民国军政启示录

（套装共四册）



现代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民国总理段祺瑞

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四川王和他的天下

关河五十州◎著

从小人物到"关外王"、"满蒙之

张作霖人生起伏、性格、格局、外



张作霖大传

——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关河五十州◎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 关河五十州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283-2

I. ①张… II. ①关… III. ①张作霖（1875-1928）-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3126号

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作　　者　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283-2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隐秘的江湖
第二章　我就是张作霖
第三章　最关键的一步
第四章　说破英雄惊煞人
第五章　我自有办法
第六章　明人不做暗事
第七章　相约取天下
第八章　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第九章　他真的叛变了
第十章　上了马就不肯下来
第十一章　黎明前的灯胆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隐秘的江湖

清末光绪年间，辽河下游有一座叫驾掌寺的村庄。驾掌寺一带地势低洼，总共有包括辽河等七八条河流在此处汇流南下，从营口入海，民间称为“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由此便造成了当地土地的瘠薄与农作物的广种薄收。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驾掌寺虽然农业不兴，但因为位于辽河沿岸，乃是各口岸前往营口的交通要道，所以市面倒是颇为繁华，也为很多人带来了弃农务商的机会。除了做小商小贩外，当地还有两种“职业”。一种是“要混钱”的盗匪，另一种是“要清钱”的赌徒。旧时东北黑道上流传着一句口诀：“千山万水一枝花，清钱混钱是一家，你发财来我借光，你吃肉来我喝汤。”

如同口诀中所言，虽然盗匪和赌徒“要钱”的方式区别很大，可毕竟殊途同归，都是要通过不太光明的手段来取财，完全称得上是一家人。也因此，据说东北盗匪抢你抢他，但绝不抢劫赌徒。驾掌寺的张有财就是个连盗匪都会手下留情的职业赌徒，他终年在各处“放局”，也就是设赌抽头，因此回家时间很少，但每月都会托人往家捎钱，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883年春末夏初，张有财突然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往家捎钱，以致家中生活都发生了恐慌。张有财的妻子王氏非常着急，她把三个孩子叫到跟前，嘱咐他们分头前去寻找，同时又托人打听，但始终都得不到下落。

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家中养的一只大黄狗从外面回来，向着王氏狂吠，并用嘴扯着她的裤腿往外拽。王氏觉

得事情有些蹊跷，也就跟着黄狗往外走。约莫走了有一里多地，黄狗钻进了一处小树林。林边原本落着许多乌鸦，黄狗一来，这些乌鸦才受惊飞起，整个气氛显得很是神秘古怪。

树林里究竟有什么？王氏走进去一看，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再仔细一瞧，赫然就是自己的丈夫，只是他身负重伤，而且已经死去很久了！

没关系，里面是空的

王氏又惊又痛，赶紧回村请“乡约”（村里管事的友邻）代他报案。驾掌寺所属的海城县接案后，知县率衙役前来验尸，证实张有财“全身无伤，惟脑后被带刃的硬物打伤而致死”，同时现场还遗留了一把铁镐，被“乡约”认出是本村王小二所有之物。

县令立刻传讯王小二，但王小二早已不知所踪。不过案情至此也基本水落石出。原来这王小二是个赌徒，案发前他在赌场上输给了张有财，但又拿不出钱来付赌资。张有财赢了钱自然是“千欢万喜，头颠尾颠”，听闻王小二的老婆有些姿色，他一时兴起，竟然半真半假地对王小二说：“你拿不出钱来，这不要紧，先将老婆送过来抵债，等你凑够了钱，再把老婆赎回。”

孰料王小二亦是当地的小混混，并非善茬。张有财话一出口，他就动了杀机。在假意答应，先求得脱身之后，王小二埋伏于路边，在张有财回家路过小树林时，乘其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镐砸向对方的后脑勺，当场把张有财给打死了。

虽然查明了真凶，可是由于案发时王小二已经远逃，如何缉拿就成了问题，而且打官司这桩事，从来都是“天大官司，磨大银子”，只有舍得花钱打点，人家才会卖力气追凶。奈何王氏家徒四壁，终究有心无力，于是这宗人命案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了。

正所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张有财得意忘形，口不择言，不但糊里糊涂地把自己送入了黄泉路，也使陡然失去经济支柱的家人陷入了困境。王氏生活无着，只得变卖房屋，举家迁往位于二道沟的娘家栖身。

张有财一共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就是张作霖，随母亲迁往二道沟时他已经十四岁了。王氏担心儿子重蹈丈夫的覆辙，就托人说项，把他送到街上高家木铺做学徒工。那个时候有句话，叫作“学徒学徒，三年为奴”，你想跟着师傅学手艺，师傅起初却只会把你当奴仆使唤。在高家木铺，张作霖除了要收拾屋子，担水做饭外，还要看孩子，倒尿盆，总之是整天忙到手脚不停，就这样，师傅还免不了要嫌长嫌短，左不是右不是地难为人。

张作霖生来就受不了这种束缚，有一天他终于发作出来。师傅让干活，一动不动；数落几句，立马顶嘴；打了几下，还手了！

毫不意外，气得浑身发抖的师傅把他赶出了门，木匠活当然也学不成了。王氏没有办法，只得又凑了几吊钱，让张作霖去卖包子。这是个不怎么需要垫付本钱的活，每天张作霖从包子铺赊账上货，然后背到附近各村去卖，卖完后再结账交钱。

卖包子同样很辛苦，顺利时还能赚上几个钱，但更多的时候是根本卖不完包子，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就只能自己把剩余的包子吃

掉，为此他时常拖欠包子钱。有一天下着小雨，没几个人出门，张作霖找不着主顾，郁闷坏了。正在发愁之际，他看到一群老太太正聚在一间屋子里玩纸牌赌钱，就凑上去瞧热闹。

王氏最怕的就是儿子再跟赌博有染，偏偏他的儿子又继承了其父的基因和兴趣。只看了一会儿，张作霖就心痒难耐，向老太太们提出带他一道玩。老太太们知道他没什么钱，哪里肯答应。张作霖就以装包子的篮子作抵押："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有包子，你们怕什么？"

到底是初次玩牌，没有经验，和三个老太太一桌玩了几圈，都是张作霖一个人全输，为此还搭上了卖包子所得的零钱。

老太太们耳聋眼花，手脚不灵，凭自己的这点机灵劲，竟然还不是她们的对手？张作霖正在懊恼，忽然外面起了一阵大风，把门窗都吹得咣咣作响。他见状穷极计生，猛地把身子压到牌桌上，一手按住自己的钱，一手把别人的钱统统搂了过来，然后下地就跑，一边跑一边嚷："这风太大了，钱都吹跑了！"

三个老太太起先还没明白过来，等到弄清小货郎是在抢赌资，才叉腰顿脚地在院门口朝他的背影大喊："扣你的包子！"张作霖听见了，就在不远处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嬉皮笑脸地说："没关系，里面是空的。"

篮子里的白面包子早就被张作霖吃光了，发现真相，老太太们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胡子

包子生意至此是做不成了。王氏于是又向邻居借了一笔钱，买了些鞋面、胭脂粉、小梳子、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让儿子到各处去卖。按照母亲的要求，张作霖背起货郎担，拿起唤铃，重又开始走街串巷，东游西逛。

货郎生意并不比包子生意更好做。每到一个地方，张作霖只要一放下箱子，人们便会围过来，挑这拣那，可是热闹归热闹，真正买的人却不多。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张作霖已经爱上了赌博，一旦碰到赌钱的，往往会扔下货郎担上去“耍”。一来二去，不仅输光了卖货赚来的钱，连货郎担也归了别人。

看到儿子又两手空空地回来，可怜的王氏欲哭无泪。她唉声叹气地对张作霖说：“我们欠邻居的债到现在还没还上，怎么办呢？”

如果之前碰上这种事，张作霖或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不管是卖包子，还是做货郎，都犹如在社会课堂进修，那些张作霖平时能够接触和认识到的人，从店铺的老板、旅店的老客、赶集的大小买卖人，再到学馆的先生、乡里的士绅，甚至是赌场里鬼混的赌徒，都是他的“一字之师”。这也使得张作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是一个走千家踏万户，知头识尾，懂得变通的“小江湖”了。

听母亲诉说完难题，“小江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一天，张作霖邻居家带崽的母猪突然掉进了村中的池塘。张作霖“看到”后站在池塘边大叫大嚷：“猪落水啦！”村民们听到喊声后都赶了过来，此时只见张作霖衣服也不脱，就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并将猪托出水面，赶上岸来。

邻居站在岸边目睹了这一场面，十分感动，对张作霖大加夸奖。之后，又上门向王氏致谢，对她说："多亏'老疙瘩'（东北人通常把家里最小的儿女称为老疙瘩，张作霖的小名叫张老疙瘩）救了猪，我们家免受了损失。你家上次借的钱我就不要了，算是一点谢意吧。"

其实猪就是张作霖连踢带踹给赶入池塘的。王氏虽然心里明白，但她也不会犯傻到把事情给挑明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邻居的好意。

一个寡妇家拉扯着几个孩子，实在是过得艰难。赵家沟有个兽医，正好丧妻，王氏便带着孩子改嫁了过去。老兽医为人厚道，听王氏说张作霖东来不成，西来不就，就说："让老疙瘩跟我学兽医吧，学成了也能混个吃喝。"

东北民间的兽医主要是给马匹等牲口治病。张作霖天资聪颖，对这行又颇有兴趣，很快就学到了一些相马和医马的本事，这也是他生平掌握的第一个真正的社会技能。

跟着继父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张作霖重又走出家门，来到离赵家沟不远的图河堡镇，在镇上的一座大车店当起了杂役。图河堡镇子不大，但却是个交通中心，到大车店来落脚的客人特别多，不过其中有不少实际是乔装成客商的盗匪，东北民间称为"胡子"。

在东北，人们常常把盗匪与赌徒并列，所谓"西北连天一块云，天下耍钱一家人。清钱耍的赵太祖，混钱耍的十八尊"。赵太祖指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此君年轻时酷爱赌博，民间甚至传说他与陈抟老祖赌棋，把一座华山都输掉了，因此赌徒皆奉他为鼻祖。至于"十八尊"，说的是十八罗汉。在佛教中，十八罗汉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的说法，所以就成了盗匪所信奉的神。东北盗匪往往会在胸前挂一尊小铜佛，此即十八罗汉中的第十七个罗汉，俗名布袋和尚。

传说从前有十八兄弟，家里很穷。为娘的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对他们说："你们出去谋生吧，一年后回来见我。"兄弟们依言出去闯荡了一年，回来对母亲说："天下不公平！"

母亲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回答是"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又问他们想怎么办，这群兄弟已经想好了答案："世上什么行业都有了，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

不知道是穷怕了，还是儿子实在太多，已把慈母心磨损得差不多了，老娘这个时候不是担心儿子们吃官司，而是怕牵连到自己，她说："你们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了吗？"

这十八兄弟同时也被盗匪们认为是十八罗汉的人间化身，他们听了母亲的话后，为了不牵连家人，杀富济贫时便戴上了插着毛的面具，民间按其形象称之为"胡子"，这就是"胡子"一说的由来。现实中，由于盗匪们长年躲在青纱帐或山林里，不能剃头刮脸，搞得一个个长发飘飘，也慢慢就坐实了这一名号。

在平原上活动的"胡子"以骑马居多，俗称"马胡子"。这是因为平原上一望千里，骑马抢劫可以做到来得快、去得急，不但方便高效，安全系数相对也高。不过"马胡子"的马多半是偷来或者抢来的，马患了病，必然只能偷偷地跟兽医接洽，以后若想卖掉，也大多需要兽医转手。张作霖没出赵家沟之前，家里就经常有一些附近的"马胡子"前来治马，到了图河堡镇上后，又在大车店碰到了此类好汉。

漂母饭韩信

“马胡子”主要依靠青纱帐作为掩护，等到青纱帐一倒，便无处藏身，加之随着严冬到来，室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马胡子”们便会打扮成普通客人，扑到车店来猫冬住宿。车店几乎成了“胡子”的第二个家，他们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把车店作为抢劫目标。

在张作霖所遇到的好汉中，名头最响的为冯麟阁。冯麟阁是海城人，小时候家里很穷，食不果腹，但身高力大，且性情好动，放荡不羁。他十七岁就当了“胡子”，流窜各地，以强悍闻名乡里。

冯麟阁住店时并未暴露身份，但张作霖凭借自己的社会经验，还是判断出此人非寻常之辈，因此非常殷勤地帮他套车卸车、端茶送水。冯麟阁很高兴，就一边端着酒杯自斟自饮，一边当着小家伙的面，海阔天空地神吹了一番自己的经历。

在张作霖面前，一扇窗户逐渐被打开了，里面有一个隐秘的江湖。与身边这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循规蹈矩的人们相比，那里面的故事无疑要精彩得多，而好汉们“喝大碗酒，吃大片肉，分大把钱”的生活更对张作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那时的东北，即便在公开场合，“要混钱”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走在路上，往往不经意之间就会听到这样的问话：“哎，朋友，今晚上帮帮忙好吧？今晚要出去抢点儿。”何况这真称得上是一个不赖的活法，东北一首歌谣唱道：“当胡子，不发愁，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真比神仙还自由。”

当地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有一个地主家来了“胡子”，进了院门就一迭声地喊：“压连子！瓢洋子！翻张子！挑龙！”

这些“胡子”说的都是江湖黑话，“压连子”意谓放马，“瓢洋子”是下饺子，翻张子是烙饼，“挑龙”是下面条。那气势，那排场，把地主家的伙计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胡子”们要吃啥，地主家就不能不做啥，酒菜摆了一大桌子。吃饱喝足，“胡子”们扔下半桌酒菜，一抹嘴走了。伙计们赶紧上前，边收拾边走，有人尚不知道来的是何方神圣，禁不住问：“他们是谁？吃得这么好！”

“他们是土匪，专吃好吃的。”

“咱们去当吧！”

没过多久，几个伙计真就上山当了“胡子”……

正当张作霖对绿林生涯心驰神往，想入非非的时候，倒霉的事发生了。有一天，“胡子”劫走了堡子里一家财主的马车，失主告官，说是张作霖拉的线。张作霖被以“通匪”罪名抓了起来，后来衙门审讯后查无实据，纯属诬告，才将其释放。

张作霖深感窝囊，他一天也不想在家乡待下去了，于是就跟着一位外出做买卖的商人来到了大高坎。初到异地，张作霖举目无亲，只能靠给人家干点零活、打点短工来维持生计。

高坎北面有个磙子泡村，村里有家姓孙的财主，雇着二三十个伙计，开了一个“饭堂”。张作霖常到“饭堂”找饭吃，一开始“饭堂”的伙

计觉得他是小孩，也不太计较，只要他到“饭堂”来，就给免费管饱。可是张作霖去的次数实在太多，伙计们就不干了，常将他拒之门外。

这件事后来让孙家老太太知道了。老太太是个寡妇，平时吃斋念佛，且喜欢积德行善。她可怜张作霖无依无靠，就让管事人把张作霖带到“饭堂”吃饭，还亲自为他缝补衣服和鞋子。

很多年后，张作霖听到一则故事。故事说韩信年轻落魄时，连饭都没得吃，整天忍饥挨饿。一个在河边漂洗丝絮的老太太很同情他，就把自己的饭菜拿出来给韩信吃，连着十几天都是这样，一直到棉絮漂洗完毕为止。这则故事深深打动了张作霖，他十分感慨地说：“孙老太太就是漂母啊！”

在“漂母饭韩信”这则故事中，终于能够吃饱饭的韩信发誓以后一定要重重报答“漂母”。未料“漂母”听后却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是太可悲了），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哪里会指望你来报答！”

就像“漂母”说的那样，大丈夫顶天立地，首先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十六岁这一年，张作霖离开碴子泡，来到了十里以外的黄家店，给财主“孙鬼子”放马。可是都已经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图河堡沾到过的那点霉运似乎仍然没有走远，由张作霖看管的一匹马走丢了，“孙鬼子”因此将他狠狠地毒打了一顿。

张作霖急怒攻心，生了重病，人躺在炕上，一连几天滴水不进。“孙鬼子”见他孤身一人，竟然天良泯灭，在一个风雪之夜，将他抬出屋，扔到了路边沟里。

第二天清晨，村里的樊老汉出来捡粪，发现后就把他救回了家。在樊家，张作霖吃了几服药，又养了一个多月，这才能够下地。

当初孙老太太给他饭吃，张作霖就拜老太太为干妈，自动给孙家放猪、扫院子，现在樊老汉搭救了他，他又选择了在樊家白干活，以报恩情。

有原则的浪荡子

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也不能轻饶，只不过后者还需要一个机会。大高坎是一座繁华集镇，商店、车店、当铺、油坊、饭馆等一应俱全，但凡有点力气或头脑的人，都能在镇上找到谋生之道。正是看到这一点，张作霖离开黄家店来到大高坎。

凭着从继父那里学到的半拉兽医知识，加上自称是知名兽医“河西段先生”的徒弟，张作霖开始行医，而且旗开得胜，一出手就治好了一家油坊的大马。

手艺人能不能揽到活，靠的是口碑。张作霖治马也有一套，把匪首“钻天燕”也吸引了过来。张作霖早就有跟“胡子”打交道的经历及其经验，他很快就通过治马跟“钻天燕”混熟了。

绿林好汉们干的那些事，往坏了说，叫打家劫舍、伤天害理，往好了说，叫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张作霖决定让“钻天燕”为他替天行道，一天夜里，他带着“钻天燕”一帮人抢劫了“孙鬼子”家，抢光财物之后又放了一把火……

来高坎谋生的这步棋看来是走对了。“钻天燕”能够上门来找张作霖治马，不啻给他做了一回活广告，到后来，连杜立三也来光顾张作霖的生意。

杜立三是辽河一带实力不下于冯麟阁的巨匪，和其他盗匪不同，此人不喝酒，不赌钱，不吸鸦片烟，最爱的就是好马，只要谁家有好马，必然要千方百计觅得而后才能甘心。杜立三本人尤精于选马，善于骑乘，他的寨子里共有精良健壮的好马两百多匹，被分为青、黄、红、白四队，每队一色，不但鞍鞯鲜明，马头马尾和马鬃也均扎以各色丝绸条子，以为标饰。

杜立三有一匹跑得最快同时又最不驯服的马，名叫“青燕子”，别人谁都不敢骑，只有他才能驾驭。有一天，“青燕子”病了，杜立三找来兽医，指着“青燕子”对他说：“这匹马你能治好吧？如果你能治好，我封你为兽医官。”兽医说没问题，不料治疗过程中药量用得过多，把“青燕子”给治死了。杜立三当即让兽医为马抵命，下令枪毙了他。

由此可见，不是谁都能或者说敢为杜立三治马，杜立三也不会随随便便把爱马交给谁治，他能找到你，就说明你确实有两下子。张作霖在高坎的身价因而被大大抬高，出现了顾客盈门的情景。

在高坎人眼中，这位外乡人开始今非昔比，似乎都已经走上了发达的道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穿上了时新衣服，腰里有了一把把钞票。与此同时，亡父的那点癖好和德性也再次在张作霖身上发酵，他成了赌场的座上客，经常在赌场进进出出，而且赢了钱便大吃海喝，挥霍一空。

年轻时的张作霖相貌堂堂，唇红齿白，“如一儒生”，没读过什么书，可模样倒长得仿佛书生一样。与他合开兽医店的于六有个小老婆叫二兰子，她暗中看上了张作霖，常常主动借钱给他赌博。有一次张作霖外出购药，二兰子假借回娘家探亲，携带细软追上张作霖，想要约他一道私奔。

张作霖虽然有浪荡子的一面，却是个有原则的浪荡子。都说是朋友之妻不可欺，怎么能跟合伙人的老婆有染？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二兰子的要求。二兰子恼羞成怒，就做了一个局，诬陷张作霖调戏自己。于六和家人赶来，不容张作霖分辩，就将他狠打一顿，然后又绑在大榆树上，准备晚上冻死。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一位在高坎开大车店的常掌柜看到，上前问明缘由，这才将张作霖解绑放下。

尽管又一次侥幸得生，但风声一传出去，兽医也就做不成了，张作霖只好暂且在常掌柜家落脚，干些零活杂役类的事。其间，只要手中有钱，他仍会出没于赌场。

人们常称赌徒为“赌钱鬼”，这是因为赌场中弊端丛生，常有想钻空子的“赌棍”三五成群，相互勾结，用弄虚作假的办法骗人钱财。由于张作霖是外地人，本地的几个“赌棍”就老是合起伙来算计他，导致他一输再输。以前春风得意时可能还不注意，或者说是不太在乎，等到混得不济时，张作霖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发现后非常气愤。

某天，张作霖又输给了那几个“赌棍”。见他们拿着钱起身要走，张作霖忙说：“我回去取钱再赌，你们再等一会儿。”几个赌徒信以为真，就立住了脚。

张作霖没有回去取钱，而是到街上卖肉摊子上借了一把杀猪刀！看到他拿着杀猪刀返回赌场，“赌棍”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际，但见张作霖撸开裤管，嗖地一刀，就从腿肚上割下了一块皮，然后使劲往桌上一摔：“我就押这块，赢了你们拿去，你们输了我也割你们一块！”

赌场争霸，讲的是赌钱赌胆，玩命冒险，所谓软怕硬，硬怕愣，愣怕不要命。“赌棍”们见状，只得将赢到的钱又全部吐了出来。

燕雀与秃鹰斗

失了财又丢了脸，“赌棍”们自然很不爽，他们憋了一口气，时时寻机报复。

高坎有个“要清钱的”六大娘。有一次，大家在六大娘家聚赌。张作霖先赢后输，“赌棍”们就故意激他说：“你上次输钱割肉，这回该割狗头吧！”张作霖没想到对方会设套，果然被激怒了，当场就动起手来。“赌棍”们趁势一拥而上，仗着人多，将他按倒在地。其中有一个人拎起一把大砍刀，便朝张作霖的屁股上剁去——看这情形，纵然不死，也得落个残废。

六大娘是个寡妇，为了护场子，专门找了一个诨号“王三五”的彪形大汉。千钧一发之际，“王三五”抢上前去，一把掐住持刀者的手腕，同时大喝一声：“住手！”六大娘也赶紧过来，制止了赌徒们的血腥报复。

这次遭遇并没有让张作霖从此夹起尾巴。有一年夏天，他在一家杂货店买东西，见到了大菊二菊姐妹，二人都是高坎街上的美女，不过已经被街上的地痞于二爷给“包”了起来。于二爷扬言：“谁敢惹她们，拿命见我。”

谁都不敢惹，只有张作霖例外。自在六大娘家遭到赌徒们的围殴后，他特地拜一位老道为师，学了点“剑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怕的，又有“剑术”防身，张作霖就大着胆子溜达到了二菊家，想会会二菊。不巧的是，于二爷也去了，张作霖终究没敢正面跟他相撞，悄悄地就离开了二菊家。

问题是于二爷可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从二菊嘴里得知此事后，这厮第二天就拎着口杀猪刀找了过来。张作霖正在六大娘那儿赌博，听到大门外于二爷骂骂咧咧地闯进来，他哪里还敢使什么“剑术”或者拳脚，吓得跳出后窗户，撒腿就跑。

不料凶神恶煞般的于二爷仍在后面紧追不舍，张作霖只好跑进了曾救他一命的常掌柜的店里。大车店地方不大，很难藏得住人，常掌柜急中生智，干脆打开炕上的几个行李卷，把张作霖卷到了里面。

因为于二爷的追杀，张作霖躲了好几天。最后由常掌柜出面，找了几个街上有头有脸的人，采取请客认错的办法，才算保住了性命。

燕雀与秃鹰斗，弄它不倒反被它笑，张作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一头病倒在了居民于天朗家的门洞里。于天朗的母亲看见了，赶紧把他救回屋，并且一连抚养了他三个多月。这也是继孙老太太后，张作霖生命中再次遇到“漂母”，他于是又认于母做了干妈。

病愈后，张作霖在高坎街上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有个叫黄木匠的，张作霖欠了他的赌资，当听到张作霖无力偿还时，他竟然当众抽了张作霖两耳光。

明白自己在高坎已无立足之地，张作霖便打算在年关前后一走了之，顺便还可以躲掉赌债。常掌柜听后，便为他凑了一些路费，当时张作霖腿生火疖，行走困难，常掌柜就把自己的毛驴也送给了他。

得知张作霖离开高坎，还骑走了常掌柜的驴，那些平时与张作霖有恩怨的赌徒们都愤愤不平。他们跑到大车店，一边数落常掌柜，一边鼓动其把毛驴要回。

禁不住众人的蛊惑，常掌柜也动摇了，当即披着旧皮袱追赶张作霖。见常掌柜顶着风雪赶来，张作霖料定他必有什么大事，忙问："干爹，这么大的雪，有什么事吗？"常掌柜本来想硬着心肠要回毛驴，没承想这一声干爹，倒又把他叫得心软了，于是便支吾着说是来送皮袱子的。

张作霖蜷着身子，在刺骨的寒风中正冻得难耐，常掌柜送的那件旧皮袱无异于救了他半条命。当下，他穿上皮袱，重又骑上毛驴，与老爷子洒泪而别。

结束在外乡的流浪，张作霖重返赵家沟。和父亲当年一样，他对从事正当职业已经毫无耐心和兴趣，只是一味地"见赌三分喜"，而且通常都是大赌特赌，输光为止。

等到囊中空空怎么办？不要清钱了，要混钱！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干脆蒙上脸去，跑到"通京御道"附近干起了劫道的勾当。

老天帮忙

所谓“通京御道”，就是地方上通往京城的官道。也是让张家兄弟给撞上了，还没等他们“耍混钱”耍出个眉目，“通京御道”上就发生了件大事，官饷被劫了！

案发后，官府大为震动。当地驻军衙门没有线索，但查到张作霖曾在道上作过案，也就拿着封皮当信读，鹰拿雁抓地把张作霖关进了大牢。

说起来，张作霖并不是第一次受这种罪，以前就曾被以“通匪”罪名抓进去。不过他知道此番若认领了“智取生辰纲”，那就是人头落地的下场，因此不管衙门怎样动刑，他都紧咬牙关不肯承认。熬到第二年春天，吉林官府抓到一名土匪，这名土匪承认是他劫了官饷，张作霖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后来张作霖回顾年轻时候的这些经历时说：“我过去是什么事都干过，文刑罚受过，武刑罚也挨过，投机倒把的事都做过……”

出狱后，张作霖无事可做，有一天他正在饭棚子里喝粥，突然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不是张老疙瘩吗？”他应声回头一看，来人身着清军号衣，再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一名在赵家沟他继父那里治过马的士兵。张作霖嘴甜，赶紧叫了声：“大叔。”士兵很高兴，付了粥钱后，又领他到饭馆，要过酒菜，边吃边聊。

正是在这名士兵的介绍下，张作霖加入了毅军。毅军是清末时非常有名的军队，论其渊源，乃李鸿章淮军的一个支派。它的创始人叫宋庆，此人身材魁梧，比一般人都要高出一个头。相传他第一次谒见

慈禧太后时，慈禧忽然指着人群中的一个人问身边的太监：“那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无礼，见了我都不下跪？”太监回答说：“那是宋庆，他这是给您跪着呢。”慈禧很是吃惊：“跪着还有这么高？好一表人才，叫他站起来让我看看！”

宋庆不但体格威武，而且膂力过人，他最早在北京一个米坊做伙计时，就引起了一名京官的注意。京官对他说：“看你的相貌，将来必定大贵，绝不会久居人下。现在国家多事之秋，你有这膀子力气，为什么不在军队里找个前途？”

不久，京官外放到安徽做知州，就把宋庆带了过去。当时捻军正在安徽一带出没，地方上为了抵御捻军，正在大办团练，京官就命宋庆担任团练长，率部堵击捻军。宋庆智勇双全，在与捻军作战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由此一跃成为同治时代的一员名将。

因宋庆曾被朝廷赐予“毅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意即“勇”）的称号，他的部队也就被称为毅军。张作霖进入毅军军营后，先被安排在厨房里做饭，接着又被调到赵德胜骑兵营当骑兵。

当时中日已经爆发甲午战争，参战的毅军原本在西北戍边，后来才从内地调到辽西，人地生疏。张作霖是本地人，熟悉地形，无论是负责到外地征购粮草，还是渡河侦察日军活动，他都能按时完成任务，同时相比于其他士兵，张作霖还有一手绝活，那就是当过兽医，会医马。旧时兵制，指挥十人的士官为什长（大致相当于班长），因表现出色，张作霖遂被提拔为骑兵营什长。

某日，张作霖忽然接到母亲的口信，说二哥张作孚因为殴杀赌徒，吃了官司，被关在省城奉天的大狱中，准备秋后处斩。听到这一

噩耗，张作霖急忙向上司谎称要回家成亲，赶往奉天进行营救。

可是张作霖在奉天举目无亲，谁也不认识，如何救法？正当徘徊街头，无计可施之际，他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说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将要率部开拔，到前线与日军作战，但坐骑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得了病。

依克唐阿也是获得过“巴图鲁”封号的名将，长期戍守东北三省，有“虎将军”之誉。这位将军擅长骑射，自然离不开宝马良驹，然而他找了很多兽医，都没有能够将爱马治好，他也为此欲走不能，万分焦急。

要救二哥，看来这是唯一一个机会。张作霖于是毛遂自荐，主动上门去为依克唐阿治马。为了把马治好，张作霖使出浑身解数，一连几天几夜都未离开过马厩。说来也是老天帮忙，竟然手到病除，真的令病马康复了。

依克唐阿闻讯大喜过望，要设宴款待张作霖，并以重金相酬。未料张作霖既不愿赴宴，又不肯收钱，问他为什么，张作霖便流着眼泪说：“将军的宝驹治好了，可我二哥就快要被处死了，我哪有心思去享受酒宴呢？”依克唐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很轻松地对他说：“你只管赴宴便是，明天我保证把你兄长放出来。”

以依克唐阿的威望和实权，赦免一个死囚不过是举手之劳。第二天张作孚就被从大狱里放了出来。

兄弟俩同返赵家沟。与先前大多恓恓惶惶地回家不同，张作霖此番可以称得上是荣归故里：清军号衣一穿，帽子上的红缨耀眼醒目，煞是威风。

大家都说张作霖当官了（实际士官仍是士兵，并不能算军官），本来作为请假借口的回家成亲也成为事实，经人做媒，乡里富户赵占元将二女儿赵氏许配给了张作霖。

起局

当作为新郎官的张作霖回到军营时，甲午战争已接近尾声，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侵入东北。依克唐阿部首先兵败，宋庆又临危受命，率毅军接茬阻击。

当时中国军队虽然在装备训练上落伍，但日本陆军也刚刚训练成功，还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在和毅军对垒时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比如有一次在平地作战时，毅军把一座院墙推倒，埋伏在墙里面，以院墙作为掩护，向日军射击。日军一拨拨被打倒，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由左右两边分别实施突袭，才迫使毅军撤出阵地。

还有一次，毅军占领了一座大沙岭子。由于指挥得当，火力凶猛，日军好几天都攻不上来。眼看战局可能扭转，半夜里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沙岭子上面顿时飞沙走石，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来。等拂晓日军再次发起攻势时，毅军士兵无法开枪，只得从沙岭子上退下来。当地老人提起这件往事时，都带着无限的遗憾，说要不是刮大风，日本小鬼再狠，也没法往上攻，沙岭子绝对丢不了。

在一本日本人所写的史话中，记载张作霖也曾亲身参与这些战斗。某夜，他一个人前去破坏日军的通信线路，不幸被捕。审讯时，他紧咬牙关，缄默不语，负责审讯的日军队长见状很感动，遂下令予以释放。

本来，这种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精神是应该得到鼓励乃至赏赐的，无奈，在东方国家只要你当了俘虏，再大的英雄也会被看成狗熊。张作霖归营后不但没得到一句好话，反遭到了上司的白眼和冷遇，这使得他想通过参军求得前途和发展的愿望彻底落空，很感灰心丧气。不久，随着中日签定《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了。毅军奉命移防关内，张作霖不愿随军入关，就开个小差，逃回了家乡。

回到家的张作霖仍然离不开赌场，经常和二哥张作孚一起混迹其中。兄弟二人因为要赖还跟人打起架来，对方吃了亏，便到县衙门告状，说二人通匪。实际上，他们连偷偷摸摸蒙面打劫的事都没再做过，只是张作霖自己为了炫耀，时时吹嘘与胡子们关系不错，不幸就成了他们“通匪”的证据。

这回出手相救的是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拿出一笔钱，托人作保，将张氏兄弟从大牢里放了出来。

对于已经“三进宫”的张作霖来说，现在唯一能够开颜一笑的也许就是在赌场上能够得意了。然而俗话说“久赌神仙输”，没多久他又输了，而且输得清洁溜溜，一文不剩。

就在他垂头丧气地往家走的时候，相邻的沙岭村有两头猪溜了出来，张作霖眼前一亮，就想把这两头猪偷去换钱。想不到的是，两位“天蓬元帅”是沙岭民团头目家的。这家人发现丢了猪后，派人四下寻找，张作霖被逮了个正着。随后他便被押回沙岭村，遭到一顿暴打。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四乡八邻都知道了“张老疙瘩”偷猪且挨揍的事。张作霖颜面扫地，整日闷坐在家里，连最爱的赌场都不去了。

兵当不成，钱赢不了，在极度苦闷的日子里，那个一直对张作霖充满吸引力的隐秘江湖重又浮现在眼前。这正应了那句话，“狗逼急了咬人，人逼急了为匪”，不错，当“胡子”有被抓捕乃至杀头的危险，可是人过得潇洒啊，至少不用担心挨饿或被人羞辱。

发现张作霖竟有了入草为寇的念头，岳父赵占元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但哪里拦得住，张作霖终于还是选择了剑走偏锋，铤而走险。

要做“胡子”，当时有两个渠道：一是占山为王，黑话叫“起局”，一是入伙，黑话叫“挂柱”。“起局”得有“局底”，也就是枪支弹药这些家当。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为防匪患，有钱人不是请官兵护院，就是自己出钱养兵，组织“村团”“联防”之类杂七杂八的队伍，张作霖便在这个上面动起了脑筋。他听说大地主“武善人”家雇伙计，于是就跑去应征。

应征时，张作霖对“武善人”的管家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明天把我挣来的粮先送来，一年八石高粱，没粮折钱也行！”管家一听，这条件不高，就满口答应下来，双方还签了合同。从“武善人”家里走出来后，张作霖又到周围几个村庄的有钱人家转了转，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和条件把自己雇了出去。

一共是八家人，收到他们送来的钱或粮后，张作霖先跑到黑市上买了一把十发手枪，接着便通知东家们来他家庆贺“上工之喜”。八个东家都派来了人，张作霖给来人每人倒上一碗白开水，自己也端起一碗，说起了开场白：“诸位一定纳闷，张作霖这小子穷死巴活的，今天咋这么肯出血，摆上八碟八碗两大件来款待各位呢？其实这是你们自己的钱！”

众人听了这话，大眼瞪小眼，都没明白过来。

张作霖说："你们也不用瞪眼。我今儿个就是请你们来庆贺我入胡了的！是你们每人出了八石红高粱，不然我用什么去买这把枪呢！"说完，他拿出崭新的手枪，"吧嗒"一声放在了桌上。

在座的人大惊失色，谁也不敢吱声。张作霖把话题一转："不过诸位，你们也不必胆战心惊。俗话说，好狗护三邻，好人护三屯，我入胡子是为了养活老母，一旦成了局，决不骚扰你们乡亲。"

张作霖说的倒都是实话，"胡子"有个规矩，即兔子不吃窝边草，或者叫好狗不吃门前食，平时不管如何作恶，总之不会打搅难为父老乡亲，这就是所谓的"人身为匪，乡情还在"。自然也免不了有坏了规矩，在家门口打家劫舍的主，"胡子"里面称他们为"邪胡子"。对"邪胡子"，一般立住脚的"胡子"视之为敌，只要抽出机会就会进行收拾。

劫马

酒桌之上，张作霖也撂下话："你们谁要是丧良心，和官兵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了。再说，我起事造反的枪支弹药，都是你们几家出钱买的，捅漏了谁也别想好！将来我干好了，就加倍还你们！"

末了，他问道："你们甘不甘心？"

大伙唯有打掉牙往肚里咽，回答："甘心！甘心！"

"同不同意？"

“同意！同意！”

“好！”张作霖一挥手，“把你们的合同都拿回来，咱们重新签字！”

大家只好依言取来原合同，由张作霖毁掉，再重新签约。当晚，张作霖把这些人全部灌醉，然后挎上枪，离开了家。他首先找到当年在大车店给他做过“启蒙教育”的冯麟阁，由冯麟阁介绍，加入了洪辅臣帮派。

辽河下游本就是“胡子”集中的地区，经历甲午战争后，社会的动荡不安更使盗匪蜂起，一个辽河西岸竟然聚集着一百多股“胡子”，每当青纱帐起时，几乎路断行人，所以有人称之为“土匪窝子”。在这其中，最大的三股分别是冯麟阁、杜立三、洪辅臣，呈三足鼎立之势。

张作霖实际加入的是洪辅臣下面的一个小帮。在“胡子”里面，小喽啰叫作“崽子”。“崽子”必须绝对服从大小头目的命令，打仗（或者打劫）时勇于冲锋陷阵，下来时甘于站岗放哨，到年终或休息时，再和其他“崽子”一道分点酬劳。张作霖自然不想老做一个“崽子”，但要按部就班地从“崽子”升到头目，又没这个耐心。于是过了不久，他就拉上二十九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离开小帮，在外面拉起了自己的队伍。

由于根基较浅，没有固定的势力范围，最初他们只能跑东跑西地到处流窜。一次，张作霖带着人想进入姜家屯歇息，但遭到了洪辅臣的一个头目“二谷瘪子”的阻拦。即便在洪辅臣帮派内，分了炉灶的各小派之间也是各吃各饭，姜家屯属于“二谷瘪子”的势力范围，他自然有充足的理由不让张作霖进来与之争利。

就在张作霖进退两难之际，姜家屯一个当铺的钟掌柜帮忙，他借口要请张作霖为他医马，将他们接入了姜家屯。歇息完毕，张作霖一伙人准备离开，恰好与一群做马匹生意的马贩子不期而遇，后者拥有刚刚从蒙古贩运来的大批好马。

对于“胡子”来说，好枪好马都是稀缺资源。张作霖等人一见眼就红了，他们一拥而上，从中劫夺了五十多匹好马。这样张作霖及其手下人就一人有了两匹马，可以一坐一换，他们也因此由“步胡子”变成了“马胡子”，不仅可以在辽西平原上纵横驰骋，而且也不再为别的帮派所小觑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作霖一直困厄潦倒，坎坷多难，很多次还差点命赴黄泉。他发迹后，就有人把他死里逃生的遭遇归结为有福，认为有福之人当大官掌大权乃是命中注定的事。

一般认为，张作霖的祖籍是山东，但也有资料显示是河北省大城县的冯庄，包括张作霖及其家人都这么认为。据说张作霖还曾专门回冯庄祭祖，其间就有遗老指着村头子牙河边的两棵老槐树，对他说：“你老人家高官得做，是有家乡老神树保佑啊！”

原来村里传说，清咸丰年间，忠亲王（即僧格林沁）曾和太平军激战于子牙河边，当时太平军数十人围住僧格林沁，拿箭射他。僧格林沁借着两棵老槐树的庇护，得以安然无恙，从此这两棵树也就成了当地的“老神树”。

张作霖听后只是一笑了之。在他的心目中，如果有什么能够保佑自己，姜家屯也许比“老神树”更有代表性。因为正是从在姜家屯劫马

起，他的命运才开始发生真正的转变，仿佛是一夜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顺利起来了。

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

小帮毕竟还是小帮，要想在这么多帮派中间求得生存发展，有时仍得投靠大帮以求自保，这在江湖中称为“靠窑”，张作霖新找到的“靠窑”对象是程敬芳、程敬双帮派。

“胡子”这一行可谓是“行低人不低”，大帮里都有独特的组织机构和职务分工、名称。通常情况下，帮会首领被称为“大当家的”，又叫大哥、大掌柜，坐第一把交椅，可以发号施令，总领一切。其次是“二当家的”，也叫“正炮头”或“总炮头”，主要负责在退却时为队伍断后。

张作霖初来乍到，一、二把交椅都轮不上，他坐的是第三把交椅，称为“揽把”或“兰把子”，专司“秧子房”。“秧子房”是所有绑来的人质（称为肉票）集中关押的地方，由于绑票勒索为“胡子”的主要活动及生活来源之一，所以“秧子房”的地位很重要。

张作霖入帮后做成的第一桩“买卖”，是绑了两大车富人家的女眷。人们印象中的盗匪往往脱不开“烧杀奸淫”这四个字，但匪有匪道，东北“胡子”在后两个字上其实定有严规。首先，为避免动摇军心，“大当家的”一般不能有“家”，也就是娶媳妇（当然也有例外）。其次，严禁“压花窑”，即用强迫手段糟蹋女人。对于“压花窑”的人，他们称为“严岔子”，处理很严，一般都是死刑。

在绑女眷的过程中，张作霖对手下看得很严，底下人对这两车女眷连一句玩笑话都不敢说。事发后，富人家也如期赎票，如数交银。尽管如此，张作霖对绑女人为人质这件事仍旧十分不满。

除此之外，身为“兰把子”，必须心狠手辣，即俗语说的“心硬”。有的肉票自被抓起，就一直被绑在马上随“胡子”行走转移，无法移动，天长日久，屁股都让马背给磨烂了，大腿上生了一堆一堆的蛆。“胡子”们既怕肉票死掉，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就只能用火来烤肉票腿上的蛆。在烈火熏烤下，肉票疼得爹一声妈一声地拼命叫唤，情形惨极了，面对这一情形，胆子小或心软一点的“兰把子”根本无法承受。张作霖的胆子不算小，但心实在没那么硬。

绑了票，就要设法使人家赎回去，不然就没意义，这叫“甩出去”。为了确保尽快“甩出去”以及防止肉票逃跑，“秧子房”每天要对肉票用刑，所用刑罚大多非常严酷，其中的“熬鹰”更是令人谈之色变。“熬鹰”时，“兰把子”会先命令肉票们围着一堆火坐下，然后交给他们一个拨浪鼓或者铃铛，让他们从一头开始摇，每人摇五下，摇完再传给下一个人，到谁那里停了，监视的“胡子”就从背后给谁一棍。有人几天几宿没睡觉，被熬得受不了，摇着摇着就扎到火堆里，重者当场被烧死，轻者也得被烧个“满脸花”。

张作霖耳闻目睹，觉得这些事真的是太缺德了，他干不了。于是很快他又率部脱离双程帮，回到了赵家沟。日后张作霖发了迹，上山为匪这段经历虽然无法回避，但他总是理直气壮：“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了？那时候我就是不服天朝所管！”

张作霖回赵家沟前，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东北也出现了杀洋人、焚教堂的义和团组织。1900年7月，俄国以“护路”为名，出动十几万部队侵入东北，直接剿杀东北义和团。10月，俄军将领阔比萨尔率部占领奉天，盛京将军（盛京为清代对沈阳的称呼）增祺被迫逃往辽西。

逃亡过程中，增祺所率仁字、义字两军在辽西溃散了两营，这些游兵散勇抵抗俄军虽不足，骚扰百姓却有余，当地有句俗语“兵匪一家”，就是说这些当兵的有时和“胡子”一样坏。在辽西一带，地方政府的运作完全失灵，清兵、“胡子”四下出没，到处抢劫，搅得乡里极不安宁。为了自保，地方士绅纷纷组织起由练勇所组成的“保险队”（也叫大团），通过“保险队”来为当地做“保险”。

什么叫“保险”？就是你这个村庄，他这个村庄，都由“保险队”负责保护，村里则每月付给“保险队”多少钱，以供练勇们吃喝穿用。有人套用戏曲中不太好听的说法，称之为“坐地分赃”。

“保险队”负责保护的区域叫作“保险区”，“保险区”付给“保险队”的钱就是“保险捐”，有钱的士绅多交一些，那些没什么钱甚至是赤贫的居民可以免纳。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有兵匪抢掠“保险区”内村民的牛马车畜等财物，“保险队”必须派人追捕，乃至将祸首处死，就好像官府一样。那段时间内，辽西各地都呈现出“似无治安而有治安”的奇怪现象。

当大股“胡子”过境时，“保险队”首领还要率部到境外迎接，一半监视，一半备战，总之一句话，务必要确保其秋毫无犯。倘若对方缺乏江湖义气，不守江湖规矩，双方就免不了要大打出手，来一场恶斗。

说起真刀真枪的恶斗，除了官军，当然还是“胡子”比较在行，所以练勇一般都是被招募的游兵散勇或者“胡子”。张作霖这一回家可谓正逢其时，在岳父赵占元及其他乡绅的协助下，他也在赵家沟成立了一个“保险队”。

“万人喜”

由于鱼龙混杂，有的“保险队”非但不能很好地维护地方，反而还勒索乡里，成为一方祸害。赵家沟西北的金寿山“保险队”就是这样。金寿山原为北洋新军的一个哨官，因受不了军队的约束，便回到家乡做起了“胡子”。虽说眼下改做了“保险队长”，但他恶习不改，除对所在“保险区”征粮征饷外，仍旧公开勒索抢劫。

与他们相比，张作霖算是非常守规矩。他从不允许手下在自己的“保险区”内乱抢乱夺，如果有别处的兵匪前来抢掠，他就竭力联系说服，让对方停止骚扰。

村民们得到苟安，对张作霖大加称赞，张作霖也抓住时机，不断扩大自身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不久，一支官府驻军奉命返京。这支军队军纪很坏，沿途到处扰乱地方，掠夺民间财物，所以当他们经过赵家沟一带时，有人为免搅扰掠夺之苦，曾欲进行阻击并劫持带队官佐。

劫持朝廷命官乃是不赦大罪，到时官府进行报复，反而更要遗祸地方。深知其中利害的士绅们赶紧采取了一个办法，即把兵丁领到各处加以招待，以防止生变。张作霖听闻后自愿分担责任，把四十多名

官兵领到他岳父家住宿，不过他对这些官兵都有言在先：“吃喝是有的，但是杀猪宰羊是办不到的。”

官军走后，张作霖很快成了一方名人，“保险区”外的一些村庄也开始慕名请他前去保护。“保险队”能够得到的“保险捐”多少，主要由“保险区”的范围大小（称为“会圈儿”）以及区内民户的贫富而定，受张作霖保护的村庄多了，他拿到的“保险捐”自然就多了。

有利益就有争夺。自有了“保险”这个新生事物后，大小“胡子”们几乎全都“与时俱进”，成了各霸一方的“保险队”。张作霖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免不了遭到他们的忌妒，这其中就包括张作霖最早投奔的洪辅臣。一天，洪辅臣派人给张作霖送来请柬，邀他上门做客。张作霖虽然明知赴的是鸿门宴，可是又怕正好给对方留下大鱼吃小鱼的借口，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张作霖打小就在社会上混，练出了一副好口才和善于察言观色的细腻心思，人送绰号“万人喜”。见到洪辅臣后，他有问有答，应对自如。洪辅臣见状，杀气反倒慢慢消减了下去。张作霖很会来事，赶紧又趁热打铁，掏出自己的镀银小手枪，连同枪套一起送到洪辅臣面前：“此乃本人护身之物，今欲献出，请笑纳。”

洪辅臣对手枪赞不绝口，一边接过手枪，一边嘴里却说：“此乃你心爱之物，我倘若收下，岂不是夺人之美？”张作霖双手一拱：“如果嫌弃，就是看不起我。今后，我张作霖愿意听命于洪大哥。”

洪辅臣心花怒放，完全放弃了吃掉张作霖的想法。两人告别时，他破例送出很远，还对张作霖说：“后会有期。”

在张作霖事业草创阶段，汤玉麟是另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汤玉麟乃“胡子”出身，与张作霖一样，他之所以落草为寇，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外界的强烈刺激。当年他做车把式，赶车行至中途，遇到一股“胡子”，结果不仅货物被洗劫一空，自己还挨了一顿打。汤玉麟咽不下这口气，就干脆自己也上山做了“胡子”，并且逐渐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辽西匪首之一。

能够在辽西一百多股“胡子”中闯出名堂，当然都不会是等闲之辈。除了枪法精准外，汤玉麟主要以膂力过人、勇猛凶悍著称，绰号二虎子，又称汤二虎（因在家排行老二）。据说他早年混迹赌场时，为了跟别人斗狠，曾以烧红的铁通条烫自己的肋骨，其间谈笑自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为匪后，汤玉麟继续了这种二愣子精神，悍不畏死，敢和围剿的官府兵丁直接对抗。

张作霖和汤玉麟结缘，是因为有一次官兵包围了张作霖，汤玉麟挺身而出，率部解围，救了他的命。张作霖遂与汤玉麟金兰换谱，结为兄弟，相互盟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有这样一首民谣描述当时辽西的江湖格局：“冯麟阁占东山，洪辅臣半边天，抢官夺印金寿山，汤玉麟闹得欢，张作霖坐地保险要银捐。”在这其中，做“保险”的张作霖乃后起之辈，同其他大帮派相比也显得势单力薄，但他的发展势头却很快，其“保险区”以中安堡镇为中心，已由最初的七八个村庄逐渐增加至二十七个村庄。

中安堡原为金寿山的势力范围，由于金寿山为非作歹，称王称霸，百姓不堪其扰，才主动邀请张作霖前去办“保险队”。张作霖占据中安堡，就把金寿山的地盘分出去了一部分，对金及其部众的收入有

不小影响。金寿山听到这个消息气得不得了，但是转念一想，他又觉得如果能够让张作霖亲俄，倒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弥补自己的损失。

砸窑

俄国派兵大举入侵东北，剿杀义和团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目的是要吞并东北。俄军高级参谋马德利多夫大校认为，要想真正把东北变为沙俄帝国的一部分，除使用正规部队外，还必须注意联络当地的绿林武装，使之辅助俄军的侵略行动。

马德利多夫的主张引起了俄国远东军总部的重视，于是便委托他在东北进行招募。按照俄军的要求，凡是应募的“胡子”都要在肩膀或手臂上佩戴“中俄旗式”的标志，老百姓私底下称之为“花膀子队”。金寿山最早加入“花膀子队”，并为马德利多夫穿针引线，拉皮条式地招降其他“胡子”。

当时马德利多夫对刚刚崛起的张作霖十分感兴趣，就把拉拢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金寿山。金寿山合计下来，若是能够趁机说动张作霖，就便可以从俄国人那里领到更多的好处，强过与其动刀动枪。当下，他便带上厚礼，赶往张作霖设于中安堡的团练部。

见到张作霖后，金寿山直言不讳地让张作霖和他一道投靠沙俄，给俄军当眼线，同时承诺只要张作霖肯这么做，不但可以不再计较“抢地盘”的事，双方还能结成同盟。

至1900年年底，东北全境各主要城市及主要交通动脉均已被俄军占领，东三省全部沦陷。这些俄军军纪败坏，经常三五成群地从据点

里跑出来为非作歹，而且每每闯入民宅中侮辱妇女，为老百姓所切齿痛恨。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可不愿意像金寿山那样没骨气，为了“金卢布”出卖自己的国家和乡亲。没等金寿山把话说完，他就顶了一句：“我不参加俄军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来操心！”

金寿山碰了一鼻子灰，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没过几天，就把“砸窑”的目标对准了中安堡。

像很多假意上岸洗白的土匪一样，金寿山虽然表面上挂着“保险队”旗号，但从思维模式到实际做法，从来都没有脱离“胡子”的一套。“砸窑”乃黑道行话，就是指攻打村寨城镇，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按照坚固程度和防御设施的配备情况，“窑”又可分为“软窑”和“硬窑”。“软窑”的外墙由柳条子、木板障子构成，寨内无炮台，只是在屋角、道栅、马圈、猪圈里设有“暗枪”。“软窑”相对来说容易“砸响”，比较难“砸”的是“硬窑”，不仅有砖砌或土打的外墙，寨内还有炮台。所谓炮台也就是碉堡，当然不是家家都有，只是有的人家有碉堡，但已能起到足够的警戒和防御作用。

由于男人们白天干活，晚上要休息睡觉，所以一般情况下，天黑后都是女人到有碉堡设备的人家待着，一旦发现有什么动静，立即开枪报警，这叫“响窑”。这时候，睡觉的男人特别是练勇就会赶紧起来御敌。

中安堡镇属于“硬窑”，有不少炮台，且防范较严，所以虽然张作霖的人马不多，但金寿山也很难“砸响”。这边张作霖一面组织抵抗，

一面向自己的结义兄弟汤玉麟紧急求救。汤玉麟很讲义气，星夜赶到中安堡为张作霖解围，金寿山畏惧“汤二虎”的悍勇，只得撤兵而去。

前后两次被汤玉麟所救，张作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两人的兄弟感情也得到进一步巩固，汤玉麟受邀进入中安堡，两帮自此合二为一。合并了当然还要再排一排座次，汤玉麟甘愿为张作霖鞍前马后地效力，在他的拥戴下，张作霖坐了新“保险队”的头把交椅。

没有吃掉张作霖，反而还帮助对方增强了实力，金寿山哪里甘心。“胡子”里有句话，叫作“砸窑先砸红窑”，那些有相当底气的“硬窑”为显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吓唬住“胡子”，往往会在烟囱上绑一面红旗，意思就是你要砸就砸，爷不怕，这就叫作“红窑”。“胡子”们固然知道“砸红窑”有多难，轻易不敢擅动，但一有机会总希望自己能砸下来，因为“红窑”的油水大不说，还能借此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在金寿山眼中，中安堡已成为必须砸下来的“红窑”。对于如何“砸红窑”，“胡子”们也积累了一套经验和办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买村寨里的人，称为“内盘”，以便里应外合。

问题是金寿山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来安插“内盘”，就在他为此抓耳挠腮，无法可想的时候，干儿子马某献了一计，说不妨如此如此，金寿山听后连连称好。

东亚义勇军

这一天，马某率五名部下携械来到中安堡，声称敬佩张作霖的为人，不想再跟着金寿山干了，要求加入张作霖的“保险队”。张作霖正

在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就把六人全都收了下来。

张作霖当然也不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对马某等人进行了暗中观察。观察下来，这六人让什么就干什么，非常听话，也不见有任何越轨行为，便放下心来。

其实马某等人就是来做“内盘”，当卧底的，他们本想直接暗杀张作霖，但始终无法下手。一直等到新年将至，张作霖吩咐预备吃喝，打算年底犒劳大家。六人私自商议，认为是个机会，便向张作霖告假，说要回家过年。张作霖不疑有他，就放他们回去了。

马某等人在充当卧底的日子里，早已将中安堡内“保险队”的防守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他们回去告诉金寿山，中安堡的西北角无人看守，可以从那里进行突破，而且“张作霖心中无事，正高高兴兴地杀猪宰羊，一心一意地张罗过年，没有什么防御准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地攻打他们，肯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金寿山听了大喜过望。就在1901年的除夕晚上，他带上所有部众，加上俄军的一个哥萨克骑兵中队，由中安堡西北角突入，包围了张作霖的团练部。

听到外面枪声四起，喊杀声大作，毫无戒备的张作霖慌了神，因为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来了多少人，只得手持双枪，率部边打边突。好在他对中安堡的环境十分熟悉，又有夜色掩护，其间钻胡同绕巷子，总算摆脱了追杀。

张作霖的结发妻子赵氏这时正好有孕在身，大女儿年纪尚幼，两人都行动迟缓，又幸亏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另一个得力手下挺身而出，一人背上一个，才在张作霖的拖后掩护下脱离了虎口。

丢掉地盘也就意味着丢掉了“保险队”这个饭碗，张作霖只能重操旧业，带着少数亲信沿着辽河两岸“打野食”，也就是能偷偷点，能抢抢点，同时一面收留陆续逃回的残部，一面招收新人，以图东山再起。当年春天，就在他入驻辽阳西唐马塞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姓花的人拿着“徐老帅”的名片求见。“徐老帅”是辽阳东北的一个民团首领，名高望重，威震一方，他介绍的人张作霖自然不能拒之门外。

这位花某是个中等身材的小胖子，留着一条不长的辫子，他的两个随从则都是和尚头，主仆装扮显得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同时花某虽然说一口山东话，但说话时总有一些口齿不太清楚的地方，而且往往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得要领。张作霖闯荡江湖多年，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不知见过凡几，对此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听花某说来东北访友，需要借地住宿，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晚上，两人促膝交谈，张作霖发现这个花某特别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像什么俄军进占辽东、在奉天驻兵，盛京将军增祺被迫逃往辽西，中国皇家陵寝北陵（即昭陵）也驻扎了俄军炮兵等，都知之甚详。

张作霖对此大受触动。当时沙俄确实已成为中国政府及东北民众的心腹之患，《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争端本来已告解决，八国联军也陆续撤退，可俄军就是死活不肯撤出东北。

张作霖时年二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聊到激动处，大有国难当前，恨我徒手之慨。两人越谈越投机，花某便提议双方结拜兄弟，张作霖立即答应下来。

第二天互换谱帖，见花某的帖子上写的是花田林助，张作霖就笑着问他为什么会取四个字的名字，因为这样的人名在大清国殊为少见。花某这才道出真相，原来他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陆军少佐花田仲之助，剃发蓄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隐蔽身份，以混入中国内地，两个和尚头的随从则是保护他的武士。

在花田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再谈话就不能不涉及甲午战争了，张作霖对此尤为敏感，因为当年他还曾作为毅军的一员，与日本陆军打过仗。花田对此的解释是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和，纯粹是白种人从中作祟的结果，而且战后日本把东三省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并未侵占中国土地。“白种的俄国人”不同，他们欺中国软弱，赖着不走的目的就是企图吞并东三省。

甲午战争毕竟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事过境迁，中国的大敌变成了俄军。花田宣称，日本一向抱着亚洲是黄种人的世界的宗旨，决不允许白种人来侵略，现在就甘愿帮助中国驱除强俄，同时这种帮助纯属义务性质，绝不会因此侵占中国一寸土地。

据花田说，他本人实际为日本陆军省所派遣的“别动队”成员，来东北的目的，就是奉长官之命，组织反俄的“东亚义勇军”。目前已在辽东建立了两支队伍，辽西为第三队。

见张作霖及其手下听得入神，他又继续鼓动道：“我邀请诸位来参加这个义勇军，将来立下了大功，诸位是有官可升，有财可发的啦。”

这时张作霖一共还有二十七名手下，大家一致赞成加入“东亚义勇军”，并公推花田为盟主，表示要在他的指挥下驱除俄军。花田则委任张作霖为招募官，负责为义勇军继续招募人员。

加入义勇军并不是光嘴上说说这么简单，每个人都用铁丝在头上烙了印，以作为同盟标记。花田又拿出一堆日本银币，每人赠予三元。另外还分送了辽帖（辽阳地方使用的纸币），张作霖拿到一百吊，其他人各五十吊。

花田办完事便告辞而去，临走时他给张作霖留下了暗号文件，并答应三个月后送来军饷、枪支、弹药和军服。

那一堆大缸不可以扣人吗

三个月的约定时间未到，有人却把张作霖与花田结盟，大搞“东亚义勇军”的事向俄军告了密，俄军立即派出十余名哥萨克骑兵对张作霖进行搜捕。

张作霖刚刚招了四十个新兵，但在花田送来装备之前，人员多半是有枪无马或有马无枪。步枪在当时的攻守作战中必不可少，同时也是最为实用的武器，张作霖部的枪支多为老式的单发步枪，与俄军可连发的新式“水连珠”大枪没法比，加上缺乏准备，仓促应战，他们很快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张作霖仅率四个人冲出重围，向白旗堡方向逃去。

哥萨克骑兵紧追不舍，眼看对方就要追上来了，张作霖等人只好弃马避入村庄，慌不择路之中，一头闯进了村里一座大院。当年东北农村盛行喝烧锅酒，差不多每个村子里都有酿酒作坊，那座院子就属于作坊的一部分。烧锅掌柜姓彭，见这五人跑得满头是汗，就知道后边必有追兵，他有心搭救，但又发现院子里无处藏身。

正待另想他法，一个打更的忽然指着院子里的空酒缸说：“那一堆大缸不可以扣人吗？人蹲在里头，我再四下扫去脚印就行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彭掌柜赶紧指挥众人将酒缸倒置，然后让张作霖等人藏到里面。

藏好不久，就有六名哥萨克骑兵入院搜查。彭掌柜把他们让到柜房，请他们喝起了烧锅酒。“老毛子”（东北人对俄国人的称呼）大多嗜酒如命，这几个家伙看到酒眉开眼笑，便再也顾不得在院子里仔细搜索了。那时正是冬季，天黑得特别快，天黑下来后，从村西传来狗叫声，“通事”（即翻译）认为可能张作霖等人在村西。哥萨克骑兵听翻译这么一说，就一边吐着酒气，一边跨上马，往村西奔去了。

俄军一走，大家都松了口气。酒缸被抬开后，张作霖等人爬出来，先到屋里暖和一会儿，吃点东西，彭掌柜又让人找来可供他们乘骑的马匹。能够绝处逢生，五人均对彭掌柜感激涕零，遂一齐跪下来叩头：“你老就是我们五个人的再生父母，我们认你老为干爹。”

因为怕俄军再来搜查，张作霖不敢久留，匆匆辞别彭掌柜，冒着雪连夜赶往姜家屯，准备投靠在那里做“保险”的洪辅臣。

张作霖落魄之时，正是洪辅臣显赫之际，他的“保险队”有两百多人，“保险区”以姜家屯为中心，已扩大至周围六十几个村屯，锦州以东的“保险区”数他的范围为最大。人一阔，脸就变，洪辅臣虽因当初张作霖赠枪之谊，不得不予以收留，但见对方如此狼狈，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平日里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还时常对张作霖加以辱骂。

张作霖不是一个没有肚量的人，也不是完全忍不得气，最主要的是相处时间一长，他发现洪辅臣与金寿山并无什么分别，也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除了一味勒索乡里外，没有什么更长远的目标和计划，跟随其左右实无前途可言。另外，洪辅臣对人粗暴，匪气十足，杀个人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他的副手对他早已切齿，张作霖怕就怕一旦发生内乱，自己会被卷进去。

若不早作退步，将来必招祸害。在洪辅臣处勉强待了两个多月后，张作霖便借口新年看朋友，挂印封金，脱离了他的地盘。

众人沿辽河一带南下，路上又收集了一些旧部，但总计也不过四十多人，枪械则既少又差。想到这一切都是拜花田和日本人所赐，而自从自己落难后，花田就再未露面，张作霖便气不打一处来，一路上大骂日本鬼子欺骗人。

饥者易为食

张作霖现在的摊子又恢复到了历史上最微弱的时候。靠这么一点人马，显然很难在弱肉强食的江湖中独立支撑门户，随便哪里来一个大帮，就能把他们给一口吃掉。

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投靠一个大帮头，以作安身之计。张作霖打算去找冯麟阁，冯麟阁是张作霖进入绿林世界的引路人，同时又是江湖上尽人皆知的老前辈，手下号称千人，能依附于他的羽翼之下，起码先让自己缓口气是没问题的。

打定主意后，张作霖一行便动身前往冯麟阁所在的高坨子。天亮时，一行人到达了一座名叫雷家屯的村庄。雷家屯是一座小村庄，村民们怕张作霖等人“砸窑”，因此招待得特别殷勤，又是给他们包饺子，又是帮着喂马。

张作霖打听到，从雷家屯到高坨子还必须经过八角台。这八角台是个大集镇，镇上有五十多家商号，为了不被“砸窑”，他们除把土围子修得像城墙一般外，还雇用三十余名炮手（即练勇）组成团练。周围“胡子”们虽都将八角台视为一块大肥肉，但谁都不肯轻易染指。

张作霖估计，要从八角台通过很不容易，若不事先打好招呼，必然会遭到强力阻击。于是他就对村民说：“请分神给我找个人去一趟八角台镇，向那里的负责人送个信，就说我张某要借道一过，经过八角台镇前往高坨子，与冯麟阁‘会哨’（黑话，意思是两股或多股‘胡子’会合）。”

村民依言派人拿着张作霖的名片，前往八角台接洽借道事宜。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叫张子云，秀才出身，善于交际，见过不少世面，平时镇上的大事小情都由他说了算。听送信人报告来意后，张子云赶紧召集绅商们开会，商议此事。因为早就听闻张作霖做“保险”时纪律不错，保境安民，所以他在会上首先提出：“张作霖的名誉很好，借道的问题可以商议。”

借个道当然没关系，可毕竟与张作霖从未谋面，万一对方以借道为名，行“砸窑”之实怎么办？张子云反复掂量后，把送信人叫来问道：“张作霖有多少人枪？”

因为来之前，张作霖曾特地叮嘱送信人，要他吹嘘一下自己的实力，以免被八角台的人看扁，所以此人就夸大道："一共四十多人，每人一支枪。"

"背的什么枪？"

"不知叫什么枪，枪上都有疙瘩楼。"

当时的枪械分两种，一种是老式的单发步枪，一种是新式的连发步枪，后者又称快枪，"疙瘩楼"是快枪的一个明显特征。

得知张作霖竟然拥有四十多支快枪，张子云不免有些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就问炮头（也称团练长）张景惠："我们的力量怎样？"

张景惠手下的武器也算齐全，共有洋炮十支、洋抬杆三只、快枪数十支，其中的洋炮、洋抬杆都属于老式的单发步枪，而快枪数量又不及张作霖，所以张景惠只能回答："恐怕打不过他们。"

与会的绅商听后如坐针毡，有个性急的当即插话说："要是真打起来，我们又打不过，到时如果再放他们进来，肯定要被抢劫一番，那样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经过商议，没有人主张来硬的，张子云一咬牙，干脆人情做到底，于是拍板告诉送信人："我们不但借道，而且还欢迎他们进来。"

却说送信人走后，张作霖一直心情忐忑，不知道结果如何，听送信人回来一报告，不由喜出望外，立即率队前往八角台。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八角台北门外鞭炮齐鸣，张子云领着十几个镇上的头面人物早已迎候多时。

张子云原本就对张作霖抱有好感，这一见面，发现对方果然相貌温雅可亲，跟一般的“胡子”或“保险队长”大相迥异，遂起结交之心。两人一个抱拳致谢，一个挽手寒暄，气氛十分融洽。

接下来两人叙谈。张作霖只在小时候念过一段时间的私塾，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万人喜”的绰号到底不是白得来的，跟张子云这样的老秀才聊天，居然也能聊到一道去。张子云和他谈得很是投机，一高兴，就叫他休息两天再走。张作霖及手下一路奔波，早已人困马乏，面对主人盛情，自然乐呵呵地就答应了。

张子云身兼镇上烧锅酒作坊的财东，他把张作霖及其部众安排住在自己作坊的两座院子里，一座院子里住二十多人。住的条件虽然谈不上多好，但张作霖等人“饥者易为食”，有人肯让他们休息两天，已经感到非常满意，所以并无怨言。

真正让张作霖发愁的，是外面传闻冯麟阁已经马失前蹄，而且跌跤跌在了跟他张作霖相似的坑里。

以利相诱

事情还得从甲午战争期间的《马关条约》说起。按照《马关条约》，中国须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主持签约的清室重臣李鸿章为了保住国土，不惜引狼入室，联合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已在甲午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国力，根本没有与这三个欧洲强国直接对抗的实力和把握，这才不得不放弃了辽东半岛。

花田对张作霖说的甲午战争是白种人从中作祟，日本主动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等，不过都是钻了普通中国人愤恨俄军的横暴，但对国际关系的微妙复杂又缺乏了解的空子而已。

被迫归还辽东半岛后，日本并没有放弃向亚欧大陆扩张的野心，东三省也就此成为日俄入侵势力的角逐场。日俄双方都注意到了东北地方绿林武装的作用，也都派现役军官到东北充当间谍，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来对绿林头目们加以笼络、收买。

作为日本间谍，花田在东北的活动还不算最出色，他的一个同伙绰号“王小辫子”，甲午战争前便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一带刺探中国海军的情报，战后又混入了东北绿林，对各帮派极尽拉拢之能事。

“王小辫子”也黏上了冯麟阁，想把他拉过去，但有明眼人已经识破了“王小辫子”的真实身份，便劝告冯麟阁说：“王小辫子是一个日本间谍，他所以要混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怀好意的。我们过去不得已走上了土匪的路，这已经是很难看的了，再要受其利用，那岂不是留骂名于千古吗？”

不久，冯麟阁又把别人劝他的这些话告诉给了金寿山。在绿林这个圈子里，金寿山尚属于中等级别，打张作霖可以，实力与冯麟阁一比，却还差着老鼻子，所以他便拜冯麟阁为老大哥，平日里对冯麟阁也是点头哈腰，一副唯其马首是瞻的样子。

这金寿山本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先前亲俄和加入“花膀子队”纯粹都是为了个人私利，但是随着日本在东北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渗透，他又觉得投靠日本人可能更靠谱。听了冯麟阁的话后，他一边在表面

上对冯进行敷衍，一边对“王小辫子”不但不加以戒备，反而更亲近起来。

金寿山的心思很快被“王小辫子”摸得一清二楚，后者趁势将他笼络到了手中。在“王小辫子”的指使下，金寿山专门跑去“启发”冯麟阁，说：“人生在世，总得有个出人头地的日子吧，我们总搞这种勾当（指从事绿林生涯），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样子下去能有什么好下场呢？”

知道冯麟阁已识破了“王小辫子”的身份，金寿山在不得不干脆挑明的同时又重新编了一套瞎话：“不错，王确实是个日本人。他因为在军队中犯过错误，不愿回日本，就流落到这里和我们混在一起。我虽然和他认识在后，但是他很相信我，对我无话不说，可以说是彼此相印以心。”

比“相印以心”更重要也更有效的，当然还是以利相诱。金寿山对冯麟阁说：“他（指王小辫子）过去在陆军中当过将官，有好多同学同事和三井洋行老板有关系，我们和他多接近，不但现在的枪械子弹容易解决，而且将来我们也可以做到缺钱有钱，缺人有人，哪里有这么好的借重呢！”

话说到这里，凡是有点头脑的，都已能够听出弦外之音。人与人毕竟不同，对张作霖这样的，趁他热血上涌，爱国激情爆发的时候，你或许还可以用日本义务帮助中国的一套来蒙骗他。冯麟阁是老江湖，这一套不会好使，因此金寿山接下来用的是单刀直入法：“日本和我们中国固然是仇敌，但这和我们个人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不也是和官府作对吗？我们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不要三心二意，摇摆不定，更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

金寿山一番鼓动唇舌，终于成功地把冯麟阁的利欲之心给挑动出来。此后，他便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率部到辽阳大高岭一带进行活动，专扒东清铁路（又称中东铁路，沙俄在东北修建的一条铁路），而且还扬言除非沙俄拿出巨额代价，否则决不停止扒路活动。

冯麟阁由此进入了俄军的黑名单，但由于他在江湖上地位较高，势力不小，直接捕杀不易。直到有一次冯麟阁在辽阳为部下庆功摆宴，俄军在事先掌握这一情报的基础上，派一股便衣队前往辽阳，用诱捕的方式才捉住了他。

冯麟阁被捕后，沙俄一心想把他拉过去为己所用，便没有立即予以处决。冯麟阁起先被关押在奉天，他的旧部计划到奉天劫狱，俄国人得知后赶紧又用船把他解往库页岛（俄译萨哈林岛）加以关押。

张作霖本来想投冯麟阁求得庇护，万没想到他也上了日本人的当，做了“老毛子”的阶下囚。正是通过这些事例，张作霖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日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组织“花膀子队”也好，搞“东亚义勇军”也罢，无非都是要拿中国人当枪使，替他们火中取栗，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后跟这两边的人打交道，必须多长心眼，否则一定会吃亏上当。

第二章　我就是张作霖

事到如今，张作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两天后，他向张子云辞行，不料张子云却不让他走了，并且还对他说：“你们走到哪里还不是保护地面？你们做保护地面的事，我们放心，你就保护我们这个地面吧，我们给你按地抽饷，保你够用就是了。”

张作霖一听，真有喜从天降之感。因为感激张子云对他的信任和雪中送炭般的收留，他后来便以同姓是一家的由头，拜张子云为义父，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张作霖在八角台落脚后，其部与张景惠的团练合并，张景惠为大头领，他为二头领。张景惠从前以做豆腐和卖豆腐为生，村里人都喊他“豆腐匠”，此人性格上有耿直豪爽的一面，但也有人评价他“不学无术，头脑简单，胸无大志，没有作为”。要说后面的这几句评价，谁听了心里都不会舒服，可是在与张作霖接触后，张景惠倒真的自惭形秽起来。

有一天晚上，二张秉烛夜谈。张作霖很诚恳地对张景惠说：“大哥，现在你只有多收拢人才，广交官府和地方士绅，扩大自己的实力，才能保持住位置。”

张景惠听后很以为然，同时他打心眼里觉得，张作霖从相貌气质到言谈举止都不是一般人物，将来跟着他干必有发展，于是便提议让张作霖坐头把交椅，自己甘愿让贤做二把手。张作霖没有心理准备，不由大吃一惊，连忙加以推辞，张景惠则一再坚持说：“你的才能胜过我十倍，这头把交椅非你莫属。”

让贤

在《水浒传》中，宋江第一次上梁山，曾受过他救命之恩的晁盖便要拜他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坚不肯从，说：“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他甚至还声明，如果晁天王硬要让贤，那他情愿去死。

后人评《水浒》，评到这一段的时候往往就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江十足虚伪，明明心里高兴，却还要假惺惺地忸怩作态。其实这种分析反而是违背了《水浒传》的本意，因为宋江在书中乃是正面人物，绝对的男一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所有言行都不能逾越作者所认同的江湖道德规范，而这种所谓的江湖道德规范，核心的东西其实就两个字：义气。

行帮各派，义气为重。晁盖让贤是“义”，宋江推辞也是“义”，他们都是在巨大的利益和好处面前互相进行推让，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长期闯荡江湖的绿林中人，义气二字同样为张作霖所认同和尊重，所以不管他心里对做一把手究竟有没有意思，嘴上一定会坚决推辞。

张景惠不肯罢休，第二天，他把部下都召集起来，对众人说：“张雨亭（张作霖字雨亭）年富力强，志向远大，我情愿拥护他做团练的领袖，大家跟着他图个好的前程。”

张景惠这么讲义气，张作霖只能向宋江老前辈学习。当下他不仅执意不从，而且还吩咐手下收拾行李，表示如果张景惠一定要这么

做，他就只能离开八角台了。

事情惊动了张子云，他亲自对张作霖进行挽留。在二张互相推让这件事上，则主张从全镇利益出发，让全镇人商议决定究竟谁来当民团的一把手。

在八角台，数张子云的面子最大，他一站出来，二张都无话可说。接下来一切顺理成章，在张景惠的竭力推荐下，镇上的人都同意张作霖坐头把交椅，张作霖实在推辞不过，这才接受下来。

得马者未必为喜，失马者未必为忧，经历挫折后的张作霖意外捡到金元宝，从此在八角台站稳了脚跟。这里也成为他恢复元气和进一步发展的基地，凭借八角台相对充裕的财力物力，张作霖开始招兵买马，扩大团练规模。

随着实力的增强，张作霖同周围其他帮会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一个绰号“项傻子”的“胡子”与金寿山等联合，对八角台实施了夹攻。见对方人多势众，张作霖忙派汤玉麟带一部分人到镇外驻扎，与八角台形成掎角之势，自己则与张景惠一道在镇上坚守。

对于八角台这样的“硬窑”加“红窑”，“胡子”通常都是要么不砸，要砸就往狠里砸。因为都知道窑里油水足，一旦“砸响”（打进去）便可以进去花天酒地，纵情享乐，所以在八角台“枪头子硬”，即便硬攻进去，也要死许多“崽子”（即喽啰）的情况下，“项傻子”等仍不肯收兵。

就在这一节骨眼上，张作相来了，立刻局势大变。

张作相是泥瓦匠出身，原来住在锦州柳条边墙一带。那一带在地理上是汉蒙两族居住的边界，民风彪悍，向有聚族械斗的传统习惯。家族中谁被人打死了，如果停灵不葬，就预示着他们要集合整个家族的力量继续进行复仇。

有一天，张作相的本家族弟遇上土匪，被打死了。族人便停灵不葬，并公推张作相带队复仇。张作相到处打听仇人的下落，后来得知对方已经入军营当兵，便紧追过去，找机会干掉了他。仇人的家属在当地也很有势力，马上到县衙鸣冤告状，为躲避官府的捉拿，张作相只得带上十几个本家兄弟浪迹江湖，带着人马前来八角台投奔张作霖。

张作相的人马虽然不多，但都很能打，又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因为他的加盟，张作霖终于挡住了“项傻子”的进攻。

张作霖与张景惠、张作相皆为海城老乡，且一见如故，有着相当好的私谊。三人于是结拜为兄弟，按照年龄顺序，张作霖居于老二，他称张景惠为“我大哥”，称张作相为“我三弟”。

加上汤玉麟，张作霖帐下已拥有三员颇为强悍的大将。有人分析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绿林既是晚辈，初起时其力量同其他帮派相比也十分薄弱，后来实力之所以能够扩展得那么快，和手下这几员大将其实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北霸天

在部下的襄助下，张作霖逐步对“项傻子”展开主动进攻，并在对方率部抢劫时将其予以包围，一场鏖战下来，“项傻子”被当场击毙。这一仗不仅为张作霖和八角台去一强敌，也对其他蠢蠢欲动的“胡子”和游兵散勇起到了震慑作用，自此再没有人敢来碰硬钉子了。

由于成功地保住了八角台，张作霖在绅商们心目中的地位越加高大，他们每月支付近三千两银子作为军饷，帮助张作霖购买枪械，招募人马。张作霖的团练步马队迅速扩充至两百多人，而且有马有枪，并配有洋鼓、洋号和鲜明旗帜。所部列队绕村行走时，阵容甚为雄壮，与正规军队相比，气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彼时辽西绿林中有“四霸天”一说，张作霖位列“北霸天”，这标志着他已一跃成为像过去冯麟阁那样的江湖老大。不过与冯麟阁等山大王不同的是，张作霖还拥有一个未来枭雄所必须具备的眼光和气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结交名士。

除义父张子云外，八角台的士绅和文人都是张作霖的座上客。举人刘春烺位列“辽东三才子”，虽在官场上不甚得意，却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和张作霖相交甚笃，常常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对张作霖说：“当今之世，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办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

张子云与刘春烺观点相似，认为养兵毕竟是国家大事，民团只是应付于一时的地方武装组织，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民团终将失去存在的条件。听了他们的建议，张作霖连连点头称是，他也感到“不和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只有跟从大清政府，才能拥有强大后盾。

张作霖开始为“和官家合作”进行准备，比如训练和管理练勇时，都要求保持与官军一致的纪律。“保险区”内，除盗窃案自行管理外，所有民事刑事案件一律解送官府裁决，这些都是为了给官府留下一个好印象。

就像当年宋江日夜盼着朝廷招安一样，张作霖巴巴儿地期待着政府降旨。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没过多久，好消息真的来了。

身为东三省政要，盛京将军增祺实在是倒霉透顶，调任这个职位不过才一年光景，就让俄军占领了奉天。他刚逃到新民府附近，便被哥萨克骑兵给追上截回，并在沙俄的逼迫下，与其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答应将奉天交给俄国军管。此事并未报经北京政府批准，朝廷为此进行了追究，准备将他革职。

要说真革掉也就算了，可是因为无人敢出关接替，增祺又只能暂留原职，继续维持地方治安。这可不是一件好干的活，因为他发现，辽西“胡子”（也包括那些打着“保险”旗号的队伍）既多且强，仅靠官军武力剿伐根本就消灭不了。

增祺的下属、新民府同知（同知为知府的副职）廖彭亦有同感，因为他手中能调动的巡捕队仅有一百六十人，而所要对付的匪盗则多如牛毛。为此，廖彭向增祺上书，建议招抚地方“保险队”，将私团招为公团，他认为通过这种办法既平了匪患又壮大了官军，乃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增祺看到后觉得未尝不可以一试，便授命新民府知府增韫具体承办招抚事宜。增韫不敢怠慢，当即派人向各“保险队”宣抚收编。收抚的办法是先是有当地士绅出面担保，保证安心归顺，不出尔反尔。通

知一出，各帮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踊跃，原因是大家都不知真假，害怕官府以收编为由，趁机将他们解决了。

张作霖平时广交官府和地方绅商，内部消息非常灵通。当其他帮派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他已经认定这是一个出头的好机会，下决心归顺朝廷，听候改编。张作霖的决定得到了张子云的支持，在张子云看来，地方太平了，团练就该遣散，但要让练勇们立即放下武器回家种地，也很难安分守己，反而对治安不利，更何况，张作霖这几年在地方上表现不赖，彼此间的私人关系又不错，于情于理都应该帮他找一条出路。

张子云找来另一名当地士绅杜绊林商议。杜绊林是个秀才，与张作霖的关系很好，当下便答应与张子云一道为张作霖作担保。当年关外有文化的人不高，读书人因此很受尊敬，那些有一点功名的，更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在社会上的名望和地位都很高。秀才这样的身份，若放到关内也许不值一提，在关外就不一般了。知府增韫对于张子云、杜绊林这两位老秀才一向都特别尊重，有他们两位共同做担保人，起码取得官府的初步信任是没什么问题了。

对于张作霖而言，仅仅拿到入场券还不够，入场之后，你知道人家会让你坐哪里？那些边角旮旯，谁都不待见的地儿，你愿意去？

就在张作霖思忖着如何再找点门路，下点功夫的时候，他突然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增祺当初逃往辽东时，曾先把家眷送走。如今他被截回且与沙俄达成了和约，社会秩序也渐渐安定下来，他便打算把家眷重新接回奉天。

京奉铁路当时只通到沟帮子，剩下的路要从新立屯经过，而新立屯就在张作霖的控制范围之内。张作霖由此心生一计，他将张景惠等部下召集到一起，鼓动他们说：“我们总在绿林中吃黑饭，前途是暗淡的，是毫无出路的。我看不如借助我们现有的这点实力作本钱，向官家讨价还价，混个一官半职，总比这样继续干下去有出路。”

好胡子

听张作霖这么一说，几个人都点头同意。汤玉麟说：“只要当家的有好办法，打定了主意，我们无不唯命是听。”

张作霖一拍桌子：“好，只要大家愿意，我自有道理。不过在未实现以前，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泄露出去，不但事情要失败，而且更要被绿林朋友耻笑。”

按照张作霖的设计，当增家眷属从新立屯经过时，大家就要分工演一场好戏。他特地嘱咐道：“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但不准乱动，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关于这一点必须同众弟兄讲清楚，违者就要以手枪相见。”

过了不久，负责打探的手下来报，增家眷属乘坐十几辆马车，果然已行至新立屯附近。张作霖闻讯大喜，马上布置展开行动。

增家车队刚刚走到一条河边，就落入由汤玉麟率众扮演的“劫匪”所设的伏击圈内。车队被团团围住，护卫们急忙进行抵抗，但哪里是“劫匪”的对手。“劫匪”们开枪打死了两名护卫，在收缴车队人员所携带的枪械子弹及其数十件箱柜后，便开始假装大分金银细软。

这时作为真正主角的张作霖上场了，他骑着马鸣着枪，率领部属们冲了过来。汤玉麟见状佯装不敌，一边扔下收缴的东西，一边“落荒而逃”。

车队被连人带物一并送往新立屯街上。在以“保险队”的名义安顿好人员车马时，张作霖还单独给增祺的夫人及贴身侍者提供了一座很好的房子，并拿出最好的鸦片烟款待他们。

曾家人先认为劫数难逃，接着意外被救，最后再一看，救他们的人并不是官军，也是“胡子”（曾家人搞不清“保险队”与“胡子”有何分别），而且没有马上放他们走的意思，不由又惊恐失色起来。到现在，发现接待他们的“胡子”竟如此温和体贴，又有些莫名其妙，那心情真的跟玩过山车一样。

张作霖干脆也把自己当“胡子”，不过是那种被逼上梁山的“好胡子”。他亲自招待车队中几个重要的随行人员，陪着众人一道躺在床上吸鸦片烟。就在这种貌似很放松的环境中，他突然叹了口气，说：“唉，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地软弱，毫无国际地位，受尽了外人的欺凌，致使国内人民的生活竟达到这般境地，真使我有说不出的伤痛！我们所以当上土匪，也是被逼上了梁山哪。”

这些人想不到一个“胡子”能够如此忧国忧民，谈吐还这么文雅抒情，便料定其中必有文章，他们中间一个地位较高的人便试着搭讪道：“我们很同情你的处境，我想我们将军来到奉天一定会有办法的，你们也一定会有出头露面的一天。”

见张作霖的样子确实很容易接近，此人又接着说：“请原谅我不懂规矩，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大胆请问您的贵姓？”

“我就是张作霖！”

几个人过去听说过张作霖，知道对方乃是辽西著名的绿林首领。现在得知张作霖就在面前，他们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但同时又更加愕然，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张作霖一定是生得高大威猛、面貌凶恶，怎么也没法跟眼前这个儒雅温和、文质彬彬的青年对上号。

你们觉得诧异？那就对了！接下来，张作霖便把自己的身世以及为什么会走上绿林这条路的前因后果，都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其间，他有意在话中对增祺流露出一股愤懑不平之意，说增祺到任不久，也不先弄清真假虚实，就要对他们这些守法的“保险队”严拿法办。

“保险队”本身良莠不齐，既有像张作霖这样比较规矩、捍卫乡里的，也有像金寿山那样乱抢乱夺、胡作非为的，所以别说平时高高在上的增祺，就算是普通老百姓，有时也弄不清“保险队”与“胡子”到底有什么区别。增祺接受廖彭建议对“保险队”进行招抚，就是视他们为“胡子”，要平的是匪患。

俗话说得好，别人家的肉煨不热，官家一旦有这种心思，即便使用招抚的手段，也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圈住你。这正是张作霖所担心的，他不是真的认为增祺招安是假，怕就怕招过去之后还被盯贼一样盯着，那样的话，除非在娘肚子里重新翻个跟头，否则今生做梦也别指望“转正”成为真正的官军了。

为了把戏演得更为逼真，张作霖继续做悲愤状，说如果增祺一意孤行，仍然要来硬的，“使我们有口难辩”，就只能破罐子破摔，“我们干这个勾当，个人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了！”

若要好，大做小

张作霖如此一说，可把大伙吓坏了。你想啊，此时此刻，谁是不经摔的“罐子”？不就是他们这些肉票吗！刚才与张作霖搭讪的那名随员赶紧说：“依我愚见，长期同官家作对，毕竟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将军也同意招抚了，为了个人的前途，我看你们弃暗投明，才是正路。”

张作霖想走的就是“正路”，但他偏偏还要欲擒故纵，装出一副低头沉思的样子。随员则早就沉不住气：“假如有这样的机会（指招抚），尊意如何呢？”

张作霖料到他有这一问：“我已说过了，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因为迫不得已才不得不落草为寇。假如真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当然求之不得。不过听说增将军这个人很固执，我们想受招抚恐怕没有门路。”

接着，他又一本正经地反问道：“你们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呢？那位太太又是谁呢？请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加害你们的。”

带队随员起先不敢暴露曾太太的身份，但看张作霖这样子，确实无加害之心，于是在思索片刻后对张作霖说：“待我回禀太太一声，取得她的吩咐再同你谈。”

张作霖点头应允，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计策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

随员找到增太太，向她讲述了张作霖的谈话经过。增太太也是见过点世面的女人，她和众人商议了一下，考虑论公论私都应该和张作

霖取得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沟通：一者，需要解除眼前危难；二者，就算从维护增祺的角度，也可以替他去掉可能危害地方治安的一个大患。

随员得到明确指示，随即出来告诉张作霖："不瞒你说，我们太太就是增将军的夫人，有些话你不妨跟她唠唠。"

"若要好，大做小"，一听这话，张作霖少不得还得扮出惊讶、谦疚、惊喜等各种复杂表情。之后，他跟着随员前去拜见增太太，一入室，先行大礼参拜，然后才低头站立着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

见对方对自己如此恭敬，又那么谦逊，增太太把最后的一点心理包袱都放下了："我明白地告诉你吧，我就是增将军的夫人。我们这次是由京城来到奉天，路过此地。我原在省城时，就听说绿林各帮与将军为难，特别是你的声名最大。现在路上巧逢，想不到你这样对待我们。"

张作霖时年只有二十八岁，增太太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眼前这个青年不但是绿林大佬，而且在耍心计斗心眼方面也出类拔萃，乃是个"不由科举的状元，不作文章的秀才"。她这时候倒真的有点提拔和帮助一下这个年轻人的意愿了："适才听跟班的谈了你过去的一切和你的愿望，我很同情你，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而且又有这样一部分力量，假如你能很快地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张作霖继续保持着恭敬和谦逊的态度，以鼓励增太太继续说下去："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也一定保证在增将军面

前保举你，让你们这一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这样既有利于地方治安，你们也有了出路。你看这样好吗？”

还会不好吗？我费尽周折，要的就是这个啊！张作霖当即表示感谢不尽，说：“假使我张作霖能带众弟兄投到增将军麾下，为朝廷效命，有生之年，决不忘掉增太太的大恩。”

从增太太处辞出，张作霖告诉张景惠等人事情已经办妥。他命令喽啰们将劫得的东西“完璧归赵”，同时又送了一份厚礼给曾太太一行。曾太太和随行人员过意不去，特地拿出五锭纹银要赏给张作霖的部众，张作霖哪里肯收，婉言谢绝后还亲自护送车队走出新立屯地界。分别时，他又再次对增太太说：“只要我们有出头露面的一天，您的大恩没齿难忘。”

这出高质量的情感甚至还带点悬念的大戏，彻底把增太太给征服了。她平安回到奉天后，便把途中遇险的经过以及张作霖诚心接受招抚的愿望，都告诉给了增祺。自然，在讲述自己耳闻目睹的客观事实的过程中，她也没忘记加入浓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比如张作霖的实力有多强，为人有多好等。

增祺是个有城府的老官僚，但枕边风的威力却也不容易抵挡，加上增太太的几个随员也帮着鼓吹，遂一边奏明朝廷，一边给新民府知府增韫下令，要求有条件时将张作霖部收至奉天省巡防营中，给予正式军官待遇，但仍驻在新民地方负责维持治安。

决斗

得道夸经纪，时熟好种田，既然已经铺好道路，新民这边便可以开张了。1901年9月，受张作霖之托，张子云、杜绊林作为担保人，一同到新民府拜见知府增韫，说心甘情愿把八角台“保险队”这股人马交给政府。

增韫本有招抚之责，又得到了上峰的命令，听后满口应承，说：“二位地方士绅既以身家性命担保，本府当然深信不疑。”

张、杜随后又把张作霖大加称赞了一番。因为盛京将军有言在先，张作霖部将暂时维持新民的地方治安，所以增韫也颇有见这位新部下一面的兴趣，便提出把张作霖领去给他看看。

张、杜返镇后，把经过情形转告给张作霖，过后三人一同拜见增韫。张、杜是以新民府考中同年考取的秀才，府考由知府主持，所以两人都称增韫为老师。张作霖何等机灵，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秀才出身，便跟着叩头行大礼，并拜增韫为老师。

增韫见他相貌儒雅，样子挺聪明，言行举止又如此乖巧，对他很满意，便问他手下有多少人。张作霖信口回答：“一营人。”

按照清朝兵制，一营要有五百人，少说点也得四百人，张作霖当时只有两百人，但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给以后扩充力量提供余地，就来了个以少报多。增知府也不细察，只是告诉他：“回去赶快整顿，整顿好即带到新民点编。”

点编就是点验人数，列入编制。张作霖一回八角台就忙开了，除八角台的原有班底外，他又吸收了辽西一带其他小股帮派，凑足四百之数，开到新民府点编。

点编完毕，增辐成立了一个游击马队，张作霖被任命为马队管带（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营长），以下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各有职务。大家摇身一变，全都成了堂堂正正的大清军官。

俗话说“人要衣裳马要鞍”，尤其张作霖，待到他把军帽往头上一戴，制服往身上一装，洋式军枪往腰间一佩，薄底军靴往脚上一穿，那个精神，整个人都显得威风凛凛、气宇不凡。

旧时官员拿到委任状后必须谒见上司致谢，名为“谢委”。张作霖到奉天巡防营务处“谢委”，由于当时还没有“胡子”敢主动接受招抚，张作霖是吃螃蟹的第一人，所以营务处的人都想看看这位声名在外的绿林豪杰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这一瞧，几乎完全颠覆了“胡子”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但见张作霖相貌清朗俊秀，双目灼灼有光，根本不像是山大王的样子，倒十足像个文雅书生。

一定要说张作霖在形象上有什么缺陷，就是身材还不够高大，因此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个子”。“谢委”时，营务处的负责官员问“小个子”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的回答立刻暴露了他与书生的区别：“我想升官发财。”在场众人听惯了报效朝效之类的官话，没想到张作霖会如此直言不讳，顿时一个个瞠目结舌。

马队成立后奉命继续留驻八角台。这时敢于侵扰八角台的“胡子”主要来自热河，其中最为凶悍的是一个绰号“海沙子”的巨匪，麾下有百余之众，里面一半为蒙古人。他们常常骑着快马，一晚上就朝辽西呼啸而来，十分吓人。

有一次，这伙边外盗匪又入境侵扰，还绑走士绅常家的老太太作为肉票。张作霖与其进行了一场恶战，张景惠率先将肉票解救出来，

接着张作霖又亲自指挥马队予以包围。

两边首领喊话，张作霖对“海沙子”说：“你不能在此处收过路钱，这地方属我管。”“海沙子”情知今天靠跑是跑不出去了，便梗着脖子叫嚷：“不给钱？那我就要打！”

张作霖说：“我在这村庄负责安全，我拿人家的钱，咱俩一打，村庄不就遭难了吗？不行，你不能打！”为了减少附近村庄的损失，他给“海沙子”提了个建议：“这样吧，咱俩对打好不好？你人站那边，我人站这边，咱俩开枪对打，如果我被你打死了，这地方就归你。如果我把你打死了，你的部下就归我，好吧？”

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张作霖提议决斗并非完全意气用事。当年的东北“胡子”都以枪法好著称，不单单是大小头目，就是最下面的“崽子”，都首先要求“管硬”“管直”（黑话，意思是枪法准）。他们平时吃饱喝足了之后最主要的娱乐之一就是玩枪，也即练枪法。通常是大伙坐在屋里大炕上，把窗户敞开，窗外的墙头上挨排插蒿子或酱杆（高粱的秸秆），众人开枪射击，比谁用枪“掐得齐”（黑话，意思是打得多和准）。

很多“大当家的”都是靠玩枪玩出名的，他们使“双家伙”（即双枪），能够做到“左右开弓，骑马点射，空中打飞物，夜晚打香头，说打鼻子绝不打眼睛”。张作霖多次持双枪冲锋陷阵，但他平时更习惯使用一支八厘米套筒步枪，由于长年枪不离肩，甚至造成了右肩高、左肩低的体形特点。

与“海沙子”的决斗开始后，两人几乎同时以闪电般的速度举枪和扣动扳机，结果是“海沙子”被当场击毙，而张作霖只受了一处并不致

命的枪伤。按照决斗时达成的君子协定，“海沙子”一死，他的部下也就放弃抵抗，或归顺张作霖，或四散逃去。消息传出，热河一带的盗匪惊恐失色，再没有谁敢随随便便跑到八角台来滋事了。

“窦尔敦”

八角台时期的张作霖可谓英气勃发，一抽出空来，他就扛着那支套筒步枪，骑一匹白马，不要任何人护卫和跟随，单枪匹马地到赵家沟去探望老母，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绰号“白马张”。

八角台与赵家沟相距约九十里，张作霖每次都是在吃过午饭后动身，在太阳偏西时到达赵家沟。那路上要经过一个一望无际、方圆数十里都没有人家的大草甸子，他在途经此处时，曾遭遇一股敌对势力的伏击。当时他一看，所处区域地势开阔，又是白昼，人马目标太大，不易走脱，就赶紧下马跳进一条沟里，用步枪与敌人对抗。对方有一二十个人，但都打不到张作霖，反而被他打死打伤了好几个。

一直对峙到“摺帘子”（黑话，意思是天黑了），张作霖这才翻身上马。他的白马久经战阵，训练有素，打仗时寸步不离主人，一旦跑起来，又速度飞快。依靠白马和步枪，张作霖突出重围，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赵家沟。

张作霖对他的套筒步枪非常珍视，认为这是自己创业的家伙，陪着主人打过很多胜仗，已称得上是一个“功臣”。在马队多数人都已换用快枪的情况下，他依旧不愿更换，一直到死，这支步枪都被他妥善地保存着。

绿林是靠本事混饭吃的，在这个圈子里，像张作霖这样既有生死不惧的胆子，还拥有一身过人武艺的好汉，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然而话又说回来，由于长期浸润其中，也让相当一部分人养成了滋事扰民的恶习。他们以前过惯了这种生活，积习难改，人少时尚可管束，多了便很难控制。有人就曾为此告上省府，指责张作霖名义上剿匪，实际却纵兵焚烧民居、抢劫财物，“从各村抢来的财物装了十几大车”。

奉天将军增祺闻报大为震怒，便打算另派亲信接替张作霖的职务。张作霖早已在新民府编织好了关系网，得到风声后赶紧请官员们替他求情。1902年10月，新民府同知廖彭向增祺禀称：“张作霖投靠朝廷已经快一年了，肯定没有再回去做土匪的可能，他是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如果另外派员接替张作霖，恐怕他底下人不服，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处理不当，反而对地方稳定不利。”

增祺听后觉得有理，加上夫人也在一边为张作霖说好话，就决定见他一面，但要求张作霖必须到省城进见。张作霖害怕增祺借机将他扣留，便托故让张景惠代他前去接受召见。

增祺的左右对此很是不满，主张对张作霖进行处分。增祺倒是知道张作霖有所顾虑，因此反而能够谅解，他抚慰张景惠：“只要你们真能为朝廷效命，我就一定准许你们戴罪立功，决不会欺骗你们的。”

增祺让张景惠密告张作霖：“现在奉天省还有杜立三等几个匪帮为害地方，应相机图之，如能为地方除掉这些巨患，那就是你们的大功，将来一定还要重用你们的。”

张景惠回去后向张作霖做了汇报，张作霖又羞愧又感动，也暗暗记下了增祺的话。

与其他绿林头目大多家境贫寒不同，杜立三出身于豪强世家，父亲专劫“皇杠”，几个叔叔都是著名的“马胡子”或坐地分赃的寨主。此人紫红脸膛，穿着上也偏好紫色，出行时一般都是头扎紫红色头巾，脑后垂一尺多长的紫红飘带，身穿紫红宁绸上衣，民间一谈起杜立三，都爱把他当成京剧和公案小说里的窦尔敦、单雄信。可是真实生活中的所谓江湖好汉，其实远没有戏曲中那么可爱，杜立三生性狠毒，杀人不眨眼，不但地方上的老百姓闻名丧胆，就是其他帮派头目也都怯其三分。

张作霖在没有就抚前，杜立三的一小股人马曾跑到他的“保险区”境内抢掠。事情发生后，张作霖缴了这些人的枪支，杜立三闻报大怒，集齐全部人马要与张作霖拼个你死我活。张作霖打不过这个“窦尔敦”，只得落荒而逃，杜立三则穷追不舍，由辽阳一直追到了镇安县十七户。

十七户有一个被称为“汤二爷”的庄主，势力很大，属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汤二爷”是汤玉麟认的本家，在张作霖等人的请求下，他出面进行了调解。张、杜遂言归于好，张作霖把所缴的枪支归还给杜立三，杜立三也表示对此事将不再追究。之后，两人又共同认“汤二爷”为义父，彼此间还焚香拜把，结下了金兰之好。

虽然拜了把兄弟，但张、杜之间并无任何惺惺相惜之意，张作霖纯粹是畏惧于杜立三的凶狠强悍，而不得不使出权宜之计。从内心上来说，他与杜立三仍然势不两立，真要有条件下手，他完全可以做到毫不犹豫。

增祺更是迫不及待要除掉杜立三，他除命张作霖对本区进行清剿，严防杜立三窜入外，又把官军和地方豪绅的武装集中起来，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对杜立三进行联合进剿。

齐天大圣

至当年秋季，近千名官军乡勇逼近了杜立三的老巢后插拉村。这个村子的陈、于两家大户都有院墙和炮台，且地形险要，便于攻守。除此之外，便只有十几家孤零零的小户了。官兵进村后，全部驻扎在陈、于两家，准备休息一阵再寻找杜立三。

孰料杜立三用的不过是一招诱敌深入而已，当官兵进村时，他已率领精选的五百悍匪钻入那十几家小户里，官兵刚要休息，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顿时，枪声四起，炮火纷飞。

杜立三为了将官军一网打尽，颇花血本。他亲画图样，让人把大树干挖空，外面裹铁皮，里面放火药，再加入铁钉、铁砂、碎石等，制成了一门门土炮。军官乡勇几次欲强行突围，都被枪炮打了回去。

三天后，院中粮食断绝，只得杀马代食，饮水断绝，只得拿马尿当饮料。得悉剿匪部队陷入绝境，后方指挥官赶紧组织救援，一时却又无兵可调，情急之下，只好向附近的俄军炮兵求援。俄军炮兵架起大炮，向后插拉村连发数弹。

俄造大炮的威力自非土炮可比，当炮弹掠过村庄上空时，村民都十分惊恐。不过其实杜部并未受到什么损失，因为他们都散处于各小

户中，反而陈、于两大户受到的震动更大，官军人人自危，都害怕炮弹正中落到院里来。

杜立三见俄国炮威力强大，又不知道俄军到底来了多少兵，在村民的再三恳求下，遂撤兵离去。官军虽然绝处逢生，但已狼狈不堪，之后他们便偃旗息鼓，收兵回营，自此再不敢和杜立三进行直接较量。

在官军与杜立三大战的过程中，张作霖只是个旁观者，但是看到杜立三如此不好惹，就算他的邀功之心再迫切，暂时也只能先退避三舍了。

1903年，朝廷对地方军进行整编，张作霖所部由八角台移驻新民府街，并与新民街巡捕队合并。张作霖依旧出任管带，继续与昔日的绿林同行们演着兵捉匪、猫捉鼠的游戏。在这一整年里，他就像是那个被释出五行山，跟着唐僧取经的齐天大圣一样，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对辽西的各路“妖魔鬼怪”东征西讨，被他击溃的大小“胡子”不计其数。

当然，剿从来都不是官军对付盗匪的唯一手段。有个叫侯老疙瘩的“胡子”，长期在新民西北和彰武边界一带窜扰，居民甚以为苦。他见张作霖做了受抚的榜样，也想学着升官发财，便通过一个中间人告知知府增韫，说自己要投诚。增韫答应下来，让侯老疙瘩做好准备，将所部开到新民府听候点编。

点编那天，增韫令张作霖率众站堂，以防不测。随即，侯老疙瘩带着四十余人进入大堂，看到他们身上都带着武器，站堂的兵丁忙喝令他们把枪放下。不料侯老疙瘩见大堂内外戒备森严，以为官军要强

行缴械，竟然在增韫升堂时操起了枪。张作霖及部下早有防备，一阵乱枪打过去，当场击毙侯老疙瘩，还缴获了二十多支俄国快枪。

增韫受了一场虚惊，对张作霖大加称赞。事后，他除了将侯老疙瘩的手下全部交给张作霖改编，缴获的快枪也归其所有外，又从府库里拨出一部分银两，买了两百多支枪械送给张作霖，以示奖励。

与“侯老疙瘩案”相似的还有“五大哨案”。所谓“五大哨”，是五股绿林武装的别名，他们事前也同意接受改编，双方相约在新民府的大堂进行点编。由于有了经验教训，张作霖不待增韫吩咐，就已早做准备，在大堂上埋下了伏兵。

“五大哨”进入大堂后，循例要跪在地上，听知府宣读点编命令。可是这些人听完命令，却认为与接洽时所谈条件不符，竟然立即翻脸，并当堂鸣枪。增韫这回吓得躲到了公案底下，又幸亏张作霖及其部下开枪还击，对方抵敌不住，除当场死伤者外，其余人全都逃之夭夭，“五大哨”也从此瓦解。

张作霖逐渐成为增韫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锦西有一对“胡子”兄弟苑四、苑五，领着四百多人在当地烧杀抢掠，锦州官府束手无策，就请新民府派兵助剿。增韫命张作霖前去扫平，张作霖出手不凡，开到锦州不久就把苑氏兄弟打了个灰飞烟灭。

顺风转舵

张作霖再怎么表现得英勇无敌，终究还是不敢碰杜立三，而增祺也无法再对他下这样的命令了，因为这位将军早已自身难保——俄军

又一次占领奉天，对东三省进行强制军事管制，增祺被囚禁了起来。

沙俄有一个“黄俄罗斯”计划，其主旨是通过实施殖民政策，将东三省变成它的“黄俄罗斯”。至1903年年底，俄国在东北的武装移民已超过三万人，“黄俄罗斯”计划距离大功告成也只剩下最后一步，即迫使中国将东北名义上的主权交给它。

在自身无力直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和朝鲜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大国制衡的策略，中国是“以日制俄”，朝鲜是“以俄制日”。日俄虽然有时也想各取所需，达成妥协，但双方在贪心欲念的驱使下，就好像老米饭一般，怎么捏都捏不成团，最后终于翻脸打了起来。

日俄之间开打，陆战战场却在中国东北境内，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让朝廷上下颇费思量。以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首的一派意见认为，中国不能参战，也不能帮着日俄任何一方：如果帮助日本，俄国就会以此为由派陆军在中国西北采取行动，同时一旦俄军战胜后，作为战败国的中国就只能将东北的名义主权乖乖割让给俄国；如果帮助俄国，日本海军会对中国东南沿海构成威胁，一旦日军战胜，东北又将沦为日本的口中之食。

经过反复斟酌，中国政府决定保持中立。1904年2月12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俄双方一边拼命厮杀，一边延续以往政策，对“胡子”竭力进行拉拢和训练，以使之作为本国正规军的辅助力量。被它们拉过去的“胡子”也依照原名，亲俄的称之为“花膀子队”，亲日的称之为“东亚义勇军”或“满洲义军”。

同样是招人，俄国不管是手段、战术还是投资，都远远落后于日本。一般俄国官兵将东北人一律蔑称为“满子”，即便是对待“花膀子队”亦不例外，对方稍有不顺从或不满情绪流露出来，他们就会当众拳打脚踢，施加侮辱，致使这些“花膀子队”也在不知不觉中对俄国人产生出强烈的不信任感。日方间谍人员正好利用这个矛盾，乘虚而入地将一些“花膀子队”拉过去，又将他们变成了“东亚义勇军”。

日本人也没忘记昔日的绿林魁首冯麟阁。战前冯麟阁已被从库页岛解往西伯利亚的一个苦力营关押，每天要下矿挖煤，干着牛马一样的活。不久，“王小辫子”收买中国通事（即翻译），把他从苦力营里营救了出来。冯麟阁回到奉天后重操旧业，而且从此铁了心要跟“老毛子”干到底。

日军在辽阳南首山遭到俄军抗击，屡攻不下，部队伤亡惨重。冯麟阁和金寿山遂将所部的几千骑兵组成“义勇军”，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俄军阵地的右侧背。俄军措手不及，只得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俄战争的胜败之局也由此奠定。

对日方来说，冯、金是为他们立下了很大的战功。日本军事当局特地奏明天皇，奖给两人各一枚宝星勋章，过后又电请中国政府对这两大帮派予以收编重用。

除了“胡子”外，东北地区凡握有兵权的中国军官同样受到日俄的关注和拉拢，张作霖自然名列其中。只是张作霖曾经在这里面吃过亏、上过当，早就已经学得精明无比。他既不像有的地方官那样谨小慎微，除了恪守中立，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不肯像冯麟阁和金寿山那样，明目张胆地为日俄某一方出力，而是把算盘珠子打到啪啪响：你

们都有求于我，这事没错吧？好，废话少说，先把好马好枪和粮饷送来！干什么？吃好睡好装备好，才能为你们干活啊！

战争初期，俄军的实力看上去更为强大，按照张作霖的估计，“小日本不能打败俄国大鼻子”。基于这一判断，他虽然也天天把政府的中立政策挂在嘴边念叨，但实际却阳奉阴违，跟俄国人套起了近乎——一边接受俄军贿赂的钱财和军械，一边暗中帮助俄军搜集粮草，或者供应一些情报，有时甚至还会让手下人冒充“花膀子队”，对小股日军进行偷袭，趁火打劫地从日军手里抢夺一些枪弹马匹或者粮秣柴草。

当时受日本参谋本部之命，日本驻满洲军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专门负责东北的情报工作。他很重视拉拢张作霖，为此派遣了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率“特别任务班”到新民府进行活动。可是黑泽兼次郎可以明显感觉到张作霖对他们不抱好感，有时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一回事。

随着战争的逐次展开，日军开始占得主动。张作霖马上顺风转舵，对黑泽兼次郎的态度又似乎变得热情起来，还安排对方住到自己家里。那段时间，黑泽兼次郎送给张作霖不少枪支弹药和金钱，而张作霖则投桃报李，把在俄军身上做过的事，重新复制一遍给日军。

张作霖后来回顾道：“日俄打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们。我们为了得武器，有时也被他们利用。那时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都是为了武装自己。”

张作霖非常清楚日俄的用心以及自己的定位，不管日本人给多少好处，他都没有选择向日方一边倒。有一天晚上，在和几个得力部下讨论时局时，他还特地谈道：“我们要把握好风向，小日本虽然取得暂

时的胜利，但俄国大鼻子在东北待了这么多年，而且凶猛好战，最后可能还是大鼻子要赢。”

万没想到，隔窗有耳，黑泽兼次郎是个高级间谍，这段谈话居然被他偷听到了。对于从前在张作霖那里受到的冷遇，他本来就很是不满，现在一听，才知道张作霖实际一直在脚踏两只船。

吃客、用客，你还要要客，当我们全是二傻子！黑泽兼次郎越想越恼火，决定找机会杀掉张作霖。回到满洲军司令部后，他向福岛安正透露了这一想法。福岛安正老谋深算，听后赶紧说：“现在张作霖正为我军效犬马之劳，要留着他加以利用，不可对他轻举妄动。”

按照福岛安正的指示，黑泽兼次郎不但暂时打消了原先杀掉张作霖的念头，而且又在对张作霖进行拜访时，送去银币一千元，以坚定张作霖为日军效劳之心。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防患于未然，此后黑泽兼次郎便留在了新民，专门负责监视张作霖的一举一动。

官场关系学

1905年初，日俄展开奉天会战，这是双方在陆地上进行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俄军在会战中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奉天。战后，获胜的日军控制了新民地区。有些亲日派“胡子”头目早就看张作霖不顺眼，这时便趁机指控他：“雨亭伪装中立，暗中与俄军通谋。”

派驻新民的日本宪兵听到传闻后进行调查，确认张作霖有充当俄军间谍的嫌疑，因而将其秘密逮捕，并呈请“新民屯军政署”署长井户川辰三少佐，欲将张作霖处以死刑。

所谓“军政署”是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实际占领的东北南部所设立的一种殖民机构。日本人后来自己也承认：“名为军政署，实则为纯粹的民政厅，特别是施政方针等，如同视满洲为新占领地。”井户川辰三考虑到张作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营官，但手下有很多精锐的骑兵，这些骑兵都可以为日方所用，杀了未免可惜，对日军有效地控制新民一带不利，于是便一再向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请示，要求豁免张作霖。同时，他还请满洲军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田中义一从中斡旋，张作霖这才得以免于一死。

免死金牌不是白拿的，在把张作霖放出来之前，井户川辰三交给他一份写着“愿为日本军效命”内容的誓约。张作霖其时羽翼未丰，说被抓就被抓了，说要被杀头马上就会人头落地，所以他十分乖觉，誓约一递上来，连想都没想，二话不说，就在上面按了手印。

在日俄之间“踩钢丝”固然惊险万分，然而对张作霖而言，收获也是满满的。通过两边获利，至1905年，他的游击马队已从一个营扩编至三个营，若抛去个人风险因素不算，真可谓是骆驼骨头卖了象牙的价。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胜俄败，沙俄用于吞并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宣告破产。根据战后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日俄将在十八个月内，即1907年4月之前，从东北陆续撤走他们的军队。为此，朝廷特派张锡銮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到东北整理军务。

张锡銮奉命之后，即乘坐京奉铁路兼程赶往奉天，但京奉铁路只修到新民府，奉天和新民之间不通车，这样他就不得不在路过新民府时在当地暂住。就巡防营这个系统来说，张锡銮乃是张作霖的顶头上

司，现在对方自己送上门来，这样的天赐良机无论如何不能轻易错过。

自设法被招安之日起，张作霖就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套官场关系学，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要点，即巴结、应酬、馈赠。只要把这三点做到位，不怕不能给上司以好印象，从而确保今后仕途坦荡。

张锡銮为人清廉自守，官声颇佳。你要单纯送他财物，人家未必肯收，这就需要投其所好，另找突破口了。张作霖打听到，张锡銮早年就随军习武，骑术和枪法都很精湛，尤其擅长马术，绰号“快马张”。

张锡銮爱马，乘马生了病，他便舍马不坐，徒步在新民府下榻。张作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相送。

第二天早晨，张锡銮从下榻处走出，一眼就看到了门外所备之马。他一边上前抚摸，一边忙问随从这是哪里来的好马。随从答道:“张作霖管带说特为将军壮行敬送此马，如蒙乘用，不胜荣幸之至……”

张锡銮听了一愣:“张作霖？迄今未听过此名啊！”

虽然此前对张作霖完全不了解，但就凭这匹比自己的病马还要高出几等的好马，爱马至深的张锡銮在心情大悦的同时，对张作霖已经产生了很深很好的印象。以此为由头，两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彼此交谈中，张作霖从大家都爱马这一兴趣点出发，与新上司大谈起马经，他有医马、相马的经验，也称得上是一位医马御马的好手，张锡銮和他谈得很是投机。

“馈赠”说到底还是为了“巴结”，趁张锡銮高兴，张作霖引用“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俗套，提出要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眼中，张作霖早已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地方管带，而是一个才智双全的奇才了，于是当即就答应下来。

张作霖的套路还没有结束，他把手下召集到一起，从中选出二百五十名高大俊朗的骑兵，十人一排，组成二十五排，由自己亲自带队，前呼后拥地护送张锡銮去奉天城。人都是有虚荣心的，何况是新官上任，更需要下属给捧着，张作霖由此成了张锡銮到东北后培植的第一个亲信。

这时除盛京将军增祺已因故被免职外，原新民府知府增韫已升至奉天府府尹。朝中有人好做官，有张锡銮、增韫等人的多方提携关照，张作霖想不发达都难。张锡銮抵奉后不到三天，张作霖的部队即扩编为马步五营，他被任命为五营统带。如此高速度大幅度的提拔，颇具中国特色，旁人除了诧异和眼红，也莫可如何，而张作霖则眉开眼笑，满心欢喜。

东三省向被满人视为龙兴之地、陪都所在，在内忧外患不断，尤其关内随时可能爆发革命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对经营东北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1907年4月，清廷下诏在东三省实行官制改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分治其事，原先奉天的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

第一任东三省总督是身兼钦差大臣的徐世昌，他带着军队上任，并且上任伊始即对地方治安进行强化。处于这种高压之下，各路中小绿林武装纷纷或亡或降或隐，原先盗匪蜂起的情况得到很大改观。剩下来的大鳄中，洪辅臣帮内发生内讧，他本人被刺死，余部被张作霖所招抚。冯麟阁和金寿山等因在首山之役中助日有功，经日本建议已

由朝廷收编为省防营，不能算是江湖人物了。这样一来，实力上本就与冯麟阁处于伯仲之间的杜立三水涨船高，成了辽西独一无二的绿林老大。

鸿门宴

自从江湖地位跃升后，杜立三越发骄横傲慢，目空一切，他除了尚把冯麟阁看成老前辈，给予特别尊重外，对其余头领均不屑一顾。

杜立三也确实有嚣张的资本，不但官军不敢上门来剿，就连俄军看到他，都得绕着走。日俄战争期间，由于曾遭受过俄炮兵的轰击，杜立三选择了专打俄军，他常常对俄军人数较少或未加戒备的地区进行袭击，而且一打就跑。俄军在蒙受很大损失的同时，对这种忽隐忽现、出没无常的打法又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他们在心理上都有了阴影，以至于每到一处，就会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杜立子（俄军对杜立三的称呼）有没有？"老百姓成心吓他们，于是也用刚学会的俄国话回答："也西（俄语有的译音）！"俄军一听，立时惊逃。

辽西的老百姓对"老毛子"又恨又怕，可是日俄战争结束，杜立三又代替了"老毛子"，成了辽西的一大公害。据说杜立三不仅肆意掠夺民财，而且还霸占民女，因而民愤极大，各地控告和要求对他绳之以法的状纸在奉天公府中已经堆了厚厚一摞。

和他的前任盛京将军增祺一样，徐世昌将杜立三视为必除的大患，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杜立三等以积年巨匪，屡与官军接仗，恶贯满盈，久为地方之害。"

杜立三当时主要活动于“三界沟”一带。“三界沟”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处于辽阳、新民、海城三地交界处，乃典型的“三不管”区域。三地官员对杜立三向来都抱着装聋作哑、能推则推的态度，一旦发生案发，则相互进行推诿和指责。徐世昌这次决定专责一地，受其委派，奉天营务处提调殷鸿寿来到新民，向新任知府沈金鉴和张作霖传达密令，要求他们限期剿灭杜立三，逾期不成，唯两人是问。

对于张作霖而言，擒杀杜立三已不仅仅是邀功请赏的问题了，它还关系到自己能不能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所以这事不是能不能干，而是必须干。简单一句话，机会就这么点，你有戏我就没戏！

可是擒杀杜立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以前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杜立三本人彪悍善战，所部武器精良、人多势众，官军与之交锋，从未能够占到便宜。除此之外，“三界沟”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杜立三又在那里修筑了不少碉堡和地道，沟内还设置重门深巷，是个易守难攻的贼窝。张作霖和沈金鉴再三研究，认为派兵进剿没有太大的成功把握，最后很可能又落得个损兵折将、徒劳无功的下场。

硬攻不成，智取怎么样？智取的关键是设计捉住杜立三，张、沈都相信，只要杜立三落网，其部必然沦为一盘散沙，到时就算要端他的老巢，也易如反掌。

张作霖首先以结义兄弟的名义，派专人到“三界沟”向杜立三道喜，一面伪称奉天总督府派使来向他招抚，而且给他的官衔比自己还高，一面诓骗杜立三速来新民晋见“招抚委员”，以便筹备受抚事宜。

张作霖精心编造的这套东西，却并没有能如愿以偿地立即打动杜立三。杜立三长年纵横江湖，早就修炼成了个妖精，岂是那么容易上

当受骗的，而且他其实从心底里很鄙视张作霖：就知道抱粗腿，顺杆儿爬，官府一招手，你就欢天喜地地奔了过去，反过来与我们这些昔日的黑道兄弟作对。就你这样的，还配叫江湖好汉？没骨头！

印象不好，说话的诚信度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同时杜立三的母亲和弟弟也都认为张作霖是在设“鸿门宴”，此行风险太大，凶多吉少，力劝他不要去。既然如此，杜立三便打定主意不去新民，他对张作霖派来的人说：“张为官，我为匪，我们已经是走两条路的人了，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朋友和交情。我们是有骨头的，我们看他升官好了。”

哄骗不成，反遭到一顿奚落，张作霖又沮丧又生气。想来想去，他只得求助于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老秀才杜绊林。

捕生不如捕熟

过去人们对于读书人尤其是有功名在身的人普遍都抱着一种尊崇的态度，结识者往往引以为荣，即便杜立三这样杀人如麻的魔王也不例外。只是书生们大多对他望而生畏，不敢过于接近，唯有杜绊林没有这些顾虑，一直以同宗的关系与杜立三常来常往，不仅如此，杜绊林还很看重杜立三，常用一些历史上侠义英雄的故事来激励他。杜立三觉得碰到了知己，遂认杜绊林为同宗叔父，对他非常信任，遇事必向其请教。

杜绊林亲眼看着张作霖由“胡子”转到“保险队长”，又由“保险队长”升为朝廷要员，他希望杜立三也能走这条路，并认为杜立三若受招安，其地位和成就必不在张作霖、冯麟阁之下。为此，他对杜立三以

宋江相期许，还亲书“忠义家风”四字相赠。杜立三也很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特地将四字制作匾额，悬挂于家里的大门之上。

张作霖知道杜立三很听杜绊林的话，就把杜绊林接到新民府自己的家中，一边优礼相待，一边展开攻心战。

古语道：“未角智，先练品。”既是古语，那就是很遥远的事了，如今大伙儿真要斗智，比的都不是什么品德高低，其实比的就是谁更鸡贼更腹黑。谈话间，张作霖脸不变色心不跳，堂而皇之地把自己摆到了与杜绊林一样的出发点，说他对杜立三这位结义兄弟也是寄予厚望，常想劝对方改邪归正，“（一旦被招抚），以立三的才干和力量，何愁不青云直上呢？”

就在杜绊林频频点头赞同之际，张作霖话锋一转：“可是立三始终不肯回头，前几天因徐总督（指徐世昌）带兵到省，我觉得他这样干下去太危险了，特设酒席请他来，再进最后忠告。可惜他反而误会了，不但拒而不来，并且说些闲话。”

即便不看画面，也能想象得出此时张作霖脸上的表情，当然这只是个引子，他真正要让杜绊林感觉到的，其实是“举世无不争之家”“我决不会计较自己兄弟的态度”。杜绊林被告知：“这次请你老人家来，就是为了此事，仍想请他觞叙共商进止。现在徐总督带重兵来奉天，决心要消除地方匪患，不像自家朋友，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心照不宣了。”

软硬兼施之后，张作霖又开始用上煽情这一必杀技：“立三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趁徐总督还没有动手的时候，他和沈知府力主招安，

他投降是有把握的。你老人家如果同意，能否亲自出名邀他前来，以免再发生误会？”

说到动情处，他干脆双膝跪下，认杜绊林为义父，同时捶胸发誓：“若有三长两短，拿我张作霖是问。”

这一番旁人看上去恨不能挖心肝掏五脏般的表白，很耗当事人的体力，但也真有效。杜绊林听了大为动容，认为张作霖很够朋友，招抚杜立三完全是出于诚心善意，加上之前为证明朝廷确实是诚心招安，绝非欺骗，张作霖已带他引见了殷鸿寿，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张作霖的请求。

正是捕生不如捕熟，当下张作霖便假模假式在新民街上为杜绊林另设招待处，请杜绊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说等杜立三来到后，可以一同晋省“谢委”。杜绊林则修书一封，邀杜立三速来新民会晤。

杜绊林的这封亲笔信果然起到了效果，尤其是当杜立三读到“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这些句子时，更是怦然心动。

俗语说得好，“当一天胡子，怕一辈子兵”，盗匪的最大心病是什么？就是“剿匪”！一个黑道大哥就算混得再好，都怕这两个字，也不免要为自己的结局做些打算。应该这样说，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投降和受抚的，想想看，只需换套衣服，然后便可以首领当官，喽啰当兵，又不愁吃穿，又不怕官捕，何乐而不为?

在此之前，杜立三并不是真的不想受抚，只不过是“小孩子放鞭炮，又爱又怕”罢了，现在杜绊林帮他消除了疑虑，没有“怕”，光剩下了“爱”，就没有不去的道理了。

毕竟是个老江湖，杜立三在动身前往新民之前，仍然做了严密布置。他首先通知附近和留守的亲近部卒两百多人，让这些人马做好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就驰往救援。其次是在“三界沟”到新民的两百里路途中，以西佛牛录镇为重点，设置哨所四座，每座哨所都派驻十名骑兵。一有风吹草动，骑兵就可以快马传报，让他的弟弟杜老疙瘩率队对自己进行接应。

所有这一切布置完后，杜立三才精选出十三名贴身护卫，由“二当家的”、人称“宋帮带”的宋庆濂带领，随自己一同前往新民府。

送客

杜立三自以为精明干练，布置妥帖，不知道狐狸遇着了虎狼，那张作霖更不含糊。还在杜立三动身之前，他就密令张景惠领五百骑兵绕道到达八角台待命。在探得杜立三动身后，张景惠兵分两路，骑兵主力进驻“三界沟”附近，一面做好进剿准备，一面防止外面的“胡子”增援。所分出的另一部分骑兵潜伏于辽河岸上的卡力马，对杜立三设于西佛牛录镇的重点哨所进行牵制，同时防止杜立三逃逸回窜。

在新民街上，张作霖把一家饭店作为接待杜立三的招待处，殷鸿寿则住在一家当铺的后院内，执行抓捕任务的士兵都藏在这家当铺里。

里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外面仍是风和日丽。当杜立三一行到达新民府城郊外时，张作霖即派人迎接，将他们引至招待处，一如所承诺的那样热情周到。杜立三在稍事休息之后，也派宋庆濂去向张作霖报到，并约期会面。

宋庆濂一到张作霖处便发现落入了对方陷阱，不过张作霖并没有强行将其拿下，而是来了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此时宋庆濂明知众寡悬殊，若要反抗的话可以说是毫无益处，只有吃亏的份儿。更何况他似乎也没有为“大当家的”无条件殉职的必要——杜立三平时为人残暴，待属下苛刻，相比之下，张作霖性格和善，处事较为厚道，倒更像一个值得跟随的“明主”。权衡利弊，宋庆濂当即决定“弃暗投明”，归顺张作霖。

这边杜立三尚蒙在鼓里，那边张作霖已随同宋庆濂亲自来招待处拜会。让杜立三感到惊讶和释然的是，张作霖便衣简从，居然随身仅带了两名护卫。

接下来，大家共进午餐。席间张作霖频频向杜立三举杯，预祝对方在晋省后能够一帆风顺，升官耀祖。当时一般规矩是官招待官，兵招待兵，随杜立三前来的十三名护卫另有人招待，而且也全都是大酒大肉，招待得殷勤备至。

饭后，张作霖邀杜立三同去“招抚委员”殷鸿寿处拜会。杜立三的护卫们大多已是酒醉饭饱，人困马乏，而且既然张作霖仅带两名护卫，杜立三要是再带上一大堆人未免丢份儿。护卫中有杜立三的内弟和族侄，这两人是他的心腹，对他忠心耿耿，因此杜立三决定只带上这两人，其余人等由宋庆濂指挥，在招待处静候。

杜立三一离开招待处，潜伏在店内的便衣队就展开行动，将店里的人全部包围起来。有人想要反抗，立即被宋庆濂制止，让他们不要动手，听凭处理。在宋庆濂的配合下，杜立三留在店内的护卫被悉数解除了武装。

张、杜来到殷鸿寿所在的当铺后，下马并肩入内。殷鸿寿将他们迎进后院北房，护卫则留在外屋。按照原定计划，张作霖和殷鸿寿等人本打算请杜立三上炕，趁他吸鸦片时，让人在炕上将其按住后予以擒拿。可是杜立三不吸鸦片，而且他久闯江湖，非常机警，一进屋就拣背墙面向其他人的位置坐下，同时两手不时插入兜内抚摩枪柄，使得暗藏的抓捕士兵根本没法下手。

见此情景，张作霖和殷鸿寿只好自己先上炕吸烟，以便借机行事。两人一边吸烟，一边恭维杜立三，说杜立三敢于和俄国兵交锋，给国家出了气，替老百姓报了仇，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又说朝廷由于爱惜人才，不但赦免杜立三过去的一切罪恶，而且还要将他升为军官，为国家出力。

对这些试图转移注意力、让他放松警惕的恭维话，杜立三始终抱着唯唯诺诺的态度，不做任何肯定答复，只是连说“再商量”。非但如此，在发现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而且门外还有杂沓的脚步声和低语声后，杜立三的疑心还更大了起来，一再要起身告辞。

眼见炕上擒拿这一招已经失败，张作霖、殷鸿寿只得使用预定的第二套方案。在预料门外业已布置就绪的情况下，两人假装不再够挽留杜立三，一同起身送他出门。随着殷鸿寿一声高喊：“送客！”门外已有人揭起了门帘。

杜立三走在前面，因为即将离开，戒备和紧张情绪也一下子放松了许多。可是就在他跨出门，转身请殷鸿寿“留步”的时候，话还没说完，便有人从背后伸过手来，将其紧紧抱住！

杜立三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想要拔枪反抗，无奈两手已被人死死压住，一动也不能动。这时又有几名壮汉冲上来，将杜立三按倒在地，摘下手枪后捆绑了起来。

杜立三叫骂，也是为了向留在外屋的两名护卫发出信号，但张作霖早就布置好了监视兵，那两名护卫刚刚拔出枪，就被打中手腕并遭到生擒活捉。

在将杜立三拿住后，张作霖、殷鸿寿和知府沈金鉴经过商议，确定将其处死。当晚，殷鸿寿宣读省法令，公布了杜立三的罪状，在奉天营务处警务人员的监视下，杜立三被就地正法。

“黄天霸”干掉了“窦尔敦”

接到杜立三业已伏法的消息，潜伏于卡力马的骑兵立即出动，收拾了杜立三沿途布置的所有哨所。张景惠更是一分钟都不敢耽搁，率队争分夺秒地驰往“三界沟”，将杜立三的老巢予以层层包围。

张景惠先礼后兵，派人拿着所缴获的杜立三本人的枪马以及省令，到杜家劝降：“杜已伏法，有其枪马为证。余者不究，愿回乡务农者，缴枪发价，愿当差者，受抚。”

树倒猢狲散，得知“大当家的”已经身首异处，杜立三的部属大多已无顽抗之心，只有杜立三的弟弟杜老疙瘩要为哥哥报仇，一心想着拼命到底。杜母虽是女流，但能说善道，经常周旋于各帮派之间，为他们排忧解难，是各帮派公认的“老干妈”。她见大势已去，便劝小儿子暂且忍耐，等以后有机会再徐图报复。

在杜母的主持下，杜部打开大门，迎接张景惠的人马进院。后者进院时持枪布岗，如临大敌，杜老疙瘩一时忍耐不住，拔枪就射，一些忠于他们兄弟的帮会人员也跟着射击。双方一场混战，最终因士气已丧，杜老疙瘩及其所部还是被张景惠给打垮了，他本人也被拉到院外砍了头。

杜绊林尚在张作霖为他安置的招待处内，还等着和杜立三一道晋省呢，直到杜立三被杀的消息传来，方才如梦初醒。

京剧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作黄天霸，他和绿林好汉窦尔敦相对，乃是个“外表人畜无害，内心扭曲狰狞”的朝廷鹰犬，专干卖友求荣、靠哥们儿的血来染自己红顶子的事。在杜绊林眼里，张作霖赫然就是个翻版黄天霸，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还受到利用，生生让杜立三上当受骗中了圈套。

老先生悲愤万分，追悔莫及。他气冲冲地找到张作霖，指责对方无信无义，言下恨不能和张作霖拼命。

对诱杀杜立三可能带来的舆论反响，张作霖当然能够预想得到。消除了这样一个地方上的隐患，朝廷高兴，那些曾经受害的百姓也会拍手称快，可是在更多素有梁山情结的民众心目中，就完全不同了，“黄天霸”干掉了“窦尔敦”，会说你好吗?

大丈夫做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能够想到，还一定要去做，就是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张作霖很镇定地对杜绊林说：“杜立三凶横残暴、恶贯满盈，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正是大仁大义。事前所以不同你老人家说，是怕事机不密，一旦泄露，就免不了要大动干

戈。我这样做所全者大，所伤者小，老人家为了侄儿，情固有所难堪，如从大义灭亲的道理看去，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张作霖这话说得很有高度，让平常都爱把这些大道理放在嘴边的杜绊林顿时语塞。张作霖又接着说道：“这次兵不血刃而为地方除一巨患，完全是老人家的力量，我张作霖决不能贪天之功为己功，一定要报请徐总督从优奖叙。”

杜绊林听了，情绪稍微平和了一些，对张作霖说：“我没料到你会这样欺骗我，我已老了，苟全性命，不求显达，所最痛心者，是我诱骗了我的侄儿，我的侄儿虽不是我亲手所害，却死于我手。”言毕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张作霖再怎么做大义凛然状，毕竟心里也觉得亏欠。他极力安慰，并保证将对杜绊林的晚年生活尽全责。

事已至此，眼见得对张作霖拽又拽不得，打又打不着，杜绊林只得强抑悲痛，说：“算了吧，为奉天除害，你是做对了。死者不可复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希望你对他（指杜立三）的身后加以照顾，对于他的部众有所安抚。”张作霖忙又安慰一番，答应对杜立三的家属一定要尽到朋友之情。

临走时，杜绊林给张作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赶紧向总督报功去吧，前途远大，好自为之！”

不单单是杜绊林，大概当时稍有点眼力见儿的，都能看得出张作霖“前程远大”。得悉张作霖已剿灭杜立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立即上奏朝廷，为其请功，在奏折中，他力赞张作霖：“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

剿匪得花钱，徐世昌上任后用兵频繁，短时间内，前任留下的七十万两白银就花得精光，地方财政因此出现了数十万的赤字，巡防营甚至一度连薪饷都开不出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两个月不给官军发饷，就有化兵为匪的可能，也就意味着所有剿匪方略都将前功尽弃。徐世昌和主管营务处的张锡銮都因此愁眉不展，在张作霖前来拜见时都不约而同地面露难色。察知他们的难处，生财有道的张作霖第二天便派人拿来一万两白银，以帮助上司应急。

中国的潜规则向来是，光有能力有功劳不行，还得上司真正认可才行。张作霖的机敏反应让徐世昌、张锡銮十分满意，不断向朝廷进行保荐。1907年8月，张作霖终于接到圣旨，他被晋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仕途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章　最关键的一步

从19世纪末开始，出于巩固边疆，缓和关内人地矛盾等原因，中国政府实行了“蒙地开放，移民实边”政策，下令在蒙古“放荒招垦”，允许和鼓励汉人进入蒙地并耕种土地。

蒙地开放虽是大势所趋，但在客观上也确实让很多不善经济的蒙古人感受到了生存危机，由此便出现了“反垦起义”。蒙古有两首传唱度很高的民歌，一为《嘎达梅林》，一为《陶克陶胡》，歌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垦起义”的领导人。只是陶克陶胡发动起义的背景更为复杂，当时沙俄正在蒙古收买上层王公和匪首，积极策动以武装叛乱为主的所谓“独立运动”。陶克陶胡在此期间与俄国人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实际被沙俄所操纵，为其分裂中国充当了马前卒。

在一次武装反垦的集会上，陶克陶胡说：“我们蒙古族人要把移入蒙地的汉人驱逐干净，保持我们蒙古领土完整，没收在蒙的汉族商店的财产。”1908年，他率部进入洮南府境内，不但对汉民进行大肆劫掠，而且还把垦务局的官员抓起来，将蒙古人牵狗用的铁链子套在他们脖子上，逼着他们吃狗食。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陶克陶胡又与蒙古土匪白音大赉、牙仟驱等部结成了联军。这些草原上的“胡子”人人乘好马，带刀枪，凶悍异常，牧民见到他们都非常害怕，其烧杀劫掠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反垦的范围，据说连陶克陶胡都对白音大赉等人有所不满，因为他们“军纪极坏，常常不加分别地劫掠汉人财物”。

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牙仟驱三股人马成犄角之势，屡次袭击官府和汉人居住区，令奉天地方政府极为不安。奉天当局曾多次组织官

军进剿，奈何对方出没无常，“此剿彼窜，滋蔓难除”。

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西北沿边两千余里的地方已几成蒙军乐土，没有一处可以真正安宁。鉴于张作霖在剿除杜立三时的出众表现，徐世昌在与张锡銮商量后，决定任命张作霖为蒙古剿匪总指挥，所部由五营扩为七营，急速进兵洮南。

在张作霖看来，徐世昌委以大任，是对自己的器重，此次剿匪是继杜立三之后，又一个“功成名就之天赐良机”。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要想抓住并实现这一“良机”，其难度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

一块烧饼

洮南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干燥草原，夏天蚊子既多又大，有的个头几乎跟蜜蜂相似，叮人特别厉害，名为“瞎虻”。一到黄昏，“瞎虻”等蚊虫成群飞来，糊到不加防备的人身上，一夜间就能把人血吸干。张作霖所部在草原上行军，大热的天都不得不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便寸步难行。

比蚊虫更具威胁的是狼。“跑拔子”（军队里的通信人员）一个人骑马外出送信，往往就会被狼吃掉，最后仅剩一匹马跑回来，因此“跑拔子”不离开大队便罢，要离开的话必须几个人在一起，而且还得全副武装，就这样，有时仍免不了遭到狼群的包围。

这是夏季，到了冬季，草原上冰雪载途，人烟寥寥。官兵们晚上露宿寒林，光把手指冻掉的就有二十多个，其他人脸上手上也都不同程度地有冻裂伤。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大家只能吃些干粮，捧雪为

饮，张作霖本人亦不例外。有一次，徐世昌派员前来赏银犒师，来使在河岸边碰到张作霖，其形容之憔悴，几乎令他不敢相认。过后，他向徐世昌进行了报告：“（剿匪部队）艰苦情形，可以想见。”

张作霖所部面临的困难，蒙军当然也会遇到，但后者的适应能力显然要强上许多。首先，蒙军出动时会预先带上大群空马，这些空马既是交通工具，可用于换乘，同时亦是其主要给养来源，每当断粮，他们就会杀掉几匹，以马肉充饥。马肉热量高，每天吃一顿基本就可以一天不饿肚子。其次，因为反垦，陶克陶胡等部得到了不少蒙古族民众的支持。随张作霖一同出征的张景惠曾说：“我们军队所到之处，蒙古人都搬家躲得远远的，所以我的部下人马住食十分困难，就想找个蒙古人领路也办不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蒙古族民众视陶克陶胡为英雄，会随时予以接济和帮助。

官军在草原上备受苦楚，每个人都希望早一日收工打道回府，可是接仗并不顺利。蒙军全都精于骑术，有着不俗的枪法，纵马冲锋时他们会将头贴在马脖颈上，以减少伤亡，当驰近目标时才一跃而起进行射击。官军若意志不坚，准备不足，随时有被蒙军冲垮的可能。

要说光这样还好应付，张作霖马队成员有不少是以前辽西的“马胡子”，骑射作战的技术也不赖，加上具备人数武器上的优势，双方真要是立住阵脚，你一刀我一枪地比拼，蒙军自然不是官军的对手。

问题是人家偏偏不跟你这么比。蒙军所用战法多为奇袭，也就是先出其不意地来一个攻击，给你造成损害，然后打马就走，溜之乎也。

蒙军每个人都有两匹马，骑一匹休息一匹，骑的那匹如果被打伤或跑乏了，可以立即换上备用马，以此保证他们的马儿有足够脚力。除此以外，草原上没有正规的道路，不像辽西平原上有村落、树木等作为据点或标志，不常来往这些地方的人简直没有办法走路。因为这些因素，蒙军要么不想逃，只要他们想逃，常见的情况往往都是：官军这边刚刚整顿好准备追击，蒙军那边早已杳如黄鹤。

其实有时候若干脆不追还好，怕的恰恰是若即若离，部队被诱得紧追不舍。那样的话，一旦跑到很遥远的地方，各部就很容易和本队脱离，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张作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险情。那一天，他和蒙军一场鏖战，蒙军故技重施，打了就跑。张作霖带着全部人马跟踪追击，走了一两天后，他才蓦然发现指挥机构与各队脱离了，周围杂草遍野，各队皆不知所往。

张作霖当时身边不过才十几个人，吹集合号没人听得见，鸣枪又怕被蒙军发现，他们只好慢慢地找。过了不久，大家把干粮差不多吃光了，饿了一天多，连困带饿之下，人人都有些承受不住。张作霖年轻时餐风宿露，挨饿也是常事，他最担心的是“总理”陶历卿吃不消。

“总理”是指挥部门办文案的人员，指挥机构内凡一切不直接属于军事作战的事宜，例如公文、粮饷等，都由其负责，所以职位还是很重要的。张作霖非常尊重和关心文人，在他的思维里，文人与武人不同，忍饥挨饿的生活是过不惯的，也决不能任由其挨饿。

张作霖身上还藏着一块烧饼，于是他骑着马走到陶历卿旁边，把这块烧饼悄悄递给了陶历卿。

陶历卿一看是烧饼，哪里肯要："统领（指张作霖）也一天多没吃东西了，留着统领吃吧。"

张作霖摆摆手："你不用管我，你吃吧。"

陶历卿又要让给别人吃，张作霖也不允许，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吃下去。陶历卿没办法，只好一个人把烧饼吃掉了。

就这样苦挨苦熬，他们才在一天下午找到各队。聚齐后，大家在一个四面高、中间低的区域集合休息，因为认为这样的地形能遮蔽敌人的视线，当下便决定就地过个夜。

就在其他人忙着搭帐房和埋炉造饭的时候，张作霖亲自上马，到附近绕了一圈。回来后，他召集所有管带开会，说："不能在这里宿营，赶快上马开拔！"

过人之处

一连三四天奔波下来，众人已经累到了两脚打飘，能够过夜休息，没有人不高兴。现在一听要开拔，各营管带、哨官、军士都不乐意，但在张作霖的一再坚持下，又只好勉强动身。

约莫走了一百多里，天亮时他们到达了一个汉蒙交界的地带，可以看到有土房子和蒙古包，张作霖这才传令"住下"。紧接着，后面的监视兵报告："昨夜蒙古兵果然前来奇袭。"

凡是和张作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身材短小，然而两眼炯炯有神，精悍之色见于眉宇。"后来据说法军元帅福煦（一

说是霞飞）到访中国，在奉天见到张作霖时，也称他“两只狐眼，机警过人”。正是凭借这种精悍和机警的性格，张作霖又一次摆脱了危险。

晚上宿营，张作霖和陶历卿一个住在土房子的里屋，一个住在外屋。陶历卿认为到了新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想安心地睡个好觉，但张作霖偏不让他睡，一个劲地催着他写信。

陶历卿写了一封又一封，一共写了七八封，直熬到深夜才结束。这时勤务兵都已睡着了，张作霖却还没有睡，正在屋内抽大烟玩呢。见陶历卿写完了信，他就把大烟盘子端出来让陶历卿吸。陶历卿推说“不会”，他不让，非得吸，还亲自倒在炕上，给陶历卿打烟泡。

陶历卿推辞不得，只好吸了两口，但他到底困得不行，很快就晕晕乎乎地倒在炕上，头塞在枕头下面睡着了。睡梦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耳边有“扑哧扑哧”的声音，转过头来，赫然看到有人正用刀砍他的枕头。

陶历卿这一惊非同小可，脑子立刻清醒了，他迅速拔出枪，向持刀之人射击，然而子弹并没有射中对方。千钧一发之际，由里屋冲出一人，他把陶历卿拉下炕，用膝盖将其压倒在地上，随之甩手就是“一连六响”（即六颗子弹连发），而且连续打了好几连。与此同时，外面也枪声大作。

原来部队到新地点后，蒙军还是跟了过来，并且在夜晚实施偷袭。张作霖虽不知道这些，但他直觉危险未过，而在有危险预感的情况下，他是不会睡觉的。让陶历卿写信和吸烟，也是为了让陶历卿警醒一点，以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的发生。

蒙军偷袭时不用枪，只用刀，在他们砍陶历卿的枕头前，外屋的两个警卫兵已经被砍死了。陶历卿虽然还是睡着了，但幸亏把头放在了枕头下面，又因为被张作霖干扰，所以睡得不是太沉，否则也难免一死。最后从里屋冲出，救陶历卿一命的正是张作霖。他射出的子弹把闯入屋内的两名蒙古兵都给打死了，同时枪声也唤醒了屋外的大部队，参与偷袭的其余蒙军见行动已经暴露，赶紧骑马逃走了。

在草原追剿的那些日子足可以称得上是艰苦卓绝，若是一个不善于带兵或缺乏江湖经验的人，可能还没过几天，麾下官兵就会逃得一干二净，让指挥官变成光杆司令。张作霖在洮南一干就是几年，部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苦和险，都已渐渐习以为常，让人无法接受的还是迟迟难以建功。在这片宽阔无垠的草原上，成天就只能眼看着蒙古骑兵像闪电一般出没，官军除了干着急，还是干着急。张作霖压力很大，他对部下们说：“如果不能把蒙匪消灭，我还有什么脸面干呢？”

听了张作霖的话，大家都坐不住了，便一起寻思究竟该用什么法子才能把事情办好：想剿平这伙“蒙匪”，必须一部一部地消灭；要消灭其中的任何一部，必须知道这一部的老巢在哪里，这样就非得派人去挖底；被派去挖底的那个人，又非得与“蒙匪”有内部关系不可。

众人想来想去，一致认为只有八角台的安遇吾能办这个事，而且除了他谁都不行。

安遇吾身材高大，经常穿一身不扣纽扣的袍子，系一条布带子，平时好骑快马，骑马时不拿马鞭，拿的是绳拂，这是当时东北有钱人

的典型装束和做派。安遇吾很有钱，但绝不吝啬：朋友有急，挥金如土自不在话下；朋友有难，别说钱，要他拿命相抵都没有问题。

这种比《水浒传》中“及时雨”还要更慷慨好义的性格，在江湖中最受推崇，在八角台一带，凡是“耍混钱的”，无不把安遇吾敬得像个头儿一般。有人甚至说安遇吾不是“胡子”，但却能指挥“胡子”。

过去，“胡子”里面有一类人，名为“插千的”，专门负责在“砸窑”前潜入“窑”内做卧底或进行侦察活动。“插千”非常危险，一旦被对方发觉，重者被立即处死，轻者也会被打成残疾，所以“插千的”除了需要“管直”（枪法好）外，还必须机智勇敢、忠诚可靠。安遇吾不是“胡子”，当然更没有做过“插千的”，但是“插千的”所需要的技能和品质，他全部都具备。更重要的是，牙仟驱那里有个名叫鲍老疙瘩的头目，过去在安遇吾家里做过事，两人交情不错，安遇吾可以利用这一关系打入对方内部。

张作霖与安遇吾是至交好友，听了众人的意见后深以为然，遂派人给安遇吾送信，约他前来一聚。

路线图

尽管张作霖在信中只是说老朋友聚会，但安遇吾读过信后，还是立即意识到张作霖一定是军事上遇到了什么困难，非自己去不可。

张作霖是何等样人，那也是过五关斩六将后杀出来的豪杰，他都办不了，可想而知有多凶险。这同时意味着他安遇吾要么不去，去了能不能再回八角台就说不定了。安遇吾对信使说：“你回去告诉统领，

我随后就到。”信使一走，他在家中杀猪宰羊，宴请邻里和好友，为的就是当着客人的面托付后事。

安遇吾赴约后，张作霖不仅设宴款待，还亲自陪同游玩，只是对深入虎穴一事仍未有一言涉及。这样过了一个月，安遇吾终于有些忍耐不住了，他对张作霖说：“雨亭，究竟有什么事情，快快讲。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是万死不辞。”

张作霖这才说出了行动计划，并且说除了你安大哥，谁也无法把这件事办好。安遇吾听后立即答应下来：“好，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安遇吾独自一人，骑着马向草原深处如飞奔去。在他身后，张作霖一直目送着，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方转身回去。

安遇吾很快就找到了鲍老疙瘩。他现编的一套话是说冯麟阁夺去了他的地盘，使他在八角台一带站不住脚，所以不得不来投奔牙仟驱。鲍老疙瘩信以为真，就带他前往牙仟驱老巢，并将他引见给牙仟驱等人。牙仟驱听鲍老疙瘩说安遇吾如此了得，自无不予以接纳之理，这样安遇吾便在牙仟驱那里住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大营附近突然来了一群蒙军骑兵，张作霖闻报立即率部迎击。这些蒙军骑兵打了几枪就逃走了，不过临走前却在树上挂了一件东西。大家近前一看，发现是一个包袱，取下来一瞧，竟然是安遇吾被卸成几块的尸体！

安遇吾遇害了，显然蒙军是在用这种方式向张作霖示威：你派来的侦察员不中用，我们已经把他给杀死了，看以后还有谁敢再来冒这个险。

张作霖见状如遭雷击，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哭罢，他赶紧让人把安遇吾的尸体洗净，再用针线缝在一起，以便装入棺内，送回原籍安葬。

就在刷洗尸体时，有人发现安遇吾的腿上有一处已经溃烂的刀伤，而且伤口里似乎还藏着什么东西。掰开一瞧，里面有一个小油纸包，打开油纸包，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张手绘的路线图。

原来安遇吾打入敌营不久，就摸清了蒙军老巢的位置以及外界通往其老巢的道路。在将这些记好画下来后，本来已经完成了任务，可以逃回来了，但他还想再刺杀一名蒙军头目，以便瓦解其力量。

为了避免逃回来的途中发生意外，安遇吾将路线图藏在伤口里，随后才去进行刺杀。不料尚未展开行动，他的意图就被蒙军发现了，后者将他杀死，又大卸成几块送来张作霖处示威，但唯独没有对安遇吾的伤口处进行仔细搜查。

路线图仿佛给黑暗中的张作霖送来了一盏明灯。1908年6月12日，他按图索骥，率部突袭蒙军老巢。蒙军猝不及防，慌忙溃逃，却又在溃逃途中遭遇伏击。白音大赉手下得力干将巴塔尔被俘，张作霖下令将其斩首示众，以振军威。

6月28日，张作霖再次分四路发起攻击。牙仟驱和他手下头目黑虎窜地龙等人被击毙，他的两个儿子被俘。白音大赉虽然逃走，但是也顶不住张作霖的穷追猛打，不久受伤被捕，几天后即因伤重身亡。

牙仟驱、白音大赉这边一垮，陶克陶胡遂陷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被迫逃往大兴安岭北部的索伦山区。1909年1月，正值朝野上下欢天喜

地庆贺新年之际，张作霖率军深入索伦山区，在林海雪原中对陶克陶胡部发起猛攻。

这是张作霖在剿匪过程中所经历的最激烈一仗，蒙军设置了多处险要工事，火力也非常猛烈。张作霖在此役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虽然尖兵队员纷纷中弹倒下，仍坚决不肯后退，最后他终于一鼓作气，亲自率队冲上了山顶。蒙军残部难以抵挡，遂丢下山寨，向巴林旗方向溃逃。

1910年4月，在沙俄特务和俄国驻哈尔滨总领馆的安排下，陶克陶胡绕道外蒙逃入俄境，当时他身边仅剩下了几名护卫。至此，内蒙局势趋于稳定，沙俄分裂中国的图谋也宣告破产。

张作霖深知安遇吾在其中所建之功，他除了派人把其灵柩送回八角台风光大葬外，还将安遇吾的两个儿子一人补一个哨官，带到洮南进行安置。可是安遇吾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在性格上都随父亲，不愿受差事约束。他们几次故意犯错，希望张作霖能够开除他们，而张作霖始终记着大哥的恩情，总是一味包涵，不肯加责。

最终，两孩子还是开小差离开了军营，去往哪里，谁也不知道。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混乱，重又盗匪蜂起。一股土匪打进八角台，向当地商会勒索十万元。就在这时，突然又杀出一股土匪，把先前的土匪给打跑了。商会代表想把钱交给新来的这一股，谁知那位“大当家的”听了却哈哈大笑，说：“我回来是保护家乡的，谁拿出来的钱就还给谁，我是拿不起的。”

说完之后，这股人就走了。有人认识“大当家的”，说他就是安遇吾的儿子啊！

你把我张作霖当个什么人了

张作霖征蒙大获全胜后，即派“总理”陶历卿护送其家眷先回洮南府。家眷中有张作霖新娶的第五房妻妾寿夫人，寿夫人是旗人，乃黑龙江将军寿山的一个外室（即妾）的女儿，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同时又年轻貌美，因此最受张作霖的宠爱。寿夫人恃宠而骄，平时很有些跋扈。

洮南地处偏僻荒凉的辽北，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与辽南相差甚远，寿夫人对食宿不满意，就迁怒到陶历卿身上，认为对方照顾不周，为此她把陶历卿叫到跟前，打算当面申斥，耍一下官太太的威风。陶历卿有着文人的耿直性格，哪里肯买账，寿夫人一发火，他就拿起茶碗泼过去，泼了寿夫人一身水。

寿夫人丢了面子，后来见到丈夫时便寻死觅活、连哭带喊地闹。陶历卿知道后颇有些后悔，他找到张作霖，表示自己脾气不好，不便在张府干下去。张作霖听了马上对他说：“你把我张作霖当个什么人了？她（指寿夫人）年轻，闹就闹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事情要紧。”知道陶历卿可能觉得不自在，又说：“既是你为此不愿意在这里，先到叙五（张景惠字叙五）那里也是可以的。”

还没等陶历卿调到张景惠营中，张景惠自己倒已经接到了调令。原来当时各省均设立了讲武堂，用以提高中下级军官的军事知识，东三省一共只设立讲武堂一处，校址就在奉天省城。按照规定，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巡防营军官都需进入讲武堂学习一年，入校时带原部队的底薪，毕业后再返回原部队。

借着这个机会，张作霖便也安排陶历卿前去受训。当全体受训人员由洮南起身时，张作霖又特意前往送行，鉴于洮南信息较为闭塞，他在席间特意嘱咐众人，务必随时把省城形势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他。

正因为时常可以通过这种渠道得到报告，所以从此以后，张作霖虽远居洮南，但对于奉天的情形却非常明了，而这时奉天的形势也已变得非常复杂微妙，革命党人四处活动，尤其在新军内部的活动十分频繁。

甲午战争之后，许多人总结战败教训，认为中国陆军之所以不敌日本，乃是武器装备和编制训练不行之故，换言之，以前的湘军、淮军也包括毅军都落后了，得建立新的陆军。新军于是应运而生，按照政府计划，全国计划编练常备陆军三十六个镇（镇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师），但到清朝灭亡时，建制完备的新军一半都不到，只有十六个镇，其余都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协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旅）。

奉天的新军包括一镇一协，即陆军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这两支部队都是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带来的。不过新军指挥官的任免权却并不掌握在徐世昌或任何一个地方官手里，镇统（相当于师长）和协统（相当于旅长）均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到了宣统年间，也就是小皇帝溥仪登基之后，朝政主要由一些八旗子弟所把持，其中载涛任军谘府大臣，荫昌任陆军部大臣。这两人都曾考察或留学德国，对德国军事很是服膺，又由于日本正是在学习德国军事的基础上才练成了陆军，所以他们对士官生，也就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格外重用。

在载涛、荫昌等人的荐拔下，张绍曾、蓝天蔚分别出任第二十镇镇统制、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保送生，蓝天蔚第二期，他们和另一位士官同学吴禄贞并列，在校期间成绩优异，被称为“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业务上可能无可挑剔，但若翻到另一面却绝对可以让载涛等人瞠目结舌——早期的中国士官生有很多与革命党有联系，或本身就是革命党人，“士官三杰”皆属此列。

除张绍曾、蓝天蔚外，同为士官生的张榕也是东北革命党人的领袖。不过与张、蓝因手中握有武装而享有威望不同，张榕之所以受到党人拥戴则更多是缘于他身上的传奇色彩。

“乡巴佬”

张榕的父亲是辽东有名的财主，广有田产、商号、烧锅和当铺，仅在奉天就置有房产一两百间。和张作霖的“安大哥”安遇吾一样，张榕虽然家财万贯，但却专爱行任侠尚义之事。他很早就在关外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更与吴樾联手谋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那次轰动一时的谋刺案中，吴樾当场牺牲，张榕逃脱后化名潜往天津，但随即被侦探识破身份并遭到抓捕。张榕的姐姐张焕桂闻讯，赶紧通过关系向太监李莲英贿送重金，经李莲英跪求慈禧太后，才将死刑改为永久监禁。被监禁期间，又由其姐姐重金买通狱长，从而得以成功越狱。

越狱后，张榕东渡日本求学。他本人精通剑术，曾为了给一名下女争取自由，而同日本武士比剑，最终比剑获胜，使那名下女得到了解放。当然，张榕不会仅满足于当一名普通的江湖侠客，在日本的时候，他会见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张榕即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与张绍曾、蓝天蔚等共同策划反清事宜。

当时以大连为跳板，可以北往奉天，南达上海或远赴日本，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同盟会在东北的活动主要以大连为中心，张榕也一直在大连对革命党人和关外的武装力量进行联络。

1911年9月，也即武昌起义爆发前一个月，张绍曾的第二十镇被调入关，驻扎于滦州一带，奉命与驻石家庄的吴禄贞所辖第六镇一齐进行秋操演习。按照计划，张绍曾、吴禄贞将借秋操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张榕则率部从大连出发，经锦州入关袭击北京。因武昌起义突然爆发，清廷临时叫停了秋操，原计划被迫变更，张榕遂来到奉天倡言革命。

辛亥革命开始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黑龙江视察防务。赵尔巽是翰林院出身的老臣，因其身材瘦小，且生活俭朴，平时如果不着官服的话，很容易被别人误认为是个“乡巴佬”。在清末官僚中，“乡巴佬”官声卓著，尤其是首次执政东省期间更是为人所称道。

在清朝前期，作为所谓的龙兴封禁之地，汉人被禁止移住东北，这成了奉天省人烟稀少、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到了清朝中叶，封禁政策被逐渐打破，“闯关东”的汉人多了起来，政府也开始实施课税，然而财政上仍是入不敷出，每年国库用于补助的资金都高达百余万两。

历任奉督均在改善财政上动过脑筋，但都没有什么成效。赵尔巽继增祺之后出任盛京将军，他在那一任上着力整顿财政，除设置财政局外，还创办了东三省官银号，用于铸造银圆、发行纸币。因其措施有方，且为政清廉，在任两年间，便使奉天省的财政得以根本改观。当他离职转任中央时，奉天省金库储藏现金已有六百多万两。

可问题是，你前面即便留下一座座金山，也吃不消后面那些败家的折腾。接替赵尔巽的徐世昌虽然表面提倡新政，开发实业，但却也被外界指责为“用人不当，贿赂横行”，加上频繁用兵剿匪，赵尔巽留下的库存很快便被挥霍一空。

接班徐世昌的锡良一看财政又困难了，赶紧采取极度紧缩政策，一边设立奉天清理财政局，对财政进行整理，一边裁汰冗员，以节约经费。可就这样，财政上仍大大超支。锡良挽救乏术，回天无力，只得辞职而去，这才有了赵尔巽的第二次督奉，他也成为清代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

赵尔巽上任后尽其所能要拯救经济，重现昔日辉煌，但他这次的运气不好，在任期间，奉天连遭自然灾害，当时中央国库又一贫如洗，无力对地方财政进行弥补。赵尔巽巧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非但不能改变财政窘迫的状况，眼看着连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都没法维持了，最后他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二百万两，以资补助。

尽管如此，海内外对赵尔巽的评价仍非常高，认为他在财政困顿并被俄日两国包夹的情况下，“既敢于抵抗沙俄的横暴，又不甘居日本下风”，是一位“屈指可数的硬骨权臣”和“顶天立地的人物”。

得知爆发了武昌起义，赵尔巽料定奉天一定会人心动荡，于是连夜就赶回了省城。从1911年10月15日起，他下令拒收密码电报，并将最早公开披露起义消息的奉天《大中公报》予以查封，以便尽可能隔绝内外消息，同时不断召集会议，传见文武官员，力图稳定人心。可是东三省的革命浪潮不但没有因此平息，反而声势越来越大，蓝天蔚、张榕迅速成为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

上策

革命党在奉天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除掌握着驻扎于城外北大营的新军外，一旦起事，更可以在南满车站附近继续招兵购械，张榕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毫无顾忌地公开活动，甚至于他还与赵尔巽分庭抗礼，面对面地向对方提出了奉天要独立的要求。

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常用刺杀清廷重要人物的手段来营造恐怖气氛，官场对之无不“谈虎色变”，更何况张榕还曾在谋刺五大臣案中担当过重要角色，所以就算老练沉稳如赵尔巽，也不由得对此提心吊胆，深恐对方一不如意就给他来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能令东三省总督退避三舍，自非寻常之人，张榕由此在奉天轰动一时，连妇孺都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赵尔巽又得到情报，在南满铁路附近，一些日本浪人勾结本地盗匪，正阴谋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一旦得逞，日本便可以假借保护日侨之名，向满蒙伸手。

赵尔巽是汉军旗人，即便在如此风雨飘零之时仍倾向于王室。为此，他把亲近僚属召集起来密议，以征求挽救时局的措施。

还在1905年的时候，赵尔巽任盛京将军。那时朝廷为挽救垂危时局，诏谕各省督抚励行新政，作为新政的措施之一，是准许下级官员破格陈奏。在送上来的各种陈奏中，有一份引起了赵尔巽的注意，上面洋洋千言，陈述的各项改革建议均能引起他的共鸣。出于爱才之心，赵尔巽立刻召见条陈者并认为门生。

几年后，赵尔巽由川督回任东三省总督，这位门生遂正式加入其幕府，此人就是袁金铠。袁金铠被赵尔巽视为东三省难得的人才，一心要加以重用。当时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在各省设立谘议局。谘议局是政府机关的监督机构、日后省议会的前身，从政府人员的升迁补调到财政收入支出，均须其通过才能产生效力。谘议局人员主要由地方士绅选任，经赵尔巽授意，袁金铠也参加了谘议局选举并被选为副议长。

当着袁金铠等人的面，赵尔巽特意声明自己要为清廷保存东三省，给王室留出最后挣扎的余地，从而“不负累代食禄之恩”。袁金铠也先来了一下官样文章，说：“公能行古人之事，功书竹帛，名传千古，铠实钦之。”

随后，他便实打实地说出了自己想好的三条对策，供赵尔巽进行选择。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袁金铠这些幕僚都在一刻不停地关注和分析着外面的局势。在袁金铠看来，“武昌军变”（即武昌起义）之所以发作，纯粹是因为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镇统张彪没有控制好部队所导致的，不过革命军在揭竿而起之后并不可能走得太远。

袁金铠这么说的依据之一，是革命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者。黎元洪虽被推举为都督，但却是被革命军硬推上去的，他本人缺乏意愿，只是出于个人生命安全的考虑，勉强服从而已。孙中山、黄兴倒是革命党人当仁不让的核心领袖，而且正从海外赶回，然而他们只是机会碰得好，“武昌军变”并非他们两人的功劳。袁金铠推断“尔诈我虞，久必生变”。

内部不稳定，外部还有强敌。袁金铠得到消息，袁世凯已被朝廷重新起用，正统兵南下。袁氏久握北洋兵符，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金铠认为，只要袁世凯真打，“民间实鲜对手，胜负之分在指顾间耳”，也就是说革命军可能很快就会败北。

滔滔不绝地论述这么多，都是为了给自己的上策做铺垫。袁金铠照应赵尔巽的开场白，指出关外为朝廷发祥重地，倘若失陷，“岂独为朝廷根本之忧，亦公负世代食禄之恩”。

要替朝廷保住东三省，没有兵不行。奉天之兵可分为本兵和客军，本兵是指五路巡防营，他们是奉天省地方部队，故称本兵，客军是指驻于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袁金铠将他的上策概括为“充实本兵，联络客军，使市面不惊，地方安谧，使革命党人无隙可乘，东省可保无虞”。

如何“充实本兵”？得看五路巡防营的不同路数。中路巡防营统领由赵尔巽自兼，算是最可靠的近卫军，但该部驻防于铁岭一带，要用来拱卫奉天，而且光靠这一路部队显然也不顶什么用。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是秀才出身，恃才傲物且城府较深，要想在关键时候使用他并不容易，而且右路巡防营主守辽东的山林地带，那里情况也很复杂，需要部队镇慑，不能轻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虽是行伍出身，作战勇敢，且本人嗜利无远略，但其部驻地与张作霖一样，同在与内蒙相邻的洮南。虽然蒙古叛军已被张作霖扫平，但若不以重兵威慑，仍不免会死灰复燃。

剔开右后两路，剩下的前左两路统领才是袁金铠觉得可以加以重用的：“前路统领张作霖、左路统领冯麟阁系土匪出身，脑筋简单，公

（指赵尔巽）但示以优遇，勉以忠义，必能出力。”他请求赵尔巽，若认为此计可行，应赶快调张、冯来省，以资拱卫。

至于“联络客军”，袁金铠表示将和其他幕僚一起策划，竭力对之拉拢。按照他的想法，“充实本兵”和“联络客军”一有眉目，赵尔巽就能在奉天稳操胜券，到时只要召集军政人员、地方士绅在谘议局开会，当众宣布奉天中立，保境安民即可。袁金铠相信，如此布置，“一切党派人士不敢再存异志，省城当能如磐石之安”。

黑夜中出现了一盏明灯

“整军保境，镇慑革命”的上策之外，尚有中策和下策。袁金铠的中策是建议赵尔巽将巡防部队集中于省城，然后亲自统领，进兵榆关，以遥作勤王之师，后方则令地方士绅倡办团练。这是一个讨巧的计策，用袁金铠的来说，可以做到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倘袁项城（袁世凯）得手，公（赵尔巽）以勤王之故，不失为忠臣；若民军（指革命军）得势，公可奏请朝廷东迁，可当偏安之元勋，不失忠节”。

袁金铠也提到，若实在不行，只有响应革命军，树起白旗，宣布独立，并请皇帝退位。这就是“响应民军，甘当叛逆”的下策。

对着三策，赵尔巽思考再三，下策是他暂时根本不愿考虑的，中策似乎还没到那一步，所以可行一半，也就是没必要先率部勤王，但可以先让地方上办团练。只有上策，马上就能完全施行。

赵尔巽决定采纳袁金铠的上策，让张作霖、冯麟阁整军来省，但是这两大巡防营都有专守区域，短时间内调来并非易事。就在他为此费尽心机地对部署进行调整的时候，又被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乱了步骤。

赵尔巽固然在积极筹谋，奉天的革命党人却也从没闲着。张榕率先行动，与谘议局议长吴景濂进行联络，吴景濂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属于拥有新思想的立宪派，他见清廷大势已去，就与张榕商定在谘议局举行各界代表会议。居时，他们将在会上逼走赵尔巽，转而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吴景濂自己为民政长，以袁金铠为民政副长。

吴景濂虽然知道袁金铠与赵尔巽的关系，但既然在新政府里已为他留了位置，便认为对方会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且谘议局既要举行会议，不可能完全避开副议长，于是他就试探式地将这一意图告诉了袁金铠。袁金铠听了一边假装赞同，一边赶紧将此事报告给赵尔巽。

用谘议局开会的方式定局，本是袁金铠上策中的一个内容，未料对手竟会先下手为强，但令赵尔巽感到惊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客军”也出了问题。

蓝天蔚与张榕同时行动，他在北大营召集秘密会议，准备发动第二混成协的士兵入城占据各机关，直接宣布奉天独立。第二混成协由两个标（标相当于团）和步、马、炮等几个兵种混合组成，其中第二标标统（标统相当于团长）聂汝清毫无革命思想，也并不拥护革命，会议一散，他就跑到总督府向赵尔巽告了密。

密报意味着袁金铠“联络客军”的措施尚未真正着手就已失败。第二混成协是驻扎奉天的唯一新军，如有变故，别无其他可靠之兵。黑、吉两省虽还有新军，但这两个省的新军向来都唯蓝天蔚马首是瞻，只要蓝天蔚在奉天举义，黑、吉两省只会紧紧跟随。

客军不但不能依恃，反而成敌，至于“充实本兵”，根本八字还没一撇呢。有人说彼时的赵尔巽已准备身穿朝服，以身殉主。如果仅仅是形容他的绝望之态，无疑配得上形象逼真四个字，但赵尔巽实际也没有愚忠到那个地步，他是想三十六计走为上，保命回京的。

临走前，赵尔巽召集亲信开会，在讲清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说：“我早就知道新军靠不住，担心他们与革命党发生联系。现在他们果然密谋造反，我手头又无可靠的军队，所以只好出走入关了，事已至此，实属无奈。”

众人听了一阵骚动，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袁金铠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赵尔巽面前，声泪俱下地说道：“请大帅为我全省民命着想，不要入关。革命党完全是虚张声势，蓝天蔚部下既然来告密，说明军心依然归属大帅，谅不能有大问题。大帅这样轻易出走，不是更便宜了那帮乱党吗？”

能不走赵尔巽哪里肯走，这不是没办法嘛。他双手搀起袁金铠，叹了口气：“说归这么说，可没有自己的军队是压不住乱军的。蓝天蔚部署得那么周密，他是一定要起事的。他的目的无非是撵我走，我让开这个位置好了。”

袁金铠见状又再次跪下，拍着自己的胸脯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有个人就能挽回局势，就看总督你能不能起用。”

仿佛是黑夜中出现了一盏明灯，赵尔巽的眼睛亮了，赶紧追问是谁，然而一问才知道，袁金铠说的还是上策中提到的那个张作霖。

奉天要革命了

张作霖不是远在洮南吗？赵尔巽一阵失望，还没等他开口动问，旁边已经有人插嘴道：“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他驻兵洮南期间，时常有地方百姓告他纵兵劫掠。若引他入奉天，恐怕会引狼入室，反而对总督不利。”

袁金铠立即反驳：“不错，张作霖的确是土匪出身，但这正是他的长处。他头脑简单，不会受革命党蛊惑，只知道忠心耿耿为上司卖力。如果大帅对他给予优厚待遇，以忠义勉励他，这个人必定能为大帅效犬马之劳。”

赵尔巽原本对张作霖的出身就不介意，所着急的还是张作霖一时赶不过来。他对袁金铠说：“现在张作霖远在洮南，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可如何是好？”

未曾想袁金铠却站起说道：“张作霖已在府门外等候多时了。”一听此言，包括赵尔巽在内，与会者全都大吃一惊。

众人都想知道的是，洮南距奉天不下数百里，张作霖怎么可能话到人就到？

事实上，张作霖早就来奉天多日了。把他召来的是正在讲武堂受训的张景惠，张景惠一次和新军的军官闲聊，偶然探知省城的革命党人正蓄机采取行动，要驱逐总督赵尔巽。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景

惠连忙打电报给张作霖，告知他奉天城可能要出大乱子，请他迅速进省。

张作霖接到电报时，还没有收到省府的调令，他只能先率一哨马队紧急赶往奉天。若论路的远近，吴俊升大营距奉天还要更近一些，在经过其驻地时，护卫请示张作霖是否需要拜访吴俊升，张作霖照旧马不停蹄，对护卫说："你拿我的名片去约吴俊升到省城相见，我这次就不去拜访了。"

张作霖快马加鞭，兼程疾进，仅用不到三昼夜的时间就到达了奉天。入城后，他找到张景惠，说："我刚才看奉天城也没什么乱子呀。"张景惠说不是已经出乱子，而是将要出乱子："咱奉天要革命了！"

张作霖长在洮南，连革命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于是连忙问张景惠什么是革命。张景惠用对方最能理解的方式解释道："要是革命，我们就没有地盘了，那么饷银也没法领了，请您快去见总督合计对付办法。"

张作霖虽不懂何为革命，但对怎样在官场上打交道却是再精通不过。因为没有接到正式调令，所以他没有冒冒失失地直接去见总督，而是先找到袁金铠，请袁金铠为他引见赵尔巽。

却说赵尔巽得知张作霖就在府门外，顿时精神大振，他对袁金铠说："你既苦心为大局，那么先传张统领入府一见。"

听到总督召见，张作霖立刻三步并作两步，从府门外直奔正厅而来。见到赵尔巽后，他马上行礼，并且大声说："作霖愿为总督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看到张作霖奇迹般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赵尔巽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中大喜，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便表露出来，于是就故意训斥张作霖：“阁下不守边疆，擅自到省城，可知罪吗？”

张作霖知道赵尔巽的这一套都是做给人看的，遂也赶紧顺着对方的路子答道：“因局势十分紧张，下臣唯恐总督陷入危险境地，因而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在下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

张作霖没什么文化不假，但他善于应变和辞令也是真的，这一回答不仅给足了赵尔巽面子，也使得他擅自进省的举动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有了张作霖及其“保卫大帅，镇压地方”的保证，赵尔巽心里就有了底。两人私下谈话时，他对张作霖说：“你来得正好，我明天就准备去死！”张作霖有些不解：“总督为什么要去死呢？要死，大家一起去死。”赵尔巽幽幽地说：“奉天的文武官员们要独立，但我绝对不干。如果他们得逞，那我就去死。”

弄明白赵尔巽说话的用意，张作霖赶紧说：“总督给我下命令吧，把我的军队全部调来。你赶快把城门关上，再把我那三十多名学员（即张部在讲武堂受训的人员）召来，给他们发些枪，我来保护这座城。”

赵尔巽听了心花怒放，说：“很好。不但这样，我还要把我的卫队和警察也全都交给你，统统归你指挥。你把他们放在城门那儿，叛军来了，打就是了！”

赵尔巽要的是张作霖再一次的表态。至于巡防营，因涉及面大，以及怕打草惊蛇等原因，暂时还不能调来，能调来的只是另一个巡防营统领，即冯麟阁。

发现张作霖、冯麟阁先后来省，吴景濂觉得奇怪，他问袁金铠："张、冯何故调省？"袁金铠假装漫不经心地回答："大帅因为时局动荡，恐怕张、冯在外联络一气，对省城造成威胁，况张、冯是土匪出身，实不可靠，所以才调他们到省城。这样可以就近监视，同时也使其势单力孤，免生意外。"

张作霖、冯麟阁等人也积极配合，在公开场合，当有人问起为何来省城时，他们就说是与巡防营务处接洽业务。党人们对赵尔巽一方的反击能力本身就估计不足，听了之后也就不以为意了。

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得到张作霖、冯麟阁的支持，赵尔巽气壮了许多，也再不提及出走入关的事了。1911年10月20日下午，他更在奉天主持召开东北新旧两军将领会议，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首先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

会议一开始，赵尔巽就开宗明义："武汉叛乱，朝廷正派大军剿办，不久即可平定。东三省为皇上老家，我们必须拥戴朝廷。现在朝廷还没有谕旨下来，我们的要旨是保境安民。"他接着提议道："我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与会的新军代表除第二混成协外，还包括黑吉两省的新军军官。旧军主要是指巡防营，几名统领尽皆与会。赵尔巽话音刚落，张作霖

就举起了手，其他旧军统领也跟着举手赞同，可是新军那边的镇统、协统和参谋长们却都端坐不动，没一丝反应。原来在开会前，蓝天蔚就与其他新军将领商量好，要趁这次会议将赵尔巽一军，逼迫他发表东北独立的电文。

会场一片寂静，赵尔巽顿时陷入难堪之中。就在他不知如何才能下台收场的时候，张作霖忽然起立吼道："总督劝告诸位保境安民，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大家如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众人再一看，只见张作霖双手还紧握着两个类似炸药包的毛巾包，且两眼喷着怒火，看起来确实是一副要同归于尽的样子。

见张作霖已镇住全场，赵尔巽趁势说道："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在赵尔巽重述一遍自己的主张后，新军中一位姓卢的协统率先举手，其他人见有了带头的，迫于形势所逼也相继举手。赵尔巽喜形于色："全体通过了，大家总算给了我一个老面子。"

一散会，蓝天蔚就抓住卢协统的袖子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是怎么说的？说话不算数，到里面又举手！"

卢协统被说得面红耳赤，只得辩解道："老兄，有命才能革命。张某那两颗炸弹，你难道没有看见？若是放响了，我们还能有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救了大家。"

话到此处，他还抖了个机灵，说：“我的手仅举到耳根，只算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不看清楚，稀里糊涂地就随着把手全举了起来，这怎么能怪我呢？”

东三省新军的联手“逼宫”至此夭折，蓝天蔚在东北新军中亦因此陷入孤立。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张作霖手里的毛巾包并非炸药，他事先也没有准备。只是看到赵尔巽处境窘迫，为化解危机，才临机一动，从赵尔巽随从手里拿来小茶壶，用毛巾包起来，以此充作“诈弹”。曾有后世学者这样形容张作霖超人的胆识和气魄：“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意谓可吓退千人）。”

张作霖在会上一出头，便把自己摆到了蓝天蔚及其革命党的对立面。随他进入奉天城的马队仅有四五十人，人数上没比他在讲武堂受训的部下多出多少，合起来百人还不到，即便再加上赵尔巽的卫队和警察，兵力也仍然不足。那些天里，张景惠等几名管带每天轮流在张作霖所住的万福客栈值班守卫，为的就是怕蓝天蔚动手或党人行刺。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施出虚张声势的空城计，在东西南北关的各处客栈、商号和大民宅，他都派人在墙上贴出“前路巡防营哨兵房间”的字条，给人以数千兵马源源来到的气势。

当时张作霖的原配赵氏及大儿子张学良都住在新民府，虽然新民府也驻有张作霖的一小部分军队，但若是蓝天蔚派兵袭击，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而已。张作霖做“胡子”的时候，曾经干过绑票的事，他当然不会想不到蓝天蔚可能劫持其家属以为人质，只是在他自己都处于危境的情况下，也实在无法再顾及家人了。

有一天，赵氏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蓝天蔚当晚要打进新民府。她赶紧把十岁的张学良叫到身边，对他说：“今晚上可能会出事，今晚上要是打仗的话，你就跑！”说着，便用白布将三十块大洋包起来，系在张学良的腰上。

张学良一看母亲的表情就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很着急地问：“妈，那你呢？”赵氏回答道：“你别管我，也别问，你赶快跑。等事情稍微平息了，你看到哪个老头儿好，就跪下给他磕头，把银子给他，叫他带着找你爸爸去。”

后来张学良才知道，他母亲让他跑而自己不跑，是准备等新军打过来时自杀的。幸好那天晚上并没有打仗，蓝天蔚也没有袭击新民府，长大后的张学良一直想不明白，蓝天蔚为什么不动手。

若真要探究这件事，可能还是蓝天蔚的思维方式与他们不同。党人喜欢行刺要员和发动起义，但殊少像“胡子”那样绑架人质，自然更想不到、干不出用“诈弹”来恐吓别人的事。也正是这个不同，导致蓝天蔚等人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步步开始落入下风。

这就是我的胆子

1911年11月初，革命党的行动计划突然受挫。与蓝天蔚相呼应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调任长江一带的宣抚大臣，实际被剥夺了军权。这些不利情况加剧了党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他们决定立即在谘议局召开大会，以便实施“不流血革命”和宣布奉天独立。

筹备好后，吴景濂亲自登门邀请赵尔巽出席会议。赵尔巽情知这是一次请君入瓮式的会议，在己方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前去恐怕脱不了身，于是就推托说由于最近一段时间许多大臣被激进的革命党人刺杀，所以他不方便公开露面。

赵尔巽若不出席，会议就不会有结果，吴景濂自然要再三规劝，并答应绝对保证其人身安全。赵尔巽觉得事已至此，不去不妥，这才答应出席。

与此同时，蓝天蔚把第二混成协的炮兵开进了省城，但炮兵并未按其命令把炮口对准总督府，而是对准了谘议局。之所以出现这一微妙变化，是因为赵尔巽、袁金铠在“联络客军”方面动了手脚，按照他们的布置，第二混成协士兵的菜金已改由督署支付，中下级军官也交由反对革命的标统负责疏通，让他们反蓝拥赵。也就是说，蓝天蔚已经部分被架空，包括炮兵在内的一些官兵已不听从他的指挥。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党人对赵尔巽一方背后的活动仍然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要逼赵尔巽出走不过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干脆把庆功宴都提前摆上了，蓝天蔚对炮兵掉转炮口一事也未能予以足够重视。

相反，赵尔巽一方则进行了精心准备。赵尔巽传令嘉奖张作霖、冯麟阁，以鼓其勇气，袁金铠在传达嘉奖令时对张、冯说：“大帅对二位非常重视，将来打算拟专折特保。此次会议有客军将领和地方士绅，恐临时产生争执，二位可保护大帅安全，以报知遇。”张作霖一听马上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冯麟阁没有先前与赵尔巽、袁金铠的那种私下接触，关系上要生分许多，但张作霖既有如此表示，他也随声附和。

1911年11月12日，谘议局大会如期召开。在场外，已被赵尔巽控制的第二混成协炮兵架起火炮，以资威慑。场内，张作霖践其承诺，把在讲武堂受训的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全都调了过来，加上其他一些军官，一共二十多人，全部穿着便衣，分布于会场各处。他自己也身着轻装短衣，腰别自来得手枪，紧随赵尔巽身旁进行护卫。

当天各界出席会议者达两百余人，这些与会代表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对场内外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未稍加留意，他们只以为己方人多势众，所以表现得情绪激烈，咄咄逼人。会议一开始，议长吴景濂发言，说明开会以及革命的意义，场下喝彩声不断。

赵尔巽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轮到他发言时，他就说自己前后两次来关外，没有做过对不起民众的事，而且东三省处于日俄两强之间，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希望大家各安生业，静观时局变化。

老爷子说得恳切，话中也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来开会的这些人并没有耐心来听人讲道理，他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在赵尔巽发言时，台下便嘘声四起，不断有人高呼“赵尔巽滚回北京去”等口号，甚至还没等赵尔巽把话全部讲完，革命党人赵忠鹄就站起来直接打断了他的发言：“赵次珊（赵尔巽号次珊），今日不是你报功的时候，就以奉天粮食问题来说，现在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你要讲真话，不要光说官场上的一些废话。”

赵尔巽执政奉天期间，厉行改革，政绩有口皆碑。虽然那两年奉天连续遭灾，但并非赵尔巽之过，赵忠鹄这么说，颇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当然，他的主要目的也不在此，而是为了下面这

句：“摆在你（指赵尔巽）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宣布东三省独立，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巽还试图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解释，未及数语，议员席上已经群起呼叫，都是逼他立刻服从民意，宣布独立。就在赵尔巽有口难辩、窘迫万分的时候，旁边的张作霖霍然站起，厉声说：“赵大帅是朝廷命官，服从的是朝廷命令。我张作霖是带兵的官，也只知道保护总督和地方百姓。如有胆敢破坏省城秩序者，我便以铁血对待之！”

议长吴景濂没有搞清状况，说张作霖胆大包天，让他赶紧从主席台上下来。张作霖一听大怒，他掏出腰间手枪，“叭”的一声拍在桌上，然后大声喊道：“这就是我的胆子！我张作霖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要是谁对赵大帅轻举妄动，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把枪，它是不交朋友的！”

赌博性的讹诈

看到张作霖把枪都掏了出来，不仅吴景濂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议员们也都被唬得纷纷起立。其他与会代表则多半是教育界人士，很多还是青年学生，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胆小者已经逃出了会场。

革命党人吃的就是冒险的饭，当然不至于到立刻败下阵来。蓝天蔚赶紧站起发言，先讲了一番满汉的民族仇恨，接着对赵尔巽说：“东省距京较近，又居清军后方，大帅首先独立然后统兵南下，直取幽燕，推倒清廷，报累世压迫之仇，成大帅不世之功，蔚（蓝天蔚自称）当执戟先驱以遂宿愿。”

张作霖先后两次镇住全场，靠的不是“诈弹”就是手枪，这让他尝到了动嘴不如动枪的甜头。一看蓝天蔚还想重新控制局势，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拿起桌上的手枪，直接对准蓝天蔚：“你丧心病狂，满口胡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张某深受国恩，决不叛逆，尔敢再言独立，以此从事。”

汤玉麟等人也纷纷掏出身上暗藏的手枪，朝蓝天蔚怒目而视，大有现场火并之势。蓝天蔚没想到张作霖这一伙人会这么“撒泼”，一时无言以对。其他人则被吓到不轻，吴景濂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更有心理素质差的，甚至已经倒在了桌子底下，会场一片大乱，空气极为紧张。

一旁的袁金铠见状，赶紧上前打圆场，半哄半劝地把蓝天蔚拉出场外，接着吴景濂也溜走了。会场门口早已有人把守，许出不许进，这使革命党人和民意代表在会场上迅速败下阵来。

发现场面已被完全控制住，张作霖又继续说道：“我张作霖有枪有人，只要是对地方有利的事，我张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总督的意见。”

会场在乱了一阵后终于又安静下来。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宣布继续开会，此后的会议进程和结果完全符合赵尔巽一方的愿望：成立保安会，赵尔巽任会长，当场宣布东三省中立，保境安民。

革命党人原想通过成立保安会这一机构，来挟持赵尔巽，逼他出走，并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不料事与愿违，反被赵尔巽所窃据，这正应了那句话“拿来防贼的，反做了贼的招牌”。在保安会的成

员名单上，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得到了一个参谋部的副职，这还是因为他与袁金铠私交不错，赵尔巽、袁金铠有意拉拢的缘故。

吴景濂虽然也被选为挂名性质的副会长，但这与他原来预想的民政长一职相去甚远，而且奉天中立也非其本意。更主要的是，吴景濂终究不是带兵的武人或革命党人，经历此次惊心动魄的会场风波后，开始变得寝食难安。这时他已经明白自己上了袁金铠的当，接着又听到风声，说是张作霖、袁金铠密谋要将他除掉。吴景濂又恨又怕，于是决定离开奉天。因为怕张、袁中途暗算，他都没敢前往车站直接上车，而是先化装步行到皇姑屯，然后由皇姑屯乘车至天津，再转赴南京。

随着吴景濂的离去，东三省独立之议完全烟消云散。张作霖通过不惜与蓝天蔚拼命的方式，换来了己方的胜利，但他在会场上的举动实际有点类似于"赌博性的讹诈"，因为他的大部队仍远在洮南，能够在谘议局布置的兵力不到百人。蓝天蔚虽部分指挥失灵，但毕竟已在第二混成协经营多年，军队中有不少他的心腹，何况党人又普遍激情高涨，若抵死不后退，张作霖至少不可能赢得盆满钵满。

问题在于蓝天蔚不会像张作霖那么豁得出去，此人在性格上与张榕有相似之处，即生性豪爽、喜交朋友，但他做事缺少主张，决心很容易动摇，说通俗一点，就是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够狠。

直到回营之后，蓝天蔚才慢慢回过味来，对自己被张作霖当场羞辱后，不仅没有予以有力反击，还主动退出会场的举动很是后悔。他当即召集本协将佐开会，将在谘议局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为了将部下们鼓动起来，他还着重强调了赵尔巽如何忠清主张中立，张作霖如何野蛮反对独立，自己如何提议但未能通过等细节。

按照蓝天蔚的打算，他准备整军与张作霖决一胜负，若胜便电告全国响应民军（即革命军），败则退至榆关，与关内民军相呼应。可是在他充满信心地希望部下们“多加赞助，以成此功”时，却遭到一名管带的反对，其他将佐也不同意整军出战。

蓝天蔚这才知道部分部属已被赵尔巽策反。就在他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有人给予了他重重一击。

谘议局大会结束后，赵尔巽向清廷和袁世凯报告了保安会成立的经过情形，同时着重指出：“协统蓝天蔚与两标素不相洽，全协皆不听从命令。”清廷复电：“蓝天蔚著开去统领官，交赵尔巽差遣委用。”

赵尔巽没有明言蓝天蔚有革命党的嫌疑，是因为蓝天蔚在关外新军和民间中仍有相当威望。当时因为成立了保安会以及先前部署就绪，张作霖的部队即将全部开来奉天，张作霖遂向赵尔巽请示到时是否要借机除掉蓝天蔚，赵尔巽答道：“蓝天蔚的潜在势力不能不考虑，如果采用极端手段，就怕激出兵变来。我看把他逼走就算了。”

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正式发表命令，解除蓝天蔚协统一职，其职务由反对革命的聂汝清兼代。之后，他又邀请蓝天蔚入署，对蓝天蔚说：“因南方风潮日烈，请君去调查，据实以报。”随赠旅费两千元，以打发蓝天蔚速速离奉。

调虎离山

有人说，如果蓝天蔚能够借助于自身的威望，向第二混成协的士兵们晓以大义，则仍有掌握军心的可能，一旦高举义旗，聂汝清等将

佐也起不了多大的阻挠作用。到那时，即便张作霖的大部队开来奉天，先不说兵员数量，单单武器弹药及兵员素质就远不及新军，蓝天蔚完全可以靠击败对方而重新扭转乾坤。不过这只是局外人的一厢情愿，站在蓝天蔚的角度，可以说从退出会场那一瞬间起，他就已失去了坚持到底的勇气。

蓝天蔚趁夜只身离开奉天前往大连，接着又渡海前往上海。离奉后，他给赵尔巽写了一封信，说他并非怯懦之人，之所以甘心放弃一切悄然离奉，只是“不忍视生灵涂炭，我公（指赵尔巽）危险”云云（都已经出局了，还要写信向对手进行解释，党人身上固有的那股书生气和要面子思想可谓暴露无遗）。

作为这一轮争斗的胜利者和最大功臣，张作霖、袁金铠声名鹊起，二人在赵尔巽心目中的地位也更高了。在保安会的成员名单上，赵尔巽安排袁金铠为总参议长，张作霖为军事部副部长。同时他还保奏张作霖为总兵简放（即朝廷派任的总兵），特派其为巡防营务处总办。

能够当上巡防营务处总办，对张作霖而言，其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他的义父张锡銮以前兼的就是此职，这意味着他张作霖在官职上已跃居各巡防营统领之上。

赵尔巽本身是个极有头脑的老官僚，他很清楚，在革命怒潮频繁爆发的非常时期，昏聩的中央政府已不足恃，新军则更不可靠，唯一能够依赖的只有原本作为地方部队的巡防营，而巡防营将领中跟着他最紧，表现也最为突出的又唯有张作霖。因此之故，赵尔巽特将中路巡防营统领一职也交由张作霖兼任，使他直接指挥的兵力达到十五个

营以上。从这时候起，张作霖俨然成为掌握奉天省城大权的军事首领，外界也都普遍认为，这是他爬上高位最关键的一步。

成立保安会后没几天，张作霖的前沿巡防营便开入奉天，加上蓝天蔚的被迫出走，奉天革命活动趋于低迷，力量也有些涣散。为挽回颓势，张榕积极联络其他同盟会会员，于11月17日，也即蓝天蔚出走的第三天，在奉天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张榕本人被推举为该会会长。

“联合急进会”势力发展很快，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很快便与赵尔巽所控制的保安会形成彼此抗衡之势。趁着这股势头，张榕约赵尔巽谈判，对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已非你我所能控制得住，请你速悬白旗，以靖民心。”赵尔巽身后有张作霖带兵拱卫，新军也已被他控制在手里，因而一口便拒绝了张榕的要求。

赵尔巽有恃无恐，党人在省城内又很难活动，张榕等人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即先在各地招募民军，举行起义，借以引诱省城军队出城讨伐，然后再乘虚在省城起事。为此，除张榕等少数人留在省城坐镇中枢外，其余革命党人皆分赴各地进行组织。

辛亥革命后，辽西地区重又出现大乱迹象，曾经为张作霖等人剿平的“胡子”这里一股、那里一股，又重现江湖。革命党人在招募民军的过程中，很重视对这些“胡子”进行吸收和改编，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要为亡夫报仇，加入的就是民军。

赵尔巽、张作霖为了避免“胡子”加入民军和扩充官军实力，也积极进行招降收编，这使得“胡子”俨然成了官府和党人竞相争取的香饽饽。八角台附近刚刚出现了一股千余人的“胡子”，张作霖的义父、原

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此时已被推为资政院候补议员，正式走上政坛，他借鉴先前为张作霖与官府之间牵线搭桥的经验，与“胡子”头领直接面谈，终于促使对方答应接受收编。

可是就收编尚未正式着手进行的时候，张子云却被人刺杀了。这股“胡子”本可被编成三营，但由于刺杀事件发生后大部跑散，最终仅能勉强编成一营，张子云的儿子担任了管带。获知刺杀事件乃党人所主谋，张作霖十分吃惊，这才发现党人也不好惹，同样会使出许多非常手段。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在东北多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各地也都出现了要求保安会脱离清廷的呼声。赵尔巽很是紧张，但并未将省城军队全部派出去讨伐，他只是令当地武装就地弹压，最多也只是抽一部分军队前去助剿。被他倚为护身符的张作霖一直集中巡防营主力于省城，以防备民军进行袭击，张榕的调虎离山之计始终无法实现。

杀秃子

袁金铠在纵论天下大势时，认为只要袁世凯真打，革命军就很难找到取胜机会。让他们这些人失望的是，袁世凯还就不想真打，而南方革命军也继续向自己认准的目标挺进。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蓝天蔚就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军都督，率部誓师北伐。

留在奉天的张榕积极响应北伐，随时准备接应已攻至山东的北伐军。他与袁金铠在生活中是好友，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过从甚密。当时因吴景濂逃离奉天，袁金铠已稳操谘议局大权，张榕便想把袁金铠

发展为自己的同志，居然将其委任为急进党部参谋部长，对他毫不避嫌，以至于袁金铠对一些党内机密了解得一清二楚。

张榕性格豪爽、敢作敢为，然而终究年少缺乏经验，他浑然忘记了吴景濂吃过的亏，忽略了“朋友有时就是用来被利用的”这句古训。张榕“调虎离山”以及响应北伐的举动和计划，都被袁金铠一一报告给了赵尔巽，他同时对赵尔巽说：“张某，人杰也！留着他，恐于大局不利，须遇机会除之，以免后患。”

赵尔巽深以为然，遂授意袁金铠与张作霖定计，相机除掉张榕。1912年1月23日晚，袁金铠出面邀请张榕到德意楼饭店喝酒。酒酣耳热之后，袁金铠又撺掇张榕到妓院消遣，张榕开始先不同意，经不起袁金铠再三相劝，这才勉强前往。

两人在妓院刚刚坐定，还什么都没干呢，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张榕很是惊疑，袁金铠就骗他说，只是军警在查夜，枪支走火罢了。可是紧接着又传来几声枪响，张榕意识到绝不是走火这么简单，一定是情况有变，便再不肯留在妓院。

将张榕堵在妓院杀害，或者是把他放出来枪杀，都在袁金铠与张作霖所定计策的范围之内，因此袁金铠也不拦阻，只是说：“此院外通南北二街，君可北行，我可南往，这样查夜的军警就不会怀疑了。”

张榕听了觉得有理，便与袁金铠分道而行。哪里知道张作霖在南北两个口子都埋伏了人，袁金铠往南口，守南口的人立予放行；张榕去北口，守北口的杀手举枪就射。张榕连中三枪，枪枪都是要害，当即倒地身亡。

当晚，张作霖实施全城大搜捕，同情革命、曾帮助张榕策划一切的满洲旗人宝昆，以及急进会秘书田亚赟均被搜出杀害。第二天早晨，包括张榕在内，三家人院中自晨至晚挤满了来看死者的人。

紧接着，张作霖又下令“杀秃子”。他派人四处巡查，看到有形迹可疑及“秃头”（即剪去辫子的人）着西装的人，马上抓获并押到他的住所万福客栈，查明确实是革命党人或与革命党有联系后，即行枪决。一时间，城内气氛极为恐怖，凡剪发青年和由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全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一定要出去也非得戴上假发辫，以便躲过侦探的耳目。

其时不少日本人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都持支持或同情态度，有日本记者采访张作霖，对他说：“统领应恩威并施才好，太多杀戮于民心不利，况且张榕等辈也没必要处死。”张作霖很干脆地答道：“张榕不除，最为危险。我不下手杀他，他必下手杀我。我是为了加强防卫，才把他处死的。”

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反正赵尔巽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奉天城内的党人势力基本都被消灭了，他不但借以自保，稳渡难关，而且创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先例——辛亥革命后，各省的常见情况都是革命党联合军队以驱逐旧官吏，甚至于赵尔巽的弟弟、四川总督赵尔丰还丢了性命。只有奉天一省，是旧官吏联合军队驱逐了革命党，有人这样评述赵尔巽的厉害之处：“（东三省）号称革命党者，皆销声匿迹十有余年，此皆老官僚之手腕。”

没有袁金铠和张作霖，赵尔巽所谓的厉害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他对二人极为信赖。赵尔巽曾说，袁金铠才大心细有似李鸿章，张作霖骁勇善战过于张国梁，一文一武，乃自己须臾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张国梁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名将，此时的清廷日暮途穷，奄奄一息，急需有更多的“张国梁”出来替它维护江山，赵尔巽请求予以嘉奖的专折特奏一递上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张作霖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所辖的原前路、中路巡防营改编为第二十四镇，镇统制由张作霖升任，同时兼巡防营务处总办。

此时在东北军界，张作霖的威望和权力已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在镇压党人，维护地方治安的同时，仍不忘招兵纳将，扩充实力，这其中就包括吸纳与他有着多年深仇的金寿山。

日俄战争后，同被官府收编的金寿山不像冯麟阁混得那样好，只能在长春充任一个小差使。金寿山的心理极不平衡，他见奉天政局动荡，就暗中召集余党，并和日本浪人勾勾搭搭，想假借革命名义在奉天捣乱，顺便报复一下如今已飞黄腾达的张作霖。

张景惠正好探知这一消息，他知道金寿山和张作霖势不两立，于是便劝张作霖不要再对过去的私仇念念不忘，而应着眼长远，笼络金寿山为己所用。张作霖觉得张景惠说得很对，同时也怕日本浪人掺入捣乱事件后，成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因此便让张景惠从中设法联系。

张景惠找到金寿山后，向他剖明了利害关系，使金寿山同意去见张作霖。两人见面时，张作霖开口就说：“咱们俩不打不成交，现在搞合作，如果以后合不来，再打也不迟。”

金寿山当时听了沉默不语，以为张作霖只是拿话敷衍他而已。不料第二天张作霖便向赵尔巽禀明一切，接着又亲自带他谒见赵尔巽。

赵尔巽当面鼓励金寿山几句后，即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委任金寿山为巡防营管带（相当于营长）。

金寿山愧悔交加，对张作霖更是感激涕零，一回去他就将所部编为巡防营正式军队，并和日本浪人断绝了关系。张作霖以他的宽宏大量，不仅为奉天政局消去了一个祸根，而且化敌为友，给自己添了一员得力部下。

有刺客

尽管在外人看来，张作霖事事通达，几乎没碰到过什么不顺的，但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这主要还是因为外部形势太难以捉摸，就连袁金铠那样的头脑，一时都很难看清，比如袁世凯明明可以镇压革命军，却始终藏着掖着，以至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几乎是一天一个行情。

从张作霖的角度和立场来说，他从被招安那一天起，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卖力干，然后得到上司的认可和朝廷的赏赐。朝廷待他也的确不薄，一份份请赏报告送上去，一顶顶官帽发下来，无论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需要，还是照顾赵尔巽那种人所看重的“清誉”，他都实在没有理由不跟在赵尔巽后面做个忠臣。更何况，在与革命党的明争暗斗中，他已经欠下了不少血债，别的不说，光是杀张榕一案，就已与党人结下了血海深仇。试问，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坐了天下，会有他张作霖好果子吃吗?

清廷在摇摇欲坠之际，曾严令赵尔巽，须从奉天的五路巡防营中拨出一半人马，移往山海关以南，以拱卫京师。张作霖知道后，一再

请求赵尔巽让他亲自挂帅出征，并且语气铿锵地说：“要用铁血对付革命党，以尽我们军人拱卫朝廷的责任。”

赵尔巽虽然坚决保皇，但他倚张作霖为身边最可信赖的武将，哪里能放他走：“现在关内形势未卜，你这一离省，就等于离了根基，万一进关不妥，恐怕想回来都不行了。另外，你这一离开，必将人心浮动，万一革命党乘虚而来，反丢了自己的地盘。”张作霖想想有理，这才没有坚持。

其实赵尔巽、张作霖再怎么起劲也没用，因为舞台的主角不是他们。作为主角之一的袁世凯长袖善舞，把清廷和革命军都播弄得团团乱转。1912年1月22日，也即张榕被刺的前一天，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自己可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袁世凯来当大总统。

看到南京临时政府做出了让权保证，袁世凯决定牺牲掉清廷。在他的指使下，四十七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清廷同意共和政体以及让清帝退位。张作霖没有参与这次通电，不仅如此，他还认定“共和必招大乱”。

这时蓝天蔚已率北伐舰队在辽东半岛登陆，杀入了东三省。主守辽东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惊慌失措，连连向奉天发电告急。有人问张作霖该如何应对这一紧急局势，他说：“南方军队北伐之类，何足挂齿？就是袁世凯总理（袁世凯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亦绝不听从其指挥，必将我行我素。”

张作霖由此被革命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作霖有一个跟随多年的护卫，绰号梁二虎，被党人所争取。有一天

晚上，张作霖在其公馆宴请各巡防营的军官，席间梁二虎见卫兵们离得较远，是个出手的好机会，便伸手掏枪，准备射杀张作霖。也是张作霖命不该绝，前来赴宴的金寿山正在照镜子，看到梁二虎拔枪，连忙大叫一声：“有刺客！”

金寿山一边喊，一边拔枪，他是“大当家的”出身，拔枪和开枪速度比梁二虎还快，而且打得准，梁二虎当场就被他打死了。

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加入革命党后，经人介绍与张作霖的部下刘景双结婚。郑梅生从未放弃过要为前夫报仇雪恨，在她的动员下，刘景双也加入到了行刺张作霖的行列。夫妻二人率骑兵两百，时刻想对张作霖发起袭击，但因为曾遭到梁二虎的行刺，张作霖加强了防范，两人一直都未找到合适的机会。

党人的行刺或许可以吓住那些居于省城的满人官僚和八旗子弟，但要吓住过惯刀口舔血生活的张作霖，却还不是一件易事。真正让他改变立场的，不是别人，正是张作霖曾口口声声，只要“附和共和”，就视之为敌的袁世凯。

第四章　说破英雄惊煞人

官场向来都是名利场，讲的是顺风使舵、随机应变，张作霖若要真是那种我行我素，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又怎么可能在这里面混得如鱼得水？袁世凯是官场老手，岂能捉摸不透同僚们心中的小九九，同时他又深知东北的重要及其问题的复杂性，所以非常舍得在里面下本钱。

赵尔巽、张作霖虽然都是“勤王”的支持者，但赵尔巽是文臣，只能动动嘴和笔，奉天军事大权实际已完全操于张作霖一人之手。于是袁世凯就给张作霖写去一封密函，劝说他归顺即将成立的共和政府，并且许愿一旦事成，“共和政府成立之日，任卿为东三省防务督办”。

张作霖只是眼看着清廷不中用，可一时之间又抱不到合适的大腿而已，现在袁世凯主动抛来橄榄枝，岂有不乖觉之理？对袁世凯的提议，他马上表示赞同，此后便改变态度，转而用袁世凯跟他讲一套，对赵尔巽、聂汝清、冯麟阁等人进行说服。见自己唯一能够依恃的张作霖都已转向，赵尔巽也只有认命服软，他致电袁世凯称：“东三省之事无足为忧。”

是个做大事的人

1912年2月22日，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清廷颁下退位诏书，令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同一天，孙中山履行政治诺言，在南京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转而举荐袁世凯相代。

清帝退位后，黄兴电令蓝天蔚停止进攻，蓝天蔚将所辖军队交由袁世凯接收改编，之后选择了出洋游历。虽然表面的军事攻伐已经停止，但这并不表明革命党人与张作霖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张榕的姐姐张焕桂、大哥张焕柏多次向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及其最高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法办张作霖。

张作霖乃手握东北兵权的封疆大吏，连袁世凯都得哄着骗着，政府自然也不能拿他怎样，只能批示让张作霖发还当年从张家抄没的财产。张作霖顾及脸面，宁愿以赠送的名义，拿出比抄没时更多的财产给张家，而不肯承认抄家的事。张家兄妹也同样憋着一口气，拒绝赠送，坚决索讨。

当年4月，黑龙江省军方代表团入关参加全国南北军统一会议，回省路过奉天时，张作霖予以了盛情款待。代表团成员刘德权告诉张作霖，南方各省对他十分痛恨和鄙视，上海舞台上演戏剧，竟然还有演员扮成“三花脸版张作霖”，加以讥笑和丑化。张作霖听后并不感到吃惊，说：“无论他们怎样毁谤我，也不能动摇我的事业，只要他们敢来，我决以铁血对待之。咱们东三省保护地方和百姓，应当成立铁血团。希望你和我时常通信联络。”

刘德权是士官生，听到他路过奉天，几个同学便相约来找他。因为张作霖曾经在省城“杀秃子”，外界都风闻其最恨留学生，听刘德权说张作霖就在现场，几个同学怕撞见，赶紧匆匆离开。不料正好又被张作霖看到了，他回头问刘德权：“这不都是你的同学吗？”

因为同样担心张作霖对士官生这个身份敏感，刘德权便回答说的确是自己的同学，不过都是规矩的人。没想到张作霖不但不在意，反而对刘德权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走，我们奉天讲武堂就要

开办（辛亥革命爆发后，讲武堂已经停办），都要用他们。军队没有教育哪能行呢？”

刘德权知道张作霖以前做过“胡子”，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人，其实骨子里对张作霖的这种出身是很看不起的。然而张作霖的一系列言论却让他不由得刮目相看，特别是张作霖关于军队教育的认识更使他认识到，此人胸有大志，绝非一个等闲的草头王。

刘德权等人回省后，把自己的所遇所见向都督宋小濂（辛亥革命后，各省督抚均被已改为都督、民政长）报告，宋小濂也惊叹张作霖见识不凡，是个做大事的人。

几个月后的一次兵变更加证实了张作霖的魄力和能力。这次兵变起自于驻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聂汝清目不识丁，平时比较倚重二等书记官朱道南。朱道南不是革命党人，但同情革命党。第二混成协的官兵以皖籍为主，安徽人占到七成，朱道南常利用同乡的关系对他们加以启发。

清朝灭亡后，一群遗老组成宗社党，把东北作为复辟基地。奉天城内时有他们活动的身影，赵尔巽、张作霖在政治态度完全改变之前，与宗社党也有联系和合作。朱道南就对官兵们说：“保皇党起来，我们汉人都是死。”

除了认为赵、张与宗社党勾结外，“客军”常受“本兵”欺压也成为官兵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1912年6月18日是端午节，当晚一些士兵携枪出营，发动了兵变。这些士兵一路奔军械局，一路奔造币厂，余下的人在奉天省城北门外抢劫商店、银行、钱庄。一时间，枪声震耳，火光冲天，奉天城内陷入一片混乱。

第二混成协是徐世昌入奉前，从北洋陆军第二、第四两镇中挑选出来的精锐，步、炮、工加一起有十一个营，并且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二十四生大炮（生是厘米的音译，指德造二十四厘米口径的克虏伯火炮）。连日本领事都认为，在事发仓促的情况下，张作霖难以守住奉天城，因此以保护侨民为由，派人向省府要求派日军进城参加防守。

赵尔巽、张作霖自然不能干这种引狼入室的事。张作霖一边下令紧闭奉天的八座城门，一边亲自率部坚守北大门。混成协的士兵目标分散，各干各的，形不成重点，要攻城也被守军死死堵住攻不进去，气恼之下，放了把火就返回北大营去了。

聂汝清也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兵变中，稀里糊涂地成了兵变的指挥者。天亮后，赵尔巽派人请他进城会商善后事宜，表示今后“客军”与“本兵”可以充分合作，争取立功赎罪。

聂汝清召集全旅官兵开会，众人都认为赵尔巽是在使诱杀之计，力阻他进城。朱道南更是鼓动大家：“千载难遇这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大家愿干，唾手可得。只要我们二十四生的大炮两响，就可以吓死赵尔巽，活捉张作霖，举聂旅长为奉天都督，大家不是都有好处吗？要是迟疑不决，大祸立至。”

官兵们听后果然都决定放弃会商，造反到底，然而聂汝清却不是一个能赌得起的人，还没等二十四生的大炮响起来，他就失踪了。朱道南见势不妙，也托词逃走。主心骨一失，军心大乱，张作霖趁机率部包围和击溃了哗变士兵。此后，他对混成协进行清洗，共擒杀变兵两百多人，两千多名有参与兵变嫌疑的官兵被陆续遣散。

生财有道

随着兵变被镇压，省城秩序得到恢复。赵尔巽奉报袁世凯，极力称赞张作霖的表现，这使得张作霖在袁世凯的心目中又增加了一层分量。1912年9月，全国陆军进行改编，张作霖被任命为第二十七师师长。虽然冯麟阁、吴俊升也同时被晋升师长，但袁世凯明显对张作霖更为欣赏和器重，曾专召张作霖进京觐见，并在京城为他大摆宴席。那一天，张作霖在毅军老帅姜桂题的引领下入席，席间袁世凯不仅对他赞勉有加，还给了许多赏赐。

自此以后，张作霖在奉天不仅掌握军权，其政治声望和权威也逐渐超越了赵尔巽。他的公馆俨然已成全省政治中心，每天宾客如云，文武官员络绎不绝，这些官员遇到事情，不管与张作霖本人有没有关系，都会与之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到后来，即便不住省城的官员来奉时，遇事也必定要和张作霖通一通气。

长此以往，赵尔巽几有被架空的感觉，加之他年纪大了，心念旧朝，也不太愿意当民国的官，于是便向袁世凯称病辞职。11月3日，辞职获准，赵尔巽就离开奉天，到京城出任清史馆馆长，专心修清史去了。

十多天后，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署理奉天都督（民国成立后，东三省总督被撤销，改为奉天都督，不再对吉林、黑龙江两省拥有管辖权）。张锡銮此次是二度赴任东北，上次他来东北是在巡防营务处做总办，除了对张作霖多有提携外，冯麟阁也曾得到过他的好处。袁世凯对官员们之间复杂的人事关系相当熟稔，曾经讲过："张锡銮于张作霖、冯麟阁均有旧恩，因而能保证他在奉天任上不会出乱子。"

果然，张作霖对张锡銮的赴任极表欢迎。张锡銮自己手里没有队伍，对张作霖也很依赖，为了进一步拉近与张作霖的私人关系，他还在义父子之外，让自己的儿子与张作霖拜了把子。

张锡銮和赵尔巽一样，都是对官场关系学钻研极深的老官僚，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虽然张作霖是他的下级，但他仍非常注意对张作霖的控制尺度，有时甚至到了迁就和纵容的程度。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师长，但财政上要光靠政府给他的部队发军饷，实际是不够的，而且张作霖向来反对“喝兵血”，克扣官兵的军饷。为了找到财源，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

民国官员中，以县长、税捐局长、警察所长油水最多，称为三大肥缺。谁要想得到这三项肥缺，就必须有势力的人推荐。在奉天省城，张作霖是举足轻重的实权派，当然人人都想巴结，也都在打听如何才能接近这名显贵。张作霖便利用自己的身价，很“贴心”地让人放出风来：张作霖喜欢赌钱，你要跟他套近乎，唯一的办法就是到他的公馆去跟他赌钱！

一传十，十传百，到张公馆赌钱的人趋之若鹜。对初次上门的赌客，张作霖向来是不问姓名，坐下就赌，而且赌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想得出来——在“耍混钱”之前，张家的主营业务就是“耍清钱”，对各种赌博玩法，什么推牌九、打麻将、押宝，没有一样不精通。

到张公馆赌钱的规矩是去赌的人钱不输光不能散，其实也就是张作霖不赢够钱不能散。这种赌局每次的输赢都很大，动辄就要现大洋几千元乃至几万元。有的人未带足现钱，但张作霖也不怕他赖账，因为在东北这个地面上，没有什么输赢账是他要不回来的。长春道尹

（道尹相当于专员）孟秉初在张公馆赌钱时输给张作霖两三万元，回到长春后装聋作哑，很久都没有还钱的意思。张作霖就毫不客气地派人到长春去要，最终要来了事。

张作霖当然不是光靠设赌来赚人家的钱，他会观察。如果你前前后后来赌过好几次，每一次都输了很多钱，他就知道你是真为跑官来的，并且囊里的银子也给得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下，他会主动请你吃饭，吃饭时问你姓甚名谁，做过什么事，以及哪有这么多钱可拿来输。

此时你得赶紧要求他栽培，同时说明自己的愿望。张作霖听后会让你当着他的面写一个简历表，有时还问问你希望到哪一个县去，最后来一句："待我说说看，可不一定保准，你听候回信吧！"

第二天，张作霖就拿着这个输钱人的简历去找张锡銮代为介绍："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很有能力，可以当县长或税捐局长或警察所长。"末了还不忘叮嘱："这个人请都督提前发表，请注意不要忘了。"

一般而言，对于张作霖要介绍的人和所要的缺，张锡銮都是立即照准。偶有例外的时候，张作霖看到三五天都没回音，就着急了，往往会跑到张锡銮的住处，质问他为什么还不发表，于是请托也就很快通过了。

张作霖以设赌为由，代人谋事，其伎俩日久便被人们看穿了，他这个生财有道的办法也因此被称为"大吃县局"。

自己人

张作霖平时对张锡銮恭敬谨慎，但涉及地方要政，是决不肯让出发言权的。张锡銮每次召开军警会议，研究有关地方治安问题，如果事先未与张作霖商量，或未取得他的同意，张作霖就经常拍桌子打板凳，气势汹汹地加以反对，当众让张锡銮下不来台。

遇到这种情况，张锡銮只好拿出长辈的身份和涵养，和蔼地对他说："雨亭，你又喝醉了吧？不要上火，请到小客厅里休息休息。"一边说，一边亲自把张作霖陪到小客厅，劝他："这次会议都是为的你，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人，你干好就是我好，我干好就是你好。"如此这般说好话，张作霖才肯顺顺当当地回到会议室重新开会。

事实证明，袁世凯用人确实很有一套，张锡銮和张作霖之间再闹别扭，也都是自己人内部的矛盾，而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在奉天任上不会出乱子"的重要前提。处理金寿山一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民国成立后，金寿山驻防铁岭、开原等地，此人身为官军头目，仍旧匪性难移，经常在驻地劫掠绑架，滋扰百姓，省府不断接到地方上送来的状纸。

张锡銮深知金寿山不是好惹的人，如果正式捉拿，不但不能乖乖就范，而且很可能引起哗变。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将金寿山骗到省城再伺机除掉。

这样的事必须靠张作霖来执行，也必须和他商量。说起来，金寿山已算是张作霖的部下，当初护卫梁二虎刺杀张作霖，也幸亏金寿山出手格杀刺客，但在张锡銮说明此人对地方治安造成的危害后，张作霖还是答应对行动予以配合。

计议已定，张锡銮即以研究防务为名，电告金寿山到奉天开会。金寿山也知道下面告他状的人很多，迟疑着不敢去，但不去又怕遭到上司责怪，为此他特地派亲信到省城向张作霖打听动静。张作霖对来人说：“你让他（指金寿山）亲自来就行，有什么事都有我张作霖承担。”

金寿山见有张作霖作为保人，以为无忧，就只带了几个护卫赶到省城，并先在张作霖公馆住了下来。到了传他的那一天，张作霖亲自陪金寿山走进都督府。等金寿山行礼后，张锡銮便从袖中掏出一份电报，单刀直入地说：“这份电报是袁大总统专门为你的事打来的，金首领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吗？”

原来袁世凯也收到地方上送去的报告，特地发电催促张锡銮对金寿山采取行动。金寿山一听，心中已明白了大半，这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旁边的张作霖可以替他说个人情，但张作霖却把目光转向厅外，装得跟个局外人相仿。

张锡銮一摆手，几个卫士上前将金寿山绑了。到此生死关头，金寿山只得哀求都督饶命。张锡銮摇摇头：“我和你有什么呢？这是袁大总统的命令。”

金寿山随后押上囚车，送到奉天模范监狱关押。在他被关押期间，其手下和家属拿出来劫掠来的金银财物，向奉天省的大小官吏行贿，希望能将金寿山放出。张作霖担心夜长梦多，遂赶紧做了一番布置。

一天早晨，狱中的金寿山起身后，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消遣。突然，他看到一个人站在楼下盯着他看，不免有些诧异，但随即认出这

是张作霖手下一名枪打得最准的神枪手，名叫高金山。

金寿山还以为张作霖要给他送什么信息，一边活动手脚一边问高金山：“你这小子，到这里干什么来啦？”高金山回答：“我来侍候统领。”话音刚落，金寿山就随着枪声倒在了走廊的地板上。

应该说，袁世凯是一个有经验的治国者，如果他不鬼迷心窍，突然想当皇帝的话。自从他有了这个心思后，就派人四处游说，征求封疆大吏们的意见，其实也就是希望疆吏们能够拥护他黄袍加身。来人到奉天询问张锡銮的意见，张锡銮极不赞成，说：“今天不论在人民的心理还是整个形势上，都不能办这种事。”

说客回京对袁世凯一讲，袁世凯就觉得张锡銮不可靠，难免成为他登上龙椅的障碍，于是便想派一个心腹坐镇奉天，以免他以后要做皇帝时生出枝节。

我怎么能给人当儿子

袁世凯打算派出的这名心腹是段芝贵。段芝贵在前清时就是要员，但官声不佳，此人为了升官，什么不堪的事都做得出来。当初慈禧太后欲任命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为东三省总督，圣旨公布之前，先派他到东北考察，以便熟悉一下当地情况。

载振是个花花公子，在东北吃喝玩乐一番后就打道回京复命，路上他接到段芝贵盛邀，让他到天津玩上两天。载振到天津后，迷上了津门名伶杨翠喜，段芝贵投其所好，用重金将杨翠喜买下并送入载振府中。

段芝贵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知道载振将主政东北，希望能从对方手中得到黑龙江巡抚一职。载振乐不可支之余，满口答应。不料此事遭到御史的参奏揭发，慈禧闻讯大怒，立即将已经赴东北上任的载振、段芝贵革职，这就是著名的“杨翠喜案”。

进入民国，国体虽变，但世故人情和官场的本质未变，段芝贵靠着他的钻营术又成了袁世凯帐下红人。得知即将派来接自己位置的竟是这种货色，张锡銮非常郁闷，他作诗自遣，其中两句道：“庭前古树老于我，窝上斜阳红满楼。”

1915年8月22日，袁世凯正式颁下文件，让段芝贵到奉天当将军（之前都督已被改为上将军或将军），并重新节制吉黑两省，而张锡銮则被调湖北署理军务。

和他的前任赵尔巽相仿，离职前的一刻，张锡銮变得心灰意懒，只不过不是对前清，而是对民国。离开奉天前，他和张作霖道别，张作霖说：“干爹去到湖北又可大展宏图了。”张锡銮却淡淡地说：“我此番回去就不做事了，两湖潮湿，我人老了，不能去的。”后来张锡銮果然没有赴任两湖，而选择滞留北京，直到完全退出政界。

段芝贵与张作霖之前的几任上司都不同，他习惯于媚上欺下，一开始，对张作霖、冯麟阁等草莽出身的将领更不放在眼里。去将军府请示的人很难见到段芝贵本人，大部分都是由其参谋长代见，张作霖也不例外，这让他对段芝贵很是不满。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称帝后，他论功行赏，大封爵位，段芝贵被封为公爵，是所有爵位中最高的。古代分封诸侯时要举行仪式，称为“分茅裂土”，段芝贵

俨然以享受“分茅裂土”之尊的诸侯自命，让人称其为爵帅。张作霖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张作霖得到的爵位是二等子爵，他问来宣布爵位的使者：“这个子爵是怎么一回事？”来使答道：“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往上为公为侯。”张作霖因为心里不痛快，便当场见机发作，大骂道：“他妈拉个巴子，我怎么能给人当儿子？”

张作霖马上派人向段芝贵请假，说自己病了。段芝贵一打听，才知道他得的是心病，这才有些着急起来，连忙亲自来张公馆进行探望。按照张作霖的吩咐，守门的卫兵也不让他入内，说：“我们将军身体欠安，谢绝一切来访。”

段芝贵碰了一鼻子灰，就把经过情形用电报向袁世凯进行了汇报。袁世凯听后很生气，因为师长一般只授轻车都尉，小省的将军才能授以子爵，他对张作霖已是破格恩宠，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不给他面子。

袁世凯遂调张作霖为绥远都统，可是张作霖来了脾气，偏不挪窝。张作霖不是赵尔巽、张锡銮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对于这样手握重兵、拥有实权的武将，袁世凯知道不能用强，尤其这时蔡锷等人已经在云南宣布独立，发起了反对他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袁世凯顾此失彼，暂时也就顾不得料理张作霖了。

正当张作霖在家中气得哼哼乱叫的时候，袁金铠突然来访。自赵尔巽卸职奉天都督后，在东北已无职衔的袁金铠也只能随老幕主前往北京，出任清史馆编纂。他是个对名利极其热衷的人，要不然在奉天时，也不会做出先欺骗吴景濂，继而诱杀张榕这样等同于卖友求荣的

勾当。孤影一只、清灯一盏那样的生活，对于已看淡政界风云的赵尔巽、张锡銮或许没有什么，袁金铠又怎么可能熬得下去？不久，他就耐不住寂寞，扔下《清史稿》，跑出来“扛私活”了。

最初，张作霖的部队要由镇改编为师，袁金铠主动请缨，为其在京城内四处奔走。当时他住在前门某客栈内，恰好被张榕的姐姐张焕桂打听到了。张焕桂将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都列为杀害弟弟的主凶，眼见得袁金铠脱离了官府保护，独自居住在外，自然不肯放过，一份状纸就递到了法院。吴景濂时为国会议长，也对袁金铠恨之入骨，听闻后给法院、警察厅施加压力，要求即刻逮捕和法办袁金铠。

国会议长发话，警察厅不敢怠慢，迅速派出便衣侦探缉拿。侦探经过侦查，发现袁金铠确在张焕桂所说的那家客栈内，便准备第二天予以逮捕。不料他白天的侦查活动都被客栈老板看在眼里，老板挺为客人着想，他第一时间就把情况密告给了袁金铠。

袁金铠有袁金铠的做事方式，得到消息后，他没有马上溜之大吉，而是先将被褥放下，帽头置于枕上，被内又用茶壶支起，这样让别人从窗外看到后，会误以为他还在床上睡觉。如此这般伪装好后，他才化了个装，从后门溜出，连夜逃到奉天去了。

张作霖也是张榕案的主角之一，把袁金铠抓走会牵连到他，所以绝不会容许中央的人跑来奉天办案。有了这张护身符，袁金铠的人身安全算是有保障了，但舆论却饶不了他，自逃回奉天后，奉天各界对之口诛笔伐，报社用插画形容他是猪狗一类的东西，党人则发表论文指他为东省败类。袁金铠知道自己为公众所不容，便躲在家里哪也不敢去。

时势造英雄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风声不太紧了，袁金铠又重新潜入京城，准备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捧一把臭脚。可惜的是，那时争先恐后上来捧袁世凯的实在太多，他都挤不到前面去。

无法接近袁世凯，自然也就不能得志，袁金铠只得再找过去的老幕主想办法。经赵尔巽特荐，他先当上了约法会议委员，不久又改为参政院参政。不过这些职位都没有什么实权，不是袁金铠真正想要的，他想要的是黑龙江省巡按使，为此费了不少心思和努力。无奈要争得有实权的乌纱帽，其难度不比为袁世凯捧场低多少，最终由他出任的提议未能在国会会议上通过。

赵尔巽毕竟已经过气，如何能够指望得上？袁金铠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要想在官场混出名堂，还是得投靠和依附于一个有实力的当权派幕主才行。

投靠谁呢？张作霖！

张作霖知道袁金铠前段时间到京城为袁世凯捧场去了，还没等他开口，就笑着揶揄道："洁珊（袁金铠字洁珊）将为洪宪功臣，请勿忘昔日之交，遇机提携。"

袁金铠早有准备，不但不以为意，还笑着对张作霖说："师长不要误会，请容我给你详细道来。"

袁金铠给张作霖说的，是他了解到的袁世凯称帝内幕。尽管袁金铠去京城的本意是攀龙附凤，想从中分一杯羹，但既然最终没捞着什

么好处，那可就别指望他说什么好话了。袁金铠对袁氏来了个批倒批臭，全盘否定：“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藉革命而推倒清廷，假民意而阴谋帝制，不顾舆论而欲家天下。”

自蔡锷等人在西南发起护法运动后，各省纷纷响应，袁金铠也看好反袁的前景，他认为虽然袁世凯的门生故吏遍天下，但是原先的一些心腹手下态度不一，都在不约而同地进行观望，像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都不赞成其称帝，冯国璋则更有异议。

袁金铠还得知，袁世凯黄袍加身这件事尚未有定论，但家里已经不安宁了，他的两个儿子袁克定、袁克文各树党羽，有争储的迹象。在袁金铠看来，这些都非“佳兆”，说明只要战争持续不绝，袁世凯即便调兵遣将，亦难以挽回颓势，也难免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他的皇帝宝座注定是坐不长的。

见张作霖已渐渐听得入神，袁金铠不忘用大话给自己身上披一层金，说他所以入京城活动，是为了窥破这些人的底细，乃别有心机，并非一味贪图富贵。

袁金铠是不是贪图富贵，张作霖倒不在意，毕竟大家在官场上这么辛苦地跑来跑去，哪一个人又是在无私奉献？让他佩服的是袁金铠对时势的分析和见解，这让他联想到，辛亥革命刚刚爆发那会儿，若不是此人给他引见赵尔巽并多方设谋，自己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

想到这里，张作霖突然很激动地对袁金铠说：“辛亥之役，颇资臂助，耿耿在怀，今日之事，能为我再设一谋否？”

袁金铠原为打动张作霖而来，发现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还真让张作霖动了心，不由得暗暗高兴。不过他接下来要说的不是计谋，而是大

略。

自被改编为官军起，张作霖先扫荡辽西匪盗，继而经历日俄战争时的风云诡谲，接着在冰天雪地中带兵追剿蒙军，一路走来备尝艰辛。辛亥革命后，照袁金铠的讲法，张作霖又有保全东三省之功，从而使得“市廛不惊，黎民安堵，可谓劳苦功高”。

张作霖功劳之大，袁金铠说不但他感到钦佩，“东省父老莫不讴歌”。此时，袁金铠话锋一转，搬出了一个自古到今最为国人所熟悉的英雄史观——

“夫大丈夫处世，须默察时势，顺应时变，岂可郁郁久居如此，不为前途久远计乎？历观古之英雄豪杰，顺时应变而能成大业者，何堪指数！所谓时势造英雄，良非虚语。”

什么叫时势造英雄，用袁金铠的话来说，就是既然你张作霖手握重兵，在东北有举足轻重之势，这时候就应该趁袁世凯即将失势，中央陡失重心之机，在东北树起大旗，打造自己的天下！

一拍即合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袁金铠的话一下子就把长久以来潜藏于张作霖心中的一个念头勾了起来。那还是他在八角台当团练长的时候，有一天和汤玉麟喝酒，喝着喝着，兴致上来，他放出豪言：“当今之世，满洲无主，我等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在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满洲。”汤玉麟被他激起雄心壮志，也随声附和道：“我也有这种想法。”

站在当年的时空，旁人若听到这段对话，十之八九会认为他俩是在做白日梦：说难听点，你俩也就是商人雇的保镖，如果东家不雇你们，没准还得回头吃黑社会的饭，居然都扯到称霸满洲去了，想什么呢，你们?

人在微贱的时候高言如何如何，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因为没有束缚，其实都是真心话。只不过后来位置越来越高，事情越来越忙，与兄弟朋友一起喝小酒谈理想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小，张作霖自己倒已经淡忘了曾经的梦想。

现在因为袁金铠的一句“时势造英雄”，张作霖忍不住怦然心动：是啊，跟未来的东北王相比，再大的官又算得了什么?

这边袁金铠还在不停地说，他提到两个人，都是清末时的人物，一个叫李世忠，一个叫陈国瑞。李世忠、陈国瑞原先都是土匪，后向官军投诚，两人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都屡立战功，然而结局一个是被朝廷下诏诛杀，一个是被发配黑龙江。袁金铠的意思是，做东北王，称霸满洲，不仅是追求和梦想，也是最好的安身之计——历来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像你张作霖这样的出身，中央用得着时用，用不着时第一个就会拿你开刀。李世忠、陈国瑞即为前车之鉴，到时岂独升官无望，即算是想重回市井当个小混混都不可得了。

张作霖最初只是对袁世凯、段芝贵不满，希望袁金铠给出出主意，以便改善自己的境遇，或者在仕途上更进一步，根本没想到袁金铠居然会“说破英雄惊煞人”。他虽是“胡子”出身的武人，但历来心思缜密，不想好的事情绝不会轻易出手，所以在袁金铠正着反着说一大堆后，反而有些踌躇，说自己兵单饷薄，恐怕做不成这样的大事。

看到张作霖忽然犹豫迟疑起来，袁金铠担心他打退堂鼓，急忙一边对奉天的军政格局进行剖析，一边提出相应的对策。

这时奉天握有兵权的人，除张作霖外，尚有冯麟阁、吴俊升、马龙潭等人，尤其冯麟阁几与张作霖形成鼎足之势。不过按照袁金铠的分析，冯麟阁的部队编制不全，以师来说，总共缺包括炮骑在内的四个营，而且其内部也不和谐，旅长汲金纯对冯有芥蒂。更重要的是冯麟阁这个曾经的江湖老大城府过深，顾虑过多，如果张作霖先动，他必不敢轻动。

冯麟阁是不敢动，吴俊升、马龙潭是很难动，他们的部队都是巡防营编制，没有重炮，又分散各地，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非常不易。就指挥官来说，吴俊升作战奋勇，但贪而无厌；马龙潭颇有城府，可又老而无能，二人都缺乏深谋远志，因此不足为虑。

除去这三强外，省城中剩下的文武官员，均非段芝贵的亲信。袁金铠确信，就算这些人暂时把立场放在段芝贵一边，只要许之以重利，也一定可以收买过来。

袁金铠最后告诉张作霖，经过这番精心布置，加上“我省土地肥沃，矿产丰富”，“师长（指张作霖）必能展平生志愿，将大有为于天下也，岂独久居方面已哉”！

张作霖顿觉眼前豁然开朗，认识到他乘机而起，掌握东省军政大权，雄霸满洲的时机确实已经到来。二人一拍即合，张作霖以古代君王求贤的语气邀袁金铠入幕：“若事付君，祸福共之！”

当年赵尔巽离开奉天时，曾语重心长地对张作霖说：“你要想做一番事业，对国对民有所作为，不能单凭军队的武力，同时还要注重政

治，特别重要的是使用人才。”接着，赵尔巽又列了一张名单，上面都是他认为的奉天可用之才，他让张作霖赶快把名单上的人都延聘起来。

赵尔巽走后，或因张作霖重视程度不够，或因时机还不成熟，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赵尔巽的嘱咐去做，直到袁金铠入幕，而袁金铠正是列在人才名单上的第一人。

敲山震虎

1916年春，奉天一家钱庄派人将数万元羌帖（沙俄在中国发行的卢布纸币，当时在东北通用）送往其他商号。送钱的人在大街上遭到一名士兵的抢劫，他当即报告岗警，岗警赶紧吹哨，召集邻岗进行追捕。抢钱的士兵慌不择路，结果掉进了一口枯井，被警察逮个正着。

警察随即将这名士兵押往警署，署长见此案不同于普通抢劫案，乃是军人白日行抢，便亲自进行审问。正审着，旅长汤玉麟带着十几个士兵闯入警署，硬将抢钱的士兵带走了。署长马上向省警察厅厅长宋文郁报告，宋文郁听后通过电话质问汤玉麟，并向汤玉麟要人。汤玉麟答复说那名士兵是他部队的，而且已经枪毙了。

这个事情本来已经结束了，但段芝贵得知后却认为有机可乘。原来他由京来奉就任时，就将他带来的同乡张宏舟发表为奉天警察处处长，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警务处只是个空架子，并无实权，于是段芝贵便打算让张宏舟兼任警察厅厅长。可是厅长位置上已经有人，这就得找点碴儿把现任给免掉，钱号抢劫案一出，段芝贵认为正好可以从中大做文章。

这天段芝贵亲自主持召开军警治安会议，省城驻军营以上军官以及警察署长以上人员尽皆与会，分左右对坐两旁。宣布开会后，段芝贵首先气势汹汹地朝宋文郁开炮：“青天白日发生抢案，你警察厅长应不应该负责？”宋文郁老实作答：“应当负责。”

宋文郁是张作霖的连襟，同时对段芝贵、张宏舟觊觎警察厅厅长之位的事，外界已有传闻，张作霖也有所知。当下，张作霖听得很不入耳，忍不住一拍桌子，大声对段芝贵说：“你不知道奉天的情况，出抢案这是常事，不但警察厅长负不了责任，就连我当师长的也不能包干呀！”

段芝贵此时还没有充分领教到张作霖的厉害，所以仍然继续打他的官腔：“雨亭（张作霖字雨亭），那么抢钱案应该怎么办呢？”张作霖腾地一下就被惹火了，他抬起屁股便走出会场，一边走还一边气呼呼地说道：“这个会议是找我晦气，我不参加！”

张作霖的部下见他走出，都跟着走了。宋文郁一看，也和各署长一起退席，并跟着张作霖到了他的师部。见宋文郁跟来，张作霖说：“他（指段芝贵）休想摧残我的人，这次我不把他赶走，我不姓张！你以后遇事不要理他。”

这边段芝贵被一个人冷落在了会场里，立刻感受到了孤家寡人是什么滋味。他赶紧把一个姓张的青年叫到身边，让张某赶快到张作霖处进行转圜。

张某是河北人，科举出身，很有才学，原来在北京政府任职，以前因公来奉天时与张作霖见过面，很得张作霖的赏识。当天下午，张某来找张作霖，对他说：“今天上午开会，由于发生了误会，才导致不

欢而散。事后上将军（指段芝贵）很觉抱歉，特意派兄弟来请师长到军署吃晚饭。”又说：“因兄弟素蒙师长青睐，故敢冒昧前来，想师长是不会拒绝的。如果师长不肯赏脸，我也没有颜面待在奉天，只好今天晚上坐车回北京去了。”

张某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张作霖也就应约随他一同赴宴。再次见到张作霖，段芝贵早已换了态度，还直解释：“我们与宋墨林（宋文郁字墨林）都是一家人，不过在会议桌上，不能不稍严肃些，为的是他对下边好约束一些。不想你未等我把话说完，就发生了误会，发了脾气，这个事应该由我负责，还请你原谅才好。”

晚宴结束，张作霖回到公馆，宋文郁正在公馆等他。他对宋文郁说：“这下子他已叫我治住了，你回去安心干吧。”

一招敲山震虎之后，在袁金铠的策划下，张作霖又出新招。奉天东边道（管辖辽宁东边和长白山西南部一带）原有匪患，已被军警击溃，张作霖即向段芝贵建议说，土匪虽被击溃，但其党羽尚潜伏于东边山林地带，如果不以重兵镇慑，恐怕还要乘机复出。经过段芝贵的同意，张作霖从本师抽出一部分兵力编为混成团，由张景惠统率，名义上用以剿抚，实质是通过此举补充武器装备。

此前内蒙再生乱象。在沙俄的支持下，郡王乌泰与其弟葛根活佛等人合谋，并串通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阴谋建立“满蒙帝国”。乌泰集合蒙军分三路进攻洮南等地，驻兵洮南的吴俊升率部奋起迎敌，乌泰不是对手，被打得逃到外蒙去了。因在防边和剿匪上战功卓著，吴俊升在辽北声望日高，袁世凯特晋升其为洮辽镇守使。

吴俊升除了没有当过“胡子”外，其他地方颇能找到与张作霖的相像之处。比如因为他的父亲在蒙古马市上当过马贩子，熟知马的习性，对他产生过影响，以及他小时候放过马等经历，使得吴俊升习马性、识马行，以善相马闻名于军营内外。据说他的马术也极高，多么烈性的马，他只要骑上去就不会摔下来，不过后来因为身体太胖太笨重，上马时必须有两名侍从先将他抱持上去。

又比如，吴俊升虽然是个没文化的老大粗，但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而且很会“来事”，每每见到别人，总是抢先握手：“哦，哦，老弟你好！”甚至对于年龄上比他小二十岁的人，只要知道对方位高权重，他也会降下身份，在拜年时给对方跪下叩头。由此，他把上上下下都弄得一团和气，人缘上直追张作霖这个“万人喜”。

身为一员酷爱军旅生活的猛将，吴俊升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可又屡屡能化险为夷，在这方面也神似张作霖。就在与巴布扎布的那次战斗中，吴俊升身受重伤，然而却死里逃生，以至于众人皆惊呼他为“福帅”。

从张作霖的角度来看，一个“新张作霖”的出现只会给他带来竞争的威胁，实际上，袁世凯也有意识地用吴俊升来对他进行牵制。尽管袁金铠起初在分析大势时，把吴俊升视为同马龙潭一样不足为虑的人物，但落到细处时，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在袁金铠的筹谋下，张作霖调孙烈臣旅出驻辽北的新立屯，名为防止内蒙蠢动，实为防备冯麟阁和吴俊升。与此同时，汤玉麟旅、张作相炮兵团被集中于省城，以便与外部人马遥相呼应。

时机已到

在将相当一部分人马调入省城后，张作霖就开始虚张声势，把这些部队调来调去。段芝贵并不掌握军队，来奉天时只带了一个营的卫队，见张作霖如此频繁地在城内调兵遣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免不了疑惧不安。正好此时各省讨袁声浪越来越高，袁世凯本人束手无策，作为他的亲信，段芝贵也深感危机，时有朝不保夕之忧。

自在前朝为官起，段芝贵就靠拍马奉迎而扶摇直上，自然不是个清官。他的父亲更为贪婪，趁儿子在奉天上任，便在东北狠狠捞上了一笔，总共搜刮了上百万元的东西，其中单是张作霖就送给了老头子许多珍贵古玩。在张作霖的指使下，奉省的一些官员出面指责段芝贵贪污，到处宣扬说："段芝贵挪用奉天公款数百万元，这些全都是奉天人民的血汗钱，我们要求查查段芝贵的账。"

段芝贵怕就怕查账，闻讯十分紧张，急忙请张作霖从中调和。张作霖便出来扮好人，替他圆场。段芝贵既从内心里惧怕张作霖，同时又有求于对方，从此便在张作霖面前低了一头。

段芝贵错就错在媚上欺下惯了，刚到奉天时过于自以为是。想当初张锡銮未来奉天时，就有人告诉他说，关内有一个张冯（张勋和冯国璋），关外也有一个张冯（张作霖和冯麟阁），两边的"张冯"都不是好打发的，所以关里要处好这个"张冯"，到了关外也要处好那个"张冯"。张锡銮马上领会过来，一至奉天，就叫张作霖和冯麟阁各保荐两个人到都督府当差，结果张作霖派来以前的"总理"陶历卿，任都督府军务课长，冯麟阁派来白运昌，任都督府副官处长。张锡銮之所以把张冯的人放在身边担当要职，为的就是通过他们打通府（都督府）与部（师部）的联系，以便处好与张冯的关系。

段芝贵来了之后，慑于张作霖在奉天的声望和所掌握的兵权，没敢动陶历卿，但是却拿自己带来的人换掉了白运昌。除此之外，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冯麟阁这位“前胡子”的轻视，冯麟阁去省城很难见到他一面。

冯麟阁对此非常生气，曾经恨恨地说：“早晚必报复，走着瞧吧。”遇到张作霖，也发牢骚：“早晚要把姓段的撵走。”张作霖一听正中下怀，赶紧投其所好：“咱东北的事还得东北人干，要是赶走姓段的，我们拥护冯大爷当将军。”

此前，张作霖早已与冯麟阁、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结拜为盟兄弟，当时称为“奉军八虎”。八个人按年龄排序，张作霖排老七，称张七爷，冯麟阁排老五，称冯五爷，但因为他是张作霖进入绿林圈子的带路人和引荐人，张作霖平时对他非常尊重，所以称其为冯大爷。

冯麟阁虽然年龄不是最大，但却是绿林中资格最老的，张作霖还未正式入草为寇时，在江湖上就已经赫赫有名了，所有现存的江湖大佬之中，也没有一个在资历上能超过冯麟阁，因此当张作霖说出要推冯麟阁为首，取段芝贵而代之时，大家都无话可说。与此同时，众人也没有觉得张作霖做此表示有何虚假之处，都认为他情真意切且义气过人，冯麟阁更是非常高兴，引张作霖为知己。

这时护国运动又进入新的高潮，各省为反对帝制纷纷独立，北京政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密电各省军政长官，要求每晚必须给该处发一个“安谧如常”的电报（称为安电），可见袁世凯及中央政府的处境有多么困难和尴尬。在此期间，惩办帝制祸首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而在被点名的帝制祸首名单中，段芝贵赫然在列。

已被众人推为带头大哥的冯麟阁认为时机已到，他在自己的师办公处摆宴，请奉天各界要人吃饭。宴罢客散，他单独留下张作霖密谈，说：“上将军段芝贵是清末官吏败类，秽史劣迹人所共知，今为东三省帝制祸首，却仍然居于奉天人士之上。我辈决不甘心，应该驱逐他，由奉天人来干一干。雨亭以为如何？”

张作霖自然没有异议，随后便问冯麟阁想到了什么驱逐的办法。冯麟阁很得意地说：“这个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演黑脸，和他作正面冲突，由你们二十七师演白脸，用‘吓’字诀逼他畏罪逃走。这样演一幕不费一兵一文的滑稽剧，岂不妙哉？”

到底姜是老的辣，冯老大那么多年黑道还真不是白混的。张作霖暗暗叹服，立即鼓掌赞成：“对，就是要让各方面的人也知道奉天人不是好惹的。”

欲擒故纵

密谈结束，一回大营，张作霖即召集军官们开会，研究具体办法。旅长孙烈臣提议应以人民团体的名义赶段芝贵走，这样一来名正言顺，二来可以保证不把自己卷进去，以后在段芝贵面前好做人。张作霖认为言之有理，决定依计而行。

第二天天黑后，在张作霖的预先安排下，一群士兵朝天鸣枪。人们听到枪声后赶紧向张作霖报告，张作霖亲自跑进将军府向段芝贵报告，并且正经八百地透露说：“外边二十八师军官联络奉天各界团体，正与二十七师部分军官进行密谋。据臣下调查，他们是要以惩办帝制祸首为名，计划闹事，这恐怕对上将军人身安全不利。”

段芝贵一听心惊胆战，连忙拉着张作霖的胳膊问：“那我该怎么办呢？”张作霖假意拍拍胸脯：“上将军不要紧张，我有防备他们的力量。”

张作霖这个叫欲擒故纵。段芝贵刚刚把心放下，他又跑来将军府告急，说：“不好了，冯麟阁把兵全开来了，要进城找上将军理论！”

之前冯麟阁已经在递送省府的公文上对段芝贵出言不逊，故意让他难堪，段芝贵知道自己得罪了冯麟阁，无奈悔之晚矣，眼见得已无法补救。现在听说冯麟阁竟闹上门来了，急得他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张作霖不忘在旁边继续补刀：“这次冯麟阁说是要惩办帝制祸首，而且有各个人民团体的声讨书，我也没办法了。”

可怜段芝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又只好央求张作霖替他想办法。张作霖见段芝贵确实已无路可走，于是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大大的“走”字：“三十六计走为上，现在奉天是个是非之地，将军还不如一走了之。”

东北于清末时建立行省，当时文武大员都是由外省人充任，直到民国初年，本省人渐渐参与行政，1914年初，吉林人齐耀珊担任吉林巡按使（巡按使相当于省长），首开本地人做本省首长的先例。与此同时，本地人开始滋生排外思想，奉天虽然也有巡按使一职，不过却是由段芝贵自兼的，这引起了一些地方文人士绅的反感和不满，他们以段芝贵发行五百元地方公债为由，纷加责难，令段芝贵很受刺激。

可以说，段芝贵本身官就做得很不舒畅，如今又碰到这码子事，真是心塞透了，即算是张作霖不暗示，他也已经有了引退之意。当着

张作霖的面，他表示他将回北京，而且再不回来了，问题是冯麟阁已经兵临城下，不知该如何走法。张作霖忙说："这事不要紧，包在我身上。"

段芝贵随即电请北京政府，说他要回京述职，暂时离开奉天。因为做好了不回来的打算，在准备行装时，他让手下从官银号库存中取出两百万元及军火若干，全部装入私囊，同时调京奉铁路局的专车一列，作为赴京之用。

尽管段芝贵回京看上去已是板上钉钉，但他一天拖着不走，事情就有可能起变化。为了逼他快走，张作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段芝贵刚到奉天就任时，因为没有带军队来，曾有意拉拢张作霖的旅长汤玉麟和冯麟阁的旅长张海鹏。张作霖的主意是以此事为由头，派代表当面指责段芝贵阴谋分化两师，这样做，就等于直接把刀架在了段芝贵的脖子上，不怕他无动于衷。

此议一定，张作霖马上通知冯麟阁，让冯麟阁把张海鹏派来进行配合。按照计划，汤玉麟、张海鹏作为两师将领公推的代表，同去见段芝贵，但是去之前，张作霖特地密嘱汤玉麟，要求他见到段芝贵后不要讲话，让张海鹏一个人讲。

见到段芝贵后，汤玉麟整个过程都做闷声葫芦，在旁边默无一言。唯有张海鹏不明就里，只知道冲在前面给人当枪手，他疾言厉色地对段芝贵说："你分化我们、拆散我们，这是不行的！请你赶快离奉，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段芝贵只好答应立刻离奉。由于汤玉麟没有出头，这使段芝贵仍以为与他为敌的是冯麟阁，张作霖是保他的，最多不过为了应付冯麟

阁，在公开场合让部将站出来做做样子而已。在汤玉麟、张海鹏走后，他又向张作霖问计，张作霖岂肯给他留下后路，马上说："这些人（指汤玉麟、张海鹏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干得出来……"

第二天，段芝贵一刻不敢耽搁，带上家眷细软，坐着专车就奔北京方向去了。临行前，他向北京政府申请，要求将奉天的军事管理权交由张作霖代行。北京统率办事处复电，令张作霖暂行督理奉天军务兼办理巡按使的事务。

段芝贵真要走了，张作霖闻讯赶来送行。除了向段芝贵赠送许多礼物，以及一再邀请对方"病愈"后早日返任外，他还派孙烈臣率一个营的部队专程护送其进京。

对张作霖而言，尽管段芝贵发誓不会再回奉天，但这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词，万一以后形势变化，谁能保证他不会真的"病愈返任"？要知道，政客的誓言、商人的承诺、妓女的贞操，可都是世上最无可信度的东西。

所以这一幕剧还不能就此结束。

黄雀在后

当段芝贵的返京专车路过沟帮子车站时，照例要停车添煤上水。此时他接到左右的报告，说车站附近发现有一个团的军队，全部轻装，呈战斗姿势，机枪口也斜对着车站。

段芝贵没有意识到这支军队是奔着自己而来，只认为反正已经卸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让部下不要理会。哪知不一会儿，对方就

有一个军官拿着名片来到了车站。军官自称是冯麟阁第二十八师的团长邱恩荣，名片上是他的顶头上司旅长汲金纯。

邱恩荣说他要欢送段芝贵，段芝贵的部下知道来者不善，连忙一边表示谢意一边婉言谢绝。见遭到挡驾，邱恩荣突然变了脸，他拿出两封电报，要求代为呈递段芝贵。

两封电报，一封是以奉天各界法团发出的，另一封是以省议会和二十八师全体军官名义发出的。段芝贵忙让人译出电文，两封内容一致，都是说段芝贵身为帝制祸首，本要受到奉天人民的处罚，未想竟敢携两百万元官款及大宗军火畏罪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金纯旅长就近截留，押赴沈阳依法处理”。

看完电文，段芝贵被惊得不知所措，连忙把电报拿给孙烈臣看。孙烈臣看后，大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他走下车，和邱恩荣一起到票房谈话去了。

段芝贵不知道，这其实是张作霖和冯麟阁在继续演戏。原来张作霖还在前往车站为段芝贵送行之前，就给冯麟阁发去电报，把段芝贵私取官款与军火的事告诉了他，让他把专车截住后要回这些东西。冯麟阁一听能落得这等好事，岂有不应之理，于是马上答应再扮一回黑脸。

孙烈臣的一举一动都是照着“脚本”来的，他下车后便故意拖延时间，许久都不露面。段芝贵看不到他，却见车站上邱恩荣的士兵排着队拥到站台附近，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段芝贵不是个笨蛋，他终于醒悟到，冯麟阁可能是在搬他的“胡子”老戏码，即留财不留命，留命不留财，换句话说，人家就是冲着官

款和军火而来。无奈之下，段芝贵只得下令左右将官款银箱从车上卸下，堆放在站台上。

看到段芝贵自觉地留下了财，孙烈臣这才返回专车，一本正经地向段芝贵报告说，奉天各界民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沈阳，只是在“张代督”（即张作霖）的一再恳求下，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火必须留下，且要电请中央查办。

段芝贵心惊胆战，哪里敢有丝毫反对，当下便点头认可，于是命左右将军火也一同卸下。到了这个时候，邱恩荣方肯撤兵，由孙烈臣继续护送专车前行。

段芝贵人财两空，庆幸的是总算保住了项上人头，而冯麟阁拿到官款和军火，也以为是捡了个大便宜，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赚到了的并不是他们二位，而是张作霖。因为靠着这一幕戏，当众出丑的段芝贵将再无脸返回奉天，至于冯麟阁，他得到的那一点官款和军火，能跟奉天最大的乌纱帽相提并论吗?

段芝贵到京后即正式提请辞职，不敢再回奉天，这时候袁世凯也已被迫取消帝制，主仆二人几乎都是一样的狼狈和落魄。袁世凯虽然退位，但余威还在，各级官员的任免也仍然需要他来主持，让他感到特别伤脑筋的是，既然段芝贵不能返任，派谁去接替好呢?

在逼迫段芝贵离奉的同时，袁金铠与奉天的地方士绅文人以及法团联络，猛力鼓吹奉人治奉，加上此次段芝贵的遭遇，袁世凯认为，若再派一名外籍大员，一定会遭到地方上的激烈反对，大员不仅会面临尚未赴任就丧失威信的尴尬，还可能遭到意外。基于这些考虑，他

只能从奉天本省有威望的人士中拣选一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又只能从张作霖、冯麟阁两人中挑选。

演戏，必须是认真的

在袁金铠的串联下，奉天各界早就为拥张上位大造舆论，段芝贵离开奉天后，众人更联名致电中央，要求拥张治奉。当然，袁世凯不能光看所谓的民意，他还得听听身边人怎么说。

这个身边人就是从奉天仓皇逃回的段芝贵。段芝贵吃够冯麟阁的苦头，自然对他大骂不止，特别是沟帮子车站“遭劫”，更让他对冯麟阁恨之入骨。尽管汲金纯、邱恩荣事后辩白说他们既未伤人，也未抢夺财物（指官款和军火以外的财物），仅仅是吓唬段芝贵不准再来奉天搜刮而已，但段芝贵可不这么认为，他到北京后就向袁世凯哭诉，说冯麟阁的军队化装成土匪，大肆劫掠其财物，弄得他官囊如洗，仅存一命。

对于一直演白脸的张作霖，段芝贵说的都是好话（也以此衬托他段某在奉天不是没人缘，而完全是“冯胡子”太坏的缘故）。在他的极力推荐下，袁世凯下决心以张作霖督奉。1916年4月，张作霖被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不再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

接到任命，张作霖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多年媳妇熬成婆，从此奉省军政大权将全部归于他一人之手，忧的是何以应付冯麟阁，要知道他当初可是口口声声，说要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冯大爷”的。

张作霖立即把所有结义兄弟都尽可能请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痛哭流涕，并指天发誓自己是清白的，对做一把手绝无任何企图。那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呢？——段芝贵！这厮在奉天时吃够了我和冯大爷的苦头，回京后就想使用离间计，靠一纸委任状来挑拨我们弟兄之间的感情。

演戏，必须是认真的。一散会，张作霖即时发出电报，坚辞北京政府的任命，并力荐冯麟阁当盛武将军，说奉天局面非冯不能领导。

袁世凯既已定下张作霖，自然不能随意更改，况且"坚辞""力荐"之类也向来都是官场俗套，在他已见怪不怪，因此复电不准。张作霖再请辞，仍不准。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部将，深知攀龙附凤之理，看看差不多了，他赶紧对张作霖说："你一定要坚辞，北京要是另派一位外省人来，我们怎办？我看还是就了（职）罢。"其他人随声附和，认为汤玉麟的看法很对，张作霖确实不宜再辞，对"冯大爷"的安排可以另想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冯麟阁也不能不违心地朝着张作霖说上两句场面话："兄弟，你比我精明强干，你当头，哥哥捧你。"张作霖见冯麟阁终于松了口，急忙接过话茬："如果大哥捧我，我就遵命吧。"他迅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必须任命冯麟阁为军务帮办，他才肯就职。

担任军务帮办，也就是做张作霖军事上的副手，袁世凯乐得送给张作霖做人情，马上批复同意，任命冯麟阁为奉天军务帮办。

这边张作霖心安理得地准备就任，那边圈子里却传开了"冯大爷就这样被干掉了"的议论。冯麟阁的部下都对他说："您受了张作霖的愚弄了，他表面上对您毕恭毕敬，实际上您得着了什么？"冯麟阁自己也

越想越不是味，由于心理严重失衡，他非但不向张作霖道贺，甚至连到奉天就帮办职都不肯了。

张作霖只得请马龙潭、吴俊升出面，劝冯麟阁来奉天上班，可冯麟阁听说马、吴为张作霖做说客，干脆叫手下人挡驾，让两人吃了闭门羹。如此一来，张作霖更加无法下台。第二天，他穿着便服，带上几名护卫就亲自来拜见冯麟阁。冯麟阁不能将张作霖也拒之门外，但架子摆到十足，明明看到张作霖也权当没看见，磨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站起身，冷冷地说了声招呼："失迎。"接着又带着一股醋味儿说："老弟，你高升了。"

张作霖不得不赔着笑脸："大哥，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我张作霖能有今天，还不是都靠大哥和弟兄们捧场吗？当年咱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上，如同一奶同胞，今天也不能分心眼儿呀！"

不提"一奶同胞"还好，一提冯麟阁更来气，当下也顾不得什么"哥哥捧你"之类的场面话了，直接朝着张作霖开起了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你成了盛武将军，而我冯某却闹了个他妈的军务帮办，这能让我过得去吗？"

张作霖连忙给他戴高帽："论能耐，大哥你比我高。可这是上头硬派到我头上，我推了两次都不行，我也是没招了。再说，官面上的公事，就是这么回事。兄弟我还是当年那句老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说"哥哥捧你"的时候，冯麟阁曾经被张作霖接过话，现在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顺势接过话茬："好，那我就提几个条件吧。"

说着，冯麟阁将一张早就拟好的文稿取出交给了张作霖。

肚量

张作霖接过一看，上面写着两个冯麟阁的条件，其一是要另外为他的军务帮办设一个公署；其二公署内要参照张作霖的将军公署，设立参谋长及各课，并且组织、编制和开支还要和将军公署一模一样。

条件非常过分，这哪是在设什么帮办公署，几乎就是想另开一个将军公署了。张作霖暗暗叫苦，但嘴上还只能含糊其词地应承着："这事得请示上边。"

回去向袁世凯一报告，袁世凯回电认为，冯麟阁的要求与体制不符，不能这样设公署，而且将军署内已有参谋长及各课设置，也没必要重复。他只答应每个月另拨十五万元作为帮办的办公费用。

拿着袁世凯的回电和十五万元费用，张作霖又来拜见冯麟阁。没想到冯麟阁不依不饶，干脆向袁世凯提出要辞职不干了。

在袁世凯看来，如果冯麟阁这老刺儿头真的卸甲归田倒好了，怕就怕他给你来阴的。为了缓和冯麟阁的情绪，调解他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袁世凯曾想请张锡銮赴奉。张锡銮虽然于冯、张都有恩，但他知道此事非同一般，居中调解乃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无论如何不愿掺和进来。

那段时间，袁世凯正处于凄风苦雨之中，自己的生命都时日无多，实无精力再应付如此棘手的事。既然找不到人调解，他也就只好撒手不管，任奉天的这帮人折腾去了。

袁世凯不管，张作霖与冯麟阁过招时就少了块挡箭牌，自然更加困难。转眼张作霖的将军就职仪式就到了，他硬着头皮，特派孙烈臣携现款三十万元和大宗礼物，前往冯部驻地北镇劳军。受张作霖之托，孙烈臣在献上礼物后，即再次邀请冯麟阁回奉天就帮办职，冯麟阁未置可否。

1916年5月20日，张作霖在省城就任盛武将军。当天，冯麟阁忽然率马部五营开入了奉天。看到冯麟阁真的来了，张作霖喜出望外，以为双方的心结已经解开，于是立刻来到城南风雨台冯部办事处拜会冯麟阁，同时盛邀对方到他的将军府赴晚宴。

可是冯麟阁并没有这么好打发。他向袁世凯辞职是假，要的只是在他面前撒回娇，不料袁世凯自顾不暇，连搭理他的时间都没有，娇也就撒不成了。撒不成娇，还可以撒气，这次冯麟阁率部回省城，可不是来和解的，而是要向张作霖炫耀武力，告诉他，老子就是这么有尿性，偏偏不听你的，你能拿我怎么着?

张作霖满腔热情，换来的是一盆冷水——冯麟阁既不回拜，也不赴宴，横竖没把他这个新任将军当回事。

要说张作霖有肚量是真有肚量，你冯麟阁不是不来赴宴吗，那行，我把酒席抬到风雨台办事处，由你自斟自饮。是不是还觉得不够热闹，我这里还送来歌伎数名相陪，费用都不需你掏，全是我出的！

冯麟阁来省城没别的事干，就是提条件，什么拨款、招兵，一堆难如登天的条件。之后他只在省城住了一天，就借口视察防务，又回到北镇去了。

十几天后，在张作霖的相邀下，冯麟阁才重新带着两营人马回到省城。当天下午，张作霖前去拜会，冯麟阁居然不但不见，还让人传出话来，说是他听闻张作霖生了病，怕会面受传染。

其实在督奉这件事上，冯麟阁还真不能指责张作霖什么，俗话说得好，心肝都不能托着五脏，有了利益谁都免不了去争去抢——设若把他“冯大爷”放到张作霖的位置上，他会单纯因为义气，就将交椅拱手相让?

再说了，你就算是心里有气，我都退让到这种程度了，你总还得给我三分薄面吧，何至于老是为难人？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也看出来了，只要他坐着将军这个位置，冯麟阁就不会善罢甘休，他越忍让，对方可能还越起劲。

张作霖倒也时有跟冯麟阁翻脸的冲动，但冯麟阁的北镇大本营背靠大山，前抚平原，进可攻退可守。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双方实力相当，就算是上边调兵相助，要击败冯麟阁也极为不易，这也是冯麟阁始终不肯离开北镇的重要原因。

过去张作霖擒杀杜立三、金寿山，用的是请君入瓮之计。冯麟阁不愧是老江湖中的老江湖，他比杜、金滑头多了，即便短期来省城，也一定要住在自己的办事处里，而且决不赴你的宴，你能奈我何?

张作霖左不成，右不是，弄得十分苦恼。一气之下，他向北京政府拍发电报，要求辞职。可就在他拍发电报的时候，袁世凯病死了，北京政府内部乱成一团，辞职电根本没人搭理。

将计就计

张作霖、冯麟阁继续别扭着。一天，张作霖正在房间里午睡，他最宠爱的五太太寿夫人突然发现有两个女人在门外瞅来瞅去，形迹十分可疑，连忙叫来卫士。卫士将两个女人抓住后进行搜身，但又没能搜出什么东西。尽管如此，张作霖仍怀疑冯麟阁已经派出了刺客，要对自己下黑手。为了加强防范，他在将军署后门修筑了一座炮台，炮口直指冯麟阁的风雨台办事处。

冯麟阁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在张作霖身上找碴儿，一听还有这事，当即派人责问张作霖，并且留下话来："限于当日给予合理答复，否则后果自负。"

要真打起来，张作霖并无一战而胜的把握，所以冯麟阁一下通牒，他就又悔又急。正好吴俊升在张府做客，他就请吴俊升做和事佬，前去向冯麟阁进行解释。

在"奉军八虎"中，吴俊升排老二，人称吴二爷。这位吴二爷虽与张作霖"张七爷"在性格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他是军旅出身，并不被张作霖视为一个圈子里的人，加上在防边和剿匪方面战功卓著，锋芒毕露，所以最初张作霖对他是排斥的。吴俊升也很有意思，不管是年龄还是资格，都不落于张作霖之下，可他就认张作霖，好像张作霖天生就是他大哥一样，有人甚至讥笑他对张作霖是"卑躬屈膝，忍辱求全"。见吴俊升一心要做自己的小弟，张作霖对他也就渐渐地从"不好意思下手"，过渡到了有所信任和亲近。

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吴俊升来到风雨台拜见冯麟阁。见到冯麟阁后，他满脸堆笑地说："这炮台的事，雨亭上将军……"

吴俊升口吃，而且说话时满口唾沫，人送绰号“吴大舌头”，他也知道自己有这毛病，所以常常有意把话拖长了慢慢说。可是还没等他说下去，冯麟阁张口就骂了起来：“什么上将军？妈的！”

吴俊升一看不妙，急忙改口，并且对着冯麟阁打躬作揖：“大哥息怒，雨亭对修炮台一事，事情根本不知道。”

吴俊升的年龄比冯麟阁还大，他把姿态放到这么低，冯麟阁也就不太好继续发作了，只好哼了一声：“不知道？他当了上将军，咋没有忘掉呢？”

眼瞅着是鼻子里喷了一碗酽醋，一溜儿酸将下来，话一出口，冯麟阁自己也有些不自在起来，于是改换话题：“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说怎么办吧。”

吴俊升赶紧说，张作霖已将修炮台的负责人撤职，炮台也要拆掉，保证一块砖也不会留下。又说，张作霖本打算亲自来赔罪，但因怕冯麟阁生气，才让他前来代赔不是。

好话说尽，冯麟阁总算松了口，让吴俊升给张作霖带话，必须满足他的条件，事情才能算完。跟以前一样，冯麟阁这次提出的条件依然非常苛刻，吴俊升急出一身汗，可是看冯麟阁一副无价可还的样子，他也只好如此回去向张作霖复命。

听完冯麟阁转达的条件，张作霖不但没有勃然大怒，反而哈哈大笑——不笑别的，单笑冯麟阁虽然老谋深算，然而醋吃多了，也难免会出昏着。

原来冯麟阁的条件中有这么一条，要张作霖领着二十七师营以上军官，到他二十八师办事处正式道歉。

你老冯头朝着我姓张的骂也好，毁也罢，哪怕是真的搞暗杀，我都拿你没办法，因为在外人看来，都是咱两个为争“奉天王”弄出来的恩怨。可你硬要扩大范围，惹众怒，激公愤，那事情就好办了。张作霖立即把二十七师营以上军官全部叫到上将军公署，一五一十地说了上门道歉一事。

不出张作霖所料，军官们一听就炸了，大家一边对冯麟阁破口大骂，一边摩拳擦掌，争吵着要与二十八师拼个你死我活。

张作霖制止了众人的冲动之举，决定上门道歉。他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今朝去弯弯腰，来日要砍掉他的脑壳当尿罐用。”说完，他亲自喊口令，带着军官们徒步前往风雨台。

冯麟阁只顾着泄愤出气，他没想到张作霖会真的亲自带队前来道歉，一时尴尬万分。张作霖则仍然一板一眼，郑重其事地向他致歉：“小弟我平日对部下管教无方，惹大哥生气了。”冯麟阁只得连声说：“哪里，哪里。”

张作霖将计就计，在突出自己器量的同时，把冯麟阁衬托得更加得理不饶人。为了挽回脸面，冯麟阁也不能不做出已与张作霖重归于好、捐弃前嫌的样子，曾以吴俊升、马龙潭相陪，拉着张作霖打了几圈麻将。

事情还没完，冯麟阁的条件中有一项“今后用人行政，必须征求我同意”，张作霖就真像古书中说的那样“乔张致”（意思是装模作样），遇到一切公事，必得先向冯麟阁请示或打招呼。冯麟阁哭笑不得，也

知道张作霖做这些就像上门道歉一样，都是给世人看的，而他不但从中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反而会很难堪，因此忙不迭地对张作霖说：“有什么事只要兄弟看着对，就放手做去，不必问我。”

冯麟阁渐渐安定下来，不再像原来那样折腾了，但他对张作霖仍然保留着戒心和恨意，平时都是长居于北镇，来省城的次数和时间很少。

第五章　我自有办法

张作霖得志，首出于袁金铠之谋。张作霖本人对此也相当领情，在就任盛武将军时曾特地对袁金铠表示谢意，说：“我有今天，皆兄之谋。今后有关军政各事，更望多加帮忙，富贵与兄共之。”作为回报和认可，袁金铠被任命为军政两署秘书长，等于是承认了他作为张作霖首席幕僚长的地位。

袁金铠让张作霖真正懂得了智囊的重要性，掌握奉天政权后，他更加极力延揽人才。凡袁金铠所介绍和推荐的奉天知名人士，尽被他罗致于自己府中担任秘书，其秘书数量之多，超过了自徐世昌至段芝贵以来的历任奉督。

有一天，张作霖与袁金铠闲谈，突然问道：“奉天人才以谁为最出色？”在张作霖想来，袁金铠可为人选，即便自谦，也定会推说是幕府里的其他同僚，不料袁金铠的回答却是：“我们这些人中哪一位也赶不上王岷源。”

袁金铠提到的这个王岷源，原名叫王永江，岷源是他的字。王永江的样子粗粗大大，颇像个军人，但他其实是个文人。袁金铠说王永江有才也绝非虚言，清代制度，每三年要从各省选拔成绩特别优秀的秀才，进入国子监（古代最高学府）进行深造，这叫作优贡。王永江在清末时考中过优贡，其国学功底可见一斑。

袁金铠推重王永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优贡身份，毕竟在那个时代，前清留下的秀才举人不少，但很多人早已完全隔膜于时代，成了死在沙滩上的“前浪”。王永江厉害就厉害在中外兼通，当新的大浪涌来时，照旧能在其中担当弄潮儿角色。

大耳如何慢风雏

王永江深明医理，最早时曾开过一家中药店。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商侵入东北，东北的工商业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王永江的药店也因此亏损停业。以后日本人在东省创立书院，慕其文名，曾聘王永江为书院的汉文教员。可是这座日本人开的书院虽然也教汉文，却不准学生课余阅读中国书籍，王永江对此很是不满，于是愤而辞职，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饭碗。

与那些喜欢口头发泄或诉诸非理智行为的愤青不同，王永江是个崇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干家。药店关张和书院的遭遇在给他造成强烈刺激的同时，也促使他开始投入精力对日本进行关注与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对于日本的村屯制度、警察制度最感兴趣，且深得其旨。

袁金铠很早就认识王永江，两人有不错的私谊。有一段时间，袁金铠奉命在辽阳试行警政，那时警察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大家都不了解。袁金铠知道王永江对此有研究，就写信给他，委托其调查日本在租界实行警政的具体做法。

王永江经过一番考察，写出报告交给袁金铠。袁金铠看后大加赞许，遂正式邀请王永江到辽阳警务学堂当教员。教学期间，王永江参照日本警政制度，并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况，编出了包括警政法规、章程、制度在内的十几种讲义和教科书，很受校方肯定。

因教学有成，王永江不久就被擢升为辽阳警务所长。转入警政实战后，他同样成绩斐然，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特予嘉奖，称其为“奉

省办警政的第一人”。

王永江的医术在其仕途中也起到过作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东三省流行鼠疫，王永江凭借胸中所学组织防疫，成效很大。经辽阳知州推荐，他被提升为候补知县。清代有官员籍贯回避制度，一般情况下，本省籍官员不能在本省为官，王永江是奉天人，按理也不能入奉天官场，但在锡良的奏请下，他仍然被按特例调进奉天省城，入总督府民政司、礼学司参预机要。

武昌起义后，铁岭爆发革命党起义，继锡良之后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他率部前往镇压。经三天激战，起义军不支退走。书生亦能带兵，文官也会打仗，这是王永江很为之得意的一段经历，他在自己的诗集中曾专门记述此事。

王永江自此在省城逐渐崭露头角，赵尔巽和锡良一样，对他器重有加。可是王永江与袁金铠不同，他不但不喜欢钻营、谄媚这一套，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文人的倨傲和清高。当初张作霖在省城初掌大权，人人趋之若鹜，以能见其一面为荣，唯独王永江从不主动上门奉迎，他每天处理完公事后，最喜欢做的事只是回家闭门品读《易经》而已。

《易经》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永江不可能对张作霖的上升势头视而不见，他也希望能通过为张作霖出谋划策来施展平生抱负，可是因为不像其他人那样会看眼色和投其所好，张作霖对他不是很重视。王永江很失望，便写了一首诗，诗中道：“士元竟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荆襄宁志满，英雄通病是轻儒。”

“士元”指的是三国谋士庞统庞士元，他与诸葛亮齐名，诸葛亮号卧龙，他号凤雏，“大耳”指的则是刘备。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占据荆襄后张榜招贤纳士，庞统前去投奔，可是刘备因为他颜值低，长得丑，起初只给了一个县令干。

庞统赴任后闷闷不乐，整天以喝酒为乐，不理政事，刘备闻讯派人前去督责。庞统当着来人的面现场办公，不到半天时间，便将所积公务全部处理完毕，至此，刘备方知他是个大才。这段故事还被民间编成歇后语，叫作“刘备轻看庞统——以貌取人”。

王永江以诗言志，借三国故事狠狠地讥讽了一下张作霖。张作霖听闻后，却只认为王永江是未得升迁，所以乱发牢骚。他那时对智囊的作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想想你要升官也不是不可以，来我家跟我赌，给我送够银子，我不就能给你官做了吗？为什么要酸不拉叽地在下面嘀咕我，毁我名誉？

未几，赵尔巽欲任命王永江为署理奉天民政司使。张作霖逮着机会，就故意问赵尔巽：“王永江是什么人？他能胜任民政司使一职吗？”赵尔巽见他脸色不好看，赶紧说：“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追问了。”

张作霖并没有就此放过出语讥讽他的人，回去后便扬言：“如果王某敢就职，我一定让他好看！”

王永江听到知道自己得罪了张作霖，只得干脆向赵尔巽称病告假，暂回家乡避祸。不久，赵尔巽重又授之以别的职务，但都不是很得意。

直到赵尔巽离奉，给张作霖开列的人才名单中，都还把王永江列了进去。张作霖倒也不是不知道王永江才堪大用，他就是受不了王永江的那句“英雄通病是轻儒”——我“轻儒”怎么了，你一玩玩笔杆要耍嘴皮的，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就是不用你！

公来何迟

《史记》中说，有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求见刘邦，他会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不过那说的是起兵初期，等到他立定取天下的志向，想往“汉高祖”的目标进军的时候，人家可是把有才的儒生当神一样供着的。

同样，张作霖也经历过这样的心理变化，最早他不但曾轻视王永江这样的“大儒”，还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法律是人造的，怎能约束我呢？”一副浑不吝、我行我素的模样。后来他就知道这样不行了，也明白“儒”是个好东西，他用刘邦式的口吻对手下亲信们说：“我这个位置（指督奉）是得自马上，然而马上得之，却不可以马上治之。如果地方上有贤俊之士愿替我效劳的，我们应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

正是了解张作霖态度的变化，所以袁金铠才会再一次在幕主面前引荐自己的老友：“岷源（王永江）乃天下奇才，将军幕下诸君无出其右者。将军应直释小嫌，以就大业。”

张作霖本来也有要起用王永江的念头，只是因为原先轻慢和威胁过对方，怕王永江记恨在心，不肯投于麾下，当下就笑着说：“我哪是不愿意用岷源，主要是岷源不屑来屈就罢了。”他知道袁金铠与王永江的关系，因此又试探着追问道：“人家肯到咱们这里来吗？”

袁金铠等的就是这句话，赶忙回答：“只要咱们对他优礼相待，言听计从，他也能来。”

张作霖一听大喜。这时王永江正充任辽康税捐局局长，张作霖先让袁金铠写封信给他解释原委，继而又将王永江调到奉天任税捐局局长。

为了充分做到“优礼相待”，王永江一到奉天，张作霖就派人上门邀请他到府中做客。虽然有袁金铠预先做了铺垫，但王永江对张作霖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仍有措手不及之感，也不免疑心张作霖会在门口做点文章，为难为难他什么的，于是就对来人说：“张公门前戈戟森列，我这样的小官到了门口，万一门卫不让我进去，那该怎么办？”

使者回禀张作霖。张作霖就像是那个已发现庞统是大才的刘备，早就迫不及待地要见到对方了，他立刻让使者转告王永江：“不要担心，我已经预先跟门卫讲过，你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既然张作霖诚心诚意，王永江便放下顾虑，收拾整齐后前来将军署拜会。当他走到门口时，果然有人主动上前迎接，刚刚进入中门，等候多时的张作霖急步走下台阶，对王永江说：“公来何迟？”

张作霖一边说，一边亲切地握着王永江的手，就像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一样。随后，他又把王永江拉进内室，密谈了一天。虽然外人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所有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两人已尽释前嫌，王永江正式加入了张作霖的核心智囊团。

当时由于张作霖所属军队很大一部分出自绿林，所以经常有不法军人胡作非为，欺行霸市。城内虽有警察，但根本不敢管或管不了，比如段芝贵督奉时期，汤玉麟的士兵公然抢劫，警察出动抓住劫犯，

而汤玉麟竟然会亲自带人把劫犯又给抢回去。长此以往，导致奉天的治安状况十分混乱。

取得奉天省的军政大权后，张作霖即宣布军人不能干政，军队应严守军纪，不准扰民害民，如果有谁敢故意违反，就以军法惩治。问题是再严的制度，最终都得靠人来执行。原省警察厅厅长宋文郁虽与张作霖是亲戚，又支持张作霖多年，但他与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多认识，在维持省城秩序和纠察军队风纪方面，难免碍于情面，不能严格执行命令，汤玉麟士兵抢劫案即典型例子。

王永江初到奉天，张作霖就明确说明，请他到奉天不是专办税务，而是办理一切政治。鉴于王永江在警政方面既有理论又有实绩，张作霖很快做出决定，用王永江替换宋文郁，主抓全省警务。

王永江甫一上任，就将他在辽阳试行警政的经验推广于全省，开始在省城各处设立警务分驻所。警务分驻所相当于现代的派出所，原先军人横行街市已成习惯，自从有了“派出所”，他们的行动便处处受到限制和干涉。这些出身绿林的军人对此十分反感，他们骂警察为“巡警狗”，将“派出所”称之为“西瓜棚”，军警冲突事件因此一再发生。与此同时，以冯麟阁为首，一些军官也纷纷要求张作霖取消“派出所”，有人因此劝张作霖说：“你犯不上为王某得罪很多的人，请把王某调开吧。”

张作霖在跟冯麟阁争“奉天王”时可以百般忍让，但在这件事上却不肯让步，尤其是看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省城治安情况已得到极大改善后，他反而对王永江更加信任。反对者们见状，也就只好把反感情绪都咽到肚子里，暂时敢怒不敢言了。

在张作霖的支持下，王永江一面对不法军人采取严厉惩处措施，一面对奉天省各县警务长的职权重新做了规定，并且要求认真执行，不得敷衍了事。

王永江不徇私情的强硬态度最终让张作霖的那些老部下们坐不住了。在他们看来，军警是一家，警务处长、警务厅长都应该由军人担任，况且天下原本也是军人用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功劳可以高高在上地来管辖军人?

你们懂得什么

所有老部下里面，要说最不服气的还得数汤玉麟。作为张作霖患难时期的结义兄弟，汤玉麟为张家立下了汗马功劳：金寿山进攻中安堡，他先是替张作霖解围，接着在金寿山的人马突入堡内时，又背着张作霖的大女儿逃出；辽西剿匪，无役不从，特别是剿灭陶克陶胡，张作霖两次被困，都是由他率敢死队舍生忘死给救了出来；奉天告急，又是他率马队跟着张作霖星夜赶到省城，从而为张作霖夺得大权奠定基础……

正因为倚仗着是张作霖的老兄弟和大功臣，汤玉麟一向有恃无恐。他曾屡次向省内各行政机关强行荐人，大有效法张锡銮督奉时代张作霖“大吃县局”的作风，行政机关的主官们又不敢向张作霖报告，致使其越发无法无天。只有王永江完全不理会他那一套——你想往我的警厅塞人，弄个某某县警察所长的职务？对不起，门都没有！

汤玉麟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自然十二万分的不爽。同时他当时身兼奉天省城密探队长一职，与王永江的职权有些重叠，因此他除了认

为王永江态度傲慢、目空一切、不买自己的账外，还视之为是与自己争权，两人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

汤玉麟这人从好了说，叫作心地宽厚，他对部下很少谩骂，带兵三十年更是从未杀过一官一兵。部下犯了错误，他最大的责罚不过是驱逐，过了些日子，被驱逐的部下重返军营，仍然会照旧录用（宋文郁任省警察厅长时，他抢去并声称枪毙的那名士兵，自然也不可能是真被枪毙了）。汤玉麟如此放纵，致使部下扰民事件层出不穷，各处发生的劫案，要么不查，一查几乎全都是他手下官兵干的，有知情者批评他是“有奖无罚，最误事”。

汤玉麟有一个部下公开在省城设赌抽头，原先谁都不敢管，王永江断然下令将其逮捕送警务处关押。汤玉麟闻讯气势汹汹地来到警务处要人，王永江不予理睬，汤玉麟竟派兵包围了警务处。王永江大怒说：张作霖叫我整顿警政，我就要秉公办理，汤玉麟要包围我的警务处，我就和他拼！

王永江随即命令警察荷枪实弹，准备进行反击。汤玉麟这时候还只想吓王永江就范，没想到对方敢来真的。他之前已经多次向张作霖进言，想搞掉王永江，但每次都遭到拒绝，而且总要挨上一顿臭骂。这次因为骑虎难下，他只好又硬着头皮去找张作霖告状，坚决要求撤王永江的职。

王永江知道后，自忖汤玉麟与张作霖关系至深，为了不让张作霖为难，便以到温泉地休养为由，向张作霖递交了辞呈。见王永江要走，张作霖着急了，他一边对王永江极力挽留，一边大骂汤玉麟：“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

张作霖这句过了头的气话让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一众高级将领都不淡定了——居然骂我们给人牵马扶镫都不配，那你当年被仇敌追杀，需要我们舍命辅佐时，为什么不说?

汤玉麟更是气炸了肺。有一天，他去军署请张作霖赴宴。张作霖正和王永江等几个人打牌，于是头也没抬地对汤玉麟说："你们先走，回头我和岷源（王永江）晚点去。"

汤玉麟横了王永江一眼，说："谁他妈请他。"

张作霖不听则已，一听怒不可遏，他一把将牌桌掀翻，咣咣咣地就和汤玉麟大吵起来。王永江见情形不对，赶紧悄悄溜走了。

一直到1917年春节，按照惯例，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都要请省城文武长官们吃年茶。初五这天，二十八师做东，张作霖前去赴宴，他在席上没看到王永江，心里很不高兴，但二十八师是冯麟阁的部队，又正值年关，也就没有说什么。

初六是二十七师请客，还是没请王永江。张作霖忍不住了，说："我为地方考虑，才用了王处长，诸位对王处长不敬，就是对我不敬。"

话说完无人吭声，张作霖情知众人不服，更加来气，当下便厉声质问道："为什么没有请王处长？"仍然没人搭腔，张作霖接着又说："二十八师不请王，我不说什么，怎么你们也不请呢？"

见场面尴尬，孙烈臣赶紧出面对张作霖说："我们把王漏掉了，改日再请他吧，您甭生气。"

有孙烈臣这句话，张作霖本来可以找台阶下了，未料张作霖反倒来了劲，他愤愤地训斥道：“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我用定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谁辞职！”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汤玉麟腾地跳了起来，对张作霖说：“你甭骂街，辞职那算不了什么。要是姓王的这狗东西不去掉，我们不敢奉命。”

从来是只有张作霖训别人，没有别人朝着他吼的，汤玉麟此举惹得张作霖勃然大怒，顿时就拍着桌子骂了起来：“这么说，你们是反对我呀！”

众人一看不妙，赶紧上前劝解，宴会不欢而散。

分道扬镳

知道因自己秉公执法，已经惹了众怒，为了缓和与武将们的紧张关系，王永江特地预备丰盛宴席，邀请省城高级官吏联欢，可是汤玉麟、孙烈臣等人谁都不去，让他大丢脸面。张作霖知道后又头疼又恼火，他把汤玉麟等人找来，除了痛骂不止外，还要求这些人向王永江道歉。

汤玉麟等人退下来一起商议，没人肯向王永江道歉。他们拟了一张呈文，内容是要求将王永江撤职，否则的话，就全体一致，都辞职不干回老家去。

诸将公推孙烈臣为代表发言，一起去找张作霖请愿。可是见到张作霖后，还没等他们开口，张作霖先妈长爹短地骂了他们一通。众人

面面相觑，自己不敢说，都指着孙烈臣说。关键时刻，孙烈臣也了，他把头扭过去，别说发言了，连正眼都不敢看张作霖。

汤玉麟憋不住了，催促孙烈臣："赞尧（孙烈臣的字），你倒讲话呀！你手里拿的呈文呢？"

孙烈臣仍然说不出话来，但好歹还有勇气把呈文掏出来，交到张作霖手里。张作霖那暴脾气，呈文接到手里，略扫了一眼，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呈文撕了个粉碎。他刚刚见汤玉麟鼓动孙烈臣，便猜到肯定又是汤玉麟带的头，于是把火都发到了汤玉麟身上。只见他一边用手指着汤玉麟的脸，一边破口大骂，差不多把汤玉麟的祖宗三代都掘了出来。

汤玉麟哪里能够忍受，当即与张作霖对骂，张作霖骂他什么，他就回骂什么，之后张作霖跳起来，他也一蹦三尺高。

看到汤玉麟一点没有肯让步的样子，张作霖愈加暴跳如雷，举起拳头就要揍他。一同前来请愿的人顿时全都变成了拉架的，你推我搡，好不容易把汤玉麟给拉出了门外。汤玉麟都已经出了门，还听见张作霖在背后不依不饶地骂他，让他滚蛋，说："没你有这个鸡子，我也能做出槽子糕。"（槽子糕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一种传统糕点，以鲜鸡蛋为主原料烘烤而成，也称鸡蛋糕。）

听到这句话，汤玉麟回过头放开喉咙叫道："你叫干，老子也不干了，哪里都能吃饭。"

在此之前，得知张作霖、汤玉麟公开在宴席上大吵大闹，一直与张作霖面和心不和的冯麟阁就已派人联系过汤玉麟。来人劝汤玉麟不要辞职，并且对他说："一切有冯帮办给你做主，将来奉天的天下不定

是谁的呢！”回到自己的军营，汤玉麟越想越气，加上倚仗冯麟阁的支持，就真的有了和张作霖从此分道扬镳乃至发生兵谏的打算。

汤部全部驻扎于省城，同时又是张作霖所有部队中军纪最坏的一部分，与警察发生直接冲突的概率自然也最多。汤部官兵都害怕汤玉麟真被张作霖给骂得不敢动弹，从而导致自己以后也栽在“巡警狗”手里，或者被关进“西瓜棚”，因此他们纷纷撺掇汤玉麟脱离张作霖单干。

汤玉麟本来就是个没多少头脑的莽汉，给众人一激，果然就冲动起来。一次王永江下令整肃风纪，逮捕了汤部的一名不法士兵。汤玉麟乘机挑衅，枪杀了两名执法法警，酿成了“军警冲突案”，以此向张作霖施压。

又有一次，汤玉麟亲率数十人，利用晚间突袭警务处，打算生擒王永江。王永江在无准备的情况下急忙从后墙逃出，跑到张作霖处进行报告。张作霖听后当即给汤玉麟打电话，劈头盖脸一顿大骂，并让他速来军署相见。可是汤玉麟这回一反常态，表现得就像个犟驴一样，不但不服，而且死活不肯出来见面，两人的关系立刻出现僵持状态。

张作霖脾气暴躁专断，过去同他的几个拜把子弟兄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也是轻则动嘴，重则动手。不过那个时候，他的原配赵氏尚可以起到调解作用，每当张作霖发火动怒时，赵氏总会第一个出来劝解他的那些兄弟们：“他（指张作霖）那个熊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好兄弟，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三天别理他就好啦。”

像汤玉麟这样绿林好汉出身的人，大多吃软不吃硬，被赵氏这么一说，肚子里再有气往往也就平息下去了。汤玉麟因此对赵氏赞不绝口：“老嫂子贤惠，雨亭兄（张作霖）多少大事，都多亏了老嫂子啊！”

如果赵氏还在，可以想见大家绝不会闹到这一步，可惜的是，赵氏早已不在了。

此风万不可长

赵氏与张作霖是患难夫妻，嫁给张作霖后一度过着颠沛流离、惊险动荡的生活，后来日子渐渐安定下来，可是随着张作霖陆续娶进其他妻妾，对她也逐渐疏远起来。

赵氏一直带着子女住在新民府，有一年带着二儿子张学铭来奉天探亲。其他家人对她都很尊重，唯有五太太寿夫人言语怠慢，不亲自来问候，而以自己的母亲王老太太代替。王老太太以前在妓院做老鸨，她倚仗着女儿受到张作霖宠爱，言语上没规没矩，令赵氏很是生气，感觉自己唯一能够聊以慰藉的正室身份也受到了挑战。

在几个儿女中，张作霖又特别不喜欢张学铭。那还是张作霖做统领的时候，有一年，张府的看门人午睡做梦，突然梦见一个小喇嘛跑进院里。看门人醒来后将梦境当成真的，就跑到院里面去追，正好遇见了张作霖。张作霖问他：“你跑进来做什么？”看门人就说如此如此，张作霖骂道：“胡说，你做梦吧！”

就在此时，赵氏生下了张学铭。这使张作霖吃了一惊，原来他早年办“保险队”时，曾枪杀过一个充作喽啰的小喇嘛。张作霖是个比较迷信的人，他认为是死去的小喇嘛要进行报复，所以投胎转世变成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便恨恨地骂道：“这小子，找我算账来了。”

那一年赵氏携子来奉天，母子住外间，张作霖住里间。张学铭晚上哭闹，把张作霖吵醒了。张作霖就从里间跑出来，把张学铭给打了一顿。赵氏触景生情，气恨交加，她对张作霖说了一句：“我的孩子我会管！”第二天便赌气带着儿子返回新民府，回去后没过多久就病死了，死时年仅三十八岁。

赵氏性格异常刚烈。病危时，张作霖前去探望，赵氏只是在看到儿子张学良时掉了几滴眼泪，但至死都不肯原谅丈夫，也不开口和他说一句话。

没了赵氏这个贤内助，张作霖和他的结义兄弟一旦闹僵，便再无人可以从中转圜了。张作霖这时也已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几次派自己的夫人和张学良到汤处请汤，但汤都避而不来。

在对待王永江一事上，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人原本都和汤玉麟穿一条裤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反对张作霖。现在一看，汤玉麟真的要拉起架子和张作霖干了，又都齐刷刷地站到了张作霖一边。就在张作霖和汤玉麟吵翻的第二天，孙烈臣主动对张作霖说：“我打算找阁忱（汤玉麟字阁忱）打打圆场。”张作霖求之不得，连忙说：“可以。”

孙烈臣见到汤玉麟后，竭力劝说他打消辞职的念头，与张作霖重归于好。汤玉麟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辞不辞职都不能找他，看他

能把我怎么样！”

谈话间，孙烈臣从怀中掏烟盒。汤玉麟一看，还以为他是要取枪对自己不利，当即喝问道：“你打算怎的？”而后发现孙烈臣只是掏烟盒，汤玉麟这才放松下来，但仍不肯听从规劝。

孙烈臣不得要领，继他之后，吴俊升、马龙潭也来调停，不过依旧归于无效。

听说张作霖为了他和汤玉麟闹得天翻地覆，“家务”不和，王永江深感内疚和无奈，便直接回了家乡，同时派他的秘书将一封辞呈送交张作霖。

张作霖的态度是立场不变，维护王永江到底，他让秘书许泮香转告王永江：“王处长要辞职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绝对不准。此端万不可开，此风万不可长。如果我部下的武将看谁不顺眼就闹，一闹我就把人家去掉，那太不像话。”

见许泮香还要替王永江请辞，张作霖不由分说：“说什么我也不准王处长辞职，快请他回来。事过之后，随他尊便。”

事实上，此时张作霖所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为防患于未然，他不得不调集部队，远远地对汤玉麟的第五十三旅旅部进行包围监视，汤玉麟不甘示弱，也在门前筑起了防御工事，随时准备与张作霖硬拼。奉天城里由此谣言四起，人人为之惶恐不安。地方团体急忙派代表求见张作霖，请求不要在省城内打仗，以免殃及池鱼。

身为一省之长，张作霖没有理由拒绝代表的要求，于是他点头应允，随后便下令包围部队撤去一面，让五十三旅部移防新民。

在与张作霖相持不下之际，汤玉麟的外甥、营长刘景双曾给他出主意，说如果张作霖不让步，就先出兵打日本的车站，惹起中日外交纠纷，从而使张作霖在现在的位置上干不成。

汤玉麟尽管没多少头脑，但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便没有同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汤玉麟与张作霖的争执主要还是出于意气用事，而没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现在张作霖让他到新民去，汤玉麟考虑一者可以免受包围，二者还能依托北镇的冯麟阁作为后盾，所以也就依言带着随从离开奉天，到新民去了。

四面楚歌

汤玉麟一走，省城人心安定下来。当然只要汤玉麟一天不改变态度，张作霖的心还是不安，他决定用多少的兄弟情谊来打动汤玉麟，给对方写一封信。

张作霖的嘴皮子利索，给军士们讲话常常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中间滔滔不绝，言之成章。可是要让他把这些口水大白话整理成有腔调的白话文，那就作了难，所以一般情况下，张作霖都是口述大意，然后由文案执笔。在他的授意下，秘书给汤玉麟写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信中说他和汤玉麟作为十余年患难与共的老弟兄，千万不要因为几句不投机的话便割袍断交。

信写得可谓是真情意切、感人至深，但汤玉麟最想了解的信息，即如何处置王永江，却一个字都未提及。汤玉麟也不傻，知道张作霖还是要死保王永江，一想到这个，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对张作霖的信来了个置之不理。

事态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往更棘手的方向发展。见汤玉麟率部出走新民，人在北镇的冯麟阁认为有机可乘，遂由暗助转向明帮，他全力支持汤玉麟的对抗行动，并向张作霖提出，由他本人兼任奉天省长（袁世凯死后，巡按使已改称省长），由汤玉麟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冯麟阁还威胁张作霖，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他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冯麟阁撑腰，汤玉麟气势大增。他也假借第二十七师全体官兵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对张作霖提出了控告。

处于如此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下，张作霖被迫使出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宣称会将省长和二十七师师长让出，只担任督军（袁世凯死后，各省将军也都改称督军）。可是这种表面的让步并没能如其所愿地换来妥协。汤玉麟在新民的驻兵为刘景双营，营长刘景双的火气比汤玉麟还大，他对汤玉麟说："我帮助您干，将来万不得已咱们再进山。"汤玉麟听从其言，除派刘景双到彰武、阜新一带招募"胡子"外，又派人潜入省城四处捣乱。

冯麟阁所部集中于北镇，留在省城的人不多，但他们也暗中策动二十七师的人反张，而且策反了好几个人。当时张作霖已经掌握了被策反者的名单，有人建议将这几个人监视起来，张作霖反而镇静下来，他说："用不着，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张作霖在督军署召集全师营以上将领会议。身为团长的张景惠首先发言说："我们今天开会，对于这种局面要表明个人的态度。"炮兵第二营营长阚朝玺随后站起身问道："我们营长级的小官能否说话？"

大家说："凡出席的人皆可随意发言，你说吧。"于是阚朝玺说："卫国保民是我们军人职责，若是因为闹意见彼此对立，打起来不但殃

民，而且误国，是我们军人莫大的耻辱。”由此出发，他认为：“张将军没有做误国殃民的事，我们应该拥护他，况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在汤玉麟这件事的态度上，阚朝玺主张：“至于汤旅长辞职不辞职，是个人的事，没有多大问题。如他有轨外行动，或者有人借此活动牵及大局，就应绳之以法，我就请命讨伐他！”

阚朝玺一番慷慨之词，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随声附和：“阚子珍（阚朝玺字子珍）说得好说得对。”

按照阚朝玺的提议，会上形成了决议案，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决议案上签名盖章。签名盖章的人里面中有许多是汤玉麟五十三旅的团营长，这表明汤玉麟因为行动过激，已失去多数军官的支持。而后，张景惠、张作相又联系全师官兵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揭露以前给中央发去的所谓控告张作霖的电报，均系汤玉麟所捏造，现全师官兵一致拥护张作霖。张作霖以一个近似于冒险的举动（召开全师会议），重新团结了内部，使汤玉麟在二十七师中陷入孤立。

这时吴俊升也赶到奉天，他向张作霖表示：“若大帅想打，俊升带队打前敌，我去揍这些兔羔子去。”张作霖闻言大喜过望：“大哥，您把队伍集中候命吧。”

形势转瞬之间便发生了变化，汤玉麟一看处境不利，马上决定离开新民去北镇投奔冯麟阁。张作霖接到情报后，忙派张景惠等人去做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劝冯麟阁不要离开新民，但当张景惠等人赶到新民时，冯麟阁已经到达了北镇。

汤玉麟直接与冯麟阁合流，对张作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急派邹芬团和阚朝玺炮兵营进驻新民，以加强对北镇方面的防卫，也

就在这个时候，总统黎元洪派出的一名特使也来到新民，要求面见冯麟阁。

密电

自从和张作霖有了隔阂后，冯麟阁即派白运昌充任二十八师驻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联络北京政府高层。白运昌常给冯麟阁发电报，报告各方面的接洽情形，冯麟阁也常有复电给白运昌。

北京没有直达北镇的通信线路，这些往来电报都须由奉天电报局转拍给北镇电报局，而奉天电报局局长吕永恩乃张作霖所派，也就是说是张作霖的人，他总是先将这些电报译出，拿给张作霖看过之后再拍转。正是通过这些电报，张作霖了解到冯麟阁与黎元洪的关系比较密切，对此早就留了心眼。

黎元洪支持冯麟阁，当然也想拉拢汤玉麟。只是他对于汤玉麟退出新民一事并不知晓，所以才会派特使带着自己的亲笔信来新民找汤玉麟。

邹芬、阚朝玺知道特使来新民的目的，又得知他先前并没有见过汤玉麟，于是临时决定设个圈套，将黎元洪的亲笔信骗到手。编排好之后，阚朝玺就对特使说："我带您去见我们的汤旅长。"

假称的"汤旅长"由邹芬冒充，他装模作样地接见特使，并收下了信件。特使当面转达了黎元洪的意思："大总统将来要借重您，二十七师的事情请您多负点责任。""汤旅长"顺着他的话回答："一切事我会

随时与冯帮办（冯麟阁）联系，请您回去转禀大总统放心。因恐沿路检查与您不方便，我不写回信啦。”

特使走后，阚朝玺连夜把黎元洪的信件送到奉天交给张作霖。张作霖写了一封信，连同黎元洪的信件一齐送给自己的驻京代表曾有翼，并让曾有翼赶紧在中央进行周旋。

曾有翼另有一个身份是国会议员。在当时的国会中，东北籍国会议员占有六十六席，若集体发力，在政治上能够起到相当大的影响。张作霖很早就授意曾有翼以同乡名义，将他们组织起来。曾有翼于是奉命成立了一个叫尚友会的党派，主要用于吸纳东北籍议员。

张作霖每月给尚友会发一千元经费，负责会内事务的曾有翼很快就感到经费不足。正好国务总理段祺瑞对国会各党各派很重视，多有经费补助，而发放经费的负责人是段祺瑞的幕僚靳云鹏。曾有翼便通过中间人介绍与靳云鹏结识，从而又从段祺瑞那里得到了每月五百元的补助款。从此，尚友会或者说是张作霖就与段祺瑞发生了关系。

接到张作霖的指示后，曾有翼立即拜访靳云鹏，向靳云鹏详细说明了汤旅“叛变”以及冯麟阁联合汤玉麟意图倒张的经过情形。当着靳云鹏的面，曾有翼表示张作霖绝对服从中央，但现正处于危难之中，还得请中央设法消弭战端。

靳云鹏听完后说事关重大，需要请示段祺瑞裁决，结果如何，只能明天再来听信。

原来那时北京政府内部也分成对立的两派，即所谓的“府院之争”，其中“府”是指黎元洪的总统府，“院”是指段祺瑞的国务院。两派在各方面都不对付，下面一有事就对着干。段祺瑞听了靳云鹏的转

述，尤其是读完张作霖送往北京的那两封信后，果断决定支持张作霖。

第二天，靳云鹏即向曾有翼报喜：政府已经电令张作霖、冯麟阁各守原防，不准擅自行动。如有争执事件，应呈报中央，听候解决。

靳云鹏信心满满地向曾有翼保证，有了这个政府电令，冯麟阁的二十八师绝不敢轻动，而冯麟阁不动，汤玉麟也就不成问题了。

事实上，段祺瑞在下发电令的同时，还动员了归其控制的第九师、第十三师，要求协助张作霖戡乱。此事很快传到白运昌耳中，他急忙向北镇冯麟阁发去十万火急的密电，谓：“段助张两师已动员，我方对汤事千万勿加入，千万勿加入为要。”

这封密电和以前的电报一样，首先被奉天电报局送交张作霖，张作霖看后又让电报局照常转发给冯麟阁。冯麟阁看到电报傻了眼，如果说对于政府电令他尚可以阳奉阴违，那两个协助戡乱的师他可不敢小觑。在明知已失去胜算的情况下，他赶紧中途取消与汤玉麟合谋驱张的计划。

诚如靳云鹏所言，冯麟阁不动，汤玉麟也就不成问题。张作霖传令撤销汤玉麟五十三旅旅长一职，由邹芬代理，被其带走的部队听候改编。

汤玉麟在北镇也待不下去了，只能去徐州投奔张勋。他的外甥、部下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刘景双带着数十人准备到南方投奔革命党，结果还未登船，就在营口被张作霖的部队逮捕，之后全部被解至省城处死。

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可能让张作霖阴沟里翻船的特大风波终告平息，企图与张作霖作对的两个人，一个在成为光杆司令后远走他乡，另一个虽然实力未受损伤，但也已偃旗息鼓，暂时不再能够与张作霖继续角力。

遭遇此次挫败后，冯麟阁一度心情沮丧，意志消沉，长期蜗居于北镇无所作为。其间，北京政府曾拟定他为黑龙江省督办，但又因时局不稳而作罢。

1917年6月，张勋密谋复辟。张勋与张作霖本是老朋友，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张作霖认为张勋的复辟计划风险太大，一直持观望态度。这时袁金铠给他出主意，说为什么不让冯麟阁替咱们去蹚这趟浑水呢?

“冯麟阁因大帅升任奉天将军，时有不平之色，久恐生变，须早为计，”袁金铠认为现在就到了设计的时候，“莫若令其（指冯麟阁）入京，暗中参加复辟，事成大帅不失戴翌（即襄助复辟）之功，不成则以冯当之。”

在袁金铠看来，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彻底的话，可使卧榻之侧从此免去他人酣睡，即便就眼前来讲，亦可起到调虎离山的作用。

张作霖认为袁金铠所言极是，于是就同冯麟阁商量，拟委任他为奉天驻京全权代表，与张勋接洽办理奉军问题，也就是允许他打着驻京代表的旗号，暗中从事复辟活动。

同一时期，张勋实际已派人运动冯麟阁参加复辟，并答应事成之后升其为东三省总督。这边张作霖不反对还支持，那边张勋又提出了丰厚的条件，冯麟阁想都没仔细想一想，就高兴地答应下来。

6月20日，在三十名卫士的护送下，冯麟阁以奉天全权代表的身份进京。进京后，他立即拜见张勋，支持复辟并表示愿为其效忠，接着又下令调二十八师部分官兵进京“赞襄复辟，保卫皇室”。

在入宫进谒复辟的小皇帝溥仪时，冯麟阁对溥仪行三拜九叩大礼，溥仪赏赐他“穿黄马褂，紫金城内骑马，御卫大臣头衔”。虽然都是虚衔，但也已经让冯麟阁乐得合不拢嘴了。

在此期间，张作霖一直是见机行事，随风转舵。张勋复辟后封他为奉天巡抚，他不仅来者不拒，表示谢恩，还通令奉天省城各机关一律悬挂龙旗，以庆祝溥仪登基。与此同时，他仍在往来公文中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字号，以便万一复辟失败可以留有余地。

就在张勋、冯麟阁等人踌躇满志、飘飘然的时候，风云突变，已经下野的段祺瑞通电全国，打起了反对复辟、兴师讨逆的大旗。自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后，云集在京津一带的约五万讨逆军，迅速对张勋形成了两路夹击的态势。

一看这个情况，张作霖料定张勋必败无疑，于是一边立刻通电支持讨逆，一边竭力为自己之前拥护复辟的一些言论举止洗白。他后来曾一再对外界声称：“说我要复辟，那全是报纸放屁！我张作霖在前清是个小小的武官，并没有受过什么样浩荡皇恩，我又何必复辟？而且就算前清于我有恩，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报纸上的浑诌胡扯，不可听信。”

被张作霖骂为“放屁”的报纸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盛京时报》就讽刺说，张作霖“以高骑墙头为其本领，嗣见何方强盛，转而去彼就此”。

不过结果也正如张作霖所料，张勋的“辫子军”根本就顶不住讨逆军的进攻，这场复辟闹剧才演了十二天便狼狈收场。冯麟阁傻了眼，他原先的算计是，自己若能在这个时候参加复辟，是立了勤王救驾之功，值得干一下，但唯独忘了这背后的风险会有多大——若论当年闯荡江湖的资历，冯麟阁足称张作霖的前辈，但要比观察时局的能力，张作霖这个晚辈可就要甩他好几条街了。

预感到一场厄运即将到来，冯麟阁只好厚着脸皮向张作霖求救。张作霖复电：“永居北京甚为危险，速从陆路沿长城单骑来归，当于适当地点出迎，乘火车归来危险。”

张作霖脾气暴躁、杀伐果敢，但他对昔日兄弟同人乃至部下，又有着很温情感性的一面，所以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这些人才会至死不渝地跟随着他，这就是所谓的“人畏其威而怀其惠”。对于冯麟阁，他也没有因为对方曾是苦苦相逼的政敌而落井下石，复电中所设计的逃跑路线，都是真心实意地在替冯麟阁考虑。

可是冯麟阁的左右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张作霖的话应该反着看，比如张作霖说陆路安全，可能陆路反而不安全，张作霖说乘火车危险，可能乘火车反而不危险。

听左右的，还是听张作霖的？冯麟阁选了前者。他和旅长张海鹏及下属官兵两百多人穿上便服，乘火车出京东行。当火车行驶至天津车站时，被讨逆军的侦缉人员发现，冯麟阁随即落网。

张作霖接到北京电报，得知冯麟阁被捕，赶紧联名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军官，致电段祺瑞，集体为冯麟阁求情。冯麟阁因此获得赦免，但原先所有的官职和勋位都已被剥夺，可谓从天上一下子跌到了地上。

奉天王

沦落为平民的冯麟阁暂时住在北京棉花胡同，生活非常贫困。后来经过老部下的斡旋，他才与张作霖重归于好，并得以重返奉天。张作霖保他做了三陵的副都统，专司奉天三家皇陵的守护以及有关地亩管理等事宜，虽无实权，但颜面上算过得去，而且每年收入也非常可观，晚年生活可以无忧。

冯麟阁仍然很少去奉天见张作霖，不过只要去了，一定会事先在长袍马褂的袖子中藏一支枪。有一次，枪从袖子里掉了下来，被张作霖看到了，他愣了愣神，然后对冯麟阁说："大哥，你到我这还带这个？"经过那次之后，冯麟阁就不好意思再带枪了。

除冯麟阁外，汤玉麟也已与张作霖言归于好。在暂无实缺的情况下，汤玉麟被任命为军署高等顾问，每月可以得到五百大洋的津贴。以后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身边急需人才，又特别提拔他为奉军侦察队长，并派往北京活动，为其重新在军界担当实职做铺垫。

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置身于利益场中，张作霖和他这些江湖老兄弟免不了要为此争夺，但他们终究都不会置对方于死地。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当年绿林生涯留给他们的印

迹——就算做不到“江湖中人，义气为重”，也得遵守“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的规矩。

冯麟阁是张作霖在奉天境内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强敌，在其落马后，张作霖先是任命孙烈臣为第二十七师师长，自兼第二十八师师长。后来因为风闻有些人要运动冯麟阁复职，他又将冯麟阁的老部下、旅长汲金纯升为二十八师师长。

汲金纯尽管原来在冯麟阁帐下效力，但对冯麟阁并不服气，还在冯麟阁栽跟头之初，他就已向张作霖靠拢。张作霖做此职务安排，也就意味着冯麟阁完全没有复职的可能了。

在与冯麟阁角力的过程中，吴俊升表面标榜中立，实际始终在为张作霖鞍前马后地效力。为了对他进行酬谢，张作霖特将吴俊升的后路巡防营与骑兵第二旅进行合并，创立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吴俊升非常感激张作霖的提拔，当着面对张作霖表示“虽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心甘情愿为张作霖继续舍命打拼。

至此，奉天军政大权为张作霖所一手包揽。有史家评论道：“作霖以一匹夫，起于草泽，啸聚十数不逞之徒，振臂一呼，竟得据辽东……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往前追溯，和张作霖情况相似的，仅有东汉末年的公孙度和明末的李成梁。后者也均为辽东土著，不过公孙度属于完全的封建割据，且占据的地域也较小，只有李成梁以臣子身份完全据有辽东，“隐然如一强藩”，和张作霖最为接近。有人甚至做出假设，认为如果当初袁世凯破格封张作霖为公侯，使之代段芝贵节制东三省，则可大得其助，洪宪帝制也许就不会失败得那么快了。还有人说，要是张勋复辟时也

以东三省总督一职授予张作霖，充分满足其愿望，那么他的复辟之举也不至于昙花一现。这些假设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了张作霖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身为“奉天王”，在奉天省这块地方，可以说已无人能与张作霖争锋，能让他伤神的只剩下了财政问题。说起奉天财政，其实也就是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时好过两年，至赵尔巽二次督奉，出任东三省总督时，连他都得从日本银行借钱度日了。接下来的两任奉督，无论张锡銮还是段芝贵，面对这个问题同样都是一筹莫展，拿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整个奉天省负债累累，每况愈下，除负外债一千万元外，每年还要再亏损二三百万元，开支方面完全靠继续借外债补充。

1916年当张作霖就任盛武将军兼巡按使时，奉天财政已困难至极，当年全省收入一千万元，财政赤字却高达一千三百万元，净亏三百万元，这还没有算欠的那一千万元外债。为此，张作霖在自己就职一个多星期后，即任命幕僚王树翰为奉天财政厅长，对财政进行整顿。

约法一章

危乱之邦偏多人才，从清末到民国，东北动荡不安，但同时期人才也大批涌现，他们与活跃于中原政坛的那些厉害角色相比，可谓毫不逊色。王树翰即为其中之一，他是书吏也即普通文书人员出身，记忆力超强，文章看过一遍之后就能背诵下来，因此很早便以“长于案牍”著称。张作霖督奉之初选贤举能，王树翰自然而然就进入了他的首批幕僚行列。

前东三省总督锡良曾设立奉天清理财政局，王树翰历任科员、科长，从中积累了一定的理财知识和经验。他出任财政厅长后，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针对财政危机提出了“筑堤叠坝”的应急办法。

当时奉天省通行的货币是“现小洋”（一种小面额银币，与被称为“现大洋”的银元相对），与此同时，东三省官银号和奉天省官商合办的兴业银行还发行一种小洋纸币，称为奉票，二者可以随时兑现。由于市场上银价高涨，一些小钱庄看准有便宜可占，便以低价收买奉票，然后再到银号兑换“现小洋”，以便从中渔利。

发现这一情况后，官府赶紧严令取缔，不准商民持票挤兑。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不法商人自己不敢明目张胆出头搞，就买通或与日本人合伙，让日本人代替他们去进行兑换，从而掀起了新的挤兑风潮。

当挤兑风潮爆发时，官银号和兴业银行紧急设法，委托驻天津官银分号在当地收购“现小洋”，运到奉天来应付这种兑换，但仍然供不应求，紧张得很。几次一来，官银号穷于应付，纸币与银币之间的差价也越拉越大，奉票价格已跌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

王树翰认为，只有首先稳定奉票价格，财政危机才有缓解的可能。从1916年6月12日起，他按照“筑堤叠坝”之法，对奉天金融市场实施行政干预，下令奉票每日公兑以四万元为限。这样一来，就算是日本人来挤兑，忙上一天，也只能零零散散地兑到几万元。

哪怕是一日兑几万元，那也还是挤兑，何况日本人几乎个个都是劳碌命，人家积少成多，不嫌麻烦。张作霖于是亲自上阵，他拿出自

己的看家本领，派人暗中对兑换“现小洋”的日本人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查明有好些日本人都是由银钱庄事先买通的。让张作霖感到震惊的是，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也是参与者之一，这哥们儿三天两头向本银行挂借两三万元纸币，随后就拿去让日本人替他兑换“现小洋”，得利后再把借款还上。据说他本人从中得到的好处不下十几万元。

张作霖怒不可遏，马上把刘鸣岐叫来，对他说：“现在财政秩序混乱，外面流言四起，所以我想借先生一样东西用用。”

刘鸣岐不知东窗事发，还稀里糊涂地问要借什么，张作霖的一句话顿时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今天要借你的脑袋用用！”

听到张作霖要杀他，刘鸣岐连喊冤枉。张作霖说：“如果你觉得冤枉，可以跟阎王爷那里告状去，反正要我饶了你是不可能的。”说完之后，即让人将刘鸣岐拉出枪毙。

其他几家涉案的银钱庄人员也全部被抓了起来，张作霖下令严加审讯，不得宽纵。作为前清的过来人，张作霖蹲过冤狱，深知官府办案方面的黑幕。当着文武官员的面，他告诫几个办案人员说：“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有约法一章，那就是你们几个必须好好办事，否则的话，我一定送你们一个字。”张作霖虽没有明言是哪一个字，但大家都能听出是“毙”，一时人人为之悚然。

查证清楚后，文案把所有审讯记录抱到堂上，并请示张作霖处理意见。张作霖略加沉吟，就随手拿起笔，在上面批了“死”字。文案大惊，连忙争辩说这些人虽然犯了罪，但罪不至死。张作霖笑了笑：“我在军中杀人如麻，杀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你们这些书生要是看

到了，还不得吓死？此本常事，不要再啰唆了。”文案还想再说什么，秘书长连忙在旁边示意，让他不要说了。

最后涉案银钱庄的负责人被一律判处死刑，张作霖还特地让银钱庄的伙计以及在钱庄学习生意的人陪绑，在刑场亲眼看着他们的老板或掌柜被枪毙。

经过这次血腥味极重的压制，短时间内，各银钱庄皆噤若寒蝉，无人敢于以身试法，但在其中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却选择了独自兑换“现小洋”，然后熔化成银块进行贩卖。涉及外交纠纷，对待他们又不可能像对待国人那样逮捕法办，为了进行遏制，经省公署批准，官银号和兴业银行遂按银块价格比例，采取多掺铜铸造“现小洋”的方法，以便减少日本人可得之利。

问题是利少不等于完全无利可图，就像肯积少成多地进行挤兑一样，日本人连这一点点薄利也不肯舍弃，致使挤兑活动照旧。张作霖对此很头痛，继王树翰之后，他请出了自己的另一个幕僚、高级顾问于冲汉。

你只管干

于冲汉系前清秀才，其特长是曾留学日本，不仅精通日、俄、朝三国语言，而且对日本的情况很了解，称得上是个“日本通”。张作霖和于冲汉商议对策，决定由侧面入手，通过与日方协商来解决此事。

于冲汉先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约了个见面谈话的时间。见到落合后，于冲汉开口就说：“在奉天，有些贵国人太给你们强

大的日本帝国丢脸了！”

接着，他便把一些日本人如何代中国商人挤兑，以及将“现小洋”化成银块贩卖的事叙述了一遍，最后表示：“此事不但伤及贵国体面，而且贻笑国际列强。张作霖阁下本想直接向贵总领事提出交涉，以取缔这些不法日本人，但怕损及贵国的体面，所以派我来同您协商。”

落合自然要站在其国民利益的立场上。他针锋相对地说，最近有一个“奉天居留民”（即东北的日本移民）某某向领事馆递了一封请愿书，上面写道，中国最近制造的“现小洋”在成色上与先前不同，铜质增多，实有损于日本人的利益。落合还提到，那人还列出了前后的成色化验表，以证明他没有说谎。

落合以此反过来向中方提出交涉。于冲汉听后忍俊不禁，他笑着对落合说：“给贵总领事馆上请求书的这位居留民，恐怕就是违犯中国法律的人。他若不是常常把‘现小洋’化成银块贩卖，怎么能知道这前后成分的不同呢？这无异于是自己在招供。”

落合顿时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于冲汉缓和语气，趁势又说道：“请您帮帮中国的忙，答应我的请求，这对中日亲善是有益的。”

落合也觉得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把中日关系搞僵，从而影响日本在东北的长远利益。经过协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向日本朝鲜银行存放三十万日元，作为兑换“现小洋”的准备金，而手中凡持有奉票的日本商民只要有证明书，可直接到朝鲜银行兑换金票（奉天流行的一种日本纸币，又称老头票，为朝鲜银行发行）。

经过此次协议后，便几乎再没有日本人去兑换“现小洋”了。念及于冲汉在办理此次交涉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张作霖特委任他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以酬其功。

挤兑没有了，原先混乱的金融秩序也得到整顿，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措施手段有如扬汤止沸，都无法使财政危机得到根本解决。在王树翰任职期间，由于无法维持开支，只得仍向朝鲜银行奉天支店借了两次总共两百万元的款。

据说古代鲧治水时使用了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最后历时九年而以失败告终。“筑堤叠坝”似乎也与此类似，弄了个治标不治本，到头一场空的结果。王树翰深感自己理财无方，加上与张作霖出现了不同意见，遂向张作霖提请辞职。

收下王树翰的辞呈，张作霖也挺无奈，毕竟理财跟做“胡子”不是一码事，就算你再舍命再发狠，钱还是不会自动跳到你口袋里。一抬头，正好看到王永江站在面前，他嘀咕了一句：“东北这么大，为什么会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儿？”

说这句话，张作霖完全心中无底。王永江先前只是在警政方面富有经验并做出成绩，试想一下，如果连王树翰那样的理政专家都束手无策，你让一个新手把脉会诊，怎么可能马上就查出病因？

未料王永江脸上未露出丝毫难色，他对张作霖说：“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指张作霖，虽然巡阅使已改为省长，但王永江仍沿用了旧称）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只是怕有人说闲话。”

对王永江把话说到如此之满，张作霖颇感惊疑，然而在整理财政俨然成为烫手山芋的情况下，王永江敢于接过重任，已令他很是满意，于是很爽快地向王永江做出保证："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

王永江虽没有在财政方面当差的履历，但他做过税捐局长，对税务利弊知之甚详，通过调查，他更认定财政紊乱的根子还是在税务环节出了问题，所以理财亦以整理税务为中心。由此入手，他对税务系统的吏治进行了大力整顿，将那些惯于浑水摸鱼、到处营私的税捐局长尽行撤换。

王永江同时下令清丈土地，针对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生产状况定出实征税额。对于占有土地的富户和一般农民而言，清丈土地是他们普遍不太愿意接受的，自然立刻引起了一片抱怨之声。曾有翼此时已从北京返回奉天任清丈局局长，他字子敬，便被依谐音骂为"整之净"，王永江本人字岷源，则依谐音被骂为"万民怨"。

尽管周围怨声四起，但既然事先得到了张作霖会鼎力支持的承诺，王永江便毫不动摇，顶着压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改革。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少报的耕地面积均被一一查出，既增加了政府的税捐，也进一步杜绝了过去县知事（即县长）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之弊。

报恩不报仇

在东北政界，人们将王永江、王树翰并称为"二王"，实际上王树翰尚视王永江为后起之辈，因为他任厅长时，王永江还是地方上的税捐局长，可以算作他的部属。然而终其一生，王树翰的成就却远不如王永江，这不能不说是性格使然。王树翰的长处是谨慎小心，且善于

观察细枝末节，缺点是气魄不大，气象窘迫，不像王永江那样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换句话说，即便王树翰找对症结，他也不可能如此大刀阔斧，所以有人评价王树翰只是一个“吏才”，意谓他以吏起家，非宰辅之器。

王永江并不是只会用蛮力，他也善使巧劲，尤其知道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他规定每个税捐局只要超额完成征收税额，就可以从超出部分中提出若干作为奖金，多收多提，从局长到科员人人有份，财政厅的人员亦有提成。在此政策的激励下，人人工作卖力，税捐局长也不用再偷偷摸摸虚报贪污了，因为只要干得出色，当年光奖金就可以拿好几万，而一个普通财政厅人员每年拿到的奖金也往往能超过他的一半薪水。

王永江除弊虽严，但只要哪一项规定有碍于政府收入，即便有人认为是陋规弊政，他仍然会网开一面。比如商人持税单将货品由甲地运至乙地，中间经过各税捐局的关卡时，要进行查验，查验完成后关卡人员要在税单上盖一个“验讫”的戳，并征收若干费用，这笔费用叫作验讫费。

验讫费不是税种，财政厅也有一些人主张按陋规废除，但王永江坚决反对，理由也十分简单明了：若是裁去此费，哪个关卡人员还肯在黑夜冬日跑出来，眼巴巴地等着商人的车辆通过并进行查验呢？

王永江认为税务系统环环相扣，相关人员稍有懈怠，偷漏必多，因此就算验讫费被指责为“弊政”，只要有存在的必要，“虽弊不除”。

捐税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实业。王永江规定官有财产中凡有民营必要的，应速交民营，以免造成损失，在其任内，他废止了省内没有收

益希望的官营事业，同时将收益情况良好的矿山开采权完全收归官营。除此之外，他还广开财源，一面奖励移民开垦荒地，一面扩张商业。至1917年，奉天省所拥有的商会、会董、会员数量都超过了吉黑两省，为东三省之冠。

张作霖以王永江接替王树翰，本来是抱着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不料王永江居然还是一位理财能手。过去奉天省历任执政者几经努力，尚不能根本解决财政问题，他仅用数年就已大功告成。截至1920年冬，除将所有外债完全还清外，奉天省库尚存一千一百万结余。

奉天省大权在握和财务上的渐渐充裕，令张作霖离“称霸满洲”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常言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发达之后的张作霖不止一次荣归故里，其中就包括回到曾随母亲一起生活过的赵家沟。

当年在赵家沟时，张作霖曾被官府冤枉为打劫官饷的大盗，差点人头落地。如今才知道这背后其实是还被人摆了一道，原来张氏兄弟那时在外经常打架斗殴，因此得罪了二道沟子村的李老恒，正是李老恒向官府控告，说张氏兄弟“通匪”，从而让张作霖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

听说张作霖又回到了赵家沟，李老恒深恐他翻起前账，记恨前嫌，于是赶紧带着老伴到张的行辕负荆请罪。见到李老恒，张作霖一笑置之，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恨，你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而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他又拿出两百元钱送给李老恒夫妇，并且安慰他们：“你们老两口不要害怕，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

在张作霖的青少年时代，高坎对他影响甚大，也是他必回的“第二故乡”。听说张作霖要回来，由街上的头面人物牵头，高坎人便在凤凰甸村到高坎镇之间修了一条又宽又平的路。当天，张作霖率领一个卫队，一行三四十人踏上归乡之旅，当来到凤凰甸时，他特地命令随从下马，除他自己外一律步行进入高坎。他还不忘嘱咐：“到高坎不准碰一草一木，不准有任何不轨行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张作霖来到高坎街上，众人迎上前来，毕恭毕敬。张作霖很客气地与大家一一相见，但绝口不提过去的事，概因当年有很多高坎人得罪过他，他怕在公众场面突然提起别人会尴尬和为难。之后，他才单独把几个和他有过恩怨的高坎人请到自己的会客室，被邀的几个人中，有曾把他绑在大榆树上，准备晚上活活冻死的于六，有拎着口杀猪刀，追得他满大街乱跑的于二爷，还有因讨债不成扇过他两耳光的黄木匠。这些人被请去时个个心情忐忑，未料张作霖不咎既往，以诚相待，并且很恳切地对他们说：“咱们哥们儿，年轻时闹过摩擦，算个什么？早忘了，我早忘了。老实说，没你们打我，我还没有今天。”

仇早已忘，恩则始终牢记在心。张作霖这次回高坎，一一看望了那些曾帮助过他的干爹干妈及其乡亲。回忆在高坎开大车店的常掌柜几次救过自己的性命，直至最后离开高坎，也还是常掌柜送的行，张作霖专门让人赶到常家，把常掌柜请了过来。见面之后，他给老爷子敬了个军礼，表现得分外亲热。常掌柜看了半天，才把张作霖给认出来，于是急忙上前拉住张作霖的手：“老三（张作霖在家中排行老三），你还真出息了，我以为你早死了呢！”

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自己出钱，将街上的大客店和一家当铺一并买下来，让常掌柜做经理，常家因此拥有了长工三四十人，土地二百五十多亩，成了高坎一带的富户。考虑到常掌柜已经年迈，儿子又少

不更事，张作霖就让自己岳父那边的人过来管事。常掌柜不用烦心，只需坐享股金即可，晚年生活十分安逸富足。

对待“漂母”孙老太太也是这样，张作霖为了让老太太安心，把老太太的儿子也带回奉天安排事做。后来老太太过世，他还派人专程赶回，为其送钱立碑。

张作霖回乡之行很受赞誉，人们都说：“张作霖有度量，报恩不报仇。”

第六章　明人不做暗事

包括张作霖在内，每一任奉督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在东北保持并发展个人的权势，日本轻易得罪不起。

说起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不提到日俄战争。按照战争结束时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除俄国之前从中国租借的旅顺、大连被转租给日本外，俄国还将中东铁路南段（也即南满铁路）以及沿线的行政、司法、警察及驻军权转让给日本。这些权益被日本统称为“满洲特权”，日本人对此非常在意，认为是他们花了数十万人命才从俄国老毛子手中抢得的战果。

《朴次茅斯和约》达成时间不久，日本军政界就发生了激烈争论。以“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为代表的一批军人主张，应当以战争期间设立的“军政署”为基础，尽量扩大“满洲特权”，而以伊藤博文、西园寺等人为代表的政坛元老们则认为东北毕竟还是中国领土，不顾条件地霸王硬上弓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他们的意见是只要维护好既有的“满洲特权”即可，没必要扩大。

当时元老派对日本军队还拥有很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连儿玉这样在日俄战争中打出名堂的军人也不得不服，以后“军政署”便被全部关闭。日本陆军当局虽在“军政署”问题上败给了元老派，但一些人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仍企图通过“满蒙独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顾问

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有人宣传说中国虽然要发生革命，但与日本利益相关的“满洲”万万不能有革命，“满洲有张作霖、冯麟阁、张景惠等绿林头目，如果领导这些人，令满洲独立，则可防止革命”。

一个叫町野武马的日本政客听了这话后，就赶往奉天去扶植张作霖，其间共在张作霖家住了一个月之久。与此同时，另一群日本人也在奉天上蹿下跳，为首者名叫川岛浪速，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据说他在日本陆军当过翻译官。川岛这些人的胃口更大，他们不仅想让“满洲独立”，内蒙也在其计划之内，此即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

在“满洲独立”上，町野与川岛有着共同点，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町野要抬出的是张作霖，川岛寄予希望的却是宗社党，他与宗社党骨干肃亲王善耆关系密切，善耆甚至还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给川岛做了养女，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大间谍川岛芳子。

大家都要抢生意做，自然就会产生冲突，川岛一群人中甚至有主张要杀掉町野的。有一天，町野偶然在奉天碰到了他们，他们对町野说：“你不要妨害我们的工作。”町野矢口否认：“我并不是来妨害你们的。”

“如果是那样，你能不能帮我们？”

“我不干办不到的事情，对不起，我先走一步。”

就这样，町野被挤出了奉天，但川岛及宗社党也未能成事，“满蒙独立运动”很快便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民国登场，袁世凯所任命的奉督又成了日方关注的对象。从张锡銮督奉起，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在他身边设置日籍顾问，起初张锡銮当然不愿意，但是吃不消对方一再逼迫，在答应只需付薪水，无任何其他附加条件的前提下，才同意雇用町野等日本人为军事顾问。

袁世凯在任末期，中日围绕“二十一条”进行交涉，战事一触即发，因为害怕中日开战，东北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附属地（日本对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称呼）。身为军事顾问的町野接到上级的训令，告诉他一旦发生战争，必须搬进张锡銮家，“俘获张锡銮，不要让他逃跑，使其统治满洲”。于是他就真的跑到张锡銮家，说要搬进去住，张锡銮问为什么，町野也不隐瞒，当下就把训令的内容告诉给了他。

张锡銮原本对町野并不信任，但町野能够实话实说，而且还要力保他，让他一下子对这个日本顾问有了好感。自此以后，日本顾问便都可以住在督军公署，和督军的家人一样出入起居了。

当时附属地内中日双方的军民经常发生冲突，张锡銮为此很头疼，就试探着问町野：“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冲突？”町野一拍胸脯：“这很简单，只要我出去走个十来天，一定可以办到。”

町野从张锡銮领了三万元经费，然后前往各附属地，每到一个附属地，就宴请和招待中日双方的要员，协调彼此间的关系。经过他的一番斡旋，冲突事件果然大为减少。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人就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但清国人对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之不治之症。”民国其实也没比清国好上多少，某些方面可能还更差。倒是日本的政客除了不顾一

切要达到其政治目的外，很少沾染行贿受贿的恶习。町野对于经费就非常节省，有时在活动中还自掏腰包，十多天过去，一共只花了四千多块钱，其余都交还了会计，这一点无疑也增加了包括张锡銮在内的中方官员对他的好感。

张锡銮去职后，町野闲了一段时间，直到张作霖就任奉天省督军，他被派去给张作霖当顾问。

当年町野期待张作霖的两件事，一为赶走革命党人，一为发起“满洲独立”，前面一项张作霖做了，后面一项却没做。在町野看来，张作霖其实是“接受了革命军的任务，做它的师长（指担任二十七师师长）”，背离了初衷，因此拒绝去见张作霖，还说：“我不想到绿林出身、没有大志的人那里去。”

张作霖深知对付日本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跟町野相处过一段时间，又看到町野在替张锡銮方面确实肯出力且见成效，便很希望这个日本人能去帮他，即便对方说了不好听的话亦不以为意。

在张作霖的坚持下，町野来到督军府，不过当着张作霖的面，还是冷笑着讥讽他没出息。为了把町野留住，张作霖当场表示他是有大志的人，而且要么不立志，要立志就干到底。按照町野的说法，张作霖和他约定了要“共生死，取天下”，这样他才最终同意给张作霖当顾问。

此时对在促使“满蒙独立”过程中究竟应培植、使用哪一类人，日本内部的意见仍不一致。特别是在民国建立后，宗社党在东京重新成立，善耆、川岛等人继续试图复辟，他们通过游说，将仇恨汉人，向往“蒙古独立”的蒙人巴布扎布也拉进了宗社党。刚刚上台的大隈内阁

见有机可乘，便开始支持军方干掉张作霖，以便乘乱造成“满蒙独立国”。于是在袁世凯称帝期间，日本一边派人到华南去出钱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反袁力量，一边派现役联队长土井市之进大佐等人进入东北，计划伺机暗杀张作霖。

1916年5月，在奉天满铁附属地内，土井召集日方有关军职人员开会，具体密商如何干掉张作霖，町野也应邀出席。町野一贯主张扶持张作霖，他认为通过张作霖来实现“满蒙独立”，要比发动没有把握的暗杀和暴动更靠谱。

我头一个不依

尽管遭到町野的极力反对，土井仍选择了将暗杀行动进行到底。5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途中必须经过奉天，张作霖和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同前去迎接。之后，两人分头坐马车离开，就在途经小西边门时，埋伏在那里的杀手突然投出炸弹，当场炸死了五六名警卫——事后矢田察看现场，看到爆炸现场惨不忍睹。他捡到一颗没有爆炸成功的炸弹，拿去给一位日本将军看，那位将军马上辨认出来，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

幸免于难的张作霖见势不好，急忙跳下马车，戴上警卫的帽子，并骑上警卫的马，在马队保护下绕道回署。结果当他们跑到奉天图书馆时，又再次遭到炸弹袭击，由于张作霖策马飞奔，炸弹在其身后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仅仅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

这次未遂的谋刺案在迫使张作霖加强戒备的同时，也增强了他对町野的信任和亲近，因为他很快就得知，町野不仅在土井主持的暗杀会上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且还曾声言：“谁要动张作霖一根毫毛，我头一个不依。”

自此以后，张作霖便把町野视为自己的日籍幕僚兼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主要任务是联络日本朝野各派要人，以争取日本在把他视为“忠实外藩”而不是敌人或障碍的情况下，少找他的麻烦。每次张作霖都依张锡銮例向町野提供三万元交际费，而町野剩余多少，也会把结余下来的钱全部缴还给替张作霖管钱的五太太寿夫人。

可是町野等人在当时只是少数派，大隈内阁的主流意见仍是要建立“满蒙独立国”。在谋刺张作霖的同时，巴布扎布又亲自率部南下，准备攻打奉天城。

就好像当年的陶克陶胡一样，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说，巴布扎布分裂国家，罪在不赦，但因为打着“蒙古独立”的旗号，又使他在部分蒙人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就在巴布扎布部南下途中，不断有蒙古人参军，使其兵力迅速扩充到了三千多人。

蒙军一路上跟奉军打了很多仗，屡屡攻破城池。1916年7月中旬，蒙军进逼洮南，形势十分危急。张作霖闻讯急派吴俊升统兵前往突泉进行阻击，突泉一战，吴俊升肩部受伤，但击毙了蒙军达五百余人，并成功阻击其南下。因在突泉受阻，巴布扎布转而谋攻郑家屯，张作霖立派奉军前往郑家屯进行防守，蒙军只得继续东窜。在此过程中，双方交战多次，蒙军受到重创。

见几条南下路径均被阻住，8月初，巴布扎布指挥蒙军向南满铁路上的要站郭家店开进，欲通过郭家店一举攻下奉天省城。鉴于军情紧急，张作霖要求日本允许奉军经过南满铁路，乘车前往郭家店，但被日本以严守中立为借口予以拒绝。

至此，对于“此次蒙匪南犯确有日本从中计划主持”的背景，张作霖已经十分清楚，也知道对付巴布扎布必须面临可能开罪日本人的风险，但他仍令部队由长春徒步行军至郭家店。

奉军开到郭家店附近后，立即对蒙军进行围追堵截。在十多万奉军的猛烈进攻下，蒙军终于力不能支，最后被迫逃入郭家店据守。正当奉军要对被围的蒙军发动歼灭性攻击时，张作霖突然接到报告，郑家屯爆发了由日军挑起的武装冲突。

事情发生在8月13日当天，直接起因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纠纷：郑家屯的一个儿童误将瓜水泼在了路经此处的日本商人吉本的衣服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吉本想从那名儿童手里买鱼，因儿童嫌他出价太低，不肯出卖），吉本出手打了儿童。当地奉军第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个士兵上前劝解，吉本蛮不讲理，跟士兵扭打起来。

要打架，吉本自然很难从士兵身上占到什么便宜，于是他就恶人先告状，向当地日本警署提出控告。听说中国士兵打了他们的人，日本警察河濑即向其守备队求援。日军守备队队长井上大尉派二十余名士兵随河濑去奉军骑兵团寻仇，当他们走到团部门口时，遭到守门卫兵阻拦。日军用刀砍伤了卫兵，又开枪打死了两名奉军士兵。奉军被迫实施自卫还击，与日军展开枪击，双方互有伤亡，日军共被打死十二人。

段子

张学良晚年回忆父亲的事迹，说张作霖驻军新民府时，当地也驻有日军，两边军营都有人逛妓院，因为一言不合，发生群殴。张作霖的士兵被打死了两个人，张作霖为此火冒三丈，非要对方偿命不可。日军方面自知理亏，便提出给每个被打死的中国兵各赔五百两银子。张作霖不听犹可，一听更火了，过了三天，他也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对方闹上门来，他双手一摊，说那我还是按照前例，一人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

张作霖驻兵新民时没有与日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记载，有据可查的便是郑家屯事件，很可能张学良自己在回忆中把二者混淆了。郑家屯事件爆发时，正值奉军与蒙军激战于郭家店，于是日方就趁机对这一事件进行扩大化，以便转移张作霖的注意力，对已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的蒙军进行掩护。秉承日本参谋本部的旨意，井上先是提出“凡中国军队均须退出城外三十里”，继而照会张作霖，要求驻郑家屯至四平街沿线三十里内的奉军全数撤离。

中国驻军撤离后，日军占据了奉军的所有营房，并非法架设军用电线电话。至1916年8月底，从各方增兵开进郑家屯的日军已达一千五百余人，日本还计划调集八千人开赴郑家屯，其意图显然已不仅限于为蒙军打掩护。有证据表明，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要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东北“门户开放”之际，以军事实力压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并进一步吞并“满蒙”。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十五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对郑家屯事件的背景和日方的真实意图，北京政府最初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以为系偶然发生之冲突，且系地方上事件”，于是命奉天当局直接与日本交涉了结此案。张作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进行交涉，但日本政府拒绝在奉天谈判，他们强硬要求由日本公使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方面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当时袁世凯刚刚去世不久，中日关系尚未完全缓和，如果张作霖处置不当，轻者可能滚鞍落马，乖乖地把位子让给冯麟阁等政敌，重者将导致东三省沦丧，“九一八”事变提前上演。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恐怕不太可能意气用事，更无法轻率地说出“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一类的段子。后者倒与当时流传于东北民间的一些传说相辅相成，这些传说夸大了张作霖与日军对抗的行为，虽然听上去鼓舞人心，其实反倒显得当事人颟顸无知，毕竟国事不是儿戏。

事实上，张作霖既没有任着性子胡来，也没有消极等待，他急令奉天外交人员及郑家屯当地驻军调查事件原委，而后写成报告书送交北京外交部。在外交部对案情还茫然无所知的情况，张作霖提交的报告书不仅避免了自己成为事件的替罪羊，也为中央对日交涉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

在中央出面展开交涉的同时，张作霖也没敢闲着，他一面电致北京政府，请求增兵以备万一，一面派身边的另一名日籍军事顾问菊池武夫到郑家屯进行调查（菊池的军衔为中佐，町野只是少佐，所以由菊池出面）。说是调查，实际是让菊池做调停人，希望能够大事化小，把紧张局面缓和下去。当着菊池的面，日方不惜撕下“中立”伪装，公开出面保护蒙军，他们让菊池给张作霖带话，以奉军“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由，要求奉军立即与蒙军停战，对巴布扎布也勿予追究，否则的话就将施以武力。

听菊池传达日方要求后，张作霖进行了审慎研究。他考虑到，郭家店确属南满铁路附属地，一旦奉军在此处与蒙军大打出手，即便没有郑家屯事件的影响，也很容易给日本人授以口实。为了不使东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他只得下令停战，同时派菊池再次与日方联络，表示同意日方提议，对蒙军不加讨伐，令其安全退回蒙境。

事情到了这一步，似乎张作霖跟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该服软的时候还得服软。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因为他还给心腹部下们另外下了一道绝密命令："令该匪逃出，俟离站较远即行痛剿，免为外人藉口。"

什么意思？你总不能在车站里待一世吧，等你离开郭家店，到远一些的地方我再灭你，那样更干脆，还让日本人说不得闲话！

把柄

从1916年8月19日起，围绕郑家屯事件，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权助展开谈判。谈判期间，张作霖并未袖手旁观，他采取了积极介入的态度。

郑家屯事件缘起的最关键问题，是谁寻衅在先。日方在谈判中恶人先告状，声称武装冲突是因"中国兵发炮挑斗"所致，且奉军对日军实施了"猛烈攻击"，为此他们曾将两名中国商人抓起来，逼其画押，以制造伪证。张作霖得悉后，于8月28日急电北京政府进行揭露，外交部据此发出声明，认为逼供不能作为证据，从而使日方制造伪证的行径未能得逞，己方也得以从最初的极度被动中慢慢摆脱出来。

不管谈判进行到哪一步，总之奉军在郭家店方面是没有再发动进攻。有日本人在背后撑腰，本已濒临绝境的巴布扎布和蒙军又来了精神，他们在郭家店竖起一面一丈多长的黄旗，有人把它看成是象征复辟的清朝国旗“黄龙旗”。一时间，这些人张牙舞爪，不知怎样显摆才好了。

配合着官方行动，日本国内的许多报章杂志也极力对巴布扎布进行吹捧，先把他描绘成一个“躯干高大，容貌非凡，具有将才霸气”的“常胜将军”，继而又称其“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雄才大略，有图谋蒙古民族复兴之壮志”。经过内外这么一包装，巴布扎布俨然成了“成吉思汗再世”、蒙古独立的英雄，善耆等宗社党要员脑子一热，干脆把自己组建的约八百“勤王军”也运抵郭家店，由巴布扎布统一指挥。

“勤王军”一出，立刻被张作霖抓住把柄。因为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对宗社党人历来是严惩不贷，宗社党把“勤王军”拨给巴布扎布，就表明二者已经合流，当然也应与之同罪。张作霖遂正式通告日方：“蒙匪既与勤王军联合，中国军队不得不大举讨伐。”随着他一声令下，奉军打破与日本刚刚订好的“协约”，对撤出郭家店的蒙军发起猛攻，并在1916年9月2日予蒙军以重创。

同一天，中日进行第四轮谈判。出面谈判的外交总长陈锦涛根据张作霖的八条意见，对日方进行逐条批驳。此前一直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反复纠缠的林权助立即陷入被动，只得以“此案实无深究之必要”进行搪塞，以后又承认事件中的日本警察河濑处理不慎，日军也“稍有过分者”。

虽然理屈词穷，但林权助倚仗着自己国家有实力，仍以郑家屯事件为借口，非常蛮横霸道地提出了八条要求。在这八条要求中，除对

有责任的中方官兵予以免黜或惩处外，还包括向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向东北各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等。中国外交部自然不能同意，双方争执激烈，尤其在派驻日本警察一项上更是互不相让，后来该项也成为每一轮谈判的焦点所在。

日本政府一边在谈判中实施逼迫式打法，一边仍没有忘记继续维护自己的工具。9月3日，眼看蒙军即将被歼，日军开始直接对其实施援助。蒙军原先的武器主要由日本政府和宗社党偷运提供，南下这么多仗打下来，军械子弹已经十分匮乏。日军便从四平街方面运来武器进行补充，其中不仅有大量子弹和炮弹，还包括了四门青铜炮。这四门青铜炮均为日俄战争时日军使用的旧式山炮，一发射炮弹就要后退三米远，必须再上推到原地才能继续发射，怕蒙军不会用，一个退伍的日军炮兵少尉被专门派来充当炮手。

蒙军的武器弹药重新变得充裕起来，而由于无法使用铁路，奉军的给养则越来越接济不上。当天下午，因为缺乏子弹，奉军被迫转攻为守，黄昏时组织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只得再度与日方立约，准许蒙军安全退回蒙古大沙漠，而条件是日本必须解除“勤王军”的武装。

协约虽然订了，但各方其实都无守约的自觉性，日本嘴上答应着，实际对“勤王军”一个手指头都没动，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在蒙军出发后不久，就通知奉军对蒙军及“勤王军”继续发动进攻。巴布扎布本身更不老实，他非但不肯就此偃旗息鼓，率部返回沙漠，而且还在与奉军交火的同时，不断对沿途的城镇村寨进行烧杀和劫掠。

从9月中旬起，中日双方在北京的交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林权助为了逼迫中方让步，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尽管日军在事件

中先闹上门，可是当他们在撤离时，却遭到了奉军的“包围追击”。参加谈判的外交次长夏诒霆因为对具体情节掌握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未能予以当面驳斥。

过后外交部紧急电询张作霖，张作霖再度进行详细调查，查明被打死的十二名日本兵中，十一人的致命处均在前面，剩下一人的伤口也在左腰眼。依据张作霖所提供的尸体检查报告，中方代表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林权助无隙可乘，也自觉理亏，在以后的谈判中未再提及此事。

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1916年9月底，巴布扎布想出新招，准备向中国军队已撤出的郑家屯一线以东开进，乘虚攻入长春城。可就在他跃跃欲试的时候，派去与日军进行联络的信使却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日军发出通告称，严禁蒙军及“勤王军”进入郑家屯一线以东，如果他们要强行进入，就解除其武装。

发现老大突然变了脸，巴布扎布整个人都傻了，他急忙与宗社党的川岛浪速进行联络，川岛答称：“本国政府有改变方针征兆，目前正反复交涉，要求其继续执行前此之政策。”

原来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受到元老派的批评，早就维持不下去了，被元老派选定为首相继任者的寺内正毅主张“中日亲善”，以缓和中国国内的仇日情绪。虽然寺内尚未正式组阁，但大隈内阁成员已提前处于涣散之中，曾经积极支持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一帮军

政要员，如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田雅太郎、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海军省军务局长秋山真之等纷纷离职。

巴布扎布见形势不妙，这才急急忙忙地率部逃往外蒙。当逃到内蒙林西境内时，一看林西是一座孤城，又没有多少守军，就想攻下林西抢劫一把。可是他们不知道林西的守军并不是一般部队，乃是张作霖早年加入的毅军，厉害得很，不管怎么死打硬撞，城池就是攻不下来。

也是巴布扎布这厮活该晦气，他攻城心切，亲自在山上进行指挥，正拿着一个望远镜往城里看呢。守军见了立即举枪瞄准，结果一发即中。巴布扎布一死，蒙军失去斗志，残部狼狈逃往索伦山区。

索伦山区就是当年张作霖剿灭陶克陶胡部的所在，蒙军残部退到那里后已是人困马乏，纷纷倒头呼呼大睡。不料天降大雪，雪有四五尺深，当地气温达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一大半蒙军官兵就这样被活活冻死了。

还在蒙军进兵奉天的时候，一直组织对张作霖进行刺杀的土井大佐化装成中国人，准备带上他的“苦力队伍”（系从中国各地找到的游民所拼凑而成）乘乱占领奉天。只是奉天并没有出现他意料中的混乱，不久蒙军也败逃乃至溃灭，使得他的计划尚未能够实施就已胎死腹中。

土井很不甘心，便带上自拟的契约条件去与代理总领事矢田商谈，目的是让矢田支持他推翻张作霖。矢田本身和町野等人一样，属于保张派，又得知日本政府已改变对华方针，于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他的要求。至此，“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完全失败，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日方政策的变化也影响到了郑家屯事件的谈判，双方都不再针尖对麦芒，而是彼此寻找台阶，希望赶快收场，即便对于前面争执最激烈的派驻警察一项也是如此。1916年10月27日，林权助突然在谈判桌上提出，奉吉两省“事实上已有日警派出所，并非新问题”。

林权助倒不是信口雌黄，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即在东北设警所多处，郑家屯事件后，又在奉天各处设立警察官吏派出所。问题是它跟“军政署”一样，并没有得到中方的承认，日本政府自己也曾在相应条约上明文规定，非附属地的日人必须服从中国警察的法令。

北京政府向张作霖了解了具体情况，但到1916年末，却又有了在设警问题上对日让步的初步打算。征询张作霖的意见，张作霖表示坚决反对，他明确表示，设警问题属于内务行政范畴，国权所系，不容觊觎，如果在谈判中因顶不住日方压力答应其要求，必定会贻害无穷。

1917年1月22日，经过多达十余次的谈判和反复交涉，中日双方终于就郑家屯事件达成协议，主要内容为中方应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惩处有责任的中国军官，以及对日人进行抚恤、道歉等。虽然仍很无理，不过与当初日方的原提案相比，已有本质不同，在至关重要的设警权等权益方面都未有丝毫让步。

无论是郑家屯事件，还是郭家店对付蒙军，张作霖都是其中重要的当事者。在这些事件处理的过程中，他虽有迫不得已的妥协，但更多的还是进行极力抗争，也因此从中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和经验。比如

对付蒙军，就是以软磨代替硬顶，表面可与日军立约，答应怎样怎样，但只要找到空隙和机会，照样我行我素。

又比如，郑家屯事件发生后，欧美国家曾对日本表示不满。日本政府极为不安，为此要求中国新闻界不得报道郑家屯事件及中日各轮谈判的详情。北京政府出于避免开罪日方的考虑，还真的以“于国交致有妨碍”为由，对国内舆论进行压制。张作霖则持有异议，他致电外交部，主张不仅应开放国内舆论，还要将实情通告各国公使，并通过欧美报纸的报道来给日方造成压力。后者实际成为张作霖的对日策略之一，即远交近攻——远交欧美，抵制日本。

说我抽手，我就抽手

自清末以来，奉吉黑三省都共戴一个最高行政长官，这是因为三省介于日俄两大强邻之间，设一个最高长官便于统一军事外交政策。又由于奉天在三省中实力最强，所以一般情况下，奉天长官就是三省最高长官，远者如清末的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近者如民国的奉天将军、都督。

可是惯例在张作霖这里被打破了，尽管在他任内，奉天无论兵力还是财富都居于三省之首，可是吉黑却都各自为政，不受他的节制，张作霖也不能过问吉黑两省的军务和政务，这让他如鲠在喉，深感美中不足。

张作霖要打吉黑的主意，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袁世凯当总统，他当二十七师师长的时候。那时吉林督军是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是朱庆澜，两人论资格都比张作霖老。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的武夫，但自

被招安之后，也是一步步循资格和战功晋升上去，资格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一旦对方资格在他之上，就觉得很难直接下手，于是只能考虑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

孟恩远在吉林经营多年，一时很难从中设法，与之相比，朱庆澜上任的时间不长，而且他过去在奉天当统领时，很看不起张作霖，两人有旧怨，这也就为张作霖提供了一个他可以接受的驱逐对方的理由。正好驻黑龙江的第一师师长许兰洲与张作霖过从甚密，人称“黑龙江的张作霖”，张作霖就怂恿他取朱庆澜而代之，并且对他说：“如江省你要用款，我可以把还日本的三百万外债晚一点还（其时奉省外债尚未完清），挪给你用。”

在张作霖的鼓动下，许兰洲与骑兵旅长英顺、步兵旅长巴英额合谋，制订了一个驱逐朱庆澜的秘密计划。有一天晚上，黑龙江省城内的旗人忽然到处散发传单，通知所有旗人于第二天集会闹事。次日，一些为首的旗人或乘马或乘车来到集会场所，却发现警察已有所戒备，只得与其他代表一起躲进了许兰洲的师部。

这就是许兰洲暗中策动的行动，他企图借此达到动摇朱庆澜的目的。见集会未能成功，他又假装出来调解，暗中则指示旗人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对朱庆澜的左右进行攻击。

江省由此人心惶惶。朱庆澜弄清都是许兰洲暗中捣鬼，很气愤地向袁世凯告了一状。袁世凯下令许兰洲不准胡来，说如果朱庆澜发生意外，即拿许兰洲是问。

许兰洲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卫士，因会武术而被袁世凯赏识提拔，袁世凯一发话，他也就不敢再做出什么出格举动了。袁世凯最

后做出决定，电调朱庆澜入京，另派毕桂芳代理军民两长。

既然是代理，就是属于过渡性质，其他人皆可上位。此时张作霖在奉天已大权独揽，在北京政府面前说话很有分量，所以许兰洲就托张作霖保举他。张作霖表面答应设法，实际想保的却是他的同乡兼后来的儿女亲家鲍贵卿——都是间接控制，但鲍贵卿显然比纯靠利益结合的所谓“密友”要牢靠得多。

许兰洲被蒙在鼓里，他急于求成，便派参谋长尚某为代表，长住奉天与张作霖联络。尚某侦察到了张作霖的两面派手法，就将这一内情用密电发送许兰洲。可是这封电报被奉天检查机关扣留了，他们将密电译出送到了张作霖那里。

张作霖看完电报后，对许兰洲派尚某到自己眼皮子下充当间谍一事很是生气。尚某的密电上有一句话“雨帅（张作霖）有袖手之意”，他把“袖手”误读成了“抽手”，就愤愤地说：“我姓张的明人不做暗事，说我抽手，我就抽手。”

于是张作霖干脆正式保举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系北洋嫡系，连段祺瑞都很欣赏，自然是一保就准。为了避免许兰洲因不满而捣乱，在鲍贵卿委任状下达的同时，许兰洲及其第一师也被调到奉天，受张作霖节制。

当许兰洲到奉天拜见张作霖时，张作霖亲自穿马褂出迎，并且首先开口对他说：“我对不起大哥，未能帮大哥的忙，因为我的队伍看着二十八师，腾不下手来，请你原谅。”

许兰洲离开江省后，既失根据地，又成了张作霖的下属，要想再发个脾气啥的，不过是自讨苦吃。明知这一点，他只好打碎牙齿和血

吞，也跟着张作霖你好我好地客气了一番。

许兰洲虽走，江省还剩下英顺、巴英额两个刺儿头。这两个家伙没捞到什么好处，心里很不甘心，他们见鲍贵卿虽是督军兼省长，但并无实力，就合计着复制驱逐朱庆澜的一幕，将鲍贵卿赶走。

鲍贵卿毕竟是北洋出来的，可不像他的前任们那么好对付。就职江省不久，他就通过张作霖从奉天调去张鸣九四个营作为自己的卫队，此外在原江省部队中，张奎武六个营也拥护鲍贵卿。鲍贵卿决心跟刺儿头们干到底，但他担心仅靠十个营的兵力，解决不了英顺、巴英额，因此密电奉天，请求张作霖派兵援助。

在已确定鲍贵卿是自己人的情况下，张作霖当然不能容许江省出现任何闪失，他立刻以剿灭蒙匪的名义派吴俊升率二十九师援黑，即日开拔，同时致电张鸣九、张奎武，说在二十九师到达之前，“省城与鲍督军倘有差错，惟你二人是问，叫你二人提头来见”。

吴俊升率部一到江省，英顺、巴英额的部队就被震慑住了，没人敢当其锋。1917年12月2日，根据鲍贵卿的请求，北京政府以挟制长官、吞没公款等罪名，下令免去英顺、巴英额的职务。

江省军界的骚乱至此得到彻底平息，军政归鲍贵卿掌握，张作霖也就此达到了间接控制黑龙江的目的。

张作霖本打算一鼓作气，通过如法炮制的手段，将吉林也顺势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吉林督军孟恩远身为老北洋将领，又在吉林任军事将领近十年之久，可谓树大根深，张作霖即便铆足了劲都撬他不动。

我识将军未遇时

暂时的碰壁并没有对张作霖的雄心壮志造成任何影响。在参谋长杨宇霆的辅佐和推动下，他开始不安于东北，一心向关内发展势力。

张作霖帐下幕僚人员，多为赵尔巽、袁金铠所推荐，杨宇霆并不在其列，可以说是张作霖所一手识拔。就在张作霖担任二十七师师长时，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支队伍，见其军容整齐，风纪严肃，颇为诧异。因为当时由巡防营改编的部队主体是“胡子”，纪律很散漫，原来的新军又都调走了。

张作霖疑心是日本军队，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军械厂的卫队连，而对他们进行训练的正是时任军械厂厂长的杨宇霆。说起来，杨宇霆之前其实与张作霖也有过一面之缘——还在张作霖担任师长的前几个月，曾宴请路过奉天的黑龙江省军方代表团。杨宇霆是代表团成员刘德权的士官同学，他和另外几个同学曾相约去看刘德权。因为当时风闻张作霖最恨留学生，所以他们曾有意避开张作霖，没想到张作霖很看重士官生，特地通过刘德权转告杨宇霆等人，说要起用他们到重新开办的奉天讲武堂当教员。

几个月过后，当张作霖看到部队也可以被一个士官生训练得如此之好时，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于是便把杨宇霆找到师部详谈。杨宇霆从刘德权那里知道了张作霖对士官生的真实态度，亦有心投效，交谈过程中，他口齿伶俐，对答如流，且态度谦恭有礼。张作霖很欣赏他，遂将其调到二十七师担任参谋长。

杨宇霆少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十岁时入私塾读书，很快就能背诵和理解《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的启蒙书，其表现出的早慧能力令塾师都感到教他吃力。

杨宇霆人既聪颖，还刻苦好学，第一次参加科考就考中了秀才。可惜的是，那是末科秀才，也即清廷废除科举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科举一废除，杨宇霆就无法再像赵尔巽那样学而优则仕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年奉天中学堂招生，杨宇霆便考入中学堂当了插班生。

时值中央政府准备选送一批学生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行学习，担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决定由奉天中学堂选送几名。当时挑选学生主要是测验外语，轮到杨宇霆时，他当场就把外语课本《华英初阶》从头至尾背了一遍，考员很是惊诧，杨宇霆得以成功录取。

到东京后，杨宇霆入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对于一个常年读古书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所有的学习环境和内容都被改变，初学入门阶段是很困难的。杨宇霆性格争取好胜，越困难越不肯服输，为了练习马术，他曾在半夜里偷偷地潜入马厩，想把马拉出来进行练习，但他不知道受过训练的军马是轻易不出马厩的，结果他不但没能把马拉出来，右腿还被马给咬伤了。半夜拉马是违纪之举，杨宇霆即便受伤也不敢言语。士官生每月要检查一次身体，结果检查时才发现咬伤处已经溃烂，杨宇霆因此还挨了处分。

就读士官学校期间，杨宇霆每期考试都名列前茅。几年后毕业回国，正赶上赵尔巽第二次来奉天任东三省总督。当初他们这批留学生出国前，赵尔巽曾予以接见，当时杨宇霆代表全体留学生致答谢词，

赵尔巽对杨宇霆的仪表及其发言时所表现出的激情很满意，所以在他们回国时，又再次接见了他们。

赵尔巽的重视，为杨宇霆等人回国就业打下了基础。杨宇霆先是被分配至吉林孟恩远部当见习排长，民国建立后升任营长，不久又调东三省都督府任军械科长兼军械厂厂长。他治军严格，经常在深夜搞紧急集合，士兵站好队后，他总要从中挑出不穿袜子的人，当场进行处罚。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哨兵听到是他的声音，未问口令就迅速开门放人，想不到他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进门要问口令是一再宣传的军令，你竟敢不遵守，倘若敌人模仿我的声音，你把他们放进门来，军械厂就被断送了！"

在邀杨宇霆入幕之前，张作霖对自己的部队并不满意，经常说："目前的军队，我虽然可以统一指挥，但官兵良莠不齐，很多军官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甚至还有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的情形。"如其所言，奉军中军纪败坏的现象确实很普遍，即便是张作霖嫡系的二十七师也是这样，该师的老底子是张作霖在八角台建立的"保险队"，从没经过正规训练，纪律相当散漫。

在被张作霖任命为二十七师参谋长后，杨宇霆沿用训练军械厂卫队连的做法，首先对二十七师进行了改造。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整顿，二十七师等部队开始变得规范整齐，军容焕然一新。

对杨宇霆整顿奉军之功，东北各界向有公论。张作霖的幕僚之一、"日本通"于冲汉写道："棘门霸上如儿戏，我识将军未遇时。"此句典故出自《史记》中所记载的周亚夫故事：匈奴进犯北部边境，汉文帝急调三名大将率三路兵到长安附近进行防御，其中刘礼屯兵霸上，徐厉屯兵棘门，周亚夫屯兵细柳。为鼓舞士气，文帝亲自到三路

军队犒劳慰问，他到霸上、棘门时，两处军营都不用通报便主动放行，只有细柳营非得使者拿出天子符节才肯打开寨门，而且周亚夫在迎接文帝时，仍穿一身戎装，以军礼相见。文帝感慨万千地称赞周亚夫："此真将军矣！"他说霸上和棘门的军队简直都是小孩子玩家家，倘若遭到匈奴偷袭，恐怕刘礼、徐厉这两位将军都会束手就擒。

于冲汉的意思是说，张作霖在未遇到杨宇霆之前，奉军和霸上、棘门的军队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儿童嬉戏，哪里能放到正规战场上去打仗？然而自从遇到杨宇霆，奉军就好像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样，别的不说，起码可以拿到战场上去练练了。张作霖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曾很感慨地对左右说："我们武人不懂政治，要想国富民强，必须选用人才，特别是行政部门。就是军队，我们也需要请人才。"

对杨宇霆，张作霖由赏识发展到信任，并渐渐倚之为军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左右手，在执掌奉天大权后，即升任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谋长。

借花献佛

除了帮助张作霖改造和训练军队外，杨宇霆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往返京津，与中央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与段祺瑞一方进行联络。

士官生是民初不容小觑的一股军政势力，在杨宇霆崭露头角的时候，他的同期或不同期同学也多已居于显要位置，段祺瑞的首席幕僚徐树铮就是一个。徐树铮是第七期士官生，比杨宇霆要大一期，但两人在性格、能力、经历上极其相似，也特别气味相投。同时，徐树铮

受段祺瑞信任和依赖的程度，甚至还要超过杨宇霆之与张作霖，所以有段祺瑞的灵魂之称。有了这层关系，杨宇霆联络段祺瑞，便只要与徐树铮打好招呼就行了。

此时北京政府正爆发新一轮“府院之争”，以总统冯国璋为首的府方与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院方针锋相对，政争激烈。段祺瑞的国策主张是，在国际问题上积极参加欧战，在国内南北统一问题上用兵以武力解决。对于前者，冯段无异议，后者则存在严重分歧，冯国璋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也是在假和平与段祺瑞争权。

因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他们这一派当时被称为皖系，相对而言，冯国璋那一派多为直隶人，故称直系。在直系的紧逼下，段祺瑞被迫再次辞职，时任陆军次长的徐树铮亦随之辞职下野。

之后段祺瑞、徐树铮反守为攻，通过召集督军团会议，利用皖系和接近皖系的督军之力，对冯国璋施压。张作霖与段祺瑞关系密切，因此杨宇霆代表张作霖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张作霖本人也致电冯国璋，认为“南方已无媾和之诚意，政府应下堂堂正正的讨伐令，以挽救千钧一发之危局”。

冯国璋吃不消主战派督军的压力，只得不情不愿地发布了湖南讨伐令，但实际仍在暗中与南方进行和谈。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想到了引奉军入关助战的策略，他对段祺瑞说：“仅靠我们皖系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制止直系和南方和谈的，我看不如来个借刀杀人，借奉打直。”

徐树铮随后秘密前往奉天，他先与杨宇霆接洽，商量如何促成张作霖答应派兵入关，助皖打直。杨宇霆与徐树铮一样年轻气盛，一心要帮助幕主扩张势力，张作霖虽然也有此意，但他相对来说则要谨慎

得多，毕竟出兵入关和站队呐喊还是两码事，弄得不好极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把部队乃至自己的前途都扔进去——想当初张勋复辟，要是他张作霖也像冯麟阁那样傻乎乎地跑进关内，下场如何真不可想象。

显然，要想打动一个政坛老狐狸的心，光靠三寸不烂之舌是不够的。徐树铮想起一件事，从前“府院之争”相持不下的时候，冯国璋的谋士曾向冯国璋献计，说只有拥有足够的军队，才能在与段祺瑞的争斗中占据优势，也才能保住总统之位。冯国璋只听了他的话后，便向日本购买了大批军械。这桩买卖是徐树铮在任时敲定的，合同约定日本人先将军械运至秦皇岛交付中国接收，然后再运至北京，不过直至徐树铮卸任，军械尚未起运。

为了打动张作霖，徐树铮遂决定借花献佛，他将军械购买计划告诉了杨宇霆，并让杨宇霆鼓动张作霖截械。

当时张作霖所辖奉军只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军三个师，且所有装备均很陈旧，张作霖久欲扩军，只是苦无军械。听杨宇霆一说，他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同时也不免犹豫：且不说徐树铮必定会有所索求，就是单单劫械一桩，就注定要和冯国璋及直系撕破脸了，以后再无退路。

玩政治有时候跟赌博也没什么两样，这一注下去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张作霖实无把握，一时间，他颇感左右为难。

见面礼

据传唐代李虚中精通五行之术，仅凭人的生辰八字，就能推算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韩愈称他为人算命，“百不失一”，可见准确性之高，李虚中也由此被后世奉为星命家之祖。

至清末民初，李虚中的徒子徒孙已遍及天下，奉天的星命业者更是为数众多，仅从生理现象上来看，他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目术士，也就是视力正常的算命先生；另一类是瞽目术士，都是盲人，此即俗称的“算命瞎子”。

在瞽目术士的高手中，流传着一门独特技能，名为“一掌金”。算命时，在问卜人报出出生的年月日及时辰后，一般算命先生必须查阅《万年历》，才能说出问卜人的生辰八字，掌握“一掌金”的术士不用查，只需屈指一算，就能立即报出八字，然后再判断吉凶，批算宿命。“一掌金”只在瞽目术士中进行师徒传授，绝不传给明目术士，而在奉天，也只有四五家能凭着“一掌金”的本事坐家算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包秀峰、张震洲。

张作霖每每遇到难以判断的疑难问题，总要找包秀峰、张震洲前去算上一卦。当然这两位专司觑破天机的术士也不会受到亏待，比如被称为“包瞎子”的包秀峰每月都能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两百元酬劳，张作霖还让手下称其为“包顾问”。

这次张作霖又决定召包秀峰算卦。包秀峰受召进府，经过一番推算后，对张作霖说：“恭喜大帅，这次卦象得吉。”

既是天意，张作霖也就不再客气，马上让杨宇霆进行筹划。杨宇霆奉命带上军械厂厂长丁超、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前去劫械，在此

过程中，他施展交际手段，与运械者花天酒地，结为友好，于不动声色中侦悉了所有运械情况。

等军械卸岸，装上火车，准备由秦皇岛运往北京时，杨宇霆手持徐树铮所送的领取军械的证件，率奉军将火车拦了下来。一边是黑洞洞的枪口的威逼，另一边人家还有证件，车站站长只好听从其指挥，将火车头掉头开往奉天。

奉军截械一案轰动一时，冯国璋盛怒之下，亲自署名给张作霖拍出一封电报，大意是把军械立即还给中央，如确实需要军械，当另行筹拨。张作霖自然不会听信“另行筹拨”之类的话，他以冯国璋自己发布的讨伐令为挡箭牌，说自己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正要实施南征，但是因缺少军火，没法开拔，正好有这批军械，便拿着先用。

袁世凯当总统时，中央曾从奉天借过一批武器，一直没有偿还，张作霖这时也旧事重提，称抢来的军械可作为补偿，大家今后算两清了。总之一句话，就是根本不想返还。事已至此，冯国璋也无可奈何，只得以军械暂由奉省代为保管为由，把这件事敷衍掉了。

利用截得的两万七千余件军械，张作霖当即编成了三个混成旅。这些新旅装备精良、枪炮齐全，它们对奉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此之前，奉军最多也只能在关外闹腾闹腾，在此之后，才有能力向关内扩张，并进一步问鼎中原。因一手策划这次关键的劫械案，杨宇霆从此在奉军中声名鹊起，获得了“智囊”及“小诸葛”的称号，他本人也很得意，特将自己的字“麟阁”改为“邻葛”，意为与诸葛亮比肩。

一笔价值不菲的见面礼，令徐树铮在奉天身价倍增。徐树铮才华横溢，喜饮酒赋诗，且有着出众的口才，“辩才无碍”，一时奉人多为之倾倒，只有作为奉天文臣首领的袁金铠不屑一顾。

袁金铠其实也不喜欢杨宇霆，认为他和徐树铮只知一味劝张作霖扩军拓地，对奉天地方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另一位文臣孙百斛亦持相同观点，甚至当徐树铮被张作霖任命为驻京代表时，他就跌足长叹，说：“吾奉自此多事矣。”

在徐树铮、杨宇霆的劝说下，张作霖终于起了派兵入关助皖的念头，这对奉天来说是件以前从未有过的大事，因此他特地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徐树铮虽还不是奉将，但也受邀出席。在会上，徐树铮滔滔不绝地列举入关助皖的种种好处，“逞其辞锋，锐不可当”，把包括张作霖在内的许多人都说得心动不已。

等徐树铮讲完，袁金铠站起身表示反对：“东三省地介两强（指日俄），危机四伏，所以奉人都愿意保境息民，蓄余力以御外侮，其他事情，是我们所不愿听到的。”

虽然大多数时候，张作霖对袁金铠都言听计从，但这次是例外，劫械案的得手和奉军的一夜壮大，让他和手下将领们尝足了甜头，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作为少数派，袁金铠的意见没有得到认可，张作霖最终还是答应徐树铮派兵入关。袁金铠对此深感失望，散会后对别人说：“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说的就是今天这件事吧。”

袁金铠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春秋战国时候，晋国人士会被秦国所用，抵御晋军，晋国对此很担心，就使了个计，引诱士会

返晋。此计被秦国大夫绕朝识破，但可惜秦国国君听不进他的话，仍然要放士会走。

士会临行前，绕朝送给他一根马鞭，对他说："你别以为秦国没有聪明人，我早就知道晋国人的目的，只是我的谋略没有被国君采纳罢了，所以才让晋国人得逞了。"这就是"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后人也用"绕朝策"来指代"有先见的谋略"。

袁金铠确有先见之明，奉军入关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十几年间，先是张作霖自己，接着是接班的张学良，父子数番受诱入关，每次看着前面好像繁花似锦，到最后却都只能落得一个雨打风吹去的凄凉下场，当然这是后话。

自乱阵脚

1918年3月12日，张作霖、徐树铮宣布组织援湘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奉军入关。张作霖由"胡子"起家，之后得以飞黄腾达，身任封疆大吏，全靠枪杆子的力量。他当然深知枪杆子有多么可贵，更知兵权不可以假人，现在居然肯将奉军统帅大权交给徐树铮，并付以全权而不加遥制，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很少见的。

奉军南下，声势很大。在他们进驻北京南苑后，已构成对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胁，迫于形势，冯国璋只得邀请段祺瑞再度出来组阁。为了使段内阁能够尽快组成，张作霖又向北京政府提出："如果成立段内阁，十日以内则将北京附近军队全部撤走南下。"

3月23日，段祺瑞搬回国务院，他一上任即重祭“武力统一”政策，继续对南方用兵，张作霖亦践行承诺，令北京附近的五万奉军南下征战。

问题就出在南征上，吴佩孚等人的直系军队不愿打，致令北方南征军在湖南吃了败仗，形势骤变。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仍不顾一切地要挽回战局，为此不惜把奉军全部摆在湖南战场，欲用奉军来独当一面。

奉命南征的奉军将领对此极为愤慨，认为徐树铮是在拿奉军当枪使。张作相进言张作霖，说奉军在前线卖命，胜利果实却有可能被徐树铮一人夺走，“也太吃亏上当了”。袁金铠也对张作霖说：“徐树铮不过借公之力，伸个人之权以固私而已。”

听了众人的话，张作霖急忙改变南征方针。他一面让孙烈臣等人分别统率各部，用来架空徐树铮，一面以俄国爆发革命，中俄边境紧急，奉军不能长期远征南方为由，将奉军撤离前线。

眼看着奉军被调离前线，徐树铮就想拉队伍自己干。他利用奉军之名，从陆军部冒领军款三百七十余万元，利用这笔钱，他与杨宇霆私自招募了四个旅，由同为士官生的丁超等人率队指挥，在洛阳、信阳两处进行训练。

徐树铮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孰料事情首先被张景惠发觉。后者赶紧密告张作霖，并且说徐树铮和杨宇霆私自招兵有取代奉军的企图。张作霖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免去徐树铮、丁超等人的职务，同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涉案的杨宇霆予以关押，后经段祺

瑞说情，才只以撤去参谋长一职了事。被罢了官的杨宇霆失去幕主宠信，只得滞留于京津，终日无所事事，生活上还得依靠别人接济。

气呼呼的张作霖倒也不是一无所获。鉴于中俄边境不断发生骚乱，需要统一兵权加以抵抗等原因，北京政府特任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由于北京政府未对这一职务的官制和权限发表任何限制性规定，所以它不单单相当于前清东三省总督的翻版，其实际权力甚至还要超过东三省总督。

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后，名义上可统揽三省兵马，吉林亦包括在内，但吉林督军孟恩远的资格比张作霖还高，哪肯真的听从张作霖的指挥，可是不听看来又不行——张作霖仅在奉天一省就拥兵四个师、七个混成旅，外加十几个营的巡防队，另外黑龙江省也在奉天势力范围之内，完全服从张作霖的调度。

孟恩远不想听张作霖的，于是就想通过扩充实力来增加自己的发言权。张作霖靠劫械扩充军备，他则让自己控制的永衡官银号猛发纸币，用滥印的纸币成立了一个暂编师，结果弄得吉林财政紊乱，人心惶惶。

孟恩远这一自乱阵脚之举，正中张作霖下怀。孟恩远在吉林的地位较为稳固，除了资格老，督吉时间较长外，还因为他出自老北洋，北洋元老、新任总统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时，孟恩远是督署的先锋官，本属徐的亲信。于是张作霖就直截了当地以东三省巡阅使名义，给徐世昌发去电报，指责孟恩远在吉林财政方面处理失当，一边滥支军费，一边却眼看着胡匪滋扰而不管。

除了请求中央对孟恩远进行处理外，张作霖还给孟恩远本人寄去一封公函，暗示其自行辞职。孟恩远自恃树老根深且上面有人，对张作霖的这一暗示置之不理，在吉林省议会上公开声称：“我虽年老，对前途无大希望，但只因受到某方面的压力而辞职，是断然办不到的。我有一个师和五个旅的亲兵，自信还有些抵抗力。”

见孟恩远不肯就范，张作霖又唆使奉天籍国会议员邴克庄等人联系吉林省议员于贵良，以违法乱纪、擅自编师为由，在参议院对孟恩远提出弹劾案。本来查办督军的提案很少能够通过，但这次在张作霖所控制的尚友会的作用下，居然得以一举通过。提案通过后，邴克庄等人趁热打铁，约于贵良面见段祺瑞，促请政府迅速派员查办孟恩远。

段祺瑞虽已不担任总理，但仍握有实权，遂委任汪湘琦为查办使，赴吉林进行调查。迫于段祺瑞、张作霖的压力，刚上台不久的徐世昌只得下令将孟恩远免职，另调鲍贵卿任吉林督军。

孟恩远万没想到徐世昌会给自己下达免职令，不由大为惊骇。看到张作霖如此苦苦相逼，他本想交任离吉了事，但幕僚和部下们不乐意了。

他不退是不行的

督军参谋长高士傧是孟恩远的女婿，向来以未来的吉林督军自命。他和他的哥哥、吉林陆军混成第四旅旅长高俊峰，以及其他一些孟恩远的亲信，长期以来都以孟恩远为靠山，撤掉孟恩远的职，也就意味着挖掉了他们的靠山。这些人以高氏兄弟为首，极力建议孟恩远

举兵抗命。在这种情况下，孟恩远产生了侥幸心理，也就倚仗着高氏兄弟的武力，选择了恋栈不去。

高氏兄弟随后将军队部署于吉奉交界处，以防奉军发动进攻，为抵制北京政府对孟恩远的免职，又同时宣布吉林独立。张作霖对此早有准备，他马上请求北京政府下达讨伐吉林的命令，并以孙烈臣为讨伐军总司令，分四路进兵吉林。一时间，奉吉两军相互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也就在这一紧急关头，张作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获悉吉林发生了一桩大事件。

事发地是长春北郊的宽城子车站。当时高俊峰旅的一个团露营驻扎于车站空地上，露营地周围画着警戒线，禁止行人车马通过。1919年7月19日下午，南满铁路的日本籍职员木村不顾哨兵阻拦，想要从警戒线强行通过，结果被暴揍了一顿。木村随后跑到宽城子车站的日军兵营求援，这座日军兵营其实主要是对付俄国人的，驻有一个大队部，留守士兵不过三十余人。看到自己人吃了亏，大队长林繁树便派副官隅田中尉带上二十名士兵前去交涉。这些日本兵到达现场后，在露营地前面列成横队，声言必须把打人者交出，由他们带回审讯。

受到刀口舔血、悍不畏死的“胡子作风”影响，官兵胆子都很大，根本不怕日本兵。正当隅田等人扯着喉咙咆哮时，不知谁从露营帐篷里首先开了一枪，随之枪声四起，隅田及其十八名日本兵被当场击毙！

日军在南满铁路长春段共有一百多人，另有铁路守备队一百多人，加上宪兵警察，总计两百多人前往宽城子助阵。当中日双方要员闻讯赶到事发现场时，两边军人都还在相互射击。

双方停火后，应日方要求，高氏兄弟同意在长春附近二十余里以内不再驻兵，并不与日军发生接触，等问题解决后再进行复原。此即宽城子事件。

宽城子事件和三年前的郑家屯事件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此时大限内阁早已下台，当政的寺内内阁在对华问题上实施“中日亲善”政策，向中方提供积极的财政援助，中日也因此一改袁世凯时期的紧张对峙局面，相对来说关系比较缓和。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未像郑家屯事件那样率先在地方上展开单方面军事行动，而是直接与北京政府进行交涉。经过交涉谈判，7月23日，负责处理宽城子事件的龚心湛内阁做出决定，宣布将高氏兄弟先行免职，已死的日军官兵从优抚恤，费用由中方承担，同时派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身份赴奉天日本总领馆道歉。

本来张作霖对吉林的讨伐并未得到中央许可，很容易被指责为扩充地盘的私斗，现在不同了，奉军进兵吉林顿时变得名正言顺。孟恩远失去了可与之对赌的所有筹码，意气极为沮丧，高氏兄弟也慌了手脚，高士傧甚至口不择言，说实在不行就上山归绿林，“变土匪以扰乱东三省”。

7月25日晚上10点，孟恩远与张作霖直接用电话进行商谈。因为连日着急上火，他喉咙都哑了，说不出话来，不得不临时请长春镇守使裴其勋替他讲话，以向张作霖表明求和之意。张作霖在电话里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一切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没有办法。请你对孟说，他不退是不行的。”裴其勋连忙解释：“孟督军没有再恋栈的意思。”

几天后，孟恩远本人通过长途电话向张作霖表示愿意交出政权：“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现在已经说服高士傧了。”

在得到人身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孟恩远自愿交出吉林督军的大印。高氏兄弟也只好双双放弃部队，身着便装由海参崴乘船回天津原籍。8月11日，总统徐世昌正式任命鲍贵卿为吉林督军，从此吉林省也并入了张作霖的势力范围。

鲍贵卿调任吉林后，他腾出的黑龙江省督军一职，由孙烈臣继任。孙烈臣出身卒伍，张作霖调驻洮南时，他只是洮南的一名营长，与张作霖那些绿林时代就生死与共的老部下兼盟兄弟相比，资历要差一些，但此人一向深沉有智，稳健沉着，在奉军将领中有温厚长者之称，也因此深得张作霖的信任。

孙烈臣督黑，跟张作霖亲自督黑几乎没什么差别。孙烈臣赴任前，也就新班子人选一一咨询了张作霖的意见。张作霖则把黑省作为奉天的二线人才仓库，尽可能把自己认为有才，但又需进一步考验和打磨的文武官员拨给孙烈臣使用。前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在截械案中立功，但后因牵涉徐树铮、杨宇霆私自招兵案被撤职，此次张作霖不计前嫌，重新起用他为黑省督军署参谋长。

参谋长是首席军事幕僚，孙烈臣还需要一个首席政治幕僚，也即黑省督军署秘书长，张作霖为他挑选的是袁金铠。在王永江、杨宇霆显山露水之前，袁金铠曾经稳坐奉天文臣的头把交椅，张作霖对他言听计从，“事无巨细皆咨而后行”。即便王永江后来风头强劲，得到张作霖越来越多的宠信，在政治经济这一块，也仍然是由袁、王分头掌舵。

袁金铠最突出之处是其长于计谋，可以说，在用谋使诈方面，东三省的文臣谋士中没有能超过他的，连王永江、杨宇霆也多有不如，这使得袁金铠以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军界亦能找到其用武之地——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驱许兰洲出黑省，击高士傧于吉林，表面上看来都与袁金铠无关，但预先计划多出其谋。

将袁金铠调往黑省，自然是表明了张作霖对黑省的重视，不过也同时意味着袁金铠已脱离张氏幕府的核心位置，实际上是失势了。到了这个地步，既与王永江等人不断上升的势头有关（张作霖已不用再像原来那样必须倚重于袁金铠一人），也来自袁金铠的“自作孽，不可活”。

乾隆之失

袁金铠固然才气纵横，亦尝以诸葛亮、王猛（十六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自命，其常受诟病之处恰在个人小节和操守。他因与前奉天文人首领吴景濂结下仇怨，为了报复，便在举行文官考试时对吴景濂家乡那一带地方的人概不录取，而独重自己的老乡。时人讥之曰：“西河不如南河好，兴城哪有辽城高。”（吴景濂是兴城人，袁金铠是辽城人，西河南河为同样意思。）

当然对于袁金铠是否出于心胸狭窄而妨碍荐才这一点上，也是众说纷纭。比如有人就说他不计小嫌，能够涵盖一切，“前日为仇者，今日可视为友，果能俯就其范围，则亦乐为汲引”，证据是袁金铠不仅荐拔了王永江、于冲汉等人，也推荐任用了不少已经依从于他的吴景濂旧日弟子。

袁金铠要说倒霉，主要还是倒霉在他的老婆手上。在袁金铠得势的那三四年里，袁家俨然成了奉天政治中心，一般趋炎附势之徒均集中于袁门。袁金铠本人倒不敢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但是他的老婆苏氏却以丈夫的名义大肆收受礼物。

袁金铠在奉天的住宅位于军署门前胡同，每逢年节，送礼者往来如梭，几乎要挤破门槛。苏氏是个钻在钱眼里爬不出来的女人，她竟然会将礼物以低价卖给商店，甚至还将干鲜贵重食品送到军署厨房代售，完全不顾及丈夫在外的名声。

赵家沟隶属黑山县，早年与张作霖一道打江山出来的人都被称为黑山派，他们对靠嘴皮子和笔杆子发达的文官向来就满腹牢骚，见状哪里肯放过，遂将袁金铠的劣迹添油加醋，编成了一首民谣。民谣中说，“要当官袁洁珊，成不成哲继明，妥不妥高钧阁，若找门路吴大胡”，袁金铠字洁珊，至于哲继明、高钧阁、吴大胡，均为袁金铠的亲戚或与之有关系的人。

黑山派故意将民谣传给张作霖听，并且挑唆说：“洁珊之门如市，人皆知有秘书长，而不知有大帅。”张作霖听后非常不高兴，不过是忍着没有发作而已。一天，他想吃松花江产的白鱼，让厨师做了送上来。他一吃，味道不错，便回头对侍从说：“这鱼很鲜美，跟往日不同，你们是从哪里买的？”侍从暗中受了黑山派的嘱咐，就答道：“袁秘书长公馆！不然，市场上可没有这么好的。就是上次进的燕菜汤，大帅夸奖色白品正，那也是从袁公馆买的。”张作霖笑道：“这么说，秘书长公馆是开了食品店了！”侍从微笑作答：“不是，都是送的礼品，实在吃不掉才对外出售的。”

此言一出，张作霖大为震动。其实如果袁金铠真的开店，他倒不会不介意，因为张作霖自己也做生意。张作霖早在做“保险队”时，便购置田产、开办油坊和当铺，及至在新民府发迹，已赚得盆满钵满，“钱库里的钱，用句文雅的话来说，像辽河的水滚滚而来”。正是因为家里有钱，当初看到徐世昌、张锡銮面临财政危机，他才会慷慨解囊，拿出一万两白银送给上司应急。

到张作霖担任二十七师师长时，据其自述，已经“积累了二十万两银子”，同时他又陆续开办了许多当铺、粮栈、油坊，有大批人常年替张家经营这些产业，其中规模最大、买卖最兴旺的还要数在奉天设立的三畲粮栈，这个粮栈位于皇姑屯车站附近，以经营军粮为主，绝对属于日进斗金的垄断企业。

聚财方面，可与张作霖比肩的只有吴俊升。“吴大舌头”到四十岁才开读《三字经》，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但除了善打仗之外，也很会做生意，据说他的个人财产之多，甚至连账户先生都弄不清楚。吴俊升有一次还曾与张作霖“比富”，他满口唾沫，结结巴巴地对张作霖说：“哦，哦，别看你是大帅，可我的财产比你多。”

张作霖不干涉部下们做生意，也不介意他们的财产比自己多，他介意的是送礼，认为这会因私废公。吴俊升有一年来给张作霖拜年，送给张学良等人每人五千元，张作霖见了连忙说：“哎，吴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吴俊升解释道：“过年了，给几个钱，没什么的。”

“你给他们点儿钱，没什么，可你不能给他们那么多钱。”

“大帅，我的钱，我的一切，还不都是大帅给的吗？都是你给我的！”

听到这里，张作霖蓦地把脸拉了下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说真话？”

见张作霖生了气，吴俊升忙道：“我哪能说假话？”张作霖更火了：“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不要这样子，你回去，好好做事，别让老百姓骂我的祖宗！”

吴俊升吓坏了，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给张作霖磕头。当时张学良等小孩子就站在旁边，一个个感到毛骨悚然。

现在听侍从说起，袁金铠收受别人这么多贵重礼品，还向外出售，张作霖的气愤之情可想而知。见张作霖如此，有身边的人便给他说了一段典故，说的是前清乾隆年间和珅当国，外省督抚每逢年节照例进贡，贡品中的上等货色总是先送到和府，差一点的才送宫内。乾隆皇帝在的时候，有乾隆罩着，和珅自然没事，但等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和珅就遭到了抄家灭门之祸。

此人认为，袁金铠之贪婪已经快赶上和珅了，如果张作霖依然像乾隆那样对之迁就维护，实际是害了他，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在袁金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加以警醒，以免“演乾隆之失”。

张作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从此就对袁金铠的举动格外注意起来。

你还有没有一点丈夫气

那一年，张作霖在军署召集军政要人联席会议。开会人员都按时到齐，唯独袁金铠不曾露面，张作霖令差人前去袁宅请了三次，仍不见踪影。他有些着急，问袁金铠为何不来，差人开始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后来经不住张作霖再三追问，不得已道出真相："秘书长与太太口角，不敢动身。我以大帅命令传之，其太太对大帅亦有不逊之词。"

听说苏氏竟然阻挠丈夫出席重要会议，且对自己出言不逊，张作霖顿时勃然大怒，立刻对差人说："你拿着枪去他家，毙掉这个悍妇，然后回报！"

与会的张景惠一看不好，连忙起身劝说："请大帅息怒，我先去看看情况再说。"袁宅本来离军署也不远，张景惠徒步跑去，对苏氏婉言相劝并晓以利害，袁金铠这才得以逃出难关，和张景惠同来军署。

见到袁金铠，张作霖犹余怒未息，他厉声对袁金铠说："你还有没有一点丈夫气？竟然弄到这种样子。天下漂亮的女人多的是，何必如此，你快让这个悍妇滚吧！"

袁金铠脸面扫尽，还不忘为自己的惧内毛病进行解释，说与苏氏结为夫妻三十余年，苏氏给他生了一男三女，平时还主持家政，"不谓无功"。除此之外，他还提到，日俄战争时他曾被日本人关押在警察署，是小舅子也就是苏氏的弟弟苏会臣联合地方士绅予以营救，始免于难。

袁金铠战战兢兢地请张作霖原谅苏氏："虽有小过，不忍以一时之愤而忘前情，致贻物议也，望大帅见谅幸甚。"发现袁金铠真的特别怕老婆，张作霖也不由忍俊不禁，说了句："君真步杨万石之后尘矣。"

杨万石是《聊斋志异》里的人物，老婆妒悍异常，对其极尽虐待之能事，而杨万石却不敢有任何反抗，仿佛一个施虐狂，一个受虐狂。虽然张作霖终以一笑置之，过后也未再追究此事，但袁金铠的形象在其心中已经一落千丈——那个可以“祸福共之”的最佳智囊渐行渐远，眼前是面目可憎的“翻版和珅”兼“翻版杨万石”！

在此之前，张作霖都对袁金铠非常尊重，无论当面还是背后，均长其为袁六爷（袁在家里排行第六）或洁珊，自此以后，当面称以官衔，背后则称之为袁瞎子（袁视力不好），礼貌远不如从前。在察觉到张作霖态度的变化后，袁金铠本着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的心理，言语行动都变得收敛起来，以往张作霖的很多计谋都为其所献，现在则不再那么积极主动。

袁金铠此举实际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张作霖的疑虑，即袁金铠是不是已经和他不是一条心了，要知道，这可是比“翻版和珅”兼“翻版杨万石”更严重的问题。某日，张作霖突然拿兴京县知事苏景阳做起文章，称苏景阳身为一个小小县长，做事胆子大，并且还笑着对袁金铠说：“苏知事想是你的近亲（因袁金铠老婆的娘家姓苏），故有此种豪胆，可见君之权势，较我为重也，无怪门庭若市，礼物充斥，有‘要当官袁洁珊’之谣也。”

袁金铠不听则可，一听大惊失色，知道张作霖这番看似没来由的话，实则是在敲打自己。他急忙对之进行辩白，说兴京知事虽姓苏，却并非他的亲戚，也不是辽阳人——当时谣传袁金铠结党而成“辽阳派”，袁金铠强调苏景阳不是辽阳人，即对之进行反驳，可见他对外界针对自己的各种非议也是很清楚的。

袁金铠希望张作霖能够继续给予信任："其他谣言，无非挑拨离间，望大帅详查以验始末。"这一下把张作霖的心事全都勾引出来，他顿时大光其火，对袁金铠予以了狠狠训斥。

文官与武官不同，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是传统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而张作霖重不重视某个文官，其实也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给足这个文官面子。张作霖对袁金铠的两次当众训斥，尤其是第二次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莫须有"的训斥，无疑给张袁之间的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缝隙。以后虽然又经张景惠从中疏通调和，张作霖对袁金铠的"辽阳派"等事并未再深究下去，但袁金铠在张氏幕府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他也不想再在张作霖身边做下去了。此次调往黑省，实际也是他本人主动请缨的结果。

作为继吴景濂之后奉天文人圈中的核心人物，加上之前张作霖的信任倚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袁金铠都称得上是炙手可热，不过在调往黑省后，由于黑省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很大，且排外思想比较严重，他已很难如在奉天那样如鱼得水，最终帮助孙烈臣起到稳定黑省作用的，其实另有其人。

黑面包公

张作霖自出任奉天督军起，常常感慨，地方上虽军警林立，但土匪仍然到处为害，自己想要肃清匪患，却又找不到得力的人。左思右想之后，他终于还是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顺存。

王顺存清末时在海城县任知事，是个勤政爱民、治匪有方的地方官，他曾顶着各方压力，将为非作歹的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二连

子”是张海鹏的亲兄弟，那时的张海鹏尚跟着冯麟阁在江湖上混，此人山头报号“大海”，又因满脸长满麻子，绰号“张大麻子”。他做事心狠手辣，素以“狞猛汉”闻名，为了给弟弟报仇，就带了数十个“胡子”，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一十八口都打死了。

这次来自黑道的血腥报复并未改变王顺存的行事风格，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严霜过后必见晴天”。民国肇始，王顺存在黑龙江出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省会警察厅长，他用三年时间，肃清了全省匪患，使得黑省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与此同时，他还开垦荒地，安置人丁，总之是为当地做了很多好事。为此，时任总统的袁世凯对王顺存的上司、时任黑龙江巡按使的朱庆澜予以嘉奖，并称黑省政治为全国之冠。

张作霖听说过王顺存的这些事迹，尤其海城发生灭门巨案时，他已在新民府出任管带，曾随知府到海城会验，对此事知之甚详，也能深深地体会到，在那样一种严峻的环境之下，一个敢于除暴安良的地方官需要多么大的能力、胆气和魄力。

当记起这名好汉的时候，王顺存已经辞职返回原籍。张作霖就让秘书长谈国恒去电邀王来奉，拟委其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

此时冯麟阁已被撤销职务，张海鹏转投张作霖，依然在二十八师当旅长。在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的情况下，张作霖怕张海鹏反对，便在王未到奉之前，召集高级将领们开会，说明需选用人才的道理，并说为了肃清匪患，他已电邀王顺存来省。

张海鹏虽报复过王顺存，但依然旧恨未消。听了张作霖的话，他马上站起来说：“叫他来吧，请大帅替我报仇！”张作霖当即驳斥道：

“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理堂（王顺存字理堂）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难逃法网。”

他让张海鹏搞明白公仇私仇的区别：“比方说，我们现在都当官了，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

几句话说得张海鹏自知理屈，但他不肯罢休，仍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对张作霖说：“大帅既不与我做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私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

张海鹏这一撒泼，使得双方当场闹成僵局，虽然孙烈臣等人很快就把张海鹏给拉走了，但会议还是落了个不欢而散的结果。

会议召开的第二天，王顺存来奉，当晚谈国恒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即将开会时张海鹏无论如何要报仇的事告诉谈国恒，让他通知王顺存赶快离开奉天：“张海鹏手狠心黑，说得出就做得出，他在省城的手下人很多，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

身为奉督，却不能自由选择贤才，用一个王永江，汤玉麟叛离，用一个王顺存，张海鹏大闹。这事挺让张作霖费神闹心，当着谈国恒的面，他忍不住发起了牢骚：“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

第二天一早，谈国恒将张作霖的意思转达给王顺存，王顺存即乘车赴大连转回原籍。事后得知，张海鹏果然一心要杀他，甚至于他离奉后，还以若行刺成功，即晋升营长作为条件，派了一个刺客前往大

连刺王。所幸王顺存到大连后，住在友人所开的商号里，商号又在日租界内，刺客才未敢动手。

一晃几年过去，轮到孙烈臣督黑，履任后他就深感黑省土匪猖獗，剿不胜剿。正在苦无办法之际，左右就向他建议起用王顺存，说王顺存在黑省威望很大，一个人能顶一个师的兵力，“现在如能将王请来，予以重任，则江省的匪患，不难平定”。

孙烈臣依言邀王。当王顺存接受邀请，途经奉天时，正好孙烈臣也在奉天，于是便偕王一道去见张作霖。张作霖很客气地对王顺存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

确如所言，统一东三省的张作霖已完全站稳脚跟，张海鹏等人纵有不满，也不敢公开出来叫板。随后，张作霖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

王顺存犹如是剿匪界的王永江，从能力、经验到态度上的不畏强权和不怕牺牲，都如出一辙。有这样一个黑面包公再次出世，加上张作霖、孙烈臣的支持，那些从前跟黑道勾勾搭搭的地方势力都不敢再对土匪进行掩护和包庇了。

三年之内，王顺存不但肃清了黑省匪患，为孙烈臣稳定黑省立下汗马功劳，即如东北其他地方的土匪也逐渐销声匿迹。

第七章　相约取天下

孙烈臣管治黑龙江，鲍贵卿把持吉林，张作霖自己控制奉天，孙、鲍、张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相对于前清东北官员几乎清一色非东北籍而言，“东北人治东北”乃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东三省如今都被统一到了张家旗下，张作霖由“奉天王”跃升为名副其实的“关外王”。

张作霖能够迅速统一东三省，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日苏的“相助”。当然这种“相助”也是无意中促成，前者是宽城子事件的爆发，令孟恩远及高氏兄弟束手；后者是中俄边境的紧急局势，把张作霖推上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宝座。

张作霖并不领日俄两国的“情”，他常说：“什么是外交？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与外国人办事。”在取得吉黑两省军政大权的前后，他一直致力于从俄国手中争回利权，包括恢复松花江航运权、取消呼伦贝尔自治，以及向松花江及葫芦岛派驻海军等，其中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东路权的争夺。

俄国因为爆发十月革命，分成了新旧政权。为了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它的支持，刚刚成立的苏维埃发表对华声明，表示愿意将中东路（此处专指中东路北段，即俄国控制部分，不包括南满路）交还中国。可是北京政府外交部因对苏俄政局的变动不了解，且未与旧政权断绝关系，却没敢欣然接应，反而傻乎乎地选择了“复文逊谢之”。

当时国人将旧政权人员称为“旧党”，将苏维埃新政权人员称为“新党”。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属于“旧党”，因国内动荡而被迫

暂时离职。看到“旧党”在中东路的控制上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新党”又顾及不上，日本及欧美各国立刻蜂拥而上，大家都以“国际共管”为由，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令情况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长袖善舞

面对列强纷争的复杂形势，张作霖一方面电请北京政府采取措施；另一方面调兵驻防，加强对中东路的保护（称为护路军）。1919年1月25日，北京政府交通部密电称：“日美等国协议共管中东铁路之事，并未征得我国同意，这是置我国主权于不顾，我国绝不能承认。”

所谓“国际共管”，按照列强们的说法，是将外国人在中国东北建的铁路置于国际管理之下，以免一国专权垄断。张作霖在受访时说，如果列强真的有这么好的心肠，他倒是非常赞成，可问题是不能只“共管”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怎么办？也得“共管”起来啊！

“如能把南满铁路收归国际管理，中东铁路我也宁愿牺牲，交归国际管理。倘若不然，只把一个中东路收归国际管理，我姓张的是极端反对，无论它是什么国家，怎样决定的，我张作霖是绝不听那套的。”

张作霖郑重声明：“我就知道中东路是中国人的铁路，应当归中国人管理。（对中东路）我自有办法，总之，我是绝不放松的！”

1919年11月，霍尔瓦特重返哈尔滨，并且称中东路附属地内的俄国人仍拥有国家统治权。吉林督军鲍贵卿而后致电霍尔瓦特，请他收回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中东铁路系中国领土，中国自有完全主权”。

一招不成，霍尔瓦特又来一招，说至少中东路附属地内的军事和行政权应归他统辖。中方回应：霍尔瓦特仅为铁路总办，无担负国家统治的职能。

欲收回中东路权，必先驱逐霍氏，成为东北各界的共识。1920年3月12日，哈尔滨三十多个工人组织联合向霍尔瓦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而且“霍氏一日不去，路工一日不开”。

其实从苏俄新政权的角度来说，霍尔瓦特早就失业了。发现这老毛子仍然死皮赖脸地不肯走，3月16日，鲍贵卿下令全面接管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的俄国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迫下台。当天张作霖亲自赶到哈尔滨，在他的授意下，鲍贵卿限霍尔瓦特三天内必须离开哈尔滨，不准再回中东路。

至当年年底，中国政府先后收回了中东路的警权、司法权、行政权，中东路附属地被改为东省特别区，由中国派驻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尚未收回的只剩下了中东铁路本身，北京政府准备借款赎回，但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

张作霖在对苏俄交涉上，向来“无所屈挠”。他曾发布宣言说：“中国对新党守局外之中立，新党对于中国主权内之事项也应格外尊重才是。”言下对“新党”几次三番宣称要把中东路还给中国，可始终口惠而实不至很是不满。

不过话又说回来，“新党”起码有了这样的表示，那就是可以谈了，为什么还要再向别的国家借钱来赎呢？张作霖因此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保护东北的边界为主，至于借款赎路关系到中国主权，我决不承认。”

自“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日本为维护其在东北的既得权益，不得不转而支持张作霖，奉系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鉴于张作霖草莽出身，没有多少现代知识，甚至哪一省在哪里都不知道，日本人最初也以为对付起来困难不大，没有料到张作霖的算盘其实精得很。

在与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张作霖的一贯处事原则是：小权小利可以让的好商量，有关国家命脉或地方安全的，想都别想！

日本向北京政府大量借款，其中有很多涉及东北权益，比如“吉会铁路筹备借款”“吉黑两省农矿借款”“满蒙四路筹备借款”等。日本要求东北方面履行条款，张作霖来了个概不承认，让日方直接向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这些借款的条件都非常低，抵押品不过是森林、电线之类，张作霖既不履行，北京政府也顺势拖延，日本两边都无着落，只得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

自近代以来，对日交涉向来是东北执政者最感棘手的问题。张作霖之所以能够做到长袖善舞，与他善于用人有很大关联，在对日外交上，他又特别重用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杨宇霆，另一个是与杨宇霆关系非常密切的常荫槐。

杨宇霆的政治外交手腕非常高明，“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日本的内情知道得很清楚，有许多日方情报供给来源，也因此能够对症下药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周旋。平时张杨配合得相当出色，每当日本向张作霖提出某种苛刻要求时，张作霖就会以“好，好！我叫杨某来办”的话作答，如果对方想索取书面保证，他便装文盲，以自己不通文墨为由加以拒绝。后来苏联学者经过研究认

为，张作霖在统治东三省期间，之所以始终未与日本签订任何正式协定，就是“因为遭到杨宇霆的强烈反对”。

只要张作霖不立字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日方打消、变质或将相关损害减至最低限度。这一方面是因为杨宇霆了解对方底细，掌握着他们的价码和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也是他和张作霖对日本政客进行多方联络乃至于“收买”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从奉天省府档案中发现，日本要人以至于政党竟然多数都曾从张作霖手里拿过钱！

什么叫手腕，就是他明明很强硬，但还不让你觉得他讨厌。和杨宇霆打过交道的一些日本人对杨宇霆的评价都不低，本庄繁常说：“日本没有像杨宇霆这样富于正义感和能办事的人。”町野也说：“的确，杨宇霆很敢说敢为。”

关内纷争

日本在东北攫取权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继续开口要；另一种是在原有的权益上进行扩展，例如利用南满铁路控制东北交通和军事，同时进行资源掠夺以及侵蚀当地经济。张杨对后者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张作霖在一次讲话中，曾对工商界人士说：“买卖人不要轻看自己，英国一个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灭亡了。今天的南满铁路公司，就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它是灭亡我们的大本营。”

众所周知，南满路是日本人死都不肯放松的。在这方面为张作霖想出对策的人，便是常荫槐。常荫槐负责主管东北的铁路事业，任职期间他大力兴建东北铁路，这些铁路全部都与南满路平行，从而对南

满路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满铁的营业收入因此大受影响，在生意清淡的情况下，不得不以降低运费的办法与东北自建铁路进行竞争。

完整的铁路网必须配有良港，除建路外，常荫槐还积极筹划在葫芦岛筑建商港，以与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港进行对峙。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距离东北和内蒙腹地较远，而葫芦岛连接两大铁路干线，几乎东北各地的货物都可以此为集散地，交通上要比大连港便利得多。一旦葫芦岛海港建成，大连港就可能像南满铁路一样逐渐失去作用，最终沦落为一个死港。

日本对此当然极为不满，甚至有人大肆咆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在东北路权交涉中，日方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可是结果都不了了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唯恐杨宇霆等反对派将乘机制造纠纷”，从而使他们已取得的权益“化为泡影”。

打不得，骂不得，逼不得，也吓不得，无可奈何之下，日本只能选择走所谓“稳健”道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本人就是稳健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主张日本在东北“不可急进，必须条件成熟，不然就会无济于事”。

在关外与日俄争锋的同时，自恃已有充分实力的张作霖也开始不断介入关内纷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系原先的首领冯国璋去世，曹锟、吴佩孚继起，在这两人的领导下，直系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争斗激烈。众所周知，段祺瑞视其首席幕僚徐树铮为自己的灵魂，须臾不可或缺，而徐树铮也对段祺瑞感恩知己，忠心耿耿，两人可谓是情同父子。因此直系的攻击策略是先把矛头集中指向徐树铮，要求段祺瑞“亲君子远小人”，罢免乃至处死徐树铮。段祺瑞当然不肯做这种自毁长城的事，两派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在北洋内部各派中，直皖旗鼓相当，此外就数奉系实力最为强劲，直皖双方也都很重视拉拢奉系。1920年春，段祺瑞派嫡系第九师所部参加协约国组织的“西伯利亚干涉行动”，不久第九师师长魏宗翰奉命代表陆军部前去海参崴一带慰问参战部队，临行前，段祺瑞特地交代，让他在经过奉天时试探张作霖的态度。

魏宗翰途经奉天，张作霖招待得殷勤备至，并且一再对他说：“拥护段总理的武力统一政策，绝不偏袒曹仲珊（曹锟字仲珊）方面。至必要时，愿以中立的资格出头调解。”慰问结束，经过双城子时，驻防双城子的吴俊升到站为魏宗翰一行送行，并赠送了两袋高粱米，车抵锦州，张作霖的大公子、已任旅长的张学良不仅同样率官兵到站向他们列队致敬，而且还亲自上车对魏宗翰说：“我父亲要我来向魏老伯请安。”看到吴俊升、张学良对自己如此尊敬，魏宗翰更相信张作霖的话了。

有了来自奉系的这一系列表示，段祺瑞与直系相争时底气多了不少。由于直皖两派谁都不愿意退让，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逐渐变得不可避免。总统徐世昌原本抱着借直系压段祺瑞的目的，但真的弄到刀枪相对的地步，也就等于把他推上了火山口。为此，他急电关外的张作霖来京调停时局。

1920年6月19日，应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坐专车来到北京，一时间，这位声名赫赫的“关外王”备受各方瞩目。对张作霖来京调解，段祺瑞起初抱有极大期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有言在先，是向着自己的，退而求其次，即便是站在中立立场上调停，最低限度也应该不会偏袒直系。皖系的其他人大多有着类似想法，徐树铮大老远专门跑到廊坊车站，上车为张作霖引路。段祺瑞的另一个幕僚曾毓隽则将北京的奉天会馆粉饰一新，准备用作大帅行馆。

直到张作霖前往皖系基地团河拜访段祺瑞时，皖系才蓦然意识到他们的所有美好设想都不过是一厢情愿。

动物般的机警

最大的症结所在仍然是徐树铮。因为私自招兵案，张作霖与徐树铮结怨。就在直皖尖锐对峙前，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凭一己之力，未费一枪一弹，即成功取消外蒙独立，此后开始大力经营外蒙。此为徐树铮历史上最大的功绩，也是段祺瑞引以为豪且不肯撤换或处分他的一个重要理由，然而这同样又引起了张作霖的不快——张作霖统一东三省后，就计划进一步由自己来统一满蒙，徐树铮的所作所为显然与此相冲突。

徐树铮的意见左右着段祺瑞，自然也就代表了皖系方针。于是在需要站队时，张作霖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皖系的对立面也就是直系一边，魏宗翰路经东北时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事先编排好的一场戏而已。

来京之前，张作霖其实早就跟曹锟、吴佩孚穿一条裤子了，调停不过是幌子，其真实目的是对段祺瑞施压，逼其不战而降，答应直系的条件。发现自己上了张作霖的当，段祺瑞在大失所望之余，仍坚决不肯妥协，他对张作霖说："你去转告曹仲珊（曹锟），吴某（指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罢了，他要是不服，尽可与我兵戎相见，我不怕。"

张作霖几次去团河与段祺瑞商谈，把调停角色应有的中立公正立场抛弃得一干二净，到后两次，几乎已经完全成了直系的代言人。这

让皖系军官们十分火大，徐树铮更是极力主张趁机除掉张作霖，以绝后患，然而段祺瑞向来主张堂堂正正地进行政争，没有接受徐树铮的建议。为免张作霖在团河出现意外，他在谈话中就直接对张作霖发出暗示和警告："你回你的奉天，别管我的事！"

张作霖来团河不仅带足卫兵，还把早年前随自己闯荡江湖的那支八厘米套筒步枪藏在汽车中，为的就是防备万一，但段祺瑞若真的要下决心扣留或干掉他，仍然有着充分把握，所以在听出段祺瑞的话外音后，顿时吓得不轻，在与卫兵互换衣服后便急急忙忙地逃出了团河。

见段祺瑞放跑张作霖，徐树铮急得直跺脚，连声哀叹："大事去矣！"就在徐树铮继续派人追杀的同时，张作霖已经迅速离京，他乔装改扮，身着便服，并临时改变了回奉线路，最终得以安全返回自己的奉天大本营。外界对此的评论是"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具有动物般的机警"，还有人把这一对仇家的表情包叠加了起来，"与徐树铮的唉声长叹相反，作霖不觉得意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嗤笑了起来"。

对于皖系整体来说，放跑张作霖确实是大错特错。1920年7月上旬，张作霖宣布"武力调停"，亲自指挥七万奉军入关，而后又在直皖激战的关键时刻直接插手，形成夹击皖军之势。皖军在与直军交战过程中本已陷入被动，至此士气更加沮丧，最终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方天下落入曹锟、张作霖之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人进行了利益再分配：曹锟在执掌中央政府实权的同时，做出重大同意，同意由靳云鹏组阁。

靳云鹏虽曾是段祺瑞的门生兼重要幕僚，但因与徐树铮势同水火，实际早已与段祺瑞及皖系分道扬镳。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扶持他，与在东北扶持鲍贵卿是一个道理。

随着皖系的覆灭，张作霖不仅得以操纵北京政局，而且也终于有机会替代徐树铮，把手伸进蒙古地区了。他最早打算控制热河。民初时的热河包括直隶一部和蒙古南部，在行政区划上被称为热河特别行政区，因为与奉天相接壤，关系密切，自然就成了张作霖统一满蒙计划中的第一个目标。

要控制热河，就得把热河都统换成自己人。可热河时任都统姜桂题时年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但驻守热河多年，更重要的是他乃毅军元老，连段祺瑞看到都要敬其三分，张作霖一说要将姜桂题调职，各派都群起抵制，使得他不得不知难而退。

热河暂时拿不下，只得打察哈尔的主意。察哈尔也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该地区位于内蒙南端，一左一右分别是热河和绥远。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属于直系，不过他参加直皖战争较晚，也因而得罪了曹锟、吴佩孚，所以很容易就被张作霖和靳云鹏联手撤掉，代之以奉军大将张景惠。

就在张作霖思谋着下一步该如何染指热河、绥远的时候，从外蒙突然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亲征蒙疆”

在徐树铮的努力下，中国本已收回外蒙，但因为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被迫将驻扎外蒙的主力部队调入内地参战，仅将一个约一千五百人的混成旅留在了外蒙区域中心库伦。

1921年1月，“旧党”白俄军将领恩琴突率五千余众侵入外蒙，对库伦形成三面包围。接到库伦危急的报告后，总统徐世昌马上命令驻屯张家口的奉军邹芬部进行援救。其时正值严冬，塞外冰天雪地，要想快速横越大沙漠更是极为困难，邹芬只能先派小部队前去救援，自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守军苦苦支撑一个多月后，因粮草弹药极度匮乏，库伦失守。攻陷库伦后，恩琴一边以外蒙活佛的名义宣布外蒙独立，一边继续向中国内地进犯。

经过直皖大战，早已溃败的皖军当然是指望不上了，北京政府只能敦请直奉两家派主力出征。不料这两家互相推诿，张作霖推举吴佩孚为援库总司令，率直军征蒙，吴佩孚却坚辞不就，说以地理之便，更应该由奉军充当主力。张作霖自己同样按兵不动，理由是中东路关系重大，万难分兵。身为察哈尔都统的张景惠吃不消北京政府一再催促，向张作霖请示怎么办，竟然招来他一阵大骂：“你干什么急着往北进兵，想自己找死吗？”

从吴佩孚来说，这哥们儿是个典型的爱国“嘴炮”，向来爱骂别人是卖国汉奸，自己则“为中国民族而战……为国人争人格”，但是谁也没看到过他去北疆收复过什么失地，或是跟他口中憎恨的“倭寇”干上一仗，倒是打内战打得十分起劲。

张作霖与吴佩孚一样，都怕因此损兵折将，失掉和对方的兵力平衡，就此而言，当时南方革命党人骂他们是军阀，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冤枉之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即被他们口诛笔伐的徐树铮和皖系，在实际行动上反而比他们更符合国家利益。

除了担心损耗实力这个共同点外，张作霖之所以迟迟不肯出兵，还有属于他的顾虑。当时远东国际形势十分复杂，“新党”苏俄主要把精力用于应付协约国方面的干涉，一时无暇东顾，日本便趁机借助白俄军的力量，向远东进行渗透。直皖大战前，徐树铮在外蒙即遇到了日本的阻力，只是当时皖军投入外蒙的兵力较强，日本才未能得手。此次外蒙独立，表面是白俄军作怪，背后实质是日本人在作祟——恩琴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全力扶持，他的白俄军里面除了俄国人外，还有日本人。

张作霖与日本打交道并非一日，深知日本对外蒙早有觊觎之心，他唯恐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征蒙，不但难以取胜，而且会招致日本的不满和报复。

当然张作霖内心里还是想借此机会收复外蒙的，毕竟外蒙也在他的统一计划之内，而且当时舆论对他也有一定压力。比如《申报》就把库伦失陷归咎于奉军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救援，该报还讥讽奉军是“贪鄙小人，懦夫怯卒，差足当之。名曰武人，尚属过誉矣”。

外蒙是要打的，而且必须我来打，但是得等待时机！张作霖一面与中央讨价还价，一面暗中命令张景惠、邹芬做好出征外蒙的准备。

见奉直双方在征蒙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北京政府只得在天津专门召开会议，对此进行研讨。此时在张作霖的一再要求下，

中央松口答应拨付三百万元作为“征蒙费”，张作霖认为征蒙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在会上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亲征蒙疆”。

张作霖既愿主动挑担，北京政府自然是如释重负。1921年5月30日，总统徐世昌颁发命令，特任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享有指挥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的权力。

内蒙本由热、察、绥所组成，现在被张作霖以征蒙的名义一蹴而就，帮他解决了原来最为头疼的一个难题。如果北征外蒙再能成功，那么统一满蒙计划便大功告成，他就能从“关外王”成为事实上的“满蒙之王”了。面对这一远景，张作霖很是激动，他在怀仁堂外蒙大会上当众表示：“事若不成，暴尸疆上。”

此时，外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恩琴率白俄军主力北上进犯苏俄境内的远东共和国，结果大败而归。看到支持他独立的俄军元气大伤，外蒙活佛慌了，急忙派密使赴京，谋求和平归附。与此同时，苏俄击破了来自欧洲方面协约国的威胁，主力逐渐东移，迫于苏军的压力，日军准备从远东滨海地区撤军，暂时也不再关注外蒙。

这本是张作霖实践诺言，一举收复外蒙的绝佳时机，要知道兵贵神速，当初徐树铮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兵临库伦城下，从而收获全功的。可是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后，想到的不是立即出兵外蒙，而是怎样先消化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先是忙着用政府拨下的三百万元“征蒙费”扩充奉军编制，继而又派兵强行在热河过境，从而与热河老都统姜桂题发生冲突。

为了让张作霖尽快征蒙，北京政府不得不出面将姜桂题调职，然后再按照张作霖的要求，委任奉军将领汲金纯为热河都统。

此后，驻丰台、廊坊、马厂的奉军纷纷调防，声言开赴蒙疆，实则都没有开拔。徐世昌、靳云鹏再三促请，张作霖的答复都是准备不足。

烫手山芋

张作霖倒没有说谎，回奉天后，他就召集了东三省征蒙会议，为征蒙抽调兵力和筹集物资。在他的指令下，奉天兵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武器，但还得觉得缺口太多，于是又从上海购入步枪五千支，从汉口兵工厂购入子弹数百万发。

甚至于张作霖把他压箱底的宝贝也倒腾了出来。直皖战后，奉军从皖军手里缴获了一批飞机，他决定从中拨出四架或六架随队征蒙。那些天里，奉天人时常能看到飞机在空中连续不断地进行训练。

问题是，连张作霖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才算准备充足。因为他要避免过多的人力物力损失，便把“以武力求和平”作为自己的征蒙方针，其实也就是不停地在家里倒腾，指望着既增加征蒙的胜算，又能使外蒙活佛和王公感到害怕，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就在他拖拖拉拉，左顾右盼的时候，正对外蒙予以密切关注的苏俄政权采取了新的行动。1921年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契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声称苏军必须进入外蒙境内与白俄军作战。

苏俄的这一声明，完全打乱了中方的征蒙计划。徐世昌、靳云鹏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他们一边通过外交部拒绝苏军入蒙的请

求，一边促请张作霖加速进兵。电报发到奉天，张作霖还是“准备不足”，不过与原来稍有不同的是，这次他已经掂出了征蒙的分量。

俗话说得好，看人干活不累，原先见徐树铮在外蒙建功，似乎轻轻松松，等到张作霖真把活接过来，才发现颇不轻松：对外蒙的具体情况，奉军之中包括张作霖自己在内，都不是很熟悉，加上又是悬兵万里，在物资奇缺、运输困难的漠北作战，几乎每一个细微环节处理起来都令人挠头。

为了鼓舞士气，使部卒们克服畏难情绪，张作霖决定像原先许诺的那样，亲自带队出征外蒙。幕僚们劝止道：“漠北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还请大帅留后坐镇全局为好。”张作霖故作轻松地说：“我曾先后两次到过库伦，熟知水陆交通，攻打外蒙，并非你们想象的那样困难。”

张作霖把亲征的日期定在7月26日上午，计划看上去很宏伟也很完美，可惜的是苏俄不会承认这个时间表。6月28日，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苏军抢在奉军正式出兵之前，进入外蒙围剿恩琴，并于7月6日攻占库伦，恩琴残部仓皇逃遁。7月12日，苏军将原先一俟消灭白俄军，即退出外蒙的声明置之脑后，他们在掌握外蒙实权后，即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至此，北京政府拟定的种种征蒙言略通告破灭。

张作霖的“亲征蒙疆”亦成画饼，他对外表示“蒙疆已无匪可平，无须派大军前往，只需政府派人与苏俄接洽，交还库恰（指库伦和恰克图）即可”。按照张作霖的实际意图，他是想把外蒙问题再推给北京政府，可是既然苏俄已控制了外蒙，其棘手难度显然还要超过以往，这

块烫手山芋如今谁都怕捡，所以徐世昌、靳云鹏还是命张作霖以蒙疆经略使的身份与苏俄交涉，以求相机收蒙。

苏俄占领库伦后，嘴上说愿将库伦和恰克图无条件交还中国，实际与它对待中东路等问题一样，不过在施欲擒故纵之计而已。他们所派的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优林在与张作霖谈判时，对交还库伦一事一再出尔反尔，提出各种苛刻条件。张作霖系以中方代表出面，所以在谈判中始终能以国家主权为重，对优林寸步不让，双方谈了很长时间，但毫无进展。

苏俄不肯归还库伦的理由之一，是恩琴尚在逃亡途中。8月25日，恩琴被苏军擒获，随即遭到处决，余部四散溃逃。北京政府认为这是促其归还的一个好时机，因而又组织了新一轮谈判，但苏俄根本无意将外蒙归还中国，不过是以谈判换取时间，造成苏控外蒙的事实而已。11月5日，苏俄与外蒙地方当局签约，承认外蒙完全独立。

年底张作霖受访时，有人问道："大帅，蒙古事情，不知现在怎样了？"张作霖的回答是："蒙古事不成问题，只要中央政府稳当，我便可把它收复回来。现在中央乱七八糟，收回问题，无从接洽。"又问："听说俄国赤党（指苏俄）在库伦驻兵很多，不知确否？"

"不用听外边乱说，其实只有三四百人，不成问题。"

事实是，对于外蒙问题，张作霖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他如今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关内争霸。

官胡子

1921年冬，张作霖自京返奉，途中下榻姜家屯。出现在姜家屯乡人面前的张作霖一手撑手杖，一手拿纸烟，他身材不高，白面黑发，态度文雅得像文人，而不是一个武夫。

不过这只是从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以时政观察家的角度来看，张作霖有着迥然不同的形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往访张作霖，他见到的张作霖"面色红润，两目常下垂，发言时偶尔举目一视，虽对外宾表示礼貌，但其骄人凌人之概，时时显露"。

当着孟禄的面，张作霖纵论国内政坛百象，且一语惊人："中国大病，在'官胡子'太多！中国大多数官吏，都是吃干薪不做事，国家焉有不穷？政治焉有不坏？这一些王八蛋，应当把他们都宰杀个干干净净。"

张作霖认为当时的督军省长、总长督办，全都是该杀的"官胡子"，因为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做两三年官，便称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哪来那个钱，还不是小民的！"

身为民国的封疆大吏，张作霖一方面说自己也算"官胡子"，也该杀，但他又为自己辩护说，任职以来，他拿的省长薪金、督军薪金，几年下来积攒了五百万，全在官银号放着，分文未动（张作霖的个人生意庞大，生活中主要靠这方面开支）。

张作霖抛出"官胡子论"，不是要朝其他省的同僚开炮，而是剑指中央政府。他先将唾沫星子喷到时任总统徐世昌身上："大总统的家人，有一人兼十来个差的，总统是一国的表率，竟任家人这样，真真岂有此理！"接着便数落起了靳云鹏内阁。

靳云鹏是张作霖在直皖战争后一手扶上马的，但上台后在财政上焦头烂额，穷于应付。尤其是1921年11月，北京爆发金融风潮，国内催饷，国外逼债，令靳云鹏几乎陷入绝望境地。张作霖曾在北京目睹金融风潮的可怕，“国家银行，弄糟到这步田地，成何事体”?

虽然自己一度是靳内阁的铁杆支持者，但面对此情此景，张作霖仍对靳内阁产生出了恨铁不成钢之感：“外国人每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不过钱都入了官吏的私囊。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

说起财政危机和外债，张作霖在任上也遭遇过，不过凭借王永江理财，他不仅成功地渡过危机，而且还可以拿出来自诩：“我接奉天省事情的时候，奉天欠两千万外债，现在不到六年，我把这些外债都还干净了，另外还积了两千万出来。”

以此及彼，让张作霖有了为别人指点江山的底气：“拿奉天省作个比例，可见整理全中国的财政也是不难的。全国这点外债，东三省若发展发起来，使使劲，只三省之力也可还清了。”说到兴奋处，他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我姓张的今天发一道命令，使人民每人摊多少公债还外债，不数日就可把钱凑齐。”

虽然没有真的下过那道“命令”，但据张作霖说，是他在紧急时候拿出奉天的省款，筹了三百万接济，国家银行才未倒闭，而他帮了中央政府，非但没落下好话，还惹来非议。张作霖对此愤愤不平：“这些浑蛋报纸，又说我有什么野心，什么条件，真是放屁。我是干干净净无条件接济的，丝毫没有什么野心。”

事已至此，张作霖也不打算再支持靳云鹏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了，他对孟禄说：“外边人常常不问缘由，责我们不服从中央命令。不知道像这么糟的中央政府，叫人怎样服从啊？”又就靳内阁表明态度：“外边都传说我赞助靳内阁，说他是我的亲戚，全是胡说。我何尝赞成他。他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我还赞成他吗？我告诉你们吧，中央政治不久就得变动一下。”

张作霖与孟禄谈话之前，中央政局果然发生了大变动。1921年12月17日，靳云鹏宣布内阁总辞职。一周后，梁士诒内阁成立。

虽然张作霖口口声声“朝野没有一个好东西，把他（指靳内阁）推下去，再来一个，还是那样”，但实际梁士诒内阁也是由张作霖所全力扶持，包括张作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也进入内阁，当了陆军总长，所以外界也称其为“奉系内阁”。

好好治治他

新任国务总理梁士诒秉承过去段祺瑞皖系“务实外交”政策，利用条件较为优厚的对日借款来缓减财政危机，同时在华盛顿会议上也为中国争取到了部分权益。应该说，在维护国家利益这件事上，梁内阁做得并不是很差，可是这也并未能让他们避免被倒阁的命运。

直系对梁内阁持不支持态度，梁士诒就职当天，吴佩孚甚至连封贺电都没发来。这使梁内阁自然而然只能对奉系一边倒，致使张作霖在中央的发言权高到极点，而直系的中枢地位则几乎降到了零。反过来，这又更增加了直系对梁内阁的不满。

吴佩孚一边密电各省直系督军逼宫，一边利用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给梁内阁猛扣卖国贼帽子。报纸上三天两头能看到这位前清秀才激情洋溢的妙文，比如“我国不乏爱国健儿，到时恐怕火烧赵家楼的旧剧又要重演”，又如“请问今日之国民，谁认可这个卖国的内阁”。

吴秀才的文笔是如此之好，以致当时的国人把他的通电当作国文范本或“新古文观止”，都说读了这些文章，就不愁文思不畅，文笔不雄健了。

中国人通常都是感性的，并不太注重理性思考，没有人会去认真剖析每一件事内部的是是非非。结果是吴佩孚仅发了连续几天的电报，未用一兵一卒，便使梁士诒放弃了继续主持内阁的勇气，弃职逃往天津。

吴佩孚此举令张作霖愤怒至极。其实他和吴佩孚之间早就互相都看不惯对方了，张作霖自恃是堂堂封疆大吏，而吴佩孚到直皖战争时也只不过是个师长，照他的话说“我国师长多达数十名，即使我自己手下也有不少”。至于吴佩孚，同样也不把张作霖认在眼里，他认为自己是秀才，秀才遇到兵，尚且有理讲不清，何况张作霖以前还是个土匪头子呢?

你还别说，张作霖若论地位，虽然与当年绿林时期已不可一日而语，但他的那点德性真就没怎么太变过。直皖一战，直军是主力，奉军只是配合，坐收的是渔人之利，可是战争一结束，张作霖就给张景惠下达紧急命令，让张景惠抢在直军前面，从皖军的军械上捞油水，“别的都不用管，赶紧划拉去吧”。

张景惠得令，真就拿出“砸窑”的劲头，把能抢到的东西都抢到了手，连已被直军得到的两个空军探照灯也被他们夺了过去。

吴佩孚得报后大骂奉军是土匪，他朝着曹锟大发牢骚：“张作霖真不像话……南苑和东直门库房的飞机、军火被他们搜劫一空，这还不满足，居然把我们接收到手的探照灯也硬给抢走。这样的‘红胡子队’，今后怎好合作？”

曹锟听了也很是不满，大骂道：“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两个坏灯还要。”

骂归骂，当时直奉刚刚联手打败皖系，也不可能两家马上又自己打起来。曹锟、吴佩孚只得忍着气，继续在天津与张作霖开“分赃会议”。会议期间，张作霖频频驳斥曹锟的意见，吴佩孚见状发言反驳，意思是你奉军不过是在皖军主力已被我击溃的情况下，才中途参战的，等于是从我们手里夺取胜利果实，有什么可居功自傲的?

吴佩孚说话跟他写文章类似，一向尖酸刻薄，张作霖当场非常难堪，他愤然变色，对曹锟说：“三哥（曹锟在家排行老三），今天这个会，是咱俩商议要事。如果说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也有好几个师长呢！”

张作霖此言一出，吴佩孚下不来台了。他气呼呼地站起来拂袖而去，出来后对他的幕僚人员说：“他张胡子自己觉着不错，我不得势则已，一朝得势，必好好治治他，叫他认识认识我这师长！”

如今的吴佩孚早已由师长晋升为两湖巡阅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挑翻“奉系内阁”也可以说是他得势之后对张作霖的一次凌厉反击。

张作霖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直皖战争中吴佩孚展示出来的军事才能，以及直军整体所拥有的实力，都让他不敢贸然站出来与直系单挑。为了增加胜算，他决定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其他反直力量进行联合。

最早主张建立反直联盟的，不是张作霖，而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形势下，孙中山认识到要取得政权，就必须擒贼擒王，首先打倒直系，为此他一边打算回广东重组政府，进行北伐，一边号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曹锟）吴（吴佩孚）”。后者就是所谓的“三角反直联盟”，或曰“孙（孙中山）段（段祺瑞）张（张作霖）合作”。

革命党人与段、张自然不是一路人，孙中山对段祺瑞的看法尚可，认为段“反袁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徐树铮取消外蒙独立时，他还曾致电祝贺。但张作霖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形象要差得多，孙中山视他为“过去的土匪头子”“列强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的土皇帝和军阀”。之所以要联合他们，当然只是为了倒直的需要，例如在平息党内关于联合段祺瑞的异议时，孙中山解释得就很明白：“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此说当然也适用于张作霖。

海外侨胞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资源。有一段时间，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孙中山就以此为契机，派东北籍党人宁武带上华侨资本家的信，前去天津联络正在参加“巡阅使会议”的张作霖。

好事多磨

宁武到天津后，先通过一些社会关系结识了张景惠，再由张景惠介绍与张作霖会晤。晤谈中，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葫芦岛海港表示欢迎，宁武趁机说，要让华侨来投资是没有问题，不过外面谣传直皖两系又要动刀枪了，时局不定，华侨怕把钱往海外扔，所以很是担心。

这么说只是为了切入正题。在转弯抹角扯了一阵后，宁武见张作霖确实对直系有反感情绪，这才开始试探道："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谈了。"

张作霖一听就明白了宁武的真实身份及目的，他马上很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先生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儿？"

张作霖问的是段，其实指的也是他自己，即孙中山为什么肯放下党人和北洋之间的恩怨，与他们进行合作。宁武当然不能把自己党内讨论的那些东西向他和盘托出，于是便只有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张作霖不会革命，但他知道合作反直的好处。经过和幕僚们商议，他向宁武表示可以试试看，并派自己少将副官带着问候信，随同宁武去拜见孙中山，这样孙、张之间便建立起了初步联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年秋天，张作霖来北京，特派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邀宁武到京会谈。其间，曹锟突然来见，而且一进门

就嚷：“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锟在家排行第三）呢？”

张作霖忙矢口否认，让曹锟不要听信外界的胡说八道。曹锟为人忠厚老实，不知道旁敲侧击和玩阴的，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当即拿出两封信给张作霖看。

这两封信是其他革命党人寄给宁武的，信里牵涉到了宋文林。张作霖见了，赶紧就势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宋文林，还下令张景惠把宋文林扣了起来，以此敷衍和打发了曹锟。

曹锟这么一迫一闹，反倒对孙张合作起了促进作用。次年张作霖在奉天直接会见了宁武，他对宁武明白表示：“现在国家成了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去先联络一下。”随后他便派李少白带着密码本，随宁武去南方晋谒孙中山。

宁武认为孙张合作已经快接近于瓜熟蒂落，回去后即对孙中山说：“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

然而好事多磨，报上不久就登出消息，说张作霖派代表某某赴桂林密商，要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张作霖嘴上恭维着孙中山如何如何，却并无拥护对方为大总统的打算，他以为是南方党人利用李少白对政治内幕不了解，预先捅出去的消息，见到李少白后不容对方分辩，就破口大骂：“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

骂完李少白，张作霖立即命人发电，否认李少白是他的代表以及报上所登载的消息。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南边人我们斗不了，什么合作，算了吧。"

第二天，宁武求见，张作霖余怒未消，他连珠炮似的对宁武说："现在是共和国，你们革命党明明知道总统是选出来的，不是我张某一个人说了就成啦，为什么要登报造谣言？看来还是我自己动手打姓曹的吧，胜败都不管，什么与广东合作，算啦，算啦！"

宁武跟他解释，李少白在桂林并没提过大总统问题，报上的消息只是政客造谣，为的是破坏粤奉合作，进行挑拨离间。经此提醒，张作霖才作恍然大悟状，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

在与宁武的谈话中，张作霖还提到，有人告诉他，两广遍地是匪，孙中山没有力量北伐，至少几个月内办不到。宁武澄清说现在两广不是这个样子了，同时他还向张作霖转达了孙中山的原话："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

张作霖听了颇为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他让宁武密告孙中山，称只要革命党在南方率先北伐，他立刻派兵出关响应。

欺人太甚

如果能像直皖战争那样，其他力量先打头阵，把直系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然后奉系再出兵，以举手之劳取得决定性胜利，实乃张作

霖求之不得的结果。孙中山在这方面也没有欺瞒他，没过多久，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随后孙中山驻节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

可是北伐要真正启动起来并不容易，内部粤督陈炯明表示反对，外部湘督赵恒惕又不敢假道，致使迟迟难以成行。张作霖很是失望，他把孙中山叫作“孙大炮”，在内部谈话中说：“一个孙大炮天天嚷北伐……”

除孙中山外，段祺瑞也与张作霖达成了合作推翻曹吴的密约。尽管段、张在直皖战争中为敌，但他们一度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未中断，战争结束后，吴佩孚曾经想抓住段祺瑞不放，又是张作霖采取力保的态度，才使得段祺瑞能够安然无恙。

时过境迁，如今奉张既已与曹、吴为敌，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心东山再起的段祺瑞便很容易和他走到了一起。与孙中山相似，段祺瑞在北洋属于他那个圈子里，同样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虽然他早已倒台，无官位爵禄可施与人，但四面八方肯给他打听消息和跑腿的人仍然非常多，这也成为他可以与张作霖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政治资源。

在段张密约中，双方说好由段负责对直系内部进行策反，张则负责相应的费用。可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渠道以及害怕走漏风声，段祺瑞在派人往奉天取款的过程中颇费周折，从而也使得策反行动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效。

“三角反直联盟”，孙中山行动迟缓，段祺瑞无所作为，张作霖暂时只能靠自己。他采取离间术，给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发去一封电报，

说："吴小二非善相与者，公如不悟，再宠信之，将来难保不为殿前检点。"

"吴小二"指的是吴佩孚，因其在家中排行老二，张作霖便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很不好听的雅号。"殿前检点"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后周时皇帝柴荣逝世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结果柴荣一死，赵匡胤便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天下。张作霖以此暗示吴佩孚不安其位，是曹锟身边的赵匡胤，一有机会就会夺他的位子。

可是张作霖的挑拨离间，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曹锟其人大智若愚，很会使用部下，吴佩孚虽是他的下级，但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岂是外人可以随便忽悠的?

就在曹锟考虑该如何回复张作霖的时候，有人建议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是咱们团体的中坚，不论免他的哪一个职务，都必然会使大家离心离德。况且这样做，也太示人以弱了。不过子玉总与奉天抗衡下去，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大帅要劝止他才好。"

曹锟听从他的建议，派人去洛阳见吴佩孚，并带去相关的处理办法。吴佩孚也依其要求，在张作霖四十八岁寿辰之日，给张作霖拍发一电，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再反对现有内阁人选，并对想出任内阁总理的鲍贵卿加以称赞。

这本是曹锟用以麻痹张作霖，缓和矛盾的权宜办法，可是张作霖却会错了意，他以为自己的离间之策已经得手，大喜过望之余，胃口居然也跟着变大了。

当天，曹锟的弟弟曹锐来奉天为张作霖祝寿。其间，张作霖又说了一通吴佩孚的坏话，然后问曹锐："令兄是要亲家，还是要属员？"

直皖战争结束后，为加强与直系的政治联盟，张作霖与曹锟结成了儿女亲家。他这一问颇让曹锐作难，只好答道："我三哥没有别的意思，遇事作梗的不过是吴子玉一个人，但是他已责备过了。"张作霖听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吴小二是什么东西，他也配干涉我两家的情义和国家大事吗？"

趁着曹锐诺诺连声，张作霖开出了自己早就想好的价码，而当曹锐带着这些价码回去复命时，把曹锟惊出了一身冷汗：张作霖共提出三个条件，除梁士诒必须复职外，还包括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划归奉军驻防，以及免去吴佩孚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

如果说第一条尚可商量，后两条可谓直指直系要害，已打破了曹锟所能容忍的底线，简直可以和当年直系向皖系叫板时的情形相提并论了。曹锟马上在保定召开直系军官会议，将张作霖的三个条件公布于众。军官们听了群情激愤，都认为张作霖欺人太甚，实在是太不把直系放在眼里了，既然如此，他们情愿豁出去与之拼个你死我活。

众人的支持让曹锟解除了顾虑。他当即向秘书口授一份拍发给吴佩孚的电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想照例改成文言，曹锟摆摆手："不必，速电发。"

直奉终于彻底撕破了脸。1922年3月，南方传来消息，孙中山免陈炯明职，移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这使张作霖更倾于向直系动手，不过他也深知此次若与直军对决，绝不会再像以往那么轻松，因此特地召集军事会议，以便对是否要入关作战进行最后定夺。

隐忧

自杨宇霆受徐树铮私自招兵案而失宠被贬，张作霖先提升张作相为奉军参谋长。张作相出身草莽，不谙军事，办事多不称张作霖之意，张作霖只好让他接替孙烈臣，转任第二十七师师长。

张作相之后一度出任奉军参谋长职务的是一个叫秦华的人。秦华也曾留学日本，但论能力亦远不及杨宇霆，张学良的印象是“我父亲不喜欢他，这个人无用”。几任参谋长对比下来，张作霖认识到还是杨宇霆最为称职，他常对左右说：“你们办事都赶不上邻葛（杨宇霆字邻葛）。”

眼见得大战将起，身边不能没有一个善于出谋划策之人，张作霖终于回心转意，让人发电召还杨宇霆回奉。杨宇霆回奉后即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辅佐张作霖主管军务。

在讨论是否要对直开战的军事会议上，众将意见纷纭，张景惠、张作相乃至杨宇霆都不主张打。二张是粗人，实际讲不出什么道道，翻来覆去说的，不过是奉军力量尚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不如仍捧曹锟为首，大家依旧相安无事这些，与奉系实际所必须面对的局面相去甚远。杨宇霆则了解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在他看来，如今的奉军虽然数量更多，盘子更大，但素质和军纪方面相比他在任时却下降很快，几乎又被打回到了原形。

杨宇霆的隐忧在张作霖的日籍幕僚那里得到了部分验证。张作霖原来一共有两个日本军事顾问，一为町野，一为菊池。菊池离职时，日本参谋本部本拟以土肥原贤二接替。町野预先得知了这一内部消

息，他就对时任参谋长秦华说：“土肥原做事十分跋扈，把这种人置诸左右，实难放心，请把此事转达张作霖。”

町野虽是个日本人，本身也负有日本政府所给予的秘密使命，但他拥张是真心的，站在一个幕僚的角度，亦有与张“共生死，取天下”的意愿。用他的话来说，他与张作霖一直是“形影相随，张作霖危险时，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同样，张作霖对町野也很信任。町野曾经自得地说过：“张作霖一做决定，就是他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因此，当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

听町野这么一说，张作霖立刻明白土肥原不是什么好货色，于是就对日方提出要“退货”。日方问他究竟要谁，张作霖点了铃木美通，因铃木另有任用，抽不出来，日方便将本庄繁派了过来。

本庄繁参加过日俄战争和西伯利亚干涉，又曾在日本陆军大学任兵法教官，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手。他到奉天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看出了奉军训练不足的弱点。当张作霖征询他的意见时，他直言不讳：“以此种训练恶劣的军队与直隶军（即直军）作战是无把握的，应当自重行事。”

张作霖虽然也清楚自己部队的不足，可是并没有想得有多么严重，相对而言，他更倾向于听取町野的意见。町野是日本人中最坚决的拥张派，他经常对张作霖说：“只要你生存一天，我一定卖命做你的顾问一天。”有一次，张作霖对他说：“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

我就给你做督军。”町野：“不要，如果你做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

虽然都是半开玩笑，但町野确实很早就与张作霖“相约取天下”，对入关争霸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自然赞成入关作战。见町野主战，张作霖便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决计与直军一战。

奉天军事会议的最终决策尽管属于内部最高机密，但外界也渐渐有所知晓。当时吴景濂在非常国会担任众议院议长，他的母亲去世了，与吴景濂接近的朋友同僚纷纷赴东北进行吊唁。丧礼结束，客人们陆续返回关内，他们带回的消息是，张作霖正重礼优待西南专使伍朝枢，并已约定孙中山由湘赣进兵北伐，拟南北夹击直系。

吴佩孚见张作霖如此蓄谋，料知战争已不可避免，赶紧预作准备。他首先想方设法破除“反三直联盟”：与陈炯明取得联络，双方订立了统一南北同盟，同时扶持贵州、云南的地方诸侯，以牵制孙中山的北伐；取得驻于上海的北洋海军的支持，使得属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不敢轻举妄动。

接着转往北方。河南督军赵倜心有异志，本准备做奉军内应，吴佩孚察知这一情况后，一边明言会永久维持赵倜的地盘，一边把赵倜的弟弟赵杰列入前线作战行列，让赵倜即便想“造反”也得有所忌惮。

投鞭断长江之流

1922年3月31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以换防为名派第二十七师入关。吴佩孚得到的情报是，其余奉军也正在新民、锦州一带进行集

结，只要张作霖一发布动员令，就将大举入关。

面对大兵压境，吴佩孚表面强装镇静，内心其实非常焦躁。他一边加紧部署战事，一边托人向各处发出通电，请张作霖对他予以谅解。在奉军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况下，吴佩孚的缓兵之计注定难以收到效果。4月9日，张作霖发布总动员令，奉军开始大批入关，并在天津的军粮城进行集结。

这一期间，吴佩孚不断接到奉军兵车络绎进关的报告，外界对此的评论是“奉军沿京奉线如怒涛一般越过山海关南下，开进华北地区”。不过奉军气势虽足，但在战略上其实并不成功，这是因为原来可以对他们进行策应的力量都已被吴佩孚提前控制住了，而且由于奉军是先出手的一方，国际社会更同情和支持直系。在张作霖原来的计划中，他是要先发制人，打直系一个措手不及，继而获得四方响应，至此这一期望完全化为泡影。

4月中旬，奉军已大部入关，而吴佩孚也已完成全部的军事部署。双方讨敌骂阵，互相揭短，都拼着命地往对方身上泼脏水，吴佩孚抓住张作霖的“胡子”出身不放，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张作霖则把吴佩孚比作是安禄山、史思明，说他的存在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耗完唾沫星子，便是要真的互砸板砖了。4月29日，张作霖下达总攻击令，奉军哇哇叫着向直军扑了过去。

当时的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除中路因为两边均未配备主力，战事不太激烈外，其他两路都打得分外激烈。开战之初，直军基

本被奉军压着打，西路几乎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东路虽然没这么糟，但也节节败退。

奉军之所以一上来就能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击”，首先是因为兵力装备上与对手有较大差距。吴佩孚尽管也集结了十万兵力，可是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要用来巩固后方，无法调到前线。奉军能够直接开到一线作战的部队则高达十二万五千人，几乎超过直军的一倍。重武器方面，直军勉强拼凑了一百门大炮、一百挺机枪，奉军在此基础上大炮多了五十门，机枪多了一百挺。奉军军官们对此扬扬自得，夸口道：“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

其次是直军自身指挥不力。东路的彭寿莘第十五师乃直军劲旅，但彭寿莘因丁忧（即遇到父母的丧事）请假不在军中，及至开战才匆匆赶回师部。身为直军总指挥的吴佩孚则坐镇洛阳，并未亲临前线。

不过直军也有直军的优势，它的老底子是清末时的北洋第三镇，有着很长战史，士兵多是老兵，久经训练，身经百战。在熬过奉军一开始发起的冲击波后，他们的这一优势迅速呈现出来，即人虽少，但精干有战斗力，打起仗来不仅凶悍顽强而且不急不慌。

奉军仍然占据着主动，但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完胜对手。一名新闻记者赴前线采访，看到两边机关枪对射不止，大炮打出的开花弹自头上飞过，呼呼作响，一经着地，震耳欲聋。当奉军步兵进攻时，前队士兵受伤倒地，后队士兵立即上前补缺，受伤士兵则被救护队送往救护处治疗。在前线阵地的后方，“火车、骆驼及各种车辆，自北京运援兵军需赴前线者，络绎于途”。

战场逐渐陷入胶着状态，双方战成一团，不相上下，这就给直军扭转战局创造了机会。吴佩孚向来喜欢靠前指挥，此次迟迟不到一线，不是怕死，而仍然是担心河南督军赵倜给他出幺蛾子——虽然事先施了恩威并施之法，然而若是他吴佩孚亲到前方，赵倜还是可能会乘虚而入，到时豫省直军兵力又无法与之抗衡，河南一失，直鄂必然要中断联络，战事非败不可。

想要把自己腾出来，只能依靠客军。曹锟时代的直系与冯国璋时代的老直系不同，它所指的直军仅限于曹锟所部，也就是曹锟培养出来并始终在他部下任职的官兵，不在其列的便都统称为客军。关键时候，吴佩孚决定征用两支陕西客军，指挥者一为陕西督军冯玉祥，一为潼关镇守使张锡元。

对直系内部情况不太清楚的人，常爱说曹锟无能，是吴佩孚替他打了天下，实际上曹锟在很多方面比吴佩孚还要高明得多，尤其气量宽宏，很善于用人。冯玉祥最早时在很多地方都不受欢迎，但曹锟能够接受，因此冯玉祥便归附了直系。张锡元则是与吴佩孚有历史关系，清末时张锡元在骑兵学校任教官，吴佩孚是学生。直系走红后，张托人向吴表示愿附直听从指挥，吴佩孚自然表示欢迎。

在直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吴佩孚下令冯玉祥、张锡元出陕相援。当时的陕西连年战乱，经济非常困难，丁赋预征甚至已达到二三十年，到了征无可征的地步，而客军偏偏还特别多，实在是僧多粥少，所以冯、张都想出陕找主路，吴佩孚命令一到，二人即马不停蹄地率部从陕西开来河南。

1922年4月30日，吴佩孚收到电报，得知冯玉祥已率兵出潼关，其前锋李鸣钟旅及张锡元自率的一个旅已到达洛阳，他这才放心地把洛

阳和郑州一带的防务交给冯玉祥，自己赶往前线。

胡子军

到达前线后，吴佩孚对东路进行重新部署，命令彭寿莘等人不得再退，接着便坐镇西路的良乡进行指挥。通过侦察，他发现奉军在布阵上存在弱点，于是急调张锡元、李鸣钟两旅星夜来援。

当两旅兼程到达良乡时，正当直军疲惫不堪之际。曹锟也正在良乡督战，他亲自到车站迎接援兵，并且对张锡元说：“老兄来得及时，请大力帮忙，火速开到前线去。”

吴佩孚令李鸣钟旅附奉军之背，实施迂回攻击，张锡元旅则会同直军，从正面出击。当时直军战壕里二三十步才有一个士兵，而且精神不振，援军的出现令他们又重新振作起来。

奉军西路总指挥是张景惠，他本以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攻下吴佩孚的老营指日可待，现在看到对方忽然从正面出击，而且还有生力军进行抄袭，顿时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总统徐世昌又在此时对张景惠说：“位于北京附近的三个师，与吴佩孚相通气，有攻击奉军后路的可能，因此（奉军）以后退至北京以南、长城一线为万全之上策。”徐世昌本偏向于奉系，奉军入关时打的就是“奉令拱卫京畿”的旗号，可是他向张景惠提供的这份似是而非的“情报”却给奉军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

奉军各级官佐多数起自草莽，他们不学无术，故步自封，平时愚昧而好自用，战时又因对现代军事知识讳莫如深而喜欢任意瞎指挥。

张景惠就是如此，他听信了徐世昌的话，想到如果真有这么多反叛部队从背后打过来，奉军不但要遭遇双重包围和前后夹击，而且察哈尔与前线之间也将被打进一个大楔子，那么自己的地盘就保不住了（张景惠的正式职务是察哈尔都统）。

在未征得张作霖同意的情况下，张景惠便擅自下令西路奉军全线撤退。他们前脚刚撤，吴佩孚后脚就从俘获嘴里获知了消息，于是当即电令张锡元旅实施追击。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的奉军，究其实还只是一支“胡子军”。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为了利用东三省的“胡子”替自己效力，日本人曾对“胡子”的作战特点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发现，“胡子”看似相当于日本的浪人或者无赖流氓之类，但实际上已是一种军队，具备班、排、连的战斗机能，同时“胡子”还具备许多突出优点，比如“习惯骑马而擅长马术，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其行动进退之机敏灵活令人惊讶”。正因为这样，一些较为悍勇的“胡子”在实力上往往可以压倒前去围剿他们的官军。

另外，尽管在局部战斗中堪称优秀，但“胡子”的整体秩序和统制能力都非常薄弱，也就是说，若不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胡子”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有限，最多只能止步于班、排、连这一级。很多依附于日军的“东亚义勇军”都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此类匪团马队，不能对敌展开正规进攻，凡遇优势之敌攻势，甚至一发炮弹攻击，其主将即带头逃跑，敢于抗敌到底者为数甚少。”

当张锡元旅发起追击时，奉军“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缺点在战场上暴露无遗，各部都只顾着逃命，几乎是草木皆兵，撤退也变成了大溃退。西路的惨败又很快波及东路，在吴佩孚集中兵力发起猛攻

后，各部多数已失去战意，纷纷向军粮城溃退。因奉军军纪不佳，败兵到处骚扰，沿途老百姓曾立石碑咒骂：“奉军败退，争相奔命，跑得烂泥洼子冒烟！”国外观察家更是视为笑话，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军队是假如一个支队的军队退却，便犹如野生动物一只逃跑，会立即引起全群逃跑一样，将导致全军一泻千里的退却。”

为了挽回败局，张作霖亲临前线指挥，他给东路总指挥张作相打去电话：“你怎样也不能退，你要退下来，我们只有梦里相见。”

张作相的军事才能和定力并不比张景惠高明多少，且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几句狠话又岂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此时的奉军已处于崩溃状态，是谁都阻止不了的。

张作霖急得双眼冒火，他在指挥部内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好，为了不丢面子也绝不能逃跑。且看天津一战，一决雌雄！”

张作霖还想在天津再打一下，但以奉军的状态，显然已非常不现实。一旁的本庄繁赶紧劝说道：“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案，但从兵力素质而言，不易取胜。与其冒这样的风险，不如到适宜地点进行休整，以图再战。”

本庄繁虽然对入关作战持有异议，但战争开始后，就改穿上中国的粗布军装，和町野一起随张作霖征战。其间，他不仅视察阵地，而且参与制订了奉军的大多数作战计划，所以深知战场的实际情况。本庄繁认为应先退到滦州，在那里对败退部队进行收容休整，以防被衔尾追击的直军攻入关外。

町野对本庄的意图表示赞同，随后又附在他的耳边低语道：“滦州与秦皇岛靠近，如果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使作霖亡命日本也是可以

的。”

为张作霖想好退路之后，町野紧接着便高声对张作霖说：“此次战争，一开始就提出反战论的是本庄顾问和杨参谋长，如今在主战论的张将军已失败的情况下，今后一切都应按本庄顾问意见处置较为妥当。”

眼见败局已定，张作霖只得接受幕僚们的意见，下达退却令，同时授权本庄繁担任指挥，将司令部后撤至滦州。

苏醒过来了

退却令一下，各部争相撤往滦州，短时间内，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一条京奉大路被溃兵塞得满满当当。1922年5月5日，东路部分奉军溃退至军粮城，恰巧张锡元旅追到，结果奉军的一师两旅一枪未放，就全部缴械投降。

直到张作霖及其司令部退至滦县车站，情况仍十分危急，幸得杨宇霆的至交兼士官学校同学姜登选赶到，两人一起筹划，在滦河岸边设立防御阵地，使得追击的直军不敢贸然进击，奉军才得以从容撤退。

按照张作霖的吩咐，司令部从奉天提出大批现款，换成十元票，装成三个大箱子运到滦州火车站。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排成长队，点到谁，谁就到前面来领一张十元的票子。

发放现款的本意就是稳定军心，让官兵们心甘情愿留在滦州，而不是一股脑儿都逃往关外。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在滦州强制阻拦败

兵后退，这些缺乏训练和制约，同时又急于逃生的败兵将会不顾一切地胡来，到时即便是张作霖自己上前拦阻，他们也很可能会先将张作霖毙掉，然后再继续逃命。

张作霖和町野、本庄、杨宇霆等人都来到了车站。张作霖一边说着“辛苦了，给大家零用”，一边亲自给各部官兵发钱。不过他们也注意到，尽管所有领到现款的官兵都会颇感诧异地议论纷纷，但同时仍然急着逃往关外：“快派火车，快，快！”

面对此情此景，主张在滦州收容败兵的本庄很是失望：“难道这就是失败吗？”

第二天，山海关守军传来报告：“先遣部队的列车已在山海关停车，后续列车也不开动，官兵纷纷下车，车站一带到处是士兵。”

自兵车离开滦州，官兵们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我们这样败退下来了，可是张大帅和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都还留在滦州，又是发钱，又是笑脸相迎表示慰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极度的紧张和慌乱中清醒过来之后，感到羞愧的人们选择了就地集结。听闻这一消息，张作霖及其幕僚们都很高兴。町野手舞足蹈地对本庄说：“果然成功了，本庄君，中国兵从败逃心理的催眠术中苏醒过来了。”

集结于山海关的奉军以第三、第八混成旅为骨干力量，实际指挥者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郭松龄。郭松龄早年在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当时速成学堂中有同盟会员秘密传播反清书刊，这使郭松龄开始接触到了民主革命思想。从陆军学堂毕业后，由于他带兵有术，勤于职

守，受到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升为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官，倚为亲兵。

辛亥革命前，郭松龄随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朱庆澜本人同情革命，在他的掩护下，新军中成立了同盟会组织，秘密进行反清活动。其间郭松龄经人介绍，也加入了新军同盟会。

及至辛亥革命爆发，郭松龄参加了新军起义，拥戴朱庆澜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可是在四川独立不久，就有川军将领鼓动地方军队发动兵变，朱庆澜与客籍将领都被迫离开了四川。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选择辞职潜回奉天，密谋武装起事。此时适逢张榕被杀，张作霖率巡防队满城搜捕革命党人，郭松龄因剪发易服，“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被巡防队逮捕入狱。眼看就要人头落地，在韩淑秀等人的多方营救下，他才得以幸免于难，并在民国建立后获释。

经过前前后后的几次严重挫折，郭松龄逐渐认识到“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开始痛下决心钻研军事，直至考入北京陆军大学。这一期间，一些认识郭松龄的人“从未看见他有着闲着的时候，总是读书看报直到深夜”。郭松龄自己也说：“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

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郭松龄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但随着孙中山的失势，只得又离开广州，重返奉天。时任奉军参谋长的秦华是郭松龄在陆大的同期同学，经秦华介绍，他得以充任督军署中校参谋。没过多久，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干部，下令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任为战术教官。

在开学典礼时，张作霖语带讥讽地对郭松龄说：“郭教官，你是反对我的革命党人，听说到南方参加革命去了，为什么回来了呢？”郭松龄听了一声不吭，张作霖素来为人宽宏大量，见状也就没有再为难他，只是对他说：“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什么混头。”

张作霖为人宽宏大量，往往说过就算，不会放在心上，郭松龄则不然，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张作霖的话让他断定，张作霖对他既不信任也不会予以重用，自己今后在奉军中混口饭吃容易，要想登上高位势必十分困难，只能另寻捷径。

在奉系军人中，郭松龄向以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著称。当时奉天的一般读书人多数喜欢阅读旧史书，只有郭松龄爱看新出书刊，一般军政人员多少都会涉猎一点喝酒赌博，唯郭松龄从来不碰，也不与这些人交往。他教学时也是一板一眼，不但敢于严格管教学生，还会毫不客气地对队长、区队长进行约束。按照军校内约定俗成的规矩，教官是不能管队长的，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郭松龄性情古怪，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郭鬼子”。

“郭鬼子”谁都看不上，也不结交，唯有张学良是极少的例外。张学良当时是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员，小伙子称得上是讲武堂的风云人物，还没毕业，就已经当上了巡阅使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人称“黄嘴鸭子团长”。不但如此，卫队旅的许多事，包括军官任职，他也要一本正经地要予以过问，俨然就是一位代理旅长。

张学良从未带过兵打过仗，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便能当上高级军官，毫无疑问靠的都是“拼爹”。不过张作霖也没有蠢到直接出面把儿子拔上来，代替他做这件事的是张作相。

技惊四座

张作霖最早结拜的几个把兄弟，汤玉麟曾经反叛过，张景惠先导致奉军大败，后又投靠曹锟做了官，也算叛变了，只有张作相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从未有过任何异心。张学良说过：“张作相待我父亲，比我对我父亲还要好，我曾见过我父亲如何对待他，有时候都感到毛骨悚然。他那时都当师长了，我父亲还对他说骂就骂，然而，他却仍旧那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

张作霖亦视张作相为心腹，除了把自己的基干师交其掌握外，赴京时还经常委任他为代理督军、巡阅使等职，有人甚至认为张作相有接班张作霖，成为未来东北掌舵者的可能。

然而不管别人如何吹捧或猜测，张作相心里都明镜似的。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子承父业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他张作相若是真的有此非分之想，得来的极可能不是什么大王宝座，而是杀身之祸。他要回报张作霖的信任与重用，同时免遭猜忌，唯一的办法就利用职务之便，给予张学良更多的信任与重用。他那时担任着第二十七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原本他已想辞去兼职，但为了方便提拔张学良，就一直没将这一职位让出来。

进第一期讲武堂就读的多为行伍出身，让他们拿枪容易，拿笔难，张学良是一开始就进的学堂，而且年纪轻，记忆力强，在学习时相比于其他人占有一定优势，所以“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张学良认为，就因为这样，“这郭松龄也看中我了，我就跟郭松龄变成了好朋友”。

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郭松龄在回奉天前就在北京做过讲武堂教官，也不是没见过优秀的学生，更何况，纸上做两张卷子，考两次第一，对手还都是大老粗，这能说明多大问题？真正打动郭松龄，且能让他这个恃才傲物的老师屈尊与自己学生做好朋友的，不能不说还是与张学良特殊的背景有关。

另外，张学良虽然因父亲的庇荫而少年得志，但以他自己的能力尚难以支撑局面，身边急需一个会带兵、能打仗的人相助，郭松龄主动示好，可谓正合其意。

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不久，张作相便很知趣地辞去兼任的卫队旅旅长一职，由他正式接任。之前，郭松龄就把结交张学良视为取得兵权的阶梯，他劝张学良编练新的军队，并说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承袭其父之位。张学良记在了心上，为了在卫队旅乃至整个奉军中站稳脚跟，他以辅佐自己治军为由，向张作霖保荐郭松龄为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张作霖虽曾当面挖苦过郭松龄，但实际对他已无成见，加之望子成龙心切，希望儿子能够尽快掌握部队，于是便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

如果没有张学良，郭松龄还得继续在讲武堂吃他的粉笔灰，或至少不会这么快便在奉军中担当要职。他本人也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赴任后即专心对卫队旅进行训练。

包括东北讲武堂在内，民初军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两类，所谓学科是指战术学、筑垒学等；术科则是拼刺术、射击术等，郭松龄把军官应学的这些东西直接灌注到军队，并且亲自进行指导。不到一年，卫队旅的训练成绩即冠于全军。同时，他军纪严明，

官兵中有违反军纪者，严惩不贷，从而大大扭转了奉军军纪涣散、到处扰民的恶劣风气。

郭松龄执掌卫队旅，标志着奉军内部新旧两派的明争暗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旧派，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一群好汉，像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新派是杨宇霆起的头，当初杨宇霆因私自招兵案被张作霖免职，实际就是被旧派给搞下去的。

杨宇霆被张作霖起用后，仅仅表明新派在奉军高层重新得势，在奉军中下层，仍是旧派的天下。那些旧派统兵官多是“胡子”出身，浑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张学良、郭松龄既照编练新式军队的思路来整训部队，也就把自己纳入了新派行列，并且是从奉军中下层来与旧派展开竞争。

当郭松龄开始因练兵而崭露头角时，旧派还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郭某所训练出来的部队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罢了，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该抓瞎还得抓瞎。没想到的是，郭松龄出手不凡，直皖一战，在天津附近仅以一个团的兵力便围缴了皖军两个旅，由此技惊四座。

直皖战争结束后，吉林省东边地区一度土匪猖獗，并且已经占据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奉命率卫队旅剿匪，在短时间内便得以肃清匪患，收复了所有城镇。经此一役，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不仅让那些在背后说闲话的人全都闭了嘴，而且获得了张氏父子进一步的提拔和倚重。

我就是这样起来的

张作霖在出任蒙疆经略使时，以亲征外蒙为名，将奉军扩编为十个混成旅。在这次扩编中，张学良、郭松龄均被晋升为少将，一个担任第三混成旅旅长，一个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长，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称“三八旅”。

张学良名为旅长，但人常在总司令部参赞，联合旅的行政、训练均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张学良自己也乐得卸责，对外声称：“我就是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张学良懒得抓军队，郭松龄则是求之不得。他对联合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除实行精兵主义，裁汰匪兵、兵痞外，还对军官量才录用，一遇部队官佐出缺，即择优升补。奉军在未经整理之前，人事制度极不健全，护兵警卫是进身之阶，亲戚好友是升官标准。只有联合旅是按一定制度晋升，这样较为完整的人事制度，保证了军无怨言，因为一旦军官出缺，大家都知道应该由谁提升补缺。

郭松龄把“三八旅”训练成奉军精锐，是开了奉军正规化的先河，当时所谓东三省新军，指的就是郭松龄所练之兵。作为“三八旅”声名在外的另一个最大受益人，张学良不仅被外界视为奉军中的新派首脑，他在军界的地位也相应得到巩固，时人皆称其为“少帅”。

民初那些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父辈再怎么英雄盖世，后代都少有能成才的，像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还是个“坑爹”货，活生生就把老子给坑死了。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与张学良同被列入民国“四公子”之列，但在军政方面一无建树，身上没有一点其父的才能与魄力，以致段祺瑞要么不提他这个儿子，一提起来就很生气。与这些窝囊废般的公子哥相比，张学良显得格外突出，也令人眼羡，连段祺瑞的部下、皖系大将魏宗翰都曾为自己的老大叫屈：“张学良才十九岁就当旅长，

固然是沾他父亲的光，但总有相当的军事知识和带兵能力，怎么段大少爷（指段宏业）就不行呢？”

在直奉战争中，张学良被任命为东路第二梯队司令，郭松龄与“三八旅”列入该梯队序列。开战之初，郭松龄即率部一举攻下胜芳镇，日本所办的《盛京时报》以大字标题进行报道，谓之“攻下胜芳之胜将郭松龄”。及至奉军全线大败，各旅都被打得支离破碎，唯有“三八旅”等部败而未溃，仍保持着完整编制。

当奉军在山海关集结时，张学良已逃回奉天，他给郭松龄写信，信中说：“方今势危时迫，榆关（即山海关）可守则守之，否则请退处一隅，养精蓄锐，以待再举……望勿逞愤一时，置全军于不顾也。”

按照町野的总结，张作霖最大的特点是不怕死，富于决断力，即便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仍要在滦州或山海关组织抵抗。张学良来信的意思则跟他老子完全相反，其实就是要郭松龄保存实力，把“三八旅”撤往关外。接信后，郭松龄颇费踌躇，想想张作霖新败，要找个借口敷衍他或许不难，怕就怕吴佩孚紧追不放，乘势对奉军予以歼灭性打击，须知，溃退部队是最没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

犹豫了半天，郭松龄派了个密使去见吴佩孚，要求停战，条件是他将联合各军，逼迫张作霖下台，“三省交由人民自治”。谁知打了胜仗的吴佩孚尾巴翘到天，根本就不予理会。被吴秀才打了脸后，郭松龄又羞又怒，遂联合李景林第三梯队在山海关组织防御。

直军以破竹之势追到山海关，满以为奉军已成乌合之众，可一举攻入关外，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料却在山海关石门寨一线遭到“三八旅”王升文团的猛烈抗击。王团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

外，结果虽然团长王升文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击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与此同时，李景林第三梯队也打得不错，直军的进攻锋芒受到极大挫折。

山海关战役虽然主要是由郭松龄、张景林实际指挥，但张学良却是名义上的战场最高指挥官，等于又不花力气地拿到了功劳，他对此很得意，后来回忆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所有部队都被打垮了，就我指挥的部队没有被打败，不仅没被打败，还把吴佩孚的军队给打了，我就是这样起来的。"

山海关战役的胜利只是让奉军喘了口气，并无力量反击或与直军大打出手，于是张作霖借着取胜之机，托人请英国公使和传教士出面调解，欲与直系议和。经此一战，曹、吴认识到张作霖仍拥有实力，并不是他们想灭就能立刻灭得了的，而且直军大部队在追到山海关时同样已精疲力竭，遂也决定见好就收。

1922年6月16日，张学良与直方代表王承斌会晤于秦皇岛车站。次日，双方即在秦皇岛港英舰上正式签订了停战和约。

第八章　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直奉战争后，北京政权由原来的直奉共掌变成直系一家独大，甚至有“直系即中央”的说法。曹、吴“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总统徐世昌出面，下令免去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本兼各职。同时吴佩孚还施以离间计，委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麟阁为黑龙江督军。

冯麟阁过去虽与张作霖有过一段恩怨，但张作霖对他怎样，大家有目共睹，自然不能行此落井下石、遭人唾弃之事，更何况就算他厚着脸皮硬要上位，东三省实权仍掌握在张作霖及其部属手中，恐怕那个位置他连半天都坐不下去。至于吴俊升，倒是个实力派，可他向来死保张作霖，绝不肯轻易背叛。最后，吴、冯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辞呈，把吴佩孚抛来的乌纱帽给扔了回去：“张使之去留，为三省三千万人生命之所系，对此乱命，一致否认。”

事实证明，张作霖在关外的声望和权威已坚如磐石，其地位不是北京政府一纸命令就能改变的。在东三省各界人士的拥护下，他干脆宣布东北独立，并自封为奉军总司令。

对张作霖而言，声明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颇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也不利于今后与直系进行角逐。怎样才能找到更好听，看上去也更正当的说法呢？正当他为之绞尽脑汁的时候，一个方兴未艾的政治学说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管仲治齐

这种学说的名称叫作“联省自治”，主张这一学说的人认为，要达成国家统一不一定要通过武力，也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由各省选出代表，组成联省议会。

一开始，张作霖对何谓“联省自治”还不是弄得太懂。问杨宇霆，杨宇霆就用张作霖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道：“联省自治就是各省独立，名义上归中央管，但让不让他们管，他们管不管得了，还是各省的头头说了算。”

张作霖一听十分高兴，当即说：“这回我也来个联省自治，让直系没有话说，而且东三省稳稳地握在我们手里。他妈拉个巴子，这联省自治好！”

1922年5月19日，奉天省议会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张作霖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经过这么一包装，张作霖“关外王”的头衔从此也就不用中央册封了，他自己给自己戴上就行。

通过联省自治，还选出了新的奉天省长。此前这一职务一直由张作霖兼任。帅府（即张作霖的军署，既是办公官邸，也是张家私宅）与省长官公署仅一街之隔，省署习惯称帅府为前院，省署各科负责人每天抱着公文案卷到前院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有时亲自批阅公文，有时由原省署秘书长袁金铠代为批阅，本来省署行政厅厅长也可以帮助进行处理，但历任厅长们都是唯唯听命的角色，张作霖怎么说，他们才敢怎么办，无法负裁断要政之责。

自古及今，多有“武人不谙吏治”之说，张作霖本质上是个武人，对处理省务渐渐地不胜其烦，而自袁金铠调黑后，便再无人能替他分

劳，因此就想着要找一个人专任其事。

在奉天政界，能担当省长重任者，除去已出局的袁金铠，自非王永江莫属。不过直奉战后，王永江已经以父亲生病为由，请假避居乡里。原因据说一是过去与他敌对的汤玉麟被张作霖重新起用，二人同殿为臣，不仅可能感到尴尬，而且还担心汤玉麟会继续寻仇。二是张作霖发动直奉战争，并未征询过他的意见。如今吃了大败仗才让他督奉，颇有点找人顶杠收拾烂摊子的意味。

第一个担心其实是不存在的。汤玉麟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重归张作霖麾下，再不敢乱说乱动，对王永江已构不成什么实质性威胁。至于第二个，在张作霖看来，无非是文人爱面子，邀请的时候态度诚恳一些就行了。

可是请了几次，王永江都没肯动身。实在没办法，张作霖就亲自派人派车把王永江从家乡硬接到省城。见到王永江，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算是不为我，为东北老百姓着想，也应该承担这副担子。”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据说他也曾对诸葛亮说过:“先生若不出山，如苍生何也? ”先生您如果不出山，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话，那么天下百姓应该怎么办呢?

王永江本喜任事，让张作霖这么一恭维，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顺势了打消原有的矜持之念，同意再次出山相助。1922年6月18日，张作霖正式任命他为奉天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中，王永江对管仲非常推崇。管仲能够令齐国富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其亮点之一就是采取重商政策，即所谓

“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王永江治理奉省，效仿的就是管仲治齐，其间他推出了不少相应措施，比如修建奉海铁路。

奉军以关外一隅之地，能够与关内据有大半个中国的直系相抗，若无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不可想象的。东北最大的优势就是农作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土豆出口，这使它在外贸上经常处于出超地位。奉海铁路自奉天到海龙，沿途皆奉省大豆产地，极具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同时，它也是东北第一线官商合办的铁路干线，采用的全都是本国资金和技术。王永江明确规定，该铁路公司股票只准中国人持有，不准抵押或转汇给外国人。尤为难得的是，相比于同期日本技术修建的洮昂铁路和吉敦路，奉海铁路不仅质量更好，而且还分别节省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资金。

除了奉海铁路外，王永江最为显著的政绩是创办奉天纺织厂，二者共同的特点都是出官款集民股，以官商合办的方式成就了大事。

管仲很重视对官员的奖惩，王永江课吏也很严格。他多次派人调查各县吏治，举行县知事考核，又在奉天省范围内自行组织对高等文官进行考试，从中提拔县知事。

张作霖自己治奉，很在意任职者的资历，哪个县里有缺额，需要补上，他都会指着候选者的名字询问左右：“他是留奉知事吗？”意谓这个人以前有没有在奉天做过知事，如果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此人十有八九便失去了补缺的希望，也因此，在张作霖兼任省长的年代，地方官多为旧时之老吏，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王永江与之不同，他奉行的是管仲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凡奉天省的新进青年，只要文官考试成绩优异或能在仕途中做出

实绩，都有被提拔任用的机会。

风生水起

清末民初时的奉天乃至东北的吏治一度相当混乱，谋职者往往凭借关系或钱财就能通行无阻，张作霖自己也曾因以设赌为由，代人谋事，而被外界讥称为“大吃县局”。到王永江执政，因其“声音颜色千里拒人，无人向其请托”，张作霖虽然麾下如云，亲戚眷属众多，然而也没有一个军界将领或者帅府亲戚敢来省署求情托事。在王永江执政期间，张作霖所有亲戚中只有一个人当了地方官。此人为义县知事赵学德，他是张学良的亲表兄，但为人谦虚谨慎，当县知事也是合格的。

实际上，就算张作霖本人要出面谋私，他被搭理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有一次，张作霖有事找王永江，王永江到帅府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从内宅出来，他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副官说：“我还有事。”说完便扬长而去，事后张作霖也未有丝毫怪罪之意。不仅如此，每当部下中有人被任用为县知事或税捐局长时，张作霖还会在谈话中加以提醒：“王岷源（王永江）脾气不好，很难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地去做事。”

谋人用人归根结底还得靠育人。王永江向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必须发扬文治，通过兴办大学教育，来培养专门人才。张作霖接受其建议，下令筹办东北大学，并由王永江本人兼任校长。

东北大学初创时，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的财政状况，唯恐学校用奉票发月薪，到时一旦奉票跌价，势必影响收入，所以不愿前来应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永江经过悉心筹划，决定教师薪金一律

用银元发给，而且不许拖欠。民初时大学最为集中的是北京，但北京各大学的欠薪情况颇为严重，东北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教师薪水最高，发放也最及时的一座大学。国内外名师学者纷至沓来，黄侃、章士钊、梁思成等均先后应聘来东北大学任教，可谓盛极一时。

王永江这个省长当得相当之“抠”，在他任下，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不过奉大洋两三千元而已，教育厅长出入坐的都是人力车。唯独在办校上，王永江非常舍得花钱，他筹拨三百七十余万元，从德国购买新式机器，成立了东北大学工厂，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供学生实习使用。

日本人原先不相信东北方面可以独立把大学办好，及至看到东北大学的实际情况才不得不发出惊叹，认为这所省办大学乃是同时期教学质量最佳、设备最好的第一流高等学府，“它的教育水准无疑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学院”。

和办警政、财政时一样，王永江不负所望，把奉天的政务也搞得风生水起。当时奉天吏治的清明为全国瞩目，“一时之风气尚非他省可及也”。

自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起，东三省中的其他两个省均效仿此例，吉林王树翰以督署高等顾问身份代理省长，黑龙江于驷兴以教育厅长身份代理省长，二人也都是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文官，东北由此在政治经济上步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将政务移交给王永江后，张作霖即专心处理军务。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作为一个打了大半辈子仗的武人，他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在直奉战争中落败并不气馁：“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

重要的还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直奉战前，张作霖总是认为只要敢于拼命就没有打不赢的仗，他训话时用来激励官兵也都是从前纵横江湖的一套，不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就是“哥们儿兄弟”“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还有这样的“训词”：“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了老婆不给之外，什么都会给你们！”

经此一战，张作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太多偏颇之处，奉军不是不能打仗，也不是不拼命，但还是败得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对比一下郭松龄“三八旅”的表现，再想想杨宇霆、本庄繁等人的多次进言，便知道还是因为军队缺乏严格训练，没有被纳入正规化轨道所致。

整军经武

张作霖痛定思痛，下决心“整军经武”，对奉军进行认真整顿和训练。他首先采纳杨宇霆的建议，设立了陆军整理处。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办公处就设立在帅府后面，有后门可以相通，便于随时来往，足见张作霖对它的重视。不过张作霖对整理处的事务并不干涉，他虽然也常来整理处，但不看公文，只是随便看看，找人聊聊天而已。平时除了涉及东三省的重大决策须由张作霖直接掌握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项，包括部队的整编、人事部署、官员升迁等也均由整理处独立负责。

孙烈臣是整理处总监，张学良是参谋长，但他们仅是挂名，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副总监姜登选和韩麟春。姜、韩二人均为杨宇霆介绍过来的士官同学，二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很快便成为新派中的骨干

力量。这也同时表明，新派已经在奉军中掌握大权，新旧两派的竞争以新派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告终。在新派的推动下，整理处对奉吉黑三省军队进行整编，裁汰三分之一，又添招三分之一，同时取消师制，全部改为旅制，整编后的部队统一以“东北军”作为番号。在整编过程中，为新派独占鳌头立下汗马功劳的“三八旅”得到加强，这支部队原本在直奉战争中损失甚重，经过补充，人员枪械整齐一新，不仅官兵都经过精挑细选，而且装备全部是新式的。

“三八旅”的名称也进行了改变，张学良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时称“二六旅”。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整编前的“三八旅”，还是整编后的“二六旅”，两旅都不分家，张学良也都只充当“甩手掌柜”的角色，一直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

接下来的军事改革以“二六旅”为试点。早在直奉战争前，“二六旅”就已开始任用正规军事学校的人为军官，改革后，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大部都被军校学生所代替。

“二六旅”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很快又被转用到其他部队身上。相应推出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定全军各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握教育的中校团附，必须全部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也要由各部队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或队长调充。

如此大规模的弃旧纳新，在直奉战争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整理处为此大肆招兵买马，以原籍东北而散落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为重点，极力吸纳有海外陆军留学经历，或国内陆大、保定等军校出身的军官。招人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顺藤摸瓜，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地进行招揽。虽看重东北籍，

但也不排斥非东北籍的外地人。广西人何柱国与“二六旅”炮兵团长邹作华是士官同期同学，便通过邹作华的关系进入了东北军。

如果说东北大学吸引师资靠的是优厚待遇，东北军能够引起各方面军事人才的兴趣，则主要缘于他们提供的带兵机会。民初自北洋一系起，将领们大多喜欢让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当参谋一类的幕僚，独有东北军与之不同，按照新的规定，去了就有机会带兵。

何柱国投身奉军后，有一年回北京结婚，有人对他说：“你在东北是个中校，如果愿意转到冯玉祥的方面来，可以立即升为上校。”何柱国直截了当地加以回绝，理由就是自己在东北有机会带兵，而冯玉祥方面无此机会。

除了用人制度外，东北军还效仿日本军制，实行军法、军械、后勤独立。各部队以实弹射击和相互之间的对抗演习为主要训练课程，按季校阅评分，后勤方面则进行统一补充，军需沦为长官私人账房的现象自此不复存在。

若干年前，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班，曾对人说：“东北有两件事是需要学的，一件是后勤独立，这在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做到，另一件是他们的用人制度。”与直奉战争前相比，经过改革的东北军内部确实开始呈现出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一战”前后，世界军事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美国教授孟禄往访张作霖时曾谈到，他的儿子在欧洲战场从军，所属一师共有两万八千人，与德国人打仗战死了一万八千人，可是包括他儿子在内，好多美军士兵连德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过一个。由此可见，近代战争更加注

重发挥武器、火力和战略战术的作用，有人称之为“器械的战争”“学术的战争”。

孟禄说他还有一个陆军朋友，新近发明了一种机关炮，每分钟能射击惊人数量的子弹。当时张作霖的几个幕僚听了直伸舌头，都说不得了：一杆机关炮所能射击的子弹，竟然比同一时间段内全中国军队放枪所射出的子弹还多。换言之，这杆机关炮可敌全中国的军队，武器厉害到这种样子，真正是太可怕了。

可是张作霖听了却不大以为然，他对幕僚们说：“欧洲战术，近年我们也稍稍研究，不用听他们吹，两军相见，还是拼命，豁得出死去，便可以制胜。”

那还是直奉开战之前的事，现在张作霖再不会这么想了，因为直奉战争给他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仅以“三八旅”为例，当时直军据守一处村庄，因其工事坚固，抵抗顽强，“三八旅”付出很大伤亡都攻不进去，后来便集中炮兵团的全部炮火，用燃烧弹进行射击。炮击之后，村庄硝烟四起，火焰弥漫，直军的所有防备设施被全部摧毁。

患难中交朋友

对于张作霖而言，如果能够直接从美国买到孟禄所说的那种机关炮，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当时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禁止供给中国武器的协定，他就是拿出再多的钱，美国人也不会把武器卖给他。这样，他就只能向日本提出购买军火的请求。

日本原先认可的是段祺瑞的皖系，与曹、吴的直系彼此敌对。见直系独霸中原甚至随时可以出关，他们唯恐损害到自己的“满蒙利益”，因此大力支持张作霖整军备战，并以“善意援助”的名义，想方设法把价值数百万元的军械转卖给了张作霖。不过此事暴露后，立即遭到英美各国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决定改变方法，授鱼不如授渔，“协助他（指张作霖）自设兵工厂，以求自治”。

东北兵工厂很早就已设立，但在直奉战争前规模并不大，此后日本政府委托日本兵器会社向其供应了大量机器设备，在日方的帮助下，兵工厂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张作霖接受了设备，然而当日本拟进一步提供人力支援，向兵工厂派出兵器顾问团时，却遭到了他的婉言谢绝。

张作霖的心态就像日俄战争时期一样，他是想尽可能利用日本人而不被日本人所用，很显然，如果在日本人的“盛情相助”下陷得太深，这种平衡就必然要被打破，所以他绝不能再往前走了。好在设备虽然必须从日本进口，但人才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寻觅。张作霖首先起用了两个管理人才，他派杨宇霆兼任兵工厂督办，派韩麟春兼任兵工厂厂长。

杨宇霆就不说了，不仅精明干练，敢于负责，而且“学通今古，识洞中外”。韩麟春是杨宇霆的同学、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生，还曾经到欧洲参观学习，拥有比较广博的军事和兵器知识，据说他改良了一种手枪，功效很好，后经兵工厂制造，曾由北京政府通令全国军官统一佩带。

在杨宇霆、韩麟春的共同主持下，东北兵工厂除了从德国、捷克聘请高级工程师外，还从汉阳、上海的老工厂挖来许多老技师、大工

匠。这些外聘人才待遇优厚，宿舍住漂亮洋房，每月薪水发的也不是奉票，而是全国通行的现大洋。关外在当时很多人眼里是出“胡子”的地方，一些南方的技师工匠加盟东北兵工厂纯粹是为了多赚些钱，他们以为自己在奉天不会待得太久，没料到来了之后却立即有宾至如归、乐不思蜀之感，于是互相援引，又从南方招来不少工匠。一时间，东北兵工厂人才济济，俨然成了国内武器专家的人才库。

东北兵工厂最终被打造成了同时期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连日本人都为之侧目，称之为“东方第一”的兵工厂。它不但能制造一般枪械弹药，而且能出产山炮、野炮。其间还增设了一个迫击炮厂，限于武器禁运协定，该厂所进口的迫击炮筒全部以自来水管的名义改装，负责制造迫击炮的则是专门聘请的英国技师。迫击炮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所生产的中型迫击炮威力冠于国内各军，称得上是物美价廉。

直奉战前，双方都有航空队在，但东北航空队在战争中却没有起到作用，风光的是直系航空队在，张作霖将这也视为落败的一个原因。他让张学良担任主管，重点抓航空队的发展。“整军经武”期间，东北航空队改用了“一战”以后法国最新的飞机，教官和教材也都来自法国。相比之下，直系航空队的飞机一直没有更新，用的始终都是皖系留下来的陈旧之物。

经过“整军经武”，仅用两年时间，东北军就基本恢复元气，同时数量和质量也有了空前提高，已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成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张作霖一面进行“整军经武”，一面继续加强“三角反直联盟”。直奉大战时，孙中山因受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威胁，被迫离开广州前

往上海，未能对奉军起到相互呼应或支援的作用。张作霖怒气冲冲地说："那边有个陈小子（指陈炯明），这边有个张杂种（指张景惠），坏了事。"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怪罪孙中山："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救国大计多想办法。这班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经济一度非常拮据，张作霖得知这一情况一拍胸脯："患难中交朋友，我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钱由韩麟春负责带给孙中山，韩麟春可能觉得多了，就只给了三万元，后来张作霖看到孙中山给南方代表宁武的一封信，上有"雨公所赠三万元，我已分给众同志矣，烦代致谢"的话，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把韩麟春叫来痛骂一顿，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七万元！"

无论三万元还是十万元，都只能解决生活问题，孙中山派人给张作霖送信，希望商借一笔更大的款子，并暗示如果他有了这笔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经过几度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粤军回粤费五十万元，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又陆续补助了几十万元。此后孙中山果然重振旗鼓，派手下大将许崇智率部回粤，对陈炯明进行讨伐，直至逐步恢复自己的根据地。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举国为之哗然，这无疑为张作霖及"三角反直联盟"准备了一个倒直的最好理由。张作霖立即通电予以反对，紧跟着张学良便在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的文章。彼时的张学良已在国内军政界崭露头角，跟孙中山等要人

亦有书信往还，加上题目新鲜，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少帅如今对革命也产生了兴趣。一读才知道，张作霖所说的革命其实只是要“革”曹锟的“命”——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推翻曹锟即为革命。

当年秋天，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来到关外，与东北方面共同商讨如何对付曹、吴。他所携的军事方案主张先由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直军，然后东北方面再出兵关内，直捣北京。

张作霖同意南北夹击，但强调分头进行，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他的意思还和从前一样，即大家合作可以，只不过我张作霖绝不会做你孙中山的配角。对于这一点，双方虽然在会上都未明言，但心中都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达成了协议。

作为张作霖在“三角反直联盟”中的另一个政治伙伴，段祺瑞的表现同样非常活跃。直奉战争前，段祺瑞收买直系军队的行动之所以难以取得进展，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渠道和方法从东北取得资金。战争结束后，段祺瑞经过研究，决定派杨宇霆在北京的旧相识于立言为密使，以商人的身份做掩护前往奉天，同时还商定了如何以密码电报联系，如何通过山海关检查等细节，从而使得取款方面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自1923年4月至1924年3月，张作霖向段祺瑞提供的活动资金总计达到大洋二百八十二万元，远超他给予孙中山的经费，从事后来看，这笔巨款也确实物有所值，在关键时候帮了东北军大忙。

那段时间，张作霖在关外靠“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吴佩孚则在关内用“武力统一”削平群雄。不到两年，全国范围内尚未为曹、吴所吞并，并且敢于同曹、吴相对抗的实力派，除山海关外的奉张外，便只剩下了南方拥护孙中山的粤军，以及华东拥护段祺瑞的卢永祥、何丰林。

卢、何一个据有浙江，一个据有上海，这其中何又依附于卢，行动上唯卢马首是瞻。卢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和段派嫡系，他个人非常崇拜段祺瑞，不管段经历怎样的升沉荣辱，始终坚决拥护，称得上是一名段的死忠粉。

直皖战争后，皖系军事力量分崩离析，唯浙沪的卢永祥、何丰林，福建的臧致平、杨化昭尚在支撑，他们作为皖系仅存的最后一点实力，也因此成了直系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24年4月，臧致平、杨化昭被直系孙传芳逐出福建，只得逃入浙江，投奔了卢永祥。直系的江苏督理齐燮元早有吞并浙沪之心，见状便以反对卢永祥扩充军队为由，联合已“统一福建”的孙传芳，从苏皖赣闽四面向浙沪进逼。

汇集苏皖赣闽四省的直军本已很多，不久山东、河南、湖北又听从吴佩孚的命令，派军队源源不断南下援苏。卢、何孤立于华东一隅，形势立刻变得岌岌可危。段祺瑞与手下幕僚都很清楚，一旦浙沪有失，皖系将彻底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徐树铮等人都赶赴上海，帮助卢、何筹划救急之策。

首先能够想到的便是向“三角反直联盟”求援。张作霖先汇了三十万元对卢永祥予以接济，同时订立攻守同盟，表示江浙如果爆发战争，将派兵入关协助。孙中山也认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粤”，声明一旦江浙开战，即派兵北伐。

有了“联盟”的保证，卢、何便决定成立浙沪联军，与进逼的直军誓死一战。经过双方台前幕后的一番紧张部署，1924年9月3日，浙沪联军与齐燮元部终于在上海附近展开交火。

江浙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皖系盟友迅速做出了反应。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张作霖即在关外通电响应卢永祥，并且马上开始进行军事准备。第三天，孙中山发表宣言，宣告即日移师北伐。

即便在进行军事准备期间，东北军新旧两派对于是否真的要与直系大打出手仍存在分歧。旧派上次在关内作战中跌了个大跟头，乃至退入关外后被迫向新派让步，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作相、吴俊升均主张这次镇静处之，等待江浙战事解决再定行止。

新派与之完全不同，他们正是通过入关作战才得以显露锋芒，并以此压倒了旧派，故看到新的机遇来临时，人人跃跃欲试。杨宇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前态度犹疑，那是觉得部队未经训练，胜负没有把握，现在经过"整军经武"，东北军人强马壮，也就不再存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他和张学良等新派人物都认为直系调兵东南，无暇兼顾北方，为东北军乘虚而入提供了条件，"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万不可失之交臂"。

旧派的权势与在张作霖面前的说服力早已江河日下，无法与新派抗衡，但鉴于之前的失败，张作霖还得再征询一下文治派，特别是王永江的态度。

天意如何

自治奉再次获得巨大成功后，王永江不仅接替袁金铠成为关外文臣首领，而且张作霖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的程度也超过了袁金铠受宠时期。王永江到帅府见张作霖，事先都会打去电话，张作霖接到电话，

必让人把正门打开，然后亲自到门口迎接——帅府正门平时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

每年张作霖过生日或有其他庆典，文官武将都会早早立于帅府阶下，张作霖一出正厅，众人便齐齐下拜称贺。王永江的省署就在帅府后面，可他偏偏不露一面，直到称贺的人都走了，才离开省署前往帅府。张作霖知道他的这一习惯，王永江一来，就赶紧让人把帅府的门打开，并且微笑着到阶下迎接。幕主如此礼遇，若是换成别的幕僚，难免要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唯王永江处之泰然，他给张作霖行礼时也不下拜，而仅仅是拱个手，作个揖。

王永江奉管仲为偶像，他用管仲治齐的办法来治理东北，同时也希望能如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与“取天下”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管仲和齐桓公的政治理想就不是要做天下的皇帝，他们觉得能立足齐国，做一个维持中原秩序的霸主就够了，此谓“霸道”。王永江感慨：“自唐以后，求霸且不易得矣。今之时局，能行管子之道者，犹可以强国，岂独区区一省地盘之区区关系哉！”

问题是，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取天下”远比“一匡天下”要吃香得多，只要稍稍觉得自己膀子上有点肌肉，居于地方的必然想到要扩充地盘乃至黄袍加身，居于中央的更是把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喊到震天响。比如，段祺瑞当政一心要“武力统一”，吴佩孚以此为罪状加以攻伐，但等到他把位置坐稳，忘不了的还是“武力统一”。下面各省之间的你争我夺，究其实质也都离不开“取天下”三个字，只是说法和口号有异罢了。王永江对此深恶痛绝，他曾致函杨宇霆：“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足以腾笑

列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于一嗤，不足以称豪于一时，反足以贻害于国家而已。”

由于反感“中国人与中国人斗”，王永江对从事合纵连横的政客们十分厌恶。张作霖雄踞关外一隅，在“三角反直联盟”中具举足轻重的作用，各方信使和说客因此云集奉天，位极“人臣”的王永江自然是他们要巴结的重点目标，但王永江从不跟他们接触和往来。

奉天省署内没有一个秘书。有人好奇，堂堂省长连一个秘书都不配，如果要给各方写应酬信件怎么办，省长一个人忙得过来？知情者笑曰：“王省长与人无交际，无须设此。”事实也是这样，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的某要人过去曾奔走于奉天，他给王永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想与之谈论政要，王永江看后仅仅提笔批了两个字：“不理！”

王永江既非新派也非旧派，但从反对关内争雄的政治主张出发，他的意见却和旧派有类似之处，即对入关作战持慎重态度，反战派意见的分量因此一下子就被加重了。

碰到难以决断的时候，问问天意如何，或许是一个选择。“瞎顾问”张震洲奉召来到帅府，为可能即将开始的战争预卜胜负。张作霖一共有两个“瞎顾问”，都是当时奉天最负盛名的瞽目术士，但论操术之精，曾在劫械案前为张作霖算过一卦的包秀峰还不及张震洲。

张震洲掐指一算，断定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张作霖闻言大喜，遂决计起兵入关作战。在随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他对部下们说：“我不能看到他们（指直系）各个击破，等打完了再来打我。我宁可现在就叫他们打败，而不是等后来更丢脸地被他们打败！我决心已下，细节你们筹划好了。”

尽管有张震洲的卦相为众人壮胆，当张作霖真的下了打的决心之后，与会的很多人在内心里仍然感到忐忑不安。那个时候的吴佩孚号称“常胜将军”，善战之名播于海内外，自在国内军界崛起，几乎从没打过败仗。他和直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神勇表现，更是不仅打没了旧派的自信心，连带一些新派人物也不免留有心理阴影。张学良等人此前直嚷着要抓住机会打它一下，可是“开完会后，我们都相对无声，不知此次是否有去无回”。张作霖回家后，就对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说：“你什么话也别问我，我只是来和你告别的。”

咱们的本钱要输光了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在奉天组织镇威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东三省共有二十五万军队，他们被编成六个军，其中四个军约十五万人直接用于入关作战。张作霖同时任命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会同姜登选等人具体筹划入关作战的细节。

商讨入关作战，首先要解决如何入关。当时由奉天入关不外乎两条路，一是由山海关入关，二是由热河入关。山海关一路较近，而且地势平坦，有现成的京奉铁路可以利用，乃是进关的大道和捷径，不过此处直军的防备也较为严密。相对而言，热河较远，交通运输困难，但直军的兵力空虚。另外，若出兵热河的话，还可以预防吴佩孚以重兵出朝阳，从而威胁锦州，切断锦州以下全军的后路。

张作霖最后采纳了姜登选的方案，即先从热河进兵，等热河方面进至与山海关一线齐平时，再与集结于山海关前的主力一起出击。为了适应这一战略，张作霖派李景林第二军出热河，姜登选第一军、张学良第三军则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待机。

善于用人是张作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此时孙烈臣已病逝，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等旧派人物虽然能力平庸，无所作为，但却能够对张作霖唯命是从，忠诚度也较高，张作霖就让他们领着第四、第五军屯守后防，作为增援部队，不直接参战。对于直接参战的新派人物，张作霖也“一个馒头搭一块糕”，根据将领们不同的性格进行精心搭配。比如，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个性急躁，喜欢不谋而动，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则贪功心切，好胜轻敌，张作霖就分别以姜登选、张学良进行制约。姜登选以沉静克制著称，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密切，就当时来讲也能说服得了郭松龄。

战争打响后，从热河出击的第二军进展迅速，很快就占领了朝阳。韩麟春、郭松龄果然都按捺不住，两人一个劲地催促着要求立即向山海关发动攻击。姜、张均坚持既定方针不为所动，张学良说：“要攻必须得老将（奉系内部对张作霖的称呼）许可。”韩、郭始默然而去。

等到第二军逼近承德，韩、郭又叫喊着要向山海关进攻。姜、张则认为第二军尚未到达长城一线，侧翼仍存在不安全因素，故还是坚持原方针。直至10月7日，第二军拿下承德，前锋位置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持平，姜、张在确定侧背安全，已无威胁后，他们才下令发起全线攻击。

山海关与九门口两地之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它把山海关分成了两个战场，一为山海关正面，一为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按照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前者由郭松龄负责，后者由韩麟春率负责，第一、第三军另外成立指挥部，对战场进行统一指挥，两军也因此合称为“一三联军”。

地形上，山海关正面比较平坦，九门口一带则山岭连绵不绝，指挥部预计山海关正面战场会先得手，所以在这方面配备的兵力最多，而且全都是久经沙场、富有作战经验的精锐老兵。结果是这一战场倒是战斗最激烈，死伤也最重，可就是攻不破对方的阵地。

郭松龄属于勇将派将领，作战主要靠硬打硬拼。进攻受挫，他不加以分析研究，仔细想想为什么受挫，反而仍是一味督兵强攻，大有不夺取山海关绝不甘心之势。眼见得第三军参战部队伤亡惨重，用张学良后来的话说，“我有一个团，差不多整个地全完了”，面对此情此景，连坐在指挥部里的张学良都感到吃不消，他对郭松龄说：“老郭，不能再干了，如果再赌气，咱们的本钱要输光了！”

原来山海关正面虽然平坦，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险要，但却正好有利于守军消灭射击死角，从而充分发挥其炽盛火力的威力，也就是说此处貌似易攻难守，实质易守难攻。与之相反，九门口一带表面险要，运动困难，实际山岭愈高，死角愈大，也愈容易避开守军的火力。

民初时军用地图稀缺，能找到的可用地图，只有清末各省测量局所测绘的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由于它对地形地貌的描写非常简略，所以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并不大。作战开始时，联军指挥部凭图查看，然而看来看去，对于九门口附近到底有哪些关口，有无道路可通关内，仍然是一头雾水。这时町野的日本顾问一职早已到期，张作霖又改聘他为私人顾问，日本政府派来接替町野的是仪我诚也。仪我住在联军指挥部，他随身携带有日本参谋本部间谍秘密在中国测绘的地图一份，该地图为五万分之一地图，尽管比例尺比中国地图大一些，但十分精细。指挥部借来一看（只能借阅查看，不允许翻印），才发现九门口附近还有多处小路和山口，且有羊肠小径直通关内。

指挥部如获至宝，当即根据这份地图拟订攻击计划，并由韩麟春部孙旭昌团担任主攻。孙团平时系姜登选亲自掌握的部队，战斗力极强，尤善于山地攻坚。这个团上去后，很快就沿着小路山口，采用分进合击的方式拿下了九门口。

最大的失着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对东北军的援助远不止派顾问和借用地图。当时日本关东军有一个中队驻扎于山海关海边的南海兵营内，该处兵营设有无线电台，一面与驻东北的关东军本部保持联系，一面直接将所观察到的有关直军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一三联军”指挥部。此外，段祺瑞在他位于天津的住宅内也设有无线电台，可随时向东北军传递有关直军的各种情报。待到孙旭昌团攻下九门口，连直军的作战序列和作战计划都到了“一三联军”手中，“一三联军”已完全处于主动地位。联军指挥部为此十分兴奋，认为可以以突破九门口为契机，尽一切可能扩大战果，用以影响全局。

要扩大战果就必须动用预备队，孰料郭松龄因久攻山海关正面不下，居然依仗着背后有张学良这块硬板撑腰，不经联军指挥部批准，便擅自将总共三个团的预备队全部调了过去。韩麟春闻听又气又急：“就在随便什么地方抽出一个团来用上也好啊！”

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靠前指挥的姜登选突然看到一架直军的飞机从半空中掉下来，落在了双方阵地中间稍靠直方的一个山沟里。他灵机一动，高声喊道：“好呀，我们有了攻击的好机会了！”

东北军早有规定，若能缴获直军一架飞机，就可以领到十万赏金。这一规定让姜登选意识到，他可以靠抢飞机来激励士气，这样纵使能抽出用于攻击的部队少一些，也一样能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

姜登选抽来抽去，仍旧抽了孙旭昌团，其使用方法是“循环式”，即先用它突破一个高地，然后让它回去休息，接着遇到难攻的高地时，再让它上去，打下以后再休息。依靠“循环式”作战，加上韩麟春部的全线配合，孙旭昌团终于一鼓作气又攻下了石门寨。

张学良晚年有一番惊人之谈，说在他在战场上遇到过的对手之中，最不佩服的是吴佩孚！“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当年我想不通为什么吴佩孚会得到那么大的名气。当然他是会写点字的人，当年从军的人大多是老粗，但说到他作战，可以说毫无能力。”

事实上，如果不是直军碰巧掉了一架飞机，姜登选又借机发动一个团的攻坚战，张学良口中这个毫无作战能力，只会写点字的秀才将军完全有可能复制第一次直奉大战的结局，再次把东北军打个落花流水。

吴佩孚有吴佩孚的方略，他的计划是用大军在山海关、九门口与东北军胶着，吸引其主力，然后再以他最精锐的部队为奇兵，由海路载运至葫芦岛。葫芦岛乃东北军后方，张作霖事先没有在那里部署海军，陆军也不多，至于空军，那时威力甚小，最大的炸弹不过五十磅，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直军的大举登陆。

一旦直军占领葫芦岛，就意味着东北军归路被截，则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部队势将成为瓮中之鳖。可就在吴佩孚认为时机已到，要向葫芦岛运送奇兵的时候，石门寨丢掉了。从石门寨的位置往东看，秦

皇岛一目了然，东北军在拿下石门寨后，南下既可切断山海关直军的近后方，又可以直取秦皇岛，切断山海关直军的远后方。换句话说，就是把归路被截的命运反过来丢给了直军。

得知石门寨失守，吴佩孚急忙调预备队进行反攻，他先用一个旅，接着又增援了一个师，但俱被东北军击破。

吴佩孚不是“廖化”，他会用兵，但战前太骄傲了。山海关激战之初，部队向他求援，他发去一个文件，上面竟然写道：“张学良黄毛孺子算什么东西？本大帅明天抵达前线，他立刻就得逃掉。”石门寨如此举足轻重的地方，自然需要设置特别精良的部队做预备队，但吴佩孚安排的预备队军事素质都很低劣。后来增援的那个师是陕军，连东北军都知道，该部官兵手上一般都有两根枪，一根是步枪，另一根是抽大烟的烟枪！

无奈之下，吴佩孚只得把海上正在运送的奇兵两师一旅全部改由秦皇岛登陆，用来反攻石门寨。这是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最大的失着，也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一大关键因素。

日本关东军南海兵营有一个小队分驻于秦皇岛，对直军在秦皇岛登陆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马上向“一三联军”指挥部进行了通报。联军指挥部急调张作相的总预备队前来应援，所有六个团的预备队都用上了，可还是没有能顶住的把握。大家为此忧心忡忡，不能不考虑把山海关正面的部队再抽出一部分，用以增援石门寨。就在这时，段祺瑞由天津发来一份绝密电报，看完这份电报，众人如释重负，都确信己方已经必胜无疑。

该当何罪

电报里的主人公是冯玉祥。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有功，有一种说法认为，吴佩孚在那次战争中其实胜得十分偶然和侥幸，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冯玉祥等直军以外的客军卖死力气，“直军势必土崩瓦解”。在对待冯玉祥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曹锟的独到之处，在接到冯部由前方传来的捷报时，他马上表态：“他们都说焕章（冯玉祥字焕章）的闲话，可我早知道他（指冯玉祥）对我们很忠诚，难道这不是证明吗？”当即保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

然而吴佩孚却缺乏这样的大局观，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没多久，两人就因地盘问题发生了矛盾。冯玉祥自然争不过当时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他被免除河南督军，到北京南苑当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冯玉祥由此“极为苦闷”。发现冯玉祥与吴佩孚有隙，张作霖马上通过中间人与之取得联络，段祺瑞策反直系内部的工作也以冯玉祥为主，在张作霖给予段祺瑞的活动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转送给冯玉祥的军饷。还在战前，冯玉祥、张作霖之间就已达成秘密协约，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应天空鸣枪，同时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东北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以资识别。

吴佩孚对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秘密联络虽然毫无察觉，但始终对冯玉祥持不信任不重用的态度。此次他安排冯玉祥出兵热河，表面任务是迂回锦州，断东北军后路，实际上是不放心冯去山海关正面，有意将其安排到热河那个穷乡僻壤去瞎对付。

吴佩孚这种既要用人又要埋汰人的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掘坟墓。冯玉祥暗中决定临阵倒戈，而且在从北京出发时就预先做了手脚，当然最初他也不无观望之意——如果直军能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得手，或者登陆葫芦岛成功，倒戈就未必能够实现，甚至还可以断定他一定不会主动倒戈。

让冯玉祥最终下定决心的，恰恰也是石门寨的得失。因为丢掉了石门寨，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天真地希望冯玉祥能迅速进兵，减轻山海关一线的压力，因此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称："此间形势紧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令你部火速进军。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

冯玉祥一看电报就明白了，敢情你们打得很烂啊，那我还犹豫什么？在得知吴佩孚本人也已离开北京，赶到山海关救急后，他立即下令回师北京，倒戈反直。段祺瑞由天津发来的那份绝密电报，就是冯玉祥决定倒戈的确讯。

接到段的电报，联军指挥部进行了商议。经过数天的激战，韩麟春部伤亡颇重，而防区却扩大了，这使兵力显得非常不够用，于是大家决定仍旧从山海关正面抽调部队，并指定由郭松龄亲自率部来石门寨，不过目的已不再是对付直军的反攻，而是让他组织大军出击秦皇岛，截断直军归路。

谁都知道胜利在望，出击秦皇岛乃是有绝对把握的一项行动，由郭松龄担负此责，摆明就是看到郭在山海关正面一直毫无进展，怕他脸上无光，囊中空空，回去了不好交差。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姜登选、韩麟春要照顾张学良这个"少帅"面子，所以才把唾手可得的功劳让给了郭松龄。

张学良心知肚明，但此时要想从山海关正面抽兵也并非易事，因为一旦直军发觉当面压力减轻，极可能施以反击，从而动摇郭部阵地。要想让直军觉察不出指挥部在抽调郭部兵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炮兵，从正面实施佯攻。

张学良遂下令以野炮列阵，对正面直军阵地实施猛烈轰击，但连续炮击三次，直军阵地依然坚固，丝毫不为所动。张作霖为此感到分外棘手，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真正让直军感到震撼和害怕。

联军指挥部作战参谋蓝香山与日本顾问仪我就此事闲谈。仪我说："直军阵地坚固，仅用野炮徒劳无功，必须用攻城重炮方可奏效。"蓝香山一听，连忙追问有没有办法搞到攻城重炮。仪我说："旅顺有攻城重炮一个大队，可向关东军司令部商借。"

蓝香山随后向张学良进行报告。张学良当即命令他给杨宇霆发电，请杨宇霆向关东军借炮。两天不到，攻城重炮就由旅顺运至山海关，并且自此担负了每天黄昏后向直军阵地进行射击的任务。重炮威力强大，虽然仍是佯攻，但却让直军误认为是发动总攻，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随意出击。在这种情况下，经征得郭松龄同意，张学良和姜登选终于得以从山海关正面抽调出八个步兵团，由郭松龄率领前往石门寨。

郭松龄骑马赶到石门寨后，开始表现得也很兴奋。不料韩麟春无意中插了一句话，他对郭松龄说："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郭松龄闻言立刻脸色大变，转而愤然道："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说完便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

郭松龄走了没多久，就有人打来电话，说郭松龄擅作主张，把抽出的部队也都带了回去。张学良急忙跟郭松龄通电话，骂了他几句，说："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军队带回去了？为什么？"谁知郭松龄连他的面子也不卖，咔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众人面面相觑，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姜登选先开了口："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正是该当何罪！"

内部攻心

郭部一走，直军乘隙深入，姜登选急调两旅添防，这才免于全线崩溃。险情过后，韩麟春很不满地对张学良说："你看你看，郭松龄叫你惯的。"张学良无言以对，为了免得他尴尬，姜登选连忙劝住韩麟春："你得了吧，别难为老弟了，你没看见已把我们的小老弟急死了，别管他了。"

停了好一会儿，张学良才说："我把他找回来。"当天晚上，他骑着马追到二三十里外，才将郭松龄拦住，此后劝说了对方一整夜，声泪俱下，这才把郭给劝了回来。

说来也凑巧得很，正是由于郭松龄无端耍脾气，导致出击秦皇岛的行动推迟了好几天，东北军才因此减少了很多损失。原来几天之后，冯玉祥的倒戈已正式付诸实施，他率部一回北京就把曹锟幽禁起来，另以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务。消息传到前线，直军军心混乱，士无斗志，郭松龄率部一路势如破竹，没遇到什么顽强的抵抗就到达秦皇岛，截断了直军的归路。

差不多是在郭松龄出击秦皇岛的同时，第二军的李景林、张宗昌由刀尔登插入了山海关背后的滦县。刀尔登位于长城边境，奉军第一次进关失败时，第二十七师途经此处，曾被当地士绅张鹏飞所属民团围困，全师在被缴械后才得以放回，师长汲金纯也因此遭到撤职处分。

在战前研讨时，杨宇霆认为，从热河到关内这一带，直军戒备较严，硬打难以奏效，不如把张鹏飞拉过来，从刀尔登地方打开缺口，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这样不仅能够挽回过去在刀尔登丢掉的面子，还能改硬打为巧打，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他对张作霖说：“那年我们二十七师被张鹏飞缴械回来，如今进关还要从这条道回去。”

为了拉拢张鹏飞，杨宇霆向张作霖献计：有个叫李阳春的人在生意上与张鹏飞有往来，两人也素有交情，何妨派李阳春前去“内部攻心”？

张作霖听了大喜，遂让杨宇霆依计而行。在杨宇霆的策划下，李阳春奉命先将张鹏飞约至天津自己的宅邸，初步谈妥后两人再同往奉天。

张鹏飞一到奉天，杨宇霆即亲自陪同他拜见张作霖。张作霖年轻时是个“万人喜”，年纪大了并且显达之后亦保持着这一特点。二张以前从未谋面，然而却一见如故，张鹏飞口口声声地做出保证：“我们是同宗，我一定保你入关。”

张鹏飞说到做到，战争进行到后半段时，他让自己民团的马队带路，导引着一个营的东北军骑兵从刀尔登出发，由山间小道直奔滦

县。李景林、张宗昌亲率大军在后紧紧跟随。彼时直军主力全都集结于山海关、秦皇岛，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东北军遂轻取滦县，逼向天津。

后院突然起火，令吴佩孚焦头烂额。他一面通电讨冯，一面将山海关前线军事交由他人负责，而自己则率舰队由秦皇岛退回天津。直军前线部队除一小部分随其脱逃外，其余尽被东北军所俘获。

吴佩孚退回天津后，却再次陷入绝境之中。《辛丑条约》规定："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他所乘的火车进不了天津城，只能在天津东站徘徊。

吴佩孚进退维谷，只得给段祺瑞打了个电话，说："我打算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吴佩孚本想用国际干涉来恐吓反直联盟，未料段祺瑞以师长的身份给了他当头一棒："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来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哑口无言，连连称是："老师，我遵命。"

这时有人向吴佩孚献策，说到万不得已时，不如穿便衣逃入租界，东北军也不敢到租界抓人，这样至少可保人身安全。吴佩孚一听很生气，厉声怒斥道："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要这一套我比你们高明

就在吴佩孚考虑究竟该如何出逃的时候，晚上张作霖的私人日籍顾问町野突然求见。自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后，町野就认定

“张作霖一个人不可能统一天下，因为南方还有四省的巡阅使”，他由此萌生了新的想法，那就是促成张作霖与吴佩孚、孙传芳合作。

隔着火车上所点的蜡烛，町野对吴佩孚说他不希望中国因内战而失去一位清廉的名将，“你在这里战死，对中国是个损失”，他劝告吴佩孚从渤海出逃。

当着町野的面，吴佩孚语调铿锵地回答道：“得失与否我不管，在这里打最后一场战争是我的宿愿。”

表态是一码事，实际怎么做又是另外一码事，毕竟到这种时候了，别说再打一场战争，在天津多待一天都成问题。就在与町野谈话的第二天早晨，吴佩孚仓皇离开天津，由塘沽登舰，经由海路南下。途中曾有日本军舰尾行，虽然众人都不知其用心所在，但据町野与吴佩孚对话时的态度看来，监视的同时倒还有护送之意。

吴佩孚前脚刚走，后脚东北军已开入塘沽。张作霖得到报告后，认为是日本人有意放跑了吴佩孚，对此颇为恼火。他朝着町野大发雷霆：“为什么放走吴佩孚？”町野不予作答，杨宇霆不便说什么，只能在一旁喘笑着打圆场。

战争结束了，张作霖准备由奉天出发，前往天津与段祺瑞、冯玉祥会晤。杨宇霆、姜登选等人问他会如何应付段、冯，张作霖显得很是自信，他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比不得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耍这一套我比你们高明，你们可再不用管了。”

按照东北军统帅部的规定，所有军事文件，非经总参议或参谋处长附署，不能下达，连张作霖都不能直接下达命令。张作霖话中“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指的就是这个，其言下之意，对于怎样谈判和与政客

们打交道，他本人还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完全用不着幕僚们进行辅佐或帮助。

遥想春秋时代，吴越两国相争，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击败并围困于会稽，其后勾践卧薪尝胆，为的就是要一雪“会稽之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的心境就仿佛是勾践，向直系复仇雪耻占据第一位，其他都尚摆在次要位置。当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与其商谈打垮曹锟、吴佩孚后的权力分配问题时，他就表示只要打垮曹、吴，怎么都好说。

简单来说，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的联盟以及冯玉祥的倒戈，只有推翻曹锟、吴佩孚这一个目的是相同的，至于推翻曹、吴之后，应该如何设立中央政府以及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则各有各的主张和打算。张作霖的算盘是还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那样，以东三省为根据地，同时拥戴一个政治人物或内阁入主中央，这样便于自己尽可能插手和控制中央。冯玉祥的念头与此相仿，因此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究竟该给谁黄袍加身了。

几个反直盟友之中，有资格也有愿望坐上金銮殿的，只有孙中山和段祺瑞两人。段祺瑞是除袁世凯之后声望最高的北洋元老，张作霖一系虽非小站出来的北洋正统，但亦算是北洋这个圈子里的，他们对段祺瑞非常尊敬。从张氏父子到东北军的一般高级将领，均视段为最有希望重振北洋的核心人物。

和段祺瑞相比，张作霖与孙中山几乎就是两个世界的人。除了信念有异外，奉系向来都瞧不起孙中山，称他为“大炮”，只会吹牛放炮而干不了什么实事。当然也有人认为孙中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未可轻视，但也仅仅是说孙中山代表了一种新思潮而已，对于这种新思潮究竟有多大能量，奉系那时并没有能够予以充分重视。

与孙中山结盟，张作霖主要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多少能够用来牵制吴佩孚的力量，他从一开始对孙中山就没有寄予太高期望。第二次直奉战争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其间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虽然一度有所进展，但因受广州商团的牵制，实际战果其实很小。段祺瑞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大多了，起码浙沪的卢永祥、何丰林都属皖系，冯玉祥的倒戈也应该算在他的账上。因此种种，张作霖拥段是铁定不移，一面倒的。

事办好了

冯玉祥的最早设想倒是拥孙，他倒戈时在北京与之里应外合的黄郛是早期革命党人、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在黄郛的引导下，据说冯玉祥已读过三民主义的有关书籍，而且很感兴趣，对孙中山也不止一次表示过敬仰。他们进行倒戈，其名义之一就是发动“首都革命”，迎接孙中山来京执政。

不过冯玉祥又不像张作霖那样铁定拥孙，他虽敬孙，但亦不恶段。换言之，拥孙拥段都行，若孙、段能合作入主中央，那是更好了。当然孙、段的政治主张和世界观也是南辕北辙，根本不可能合作，既然如此，张拥段，长江各省实力派也一致拥段，冯玉祥便随风转舵，跟着捧起了段。

受张作霖委派，日籍顾问町野前去为段祺瑞就执政之位铺平道路。临走前，张作霖除了交给他一百万元作为活动费用外，其他什么

也没说。町野的事情办得很顺利，但到段祺瑞这一关时反而变得麻烦起来，段祺瑞周围一帮谋士幕僚，全都是在政坛上混的聪明人，所谓安福系政客。他们强调必须十八省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要合法等，啰里啰唆一大堆，町野听得头疼，于是便来了句狠的："吴佩孚还在渤海，我们还是请曹锟继续做大总统好了。"这句话一抛出，谁也不言语了，事情就此定了下来。

张作霖向来不用人做事则已，一用就信任不渝，而且对于所委派的事情，一般都只听结论，不听过程和经过，即便对于日籍顾问如町野之类也是如此。町野回去复命时向张作霖只说了一句"事办好了"，张作霖也只说"好"，而根本没问经过，更不问钱的用途。

1924年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人根据天津会晤的结果，发出联合通电，一致推举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这些人从商议到最后做出决定，都撇开了他们的盟友、那位被他们认为"书生不知兵"的党人领袖。孙中山自11月13日动身北上，路上就已经得知了段祺瑞出线的消息，也就不再紧赶慢赶了。11月17日，他抵达上海，随后转道日本，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希望能获取更多的支持。

12月4日，孙中山一行辗转抵达天津，与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进行会晤。这时段祺瑞已在北京宣誓就职并组织了内阁，会晤过程中，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及"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段祺瑞和张作霖都认为很难答应。

自己的要求被拒绝后，已经一再碰壁的孙中山显然极受打击，谈话过程中就脸色铁青。他与张作霖等人会谈的当天，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又很热，孙中山原来身体就不好，从此就病倒了。

此后张作霖曾去探病，医嘱不能多谈，因此孙、张所谈只是寒暄问病，并未再涉及政治云云。然而孙中山有病固是事实，其左右不是还有汪精卫等人可以全权代表吗？明眼人都能看出，“医嘱”不过用于掩饰，之所以不谈政治，实在还是双方之间已没有什么可谈了。

1925年3月，孙中山因肝病在京逝世，曾经的“三角同盟”就此寿终正寝。

第九章　他真的叛变了

民初是个诸侯混战的时代，而差不多所有的混战都是为了争夺地盘，所以每一次混战结束，总会伴随着一次地盘的再分割。作为民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混战，第二次直奉战争亦不例外，这绝不是王永江等人几句话就能纠正得过来的。想想看，东北军入关之后打到尸山血海，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什么也不要”？怎么可能！

杨宇霆与王永江观点相左，他主张继续向关内推进，张作霖听了正中下怀，说还是“杨总参议”的见解高，“我们打下关里的地盘，绝不能让别人享受，终归我们派人，四个督办，一个都统（指直鲁苏皖四督办以及热河都统）”。一俟将自己在中央政府所拥戴的人扶上马后，张作霖便乘胜紧追，展开了自己的南下吞并计划。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卢永祥、何丰林因孤悬华东一隅，众寡不敌，在奉直两军的山海关决战尚未见出分晓前，就已兵败，卢、何的浙沪联军也被消灭。战后张作霖主动提出，由东北军组织南下宣抚军，护送卢永祥去南京就任苏皖宣抚使。不知内情者还以为东北军肯护送卢永祥南下，是因为出于对卢永祥在江南发难有功的感激，后来才知道，所谓护送，不是一种表面文章，骨子里张作霖是要借此扩充自己在关内的地盘。

那个时代，一切取决于枪杆子。一个人有多少枪杆子，就可以占有多少地盘，没有枪杆子的人不可能有地盘，而且通常情况是，军队推进到哪里，地盘就扩充到哪里，军队哪一天被消灭，地盘也就哪一天跟着丢失，几乎没有什么例外。此时南回的卢永祥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虽然他也想收集残部，重拾枪杆子，但问题是他一切都得依靠东

北军。有人打比方说，这就好像是《红楼梦》中尤二姐被凤姐接进了大观园，主人当面说得很好，背后却是要这没这，要那没那，甚至连小丫鬟都敢冷言冷语地进行讽刺，日子尚且难挨，恢复实力又从何谈起?

卢永祥在南京只待了几个月就挨不下去了，只得将地盘拱手让给东北军。张作霖用这种方法一帆风顺地扩充了直鲁苏皖四个省，外加一个热河区。至此，奉系的势力范围北自黑龙江，南至上海，全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带尽被其囊括，这个原属地方的北洋支系派别达到了兴盛的最高峰。

胡子不能要

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三分之一”还是经济发达区，张作霖好不得意，对人说：“他妈拉个巴子，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人敢打我！”没想到话音刚落，门外已经有人准备打上门来了。

这个人就是孙传芳，继曹、吴之后直系涌现出来的实力派。江浙战争后，孙传芳已取得闽浙两省，有意进一步扩张，不料还没等他迈开腿，奉系倒加速向南扩张，反过来对他的浙江地盘形成了直接威胁。

孙传芳盘算若和东北军单打独斗，难有必胜把握，就开始多方寻找盟友。落马后一心渴望东山再起的吴佩孚自然是理想人选，除此之外，奉系的对头中还多了一个冯玉祥。

张作霖与冯玉祥，就如同以前的张作霖与吴佩孚，基本上都是互相嫌弃的关系。奉系对冯玉祥的印象一向都很坏，认为冯的野心既大，为人又矫揉造作，非常难以相处。韩麟春就直言不讳地说：“冯这个人最要不得。”因为奉系从上到下都存在这种看法，所以他们虽然曾极力策动冯玉祥倒戈，后者也成为东北军在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但从战争行将结束开始，他们就对冯部处处防范，以确保不让其钻空子，占便宜，尤其是不让对方得到任何出海的海口。

冯玉祥在天津附近收编吴佩孚残部，意欲保持这一地盘，东北军就毫不客气地对他收编的部队实行缴械。一句话，津浦线这边是寸步不让，你冯玉祥想要发展，就只能去西北或者平汉线方面。冯玉祥这时还不敢与奉系决裂，唯有知难而退，但内心已视张作霖为敌。在去天津会晤张作霖之前，他特地剃掉了胡须，身边人很是不解：“你怎么把胡子弄掉了？”冯玉祥说：“胡子不能要，非去不可！”意思就是以后有了机会，无论如何要除掉张作霖这个“前胡子”。

张作霖当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会晤时段祺瑞致辞，称赞他和冯玉祥在打击直系的战争中劳苦功高，轮到张作霖发言了，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咱们收买的人，不能与起义的人相提并论。”直接讽刺挖苦冯玉祥是“咱们收买的人”。

张、冯谁都容不下谁，在强忍着达成妥协之后，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冯玉祥无时无刻不想着能找到机会，从背后捅东北军一刀，与孙传芳可谓是一拍即合。两人取得联系后，冯玉祥派人到杭州与孙传芳约定共同袭击东北军的日期，孙传芳对来人说：“你可在这度中秋节，看看打仗吧！”

浙江与苏皖两省邻近，这两省是孙传芳预备攻击和夺取的首要目标。张作霖在将苏皖收入囊中后，以杨宇霆为江苏省军务督办，以姜登选为安徽省军务督办。姜登选性情平和，能够和地方搞好关系，他说："我来安徽，未带军队，我绝不能作战。"对于孙传芳，姜登选也有所警惕，曾通过他人进行告诫："上海、南京都有奉军驻扎，怕有战事发生，馨远（孙传芳字馨远）万勿轻动。"

相对而言，张作霖将杨宇霆派到江苏却不是一个很适宜的决定。杨宇霆与段祺瑞帐下的徐树铮类似，虽然才华横溢，但锋芒过于外露，极易招来仇怨和各方攻击。姜登选、韩麟春是由杨宇霆引荐的士官同学，然而他们对此也不为然。姜登选在多次私下议论中，都说到不应派杨宇霆去江苏："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杨宇霆的字）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

姜登选所提及的江南情形复杂，里面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奉系在江南不受欢迎。东北军虽经"整军经武"，但自奉军时代沿袭下来的恶劣习气已经根深蒂固，一旦无人制约，便会如脱缰野马一般胡作非为。尤其上海的邢士廉、山东的张宗昌，本身就不知检点，部下们也纷纷效仿，乃至做出了种种扰乱民间、横行不法的勾当。当时江浙一带的老百姓一听到"直鲁军南下"五个字，人人头疼，个个反对，江浙地方士绅也由此对奉系持强烈的抵触态度。

杨宇霆没有仔细分析人家为什么不待见奉系，只是一味归咎于江浙人排外。到南京就职的当天，江苏大名士、士绅冯煦前去迎接，他开口就说："江苏民风太坏啦！"

江苏民风再坏，能有你们东北军的军纪坏？冯煦是进士出身，清末时做过封疆大吏，他当即回敬道：“民风坏不坏与我无关，我是来欢迎督办的呀！”

与士绅们同到车站的还有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等苏军将领。杨宇霆对他们也同样非常冷淡，见了面毫不寒暄客套，并且撂下的依旧是那些让人下不了台的话：“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全不如奉天。我本人不想来，是雨亭（张作霖字雨亭）硬让我来的。”

杨宇霆把他这种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劲头一直维持到了督署门口，之后他的车子径直而入，其他人都只准在门外下车。在陈调元看来，杨宇霆的架子甚至比张作霖都大，陈调元后来气愤地说：“别人称雨亭可以，他（指杨宇霆）配吗？”

杨宇霆在南京正式就职后，苏军将领都重新加委。将领们前来谢委时，杨宇霆对他们不仅没说一句客气话，还模仿着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地干吧。”将领们一出门就骂：“什么东西！”

平日里，杨宇霆对陈调元等苏军将领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总是说：“你们军队的质量太差，需要好好整顿。”陈调元感到难以容忍，决定找人合作驱杨，他对手下人说：“我怎么说也是帮办，这种态度叫人何以忍受？所以我才派人和各方联系，共同驱杨。”

正好孙传芳也派人来南京，劝陈调元参加对东北军的行动，并许诺取胜之后给予酬报，双方因此达成了秘密协议。

真是好险呀

1925年10月15日，中秋节刚过，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接着便先发制人，假借夜间演习，率部奔袭上海。

驻于江南的东北军本就不多，杨宇霆到南京就职还没几天，郭松龄不待请示张作霖，就把他的嫡系部队、驻浦口的刘伟步兵旅调回了冀东。刘旅虽然只有一个旅，却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刘旅一走，苏沪地区仅剩南京的丁喜春师和上海的邢士廉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北军原来的旅都已扩充成师）。

在孙传芳通电讨奉后，陈调元态度暧昧，这时有人建议杨宇霆依靠宁沪两师，与孙军在南京决战。杨宇霆认为东北军孤军深入，如果后援切断将非败不可，因此决定渡江北撤。他下令邢士廉师先行，向镇江撤退，然后再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殿后，在他本人渡江后，再向浦口集中北撤。不料邢士廉并未按照指定地点撤退，而是径直率部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选择从下关渡江，以致船只不敷使用，互争抢渡，乱作一团。

眼看邢师溃不成军，上海至南京的交通又被孙军截断，杨宇霆急忙于深夜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议进行过程中，陈调元突然闯入会场，并让他马上随自己一道走时，杨宇霆才明白不仅大势已去，自己也将在劫难逃。

好个“小诸葛”，杨宇霆立即起身，回应陈调元道：“好，让我洗个澡马上就走。”结果他这个澡洗了一个多钟头也没出来。陈调元起了疑心，推开浴室门一看，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原来杨宇霆早已借下水道溜出南京城，从下关渡江到了浦口。

陈调元赶紧打电报给浦口和江浦花旗营的苏军，下令对杨宇霆的专车予以拦截。事有凑巧，花旗营驻军的电务员刚换了一名新手，译电报的速度较慢，等他把整个电文译完时，杨宇霆的专车正好驶到。驻军立即进行拦截，专车是拦下来了，但专车前面的一辆押道车已飞驶而去，杨宇霆正在押道车中！

负责在南京殿后的丁喜春比邢士廉还没有脑子。事发前，陈调元以帮办的名义多次宴请丁喜春和其他东北军高级军官，杨宇霆刚刚过江，陈调元又再次宴请丁喜春等人，后面这批人居然还真去了。陈调元趁机对丁师实施包围，一枪不放就把这个师全部解决掉了。

安徽的地方军队与陈调元一样，也都与孙传芳有过暗中联络。东北军在安徽只有一个旅，对付不了这些皖军，只是因为姜登选的人缘好，所以皖军并没有立即对他采取行动，才使他避免了全军覆灭的下场。

事发后，姜登选安排那唯一的一个旅撤往徐州，单留自己和少数随从人员在蚌埠唱空城计，然后召集蚌埠绅商，对他们说："你们安徽人反对我们奉军南下，我把奉军全部撤回去了。我没有拿过你们安徽一分钱，也没有杀过一个老百姓，自信是对得起你们安徽的。现在我只等待中央派人来接替，哪一天来了接替的人，那一天我就交代。"

不久，皖军蠢蠢欲动的消息传来，眼看情势已万分危急，左右再三劝姜登选走，姜登选总是不依，急得众人团团乱转。最后还是张作霖命令张宗昌派来一列装甲车，责成必须将姜登选拉走，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把他硬拉上装甲车。当姜登选一行离开蚌埠城时，听见城内已经枪声大作，众人连呼："真是好险呀！"

东北军南下后，张作霖派两位直接带兵的大将分别掌管关内军队，即由郭松龄坐镇天津，统领直鲁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韩麟春坐镇徐州，统领苏皖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这样南北呼应的部署从理论上来说是很牢靠的，尤其是郭松龄坐镇天津，对大局更有举足轻重的稳定作用。问题是东北军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加上事前毫无准备，临时措手不及，所以一下子就被孙传芳部及其苏军、皖军节节截断。没有交通线作为依托，东北军要打也无从打起，所有部队都不得不仓皇北撤。

不过半年多一点的光景，奉系就又丢掉了苏皖两省，真是得来容易失去也不难，其命运不见得比前面的卢永祥、何丰林好到哪里去。

杨宇霆逃出南京时，南京宪兵司令杨毓珣刚由上海回来，见情形混乱，他不敢渡江，只好一个人落荒而逃，途中又骑了农民的一匹驴以为坐骑。天快亮时，他进入一座古庙休息，还谎称自己是迷路的老百姓。庙中和尚乐了，说：“你不必瞒我，昨天也来了一位你们同样的人物，请你看看也许认识。”说罢就带着杨毓珣前往相认，杨毓珣过去一瞧，原来是邢士廉师的一位旅长，名叫刘翼飞。刘翼飞身着僧衣，早已化装为僧。于是杨毓珣也如法炮制，扮成了僧人模样。此事后来在东北传为笑谈，谓之：“杨琪山（杨毓珣字琪山）劫毛驴，刘翼飞当和尚。”

事实上，刘翼飞也是整个苏皖地区，唯一曾对孙传芳组织过抵抗的东北军将领。当他到奉天见张作霖时，张作霖对他说：“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都是爹妈少给了一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

突然递出的糖包

孙传芳宣布讨奉后，吴佩孚随即呼应，但冯玉祥方面却未有任何动静。负责中间进行联络的人问冯玉祥：“孙军已动，而你们不即时响应，这不是失信吗？”冯玉祥解释道：“我虽一时不动，但可牵制住奉军二十万大兵。”

事实的确如此，冯玉祥虽然表面仍在假装呼吁和平，实际早已派他的国民军增兵豫东、豫北，以蹑东北军之后。这对于向来就对冯玉祥有所警惕的东北军来说，乃是一个不小的威胁，两军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在杨宇霆、姜登选的提醒下，张作霖很快也意识到了冯玉祥是在配合孙传芳，对自己的部队进行牵制，于是在1925年11月上旬，下令东北军向驻于北京的国民军进逼。看到张作霖气势汹汹，大举问罪之师，冯玉祥赶紧将国民军主力撤守南口，仅以少量部队象征性地留守北京及其近郊。

11月8日，孙传芳的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北溃退。同一天，许兰洲、郭仙桥奉张作霖之命，来到包头与冯玉祥进行谈判。二人质问冯玉祥是否真心与奉系合作，并且要他马上表明态度：“若要取信于人，一条是共同出兵去打孙传芳，一条是帮着奉军去打湖北（湖北系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否则奉方无法谅解。”

冯玉祥已将部队撤到南口，自认为有备无患，时机一到，随时可以拉开架势一搏，因此根本不买张作霖的账：“要问我的态度，一个是和平，一个是中立，我与直军有不并立的事实，不需要再有什么表

示。”他反问许、郭：“现在你们以武力来逼我表示态度，表示一下就可靠吗？我冯玉祥有个牛脾气，就是不受逼迫，如果真心来合作，我们就合作，否则就随尊便吧！”

接到许、郭的报告，张作霖断定冯玉祥已与直系结成一党，但冯如此强硬，显见得也并不怕与东北军作战。在与徐树铮商议后，张作霖一面部署张宗昌、姜登选防御孙传芳军继续北上，一面通过许、郭向冯玉祥示好，说：“如果国民军愿与奉方合作，我们即愿让出‘保、大’防地（指京汉线上的保定、大名），不仅如此，还可以接济国民军一批武器，其中包括飞机大炮。”

对于张作霖突然递出的糖包，冯玉祥虽也料定其中有诈，但他也并不想马上与东北军兵戎相见，所以便就坡下驴，故意装出转怒为喜的样子，同意与许、郭就此进行谈判。

经过谈判，双方勉强达成了合作对直的九条办法。之后许、郭离开包头，张作霖则派张学良到天津，继续和冯方代表进行接洽。

11月13日，张学良抵达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召集李景林、郭松龄等人开会，会上传达了张作霖下达的一封密令，要求李景林、郭松龄对国民军发起进攻。原来张作霖让出防地是假，用以麻痹国民军，从而达成突袭效果是真。

让人意料不及的是，李景林、郭松龄在会上都“反对动武，力主和平”，郭松龄还从军事角度，当众诘问张学良在军饷、军械、兵力三项上有无十分把握。

无论是以前的“三八旅”还是后来的“二六旅”“一三联军”，虽然张学良都从中名利双收，但他在练兵打仗上其实并没有花多少力气和心

思。举凡部队的训练教育、统率指挥、官佐将校人事上的调动，都是由郭松龄一手掌握，张学良统统采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态度，很少过问，这也同时令他在细节方面相当生疏，一旦被问到具体的东西，就只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除了主和反战外，张学良察觉到会场上“反老帅（指张作霖）之气氛已很浓”。李、郭都认为张作霖赏罚不公，是非不明，证据就是杨宇霆“无功而霸江苏”，此后又在江苏丧师失地，为什么回到奉天还能照做总参议?

李、郭的这种反张情绪其实还有所区别，具体来说，李确实是主要对张作霖不满，而郭是对张作霖和杨宇霆都不满。李景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进攻热河，自以为其功不小，战争尚未结束，就电请张作霖准其扩军，被张作霖大骂后驳回。李景林不甘心，又给张作霖发去一电，其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句，张作霖见了更加生气，又是一顿怒骂。两人关系一时很是紧张，当时山海关激战正酣，杨宇霆从大局出发，效“张良蹑履故事”，也就是让张作霖暂且克制自己的怒气，顺着李景林，气氛这才得以缓和。

可是在战争结束时，李景林却又在直系议员孙洪伊的怂恿下，来了个“齐王自为”，没有通过张作霖，就擅自当了直隶督办。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完全丧失了对李景林的信任，并因此下令补给机构停发李部的粮饷械弹——你不是翅膀硬了吗，那就自己找食吃去吧！

张作霖此举，无异于是在扼李景林的咽喉，李景林从此便与张作霖反目。虽然后来张作霖还是顺水推舟地委任李景林为直隶省的军务督办，但李景林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相对于李景林，郭松龄则是另外一种情形。郭松龄自恃清廉，生活朴素，不吸烟，不饮酒，不嫖不赌，这在东北军将领中确实比较少见，但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实际上他不仅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性格上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心胸不够宽广，气量也比较小。

密约

郭松龄并不仅仅是像李景林那样，心里感到不平衡，需要尥尥蹶子，发泄发泄，他其实有着更大的政治抱负。

郭松龄很早就与冯玉祥暗中取得了联系，冯玉祥曾派代表给郭松龄送去银盾一面，上面有“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八个字。还在1925年11月初，郭松龄就派亲信李坚白赴京，秘密与国民军接洽合作办法。及至李坚白回来复命，张学良突然来津。当时张学良任第三军团长，郭松龄平时指挥的部队都在该军团内，在张学良的眼皮子底下，郭松龄要调动军队并不是太方便，因此他首先采取了软磨硬顶的办法，并有意识地把李景林推到最前面。

继在会上表明态度后，当天郭松龄、李景林又联名致电张作霖主和。张作霖见在津将领果然都坚持这一主张，只得同意取消突袭国民军的计划，并复电李景林：“君既欲和，当先将‘保、大’让出。”

11月15日，奉冯双方在北京召开和平会议。在冯方提出“拥段（段祺瑞）、联张（张作霖）、抗吴（吴佩孚）”政策的前提下，奉方接受了段祺瑞的调停建议，并同意再度划分防区。之后两军便在京津设立联合办事处，处理“保、大”防务交接问题。

依靠出让“保、大”，是否真能拉拢住冯玉祥，张作霖极为担心，为此特地通过电报质问李景林、郭松龄等在津将领：“尔辈一味主和，如国民军进而相迫，将如之何？”他严令李、郭等人必须积极备战，以应付突发情况。

一边是张作霖从奉天发来严令，一边是张学良迟迟未离开天津，郭松龄为了更好地摆脱他们的视线，以便于暗中谋划，干脆称病住进了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医院。

11月17日，郭松龄在医院中召集亲信密议对策，经过商讨，决定派李坚白和他弟弟郭大鸣去包头面见冯玉祥。两天后，李坚白、郭大鸣到达包头，并带去了郭松龄的一封亲笔信以及建立“反奉三角同盟”的意向。

所谓“反奉三角同盟”的成员，也就是郭松龄、李景林、冯玉祥。按照郭氏的初步意见，议定由郭松龄率部回东北驱逐张作霖下野，冯玉祥进兵热河以作声援。作为回报，冯军将得到天津海口的使用权。

郭、冯对于反奉早有默契，李景林实际是被动的，而且事先对“反奉三角同盟”也毫不知情，为了能够把他拉进来，郭松龄除准备将“保、大”两地的财政收入仍交由李景林支配外，直隶、热河也拟归李军驻防。

冯玉祥当然乐见郭松龄反奉，对李景林也能够参加进来，更是喜出望外，唯草案中直隶、热河都要归李景林，这让他面有难色。李坚白、郭大鸣急忙说：“李参加我们的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冯玉祥认为言之有理，遂同意就此签订密约。

郭松龄已经密谋起事，但被蒙在鼓里的张学良仍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1925年11月20日，张学良到医院探望郭松龄，劝他到奉天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以释误解。

郭松龄岂肯自投罗网，知道张学良对攻击杨宇霆以及士官派不反感，他就继续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说："东北的事都叫老杨（杨宇霆）这帮留学生弄坏了。我们打了胜仗（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不愿意再打了，还是回去好好地整理整理东三省吧。"

说到这里，郭松龄忽然话锋一转："上将军（指张作霖）脑筋陈旧，在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可挽救。建议'父让子继'，由你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我们拥护你来干！"

张学良一听此言，连忙说："那怎么能行呢？"话虽如此，却也没有什么特殊和坚决的表示，最后还对郭松龄说了一句："你看着办吧，我走了。"

主和派误我

张学良从军以来，没用多长时间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少帅"，也成为实际上的"东北皇储"。他的弟弟们经常说他只是侥幸成功，张学良可不这么认为，他对二弟张学铭说："你哥哥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

客观地说，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确实上过前线，也经历过危险，但这与他的父辈，包括张作霖、吴佩孚们的遭遇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那一代人才真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从血雨腥风中拼杀出来的幸存者和胜利者。张学良能够有所成就，还真就如他的弟弟们所言，侥幸或者说是得人之功的部分占了一大半，而在某种程度上，看不到这一点，也堪称张学良人生不幸的一个源头。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春风得意，尾巴差不多翘上了天，连吴佩孚在他嘴里都不值一提，口口声声总是“吴佩孚这人除了会吹之处，没有什么能耐”，或者“吴佩孚这个人真是不会用兵”。既然吴佩孚都没有什么了不得，那么曾沦为吴佩孚手下败将的父亲又有什么稀罕呢?

对张作霖已经“脑筋陈旧”，张学良心有戚戚，他也自忖若由自己坐上那个位置，肯定比老爷子强。从前当郭松龄抱怨得不到地盘时，他经常劝郭：“你不要急，咱慢慢来，大帅那一套早晚还不就是我们的吗？我当儿子的总不能去抢爹的，他那一套将来还不都是我接吗？”

话虽是这么说，但如果能顺顺当当地早点戴上皇冠，岂不是更好？当然张学良不会料到郭松龄早已与冯玉祥订立密约，他所想象的只是在郭松龄等陆大派的压力下，通过和平方式，让父亲自觉自愿地把大权提前交给他而已。这也是当郭松龄大着胆子暗示他可“谋权篡位”时，他并未坚决加以否认或驳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认定自己仍得到郭松龄等人的坚决支持之后，张学良终于离开天津，返回奉天。回到奉天后，他即按防止杨宇霆等士官派借机抢功的路子，说服张作霖停止与冯玉祥敌对。

父子相谈，张作霖却越听越不是滋味。他历经风雨，吃过的盐比自己儿子吃过的饭还多，听了不一会儿，就明白张学良的话全都是郭松龄教的。老爷子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将张学良狠狠地骂了一通，其中有一句骂得特别尖刻，说："你除了你老婆不跟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去睡之外，你甚至吃一个苹果，都要分给他一块！"

就张作霖而言，他其实一直都不看好郭松龄，认为此人刚愎自用，作风跋扈专断，只是因为张学良多方为其说好话，这才予以破格拔擢。张学良的基本评价则是"父亲确实有慑人之威，能御人，但却不会识人，断事也有缺"。所谓不会识人，说的是不喜郭松龄，偏宠杨宇霆，所谓断事有缺，指的是郭松龄没捞到地盘，杨宇霆江苏被逐反而重用之。

父子两人发生了激烈争执。张学良脱口而出："我管不了你的部下，你也管不了我的部下。"张作霖一听大为光火，拿起一只杯子就向张学良扔了过去。

见郭松龄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儿子对他又如此偏袒维护，张作霖决定采纳杨宇霆的建议，立刻调郭松龄回奉天，但郭松龄却以生病住院为遁词，拒不从命。

1925年11月22日，冯、郭双方正式在包头签订密约。冯玉祥对待奉系更加强硬，当国民军接防"保、大"时，甚至与撤退不及的东北军发生了冲突。此举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和疑虑，认为冯玉祥不守信用，于是又再次要求冯方公开表示与奉系合作的态度。冯玉祥有恃无恐，他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亲笔信，指责张作霖迷信武力，颠倒是非，同时声称自己"决不受逼迫而宣言"。在信的末尾，他还说道："如兄认为有合作帮忙的必要，弟就来合作帮忙，否则惟有静待缴械而已。"

张作霖读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当即在帅府召集军事会议，会上拍案大呼：“主和派误我！”他问杨宇霆谁在主和时最卖力，得知是李景林和郭松龄，便欲召二人回奉，说：“我要处理他们。”

杨宇霆等人均认为李、郭地位重要，不可轻易调动，只可缓图。张作霖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马上命手下发急电两封，一封命李景林即日夺回“保、大”，驱逐国民军以求将功赎罪，另一封命郭松龄调所部集中滦州，然后回奉天听命。

张作霖的急电犹如火上浇油，郭松龄的第一个感觉是，自己与冯玉祥签订反奉密约的事可能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奉一定不怀好意，于是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办了一件蠢事

11月22日深夜，郭松龄发出通电，作为反奉开始行动的信号。最早的通电称为“养电”，内容是让张作霖即日下野，拥护张学良继承大任。执笔者是黎元洪当总统时的秘书长饶汉祥，有名的大笔杆子，为此郭松龄还破费了五千大洋的润笔费。文章颇有骆宾文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只可惜写得太长也太讲究，过于斟字酌句，反而晦涩难懂。在部下的建议下，郭松龄于当晚又追发了两封相对通俗易懂一些的电文，其中一封是“清君侧”，让杨宇霆下台，另一封则倡言奉冯两军停止敌对行动。

“养电”发表后，“反奉三角同盟”很快做出回应。冯玉祥召集会议，发出了历数张作霖罪状，劝张作霖引咎下野的通电，同时以援郭之名，派兵出喜峰口，直取热河，热河都统阚朝玺因此不得不自行撤

走。李景林系被动加入同盟，其意在保住直隶地盘，并不是真的要对张作霖怎样，所以他虽迫于形势，紧跟着冯玉祥也发了封通电，呼吁惩办杨宇霆，以及请张作霖“将庶政付于少帅”之类，但明显话语缓和，留有余地。

郭松龄打电话给李景林，让他措辞强硬一些，他回答说：“我的老母现住在奉天，日来已被监视。我心中感到十分不安。若对你再有表示，老人家的危险更大，因此我是不能有什么举动的。”郭松龄说我的父母也在奉天，我才不管呢，谅他张作霖不敢怎样，但李景林仍首鼠两端，不愿与张作霖彻底决裂。

与李景林不同，郭松龄早已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1925年11月23日晨，他走出医院，率第三军团部及所属部队前往滦州。此前张学良虽为军团长，但军团的所有事务均由郭松龄主持，军团印章刻的也是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人的名字。郭松龄又一向对人事抓得很紧，一人独揽了军团所属三个军的全部编组事宜，甚至连各军卫队营营长的人选乃至于一个事务长的调动，都要经他亲自决定或批准。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军团名为张学良统率，实际都是听从郭松龄指挥。当时的基本情形可以概括为，张学良若在眼前晃悠，郭松龄调动部队时可能会觉得有些不便，但并无太多实质性影响，换句话说，就算张学良不回奉天，面对郭松龄发动兵变，亦难有回天之力。

郭松龄一到滦州，即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凡上校以上官佐均必须参加。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会场的气氛也十分紧张，武装警卫人员荷枪实弹，来回巡视，没有郭的手令，谁也不准随意出入。

会上郭松龄宣布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分编为五个军，即刻班师回奉，“撵走老张、拥护小张、整理东北、开发东北”。与此同时，他还撤换和拘押了一批被认为和自己不一心的军官，代之以相对可靠的亲信部属。

滦州会议后，郭松龄随军部沿铁路向奉天进发，留参谋长彭振国为后方司令继续驻守滦州。这时姜登选要出关回奉天，其专车正好抵达滦州车站，彭振国奉郭松龄之命，上车对姜登选说：“郭军长现患感冒很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姜登选的正式职务仍为安徽省军务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已经察觉郭松龄要反奉，也想面见郭松龄进行劝告，因此欣然点头应允：“茂宸（郭松龄字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

早已出发的郭松龄其实根本没打算与姜登选见面。上了圈套的姜登选先被关押在滦州车站的一个楼梯间里，之后郭松龄的卫士又以送他到城里为名，在路上将姜登选开枪打死了。

当天晚上，他的部下戢翼翘等人在司令部门口亲眼看到一颗星从天空落下来。那时众人尚不知姜登选已经身亡，只知他被郭松龄扣押，但看到这一情景后都预感到凶多吉少。戢翼翘惊呼：“危险，姜先生怕没有了。”

姜登选沉着有谋、性格平和，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唯一能沟通各派的人，有一段时间甚至高傲如郭松龄也想对其进行拉拢。郭松龄不爱赌博，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他却经常到姜登选家里去玩牌九，而且一掷万金，毫无吝色，显见得是想和姜登选搞好关系。

为姜登选惹来杀身之祸的，只是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负气率部离开前线，差点影响大局，姜登选来了一句“该当何罪”。按说郭松龄这样违抗军令、不顾大局的行为，确实完全够得上军法从事，所以姜登选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按军法应当被处死”。可是实际上熟悉姜登选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该当何罪”只是平时哼惯的一种京剧舞台腔，并非真的要将郭松龄怎样。

郭松龄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是张学良背地里告诉给了他，而就是因为这句话，加上认为姜登选抢了他的安徽地盘，所以姜登选便被置于了死地。得到枪杀姜登选的报告后，郭松龄特发电告，内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

郭松龄仅以一个小小的个人私怨，就下手处死一个在东北军中深孚众望的高级将领，此举很不得人心，可以说是办了一件蠢事。很多人都认为郭松龄度量狭隘，韩麟春事后也说：“郭茂宸如果不杀姜超六（姜登选字超六），事情是可以转圜的，可是你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

郭鬼子反了

姜登选被害时，郭松龄正欲派部队东进奉天。前往奉天，必过山海关，驻守山海关的为张作相第五军团。第五军团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才组建起来的吉林军，从兵员数量到素质、装备均不及郭军，郭军若一拥而上，解决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因缺乏机车，运输迟滞，郭军没法一道坐车，郭松龄只能命令主力部队乘车直趋奉天，而将对付吉林军的任务留给徒步前进的另一支部队。

郭松龄宣布作战计划后，将领们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不妥。因为京奉铁路沿线和奉天附近，除了吉林军外并没有其他部队，郭军主力部队乘着火车通过山海关，吉林军不可能不发生怀疑，由此很可能破坏整个计划。他们主张应按部就班，由拟定步行的那支部队先行乘车，用以解决吉林军，然后大军再毫无阻碍地直趋奉天。

对将领们的建议，郭松龄坚决不同意，他的战术设置是突袭，即以迅雷不及掩雷之势，打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如果在山海关提前交战，张作霖必定得到风声，做好准备。

郭松龄急于进兵，但越急似乎事情越不顺。1925年11月23日当天，主力部队原定上午六点出发，到了十点才有车来，已经没法按方案行动。焦虑万分之际，正好有两个步兵团乘车由蚌埠到滦州，郭松龄就让手下大将魏益三率这两个团先行通过山海关占领一个阵地，以掩护其余部队通过。

几天前，张作相接张作霖电召，已回奉天开会，在山海关负责的是军团参谋处长王之佑、旅长李杜等人。魏益三所率两团虽然以回奉整训为名成功闯过山海关，但也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接着他们又得知有人找到军团部要求见大帅（指张作相），便急忙赶往军团部接待。

来人是一位身材高大、年逾半百的老校官。他面色苍白、惊魂未定，见到王之佑等人，就问：“你们都是大帅的近人吗？”王之佑等都和颜悦色地答道：“当然喽！要不是最亲近的人，怎能将重大军事托付我们呢。”老校官突然如见亲人般激动起来，含着眼泪说道：“郭鬼子反了。”说完便哽咽着痛哭起来。

王之佑忙把手帕掏给他，扶他坐下，说：“老大哥你擦擦泪，镇静镇静，把这件事好好想想，详细告诉我们。”良久，他才恢复平静：“师长临别时，就告诉我这句话。”

原来老校官是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的部下，随赵恩臻到滦州开会。赵恩臻和与会的另外三名师长皆张作霖的老部下，他们因不肯附和郭松龄而被当场解职。幸运的是，出于稳定军心等需要，郭松龄未当场对他们痛下杀手，只是让持枪卫兵押往天津，交李景林看管。

老校官这种级别的军官按规定不能进入会场，他看到自己的师长被押出来，且走在最后面，就赶紧跑上前去。赵恩臻看到他，回头低声说了一句：“你快去山海关见张辅师（指张作相），说郭鬼子反了。”再想问些其他情况，卫兵已上前将他驱开了。后来由天津开来一列去往山海关的客车，老校官就坐着客车赶来进行报告。

在老校官之后，紧接着李杜又接到情报，除证实老校官的报告确凿实外，还得知姜登选已被郭松龄所枪杀。众人由此判定郭松龄是真的反了，于是一面给张作相发出急电，一面下令驻山海关各部队紧急行动，将从西边开来的郭军第三、第四辆兵车全部截住并予以缴械。

却说魏益三在山海关后的万家屯车站等了一夜，不见后续部队开来，知道情况有变，遂就地在万家屯车站及其东北山地构筑工事。次日上午，王之佑、李杜即指挥部队向其发起攻击，结果将魏部一举击溃，两团人大部被缴械，仅魏益三带少数人逃脱。

突袭行动受挫后，郭军专门用来解决吉林军的部队尚未赶到，郭松龄即令主力部队大举出关。铁道线上，十余列军车一个接着一个，浩浩荡荡地向山海关开去。面对实力强大的郭军，王之佑、李杜等人

自知若无坚固防御阵地作为依托，难以进行抵御，于是被迫主动撤出山海关，向绥中一线据守。

干到底

1925年11月下旬，张作霖的总参议办公室突然接到铁路方面的报告，说“关外头一站万家屯车站被情况不明军队占据，交通断绝”。听到这一报告，举座皆惊，但当时众人都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天傍晚，张学良来到办公室，正好收到他的副官兼私人代表胡若愚从天津意大利租界发来的亲译密电。张学良在阅读这封密电时，两手颤抖，连译电纸都被震得簌簌作响，一旁的人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了，事后才知道胡若愚在电报中向他报告了郭松龄反奉，以及扣押四师长、杀害姜登选的情况。

郭松龄突然起兵发难，令张氏父子措手不及。张学良在离开天津时，尚以为拿捏郭松龄不成问题，“你（指郭松龄）就是叛变了，你也出不了我的手心”。至此他才知道大事不好，“他（指郭松龄）真的叛变了”。

张作霖闻讯，更是犹如五雷轰顶，他大骂“小六子”（张学良的小名）稀里糊涂，不应当重用“郭鬼子”：“瞅瞅你交了这么个好朋友。”接着又骂“郭鬼子”没有良心：“看着我大帅府好了，他也要来住一住。”

张作霖让张学良立即驰赴前线，与郭松龄进行“疏通”。自己惹的祸只能自己消除，张学良不敢推托，临行前给张作霖叩头，流着泪

说："儿如不能制止茂宸（郭松龄字茂宸），宁死不归。"

张学良首先赶到绥中前线了解情况。之前大家都知道他和郭松龄的关系，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了，王之佑当即问他："老郭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你事先是否知道？"张学良便把郭松龄如何装病进医院，他去医院看望时，郭对他说的话重述了一遍。王之佑从中想到，以小张代老张，以郭代杨的传说，张学良是可能预知的。顾及张学良的"太子"身份，他不能直接揭穿，只能劝张学良以后行动谨慎，不要专重感情。

就在张学良考虑该如何劝说郭松龄回心转意时，张作霖给他发来一封电报，开头就称"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先生阁下"，后面署名是"张作霖、王永江"。电报上说，现在所有东北军都公举你张学良为东三省总司令，那就请你回来接事吧。

显然张作霖已经了解了郭松龄反奉"养电"的内容，心里郁闷，便拿这样的电文来故意揶揄自己的儿子。张学良有苦难言，连夜便乘军舰到秦皇岛与郭松龄接洽。他不敢亲赴郭军大营，便通过中间人与郭松龄联络，希望能约郭到舰上面谈一次。

郭松龄最初为了保证师出有名和抓住军心，在事先的宣传以及反奉通电上，都打着张学良的旗号，即所谓"以小张代老张"。就是在滦州开始行动时，仍用张、郭两个人的名义发布命令，一直到强闯山海关，他才抛开张学良，独自在所下达的命令上署名。说到底，张学良不过是他用来造反的一个工具，他所要扳倒的，不仅仅是张作霖，也包括张学良在内。有人这样评价郭松龄与张学良交往的整个过程："（郭）平时对张汉卿一片鬼话，无非利用张汉卿以攫取权力而已。"

大战在即，郭松龄对与张学良的谈话毫无兴趣，他让中间人带给张学良一句话：“军事时期，我不见他，军事完了回天津，我再见他。”郭松龄的态度令张学良进退维谷，回奉天吧，父亲肯定要责难，日子不会好过，去别的地方吧，又幻想着郭松龄仍能回头。为此他在秦皇岛徘徊了一天多，后来见实在没有什么指望，才不得已绕道去大连暂避。

在郭松龄举兵东向之前，他在各种通电和布告中都指名道姓地问罪于杨宇霆，反奉通电“养电”中更声称要“清君侧，除群小”。这使杨宇霆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于是便向张作霖请求辞去总参议一职：“好，既然他们反对我，我走。”得到张作霖的同意后，杨宇霆即刻离开奉天，前往大连隐居。

问题是郭松龄虽与杨宇霆水火不容，但其最终目标却远不止除去一个杨宇霆这么简单，所以不仅不肯停止进兵，还向张作霖提出了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让张作霖自动下台让位。1925年11月27日，郭军进占山海关。之后郭松龄命令大部队暂时停止前进，以便等待张作霖在规定时间内做出答复。

见即便抛出张学良、杨宇霆这“双保险”，郭松龄仍旧不依不饶，张作霖进一步认识到，郭松龄的要求不是单纯地要让杨宇霆走人，而是要谋夺他的位子，于是便又将杨宇霆、张学良从大连召回奉天。

11月29日，张作霖在上将军公署召集部属开会，商讨对策。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即便吴俊升结结巴巴地插科打诨，努力想缓和气氛，但室内仍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抑感。张作霖脸色铁青，一上来就大骂“郭鬼子”以下犯上，是个乱臣贼子，继而痛斥张学良偏听偏

信，误了大事。他表示要决心“讨伐”郭松龄，说：“我个人一息尚存，一兵犹在，决不苟且偷安，任彼辈小人得志。”

会上，张作霖的一班旧派老臣备受瞩目。东北军士官派的人数很少，而且多数在上层，中下层几乎全是张学良、郭松龄所提拔的陆大派，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又都跟着郭松龄造起了反，也就是说张作霖已无法依靠新派打仗，他只能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旧派之上。

自新派兴起后，旧派一度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不过是被张作霖用来看看家、守守门而已，临时要拿出派大用场，连他们自己都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更何况，郭军因为张学良的原因，原先好兵好枪好炮都往那里面塞，东北军引以为豪的炮兵也大部分都在其中，称得上是东北军绝对的精锐，相对而言，无论是吴俊升的黑龙江军，还是张作相的吉林军，都早已沦为杂牌水平。

张作霖失望地看到，他的“表决心”在老兄弟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力挺，吴俊升、张作相要么言不及义，要么就做呆若木鸡状，终席不发一言。

还好尚有一个张景惠。张景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接导致奉军溃败，事后又在曹锟政府中担当要职，他自知对不起张作霖，其间老母病逝，都不敢回家奔丧。后经吴俊升、张作相劝解，张作霖终于还是像当年对待汤玉麟那样，选择原谅了他，并委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张景惠很是感动，曾在张作霖面前痛哭流涕，还跪倒叩头谢罪。现在为弥补前嫌，张景惠便主动表态：“我要跟老弟（指张作霖）干到底！”

有没有底气和实力，干到底都已经成为张作霖的必然选择。会前王之佑已选定山海关以北的连山（今辽宁锦西县）作为最佳防御地点。连山为辽西咽喉，地势险要，乃兵家必争之地。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战败，为了防止直军继续攻向关外，姜登选就曾在连山构筑野堡式阵地。王之佑询问当地警察所和农商会，得知几年过去，阵地并未有大的破坏，遂决定在修补的基础上重新加以利用。

张作霖按此报告在会上发布“讨伐”命令，决定在连山与郭军决一死战。作为对郭松龄的回击，他同时宣布杨宇霆官复原职，张学良为前线指挥，协助张作相在连山御敌。

擦肩而过

杨宇霆重任总参议后，认为己方在连山之战中有必胜把握，原因是张军占据有利地形和坚固防御工事，又有河道、大海作为屏障，易守难攻，而郭军在天气严寒的情况下，尚穿秋衣作战，也必然难以持久。他对张作霖说：“大帅尽可宽心……只要我们顶得住，郭军可不战自溃。”张作霖受到激励，于是更视连山、锦州防线为“救命”防线，将他能够集结起来的四万余步骑兵全部投注于此。

张军正在前线紧张备战之际，一场百年不见的大风雪不期而至，一夜之间，连山雪深三尺，军民都被弄得十分狼狈。张学良、张作相本质上说都不是善战之人，一见这情况就慌了手脚，他们害怕自己的部队守不住连山，迅速推进的郭军在占领连山后，反而将此处作为进攻锦州的桥头堡，因而联合给王之佑发来一份命令，要他将连山一把火烧掉。事关重大，王之佑去找李杜商量，李杜看完电报后对他说：“这是发给你的命令，得你拿主意啊。”

王之佑认为不宜马上退出连山阵地，况且“连山上万居民，都是你我乡亲，能看他们在数九寒天里无家可归吗？”在王之佑的坚持下，两人决定不执行上级命令，只是通知居民疏散。

1925年12月3日，郭军到达连山，随即对张军防御阵地展开进攻。虽然郭军在实力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因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和完备，所以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同时官兵的士气也很是不振。士气不振的原因之一，是郭军内部对于反奉的意见并不一致，即便是郭松龄认为信得过的一些军官，也不能接受这种东北军自家打自家的做法。在连山作战的第一天晚上，其主力部队中就有富双英团以及其他两个营拒绝服从郭松龄的命令，乘夜脱离指挥，投奔到了张军阵营。

见郭军推进困难，张军方面便有人建议以富双英团为引导，乘机发起反攻，但张作相缺乏韬略和魄力，主张慎重行事，没有予以采纳，致使己方与制胜之机擦肩而过。

就在张学良、张作相都以为起码可以守住连山的时候，天公不作美，连山一侧的渤海结冰了。有一首东北民谚这样总结辽西的气候特点：“小雪封地，大雪封河。”按节气惯例来说，辽西当时连河面都封冻不了，何况渤海，然而在连日大风雪之后，气温逐日降低，为河海封冻创造了条件。渤海一结冰，行人可通，当天晚上，郭军便采用迂回战术，由海滨出发，在绕过张军正面防线后，潜入了左翼汲金纯师背后。

第二天拂晓，郭军前兵夹攻，对汲金纯师阵地展开猛击。身为师长的汲金纯带头乘火车逃跑，部下亦无心作战，几个小时不到，左翼阵地就到了郭军手中。左翼阵地系由张学良负责，他赶紧把预备队调

上来堵“决口”，谁知又中了郭松龄的诱兵之计，预备队差点全军覆没，好不容易才逃出虎口。

左翼一垮，张作相的中路侧面全部暴露在郭军面前，张作相被迫下令全线撤退，郭军仅用两天时间便攻克了连山。

张作相和张学良急急忙忙地乘火车退至高桥镇，为了守住高桥，张学良把原驻锦州的补充旅也调过来加强防守。不久，郭军前锋进抵高桥附近，张学良嘴上说要守，其实早已胆寒，在下令将河面上的大桥炸毁后即乘车东去，补充旅旅长朱继先也不是吃素的，你跑我也跑，他也扔下部队骑着马逃走，只留下团长们在高桥指挥防守。

补充旅团长以下军官不是郭松龄的亲信就是他的学生，该团也原本便是郭松龄安在锦州的“钉子”，准备必要时里应外合，张学良、朱继先既已不在军中，他们正好阵前倒戈，投向郭军。于是作为反攻连山兼屏障锦州的重要据点，高桥又在最快的时间内丢掉了。

在连山、高桥之败中，虽然前线张军的伤亡并不是太大，但所拥有的大炮全部都被夺走了。1925年12月5日晨，消息传入奉天，张作霖大惊失色。他认为如果再无援兵增援的话，将难以抵挡“郭鬼子”攻入奉天，于是连忙致电黑吉两省，但黑吉两省都表示短时间内抽不出兵。张作霖更加慌乱，当即命令内眷收拾细软准备逃出奉天。帅府上下一通忙乱，家人们动用二十七辆汽车，才把所有家当全部送至日本南满货栈进行保存。

接着，张作霖又令副官购入汽油十余车以及木柴等，摆在帅府楼前房后，然后说：“他妈拉个巴子，郭鬼子来时，给他剩一把掉嘴的茶壶和三个茶碗还有一个掉把的，别的别想。”

岁月是把杀猪刀

见张作霖竟然要烧毁帅府，部下们赶紧找人相劝。杨宇霆劝张作霖说：“你老此时走太早，郭鬼子打到新民，再走不迟。锦州还在咱们手里，前边尚有不少队伍，你老忙什么。”张作霖原来在军事方面对杨宇霆言听计从，但杨宇霆关于连山必胜的预言破产后，张作霖对他也失去了信心，不怎么愿意听他的意见，杨宇霆的这番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除了杨宇霆，能够左右张作霖的只剩下了代省长王永江。于是有人给王永江打去电话：“大帅要到日本租界地（指大连）去，临行时要火烧大帅府，请王省长快来商量一下。”

王永江闻讯立刻赶到帅府。一见到王永江，张作霖就期期艾艾地说：“郭鬼子快进城了。我给吉林、黑龙江去电报，请他们帮忙，但他们不理我。我不能等郭鬼子进城把我逮住，我要到租界地去，这房子也不能留给他，我要放火烧了它。”

王永江埋怨道：“事先你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就想走，就是走，咱们也得一块走，不能你一个人先走。果真需要走时，我们一起走，现在还不到走的时候。”

为了让张作霖宽心，王永江告诉张作霖，他已经派清乡警察独立大队去新民境内的巨流河一线担任阻击，就算郭军越过锦州，也不可能立马攻到奉天城下。另外，他还打算再以自己的名义，再给黑龙江的吴俊升发一封电报，请其出兵堵截包抄郭军。

王永江再三叮嘱张作霖："你听我的话，在我确认不行时，必来告诉你，咱们一块走。另外，你要烧房子，我的意见房子不能烧，就是走，也不能烧房子，房子应留给人们作为一个纪念，人们看见房子就想起你来了。"

王永江的一番话令张作霖大为动容，他当即给王永江作了一个揖，说："好，岷源（王永江字岷源）老弟，一切听你的，我不走了，一切都拜托你了。"

张作霖这时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在稳住了神之后，立即召集王永江、杨宇霆等人开会，具体研究阻止郭军的作战部署。会上，他提议将奉天的全部军队开到新民担任防守，但杨宇霆等人都表示反对，认为为时过早，而且调出去后，周围没有别的军队可填补奉天的防守真空。

说要用兵，却又无兵可用。这让一辈子靠枪杆子打江山的张作霖也倍感无奈，他用凄楚的语调说："连山已失守，辅忱（张作相字辅忱）是否还有抵抗能力，殊不可知。现实四处已经无兵可调了，只有听之而已。如果前线我军再退出新民，我也不免一走了之。"言罢，老泪纵横，与会众人受到感染，也都唏嘘不已。

当天郭军大部队已向锦州发起进攻。城内一片混乱，指挥完全失灵。下午，张学良给张作霖发来电报，称东北军已无挽回之希望。这封电报让刚刚才有所振作的张作霖再次陷入绝望之中，精神也顿时处于半疯狂状态，当着众人的面，他拔出枪就要自杀。幸亏王永江等人手疾眼快，从旁抢下他的枪。王永江一边劝阻一边安慰道："我们可请日本出兵，省城治安可保无虞。"杨宇霆也忙接话说："锦州尚有数万守军，可为一战。"经过众人又哄又骗，张作霖才逐渐恢复了理智。

尽管有王永江、杨宇霆等人不停地为之打气，但张作霖仍整天心神不宁。他穿长袍马褂，戴貂皮帽来到客厅，碰到杨宇霆就说：“你看我这一身穿得怎样？”杨宇霆一看这行头，显然不是要跟郭松龄拼命，而是时刻准备逃命，心里不以为然，但也不便说什么。参谋长于国翰没憋住，在一旁自语道：“郭鬼子未必能进奉天城，怕什么。他走西门，我出东门。他走北门，我出南门。哪个想走就先走吧。”张作霖被说破心思，顿时面红耳赤。

未几，因发电厂发生故障，帅府电灯全灭。张作霖又着了慌，他跳出院子，让卫兵纵火烧楼，准备开溜。韩麟春正好在场，忙让卫兵暂缓动手，随后找到张作霖，对他说：“您老怎么老沉不住气？”张作霖不肯在部下面前丢了面子，这才强装镇定地说：“我怎么沉不住气？我什么没见过？”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与青少年时期那个在刀山火海中闯荡来去，从来也不皱一皱眉的“张老疙瘩”相比，如今的张作霖虽然在政治场上越来越精明，越来越油滑，但论起打仗和与之相应的能力胆魄，却显得越来越不济了。杨宇霆后来对别人说：“张老将军（指张作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他指挥军队乱出主意，毫无定见，而且胆量又小。”

除了随时准备卷铺盖卷跑路外，张作霖对于一切事情都不再过问。每天做的就是在炕头抽大烟，抽一会儿烟，就霍地爬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一边走一边骂“小六子浑蛋”。骂累了，再躺到炕头猛抽，已经是在靠大烟麻醉自己了。

郭松龄反奉之前，帅府的大客厅总是高朋满座，候见张作霖的人经常排成长队。如今早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只有王永江、杨宇霆等

极少几个人每天必到，替张作霖维持局面。

杨宇霆被郭松龄指为引发他兵变的祸首，眼见即将大祸临头，周围的人都归咎于杨宇霆，对他冷眼相加，甚至张作霖也偶尔流露出不满的神色。这让杨宇霆如芒在背，遇事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做主张了。主持帅府的变成了王永江，他除在小客厅里与杨宇霆等人一道办公外，每天还必到张作霖处两次，用以观察和稳定张作霖的情绪。

当时从奉天到地方都人心浮动。铁岭县知事把自己的家当全都搬到日本人开的旅馆，白天在县公署露露脸，晚上则偷偷地跑到日本旅馆里去过夜。王永江闻讯，立即将这名知事撤职，另从省公署调派科员前去接任。

在张作霖已实际无法视事的情况下，王永江俨然成了奉系的“定海神针”，若无他带头做了表率，不需郭军进攻，奉系恐怕自己就已经先行崩溃了。

政治好像演戏一样

1925年12月6日，担任锦州防守之责的张学良、张作相都已逃出锦州。锦州守军群龙无首，除小部分进行软弱无力的抵抗外，大部分也都逃到了城外。锦州之战败局已定，被郭军占领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前线战事失利，使得省城更加动荡不安。关厢（指城门外的大街和附近居民区）还发生了多次抢劫事件，被害者向警局报案，可是警察却置之不理，这表明奉天已处于混乱和失控的边缘。王永江认为在

特殊时期，单靠中国军警已无法维持城内治安，只能求助于日本军警，这也是他对张作霖说“我们可请日本出兵，省城治安可保无虞”的原因所在。

在奉天交涉署科长丁鉴修等人的陪同下，王永江亲自来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进行拜访。因为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去了上海，所以接待王永江一行的是首事副领事吉田茂。王永江告诉吉田茂，现在省城的治安虽然还可勉强维持，但城内一共只有一千多名警察，已感到不敷分配。吉田听出了王永江的话外音，马上表示凡居住于奉天城内的日本居留民及商店，他将另派日本警察前去，此外还可以派些军队协助守备。

按照奉天总领事馆的要求，日本警察开始换上便服，驻扎于各日本商店，大小城门口也都出现了日本兵站岗的身影。只不过这些日本军警的任务仍是维护省城治安，他们可没有替老张家守江山的义务，王永江观察形势，判断前线张军已无力抵抗，郭军即日就可能打进奉天，为张作霖的个人命运着想，他劝张作霖还是和平解决。张作霖则早已是六神无主，王永江说怎么做，他都回复说可以。

王永江再找吉田进行商谈，请吉田代为出面调停。吉田便酝酿了一个调停方案，主要条件是张军投降，张作霖无条件下野，“和平交出政权”。

商妥调停方案后，王永江又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召集省各法团负责人讲话。他先说道：“大帅让我召集你们大家来谈谈。军事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但集中兵力还可以背水一战，不过使家乡父老遭到兵燹的蹂躏，大帅是不忍心的。”

这段开场白摆明是为了给张作霖和奉系台阶下，意思不是我们打不过“郭鬼子”，只是为了你们这些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忍辱不打了。接着他又引述了张作霖的话：“大帅说了，政治好像演戏一样，郭鬼子嫌我唱得不好听，当然可以下台。郭鬼子要唱，就让他上台唱几出，我们可以变成看戏的，到台下听听，左右是一家人，何必兵戎相见？”

最后切入正题：“你们可以去欢迎他（指郭松龄），但要请他不要因为我们唱得不好，连戏台都砸毁不要。”

王永江还说他已经备好专车，请各法团挑选代表，然后乘车沿铁路向西去迎接郭松龄，准备正式移交政权。大家听后都意识到张作霖要投降郭松龄了，眼下只是缺个迎降代表。众人经过商量，一致推荐省议会会长范先矩为首席代表，并与王永江商定了具体的起身时间。

次日，也即1925年12月7日黎明，郭军占领锦州。郭松龄一边下令将司令部专列开入城内，一边派自己的外交代表殷汝耕前往旅顺，就相关问题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交涉。

时间推回到两个月前，那时张作霖和冯玉祥还没有公开对立，双方均派人赴日本观操（即观看日军的军事训练）。东北军的首席代表是郭松龄，国民军的代表是韩复榘。他们在东京同住于帝国旅馆内，一天深夜，韩复榘已经睡下，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他披衣起床一看，却是郭松龄。

郭松龄一脸神秘，入室后就小心地把门掩好，并且对韩复榘说：“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

鬼使神差

郭松龄要与韩复榘谈的是其亲身经历。据他说，他到东京后，日本参谋本部有一个重要职员曾来拜访过他。这位职员没谈几句话，就问道："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回答："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来人见状，便无精打采地走了。

郭松龄说他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用以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相关密约张作霖已经在奉天与日方商洽成熟，张作霖还给日本当局发电报，说签字的代表已经动身，不日可到东京。恰好郭松龄又到东京，日方误以为他是签字代表，所以才会前来拜访。

说到这里，郭松龄对张作霖"出卖国家"的行为表现得义愤填膺，他对韩复榘说："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没有任何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郭松龄所说的这件"稀奇古怪的事"真实发生过，而且由于"二十一条"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涉及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益，张作霖自担任奉天督军起，便一直对此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

在各种公开场合乃至政争中，张作霖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也从不让步。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有传言说曹锟因为想做总统，就对外国公使许诺，称一旦上台，就可以延长京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及"'二十一条'也可以考虑"。张作霖愤愤地表示："我和曹锟是儿女亲家，但他想做大总统，出卖东三省，我就不答应！"

两个月后，日本的态度变得十分关键，而它究竟是助张还是助郭，自然都要取决于其本国的利益。假使郭松龄成功地代替张作霖做了“关外王”，又能够真心实意地承认和履行“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及其关东军自然乐得助郭。然而当时日本朝野的主流舆论都普遍认为，郭松龄资历较浅，且不说未必能把张作霖赶下台，即便能够成功，他对于东北军新旧两派也难以驾驭。另外，张作霖固然难以应付，但郭松龄上台后问题可能更为复杂，譬如郭松龄为了反奉，已与冯玉祥、国民党等势力构成了复杂关系，部队也改称了国民军，这意味着郭一旦掌握权力，对日本究竟会怎样，其实是件很难说清楚的事。

从有利于日本的角度出发，多数日本人都觉得助郭有风险，不如助张，以后也仍以张作霖为谈判对手。不过也有些人提出相反观点：如果郭军打破顾虑，冲过满铁线并进军奉天，就算日本有所抗议也无济于事。到时郭松龄已造成了局面，在交涉中也处于有利地位，就不会像进入奉天前那么好说话了，日本同样会很被动。

鉴于多方面的考虑，日方决定暂时观望。另外，所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张、郭战争一开始，张作霖的日本顾问们就忙开了。这时本庄繁已期满归国，接替他的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大佐。松井与张作霖的关系处得也不错，眼看张作霖似乎已在奉天待不住了，他便把张作霖最宠爱的五太太寿夫人以及一些年幼子女接出来，安排到他位于满铁附属地内的家里避难。町野作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兼铁杆支持者，自然更是卖力。在此期间，他除介绍一名做过警官的日本人给张作霖做保镖外，还特地引荐滨面又助“在大帅危急时期来帮忙”，后者亦被张作霖聘为私人顾问。

滨面又助在日俄战争期间参与制订过对俄作战计划，之前担任日本关东军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的参谋长。他和町野都有机会接触

不少日方的内幕消息，郭松龄派殷汝耕再赴旅顺与日方交涉一事，也很快被他们透露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那一阶段正是时而清醒，时而错乱，相当沉不住气的时候，他一听就慌了神：要是这次殷汝耕答应就“二十一条”做出书面保证怎么办?

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张作霖就决定跟关东军进行谈判。关东军本来就把助张作为首选，听说张作霖已有此意，自然乐得舍郭而就张。1925年12月7日，白川的代表斋藤恒参谋长来到奉天，通过町野邀请张作霖在满铁地方事务所见面。见面过程中，张作霖鬼使神差地与对方签约了一项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以及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作为交换，斋藤也在助张上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其中之一是在满铁附属地内或日本租界（主要指旅大）内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这相当于预先给张作霖找了退路，密约一缔结，张作霖就把帅府财产运往满铁地方事务所进行存放。

按照密约，关东军方面还同意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以及对郭松龄发出警告。12月8日，白川向郭军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沿线二十里内落下一颗炮弹，否则将由守备队解除其武装。

为了好对外界进行交代，白川也同时“警告”了张作霖，但这其实是做做样子的，其主旨还是帮助张军。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若是郭军不能进入其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范围的话，无异于把南满线给张作霖做了保护靠背，也大大增加了郭军攻入奉天的难度。无怪乎当张作霖接到关东军送交的“警告书”时，顿觉神清气爽，“获得了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

有了希望的张作霖改变主意，决定不下野了。他再次召来瞽目术士张震洲预卜吉凶，张震洲经过一番演算，说张作霖虽逢厄运，但终必“逢凶化吉”，“克制敌人在十天必死”。张作霖由此更信心大增，决心“讨伐郭逆”，而且即便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与郭松龄奋战到底。王永江见状，便由省公署给迎降代表打去电话，通知他们迎降事宜“暂缓进行”。

张作霖原先曾计划将奉天的全部军队开到新民，只是因为怕郭军乘虚杀入才未果，现在既有南满铁路作为保护靠背，关东军又同意在必要时候出兵对他进行保护，以及协助维持奉天省城治安，这种情况下，张作霖要再把军队调出去就变得可行了。

奉天城内只有警察没有兵，奉天卫戍部队指的是驻扎于北大营的军士教导队。军士教导队乃种子部队，堪称精锐中的精锐，如果能将他们进行编组，然后开到前线去作战，无异于给张军打了一针强心剂。问题是自郭松龄起兵反奉后，张作霖等人对年轻的少壮军官都起了疑心，怀疑这些军官可能暗中与郭松龄勾结，加上连山之战时已有一个补充旅充当了郭军的内应，更使他们疑窦重重。王永江在城内治安不稳时，宁肯求助于日本军警，也不肯轻易动用教导队，说白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事在危急，张作霖内心挣扎半天，还是决定一试。正式下达调令前，他先把教导队副队长王瑞华等尉级以上的军官叫到帅府训话，借以进行试探和动员。

我哪一点对不起他

这天上午，帅府内外气氛紧张，前后院戒备森严，大厅台阶的两侧还架上了机枪。王瑞华等人皆徒手而来，置身于如此情境之下，都一个个心惊胆战，不知道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上午8点，张作霖出来接见众人，他站在台阶上，怒目注视着瑟缩的军官们，开口就道："我找你们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郭鬼子反了！"

他环视了一下人群，接着又说："怎么，你们就这些人吗？我命令你们连事务篓子（指司务长）都给我带来！"不等他说完，王瑞华就发出口令："敬礼！"随后向前一步举手敬礼，解释说大部分军官都已调走，剩下的人全来了。

张作霖把架势摆得这么足，为的是对军官们慑之以威，抢先压住其气势。王瑞华态度恭敬周到，让他稍感安慰，但仍不敢放松，他装作余怒未息的样子说："你们他妈拉个巴子的为啥没走，想他妈的里勾外连吗？"王瑞华忙再次敬礼，连称："不敢！不敢！"张作霖哼了一声："把枪炮交给你们就敢了。我马上发给你们武器，让你们和郭鬼子里应外合，咱们干一场子，我张作霖要离开帅府一步，我就是丫头养的！"

这一刻的张作霖似乎又回到那个敢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草莽年代，精神也变得亢奋起来。他虎着脸对军官们说："我知道你们都和郭鬼子勾通一气，你们回去告诉郭鬼子，让他进来，我等着他。我姓张的要和他比试比试，把刀子插在胸口上，我要眨巴眼儿就不是人留的。"

说到这里，张作霖有意识地看了众人一眼，见没有一个人敢吭声，这才哗哗哗地继续开讲。他先简单回顾了一下自己那充满坎坷、极其不易的创业经历，接着便说到了郭松龄："我进沈阳（正式名称仍

为奉天，但私下谈话时亦称沈阳）后，有人说老一套办法不行了，这才成立讲武堂。后来郭鬼子到讲武堂当教官，又他妈的当了军长，我哪一点对不起他呢？”

世上任何事缩小到最后，似乎都能归结到恩怨二字之上。张作霖对此也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无奈：“他（指郭松龄）以为自己有功，没得着地盘。我他妈的得像陪送姑娘似的，一个一个来呀！将来还没有他当督军的地方吗？哪承想他人面兽心，干出来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

“好，这回我把沈阳让给他，看他能待多久？王瑞华，让你们这帮人和他里应外合，看你们能干多久！”

王瑞华终于弄明白了张作霖召他们来帅府训话的用意所在，他给张作霖敬了个礼，说：“报告大帅，郭鬼子的亲信早就调走了。我们都是大帅、少帅的人，我们有天良血性，请把我们装备起来，去和没有人心的叛徒决一死战。”

听王瑞华如此表态，张作霖还不太放心，又问军官们：“你们都能这样？”众人齐声答道：“能够！”

张作霖这才完全放松下来：“我知道你们都不是郭鬼子的亲信。王瑞华，我任命你为混成旅旅长，晋级少将，这些人都晋升一级。咱们有的是好武器、新服装、银元大洋，马上给我招兵，越多越好，星夜操练带上前线！好，都带回去！”

王瑞华敬礼道：“谢谢大帅委任。”张作霖正要转身，王瑞华又抢前一步，大声替两名团长向张作霖谢委，说：“谢大帅委任，报效大帅。”张作霖连连摆手：“不，不！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除了鼓动教导队外，重新振作起来的张作霖还给旧派老臣打气鼓劲。张作相屡战屡败，本已萎靡不振，经张作霖竭力劝说，决定亲自指挥吉林军在巨流河与郭军继续拼杀。张作霖也给黑龙江的吴俊升发去电报，电文中流露出了恳请老兄帮忙之意。

鉴于老兄弟之间的感情，张作霖这个时候对吴俊升不得不语气委婉。同样激动起来的杨宇霆可就顾不得了，他见吴俊升动作较慢，便干脆采用激将法，强硬地质问吴俊升："按兵不动是何居心？"此话一出，果真起到作用，吴俊升最怕张作霖质疑自己的忠心，于是不管客观条件允不允许，马上命令黑龙江省骑兵即刻奔赴巨流河战场。

锦州失陷后，张学良一度不敢返回奉天，而想出国避难。当时跟随张学良的鲍文越事后说："我们判断郭鬼子能够成功，为了避免舆论抨击以及伤了父子（指张氏父子）的情感，张学良准备先到法国去。我们连船票都买好了，只要老帅一走，我们也就出国了。"

张作霖既下定决心不离奉天，张学良也就不能在他未走之前出国，若要向外界有所交代，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将他自己和父亲绑在一块，祸福共之。他对张作霖说："你老在奉天坐镇，我去前方布防，把郭军引到兴隆店，等候各路援军到齐，一战可把郭军歼灭！"

张作霖立刻说："好！再想走，就不是你亲爸爸。"张学良也赌咒发誓："我若顶不住郭松龄，不是你老的儿子。"说完，转身就到前线布防去了。

第十章　上了马就不肯下来

郭松龄攻取锦州后，就认为大事已定，变得十分骄傲自满。在从天津出发时，有人问到奉天后如何对待张氏父子，他的说法还很谨慎："我们是讨杨（指杨宇霆）以清君侧，当然仍是张家的天下。"到了锦州，当别人又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口风就完全变了："那得听地方上的处理了。"所谓地方处理，其实就是由他主宰生死而已。

随着郭军进占锦州，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大势已去，郭松龄可以成功，因此想转换门庭者不在少数。汤玉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又被张作霖重新提升为骑兵师长，与热河都统阚朝玺一道驻兵热河，二人遭到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眼看郭军又逼了过来，便派代表来锦州找郭松龄，表示愿意合作，条件是要求事成之后得到黑龙江。此外，隶属于张作相吉林军、从山海关前线败退下来的骑兵师长于琛澄，也提出只要事后能得到吉林，就与郭军进行合作。

阚朝玺有一师一旅，汤玉麟、于琛澄则各有一个骑兵师，三人均为地道的实力派。且不说郭军缺乏骑兵，汤、于骑兵师可能带给他们莫大的帮助，就是阚朝玺的作用也无可替代。当时只要阚朝玺率部指向黑龙江，吴俊升保家尚恐兵力不足，就算杨宇霆再出语相激，也无法抽调部队增援奉天前线，张作相的吉林军亦只能用于自卫。

对郭军来说，这是一个不战而成功的大好机会，可是令魏益三等部属为之扼腕的是，他们的主帅对此机会却并不重视。

戴着镣铐跳舞

郭松龄认为自己力量强大，有人临时加盟固然是好，没有也无所谓。在未征求众人意见的情况下，他就委阚朝玺为总参议，汤、于为参议，对于阚、汤、于所索要的地盘则置之不理。与此同时，他还下令扫荡奉热边界，其对象为阚、汤的部属，这更无异于在打阚、汤的脸。魏益三等人对此再三劝谏，但郭松龄只是一意孤行，不予采纳。

见郭松龄不能相容，阚、汤、于只得重归张军阵营。郭松龄得报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让他们凑在一起，我费一回事就完了。"实际上，与阚、汤、于合作的失之交臂，是郭松龄的一个很大失策，此后郭军不但失去许多帮助，其左翼还不断受到阚、汤、于的骚扰破坏。

还在未从天津出发时，郭松龄曾想请李景林出兵热河相助。假使李景林能到热河，郭军左翼不但可保无忧，而且必要时，李部还可以迂回长春，切断吉黑与奉天的联系，则郭军又可以至少成功一半。未料冯玉祥因急于得到天津海口的使用权，派国民军在邯郸附近对李景林部进行了围攻，冯李关系因此恶化。李景林见所部被国民军围于邯郸，早已是坐立不安，焦急异常，有时竟至热泪盈眶，几乎要放声痛哭，如何还有兴致出什么热河。当时郭松龄急于出兵奉天，也顾不得协调冯李之间的利益和矛盾，就匆匆离开了天津，最后还是冯玉祥近水楼台，轻易便攻占了热河。

按道理来说，冯玉祥已取热河，完全能代替李景林援郭，可是他对东三省也存有野心，只想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从始至终，在援郭的军事行动上都不积极。

郭松龄事先把反奉想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一纸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然后就能挥戈东进，直入奉天，因此在后勤方面缺乏足够配

备。直到张郭战争开始，他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不得不派人向“三角同盟”的盟友求援。冯玉祥借助于郭军对张军主力的吸引，几乎是不劳而获地就拿下了热河，心情很是舒畅，不仅馈送郭军大批罐头食品，还资助了现款二十万元。李景林则不一样，立马将郭的来使拒之门外：“我们都穷透了，哪里有钱借给你们，还想跟你们借钱呢！”

就在这个时候，李景林的母亲恰好从奉天发来一封长电，诉说“张大帅”待她如何之好，劝李景林不要跟着郭松龄造反。李景林因遭到冯玉祥攻击，本就认为所谓的盟友已经毁约，看到这封长电后被触动心思，遂决定背盟。他先把郭松龄扣押在天津的东北军官员全部予以释放，接着又将所部改为直军，与张宗昌的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公开宣战，“三角同盟”就此解体。

李景林背盟，使郭军陡失后方不说，其背后还面临着李军的军事威胁。为防止出现意外，郭松龄只得派魏益三率部据守山海关，以防备李景林“从背后给我们来一刀子”。冯玉祥夺取热河后，态度也不明朗，相当于成了郭军在阚、汤、于之外左翼的另一个隐患。在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还得时时提防着后方、左翼出现异动，郭军就像戴着镣铐跳舞，真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士气低落是郭军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从根子说，这是因为郭松龄的反奉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大多数郭军基层士兵都觉得东北军是一家，反奉是自家人打自家人，最后打了半天，遭祸害的还是东北军本身和自己的家乡父老。虽然他们勉强服从了命令，但表现在行动上却是动作迟缓，进取心严重不足。

在张郭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后勤不继又进一步对郭军的士气造成了打击。还在连山之战的头天晚上，他们就吃足了这方面的苦头。那

天晚上突降大雪，气温骤然下降至零下二十多度，郭军士兵均身着单衣单鞋，只能披着羊毡，躲在战壕里以御风寒，很多人都被冻坏了手脚。

郭松龄在天津存了六万套冬装，结果李景林一翻脸，把所有冬装和郭军在天津存放的其他钱物全给扣押了。无奈之下，郭松龄只好把冯玉祥送给他的二十万元都拿出来，让人在天津重新置办了几万套棉衣，但因交通断绝，直到巨流河战役打响，这些棉衣都还尚未能够装船运往前方。

分封地盘、防这防那、士气低落、缺乏棉衣，这一堆事先想都想不到的烂事，让郭军竟然在锦州停留了一周多时间。一周多过后，各部仍迟迟不愿前进，他们的趑趄不前，使得张军不仅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调兵遣将和布防，而且还乘机破坏了铁路沿线的给水设备，运兵车因此无法开动。这样一来，郭军的大部分人马都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徒步行军，行动更加迟缓低效。事后有人认为，如果郭军能够做到兵贵神速，张郭之战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背水一战

张作霖虽倾其所有，能够会集到巨流河进行布防的兵力也不过五六万人，其中还有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有点实战经验的都是从连山和锦州败退下来的部队。为了与郭军进行识别，每个官兵都发有一块黄布围在脖子上，老百姓见了都说："奉军黄到脖子上了。"意思是张军垮台在即。

张学良在父亲面前信誓旦旦，等到真正置身于这种“黄到脖子上”的氛围时，也远没有先前那样决绝果敢。更何况，他的老部队都归了郭松龄，如今除辖有少数临时投奔过来的部队外，其余尽为刚招来尚未完成训练的新兵。所谓把郭军引到兴隆店，然后一举歼灭，也就只能拿来哄哄老爷子，让他高兴高兴，以便少挨几句骂了。

有趣的是，两军对垒，张学良设在火车包厢上的司令部竟有电话线可通到郭军控制区域。战前的两三天内，司令部内电话不断，而所有通新民县的电话统统都由张学良亲自接，别人一概不准代劳。同在包厢里办公的戢翼翘看到他接电话后，有时很懊丧，有时又比较开朗一点，有时还听到他说：“他不下台，他也不自杀。”

戢翼翘等人也不好问哪个“他”不下台，哪个“他”不自杀，但是可以肯定这个“他”不会是气焰正高的郭松龄，倒很可能是指他那个既不下台也不走的老爷子。

其实，不光是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等“老头儿”这回也豁了出去，身为张家的老臣子，他们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而且他们本身与郭松龄也殊有矛盾，深知一旦对方当政，绝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所以都准备不惜牺牲一切与郭松龄进行决斗。

张作相从吉林出发时，曾请人扶乩，乩语上有“福厚平安”的话，于是一到前线，就把原定的军团部由公主屯改到安福屯，并且对别人说：“我是死在这里也不再退了。”张作霖听到后对将领们说：“辅忱既已抱着至死不退一步的决心，我也决心至死不出奉天。你们好好去干吧！”

张作相向被称为是东北军中最厚道的一个人。前面屡战屡败，他没有因此责罚任何一个军官，反而向能来参战的全体官兵表示深深感谢和慰问，同时又引咎自责，说他不应离开大家先行退走，当谈到因天冷衣薄，已有官兵出现冻伤时，还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张作相的吉林军仍是巨流河一战的主力，他的这些做法在令官兵为之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大大鼓舞和激励了士气。

张作霖深知巨流河战役关系着张家兴衰荣辱，为此不惜让刚生完幼子的五夫人寿夫人出马，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一起，携五万银元，前往东北医院慰问受伤官兵。另外，除出十万银元招募新兵，他还派张景惠以宣抚使的名义到前线慰劳官兵，宣布凡参战官佐各晋一级，士兵每人发“恩饷”两月，仅后者一项就耗用了五万银元。这些都是张作霖自掏腰包，也可以说张家雄厚的财力在关键时候助了他一臂之力，使得张军更加斗志昂扬。

张郭两军在后勤方面悬殊。张军所有士兵都发给新棉衣、皮大衣、面包、罐头、香烟等，物质供应异常丰富。也因为后勤充足，张军比较重视军纪，力避军民冲突，以此收买人心。反而郭军主力虽曾以军纪肃然著称，但此次因棉衣棉鞋不足，就不得不抢老百姓的棉衣来御寒，有的甚至把小孩的棉衣都抢来裹脚，服装看上去五颜六色，不但遭老百姓怨恨，而且对军心士气也是不小的挫伤。

胜利的天平已悄然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的张军倾斜，但郭松龄及其部下却全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据说就在巨流河战役打响之后，他专车上的兵站人员晚上仍脱光衣服睡大觉，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众人都认为指日可进军省城，所计划的只是如何接收的问题。

战前，郭松龄得到情报，获知张作霖将集结兵力，在新民一带与之背水一战，便召集众将开会商议。会上，多数人都提出应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左右翼兵进奉天。这样既可以避开南满线附近，不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也能够不与集结于新民的张军主力直接交锋。只有郭松龄认为“张的军队已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分路进击费时费力，完全是多此一举。

因连续获胜，郭松龄对张军相当不屑一顾，曾说：“等张作霖把奉、吉、黑三省的杂牌队伍全部集中后，一击成功，可免去东征北讨，战事延长。”在他看来，现在正是这样可予以集中歼灭的好机会，“（张军）越是集中，我们收到的效果越大，趁所有敌军都集中新民附近，正好一网打尽”。

无独有偶，当张军在兴隆店召开军事会议时，也有人建议为防范郭军的两翼包抄，应实行分路堵截，作为张军总指挥的韩麟春则判断，郭松龄性格固执急躁，指挥作战多喜欢硬碰硬，加上一路打的都是胜仗，骄傲轻敌，实战时必定仍只会集中兵力攻坚，且直向白旗堡一带进军。会议最终采纳他的主张，张军所有兵力都被部署到了白旗堡附近的岸上。

我扯谁的后腿，谁就得趴下

1925年12月22日夜，郭军向张军的巨流河防线发起全线总攻击。战斗十分激烈，枪声连成一片就像刮风一样，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郭军的几次强攻都未能得手。外间传说，日本派一个师团的陆军和百门大炮加入张军防线，巨流河、兴隆店一带无处没有日本兵，一些郭军官兵事后便认定是与他们作战的除了张军还有日军，所以仗才这么难

打。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刘鸣九亲身参加了巨流河战役，据他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整个巨流河防线并不太长，倘有此事，一万多人的日本师团和那么多大炮该配置于哪个阵地上呢?

又有人说，日本航空队曾狂炸新民等地，以配合张军的正面进攻。那时张学良兼任奉天航空处总办，下设三个飞行大队，如果要轰炸郭军，出动自家的空军就足够了，也实在没必要借助日本航空队。刘鸣九随张学良的军团部先后由兴隆店移驻新民，其间没有看到新民的哪一个地方曾经被炸。

日本人有援助张军，但仅仅只限定于几个日本顾问，比如张作霖的私人顾问町野参与了防御作战计划的制订，吉林督署日本顾问林大八中佐在前线为张军部署过炮兵阵地。在战场上真正顶住郭军的还是他们曾经的手下败将，只是士别三日，他们的状态早已今非昔比。

巨流河距离奉天省城不过几十里，郭军只要越过巨流河，奉天就不能守了。可是果子明明就在眼前，却横竖吃不着，郭松龄急了，立即下令集中火炮摧毁张军阵地，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众人都倍感惊异的事：耳边炮声隆隆，但没有一个射击目标遭到破坏，连炸裂的声音也听不到，就好像炮兵射出的不是一颗颗炮弹，而是一个个铁球。

郭松龄忙问参谋长、炮兵专家邹作华究竟是怎么回事，邹作华煞有介事地解释说，张军阵地都建在巨流河河坝之上，河坝全是沙土地，抗力小，故而射出去的炮弹都不爆炸。

事实是郭军只有很少的工辎部队，运输工具还是临时从民间雇用的十余辆汽车，在铁路运输连运兵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充分满足的情况

下，其战斗配备受到很大影响。负责这方面的军官忙中出错，出发前检查不周，居然所有炮弹引信都忘记携带了。及至战斗开始，这一要命的失误才被发现，但再运已来不及了，又不敢据实报告，郭松龄下令开炮后，就只得将没有引信的炮弹打出。当郭松龄发问时，邹作华若据实讲来，不仅会让同僚倒霉，还可能牵连到自己，自然也就只能一本正经地瞎编了。

张军阵地挨了半天炮击，却没有受到损失，也是莫名其妙。后来郭军兵败，邹作华以此邀功，说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事先让火车上管弹药库的人把炮弹引信抽了出来，所以炮弹才会不炸。张学良晚年对此进行了否认，说："那是假话（指邹作华暗中做手脚），不但是假话，那邹作华当时是真心帮他（指郭松龄）。"

原张学良第三军团的炮兵囊括了东北炮兵的大部分，兵变后皆为郭军所有。郭军能一克连山，再夺锦州，炮兵居功至伟，如今大炮哑了火，郭松龄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继续督促步兵发动硬攻。

虽说邹作华对郭松龄说的都是瞎话，但河坝坚固也是真的，一旦炮兵不能发挥威力，步兵在河坝前再怎么折腾，都唯有流血送命的份儿。张军方面，吉林和黑龙江军固然在装备上不及对手，野炮又已在战斗中全部散失，所存山炮只有一营，然而张作霖已把奉天兵工厂储藏的大批新枪、新炮、弹药，一股脑儿全部送到了前线，相对于无后方作战，弹药无法补充的郭军，他们反而后来居上。据说当时连奉天兵工厂的技工、技士都到前线充做了炮手，他们熟悉火炮技术性能，射得很准，每发必中，给无法逾河坝而过的郭军造成了极大伤亡。这让郭军又产生错觉，以为"奉军方面有日本炮兵参加"。

郭军官兵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混乱，仗打得好还罢了，一旦遇到重大挫折便会产生剧烈动摇，尤其下级官兵，眼看奉天近在咫尺，自己有家不能归，还得在冰天雪地中与以往袍泽拼个你死我活，更是本能地生出了对郭松龄的不满。进攻失败后，士兵们议论纷纷，有人嘀咕："进城（奉天城）打谁呢？打老将吗？我们不会这样没良心。"更多的说法则是："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这一天下来，郭军士气不振就已达极点，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松龄在东北军中的威信，确实还是压不倒张作霖。

1925年12月23日，就在郭军攻击受挫、军心沮丧之际，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赶到战场。吴俊升虽然没有多少正规的军事知识，但毕竟也曾是一员久经沙场的悍将，他在军事会议上说："我是老粗，不懂得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怎么画。我只知道两个人打架，我扯谁的后腿，谁就得趴下。"

吴俊升用来扯郭松龄"后腿"的办法，是亲自带领骑兵绕道袭击郭军后方。郭松龄在滦州起兵时只控制了炮兵、步兵，没能控制住骑兵，这导致在巨流河战场上，张军骑兵极多，而郭军骑兵极少，一旦面临骑兵部队的大规模冲击，几无抵御能力。

骑兵得手之后，张军正面部队乘机放弃阵地，实施全线出击。让他们感到惊异的是，当面的郭军竟然不做抵抗，就纷纷举起白旗，自动缴械投降。此后，整个郭军阵营便呈现出兵败如山倒的趋势，即便郭松龄亲临前线指挥也无济于事。

群龙无首

郭松龄在阵前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什么解困的好办法，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场战争是注定失败的了。与会者最后决定给张作霖发电报，承认失败，请求宽恕。张作霖很快回电，大意是除郭松龄一人外，其他将领均可赦无罪。

张作霖的这份回电颇具策略，所起到的效果也极其微妙。郭松龄走投无路，于是提出反攻意见，计划亲率五个步兵团，于第二天拂晓实施进攻。没想到反攻意见一提出，便遭到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反对，什么部队无法整顿啦，什么后方联络线中断啦，什么人心不稳不愿打奉天啦，什么通过南满铁路恐有问题啦，总之就是找各种理由逃避继续作战。

郭松龄再有勇气，总不能做光杆将军往上冲，只好说："你们都不愿意打了，现在就是因为我。我走，你们跟沈阳接头就是了。"说着，愤然离开前线指挥所，回到了位于白旗堡车站的郭军总司令部。

不料当天晚上，王永清的黑龙江骑兵旅突然闯入司令部附近，停在司令部后面的弹药车被击着火，车站内外顿时火光和爆炸声一片。司令部人员不明真相，以为司令部已被张军包围，于是纷纷下车各自逃命。

郭松龄身边向来没有为他分劳的各种得力幕僚，自滦州起兵以来，大事小事都是自己一把抓，此时早已经到了精力不济、顾此失彼的状态，听参谋副官报告司令部被围，便也信以为真，当下即偕夫人韩淑秀及少数机要人员，在一部分卫队的保护下，乘着民间大车向南逃跑。郭松龄一脱离战场，余下部队群龙无首，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郭军至此彻底失败。

1925年12月24日，当郭松龄一行逃亡至新民县的苏家屯时，与走错道路的王永清骑兵旅不期而遇。郭的卫队全是刚从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学生，缺乏战斗经验，连老百姓见了，都说“不像当兵的，倒很像学生”，而且卫队又没有重武器，步枪也很少，学兵们多持手枪或手提机枪，打得不远。在王部用迫击炮实施轰击后，卫队很快就消耗完子弹并被包围缴械。

王部查问俘虏郭松龄去了哪里，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向南逃了。接着又问老百姓，老百姓回答说不认识什么“郭鬼子”，只知道有一男一女下了菜窖。王部于是判断郭氏夫妇就藏在菜窖里，他们自己不敢下去抓人，就硬逼着两个村民下去。村民进入菜窖后，郭松龄想开枪，被韩淑秀劝阻，说：“别打！他们也是被逼下来的。”当郭氏夫妇走出菜窖就缚时，村民们看到“（郭）挺高的个子，长脸。他老婆个子不高，长得挺漂亮”。

获知郭松龄夫妇被捕，王永清的上司、骑兵师师长穆春当即给张作霖打去电话，报告了事情经过。这时张作霖喉咙已经哑了，最初他还有些半信半疑，直到穆春说此事千真万确，绝无错误，他才兴奋地说：“他妈拉个巴子的，我得叫他来，问问他。你们好好地看着，别叫他寻了无常，等天亮我派人去弄他来城里。”

张作霖接电话时，他的秘书长郑谦和杨宇霆正好就在旁边。后者问他会怎么处理郭松龄，张作霖显然仍没有想好，只是说：“把他解回来，我当面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反我。”

郑谦是个很有头脑和做事稳健的人，他立即说：“日本兵派兵在营口以北一带巡逻，万一知道我们押解的是郭松龄，中途截去怎么办？”

虽然从事后来看，郑谦显得有些多虑，但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他有这种想法却也情有可原。与郑谦意见一致，杨宇霆同样不主张将郭押来奉天，不过他顾虑的是另外一层。

将星落地

杨宇霆对张作霖说："郭反正是要死的，不如就地枪决，以免株连。"这句话提醒了张作霖，他倒不是光想到张学良，而是考虑到，郭军几乎包含了东北军全部的精锐，事情既已过去，大部分官兵还要予以保全，没必要留活口从而牵连无辜。

张作霖随即让杨宇霆代为拟电，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以后张学良及郭军旧属均归咎于杨宇霆，认为是他"矫老帅之命"，导致郭松龄被处决，这也成为杨宇霆日后遭到诛杀的原因之一。可是以郭氏夫妇死后，张作霖仍要将他们暴尸三日以泄愤这一点来看，即便没有杨宇霆的建议，郭松龄亦必定难逃一死，而杨宇霆一片苦心要调解张氏父子的关系，避免他们感情破裂，结果反被人歪曲，以致惹祸上身，也真是太冤、太不值得了。

在杨宇霆代拟的处决令中，枪毙韩淑秀的理由和罪状是"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韩淑秀确实自始至终参加了郭松龄的反奉行动，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张学良就说"郭松龄起兵倒戈的动因，与她的太太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个很硬气也很有担当的女人，行刑时，围观的村民看到"郭松龄有些颓了，那女人倒比她男人刚强"。死到临头，韩淑秀还对丈夫说："你怕什么，如果我们胜了，不也是一样吗？"她接着又对行刑士兵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

郭松龄是在一户姓郝人家的庄稼地里被枪杀的，郝家认定郭被杀是“将星落地”。将星自非人间凡品，落在哪里，哪里的风水一定错不了，因此郝家人特地在郭被杀的地方植上松树，作为自家坟地，此后该处便得名松树坟，或称郝家坟。

在郭军兵临城下的那段时间里，张作霖被迫把家属都暂时藏到他的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家里避难。当张作霖接到前方电话，得知郭松龄已被处决时，正值他的第八个孩子张学铨出生，张作霖十分高兴，一拍大腿，就给张学铨起了个小名，叫作太平。

张作霖并不知道，他的大儿子此时尚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之中。穆春在擒获郭松龄后，除直接向张作霖报告外，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张学良获悉，当时就打算让穆春先将郭松龄送到新民县，然后予以释放。他和机要秘书刘鸣九进行商量，刘鸣九说：“这个事情你可要好好考虑，老将这样震怒，能行吗？”张学良听了有些害怕，暂时便再未提及这个话题。

对郭氏夫妇行刑的并不是穆春，而是张作霖的卫队团团长高金山。和穆春一样，高金山也知道张学良与郭松龄不同寻常的关系，所以在从奉天总部出发时亦给张学良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没有说行刑，只是说奉派押解。张学良正在兴隆店自己的司令部内，收到电报，他马上让刘鸣九复电高金山，叫对方押送郭氏夫妇路过兴隆店。刘鸣九问：“到这里干什么？去沈阳又不顺路。”张学良回答：“到这里我把他放了。”刘鸣九没想到他对放郭仍念念不忘，急忙提醒道：“这不行啊！老将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老将能答应吗？”张学良这回很坚持，说：“不要紧，你就写吧！”

刘鸣九只得遵命拟写电报，然而还没等他把电报稿写完，高金山的第二封电报来了："走到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学良看完这封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就当作一次演习吧

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亲密，形同一人，但那是郭松龄反奉以前的事，之后他不仅被夺去军队，还差点遭受灭门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仍要不顾一切地放郭，连刘鸣九都弄不清其动机何在，只能单纯归结为"张待人宽厚，对郭始终怀有眷顾之情"。

几年后，张学良正式继承父位，没多久便诛杀了杨宇霆。外界认为，这与杨宇霆不识时务，在张学良未"登基"之前就与之结怨有关。可是张杨之间的所谓怨其实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无非是杨当初没有能够事事都顺着"太子"罢了。这至少说明，张学良并不如他身边的人所形容的那样宽厚和有肚量，回到郭松龄这件事上，他对郭也不会真的"眷顾如初"，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政坛上走那么远。

到了晚年，张学良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打算："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可以看出，张学良放郭的目的之一是要将其重新收拢过来，为己所用。

抛去张学良是否真的参与郭松龄反奉不提，毕竟他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少帅"，郭松龄的作用无可替代，张依赖郭来练兵打仗，以及统摄陆大派这样一支派系力量，也都已成为一种惯性，可以说，骤然离开郭的辅佐，张会本能地感到困难重重。

张作霖出身绿林，也因此常被讥为不学无术，但他为人豪爽，且能知人善任。相比之下，张学良就缺乏这样对人才兼容并蓄的能力，终其一生，选用到的大将之才只有一个郭松龄，他也离不开郭松龄。在他看来，郭反奉，说明这员虎将的毛还不够顺，如果捋顺了，不一样可以继续用吗？从这个角度理解，郭松龄被杀，令张学良未来的用人计划落空，所以他才会跺脚叹气。

接下来，张学良只能考虑如何接收郭军残部，也就是原来归属他的第三军团了。还在郭松龄占领锦州，奉天省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时，张作霖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善后处理的问题，吴俊升当时态度激烈："郭松龄非杀不可，追随郭松龄的将领也非杀不可。"

散会后，张作相有意留在后面，等吴俊升走了，又重新转了回来。见他去而复返，张作霖便问："你有事吗？"张作相说："郭松龄反奉，都是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的军队，也是你老的军队，都是家乡子弟，不该处理一大片，结下子孙仇！"张作霖听了欣然道："好！"随即派人分头给尚在奉天城内居住的郭军军官家属送米送面，进行抚慰。后来郭军将领们给他发电报，请求宽恕，他在复电中又重申了"罪在一人，不及其余"的原则，这些在当时都起到了瓦解郭军的作用。

战争结束，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韩麟春会合一处，讨论怎样处理郭军将领。与张作相老实宽厚的个性不同，吴俊升是表面一团和气，内心狠辣无情，同时在后期激战时，黑龙江军队也伤亡惨重，为此，他提出要对郭军将领一律追究，并将郭部军长一级和抵抗最有力的几名旅长予以处死。

张作相战前就有不扩大惩办范围的主张，他表示反对："这是奉军内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郭松龄已经死了，别追究了，保

留元气吧！”韩麟春也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力主从宽。

就张学良而言，郭松龄的部下就是他的部下，全部处理完了，他在东北军内部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不想株连过多，但最终杀不杀，还得张作霖说了算，而相比于张郭战争之前，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的发言权已大受限制，张作霖一看到他就骂：“我这点家当都叫你给折腾光了。”张学良不敢再多言，只好恳求张作相回奉说情，请求张作霖不要再多杀一人。

张作相向来都维护着张学良，听后立即赶回奉天见张作霖，并当面提出了郭松龄既死，其他人员一律免究的建议。

正好吴俊升、张景惠、王永江、杨宇霆等人也都在帅府，张作霖尚未定夺，张作相的建议就遭到他们的全体反对。张作相与众人竭力辩论达两小时之久，但室内空气仍无法缓和，“总得杀几个”的声浪还是不断响起。最后张作相急得哭了，他抽抽噎噎、若断若续地说：“那就先杀了我，免得再看发生惨剧。”

张作相在文武群臣中有着不错的口碑和人缘，见他这副模样，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张作霖实际对张作相持支持态度，不同意张作相的意见等于拂了张作霖的面子，于是也就一个个改弦更张，开始帮着张作相向张作霖求情。张作霖见状顺水推舟，给了一句“那就让小六子去看着办吧”的答复。

张作相生怕张作霖事后变卦，赶紧又叫通新民的电话，请张作霖把这一意旨亲口向张学良说一遍，至此，他才如释重负，放下心来。

演一场戏

张学良能够在民初一群政要的后人中脱颖而出，固然要归功于张作相、郭松龄等人曾给予的帮助，但也确有属于他的一套。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高层，耳濡目染之下，张学良对于如何掌权和拥有自己的实力，要比练兵用兵熟稔得多，这在战后处理郭案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张学良先对郭军将领进行了一次肃清，凡与郭松龄关系较深的老同学、老同事，均撤职不予录用。当时部队不在新民，而在后方的军官，以后也均撤职。然后是职务上的考量，中下级干部大多奉命行事，因此一律不予追究，照常任职。旅长以上的将领，除郭反奉时，被郭怀疑削去军职，或在郭军到新民后，就和张学良暗通声气的少数人得以官复原职外，其余都必须经其逐一考察。这样做既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原第三军团的骨干力量不致流失，仍可为其所用，又避免了军队日后再次生变。

在对旅长以上将领进行甄别时，张学良问他们："你们说怎么办？"每个人的回答都不相同，有的说："这是郭鬼子的所作所为，我是没有办法的。"还有的说："这账，你找郭鬼子算就是了。"只有被郭松龄任命为军长的刘伟颇为倔强，没有把责任往郭松龄身上一推了之，当张学良问他"刘佩高（刘伟字佩高）你怎么干这不是人的事（指附郭反奉）"时，刘伟坦然回答："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

韩麟春当时在场，觉得刘伟勇气可嘉，是个汉子，在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后说："刘佩高你是好样的，还回到第二旅去当旅长（刘伟原任第二旅旅长）。"最后这些高级将领只有刘伟一个人得以重掌军权，其余全部被安排了闲职。

看到大局已定，张作霖遂在帅府办公厅召开善后会议。他进入会场后，首先把头上的貂皮帽子摘掉放在大案子上，接着向会场环视一周，然后才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说完，他把目光转向与会的袁金铠：“四哥（张作霖对袁的称呼），你把通电先宣读一下，明天就发表。”

袁金铠清了清嗓子，高声朗读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王永江字岷源）、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字兴权），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张作霖之所以要让人起草这封通电，直接起因是郭松龄到新民后，便抛开“清君侧”的一套说辞，直接朝他开了炮。在郭松龄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张作霖被口诛笔伐，大加指责。迫于形势的需要，张作霖当时也被迫发出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了人民生活，同时表示在张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

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既然前面做了这样的保证，后面就不能不有所交代，哪怕是演一场戏。

通常情况下，一场戏除了主演外还得有一众积极配合的助演。未等袁金铠把全篇电文念完，吴俊升就站起来连摆手带摇头地说：“嗯……嗯……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嗯……咱们一块儿撂下！”王永江也连忙站起来：“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惟有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有负国家人民倚托之重。”

战祸是谁引起的，张作霖说是他，但郭松龄最早的“清君侧”却指明是杨宇霆，此乃众所周知的事。杨宇霆不敢回避，继吴俊升、王永江之后，他站起发言：“苏皖挫败，乃至牵动全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

当时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正遭受国民军的猛烈进攻，形势岌岌可危，杨宇霆主张应加紧收编郭军残部，集中力量，先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到关内对直鲁联军进行策应，以求共同击败国民军。为此他呼吁：“这种危急存亡之际，绝不是大帅引退休养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言实际也就是表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直接说这次战祸仅一个月就得以平定，“全仗大帅洪福”，言下张作霖不仅无过，还有功。

眼见火候已到，再讲下去恐怕自己也要感到难为情了，张作霖站起身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

小六子上了贼船

随着“让贤”的戏份儿暂告一段落，张作霖突然脸色骤变，一边眼光四顾，一边询问军政执法处处长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闻声从后面角落里站起应道：“我在这里。”

张作霖大声对常荫槐喊道：“常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荫

槐弄不清张作霖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刚想转身，就被吴俊升制止："嗯……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

吴俊升虽然出身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但处事却极其圆滑，可谓是八面玲珑。他一眼就看穿了张作霖还在继续演戏，只是剧目由"让贤"换为"斩子"罢了，同时张作霖在剧中的虚情假意也都是一样的——嘴上喊着枪毙儿子，不过是要欲擒故纵，换一种方式为儿子擦屁股。

吴俊升两次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给张作霖圆场，足见其人聪明之处。张作霖暗暗高兴，他假装怒气冲冲地问吴俊升："你有什么说的？"吴俊升答道："嗯……过去没有张军长（指张学良）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

为了能够把戏演得更为逼真，张作霖当然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就过去，他把脚使劲一跺："你胡说！"全场为之震动。

吴俊升忙说："嗯……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

顺着这个现编的理由，"吴大舌头"越说越顺溜："嗯……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嗯……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摆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经吴俊升如此演绎，张学良转眼之间价值倍增，张作霖再要"斩子"，等于就是不顾大局了。这时张作相也站起来要发言，张作霖大喊一声："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

张作相显然是要继续为张学良说话，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张作霖所有部将中最偏袒张学良的一个，因而此时此刻，他说出的任何话，都可能是在帮倒忙。对于张作霖来说，有吴俊升的那些理由就足够了，用不着再画蛇添足，让别人产生自己护短的印象。

张作霖召开善后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贬新派，扬旧派。他对奉系内部的各个派别并无事先设定的成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新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示了价值，因而受到重用，可是这次反奉战争恰恰又是由新派一手挑起，而且竟然用他老张的军队来打他老张。倒是一群老兄弟们两肋插刀，带着貌似早已过气的旧派人马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让张作霖心存感激的这帮老兄弟中，既有一贯死忠于他的张作相、吴俊升，也包括一度离开的张景惠、汤玉麟。张景惠在张作霖最感绝望的时候甘愿同生共死，汤玉麟虽然曾犹豫彷徨，但在关键的巨流河一战中，还是义无反顾地率部出击，对郭军进行了截击，由此重获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认为他“作战英勇，为人可靠”。

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理智上，张作霖都感到有必要给新派泼一泼冷水，再为旧派点个赞。他说：“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

黑龙江骑兵旅旅长王永清出身土匪，绰号“天下好”，他不但袭击郭军后方司令部，造成郭军大乱和郭松龄脱离战场，而且还直接擒获了郭松龄。张作霖便把他拿出来作为旧派并不比新派差的证据：“‘天下好’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指郭军）打得蒙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

“我姓张的向来一秉大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张作霖确实可以做到无愧于心，甚至很多将领原来都不是出自奉系，与他素无瓜葛，比如李景林就是直隶人，只是单纯因为作战有功而受到了重用。回到郭松龄，又何尝不是如此，张作霖对郭松龄刚来投奔他时的落魄情景仍记忆犹新：“郭鬼子这个鳖羔子（鳖羔子指鳖的幼崽，东北方言中骂人的话），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到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

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张作霖对郭松龄反奉的真实起因看得很清楚：“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指汤玉麟，冯麟阁、汤玉麟、张作霖三人结拜时，汤居于老二）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清君侧。”

历史上李世民“清君侧”只是个幌子，为的是实施宫廷政变，争夺父兄手里的权力。当张作霖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一下子占了上风，突然又当场发作起来：“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眼看事情要糟，杨宇霆霍地站起身：“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率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他一个人。”

王永江老谋深算，立即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张作相、吴俊升心领神会，两人上前一左一右地架着张作霖退席，张作霖也意识到自己入戏过深，差点就要把戏

给演砸了，于是便顺势装着不情不愿的样子，被张、吴架着出了会场，走之前还不停地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宴非好宴

之后张作霖又召开了一次军政首长大会，当然这次仍是做戏，只是对象变成了各法团领导人。会上，张作霖首先斥责了作战不利的军官，尤以汲金纯为最。汲金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就丢盔卸甲，所统领的第二十七师本为张作霖起家的基本部队，结果竟然让民团给缴了械，这次张郭战争又是他首先掉链子，直接导致张军大败于连山，因此被张作霖结结实实地痛骂了一顿。

骂完不得力的部下，张作霖对与会众人说："我不善用人，出了这样的败家子，对不起地方父老百姓。天下英雄多得很，你们另选高明来接替我吧！"

虽然实际还是为了演戏给人看，但当触碰到"另选高明"这个话题的时候，张作霖却又一次动了真情，他越说越气，越气越收不住："你们中间不是有人想要欢迎郭鬼子吗？好啦，我不干啦！"说着便站起来，手指奉天省议会议长范朗清："范议长你不要走。"范朗清被吓得面如土色，他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王永江见状，急忙接过话茬："不干当然是不干了，不但大帅不干，我们也不想再干下去啦，但是军事刚过，善后没办，地方疮痍满目，急需整理。我们把一些问题处理处理，然后让地方另举贤能接替吧。"吴俊升附和道："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

这几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了起来，会场内的空气立刻得到缓和。张作霖按照上次会议的招数，站起身说：“你们大家商量好了！”然后便退出了会场。他一走，会议在王永江的主持下重开，各法团负责人不出意外地都一致慰留张作霖继续出任东三省首长。

“让贤斩子”的戏终于可以圆满收场了。隔了两天，张作霖在帅府召开的所谓民众大会上发言，向社会各界做最后一次交代。他训话的重点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显示威严，“谁想造反，郭鬼子就是先例”；第二层的大意是说他本不想干了，既然大家仍然推举，不得不接着做下去，但此后大家要安分守己，“一切听我的”。

内部的事情交代完并不是结束，真正难办的是张作霖单独和日本签订的那份密约。事实上，张作霖签完密约后，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一回去就拿给王永江看。因为当时郭军正兵临城下，情势十分危急，王永江怕影响张作霖排兵布阵的情绪，就没有说什么。直到郭军兵败，他才慢慢地跟张作霖解释：“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就等于承认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杨宇霆知道后说得更具体：“这是袁世凯‘二十一条’中的第十六条，我们不能那么做。”张作霖一听如梦初醒，顿时把肠子都悔青了，赶紧让王永江和杨宇霆想办法挽回。

王永江、杨宇霆的办法是召集议员开会，对密约进行反对和抵制。于是张作霖便用电话通知日方：“省议会通不过，所以我暂不能答应商租和杂居问题。”

随后张作霖又亲赴旅顺，就关东军在张郭战争期间提供的帮助进行答谢。为了还掉日本人的人情，张作霖此次自掏腰包，特地拿出一笔钱赠送给关东军。可是光这点钱，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哪里能够看得

上眼，他们在意的仍是密约，而且他们很清楚，所谓“省议会通不过”只是个幌子，东北的事情只要张作霖点头，就没有通不过的。

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为张作霖举行欢迎宴会，准备在宴会上重提这件事。张作霖知道宴非好宴，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赴宴前，秘书问要不要为他起草一份答谢词，他回答说：“不用，他有来言，我有去语。”

宴会开始后，白川先致辞，提到郭松龄事件能够得以平息，对中日双方都有好处，“解决这件事我们（指关东军）也尽了力”。意思是当时许给他们什么还是要履行，不应找借口反悔。

张作霖早有准备，他在致答谢词时连称感谢，但在涉及有关密约的具体问题时却说：“我有两个图章，一个交给下边，处理一般问题时使用。一个由我自己保管，遇有重大问题，非盖这个图章不生效。”

说着，他真的从怀里掏出一枚图章给众人看，并表示怀里这个图章才是生效图章，而密约并没有盖这枚图章，所以不生效。“在郭松龄反奉时期，下边人谈些什么，他不代表我。”

签订密约时，由于双方都很仓促，所以协定确实不很规范，张作霖身边有一大帮外交方面的专家，当然能够看出来，张作霖也就以此钻空子。白川等人气得目瞪口呆，但又不好当场发作，宴会最终不欢而散。

张作霖如此做法，连奉系内部的人都看出他是“有点赖账”，日本人更不傻，都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日本政府尤其是关东军的很多人因此对张作霖十分厌恶，他们认为从直奉战争到郭松龄事件，若不是日本从弹药补给到作战指导都给予不少援助的话，“奉军就

不会有今天的威武”，至于密约也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因为是“作为报答洪恩，奉军才进而提供了商租权之类的权益。”如今，张作霖居然“赖”得一干二净，实在是“忘恩负义”。

有仇必报

郭松龄在率部开赴新民之前，将魏益三部留在了山海关。郭部主力兵败巨流河后，魏益三拒绝张学良的招抚，正式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1月，张作霖一方面派兵讨伐魏益三，另一方面对山东境内的直鲁联军进行支援。

因为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一段时间内对关内完全无暇顾及。等到张郭战争结束，冯玉祥的国民军已进占京津，截断京奉、津浦两路，李景林被迫率直军退往山东境内。与此同时，直系方面的靳云鹗部又由河南进入山东，将津浦路兖济段切断，与张宗昌的鲁军在曲阜、兖州之间对峙。

北有冯玉祥，南有直系，令张作霖倍感压力，尤其靳军在山东的作战也颇为得手，倘若这两派真正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东北军，那就太危险了，于是他决定派张景惠专程前往武汉，与吴佩孚联系，希望双方能合力讨冯。

吴佩孚是有着书生般一根筋脾气的人，最恨朝三暮四、随风转舵之徒，他曾经对部下说：“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甲，我姓吴的生平不干这种事。”喜欢“干这种事”的是他曾经的部属冯玉祥，吴佩孚也因此对冯玉祥十分痛恨，即便佯装与孙传芳联合讨奉，其实还是想借机给冯玉祥一下子。

郭松龄讨奉，让吴佩孚见识到了另一个奉系的“冯玉祥”。早在张郭战争期间，他就打电报给张作霖，大意是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倒戈，想必你也很痛心，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帮助你。

有了这段插曲，张吴联手便得以水到渠成。张景惠到武汉后，迅速与吴佩孚签订了合作讨冯的协议。因为张吴合作，靳云鹗遂与张宗昌战前议和，并反过来协助直鲁联军，沿京汉线向河南的国民军发起进攻。

据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说，他也曾奉命先后拉拢孙传芳、吴佩孚，而且第一个找的就是孙传芳。只不过孙传芳神情高傲，对与奉系结盟表示不屑，当着町野的面，他声称：“我绝不跟张作霖这种坏蛋合作，也不必借用潦倒者吴佩孚的军队。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将统一天下，请你放心。”町野碰了一鼻子灰，扔下一句“竖子不足谈”，便放弃了对孙传芳的说服。

尽管孙传芳不肯和奉系合作，但对于张作霖而言，有一个吴佩孚愿意和他站一块也就够了。在东北军、直军、直鲁联军的三路攻击下，国民军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战局发生重大转折。冯玉祥以让出热河为条件，希望与张作霖达成妥协，但张作霖根本不想接这个茬。不仅如此，在侦知郭松龄之变实际亦为冯玉祥所鼓动后，他还打破原先对王永江等人许下的承诺，准备大举进兵关内以泄愤。

民初政坛很多风云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吴佩孚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对一切背叛行为都无比憎恶，张作霖则是有仇必报，打败了一定要报复，等到打胜了再让人。这跟他打牌的风格非常相像，同样是喜欢赢不喜欢输，输了很不高兴，但赢了再还给你没关系。

据说第二次直奉战后，张宗昌原本并没有分到地盘，他无事可做，就天天陪张作霖打牌，结果每天都大输。当时张宗昌也没什么钱，输了便叫部下替他还钱。他的参谋四处张罗，到处借贷，最后已经输到了数百万，张宗昌只好如实告诉张作霖："我没钱了，部下的饷也发不出去。"张作霖一听，就设法让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办，山东相对来说是个富裕的省份，也等于张作霖是把更多的钱还给了张宗昌。

在张郭战争中，张作霖被看似不沾边的冯玉祥狠狠阴了一道，可以说是输惨了，那他就必须报复，为此可以不计代价，不论得失。袁金铠曾说："张雨帅向来遇事一直向前钻，顾头不顾屁股，加上杨宇霆从后面向前紧拨，将来不撞在墙上不休。"张作霖确实就是这样的人，上了马绝不肯再下来，除非对手已经自动倒地。

钱从哪里来

张作霖欲再次举兵入关的想法，引起了以王永江为首的"文治派"的极大不安。奉天本为天府之国，在王永江的悉心治理下，吏治财政也都拥有了一定的基础，若能循序渐进，保境安民，实足为乱世中的桃源之地。王永江也常劝张作霖"修文偃武，保境安民，刷新政治，自强不息"，张作霖嘴上答应，实际却总忘不了中原逐鹿，硬是要以关内一隅之地与天下争衡，结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自食其言。

最早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张作霖纳杨宇霆之言，实行"整军经武"。无论是扩建兵工厂、购买飞机，还是扩充军队，都需要巨额投入，钱从哪里来？只能从奉票中来，实际就是靠官银号不断地加印钞票。

当时国外发行的纸币是可兑换的，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或相当于三分之一现金的实物作为储备，否则纸币就不能稳定。因为奉票不可在省内兑换，所以东北官银号发行纸币时虽然也要有一定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额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储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纸币。问题是即便这样，纸币发行也不是不受限制，一旦达到滥发的程度，必然导致币值跌落，物价飞涨，金融混乱，民生日蹙。

张作霖自督奉以来，军费向来不受预算限制，而且他和杨宇霆均志在事功，对花钱毫无概念。各方政客和势力来东北要钱，张作霖总是以“个人机密杂费”的名目大笔一挥，予以批准。王永江对此颇有微词，说：“总字（指张作霖）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故易上当，而不承认。”杨宇霆作为兵工厂督办和“整军经武”的主要发起人，自然更是花钱的祖宗。每当王永江稍加整顿，使金融稍有起色时，就会发现杨宇霆又在买机械购军火，扩充兵工厂了，于是奉票也跟着旋起旋落，始终无法稳定。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王永江这样诉说自己的苦衷：好像在防洪水，筑起了一丈的堤，杨宇霆马上就会将之去掉一尺，于是“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

王永江固然是财经高手，可是碰上这么多败家的，也徒呼奈何。他曾反复向张作霖谏言：“奉省应速改方针，发展民治，缩小军备，导中国裁兵统一先声，固中国长治久安之策。”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打响前，又力劝张作霖，说战事一旦结束，“我们什么也不要”，更不可留恋北京，因为“北京是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开发东北，大有可为”。

张作霖当时对此建议表示欣然接受，然而仗一打赢，便忘乎所以，仍像以往一样“棋胜不顾家”“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的授意下，东

北军不但没有退回关外，反而乘胜南下，大肆扩充地盘。王永江对此痛心疾首，愤而批评张作霖“无信义，终不能成大事”。

因为没有听王永江的话，见好就收，张作霖偷鸡不着蚀把米，把关内地盘几乎丢尽不算，还直接导致郭松龄发起了反奉战争。张郭战争对东北经济和财政可谓雪上加霜，奉票原来十八元尚可换现银一元，这时发展到六十元才能换到现银一元，很多普通人家因此被逼得倾家荡产。王永江算一算，一年来，奉天的军费、兵工厂经费、经常性军事开支、张作霖的“个人机密杂费”总计已达五千一百万，而奉天全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两千三百万，尚不及总支出的半数。他断定，“奉天省将无法实施民政，财政破产乃为必然之势”，以及“郭叛以后，非数年休养生息，难复元气”。

作为唯一的弥补之策，王永江要求张作霖从速放弃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染指关内，同时“裁节军用”，将兵工厂缩小十分之四，军队减少到三个乃至四个师，张作霖的“个人私密杂费”也必须废止。后者因遭到军队武将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对于前者，张作霖开始有所应承，在通电中声明要“修明内政，不勤远略，与民休息”，但是话犹在耳，东北军就又敲响了大举入关的鼓点。

眼看自己费尽多年心血才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最终都将一股脑儿毁损于战火，王永江心力交瘁，导致左眼失明。1926年2月，他请假回金州原籍探亲，便在故里给张作霖写了一封辞职信。张作霖自然要再三挽留，王永江就说我复职可以，但必须同意“裁节军用”的改革建议，这让已经骑虎难下的张作霖犯了难，只得准其辞职，另选他人为奉天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

王永江辞职，在东三省政界尤其是“文治派”中引起了地震般的连锁效应，吉林省长王树翰、黑龙江省长于驷兴均自动引退。这对张作霖打击不小，曾对人说：“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

炮兵群

纵使张作霖曾经那么信任王永江，王永江又以辞职相规劝，却仍不能动摇其纵兵入关的决定。自1926年2月下旬起，随着张作霖一声令下，东北军大举入关，随后便会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向国民军发起猛攻。国民军抵挡不住，包括京津热河等地盘一一丧失，甚至一直被夹在奉冯中间的段祺瑞亦受池鱼之殃，被迫通电引退。

冯玉祥焦头烂额，为了减轻压力，只好通电下野，前往苏联考察，所有国民军均被改为西北军，由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统一指挥。张之江坐镇张家口，将其主力部队向察绥撤退，借以保存实力，同时以一部分军队留守南口，以阻追兵。

张作霖调兵遣将，对南口形成了三面大包围之势，但却迟迟未下达攻击令。原因是他在入关后，即与吴佩孚商定，由吴主持南口战事，进攻南口也以直军为主。另外，直鲁联军收复天津后，张作霖任命张宗昌的大将褚玉璞当了直隶督办。李景林对此心怀不满，想脱离东北军，另谋出路，被张作霖及时发现并加以追缉，这就又耽搁了不少工夫。

1926年6月，吴佩孚亲自指挥和发起南口之战，他将攻占南口的任务交给直军大将田维勤，并告诉田维勤，如果攻下南口，即以察哈尔

都统相酬。无奈田部多由投降过来的西北军所改编，与西北军稍一接触便马上溃散，很快就由六个旅变成了两个旅。

就在南口久攻不下之际，吴佩孚的后方又起了火——北伐军攻入湖南，相关告急电文雪片似的一日数至。万不得已，吴佩孚只得南返救急，北方军事转交张作霖负责。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乃是东北陆军的全盛期，拥有总数达六个军团的雄兵，然而张郭战争改变了这一切。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除对东北经济和民生造成极大打击外，也严重削弱了东北陆军的实力，其损失甚至超过两次入关作战损失的总和。东北陆军由盛转衰，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便将所余的大部分步兵精锐和全部炮兵都编入第三、第四军团，以便集中使用，也可以说，这两个军团是当时东北军中力量最强、装备也最为精良的部队。

第三军团长为张学良，第四军团长为韩麟春，按照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模式，两军团实行合署办公，称之为联合军团。东北军曾有“五虎将”的说法，“五虎”分别为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如今姜登选、郭松龄已亡，李景林离奉而去，能被称为东北军名将的便只剩下了韩麟春、张宗昌。韩麟春不仅在指挥作战方面有突长，而且军事素养也要远高于张宗昌，张作霖让他辅佐少主，很明显地有替代过去“张郭配”（张学良与郭松龄）之意。张、韩在军团内也分工明确，张学良本身缺乏独立指挥大战役的能力，因此掌握的是财政和人事方面的权，军事指挥主要由韩麟春负责。

这次为了在“常胜将军”吴佩孚面前争一回脸，张作霖将联合军团和直鲁军全部投入战役，韩麟春、张宗昌这两员虎将也都被用到了刀刃之上。

1926年8月1日，东北军对南口发起进攻。南口系山丘地带，且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可就近从京绥路上征发铁板、枕木、水泥及铁丝网等物资。利用张作霖迟迟未下达攻击令的那段时间，西北军在山上构筑了坚固工事，这也是吴佩孚的直军难以攻克的原因之一，不过等到东北炮兵开上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东北兵工厂可以自己生产大炮，但好马配好鞍，没有高素质的炮兵，再多的大炮也只是摆设。说起东北炮兵，就不能不提一下张郭战争时的那个炮兵专家邹作华。邹作华人称邹大虎，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读的都是炮科。他最早服役于皖系的西北边防军，任野炮营营长，在直皖战争中，他和他所属的野炮营被奉军收编，由此奉军才开始有了建立炮兵部队的基础。

因张学良也是学炮兵出身，对炮兵很重视，所以邹作华加入奉军后，即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和提拔，他的野炮营扩编为炮兵第四团，隶属于张学良、郭松龄的“二六旅”。作为东北炮兵创始和扩展的关键人物，邹作华对炮兵的技术、射击两门教育抓得非常实在，专门主办了东北炮兵军官教育班和炮兵研究班。在这两个班的倡导下，东北炮兵的素质得到极大提高。他们可以单纯依靠图上作业，在无观测无试射的情况下开始效力射，还掌握了占领遮蔽阵地的技术，观测器材则从炮队镜发展到精微仪测远机，这在民初的国内炮兵中都是很先进的。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东北军最厉害的就是炮兵”。

早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东北炮兵便表现不俗。那个时代国内炮兵包括直军在内，经过正式训练的不多，而且多数都是买国外的炮，一门炮顶多带五百发炮弹，只有东北军的炮兵不单训练有素，而且由于后方能大量提供火炮以及炮弹，在战场上没有束手束脚的感觉。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山海关战役，一阵炮击过去，直军很多带掩盖的野

战工事就都被摧毁掉了，直军的炮兵阵地亦受到压制，只是郭松龄在指挥上存在一些问题，以及步兵未能很好地利用炮击成果进行突破，才使炮兵的价值打了折扣。

邹作华虽然在张郭战争中当了郭松龄的参谋长，但因为他是张学良提拔上来的，而且在巨流河战役中又发生了神秘的炮弹不安引信事件，所以事后不仅没有受到处分，还被继续委以重用，担任了炮兵军（隶属于联合军团）的军长。在此之前，国内各军事集团都没有炮兵成军的先例，东北军创造了一个纪录。

作战时，邹作华将参战炮兵部队编组成左右中央各炮兵群。每一个炮兵群所使用的火炮都不是单纯的山野炮，而是依情况分别配属榴弹炮，同时部队也不是一个连一个营地使用，而是集结各类炮兵营，组成一个密集的火力集团。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炮兵群战术，国内其他部队纵有炮兵，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火炮的大规模有效运用，使得南口战役的激烈程度为有史以来所鲜见。张学良当时担任的是后方总司令，但仍清晰地记得："我们有两个炮团，七十二门野炮，最少也打了五六万发炮弹。这个炮弹虽与外国的炮弹不一样，没有那么好，可毕竟也是炮弹啊！"西北军在南口构筑的最坚固阵地称为"红工事"，最终也在凶猛的炮击下遭到毁灭性摧毁。

8月12日拂晓，东北军又投入新组建的坦克车大队，以坦克大炮作为掩护，向南口发起总攻。经两个昼夜激战，西北军全线溃退，南口至张家口一带尽为东北军所夺。

做一帝

北方的南口战役刚刚结束，南方战场上直军又再度败北。尽管吴佩孚使尽了浑身解数，但所部根本就挡不住国民革命军的猛烈攻势，他自己也在卫队的保护下，从汉口逃往河南。

直军在南北战场中的表现，证明继皖系之后，直系也已沦为明日黄花，而奉系则成为当时北洋最大的实力派系。作为奉系首领，张作霖水涨船高，无论是他自己还是部将们，自我感觉都好到要爆。1926年9月，奉系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韩麟春首先发言，说各省军民都已派代表赴津，要拥护张作霖做海陆军大元帅，“以便统一军政大权，迅速平息内乱”。

韩麟春话音刚落，张宗昌立刻高声附和：“既然各省代表们都愿意，我也很赞成。那么，老将，你就做一帝吧。”接着他又吹胡子瞪眼地说：“俺们的士兵只要多练习编草鞋，准备着用，然后一声令下，三推两搡就可以打过长江去。”

张宗昌所说的“做一帝”当然不是像当年袁世凯那样称帝。袁世凯以他的悲惨结局告诉人们，龙袍不是不可以穿，但只能以其他能让世人接受的名目来穿，比如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或内阁总理，后者同样可以君临天下，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张宗昌的话可算是说到张作霖的心坎上了。屡次称雄关内，使得他逐渐不满足于做“关外王”。毕竟，哪怕是一个可以遥控中央政局的“关外王”，与坐金銮殿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啊。早在张郭战争时，瞽目术士张震洲在预卜吉凶时，就说张作霖不但可以“逢凶化吉”，而且作

为“大命之人”，他还将有“九五之尊”。张作霖认为现在正应了此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过下称帝瘾了。

就在大部分人都热情高涨的时候，杨宇霆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南方战事未平，在军事上尚没有直接把握之前，不宜过早“登基”。自王永江辞职后，张作霖原有的左膀右臂只剩下杨宇霆一人，他对之言听计从，于是便决定接受杨宇霆的意见，暂时把“称帝”一事放一放，看能不能先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群雄。

张作霖要做盟主，北洋内部自然都无话说，就连以前反奉最力、架子摆得最足的孙传芳也开始拥戴其为北洋领袖。孙传芳属于直系的后起之秀，也是直系在吴佩孚之外的另一个能战之将，不过在江西战场上他同样被国民革命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不得已，他只好掉过头来，乞援于张作霖。

得知张作霖正驻于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特派代表杨文恺前往奔走接洽。杨文恺到天津后首先找到了张宗昌，张宗昌答应帮忙疏通，他还诙谐地对杨文恺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孙传芳、杨文恺均为士官生），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啦，咱们一起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孙传芳字馨远），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经张宗昌疏通后，张作霖亦认为孙传芳尚有一部分实力，可以利用他在长江一带抵御国民革命军的北进，因此答应与其合作，且既往不咎。

孙传芳得信，即微服潜赴天津，预备晋谒张作霖。孙传芳是导致当初奉系南下失败的始作俑者，甚至可以说他还间接引发了郭松龄的反奉战争，奉系将领对之怀恨在心的不少。据说杨宇霆就极力劝张作

霖乘机杀之，以泄旧恨，同时根绝后患。张作霖对杨宇霆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不打不成交，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

他还语重心长地进行剖析：“现在馨远（指孙传芳）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堵塞贤路吗？”

张作霖一边说服杨宇霆等人，一边派张宗昌、张学良前往迎接孙传芳。对这件事，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起初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看到张作霖正坐在椅子上看电报，然后副官送来一张名片，张作霖摆摆手说：“不见，不见。”町野觉得张作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于是便从副官手里要过名片，一看是“孙传芳”。

新盟主

此前町野为了促成孙传芳与张作霖合作，曾在上海跟孙传芳吵过一架，还遭到了冷遇，现在看到孙传芳居然主动上门拜访，张作霖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他马上对副官说：“请他来。”

一会儿，孙传芳由副官领着进来了。这时张作霖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町野则特意坐在一张大安乐椅子上，摆出一副“有如张作霖的头子的态度”。进来之后，孙传芳很自然地向张作霖跪下，但张作霖却面朝里面不加理睬。町野见状，心里自然大为受用，原先的那股郁闷情绪也烟消云散。他装出既往不咎，大人有大量的样子，拍着孙传芳的肩膀，请其站起来。

孙传芳站起来后可怜巴巴地说："我受到陈诚（北伐军指挥官，蒋介石的大将）的攻击，只身幸免于难。我愿意拿出我的地位、财产，一切的一切，请你们救救我。"

张作霖仍不作答，町野就让副官"把杨参谋长请来"。杨宇霆即时赶到，町野对他说孙传芳因为这个那个理由而来，"请你好好帮助他"。说罢，就志得意满地进房间去了。按照町野的说法，孙传芳第二天还和他碰了面，但一句话也没说，此后张孙联盟也告吹了。

如果町野的这段记述没有任何虚构的话，他所见到的一切，不过是张作霖、孙传芳、杨宇霆为了考虑他这个日本人的感受，所额外加演的一个小品而已。当他不在场的时候，真实的场景其实是这样——孙传芳一进蔡家花园，看到张作霖早在台阶下迎候，忙执晚辈礼，往前紧走几步，向张作霖深鞠一躬，嘴里连说对不起大帅。张作霖笑着安慰他："你辛苦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会晤时，张作霖问孙传芳还有多少部队，孙传芳恭敬地回答："直属部队有五万余人，五省联军共有二十多万。"张作霖听到这里，对在座的人说："我们东三省的部队还有八十多万，连同直鲁联军不下百万。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干，就是退到哈尔滨，剩下一团人，也要干到底。"

张作霖的这番表态让孙传芳很是激动，他紧跟着说："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来。"孙传芳的这个比喻尽管听上去有些不伦不类，但却很符合当时众人的心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说话"又漂亮，又爽快，真够朋友"。

孙传芳拜见张作霖的消息很快见诸报端，标题为“孙传芳拜山”。“孙传芳拜山”的最初结果，是孙传芳归附奉系，成为新晋的东北军将领。张作霖则承诺大量支援他粮饷械弹，以便他能够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继续指挥东南各省的军队与“党军”（指北伐军）进行对抗。

1926年12月1日，在北洋各派的拥戴下，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这样他就在事实上成了北洋的新盟主。

张学良点评张作霖，认为父亲有诸多缺点，唯“外交”（此处专指国内政坛上的交际）上的功力自叹弗如，说：“我父亲他比我行，他这人很会办外交，他很会利用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大智。我以前只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将。”

顶着北洋新盟主的光环，张作霖启程入京。看到政府首脑的位置空着，他禁不住心痒难耐，又想到了“称帝”，于是打算事不宜迟，在元旦时就“登基”，做一回临时总统或者临时大元帅。

杨宇霆对此依旧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在现有情况下，张作霖如果急于直接出面组织政府，一定会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并将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杨宇霆的力谏下，张作霖只得同意暂且忍耐，尽管如此，他仍心有不甘地对杨宇霆说：“我终究非干它一下（指当总统）不可。”

杨宇霆在政治外交方面有着突出的才能，就像当初徐树铮辅佐段祺瑞，他也样样都为张作霖考虑到了。张作霖在天津时曾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过一个靳云鹏内阁，这一内阁除总理靳云鹏外，内阁

成员不是出自奉系，就是出自鲁系（指以张宗昌为首的小派别，隶属于奉系）。杨宇霆向张作霖指出：“我反对组织一个以奉鲁系为核心的内阁，用‘家天下’代替‘公天下’是政治愚蠢的表现。”张作霖觉得言之有理，到京后即对内阁进行改组，重新成立了顾维钧内阁。顾维钧是有名的职业外交家，内阁成员也多数与奉鲁系无关，这样就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内阁的超然地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敌的攻讦。

第十一章　黎明前的灯胆

进入1927年，国内外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的最大变化是南北力量开始失衡，南方的国民党力量日益强盛。一般人都认为，北洋各派即便联合起来，亦难以阻止北伐。

据顾维钧分析，主要是北洋一直都不团结，彼此混战不休，导致民心逐渐倾向南方，另外一个原因是北伐军似乎有“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因素”，那就是建立起了支持军事的政治组织。在此之前，北洋各派军事首领往往都只注意加强自己的军力，而不太看重政治。相对而言，国民党就知道把政治观点加以综合运用，以迎合民众的期望，尤其是国共合作之后更是如此。北伐军在出征前会把许多政治干部派出去，为民众接纳他们做好准备，等北伐军占领城镇，这些政治干部又能够立即把民众组织起来，使其不需留驻太多军队，就可以在新的占领区立住脚。

顾维钧看出，由于“新的政治因素加强了军事力量”，所以北伐军能够“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换句话说，如果北洋不改变陈旧的观点和方法，失败将不可避免。

原属北洋的一些人也不同程度有了这种认识，只不过他们选择的不是继续与北伐军对峙，而是干脆改换门庭。在安国军成立之前，冯玉祥已由苏联考察回国。他派人到广州，向国民党报告，说已在莫斯科率全体西北军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中央遂视他为自己人，任命其为军事委员。

得到多方面支援的冯玉祥重整旗鼓，在五原誓师，拟出兵潼关，进军河南，以便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张作霖由此将冯玉祥

视为北洋叛徒以及“北赤”（国民党为“南赤”），按照杨宇霆为他制订的军事计划，他准备假道河南，先打垮国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就是西北军），再援助吴佩孚收复湖北。

上帝的眷顾

河南为直系地盘，吴佩孚一向坚持联奉讨冯，又要倚仗东北军对抗北伐军，因此对张作霖借道河南的要求满口答应，但这时的吴佩孚实际已失去了对直系的掌控力，他的部下靳云鹗坚决反对东北军从河南过境，且主张联冯讨奉。吴佩孚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由田维勤继任，结果这一措施引起靳部将领的强烈反弹。靳云鹗在公开通电反吴的同时，还干脆效仿冯玉祥投入了北伐军的阵营。

1927年2月，张作霖命令联合军团向河南推进，这就是所谓的“东北军下河南”。对于兵下河南，联合军团内部有过分歧。张学良认为应把主力摆在黄河北岸进行防守，特别是炮兵不应渡过黄河。韩麟春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东北军要说强，也就是强在炮兵上，他很生气地说：“没有重武器怎么打？打仗可不是儿戏。”见韩麟春发了火，张学良这才勉强同意他的意见。于是联合军团便渡过黄河，向南岸的靳军发起进攻。

这场战役东北军打得极不顺利，先是武器最精良的一个军兵溃开封，接着军团主力在攻击郑州时又屡屡受阻。不惟如此，靳军大将高汝桐还率部赶到郑州市郊进行增援，从三面对联合军团的主力部队实施了反包围。

自张郭战争结束后，张氏父子虽然采用轻罚重赏的办法，使得团长以下军官没有出现大的调整，甚至张作霖还曾论功行赏，军校出身但在张郭战争中有突出表现的高级军官，获得“勇”字奖章的大有人在。可是从张作霖在善后会议上的讲话就可以看出，在他们这一派老人心中，已经认为“学生出身的”也就是新派靠不住了。实际上，后来东北军中师长一级军官的位置基本都被老派所占据，有人分析认为，郭松龄反奉造成了东北军老派的复辟。

一旦“业务出色”被“政治可靠”所完全替代，高级指挥官们的素质如何可想而知。面对不利的战局，张学良垂头丧气，认定是韩麟春决策错误，可是要让他下决心将部队重新撤退到黄河北岸又不可能，一则两军黏着，不是说脱身就能马上脱身；二则联合军团有许多重炮，渡河也很困难。

在进退不得的情况下，张学良把气都撒在了韩麟春身上，而且“气得简直没法说”。当时东北军将领普遍都抽鸦片烟，韩麟春也不例外，但他和张作霖一样，没有多大的瘾头，也不因此耽误公务，倒是张学良自己早已吸食成瘾。一怒之下，他便跑到韩麟春处，拿着韩麟春的鸦片猛抽起来。

就在张学良“拼命地抽，都抽糊涂了”的时候，战局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事情缘于东北军的铁甲车，这种铁甲车是张宗昌的杰作，张宗昌早年在中东铁路当过筑路工，懂得如何利用铁路上的材料，他的铁甲车外面是夹水泥的铁板和道木，里面安上大炮机关枪，总之是好坏不管，能用就行。

铁甲车本来是沿着平汉铁路，随步兵往前推进的，结果步兵退了，把铁甲车扔在了野外。铁甲车上的带队连长见状只好安慰士兵们

说：“你们不用怕，过一会儿，他们准会回来拉走我们。”

天亮了，铁甲车真的开始移动，但连长却发现移动的方向不对。仔细一看，原来竟是靳军的铁甲车把他们的铁甲车给钩上了。眼看即将连车带人成为对方的俘虏，一个管炮的班长嚷起来：“妈的，给它（指靳军铁甲车）一炮算了，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打不好，炮筒哗啦炸了，要死大家一块儿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说干就干，“咣”地一炮打过去，炮弹直接洞穿靳军铁甲车。车里的人全都被打死了，这些人并不都是被炸死的，多数其实是被震死和闷死的，有的人死时甚至连眼珠子都出来了。巧合的是，这辆铁甲车就是高汝桐的临时司令部，高汝桐当场毙命。

高汝桐一死，城内城外的靳军均方寸大乱。在联合军团的猛打猛冲下，靳军全线溃败，东北军很快就得以连克郑州、开封。这仗打赢，张学良事后归结为运气使然，“战争的胜败，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东北军在河南的取胜，让张作霖暂时松了口气。在此前后，他开始对国共在北京的活动予以重视，并下令通缉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1927年4月，李大钊被迫避居东交民巷原俄国兵营，此处距苏联使馆仅三百多米，当时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

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中共创始人，当时有“南陈北李”之称。知名学者梁漱溟是李大钊的好友，有一天到兵营来看他，结果看到访客满屋，而且大多是青年求见者。李大钊忙于接待，梁漱溟见状不便打扰，随即便退了出去。

自然也有人为李大钊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李大钊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即与章士钊夫妇相识，两家关系密切，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请李大钊为她的三个孩子讲授社会学，李大钊则叫自己的女儿认吴为干妈。李大钊住进俄国兵营后，章士钊夫妇曾假借为儿子办护照，到东交民巷来找他。吴弱男力劝李大钊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在出国之前，先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到她家里暂住。章士钊得知外面风声很紧，也主张李大钊应尽快行动。李大钊感谢朋友的好意，但他表现得非常镇定，迟迟未离开东交民巷。

搞出来什么没有

李大钊白天接待访客，晚上写文章和做报告，这曾一度瞒过日本使馆——日本使馆距苏联使馆、兵营都不太远，他们发现俄国兵营常有人进进出出，形迹可疑，但因为不了解夜间的情况，所以并不敢轻举妄动。

首先窥探出秘密的是法国人。俄国兵营的西隔壁有一座法国医院，医院的值班人员经常在晚上听到兵营里传来大声争论的声音，于是便报告给了法国使馆。法国使馆一面向亲法的外交次长吴晋通报，一面与日本使馆进行联系，双方达成一致，支持北京政府对俄国兵营进行搜查。

搜查俄国兵营是件牵涉外交的大事，据说英美使馆就不同意，他们认为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有治外法权保护，中方搜查人员无论是穿制服还是穿便服，都违反了国际法，破坏了多年的传统、常规、惯例。

尽管英美提出了抗议，但在法日两国的支持下，吴晋仍与警察总监陈兴亚等人共同做出了突击搜查的决定。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和遭到英美的干涉，参与搜查的人员一律不穿制服，不带武器，每人身着一件中式斜大襟的蓝褂子，褂子长至膝盖以下，乍一看，就好像是一群仆人一般。他们还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用以识别彼此的身份。

4月8日，上午8点多，二十名搜查人员开始行动，其中的十人装作在马路边晒太阳，实际是望风，同时阻止中国人进入（但对外国人则不加阻拦），另外十人跳墙闯了进去。听到外面有动静，李大钊等人立即焚烧文件，但因为文件系上等纸张印制，不容易烧着，所以当对方闯入时，仍未烧透。搜查人员将火扑灭后，从中查出了很多带有烧痕的文件，里面有中文也有俄文，有一些内容非常机密。接着，所有原在屋内的人都受到了搜查，被认为是不相干的人经询问后就放走了，李大钊等人则未能脱险。最后，李大钊承认他是国民党（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对外也以国民党员为公开身份），从事着革命工作。

直到搜查结束，吴晋才就这一行动向张作霖进行报告。他告诉张作霖，北伐军是“由苏联派的鲍罗廷组织共产党人参加的军队”，其任务是要“消灭北京政府，搞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吴晋提供的说法，李大钊等人潜伏在俄国兵营内，任务就是要组织暴动。

张作霖听后，便令吴晋调集相关人员，对抄到的俄文文件进行翻译。翻译人员以张作霖的御用俄文翻译、外交官张国忱为首，分成两个组，每组各五人，日夜加班翻译文件。大家忙了一个多礼拜，却并没有发现有组织的暴动计划和苏联准备出兵的材料。诚然，文件中有军情报告，比如记录东北军将领王树常在哈尔滨驻军，共有兵力多

少，还有其他军队的一些驻扎情况，但这些并不足以说明人家要进行暴动。

众人为此大失所望，可张作霖偏偏还天天催问进展：“搞出来什么没有？”张国忱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利用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间，让张作霖宽限时日，说这么重要的事，哪能很快搞完。

大约一个月后，翻译组印出了四本《苏联阴谋文件汇编》，送给张作霖的是一套特制线装本，封面和书套都是用黄缎子做的。虽然里面仍然没有暴动的材料，但在张作霖看来，也算是“人证物证俱全”，所以他看了很高兴。

英美从一开始就反对到东交民巷进行搜查，曾要求北京外交部认真清查搜出的文件，看里面是否有外交文件，如果有，外交文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擅动。涉及对李大钊的处理，两国都提出李大钊不够判处死刑的条件，因为文件里没有发现有搞军事暴动的材料，可以从轻处理或释放。日法则与之意见相左，他们坚决主张杀掉李大钊。

在内政问题上，张作霖对外国的态度向来并不特别买账，杀与不杀还是取决于他自己，而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早已展开了积极的营救行动。梁漱溟闻知李大钊被捕后，即自西郊入城拜访章士钊，提出愿与章士钊一同出面，先将李大钊的家眷保释出来，以免李大钊挂念（实际其家眷并未被捕）。

章士钊是交好军政各界的社会知名人士，段祺瑞当政时曾以之为核心幕僚，他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为的也是对李大钊进行营救。当着梁漱溟的面，章士钊把胸脯一拍，表示自己与张氏父子、杨宇霆都

很熟，只要他去打招呼，不但李大钊的家眷不会受到连累，就是李大钊本人也可免于被害。

章士钊言出必行，当下就先找了张学良、杨宇霆。他对张、杨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国内，尚处于空洞谈论理论的阶段，“不宜穷治”，因此可以判处李大钊等人有期徒刑，并准许其带上《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这些人当中情节较轻的，甚至可径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

张学良点头答应，杨宇霆当场也同意了，章士钊大喜，于是便与张、杨一同求见张作霖。张作霖听后踌躇良久，说这件事不能独断，必须与前方的十一名将领商量后才能定夺。

章士钊是个聪明人，马上就知道张作霖是在推托，解救李大钊已经无望。尽管如此，他仍抱着一线希望，请张作霖分别致函各将领，而不要以联衔通电的方式。

张作霖分别去函不久，多数将领就发来复电，称李大钊等国共党人并非仅空谈理论，实际都是北方罢工罢学的组织者，还说前线部队在“讨赤”战役中不知伤亡了多少人，李大钊既是共产党的首领，“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

接获复电，张作霖遂下令对李大钊等二十名国共被捕人员处以死刑。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当天，他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走向绞刑架，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风骨和浩然之气。

张作霖的一双手从此沾染了革命志士的鲜血。

满蒙五路

在国际范围内，1927年处于经济危机的前夜，当年世界性金融大恐慌首先袭击了美国，接着日本也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昭和金融危机”。4月17日，当政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也称第一次若槻内阁）因此垮台，三天后，田中义一内阁诞生。

若槻内阁的外相是币原喜重郎，币原在任时主张同英美协调，“尊重”中国的合理要求，为此遭到了包括田中在内的许多人的责难，称其为“软弱外交”。田中组阁后，除担任内阁首相外，还自兼外相，他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前任区别，定位为“积极外交”。

张作霖的私人日籍顾问町野这时正在日本国内，田中便把他请到自己的住处进行密谈。一开始，田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处于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非一下子把满蒙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将陷于混乱，更不可能有前途。他田中这次出来组阁，主要就是想通过“积极外交”来解决满蒙问题，为此将不惜诉之于武力。

町野一怔，他是所谓的稳健派同时又是张作霖的铁杆支持者，从没想到过自己的政府会对东北直接用兵。他赶紧说，要用战争来解决满洲问题是轻而易举的，“恐怕有一个旅团的精锐就够了”，但是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

银座是日本东京的一个主要商业区，十分繁华。町野给田中打了一个比方，说你要在银座街头强奸一个芳龄美女，应该是办得到的，可是事后万一那些大哥来找你麻烦，那你怎么办?

在町野这个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的比方中，美女就相当于日本一直垂涎三尺的东三省，强奸美女就是直接入侵东北，至于“那些大哥”，指的是英美两国，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主张东北“门户开放”，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生意，如果日本独占东北，不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英美还可能以武力出来干涉。

田中点点头“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继而他又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不靠战争就能立即解决问题的“妙案”。町野再听下去，田中提到了“满蒙五路”。

所谓“满蒙五路”乃指修筑从南满路伸出的五条支线，它们的具体路线虽迭有变更，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南满路的“培养线”——这不仅仅是五条铁路，各铁路还像南满路一样附带有租借地。

田中让町野说服张作霖，与日方签订关于“满蒙五路”的正式条约。町野一听倒抽一口凉气，他知道“满蒙五路”是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实际上，自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不间断地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取得“满蒙五路”的建筑权和借款优先权，但从未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当然是遭到了中国朝野舆论的强烈反对。

“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没有多少时日，而其志在平定整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其承认舆论所反对的问题，简直是杀鸡取卵的行为，因此请您能给我两三年时间。”

日本政府向以换届频繁著称，田中都不知道他的内阁能不能撑到两三年，如何能够等得起，他马上说：“日本国内很郁闷，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足下如果不肯答应，那就只有武力解决之一途。我已成竹在胸。”

田中的恫吓十分有效，町野把他的所有事业前途都系于张作霖，一旦发生战争，等于他的前途也没了，于是只好让步：“首相既然这样坚决，那就没办法。张作霖的霸业虽然将受挫折，但我唯有让其承认五路的问题。”

町野负责劝说，还得有人直接与张作霖交涉。日俄战争时，田中任满洲军司令部参谋，那时张作霖曾遭日军逮捕并将作为俄国间谍被处决，是他和福岛安正等人为张作霖求情，才救了张一命，因此说起来，田中甚至算得上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町野也知道这段故事，因此他建议田中本人亲自出马和张作霖进行接触，但田中说他是个首相，不能离开东京，“我想请山本条太郎来办这件事，我没有请他入阁就是为了这种原因。”

山本条太郎的正式身份为日本政党政友会的干事长，更重要的是他早年还是个企业家，专门经营中国东北的大豆业务，并对中国东北乃至朝鲜的经济有过一定研究。町野也觉得山本是个适当人选，两人经过商量，决定由町野出面，推荐山本出任满铁总裁——从表面上看，“满蒙五路”是铁路的交涉，由满铁出面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可以让外界误认为是一种单纯技术性的交涉，相比正式外交途径，更能避免使问题政治化，从而收到实效。

当晚，田中就把山本喊过去，请他出任满铁总裁，并代自己与张作霖就“满蒙五路”进行交涉。山本听后显得很惊讶：“我连个满铁的职员都不是，又怎能去担任总裁呢？”

满铁首脑当然不是非要从职员中选拔不可，山本真正的顾虑其实还是觉得田中给的这个任务不太靠谱。此前经町野介绍，他已与张作霖见过面，在他的印象中，张作霖是个“意气轩昂”且民族意识很强的

人，可以想见，与之交涉“满蒙五路”必然困难重重。山本甚至还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即田中要他与张作霖交涉，等于是要置他于死地。

山本没有急于答应田中。第二天早上，他找到町野，问他对“满蒙五路”交涉有无信心，“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通？”町野老实作答：“办不通！”山本很吃惊地问：“办不通，为什么要我去办？”町野答道：“否则将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去试试。”

町野向山本和盘托出了昨天密谋的经过。在町野的劝说下，山本终于同意出任满铁总裁。加上田中，三人重新密谈，这才最终把事情定了下来。1927年4月下旬，町野由东京前往北京，以便给秘密行动打好前哨。

高度机密

却说东北军自在郑州、开封初战告捷后，又继续南下，以阻止北伐。1927年5月中旬，当部队推进至豫南地区时，与北伐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北伐军正处于上升期，冲劲十足，与状态严重下滑的东北军恰为一正一反。东北军将领或者像“胡子军”时代那样，进时冲动鲁莽，退时仓皇失措，或者技术打法毫无长进，有人甚至还摆出了一字长蛇阵，让部队逐次投入作战，结果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几乎溃不成军。

这个时候张学良正从郑州回北京，接到韩麟春来电，得知豫南作战失利，急忙赶回郑州。途中他对随从副官说：“今天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若还活着，我们吃不了这个亏。”言下颇有不满韩麟春之意。

韩麟春在发报的同时，已将何柱国旅紧急派往前线进行增援。何柱国属新派将领，士官和保定双料生，且非东北籍，那时候打仗很肯卖力气求表现，他率部上去后即与北伐军张发奎部厮杀成一团。当时战况的激烈空前未有，从望远镜里看过去，只见东北军阵地前的大片麦地上，全是纵横交错的北伐军官兵尸体，多到简直无法计数。

张发奎是个和郭松龄相似的勇战派将领，以猛打猛冲为主，一旦开头的三板斧被敌方破解，气势也就不足了。就在北伐军攻势顿挫、豫南战局缓和之际，对东北军极为不利的消息开始接二连三地传到联合军团司令部：冯玉祥指挥西北军东进洛阳，洛阳守将万福麟系吴俊升的部下，乃是个“胡子”出身，打不了高水平战役的老派将领，所部与西北军稍有接触，就溃败下来，西北军攻占洛阳后，兵锋直逼郑州。与此同时，山西的阎锡山也露出了反奉迹象，在东北军后方蠢蠢欲动。

面对这一恶劣形势，韩麟春只能缩短战线。下达撤退令时，联合军团的于珍、荣臻、赵恩臻三个军正与国民二军岳维峻部作战，一时无法脱离战线。此时东北军的整个军纪也恢复到了“胡子军”时代，偏偏河南民风彪悍，到处都有称为“红枪会”的组织，结果这三个军到处遭到“红枪会”的袭击，再加上岳维峻部的反攻，最后三个军几乎全部覆灭。张学良和韩麟春同时在火车上听到了这一噩耗，张学良失声痛哭，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假使郭茂宸在，不会遭到这样的惨败。”尔后又不止一次，翻来覆去地这样说，使得韩麟春十分难堪和憋气。

胜败得失本为兵家之常事，像这种一遇挫折就嘀嘀咕咕，抱怨这埋怨那的，恐怕也没谁了，何况还要含沙射影般地进行讽刺挖苦，纵使韩麟春修养再好，亦难以忍受，这也为他后来突然中风患病埋下了伏笔。

东北军撤到黄河北岸的新乡后，张学良即令联合军团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刘鸣九草拟了三封电报，以他的名义发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希望双方罢战言和。没料到这三封电报都被张宗昌给截获了，张宗昌正和孙传芳在东路与北伐军作战，看后气得不行，向张作霖告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你儿子却和蒋介石打电报言和。"

获悉这一消息，张学良对刘鸣九说："'张长腿'（张宗昌的绰号）把咱们告了，你拿上电报稿，准备一下，和我上北京打官司去。"

张学良不单单是想上京论理，竟然还制订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准备"响应北伐军，与山西阎锡山同时起义"，其中的部分内容是推举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同时联合孙传芳，消灭张宗昌所部。

在与孙传芳进行协商后，孙传芳大吃一惊，认为张学良在新乡制订的这一计划十分荒谬，立即告诉了张作霖。张作霖听闻勃然大怒，把张学良叫去严厉训斥了一通。见联孙不成功，计划内容又被泄露，张学良才不得不予以放弃。

实际上，新乡计划的另一部分内容更加令人震惊，那就是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计划安排，该怎么办。张学良的答应是"兵谏"！他命令亲信到时率兵包围顺承王府（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司令部），破坏电信、电话，断绝一切交通。

从以下犯上的角度来说，这几乎就是郭松龄反奉的翻版，那郭松龄毕竟是张作霖的部将，张学良却是他如假包换的亲生儿子。身为被父亲授予兵权和托付重任的儿子、未来的"太子"，竟然企图以兵谏的方式逼老爷子归附北伐军，这也太违背常理了，所以当时在张学良手

下做事的人，多数不敢相信。只有深知张学良思想和了解他性格的人，才能判断出这件事完全可信，刘鸣九就曾说："张先生做事情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

韩麟春对此看得更为清楚。蒋介石的特使何成浚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归附国民党，经过津京时，与韩麟春晤谈。得知何要去山西游说，韩麟春很明白地告诉他："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可运动，张学良未必不可运动。"

何成浚正愁游说不能成功，闻言不禁"惊喜交集"。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后方知其言不虚，且深服其知人之明。"

登基

何成浚北上后，果然不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阎锡山。1927年6月上旬，阎锡山声明服从"三民主义"，在山西全境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随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所部也全部改称国民革命军。何成浚接着又造访张学良，并通过张学良等人向张作霖提出"南北议和"的条件：张作霖要和阎锡山一样，宣布信奉"三民主义"，同时将安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由此便可委任他为"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维持东北。

阎锡山受蒋介石之托，也派代表到北京，以奉方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旗为条件，斡旋成立"奉、宁、晋三角同盟"。

在当时东北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张作霖认为"南北议和"可以，但双方地位应该对等，而蒋、阎这些条件却是要迫使自己屈从于南

方，是他绝不甘心也无法接受的。

6月11日，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开奉系将领会议，讨论与南方的和战问题。所有高级将领里面，唯张学良早有向南方完全妥协的想法，但他和韩麟春尚远在新乡，而且在新乡计划的部分内容泄露后，张作霖非常警觉，对他的相关意见也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其他人都视蒋介石的条件为投降，谁都不愿意就此向南方称臣，只是他们又分成两派。一派以张作相、吴俊升为代表，对打下去无信心，主张退守关外。另一派以孙传芳、张宗昌为代表，这两人都是比较能打的战将，声言就算打到最后一人也不轻退。

两派各执己见，吵到不可开交。杨宇霆见状，怕引起奉系内部新的分裂，赶紧说“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他建议将各省军队的名称统一起来，全部改用安国军旗帜，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也就是张作霖的命令。孙传芳一听立刻补充道：“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

经杨宇霆、孙传芳的提议，会议话题被引到了如何在政治上对北方进行统一。原先一直被搁置的张作霖“称帝”被顺理成章地放到了桌面之上，杨宇霆也不再对此表示反对。讨论时，有人主张拥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人主张沿用段祺瑞临时执政的名义，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

意识到终于可以“登基”了，本来已经被战事弄得有些沮丧的张作霖雄心顿起，他望了孙传芳一眼，问道：“馨帅（孙传芳字馨远）还有多少兵？”孙传芳回答：“还有十三万人。只要雨帅接济军饷子弹，继续作战毫无问题。”

张作霖当即答应拨给孙传芳军饷五十万，子弹可就近向山东领取。接着他又回头问张宗昌、褚玉璞：“你们两位守得住山东、直隶否？”张、褚齐声答道：“进取不足，退守有余。”

听到这里，张作霖十分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便是。”

当天，按照杨宇霆的建议，北方镇威军（即东北军主力的名号）、直鲁军、东南五省联军一律统称“安国军”，安国军共分七个军团，囊括了以上全部军队。

1927年6月18日，在众将的拥戴下，张作霖正式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就职典礼在怀仁堂举行，张作相、吴俊升、杨宇霆、孙传芳等人一直都在张作霖身边随侍，然而张作霖坚持要等到张学良、韩麟春从前线赶到方肯就职——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何况是非常看重父子伦理关系的东方社会。张作霖时年已经五十二岁，即便他对儿子再不满意，也只能把未来希望寄托于这位“太子”的身上。

由于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登基”，各国对张作霖政权都表现得很冷淡，没有一国肯以国家的名义表示祝贺，这是历届北京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时隔一周，张作霖来到天坛，祭告中华列祖列宗。正当他捧爵而祭，喃喃祈祷时，一不小心竟将金爵摔落在地，在场众人看到后都认为此乃凶兆。

尽管场面冷清还被说成有凶兆，但仍盖不住张作霖亲政的热情。在怀仁堂，他召集大家训话，态度非常率真老实：“一个人活在世上，总不过是为名为利。我现在钱同产业很多了，可以说我的子孙也用不

完。这一次来北京就大元帅职，是为求名而来。能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就是有名了，我总尽我的力量去干。”

我不能便宜外国人

张作霖就职后，北京增设了一个军警督察处，处长叫单玉龙。单玉龙过去是张作霖的结拜弟兄，又是张作霖最宠的五太太寿夫人的干哥哥，他仗着这个来头，平时欺诈财物，奸污妇女，可谓是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两个案子：一是从某太监手里敲诈了价值逾万的蓝宝石，受害者愤而服毒自杀；一是强占某女做妾，对方不从，竟被他用手枪打死。

陆军署署长杨毓珣绰号“杨二虎”，素来为人正派，爱打抱不平，便提出要加以惩办。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单是老将的把兄弟，又是王老太太（指寿夫人的妈）的干儿子，他有这样大的靠山，你这头虎虽凶，恐怕敌不过那条恶龙。”杨毓珣不信邪，仍旧下达逮捕令，将单玉龙收押刑讯。

就在杨毓珣发逮捕令的次日深夜，单家送来特制大蛋糕一盒，杨毓珣猜其中必有花样，打开一看，蛋糕里居然藏有大钻石两粒。在取得确凿证据后，杨毓珣写成手折，顺便带上这两粒大钻石，进府向张作霖报告，要求对单处以极刑。

张作霖起先没有说话，而是深思了数分钟。显然单家也早已通过各种关系向张作霖说了情，杨毓珣遂不顾一切地说：“大元帅为人民而来，若不为人民除此公害，大元帅的名誉就完了。”

张作霖听了起身大骂：“他妈的，有这样混账，毙了他。”立即在手折上批“枪决”二字。第二天早上，杨毓珣便依令枪毙了单玉龙，处决布告贴出，人心为之大快。

当时京津流通的货币，以热河兴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最多。不久盛传该行有不稳的消息，由此出现了严重的挤兑现象，那天下午银行虽特意延长兑换时间，持票前来兑换者仍络绎不绝。大家估计第二天上午挤兑情况将更为严重，不准备百万现金别想开门，而兴业银行如果因此关门倒闭，将对京津市面及百姓生活造成极大冲击。

财政当局竭尽全力，也仅筹得三十万，只得向张作霖紧急报告，请示办法。张作霖听完报告，略加思索，即将管理自己私产的负责人叫来，让他从自己名下调动资金，如果不足数，可以将其他财产为抵押，但无论如何，必须在明晨七点前，凑足七十万现金送兴业银行救急，缺一元便以军法从事。负责人不敢怠慢，立即四处奔走，终于得以在规定时间内凑足全部所需现金，从而使得兴业银行平安地渡过了挤兑风潮。

张作霖主政北京，意味着他平时接触到的洋人更多了。跟在东北时一样，他不太买洋人的账，曾经在一次训话中说：“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

英国驻京汇丰银行的华人账房邓君翔用银行钱款买空卖空，做公债投资，不料中途失手，亏空达到三百万元。谁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因为“人家有事向东交民巷跑（指寻求外国使馆庇护），他（邓君翔）的事恰恰相反，而且外国鬼子的款子让你亏空了这么一大笔，他就肯罢休吗？”

亏空太大，邓君翔自己补不上，也没人敢帮他，最后只好托友人找张作霖求情。张作霖正在打牌，听后哈哈大笑，对来人说："历来外国人骗中国人钱，你的朋友今天能骗外国人钱而且数目还不少。"说着伸出了大拇指："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我一定保护他，叫他不必害怕。现在这样办，你叫他暂时就在你家住着，我马上派两个弟兄在你家站岗保护，看看外国鬼子敢怎样！"

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将邓君翔藏到这位友人的一所空房子里。张作霖说到做到，当时就吩咐副官，派了两名卫兵前去站岗，一直到邓君翔脱险，这两名卫兵才离开。

当初邓君翔及其友人求助张作霖时，并没有想到张作霖敢冒着得罪英国人的风险，予以这样的照顾和支持，事后他们都深感意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张作霖不但个性豪爽，而且确实有胆量有魄力，常挂在他嘴边上的"便宜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也绝不是在吹牛说大话。

主义有什么用

既然张作霖在北京做起了"大元帅"，自然就不可能再退守关外，但和战问题并没有因此变得迎刃而解——即便北方军队来了个大联合，即便孙传芳、张宗昌等人都还有干劲，军事力量上北不如南，却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国民革命军再次兴师北伐，奉系还能不能继续在关内站住脚就很成问题了。

为此，张作霖在"登基"的头几天，就开始派杨宇霆和南方代表方本仁、阎锡山代表南桂馨在帅府进行停战谈判，在一些问题上也打算

进行退让。

张氏父子及属下对于国共的思想向来都非常隔膜。还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搞“三角反直联盟”，南方特使伍朝枢来东北进行联络和考察，有一天他突然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语气对接待他的何柱国说：“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柱国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奉军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谈不到的。”事后何柱国就此向张学良进行了报告，张学良满不在乎地说：“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人家有人家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张学良虽不信仰三民主义，但至少知道一些，张作霖原来是根本不知道，后来听别人讲，才多少了解了一点，至于当时刚刚兴起的共产党学说，则接触得更晚。从骨子里，他对这些都很排斥，一律视之为“赤”，说：“现在有人闹什么革命（指李大钊等），想把俄大鼻子那一套拿中国来，叫什么共产共妻啦。你们大家想一想，什么都可以共，个人的老婆孩子也可以共吗？”

他的部下张宗昌挺能凑趣，以后对所谓“共产共妻”进行了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解读：“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为了跟国民党讲和，张作霖一度同意“信仰三民主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真信假信，彼此都不管），但决不易帜。不过到就任大元帅时，他又突然改变初衷，允许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悬挂了青天白日旗。在通电中，张作霖还表示，他与已故的孙中山是多年老友，宗旨相同，“凡中山同志，不违背三民主义者，一律为友”。

可是南方的最后一个条件还是把张作霖给难住了，那就是将安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这表示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他老张从此得给国民党打工了。

张作霖不同意改军制，新华门的青天白日旗便只好降了下来。此时宁汉分裂，南方革命政府实际分化为了南京、武汉两个政府，代表南京政府的是蒋介石，为了与武汉政府相抗衡，蒋介石急于和张作霖达成协议。见谈判陷入僵局，他忙派何成浚为代表再赴北方，准备与张作霖、阎锡山协商成立一个纯军事上的三角同盟。

对于蒋介石的新提议，张作霖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因为这对他很有利：冯玉祥远在西北边陲，三角同盟一成立，东北军便只需对付远道而来的武汉北伐军，从力量上看应该绰绰有余。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三方都产生相关意向的时候，蒋介石却自身难保，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逼宫”下被迫辞职下野。蒋介石是三角同盟的主导，随着他被从南京政府中踢出，结成同盟的线索也就被切断了。

不能和，就要战。继张学良、韩麟春败于河南，孙传芳、张宗昌在津浦线上也相继溃败，不得不退守山东。日本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军事形势的发展，意识到东北军已难以阻止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占领北京也只是时间问题，田中在外相官邸连续召开会议进行商讨，史称“东方会议”。

在出席东方会议的官员中，外务次官森恪是中心人物。由于田中的外相是兼任，所以森恪是事实上的外相，也是田中“积极外交”的主要幕后策划者。除了“积极外交”外，森恪还为田中构思了一个新的对

华政策，名为“满蒙内离政策”，其主旨是把中国的政治力量一分为二，以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关内，用于“遏制共产主义”，以张作霖的奉系统治关外，用于“保境安民”。

东方会议没有离开“满蒙内离政策”的基调。与会者认为，蒋介石既已宣布分共，就可以利用他来“遏制共产主义”，但国民党以反帝为口号，如果让他统一中国，对日本又是不利的，因此哪怕出动武力，也至少要把北伐军阻止在华北。至于张作霖和奉系，众人预计，就算日方不做安排，只要北伐再次启动，东北军也一定会“使用逃回关外这最后一招”——张作霖争霸中原多次，每次不利时，就会用这一招，而他的政敌也很难奈何得了他，因为张作霖“像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

先礼后兵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会怎样？可以想见的是，他“又安稳了，在这里坐看时机，等待阳气上升，就会慢慢爬出来”。

此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已经离职，继任者为武藤信义，武藤和他的随员、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都参加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在他们看来，张作霖一直“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明目张胆地对日本人进行压迫”，同时利用日本人加强自己的力量或摆脱困境，最后利用完了，又“没有义气”地过河拆桥。前者包括拒绝履行“二十一条”，对满铁进行包围和排挤等，后者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张郭事件中“赖账”。

武藤、河本断言，随着东北军在关外力量的增强，张作霖依旧会像过去一样，在经济上对满铁采取包围态势，致使“日本的大陆经营（指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经济掠夺）陷入被架空的状态”。他们说让张作霖出关可以，但应在山海关将败退的东北军全部解除武装。到时张作霖赤手空拳，真正成了只能任由日方摆布的傀儡，要解决任何涉及“满蒙权益”的问题都不过是一气呵成的事了。

对武藤、河本的建议，森恪表示非常赞同。这一方案也被称为“外科方法”，即用武力解决问题，直接出兵占领东北。与“外科方法”相对应的是“内科方法”，支持该方案的人主张继续对张作霖实施“行贿”，同时兼以恫吓，使其接受日方要求。田中事先同町野、山本进行秘密谋划，实际也就是要在“内科方法”上做文章。

田中是东方会议的主持者，他认为如果先采用“内科方法”，在国际上对日本比较有利。在他的力主下，会议最后决定先礼后兵，将“内科方法”作为第一选择，待“内科方法”不能奏效时，再换用“外科方法”。

尽管如此，在动武这一点上，日本人也绝非虚张声势。很明显的一点是，在币原时期，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或张作霖即便有所不满，最多也不过是进行外交抗议，东方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却公然将“出兵他国领土”作为了外交原则。

对日本外交而言，“出兵他国领土”这六个字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武藤因此特地向田中询问：“这个声明是百分之百地实行？”田中答道：“一点也不错。”

武藤又问道：“如此重大的方针（指出兵东北），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在这一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没有一点犹豫：“我有这样的决心！”

“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武藤对首相的回答感到满意：“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转过头去，田中又一次向町野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如果（‘内科方法’）不成功，将赌国运，用武力干！”这一期间，由他牵头，町野、山本共同参与的秘密行动正式开始实施。1927年7月19日，山本就任满铁总裁。满铁首脑原为社长制，将社长制改为总裁制，实际就是为与张作霖交涉提供身份上的方便。

町野认为“满蒙五路”交涉应是他和田中、山本三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不料事实却不是这样。在陆军省的支持下，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迫不及待地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满蒙五路”的要求，结果不出所料地为中方所拒，更糟的是，日本报纸还报道了相关消息。町野为此发飙，并当即打电报给山本：“这样不守秘密，我不干了。”山本老谋深算，他估计大约再过两个半月的时间，舆论就会自动平息，到时一样可以行动，于是给町野发去回电，让他少安毋躁，说：“风声也不过七十五天，请等一等。”

1927年8月，孙传芳率部渡江进行反攻，结果龙潭一役，又被国民革命军杀得大败。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就此消耗殆尽，他自己也一蹶不振，再无法在军政界呼风唤雨。

前线的接连失利，令张作霖一筹莫展。他愁容满面，无论开会、抽鸦片、与人谈话，还是读电报看公文，都很少有笑脸，有时还发出叹息之声。一些政客来见张作霖，也发现他意态十分消沉，看上去就好像一个病人。

一位算命先生曾经预言，张作霖的好运还有两年，张作霖便对五太太寿夫人说："我们好运总还有两年吧，真不得了时，唯有叫姓段的（指段祺瑞）出来挡挡，再不得了时，只有一走了之，回关外，关起大门过日子。"

霍然变色

张作霖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困境，偏偏这个时候，又有人兜头砍来了一刀。阎锡山既加入南方阵营，且成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自然就与张作霖成了死敌，眼见得三角同盟又无建立的可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不是他打张作霖，就是张作霖打他。

山西与北京近在咫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1927年9月，阎锡山乘京汉路北段空虚之际，亲率晋军主力直扑北京。晋军事先经过精心策划，谋定而后动，来势极其凶猛。东北军措手不及，迭失要地，眼看对方即将兵临城下，张作霖连离京出关的准备都做好了。

相对于晋军而言，东北军的实力毕竟要强大许多，略加整顿之后，韩麟春派遣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从左翼迂回晋军侧背，攻下定州。定州位于京汉路石家庄与保定之间，此处失守，不仅令晋军前线各部均失去后援，而且戢部还可由定州直插作为晋军大本营的石家庄。阎锡山被迫下令总撤退，晋军各部纷纷撤离铁道线，向娘子关以西遁逃。当阎锡山逃进娘子关时，其司令部的印信等重要物品都被东北军所截获，狼狈情形，可以想见。

正当晋军各路人马争相败退之际，晋军大将傅作义却不退反进，率一个师乘虚攻占了涿州。涿州距北京仅一百里，是东北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同时北京西郊沿门头沟一带，又发现晋军便衣队进行扰乱。来自南方的情报则显示，国民革命军枕戈待旦，预计也将于第二年春天起举行北伐。种种危情使得京师震动，群情惶惑，张作霖更是寝食难安，头痛不已。

两个多月前，驻华公使芳泽冒冒失失地向中方提出“满蒙五路”的要求，被中方拒绝后还引起了媒体关注。两个多月过去，舆论又有了新的聚焦点，关心旧闻的人已经不多，而且张作霖四面受到强敌的猛攻，正是其意志力最为薄弱的时候，町野和山本都意识到这是进一步推动秘密行动的好机会。

首先出马的不是町野和山本，而是一个叫江藤丰二的人。江藤过去曾是山本的部下，他和山本、町野等人一样，都是地道的中国通，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和张作霖有不错的私交，关系密切到甚至能出入张作霖的卧室。在张作霖的日籍朋友和幕僚中，要论与张作霖的接近程度，恐怕也就仅次于町野了。

江藤面见张作霖时，带去了一份“满蒙铁路计划”。“满蒙铁路计划”是日本外务省在东方会议上的一份提案，该提案主张向中国东北索求七条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这七条铁路干线中的四条都与“满蒙五路”重复，如果全部连接起来，足以形成日本到中国东北的环球线。东方会议在围绕提案进行讨论时，一度有过争议，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洮索线，陆军认为将来对苏作战有用，主张应及早修筑，而外务省担心苏联对此敏感，要求慎重对待，不过最后会议还是决定“铁路计划即作战计划”，必须“迅速实现”。

看到“满蒙铁路计划”，张作霖脸上霍然变色。一直以来，他都处心积虑地在用东北自建铁路对满铁进行包围，作为回应和反击，日本自然要进行“反包围”，这一点是他能够想得到的，他真正感到不安的，恰恰就是像洮索线这样明显针对苏联的线路。他对江藤说：“这不是日本准备与俄国开战的铁路吗？”

日本人不好对付，俄国人更难相处，这是张作霖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早在两年前，新任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赴任前到大帅府晋见，他就特地托之以重任：“这次到苏联去，要把他们在边境上的事了解一下。”

王之相也是东北人，张作霖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咱们东北的处境很困难啊！南面有日本人，关东军就在眼皮底下，北面有苏联，它的军队驻在边境上。你是搞外交的应该知道，咱们东北的事情不好办啊！”

两年后，王之相由海参崴回国，经过奉天时又去晋见张作霖。他不负所托，把一份中苏边境情况的书面报告交给张作霖，并且大略告之：赤塔有个较大的兵营，驻有苏联边防军一个师，约一万人，另外

黑河驻苏军一个旅，伯力驻一个师，海参崴驻一个旅，总共有两万多人的样子。

张作霖听了很高兴："他妈拉个巴子，他们尽瞎说有十万人。不可能，还是王总领事（指王之相）说得对。东北这个地方，两方面受攻击，我受不了啊！"

他又特地问王之相："听说广州共产党革命闹得很凶，里面还有俄国人，你看俄国是不是要出兵中国或东三省，闹共产主义革命？"王之相回答说，根据他调查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广州的革命组织里主要都是中国人，虽然确实也有苏联人，但只是充当顾问的角色，比如苏联派驻国民政府的代表鲍罗廷，这表明"苏联不会出兵，只是宣传和声援"。

判定苏联出兵是假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东北才可以避免被两面夹击，张作霖在入关时也才能放下一半的心。可若是现在同意修筑洮索线等线路，让满铁找到"反包围"的机会不说，还极可能触怒苏联，使苏联出兵由假变真。张作霖对江藤直言，这些铁路一旦建成，他就好像"怀里抱着炸弹"，晚上连觉都不敢睡了。

办不到

毋庸置疑，町野、江藤和张作霖之间都有私人交情，而且交情还不错，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为了他们日本本国的利益，还是从张作霖个人利害出发，他们都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将张作霖往就范这条路上逼。江藤很清楚张作霖最怕什么，为此不惜危言恫吓："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

张作霖此时的处境，也不比张郭战争时好上多少，至于蒋介石这个敌人和对手，那更非郭松龄可比，江藤的话让他陷入极度踌躇之中。思虑再三，为了江藤回去劝说日本政府放弃帮助蒋介石以及不出兵东北，张作霖只好用笔在文件上圈了四条铁路。

江藤暗暗高兴，但表面仍装出为难的样子，说："七条中至少该答应五条吧。"张作霖一听便又圈了一条，然后不忘告诉江藤："这只是预备性商谈，你们暂且不要发表。"

江藤回去后急忙向町野报告，町野闻之大喜过望。秘密行动的核心目标其实仍是"满蒙五路"，"满蒙铁路计划"不过是投石问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态度。就町野对张作霖的了解，他能够在七条铁路中圈五条，虽然还只是意向，但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町野决定趁热打铁，将"满蒙五路"一举拿下。他给山本发去电报，让山本即刻启程前来北京，山本接电后，便以满铁总裁的名义起草公文，向张作霖要求会面。

获悉山本要来北京，张作霖问町野："山本来北京干吗？"町野故意装傻："不知道，大概是上任后的礼节性拜访。"张作霖说："是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

就在山本抵达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町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三更半夜地就带着江藤前来面见张作霖。在当时，别说是外国人，就是张作霖的亲信和近臣也不能如此随便，只有町野、江藤可以凭借与张作霖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在"紧急时刻"独闯大元帅的寝室。

张作霖忙问町野这么晚了有什么事。町野道出了他刻意隐瞒的真相："明天山本要来，是为了五条铁路。"

“什么五条铁路？”

“就是借款修路。”町野一边说，一边将有关“满蒙五路”的文件递给了张作霖。

“不行！”张作霖铁青着脸，捧着文件气呼呼地说：“日本想要跟苏俄打仗的铁路对不对？办不到！”说完连招呼都不打便起身就走。

从江藤前面的试探来看，町野本以为张作霖对“满蒙五路”会欣然笑纳，不是已经在“满蒙铁路计划”中圈了五条吗？而且其中大部分线路还都是重复的。他没有料到张作霖会发这么大的火，只得气急败坏地冲着张作霖的背影喊道：“不行？如果不行，咱们明天就再见。”

其实张作霖反应那么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江藤仅仅是一个日籍朋友，可以代他去说服日本政府，他随便在纸上圈上几条线路，也不过是给江藤提供一个用于说服的工具而已。山本的身份就不同了，他是满铁总裁，又专为借款修路而来，双方正儿八经地谈判，便很难玩忽悠的一套了。

事到如今，町野也已经没了退路。第二天上午9点，他到停车站迎接山本，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许多也来到了现场。山本一看到町野，就拉着他的手急迫地问道：“结果如何？”町野硬着头皮回答：“大吉，放心。”山本听了很是高兴：“那太好了。”

按照约定，张作霖将于10点在帅府接见山本，町野和山本都早早地来到帅府等待，但是10点已经过了，张作霖却并没有露面。10点半，10点40分，10点50分……依旧不见他的踪影。

町野在山本面前已经夸下海口，这一情景让他的面子搁不住了，于是便现编了个理由："山本先生，大元帅从昨天晚上开始有点不舒服，所以要晚一些……"山本信以为真地连连点头："是，是。"

町野一行坚持到11点，张作霖竟然还是没有出来，町野实在忍不住了。他已经准备不顾礼仪，到内室去把张作霖拉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走廊那边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一看，正是张作霖！

讨价还价

眼前的张作霖走路蹒跚踉跄，仿佛一夜之间就变得憔悴万分。显然昨晚从町野嘴里得知山本来京的真相后，已经让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但看在山本等人的眼里，倒以为町野说得不错，张作霖确实身体不太舒服。

见张作霖出来，町野稍微松了口气，赶紧把山本介绍给他："这是山本，满铁总裁。"山本嘴里说着"啊"，抢先向张作霖伸出手来。张作霖见状，无可奈何地伸出手与山本握了握，但握手时却连对方的正脸都没瞧，然后也只说了声："请坐。"

宾主落座后，町野对山本说："把你所要求的文件拿出来。"山本一怔，这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因为如果町野已经把事情完全搞定，第一个程序应该不会再是拿文件和提要求。

尽管心里感到疑惑，但山本还是一面嘴里应承着"啊"，一面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呈递给张作霖："张先生，我们对于'打架'来个结

束。”

山本所说的“打架”是指北京政府拒绝芳泽“满蒙五路”的要求后，双方外交部门之间出现的争执。町野此时很紧张，他生怕张作霖听了再度大光其火，给山本也来个拂袖而去。他叮嘱站在一旁负责翻译的江藤，必须好好地把山本的意思翻译给张作霖听。江藤小心翼翼地翻译道：“中日‘打架’告一段落，现在要互相携手，言归于好。”

张作霖并没有动怒，不过也没有言语，只是低头看着地面。町野常在张作霖身边，从对方的表情动作中看出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似乎已经想通了什么，于是他忙凑上前去问张作霖：“怎么样？”张作霖答了一个字：“行。”说这话时，依旧没有看町野的脸。

町野转忧为喜，接着再问：“这要叫谁来做？”张作霖小声说：“杨参谋长。”

“好，请杨参谋长……您身体不舒服，请休息。”

“啊，啊。”张作霖嘴里哼哼着，站起来无精打采地走进了里屋。

杨宇霆很快就来了。町野拿着山本取出的文件对他说：“刚才山本总裁提出这个要求，大元帅已经同意，并指定你杨宇霆来办，所以请你照办。”

杨宇霆不像张作霖那样对文件漫不经心，他看得很仔细，看完以后才问町野：“五条都要办吗？”

“是的。”

“你同意了？”

杨宇霆果然是个外交场上的厉害角色，此言一出，就足以把町野窘得面红耳赤。因为他分明是在用话对町野进行敲打——别忘了你可是大帅雇的私人顾问，别忘了大帅对你有多么信任和器重，在这件事上，你起码得有个中立立场吧！

町野急忙张口结舌地进行分辩："不是同意不同意，而是日本要做。"此后他就不好再插嘴了，谈判变成了单打独斗，也就是杨宇霆和山本之间的较量。

杨宇霆对山本说："我不干。山本先生，日本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百分之十八的利息！且不说我国有赤字，就是这五条铁路对我国也并无建设的必要。日本实在太不讲道理了。"

张作霖用来回绝日本人的办法，一般只有赖和拖，杨宇霆是有学问的人，他除了会配合着张作霖来互相踢皮球外，还知道如何讨价还价，或者让对方知难而退，或者增加己方所能得到的筹码和利益。

山本是常年出入于政坛的老妖精，马上就明白了谈判对手也是个人精，若不认真一点，在谈判桌上是讨不到分毫便宜的。他突然大声对杨宇霆的话表示赞同，说："同感。"

杨宇霆被他吓了一跳："什么？同感？为你们的需要敷设铁路，还要拿利息，这是什么道理？"

山本解释说他认为杨宇霆言之有理，"精神上是同感"，不过"满铁没钱，如果向日本银行贷款，也得付五分二厘的利息，而且这些铁路是不会赔钱的，所以这种利息是妥当的"。

杨宇霆当然没有这么好打发，最后商定下来，借款利息不变，但日方需要额外付给中方五百万元“筹备费”，另外，作为交换条件，日方同意东北方面自行修筑吉海铁路（最早的“满蒙五路”中所设计的一条线路）。

这就是“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协约的最后一条规定：“本协约签字后尚须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式签字。”除了需要两国代表正式签字外，满铁与中国铁路部门签订具体的“承建合同”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它只是一份草案。

具体条款已经商量好了，只待张作霖本人同意。1927年10月14日，协约达成的第四天，町野、江藤直接要求张作霖在协约上签字，但没有被接受。次日，两人又去找张作霖，张作霖被缠不过，便在上面写了个“阅”字。这个“阅”被日方当成了张作霖已经“同意”的证据，但实际上，它和以前张郭战争中的“两个图章”、在“满蒙铁路计划”上圈线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张作霖用于打马虎眼的招数。

从张杨交涉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张作霖在经历一晚上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一定已与杨宇霆进行了事先的沟通和谋划。如同日方设计“内科方法”和“外科方法”一样，他们也准备了两套方案：一套是最好的打算，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另一套是最坏的打算，实在拖或者赖不过去，就尽可能讨价还价，以确保己方不会吃太多的亏。

没教我学投降啊

在应付日本人的同时，张作霖严令必须将涿州拿下。东北军第一次用来进攻涿州的部队，乃是张学良选派的卫队旅。卫队旅成立于联

合军团之后，辖三个团，官兵大部分为讲武堂毕业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属上乘，因此它名为卫队，其实是一支较为精锐的野战部队。

涿州当时已是孤城，在很多人看来，只要卫队旅上去，攻陷不成问题，张学良自然也很希望能乘这个机会取得战功，可是事与愿违，卫队旅不但攻势受挫，死伤惨重，而且还被出城的晋军袭击了后方，结果被迫后撤至涿州清凉寺。

张学良闻讯，急速增调三万余人进行围攻，并且亲临涿州上空视察和督战，摆出了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自1927年10月16日至27日，东北军连续进行四次总攻击，火药、大炮、坦克乃至于坑道战、毒气弹，能用的都用上了，光大炮就动用了一百余门，日夜进行轰击，声闻百里，可就是奈何不了城池和守军。

涿州虽在平原地区，近郊无险可守，但城垣既高且厚，不仅利于守城，而且便于观察：城外攻城部队看不见城内情况，城里向外看则了如指掌。

同时傅作义又是一个善于利用城垣险要进行防御的将领。事后东北军进城参观守城设施，发现四面城墙上都凿有散兵及机枪掩体，掩体内有机枪壕，局部城墙则被挖空，用以设置射击孔，平时这些射击孔用城砖堵上，临战射击再取下来，足以打攻城部队一个措手不及。甚至于，城内还设有临时性工厂，专门生产一种重量相当于普通手榴弹四倍的特大手榴弹，加上每个连都配有“花机关”（晋造手提机关枪），近战火力以及防御能力都很强。

经过多次总攻击，东北军仍然是一筹莫展，而晋军却愈战愈勇。张学良只好派人劝降，劝降者中有一位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的战术教

官。傅作义拒绝投降，他在回信中说：“老师你只教过我学战术，并没教我学投降啊！”

在第九次总攻击失败后，被张作霖派去做前敌总指挥的万福麟向他报告：“涿州已是非力攻所能拿下的了。”张作霖闻言，气急败坏地下达了命令：“不用打啦，把涿州四周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他们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里。”

因围城日久，城上城下的双方士兵可以经常对话，张氏父子又想利用第一线士兵对晋军进行瓦解。当时已是隆冬，晋军入城时穿的都是单衣，且吃光了军粮，只能将酒糟用石磨磨了吃下充饥，可谓是饥寒交迫，然而当东北军士兵用粮食、棉衣来拉拢他们时，却收效不大，只有极少数晋军士兵因为同乡关系，从城根的工事里走出来投降东北军。

傅作义和他的部属坚持了两个多月，他们用行动向攻城者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作军人的意志和品格。此时对晋军而言，死守涿州已失去战略作用，阎锡山授意傅作义与晋军进行停战谈判。傅作义同意向东北军投降，条件是无论官兵，一律不能杀害。

1928年1月6日，傅作义下令打开涿州城门，自率高级军官、幕僚走出南门，万福麟等人在南门外大奏军乐，“摆队相迎”。当天傅作义身着便衣，负伤的一只手还挂在绑带里，他对欢迎的人群拱手致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战后，张学良用专车将傅作义接去保定，待之以上宾，隐约间似乎还有笼络和重用的意思。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傅作义不久便乘人不备，换商人装逃回了山西。

从表面上看，涿州一战，应该是晋败奉胜，可结果却好像倒了过来，傅作义靠这一战成就了晋军善守之名，东北军则被弄得灰头土脸，尤其张学良“心里很难过”，他对张作霖抱怨说：“我们今天打的这个仗，到底为了什么？今天跟这个打，打过之后又好了，明天又跟那个打，没有任何目的嘛。”

乱世皇帝

韩麟春没有参与涿州之战的指挥，那段时间他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不再能够到前线视事。因为当年被郭松龄架空，导致短期内失去兵权，张学良心有余悸，对兵权十分看重，不肯稍假于人。韩麟春病倒，他正好把第四军团也抓过来，自此联合军团便完全由其一人掌握。

倒是他的父亲不放心儿子，见韩麟春因病不能任职，在与杨宇霆商量后，决定让杨宇霆接替韩麟春担任第四军团长。张学良的陆大派亲信多半为原郭军旧部，而且普遍过于年轻，做事急功近利，他们认为杨宇霆来联合军团，是要同张学良争锋，张学良本人也持相似看法。

然而这并非事实，杨宇霆固然有很多缺点，好揽权、爱做事也是真的，但他对张氏父子始终还是忠心耿耿，无可怀疑，而且张学良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的“太子”，杨宇霆作为一个辅臣，和张学良之间有什么可争的？再说开去，杨宇霆和韩麟春一样，事情都是他们去做，可是从来都不掌握实际兵权，本身都没有一兵一将，又拿什么去争？

当然张学良完全可以将杨宇霆拒之门外，不过他在这方面素来心眼很多。在召集部属们商量时，张学良说："你们要知道，我和老将是父子关系，同时又是长官部属关系，我不能事事都直接找老将，有些事必须履行公事手续。按公事手续办，就越不过邻葛（杨宇霆字邻葛）这一关。"

张学良举的例子还是领取军械弹药之类。联合军团进关后，即享有特殊待遇，所属各部的薪饷和军需物品均由军团直接拨给，武器装备也比其他部队精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指杨宇霆）和我们为难，我们自己就不好解决"。为此，张学良决定，"他既然要来，我就请他来"。

让杨宇霆来联合军团，并非张学良的本意，他对众人们说："他来的目的是抓军队，看我的部下到底能不能叫他抓去！"张学良在说这番话时，似乎已陷于极度苦闷之中，又好像有与杨宇霆进行较量的意思。

既然已经讲清楚想法，而且杨宇霆来联合军团成了既定事实，大家便觉得没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可是张学良还要求众人就此事继续谈。大家实在找不到什么话，只好反复谈一些杨宇霆不应该到军团来的话。

这次谈话结束后，张学良本来还要求众人继续谈，不过从第二天开始，他就再未涉及这一话题。其实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张学良还是用得着别人辅佐的，涿州战役结束后没几天，蒋介石便通电复职，并开始动员北伐，这意味着新一轮大战又即将开始。

乱世皇帝最不好做，自“登基”以来，张作霖还真没能过上几天好日子。“登基”后，他的帅府已由顺承王府移到中南海，大年三十晚上，家人都睡觉了，他还睡不着，一个人拿着整股香跪在居仁堂的院子里祷告：“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

这老张一边向老天祷告，一边还咬牙切齿：“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如蒋阎冯李），我就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就凭我块臭色（东北土话，意思是凭我这个样子），在中南海里待着，算干什么的。”

因为成天处于焦虑之中，张作霖常会突如其来地乱发脾气。当时内阁总理是潘复，有一天潘复主持召开国务会议，会议开得很顺利，可是等到潘复作总结发言时，张作霖觉得有一条意见不合心意，就当众发作起来，对潘复喊道：“潘馨航（潘复字馨航），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他妈拉个巴子的，闹什么鬼，你以为我不知道？”

站在主席台上的潘复措手不及，被弄得面红耳赤，非常尴尬，只得连连解释：“大元帅，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众人赶紧上前相劝，也幸亏潘复原本就是张作霖的幕僚，彼此都不见怪，这才没有把事情搞僵。

这一期间，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薪水已经打了八折，仍不能按时发给，导致人心更加不安。为了安抚大家，张作霖特地在居仁堂召集各部门科长以上的人员讲话，而且不用秘书预备的稿子，完全脱稿讲。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叫张作霖，跟我来的都知道我张作霖

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指他的讲话对象）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

张作霖说他其实很想和下面的人经常见见面，聊聊天，可是却难以得偿所愿，因为“这些捧臭屁的，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不过，“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局势发展，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现在你们大家都要好好干！”

他还表示，对暂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他是完全了解的，但问题是大家的日子都很紧张，他老张也不例外，“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因为善于经营，才积累了几个钱，现在已经拿出来垫补军费啦”。

怎样缓解困境，张作霖提出来的办法是：“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

你小子是要拆我的台

1928年4月初，蒋介石协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向张作霖所部发起全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北伐。

张作霖采取的对策是兵分两路，以联合军团在西路，对冯、阎两军取攻势，以张宗昌、褚玉璞在东路，对蒋军取守势。战事开始后，联合军团打得不错，战局对他们相当有利，军团部曾数次在发报机上截获并破译出冯玉祥向蒋介石告急求援的密电。

关键时候，东路却支持不住了。先前就曾有人提出，蒋军实力很强，应从联合军团中抽出两到三个军增援东路，可是张宗昌以为自己的兵力已经很多，足以保住山东，所以拒绝了援助。等到蒋军发动总攻，鲁军防线几乎是一击即破，张作霖原先对张宗昌的指示是布置纵深配备，步步防守，同时联络孙传芳残部协防，但张宗昌被打蒙了，下达总撤退令后，既未部署下一个防线，又未通知同在一城的孙传芳，就慌慌张张地逃出了济南。孙传芳独木难支，未几亦在蒋冯两军的夹击下被打得溃不成军。

张作霖震惊之余，深为恼怒。许多人背后议论，都说张宗昌是此次东路兵败的罪魁祸首，他不来见张作霖便罢，如敢来见，非掉脑袋不可。

谁知张宗昌不招自来，来了见到张作霖就跪下磕头："大元帅怎么处罚，我都领！"张作霖说："算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不能总胜。败了嘛，只要把军队整顿整顿。"

张作霖一向如此，你犯了错，哪怕他已经放话说要枪毙了，只要你跪下来头一磕，承认自己错了，然后再说一句："我是赤心为老将的。"他的心也就软了，说声"去吧，以后好好干"，挥挥手便会将你放了。曾几何时，汤玉麟背叛过他，张景惠辜负过他，事过境迁，张作霖不但予以原谅，还当好朋友如故。人们后来都说，正是因为老张"待人极好"，所以他才能够统治东北十多年，历经风雨而不倒，甚至于在他死后，部下们也才会爱屋及乌，拥戴小张继承父业，并让小张成为东北人公认的领袖。

除了待部下宽厚外，张作霖宽恕张宗昌还有另一层考虑。当时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如果因为一时感情用事把张宗昌杀了，损失一员

能征善战的勇将不说，张宗昌尚存的几万军队也就溃散掉了，这些军队打仗固然已经不行，但扰乱地方还有余，而张作霖已无多余精力加以兼顾了。

西路战事顺利之时，张学良的心情还是不错的。由于主要负责财政和人事，所以即便战事紧张，他仍能跑出去游玩，在逛赵国故城邯郸宫（或称赵王城）时，还兴之所至地写了一首咏古诗，诗中道“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似乎又找到了打仗的意义所在。

东路落败，令西路大受震动。张学良急忙赶回北京与张作霖见面，除了简单汇报前线战况外，就是要求撤兵。张作霖一听大发雷霆：“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是要拆我的台！”

接着父子便辩论开了。原先张学良认为“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但北伐军的迅速强大，让他感受到了“主义”的威力。他对张作霖说：“北伐军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统一中国，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统一不了中国。”

张作霖可没有这么与时俱进，他大吼道：“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叫三民主义、孙大炮把你小子的胆吓破了。什么三民主义，我是四民主义，我还有大炮呢，他有吗？”

不知不觉中，张作霖仿佛又回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那段美好时光，“东北军人强马壮，兵多、飞机多、大炮多、大豆多，年出超三亿多美元（主要指大豆、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占了八九个省的地盘，有十几个骑兵师”，那个时候他老张怕过谁？就算是张郭战争以后，还不是曾把冯玉祥赶到陕西，并且大败过阎锡山吗？

我什么也不当了

张学良的副官站在门厅里，隔着窗户静听父子俩争吵，激辩中，张作霖的嗓门特别大，而且越来越大：“我们兵工厂库房有二三十万条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还有山炮、重炮、加农炮，北伐军天上没有飞机下蛋，地下没有四条腿的骑兵，我怎么就不能统一中国？你小六子带领几十万大军不打仗，跑到我面前要撤兵。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我不撤！”

张学良也早就准备了一盆浇头的冰水：“儿子哪有欺骗爸爸的，咱们东北军统一不了中国是真话！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打就过了长江了。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后边没有预备队和援军。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退路，再想撤也撤不回来了。”

他还不忘提醒张作霖：“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日本对各方都支持，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意思是在冯阎抄东北军退路的同时，日本也可能会乘东北军主力入关，关外空虚之机，趁机抢占东三省，从而令东北军有家难归。

张作霖没有被吓住，在他看来，冯、阎是手下败将，日本人也没什么可怕的：“我就是不怕日本鬼子！”他估计南满路的关东军顶多也只有一万三千多人，一旦想打这群“日本鬼子”，只要先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南满路的铁轨都扒了，“拉走埋在地下”。然后再出动三十万东北军，重兵占领旅、大，“一万多日本鬼子不就交待了？咱怕日本鬼子干吗呢！”

张学良费尽半天唇舌，张作霖仍不为所动。见谈话没有结果，天色已经不早，张学良只得先退出居仁堂回去休息。

第二天傍晚，张学良再次前来劝说父亲撤兵。张作霖有一股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你越说他怎么不行，他可能越要坚持，知父莫如子，所以这次张学良没有跟他辩论能不能统一中国的问题，而是改换策略，用了另一种说法："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不都是中国人嘛，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的多点儿，谁占的少点儿，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占，不还是中国人占中国地嘛！"

对于张学良的这些话，张作霖倒是挺能听得进去，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等北洋政要一样，对于内争外斗之间的区别，他分得非常清楚。

张学良告诉张作霖，如果他执意不肯撤兵，极可能与他的愿望和初衷相反："咱东北要是丢了，就不是中国人占了，而是日本人占了，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咱就要当亡国奴了！东北要是丢了，咱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

张作霖听了大为动容。事到如今，他又岂能真的看不清局势，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现实罢了，更何况，他虽然不怕与日本人干仗，但那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乃最后才能采取的下策。

"好，咱们撤！东北的高粱米子儿我还没吃够呢，北京的大米饭我可吃够了。现在就是请我在北京当大总统我也不当了，我什么也不当了，我回东北去！"

就在张作霖下决心息兵罢战，退出关外的时候，1928年4月19日，田中内阁突然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下令出兵山东，日军随即侵入

济南。蒋介石急于北伐，既对日军的武装行动缺乏警觉，又随时准备与日军讲和，致使北伐军在冲突中极为被动，从而酿成了“济南惨案”。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往深里说，其实就是为了落实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即阻止蒋军北上，并尽可能将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限制在南方。这对张作霖维持其北京政权当然是有帮助的，看到北伐军因受日军阻挠而暂时停止不前，张作霖也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派人到南京游说，希望双方停战言和，同时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

当时的南京政府主要由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三位大员当家，蔡元培不常来政府办公，谭延闿、李烈钧都主张接纳张作霖讲和，这样就形成了一份名为“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谭延闿、李烈钧以及军方在宁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

本来这份提案是有可能通过的，但是在即将开会讨论前，有新闻记者把消息提前泄露给了蔡元培。蔡元培得知谭、李在他缺席的情况，就想趁机通过提案，不由大为光火，当即跑去问谭、李：“是谁主张准许张作霖参政的？我们革命政府，难道从此不革命了吗？”蔡元培为人耿直，有威信，谭、李都有几分怕他，于是提案只能宣告寿终正寝。

其实谭、李、蔡都不过是毫无实权的政客，真正能够做主的还是前线的几位军方大佬。在蒋介石、冯玉祥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蒋介石同意放弃北进，与张作霖划江而治，但遭到冯玉祥的坚决反对，最后会议决定绕开济南城，继续向北推进。

魔鬼总是缠身

国民党一贯标榜反帝，但遇到了日军也就只能绕着走，而且他们显然把“革命”摆到了“一致对外”的前面。倒是张作霖和他的奉系还知道孰轻孰重，当日本人对张作霖、张宗昌说“让我们替你打”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摇头加以拒绝，不愿利用外力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维持自己的地位。1928年5月9日，张作霖发出息兵“佳电”，宣布主动退出京津，向南京政府和平移交政权。

为了防止冯、阎或日军抄其后路，部分东北军开始提前向关外撤退，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说法，这些东北军正“像雪崩一样向山海关蜂拥而来”。

东北军一旦撤往关外，必须在他们通过山海关时予以缴械，这是东方会议“外科方法”所规定的内容。此时关东军司令官已由武藤信义换为村冈长太郎，村冈与武藤在东北的立场和看法上完全相似，他一面向军部要求增调部队，一面立即下达命令，由朝鲜编成一个准备维持治安的混成旅团，准备先行开往锦州和山海关，以解除东北军的武装。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计划采取战时体制，在数日内移至奉天，到时村冈本人将亲自到奉天进行指挥。

锦州和山海关是属于南满线附属地以外的地区，混成旅团即便已经编成，若无政府命令也不能出动。这时在日本政府和军方内部，外务次官森恪、时任陆相的白川义则都极力劝说首相尽快下定出兵的决心，不过田中“总是有点踌躇不定”。

眼看政府命令迟迟不予下达，东北军却有“陆续进来的迹象”，直把强硬派们急得两眼冒火。打听到田中正在寺中静养，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信行便联袂赶到寺中，一起建议田中“规劝张作霖下野”，但都遭到了田中的拒绝，田中的原话是：“张作霖的事由我来处理！”

有人说，田中这么保张作霖，是因为两人过去有交集，田中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曾经救过张作霖的命，“从田中首相来看，张作霖仍是个不能随便予以责备的小孩子，与此同时，张作霖对田中也具有与众不同的信赖感”。

其实这都是没影的事。日俄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隔了这么多年，田中和张作霖也没打过多少交道，何来“亲密感”“信赖感”？退一步说，就算张作霖念及旧情，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能“亲密”得过町野、江藤?

田中为什么会踟蹰不前，河本的分析是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日军出兵东北，将会在美国舆论中引起反弹。另外田中身边的谋士佐藤安之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等人都主张继续维持张作霖政权，田中受到了影响。

应该说，河本的分析靠谱了一点，但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他们都不了解田中还有一个策应“内科方法”的秘密行动——“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的商定，让田中把满蒙政策的实行都寄托于张作霖，这个时候让他下野，岂不是干了件蠢事?

当然，协约没有正式签订，就还只是草案。田中也害怕夜长梦多，他指示山本赶快把“满蒙五路”的正式合同给签下来。江藤奉命访

问张作霖，提出此议。当着江藤的面，张作霖表示同意正式签署合同，并说这件事可找交通部门具体谈。江藤一走，他就找来交通次长、代理交通部务的常荫槐，告以此事，叮嘱常荫槐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但不能听日本人的。常荫槐当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誓就算牺牲次长的职位，也绝不答应日方的任何条件。

此后，当南满铁路的代表们找常荫槐签合同时，他就采取“回避政策”，与对方打起了游击战：当日本人得知常在天津而去天津时，他突然到了北京；当日本人到北京找他时，他又悄悄地溜到了天津，总之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哪也找不到人。

据说有一次日本人获悉常荫槐在一家妓院请客，赶紧堵住门，将常“抓了个现行”。可是常荫槐却说那里不是谈公事的地方，约他们去部里见面商谈，日本人想想有理，只好答应下来。结果第二天上午等他们再去部里，却发现常荫槐又不在了。

日本人通过各种途径向常荫槐透风，说张作霖已有应允“签字”之意，所以双方并不需要再细谈，仅仅履行一下手续就行，常荫槐毫不含糊地放话过去：“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

南满铁路的代表们拿常荫槐没有办法，便又来找江藤。江藤能做的，自然还是把“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的一套搬出来，不停地对张作霖进行催逼。张作霖厌烦不已，叫骂道：“我今年，他妈拉个巴子的，魔鬼总是缠身！这些该死的小日本鬼儿，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如果把我惹翻了，我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让他们明白明白，我张作霖可不是好惹的，急眼了，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到啥时候，我也不能吃里扒外，和他们小日本儿一条心。”

此时北伐军已以“怒涛澎湃的声势”，向京津地区迫近。内外交困之下，张作霖的情绪更加烦躁，一边抽烟一边发牢骚：“南方蒋介石这个东西也来挤兑我。唉，闹不好，回东三省去，在那儿我有独立的江山，在奉天老家我过得不也是挺舒服的吗？”

后援

遇到外交上难以过去的坎，张作霖必商之于杨宇霆，这次也不例外。杨宇霆来了以后，见张作霖如坐针毡，且动辄暴跳如雷，连忙宽慰道：“大元帅，您还是放宽心为好，从远处打算，回东北也对。不过，要想独立，就得找后援。”

张作霖知道杨宇霆说的“后援”是指日本人，他更生气了：“找后援？他小日本儿尽找便宜，我就是不上他的当。我们张家父子下决心，绝不找日本人当靠山。我他妈的要是急眼了，就豁出一头来。”

杨宇霆非常注重搜集日方情报，日本政府、军方内部的激烈争论以及关东军方面的异动，不可能完全逃过他的耳目，他来其实就是告诉张作霖：咱们还得利用日本人，这个“后援”少不了，所以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不管杨宇霆怎么分析，张作霖的脾气上来就控制不住，他继续怒吼道：“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人打场仗，他们都要干涉，他管得也太宽了！”

说着说着，忍不住又有了一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

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再大的火也总有发完的时候，一俟清醒和冷静下来，张作霖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前面北伐军，后面关东军，两面夹攻，进退维谷，东北军面临的情况，远比表面能够了解到的更为凶险可怕。

在杨宇霆的劝说下，张作霖终于认识到，以往的拖延或“赖账”对策已经行不通了，要想从绝境中挣脱出来，只能像张郭战争中那样，采取适当策略，让日本拉上一把。1928年5月13日，他一反常态，向江藤表示：“铁路问题必须在现在解决。”

当天，在满铁事先制作好的延海、洮索两路承建合同上，张作霖都签了“阅”和“准行”的字样。同时在常荫槐缺席的情况下，令交通部司长赵镇以“交通部代理次长”的名义在吉会、长大两路承建合同上签字。“五路”中最后一个是吉五铁路，这条铁路预计线路并不算长，但贯穿了素有谷仓之称的吉林大平原，过去拟议时就遭到吉林民众的强烈反对，张作霖便以此为由，与江藤商定留待日后处理。

赵镇是被张作霖赶鸭子上架，临时拿来充数的，所以直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14日，张作霖才颁布命令，正式委任他为“交通部代理次长”。从合同的严密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江藤为人非常精明细心，他发现后马上让赵镇将签署合同的日期改成了“5月15日”。

让步归让步，但张作霖中途要的小心眼一个都没少。除了要求日方对于此事“在三个月内绝对保守秘密”外，他还另设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一年之内，只有在满铁和地方政府商定后，协约和合同才能完全生效。事后，他给奉天省长刘尚清写去一封密信，特别叮嘱：“倘因关系重大不能轻易让步者，仍应本外交方式慎重办理。”

“四路”合同的签定，令山本欣喜若狂，他认为，悬案许久的“满蒙五路”问题已被打开缺口，“田中首相的大陆国策，由之踏上其第一步”。

张作霖能够做出如此重大妥协，足以表明其境遇之险恶。山本是个很能看准时局机微和做出快速反应的老练政客，5月15日，他“犹如猛虎乘疾风”一般地来到北京，对张作霖说：“苏联从北方威胁你，蒋介石从南面袭来，你的处境危险，日本愿协助你保住满洲，为此，我们双方应建立攻守同盟和经济联盟。”

所谓两项同盟，其实就是与日本缔结具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两项协定，它们也是田中、山本事先所密议，准备一举解决满蒙政策的根本方略：通过政治协定，日本将攫取东三省的治安权；通过经济协定，满蒙腹地将对日方开放，同时日本人还将在满蒙享有居住、营业、土地的商业租借权。

山本在从大连出发时，把两项协定的要项都写在了一张纸片上。张作霖向来没有细看条文的习惯和耐心，他朝纸片上扫了一眼，直觉“事关重大”，根本不能接受。好在这并不是什么正规协定或合同，山本甚至都没要他写个“阅”什么的，只需答好或者不好就行。既然这样，张作霖也就乐得再给日本人吃个定心丸，他一边装出高兴的样子，一边如其所愿地回答了山本一个字：“好！”山本却认为这是张作霖真实意愿的表达，事后日方如此记述当时的场景：“被置于绝地的张作霖，遂抛去对日本的疑神疑鬼，而欣然接受了田中这个提案。”

处于兴奋中的山本连忙向张作霖保证了两件事：一是在日本的庇护之下，他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洲王；二是万一他与苏俄发生冲突，日本将对其给予援助。

正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张作霖逢场作戏的表演功力也立刻来了个大爆发，日方此时的记述颇为精彩和有趣："犹如获得救世主的张作霖，欢喜若狂，对于欲辞去大元帅府的山本抓住不放，因而更命令特快车延迟开车的时间。"

坐在回东北的火车上，山本志得意满，满面春风，他边喝啤酒边傲然地对随员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解决了。"

必须有点骨头

至此，田中完全打消了让张作霖下野以及对东北军进行缴械的念头，"外科方法"宣告出局。1928年5月16日，田中内阁举行阁议，决定向中国的南北两军分别发出"备忘录"：劝张作霖迅速退至关外，否则不能保证不解除东北军的武装，同时要求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地区，否则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和张郭战争时关东军的声明颇有神似之处，表面貌似不偏不倚，其实是在帮张作霖的忙，因为北伐军占领京津早已是铁板钉钉，蒋介石要统一中国，下一步无疑就是紧追不舍，用兵关外，但备忘录画了红线，绝对禁止他这么做。

5月17日深夜，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造访帅府。芳泽虽然也是个有些资历的外交官，但有时说话做事不分场合。张作霖"登基"以后，有一次设国宴招待外国使节，芳泽也在被邀之列。宴席上有两道菜很别致，一道叫"向阳葵花丝"，一道叫"胜利红桃片"。前者摆放整齐后像一面民国国旗，后面像一面大元帅的帅旗。芳泽吃得高兴，有些忘乎

所以，他用手指着这两道菜，笑着对张作霖说：“我们日本人就爱吃这样的菜，真好吃，味道太美了。”

言者或许无心，听者却感到别有深意，张作霖马上以讽刺的口吻对他说：“你们愿意吃，但恐怕吃不消吧。”一句话，引得全桌大笑。国务总理潘复见张作霖面带怒容，情知不妙，忙拿话岔开：“喝酒，喝酒，吃菜吧！”接着又悄声对张作霖说：“大元帅，他们是喝醉了。”其他官员也插话说起别的话题，张作霖的脸色才稍有缓和。

宴会结束，张作霖回到住所后仍余怒未消，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两道菜都有象征意义，那道像国旗的菜，代表了我们五族共和。他小日本就爱吃，净想好事！他妈拉个巴子的，他能吃得了吗？”

现在这个惹人讨厌的芳泽又来了。张作霖正和几个客人打麻将，听说日本公使来访，客人们急忙起身告辞，张作霖明显对接见芳泽提不起兴趣，他摆了摆手，挽留众人说：“我和芳泽没啥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你们等等！”

见到张作霖后，芳泽先传达了备忘录的内容，接着又向张作霖提出了借款修筑吉会铁路的要求，并且诱惑他说：“如果阁下答应这一要求，大日本帝国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一向对日军直接介入中国内战持反感和抵制态度，听后立即正色答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

吉会路是“满蒙五路”中的第一条线路，在秘密交涉中，张作霖已经让人在相关承建合同上签了字，但因为芳泽不是秘密行动的成员，所以对此事并不知晓。见张作霖不为所动，泄气之余，便忍不住嘲笑道：“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

“这不劳邻居费心，打打看吧！”如果是中国人这么说，张作霖或许还能忍受，芳泽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是无法容忍的：“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芳泽冷笑一声：“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听到这里，张作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拍着桌子大声喊道：“这是什么话！关外是我的老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谁还敢拦路不放吗？”

“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芳泽属于软塌塌的性格脾气，张作霖发这么大的火，他也没太当回事，接着又从公文包里取出张郭战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签订的那份密约，放在桌上往张作霖面前一推：“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张作霖接过密约，却并没有要办理的意思：“不要急，先放在这里吧。”

见张作霖又要拖延和推脱，芳泽只得掏出他所认为的撒手锏：“现在本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

“又是什么事件？”“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了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一听是这件事，便回答说尚未接到相关报告。

芳泽以为击中了张作霖的软肋，便得势不饶人地对张作霖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应对此负一切责任。”

芳泽自以为得计，却不料将张作霖给彻底惹毛了，他霍地由座位上站起，将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地往地上一摔，旱烟袋当即断为两

截："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的负个屁责！"

张作霖与芳泽的会谈一共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张作霖开始称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大相径庭，里间的几位客人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便公推其中一位懂得日语的前去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此君侧耳倾听，可是也没听出什么来，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的事情！"——张作霖常说："人是一个臭皮囊，裹着一包脓血，必须有点骨头。"

紧跟着，不待芳泽辞去，张作霖就丢下这个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日本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当时留在里间的几个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什么问题，才会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必死之阵

由于田中的压制和阻止，关东军虽然已陈兵奉天，却什么也不能做。不久，吴俊升统兵五万，从黑龙江赶到奉天，对奉天进行守卫。与此同时，原在关内的东北军每天一万、五千地通过山海关，在关外进行集结，到5月下旬，以这种方式集结于关外的部队已达三四万人。

眼看对东北军进行攻击和缴械的大好机会悄然逸去，关东军方面十分郁闷和焦虑，河本等人大叫："时至今日，还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一些人也忍不住大发牢骚："张作霖不可恃，政府的狐疑逡巡将误国策。"

怎么办？讨论下来，在无法动用在满兵力的前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实施“谋略”，也就是对张作霖采取谋杀行动。按照河本等人的认识，张作霖出身绿林，他手下的将领也只不过是靠拜把子结合起来的一群私党，“这样的结合，常常是头目一死，他们立即四散”，也就是说，除掉一个张作霖，其他奉系将领必将树倒猢狲散。

村冈接受了这一意见。鉴于这是瞒着政府的行为，他没敢大事声张，只是暗地里授命司令部参谋竹下义晴为密使，前往北京与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建川美次联系，欲借华北日军之手除掉张作霖。

河本原先并不知晓此事，后来听竹下透露要去北京，且言语间神情紧张，便察觉出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当即邀请对方吃饭。席间在他的追问下，竹下一五一十地把所负使命交代了出来。

河本一听，认为原来的办法是“轻举妄动”——且不说在北京很难找到敢于从事这样冒险勾当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在各国众目睽睽的环境下，也不容易得手，而一旦行动失败，对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

河本让竹下把任务交给他来完成，竹下很为难，表示他不能不执行司令官的命令。河本就对他说：既然你自己执行任务很困难，总不能让村冈这个司令官亲自来干吧，有我河本就够了。

一席话把竹下说得心服口服，这样就由河本主持谋杀行动，竹下的任务改为到北京侦察张作霖的具体行期。河本的想法是在铁路线上动手，他权衡了袭击火车和炸毁火车的利弊，认为如果袭击火车的话，很快就会被发觉是日军所为，只有炸车才可以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

至于炸车地点，原定巨流河大桥，但因那一带东北军戒备森严，难以得逞，最后改为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一座铁桥，那里是南满路和京奉路的交叉点，名为“老道口”。之所以老道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满铁线走在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负责埋置炸药的是一名调来支援的驻朝日兵中尉，此人技术高超，埋置工作结束后，河本称赞他“不愧为专家”。

甚至河本还考虑到了爆炸失败的情况，他为此拟订的方案是，用脱轨机使火车翻车，然后派埋伏在附近的冲锋队冲上去进行刺杀。

就在河本布下必死之阵的时候，张作霖正在为离京做最后的准备。1928年5月30日，他对所属各部队下达了总退却令。右翼张学良、杨宇霆的联合军团全部后撤，但是左翼张宗昌没有马上撤退，不仅如此，他本人还跑到北京，当着面问张作霖：“大元帅，为什么要撤出北京？我一个人也要干。”

如果能够不撤，张作霖又哪里真的想撤，准备行装时，他甚至派人将大元帅的印与旗、国务院印信以及外交部重要档案一个不落地全部运往奉天，并下令说：“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

怎奈事势比人强，听了张宗昌的话，张作霖迟疑道：“不行吧？”一旁的町野也表示怀疑：“能吗？”张宗昌却很认真：“我干给你们看看。”觉得张宗昌勇气可嘉，张作霖于是就说：“好，你干着看看。町野顾问，跟我走。”“走吧。”

6月2日，张作霖再次发表出关通电。当天晚上，芳泽又跑了过来。他说日本愿以武力迫使北伐军后退，张作霖尚可得到半壁江山，条件仍是需要答应承建吉会路以及停筑葫芦港等。

张作霖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感到十分气愤，他干脆对芳泽不予接见，将其一个人晾在客厅里。芳泽独自坐在客厅里，就听见张作霖在隔壁的办公厅高声大骂："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事情！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听得懂中国话，顿时被窘得面红耳赤、坐立不安。约半个小时后，张作霖让翻译将一沓公文交给芳泽，同时转告今天无法接见。芳泽以为张作霖至少已经答应了他一两个条件，也就赶紧拿上公文溜走了。

回到公使馆，芳泽将公文打开一看，发现张作霖只在上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写同意二字，这才知道自己的希望又化为了一场空。

挽歌

因为张作霖和芳泽有过这样的冲突和不愉快，随行人员在回奉前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不祥预感，唯恐在山海关出事，有人私下里已准备了裹伤包和饼干，以防万一。那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也发现老道口四周情况异常，日军守备队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构筑什么工事（实际在埋置炸药），为此他向北京发来密电，请张作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

可是张作霖却并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安，对齐恩铭的提醒亦未能引起重视，他还不以为然地说："齐恩铭这个人警惕性倒是挺高，可有时

候就是喜欢大惊小怪的，别真以为有那么严重。”

如同村冈、河本等人对田中的秘密行动一无所知一样，张作霖也绝不会想到关东军竟然要另开一席，瞒着日本政府对他个人展开谋杀行动。日本人后来判断，张作霖之所以敢于“优哉游哉回奉天”，就是因为他确信关东军不会使用武力，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又与他已在山本的秘密交涉中给过对方甜头有关。

当然，长期在压力和危险下生存的经验，也没让张作霖完全疏于大意，他对返奉的路线、时间都有过考虑。路线上，他原打算乘汽车由古北口进关，但一者公路坎坷不平，难免会受颠簸之苦；二者既已被人赶下了台，他也不想抄小路灰溜溜地逃回奉天，他老张要堂堂正正地在奉天站接受关东父老们的盛大欢迎。

至于返奉日期，除了故弄玄虚地一再更改日子，由6月1日改为2日，又改为3日外，张作霖还找来了他很信任的瞽目术士张震洲卜算。张震洲摇卦之后，说当日下午7时动身为吉，张作霖便深信不疑，当即决定于这个时间启程离京。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张作霖当晚离京的场面：“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灯光，荒凉的军乐挽歌般的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记者还注意到，张作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当他依依不舍地回望京都的时候，眼睛甚至“闪着光亮”。

像他的前任段祺瑞、吴佩孚那样，张作霖有志于统一中国，可结局却并无任何差别，只能以败军之将的身份黯然离场，“谁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

这个时候包括张作霖在内，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的告别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不久将响起真正的挽歌。唯有离京之前，顾维钧曾经拿着张作霖的八字，请术士为张算命，算命的术士叹息道："这个命贵是贵，可是正如黎明前的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

张作霖一行所乘专车由北京开出后，作为顾问的町野在天津站提前下车，以便等待张宗昌的军队。这时车上的日本人里面，还有一个日本驻锦州领事。这名领事是在北京上车的，当时他手持奉天的日本军政各界委托书，表示在奉天的日本人一致欢迎张作霖回归奉天。张作霖在略表寒暄之后，便邀他同往奉天，就在专车抵达锦州时，此人称有急事要回领事馆，下车提前走了。有人见他行动鬼祟，怕出意外，建议张作霖改换车厢，但张作霖不以为然，依旧乘坐原车厢继续前进。事后大家回忆起这一细节，怀疑日本领事就是来侦察张作霖车厢号数的，他在锦州下车，既可以脱离爆炸现场，也便于把情况通报给关东军的伏击人员，以免炸错。

1928年6月4日，5时23分，专车驶抵老道口桥沿，埋置的炸药突然起爆，全桥崩塌，据说与预定起爆时间只差了一秒。爆炸声中，铁轨呈现出麦芽糖的弯曲状，张作霖所在车厢的车身当即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两个车轮完好。河本自始至终观察着起爆过程，他看到"轰隆爆炸的同时，黑烟飞扬到了两百公尺的上空"，这令他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空了"。

事故现场十分凄惨可怖，共有十七人被炸死。由奉天专程到山海关迎张的吴俊升头贯铁钉，当场身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远，满身是血，当时还看不见内里伤，只有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校尉处长温守善急忙用一个大绸子手绢将窟窿堵上，然后和其他人一起将张作霖抬上前来迎接他们的汽车。

张作霖的神情看上去非常难过，他虽然神志糊涂，但还能说话，问的头一句话是：“逮住了吗？”温守善骗他说：“逮住了。”

“哪的？”

“正过问呢。”

张作霖这时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夫人）。”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当时大家都以为他由于严重脑震荡，说的是呓语，不料这其实就是他最后的遗言。

皇姑屯事件令町野感到眼前“天昏地暗”，另外有两个日本人也惊愕得几乎晕倒。一个是身在东京的首相田中，他脸色苍白，流着眼泪讲了一句话：“一切都完了！”另一个是身在大连的山本，他瘫坐在沙发椅上，说：“田中内阁完了，我要回东京。”

河本以为他为日本排除障碍，立了大功，其实从长远来看，这次谋杀行动对中日两国而言几乎接近于同归于尽——东北失去了一个既能镇住内部，又可以在艰难情况下巧妙应付苏日的枭雄，这为若干年后的东北沦丧及民族危机埋下了伏笔。另外，因为张作霖在世时打下的基础，奉系并未如关东军所愿的那样顷刻瓦解，反而田中内阁所寄望的“满蒙五路”和“积极外交”归于彻底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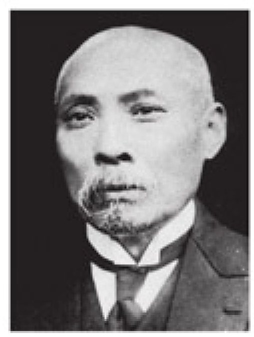
在杨宇霆被诛杀后，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满蒙问题上更难找到可以对等交涉的对手，最终只能冒险一逞。町野认为，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开端，更是太平洋战争的远因，“如果由我来谈这些，我一定会臭骂日本的外交和军人，这是日本的耻辱……”

民国人物大传

民国人物大传系列

民国总理
段祺瑞

关河五十州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总理段祺瑞 / 关河五十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43-4050-1

I．①民… II．①关… III．①段祺瑞（1865～1936）- 传记 IV．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956号

民国总理段祺瑞

作　　者　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050-1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心中的秘密

第二章　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

第三章　怎么能是一回事

第四章　我说了就不改变

第五章　光荣篇章

第六章　越怕什么就越会来什么

第七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第八章　莫负荒沙万里行

第九章　悔青了肠子

第十章　手无寸铁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心中的秘密

尽管已经有了预感，但看过密函之后，段祺瑞的心头还是生起了一股凉意。

密函是袁世凯的家人送来的，为袁世凯亲笔所写，内容很简略，就是让段祺瑞尽快来京与之见面，并且要求掩人耳目，不可张扬。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就在两年前，身为北洋魁首的袁世凯突然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看上去官职是升了，实际却是拿走了他手中最重要的兵权。随之而来，段祺瑞等北洋系将领也都不同程度地坐了冷板凳。

出手打压袁世凯及北洋系的，是以铁良、载沣、良弼为代表的一批满洲贵胄，所谓满人“中兴派”，这些人早就瞧北洋军人不顺眼了。

当年“辛丑条约”签成，两宫移驾回京，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在道路两旁立正行礼。醇亲王载沣见了，当场就责问他：“这是你的部队吗？……见了两宫圣驾缘何不下跪？”

段祺瑞认为，不下跪很正常，因为北洋新军是按照德式操典训练的，根据操典规定，军仪就是最高礼节。

载沣闻言很是不悦："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

载沣不但是亲王，还是当朝皇帝光绪的亲弟弟。可是段祺瑞仍然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我这是按操典规则行事。"

"大胆！"载沣顿时被对方的倔强态度给激怒了。

就在众人都在替段祺瑞担心的时候，有人出来给他解了围——坐在轿子里的慈禧太后传下话来："新练之洋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

有了这道旨意，载沣才不好再说什么了。

不寒而栗

迎驾风波只是"中兴派"对北洋系发起反击的一个信号。说起来，彼时的北洋系也确实过于惹眼，他们所掌握的北洋新军已渐渐超越旧军，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1905年到1906年，国内曾两次组织秋操（指秋季的军事演习），在这两次规模宏阔的秋操中，新军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注意。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完秋操后，在会见清廷大臣时直言不讳："我看中国之军事，唯有新建陆军；而中国之军事统帅，也唯有袁总督大人（袁世凯）了。"

因秋操而声名鹊起的不仅有袁世凯，还包括段祺瑞。段祺瑞担任秋操中的北军总统官，他所指挥的北军在与南军的对抗中略占优势，之后其知名度和权力便犹如长了翅膀一样地扶摇直升。

面对北洋系势力的急速膨胀，“中兴派”深感威胁，其实掌控中枢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觉得不安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要编练新军？当然是因为旧军太不足恃，而指挥训练新军又得依靠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如果像“中兴派”所设想的那样，将北洋系扫地出门，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慈禧不会干这种傻事。作为一个宫廷权力斗争的高手，这个老太婆向以狠鸷多智著称，其心机和魄力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试想一下，连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曾被她放在手掌中拨拉来拨拉去，又何况袁世凯这些后起之辈？

驾驭满汉大臣，慈禧的一贯策略是恩威并用，权不旁落。她一方面利用“中兴派”乃至一些反袁汉臣的意见，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对袁世凯及其部属进行压制和防范；另一方面也对“中兴派”的过激举措进行适当限制，以免把袁世凯逼得太紧太急。

在袁世凯调任军机处之前，陆军部已经收回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但是四镇军官仍出自北洋系，于是铁良和良弼便酝酿对这四镇中的各级军官进行改组。由于触及自己的底线，招致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将领的剧烈反弹，双方闹得不亦乐乎。

慈禧看到后，立即出面调解，让与袁世凯私下关系不错的庆亲王奕劻掌管陆军部，“中兴派”的改组计划由此搁浅。

虽有慈禧在上面玩平衡木，可是袁世凯、段祺瑞等人仍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境地。收到袁世凯从京城发来的密函，段祺瑞意识到朝廷可能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并且涉及了袁本人。

当下，他依照密函所嘱，仅带几名随从，化装成商人模样，从保定秘密潜往京城。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城内气氛果然反常，只见街道萧条、店门紧闭，往日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袁府门口也变得极为冷清。

袁世凯不在自己府上，接待段祺瑞的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据袁克定说，光绪皇帝前两天已经驾崩，而且光绪头天驾崩，隔了一天，慈禧居然也死了。

最让段祺瑞苦恼的恐怕还是后面这个：根据慈禧立下的遗旨，载沣之子溥仪将继承皇统，载沣本人则为监国摄政！

慈禧固然也打压袁世凯和北洋，可是她毕竟不会往死里整，到了北洋的对头掌握大权，就什么都难说了。袁克定告诉段祺瑞，光绪驾崩当天晚上，睡梦中的袁世凯便被召到宫中商议立嗣之事，此后一直留在宫中未归。

段祺瑞不寒而栗，他赶紧离开袁府，到租界找了家较为偏僻的饭店住了下来。

手下人被他派出去四处打探消息，但是打探出来的消息，几乎都是对袁世凯不利的。有的说光绪皇帝死得蹊跷，多半是让慈禧太后给毒死的，这也罢了，还有人甚至直接说整个毒杀事件都是由袁世凯一手策划的。理由是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曾告密出卖皇帝，这老小子害怕光绪会死在慈禧之后并借机对他进行报复，所以才下此毒手。

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驾崩，又怎么会了解如此多的内幕？段祺瑞相信，这一定是袁世凯的政敌在出幺蛾子，为的就是要给诛杀袁世凯制造舆论。

袁世凯似乎已经在劫难逃，但段祺瑞需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一情况发生，无论从公还是从私——

从公，整个北洋系与袁世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袁世凯若是倒台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作为其部属也就基本丧失了立足和进阶的希望，更何况段祺瑞本人与载沣他们还有过节儿。

从私，袁段关系非常密切，袁世凯不仅是段祺瑞的老上司，还是他的伯乐乃至恩公。

密谋

段祺瑞原本经历显赫，称得上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读过七年私塾，熟知经史，有较好的国学根底，说起“之乎者也”毫不输人。成年后考入每期只招收百人的天津武备学堂，这所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近代中国第一所陆军学堂。后来的研究者发现，“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

武备学堂有一门从德国买来的德造火炮瞄准器坏了，没有人会修理。段祺瑞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刚从学校学到的一些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知识，加上天赋，经过一番研究琢磨，居然把这个瞄准器给修好了。

段祺瑞的武备学堂毕业成绩是“最优等”。一年后，政府决定选派数名武备生赴德留学，他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在德国，段祺瑞先用一年半时间在柏林军校系统学习理论课程，接着又奉派单独进入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流兵工厂——克虏伯炮厂——深造了半年。

学兼中西，掌握近代战阵之法，尤精于枪炮技术，有如此特长的精英人才，在晚清末年可谓凤毛麟角。可是学成回国后，段祺瑞却被整整闲置了六年之久，所任职务不是军械局委员，就是随营学堂教习，反正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英雄无用武之地。

受到冷落的不单是段祺瑞一个，绝大多数军校生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干的也都是此类闲差。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可供他们发挥才干的新式军队，而在以湘淮军为主的旧军里，将领们多行伍出身，这些人取得功名主要靠实战，对于从军事院校毕业的书斋军官，他们既看不起也不肯加以提拔任用。

直到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段祺瑞及其他武备生的命运才终于发生了转折。

新军全面使用西式武器，采用西法编制，进行西法操练。这些正是武备生的长处，武备生由此逐渐成为北洋系的核心。作为武备生中的拔尖人才，段祺瑞在被推荐给袁世凯之后，更是很快得到重用，成为袁氏带兵、练兵的主要助手。

袁世凯既能招揽人才，也能笼络人才，对亲信部属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比如，段祺瑞第一次赴小站，袁世凯即亲往迎接，礼仪之周

到，令人有受宠若惊之感。又比如，段家但凡要办什么大事，只要让袁世凯知道了，他都会额外赠送银票，以壮声势。

某次，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酒楼宴请其他将领。宴会结束，正准备结账，酒楼老板却说你不必结了，袁大人已经吩咐过，所有花销都记在他一人账上……

袁世凯有一个在山东时义结金兰的故人，不幸早逝，其女张佩蘅由袁世凯接来府上照料。袁世凯的夫人于氏只生袁克定一子，无女，便将张佩蘅收为义女。另外一种说法是，张佩蘅其实是袁世凯的表侄女，从小在袁家长大。不管出身究竟如何，袁氏夫妇视她如同己出是没错的，张佩蘅见到袁氏夫妇也是一口一个爸妈，十分亲热。

后来袁世凯听说段祺瑞的原配夫人病故，就有心做主把张佩蘅许配给段祺瑞。当时武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张佩蘅的亲生母亲嫌段祺瑞是武人，女儿又是去当续弦，因此起初对这桩婚姻不太满意。袁世凯给老太太做工作，说段祺瑞是我看中的，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以张佩蘅在袁府如同大小姐一样的身份，段祺瑞迎娶张佩蘅，就等于是做了袁世凯的女婿。从此，袁段二人除了多年的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

伯乐、恩公、亲戚，看在哪一层关系上，段祺瑞都不能对袁世凯见死不救，但是搭救要讲究方法，鲁莽不得。这也是袁世凯专门以密函招他来京，又嘱其不可张扬的用意所在。

段祺瑞决定把冯国璋找来商量。北洋系有“北洋三杰”之说，段祺瑞被称为“虎”，冯国璋则是“豹”。

“冯豹”此时正在陆军部任职。段祺瑞把他叫来租界，二人在饭店里密谋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最后决定策划一起冬季军事操练。

新军操练不是小事，必须报经陆军部批准才能施行。段冯也不是真的要搞什么操练，他们就是要借此放出风去，给朝廷施加压力，同时彰显袁世凯及其北洋系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一旦真相暴露，当事者可能要进大牢乃至掉脑袋的计划，然而事到如今，再也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了。当晚，段祺瑞即返回保定，实施这一计划。

天下大势

段祺瑞一回保定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他的亲信幕僚、北洋新军的中高级军官纷纷赶来探视，就在探视过程中，段祺瑞用含蓄的方式向他们传递了信息：假装搞操练，并且要给外界确有其事的印象。

很快，陆军部就得到报告，说北洋军及其陆军学堂即将举行大规模冬操。

不经陆军部批准就擅自举行冬操，无疑是犯上作乱。朝廷闻讯很是吃惊，可是往下追查，各部队又都推说并无此事，是有人故意制造谣言。

就在摄政王载沣等人惶恐不安的时候，陆军部又得到了一份更为惊人的报告：保定发生了大规模兵变。

与前面那份查无实据的报告不同，这次是来真格的，而且提供报告的人就是坐镇保定的段祺瑞！

原来就在段祺瑞放风要搞冬操的时候，几个月前刚调到保定的北洋第十六镇第十一协发生了火并事件。事件本身并不大，不过是几个聚赌的士兵发生争执，然后互相打了起来。

这种事情在新旧军中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闻。段祺瑞开始处理时也没怎么太放在心上，随后一想，却发现居然是个天赐的好机会。

他立即从“病床”上爬起来，命令手下接通第十一协协统李纯的电话。

“是秀山（李纯的字）吗？我是段祺瑞，你那边发生兵变了！”

“兵变？”李纯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段大人，不是兵变，是几个士兵因赌博而……”

“是兵变！”段祺瑞打断对方的话，用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语调说道，“你听着，你那里发生了兵变！你当怎么处置？”

“率兵弹压？”李纯终于有所领悟。

“对，立即弹压，声势越大越好！我随后带兵增援。”

就这样，兵营中一件芝麻绿豆般的事件被越炒越大。真实发生的“兵变”自然比捕风捉影的“冬操”更吓人，也让朝廷大为震动。

据说，载沣在摄政当国后就已经草拟了严惩袁世凯的谕旨，最终没有下达，原因固然很多，但段祺瑞策划的这一系列行动不能不说起

到了一定作用。

1909年1月，朝廷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任职任”为由，将其开缺回籍。

袁世凯虽被罢官，但项上人头总算还是保住了。当他乘火车路过保定，见到段祺瑞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芝泉（段祺瑞的字），这次全亏你了！”

随着袁世凯下野，朝廷中以载沣为中心的皇室亲贵一方面抢夺军事大权，另一方面加紧剪除北洋系中的袁氏一党。段祺瑞自然也受到了牵连，更糟糕的是，他制造假冬操，把火并扩大成兵变的事情也被朝廷发现了。载沣本拟严加追究，只是顾忌事态闹得太大会导致不可收拾才作罢。

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段祺瑞的职务被频频调动，直至1910年年底奉命署理江北提督。

段祺瑞原任镇统制，职务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师长，为二品官，提督则是从一品。表面上载沣提升了他的官职，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明升暗降的手法——江北提督统辖清江浦的旧军巡防营，仅仅负责地方治安、剿匪等，显见得是朝廷虚与委蛇，要将段“置诸闲散之列”。

在得知自己即将到清江上任时，段祺瑞就已经闷闷不乐了。途中他不顾朝廷的监视和猜忌，专程绕道去看望了在彰德隐居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彰德也日日夜夜受到监视，所以白天只能领着段祺瑞观鱼、赏花，不敢深谈。只有到了晚上，众人散去，二人才能借下棋的机会聊两句知心话。

袁世凯虽然被贬，却比在位时更清醒沉着。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古书中的教训，悟出一个道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要这种进退盈缩的变化一出现，他袁某和北洋系就一定会有再次出头的机会。

袁世凯郑重地告诉段祺瑞：“芝泉啊，要沉住气，耐心等待时机。”

这的确是一个很考验耐心的过程。江北提督没有实权不说，当得还不轻松。在段祺瑞履职到任后，有一个协哗变了，段祺瑞被迫带着老婆孩子过了一段逃难日子。好在段家有两个厨房头儿，逃难期间忙上忙下，很卖了份力气，生活才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

哗变结束，段祺瑞论功行赏，将两个头儿都列为有功之臣。虽然不可能封他们官，但两个人自此在段府地位特殊，有些家事连段府总管都做不了主，得这两个厨房头儿说了算。

段府除了他们之外，另有后宅的几个老妈子，也是自清江浦提督时代开始进入段府的，而且同样归入功臣之列，可见这一时期曾给段祺瑞留下的心理阴影。

派谁出征

在段祺瑞到清江任职的第二年，他终于感受到了暗潮涌动下局势的显著变化。

首先是爆发于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已经足够令清廷感到不安：“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

变，不可收拾。”

当年9月，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倒是“严加防缉”了，但严得又过了头，结果酿成流血事件。潜伏于四川的革命党人乘机发难，连陷数十郡县。

天下未乱蜀先乱，袁世凯所预言的“合久必分”终于露出了苗头。作为一波波大浪顶峰的，则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所策动的武昌起义。至12日，起义军已光复武汉三镇，天下为之震动。

清廷立即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派谁出征为好。

在满洲贵胄中，铁良、良弼均被称为清季干将，但良弼年轻，资历和地位也较低，只有铁良才具备“帅”的各方面条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也确实常被人称为“大帅”。

从慈禧太后决定编练新军起，铁良即奉旨与袁世凯共同主持练兵事宜。当时袁为主，铁为铺，练兵处办事人员都称袁世凯为“宫保”（袁世凯曾被封为“太子少保”），称铁良为“大帅”。

如果单评政绩，铁良给袁世凯做副手都很勉强。不过依照清廷一向的规矩，凡是满人中具备办事能力，头脑比较清楚，同时又官至二品的官吏，其得到信任和被迁擢重用的机会都要比汉官来得容易得多。在慈禧的信任赏识下，铁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历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名位几乎可与袁世凯平起平坐。

练兵的时候，大权归属袁世凯，铁良尚对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等到“宫保”、“大帅”能面对面坐下了，他就不这么好说话了。围

绕着北洋新军的使用，铁良时时以陆军部的命令与袁对抗，令袁很难堪。二人矛盾逐渐明朗化，铁良也由此成为满人“中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北洋新军共有六镇。在慈禧的支持下，铁良收回了其中的四镇，从而揭开了他与袁世凯之间正面冲突的序幕。而后改组四镇军官的做法虽遭到慈禧的制止，但铁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已经赢了大半。

袁世凯被逐，本是“中兴派”内部的一件大喜事，与袁世凯积怨已深的铁良更是犹如去了一块心病。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袁这个大敌在，自己在朝中尚能相安，袁一走，他反而混不下去了。

摄政王载沣是个庸懦无能、眼光短浅之辈，他逐走袁世凯后，便把自己的弟弟载涛推出来，让载涛掌握军权。载涛时年才二十三岁，也没有什么文武才略，一切都要靠军事熟手铁良指导协助。

外行领导内行，是中国官僚场上的一个常见现象。面对载涛这个乳臭未干、对军事基本一窍不通的公子哥，有多年处理军政事务经验的铁良不可能不感到憋屈，有时也难免会流露出“军事你们不如我”之类的牢骚和倨傲。

载沣、载涛兄弟对此很忌讳，于是便将铁良身兼的禁卫军训练大臣一职免去，调他筹办海军，实际上是架空了他。

铁良知道自己不能为朝廷所容，就索性将陆军部尚书也一并辞去，像他的政敌袁世凯一样回家闲居去了。

铁良在家闲住了一年，载沣、载涛还是如同防袁世凯般防着他。由于害怕铁良暗中仍与各镇将领联系，便又特予起用，让他去做江宁

将军。在大半个清代历史中，各地驻防将军的职权都非常重要，但到光绪以后，却逐渐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基本无事可办。

代替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的荫昌曾在德国留学，专习军事。回国后，他长期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督办（相当于校长），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尊其为老师，段祺瑞到小站投效袁世凯，其实也是由荫昌推荐的。

荫昌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练过兵，更无带兵打仗的经验，同时他在北洋新军中的威信也与“大帅”铁良相差很远。不过也唯因如此，载沣等人才觉得他好驾驭，遇事不致掣肘。

事实上，荫昌接到任命时尚在德国，其职务只能临时由左侍郎署理，那位左侍郎“奉命唯谨”，上面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确实听话得很。后来即便荫昌本人回国，部务也仍然倚重副手，他自己连公文都懒得处理。

武昌起义爆发时，荫昌已出任内阁陆军大臣。内阁开会几经商讨，认为铁良已经下台，良弼资格太浅，只有荫昌才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于是便决定派他督师赴鄂剿办。

等等再看

荫昌受命之后，有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不满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所说倒也是实话。罢免袁世凯后，载沣即着手组建了由皇族直接控制的禁卫军，这支部队被载沣寄予厚望，待遇全国最优，装备

全国最精，可惜却毫无作战经验。更主要的是禁卫军将领大多由皇族子弟担任，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哥儿全都娇生惯养，谁也不愿意去前方打仗，都以拱卫京师为由反对出战。

禁卫军上不了场，只能仍然抽调北洋老六镇的人马。这时北洋军正奉命参加即将举行的滦州秋操，有的正在途中，有的已经到达目的地。内阁会议上，有人便提出，滦州离湖北较远，不如就近从京畿、河南、江苏抽调部队。

一听这话，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立刻犯起了心病。他是个贪腐成性的庸才，一生唯知要钱，对独揽兵权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他与载沣、载涛兄弟素来不合，非常担心后者会借调动军队之机来对付自己。于是内阁会议一结束，他就赶紧把亲信部队调入北京城内，驻扎于九门要冲及自己的王府周围。

让奕劻这么一搅和，京畿部队就没法动了，载沣、载涛只得从滦州和保定抽调了一镇两协，临时编成第一军，归荫昌指挥。

荫昌有了第一军，可是却调度不灵——各部队乱哄哄地南下，毫无秩序可言，有的军官到了，士兵没到，有的士兵到了，军官又没到。

荫昌急得手忙脚乱，无奈之下，只好向朝廷求救。载沣闻言也着了慌，不得不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让奕劻等人拿出解决之策。

奕劻声称：“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他转而向载沣进言，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并强调：“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的，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券，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奕劻一力保举袁世凯的另一个论据，是袁世凯在老外心目中地位很高，“东交民巷（即使馆区）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

朝廷表面上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不屑一顾，实际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屡次敲打，心理上已对对方十分畏惧，同时也很把他们的言论当回事，有时老外们的态度甚至比国人的议论还更令朝廷在乎。

见连东交民巷都呼吁让袁世凯出山，载沣别无他策，只得皱着眉头答应下来：“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旨意下达，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兼剿抚事宜，其职责相当于荫昌的助手。

受了你们那么大的侮辱，好不容易出山了，还得给人做下手，袁世凯如何甘心？他借口“足疾未痊”，拒绝回京履任，同时又暗中给段祺瑞、冯国璋等老部下发去电报，召他们到彰德来开秘密会议。

当时政府有规定，在职官吏不得擅离职守，高级官员凡出郭三里者，就必须预先奏明，奉旨允许后方可起身。段祺瑞自然不会遵守这一规定，但为了不暴露行程，他骑马秘密经小道走了七天，才从清江赶到彰德。

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蠡就留下了一句名言：“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在秘密会议上，袁世凯引用了这句名言，表示他出山的时机尚不成熟，还得等等再看，不过他要求部下们从现在开始就针对武汉战事着手准备。

在袁世凯拒绝赴任的情况下，荫昌只得率已编配就绪的第一军独自前往湖北前线。

由于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尚可，荫昌在发现调度不灵，向朝廷叫苦求援之前，曾顺道去彰德看望过袁世凯。当袁世凯问及南下有无把握时，荫昌自信心爆棚，说：“武昌的事好办，那里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又没什么人物，成不了气候。”

袁世凯虽在家中，但对外面的形势了如指掌。他提醒荫昌：“也不能这么说吧，黎元洪不就是一个吗？”

武昌起义前，黎元洪是驻军湖北的混成协协统，获悉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他匆匆忙忙换上便衣躲了起来，但是起义军却主动找上门来，不是要杀他，而是邀请他出任革命军都督。

黎元洪能有此奇遇，实在也是形势使然——参加武昌首义的起义军士兵不过才三千人，而且大多数尚未加入革命党，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有人因此提议：“黎元洪现在城内，且资望高而得军心，可当重任。”

黎元洪为人忠厚，在官兵中的人缘极好，其资历和名望也足以号召各省响应。众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来了个满城搜寻。

北方不能乱

黎元洪在哪里呢？一说是在他的一名司书的寓所里。另有一种说法是黎元洪有一个名叫黎本危的相好，原为汉口的妓女，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藏到了黎本危的家里。

革命军很快就打听到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对黎元洪比较不堪的记载是，他胆小如鼠，不敢担任革命军要他出任的都督，一直钻在黎

本危的床底下，最后被士兵强拖了出来。

到底是不是被“拖出来”的另当别论，但黎元洪一开始有顾虑倒是真的。说到底，他本不是一个想革命的人，更不用说担任革命军的首领了，而且那时革命军力量微小，能否抗拒强敌，以及今后能不能取得成功，都是难以预料的未知数。毕竟，革命在那个年代就是造反，而造反一旦失败，面临的下场不外乎死无葬身之地，甚至株连九族。

不用说，革命军为了把黎元洪推上台，肯定费了不少唇舌，黎元洪也一定会再三拒绝，拿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事之类的理由来推托。

在推拒无效的情况下，黎元洪被枪口所逼，只得半推半就地当了革命军的都督。这当然说的是一开始。黎元洪和段祺瑞等人一样，既受旧学思想的影响，也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半新半旧的过渡性人物。过去那些所谓绝对效忠君王的一套并不能完全主宰他们的意识，只要外部条件一变化，脑子就会转过弯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黎元洪逐渐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良言苦劝，铁下心来决定推动革命。他在湖北谘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当众宣布：“我以前虽然不是革命党人，但现在是军政府的一员。我决不计个人成败利害，决心与诸君共生死。”他的这一表态顿时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思想转变之后，黎元洪认为自己能成为“首义元勋”得自于相好黎本危，对方是他的命中福星，便就此把黎本危娶进门来，做了自己的宠妾。

荫昌不是不知道黎元洪之名，可他对此满不在乎。在彰德，他对袁世凯说的是：“一个小小的协统，能掀起什么大浪？”

然而袁世凯并非故意要恐吓荫昌。黎元洪可不是一个协统那么简单，此人通晓海陆军战术，湖北新军的编练、操演、整训等事务，几乎都由他一手筹划制定。当初南北新军组织秋操，黎元洪是南军的实际组织和指挥者。虽然在秋操中，南军略输于段祺瑞所指挥的北军，但南军的总体表现并不差，曾获得“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的好评。

1911年10月16日，荫昌所部在汉口刘家庙遭到革命军的顽强抵抗。19日，在黎元洪的命令下，革命军分三路发动进攻，一举攻克刘家庙，并缴获了装有大批军需物资的数十辆车皮。

刘家庙大捷使清廷内部又一次陷入慌乱。20日，内阁副总理大臣徐世昌秘密前往彰德，与袁世凯会晤。袁世凯通过徐世昌直接向清廷摊牌，即要他出山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让其掌握军政大权。

这一条件对载沣等人来说，可谓苛刻至极，但问题是这时他们手中所拥有的筹码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在一天天地不断减少。22日，湖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建立湖南军政府，同日，陕西也宣布独立。

局势的发展没有出乎袁世凯的预料，并且他已经事先布好了每一着棋。就在那次彰德秘密会议结束后，他把段祺瑞单独留下来，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现在南边闹得很凶，可是要害不在南，而在北。”

要论政治头脑，段祺瑞几乎就是袁世凯的翻版，他听了立刻心领神会：“大人的意思是说北方不能乱吧！”

袁世凯正是此意，他知道自己出山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布局。段祺瑞被告知要准备率部从清江西上，在前线部队后面控制住交通线，这样进可以取武汉，退也可以左右京师。

袁世凯的考虑是要段祺瑞借机掌控住北方局势，而从清廷的角度来说，直接调段祺瑞去湖北或许对清军取胜更为有利，因为段祺瑞多年带兵，在北洋军中拥有较高威信，同时让清江部队去湖北作战，还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早在荫昌准备督师南下时，就曾有人这样提议了，但载沣对段祺瑞抱有敌意，没有采纳。现在既然已抓住载沣的软肋，袁世凯就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干脆利落地发去了电奏："请饬署江北提督段祺瑞，酌带得力将弁，毋庸多带队伍，克日由海道北上，径赴鄂境。"

10月23日，段祺瑞接到第一道谕令，谕令内容几乎照搬了袁世凯的电谕。自这一天起，在短短四天之内，段祺瑞竟然接到了朝廷所发的三道谕令，他的职务也被明确为第二军总统。

所谓救急如救火，在已经对局势失去掌控能力的情况下，载沣被迫接受了袁世凯所提出的全部条件。27日，清廷召回荫昌，另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出征的所有海陆各军。

"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袁世凯和北洋系终于等来了他们渴望许久的时机。

小诸葛

编配给段祺瑞第二军的部队，有的驻扎于济南，有的先前被派往滦州参加秋操。接到改编命令后，各部才开始向目的地信阳集结。当段祺瑞到达信阳时，这些部队仅有一小部分到达，大部分尚在行军途中。

信阳城位于河南南部，毗邻湖北，正是袁世凯所说的“进可取武汉，退可左右京师”的军事重地。不过段祺瑞刚到时，信阳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前有残兵不断退却下来，后有部队等着组编，大家各自为政，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哄抢物资和寻衅滋事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

有一天傍晚，段祺瑞在城内办完公，骑着马返回司令部驻地。途中有人前来报告，说车站刚到的一批士兵为了争抢物资，不但动手打架，而且还开了枪。

段祺瑞立即带着卫队把出事现场包围起来，将肇事士兵和带兵的管带全部抓了起来。盛怒之下，他拿起马鞭对着士兵们就是一顿猛抽，最后连鞭子上都沾了血，那名管带也被重责四十军棍，打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等气消得差不多了，段祺瑞便把肇事士兵交给幕僚徐树铮处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徐树铮随后的处理方式竟然让他也有瞠目结舌之感。

徐树铮绰号“小诸葛”，段祺瑞的家人背后则都称他为小徐。段祺瑞幕僚众多，但要论对段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谁都超不过这个小徐，也可以说段大半生的功业都离不开“小诸葛”的倾力襄助。

徐树铮与段祺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甚至连同乡都算不上。他是安徽萧县人，在私塾读书时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据说十三岁便考中了秀才，而且还是秀才中成绩最好的廪生。按照规定，廪生可以食廪，也就是享受由国家按月发给粮食的待遇。

其后因为父亲去世，徐家倒了顶梁柱，境况便开始恶化起来。十八岁时，徐树铮因为穷得实在念不起书，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济南去投奔内兄，想找一份工作借以糊口。

可是他的内兄也没有什么关系和门路。徐树铮在济南住了一段日子，情急生智，当下便草拟了一份国家大计条陈，准备呈送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希望能够得到袁的赏识。

自古至今，一个普通平民要给封疆大吏写信，渠道都不会那么通畅。小徐是个有心人，他探知候补道齐彦儒是袁世凯的亲戚，如果上呈袁世凯的文件封面能署上个齐彦儒的名字，各级办事人员就不敢拖延或积压。

让齐彦儒署个名，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这种方式很灵，袁世凯果真很快就看到了徐树铮的条陈。条陈内容是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富国强兵之类，不过徐的观点和康梁变法维新那一套又有所区别，它更接近于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道理总是那么一点道理，徐树铮的文章也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见解，不过作为一篇政论文已经属于上乘之作，起码“言之有故，持之成理”。

袁世凯虽是武人，但也有一定的旧学功底，至少能分出文章之高下优劣。当时一般的维新文章都喜欢堆砌一些新名词，读起来佶屈聱

牙。徐文则不是如此，它全部采用了桐城派的古文笔法，行文抑扬顿挫，脉络分明。这说明作者具备相当的社会洞察力和古文功底，不然不可能将这些时事理论融会贯通，而且还能用桐城派的文笔表达出来。

袁世凯一边看一边点头赞许，随后便安排自己的幕僚朱忠琪接见徐树铮。朱忠琪和徐树铮谈过话后，同样对徐树铮赞赏不已，他对袁世凯说："这个青年人是萧县的一个秀才，食了廪（廪生），平素关心时事。他对我侃侃而谈，所谈都颇能洞中时弊，似乎中西学都有根柢，是个值得提拔的人才。"

说罢，朱忠琪还将徐树铮带来的几本诗词文章交给袁世凯。袁世凯随手接过，翻阅了其中的几首诗词，感到徐树铮确实颇有才华，于是就命朱忠琪把他留在衙门里，等待机会再行安插。

就这样，徐树铮仅仅因为一个条陈就受知于袁世凯，成为其入幕之宾，并从此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幕僚生涯。

非池中物也

徐树铮住进山东巡抚衙门后，袁世凯并没有派给他什么固定差使，他每天做的，就是和其余幕僚们一起上下古今，高谈阔论。

袁府原有的幕僚多数是学究出身，熟练掌握奏疏的一般公文程式，但对于大下大事却茫然不知。徐树铮所说的那些东西，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时间一长，便都佩服他学问渊博、才气纵横。

联想到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原来也都是看似狂妄、夸夸其谈的书生，之后却由作幕而一步步飞黄腾达起来，有人就摇头晃脑地议论道:“又铮（徐树铮的字）非池中物也！”

某天，时任炮兵统领的段祺瑞来到巡抚衙门和幕僚们闲谈。有人就提到了徐树铮，说这个年轻人才文俱佳，将来必定是有用之才。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时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杂事很多，身边缺一个办笔墨的人。他就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对那位夸赞徐树铮的幕僚说:“徐某人既然是个人才，你可以叫他来见见我。”

徐树铮知道后果然来求见段祺瑞。虽然他在与段祺瑞谈话时彬彬有礼，但态度不卑不亢，纵论起天下大事，更是旁若无人。

段祺瑞急需的是一个文案，光会讲还不行，他曾耳闻徐树铮向袁世凯上条陈一事，于是就问徐树铮:“你曾经上书抚台（即袁世凯）吗?”

徐树铮答是。段祺瑞听了，便微笑着请徐树铮坐下，随即取出几封待回复信件，让徐树铮当场拟稿。这对徐树铮来说并非难事，他没花多长时间就将几封回信一一拟就，然后呈交段祺瑞阅览。段祺瑞一看很合乎心意，由此对徐树铮颇为欣赏，爱才之心也油然而生。

徐树铮原是袁府幕僚，把他要过来自然还得通过袁世凯。段祺瑞跟袁世凯一讲，袁世凯正好尚无适当的机会安插徐树铮，当即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段祺瑞派徐树铮在书记处担任司书，月薪银十二两，待遇不可谓不优厚。段祺瑞平时待他也相当客气，因此段祺瑞的家人及其部下当面都尊称徐树铮为徐师爷。

自徐树铮投入段幕，段祺瑞天天听他议论国内外形势，每次徐树铮都讲得头头是道。至于处理事务方面，往往段祺瑞还没有想好具体计划，徐树铮已经替他考虑得非常周密：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且每一条建言都有条有理，要言不烦，让段祺瑞感到很是满意，“实获我心”。

有徐树铮在身边，段祺瑞犹如多了一个备忘录，可以省去许多记忆的工夫——徐树铮聪明过人，尤其记忆力非常人可比，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规章制度、公文条例，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段祺瑞问他，总是对答如流。有人不信，找出资料来一对，结果发现居然一字不差。

让段祺瑞满意的还不止这些。那个年代，一般当师爷的都是咬文嚼字，自命不凡，以至于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冲天的酸气。徐树铮虽是秀才出身，却并没有这些酸腐气和臭架子，为人相当朴实勤恳。

段祺瑞以军人出道，平时最重练兵，每天早晨都会亲自带着士兵出操。出操是个苦差事，连有些官兵都抱着最好不去的心理。徐树铮是个师爷，本来是不必出操的，但他天天都早早起床，跟士兵们一块儿练操。这更增加了段祺瑞对他的好感，认为徐树铮不仅能说能写，还能干，诚为书生中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个幕僚看来是找对了。

不久，袁世凯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训练新军。段祺瑞也随之来到保定，奉命办理武备速成学堂。武备速成学堂是保定军校

的前身，学校的不少毕业生后来都成了北洋系的高级将领，它对拓展段祺瑞事业版图的意义不言而喻。就在这次办校过程中，徐树铮帮了段祺瑞大忙，从招生时的命题、监考、阅卷等各项事务，到学堂的规划，无不倾力其中。

北洋六镇成立后，段祺瑞出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同时提升徐树铮为镇部一等书记官。本来段祺瑞还想找机会继续大力提拔徐树铮，但这位师爷却已经有了另外的想法。

此时日俄战争爆发，日本继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后，又进而挑战俄国，显示着这个新近崛起的岛国，已逐渐成为东亚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小觑的重要角色。

徐树铮与一般书生和师爷的不同之处就是忧国忧民，并且时时关心和了解着国际国内大势的走向。他认为中国现在虽然衰弱了，受到列强甚至日本的欺侮，但一旦强盛起来，仍旧可以征服各国，而目前必须做的，首先就是向日本学习，争取早日赶上日本。

徐树铮不但自己想去日本留学，还准备送妻子去，但让他发愁的是，去日本就要向段祺瑞辞行。大家都知道段祺瑞对他颇为信任倚重，了解他真实用意的，免不了会劝他不该就此放弃在段幕的大好前景，不了解的就会指责他是见异思迁、忘恩负义。

另外一个难题是经费。去日本留学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徐树铮除了领取固定月薪，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的积蓄用来维持日常生活尚可，但远不足以支付留学费用。

徐树铮决定先送妻子东渡扶桑，而且就像当初给袁世凯上条陈一样，他又想到了剑走偏锋。

谁也喝不过中国人

第六镇统制官吴凤岭有一天接到徐树铮写去的一封信。信中说段祺瑞在合肥老家的家人要置地产，尚缺数百元，欲先向吴凤岭挪借，数月后即还。

吴凤岭和徐树铮是同乡，与段祺瑞交情也不错，接信后当即给徐树铮寄了五百元。

稍后，直隶藩台邀请段祺瑞、吴凤岭赴宴。段、吴二人聊天时，吴凤岭向段祺瑞问起购买土地的事，段祺瑞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哪有这回事啊?

段祺瑞祖籍江西，生于安徽六安，后随家迁居合肥，等他出了名，人们便称他为“段合肥”。“段合肥”自幼在军营中长大，且青少年时期即只身离开合肥，久居外地，在合肥无片瓦寸地，他自己也从无广置田产的念头。

听吴凤岭道完事情原委，段祺瑞只好如实相告：“购地我当不知，借款更无所闻。这样吧，等我回去问了树铮再说。”

段祺瑞回来后找徐树铮当面询问。徐树铮倒也不隐瞒，说明他想把妻子送到东京留学，迫于手头拮据，所以临时就编了这么一个理由，以向吴凤岭挪借，本来想在攒够薪水后归还，不料却让段祺瑞提前知道了。

徐树铮借款这件事本不算大，但编的理由实在让段祺瑞有些恼火，为此他狠狠地训斥了徐树铮一番。徐树铮自知理亏，被训得面红耳赤，俯首无言。

不过通过这件事，段祺瑞终于明白了徐树铮的个人打算，即暂时不愿做官，而希望到日本去学习军事。他认为这是件好事，应予以成全，于是就对徐树铮说："你如果真想去东京留学，我代你办官费。"

能够官费留学，也就意味着省去了原来所有的麻烦，徐树铮既高兴又感激，哪有不愿意之理?

就这样，徐树铮以官费派出的名义前往日本。到日本后，他也很给段祺瑞争气，先是考入东京振武学校，接着又考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前后住了三年。

徐树铮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已经在日俄战争中获胜，这使他进一步体会到向日本学习的重要性。至于怎样向日本学习，他的认识是除了掌握其军事、学术外，还应熟悉日本的文化。

徐树铮在军校课堂上十分用功，但是每逢假日便到处游览，而且把其中的很多时间都消耗在娼寮酒馆里。跟他的很多中国同学不同，他玩乐不是目的，目的是接触当地的风俗、人情、语言。

徐树铮天资聪颖，时间不长就学会了说一口漂亮的日语，而且能运用自如，为同学们所远远不及。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被日本人瞧不起，如果光听说话，那些艺伎、酌妇们是不容易认出徐树铮是中国人的，但他不仅不隐瞒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还以此为傲。

每逢喝到酒酣耳热，徐树铮就会大声嚷道："酒，是我们中国大禹造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有名的酒仙——刘伶。中国的大诗人陶渊明、李太白都是能喝酒的。太白斗酒诗百篇，能喝酒才能赋诗。魏武帝横槊赋诗，曾道'对酒当歌'呢！"

嚷完之后，他又继续向这些让他自豪的中国酒仙致敬，然后举杯痛饮。徐树铮会唱昆剧，喝得高兴了，有时还会旁若无人地咿咿唔唔地哼上一段。

他这种狂气豪情，不仅令陪酒的日本女人失色，也常常让他的同学们为之侧目。有一天，徐树铮和同学宋子扬等人在一家料理店喝酒，店里有个艺伎很能喝，据说是海量。徐树铮听了说：“酒，是中国发明的。说起喝酒，谁也喝不过中国人！”

他吵着要和这个艺伎赌酒，而且举杯便饮，艺伎才喝了一杯，他早已两三杯下肚，不久便喝得酩酊大醉。宋子扬等人见状，只好雇辆人力车把他送回下宿（即租住的公寓）。

回到下宿，徐树铮仍不承认自己喝醉了酒，也不肯让人搀扶，就自己趔趔趄趄地上了楼梯。上是能上，只是走两步却要退一步，还没走上几级，就失足滚下了楼梯。

宋子扬等人赶紧上前查看，躺在地板上的徐树铮已经鼾声大作，呼呼睡去，而且怎么推都推不醒。无奈之下，大家不得不像拖死猪一样把他拖到房内睡下。

第二天，醒过来的徐树铮还有些头晕，但仍然又硬撑着跑进昨晚那家料理店，并且和那位艺伎接着赌酒，直到痛饮一场之后，方才罢休。

徐树铮是士官七期的学生，上面有六期，下面有八期，这三期学生的留日日期相差不远，平时经常来往。在三期士官生中，要论大言不惭、狂妄过人，只有八期的杨宇霆可与徐树铮媲美，二人特别气味相投，日后都成了民国军政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兵谏

在日本留学的最后一年，徐树铮进入日本军队见习。见习期满，他便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了中国。这时的徐树铮更加踌躇满志，因为他过去的身份只是一个秀才、师爷，如今则通过士官毕业取得了军人资格，已经是“文武兼资”了。

让人郁闷的是，徐树铮回国之时，正是北洋系遭受严厉打压之际。段祺瑞先在第六镇当统制，等徐树铮通过陆军部的复试，主动要求分发第六镇时，段已离开第六镇，到保定办理陆军学堂去了。

已经到了第六镇，不能马上说走就走，徐树铮只得暂时在第六镇屈就一个小小的队官。后来得知段祺瑞被任命为江北提督，他立即离开第六镇前去投效。

对旧部来投，段祺瑞自然十分欢迎。虽然徐树铮已取得军人资格，但他仍以幕僚相待，段的部下也依旧称呼徐树铮为徐师爷。与之前不同的是，徐树铮从此不仅替段祺瑞办理笔墨文案上的事务，而且对于军队的训练调配，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了。

当段祺瑞由江北启程赶赴信阳时，徐树铮即被委任为第二军总参谋，参与各项军务的运筹襄赞。对于信阳的混乱局面，他与段祺瑞一样，都认为应该抓住机会整饬军纪，只是他比幕主更加狠辣绝情——段祺瑞交给他处理的肇事士兵被他一个不留，全部予以正法！

这就是徐树铮后来一贯的行事方式，即只要认准了应该做，便来个干净彻底，既不给别人留后路，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听说徐树铮把肇事士兵全都杀了，段祺瑞大吃一惊，忍不住摇了摇头。尽管连段祺瑞也觉得有些过分，但乱世用重典，在关键时刻，此举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和效果，第二军的军纪因而有了明显好转，信阳的混乱局面大为改观。

大家说某人手狠心黑，说的都是徐树铮，段祺瑞则赢得了治军有方的美名，而正是因为徐树铮敢于做这些幕主不便亲自去做，但又必须有人代劳的事，他才能够得到段祺瑞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重用。

就在段祺瑞设法稳定信阳局面的时候，北方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新军两镇一协的高级将领在滦州通电实行“兵谏”。

认真说起来，这次“兵谏”其实是满人“中兴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结果。“中兴派”里的良弼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对新军中武备生受到重视、士官生遭遇排斥的状况十分不满，因此提出让大批士官生进入新军，从而以士官派对抗武备派的计划。计划一经提出，即获得了载沣的支持。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载沣、良弼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将一批士官生安排到新军中担任高级职务。“兵谏”的主角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生，他们分别担任了统制、协统，而在袁世凯下台之前，这些位置都属于袁氏亲信所有。

载沣、良弼所不知道的是，他们一心要扶植的这些士官生在政治理念上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早在清廷准备举行滦州秋操时，张、蓝就有过秘密协议，打算在参加秋操的过程中私带子弹，然后突然发难，解除禁卫军的武装，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秋操被中止，该计划才未能实施。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太原发动起义，杀了巡抚，宣布独立，同时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清廷闻讯，急忙传令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前去征讨。

接到命令后，张绍曾召集部下们商讨对策，一部分将领主张就此举行起义，直捣京师。张绍曾、蓝天蔚虽然也与清廷不是一条心，但他们受康梁学说的影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不太赞成搞过于激烈的革命。其他一些将领的态度则更趋保守，都担心过激生变。

大家商量下来，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以电奏清廷的方式实行“兵谏”。他们在“兵谏”中列出了“十九信条”，要求清廷让权国民，实行立宪，如果清廷不答应，将立即举兵入都。

滦州“兵谏”与太原起义发生在同一天，它对清廷的打击比武昌起义更沉重、更致命。以载沣、奕劻为首的满洲皇族心惊胆战、方寸大乱，不得不答应“兵谏”的部分要求，同意实施“十九信条”。按照“十九信条”，满洲亲贵均不得参与政权，奕劻、载涛等人乖乖地同时“谢政”，也就是辞去了原有职务。

可是清廷的让步太晚了，社会舆论认为他们只是故作姿态，借以缓和局势，一旦风头过了，肯定还要反悔。在“吾民勿受欺”的舆论推动下，上海、江苏也随之宣告独立。

眼看大浪不止，处于旋涡之中的京城更加岌岌可危，满洲皇族和官员纷纷外逃。隆裕太后也已准备偕溥仪逃往热河，经袁世凯去电力阻，才没有成行。

此时整个清廷都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曾被他们疑忌和迫害的袁世凯身上。在奕劻的建议下，清廷解散了原有内阁，转而任命袁世

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同时频频下旨敦促袁世凯入都，以重组责任内阁。

虽然意外地从中得利，可是袁世凯并不高兴。因为他对于此次重登政治舞台信心十足，且已制订通盘计划，滦州“兵谏”打乱了这一计划。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超出他的掌控范围。

在北方风波得不到平息之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入都的。他援引“十九信条”中的“总理由国民公举”，称自己不敢奉诏，应由资政院选举后才能成行。

攻心为上

1911年10月31日晚，袁世凯乘专车南下督师。抵达信阳站时，他召见了驻信阳的高级将领，接见完毕，又特地把段祺瑞留在车中密谈。

在与段祺瑞的谈话中，袁世凯重申了“北方比南方重要”的观点，认为南方革命军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清廷失尽人心，大势已去，同样不足为虑，要说麻烦，就麻烦在掌握军队而且胆敢“造反”的张绍曾等人身上。

此时南方战事吃紧，倘若分兵北上征讨，不但无取胜把握，还要冒顾此失彼的风险。鉴于参加“兵谏”的不少将领都曾是段祺瑞的学生，张绍曾等也未真正投向革命军，袁世凯决定攻心为上，派段祺瑞北上进行“安抚”。

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张绍曾并非袁氏一党，他对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一节很是不满，又发表通电表示临时政府须由国会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清廷这样的任命方式不合宪法。

看到妥协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载沣、良弼只得再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做说服、疏通工作。

吴禄贞是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期士官生，同时在旧学方面也颇有根底。回国后他曾在东北帮办延吉边务，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因此早早就在军政界崭露头角，并拥有较好的声誉。

吴禄贞恃才傲物，但与良弼有着不错的个人交情，这就为他的仕途开了绿灯。经过良弼极力向载沣、荫昌推荐，并亲自出面保奏，吴禄贞迎来了与张绍曾等人一样的机遇，得以出任第六镇统制。

派吴禄贞去滦州，是因为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是好友，三人在日本留学时即志趣相投，人称“士官三杰”。可是载沣、良弼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吴禄贞也是当初滦州秋操发难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而且他的思想比张、蓝更为激进，张、蓝要的只是改良，他却恨不得立马把清廷掀个底朝天。

吴禄贞到了滦州，不但没有劝张绍曾息事宁人，而且还鼓动他乘清军南征，合力进攻北京。

张绍曾手下的协统之一潘渠楹此前已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向他许诺，只要“兵谏”平息，即让他代替张绍曾做第二十镇统制。一听吴、张可能要联兵攻打北京，潘渠楹赶紧把消息透露给了袁世凯。

包括袁世凯、荫昌在内，清廷内部的一些高层人物本来就已经对吴禄贞产生了怀疑。原因是吴禄贞自当了统制之后，在部队人事方面与陆军部时有龃龉，给北京的函件也常常表现得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但凡提一个条件，你同意还好说，若不同意，不满之情马上就在奏章中直接流露出来。试问，哪一个统制会这么嚣张呢?

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来京，曾向荫昌自告奋勇要“南下平乱”，说自己是湖北人，如果让他去湖北，一定可以过江劝谕革命军解甲投降。

荫昌哪敢答应。等吴禄贞一走，他就对随员说：“吴禄贞若到前方，必靠不住，当遇机除之，以绝后患。”

荫昌说是这么说，但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也不敢冒失。现在潘渠楹的告密坐实了大家的猜疑，袁世凯立即授意军谘局发出两道命令：一是把滦州附近铁路上的列车全部调进北京，断绝第二十镇进军北京的交通工具；二是将吴禄贞从滦州调开，命其带兵入晋平乱。

吴禄贞何等乖觉，一收到电令就知道他与张绍曾之间的密谋已经暴露，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建议张绍曾联合晋军攻打北京。

“造反”本非张绍曾所愿，他在这件事上一直犹豫不决，但到此地步，也只得勉强答应下来。就在张绍曾着手准备的时候，段祺瑞已经赶到北京，并向参加“兵谏”的将领逐一发去公开或秘密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以同僚和师长的身份，劝将领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停止“兵谏”，服从袁世凯。与此同时，段祺瑞还派徐树铮等亲信幕僚前往自己任职的部队联络和疏导。

参加“兵谏”的将领背景和想法不一，在段祺瑞的劝说下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第三镇代理统制卢永祥原为段祺瑞的旧部，段祺瑞一发话，他就表示听从劝告，服从调遣。第三镇是北洋六镇的精锐，人数、装备都不在第二十镇之下，卢永祥的态度转变对第二十镇造成了极大震动。

第二十镇一共有两个协统，潘渠楹不用说，早就是袁世凯的人了；另一个协统伍祥桢见势不妙，也不再坚持要与朝廷对着干。其他中下级军官不是段的旧部，就是段的门生，更是纷纷动摇。张绍曾处于被架空的状态，就算他想“造反”都有心无力了。

螳螂捕蝉

吴禄贞并不知道第二十镇的将领会被瓦解。自率部离开滦州后，他即将队伍集中在石家庄，一边派人以“招抚”的名义与晋军指挥官联络，一边向清廷谎报军情，说他已经大获全胜，晋军同意投降。

清廷信以为真，随即降旨嘉奖，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在明知吴禄贞不可靠的情况下，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用爵位引诱吴禄贞，促使其进攻太原，并在进攻的过程中与晋军同归于尽。

吴禄贞拎得门儿清。他不仅假模假式地电奏谢恩，还一本正经地提到，原有巡抚关防大印尚在太原，丢没丢不知道，为了办事情方便，他另外又刻了木质关印一颗，拿来先用着。

实际上，吴禄贞根本不把区区山西巡抚放在眼里，他一心要进攻的也不是太原，而是北京，这么说只是要迷惑朝廷而已。

经过暗中联络，吴禄贞决定与阎锡山举行会晤。双方的会晤地点初定于石家庄，不料就在大家准备动身的时候，阎锡山突然又变卦了，说："石家庄我不能去，那是吴禄贞的防地，万一有变，那可如何是好？"

会晤地点就此由石家庄改为娘子关。吴禄贞听说阎锡山如此胆小，不由得哈哈大笑："昔日关云长敢单刀赴会，何以今天的阎百川（阎锡山的字）不敢来见盟友，岂地灵人杰耶？时移势易耶？"

吴禄贞拿关云长来作比，是因为这位《三国演义》里的名将也是山西人，与阎锡山是老乡。会晤当天，阎锡山带了大批警卫，吴禄贞则轻随简从，只有参谋等三人跟随，看上去吴禄贞倒更像传说中的关云长。

当着阎锡山的面，吴禄贞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的革命计划，主张由他的第六镇、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山西晋军共同组成燕晋联军，分三路进攻北京。他还肯定地说，现在清军大批南下，北京空虚，只要联军一抵北京城下，大业就可唾手而得。

阎锡山等人认为吴禄贞分析得很有道理，于是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副司令。按照计划，三路燕晋联军将于11月8日同时发难，会师京城。为此，山西方面先拨了两营兵供吴禄贞指挥，随后又派出一旅作为后援。

如果吴禄贞的对手仅限于载沣、良弼甚至荫昌，此时似乎早已胜券在握。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计划将注定要被那个更厉害的人所终结。

吴禄贞的第六镇和第三镇同为北洋老六镇的骨干，但当时第六镇已有一协被抽调到湖北前线，吴禄贞手下只有一协，再加上不是由他直接掌握的第二十镇，要想攻下北京，自忖还无十足把握。如今有了晋军助力，情况就不同了，吴禄贞在行事方面也更加大胆。

这时正好有一列向湖北前线运送械弹的火车经过石家庄，吴禄贞下令予以截留。他同时给清廷发去一份电报，要求清军撤出汉口，还说他的这一要求若不能被答应，他的部队将“阻绝南北交通”，甚至切断湖北前线部队的后路。

吴禄贞以为他在山西的所为神不知鬼不觉，但实际上袁世凯和清廷都已侦悉。只是在收到这份措辞强烈，等于是在威胁和恫吓的电报后，他们的反应不同——清廷大为恐慌，只得回电答应吴禄贞的要求，下令湖北的前敌部队停止进攻。袁世凯则痛下决心，立即给段祺瑞发去密电，要他设法除掉吴禄贞。

袁世凯让段祺瑞负责除掉吴禄贞，是因为段祺瑞曾为第六镇统制，可以利用原来的旧部，然而隔了好几年之后，第六镇的人事状况已有很大改变，段祺瑞对此也不清楚，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把握。

捏着袁世凯的电报，段祺瑞颇感为难，他急忙找来徐树铮等人商议。徐树铮听后，立即表示这件事可由他来操作，毫无问题。

从日本回国后，徐树铮曾在第六镇做过一段时间的队官，对吴禄贞和第六镇的现有情况比较熟悉。吴禄贞性情急躁，他一当上统制，就想把第六镇的军官全换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吴禄贞便以周符麟“烟瘾甚深，形同盗贼”为由，致函陆军部，想撤掉周符麟，另以士官出身的心腹充任协统。

陆军部收到函件后，认为仅凭吸食鸦片一条，撤职理由不够充分，便未予批准，但吴禄贞仍下达手谕，将周符麟开缺了事。自古砸人饭碗如杀人父母，这样一来，周符麟就与吴禄贞结下了深仇，平时喝醉酒后常常拔出腰间所佩之刀，对吴禄贞进行怒骂。

徐树铮找来周符麟，把欲除掉吴禄贞的计划跟对方一说，正中周符麟下怀，马上答应组织刺杀行动，同时还提供了几个杀手的名单。

经过再三考虑，徐树铮决定行动以马队管带马步周为首。因为马步周是江苏铜山人，与萧县相邻，和徐树铮乃是小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同时马步周还是段祺瑞在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的学生，有此双重保险，可料定不致误事。

段祺瑞听完汇报，也觉得比较靠谱，便命令徐树铮秘密布置。

瞒天过海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吴禄贞并非毫无警觉。军谘局第三厅厅长陈其采曾奉朝廷之命，到石家庄侦察吴禄贞的行动。陈、吴系士官同期，二人私下交情也不错，但陈其采一到石家庄，吴禄贞就对他说："你是涛贝勒派来监视我行动的吧？"

陈其采闻言大吃一惊，急忙分辩道："军谘局无事可办，老同学开府三晋（指吴禄贞迁升山西巡抚），极愿追随左右，同建立一番事业，何必多疑？"

吴禄贞只疑心外来人员，万万想不到会祸起萧墙之内。1911年11月9日，预定发难的第二天，袁世凯奏明朝廷，将张绍曾调任长江宣抚

使，从而削夺了他的兵权，其第二十镇统制一职由潘渠楹升任。

见第二十镇方面已无希望，11月10日，吴禄贞召集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及晋军代表聚餐开会。在会上，他宣布将采取革命手段，于第二天早晨率部直趋北京，同时分发白布袖箍以为标志，规定凡不服从者军法从事。

为了继续蒙蔽清廷，吴禄贞在会后还特地找陈其采谈了一会儿话，之后才到一家洋行的楼房内就寝。他正要入睡，忽然有几名部下敲门要见“吴大帅”，说是要报告公事。

吴禄贞将房门打开，却见马步周等人拿着手枪，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他情知不妙，急忙跳后窗逃命，但刚刚跳出窗口即中弹身亡，其首级也被马步周割下，拿去向周符麟报功。

天还没亮，段祺瑞专车前往武汉，途中经过石家庄。周符麟上车将事情经过向段祺瑞做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善后。

刺杀吴禄贞的行动乃政治阴谋，是见不得光的，段祺瑞因此告诉周符麟，此案将由中央也就是朝廷处理，至于会怎么处理还不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瞒天过海。

段祺瑞拿了五千元给周符麟，让他转交马步周作为赏钱。马步周被告知必须赶快离开，而且千万不可声张，以免留下后患。

在得知吴禄贞被刺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清廷致电段祺瑞，让他彻查，段祺瑞不能不程式化地传讯了周符麟。只不过这一传讯过程无非是演戏，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周符麟很快就被无罪释放。

吴禄贞被刺，直接导致燕晋联军成为昙花一现。已归吴指挥的晋军以及尚忠于他的部下只得退回山西，其他人则大多四散。

最初，晋军对到达石家庄的段祺瑞还抱有幻想。有人为阎锡山起草了一份致段祺瑞的书信，信上说当今中原名将首推段祺瑞、黎元洪，现黎已高举义旗，段也应继之而起，“以争功名于史册”。

写信之人很有文采。他还提到，石家庄乃古代韩信灭赵兴汉之地，段祺瑞完全可以效仿韩信，“张吾汉帜，而媲美于古英”。

段祺瑞哪吃这一套，他收信后即冷笑着对送信人说：“可劝伯川（阎锡山另一字）取消都督，再休胡闹了！”

段祺瑞此举激起了晋军的愤怒，纷纷表示：“如能捕段，必拿他的态度做报复！”

话音刚落，清廷新派的军队已经杀了过来。晋军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太原，在阎锡山的率领下逃往包头避难。如此窘境之下，自然更谈不上逮捕或报复段祺瑞了。

袁世凯原先最为担心就是北方问题，如今段祺瑞平定风波，可算是除去了他心中的一个大患。与此同时，代替荫昌出任第一军总统的冯国璋也在湖北前线击败了革命军。

荫昌出师不利，除了他本身缺乏指挥和实战经验外，“不知有朝廷，唯知有项城（袁世凯）”的北洋将领不肯卖力，以及前线部队尚未完全集结就绪也是重要原因。随着冯国璋南下，这些对清军不利的因素都得到扭转——冯国璋本人位列“北洋三杰”中的“豹”，军事上自非浪得虚名；第一军的几个协统都是冯的旧部或亲信，听说冯国璋指挥

他们，皆能抖擞精神，以便在老上司面前显一显能耐；集结在前线的清军已达万余，装备有新式的机枪和重炮，从人数到武器都占有很大优势。

就在段祺瑞平息北方风波期间，冯国璋也攻陷了汉口。袁世凯抓住时机，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向革命党人提出“和平了结”。

虽然他的这一倡议遭到了湖北军政府的否决，但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后赶到武汉指挥作战的黄兴，都表示希望袁世凯能成为“汉族之拿破仑、华盛顿”，并呼吁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不知不觉中，袁世凯已成为时局中心人物，不但清廷倚重他，革命党人也要拉拢他。这种左右逢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和作用，正是袁世凯自复出以来一直希望达到的。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在卫队保护下入都。三天后宣布组阁，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

第二章　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

从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和个人利益考虑，能够一直维持南北均势显然是最好的。一方面，在经历被迫“回籍养疴”的遭遇之后，他与清廷已没有多少情分可言，犯不着为这些曾迫害他、以后还可能会继续迫害他的满洲权贵们拼死拼活地捍卫江山。

另一方面，清廷之所以拿八抬大轿请他出山，讲穿了不过是被南方革命军逼着才不得不这么做。换句话说，一旦他真的傻乎乎地把革命军全给“剿”灭了，很可能接着就会迎来历代功臣都可能遇到的悲剧，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时别说做内阁总理，就算再“回籍养疴”都没机会了。

如此一来，袁世凯所能采取的立场和策略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即他既不能把革命军全部“剿”灭，同时又要给革命军以一定的打击。

对他的这些心思，段祺瑞心领神会，可是前线的冯国璋却一直糊里糊涂。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有两种比喻：一种比他为“豹”，喻其勇猛；另一种则比他为“狗”，喻其忠实。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步步提拔起来的，他既是袁的部属也是袁的门生，甚至他的婚姻也跟段祺瑞一

样，系由袁世凯撮合而成。对于袁，他自然很忠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忠于清”。

头脑里没有政治

每个人对事物乃至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可能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冯国璋代理过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陆军贵胄学堂里曾设立了一个王公讲习班，摄政王载沣以下很多满洲亲贵都是这个讲习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们建立了较好的感情基础。以后载沣当国，对袁世凯及北洋系极力打压，唯独对冯国璋笼络有加。

冯国璋固然不肯背叛袁世凯，为此只好采取竭力回避的办法——先是以坠马受伤和原配夫人病丧为由，多次向朝廷请假。请假未准后，又来了个装聋作哑，假痴不癫，从此“钳口结舌，随声画诺，不复言天下事矣”。

冯国璋接替荫昌出任第一军总统，乃出于袁世凯的奏请。袁世凯当时就对他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那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你慢慢走，慢慢看，不要急着打革命军。

冯国璋对袁世凯这种挟敌自重、渔翁得利的复杂思路根本就不能领会。他只知道袁世凯复出后，两个忠现在可以归于一个忠，也就是忠于清了，他正好可以借此大展拳脚、建功立业。

早在离京南下之前，冯国璋就兴奋地对一位部下说：“这一来，咱的黄马褂算是穿上了，兴许后人还会世袭罔替哩。”一到湖北前线，他就铆着劲与革命军作战，甚至不惜纵火烧城。

看到冯国璋不能领会自己的意图，袁世凯很是不快，他对段祺瑞说：“华甫（冯国璋的字）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头脑里没有政治。”

为了不让冯国璋干扰其既定方针，袁世凯决定把段祺瑞调到汉口，并让他署理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

眼看着身处后方的同事突然变成了上司，自己在前线卖命却未得升迁，冯国璋心里自然不会痛快。尽管如此，他还是派参谋长张联棻代表自己北上迎接段祺瑞。

一见到张联棻，段祺瑞就问他：“你还想做清廷的官吗？”张联棻是北洋陆军学堂的毕业生，算是段祺瑞的学生。段祺瑞如此发问，让他不明所以，只好顺着对方的意思回答道：“我跟着老师走就是了。”

第二天，段祺瑞就让自己的参谋长给冯国璋打电话，要调一协的部队去后方维护治安。冯国璋不听则已，一听更加生气：你来我这儿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不增援就罢了，居然还抽我的兵！

他一个兵也没拨给段祺瑞。

其实段祺瑞的这个决定乃是袁世凯的主张。袁世凯调段祺瑞来汉口，为的就是要让冯、段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抽去冯国璋的一协之兵，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减弱前线攻势，同时也能借此对冯国璋进行暗示。

在冯国璋拒绝抽兵后，袁世凯又通过朝廷发来电谕，直接命令他抽出一协给段祺瑞。

你有上策，我就有对策，牛脾气上来的冯国璋索性和张联棻商量了一个花招。首先，他们拍一份电报给朝廷，假装没有收到电谕，请

求朝廷增兵前线，以用于进攻汉阳。接着，再发一封电报，说是刚刚收到电谕，尊重朝廷抽兵的安排，可是前线已经打了起来，战事吃紧，兵力单薄，一时难以抽调。

朝廷哪里知道里面的隐情，收到冯国璋的请示后，便同意暂时不再抽兵。冯国璋利用这一机会，在打退革命军对汉口的反攻后，就集中兵力进攻汉阳。

1911年11月27日下午，汉阳沦陷。因“收复”汉阳之功，冯国璋被朝廷封为“二等男爵”。当他在汉口的第一军司令部里奉到这一电旨时，心情异常激动，忍不住对自己的秘书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封了爵啦！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

冯国璋边说边流泪，等到话说完了，竟然大哭起来。

在这种亢奋情绪的支配下，冯国璋三番五次地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时机万不可失”，又说“武昌唾手可得”，要求乘战胜余威，尽快给他下达攻克武昌的命令。

袁世凯怎么可能下这样的命令，他怕就怕冯国璋真的打下武昌。

汉阳失守之后，武昌方面人心惶惶，担任前线指挥的黄兴与黎元洪等人在战略战术上发生严重分歧，一气之下离开武昌返回了上海。这使得形势更加危急，黎元洪手足无措，对清廷和北洋军的态度也随之软了下来，甚至表示可以放弃共和，接受君主立宪。

对袁世凯而言，这正是他处心积虑想要达到的又一个利益平衡点，不过到了这一步也已经探底，不能再往前面去了。于是他急电冯

国璋："不接指示，不得轻举妄动。"与此同时，还警告冯国璋必须严格约束部下，决不能向武昌发动进攻。

"奸细"

为了让冯国璋这个榆木脑袋开窍，袁世凯除了一日连发七份电报外，又特地遣使火速赶往汉阳，继续对冯国璋进行暗示。

第一次派来的使节自己没有露面，只是暗中指使冯国璋的亲信向冯进言。这位亲信找不到其他不进攻的理由，就极言攻武昌之难，比如武昌倚长江之险，须有海军进行协助，但此时海军已经归附了南方政府。

冯国璋不以为然："我打汉阳不是也没用着海军吗？不能从正面进攻，难道不可以从湘赣两省进兵，取迂回包围之势？"

亲信赶紧说，迂回包围不是不可以，可是用兵太多，而现在后方已没有多少可增援的部队了。即便能调一些过来，也旷日持久，不能像汉阳那样速战速决。

任亲信怎么强调困难重重，冯国璋仍然一门心思沉浸在扬名建功，为清室和袁世凯同时效力上——没有援军，我自个儿也扛得下来；援军来得晚，没事，我能等！

见旁敲侧击不顶用，第二次派来的使节只好直接去见冯国璋，当面劝他应"权衡轻重，量力而行"。冯国璋不但听不进去，还以当代文天祥、史可法自许，声称："倘有不测，我当为国尽忠，以报天恩，他非所欲也。"

袁世凯第三次派遣的使节原本是去武昌的。此人名叫朱芾煌，系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日本东京，获悉起义的消息后才即刻回国。

在当时力主与南方和谈的袁府人物中，袁克定乃中坚分子。他与朱芾煌有旧，于是便派朱芾煌前去与黎元洪接洽和谈。

事情办完后，朱芾煌由武昌返回江北，不料却被哨兵当成“奸细”给抓了起来。冯国璋听完报告，对他的参谋长张联棻说：“交军法处正法得啦！”

冯国璋满脑子都是如何跟革命军打仗，如何直取武昌，对其他细节漠不关心。张联棻则注意到朱芾煌手上还拿着“直隶总督袁”所填发的护照，这种护照四边周围印着很多龙，故称龙票。

虽然一时难辨龙票的真伪，但张联棻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回答冯国璋：“这件事且慢来。他既然拿着袁宫保（袁世凯）发给的龙票，还是问一问的好。”

冯国璋觉得张联棻言之有理，便亲自对朱芾煌进行审问。不料朱芾煌一看到他就说：“宫保叫你班师回京。”

冯国璋感到十分突然，忙问道：“有命令吗？”

“宫保大人叫我口头传达。”

见事情如此蹊跷，冯国璋只得出面发电报给袁世凯，问朱芾煌所言是否属实，以及请示究竟该如何办理。

袁世凯看了电报不由暗暗叫苦。他不能明言朱芾煌所说皆实，就在回电中说：“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我们弟兄的名誉，请你按军法处理。”

可在电报末尾，他又加了一句看似莫名其妙的话：“克定（袁克定）不在北京，此事也可以问一问克定。”

冯国璋虽然迟钝，人却也不傻，一看后面这句就知道别有隐情。他依言再给尚在彰德的袁克定发报，很快就得到了袁克定的回电：“朱（朱芾煌）就是我，我就是朱，你们要是加害朱，我就到汉口与你们拼命。”

发完电报，袁克定犹恐不妥，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冯国璋，说：“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

朱芾煌终于得以虎口逃生。通过这件事，冯国璋也总算了解到袁世凯暗地里在和南方议和，其真意是“不打”，自此以后就不敢再给袁世凯频发电报催着进军武昌了。

手下将领们跟冯国璋原先的想法一样，都认为武昌唾手可得，恨不得立刻过江“穿黄马褂”。现在发现冯国璋突然不起劲了，他们不知何故，纷纷跑来司令部请战。大家讲着讲着，就在司令部里吵闹起来，其中尤以标统张敬尧吵得最凶。

冯国璋心里本就窝着一团无名之火，见状不由大怒。他一把将桌案推翻，正告诸将：“如再抗违，决以军法从事。”张敬尧等人至此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尽管冯国璋已没有那么冲动，对手下也进行了约束，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想通，对已经形成的南北议和局面也反应冷淡，以至于当袁世凯再派代表试探他“革命军一旦反攻过来，你将如何办”时，他的回答居然还是“只有忠心报国，不知有他”。

袁世凯再也忍受不了了，他下令将冯国璋召回北京，任命他为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被调走后，湖广总督段祺瑞同时兼任第一、第二两军军统，掌握了湖北前线的全部军事指挥权。

儒将之风

段祺瑞之所以能够顶替冯国璋，成为袁世凯走马换将的最适当人选，自然是因为他在和与战、共和与君主立宪等问题的看法上与冯国璋有着很大的区别。

段祺瑞不仅缺乏“忠于清”的牢固思想基础，在北洋系遭遇整肃的那段黑暗时期里，还被载沣、良弼等人穿过小鞋，这导致他对满洲亲贵十分不满。同时，他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大清江山弄到现在这种样子，全是这些无才无德却又嫉贤妒能的“小爷们”一手造成的。

以后袁世凯拟就了一个未发电稿，里面有一句话切中要害，可谓是对段祺瑞等人心声的直接反映：“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

有人夸说段祺瑞：“段氏本主张革新之人，自居江北，又久吸南方之空气，所辖军队……无不富有革命思想。”这纯粹就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从段祺瑞当时所处环境、地位及其个人性格、从小接受的教育等因素上来分析，实在找不到他已有共和思想的明确证据。至于称段

和段的军队“富有革命思想”，那就更是往泥菩萨脸上搽金粉了——“段氏”、“段家军”什么时候成革命党人了?

应该说，段祺瑞原先对“立宪”、“共和”这些舶来品都不是很感兴趣，也没有太深研究。不过他后来逐渐发现，无论是立宪还是共和，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一旦施行，君权将被削尽，满族权贵们也必须靠边站。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由此段祺瑞才开始对政体变革表现出一定的好感和热情。

在冯国璋被调走之前，南北双方在武汉已达成局部停战协议，基本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手下将领仍有跃跃欲试之心，前线士兵寻衅滋事、破坏停战协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段祺瑞到任后恃其旧日声势，数日之间不与各将领见面。此举莫测高深，将领们没人敢主动跑来搞什么请战。与此同时，他又令徐树铮组织执法队，上街维持秩序。

徐树铮自信阳整饬军纪开始，在士兵们中就有了狠辣绝情之名。他所率领的执法队一律佩大刀、军棍，发现不良行为立即制止，情节严重的就地正法、枭首示众。

冯国璋在进攻革命军的过程中曾经纵火烧城，汉口许多地方都被烧成了一片瓦砾。段祺瑞为此电奏朝廷，请求拨款赈救和赔偿损失，这也使得他大得人心，一时间外界都盛传段祺瑞颇具“儒将之风”。

一俟稳住局面，段祺瑞即考虑如何同南方进行谈判。袁世凯、段祺瑞最希望的谈判对象是黎元洪，毕竟曾在北洋一个炕头上吃过饭，比较容易打交道。此前袁世凯派往湖北的朱芾煌找的就是黎元洪。当

时朱芾煌带去了汪精卫致黎元洪的信件，内容是约定南北联合，逼迫清室退位，而后举袁世凯为总统。黎元洪对此已表示同意。

可是自汉阳失守，黄兴以及追随者返回上海后，武汉“首义之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上海转而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和谈地点也由武汉移往上海，事情要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1911年12月18日，南北谈判代表团在上海正式展开和谈，结果谈判一开始，双方就产生了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北方代表坚持立宪，南方代表主张共和。

北方代表秉承的是袁世凯之意。其实袁世凯并不是真的想立宪，共和对他来说更好，当然前提是必须让他当总统。问题是现在谈判对象变了，原先答应让他当总统的黎元洪已经插不上手，能够插上手的是上海方面，而上海方面却从没有做出过类似的承诺。

设想一下，万一他袁世凯顶着清廷的压力，同意改建共和了，可自己却当不上总统，那岂不是白忙一场，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袁世凯精明过人，在感到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一再告诫北方代表:“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有他。”

谈判陷入僵局。作为武汉前线的北方最高指挥官，段祺瑞的态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各方面的势力纷至沓来，有的要摸清他的思想倾向，有的要对他进行游说。不管是接待哪方面的代表，段祺瑞翻来覆去总是一句话:“国家大事应由民众来决定，我等军人，将尊重民众的意见。”

在拿模棱两可的套话敷衍外界的同时，段祺瑞也在积极寻求破局之法。这时，他得到了帐下另一名幕僚靳云鹏的鼎力相助。

第一策

还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靳云鹏便加入了新军，不久他被挑到炮队随营学堂当学生。段祺瑞当时担任炮队统领，兼任随营学堂监督，所以二人有师生关系。

炮队学堂最重数学，段祺瑞不仅自己教数学，还从海关请了一个人专门教授微积分。靳云鹏虽然天分不高，但非常刻苦用功，数学也学得不错，因此受到段祺瑞的重视，遂将其选为学长（相当于班长）。

就在学堂临近毕业时，炮队出了一个排长的缺，靳云鹏以为自己一定可以调充排长，不料却没有被选上。气急之下他抓了狂，结果被迫回家休养了一年多。靳云鹏原有斜眼之症，人称“靳瞎子”，自此以后，大家又送了他一个新的绰号：“靳疯子”。

“靳疯子”毕业后，被段祺瑞推荐至云南的第十九镇新军中担任总参议。随着武昌起义爆发，蔡锷等人在昆明发动起义，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回了北方。此时恰逢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听说靳云鹏北返，他的第一反应是“靳能生还，不禁狂喜”，对靳云鹏很是欣赏和信任，这样靳云鹏也就顺势投奔了段祺瑞。

靳云鹏新投段府，急于为幕主效力。在公开谈判陷于僵局的情况下，他提出不如与上海的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以摸清对方真正的筹码和底线。

徐树铮等其他幕僚听了靳云鹏之策后，也表示赞成。段祺瑞于是按计而行，以廖宇春等人为密使，派遣他们前往上海接洽。

在上海，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五项协议。代表段祺瑞的廖宇春同意确立共和政体，上海方面则承诺“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1911年12月24日，廖宇春返回汉口，向段祺瑞报告了这一情况。

对达成密约，段祺瑞高兴之余又不无担心。高兴的是，以实力而论，“先推覆清政府者”可以肯定为袁世凯莫属；担心的是，袁世凯是否肯答应还是个未知数，毕竟他在公开场合曾一再声称要坚持立宪。

见段祺瑞有此担心，廖宇春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再辛苦一趟，北上一探究竟。

得到段祺瑞的同意后，廖宇春随即动身出发。他首先找的是袁克定，袁克定倒很坦白，他告诉廖宇春，关于共和之举，袁世凯“心中已以为然，特口不能言耳”。也就是说袁世凯对共和并不排斥，只是限于身份，嘴上不能这么讲罢了。

接着廖宇春又去暗访其他在朝的北洋将领，但这回却遇到了障碍——冯国璋等人都不能接受南方关于共和的要求，主张继续开战。

还没有问到袁世凯本人就碰了壁，廖宇春不免有些沮丧。他向靳云鹏建议：“此事除由第一军主动，断难收效。”

靳云鹏迅速在第一军内部展开活动。有段祺瑞在背后支持，他四处联络，很快就有了满意的结果，前后总计有二百多名将校赞成共和。

在第一军内部取得一致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接着靳云鹏又拟定了实现共和的三策，其中第一策是：运动亲贵，由内廷降旨，自行宣布共和。

为实现第一策，继廖宇春之后，靳云鹏亲自入京拜见袁世凯。提及共和，袁世凯既未肯定也没否定，而是问段祺瑞的态度如何。靳云鹏回答："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议推举宫保（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挺能演戏，他一听之后马上装出吃惊的表情，对靳云鹏说："军心怎么一下就变到如此地步？"

装完了，袁世凯羞羞答答地给靳云鹏做了交代："汝曹握兵权者，亦复如此，我尚何言？但使我得有面目与世人相见足矣。"

靳云鹏明白了，敢情袁世凯既要当婊子，还想立牌坊。换句话说，只要段祺瑞能够做得干净漂亮，不让他留下篡权之名，完全可以放手去做，他也会予以积极配合。

在与袁世凯取得默契的基础上，段祺瑞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称其所部已经有一个标与革命军有瓜葛，而且这种情况其他镇也都有，"共和思想，近来将领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

外面段祺瑞造出声势，里面袁世凯就可以出来说话了。1912年1月16日，他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建议尽快对南方提出的共和方案进行讨论。

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太后随后召集宗室王公御前会议。在连续几天的密集会议中，主张退位以保全皇室的观点虽有，却并不占上

风，逐渐占据上风的反而是宗室王公中的强硬派，这就是铁良、良弼等人所组成的宗社党。他们力主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关于共和的讨论也在他们的坚决反对下搁置了。

看来无论段祺瑞的正面恫吓，还是袁世凯的幕后助力，都无法使不识相的亲贵们做出完全意义上的让步。1912年1月25日，靳云鹏密电段祺瑞：“内廷降旨，已为亲贵所阻，全归无效，请速谋第二策。”

真是岂有此理

靳云鹏的第二策是：由各军队联名通电，要求内廷宣布共和。

接到密电，段祺瑞当即复电：“第一策失败，本在意中。”他要在京的靳云鹏赶紧查明北洋各军将领的姓名及驻军地点，以便联名电奏。与此同时，他又致电内阁，借手下各将领之口，说将领们在听到亲贵们阻挠共和后，“多愤愤不平”。出现这一局面，让他很是为难，“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最“愤愤不平”的当然不是各将领，而是段祺瑞自己。段祺瑞如此着急上火，是因为孙中山此时已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同时也表示，如果袁世凯能倾覆清廷，仍愿让位于袁。

在收到段祺瑞电报后的第二天，内阁即以袁世凯、王士珍、冯国璋、徐世昌四人联名复电，劝告段祺瑞“服从命令，军人大道……切勿轻举妄动”。四个人里面，除了袁世凯属于装腔作势、掩人耳目外，其他人的保皇意图都很明显。

段祺瑞对此不屑一顾。1月26日，他联合四十六名北洋将领，由他亲自领衔，向北京发出了主张共和，奏请清帝逊位的通电。电文系徐树铮手笔，洋洋近千言，其主旨是撇开已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让清廷将政权直接移交给袁世凯。

段祺瑞的电文一到京城，廖宇春马上印刷万张，加上各大报纸的刊行号外，在城内广为传布。时任禁卫军总统官的冯国璋也收到了这份通电，他一边翻着电报，一边脸上露出了很不以为然的表情。

看完电报，冯国璋转过脸来很生气地对随员说："芝泉（段祺瑞的字）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这个电报是不是有人捏造，还是他的本意，我一定要问一下。"

这时段祺瑞已回保定，而电报是由汉口发出的，所以冯国璋怀疑电报可能是有人假借了段祺瑞的名义。为此，他打算在发电报质问段祺瑞为什么要发逼宫电的同时，自己再发一个通电，问一问列衔在逼宫电中的其他人是不是真的和段的意见完全一致。

身边的随员们知道事关重大鲁莽不得，赶紧上前劝解道："这个可以不必问了，谁还敢假冒他（段祺瑞）的名字呢？！好在这个通电里并没有列咱们的名字。"

冯国璋听了略一迟疑，才没有立即干出这种愣头愣脑的天真举动。

冯国璋的反应早在段祺瑞意料之中，根据他的安排，靳云鹏专门造访冯宅，替段祺瑞疏通。冯国璋当天戴着小帽，歪着短短的小辫，穿着便衣，嘴里叼着雪茄，就在客厅里接待了访客。针对通电一事，他质问靳云鹏："这是哪个坏蛋出的馊主意？"

靳云鹏顺势解释说，通电是在段祺瑞离开汉口的情况下，由他们发出的，请冯国璋原谅。

虽然靳云鹏刻意强调拍发逼宫电时段祺瑞不在现场，但却并没有回避电报来自段授意这一点。冯国璋终于明白此事乃段祺瑞蓄意而为，顿时怒火中烧，拍着桌子大声斥责道："当统帅的人，怎么能够私离驻地？他（指段祺瑞）不在，你们就敢发出这样的电报，真是岂有此理！"

接着他又狠狠地骂了靳云鹏一通，声色俱厉。靳云鹏窘得面红耳赤，几乎无地自容。经旁人解劝，靳云鹏才得以脱身而去。

靳云鹏走后，冯国璋尚余怒未息，又重复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

既然段祺瑞已来打了招呼，多年故交，总不至于为此翻脸。冯国璋随后又冷静下来，说："好啦！我也不再追究，不再回电了，我要是回电的话，就没有好的。"

和冯国璋一样，清廷开始也以为逼宫电是伪造的，经内阁电询段祺瑞，没有得到回电，这才知道对方是动了真格的。

事到如今，大家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即只要袁世凯表明态度，事情还有挽救的可能。因冯国璋忠于清室，并且身兼"君主立宪会"会长一职，于是就由他带着包括副会长在内的几名亲贵前去拜见袁世凯，请求袁支持君主立宪。

袁世凯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大家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有实际困难也不能不和大家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军饷没有着落，还有宣布独立

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的军队顾此失彼，实在是不敷分布。所以，我现在正和革命党力争。”

听了袁世凯这几句不得要领，同时又无懈可击的场面官话，冯国璋等人哑口无言，只得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一造共和

段府有一位叫邢宝斋的老人，是在段祺瑞父亲手里当过差的，年纪大了以后便留在段府干点轻省活，吃碗现成饭，比如出门买点笤帚、簸箕什么的。

邢宝斋常常跟人提起段祺瑞小时候的事。那时候段祺瑞的父亲在军队里当管带，段祺瑞也跟在父亲身边，邢宝斋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他。不过当时邢宝斋眼中的小段祺瑞可实在不怎么样——一天到晚淌着清水鼻涕，真是要多邋遢有多邋遢。

邢宝斋看着很窝火，就对小段说：“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

教训过之后，小段依旧不改。邢宝斋气极了，忍不住爆出粗口：“你这个屌样！”

谁也不会料到，这个邋遢孩子长大后会做到这么大的官，更想不到他还能干出逼皇帝退位这样惊世骇俗的事。之后，当邢宝斋又唠叨段祺瑞小时候如何不起眼时，有人就会变得不耐烦起来：“你不是看不上他吗？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买笤帚。”

老头顿时被堵得无话可说，只好结结巴巴地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么一天哪！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儿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想到惊天动地的事，也未必有能力或者敢于去做。有时段府厨房开出来的菜尽是萝卜，吃的人会抱怨：“怎么大师傅尽给我们萝卜吃呀？”马上有人用手指着里面段祺瑞他们吃饭的地方：“你想吃好的，到那一桌吃去！”

旁边又有一人接着搭茬：“他呀，他没有这个能耐！”说着，用手一比画：“人家三句话推倒了清家皇上。你，成吗？”

段祺瑞的逼宫电洋洋洒洒，到段府家人嘴里，就被归纳成了言简意赅的三句话：兵力单薄，粮草缺乏，清家皇上你快退位吧！

三句话让一个大清朝交待了，谁能做得到？只有段祺瑞！段府上下一提到这一点，无不心服口服。

其实，段祺瑞在递出“三句话”前后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所理解的共和，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概念未必一致；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主张共和，也绝不仅仅只是因为摸清了袁世凯的意图，要对其一味效忠。说到底，在那个历史阶段，但凡像段祺瑞这样具有政治头脑和前瞻性的政治人物，都能看清当时的历史趋势，即共和必然取代专制。

段祺瑞的“三句话”一出，犹如给清廷下了一道催命符。京城亲贵们人人为之震恐，就连良弼也发出哀叹：“现在除共和外无别路。”

就在清廷收到逼宫通电的当天，革命党人对良弼发起刺杀行动并取得成功，这位反对共和最卖力的亲贵被炸弹炸成重伤，两天后毙

命。至此，亲贵们不但是怕，而且是要逃了，他们纷纷前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避难，不能走的只能拉下脸来央求袁世凯派兵保护。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情势下，隆裕太后接连召开两次御前会议，并且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决定让清帝逊位。消息传到冯府，冯国璋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慨，他用感叹的口吻对随员们说：“唉！皇族甘愿退让，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一来，大清国的江山就算完啦！”

虽然隆裕太后已做了逊位的决定，但在包括恭亲王溥伟在内的几个近支王公的坚持下，清室还想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变化。

在段祺瑞的逼宫通电发出一个星期后，清帝退位的诏书仍未正式下发。为免夜长梦多，段祺瑞下决心采用靳云鹏的第三策，即使用武力，胁迫内廷宣布共和。1912年2月5日，他联合第一军八名协统以上的将领发出代奏电，指出共和国体已成时代潮流所向，可是现在却因为“二三王公迭次阻挠”而无法顺利实施，结果导致了“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的局面。

对逆势而动的王室亲贵，袁世凯同样既不屑又痛恨，他暗暗写下了“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的字句，只是以他所处地位，还不能公开这样说出来。段祺瑞则无此顾虑，他在电报中将“二三王公”认定为“败类”，并声称自己将率第一军全体将士入京，与之“剖陈利害”。

电报发出之后，段祺瑞真的将自己的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保定，做出了要率兵入京的姿态。

2月6日，袁世凯召集王公大臣，把代奏电交给他们传阅。看完这份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清室的兵谏式通电，人人都相顾失色，噤不

敢言。只有恭亲王溥伟愤然骂道："本爵因朝廷愿让政权，已署名认可，何竟指为败类？祺瑞此电，逼迫太甚！"

虽然他这话听上去还算有点勇气，实际也是色厉内荏，已无半点招架之功。溥伟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敢再对清帝逊位说三道四了。于是会上就拟定了赞成共和的长电。

看到清廷已支持不住，段祺瑞趁热打铁，于2月9日参与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的电报，要求"宣布共和"。10日，他又在信阳发出电奏，"力催解决"。

除了硬的一手外，袁世凯、段祺瑞还有软的一手，这就是南北代表所共同商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尽管王公亲贵们对拱手让出江山和特权仍心有不甘，但他们更怕段祺瑞带兵入京，导致最后连优待条件都得不到。2月11日，隆裕太后承认优待条件，第二天便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退位诏。

共和之局至此大功告成。毫无疑问，段祺瑞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他所领衔的前后两份主张共和的电报更为许多人称道，"一造共和"的赞誉也由此而生。

舍我其谁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和革命党人虽然合力推翻清廷，建立了共和，但自合作初期开始，相互之间就不是完全信任。清帝退位后，为了对袁世凯进行约束和限制，孙中山在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同时，又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以及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暗中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对来京接他南下的使团进行恐吓，从而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这一附加条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开始组阁。既然在定都上已经占尽便宜，他在组阁问题上就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内阁中相对不太重要的一些部的总长职务，都让给了同盟会。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部，袁世凯仍紧抓不放，尤其是陆军部。兵权重要，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陆军总长一职，南北双方都极力争取。南方推荐黄兴担任此职，袁世凯坚决反对，而他反对的理由就是黄兴还不够资格。

虽然辛亥革命带来了改朝换代、时势造英雄的机会，可是"国体虽非清社稷，朝纲仍是汉官仪"，在袁世凯主政时期，仍然特别强调资格。这种所谓的资格，又主要侧重于前清官阶，因为袁世凯自己在前清就已经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像他这样资格的人本来不多，就算有一两个资格较老的遗老，由于缺乏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也难以成为他假想中的政敌。

以前清官阶作为资格，袁世凯便给同盟会以及其他新晋官僚设置了一道很高的门槛，黄兴等人就这样被"卡"掉了。

袁世凯的"资格论"倒不是只用于对付政敌。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嫡系人马用的也是同一标准：一般文武官僚即便什么错都没犯，也得按部就班地进行升迁，要想平步登天是不太容易的。这么做的用意，就是为了在部属的脑子里奠定根深蒂固的"旧属"意识，以巩固和提高他"袁宫保"作为老上司的威望。

以资格来衡量，段祺瑞虽然在辛亥一役中表现突出、功勋卓著，但要当陆军总长，还得排在王士珍后面——王士珍为前任陆军大臣，段祺瑞此前则从未进入过内阁。

王士珍也是“北洋三杰”之一。“三杰”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备生，同时充任新军要职，又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才得以迅速发迹。不同之处则是三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各异，王士珍为人大度雍容，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经常扮演卧龙先生的角色，故被时人称为“龙”。

相对于“段虎”的锋芒毕露，“冯豹”的木讷迂钝，“王龙”的低调和淡然显然更让袁世凯放心。

问题是，“王龙”在政治态度上与“段虎”截然相反，却与“冯豹”完全一致。王士珍也是一个保皇派，在段祺瑞发出逼宫通电后，他曾致电责备段祺瑞，称皇恩浩荡，作为清廷高官不应发那样大逆不道的电报。

清帝退位之后，王士珍便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虽然袁世凯对他百般挽留并退回了辞呈，但王士珍执意不肯再留于京中。

王士珍一走，袁世凯只能属意段祺瑞，调他来北京就任北洋政府第一任陆军总长。

作为军人出身的军界要人，段祺瑞绝非一介武夫。实际上他在辛亥革命中所展示出来的也不是用兵打仗的才能，而是过人的组织能力以及在权力场上咄咄逼人、舍我其谁的气势。

一到北京，段祺瑞就打算提拔自己的首席幕僚徐树铮为陆军次长，但由于在内阁通不过，只得改提南方的蒋作宾。不过在蒋作宾到任前，他却抢先荐任徐树铮为陆军部总务厅厅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五位司长。

蒋作宾当然对此不满，段祺瑞则毫不相让，他强调总长有权委任厅长、司长，蒋作宾这个次长无权插手过问。

亲信中的亲信

总务厅厅长的权限本身也可大可小，全凭跟主管长官的关系而定——如果与长官的关系不深，便只能办理一些文书、庶务之类的事务性工作；而如果是长官的亲信，其权限就可无所不包，整个陆军部的工作都可以被“总”在里面。

徐树铮是段祺瑞亲信中的亲信。众所周知，段祺瑞起来得快乃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结果，而段祺瑞提拔徐树铮也跟袁世凯提拔他自己一样，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段祺瑞进京后，不但北京军政界的要人经常要来段公馆问候起居，就是由外省进京的官员也免不了要到段公馆禀见、禀辞、禀谢。按照段公馆的规矩，每天晚上都要在号簿上登记这些宾客的名字、官衔，有时还要把对方的住址、电话也一并记下来。在这本号簿中，“小徐”属于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小徐”是段家人背后对徐树铮的称呼。段公馆来宾，无论官职大小，一般都要预约和通禀。只有小徐是个例外，他是随来随见，用不

着号房代他通禀便可径直闯入，而且闯入的还是内客厅——段祺瑞会见其他宾客都是在外客厅！

新来段公馆的家人往往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段对小徐这么信任呢？时间一长，他们也就慢慢明白了。首先是小徐对老段的确忠心耿耿，一心护主。其次，小徐是真有学问和本事。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和负责人的电话从不用查问，全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记在脑子里，丝毫不差。如果有某个问题需要找有关部门联系，他会立刻亲自打电话去问。

除此之外，徐树铮竟然还能做到五官并用：办公的时候可以会客；会客的时候，可以一只手批公文，另一只手拿着话筒跟别人通话……

清末时，有人说张之洞有这种五官并用的本事，而在北洋时代，似乎只有徐树铮能够做到这一点。

徐树铮虽然暂时没能当到次长，却胜似次长。因为段祺瑞对他太信任了，徐树铮可以在段祺瑞面前说一不二，段祺瑞从不驳回，反过来，段祺瑞吩咐下来的事，他却可以不照办。

徐树铮的说一不二，并不是那种表面的骄横跋扈。事实上，别人找他办事时，他一般都是满面春风、彬彬有礼，从不当面让人下不了台，但客气归客气，办起事情来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通融余地。

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姓李的军官被军队撤职了，穷得没有饭吃，他写信给段祺瑞，请求段祺瑞给他个差使干干。段祺瑞看他说得可怜，便答应给安排个职位。

文件批交徐树铮办理，但徐树铮签呈后又打了回来，打回来的文件上只有简单一句话：“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段祺瑞看后没说什么，于是李军官重新谋职的事就只好拉倒了。

如果是面谈，为了照顾来人的面子，徐树铮一般不会一口回绝，而总是说：“这可要向老总（段祺瑞）请示。”只要他这么一说，对方就只能绝望了，因为知道事情肯定办不成。

陆军部的实质状况是，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是由徐树铮一人说了算，不仅有职无权的蒋作宾做不了主，就连身为总长的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可也正是在徐树铮的辅助下，陆军部的日常运作保持了较高的效率，而段祺瑞则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思考和主持一些大事。

段祺瑞履职时，国内军制比较混乱，北方军队沿用的是前清旧制，比如部队编制中有镇、协、标、营、队。段祺瑞仿照南方革命军的体制，相应改称师、旅、团、营、连，军官官阶也从原来的都统、参领、军校分别改称将、校、尉。此外，地方军政长官一律改称都督，并设都督府。

袁世凯看到段祺瑞办事有主张有魄力，且善于体察自己的心思，对段祺瑞也更加信任。有关军事方面的重大措施，像各省裁军、改革军事官制、决定各省军民分治等，几乎都要先与段祺瑞商量，然后再做决定。

身为袁世凯的老部下兼政治盟友，段祺瑞对袁世凯同样忠心耿耿，政治策略上始终紧随其后。时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与袁世凯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便站到袁世凯一边，与唐绍仪对抗。

唐反对总统垄断一切大权，段就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凡事都要由大总统亲自决定；唐坚持内阁集体负责，段就否认国务院为有机组织，强调各部应奉行“独立主义”，各行其是；唐欲与同盟会合作共事，让接近革命党人的王芝祥当直隶都督，段就策动直隶各路的北洋军队集体发通电，反对王芝祥督直。

在袁世凯、段祺瑞的夹击之下，唐绍仪度日如年，不得不辞职走人。

当然这种紧随有时也是有压力和风险的，最典型的便是张振武被害事件。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之一，他很瞧不起黎元洪，从黎元洪被推上台起，就“既推重又加以贱侮，甚至抽刀拍案，嘲弄辱骂”。

北洋政府成立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这时全国各地因为欠饷和裁军，不断有哗变事件发生。湖北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鄂人喜动恶静，武昌起义中的部分有功官兵也恃功而骄，甚难节制。在湖北发生的一次兵变中，据说黎元洪就查到主谋人是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而且张振武还曾公开宣称：“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

1912年8月15日，袁世凯、黎元洪合谋，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逮捕杀害了张振武。在杀张的执刑命令上，段祺瑞以陆军总长的身份签字副署，使之生效，因此对此案负有直接责任。

张振武被害事件发生后，舆论为之大哗，认为张案的办理不符合法治精神。参议院立即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

袁世凯见势不好，赶紧将皮球踢给黎元洪，而黎元洪为了逃避责任，又赶紧发长电委托段祺瑞到参议院登台答辩。

开始坐不住了

建立共和，并不意味着民主法制精神也相应而立。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日报——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便指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唯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

张案的最大问题和漏洞，恰恰在于决定"生杀人"的不是司法官，而是大总统、副总统。参议院的质问案也将重点集中于此，声明："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

8月23日，段祺瑞在参议院为张案的处理进行辩护，其辩护理由主要包括：张振武的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行刑前已"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张案涉及国家安全，只能执行"临时办法"。

这样的答辩不能让参议员们感到满意。在他们的连番追问下，段祺瑞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手续"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

参议院最初以同盟会占优势，在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成立后，同盟会的优势才逐渐转为劣势。接下来，唐绍仪内阁的垮台更使同盟会失去了在政府的立足点。为了改变这一状况，8月25日，同盟会与一些小党合并，组成了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国民党，国民党成为民初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在当时的参议院内，基本处于国民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对立的局面。8月28日，部分国民党籍参议员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

认为“副署之国务员段祺瑞辅佐乖谬”，要求按“临时约法”将其免职，“以彰国法，而固国本”。该弹劾案一经提出，共和党就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参议院议长几乎无法维持秩序。最后由于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张案遂不了了之，段祺瑞才得以免遭弹劾和免职。

尽管参议院在张案上颇有虎头蛇尾之嫌，但能够让陆军总长在参议院接受质询，以及差一点弹劾成功，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民初民主法制的进步。

类似事件让国民党看到了自己的能量和潜力。国民党中心人物宋教仁更是热切希望通过组织责任内阁来架空袁世凯，夺回革命党人失去的权力。事情也似乎正朝这个方向发展，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全国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在参众两院共870个议席中，国民党一家就获得392席，而包括共和党在内的其他三个政党总共才获得223席。

随着国民党在参众两院俱占多数，本来对国会并不是十分在意的袁世凯开始坐不住了，特别是宋教仁所力倡的责任内阁更令他寝食难安。

责任内阁与唐绍仪内阁、赵秉钧内阁不同，它是由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的。从选举结果来看，也就是内阁成员将主要由国民党员组成，到时段祺瑞等袁氏嫡系人马别说掌握不了重要部门，多半连内阁都进不了。

趁宋教仁在京养病期间，袁世凯派亲信、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多次前去慰问，并带去他的意思，即可以答应让宋教仁担任下一届国务总理，但条件是必须放弃责任内阁制。

当着赵秉钧的面，宋教仁表示国民党及他个人都愿意以在野的地位，帮助袁世凯把国家的事办好。宋教仁的这种表态，让袁世凯很满意。

身体痊愈后，宋教仁准备离京南下，袁世凯又通过赵秉钧“壮其行色”，赠送给宋教仁一张可以随意支取现金的交通银行存折，宋教仁也毫不推辞地收下了。

在袁世凯、赵秉钧看来，送存折就是重金贿赂，宋教仁如果拒绝，事情就又悬了，但宋教仁既慨然受之，便说明已没有任何问题。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教仁到南方后即到处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必争政权，同时照旧抨击袁世凯，甚至设计了一个在正式总统选举时让黎元洪取代袁世凯的大胆计划。

袁世凯派人一路尾随宋教仁，早将这一切都报往北京。袁世凯大半辈子都精似鬼，临到头来却喝了别人的洗脚水，不由又急又气，多次诘问赵秉钧：“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

赵秉钧窘迫万状，无言以对。他忍不住向亲近的一名议员诉苦道：“老弟，你说叫我怎么办？怎么向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故也称袁项城）交代？”

毁宋酬勋

袁、赵都低估了宋教仁的雄心和政治抱负。无论是在野的承诺，还是收受重金，宋教仁都不过是给他们玩了一招障眼法而已。

当然，政治场本身就是权力场，袁世凯在与唐绍仪等人的权力争夺中其实也要了许多阴谋。归根到底，只要这种权力斗争被限制在民主法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便无太多可指责之处。

宋教仁正是在规则里面玩游戏的高手，他在南方力倡“争内阁不争总统”的理念，并俨然以多数党候补内阁总理自许。这使袁世凯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他时刻担心大权旁落，曾对自己的高级幕僚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夺取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

眼看国会召开在即，形势之紧迫，大大超出了袁世凯及其派系人马的预料。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北火车站。一般人都认为，宋案系袁世凯、赵秉钧共同密谋，但也有资料称袁世凯并非主谋，宋案乃赵秉钧等人“毁宋酬勋”的独断行为。

宋教仁被刺，为袁世凯在政治上除去了一个大敌，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初步解决了北京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问题。

最早出现财政危机的其实是南京临时政府。就在南北还处于战时状态时，有一次安徽都督派专使去见孙中山，要求马上接济部分军饷。孙中山批了二十万元，但手下人查了一下金库，却发现仅有十元存洋。

为了这个恼人的“孔方兄”，孙中山、黄兴伤透脑筋。当时每天到南京陆军部索饷的人员不下数十拨，时任陆军总长的黄兴被弄得寝食俱废，甚至急吐了血。

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刚刚一星期，尚在执行职务的南京政府就提出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袁世凯也不是财神

爷，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找外国借款。

袁世凯的法子，南京政府同样想过做过。孙中山在回国前后就多次借款，但外国银行家们多精明，南京政府能存在几天他们都不知道，又怎么肯把钱借给你？在那段日子里，孙中山每天都盼望能得到外国银行的复电，可是一直等到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也没有见到钱的影子。

袁世凯出手借就不一样了。这时南北已走到一起，且北京政府就实力和信用而言，更符合外国银行家心目中“能负责任的中国政府”的形象。在此情况下，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便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付银二百万两给南京政府作为军政费用。

除了结束南京政府、遣散南方民军外，北京政府需要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中比较大宗的就有整顿在京政府机构、偿付承接自清政府的外债和赔款、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等。这使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程度很快就接近了当初的南京政府，而解决困难最方便最快捷的途径只有继续向外国银行借贷。

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以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为全权代表，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签署了“善后借款合同”，这就是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

据说著名学者辜鸿铭曾应邀在这次借款谈判中担任翻译。他说了一句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辜鸿铭的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借款合同的苛刻程度。根据合同规定，中国必须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

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有损国家主权的附加条件。

借款合同签署于第一届国会开幕后不久。依照国会组织法，政府所有法律、财政、国务院同意等案，都须得到参众两院的一致同意，像“善后大借款”这样重大且涉及国家主权的决策更不能例外，但国会却是事后才得知。

宋案和借款案引起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怒。两案发生之前，孙中山、黄兴曾先后北上与袁世凯商讨国是，对袁俱有好评。二人还不约而同地做出过乐观估计，认为民国若能由袁世凯执政若干年，必可跻身于强国之列。袁世凯对孙、黄亦不乏好感，与人交谈时，曾称孙中山坦白、黄兴憨直，言下颇有相互提携之意。

两案一起，南北领袖之间这种一度尚算融洽的关系便告完全破裂，双方皆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孙中山首先力主对袁世凯进行武力讨伐，袁世凯也被激起了怒火，他发出“传语国民党人”的长电，声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

多一个字也别想

在“看透孙、黄”这一点上，段祺瑞与袁世凯基本步调一致。他也认为国民党人不听约束，“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别的不说，当初揪住张案不放，对他又是质询又是弹劾的，不正是国民党籍议员们的所为吗?

议员无兵无勇，相对而言还容易对付，令段祺瑞深感威胁的还是那几个国民党籍都督。早在1913年年初，江西都督、国民党人李烈钧就未经陆军部批准，将采购到的一批枪械弹药由上海运往江西。段祺瑞闻讯密令九江驻军将枪械予以扣留，随后通知李烈钧："此项弹药已分给各水师军舰。"

李烈钧通电表示抗议，声明购买这批枪械是南京临时政府曾经批准的，只是最近刚刚从上海起运而已。

对李烈钧的通电声明和要求发还枪械的要求，段祺瑞不予理睬，他在相应文件中批示道："今日李督，通告天下，谓部扣留军械，是李不受善，莫可救药。"

虽然段祺瑞态度强硬，但鉴于李烈钧"多方布置"，"志极坚定"，袁世凯不得不做出让步，指示段祺瑞将扣留的枪械发还给他。

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刺激了段祺瑞。事后，河南都督张镇芳写信给他，对共和政体下的民主表示不满，并建议对国民党人用兵。段祺瑞读信如遇知音，他随即在复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

在准备用武力进行镇慑，以防止孙、黄"捣乱"上，袁世凯、段祺瑞可谓一拍即合。袁世凯在长电中也说："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指孙、黄）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1913年4月30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内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段祺瑞出席会议，并参与部署军事，其中包括"多购军火，增置募兵"和"分布军队办法"等项。

第二天，由于赵秉钧涉嫌宋案而被迫辞职，袁世凯命令段祺瑞以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这一任命被外界解读为袁不惜用武力对付国民党的信号，国内政治气氛瞬间就有了火药味，段内阁也因此被称为“战时内阁”。

5月5日，就参议院对借款案提出的质问案，段祺瑞以代总理身份到部接受质询。当天，他身着陆军上将军服，挎着军刀，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走进了参议院会场。在国务院席入座后，依旧双手握着刀柄，其神情仿佛不是来回答质询，而是来主持军事会议的。

议员当然也没有这么好吓唬。除了亲袁议员默不作声外，国民党籍议员都对段祺瑞群起而攻之。他们根据“临时约法”发出严厉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先咨请国会讨论，就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这是非法签字，应判定借款合同无效！

议员们越说越气，开始控制不住情绪。有人跳到凳子上大骂袁世凯破坏约法，欺凌国会，有人拍案高喊打倒袁世凯的口号，甚至还有人向段祺瑞摔掷墨盒。

不管议员们问什么，骂什么，或者摔什么，段祺瑞始终神色自若，傲然不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轮到他发言了，他走上讲台，对议员们质问的一大堆问题一个都没有正面作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木已成舟，毋庸再议！现将借款案送交国会确认。”再质问，还是那句话，多一个字也别想。

参议院的质询就这么草草结束了。众议院紧接着也提出了质问案，但段祺瑞的出场和答复方式与在参议院一般无二。

这是段祺瑞自张振武案后第二次接受质询，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对议员们的轻慢和蔑视尽在不言中。

当然，袁世凯、段祺瑞也不是真的就敢不把国会放在眼里。自发现国民党在国会占据优势后，他们就采取措施“收复失地”，其中包括组织小党群，以及将共和党、民主党进行合并，组成足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进步党。

小党林立，不仅分散了国民党的势力，而且相当一部分小党都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资助，说白了就是袁家党。比如有一个新共和党，党费主要由袁世凯拨付，所以在小党之中最为阔绰。这个党别无党纲，唯知拥袁到底，其活动甚至比亲袁的进步党更加卖力，以至于进步党有时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质询会期间，进步党和亲袁小党的议员们明知政府理亏，却还跑到休息室进行疏通，要求国民党议员满足段祺瑞的要求，对借款合同予以追认。

国民党议员虽然对段祺瑞轻视国会的态度感到不满，但当场也不能拿他怎样。质询会结束后，国民党本部召集两院的本党议员商量，认为借款合同既已签字，使用国会否决权也来不及了，同时如果使用国会否决权，势必还要对责任人进行弹劾。弹劾案一起，亲袁议员势必不会善罢甘休，在其现有力量已极大增强的情况下，到时弹劾不了不说，所掀起的政海波澜还将无止无休。商量下来，国民党决定对借款案不做硬性决议。

在国民党方面立场松动之后，借款案很快得到众议院的追认。参议院对借款案进行了自由投票，最后也以过半数通过。

逼上梁山

借款案的通过大长了袁派人马的气势。1913年5月6日，袁世凯下达一道命令，表示要“除暴安良”，矛头直指国民党。段祺瑞更是毫不掩饰，坚决主张在紧急状态下对南方用兵。自出任代总理以后，除国务会议外，他几乎从不到国务院，每天只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处理军务。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曾表示“专靠武力，总不能根本解决”，并提出应就政治解决南方问题进行讨论。还没等他说完，段祺瑞就板起面孔，很不耐烦地说：“军事非你文人所知，不应干预！”

国民党方面，虽然孙中山一再主张“速兴问罪之师”，但由于裁军后南方兵力不足、国民党籍都督们意见不统一等原因而未能及时发动。趁此机会，袁世凯、段祺瑞加快了对国民党势力进行扫荡的步伐。6月间，袁世凯以反对借款、不服中央为名，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赣督、胡汉民粤督、柏文蔚皖督之职。

国民党被“逼上梁山”，终于不得不举起反旗。7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奉命由上海转回江西，在湖口宣布起义，组织讨袁军。自江西独立后，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上海等地也先后响应独立，“二次革命”由此而起。

袁世凯闻报立即发布“讨伐令”。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兼代理总理，或派兵，或直接指挥“清剿”，鞍前马后，忙得不亦乐乎。

在北京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讨袁之役一上来就出现极度被动的局面。不到两个月，独立各省全都一败涂地，国民党在南方的地盘尽失，孙中山、黄兴也作为“乱党”头目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打败国民党之后，袁世凯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在10月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获胜。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有资格参加选举的议员须有三分之二出席投票，而获胜者得票数应达到四分之三。当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至少有三百五六十人，这可都是一些坚决不买袁世凯账的主。

选举法规定，一轮投票达不到法定数，还可以再投第二轮。两轮投票都无人当选的，以第二轮投票中得票数最多的前两名进行第三轮决选，过半数者获胜。

第一轮投票就当选，连袁世凯自己都没有把握，他只能寄望于第二轮和第三轮，但一轮投票约需四个小时，三轮共需十二小时，一天是办不了的，至少得两天或三天。遇到这种延会的情况，国民党人就很可能会以不出席进行抵制，从而使得选举一再延期。

面对这些坐而论道的国民党人，袁世凯及其幕僚必然会有一种有力也无处使的感觉——“乱党”可以直接“剿灭”或通缉，国会议员却有国家法律作为后盾和保障，轻易触碰不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手无寸铁的议员其实也并不比国民党都督们更好对付。

选举延期，不仅意味着夜长梦多，也会让袁世凯的脸面受损，影响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和权威，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袁派为此绞尽了脑汁。

逼选

作为新生事物，民初的选举制产生了不少滑稽可笑的奇闻逸事。当时中央政府无人口册籍清册可查，就采用自下而上造报的方法选举议员。按照这个办法，选民愈多，产生的议员就愈多。

浙江太平县（今温岭市）在选举时，觉得人数不够，有人就脑洞大开，提议由选举工作人员回去把自家的宗谱翻出来照抄。这样一来，那些死去的人也同活人一样成了选民，结果太平县的选民之多在全国各县中跃居第一，其议员数竟和云贵两省之和相等。

袁派人马用太平县式的思维对选举进行研究，最后终于想出了“逼选”的办法。

1913年10月6日，国会在众议院会场举行选举。国民党议员在京者全部出席，进步党人及各小党派也踊跃参加。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各不相同，前者大多是想反袁，后者大多是想拥袁。

当天统计到会选举人超过了应出席者的三分之二，但在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后，不出所料，袁世凯所得票数仅仅过半，距法定票额相差太远。

此时已近中午，吃饭休息时间到了，可是议员们却发现会场已被军警装扮成的“公民团”重重包围，所有人许进不许出。议员偶跨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议员们这下惨了。烟瘾大的没法出去抽烟，在会场内被憋得眼泪直流。烟没得抽倒也罢了，肚子总不能饿着吧，可是又不让出去吃饭。进步党本部闻讯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公民”不许他们入门，经解

释是亲袁议员所用，才准予放行。国民党本部依例而行，但“公民”一听说是国民党的，不仅不放行，还破口大骂，说：“饿死也是活该！”

第二轮投票，袁世凯的票数虽然多了些，但还是不到法定票数。这样就得进入第三轮投票，即从得票数较多的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中二选一。

第二轮计票时已经薄暮，可是会场外仍被包围着，显见得是“不交考卷就不许出考场”的架势，于是只好马上进行决选。在这次投票中，十之八九都挨饿的国民党议员基本都选了黎元洪——本来他们也不想选黎元洪，可若选袁世凯以外的其他人的话，就要按废票论，而废票是不起作用的。

限制被选人之后，票数相对集中。统计第三轮计票结果，袁世凯得票数总算过半。主持选举会的主席大声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宣布时，台下掌声稀稀拉拉，原因是国民党议员不肯鼓掌，进步党和其他小党的议员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

虽然如愿当了总统，但袁世凯并不高兴，认为国民党让他下不来台，而进步党又太无能，尤其是在不得不进入决选时，居然让他和黎元洪并列，实在是贬低了他的身价。

所有这些抱怨最后都会被归结到对共和制度的不满上来。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后的第二个“双十节”，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典礼的第一个程序是读誓词，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有人离袁世凯的座位非常近，侧耳静听，袁世凯先高声读了一个字“余”，继而读“誓以至诚”，声音却微弱到了几乎听不到的程度，接

着再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调门恢复至洪亮有力。到了“谨誓”，重又变得低沉起来。

言为心声，不诚无物，袁世凯读誓词时声音的忽高忽低，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真正感兴趣的其实只是“执行大总统之职务”以及由此所享受到的权力。

下午，为庆祝总统就职，袁世凯下令北洋军举行阅兵仪式。已卸去代总理职务的段祺瑞以陆军总长身份担任阅兵总指挥。在袁世凯阅兵的时候，他始终陪同其后，亦步亦趋。

因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有“功”，段祺瑞被封一等勋位，此次担任阅兵总指挥，更标志着他的声望和政治优势全面超越“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冯国璋，真正成为北洋系中排名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

有评论说，这时的段祺瑞已被袁世凯倚为“干城肱股”。在袁世凯正式就职总统初期，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当时凡袁世凯碰到有关大局之事或难以处理的问题，一般都会安排段祺瑞亲自出马。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最不放心的人，已不再是流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而变成了湖北的黎元洪。黎元洪为人处事一向唯唯诺诺，对袁世凯也从没有表现出什么“不臣之心”，但湖北地处要冲，战略位置显要，黎元洪身上又有着“开国元勋”的光环，一旦有了异志，登高一呼，其后果实难预测。

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二次革命”初起时，黎元洪就曾通电劝告国民党息兵，并有“元洪誓以铁血担保共和”之语。虽然立场仍是

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与袁世凯、段祺瑞坚决予以武力镇压的态度毕竟还是有所不同，这也导致有些国民党人对黎元洪尚存好感。

再退一步说，就算黎元洪本人能够一直安分下去，也难保别人不借他的声望来反袁。总统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之后到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一次投票即当选，全场一致鼓掌，掌声比袁世凯当选那天晚上不知响亮了多少倍。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国民党人的功劳，而国民党人这样做，目的无非是要给袁世凯难堪。

经过一番暗中运作，袁世凯决定以迎黎北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办法也得到了黎元洪的配合——自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虽然位高名显，但一直受部下挟制，所以也有急于脱离湖北的愿望和想法。

黎元洪是湖北地方可以利用的一块金字招牌，倘若迎黎北上的消息被提前泄露给当地军政界，就很难轻易脱身，同时黎元洪一旦离开，湖北也必然会出现人心动荡的情况。这都是让袁世凯感到棘手的地方，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派段祺瑞到南方进行具体操作。

裂痕

1913年12月8日，段祺瑞南下武汉拜访黎元洪，之后宣布北归，黎元洪过江送行。到火车站后，段祺瑞下车，黎元洪则留在车上并就此乘车北上。

整个计划天衣无缝，而且事先被高度保密，仅段、黎及一两个高级幕僚知道实情。

送走黎元洪，段祺瑞即奉命暂代黎元洪的湖北都督一职。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署理过湖广总督，现在以中央大员身份兼任地方，自然没人敢说不行。

按照黎元洪临走前留下的计划，段祺瑞对湖北军事进行了整理。由于行动周密，准备充分，一切程序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因黎元洪北上而在短时间内掀起的波澜也迅速归于平静。

不到两个月，已稳住湖北局面的段祺瑞又被袁世凯调回北京，用以对付另一个大患——白朗起义军。

白朗起义是北洋时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自在河南揭竿而起后，以“打富济贫”为口号，应者云集，声势浩大。其影响之广，连南方的国民党都对此引起重视，“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就曾写信给起义领导人白朗，要求配合讨袁。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虽然也可以称之为革命，但起义领导人的政治诉求基本都局限于“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而且起义本身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强的破坏性。据记载，白朗军在占领洮州后，城中所有房屋大半被付之一炬，葬身火海者不计其数。老百姓在争相出逃的过程中互相践踏，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白朗军也因此被称为“狼匪”，领导者白朗更被称为“白狼”，可见其在时人眼中，行为几与土匪无异。

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调动军队对白朗军进行过多方“追剿”，但白朗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三年间经略中原，征战千里，破城四十余座，夺关隘无数，引得朝野上下一片惊恐。

负责“追剿”白朗军的主将是河南都督张镇芳。张镇芳在清末考中过解元（即举人第一名），读书应试是一把好手，唯不知兵，用袁世凯的话来评价，乃“一介书生”。在他的指挥下，许多参加“追剿”的北洋正规军都受到了很大损失，甚至还有全军覆灭的。

由于张镇芳“剿”办不力，袁世凯决定免去他的职务，由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全权指挥对白朗军的“围剿”。

1914年2月，段祺瑞赶到河南信阳，召开鄂豫皖三省剿办会议，并在会上制定了“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作战方略。

白朗军和历来的农民起义军一样，都具有作战灵活机动的特点，一旦散开，官军根本就抓不住。冯玉祥也参加过对白朗军的“围剿”，他回忆那时经常从上司那里接到十万火急的电报，一会儿说白朗军到了这里，一会儿又说到了那里，弄得他疲于奔命，乃至于都不知道对方是“打哪里窜走的”。

段祺瑞取“合围聚歼”之策，是吸收了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经验。同时，陆军总长的身份，也使得他在调兵遣将上运用裕如——陆军部前后共抽调了北洋正规军和三省地方军数万人，已足以形成合围之势。

由于袁世凯担心陆军总长一直在外，反而会让各国驻华公使对白朗军更加重视，从而影响他及北洋政府的声誉，所以在段祺瑞尚未完成“围剿”目标之时，就将他调回北京。虽然段祺瑞没能亲手消灭白朗军，但他所主导的各省“会剿”还是把白朗军逼入了不归路。几个月后，白朗中弹身亡，白朗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就在段祺瑞不辞辛劳，替袁世凯鞍前马后东征西讨的时候，二人之间的裂痕却在不断扩大。

袁、段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二次革命”前，按照制度设定，国家军事大权本应由陆军部和参谋部分掌。可参谋部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空壳，以至于袁世凯想让黄兴当参谋总长黄兴都不愿干，最后只得由当时尚在武汉的黎元洪遥领。参谋部的具体事务由参谋次长负责，实际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更谈不上对陆军部进行牵制。

袁世凯为此在总统府设立了军事处，规定军机要务须由陆军部、参谋部提出处理方案，呈请总统批示执行，具体怎么执行，由军事处研议。

就像民初的国会和政党政治一样，制度听上去都不错，但实际运作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军事处原处长李书城是同盟会会员，毫无权力，甚至于连文件都看不到，到任不久就气得挂冠而去。李书城一走，日常事务便由副处长傅良佐完全负责。

傅良佐也是段祺瑞的幕僚出身，他自然不会对陆军部的事多插手，而段祺瑞也根本就不把军事处放在眼里，有时对袁世凯交代要办的事都爱理不理。

由于缺少制约，军事大权中的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军官的任免，一直被陆军部所掌握。对军官的进退，段祺瑞往往不请示袁世凯就直接下达命令，在他所提拔的军官中，又有很多是门生旧部。段祺瑞与这些军官函电往来，广泛联系，外人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已隐然形成一个派系，其势头犹如当年袁世凯与北洋系。

后来段祺瑞所谓的皖系当时实际并未形成，但袁世凯还是感到非常不安，他对段祺瑞的猜忌也开始一步步加深。

第三章　怎么能是一回事

蒋方震，字百里，国人一般都以字相称。蒋百里先留学日本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士官学校，后又赴德国学习军事，是民初公认的第一流兵学家。袁世凯对他很器重，当时袁世凯正打算对保定军校进行改造，从而培养出一批能够牵制“段派”的新生力量，于是便任命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

保定军校直属陆军部管辖，但袁世凯在发布这一任命时根本就没跟陆军部打招呼，段祺瑞对此当然不会高兴。这使得蒋百里一上任就碰到了硬对头——时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的魏宗瀚。

魏宗瀚是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见蒋百里为段祺瑞所不喜，他便在保定军校的用人、经费、学校规划等方面处处刁难。

蒋百里对日本的军事水平评价不高，他更认可的是德国军事。按照德国军事教育的模式，蒋百里决定对学校进行扩建。在与陆军部多次协商，并以为对方已同意之后，他将精心制订的扩建计划送交军学司批准，不料却被魏宗瀚搁置不理。蒋百里前去催问，魏宗瀚索性将计划完全推翻了。

送交计划之前，蒋百里已在校内多次组织开会讨论，还曾向学生透露过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现在弄得一事无成，不由羞愤交加。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他当着师生们的面，宣布计划因受到阻挠而无法施行，然后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哪还有不行的

蒋百里有一个少年侍卫，十六七岁即跟随其左右，对蒋百里的行为特点很了解。他从未见到过蒋百里如此悲愤，又看到对方伸手摸腰际，预感到情形不对，就做好了冲上讲台的准备。

及至蒋百里真的拔出手枪，这名侍卫不顾一切地奔上讲台，拼尽全力把蒋百里握枪的右手往外拉。经这么一拉扯，子弹偏离了方向，没有危及心脏。

蒋百里在住院养伤期间，痛斥魏宗瀚："我从此认识了这一班狐群狗党的下流军人！"他所受的打击出于段祺瑞的陆军部，魏宗瀚又是段的亲信，因此后来不管段祺瑞及其皖系多么炙手可热，蒋百里始终未再与其有过任何关联。

蒋百里自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虽然表面看来它仅仅是蒋百里和魏宗瀚的冲突，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袁世凯和段祺瑞发生矛盾的结果，并显示出他们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

尽管如此，在自己立足未稳、尚须借重段祺瑞的情况下，袁世凯暂时仍无法采取过激措施。对这些磕磕绊绊的事，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

袁世凯在等待着时机。当选正式总统后，他挟军事优势，一步步巩固着自己的政治地位。1913年年底，国民党议员与李烈钧的数十封往来密电被军警查获，袁世凯以此为由，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

国民党议员超过国会议员半数以上，因不足法定人数，国会只好关闭。袁世凯趁势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全部资遣回籍。

1914年5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公布了由袁世凯授意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临时约法”被取而代之。新“约法”由于制定于民国三年，故又称“民三约法”。按照“民三约法”的规定，总统府内的政事堂替代了内阁，政事堂的国务卿也成了总统的办事人员。

在一手包揽全部行政大权后，袁世凯感到收回军事大权的时机业已成熟。他决定在原总统府军事处的基础上，建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与军事处不同，统率办事处由袁世凯本人亲自掌握，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三部总长都成了袁世凯的高级办事员，实行轮流值班，大事唯袁世凯一人定夺。

统率办事处存在的目的，表面是统筹军事，其实就是要削夺陆军部之权，段祺瑞怎能看不出来。他对此非常恼火，明抗不行，就进行消极抵制。在袁世凯召集众人开会，商讨统率办事处成立事宜时，段祺瑞总是紧绷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蒋百里伤势痊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统率办事处参议，段祺瑞就指示陆军部不发委任状。这时王士珍在袁世凯的再三邀请下重新出山，袁世凯提议让王士珍担任统率办事处座办，也就是主持常务，为此他特地征询段祺瑞的意见：“芝泉，你看这事行不行？”

“行，总统要办的事哪还有不行的。”段祺瑞没好气地回答道。

统率办事处成立不久，袁世凯又授命成立军需处。陆军部、海军部本来都有自己的军需司，成立军需处显然也是针对段祺瑞的陆军部而来的。这一部门直接对袁世凯负责，大到购买军火、军队扩编费用，小到特别费用，处处插手，与陆军部不断产生摩擦。

段祺瑞素性刚愎，极有主见，发现自己的用人权和军需调配权都受到严格制约，马上就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向袁世凯提了个建议，说以后关于军官的任免，不如这样：旅长以上的，由总统主持，团长以下的，才交陆军部办理。

陆军部当然不可能只管团长以下的军官，段祺瑞只不过以此来大发牢骚罢了。袁世凯知道段祺瑞不满意，便又任命他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以此表示对他功劳的肯定以及继续借重之意。

这种哄小孩儿的招数并没有真正起到效果，段祺瑞仍旧开心不起来。他除了常常借故不参加办事处的会议外，也基本不到陆军部上班。

“二次革命”后，国务院各部增设次长一人，徐树铮已升为陆军部次长。虽然有了两个次长，但徐树铮依旧事事不与另外一个次长蒋作宾商量，就自己决定了，蒋作宾只剩下被动署名的份儿。

很多时候，徐树铮还做着总长的主。他以陆军总长名义发给各省督军和各师师长的电报信件，不必经段祺瑞批阅即可发出，事后只需口头向段祺瑞报告一下。

都是替对方做主，不同的是，蒋作宾很不高兴，而段祺瑞非常乐意。

有徐树铮在部里主持，段祺瑞上不上班都无所谓，他对徐树铮说："我这总长当得已无意义，今后部里的事务均由你代行吧！"

下马威

袁世凯很快就感受到了段祺瑞这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当时冯国璋担任江苏都督，久驻南京，渐渐地对他也不太服从了。袁世凯对此很生气，他对袁克定说："咱们这北洋还成什么样子？华甫（冯国璋的字）每天要睡到十二点以后才起床，芝泉老不到部！"

段祺瑞的夫人张佩蘅为袁世凯义女，又从小在袁家长大，视袁家为娘家，所以袁克定平时也常到段公馆去，并称段祺瑞为姐夫或大哥。袁克定评论起他这位姐夫来也毫不客气，说："姐夫人不到部，可他的灵魂徐树铮天天在部里啊！"

段祺瑞疏于理事，某种程度上倒正中袁世凯下怀。然而正如袁克定所言，有徐树铮在部里，就等于段祺瑞在部里，同时段祺瑞不上班，分明就是要给他脸色看。

袁世凯决意给段祺瑞敲敲警钟。他把段祺瑞召到总统府，针对一件公事查问道："芝泉，此事是否可以再商量？"

段祺瑞不明就里，随口回答："此事容我回部里查明再来禀报。"

袁世凯一听，满脸不痛快地把文件递了过去："怎么还要查明，你签字的呈文不是已经送来了吗？"

文件是徐树铮代办代签的，段祺瑞连看也没看过。他十分尴尬，只得支吾着说：“我带回去复议一下。”

事后，段祺瑞明白是袁世凯故意使的下马威，负气之余继续我行我素，而袁世凯对他的猜忌之心也进一步加深。

蒋百里伤愈复出后一直留在总统府上班。他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条陈，认为北洋军队暮气太重，应另行编练，因而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模范师以德国军事方法进行训练，先练两个师。

虽然北洋军曾是自己打江山的主要依靠力量，但蒋百里有关于北洋军暮气太重的认识还是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同。别的不说，仅在最近的“围剿”白朗军一役中，北洋军就洋相百出——白朗军不过几千人，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乌合之众，而北洋军先后调动了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械齐饷足，悬赏超越常规，但在近两年时间里，白朗军仍能纵横于豫鄂陕甘四省之间，如入无人之境。

冯玉祥的一个记述可以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冯部两个营截击白朗军，一仗下来，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战场上中弹而亡的白朗军官兵却连二百人都不到！

最后，在段祺瑞的统一指挥下，北洋军才最终消灭了“白狼”，但知晓内情的兵家已经发出了“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的慨叹。

要消除北洋军的暮气，最好的办法就是重起炉灶，编练新军。过去淮军继湘军，小站继淮军，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子。不过从小站练兵起，为了建立北洋派系，政策上都是重用武备生，压制士官生，并由此形成了北洋历来的用人传统。如今要形成新势力，就不得不反其道

而行之，这就是蒋百里条陈中所说的：中级军官用士官生，下级军官用武备生。

蒋百里的条陈也得到了袁克定的欣赏和极力赞同。这位袁家大公子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崇拜德国，蒋百里重视德国军事的思想正好与之合拍。

有袁克定在耳边吹风，袁世凯对建立模范新军的兴趣更加浓厚，但是他认为蒋百里最初设计的规模太大，不容易操作。

要建立两个师，已经抵得上一个军了，这免不了会使北洋旧将不安，从而生出事端。当初蒋百里与魏宗瀚发生冲突，扩校不成，愤而自戕，即为前车之鉴。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对蒋百里的方案做了修改，建军规模最后被缩小到一个团。模范团名为一团，实际已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具体组建方案是，从北洋现部队中抽调下级军官充当团的士兵，以中上级军官及武备生充任团的下级军官，以士官生充任团的中级军官。

袁世凯计划分五期训练模范团，每半年为一期。一期结束，该期官兵即被全部派到各普通师充当高一级军官。按每期产生四个旅的军官计算，五期可培养出十个师的中高级军官，已足以实现对原北洋军的控制。

模范团前景广阔，所以眼前的规模暂时小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就是由谁来当团长，袁克定紧紧盯住了这个位置。

前清时，袁克定曾在农工商部任职，后来民国建立，未再担任过正式官职。袁克定与其父相似，在仕途上很有野心，且一直参与袁幕

运作，从颠覆清室到袁世凯因不肯南下就职而制造北京兵变，背后都有他的谋划。

袁克定跟随父亲的时间不算短，与北洋将领皆有交情，凡袁世凯的部属，都称他为“大爷”，但是“大爷”还是无法指挥段祺瑞、冯国璋这些老资格的北洋宿将。长久以来，他一直想步小站练兵的后尘，像德国皇太子那样掌握一支德式新军，成立陆军模范团为他提供了这一契机。

作为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子承父业的意识在袁世凯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对段祺瑞都已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他当然也只会属意于袁克定。于是，在开会商议成立模范团时，他便当众提出让袁克定当第一期模范团团长。

并非心里话

“把鼻子气歪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拿来打比方的一个俗语。这句话如果套用到段祺瑞身上，就不是打比方，而是事实——段祺瑞生气的时候，鼻子真的会歪到一边！

段府家人都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背地里称呼段祺瑞“歪鼻子”，有时候还不明说，只用手指一指鼻子，就是讲他了。

段祺瑞第一次被袁世凯给气歪了鼻子，就在听到袁世凯要让自己儿子当模范团团长的时候。他当即提出异议：“芸台（袁克定的字）没带过兵，难以服众，我看不行吧。”

袁世凯自决定建立模范团以来，每次开筹备会都请段祺瑞参加，可是段祺瑞总是找理由不到会，就是来了也一言不发，弄得大家都很紧张。现在好不容易开了金口，却又是唱的对台戏，这岂不让人来火？袁世凯一反常态，大声问段祺瑞："那你看我行不行呢？"

段祺瑞一时无言以对，只是鼻子更歪了。

第一期陆军模范团成立，袁世凯自兼团长，袁克定等人为办事员。到第二期，他就不再征求段祺瑞的意见，直接让袁克定当了团长。

关于模范团的争执加深了袁、段之间的裂痕，不过他们真正决裂则是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在袁世凯解散国法，制定"民三约法"后，社会上复辟帝制的风声越来越大，段祺瑞对此深感忧虑。

1914年年底，段祺瑞鼓起勇气，到总统府面见袁世凯，以试探对方的心思。袁世凯矢口否认自己要复辟帝制，说你不要听信这些无稽的谣言。段祺瑞听了这才稍稍有些放心。

袁世凯所言并非心里话。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他起初未必一定就有做皇帝的野心，特别是忙于励精图治、剪除异己的时候，那时他所追求的目标应该还只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

袁世凯在内政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绩。辛亥革命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都督们各拥实力，俨然藩镇，形同割据。袁世凯利用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依次削平，除西南诸省外，地方统治权都被收归中央。

民国初建之时，北京政府既无税款可收，地方收入更无人上缴，除靠零星借贷维持现状外，可以说是一无办法。后来有了第一笔善后

借款，财政经济状况才得以缓解，但那本身是个饮鸩止渴的办法，全部借款扣去还款和所有指定用途，最后没剩下多少钱。

如果没有稳定的后续财政收入，连政府机关都难以维持，同时社会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和影响。于是在收回地方统治权的基础上，袁世凯又于各省设国税厅，将全国财政归于统一，从而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了很大增长。

袁时代的另一大政绩是整肃吏治、严惩贪污。他利用特设的肃政厅，向各部院派出许多肃政使，专门检查是否有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情况。前总理赵秉钧有一个心腹叫王治馨，曾先后出任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既是赵秉钧的心腹，自然也就是袁党的人，然而在肃贪风暴中，王治馨也被弹劾贪污，随后被袁世凯下令逮捕，不久即予以枪决。

其实王治馨在任上才受贿五百元，区区之数，本来罪不至死，之所以要处罚得如此严厉，说白了，无非是要借他的人头来立信、立威，并确保其他整肃行动畅通无阻。

袁世凯当政初期，社会经济开始复苏，辛亥革命时期北洋系内部曾经存在的“忠清忠汉”之争和“造反成吗”的怀疑，也都渐渐消失，此时的袁世凯无论权势还是声望都极一时之盛。

在第一次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宴会上，袁世凯曾大饮其酒，显得特别高兴。他由衷地对众人说：“多赖诸君努力，国是得以粗安，继此以进，不难臻于隆盛之治……”

得意之余，袁世凯的心态渐渐出现变化。特别是在完成对“二次革命”的镇压，暂时削除包括国民党、国会在内的大部分外部威胁及牵制

之后，他开始相信“南人不复反，天下莫予毒”，而单单做个总统，已不再让他觉得过瘾了。

缺德

中国人野心的极致，可以用孙猴子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来形容。不妨这么说，在许多老派中国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皇帝，袁世凯的政治理想其实跟他们并无二致。

袁世凯本身是个很迷信的人，既信批八字，也信看风水。有人曾给他批了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而在他的老家河南项城，其家族墓园更被描绘成了一个龙凤呈祥的所在：依其地势，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有一代帝王之相。

对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袁世凯既迷又信。随着个人的不断“成功”，他的自我感觉也在不断向“成龙”方面靠拢。每次遇到事情办得不顺利，他都会理所当然地归咎于制度的毛病，说是“共和”妨碍和束缚了他。

什么叫共和？只有共亡而已！

与此同时，袁世凯周围的许多人对他复辟帝制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袁克定自不消说，天天做梦都想当太子。除了袁克定，袁氏幕府中对帝制逢迎最厉害的是陈宧。

陈宧原为黎元洪的幕僚，后由黎元洪推荐，以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升了官的陈宧发现靠黎不如靠袁，便过河拆桥，转投袁世凯帐下，并很快成为袁幕“智囊”。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和重用，陈宧有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袁世凯找他咨询要政，他通常都会预先准备左中右三策，而且每策都有详细纲领和说明。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采用的一些计策大多来自于陈宧。比如调黎元洪入京，把湖北完全纳入北洋掌握之中，同时借以约束南方新兴势力。又比如逐步收复四川地方政权，使四川成为控制西南的机动重地。其他诸如在国会中离间各党派，收买异己等等诡诈之术，陈宧也献了不少。

陈宧的问题不是无才，而是缺德，也就是缺乏政治道德。在这一点上，他恰恰又是学习了袁世凯过去的做法。

当初袁世凯为了能够取得慈禧的信任，经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晚清笔记中记载，有一次慈禧过生日，封疆大吏们挖空心思，搜珍选异，都想不惜代价地搔到帝国第一权贵的痒处，唯袁世凯没有轻举妄动。

慈禧前去“视察”进贡给她的宝贝，一边看一边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不错不错，到最后她忽然望着墙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沉吟半天都不说话，接着便离开了。

这个镜头被袁世凯完整收录。虽然袁世凯当时并不在慈禧身边，但他却有办法观察到慈禧的一举一动，犹如在宫廷里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说奇怪也不奇怪，太监们收了袁世凯的贿赂，会随时向他透露慈禧的动向，哪怕是一个表情动作的细微变化。

袁世凯实在够聪明，当太监把上述情形透露给他时，他第一时间就抓住了关键点，而且迅速猜出了其中的玄机，随即一拍巴掌，说“得

之矣”——我明白了。

很快，袁世凯就向慈禧送去了礼物，那是几幅装裱得十分精致的名画。慈禧收到画后，乐得合不拢嘴，说“慰亭（袁世凯的字）真懂我啊，我正想着画，他就送来了”。

原来在所有贡品中独缺名画，但这东西又不好直接向大臣们开口索要，故而才有了慈禧望空白墙壁出神的桥段。

与先前收到的那些奇珍异宝相比，这几幅画其实最不值钱，然而它妙就妙在画龙点睛，暗合了老太婆轻易不肯道出的心思，袁某拍马奉迎的功夫可称一流。

清流派出身的张之洞与袁世凯向来不对付，他为此很看不起袁世凯，曾称他是“不学有术”。

这小徐也太狂妄了

正所谓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陈宧师袁世凯之故智，几乎全盘复制了其权术。他整天揣摩幕主的心思，袁世凯喜欢什么就竭力怂恿什么。同时陈宧还收买了袁世凯身边的办事人员，因此对袁世凯的各种私心杂念，一样知之甚详。

陈宧向袁世凯献策，准备好的三策并不是一起拿出来，而是分置三处，其中左策置于左袖，右策置于右袖，中策置于靴筒内。他一观察到袁世凯的意图与某策相符或相近，就把那一策拿出来呈献，也不管那一策是否真的符合袁氏的长远利益。

袁世凯总是能被陈宧挠到痒处，吃惊之余，经常笑着夸赞对方：“二庵（陈宧的号）所见，实获我心。”

陈宧升任四川总督，去袁府向袁世凯辞别时，他忽然一反常态，说：“我马上要走了，有一句真心话不得不讲出来。”

他的“真心话”居然是：“大总统啊，你决不能以个人为重，以国家为轻！”

袁世凯听后一惊，默然。

其实这只是虚晃一枪。有一个段子，说有人如此“批评”领导：“您怎么能这样？您怎么能不顾身体地忘我工作！”陈宧的套路与此类似，而且还加入了极其逼真的动作表演，但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跟着哗哗地流下来，止都止不住。

“共和国体，为举世所诟病，大家都说很糟，糟透了。现在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总统既负天下苍生之重，怎么能牺牲国家利益，以徇那些革命党人之私呢？”

这就是陈宧对领导的“批评”，毫无疑问说得袁世凯心花怒放。

陈宧对袁世凯的心理活动可谓了如指掌。袁世凯在做了总统并且已消灭或驱逐了大部分政敌之后，也许什么都不缺了，缺的就是一个皇帝宝座，一如进贡给慈禧的所有贡品中，还少一幅名画。其间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当事者不能说出来，得由你替他做到。

在陈宧“批评”完后，袁世凯继续保持着沉默。这时陈宧便长跪不起，而且还做出了更恶心的举动——用嘴咬着袁世凯的靴头不肯放，一副忠犬的模样。

袁世凯见状，便说了一句："你跟芸台（袁克定的字）谈一谈吧。"

袁克定平日除了对段祺瑞等老资格的北洋宿将不得不敬外，跟包括陈宧在内的其他人说话，通常都爱理不理。当陈宧奉袁世凯之命前去拜访时，他起初仍旧抬着眉毛，翻着白眼。直到袁世凯派人赶到，宣布了一道口谕："总统有命，请你速与陈宧将军结为兄弟！"

袁克定闻言，马上换了一副嘴脸，与陈宧互换兰谱，称兄道弟，从此双方在帝制活动上结成了联盟。

段祺瑞没有想到，在袁世凯亲口对帝制加以否认的情况下，社会上的帝制活动竟然又加紧了，并且逐渐由暗中转向公开。不得已，他只好再次求见袁世凯。袁世凯嘴上还是不承认自己要复辟帝制，不过其态度神情已明显不如以往那样坚决。

在是否要坚持共和这一问题上，袁、段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段祺瑞虽然一生崇尚强权和铁腕，也配合着袁世凯跟国会唱过反调，但作为"一造共和"的主要参与者，他不可能出尔反尔，转而否定自己的历史。与此同时，站在现实政治需要和袁世凯的角度，他也深知此举有多么危险。

就世界政治趋势而言，各国大多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鲜少由共和制退回君主制的成功例子。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皇室尊荣扫地，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若再行帝制，必将引起人心浮动，有百弊而无一利。

再者，共和乃民国建国之基础，基础变更非同小可。换句话说，你可以从内心上不认同共和，也可以搞事实上的独裁和"终身总统"，

但绝不能干脆取消共和。共和不取消，做什么都是搞政治；一取消就意味着叛国，国人可共讨之。

提到国人共讨之，当时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在国体问题上，革命党人历来寸步不让，虽然他们在“二次革命”中落败，但力量尚存，逃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随时可能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复辟帝制只会给他们制造东山再起的机会。为此，段祺瑞郑重劝告袁世凯：“一隅有变，牵动全局，说不定又要酿成大乱，后果不堪设想！”

段祺瑞两次诚恳进谏，不仅没有能够打动袁世凯，反而让他判明了段祺瑞的真实态度。原本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宿将对帝制不热心、不支持，现在发现自己的担心成为现实，他自然非常失望，同时也盘算着该如何清除眼前的这一障碍。

便捷的办法当然是找个人替代段祺瑞，但是陆军总长的位置如此重要，并不是谁来都行，何况还要保证北洋系不致群起反对，从而与自己离心离德。

等而次之的办法就是架空段祺瑞。统率办事处、军需处虽然分走和限制了陆军部的权力，但离架空还有不小距离，而这时因为段祺瑞经常不上班，陆军中的一切大权又都掌握在徐树铮手中，也就是说若想真正架空段祺瑞，就必须撤换或调走徐树铮。

其实最早欣赏和使用徐树铮的人正是袁世凯，徐树铮也曾在袁府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但是自从知道陆军部事务都由徐树铮大包大揽后，袁氏父子就再也不喜欢他了。

某次，袁克定想在陆军部安插个熟人，于是找到段祺瑞，段祺瑞说已交徐树铮办理，袁克定便让这位熟人去找徐树铮查问。

徐树铮正在开会，要那人等几天再来。几天后，此人又到陆军部求见，徐树铮说：“你去查查批文吧。”

那人欢欢喜喜地跑去一查，只见徐树铮的批示上写着：“查本部已无空缺，批驳，验过。”

袁克定大失脸面，袁世凯知道后也非常不快，说：“芝泉怎么会用徐树铮这种人！这小徐也太狂妄了！”

袁克定顺势建议：“除掉小徐，芝泉就少了臂膀。”

袁世凯点了点头。不久他就把段祺瑞召至总统府，特意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芝泉啊，我想给小徐换个位置，让他到参谋部去，你看如何？”

段祺瑞一听，就像夺了他的心肝宝贝一般，立即大声顶撞道：“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吧！”言下之意，就是只要让他当陆军总长一天，徐树铮就无论如何动不得。

袁世凯没料到段祺瑞居然会如此顶撞自己，顿时就火了，他大声喊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段祺瑞歪着鼻子不吱声。袁世凯一看他这样子，只好以一句“从长计议”把场面敷衍了过去。

忧心如焚

进入1915年，袁、段在对外政策上也开始出现严重分歧。1915年2月，日本趁欧美国家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之际，通过出兵方式，夺

取了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紧接着，又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该条约共分为五号二十一个条款，所以被称为“二十一条”。有评论认为，如果中国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条”，就会成为亚洲的第二个印度，即日本的保护国；但要是拒不接受，日本也会以此为由大举侵华，而且同样可以把中国逼到亡国的边缘。

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人成长的时代，虽然新旧理念已处于交替之中，但社会思潮的主流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段祺瑞为例，在他所就读的武备学堂，熟读经史以“感发忠义之心”，仍是学堂的根本宗旨，熟读并背诵经史，乃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中学”和经史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发扬民族气节息息相关。长期处于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之中，使得段祺瑞等人在骨子里普遍有一种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怀。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军进攻威海卫，刚刚学成归国不久的段祺瑞就曾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督率学生协守炮台”。

得到“二十一条”的相关消息后，段祺瑞立即以陆军总长的名义，领衔十九省将军致电政府，表示坚决反对签约，为此不惜与日本决战。在电文中，他慷慨陈词：“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

然而袁世凯则有不一样的考虑。此时距离中日甲午战争不过才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又得到了较大提升，它能够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就是一个明证。

与日本相比，中国这二十年却过于曲折，不但未怎么前进，大多数时候还在后退，尤其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已经是元气大伤。辛亥革命后，总算有了一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气象，可是若论国家实力对比，恐怕还不及甲午那时候呢。在这种条件下与日本硬碰硬，确实非常困难。

袁世凯是甲午战争的亲历者，北洋政府成立后，还特地聘请了日本人坂西利八郎做自己的军事顾问，当然比别人更清楚中日军事水平的实际差距。发现“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他只能在政治策略上动足脑筋，即一面让外交部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一面暗中向报界泄露条约的部分内容，以期让英美对日本施压。

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被证明并非完全无效。在“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里，规定了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经济、军事顾问，以及中日合办警察、兵工厂等。所有条款里面，以它对中国的危害最大，袁世凯称之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因此以今后再行协商为由坚决予以拒绝。迫于多方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删去此条款。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对“二十一条”做出答复，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随后日本摆出大战的姿态，陆军纷纷出动至奉天、山东，海军舰队驶进福州、厦门、吴淞、大沽口等处。

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在总统府讨论此事。袁世凯认为既已取消第五号条款，其他条款不是亡国条件，在万得不已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接受。大多数与会要员也都主张接受日方要求，唯有段祺瑞独持异议，他重申要动员军队，对日本示以强硬态度。

5月9日晚上11点，在英美驻华公使都劝告中国“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这就是后来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该条约使得日本在中国满蒙、山东的利益得到巩固和扩展，但对比原案，损失已降到最低程度。

无端次长萧萧下

“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发誓要带领国民奋发图强，以便有一天能够与日本“抬头相见”。在他授意下撰写的《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五万册，他当时咬牙切齿地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可是袁世凯刚刚说完狠话，转过头去做的，却不是如何抓紧时间富国强兵，而是如何更快更无阻碍地坐上龙椅。

复辟浪潮不落反涨，段祺瑞为此忧心如焚，他决定再次面谒袁世凯。徐树铮知道后，认为袁世凯对帝制已经走火入魔，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段祺瑞再去劝说，不但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还会进一步招致袁世凯的忌恨。

段祺瑞也清楚若进谒无效，自己的处境将更为不利，但他认为个人进退得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尤其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自取灭亡而不顾。

恰在此时，袁世凯派人来段公馆，劝段祺瑞不要跟他顶着干，以便消除双方的不愉快。段祺瑞说，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搞帝制实在不得人心。

说客不以为然：“总统也好，皇帝也罢，不都是一回事吗？”

“怎么能是一回事！”段祺瑞顿时认真起来，声调也提高了。

说客见段祺瑞一脸严肃，赶紧说：“芝泉，老头子做了皇帝，对你我有什么不好？”

“我不是为个人计较，”段祺瑞忍不住直抒胸臆，“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说客被说得满脸通红，匆匆起身告辞而去。

第三次按约定时间见到袁世凯，段祺瑞不再像前两次那样有所保留，他不顾一切地向对方陈述利害，说明复辟帝制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

袁世凯的表情开始很紧张，继而又恼羞成怒，他厉声回答段祺瑞：“这是芸台（袁克定的字）和杨度等讨论的问题，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地重视呢？”

段祺瑞也变得更加激动，他站起来大声说：“祺瑞受总统数十年的知遇之恩，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将悔之晚矣！”

忠言逆于耳，袁世凯对这位昔日的“干城肱股”早已不耐烦了，拿来跟陈宧一比，更是觉得段祺瑞面目可憎。他没有再正面回答段祺瑞的问题，只以关心的口吻说道：“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

见袁世凯下了逐客令，没法再谈，段祺瑞只得留下一句“总统好自为之吧”，然后离开了总统府。

袁世凯憎厌段祺瑞，也有他那帝制班子的一份“功劳”，这些人都巴不得段祺瑞早点消失——北洋老将之中，袁克定最忌的就是段祺瑞，因为段祺瑞对他向来都毫不敷衍，能给冷脸就决不给笑脸，特别是一闹帝制，二人更是势同水火，完全敌对。除了袁克定，在陈宧等人眼中，段祺瑞也从来都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自然也不会在袁世凯面前说段祺瑞多少好话。

看到段祺瑞屡次进谏，袁克定唯恐帝制活动受其影响，忙不迭地在外面放风，说中国之所以要向日本屈服，缘于陆军不能作战，而陆军不能作战，又缘于陆军部无人负责，总长在其位不谋其政。

从小站练兵起，段祺瑞就与袁克定熟识，对其也很照顾，他想不到袁克定会这样大泼自己的脏水，把“民四条约”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不由气愤至极，大骂袁克定忘恩负义。

这时徐树铮以陆军部的名义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呈文，想请示给陆军部部员加薪。本来是正常的请示，但袁世凯正对段祺瑞怀恨在心，不仅予以退回，还在呈文上亲批了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以徐树铮极强的个性，哪里能忍受这个！他马上直奔段公馆，把批文交给段祺瑞：“说咱们没人心，这是骂我，还是骂总长呢？”

联想到近期来袁世凯曾托人稍话，告诉他要多加休息，注意身体，段祺瑞意识到袁世凯对自己成见已深，所谓休息云云，不过是要他自动辞职挪位子而已。悲愤之下，他长叹一声，对徐树铮说：“算啦，不干了！”

5月31日，段祺瑞向袁世凯称病辞职，而后不待批准，就到西山去了。

袁世凯巴不得段祺瑞早点在面前消失，但段祺瑞真的辞职了，他又不得不惺惺作态，假意挽留。对段祺瑞的辞职呈文，他没有立即予以批准，而是特批了两个月病假，同时还赠送了人参和医药费。

段祺瑞请辞的当天，袁世凯即命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王士珍并不想干，但吃不消袁世凯一再坚持，只得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陆军部，徐树铮的饭碗自然也难保。很快，肃政厅就对他进行了弹劾。

徐树铮被抓到的“小辫子”是浮报军火。有一年由徐树铮经手，从美国购买了一套兵工制造设备，全部价值九十三万美元，美商付给徐树铮百分之三的经手佣金。当时美元一元合中国银元三元三毛，算下来，徐树铮可得佣金九万余元，但他一毛也没往自己兜里揣，而是直接请示了段祺瑞和袁世凯。

袁世凯批复说既是美商规定的佣金，可以收受，如果觉得数额过大，不便私有，不妨拿去办教育事业。徐树铮听从其言，果真用这笔资金在北京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家报馆。

袁世凯厌恶徐树铮的是“跋扈揽权”，是他作为段祺瑞智囊和灵魂的身份，可是仅此无法为其定罪，于是就把这件往事搬出来，说徐树铮在订购军火时浮报了四十万元。

1915年6月，袁世凯下达命令，以涉及受贿、存在弊端等为由，把包括徐树铮在内的三位次长（交通部次长、财政部次长、陆军部次长）一起予以罢免，时称“三次长参案”。

此时袁世凯已将各省督军改为将军。各省将军奉召入京开会，时间上正好跟罢免案撞在一起。日本驻京公使馆的一家报纸就此登了首打油诗，讽之为“无端次长萧萧下，不尽将军滚滚来”。

不要听信谣言

就在帝制流言满天飞的时候，冯国璋也为此事来到了北京。

北洋将领之中，冯国璋对清室应该算是最有感情的。直到民国建立后，冯府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仍挂着红顶花翎的官帽，为了避免沾染上尘土，他还特地拿一块紫色的“帽袱子”盖在了官帽上，甚至于冯国璋的辫子也是在大半年后才剪掉的。

清帝逊位前，袁世凯特别召集了一次会议，冯国璋也勉强与会。会上，袁世凯宣布皇帝将要逊位，国家将改为共和体制。冯国璋当时就问道：“逊位逊给谁？”袁世凯回答：“逊给国民。”他听了顿时无话可说。

会议结束回家后，冯国璋把几个儿子都叫到自己的卧室，神情异常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逊位逊给某某人的话，我连那个人一块儿

打。”

这个“某某人”指的就是袁世凯。换句话说，对于共和，冯国璋可以接受，或者说不得不接受，但要是袁世凯想把清朝皇帝推翻了自己做皇帝，他会不惜与之翻脸。

实际上，那时冯国璋掌握着禁卫军。禁卫军内除步兵一标的兵员是汉族外，其余不是满族就是蒙古族，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拥护清廷的。如果不是冯国璋进行了有效控制，禁卫军一闹起来，北京势必大乱，而在清帝逊位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前，袁世凯最为担心的也正是禁卫军方面是否会有异动。

一晃三年过去了，“逊给国民”言犹在耳，难道袁世凯还会自食其言？冯国璋不相信。为此，他让津浦路局挂了一节“花车”（指有豪华装饰的高级铁路火车车厢），决定到北京去探个究竟。

随冯国璋北上的，除其随从外，还有被冯国璋称为学问和文笔一时无两的梁启超。路上，梁启超又提到了那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袁世凯会不会做皇帝?

冯国璋立即答道：“芸台（袁克定的字）他们为了享受将来一套长久的富贵，或者会有这样的谋划。要说项城（指袁世凯）本人也愿意这样做，据我看，他绝不至于这么笨。”

接着，他还用很自信的语气对梁启超说：“以我和项城向来的交情，我可以问得出来。”

到京的第二天下午，冯国璋便去总统府谒见袁世凯。见面以后，袁世凯问他来京有什么事。冯国璋说好久不见，自己一方面来“看看总

统”；另外一方面是听到外面有一些关于帝制的“谣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袁世凯似乎很感慨地反问道：“像这样的谣言，别人能够相信，你我是多年的老兄弟了，难道你也相信吗？”

说到这里，袁世凯居然落下泪来：“像你这样的老兄弟也相信这个谣言，我觉得很难过。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算做皇帝能有几年？而且要知道，帝制的事，为的是长久，为的是传后。我这几个儿子，哪一个够得上做皇帝的材料？”

袁克定因骑马摔伤，就医治愈后成了瘸子。按照袁世凯的说法，袁克定仅仅形象上就过不了关，老二袁克文虽然四肢健全，却又放荡不羁，风流浪子一个，更难以服众。

临别时，袁世凯又郑重地嘱咐冯国璋：“不要听信谣言。”

冯国璋信以为真，回去后就对随从们说：“项城（指袁世凯）的心事到底被我问出来了。他是决不做皇帝的。”

冯国璋不会想到，他前脚一走，袁世凯后脚就连声说：“冯华甫（冯国璋的字）岂有此理！”

在“北洋三杰”中，段祺瑞对袁世凯最为忠心，王士珍居中，冯国璋表面捧袁，实际上始终心存清廷。对冯国璋这种敷衍的态度，袁世凯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但冯以江苏督军坐镇南京，其作用和影响力并不比当年在京师执掌禁卫军差多少，这又使得他对冯国璋始终存有三分畏惧，自然就不敢在帝制问题上跟对方讲真话了。

其实，袁世凯说的那些他不会当皇帝的理由，恰恰正是他想当皇帝的理由：袁家祖上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就算这样，能过两年皇帝瘾也是好的啊！何况这也是蒙别人的，袁世凯那时可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活不过六十岁；袁克定早就被袁世凯定为事业的继承人了，要不怎么会让他参与军政要务，又苦心积虑地将其推上陆军模范团团长的位置?

袁克定很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本人一直是帝制活动的主要幕后主持者，当时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反对帝制，袁世凯听闻后，经常把报纸要去阅读，袁克定为此不惜派人每天印制假的《顺天时报》供其“御览”，用假消息、假报告来欺骗其父。

就在段祺瑞退居西山、冯国璋进京探问的时候，袁府早就是一派“皇室气象”了。袁克定以皇储自居，号“青宫储贰”，外界则戏称他为“克宗定皇帝”。就连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的袁克文，也有人帮他刻藏书印章，曰“皇二子”，篆文中的“皇二”与“皇皇”类似，所以外界戏称袁克文为“皇皇子”。

暗杀

冯国璋离京前，特地到西山看望段祺瑞。当他谈及袁世凯无意称帝时，段祺瑞苦笑着连连摇头。

冯国璋便试探着问他：“万一老头子真的称起皇帝，我是说万一，芝泉将如何处理？”

“我不赞成帝制，但要我与项城对着干，也做不到。”段祺瑞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心境，“我不想让人骂我段某忘恩负义。项城倘若一

意孤行，我只有解甲归田。”

段祺瑞自西山养病起便闭门谢客，什么人也不见，仅仅和前往探望他的冯国璋、王士珍等人谈过话。

“北洋三杰”不仅是武备同学，还是结义兄弟，其中冯国璋居长，王士珍次之，段祺瑞最小。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亲密融洽，但段祺瑞因为怕袁世凯猜忌，起初连王士珍都不想见。王士珍到段公馆，段祺瑞的夫人张佩蘅亲自出来挡驾。王士珍说：“我就是看看芝泉的病，没有旁的意思。”说罢硬闯了进去。

王士珍进去后，段祺瑞也只跟他说了几句，会面就结束了。

尽管段祺瑞已流露出了倦怠官场之意，但袁世凯对他仍不放心。在段祺瑞最初称病期间，袁世凯多次派“御医”给段祺瑞诊治，还不断派人往段公馆里送东西，什么鸡汤啊、参汤啊，差不多天天都有，以示关怀。袁世凯的这些举动明为关怀体贴，实际也是为了监视、打探段祺瑞的动向。

外界甚至传说，袁世凯因为痛恨段祺瑞不跟他合作，曾在一碗鸡汤里下了毒药，想把段祺瑞毒死。不料这碗鸡汤被段的一个姨太太喝了下去，结果立刻毒发身亡。

其实这是捕风捉影的谣传。当时盛传前总理赵秉钧就是被袁世凯下毒药毒死的，段公馆又没有可靠的技术手段能够对鸡汤、参汤里是否有毒进行检验，所以段祺瑞根本就没敢吃，公馆的其他人也不敢碰，最后只能全都倒掉完事。

除了被下毒的危险外，还可能被暗杀。段祺瑞西山养病期间，正赶上京城里发生了一起惊人的刺袁案。

袁世凯有一个本家兼亲信，曾做过北洋的总军需，后来在袁府任大管家。他跟袁世凯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本人也在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中积极奔走，但他的儿子袁英却“很不安分”，乃同盟会会员。

袁英将炸弹秘密藏在花盆里，要炸袁世凯。事机不密，暗杀行动被发现了，袁英锒铛入狱。这样一来，北京城里风声鹤唳，防范得非常严密。段祺瑞因反对帝制而跟袁世凯闹崩，自然也怕袁世凯暗杀他。

当时陆军部卫队营长曹树桐带着卫队，负责保护段公馆的安全。张佩蘅再三对他说：“曹大哥（从段祺瑞孩子的角度称呼），俺们可都靠着你了。”

曹树桐把胸脯一拍：“师母（曹树桐曾做过段祺瑞的学生），你老放心吧。有我在这儿，谁也不能让他们进来。总长是我的老师，我得负责保护他。”

在卫队的保护下，轻易没有人能够走进段府的内宅，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叫罗凤阁。

罗凤阁的亲生父亲是北洋总军医，与段祺瑞私交极厚。张佩蘅作为续弦嫁到段家后，只生了几个女儿，没有儿子。段祺瑞很苦恼，曾跟罗军医谈起，并极力夸奖罗凤阁聪明，将来一定大有出息。罗军医一听就说：“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咱哥儿俩不分彼此。”

于是罗凤阁就拜张佩蘅为干妈。罗凤阁也的确聪明乖巧，见到段氏夫妇都是娘啊爹啊的，叫得极为亲热，很得夫妇俩的欢心。

罗凤阁一向在段府穿堂入户，和自家人一样，段府家人都称他为“小罗”。有重要客人来访，连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都要回避，小罗却可以在旁边走来走去，毫无顾忌，可见段祺瑞对他的钟爱。

有一天，段祺瑞一个人正独自坐在内宅的书房里看书，忽然见小罗走了进来。长期的军政生涯，让段祺瑞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他用眼神一扫，就发现小罗神情紧张，举止与平时有异。

“你这小孩子要干什么？”段祺瑞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不料小罗一听，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并且一边嘴里吭吭哧哧“他们叫我……”，一边用手往口袋里摸。

段祺瑞厉声言道：“拿来，你摸什么呢？”

小罗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原来是一支手枪，他双手把枪递给段祺瑞，说：“我怎么忍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段祺瑞很冷静地从小罗手里接过手枪，放到桌子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时小罗抽抽噎噎地还想说什么，大概意思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前来行刺，但因为受段祺瑞多年厚恩，实在不忍下手。

段祺瑞用手一拦，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连你的命都没有了。你称病吧，以后你不要进来了。”

小罗依言朝段祺瑞磕了个头，就离开了段公馆。

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

究竟是什么人买通了罗凤阁，因为段祺瑞没有让他接着说下去，所以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是袁世凯，不过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是袁克定或者负责策划帝制活动的其他人所为。

暗杀不遂后，段公馆又陆续发生了厨师被收买，在食物内放置毒药，最后被家人发觉，以及卫队士兵有谋变迹象等事件。有人建议段祺瑞赶紧秘密搬到天津居住，以策安全，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他告诉亲近自己的幕僚："我反对帝制，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我想袁不至于对我有所不利，万一有，那我就坐以待之。"

夫人张佩蘅则听到风声，说一切针对段府的事件其实都是袁克定所为，因为他对段祺瑞反对帝制极为不快，打算对段府采用恐吓手段，这可把张佩蘅等家人吓坏了。

张佩蘅是袁世凯大太太于氏的义女。从前关系没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佩蘅经常做客袁府，尽管袁府门前警卫森严，但她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坐着马车进去，通行无阻。进去后，袁府的老妈子们就会迎出来，说："大姑奶奶来了！"那情景，真好像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

在袁、段不睦后，张佩蘅和于氏之间起先还不断通电话，随着二人丈夫的关系越闹越僵，后来她们连电话也不通了，两方面的联系几乎断绝。现在考虑到此事关乎全家安危，张佩蘅还是硬着头皮，费尽周折地把传闻告诉了于氏。

于氏又立即转告袁世凯。袁世凯当即把袁克定叫来，对他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

袁克定连忙点头称是，至此，段祺瑞的人身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不过外面的各种谣传还是依旧，而且越来越离奇和玄乎，甚至于外国媒体也跟进来凑趣。日本报纸就有鼻子有眼地报道说，袁世凯已派袁克定指使专人暗杀段祺瑞。为此，段祺瑞不得不发表通电辟谣，表示他与袁世凯“分虽部下，情逾骨肉”，外界谣传是要“行挑拨离间之诡计”。

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负责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给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和帝

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顺其自然。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他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猜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的，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

假电报

段祺瑞原本向袁世凯请了两个月的病假，期满后又续了两个月，日子久了，也就跟被革职了一样。直到1915年8月29日，他才被正式解除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

9月间，在帝制派的策动下，各地出现了劝进热潮，就连很多反对帝制的人，或者为保身家性命，或者不舍名利地位，都违心地加入了这股热潮。

在袁氏幕府中，梁士诒是一个颇有见识也相对比较清醒的人，据说段祺瑞曾与之相约，说："我一文一武，万不可赞成帝制，误袁氏。"现在一看若再不跟风操作就可能出局，梁士诒也赶紧跟上，亲自出面拼凑了一个帝制请愿团。

就连段祺瑞本人都无法免俗。虽然他已脱离陆军部，但身上还有袁世凯所赏的"管理将军府事务"，在幕僚们的劝说下，他只好以此名义列名劝进。不过此后就一直保持沉默，不再多言。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决定接受帝制，第二天便在北京同仁堂匆匆"登极"，接受百官朝贺。那一刻，他终于把嫌弃已久的"共和"给扔到了一边。

不久，袁世凯又进行大封赏，总计有一百二十八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眼见得是"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不过还没等袁世凯咂出皇帝这枚人参果的味道，局势就突然大变。

事情首先是由那个上了袁世凯当的冯国璋引发的。对冯国璋来说，共和是没办法的事，如果能够复辟帝制倒是最好的，但他希望让清室复辟，而不是袁世凯自己来当皇帝。

在帝制问题上，袁世凯固然不能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后来从北京一回到南京，梁启超就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筹备情形告诉了他。

冯国璋弄清自己受了蒙骗后很生气，他大发牢骚说："我跟老头子（指袁世凯）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可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最后，还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

传子当然是传给袁克定，冯国璋对袁克定很有戒心："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室），怎不令人寒心！"

冯国璋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蔡锷是西南反袁的主将，他在回云南之前，曾在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供职。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才能很赏识，每天都邀请他共进午餐，当时正值"剿办"白朗军时期，关于"剿办"的一切计划情报和有关文电，袁世凯也都放心地交给蔡锷审阅。蔡锷由此洞悉了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认定"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

蔡锷在军事上虽有信心，但云南毕竟僻处一隅，且所养士卒不足两万，一旦举义，就要与十万北洋军为敌，所以他特地与冯国璋订立密约，说明只要南京率先出兵反对帝制，云南必第一个响应，以收互相牵制之效。

冯国璋在这件事上比较谨慎圆滑，不想轻易表态。他起初的算计就是按兵不动，待到蔡锷等人和袁世凯闹起来，再坐观成败，从中渔利。

可是冯国璋手下的两名幕僚却跟幕主想的不一样。这两名幕僚，一为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一为机要秘书潘若海，他们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心腹，均为地道的清室复辟派。

冯国璋与康、胡、潘观点一致。自康有为介绍胡、潘入幕后，他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在江苏督军任内，所有文电皆由这两位秘书代拆代行，公私图章大印也均由胡、潘负责掌管。

康有为这一支清室复辟派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当年因为袁世凯告密，维新派吃了大苦头，以后时时酝酿报复。见冯国璋首鼠两端，不肯先发，潘若海就背着他，以冯国璋的名义给蔡锷拟写了一份电报，上写："宁已出兵，望公速发。"

这份电报用的是江苏督军署的官印稿纸，盖的也是督军署大印，并由潘若海亲自送到上海租界邮局（时称电报局）拍发。电报局一看上面盖着印，也不问真假，便将此密电发至云南昆明。

密电到达时，蔡锷已做好了独立的准备，看了假电报，他赶紧按照密约进行誓师。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在昆明成立护国军，由他亲自统率，向四川发动进攻。

护国军入川后，大破曹锟、张敬尧等北洋军，可谓势如破竹，旗开得胜。这时蔡锷不见江苏出兵，便去电询问冯国璋因何失信，而冯国璋却被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此事纷传沪、宁、川、滇各地，一时引为笑谈。

武人不怕死

自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要求袁世凯无条件取消帝制后，全国舆论轰然而起，对复辟帝制一片讨伐之声。

长久以来，袁世凯骗你骗他骗自己，已经百分之百地相信了自己的规定情景，即全国老百姓绝大部分都拥护他登基称帝，所以当真相摆在面前时，如遭雷击。

袁世凯急于对西南动武，可是模范团等新势力尚未形成气候，难以独当一面，帝制派又多不知兵，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考虑使用冯国璋和段祺瑞这两员昔日干将。

袁世凯也得到了冯国璋发密电从而导致云南起义的情报，他为此曾特地派人到南京查办。面对查办人，冯国璋来了个一推六二五，说自己从来不看公文，文电均由胡嗣瑗、潘若海负责，至于胡、潘——直接责任人潘若海已“畏罪逃往广东”，胡嗣瑗也辞职逃到青岛去了。

袁世凯听取汇报后，说他知道冯国璋从来不看公文，定是受了胡、潘的欺骗，所以对冯未予处分。当然事实是，袁世凯想处分也处分不了，在此紧要关头，他根本不敢动冯国璋，尤其害怕南京也来一个独立，那就更要了他的命。

做完宽容大度的姿态，袁世凯随即给冯国璋发来一封密电，要他派一部分兵力到长江上游去作战。冯国璋认准了袁世凯不敢拿他怎样，回电说江苏地方辽阔，人心不定，原有的部队还感到不敷分布，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可以调到外省去?

见冯国璋按兵不动，袁世凯只得寄希望于段祺瑞。他找到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让曾毓隽转告段祺瑞:“此时能忍坐视我满头白发，遭人摧毁欺负吗? ”

想到冯、段皆自己一手提拔，如今却一个都不肯相助，袁世凯很有些愤愤然，说我纵然有错误，但第一个能了解我也能谅解我的，应该是芝泉才对，可是现在恰恰相反，“芝泉竟是第一个不了解我和不谅解我的！”

袁世凯还写了一封亲笔信，由曾毓隽转交段祺瑞。段祺瑞看完信，才知道袁世凯欲在中南海组织“征滇临时办事处”，并打算起用他主持该处。

段祺瑞当即予以拒绝。他不是不愿帮助袁世凯，前提是必须取消帝制，但他深知袁世凯不见棺材不掉泪，从眼下情势来看，仍不会在帝制问题上让步。

蔡锷发起护国运动后，总统府内阁（相当于政务机要秘书）夏寿田有一次私下和段祺瑞谈话时，说他想到了一个摆脱困局的办法。

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同时兼印度皇帝，夏寿田的办法是仿照此例，劝袁世凯以大总统兼满蒙大皇帝，这样什么都不用改变，只需对满蒙进行册封，即可借此下台。

段祺瑞听后不以为然，微笑着对夏寿田说：“你的主意是相当高明，但恐怕不易被接受。”

夏寿田不甘心，回答道：“袁总统很明白，可惜为群小包围。现在云南已经起事，我说的办法也许能通过。”

过后夏寿田真的向袁世凯献了此计，袁世凯起初听了说还不错。可是不久，袁幕中的杨度就跑来警告夏寿田，称其建议已被否决，同时还让他不要再乱出主意，因为不赞成这项建议的就是袁克定袁大公子。

说什么袁总统很明白，原来不过是被儿子牵着鼻子走。夏寿田知道袁克定对阻碍帝制的人向来不择手段，从此再不敢多嘴了，他失望地对曾毓隽说：“芝老（段祺瑞）毕竟和袁相处得久，相知得深，果不出他的预料。”

以袁克定为首的极端帝制派也对段祺瑞进行了威胁。就在段祺瑞收到袁世凯信件的前一天晚上，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扬言段祺瑞若不识时务，将对他采取不利行动。段祺瑞当即昂然表示：“武人不怕死！”

段祺瑞铁了心不愿为袁世凯的帝制站台，他对曾毓隽说：“你再见项城，不必多费口舌，只听其发付就是。我生死且不计，何计较得失！”

曾毓隽将段祺瑞的话回复袁世凯，但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放弃，而段祺瑞方面又毫不相让。这让曾毓隽感到非常为难，不得不求助于“小诸葛”徐树铮。

按照徐树铮之计，曾毓隽第二天去见袁世凯，说段祺瑞病情稍好后就会亲自前来拜见。如徐树铮所预料的那样，袁世凯听后很高兴，袁这边就算暂时先搪塞过去了。

段祺瑞已抱定决心，在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前，不管对他怎么威胁利诱，也不管授予多大官职，都不会替袁世凯出力，要他主动去拜见袁世凯更是不可能。对此，徐树铮也想好了办法，那就是在梁士诒等人面前散布谣言，说只要段祺瑞愿见袁世凯，袁世凯便会答应段祺瑞的一切要求，包括人事调整。

由于复辟帝制操作不力，梁士诒等人已有砸饭碗之忧，谣言一出，更怕段祺瑞出山后换了他们，所以忙不迭地向袁世凯进言，希望别召见段祺瑞。

袁世凯听进去了，很多天都没有再提召见段祺瑞之事，直到云南战事吃紧，他又想请段祺瑞出面维持，但仍被左右所阻。

1916年2月，袁世凯的北洋军在西南战场上屡战屡败，那些尚未独立的省份又消极抵制，不肯调兵相援。段祺瑞不但没有主动前来拜见袁世凯，而且公开提出，南北双方应当立即停战，维持共和，甚至另组新政府。在袁世凯看来，这一主张分明隐含着排斥他，逼他下台的意味，气得他大骂段祺瑞落井下石。

短命皇帝

段祺瑞只是要缓解危局，真正落井下石的是没能在“二十一条”中得偿所愿的日本人。3月中旬，驻日公使传来消息，说日本首相正在与

大臣、元老们举行御前会议，计划以保护东亚为由，乘机出兵中国。听到这个消息后，袁世凯当晚就病倒了。

袁世凯的身体本来很好，载沣说他“现患足疾”，不过是要让他滚蛋的借口。二次出山后，袁世凯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不是好，而是好得很，办公会客从无倦容，但自此之后，他开始忧危成疾、神情恍惚。

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好请原国务卿徐世昌出面帮忙收场。徐世昌系北洋元老，小站练兵时代即为袁世凯的高级幕僚和好友，他对帝制也不赞成，早在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时，就已借故辞职，跑到天津躲了起来。

对袁世凯要他救驾的请求，徐世昌再三推辞，急得袁世凯最后差点要跪下来了：“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谁来帮忙？”

徐世昌无话可说，但要求必须取消帝制，并去函劝说袁世凯：“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按照眼下的形势，帝制是无论如何撑不下去了，袁世凯满口答应，并立即派人赴天津将徐世昌接进北京。徐世昌到京后与袁世凯就取消帝制问题做了一番长谈，直言：“此事关系重大，须约芝泉共同商办，才有力量。”

袁世凯当然清楚段祺瑞的分量，但对能否请动段祺瑞却毫无把握。他长叹一声对徐世昌说：“芝泉一直生我的气，不见得能帮忙啊！”

“芝泉为人耿直，我看他是只反帝制，不反总统。”徐世昌知道问题的要害在哪里，“如取消帝制，芝泉会答应的。都是自家人，几十年

的关系了，他不会太在意的。”

袁世凯听了长叹一声：“芝泉能出山，那最好了！”

按照袁世凯的交代，他的夫人于氏给段公馆的张佩蘅打电话，对她说：“总统病了，急着想见一见芝泉，你先帮助疏通，很快总统就会有新的任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又让徐世昌出面，向段祺瑞转达了他要取消帝制的计划。

袁世凯既已如此，段祺瑞自然不能再置之不理。3月19日，他和徐世昌一同来到袁府，袁世凯大为高兴，立即从病榻上坐起来，握着段祺瑞的手说：“我老且病，悔不听你言，致有今日纠纷，若取消帝制，还需要你帮助。”

听袁世凯说得这样诚恳，段祺瑞颇为动情地表示：“当竭力相助！不过请容我与东海（徐世昌的号）再认真商量一下。”

当天晚上，袁世凯收到一份密报。这就是由冯国璋领衔其他四名将军所发的“五将军密电”，内容是要求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冯国璋将密电遍发给全国各省的将军，希望以此制造出更大的声势。直隶将军朱家宝也收到一份，于是赶紧向袁世凯报告。

一手培植并赖以发家的北洋系居然也要算计自己了！看完密报，袁世凯两眼发呆，几乎晕了过去。

此情此景，与当年段祺瑞领衔发出逼宫通电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相逼之人和被逼之人不同而已。袁世凯实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他对坐在身边的人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一颗巨星落地，这是我生平第二

次做这样的梦了。第一次做梦后，未满一个月，‘文忠公’（李鸿章的谥号）去世，这次大约轮到我了。”

3月21日，袁世凯召集在京要员在怀仁堂举行联席会议，当天会议的气氛也神似于清廷商讨退位的御前会议。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众人传阅讨论了他事先拟好的电令，结果是一致通过。

会后，袁世凯又忽生悔意，派人将已送出派发的电稿取回。段祺瑞闻讯急忙会同徐世昌赶到中南海，问袁世凯是否要改变主意。袁世凯知道不发不行，只好临时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昨天送去后，我觉得有几个字不太恰当，叫人取回来改。”

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义。从他宣布称帝，才一百天出点头，若从年号开始算，那就更少了，仅仅八十多天而已，堪称短命皇帝。

取消帝制后，袁世凯分别任命段祺瑞、徐世昌为参谋总长、国务卿。二人加上同样对帝制持反对态度的副总统黎元洪，联名致电负责南方护国军的蔡锷等人，声明帝制取消，西南起兵的目的已经达到，希望他们停战善后。

可是外界舆论并不肯就此放过袁世凯，无论西南独立各省，还是尚未独立的省份，都认为他的称帝之举有负民国，帝制取消后，连总统也不能当，应该马上退位。后来南方护国军甚至提出了更为苛刻，也更令袁世凯无法接受的条件，其中不仅要求将袁世凯逐出国外，还包括了“处决帝制祸首十三人”、“查抄袁氏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以及“剥夺袁氏子孙三世的公民权”。

负责交涉的徐世昌虽然资格老、地位高，但他对北洋系和南方的反袁运动实际没有多少影响力，蔡锷等人提出的要求让他左右为难，于是申请辞去国务卿。袁世凯知道他无能为力，也不再勉强，转而决定让段祺瑞代替徐世昌。

还是如此

段祺瑞在北洋系中拥有很高威望，同时护国军方面也把他视为一个当仁不让的实力派，不敢轻视，蔡锷回云南之前就曾拜访段府，由他来与西南交涉是袁世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3月23日，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按照段祺瑞的想法，他此时的地位和作用就好比是辛亥革命时的袁世凯内阁，一定要有实权，而不是一个橡皮图章，否则只会一事无成。

袁世凯取消内阁，设置政事堂和国务卿，是把后者作为他的办事机构以及办事人员。段祺瑞当然不会满意，他要求改政事堂为责任内阁制，改国务卿为总理。

袁世凯是个把权力看得很重的人。他生平最恨的就是责任内阁制，知道那样一来，内阁将掌实权，总统就被架空了。当初宋教仁要搞责任内阁制，他知道后每天觉都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直到宋教仁被暗杀才松了口气。

换在其他时候，袁世凯是死也不肯交权的，只是时移势易，一切都由不得他了。5月8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取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

段祺瑞组阁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起用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考虑到袁世凯非常不喜欢徐树铮，二人还曾因此闹过几次不愉快，段祺瑞便请张国淦去向袁世凯进言。

袁世凯听后果然很不高兴，他恨恨地说：“真是笑谈，段总理是军人，徐某亦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太不像话！”

张国淦受段祺瑞之托，不得不婉言相劝，袁世凯这才让了一步：“总理若以徐某之才可用，不妨令其为陆军次长。”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碰谁都可以，就是不能碰他。张国淦向段祺瑞复命，话还没有说完，段祺瑞便猛地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答应吧！”

随后，他又把衔在嘴里的烟斗使劲甩在桌上，怒气冲冲地说：“到了今天，还是如此！”对袁世凯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徐树铮只当了国务院的帮办秘书。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加强内阁的权力，段祺瑞要求撤销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等三大机构，袁世凯非但不肯撤，还让梁士诒等人暗地里予以掣肘，段祺瑞得知后自然更为生气。

段祺瑞重新出山以来，本想有所作为，替袁世凯摆平时局，尽可能帮他保住总统的位置。现在见袁世凯对自己仍持这种态度，既不能放心又不肯放手，顿感心灰意冷，在联络北洋将领、应付南方反袁声潮上也不再尽心尽力，很有点听任其发展的架势。

袁世凯到此境地，还能跟人讨价还价，当然是以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洋将领纵使大部叛己，毕竟还有一些未独立省份和亲信心腹可以作为倚靠。

在未独立省份中，陕西、四川最为紧要——陕西被袁世凯作为根据地，由其心腹之一陆建章担任将军，四川则是对西南作战的最前线，所以派陈宧做总督，两省一前一后，称得上是袁世凯的两大精神支柱。

进入5月中旬，连这两根支柱都相继倒了下去。5月18日，原同盟会会员、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告陕西独立，陆建章被逐出陕西。

仅隔四天，即5月22日，袁世凯最为信任的陈宧竟然也在四川宣布独立，并致电袁世凯，表示与他“断绝关系”。

从前的马屁拍得有多响，“心腹”们如今反击的火力就有多猛。由于本为其亲近之人，陈宧在通电中揭发袁世凯的力度和语气，甚至为蔡锷等人所不及，在电报末尾，他还无中生有地爆料说，“袁逆”（指袁世凯）已经秘密将三千万巨款汇往英国，准备逃亡了。

陈宧通电送到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吃馒头，还没来得及拆看电报。一个馒头被切成四片，吃完三片，梁士诒走了进来，袁世凯问他，陈宧发电报来是什么意思？也要反戈一击，逼我退位吗？

梁士诒知道袁世凯极为宠信陈宧，于是连忙回答说不至于这样吧。袁世凯听了顿时觉得心里踏实了些，这才把剩下的馒头片吃了下去。

接着，他和梁士诒一同阅读来电。看完电报内容，梁士诒瞠目结舌，袁世凯更是又惊又气，立刻拂袖而走。之后，他便一个人喃喃自语：“人心大变，才会弄成这样……”

段祺瑞刚刚出山和袁世凯会面的时候，曾把略通医术的曾毓隽一道带去袁府，让他对袁世凯察言观色，以便判明对方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当时袁世凯的病榻前放着中医脉案和药方，但曾毓隽发现袁世凯面色红润，言语动作也没有什么明显异常，换句话说，他有病不假，然而病情并不重。

可是此后袁世凯事必躬亲，即便请出徐世昌、段祺瑞后，依旧不肯完全放权，大事小事都要过问，这就极大地损耗了他的精力和体力。与此同时，外界今天一个独立电，明天一个劝退电，国贼之骂不绝于耳，连一些老朋友、老部下也都指名道姓地骂他，无疑又让他在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

就算是这样，老袁还能硬撑，陈宧电报一来，他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不断咳嗽气喘，原本尚不算严重的病情逐渐加重，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之人戏言，三国陈琳替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不料反而治愈了曹操的头痛病；同样姓陈，陈宧的电报对袁世凯而言，却不啻一道催命符。

5月29日，袁世凯的另一名宠臣、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至此，袁世凯彻彻底底地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同时也受到致命打击，时人有“送命二陈汤”之语，“二陈”指陈树藩、陈宧，“汤”指汤芗铭。

这就是人心

墙倒众人推，是流行中国的一句俗语，也是自古至今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到袁世凯完全失势之时，投向他身上的矛枪已远不止“送命二陈汤”这几支，其数量可以说多如牛毛。

袁世凯有一个从小带到大的贴身仆从，名叫唐天喜，一路被他提拔到了高级军官。就在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当口，唐天喜痛哭流涕地去见袁世凯，口口声声为了报效袁世凯三十年养育之恩，要到前线去跟造反的那些人拼命。

青春偶像片上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唐天喜就是那偶像片上的当红小生。袁世凯这个感动，当下便委任其为副司令。唐副司令到达前线后，对手暗地里给了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打点，他立马决定“与君绝”，也造起了袁世凯的反。

袁世凯痛心不已，据说临死之前仍在念叨：“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从冯国璋，到“送命二陈汤”，再到唐天喜，标志着整个北洋集团都背叛了他的开山鼻祖，而北洋的不可靠，其实在几十年前就初见端倪。那时袁世凯搞“小站练兵”，自述其练兵秘诀，一语概之，即“绝对服从命令”——你只要一手拿官和钱，一手拿刀，当兵的服从，就给他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

军人服从命令固然不错，袁世凯的问题在于他把内涵过于简单化了。官兵们在未发迹之前，可以一早一晚焚香跪拜，把你袁世凯当成衣食父母给供着，一旦官钱在手，他也同样会挥刀对着你，以索求更多的官和钱。

在整个北洋集团里面，一方面是很多人耳濡目染，个个利字当先，甚少理想主义的空气；另一方面则是袁世凯玩弄权术上了瘾，对谁都搞腹黑的一套，部下们由惧怕到疏远，当差做事都无非是看在金钱和势力的面上，个人感情反而越来越淡、越来越少。

当然，如果袁世凯不复辟帝制，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他仍然可以对全体北洋军人发号施令，仍然是北洋系中公认的权力中心……

据说，就连传闻中被袁世凯毒死的赵秉钧都对人说过："项城帝制，是自杀也。"张国淦对袁世凯为什么会棋错一着同样感到不解："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

自袁世凯一着走错，他就再也未能恢复昔日辉煌，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无人有能力将北洋系重新整合起来，直到它彻底崩溃。

在民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洋系就代表着社会秩序，北洋系内部无休无止的分裂和争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一念之差，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极大地拖了近代中国的后腿。曾给袁世凯做过顾问的法国人柏里索总结道："袁世凯要做皇帝，这一来使中国退化了数十年！"

在袁世凯身败名裂的最后日子里，平时围在身边、变着法子吹捧他的人都跑了，只有曾经被他压制或漠视的段祺瑞、徐世昌等人还能真正地关心他、帮助他。

这就是人心。到了这一刻，袁世凯才总算看了出来。他感慨万千，特地把徐世昌叫来，亲手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他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病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河南彰德是袁世凯遭载沣驱逐后的所居之地。多年前，这里是他东山再起的基地，在他准备重返京城的头一天晚上，全家人曾因此欢天喜地，他却忽然叹了口气，说：“你们不要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愿意出去”当然是假的，它所表露出的，只是袁世凯对于前途莫测的某种担忧。可是等到袁世凯不再恋栈，真的想回彰德养老时，他的病情却越来越沉重。袁克定及其他家人急得手忙脚乱，遍请名医，且中西药并进，但都无济于事。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紧急召见段祺瑞。因为自觉得不到袁世凯的完全信任和支持，段祺瑞此前早已提出辞呈，但是当得知袁世凯病势加剧且相召时，他还是偕同夫人张佩蘅匆匆赶往袁府探视。

除了段祺瑞，被袁世凯相召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等。他们都坐着汽车而来，随同前来的家人自然也不少。在主人进入袁府后，这些家人聚在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老袁的病情。

有尚不知情的问道：“总统怎么样啦？”得到的回答是：“听说还是发烧，心里起急。”那些比较了解情况的则断言：“打紧板了，一时不如一时，恐怕好不了了。”

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去得早一些，见段祺瑞赶到，众人全都移步闪开，以便让他走近病床。

病床上的袁世凯虽然神志清醒，还能勉强坐起来，但连睁开眼睛都已很困难了。一看这样子，段祺瑞就知道情况不妙，他赶紧压低声音问道：“总统有何吩咐，敬请说吧！”

见段祺瑞到来，袁世凯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他说：“芝泉，我不行了，以后全靠你了。”说完就闭上了眼。

人情味

袁氏在北洋军中习惯运用“一手拿官和钱，一手拿刀”不假，但他与段祺瑞的历史关系又有所不同。自小站练兵开始，二人便志趣相投，彼此来往频繁，常常一聊就是一天，长此以往，也造就了他们之间绵延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相比于功利的诱惑，友谊和曾经的志同道合总是更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不管袁、段曾有过怎样的不快，从重新见面的那一刻起，之前的种种怨恨和不满便已从彼此心中一笔勾销。

过了一会儿，等袁世凯重新睁开眼睛，段祺瑞忙劝慰道：“总统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袁世凯听后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随即又呻吟起来。

在医生的劝导下，众人离开了袁府。段祺瑞离开时脸色阴暗，表情显得非常沉痛。

第二天，袁世凯病危。段祺瑞等人再次赶到袁府，在病床前候命。徐世昌轻声问道：“总统还有什么交代吗？”

袁世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约法”两个字，病榻旁的袁克定又抢着补充了一句：“金匮石屋？”袁世凯点了点头，此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6月6日上午10点40分，袁世凯于昏迷中去世，史册中属于他的那一页，就这样被无情地翻了过去。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签署了一道丧葬通令，通令称“前大总统（指袁世凯）赞成共和，奠定大局”，因此“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

在段祺瑞等人的坚持下，袁世凯不仅没有因闹帝制而被问罪，还得到了“国葬”待遇：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学校停课一天，文武官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

在国家财政极为困窘的情况下，段祺瑞仍决定拨款五十万元作为袁世凯的丧葬费，同时向袁氏家属赠送了仪葬费一百万元。按照葬仪，在正式下葬之前，袁世凯的遗体要在中南海停灵，停灵期间，他亲率各部总长轮流守灵，接着又在公祭典礼上代表总统主祭。

民国典礼已废除匍匐磕头的规矩，改行三鞠躬，但仍有人感到“受恩深重”，不行跪拜大礼说不过去，一些靠得近点的，还是在灵前按照前清仪式磕了头。仅此一点，也让袁世凯的葬礼更多了一些人情味。

袁世凯的遗愿是将他的遗体安葬于彰德。公祭结束后，段祺瑞亲自执绋送葬，护送袁世凯灵柩去彰德，夫人张佩蘅也以义女的身份一同前去送灵。

送灵这一天，使用了抬运棺木的最高仪规，即“六十四抬大杠”，这在民国以前，只有皇亲国戚才配享用。袁世凯闹帝制，据说主要是听了长子袁克定的主意，到了这个时候，袁克定心中不免悔恨。他本身是个瘸子，腿脚不利索，难得的是作为孝子，仍打着幡，一步一步地从怀仁堂走到了西车站。

北京为此特地挂了一列专车，包括段祺瑞在内，政府要人中凡跟袁世凯关系较近的都随车到了彰德。得知袁世凯归葬，彰德当地就像办庙会看大戏似的，从四乡赶来看热闹的纷至沓来，人山人海。

对被称为袁林的袁世凯墓园，段祺瑞明令必须建好，并亲自参加了图纸的审定。该处墓园位于彰德西北角，离其原宅邸有二三里路。墓园两旁立石人石马，此外还有正殿、配殿、享殿，上面一律铺琉璃瓦，完全是皇帝陵寝的派头。

袁世凯在现实中称帝而不成，段祺瑞如此规划，也算是让老上司在阴间完成了这一难以达成的心愿。袁克定参加了整个葬礼，他没想到段祺瑞能把亡父的丧事考虑和操持得如此周全，为此再三向段祺瑞致谢，说此次国葬“得亏总理”。

袁世凯终于回到了彰德，可却是被放在棺材里让人抬回来的。在渴望成为“真命天子”的路上，这位曾经所向披靡的政坛强人丢掉了诚实，丢掉了契友，丢掉了声誉，最终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人的一生当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我们才会明白?

第四章　我说了就不改变

袁世凯临死前说出了“约法”二字，虽然没来得及讲清楚到底是“临时约法”还是“民三约法”，但从其后他对“金匮石屋”的认同上来看，所指系“民三约法”无疑。

所谓“石屋”是一座以云南白石筑成的小房子，建于中南海万字廊内，“金匮”则是一只外面镀了金的保险箱。“民三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只能由现任总统推荐，其名册就藏于“石屋”的“金匮”之中。

“金匮石屋”的钥匙共有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三把钥匙中至少有两把配合，才能开门启匮。平时如果不是用于选举，或得到大总统特许，谁也看不到那本神秘的名册。自然，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本人是个例外，他只要想看随时能够取出来看。

袁世凯一死，众人遵嘱打开“金匮石屋”，拿出了名册。关于名册上的名单，据说袁世凯曾做过多次改动，最后一次是把袁克定给划掉了。这说明在帝制撤销后，袁世凯的脑子并不糊涂，他知道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若仍把袁克定作为继承人，不但不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反而还可能害了儿子的性命。

老袁一辈子说了很多谎话，但他临终前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说要让黎元洪做总统，看来是真话——名册上写着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居于第一。

就这样办吧

即便没有名册，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在继任总统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除了“临时约法”和“民三约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据外，由于黎元洪被认为是一个与南方有一定关系的人，所以他还得到了南方的拥戴和支持。早在护国军要求袁世凯退位时，“以黎代袁”的主张在南方就颇盛行。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随后在中南海春耦斋内开会，讨论究竟由谁出任总统。徐世昌明确表示：“最好是请黎副总统出来。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黎副总统的声望有助于推动南北统一等问题，他做总统比较合适。”

段祺瑞起先默不作声，思考了几分钟后才说：“既然相国这样说，就这样办吧！”

徐世昌、段祺瑞也是袁世凯指定的“法定”候选人，他们退出竞争，是因为各有各的顾虑。徐世昌资格最老，但他不是军人，和虽是军人出身，手中却无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境遇相仿，而且南北支持他的人都不多，因此在竞争力方面，他尚不及得到南方支持的黎元洪。

三人之中，竞争力最强的其实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军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段祺瑞手中，而且他的学生、同僚和旧部遍布军政界

——令段祺瑞自己都感到得意的是，当时全国的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皆为其门生故吏。

在重建共和方面，三个候选人应该说都无可挑剔，但段祺瑞更为引人注目：作为清廷大吏，毅然发出共和通电，“一造共和”；作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敢于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二造共和”。

无论自身拥有的实力还是社会舆论的接受程度，段祺瑞要挤掉黎元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继承老袁的衣钵，犹豫的那几分钟已足以说明问题。

可是作为一个经验丰富、务实老练的政治家，光有获得权力的欲望还不行，他还得考虑到现实的可操作性。

正如徐世昌所言，南北统一是新一届政府即将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南方的护国军已多次表态拥护黎元洪继任总统，并且将此视为阻止北洋系继续独霸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举措。换句话说，只要新总统不是黎元洪，他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自“庚子事变”以后，凡中国的执政者要主持政局，无一不希望取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地位的认可。各国从其在华利益出发，都希望中国政局能够保持稳定，而保持稳定的最佳途径无疑就是按照法律程序，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纷争，犹如是中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便日本也不例外，其政府也在竭力劝说南北势力支持黎元洪。

1916年6月6日下午1点，各国驻京公使一致表态欢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声明将给予黎“道义上的支持”。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段祺瑞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支持黎元洪。早在袁世凯病重在床、命在旦夕之际，就派曾毓隽奔赴南京，与冯国璋商量“袁死黎继”的事。冯国璋认为黎元洪本为副总统，继任总统顺理成章，非其莫属，很快就复电赞成。

冯国璋虽是北方政要，但他在护国运动中较为接近南方，相对而言，工作要好做一些，别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大多数北洋军人都反对南方人出任总统，而黎元洪就包括在所谓的南方人之中。与此同时，打算攀龙附凤、拥段登基者也不在少数，一些人甚至主张在袁世凯还没死的时候就动手，通过“一切由内阁代摄”的方式，让段祺瑞抢班夺权，只是因为段祺瑞本人“力持不可”，才勉强作罢。

袁世凯去世当天晚上，北京城内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批在京的北洋将领涌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提出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并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当总统。黎元洪在家中也不断得到报告，说城外北洋军正在调动，行踪殊为可疑。

黎元洪非常不安，特地把自己的湖北同乡张国淦找来商量。张国淦安慰他说：“段总理已经表了态，我看不会出什么乱子。”

在黎元洪的要求下，张国淦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段祺瑞的副官，对方称段祺瑞太忙，没有工夫听电话。

黎元洪愈加焦躁，又催促张国淦赴国务院和段祺瑞当面交谈，还说：“你快去告诉他们，我不要做总统，我不要做，这样总可以了吧！”

张国淦驱车赶到国务院的时候已是午夜，国务院却是灯火通明，尤其总理办公室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里面全是身穿军装的高级军官。

段祺瑞身着陆军上将服装，站在军官们中间正忙得气喘吁吁。

得知张国淦的来意，段祺瑞面色异常冷峻地说：“他（黎元洪）担心什么？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国淦走后，段祺瑞继续向军官们晓以利害，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化解了这场令黎元洪为之心惊肉跳的风波。

可以这样说，黎元洪的总统其实就是被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祺瑞不支持，黎元洪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

硬的碰到了更硬的

“让出”总统，段祺瑞决定踏踏实实地当总理。当然，他要当的总理可不是袁世凯时代的虚位总理，而是责任内阁制下的实权总理。

自民国初建以来，责任内阁制的行政主导体制便在“临时约法”中得到确认，但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内阁并不居于主导地位。想当年，宋教仁为实现这一政治理想舍命奔走，直到临死都未能如愿，现在却要依靠段祺瑞来完成了。

如同支持黎元洪继任总统一样，各国对段祺瑞组阁均表现出乐观其成的态度。他们对中国各派政治军事力量及其头面人物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南方各派尚成不了气候，只有段祺瑞能暂时控制住中央政权，并巩固和扩大各国在华利益及影响。

国内方面，首先涉及北方的几个政界大佬，其中黎元洪已经做了总统，但他在北方的声望无法与段祺瑞相提并论，他就算是为了保住

总统宝座，也得依赖于段祺瑞。

另外两位：徐世昌在北方的声望高于段祺瑞，可是实力不济，同时又无法融洽与南方的关系；冯国璋的实力倒不错，也是北洋系中唯一一个能与段祺瑞匹敌的角色，然而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不及段，并且他身居长江下游的南京，做个地方实力派首领固无问题，要争夺中央政权就鞭长莫及了。

此时的中国虽然尚未形成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但南北两派势力已经泾渭分明：长江以北，基本上是北洋系的天下；长江以南则存在着多种政治军事力量及其头面人物，除了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地方实力派外，还包括西南地方实力派、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等等。

总的来说，南方各党各派都肯定了段祺瑞在“二造共和”中的表现，同时认为他是解决时局危机的核心人物。护国运动的发起者、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早在袁世凯取消帝制时，就提出了“总理摄政”的主张，后来又曾通电表示：“时事多艰，非芝老（段祺瑞）莫胜此任。”

段祺瑞当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南北。在他发出相应号召后，陕西、四川、广东在三天内就取消了独立，接着云南、广西也电告各方，表示支持段祺瑞组阁。

但是，南方各党各派支持段祺瑞也是有条件的，主要包括废除“民三约法”、迅速恢复“临时约法”和重开国会、惩治帝制祸首十三人等。

段祺瑞尝到过被国会当众质问以及议案无法通过的苦头，他的本意是继续“民三约法”，以避免国会重开后自己受到掣肘。南方各党各

派识破后，立即群起围攻，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由此而起，段祺瑞新内阁的组成亦不得不一再推迟。

面对南方巨大的反对声浪，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表示政府对恢复“临时约法”一开始就没有歧见，目前需要的只是研究如何恢复的问题。

这是段祺瑞用来拖延的一个政治花招，如果不灵，他还准备了硬的一手，即以辞职相威胁。

不料硬的碰到了更硬的。1916年6月25日，驻沪海军突然宣布独立并加入了护国军。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袁世凯曾用海军运兵南下，对独立各省进行镇压和威胁。现在海军加入护国军，反过来对北洋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在拥有制海权和海上运兵工具之后，护国军横可进入长江，纵可到达津沽，甚至直接开入北洋政府的核心区域。

段祺瑞顿感事态严重，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接受南方关于约法和国会的要求。6月29日，经段祺瑞等人副署，黎元洪公布申令，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同一天，黎元洪又宣布依据“临时约法”，于两天后重开国会。

新旧约法之争至此告一段落，段祺瑞组阁的障碍也随之解除。黎元洪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由段祺瑞出面组织新内阁。

除了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外，南方提出的主要条件只剩下“惩治帝制祸首十三人”一条。“帝制祸首十三人”包括杨度、梁士诒、张镇芳、段芝贵等，多为袁世凯政府或幕府成员，段祺瑞与他们的私

人关系较为密切，段祺瑞虽然反对他们在帝制时期的做法，但又对这些人在袁世凯失势后未对故主反戈一击表示肯定。

段祺瑞认为“十三人”都可以赦免，他不能饶恕的是陈宧。陈宧在帝制活动中出力不小，不过这并不是段祺瑞反感陈宧的原因，他所深恶痛绝的恰恰是陈宧宣布独立的举动。

倒不是说陈宧不能改变原先的政治立场反对帝制，但在段祺瑞看来，作为袁世凯座下第一宠幸之人，陈宧在公开场合反对帝制可以，却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得失而忘恩负义，在私情上背叛袁世凯，乃至于给故主的心脏插上致命一刀。

北洋叛徒

段祺瑞幼年就读私塾，十七岁时因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被迫离乡投军。塾师见他欠下学费、膳费，便扣下了他的一块旧端砚和一张书桌作为补偿。

后来塾师穷困潦倒，听说段祺瑞在北京发迹，便想去北京投奔段祺瑞。塾师也害怕这位过去的学生不认自己，甚至当面对他进行羞辱或报复，只是实在穷得没法子，才硬着头皮，抱着段祺瑞的那块端砚来到了北京。

不料段祺瑞一见塾师非常高兴，不仅仍像小时候那样恭恭敬敬地尊称对方为老师，还向老师问师母健康。塾师一边回答，一边从包裹里慢慢地取出那方端砚，嗫嚅着说：“你从前那方砚台保存在我家，现送来还你。”话说完，脸上已红得发紫。

段祺瑞看到端砚更加喜出望外，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这一方端砚是我家祖传之物，老师为我保存至今，幸未失去，我很感激！”

段祺瑞马上请老师将行李搬到他家，以后一日三餐，殷勤备至。塾师见段府来来往往的都是贵客要人，自己只是个乡下塾师，不好再开口跟段祺瑞要事情做，于是过了几天便告辞回乡了。

等塾师回到家，原先家里的几间破房早已修葺一新，不用说，这当然是段祺瑞为他的老师修的。

段祺瑞待师如此，对昔日的同学好友也是这样。他最早读私塾的时候，私塾里有二十多个学生，那时段祺瑞任军中要职的祖父还在，但他从不在同学面前摆官少爷的架子，因此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

在所有同学中，与段祺瑞交情最好的是申孟达，二人情同兄弟，往来甚密。后来父亲调防，段祺瑞随父迁徙，他们才渐渐断了音信。

许多年过去，申孟达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有一个大官叫段祺瑞，便疑心是当年的同窗好友。起初申孟达还不太敢去北京，怕有冒认官亲之罪，也有人劝他说，就算真是那个段祺瑞，那样的大人物，还能认你这样的小民吗?

就在申孟达迟疑不决之时，他的外甥来看他。外甥是个学生，颇有见识，认为不妨到京城一试，纵然认错了人也不该有什么罪，并且自愿陪同舅舅赴京。

申孟达被说动了，当下便整理行装，在其长子及外甥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在北京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入住后，申孟达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段祺瑞寄了一封信。

让申孟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段祺瑞一收到信件，立即就派人送来二百块银元，给申孟达做剃头洗澡换衣服之用。三天后，段祺瑞又亲自来接，当天，有一二十辆小汽车停在小客栈门前的路上，把附近居民和路人都给惊呆了。

段祺瑞把申孟达接到府中，并设宴洗尘，亲自相陪。因为公事繁忙，段祺瑞不能一直陪同，就派一名副官领着申孟达游览北京所有名胜古迹，他还交给申孟达一张菜单，让申孟达自己按照菜单点喜欢吃的菜肴。

两个多月后，申孟达回乡，临别时段祺瑞又赠送了许多钱和一张自己身穿官服的全身照片。

段祺瑞的这些言行绝非沽名钓誉，可以说，遵师重道、不忘故交始终是他人生价值观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正因如此，不管袁氏父子在权力斗争和复辟帝制时期如何压制、迫害他，也不管双方的政治观点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段祺瑞始终坚持“不用兵而是用口”，不肯打破他自己的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

在一次闲谈中，段祺瑞曾评价二庵（陈宧的字）才有余而德不足，他说：“袁项城做皇帝，陈事前竭力怂恿，以此来取信于袁。帝制失败时，陈又宣布独立。就做人方面、政治道德方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

让段祺瑞最无法容忍的，是陈宧不仅在宣布独立的通电中揭发袁世凯，并且还表示“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陈宧与黎元洪同为湖北人，且有过一段共事之谊。黎元洪曾让幕僚给他发去密电，陈宧接电后为表示对黎的忠诚，在袁世凯死后第三

天便在四川取消了独立。四川独立给黎元洪捧了场，也有利于段祺瑞的统一政策，但此举不仅没有讨得段祺瑞的欢心，反而增加了其恶感。

段祺瑞认为陈宧朝三暮四，政治道德败坏，所以视之为北洋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南方列了十三人作为帝制祸首，在段祺瑞的祸首名单中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陈宧。无奈黎元洪竭力相保，段祺瑞不能不给面子，最后作为交换，黎元洪同意将段芝贵置于祸首之外，段祺瑞也答应不再追究陈宧。

虽然为了敷衍南方，北京政府按照他们的名单，宣布了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但段祺瑞既然不认同，自然不愿意真的把这些人交给司法惩办。早在命令发布之前，其中大部分人就已逃之夭夭，惩办问题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惩治祸首的命令发布后，南方的条件得到满足。当天，护国军和进步党人合作建立的军务院被撤销，南北归于统一。

一块钱起家

段祺瑞与黎元洪的搭配是一段双方都不太满意的“政治婚姻”。段祺瑞有足够的理由瞧不上黎元洪——

讲资历，段在清末时就出任提督、军统，还署理过地方上的总督，而黎原来不过是个小小的协统。以现代军制而言，军统相当于军长，协统才不过是旅长，整整差了两级。

论实力，袁世凯当政时期，段长期担任陆军总长，手中握有实权。黎虽然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表面看上去很有地位，但在中央，他不过是总统府的一个政治花瓶；在地方，部下们居然都能挟之以为傀儡。

段祺瑞不仅在资历、实力上远胜于黎元洪，而且其魄力、意志方面亦有人所不及之处。这跟他少时的家境变化有很大关系。段祺瑞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祖父是家里的主要靠山，段祺瑞十五岁那年，祖父病死军营，家道随即中落。

段祺瑞将祖父的灵柩送至合肥归葬后，仍旧回到他和祖父原在的宿迁军营。这时他私塾也念不起了，只好暂时留营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役。

第二年，段祺瑞深感在兵营打杂并非长久之计，也违背祖父对自己的期望，于是告别宿迁，只身跋涉两千里，前往山东威海投奔在那里任管带的族叔。族叔见他有七年的私塾底子，便安排他在营中当了一名文书。

此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段父在家乡遇害。虽然后来案子破了，凶手也被擒伏法，但段母因哀痛过度，亦追随段父而去。

段祺瑞是家中长子，以下尚有三个弟妹，在家庭迭遭变故之后，养家糊口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为了解决收入微薄、进身无门的窘境，这位早熟的少年在二十岁时基本上靠步行去天津，并考取了武备学堂，从此命运得到改变。当时段祺瑞赴津，随身仅带一块银元，所以段家人常说，段家是“一块钱起家”的。

少年时代家境的陡然中落，以及作为长子不得不过早挑起家庭重担的艰难经历，使得段祺瑞逐渐养成了冷峻、刚毅、敢任事的性格。

同为武人，黎元洪则要逊色许多。他有一个绰号叫“黎菩萨”，在湖北方言中，“黎”与“泥”同音，故也有人叫他“泥菩萨”。黎元洪有此绰号，固然是因为他脾气好、待人宽厚，但也不经意间暴露出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

事实上，在觉得形势不利时，黎元洪确实常常露出怯意。当年辛亥革命，冯国璋攻下汉阳，第二天一名与黎元洪相熟的北洋军将领隔江偷偷给他打电话，探听其虚实。黎元洪人都哆嗦了，他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里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指革命党人）利用我们的名义瞎搞一通……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

到快当总统了，大抵还是如此。袁世凯去世那晚，得知北洋军可能要闹事时，黎元洪的表现近乎失态。忙于对军官们进行劝说的段祺瑞也被弄得不胜其烦。当张国淦受黎元洪之命一再向他打听情况时，他忍不住握起拳头朝桌上敲了一下，狠狠地说：“他（指黎元洪）要管，就让他管！”

张国淦当然没有把这句话报告给黎元洪。其后段祺瑞平息了事端，又把一张已经拟好的通电出示给张国淦看，上面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的号）颇孚人望，但‘约法’（民四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

段祺瑞这封通电显然是为了安抚北洋系，但“优柔寡断”也未尝不是段祺瑞对黎元洪的真实看法。

张国淦看过电报，赶紧劝段祺瑞："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

段祺瑞想了一会儿，觉得有理，这才提笔删去了这段难听的话。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段祺瑞存在重大分歧。比如段一再找借口推迟国会的重开，而黎则认识到国会可以限制段的势力，扩大自身权限，所以对恢复国会持支持和促成的态度。又如在敲定帝制祸首的名单时，黎和段也都有各自的主张。

尽管瞧不上黎元洪的能力，又存在诸多分歧，但段祺瑞初期在表面上还是与黎元洪合作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有互补的一面——段祺瑞需要用黎元洪来维持"中央是团结的"这样的国家形象，以便对付南方的各党各派，而黎元洪虽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可是手中无兵，缺了段祺瑞，场面也撑不下去。

就这样，大家你让一步，我让一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解决了一些分歧。在此之后，他们又合作裁撤了帝制时期的机构和职官，取消了部分专制独裁的法律条例，同时放开报禁，撤销政治犯通缉案，使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遭受重创的民主共和制度得到了局部的恢复和发展。

可惜好景不长，黎段配很快就出现了维持不住的迹象。

刚愎他用

段祺瑞主掌国务院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灵魂”徐树铮。他打算让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于是便请张国淦去跟黎元洪讲。

过去袁世凯当总统时碰到的恼火事，如今一般无二地又让黎元洪给撞上了——徐树铮在公务中向以气势凌人著称，还在段祺瑞当总理前，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就领教到了，有一次他竟然还被徐树铮当面拍了桌子。

以前还是偶然碰面，如果让徐树铮当了国务院秘书长，就得三天两头打交道了，黎元洪如何能够接受？听张国淦把段祺瑞的提议一讲，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并以和袁世凯一模一样的理由一口回绝：“段总理是军人，徐树铮也是军人，军人做总理，不能再以军人做秘书长。”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黎元洪随后还是向张国淦和盘托出了他的真实想法：“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就如芒刺在背。”

张国淦曾经在袁世凯那里碰过一次壁，岂能不知徐树铮的性格为人，但他受段祺瑞所托，又不能不对黎元洪进行劝解：“树铮锋芒毕露，实属军人爽直一派，总统还是多包涵些。”

黎元洪仍然连连摇头，毫不犹豫地说：“我总统可以不做，但绝对不能和徐树铮共事。”

黎元洪不答应，要是照直回复段祺瑞，段祺瑞的脸也注定会黑得跟个锅底似的。张国淦左右为难，只好问计于徐世昌。

徐世昌闻之一笑："黄陂（黎元洪为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太不了解芝泉啦！"随即驱车同张国淦一起来到总统府。

黎元洪见到徐世昌时尚余怒未消，说："相国，总理要做的事一万件我都依从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

徐世昌语出惊人："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唯有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你怕树铮跋扈，芝泉（段祺瑞）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

徐世昌亲自来劝解黎元洪，主要还是怕黎段二人闹僵，重演当初袁段不和的一幕。他开导黎元洪："总统请想想，为了徐树铮，芝泉当年不惜与项城反目，况今日乎？"

徐世昌的适时提醒，让黎元洪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终于在态度上软了下来，叹口气说："就依相国说的办吧！"

在过了黎元洪这一关后，段祺瑞也怕引起外界非议，说他过于偏袒徐树铮。为了掩人之口，他就和徐树铮联手演了一个剧目，下令委任曾毓隽为国务院秘书长。

曾毓隽刚刚在家中收到委任状，徐树铮就托曾的叔父来和他商量，说局势复杂，国务院总理是武人，秘书长若是文人，一定弹压不住，意思就是让曾毓隽把秘书长的位置让出来。

同为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平时和徐树铮接触较多，他看出徐树铮对秘书长一职势在必争，如果不放手的话，以徐树铮的个性，以后必然事事掣肘，自己就算是当了秘书长，事情也不好办。

想到这里，他只好让叔父传话给徐树铮，说段总理既然委任他为秘书长，无故辞职，无论对段还是对他都不合适。徐树铮一定要这个位置，他可以上一个呈文，在段祺瑞面前力保。当然同不同意就要取决于段祺瑞的个人态度了。

曾毓隽以为段祺瑞已经发布任命，就不会轻易推翻，至少要深思熟虑一番，同时也可以避免得罪徐树铮。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保徐树铮的呈文刚刚送上去，段祺瑞立刻就批复了。

段祺瑞的小舅子吴光新也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北洋将领，他为人特别骄傲，一向两眼朝天，不大理会人，有时还故意给人难堪，使对方下不了台。可以想见，他和徐树铮的关系不会好，不过与曾毓隽这样的纯文人倒还能相处。

得知段祺瑞改任徐树铮为秘书长的消息后，吴光新跑来对曾毓隽大吼大叫，说："你何必这样怕得罪人？"

曾毓隽正在郁闷之中，他对吴光新说："你和我闹没有用……问题在于段总理不坚持原来的计划，对于我的呈文，不加考虑就批准了，这能怪我吗？"

其实曾、吴都被蒙在鼓中，如果他们知道段祺瑞早已就徐树铮的事和黎元洪打过招呼，大概就不会生出这么多疑问和遗憾了。

与先前一样，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就等于让他当了国务院的家——国务院一切大小公事都要经其过目，不论是谁，只要对段祺瑞有所请求，段祺瑞总是说："你去找又铮（徐树铮的字）谈谈。"段祺瑞当面答应的事，徐树铮不同意就办不通；反之，徐树铮决定的

事，即便事先没有请示，段祺瑞也无不支持。有人因此讽刺段祺瑞是“刚愎他用”。

天地咒

出了国务院的大门，徐树铮的霸道作风丝毫未变。按照责任内阁制，总理总揽一切军国大计，但是其决定得用大总统命令的形式发表，也就是说，必须经过总统府盖印这道手续，否则无法生效。在段祺瑞、徐树铮的心目中，总统就是一架盖印机器，没有对命令内容置喙的余地。

问题是，黎元洪本人不会这么认为，他把掌握总统府印信看成一件大事。当时总统府的监印官叫作辑瑞室主任，为了表示慎重，黎元洪特地命他的亲家、长子的岳父唐某担任。

一般情况下，段祺瑞不会自己拿着公文去盖印，这事主要由徐树铮负责。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道命令来到总统府请唐某盖印。唐某把全文看了一遍，然后嘴里习惯性地嘟囔道：“这样的措词合适吗？恐怕还要斟酌斟酌吧……”

“老兄，请放心，你只管盖你的印好了。责任内阁制嘛，一切由总理负责。”徐树铮不等他说完，就很不客气地说，“你要说他（指段祺瑞）的命令不妥，明白的人知道你在文字上推敲，力求工整，不知道的人，不是说你胡乱干涉国政吗？”

徐树铮说这番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着说唐某，其实是暗示黎元洪不应该在盖印环节上加塞。唐某没听出来，仍然嗫嚅着说：“这事儿总统要找……”

徐树铮见他不知趣，便故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总统要是对老兄还不放心，那就只好请他自己盖印了！"

唐某无法，只好在命令上盖了"大总统印"。徐树铮回到国务院，一见到段祺瑞及秘书们就不由放声大笑，说："我今天给菩萨念了一遍天地咒。"

自从被徐树铮教训了一顿后，唐某尝到厉害，真的不敢再多管用印的事了。黎元洪见状，便把印信带到自己办公的地方，交给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保管，这样徐树铮要盖印，就必须直接找黎元洪办理。

管印的换成了总统，徐树铮一样不买账。有一次，黎元洪看了命令，也觉得有些地方不妥，就拿起笔准备在文字方面稍作修改，不料徐树铮立刻拉着他执笔的手说："总统，这万不能随便改……"

尽管徐树铮和颜悦色，用的似乎还是恳求语气，可是黎元洪还是被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徐树铮的过分之处还在于，总统对国务院有所指示，国务院秘书长照例应在国务会议上进行报告，徐树铮则是愿意报告就说两句，不愿报告就撂到一边，当黎元洪完全没说过一样。对黎元洪交办的事也是如此，他愿办就办，不愿办就高高挂起。

某日，国务院在一天内更调了山西省的三个厅长。徐树铮拿着相关命令去盖印，黎元洪见了自然要问问原因，徐树铮却不耐烦地说："总统只管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写什么，我还忙着呢！"黎元洪被弄得十分难堪。

这类事情多了，即便黎元洪是有名的泥菩萨也忍受不了，他气愤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

在徐树铮的影响下，国务院的许多办事人员都只知有段总理而不知有黎大总统，就连内阁中的一般办事人员都敢挖苦顶撞黎元洪。

当初吴光新得知徐树铮要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就对曾毓隽断言："这样一来，国务院从此多事，你若不信，拭目以待。"如今果然弄成了一个多事的局面，幸亏张国淦一直从中周旋调停，冲突才没有进一步激化开来。

黎元洪和徐树铮的矛盾，其实就是他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自那一年到北京后，袁世凯虽然也不给黎元洪任何政治实权，可是大面上还过得去，平时礼尚往来，嘘寒问暖，起码把他当个佛一样地供着。

袁世凯会的一套，段祺瑞不会，他为人一向非常严肃，无论对谁，都是板着面孔，很少露出笑容，更不会说什么玩笑话。跟黎元洪在一起也是如此，不会故意装出推重尊崇的样子，这让黎元洪内心里很不舒服。

在段祺瑞看来，大总统职位本来非他姓段的莫属，只是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才把黎元洪扶上了"马"，而对于扶黎上"马"，他也是很认真很花力气的。可是有与段祺瑞关系不睦的人为了挑拨离间，却向黎府吹风，说："我们在项城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元洪）继任，是东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

黎元洪听后信以为真，对段祺瑞更加不满，现在再加上一个徐树铮，那股怨气已到了难以化解的程度。

限于自身力量过于薄弱，黎元洪虽然满腹怨尤，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也只能忍气吞声。他敢于和段祺瑞唱对台戏，乃是发现国会和议员倾向于自己以后的事。

左右逢源

袁世凯时代的国会议员一年可以领到五千元薪水，这种收入水平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百姓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算是比较丰厚了。后来袁世凯解散国会，议员领不到薪水，大多数人都过了一段苦日子。现在国会重新恢复，议员们就觉得自己的议员地位不保险，说不定国会什么时候又要关掉，于是大家纷纷以议员的头衔为阶梯，踏上了猎官求官之途。

议员之中，以政学会议员对于求官最为热衷。政学会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之所以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就是因为北洋系对国民党的印象不好，继续挂着国民党的老招牌于做官不利，只有脱离了国民党，才能更好地奔走于黎段之门。当时有人私下评论说："政学会分子都是官迷！"

清末民初之际，想当官的人常常会走公馆的门路，也就是托大官的夫人、姨太太、少爷、小姐甚至是仆人打招呼、说好话。可这在段公馆却走不通，因为段祺瑞的事向来由他一个人做主，即便是段夫人张佩蘅都不敢在他面前提一句公事，更不用说荐官收礼了。

偏门走不进，求官者们只好走正门。对于这一伙求官的议员，段祺瑞开始还能敷衍敷衍，后来看到来的人太多，胃口又都不小，便一

律飨以闭门羹，以至于有些并非求官，真是来和他商榷政事的议员也连带受到了冷遇。

黎元洪则不然。他对于议员求见向来是来者不拒，而且接待态度平易近人。如果对方谈到求官问题，黎元洪照例会说：“只要你和段总理方面商量好了，我这一方面毫无问题。总理若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

相比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段祺瑞，黎元洪左右逢源，得到了很多议员特别是国民党、政学会议员的支持。重开后的国会仍以国民党议员居多，他们多数拥黎反段，有了他们做后盾，黎元洪顿时觉得局面与先前迥然不同，也有了可以向段祺瑞说不的勇气。

黎元洪的幕僚们趁此机会建议他掌握兵权，其理由是，虽然政府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但仅指政治而言，在军事方面，总统既然名义上是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价值？”

想到同为大总统，与袁世凯的实际地位相差如此悬殊，黎元洪顾影自怜，对幕僚们的话很听得进去。

黎元洪要兵权，段祺瑞不给。段祺瑞认为，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兵权，而且他现在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稳住政局，靠的就是有兵权，如果兵权都没了，国务院还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说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开启了黎段之争的序曲，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权限之争则成了黎段争斗的第一个回合。

黎段之所以争斗不息，而且愈演愈烈，根本原因还是彼此在北京政治主导权到底应该由谁来掌握这一点上，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在段祺瑞看来，既然政府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那么元首就应该自觉地做一个不管不问的“盖印总统”，而把政治主导权完全交给内阁。

实际上，从黎元洪的执政能力以及他所拥有的资源来看，居于“太上皇”的位置对他确实也比较适合。可问题是黎元洪能力不大心很大，自接任总统以来，他“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越来越不甘于无所事事。

如果黎元洪为了顾及总统的体面，只拣点儿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过问一下，倒也罢了，偏偏他还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

段祺瑞当初组阁时，原以为今后最难打交道的是国会，没想到他所碰到的第一个拦路虎不是国会，反而是他全力扶持上台的黎大总统，而且总统比国会还要难缠，这让他如何受得了?

有时被黎元洪“要问”和“多问”烦了，段祺瑞忍不住朝身边的人发火说：“我是叫他（指黎元洪）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的头上的！”

有一拼

除了争夺兵权外，府院双方还常常在官吏任免上较劲：院方想要任用谁，府方会故意挑剔；反过来，府方提出的官员名单，有时也得不到院方的同意。由于府院相持不下，许多已经拟定的官吏人选最后都中途搁浅了。

黎元洪的幕僚们想在外省扶植本方势力，便鼓动黎元洪任命孙发绪为山东省长。任命书已经写好并加盖总统府大印后，黎元洪派时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的哈汉章持令去找段祺瑞，以完成国务院加盖印章这一环节。

哈汉章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他见到段祺瑞后说：“总统因为山东省长缺人，今物色了一位安徽同乡孙发绪，认为人地相宜，即请老师盖令发表吧！”

孙发绪是安徽人，段祺瑞出生于安徽，也以安徽为原籍，哈汉章强调孙发绪“安徽同乡”的身份，自然是以为这样好通过一些。可是段祺瑞虽然极重乡情乡谊，但在任用乡人的问题上却很清醒——在他权位极盛之时，家乡常有人来看他，段祺瑞总是热情接待，临走时还要赠送路费和礼品，然而从不委派或推荐乡人当官。

听哈汉章口出“安徽同乡”四字，段祺瑞勃然大怒，当场拍案骂道：“什么东西！我不认得这个同乡，难道说安徽同乡就该做省长吗？”

见段祺瑞发了火，哈汉章情知不妙，赶紧起身溜走了。

段祺瑞固然讲原则，但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也并不缺少灵活权变的一面。哈汉章走后，有人向他透露，说黎元洪其实在山东省长这一席位上考虑了三个人选，孙发绪在三个人中尚属“势利官僚”，看风头行事的角色，对段派并不敌视。另外两个都是厉害角色，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任命孙发绪。

段祺瑞听了觉得颇有道理，便勉强同意了这一任命。

尝到甜头的黎幕又开始在更为重要的阁员名单上做文章。按照“临时约法”及民国惯例，只有国务总理由大总统提名特任，其他阁员人员均应由总理提出，但黎元洪却在幕僚们的怂恿下，擅自拟定了另外一份阁员名单，然后一面通知段祺瑞，一面径行提交国会。

进入黎元洪所拟名单中的大部分人，或为结好黎幕的议员，或与黎私交素厚，或为黎的同乡，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唐绍仪，他被提名为外交总长。作为民国改元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资望较崇，黎幕推他出山的目的，是预备将来黎段交恶乃至决裂时，可以把段祺瑞换掉，以唐绍仪继任总理。

段祺瑞拿到名单后内心很不痛快，但因为担心引发府院之间新的大冲突，所以当场未做任何表示。见段祺瑞默然不语，徐树铮一时也不便多言。

被人按着头不吱声，从来不是徐树铮的性格。退出帐外后，他忽然心生一计，决定不直接向黎元洪提出任何抗议，而是以唐绍仪为突破口，通过各省北洋军人对黎元洪进行施压。

在徐树铮的策划下，由冯国璋、张勋领衔，二十多名北洋将领发出联名通电。通电不仅列举了唐绍仪的各项“罪状”，而且称如果政府执意让唐出掌外交，以后各省将对外交部与各国所订条约一概不予承认。

此时唐绍仪已由上海到达天津，正准备赴京入阁，通电一出，只得又返回上海。

黎元洪是个经受不住压力的人，通电自然令他心惊胆战，开始后悔自己在内阁名单上采取了过于轻率的态度。黎元洪的幕僚们原来嚷

得很凶，如今也被一纸通电给压得没了一点声音——他们多为文人政客，胆子再大，也不敢真的与一群持枪在手的武人叫板。

黎元洪前倨后恭，亲自打电话邀请段祺瑞过府，以便重新商定阁员名单。

段祺瑞尽管又一次占据了主动，但为了使新内阁能够尽快通过，还是决定以混合制方式组阁，在阁员人选上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除陆军总长由他自己兼任外，其他阁员都尽量依照黎元洪的推荐和提名，从不同集团和政党中选用。

在不断升级的府院争斗中，夹在中间的“千年和事佬”张国淦也渐渐招架不住，于是索性挂冠而去，辞掉了包括总统府秘书长在内的所有职务。

黎元洪选用的继任者为丁佛言。他是第一个出来做官的国会议员，此人性格浮躁，爱兴风作浪、卖弄聪明，虽说能力可能不及徐树铮，但在不安分和好斗方面倒绝对与徐树铮有一拼。

丁佛言不再像张国淦那样好说话，他利用总统府秘书长的职权，时常将国务院呈交的公文和命令留下或不盖印。徐树铮被惹得三天两头地跳脚，二人争吵甚至互相谩骂的事屡有发生。

跟徐树铮争尚不过瘾，丁佛言还要跟段祺瑞斗。他对一位议员说：“决与歪鼻子（指段祺瑞）较量一番。”那人劝他：“你的力量不足以推倒段，相反要坏事。”丁佛言哪里听得进去，他不服气地说：“那就试试看吧！”

为了限制段祺瑞的权力、提高黎元洪的地位，丁佛言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张总统要参加国务会议，以及当院方呈请总统用印时，如黎元洪有不同意见，必须交国务院再议，等等。

黎元洪看到这个草案，没有不表示支持的道理；相反，段祺瑞则被气得火冒三丈，乃至于提出要辞职。

黎元洪已经见识过对方的厉害，在段祺瑞的一番示威下不得不让步，而段祺瑞认为时局还不够稳定，不能把与黎元洪的关系搞得太僵，因此也同意进行折中处理。

几经磋商，双方拟订了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与此同时，段祺瑞也针对部下们以往对黎元洪的不恭敬行为进行了一定约束，段黎关系一度有所缓和。

府院之争的高潮刚刚落下，国务院内部又起争端——以孙洪伊为首的黎派阁员与段祺瑞、徐树铮闹起了别扭。

害群之马

由于在段祺瑞内阁中黎派阁员占据优势，所以这场争端虽然发生在国务院内部，但其实也是府院之争的一种扩大和延续。一手挑起争端的孙洪伊原为进步党人，不过政见上却倾向于国民党，段祺瑞和北洋系对他很反感。他之所以能够入阁，完全是黎元洪提名的缘故。

段祺瑞是看在黎元洪的面子上，才同意孙洪伊入阁的。对孙洪伊，他自然不会予以重用，所以起初安排的阁员职位只是有职无权的

教育总长。不料孙洪伊到京后便以领袖人物自居，当着黎元洪的面，他声称即使不入阁，也不干教育。

这时阁员名单已经发表，黎元洪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让人再找段祺瑞商量。段祺瑞很不高兴地回答道：“就他难缠！名单已发表，谁肯让他？”

事有凑巧，阁员里面正好也有人想调整，原定的内务总长情愿把位置让给孙洪伊。段祺瑞见状，又考虑到必须维持与黎元洪的关系，就再次迁就黎元洪，任命孙洪伊当了内务总长。

内阁组成不久，恰逢李烈钧在广东与人争夺地盘，对段祺瑞调他“来京听候任用”的命令也置之不理。段祺瑞十分不安，便在内阁会议上就广东问题提出讨论。

徐树铮列席内阁会议并发言。按照法理，国务院秘书长只有列席内阁会议的资格，没有发言权，可是既然段祺瑞不予阻止，其他人也就不好讲什么了。

徐树铮提出要组织粤、闽、湘、赣四省军队对李烈钧部进行会剿，并拿出了一个水陆三路进兵的计划。因李烈钧是国民党人，孙洪伊及其他原国民党出身的阁员都对此表示反对，他们采取袒护李烈钧的态度，仅主张进行调解。

内阁会议结束后，徐树铮也不管什么少数服从多数、自己有没有发言权，就按照先前在陆军部的做法，自顾自地拟定了四省会剿李烈钧的命令，然后去找府方盖印。

黎元洪、丁佛言与孙洪伊等阁员平时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当然不肯给他盖。遭到拒绝后，徐树铮便索性在没盖印的情况下把电令发了出去。

事情很快泄露，孙洪伊性情自负，不甘人下，本来上任后就看不惯徐树铮，抓到把柄后马上当面指责他违法越权。徐树铮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二人言辞激烈，声达户外。

自此，孙洪伊挟黎以自重，徐树铮倚段以为抵制，二人皆视对方为仇敌，几乎无时无事不发生冲突，并且这些冲突还都相当激烈，乃至于“短兵相接，日在火并之中”。

“广东案”之后，又发生了福建省长胡瑞麟查办案。袁世凯主政时期，胡瑞麟奉袁世凯之命，曾授意其弟、湖南将军汤芗铭屠杀革命党人。尽管已经事过境迁，但参议院仍有人要跟胡瑞麟算旧账，为此提出要查办胡瑞麟。

胡瑞麟本来和黎元洪有些渊源，后来却投靠了段祺瑞，与徐树铮的私交也不错，因此查办案送到国务院后，徐树铮便不提出阁议，只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资格拟文咨复了参议院。

省长是文官，其任免、查办皆属于内务部管辖范围。孙洪伊从国会方面得知这件事后，马上提出阁议说总理滥用职权，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经过内阁讨论就直接咨复参议院?

其他各部的部长也都有意见，段祺瑞的处境十分尴尬。本来对徐树铮所为，段祺瑞是完全同意和支持的，但为了免使段难堪，徐树铮就一个人把责任承担了起来。

徐树铮就此成为孙洪伊等人集中攻击的目标。段祺瑞无言以对，只好说了一句“树铮荒唐”。

孙洪伊仍旧穷追猛打，又向段祺瑞提出辞呈。徐树铮忍无可忍，对段祺瑞说：“姓孙的太狂妄了！他想胁迫总理，我看干脆批了他的辞呈，把这个害群之马赶出内阁。”

孙洪伊得理不饶人，段祺瑞偏偏还不能赶他走，其直接原因是总统府和国会的一些人正借机大做文章，黎元洪还特招孙洪伊前去见面，对其大加慰留。

毕竟是自己理亏在先，黎元洪又做此表示，段祺瑞于是也不得不对孙洪伊进行了慰留。

孙洪伊有了面子，这才答应收回辞呈，但又迫使段祺瑞答应对院秘书长的权限进行限制，其中包括不能对内阁会议的决定进行擅改，以及政府命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后，才能送总统府盖印发表，等等。

此次冲突的结果，徐树铮受到了重大打击，此后他与孙洪伊的争斗便开始表面化，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热火朝天

孙洪伊上任后，一度想安插自己的人当京师警察总监。京师警察系统虽隶属于内务部，但对总监这样高级别官员的任免，必须得到总理的认可才行。

段祺瑞怎么可能让孙洪伊随心所欲地布置自己的势力，他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

孙洪伊安插不了总监，又把主意打到了部内。早在未入阁之前，他的“夹袋人物”也就是亲信和存记备用之人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这些人都要进行安置，孙洪伊就以整顿内务部为由，裁减了原有的一批高级部员。

部员们突然丢了饭碗，恨不得找人拼命。徐树铮见有机可乘，遂鼓动他们上诉平政院。

平政院即后来的行政法院，主要负责监察行政官吏的违法和不正当行为，原肃政厅即为其下属机构。接到有关内务总长违法裁员的投诉后，平政院裁决原告胜诉，并要求孙洪伊限期撤销解职令，准许被解职部员重新回部上班。

平政院是根据袁世凯时代的“民三约法”设立的。孙洪伊紧紧抓住这一点，认为平政院的存在本身是否合法还存在疑问，所以拒绝执行该院的裁定。

徐树铮见状，赶紧与段祺瑞商议，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定的命令，准备送府盖印。可是按照新规定，命令须由孙洪伊副署，而孙洪伊拒绝副署。

平政院听说自己的裁定竟然不能被执行，顿觉大丢脸面。他们请段祺瑞主持公道，说：“如果平政院真的不合法，请总理立即下令解散。如果是合法的，为何判决不能生效？”

平政院方面还声称，倘若孙洪伊继续拒绝执行裁定，他们将集体辞职。

段祺瑞把孙洪伊叫来，让他无条件执行裁定。孙洪伊却抵死不肯，还公然对段祺瑞进行顶撞。段祺瑞勃然大怒：“你这是结党营私，滥用私人！平政院的判决我看很合理，难道你还无法无天了？”

段祺瑞即便动怒也没能镇得住孙洪伊，孙洪伊根本就不把他这个总理放在眼里。这使得段祺瑞痛下决心，随后便向总统府呈请将孙洪伊予以免职。

孙洪伊在段祺瑞面前如此强硬，本身就与得到了黎元洪的支持有关。他虽为段内阁成员，却得到黎元洪的高度信任，可参与黎幕的一切密议，隐然执总统府之牛耳。徐树铮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前往总统府，去了四次，次次碰壁。最后一次他忍不住对黎元洪放言：“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洪伊的字）出席国务会议！”

见徐树铮又开始对自己不恭不敬，黎元洪顿时火了，他大喝一声：“你说的这是一句什么话？”

徐树铮冷冷回答：“这是总理说的。”

府院之争如此热火朝天，原先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国会议员们也都按捺不住，纷纷加入战团。

此时的国会议员中有两大派别，一是以原国民党人为主的商榷系，一是以原进步党人为主的研究系；基本政治倾向是商榷系靠拢黎元洪，研究系接近段祺瑞。

自段祺瑞的免孙令一问世，商榷系议员即向段内阁提出质问，认为只有国会弹劾才能罢免国务员，国务总理无权直接呈请罢免。更有甚者，还有六十余名议员联署提案，要求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

商榷系起劲，研究系议员同样把战鼓擂得咚咚响。先是其机关报猛烈批评孙洪伊“违法”，接着研究系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又亲自谒见黎元洪，劝其尊重舆论，主动调换孙洪伊以息争端。

在国会的推波助澜下，段祺瑞一反以往尽量克制或不直接表态的处事态度，亲临总统府催促黎元洪为免孙令盖印。

可是黎元洪仍然一再推诿，段祺瑞不由脱口而出：“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那就请免我的职吧！”

黎元洪虽然与段祺瑞有矛盾，但也知道如果缺了段祺瑞撑场子，他这个总统必然做不长久，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

各打五十大板

黎元洪要为孙洪伊留面子，于是加紧劝说对方自动辞职。不料孙洪伊却不肯给他面子，死活不愿辞职。

之后，黎元洪又请王士珍做说客，提出可以让孙洪伊以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部务由次长代理。这未尝不是一个下台阶的办法和机会，然而孙洪伊还是拒绝从命。

段祺瑞一面令人起草辞呈，一面也放出风来，说只要孙洪伊肯辞职，可以调其任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孙洪伊回复得更干脆：“政治家要硬干，无论做何牺牲，决不辞职。”

当孙洪伊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颗铜豌豆之时，他在内阁的进出，也就成了总理能否维持其威信的标志。段祺瑞怒气冲冲地

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黎元洪左右为难。当然他不认为问题出在孙洪伊身上，而只会认为全都是段祺瑞的错。幕僚们趁势建议邀请在河南隐居的徐世昌赴京组阁，以求彻底解决府院问题。

在幕僚们看来，北洋系是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而徐世昌在北洋的资望又在段祺瑞之上，以徐代段，不会引起严重后果。黎元洪的政治智慧并不比他的幕僚高出多少，他居然也认为此计甚妙，当下就派代表前往河南敦请徐世昌出山。

黎幕不知道，资望是一回事，实力又是另外一回事。徐世昌不掌握北洋军权，那么明白的一个人，他岂敢凭着一个北洋元老的虚衔去摸老虎屁股?

徐世昌开始一再推托，在黎元洪派使两顾茅庐的情况下，才答应进京，但只是调解，"帮助总统分忧"，而不是取代段祺瑞做总理。他让人转告黎元洪："要我做总理万万使不得，芝泉的脾性我知道，这样做必定后患无穷。"

为了避嫌，徐世昌还特地通过报界宣布了个人的三条原则，即"拥护元首"（指黎元洪）、"维持合肥"（指段祺瑞）、"不入政界"（指徐世昌自己）。

徐世昌到京后，在着重对段祺瑞的想法进行摸底的基础上，正式向府院提出调解办法：三天之内将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免职。

段祺瑞对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表示同意，黎元洪驱段不得，也只好下令免去了孙洪伊内务总长的职务。

孙洪伊离开内阁后，重新恢复了议员的资格。他对免职一事很不服气，便又组织被称为“小孙派”的一部分国民党议员，利用国会对段祺瑞进行攻击。

徐树铮下台后也不甘心，孙洪伊继续折腾的做法则让他更加恼火。在徐树铮的策划下，步军统领（清代称九门提督）江朝宗派兵到孙洪伊家中进行搜查，理由是孙宅隐藏乱党，意图不轨，孙洪伊本人也有“阴蓄死士进行暗杀”的嫌疑。

自此，孙宅三天两头遭到军警的光顾。孙洪伊到底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政客，吃不消惊吓，只好逃出北京，到上海租界避难去了。

这是继策动各省北洋军人发表联名通电、反对唐绍仪入阁之后，徐树铮第二次在府院之争中使用非正常政治手段。听说孙洪伊狼狈出逃，徐树铮打着京剧道白对他的朋友们说：“山人略施小计，孙大胡子（孙洪伊）便丢官逃走，一家大小不得团聚了也！”

徐树铮努力装出得意和兴奋的表情，但心里其实并不愉快，因为政敌固然已落荒而逃，可他也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光明正大地在国务院出入了。

徐树铮被免职后，国务院秘书长一职由“千年和事佬”张国淦担任，以融洽府院关系。徐树铮想在幕后操纵，让张国淦按他的意图办事，张国淦有时敷衍他一下，有时也不买他的账。

徐树铮向以“总理第二”自居，他的主张实际上也代表了段祺瑞的意思，张国淦不买他的账，就等于不买段祺瑞的账。这让徐树铮很不高兴，背后骂张国淦：“想不到张乾若（张国淦的字）是个蝙蝠派，给总理当秘书长，不听总理的。”

与此同时，段祺瑞一向对徐树铮依赖甚深，徐树铮的离职让他很不得劲，而且这种不快情绪很快就集中指向了徐树铮的另一个政敌——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佛言。

在徐世昌进行调解，并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时，段祺瑞就曾提出：“要免，丁世铎（丁佛言的原名）一起免。”

在段祺瑞看来，孙洪伊免职仅仅只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作为原先府院双方的秘书长，府院之争焦点之一的徐树铮既然已经去职，丁佛言也不应该再留在总统府。他对黎元洪说：“我的秘书长搞掉了，你的秘书长我还不满意呢。”

丁佛言是黎幕的主要人物，黎元洪自然不会轻易答应段祺瑞的要求，于是当即回答：“你的秘书长出了错，与我这里有什么关系？”

徐树铮虽然离开了国务院，但却从没有离开过段祺瑞的左右，而无论是为了帮段祺瑞争夺政治权力，还是给自己找回些面子，他都觉得有必要让黎元洪收回“有什么关系”这句话。

明枪不行，徐树铮又想到了暗箭。在他的授意下，以冯国璋领衔，全国二十余省区的北洋军头发出了“掬诚忠告”总统、总理、国会三方面的电文，其中提到“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力予摒斥”。很显然，“飞短流长的政客”指的就是丁佛言。

接着，长江巡阅使张勋主持徐州会议，请总统罢免“佞人”。随后，又发出电报，公然指责丁佛言挑拨是非，离间府院关系。

当年徐树铮曾用这一套中途吓退唐绍仪，迫使黎元洪让步，如今也同样有效。黎元洪看到电报后，再不敢对抗下去，只好让丁佛言辞职并予以批准。

中而不能立

丁佛言在他的辞职书上说："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这是丁佛言的心声和怨尤，更是他的幕主黎元洪的心声和怨尤。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只能给别人盖印的"虚君"，虽然他在府院权限之争、徐孙（徐树铮、孙洪伊）交锋中接连落败，但只要有机会就还要跟段祺瑞较量一番。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仅数月之后，府院便又展开了第三回合的角力，京城更大的政潮汹涌而至。

与前两个回合主要局限于权限、人事不同，这次还涉及了彼此的政见分歧，具体来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问题。

"一战"爆发于袁世凯当政时期。战事开始之初，因为中国远在亚洲，对国际间的情况也不十分明了，需要时间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观察，所以袁世凯决定暂时先采取中立方针，避开这场战火，为此还颁布了中立二十四条规，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中国境内有交战行为，不得把中国海陆各处作为攻击敌军的根据地。

可是就在中国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便突然打破中立条规，派舰队声势浩大地驶入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此后，又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尽数掠去。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曾有过响应协约国要求对德宣战，借以使山东免遭日本侵占，同时摆脱其外交讹诈的动议，但由于遭到日本政府的直接反对，以及英美不敢开罪日本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得不暂时搁置。

“中而不能立”，让中国政府的处境既尴尬又被动，实际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德国抗议中国不能严守中立，致使其在山东的权利丧失；没跟德国翻脸，给德国的庚子赔款就得一分钱不少地照付；协约国没有得到中国对德宣战的响应，很不高兴；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直至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他从执政开始就对“一战”非常关注，并且认为“中国当先准备”，为此，还特地在国务院辟西花厅，约集外交部及对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的专家学者，共同对“一战”进行研究。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对德国强大的军事体系有很深印象，这使他最初还认为德国在“一战”中没有落败的道理。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以及外交格局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德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不可摧。

段祺瑞开始和协约国方面进行秘密接触。1916年10月，他会见在华的英国人，谈到了中国参战一事；当年年底，更将投入协约国阵营，参加对德作战的意图相当明显地表示出来。

最终使段祺瑞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则是美国的参战。作为国际新贵，美国在“一战”初期也没有加入协约国，它采取的是一面保持中立，一面调停议和的外交政策，不过段祺瑞那时就预感“欧战（即“一战”）倘持久，美国终将加入”。

果不其然，1917年年初，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艇封锁政策”，美国对外投资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德国关于建立德、墨（墨西哥）、日三国反美同盟的密电被英国破译，随后又转告美国。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终于发生了戏剧性转变，遂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劝告其他中立国与其采取一致态度。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除照会中国外交部外，还连日拜访黎元洪、段祺瑞，陈述中国参战的好处。为了增强中国参战的积极性，他甚至自行向中国做出了提供援助的保证。

芮恩施的许诺当然会让段祺瑞动心，不过此时中国国内朝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参战持强烈反对态度，有人就认为，德国潜水艇的破坏力极大，如对德绝交或宣战，中国就是德国的敌国，沿海地区必会首先蒙受损害。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去何从，段祺瑞不能不结合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重新对参战的利益得失进行综合评判。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果说“一战”开始时，大家都还押不准到底谁输谁赢。进入1917年，当“一战”的对立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参战就表明大战已近尾声，鹿死谁手变得非常清楚了。段祺瑞认为，要使山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就必须有机会参与战后的和会，从而与日本争夺失去的权益。

即便不考虑山东问题，中国继续保持中立也不明智，因为“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中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

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民初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世界列强所看不起的国家。尽管客观地讲，以彼时中国的实力，一旦宣战，根本不可能耗费大量金钱，或者派大批军队到国外去作战，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列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国际地位及权利总有望得到提高，也有分享战胜国所应享有利益的希望。

除此以外，段祺瑞还有经济上的其他盘算。“一战”爆发后，德国成为与银行团其他成员对峙的力量，五国银行团实际成了四国银行团（英法日俄），第二笔善后借款也告吹了。倘若不是袁世凯整顿财政，加强税收，并发行国内公债，政府差点就维持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护国战争“耗费国帑甚巨”，而地方上本来应解送中央的税款，也被各省截留。发行内债吧，旧债尚未整理完毕，续募新债自然无人搭理。

民初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代理国库，但自袁世凯称帝，两家银行一共仅剩下两千万元的现金，为维持军政费用，只得停止汇兑，也就是说它们发行的纸币不能再与现银同价流通使用。加上投机商人操纵其间，纸币价格时涨时落，老百姓受损颇巨，以至于“手持国币不能买斗米升粟”。

可以说，段祺瑞从袁世凯手上承接的就是一个烂摊子，除了向四国银行团续借外债，他没有其他办法可想，然而四国银行团除日本外，全都在欧洲忙于战争，并且本身国内财政也很困难，并无能力再借款给中国。

当时有能力对华借款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日本当政的大限内阁是“二十一条”的提出者，主张以强硬手段对华交涉，段祺瑞本人在“二十一条”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又是坚决的主战派，他领导下的政府当然不可能主动向日本开口借钱。

美国成了唯一的选择，在驻美公使顾维钧的努力下，段政府分两次向美国借了五百万元。这件事本来是在内阁秘密讨论通过的议题，可是时任内务总长的孙洪伊为了在市场上谋取厚利，却故意向外界放风，结果此事就被银行团给发现了。

善后借款协议之苛刻之处在于，它附加了很多额外条件，就像绳索一样左一道右一道地把你绑起来。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中国不能与银行团以外的国家签订政治性质的借款合同，美国不在四国银行团之内，就被认为违反了协定，四国银行团当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没法再向美国借了，而已经到手的区区五百万元又不足以应付政府的日常开支和急需——这笔钱是1916年借到的，当年就花得差不多了。到1917年前后，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已达极点，段祺瑞及其内阁也一度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步。

通过与包括英美在内的协约国方面的接触，段祺瑞得到启示，即只要中国参战，不仅可获得协约国集团财政上的“援助”，还能缓付庚子赔款和提高关税。

正是有了这些深思熟虑，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游说之前，段祺瑞就已决定参战，并让张国淦写出提纲，以备在国务院范围内进行讨

论。当芮恩施拜访段祺瑞时，他发现这位中国总理已经在考虑与德国断交的可能性。

需要提出的是，美国的参战劝告针对于所有中立国，没有强邀中国之意，提供援助的许诺也不是其政府的本意。而后，在其他重要中立国均未响应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反过来又劝告中国无须单独与美国保持一致，并暗示芮恩施在此问题上推动过头。

对段祺瑞而言，响应美国的参战劝告是加入协约国阵营的一个机会，岂可放过，至于“单独”与否，本来也不是他考虑的重点。1917年2月9日，中国向德国政府发出照会，对德国的潜艇正式提出抗议。这一行动非常果断迅速，事前连协约国公使也未听到风声。同日，在给芮恩施的回文中，段祺瑞也明确表示了打算参战之意。

无冕大臣

黎元洪虽然与段祺瑞处于实际的对立状态，但在对德绝交的问题上，二人起初还是一致的。他的态度出现变化，是在发现日本积极介入之后。

当初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尤其是“二十一条”，即便在日本国内也广遭非议，日本元老派和其他持重稳健人士都对此表示不满。日本元老山县有朋的嫡系、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评价道：“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徒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在大隈即将倒台前夕，寺内便被山县等元老选定为继任者。鉴于前任在对华外交上的失败，寺内主张“中日亲善”，以缓和中国国内的

仇日情绪。为此，他派西原龟三以个人名义来华，对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进行试探。

西原本人自称是“王道主义者”，指责大限内阁的对华政策是“霸道主义”，对其持强烈反对态度。西原来华后见到的第一个高官是有亲日派之称的章宗祥。他告诉章宗祥，寺内不久将组阁，新内阁会一反从前政府的态度，彻底实行“中日亲善”。

章宗祥因为还没有完全弄清西原的底细，所以未与之深谈，对西原的亲善之谈，他也认为只不过是普通的门面话。可是在得知寺内有可能成为日本下届政府的首脑，西原又是这位未来首相的使者后，段祺瑞却非常重视，立即予以接见。

当初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段祺瑞曾是政府要员中为数极少的主战派，那时他对日本的态度，如果用现代政治术语来描述就是鹰派。不过另一方面，段祺瑞又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他认识到，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环境已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

早在民国创建之前，身为清廷要员的袁世凯就主张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即联合美国、德国，制约日本。在袁世凯成为民国元首之后，这一政策得到延续，中日关系也因此十分紧张，“二十一条”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

段祺瑞主张将“远交近攻”改为“一律看待”。他说：“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换言之，只要其他国家主动示好于中国，就没有必要先入为主地予以排斥。以此新政策

来看待日本，如果寺内新内阁真的能够改变对华政策，则绝不妨碍他老段由鹰派转变为鸽派。

这时德日因“一战”已成为敌对国。为了表明自己并不亲德，段祺瑞在接见西原时，便要他回去转告寺内：“日本因为我留学德国，故认为我和德国有着特殊关系，这诚然是多余的顾虑。”

寺内曾赴法国，并担任过驻法公使馆的附武官，段祺瑞以此打了个比方：“据说寺内先生长期在法国，但并没有人说他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我所想的只是中国和东方。”

此次接见不久，段祺瑞即派章宗祥出使日本，与日本加强往来和接触。临行前，章宗祥请示对日基本方针，段祺瑞向他明确交代：“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用于今日。”章宗祥素来主张与日本搞好关系，见作为总理的段祺瑞与他见解相同，“心中为之一安”。

当章宗祥以驻日公使的身份出使日本时，寺内内阁已经正式成立，西原又跑来与章宗祥会晤。

虽然大隈内阁已经下台，但当时中国各地仍有大隈内阁所派遣的浪人到处兴风作浪，四处捣乱，尤其是山东胶济沿线一带折腾得更凶，这让章宗祥感到十分头疼。既然西原一直把话说得那么漂亮，他就决定用投石问路的办法来试一试，于是便托西原传话给寺内，要求予以解决。

不久，日本政府果真下达命令，取缔分散中国各地的浪人，要求一律限期回国。

在感到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确有变化的同时，章宗祥也惊异于西原身上巨大的能量，因为西原并非寺内内阁的成员，也不在日本政府担任任何实际职务，用北京政坛的习惯用语来说，他不过是寺内私人的一个跑腿混混儿而已。

事实上，西原却绝不是“跑腿混混儿”这么简单。自寺内担任朝鲜“总督”起，他就一直追随于寺内身边，帮助其策划运作，深得寺内的信任。对这位“无冕大臣”而言，取缔召回浪人，不过是小事一桩，为了促成寺内所谓的“中日亲善”，他还有更大的礼包要送出来。

见面礼

再次与章宗祥见面，西原提到，中国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财政，而要整顿财政首先就需要一笔款子，如中国要借款，日本可以施以援手。

包括善后大借款在内，中国所借外债向来都拿不到实数，总要被七扣八扣减掉许多，这也常常会被外界认为是经手人拿了佣金或“回扣”，具体到向日本借款，则更为敏感。对西原主动要借款给中国政府的提议，章宗祥事先没有心理准备，不敢贸然答应，只好推托说自己怕因此遭到猜疑，不愿涉足其中。

西原真是有够贴心，过了几天又对章宗祥说，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借款时十足交款，答应借多少，实际付款时就给多少，中间不再给经手人佣金，如此经手人就可以干净了。

西原同时声明借款不涉及政治，不需要抵押。如此优厚的借款条件，段政府乃至之前的袁政府还从未遇到过，正好政府又处于极度缺

钱的当口，岂有不笑纳之理?

西原在日本本国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寺内对他言听计从外，大藏大臣（即财政大臣）胜田主计原在朝鲜帮寺内主持理财工作，从那时起，他与西原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在大藏省内，西原可以随便命令和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让银行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

需要避开的还是国际财团，因为按照善后借款协议，四国银行团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单独对华进行政治借款。西原虽然口口声声借款不涉及政治，可是也怕银行团知道后会大加诘责，所以只能秘密办理。

这时在日本控制的范围内，有三家专营长期投资业务的特种银行，分别是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经过研究，便决定由三家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给中国交通银行。

双方商定后，西原一个电报发到东京，胜田马上回电同意。这是寺内上台后，通过西原之手借给中国政府的第一笔款项。

借款办理得如此顺利，出乎北京的意料，也使得段政府进一步确证了寺内内阁的政治信用。一拿到款项，段祺瑞立即派吴光新拜访日本驻华公使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以表达自己“认真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决心。

对于西原和日本政府而言，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是其表达“诚意”，让中国消除戒心的见面礼。自此以后，西原在段政府面前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他开始更积极地促成中国对德宣战。

日本本身是协约国成员，站在协约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角度，西原一直担心中国被德国所诱惑，把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提供给德国，从而对协约国产生不利后果，所以他在为借款奔走的同时，一直努力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

不过寺内内阁想的与西原却不完全一致。寺内固然不乐意中国支持德国，可要是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反过来使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得而复失怎么办?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了游说中国参战，尚能背着政府夸下“援助”的海口，西原与高层关系紧密，可以做到言出必行，反倒不能这样信口许诺，因此在段祺瑞决定参战之前，其实并没有得到过日本将全力对华“援助”的确切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开始对日方的“好意”产生疑虑。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一手经办了交通银行借款案，可是也对寺内内阁的新政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章宗祥更曾电嘱曹汝霖，认为西原虽然神通广大，但终究不是外交上负责任的政府人员，勿太过信任，致生波折。

在段内阁中，曹汝霖、章宗祥均被视为亲日派，连他们都这样谨慎，段祺瑞更不会冒险把参战与日本“援助”相联系。实际上，他这时候主要想依赖的还是美国，指望得到的也是芮恩施所说的“援助”。

在发出对德抗议前，日本政府虽然接到了中方的通知，但二者仅隔五个小时，表明到此时为止，北京政府并不把日本的意见作为参战的必备条件。这可把西原给急坏了，他数度向寺内内阁提出建议，认

为如果坐视中国被美国拉进协约国，只会使好不容易打下的一点点“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他先前的种种努力也算白费了。

原先日本政府不放心的主要还是山东问题，寺内内阁为此相继与英、俄、法、意达成谅解，获得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保证。有了这一保证，寺内决定接受西原的建议。

平衡木

响应美国的劝告本是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由头，可是之后美国政府却又变得消极起来，这使得北京政府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也想重新试探一下日方的态度，看能否获取对方的支持。

1917年2月14日，段祺瑞以国务院、外交部的名义联合致电章宗祥，提到中国一旦与德绝交、宣战，就必然需要一笔非常大的费用，到时希望日本和协约国其他成员能够允许，让中国“酌加关税”以及“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期”。

先前对中国未与其磋商，就在美国的劝告下发出对德抗议，日本外相曾酸溜溜地表示过“遗憾”。现在段政府能够第一个跟日本商量“与德绝交、宣战以后的事”，显然流露的是一种“亲日”姿态。在章宗祥就此告知日本政府后，日方“极表满足”，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初次对日诚意之表现”。

为了坚定中国参战的信心，寺内立即派西原前往中国进行游说。在出发前，围绕中国加入协约国的优待条件，西原与首相寺内、藏相胜田、外务相本野进行了磋商，获得了他们的首肯。

2月16日，西原抵达北京，与曹汝霖、梁启超等要人见面，并多次拜访段祺瑞。其间，他们就优待条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西原向段祺瑞暗示，中国如果参战，日本政府可以通过派遣教官、提供军火等方式武装中国军队，但中国并不需要直接出兵欧洲，而只需派华工即可。当然，中国还可以凭此得到更多的贷款。

西原在京的一系列谈话和“保证”，让段祺瑞及其幕僚下决心在对德抗议后，进一步与其断交乃至宣战。

西原与段派成员频繁的秘密接触，立即引起了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反对派的疑虑，认为段祺瑞在乘机投靠日本，借助日本借款，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

本来仅涉及国家利益的参战问题立刻变得复杂起来。黎元洪密电全国名流征求意见，这些意见也以反对与德绝交者居多。这更增加了黎元洪的底气，遂从支持绝交完全转向反对绝交，府院之争也因对德态度不同而进一步升级。

府院相持不下，令南京的冯国璋成为焦点。作为北洋系中除段祺瑞之外的另一个实力派，早在参战风波发生之前，被选为副总统的冯国璋就是府院双方及各方面人士都竞相争取的香饽饽。冯国璋既不愿得罪段祺瑞，又不想令黎元洪难堪，只能采取两边敷衍、不置可否的办法。

2月22日，在黎、段、国会的极力相邀下，冯国璋抵达北京，为府院进行调解，不过其态度一如从前，仍然是息事宁人、不偏不倚。

段祺瑞原以为“四哥”（冯国璋在家里兄弟中排行第四）是北洋袍泽，一家人总会帮着一家人，没想到冯国璋玩的是平衡木。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此重要时刻，他得到了梁启超的鼎力支持。

在清末民初的文化界中，梁启超的文章学识被公认为居于第一流水准，同时他也勇于议政，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梁启超曾经周游世界，对各国的国情形势比较熟悉，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他写成了《欧战蠡测》一书，判断德国在“一战”中绝无取胜的希望。与段祺瑞一样，梁启超原先也是个“亲德派”，这位名副其实的舆论巨子能够主动站到段祺瑞一边，不仅足以抵消社会舆论中的部分反对意见，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段祺瑞的信心。

这时中国对德绝交正好获得了一个极好的理由：继德国政府复照拒绝中国的抗议之后，3月1日，一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搭乘该船的五百余名中国劳工不幸身亡。

段祺瑞抓住机会，当天便在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元洪虽未表示反对，却强调不要急于下论断，应服从国会决定，“倘代表民意之国会决定赞成加入联盟（即加入协约国）”，他个人决不反对。

既然黎元洪这么说，段祺瑞即以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国会各政党领袖举行会谈，结果列席者都没有在对德绝交问题上表示不同意见。

第二天，在协约国公使的敦促下，段祺瑞主持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与此同时，段内阁又草拟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

略”，节略的内容是请日本对中国参战后希望享受的各项权利予以赞助，末尾写道：“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

段祺瑞准备将节略交给驻日公使章宗祥，再由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无论绝交案还是节略，都得经总统同意，段祺瑞认为在国会方面已无异议的情况下，黎元洪也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于是当天就派人将节略送到总统府，不料却意外地遭到了黎元洪的搁置。

没法干下去了

段祺瑞的鼻子歪掉了，气歪的。1917年3月4日，他率全体阁员直接来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绝交案和节略上盖印。黎元洪浏览了一下绝交案，看到有“对德绝交”几个字，马上拒绝盖印。

段祺瑞和内阁不干了，双方大吵了起来。这是一种互相叠加的情绪反应，你给我九分厉害，我就还你十分颜色。一向显得窝窝囊囊的黎元洪也一反常态地发了火，声音非常严厉。

黎元洪强调依照临时约法，他有宣战媾和的特权。内阁亦不示弱，说你有特权不假，但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约法有明确规定，总统必须尊重内阁的决定，你现在这样轻易推翻内阁的决议案，不是目无内阁吗?

一名阁员说到激动处，甚至拍了桌子：“总统简直优柔误国！”

这句话算是道出了段祺瑞的心声，他对黎元洪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

段祺瑞愤而辞职，并于当晚坐专车去了天津。

得知段祺瑞出走，黎元洪那些不知轻重的幕僚们都乐坏了，他们纷纷怂恿黎元洪趁机改组内阁，换一个听话的总理上来。

对于换人，黎元洪内心里求之不得，他征询了徐世昌和王士珍的意见，准备请二人中的一人出任总理。可是徐、王均为政治场上的老手，谁也不愿跳这个火坑，另一边，各省军民长官则发来通电，要求挽留段祺瑞。

压力一大，黎元洪照例又撑不住了，只得请冯国璋亲自到天津劝段返京，同时承诺不再干预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

冯国璋到天津后告诉段祺瑞："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见黎元洪已经让步，段祺瑞也赶快见好就收，随冯国璋返京重新办公。回京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务院、外交部名义致电日本政府，提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到时可与协约国方面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接下来，段祺瑞亲自出席参众两院秘密会议，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此案在两院分别以多数票得以通过。1917年3月14日，北京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绝交。

与德绝交之后，中国随即接收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德奥庚子赔款，同时封存德国在华公产，接收德国在华轮船及其他军用财产，算是获得了加入协约国的阵营的一些初步利益。

在段祺瑞的计划中，绝交只是第一步，宣战才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但黎元洪认为绝交是他在对德问题上的底线，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

这时不仅黎元洪，朝野各界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宣战。当然具体到每个派别和实力派人物，在出发点和考虑角度上都会有所不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主张中立，目的是不希望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再取得成功，从而提高其威望；西南诸侯担心，段祺瑞取得协约国的同情并获得日本的援助后，会对西南贯彻武力统一政策；北洋系虽被段祺瑞倚为靠山，但包括冯国璋、张勋在内的北洋军头或不真心支持参战，或直接把电报打给国务院予以反对，其真实理由却是害怕抛弃地盘，以及带兵到遥远的欧洲去送死以及消耗实力。

就连向来与段祺瑞保持一致的徐树铮，也出人意料地与幕主唱起了反调。徐树铮虽非留德学生出身，却非常崇拜德国。他认为德意志民族优秀，科学进步，绝无战败之理，因此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严守中立。段祺瑞大怒，曾当着徐树铮的面，将他的报告书扔到地上。

徐树铮素为段祺瑞之灵魂，此前别说扔他的报告了，连重话都不会有一句。这一罕见的举动，也表明了段祺瑞所面临压力之大。

就在段祺瑞感到孤立之际，梁启超突然登门拜访，再次以实际行动支持段祺瑞。

第五章　光荣篇章

段祺瑞对来见他的任何客人，向来不迎接到楼门以外，这次得知梁启超来访，他竟然穿上马褂一直迎到院内梁坐的汽车旁边，并且握着梁的手连连说：“老弟，久违！久违！”

把梁启超让到小会客厅后，段祺瑞又让家人在午餐时预备正餐。段祺瑞留客人吃饭，一般只预备便饭，指明预备正餐，是暗示要加添燕窝鱼翅等海菜，以表示对客人的格外尊重。

这天梁、段从上午10点起，连续谈到下午3点多钟，梁启超才告辞而去。

谈话中，梁启超主要分析的还是德国为什么会输以及中国为什么要参战。

德国为什么会输——不错，德国军队确实部队精壮、武器优良，但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的胜负，并不在于军队和武器的强弱优劣，而在于最后谁能在经济上撑得住。仗打了三年，德国的人力物力已经捉襟见肘，而英法等协约国却资源丰富，又有美国在后面帮忙，经济方面远胜于德。

中国为什么要参战——中国既已与德国断绝邦交，那就算是把德国给得罪了，如果迟迟不参战，德国一旦取胜，中国势必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反过来，英法若胜，因并未对德宣战，中国也不能被列为战胜国！

还得依赖实力

梁启超此次访段显然是有备而来，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做了精心研究和准备。在讲到中国因不能参战而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时，他痛心疾首："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低落，将何以自存？况日本业已参战，到德国战败，则东邻虎视，列强环伺，中国的前途更不堪设想！"

由于外界阻力太大，段祺瑞对德宣战上的决心难免受到影响。与梁启超的这次长谈犹如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自此对德宣战的意志更为坚决，要黎元洪明令宣战的心情也更为迫切。

为了攻下黎元洪这座"堡垒"，段祺瑞特邀徐世昌、王士珍、梁启超等人同赴总统府，请黎元洪说明他反对参战的具体理由。

黎元洪当然不能说出我忌惮你老段之类的话，只能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对于舆论反对这一招，段祺瑞早有防备，要不然就不会把梁启超给邀来了。梁启超马上接过黎元洪的话茬儿："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

黎元洪张口结舌，只得把目光转向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王士珍字聘卿）就是一个。”

王士珍的确不赞成，可这只是他和黎元洪私下的交流，万想不到黎元洪会当众把他推出来做挡箭牌。眼看已毫无躲闪余地，不得不闪烁其词：“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这次会谈又是各说各话、无果而终，不仅没有能够弥合黎段之间的分歧，还将府院双方推到了更加水火不容的地步。

除丁佛言外，黎幕尚有被段派称为“四凶”的“四大金刚”，包括哈汉章、蒋作宾等人。这些家伙每天不干别的，就是琢磨如何倒段，而且馊点子着实不少：哈汉章怂恿黎元洪联冯（冯国璋）倒段，蒋作宾更发密电给东北的张作霖，以事成之后许以更大权位为诱饵，要对方反段拥黎。

蒋作宾的密电被段祺瑞的幕僚、陆军次长傅良佐查获了，段祺瑞为免被动，只好立即派人去东北对张作霖进行拉拢。

黎幕固然杀气腾腾，可段幕也不是吃素的。徐树铮在是否参战问题上与黎元洪看法相同，但这并不妨得他准备利用参战问题逼迫黎元洪让步。因为从参战问题出发，可以预知黎元洪以后一定不会和段祺瑞好好合作，国务院的其他政策也不可能贯彻得下去，这是最令徐树铮忧虑和恼火的。

怎么逼迫？还得依赖实力。在这方面，徐树铮早已驾轻就熟。他离京奔走于各地，上海、南京、徐州……对各省督军煽风点火，穿针引线，鼓动他们到京城去参政议政。

徐树铮本来希望冯国璋能出来带个头，但冯国璋自上次来京调解后，已经弄清府院关系之复杂，知道总理、总统和国会这三方都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而且哪一边都得罪不起——冯与段同学同事多年，又是换帖兄弟，至少不能跟段唱对台戏；冯自己是副总统，只要说出任何不利于黎的话，就会令人误会有取黎自代的企图；国会更是惹不得，因为冯本人就是国会选举出来的副总统。

冯国璋对徐树铮说："虽然大家捧我，有了这名义（指身兼副总统），我倒不好说话了，还是推张巡帅出来讲几句话吧。"

张巡帅也就是张勋，因其时任长江七省巡阅使，故有此称。他原先不是北洋嫡系，后来才依附于北洋，属于北洋中的杂牌。

北洋实力既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壮大，又以杂牌居多。张勋以徐州所属八县为中心，所部分布于苏皖各地区，共有步马炮各兵种六十营，共三万人。这在北洋杂牌中已经属于比较强的了，像安徽督军倪嗣冲就只有三十八营近两万人。

民初国内军队有南军北军之称，张勋作为北军杂牌之首，曾被推为北方十三省区大盟主，并三次在徐州召集北军军头开会，遂为各方面所特别重视。

在冯国璋推荐下，徐树铮又邀张勋出面。张勋召集幕僚商量，他的幕僚们认为段、黎"各挟私意以相争"，张勋去了只会被拿去当枪使。张勋听了这些话，便只派了一名代表赴京。

除冯国璋、张勋仅派代表外，其他督军都已同意入京。徐树铮这边一布置成熟，段祺瑞即宣布召集督军们到京讨论时局。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对外只说是讨论裁兵节饷问题。

定心丸

第一个到京的是安徽督军倪嗣冲。由于徐树铮在游说时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嘱咐倪嗣冲在参战问题上维持中立，所以倪嗣冲不仅发电维持中立，而且动身时又发表了反战讲话，说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后果云云。

倪嗣冲也不是北洋嫡系，对府院之争的内幕不太了解。到了京城后他还拎不清行情，以为总统比总理大，于是就先去拜见了黎元洪，同时还保举其侄儿和儿子分别晋升中将、少将。

黎元洪明知段祺瑞召集军事会议是要对他进行施压，心里已经很不痛快，又见倪嗣冲态度恭顺谦卑，当即便决定拿这个"软柿子"开刀立威。只见他沉下脸来，大声呵斥道："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授官是总统的大权，你身为省长，有什么资格求官？"

倪嗣冲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慌忙退出了总统府。

接着倪嗣冲去谒见段祺瑞。段祺瑞对倪嗣冲的反战言论很是反感，一问才知道是他受了徐树铮的影响，本人其实笨笨的、傻傻的，除了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外，并无什么确定的政治主张。

针对倪嗣冲的心理，段祺瑞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明宣战不仅不需要派兵出国，而且还可以获得日本的借款、军械以及其他优待条件。

如倪嗣冲这等粗鲁少文的武人，你给他讲高大上的政治理论，他根本无法领会，但做某事只有大把好处而没有什么坏处，他立刻就能

听懂。再加上黎元洪不给面子，相比之下，段祺瑞却和蔼可亲，于是倪嗣冲马上由反战派变成了最积极的主战派，他向外界大声疾呼："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湖北督军王占元与倪嗣冲遭遇相仿，他当即表示："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其他陆续来京的督军在被段祺瑞逐一开导后，也都对宣战投了赞成票。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督军、督军代表共二十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督军团。

段祺瑞事先准备好了一张签名单，上有"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与会者一致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大名，而后这张签名单便被送往了总统府。

段祺瑞业余爱打牌，每天晚饭后都要准时过上一把牌瘾。督军团进京，令段公馆的牌桌进入了史上最热闹的时代——督军们常聚在段公馆开会，开完会就来上几桌麻将。

倪嗣冲等人在北洋军中号称勇将，他们在战场上究竟勇不勇，段府家人也不知道，但亲眼所见，这些人在赌博场上倒真的都是以一当十，颇有英雄气概。那时候每天的输赢都有千八百块，光段公馆抽的"头钱"（即抽头）积累下来就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了。

督军们把赌博场上的英雄气概顺延到了"参政议政"上，连国务院的内阁会议他们也要参加。当时内阁成员因为辞职、请假、免职等各种原因，一共只剩下三人，可列席的督军和督军代表倒有二十多个，讨论议题时，三个阁员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

有督军团助力，参战案很快就在内阁会议上得以通过。会后，段祺瑞拿着这个方案请总统核准。因为在绝交案风波中，黎元洪已经答应不会反对内阁已经确定的方针，于是只得同意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

国会才是真正难办的。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但他们在国会中并不占多数，占多数的是国民党议员。

说起来，民初的议员老爷们与官僚相比较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食利方面还有过之。就国民党议员而言，他们对孙中山的崇拜，也仅止于崇拜孙的地位，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打算。也因此，当时的国民党议员中有所谓“南孙北张”和“大孙小孙”一类的名词。

“北张”指的是张继一派，该派直接就摆出要与孙中山分庭抗礼的架势。“小孙”指的是孙洪伊的“小孙派”，从在字面上看，这一派还谦虚一点，自称“小孙”，起码是要与孙中山分出大小，以示不敢并驾齐驱之意。

不管出自于“北张”还是“小孙”，这些所谓的国民党议员都只有一个“政见”，那就是拥黎反段。国会会议还没召开，他们已在其党派内做出决定，要“先倒段再议外交”。

孤家寡人

为了排除来自国会方面的障碍，段祺瑞亲自设宴宴请参众两院议员。次日，督军团也举行招待会，招待全体议员，以便为段祺瑞进行疏通。可是在随后的众议院秘密会议上，参战案还是没能通过。

众议院决定将参战案提交全院委员会审查，这意味着通过的可能性已非常渺茫。段幕急了眼，傅良佐等人在未经段祺瑞同意的情况下，即抄袭袁世凯曾使用过的伎俩，组织各式各样的“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欲逼迫国会强行通过参战案。

不料此举适得其反，原本就对参战案持反对态度的议员们正好四散而去，参战案自然也无法顺利通过。

不但如此，段祺瑞还因此遭到了舆论的猛烈批评。在政府内部，有前国民党背景的阁员也对段祺瑞产生不满，正在供职的几名阁员在一天之内都先后提出辞呈。

黎元洪对段祺瑞面临的窘境幸灾乐祸，他对总统府的人说：“阁员都没有了，看他段祺瑞怎么做光杆总理！”

按照惯例，阁员辞职，总统应进行挽留，可是黎元洪却一反常态，凡辞即准。只有外交总长伍廷芳的辞呈他留下不发，为的是准备在段祺瑞下台后、新内阁组成前，由伍廷芳做代理总理。

内阁变得空空荡荡，总理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劝段祺瑞暂时引退，若在平时遇到这种事，段祺瑞不须别人说，自己就会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这时他考虑到辞职会使参战案功败垂成，所以显得犹豫不决。

最后经不住张国淦一再劝说，段祺瑞的态度有所动摇，便让秘书拟写辞呈。徐树铮一向就认为张国淦是个“蝙蝠派”，不像他那样死忠于段祺瑞。得知张国淦居然劝段祺瑞下台，他立即跑到张国淦家里，指责对方是受了府方的指使，要压迫段祺瑞辞职，还说：“将来北洋派瓦解，唯你是问！我能说服总理不辞，不许你再进言。”

当徐树铮接着赶到段公馆时，秘书正将拟好的辞呈送来交段祺瑞审阅。徐树铮把辞呈抢过来，撕得粉碎！

段祺瑞见状，也就暂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督军团不来京不知道，来了才知道国会的厉害。为了帮助段祺瑞渡过难关，他们再次设宴招待全体议员，一面强调段祺瑞对请愿团“事前毫无所知”，一面代段祺瑞向议员道歉。席间，督军们都放下封疆大吏的架子，向议员大献殷勤，甚至鞠躬作揖，请求能网开一面，放参战案过关。

议员们可没这么好打发。当众议院应段祺瑞的咨请，再次讨论参战案时，有国民党议员提出，内阁成员已多数辞职，光杆总理连国会会议都召集不起来，这样的咨文显然不合手续。他建议缓议此案，等内阁改组后再行讨论。

随着这一动议经表决得以通过，段祺瑞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在段祺瑞和督军团眼里，这国会简直太可恶了。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罚酒，督军团便出面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黎元洪以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作为回应。有人问他，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黎元洪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接见督军团代表时，黎元洪还直言不讳地提出，解决时局的唯一途径是让段祺瑞辞职。他说：“我看政局形势搞得太僵。段芝老（段祺瑞）支撑大局，实在艰难，为什么不趁此机会休息休息，躲开冲突，再找一个机会东山再起呢？”

段祺瑞与国会的冲突已成为黎元洪予以反击的最佳利器，他在末了用仿佛局外人的口气再次声明：“现在国会与总理的关系如此恶劣，还是暂避为妙。”

段祺瑞被逼到了墙角边，处境十分艰难，但他知道，自己一旦主动辞职，对德宣战必将化为泡影。为此，他决定以退为进，先后派人或亲访徐世昌、王士珍，请对方出面组织新内阁，并说他本人愿意在新内阁中留任陆军总长。

徐、王均不愿来蹚浑水，一个表示决不接受组阁的任命，一个打躬作揖地“敬谢不敏”。

接着，段祺瑞一反常例，亲自到总统府找黎元洪恳谈，对他说：“我已经找过了徐菊老（徐世昌号菊人），找过了王聘卿（王士珍的字），他们都不肯担任内阁总理。请总统从速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

段祺瑞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无非是希望黎元洪能够对他进行挽留。黎元洪虽然并没有如其所愿，但终于承认暂时还没有找到其他适当的总理人选。

我不干了

鉴于黎元洪和国会都把攻击他的重点放在内阁残破、无法负责这一点上，而且黎元洪的态度也似乎有了一些松动，段祺瑞又亲自提出了一份补充阁员的名单。

当张国淦携带着这份名单前去征求总统府征求意见时，黎元洪已经拟好了对段祺瑞的免职令，他问张国淦：“芝泉的光杆总理还能当下去吗？”

张国淦回答：“总理正打算补充阁员。”

黎元洪冷冷地说：“恐怕全是合肥人吧！”

如果名单真如黎元洪想象的那样，他将当场拒绝接收，然后公布免职令，但是看完名单，他才发现自己想错了。

对段祺瑞拟定的这份名单，其幕僚们曾建议用清一色的自己人来补充阁员，但段祺瑞本人没有接受。他所提出要补充的六名阁员，几乎没有一个属于段派，头三个更是黎元洪所喜爱的湖北同乡。

这是一份有意无意取悦于黎元洪的内阁班子，黎元洪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并留下了名单。

张国淦回去后汇报了与黎元洪见面的情形，段祺瑞感到事情有了转机，第二天亲赴总统府，欲与黎元洪讨论内阁的名单问题。不料黎元洪却对名单上的人指指点点，说这个不行，那个国会也通不过。

段祺瑞想不到黎元洪会突然变卦，犹如全身被浇了一盆冰水，他赶紧强调：“内阁应由总理全权组织，不能完全按国会的意思去做。”

黎元洪的变卦来自于“四凶”的怂恿，后者认定段祺瑞是在用苦肉计兼缓兵计，为的是堵住黎元洪的嘴，他们建议幕主下定决心，对名单不予理睬。

黎元洪照此办理，他不仅当面称段祺瑞已完全失去国会的信任，还提出对方要对督军团“公然干涉制宪，闹得不成体统”负责。

二人不免又要说到对德宣战的事，黎元洪还是说国会不同意，不肯照办。双方越说越僵，段祺瑞拍着桌子和黎元洪大吵，随后愤怒异常地冲出了总统府。临走到客厅门口时，他突然用力一跺脚，回过头对黎元洪说：“我不干了！”

到了段公馆，当家人接过段祺瑞脱下的马褂时，发现他的鼻子已经向左边歪了两指多。段祺瑞虽然一生气就歪鼻子，但是歪得这么厉害，是空前的一次。随行副官也赶紧打“预防针”，叮嘱家人：“我们要小心伺候，别找倒霉。”

段祺瑞脾气上来宣称要撂乌纱帽的话，正中黎元洪的下怀。他的那些幕僚策士们更在他面前推波助澜，说别看老段表面上凶，其实色厉内荏，并没有什么实力，如果直接对他下达免职令，他必只好拂袖而去，如此则天下事不难大定矣。

当天下午，黎元洪即派人到国务院宣布三道总统命令，其中第一道就是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一职，由已递交辞呈，但尚未批复的原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

段祺瑞对黎元洪不留一点余地的做法感到异常愤慨。在决定依旧搬去天津居住之前，他通电全国，认为凡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共和国家，总统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能生效，而黎元洪的三道命令都未经他副署。

段祺瑞在通电中还特地声明，如果黎元洪执意要这样做，“将来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

一会儿，段祺瑞叫来卫队营长杜奎，要求马上预备去天津的专车。杜奎带人到前门车站找站长要车，站长却说刚刚才接到总统府电话指示：“不经总统批准，任何人不得开行专车。”

杜奎不由分说，在强逼着站长备好专车后，即去向段祺瑞汇报。段祺瑞平常照例都要午睡，现在午睡也不睡了，就带着便衣卫队乘汽车直奔前门车站。

段祺瑞刚上专车，“舅老爷”吴光新也来相陪。一行人等了十余分钟，还不见专车开动。吴光新立即让人把站长叫来，问他：“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开车？出了事故你负得了责任吗？”站长回答：“刚才总统府曾来电指示，没有总统的命令，谁也不能擅自开专车走。”

吴光新为人骄傲自大，脾气古怪，平时就很难接近，听了站长的话后顿时暴跳如雷：“他（指总统府）是放屁，胡说八道，不开不行，赶快开车。”

杜奎马上掏出手枪，指着站长的胸前问道：“你开不开车？”

站长吓得脸都白了，一面大声喊快开车，一面对身边的站内职员说：“赶快打电话向总统府报告，专车不开不行。总理大怒之下，不开车就会枪毙我。专车已经开走了！”

连环计

府院之间的天地大冲撞，全都被身在徐州的张勋看在眼里。张勋自许为督军团盟主，虽然他只派了代表赴京，但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政局的发展。公民团事件发生后，见督军团在黎元洪和国会面前也表

现得束手无策，他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渐渐成熟，便开始向一些督军及督军代表发来密函，邀其到徐州开会。

张勋是个复辟派，他在前清时当过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进入民国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人称“辫帅”。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张勋说：“我张勋的辫子等于我张勋的脑袋，脑袋掉了辫子才能掉！”

张勋的军队也和他一样都留着辫子，号称“辫子军”。“辫子军”以剽悍著称，但军纪非常坏。当初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辫子军”攻入南京，张勋竟纵兵掳掠三日，其暴虐程度超过了土匪，犹如刚入关时烧杀抢掠的清朝军队。当时军队中流行着一首歌谣：“穷巡防，富陆军，吊儿郎当镇嵩军，奸淫抢掳找张勋。”

段祺瑞内心里非常看不起张勋这个怪物，即便在迫切需要外援的情况下，他最初仍希望由“四哥”而不是张勋来出面组织督军支持他的主张。

可是在曾毓隽持段祺瑞的亲笔信前往南京后，冯国璋一如既往地把皮球踢给了张勋，他对曾毓隽说：“我虽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坐督江苏，但江南的有些事，还是以徐州的张绍帅（张勋字绍轩）为首。他年资在我等之上，是我们的老大哥，遇事总要请他出来主持。这件事关系很大，应该与张绍帅商量。”

与上次徐树铮劝他入京不同的是，这次冯国璋知道段祺瑞境遇困难，不能光用两句闲话打发。除秘密通知在京的督军和督军代表到徐州开会外，他又当即挥笔写了一封致张勋的亲笔信，信上请张勋出面支持参战并使段祺瑞复职，同时强调这一条件如不能得到满足，即共

同展开逐黎行动，他冯国璋虽不会亲自与会，但一切都会服从大哥（指张勋）安排。

冯国璋让自己的总参议胡嗣援作为代表，拿着这封信与曾毓隽同去徐州。张勋看了信假装客气，对胡嗣援等人说："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办得了？还得请副总统出来主持才好。"

其实这时由张勋召集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已经开幕。在他和冯国璋的共同相邀下，原在京的二十余名督军和督军代表齐聚徐州，与会者一致推举张勋为会议主席，张勋俨然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这令他十分受用。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即收到段幕靳云鹏、傅良佐发来的电报，得知段祺瑞已被黎元洪下令免职，并且段祺瑞通电否认此命令有效。

会场内外顿时掀起一股倒黎拥段的热浪。安徽督军倪嗣冲第一个暴跳如雷，对黎元洪破口大骂，其他人也都群情激愤。

并不是所有督军都像倪嗣冲那样真心拥段，他们有的推崇徐世昌，有的认可王士珍，但总之一句话，他们所拥护之人都得是老北洋这个圈子里的。在他们眼中，黎元洪属于外人，现在外人把自己人给免掉了，分明就是要对整个北洋发起挑战，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量下来，众人一致推举张勋出来推倒黎元洪，另请冯国璋出来当总统，并恢复段祺瑞的总理之位。张勋当天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他的秘书长万绳栻。万绳栻以张勋的原话作为答复："你们的主张我是无法办到的，因为师出必须有名。"

张勋还说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妥妥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把大政奉还给今上”。

在前三次徐州会议中，张勋也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复辟进行过暗示，但都没有说得这么直白，此次会议才终于正式涉及了清室复辟问题。

一听说要以保清室复位为条件，与会者面面相觑，都觉得不能贸然答应。在出席徐州会议的诸人中，有一个人虽非督军或督军代表，但却分外瞩目。此人就是徐树铮，他以段祺瑞代表的身份与会，察觉出张勋真正感兴趣的是复辟，众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松口，徐州会议将不会有任何结果。

徐树铮很快酝酿了一个连环计，即对复辟不再明确表示反对，引诱张勋放胆进行，以便假张勋之手驱走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再拥护共和、打倒张勋，恢复段祺瑞政权。

后来他对人如此阐述自己的用意：“张勋是复辟脑袋，先他去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被火炉炙烤的滋味

当天会议结束，张勋设宴招待督军团，但由于对督军团是否能接受他的复辟主张仍心中无底，所以仍未亲自参加宴会，而由他的义子、定武军（因张勋曾被袁世凯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他的“辫子军”也称定武军）总司令官张文生代为主持。

张文生因为劝酒、闹酒，喝得多了一点，便昏睡在大客厅角落里的一个沙发上。过了不大一会儿，他的酒醒了，只听有人在低声谈论，睁眼一看，原来是徐树铮在和倪嗣冲等人商量着什么。怕对方发觉，张文生赶紧又闭上眼睛，装作酒醉未醒的样子。

这时谈话已接近尾声，只听有人（系徐树铮）这样说："他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再想别的法子。"

徐树铮的话立刻得到响应："走！咱去找他当面谈谈。"

再往下听，就听不太清楚了，一干人一边小声说着一边走出了大厅。

张文生沉不住气了，恨不得把偷听到的话赶紧全都告诉张勋。可是当他跑到张勋的房间里时，却发现徐树铮等人已经围着张勋开起了会，而且大家正谈得起劲，他根本就插不上嘴，更无法单独告密。

见到张勋时，徐树铮用以打动他的第一句话是："芝老（段祺瑞）只求达到驱黎元洪的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

张勋知道徐树铮是段祺瑞幕中第一红人，徐树铮这么一说，他就认为段祺瑞不会反对复辟了。

倪嗣冲等人听从徐树铮的连环计，也都随声附和，说自己赞成复辟。

张勋喜出望外："既然大家无异议，那就再好不过了。"怕众人反悔，他又连忙提议道："不过这件事可不是说说而已，同意了就要做到底，必须坚定不移。"

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张勋当即让副官到后宅去找块黄缎子来签名。副官没找到，可巧张勋的二太太有一块黄缎子，原来准备盖上大印给少爷压邪祟用，于是便临时拿到了前面。

在场的人在黄缎子上一一签字，万绳栻还在上面写了个缘起。签字完毕，张勋把黄缎子交给万绳栻负责保管，接着便和众人讨论起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

徐州会议结束后，倪嗣冲率先在蚌埠发出通电，宣布独立，其通电电稿即出自徐树铮手笔。接着其他各省督军也纷纷响应倪嗣冲的通电，宣布本省独立。

各独立省份的主要目标是对准国会，他们一面派代表到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一面在津浦铁路沿线扣留火车，往天津运兵，以期造成即将发动武装政变的紧张局势。

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之前，处境艰难的是段祺瑞，他处于主动和有利地位，但罢免段之后，他反而尝到了被火炉炙烤的滋味。

除督军团外部施压外，北京政坛内部也已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不仅政府几乎无人负责，就连国会也因拥段的研究系议员出走而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

为稳定政局、笼络北洋系军心，黎元洪又打算起用徐世昌或王士珍为总理，但徐、王均坚辞不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得退而求其次，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

李经羲是前清遗老，其声望和能力与总理的职务并不相称，外界都认为他的上位是个大冷门。黎元洪及其幕僚之所以推重此人，是因

为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安徽合肥人，而且多少也曾是个北洋官僚，他们就想用“以合肥人制合肥人，以北洋派制北洋派”的办法来稳定政局。

可是眼见政局动荡，李经羲也不敢来京就职。黎元洪焦头烂额，被迫向独立各省发出“告哀电”，声明他是为段祺瑞着想，才“暂予免官，俾其养望”，而免段令的副署也有先例可循，不可径指为违法。

督军团对“告哀电”的态度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倪嗣冲在天津谒见段祺瑞时道：“黎宋卿（黎元洪）曾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径行对德宣战不合法。什么他妈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律。他不经内阁副署，就免去总理的职务，是合法的吗？”

说到得意处，倪嗣冲又挖起了黎元洪的老底：“辛亥武昌之变，黎宋卿听到枪声吓得钻了床底。后来不过是因缘际会，依人成事，可是却觍居高位，优柔寡断，竟然妄自尊大，以开国元勋自居，还有谁来拥戴他呢？”

如今的倪督军早就由刚刚进京时不知投靠谁的杂牌军头，一跃成为坚决支持段祺瑞的铁粉。段祺瑞对此当然很高兴，说到对黎元洪的评价，他也就一句话：“国事方艰，庸才足以误国。”

就在黎元洪不知如何是好时，在天津不敢就任的李经羲给他献了一计。

救命稻草

按照督军团在徐州会议期间定下的策略，张勋没有随众宣布独立。此时的张勋与黎元洪若即若离，加上被外界视为督军团盟主，遂有举足轻重之势。正好李经羲与张勋的私人关系又比较密切，于是就劝黎元洪电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各省独立和“兵谏”起自徐州会议之后，作为徐州会议召集人的张勋如果能够出面调停，不但能够劝服督军团，而且足以加强新内阁的地位。

由于张勋一直主张清室复辟，而德国皇室对复辟派表示过支持，所以张勋在对德宣战上一直不太积极，这一度让黎元洪认为张勋站在自己一边，可以进行拉拢。不过张勋毕竟不是冯国璋，在不知其真实态度的情况下，黎元洪对于要不要召此人进京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总统府秘书郭同和张勋是同乡，而且二人过去还有点交情，他自告奋勇，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张勋襄助黎元洪。

得到黎元洪的同意后，郭同秘密前往徐州。张勋正在家里等鱼儿上钩，不仅予以盛情款待，而且对郭同说：“我有三总不做，一不做总统，二不做总理，三不做总长。黎总统是忠厚长者，如果有难言之隐，张某不吝为之声援。”

郭同闻之大喜，返京后力言张勋可用。接着，张勋也致电北京，表示拥护总统，担任调停人。

恰如溺水之人捞到了救命稻草，黎元洪忙让代理总理伍廷芳给张勋发电报，令其“迅速来京，以备咨询”。第二天，他又以国务院名义发电，要张勋来京“共商国是”，以便“匡济时艰，挽回大局”。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应黎元洪之命调停说和为由，率步马炮共十营“辫子军”启程北上。

张勋的总司令官张文生对此行顾虑重重，他虽然没有能够偷听到“连环计”的全部内容，但仍认定徐树铮和督军团诸人布置了一个圈套，一旦张勋到北京后真的保清废帝溥仪复位，一准儿会上他们的圈套。

他知道如果直接劝阻张勋进京，对方不可能听得进去，张文生便从外地调来一名叫苏锡麟的统领，安排他带兵随张勋出发。

张勋的大太太曹琴常住天津，除有重大事情外一般不去徐州。临行之前，张文生便嘱咐苏锡麟，让他一到天津，就把这些顾虑转告给曹夫人，要曹夫人劝张勋，“什么都可以办，只有保皇上复位这件事办不得，一办就糟糕，准得上当，又不得好。”

张文生仍怕不保险，又对苏锡麟说：“必要时，你还可以向大帅（张勋）把我的话说明白，千万不要让大帅上这个当，将来是无法收拾的。”

张勋一行从徐州出发后，先到天津。苏锡麟找了个机会，把张文生要他转告的那些话告诉了曹夫人。曹夫人当时听了也很重视，马上就对张勋说了，可是张勋复辟之心已定，且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哪里能够接受劝阻?

就段祺瑞的处境来说，他不仅已经在野，而且舆论上也正处于下风，督军团尤其是张勋的支持无疑意味着雪中送炭，但他绝对不赞成张勋复辟。

还在第四次徐州会议期间，他就派曾毓隽到徐州对张勋声明：“如议及复辟，段必尽力扑灭，勿谓言之不预也。”张勋这才明白段祺瑞并不像徐树铮所说那样支持他复辟，只得通过万绳栻加以否认。

会议结束后，徐树铮返回天津，向段祺瑞报告了自己的计划。段祺瑞虽不便表示反对，可是也觉得这一利用张勋的计策过于毒辣了一些。在张勋到达天津的当天晚上，他便闻讯赶来看望张勋。二人见面谈了很长时间，他对张勋说："大哥来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治安，这是要紧的事。别的事都可以办，只是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南方亦不会答应。我看这件事还是慢慢来办。"

苏锡麟当时也在旁边，听后很是感动，认为"老段这个人可真够朋友"，然而张勋当时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

张勋自然也要回访段祺瑞，以及一起吃饭、打牌。段祺瑞趁此机会，再次郑重其事地把重话放在了前面："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

段祺瑞虽掌握军权，但由于长期任职于中央，所掌握的军权也只是间接军权，手下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这或许让张勋认为他只是空言恫吓，并不可能真的动用武力进行干涉，所以仍未能听进去。

当然段祺瑞毕竟是北洋的重量级人物，张勋表面上对段祺瑞还是非常恭敬的，以至于连段府家人都以为他和段祺瑞特别接近，殊不知他仅仅只是做些表面功夫而已。

与段祺瑞相比，张勋真正看不起且敢于玩于弄股掌之间的其实还是黎元洪，他曾经说过："一个小小协统也配当总统？"

到天津后张勋即驻步不前，随后向黎元洪提出五大条件，其中第一条为解散国会，同时威胁黎元洪："如不解散国会，即行返徐。各省督军自由行动，不能劝止。"

黎元洪这才知道张勋来者不善。虽然国会本身没有武力，但毕竟是全国的代表，而当时黎元洪所能依恃的只有国会，一旦解散，他手里就没有什么牌了。

明知是一剂毒药，可是为了换取张勋的支持，以便在府院之争中赢得头筹，黎元洪还是决定接受对方的条件。

国会解散令一拟好，黎元洪就想让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但遭到了拒绝。于是黎元洪又派人携令赴津，找李经羲副署，然而李经羲也以尚未正式就职为由加以推托。

黎元洪只得召集各部院高级官员开会，让众人拿主意。最后步兵统领江朝宗被公推出来，以代理总理的名义予以副署，国会解散令这才得以发布。

豪赌

国会解散令发布后，张勋仍未马上启程，而是继续在天津征询各方面对复辟的意见。这时张国淦正在天津，他意识到张勋有企图复辟的危险，而段祺瑞反对复辟，遂向黎元洪建议：在张勋入京之前，赶快免去李经羲的总理职务，重新起用段祺瑞，从而通过段祺瑞的地位和力量来对张勋进行牵制。

张国淦对总统府秘书瞿瀛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进京，才能阻止复辟。"

张国淦既做过府方秘书长，也做过院方秘书长，对上层的权力运作非常了解。他知道这种时候找徐世昌、李经羲已经没有用了，因为

徐、李等人其实没有任何实力，没有实力，就不敢对张勋说出什么硬话。

张国淦认定段祺瑞才能扭转乾坤。他郑重地告诉瞿瀛：“能够阻止张勋带兵进京的只有段芝老（段祺瑞）。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缓解时局的唯一办法。”

瞿瀛回到北京，即将张国淦的建议转达给黎元洪。黎元洪还没说话，他的幕僚们就断言：“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都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丑恶嘴脸！”

在黎幕看来，“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复辟？”退一步说，即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也不能再让姓段的来欺负总统！”

“黎菩萨”跟他的幕僚们一样缺乏政治智慧，不知道何者为轻，何者为重，听后居然被打动了，他很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

张国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黎元洪丧失了一个足以让他避开这场政治风险的机会。

就在国会解散令公布后的第三天，张勋终于决定进京，进京之前，他特地到段公馆去向段祺瑞辞行。二人在公馆密谈了半小时，段祺瑞再次叮嘱张勋：“复辟万不可行，余听公便宜从事可也。”

在将张勋送出客厅门口时，段祺瑞问道：“你几时去北京？”张勋答：“今天下午就去。”段祺瑞说：“好吧，你到北京看着办吧！”

张勋当天光着脑袋，拖一个辫子，身穿长袍马褂，持黑折扇，满面风尘，神情很是疲惫，显见得对于即将开始的复辟行动，他也很有精神压力。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舆情之下，复辟不亚于一场豪赌，赢了的人自然盆满钵满，输的人可能连穿着裤子走出赌场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在决定为这么大的赌博押注之前，不管新手老手，也不管他原先有多少资本，都不可能不紧张。

1917年6月15日，张勋率部由津北上，“高视阔步，昂昂然抵都门”。督军团见宣布独立和“兵谏”的目的已初步达成，遂于6月中旬陆续返回原任，同时取消了独立。

与督军团和段祺瑞的期望背道而驰，张勋到北京后没有立刻做出驱黎倒黎的任何举动，也未再提让段祺瑞复职的话，相反还与黎元洪会晤多次，并拥护同车来京的李经羲继任国务总理。

人都道张勋是个不通事理的大老粗，其实这货粗中有细，有很狡诈的一面。他引而不发，并不是真的要支持黎元洪或李经羲，而是想先扶植李经羲内阁作为过渡，自己居于幕后，待时机成熟再复辟。

在京期间，张勋每天应酬，异常忙碌，跟他混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复辟派。苏锡麟等有些头脑的部下怕他终究还是想着复辟，便在背后说：“老头子这样忙，怕要出事，不如请个客，唱台戏，还了情赶快回徐州原防吧。”

部下们通过其他人向张勋提出这一建议，张勋当然不会接受。不过为了照顾众人的情绪，他故意对部下们说了一句："到北京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回徐州了。"大家听了信以为真，都很高兴。

张勋籍贯江西，是宣武门外江西会馆的有力支持者。江西会馆要筹建新厦，他一次就捐了二十万元。一天晚上，他正在会馆看戏，秘书长万绳栻突然让他回去开会。

这是复辟派在张勋公馆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曾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的雷震春。他问道："请皇上复位的事，大家都签了字，这时不办要等什么时候再办？"张勋回答："这件事得好好商量。"

接着张勋又装模作样地说要请王聘老（王士珍）出来，大家一块儿商量。雷震春很急躁地抢过话头："事情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还要跟这个商量，跟那个商量，那得商量到什么时候？干脆，要办就办，不办就算了！"

张勋见在座的人都叫得很凶，认为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商量着办吧！"

"天牌"

6月30日，江西会馆新厦落成。会馆唱堂会庆祝，专门请来梅兰芳、杨小楼等著名京剧演员表演。戏一直演到深夜，因为观戏的张勋兴致特别好，又由杨小楼加演了一出。至午夜一点，张勋才乘兴而归。

也就在这天晚上，张勋下令于第二天一早悬挂龙旗。苏锡麟听后暗叫不好，紧急求见张勋，复述了徐州出发前，张文生交代他的那些话：“复辟这件事办不得，是个骗局。他们大家（指督军团）签字赞成复辟，那是假的，请大帅千万不要受骗。”

作为“辫子军”中的一员，苏锡麟也不会觉得复辟不好，只是认为事情难办：“要把国家大权交还给皇上，那是总统和国务总理的事，咱们办不了。请大帅千万别管这件事。”

万事俱备，张勋岂会因为部下的一番话就偃旗息鼓，他说：“大家公推我出来，况且事情已经弄到现在，不办亦不行了。”

如果张勋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话，复辟就是。他向苏锡麟坦承：“我愿意办（复辟），就是他们骗了我，使我为这件事死了亦心甘情愿。咱不能说了不算，咱们要干就干到底。”

苏锡麟知道事情无可挽回，便说：“好，大帅既然下了决心，我就陪着大帅吧！”

张勋决心为复辟这场政治豪赌押注，并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赢，而不至于“死了亦心甘情愿”。

在现实生活中，张勋就是个货真价实的赌徒，驻徐州期间经常邀集人在其公馆内聚赌。按说这在民初督军中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张勋的赌博方式与众不同，他居然能够做到包赢不输。

众所周知，骨牌为三十二块一副，但张勋家的骨牌却是三十三块一副。多出来的这块牌称为“天牌”，打牌时就藏在张勋的手心里——他的手脚特别宽大，手掌心里藏一块牌根本不成问题。

张勋要靠“天牌”作弊，拍他马屁的“牌友”们都知道，不过为了迎合他，不仅假装不知，还总是故意推他坐庄。仗着“天牌”兼坐庄的优势，一旦投骰分牌，张勋手中便有三块牌可供挑选配对，这保证了他每赌必胜。

当桌面上出现“天牌”，或发现少了哪张牌时，“牌友”们全都装傻充愣，视若不见。一巡过后，趁洗牌之机，张勋又把多出来的“天牌”捞上了手。

带兵进京调解，仿佛就是张勋用于政治作弊的“天牌”，而在京城这个范围内，总统黎元洪暗弱无能，总理李经羲又只是个傀儡，无人能对张勋进行有效制约，这就是让他坐庄的意思。加上复辟派“牌友”们推波助澜，张勋便觉得要想不赢都不太可能了。

1917年7月1日天一亮，北京城的大街上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龙旗，有的旗面破旧不堪，有的是用黄布画的蓝龙，有的系用黄纸木版印刷。由于准备时间仓促，这些临时亮出的龙旗连形状都不一样，长方形的，三角形的，乱七八糟地飘扬在街头。

当天上午7点，张勋率王士珍、康有为等五十余人乘车进入清宫，拥戴废帝溥仪登基。复辟闹剧由此敲响了开场锣鼓。

第二天，北京商会会长为了讨好张勋这位“复辟功臣”，特地在前门外设宴招待。中午12点，预计张勋要到场了，在同仁堂老板的安排下，梅兰芳等名角开始在台上上演大戏。正演到热闹处，张勋红顶花翎、朝珠补褂地入场了。他一边吃喝，一边听戏，听够了，又到后台同演员们聊天。

张勋终于攀上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赢定了。

师长要现金难为老段

获知张勋真的复辟了，黎元洪惊慌失措，对自己没有采纳张国淦的建议感到十分后悔。复辟开始后的第一天，他就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赴津，再次问计于张国淦。

张国淦对夏寿康说，为今之计，只有一面发表通电，请南京的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一面免去李经羲国务总理一职，复任段祺瑞，并责成其出师讨逆，恢复共和。

“如用我言，则段为总统（黎元洪）所任命，段之成功，即总统之成功。”怕黎元洪仍旧犹豫不决，张国淦又特地挑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即就算黎元洪不任命段祺瑞，段祺瑞也一定会自动自发地出师讨逆，到时“民国中断者为总统，恢复民国者为段，总统将何以自处？何以对国人？”

夏寿康回京后，将张国淦的建议报告给黎元洪。黎元洪思前想后，别无他法，也只好照此办理。

张国淦非常了解段祺瑞。早在张勋宣布复辟之前，就有人透露消息给段祺瑞，说张勋看样子准备把中华民国的牌子拿掉，请前清小皇帝重登宝座。为免督军团假戏真做，策应张勋复辟，段祺瑞急忙派徐树铮到蚌埠探询安徽督军倪嗣冲的态度，倪嗣冲不敢造次，很快复电表示决不参与复辟活动。

尽管得到了倪嗣冲的保证，段祺瑞仍忧心忡忡，那些天他始终眉头紧皱，面色阴沉。平时老段在家里就喜欢板着一张脸，轻易不见笑容，这样一来，更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模样。家人们知道他的性格脾气，都躲得远远的，怕惹老爷子不高兴。

当复辟的消息传至天津，段祺瑞勃然色变，当即派人把这一消息通知同在天津的梁启超，并邀梁启超前来晤谈。

梁启超一到段公馆，就对段祺瑞进言："总理能起兵讨贼，我跟你一道去。不然的话，总理就随我亡命日本。"段祺瑞慨然应道："我决心已定，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从我！"

随着张勋复辟的事实得到确证，段祺瑞反而镇静下来。家人们虽然听不到他和梁启超秘密商量的内容，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可是都发现老爷子紧皱的眉头已经松开，连日来阴沉的面容也变得开朗起来。

随张勋进京的"辫子军"只有十个营，一共五千人。不明内幕的人可能会认为以段祺瑞北洋系领袖的身份，挟雷霆万钧之力，要打败这五千人应如狮子搏兔般容易。段祺瑞在得到消息后也未表现出一点惊慌之色，甚至在与梁启超的晤谈过程中还能做到谈笑从容，但是实际上他对前景并不乐观。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段祺瑞手中并没有多少可调之兵。张勋复辟之初，驻防京津附近及直隶省内的军队倒是不少，但其中多数将领或已列名于张勋的复辟通电，或态度暧昧，或尚在观望。

陈光远是京畿握有兵力最多者，共统辖两个师，且装备优于其他军队。可也正因为他举足轻重，所以张勋到京后就和他拉得很紧，而

陈光远名为军人，实际是个滑头的官僚政客，见张勋势大，便表示对张勋唯命是从。复辟开场当天，陈光远就在南苑驻军区域挂起了龙旗，段祺瑞当然不能再调用他。

不同于冯国璋、张作霖等地方实力派，段祺瑞长期在中央，隶属于他的嫡系部队不多，能直接听从他调遣的更少。当时距北京较近的部队，如保定曹锟的第三师、马厂李长泰的第八师，平时与段祺瑞都不太接近，不是一道命令就可以动员的。

经过一番仔细斟酌，段祺瑞决定以李长泰部为讨逆军的基本力量。首选李长泰，不仅是因为马厂在天津郊区，联系起来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李长泰的政治倾向与段祺瑞较为接近，曾通电指责过张勋的复辟行为，用段祺瑞的话说是“此人忠厚，与各方面都不甚往来”。

另外，第八师的一名炮兵团长和一名步兵营长系亲兄弟，二人曾在段家当差多年，并均由段祺瑞一手提拔。这兄弟俩在离开段家后，还常到段公馆以当差的身份伺候段。段祺瑞具有较为丰富的带兵指挥经验，他知道在人事方面，怎样让自己从下到上都具有一定把握。

段祺瑞派傅良佐到马厂征询李长泰的意见。不料到了这个时候，“忠厚”之人也变得不“忠厚”了，提出各种条件。傅良佐先许诺李长泰功成之后即晋升官职，可是李长泰却提出“高官厚禄必须二者得兼”，换言之，即官要升，钱也要拿。

段祺瑞虽不满于这位李师长利心太重，已接近于要挟，但紧急情况下也只好从权，遂让傅良佐转告李长泰，只要对方兴兵讨逆，就给他的第八师加一个月恩饷。

光一个月的饷还是不能满足李长泰的胃口，因为这件事，后来还多出了一个段子："师长要现金难为老段。"

傅良佐等人只好另行设法。他们打听到李长泰惧内，最怕太太，于是就暗中送钱给李太太，先把李长泰的枕边人给说服了。在太太的命令下，李长泰果然乖乖听话。傅良佐遂由马厂赶回向段祺瑞报告："李师长欢迎总理去。"

马厂誓师

张勋宣布复辟的当天深夜，月光溶溶中，一辆专车秘密驶进马厂车站。一个身材瘦削、身穿军服、腰佩军刀的老者走出车厢，这就是时年已五十多岁但依旧精神矍铄的段祺瑞，他即将在马厂揭起个人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又一部光荣篇章。

李长泰率第八师中级以上军官早已在车站迎接，因为师部距车站尚有两公里，李长泰特地备了车马供段祺瑞等乘坐。段祺瑞拒绝乘坐马车，而愿与众人一道步行。其间第八师的那对亲兄弟一直紧随段之左右，以为护卫。

有了能够打仗的兵马，最好还要有擅草军书的圣手。第二天午后，梁启超如约而至，段祺瑞在师部门口对他说："任公（梁启超号任公）此来，大振军威。"梁启超笑言："打仗我是不行，我来给总理当个小秘书吧！"

梁启超稍事休息，即动笔起草讨张通电。1917年7月3日，该通电以段祺瑞的名义发表，被称为"马厂誓师通电"。

虽然段祺瑞已经不当总理，但各省的督军、师长、旅长，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旧部，所以电报发出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冯国璋也于当天通电讨逆。

冯国璋尽管一直抱着深深的“故君之恩”甚至“还政于清”的想法，可是复辟真的实现了，情况与他设想的却又大相径庭。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几乎每个人都想往上爬，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他以前之所以希望让清室复辟，除了感恩图报这一点外，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爬上更高的爵位。可是复辟之后，张勋已自任内阁议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冯国璋得到的只是“锡封”一等公、“奉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这意味着他还得在张勋手下称臣。

要知道，他冯国璋可是民国副总统，遇到合适机会，还可以顺利地爬上大总统的宝座——时为大总统的黎元洪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并发表通电请他代行大总统职权。

冯国璋不笨不傻，对这些问题岂能看不清楚，因此对复辟王朝的那些任命并不接受。在讨逆通电中，他更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中国政体已走上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

同一天，段祺瑞又发表了一篇长达两千三百余字的“讨逆檄文”，该文仍然出自“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之手。民国时，某著名报人的一支笔被赞誉为“胜抵十万军”，或许有些夸张，但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所起草的这些通电和檄文确实对讨逆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梁启超曾经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北京为复辟出谋划策，并与张勋一起被吹捧为“文圣”、“武圣”。有人便对梁启超说，先生您投笔从

戎，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壮则壮矣，可是不知道令师会作何感想。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段祺瑞前往马厂的同时，还派人到保定联系了曹锟。曹锟的第三师为北洋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张勋召集第四次徐州会议时，曹锟曾派代表参加，而且传说同张勋已有过默契，张勋还答应事成即让曹锟当直隶总督。

张勋完成复辟后，直隶总督由其自兼，只给曹锟封了一个直隶巡抚的职务。不管传说确实与否，总之曹锟没看得上这个职务，段祺瑞的使节一到，他马上同意参与讨伐。

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正式成立讨逆军司令部。天津这个商埠一变而成为政治中心，凡和段接近或拥护民国的军政要人，都聚集于司令部，开会讨论，忙个不休。讨逆军司令部设于原直隶省长兼督军公署内，为了接运要人，公署里的汽车都不够用，不得不包用汽车行里的出租汽车，最后天津汽车行的出租汽车几乎全部被包光了。

黎元洪听从张国淦之计，下令段祺瑞复职讨逆。携带这一命令的密使已在天津等了三天，但一直不敢直接面见段祺瑞，只好请张国淦予以疏通。

听张国淦说明事情经过，段祺瑞余怒未消，他气冲冲地说:“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姓黎的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 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 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

张国淦不愧其“千年和事佬”之名，他先让对方宣泄完火气，然后才冷静地分析说，黎元洪不管有什么过错，但他现在仍是总统。如果讨逆军方面不依正轨，不按总统命令自行讨伐张勋，必然名不正言不顺，会产生严重后果。

段祺瑞说靠几个军人通电推戴就能举兵，张国淦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军人推戴，乱平后大家恃功而骄，岂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何况所能取得的推戴，不过是北方几省，西南方面仍是承认黎总统，一定不予支持。”

有一份功劳要送给你

段祺瑞发火不为别的，就是一直憋着怒气和委屈，不发泄出来心里难受。其实就算张国淦不讲这些道理，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以李长泰为例，提的那一堆条件就够他头疼了。直到段祺瑞亲赴马厂督师，李长泰的太太居然还当着他的面替丈夫要官，而且指明得是“九门提督”（即步兵统领）。另一方面，自被黎元洪免职后，虽然段祺瑞一再强调免职令不合法，但他也不能否认自己事实上已处于在野地位，所以在“讨逆檄文”中还要避嫌，强调平乱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

张国淦的疏通给了双方台阶，段祺瑞马上接见黎元洪的密使并接受了任命。第二天他正式通电就职，在天津成立了“国务院办公处”。由于黎元洪此时已被迫逃离总统府，冯国璋随后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段祺瑞在以讨逆军总司令的身份亲自指挥第八师时，分别任命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军总司令。

段芝贵与段祺瑞是同姓同乡，而且据说还是同宗，外界有厌恶北洋系的，便称他们俩为“一刀两段”。两段原先并不熟悉，直到小站练兵时才互相认识。当时一般人按照职分和年龄，称段祺瑞为老段，称段芝贵为小段，后来两段叙过宗谊，论辈分，小段其实还是老段的族叔，比老段长着一辈。以是之故，合肥当地有“老段不老，小段不小”之说。

段芝贵也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在清末官场，他甚至比老段得意得还早一些，后来因为被人参劾，地位就比老段差一头了。袁世凯在世时，两段不仅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上还有着严重分歧——老段竭力反对袁世凯称帝，小段却竭力拥戴袁世凯黄袍加身。

小段和老段的个性迥然不同，小段为人机警聪明，善于逢迎。袁世凯死后，见老段执掌了政府大权，小段便与老段日渐亲近起来，并很快得到老段的信任。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退入天津后，起先就住在段芝贵家的私宅里。

这次小段虽被老段委任为东路军总司令，帐下却无一兵一卒。在讨逆军司令部出任交通处长的叶恭绰前去看望他，问他有何准备，段芝贵无精打采地回答：“没有。”

得知段芝贵犯愁的原因，叶恭绰对他说：“君既为总司令，何至一筹莫展？”

叶恭绰当场出了个主意，令段芝贵为之眼前一亮。

讨逆军要由天津开至北京，路程并不短，其中廊坊为进攻北京的咽喉要道和中心要点。驻扎于廊坊的为第十六混成旅，无论从军事意义，还是地理位置上讲，这支部队都极为重要。

混成旅的原旅长冯玉祥此时已遭排挤被撤换，但他本人恰好还在天津，而且混成旅的将官多倾心于他。叶恭绰建议段芝贵立即用电话把冯玉祥叫来天津，并让冯官复原职，指挥全旅人马讨逆："廊坊一扼，京津路断，辫子兵将何之？"

叶恭绰还提醒说："冯为善用机会之人，如他先有所组织，挂出讨张的旗帜，你怎么办？"

段芝贵听了一跃而起，说道："对，对！"

段芝贵以电话相召后，冯玉祥即来谒见。当时段芝贵尚在楼上，冯玉祥看到叶恭绰在楼下，就问他："段总司令召我何事？"

叶恭绰卖了个关子："我不知道，但猜想必定有一份功劳要送给你。"接着又试探道："人皆知十六旅是你的，今坐听张勋在京复辟，你的声威何在？难道你们十六旅要听张勋指挥吗？"

即便段芝贵不叫他，冯玉祥也在酝酿起事，被叶恭绰这么一激，顿时勃然大怒："什么话！"

到段芝贵下楼时，叶恭绰已经心中有底，他悄悄地告诉段芝贵："你开门见山说吧，包管妥当。"

段冯仅谈了十分钟，冯玉祥即回去做准备。随后段芝贵向段祺瑞报告，此前也有别人向段祺瑞献了这一计策，于是段祺瑞不仅欣然表

示同意，还临时刻了一颗关防印，并派人专程送到天津车站，当面交给冯玉祥。

任命冯玉祥的次日，段芝贵仍在天津未动。叶恭绰去找他时，见他正在与人聊天，便问道："总司令何以仍未出发？"

段芝贵笑言："一个光杆总司令闹什么？"

第十六混成旅虽加入东路军阵营，但段芝贵并不能直接指挥。不过叶恭绰认为这并不等于他只能无所作为："不是要讲排场装门面，因为主力虽在冯，而你应走在前头，以壮士气。"

段芝贵觉得有道理，不过仍费踌躇："我到前线，对军队要有些给养同犒赏，现尚无着。"

叶恭绰一拍胸脯："这容易，你交给我。"

四十盆花

一直以来，北京政治圈中有两个派系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其一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自马厂誓师以来，他们一直在给段祺瑞起草函电，献计献策。另一个就是交通系，系从事政治活动的交通界人士所组成的派系。讨逆期间，整个交通系共通过交通银行向段祺瑞预借军饷两百万元，从而在讨逆战争中扮演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角色。

叶恭绰即为交通系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对政治机智到近乎敏感的人，早在复辟前夕他就看出张勋不能成事，遂主动从北京赶到天津，站到了段祺瑞一边。

虽然叶恭绰脱离了交通部，但凭着在交通部的强大人脉和资源，几乎没有他办不到的事。与段芝贵谈话后，叶恭绰马上与京奉铁路局的局长联系，弄来一大货车的面包咸菜，同时从徐州方向调来兵车一列，另外还朝交通银行借了十万元。

有了这些物资，又经叶恭绰一再催促，“光杆总司令”才穿上军装去了廊坊。

叶恭绰在讨逆之役中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他的策划安排，交通系所掌握的所有电报、电话、铁路均优先服务于讨逆军，给讨逆军带来了莫大便利。

有人评论说张勋不但不懂政治，其实也不懂军事。在他发动复辟之初，讨逆军尚散布各处，并未能集合，如果张勋能够指挥津浦铁路一带的“辫子军”抢先北开，必然会使讨逆军处于不利境地，但他却计不及此。

不过也有资料表明，是张勋手下的第一号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误了他的大事。据说张勋与张文生曾约定一个暗号，只要张勋在电报中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张文生即调四十营兵开往北京。及至张勋宣布复辟，并给张文生发来电报，张文生认定复辟必败无疑，为保存实力，就不肯再轻易调兵北开了。

张勋收到的不是四十营援兵，而真的是徐州花园里的四十盆花！张勋气得浑身颤抖，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叶恭绰抓住张勋内部的这一弱点，成功地说服京奉、京汉、津浦各铁路局暗中服从其号令，不再为“辫子军”担任运输，同时各大车站的机车也被调离，只将客货车集中北段听用。

到讨逆军集结时，徐州附近的空车皮已被完全调离，就算张文生肯调兵都调不成了。其余地区也是如此，外省军队根本无法对张勋施以援助。

讨逆军还在马厂车站设立稽查处，陆续扣留了在北京至徐州间往来乘车的张部官兵达三四百人。参与讨逆之役幕后策划的靳云鹏向李长泰提出，应将几个扣留在车站的“辫子兵”先行悬首示众，以振军威。李长泰让他请示段祺瑞再办，靳云鹏便在吃晚饭时跟段祺瑞提了一下，段祺瑞当场未做任何表示。

第二天吃午饭，靳云鹏又唠叨这件事。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有什么用处？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有好结果呢？”

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战后所有被扣留的张部官兵均被分别编隶于第八师或给资遣回原籍。

段祺瑞不想多杀伤，如果能够兵不血刃、以必胜之势迫使复辟派屈服，在他看来是最好的结果。为此，他屡次电劝清室自动退位，可是均被张勋所阻止。

观察内外情势，认识到不诉诸武力难以奏效，段祺瑞只好以速战连胜为原则，下令东西两路军向京师推进。

张勋虽然梗着个脖子扮强硬，但其实自宣布复辟的第三天起，他所面临的局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对于复辟，各省既无人响应，连贺电也很少，倒是各地报纸“无不以三寸之管口诛笔伐，痛斥叛国”。讨逆军还没有发动什么强大攻势，北京城外的非“辫子军”就全都倒戈相向，反过来把枪口对准了“辫子军”的阵地。

张勋对此非常气愤，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拼命亦得跟他们干。咱怕什么，到时候咱就抖搂抖搂，是我一个人要出来保皇上复位的吗？"

树倒猢狲散

要拼命，也要拼得过才行。1917年7月7日，讨逆之役正式打响。虽然段祺瑞起初在动员师旅长一级指挥官时费了点劲，但具体到参与讨逆的普通官兵，在帝制不应再出现于民国这一点上，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段祺瑞的印象也非常好，认为这位北洋老前辈从两造共和，再到主张对德宣战，所作所为都对国家有利。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讨逆军官兵在动员时就表现得非常踊跃，"拥护段总理"、"消灭辫子兵"的口号一时大作。在正式开战的当天，东西两路军就击溃北京城外的"辫子军"，会师于丰台。其后当东路军由丰台进逼北京时，南苑航空学校又出动两架飞机对"辫子军"阵地、紫禁城皇宫分别实施投弹。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空军第一次实施投弹，也是第一次进行陆空军配合作战。

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张勋一面下令布置防御工事，一面让秘书长万绳栻把徐州会议时的那块签名黄缎子找出来，准备必要时公之于众。

张勋想不到的是，早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的前两天，冯国璋就通过他的总参议胡嗣援，以二十万元现洋的代价，将他曾写给张勋的亲笔信以及黄缎子都买回去了。现在张勋要黄缎子，万绳栻哪里拿得出

来，只得推说怕黄缎子带在身上会遗失，所以放在天津没带来，既然张勋要，他马上去取，随后便趁此机会溜之大吉了。

7月8日，讨逆军攻进朝阳门，“辫子军”被迫退守内城。此时十营“辫子军”又有六营被策反，剩下的四营按理应有两千人，实际上仅有一千五百人，根本顶不了多大的事。只是段祺瑞怕巷战后京城会毁于炮火，所以未再下令讨逆军发动积极进攻，而由各国公使向张勋转达了投降条件。

面对段祺瑞提出的投降条件，张勋还想一走了之，再回徐州当大帅。他以四句歌谣作为答复，曰：“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

有人问他应该怎样对清室做一个交代，张勋说：“这件事本来和清室不相干，干成了，小皇帝安坐龙廷；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

7月11日，张勋接见外国记者，他的态度表现得很镇静，说我只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们的共同主张，我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在手，必要时会公布，我决不向他们投降。

私下里，张勋大叫撞天屈：“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复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干垮了，却拿我一个人受罪。”

鉴于张勋拒绝了投降条件，段祺瑞遂于当天向讨逆军发布了三路进攻的命令。

7月12日，李长泰的第八师攻入内城。这时徐州方面传来消息，留守徐州的张文生在讨逆军的三面围攻下已经率部投降，张勋及其部属

闻讯更加绝望。

仍效忠于张勋的"辫子兵"统领苏锡麟与人商量，决定劝张勋上车到荷兰使馆避难。可是张勋却来了犟脾气，说什么也不肯走。因为时间紧迫，众人只好强行把他架上了车。张勋身材矮小，很容易架，但他仍拼命挣脱，气急了还咬了架他的荷兰老外一口。

张勋对"遭人陷害"一直耿耿于怀，直到逃进荷兰使馆后，他还对人说："就是你们总统（指冯国璋），从前亦是赞成（复辟）的，开会（指第四次徐州会议）时，我有大家签字作凭据。"又说："只有段芝泉（段祺瑞）是劝我不要干的，唯他可以打我，别人不配！"

没了那块丢失的黄缎子，张勋充其量也就只能自己给自己矫情一把。有访客对他说："复辟是否适合国情，现在也不必谈了。可是如果您及早宣布立宪（即君主立宪）以安人心，虽然最终仍不免于败，也足以解嘲，为什么您看不到这一点呢？"

张勋居然不知立宪为何物，他叹了口气道："我不懂得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栻字）等人瞎闹。你拿这个来责备我，是怪错人了。"

张勋被架走后，树倒猢狲散，剩下的一千多"辫子兵"也赶紧剪辫子，换服装，踏上逃亡之路。讨逆军进入北京内城的那一天，遍街可见辫子。

讨逆战役自正式发起到结束，前后一共不过六天，中间还有四天屯兵不进，真刀真枪的开练实际只有两天，因此京师学校其间也仅辍了一天课。事后统计，讨逆军和"辫子军"死伤者均不超过百人，另有十余名市民被流弹和飞机炸弹误伤。

一场以国家前途命运为儿戏的复辟大祸，最终来得快去得亦快，“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损失又如此轻微，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算是比较罕见了。

猛虎在山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英雄姿态凯旋回京。他在请愿团事件中受损的社会声誉及其威望大幅反弹，许多人都对他歌功颂德，就连段公馆内部对这位他们熟悉其实又不太熟悉的老段也开始刮目相看。有的家人说：“还是老头儿有办法，上次一个电报，就叫清室让了位。这回又是一个电报，撵走了张勋，取消了复辟。”

段祺瑞入京后正式组阁。在陆续发表的阁员名单中，除他继续自兼陆军总长外，主要由段派、研究系、交通系成员组成，可以说是三派的联合内阁。

在讨逆一役中，梁启超功劳不小，加上对其学识人品的赏识，段祺瑞在酝酿内阁名单时即力邀其共事。梁启超半是谦虚半是认真地说：“我只能给总理当个书记，写个稿子，别的事恐怕我担当不下来。”

最终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研究系的另一个领袖汤化龙出任内务总长。在新内阁里，研究系占有很大份额，一共九个阁员，研究系便独占五席。这既标志着研究系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同时也预示着段祺瑞在重新执掌中央政权后，暂时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来自院方自身的羁绊。

段祺瑞入京的当天，便与黎元洪会面并向对方表示慰问。复辟期间，黎元洪先欲到法国医院藏身，遭拒后又以平民身份转往日本使馆避难。直到张勋逃往荷兰使馆，他才敢从东交民巷里出来活动，犹如是在换防，一国元首的脸面扫地以尽。

尽管段祺瑞仍请黎元洪回总统府就职，但经此劫难，黎元洪在羞愧难当的同时，也已心力交瘁，不愿再当总统。他向段祺瑞表示："我已打定了辞职的主意，今天决不能再回公府。"返回私宅后，他又连发两通电报，以"心肝俱在，面目何施"的沉痛措辞，声明自己决不再复任总统。

就段祺瑞来说，黎元洪当初毫不留情的免职之举，无疑给他造成了刻骨铭心的精神伤害，即便讨逆成功，这种心理阴影也不可能完全消退。现在他之所以出面挽留黎元洪，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体现一个获胜者的宽宏大量和既往不咎，但既然黎元洪退意已决，他也就不再勉强了。

黎元洪不做总统，就轮到了冯国璋。冯国璋在讨逆期间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通电还是黎元洪一手草拟的，由冯国璋继任总统可谓合情合理合法。

段祺瑞随后接二连三发电报邀冯国璋北上，还派人到南京劝驾，但冯国璋却迟迟未动身。

冯国璋本人对继任总统自然是求之不得，问题是他的部下幕僚已经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接受段祺瑞的邀请，由代理大总统转正。他们认为，黎元洪既不肯复职，冯国璋就应到北京正式继任，如

果长期在南京代行下去，不但影响国际观感，而且妨碍政令的推行，就算以代理大总统的责任来衡量，也说不过去。

北上派还有着自己个人的小九九，用他们私下的话来说：“我们好不容易盼得有这么一天。现在我们要捧着老头子（指冯国璋）去当大总统了。这个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呢？”

为了能够攀龙附凤、鸡犬升天，北上派便竭力怂恿冯国璋北上，并且强调目前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正是他扩大权势、摆脱土皇帝身份的好机会。

相对于北上派，另外一派可称为留宁派，也就是建议冯国璋留在南京，将大总统继续“代”下去。他们提到的反证，就是先前人尽皆知的府院之争，由此引申出：做正式的大总统，只有像袁世凯那样完全执掌大权，才有可能做得好，其他人都不行。“像那黎大总统（黎元洪），由于他手里没有实权，所以就让人给端下来了。”

有人这样给冯国璋分析利害：“古人云，猛虎在山，藜藿不采。不要看总统（指冯国璋）在这儿威震八方，可是一到北京，人家处处拿法律限制你，就什么事也办不通啦！”

冯国璋曾亲眼见识过府院之争的激烈程度，对黎段二人是如何相互把对方逼到绝境的整个过程也知之甚详，所以对这一派的意见很听得进去。当时冯国璋的夫人、女婿也都劝他不应离开经营多年的地盘和军队去北京，以免轻者做个空头总统，重者沦为黎元洪第二。

如果能够像留宁派所说的那样，继续留在南京做代理大总统，而由段祺瑞在北京处理政务，对冯国璋而言，无疑是最好的结果。可是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且这时西南方面又通电拥黎元洪复任，冯

国璋便觉得还是应该慎重从事，再观望一下，于是便发表通电，宣布停止代行总统职务，仍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江苏督军。

四哥快来

冯国璋不肯北上任职总统，对此最为坐立不安的人是段祺瑞。

冯段自武备学堂换帖结义起，一直保持着友爱无间的关系。在袁世凯手下当差时，二人再加上一个王士珍，白天在一起办公，下了班又一起到冯家谈天说地。当时冯家有一个私塾，冯国璋和段祺瑞的子弟都在这个私塾里读书。

那时段祺瑞对待冯国璋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学业上都十分重视。冯国璋的孩子因为学习不好，还挨过段祺瑞的训斥甚至责打。段祺瑞也很关心冯国璋，连冯国璋生了病，医生开出药方，有时都要经过段的同意才能煎给冯国璋吃。

冯国璋后来到南京当督军，二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虽然分隔两地，甚至彼此政见也不完全一致，但是这都没有破坏他们的友情。冯国璋每次进京，必定会去段公馆，看到老段缺什么就主动给添什么，比如段公馆的汽车和司机都是冯国璋送的。段祺瑞知道冯国璋来京也总是高兴得不得了，一见面就喊“四哥”，那股亲热劲儿，让旁人看着只有羡慕的份儿。

世人皆知，府院之争乃至张勋复辟的源头乃是黎段互相不对付。对于张勋复辟，黎元洪自然应负全责；府院之争则是众说纷纭，也有人说是因为老段脾气“各色”（老北京方言，意思是说脾气古怪），不好接近，所以才把“泥菩萨”都给惹翻了。

不管是谁的责任更多一点，反正黎元洪下去了，新换上来的冯国璋与老段是盟兄盟弟，私人关系那么好，又都是北洋老人，连他都不敢进京与之共事，这不反过来说明老段确实很“各色”吗?

接到冯国璋通电的当天，段祺瑞即以靳云鹏为特使，派他率各界代表数十人赴南京劝驾。

段祺瑞要靳云鹏捎话给冯国璋，让冯国璋放心：“这一次冯四哥到了北京，一切的事都交给我。我敢担保冯四哥做一辈子总统！”

作为段幕大将，靳云鹏本身也巧舌如簧，很会哄人高兴。他到南京后对着冯国璋发表了一番妙论，说：“北方的大局好比是一个香炉，这个香炉有三条腿，大总统（指冯国璋）好比是香炉的一条腿，总理和东海（指徐世昌）是那另外两条腿。有了这样的三条腿，还怕那个香炉站不稳吗？”

冯国璋在听靳云鹏说这番话时，虽然嘴上未做任何表示，但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显然很是受用。

北上派见状，趁机再在他耳边说些“良机万不可失”之类的话，冯国璋的心慢慢就被说活了。正在这个时候，段祺瑞又给冯国璋发来一封亲拟的电报，电文只有干干脆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

冯国璋接到这封电报后很激动，他一边把电报拿在手里指给身边的人看，一边以得意的神情对众人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芝泉这个粗！”

冯国璋终于同意北上继黎元洪之位，但最后仍迟了十几天才到北京。原因是他素来爱财，在事先未征得段祺瑞同意的情况下，曾与苏

商张謇等人合伙，以制药为名，从英国人那里进口并出售了一千六百余箱烟土。这些烟土确有少数用于制药，但大部分都是为了赚取高利润。

烟土不能公开出售，账面上另有名目为“民国元年公债票一亿元”。现在冯国璋要到段祺瑞身边当总统，段祺瑞又以廉洁自律著称，他很怕真相暴露后，遭到段祺瑞的反对和抵制，于是才缓缓其行。

民元公债票系由财政部发给，当时的财政总长为曹汝霖，自然也参与其中。曹汝霖不敢直接向段报告，只好请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徐树铮、曾毓隽帮助疏通，并提出可以让他们入股分利。

徐、曾马上据实告诉段祺瑞。段祺瑞闻言微笑，迟了半晌才说：“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固所深知。”

原来段祺瑞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内心虽然对冯国璋的这些做法很不满，但为了避免因小失大，伤了与“四哥”的感情，只好故意装聋作哑。

知道冯国璋是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民元公债票”已然成为阻碍他进京的一块心病，段祺瑞遂吩咐徐、曾：“你二人万不可沾染，但须力任疏通，而不受酬。将来我见到冯时一字不提，你们可示意由他独断独行。”

段祺瑞为人刚直，宁折不弯，在处理与钱财有关的政府要员事件时，更是从不妥协。如今能这样委曲求全，已足见其邀冯北上共事，以及竭力避免重蹈过去府院之争覆辙的诚意。

第六章　越怕什么就越会来什么

冯国璋刚到京时，冯段的关系表现得十分融洽。段祺瑞对冯国璋说，欢迎“四哥”进京当总统，并愿意随时就近向大哥请教。冯国璋赶忙说，哪里，哪里，今后府院是一家，上下是一致，内外是一心。觉得这么说还不够近乎，他又紧紧拉住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府院之争了。”

接着，冯段又相携拜访王士珍。王士珍参与了复辟，并在复辟时出任议政大臣兼参谋大臣，段祺瑞平定复辟之后，他自觉无颜见人，已准备回原籍隐居。

冯国璋很恳切地挽留王士珍与之共事，继续担任新政府中的参谋总长。他还对王、段说：“今后的事情是咱们三兄弟共同来干，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

“北洋三杰”自此共掌中枢。在段祺瑞和王士珍面前，冯国璋这位大哥不但没有总统架子，而且表现得极其亲热，相互之间真有个“精诚无间”的模样。

随后冯国璋入主总统府。在他之前，总统府似乎还没怎么遇到过好事。原来袁世凯的办公地点设在居仁堂的东间，等到黎元洪继任，他嫌那间屋子不吉利，改在了居仁堂的西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次冯国璋入主总统府，干脆就弃掉居仁堂，将春耦斋选定为新的办公地点。

虽无法奢望像段祺瑞所担保的那样做一辈子总统，但冯国璋还是认为离前任们的霉运已经越来越远。那个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段祺瑞，都对此深信不疑。

支票请收回

作为北上的首要先决条件，冯国璋向段祺瑞提出，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除了徐树铮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同意。

段祺瑞也明白冯国璋内心忌讳什么，于是表示完全赞同，国务院秘书长一职遂由段幕中的张志潭担任。每天下午4点，张志潭照例要来到总统府，由冯幕成员、代理总统府秘书长职务的恽宝惠陪同，到春耦斋请冯国璋盖印。

盖印时，冯国璋、张志潭和恽宝惠分别坐在一张办公桌的三个方向，首先由张志潭把国务院的命令一件一件地递给冯看。冯看过之后，就照样递给恽宝惠，由恽宝惠拿着一寸见方，用白玉制成的“大总统印”，一个一个地往命令上盖。盖完了，再交给张志潭。

府院之争的喧嚣没有了，有的只是大家周而复始地重复盖印手续，场景极其和谐。自此以后，政府内的事情也都变得流畅顺利多了。

段祺瑞在成功地阻止张勋复辟，再执国政的时候，“一战”形势更为紧张迫切，对德宣战已刻不容缓，协约国驻华公使以及日本也再度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做出相关决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则试图劝说段祺瑞，让他不要对德宣战。

德国公使特地来段公府拜会段祺瑞。他先牵连旧情，谈到“贵总理三十年前在敝国军事学校读书，又在克虏伯炮厂实习，对我国素抱亲善宗旨”，随后便转入正题，请求段祺瑞在“国际大战方酣，胜负未定”的情况下，继续过去对德的一贯亲善精神，纵然一时绝交，也不要再宣战。他还说，如果段祺瑞能够这样做，对中德两国均有利益，云云。

德国害怕中国宣战，从而加速其失败的命运，德国公使代表政府出此言行完全可以理解，让段祺瑞感到气愤的是，对方还有接下来的一出。

只见德国公使突然让随行的德华银行经理取出支票一张，上面已填写了百万巨款。他一边把支票放到茶几上，一边说道：“贵国政府同贵总理现在需用款项之处甚多，区区之数，略申敬意。”

在北洋系中，段祺瑞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为政廉洁，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冯国璋的“民元公债票”，他是绝不会从中沾染半点的。

段祺瑞自认高洁之名声播中外，没想到德国人情急之下，居然还把他作为贿赂的对象，这无异于对其人格人品的一种侮辱。当下他便板起脸，大声答复道：“贵公使适才一段话，站在贵公使立场，我不能说你的话不应该说，但是你的做法是荒唐的！”

接着，段祺瑞又针对公使话中的破绽进行了反驳：“我过去在贵国留学，那是个人的事，素抱亲善也是过去的政策。这次酿成全世界大战，是贵国皇帝穷兵黩武，有吞并全世界的野心，是犯众怒的狂举。”

在说明德国乃咎由自取后，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对方，作为中国的总理，从中国的利害关系出发，他坚决主张加入协约国，“不唯绝交，即日将对贵国宣战”。至于公使对他的贿赂——“馈赠恕不能接受，支票请收回。”

段祺瑞义正词严，德国公使被驳得面红耳赤，只得拿着他的支票唯唯而退。

送客之后，段祺瑞犹有余怒。鉴于复辟期间国会议员星散，已不足法定人数，他迅速以国务会议通过总理负责的方式，推出了对德宣战案。1917年8月14日，冯国璋以总统令的形式予以公布，中国正式对德宣战。

一个月后，协约国公使团对中国的参战做出回应，同意德奥庚子赔款永远撤销，协约国方面的庚子赔款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这对长久以来饱受庚子赔款拖累的中国财政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按照与协约国的协约，中国最初直接派往欧洲的不是军队，而是华工。华工对于协约国来说也绝不是可有可无，“一战”犹如是欧洲人口的割草机，还没打上几年，各参战国后方就出现了劳动力奇缺的情况，特别是法国需要更为迫切。

早在中国对德宣战前，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就以将来提高国际地位为名，组织惠民公司，分别在华北、华东、华南招募华

工赴欧。宣战后，招募华工赴欧参战正式上升为政府行为，英法两国与中国政府商定的华工数目，英国是十万，法国是五万，最后都招足了。这些华工的薪水以及本人衣食住行所需的各项费用物资，全部由英法政府提供。

华工招募后即分批赴欧，其中在威海卫招募了两千多人。赴欧途中，华工们历经千辛万苦，也亲身领略到了世界大战的残酷可怕——有一天，船头警戒的威海卫华工突然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个可疑的“小点子”，船方一面鸣炮示警，一面下令船上的所有人都捆上救生带。

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经护卫舰施放深水炸弹，警报随后解除，但在到达法国三个月后，有人从报上看到，那艘搭乘他们的大轮船还是被德国潜水艇的鱼雷给炸沉了。

“先生”

协约上本来说好华工不直接上前线，但许多华工到欧洲后却被要求在前线挖战壕。威海卫方面的华工就面临着这一境遇，而且他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军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的距离甚至不超过五十码，实际就在最前线。

挖战壕非常辛苦，壕不挖到一定深度和宽度，工人就不能出来。尤其是遇到雨雪天气，壕内泥浆没膝，轮班睡觉时只能站着睡。相比之下，在前线负责打仗的英国士兵只须在挖好的战壕里守护阵地，军官和机关枪手更轻松，可以在后面盖好顶棚的战壕中或坐或卧，有些还能玩扑克、讲笑话。

初上前线时，英国人还吹牛说他们发明的坦克厉害无比，德国则没有，等英军的坦克车多了，就要对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谁知在圣诞前夕，德军也有了坦克，而且一开上来就是一长串。华工发现后找监工的英军，英军却统统不见了踪影。众人只得仓皇后撤，一气跑了三十多里路，才撤到分区司令部。

到了分区司令部一看，几名英国军官连住处都找好了，正在让勤务兵给他们铺床哩。由于未能及时得到通知和保护，华工中仅工头就有四人受伤，大家对此非常生气，便集体向司令部告状。

英国人自知理亏，第三天便安排华工到后方去转运粮食和军需。后方的危险性虽然不及前线，可是劳动量并未降低，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英国监工和管理人员把中国人当牛当马，在工人们已完成计划中安排的工作后，既不准他们提早散工，也不允许休息。华工但凡提出一点正当要求，都会遭到打骂乃至惩罚。

有一名华工以前做过教书先生，大家都称呼他为“先生”。“先生”不仅有正义感，而且擅长中国武术，在他面前，连身材高大、自称精通拳术的洋人都占不得分毫便宜，因此大家都很敬重“先生”。

见受到欺负的工友们个个气愤难平，“先生”告诉众人先不要轻举妄动：“闹尽管闹，可是在没有计划好的情况下万勿动手，因为英国人显然想打我们一个下马威。”

“威海卫华工营”的营长是个英国军官，名叫李笛亚迪，此人是个贵族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受过短期军训，平时很会摆架子，但实际上却非常胆小，遇到形势严重时，会立即改变方向。“先生”摸透了李笛亚迪的性格脾气，就决定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第二天一早，在“先生”的策划下，华工拒绝接受分派的工作，同时齐声高喊：“吃不饱，做不动，要减少工作。”李笛亚迪先是不以为然，答复说：“英国食品营养好，肚子没装满也不致缺乏营养，而且英国工头也是一样吃法。”

工友们早就料到他会如此敷衍，马上质问道：“我们也做英国工头那样的轻微劳动，行不行？”

李笛亚迪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改口：“不要乱，不要乱，好好上工去，我去同司令部商量再说。”

工人们这才答应开工，但是当他们中午回营时，却发现营房外排列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英国兵，进营房后，又见到一位工友被华工营的英国大队长以造谣生事为由打得周身青紫。

众人目眦尽裂，发一声喊“大家打”，大队长立即被拖到操场上，起初是拳打脚踢，后来就用他打人的那根棍子，朝他全身乱抽，而且边打边数落他的罪状。洋鬼子吃痛不过，只得磕头求饶，答应永不再犯，工友们这才撂下他去吃午饭。

英国佬素来欺软怕硬，包括李笛亚迪在内，在同伴挨打的时候，全都躲得远远的，不敢露面，直到华工去吃饭，几个英国工头才不声不响地把大队长送去医院。

吃过中饭，工友们有的洗衣，有的下棋，有的整理房间，有的拉胡琴，就是没有一个人肯开工。李笛亚迪把中方翻译叫过去，问华工们准备怎么办。翻译告诉他：“不撤兵，不加口粮，就不开工。”李笛亚迪用可怜巴巴的语调说：“这些事不是我能做主的呀！”

恰巧此时前线急需运送给养，连同下午耽误的，共须装七十辆车。李笛亚迪急得满头大汗，赶紧又请翻译过来商谈。翻译说：“工人都是讲情讲理的，只要合情合理，事情没有什么难办，错就错在大队长不该打人。”

见事情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李笛亚迪提起了精神：“你这个话有把握吗？”翻译说：“我是中国人嘛。中国人把情理二字看得非常重，不讲情理就会拼命，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李笛亚迪答应到司令部去报告。不到半个小时，营外的英国兵果然全都撤走了。李笛亚迪又返回对翻译说：“口粮没有问题，要紧的是今晚要装出七十辆车的给养去。”他还说，“司令部怕大家太辛苦，预备派一百个英国兵来帮忙。”

李笛亚迪已经意识到，这场中国人的“骚乱”背后一定有带头人，但他不知道是谁。问翻译，翻译矢口否认：“没有带头人，是大家的公愤。”

其实“先生”就是带头人和工友们的主心骨。在听翻译说完经过后，“先生”说：“该收帆了，我们也该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暴发户

“先生”让翻译代表华工答应李笛亚迪的条件，但同时也提出了维护华工尊严的几个条件。李笛亚迪全都应承下来。

当晚，华工们不仅把活干得又快又好，还创造了一些装卸货品的新方法。天还没亮，他们已装齐六十四车，而那一百名英国兵也装了

六车，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李笛亚迪也因此受到司令部的嘉奖。他十分高兴，特地把翻译叫过去，对华工们表示了衷心感谢。接着他又去仓库，询问管仓的英国人：“中国工人做得怎样？”

那位管仓员说：“昨晚做得还好。”李笛亚迪当即拉下脸来：“为什么说还好？我的中国工人干得比谁都好。他们昨夜的工作效率，比英兵要高出一倍，你没有算过账吗？”

英国人对华工的态度从此大变，华工在异国的境遇也有了很大改善。后来当他们回国时，不少华工还与附近的法国女子结了婚，并带回了中国。

赴欧参战的华工中有很多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威海卫华工营”那次从前线撤退伤亡尚不算大，但其他营伤亡不小。据说英国从青岛招募的十万华工，共死了三千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撤退过程中被德军的炮弹给炸死的。

重出江湖后的段祺瑞除了着力推动对德宣战外，所关切的另外一件大事是获得外界的援助和支持。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对德宣战，取消了德奥庚子赔款，加上停付协约国方面的庚子赔款，使得国内财政困顿的情况有所缓解，但那也只是“出”的少了，“入”的仍然不多。

对这笔账最清楚的，莫过于在新内阁中出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在他履任时，北京政府依旧入不敷出：军政费用每月约需两千万元，而财政部的可靠收入合计还不足一千二百万元，缺口达到八百万元之巨。

如何维持生计，再次成为让段政府头疼的大事，而到了这时候，老段又开始盯上了邻国日本那鼓鼓囊囊的口袋。

日本本来也不是个富国。甲午战争前，为了跟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日本天皇还要带头捐款，每年挤出皇室经费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让它发了笔财，要不然恐怕连后面的日俄战争都打不起。

日俄战争打完，日本又没什么钱了，但是随后爆发的“一战”却意外地令其大发横财，真正成了暴发户——欧洲各国埋头苦斗，等于把赚取高利润发大财的机会拱手送给了置身于欧洲之外的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

日本有钱，也曾在“中日亲善”的旗号下，打算借钱给中国，但在拨出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后不久，北京政局即因参战之争发生混乱，段祺瑞也避走天津。鉴于当时局势极不明朗，日本寺内内阁决定中止经济援华政策，同时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外务省和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也持全然不干涉态度，作为段派成员的曹汝霖等人曾想策动林权助支持段祺瑞，但都未能达到目的。

西原的见解则完全相反。经过几次访华，他对段祺瑞非常看重，认为段一定可以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即便暂时被免职，也不妨碍其日后东山再起。为此，他再次向寺内提出要前往中国援助段祺瑞。

寺内很信任西原，可他还是认为此行要冒许多风险，所以未同意西原的主张。西原是个极有个性的日本人，就算是老板不答应，只要

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照做不误。其间他曾四度来华对段祺瑞表示支持，与以往实质上受寺内指派不同，这四次来华完全是西原自作主张的个人行动，而非官方意见。

直到张勋复辟，寺内内阁对公开援段仍感踌躇。后来见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张勋大势已去，寺内才同意帮助段祺瑞平定复辟之乱。

复辟既平，段祺瑞也在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定调。这时，曹汝霖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认为，“远交近攻”是强国才能采取的策略，中国只是一个弱国，作为弱国，既不适宜于“远交近攻”，也不能单纯地“一律看待”，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政策，说白了，也就是必须采取亲日政策。

曹汝霖的这一见解，博得了段祺瑞的赞赏。他在送此前一直在天津活动的西原回国时，特地请西原向寺内转达自己的意向：“中国的政局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

得到西原带回的这一重要讯息，寺内内阁做出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至此，日本政府终于明确了全力援段的政策。

攻湘

虽然顺利完成了重新出山前未完成的两件大事，但段祺瑞也面临着入主中枢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一件棘手难题，这就是南方势力的挑战。

张勋复辟前，强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失去饭碗的国民党议员们即纷纷南下，以孙中山为中心发起护法运动。

孙氏“护法”，固然有捍卫民国、维护约法的政治追求，但亦有争夺中央控制权的实际考虑。他的直接诉求是要求北京政府恢复“旧国会”（即被解散的这届国会），因为“旧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占绝对优势，控制国会也就控制了中央控制权中的相当一部分。

孙中山有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也有国民党作为政治支撑，但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就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必须依赖于西南军人。

这里所说的西南主要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和广西五省，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从袁世凯时代开始，西南军人便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系、长江下游的冯国璋系互通声气，形成了一种或明或暗的盟友关系，借以增强本系在中央的分量。

在张勋复辟前后，西南各省一面参与“护法”，一面宣告独立，其目的无非是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西南诸侯不仅反对张勋，也同样反对段祺瑞。当段祺瑞根据黎元洪的命令复任总理，准备举旗讨逆时，唐继尧曾通电反对，其逻辑是复辟乃段祺瑞一手酿成，岂可再安居总理之位。

复辟被平定后，根据唐继尧的这一逻辑，西南各省不仅仍然没有取消独立，而且指段为复辟的罪魁祸首，要予以坚持反对和讨伐。段祺瑞早就看西南军人不顺眼，现在这帮人又要对他进行讨伐，并实际形成了南北分立的局面，他当然不肯示弱。

西南各省的地理位置都较为偏远，中央不宜用兵，这是连袁世凯当政时期都难以解决的一大难题。段祺瑞在总结袁世凯的一些策略办

法的基础上，制订全盘的战略计划，即“入川以进攻云贵，攻湘以占有两广”，也就是以四川、湖南为枢纽，逐步削平西南诸侯。

围绕入川，段幕设计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即利用川、黔、滇三方面的矛盾，先使其互斗，再寻机取而代之。1917年8月初，川、黔、滇三军果然发生大混战，段祺瑞立即任命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六个旅入川查办四川问题，其目的是首先督促川军驱逐滇黔军，然后再拿下四川和控制滇黔。

与“入川”相比，“攻湘”更为困难和复杂。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本倾向于西南，对北京政府只是表面敷衍。段祺瑞就以吴光新代之，但谭延闿在湖南甚得民望，湖南人以“湘人治湘”为口号，反对北方势力侵入湖南。

针对这一情势，段祺瑞采取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他决定派湖南籍的傅良佐去湖南，这样既可以堵住湖南人的嘴，又可以执行自己的计划。

可是段祺瑞的提议却遭到了冯国璋的极力反对。

冯国璋刚来京时，曾经很大度地说现政府既实行责任内阁制，那么他作为总统就应该“人事不参加”。比如陆军次长出缺，幕僚们建议让师景云干一下，他们对冯国璋说：“岚峰（师景云的字）伺候您这么多年了，现在陆军次长出了缺，是否可以提拔他一下？”

师景云乃冯幕首席，深得冯国璋的信任，其地位相当于徐树铮之于段祺瑞，但是冯国璋听后不同意，他对其中的一个幕僚说：“岚峰要去，我看还不如你去。可是我觉得你也不去的好，内阁里，咱们还是不加入为是。”

如果冯国璋能够始终如一地不过问人事和其他政府要务，冯段之间自然就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然而事实上他却做不到这一点。

冯国璋后来追述他在北京当总统的这段经历时，曾经说："以我老大哥的地位，以段向来对我唯命是听的那样态度，为了北洋的大局，当时我认为，我是可以说服段，做到府院合作的。"

其实仅此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冯国璋和他的前任一样，绝不甘心于只做一个责任内阁制下的"盖印总统"。

爆发

冯国璋就任总统不久，就提议要按照袁世凯设置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成例，在总统府成立一个"统率办公处"，以王士珍为处长。

段祺瑞一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军权有被分割的危险：王士珍身兼参谋总长，一旦府院遇到不同意见，冯国璋和府方就可以坐拥三分之二的多数。

得知段祺瑞不同意设立"统率办公处"，冯国璋又提议在总统府内设立"参陆办公处"，由参谋总长王士珍和兼有陆军总长职务的段祺瑞共同负责。他还托人带话给段祺瑞说："请芝泉无须多心，总统作为军队的统帅，对军事不闻不问毕竟是失职嘛。"

段祺瑞闻言不便再拒绝，终于同意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但又坚持"参陆办公处"必须附在责任内阁里面才算合法。他这一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使得冯国璋实际无法分享国务院的军权，而且还把参谋本

部变成了国务院的附属机构，从而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冯国璋联王抑段的可能性。

这些情况被一些老北洋人看在眼里，令他们早早就看到今后的府院关系存在某种隐忧。时任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在小站练兵时期即为管带，他在进京谒见冯国璋后，特地去秘书厅找恽宝惠攀谈。二人先谈了一会黎段相争的情况，接着鲍贵卿便说：“他们老兄弟俩（指冯段）这还有什么说的，当然不会再闹像以前的那些个事……”

说到这里，鲍贵卿欲言又止，随后才用沉重的语调继续说道：“不过，他们老二位的性情各有不同。我和他们相处多年，可以说是相知有素了，希望你和远伯（张志潭的字）设法给他们从中调和弥缝，使得他们不至于闹出任何意见来，那就最好了！”

恽宝惠把这些话分别告诉了冯国璋和张志潭，张志潭又转告段祺瑞。大家都觉得鲍贵卿语重心长，意见很好，也都在口头上表示要引以为戒。无奈这世上的事，往往是你越怕什么就越会来什么——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府院终于还是又回到了拢不到一块儿的状态，第二次府院之争很快就在傅良佐督湘这个问题上集中爆发出来。

冯国璋虽为北洋大将，但很早就与西南军人有密切联系。唐继尧曾是冯国璋的学生，早在冯住北京的时候，他和李烈钧从南方来京，即留住于冯宅。后来冯国璋到南京，又通过梁启超的关系，和陆荣廷、唐继尧建立了通信往来。那段时间，冯国璋、陆荣廷甚至还拜把子做了兄弟。

冯国璋能在地方上成为一大势力，连袁世凯在世时都不敢轻视，除了拥有地方兵权外，和西南军人的相互呼应也为其一大法宝。当年

在袁世凯称帝时期，冯国璋领衔发出的“五将军密电”，更是几乎要了老袁的半条命。

西南军人反段拥冯，冯国璋和陆荣廷等人一直保持着秘密盟友关系。对西南军人完全不同的感情，决定了段冯在这方面的政见存在着根本分歧。概言之，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而冯国璋则力倡和平统一——虽然听上去都是要追求统一，但段祺瑞是真的要统一南北，冯国璋所谓的统一却只是个形式。退一步说，即便西南各省仍然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可只要对冯国璋这个总统没有异议，他也可以容忍。

知道段祺瑞打湖南的主意，乃是为了动两广，冯国璋如何能够不予过问。他反对撤换谭延闿，其直接理由是谭延闿在湖南可以作为南北双方的桥梁，换了别人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有一天，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循例来府盖印。在把需要盖印的命令一件件递给冯国璋的时候，他特地提到了傅良佐督湘的问题，并转述段祺瑞的意见：傅良佐是湖南人，又和湖南省内的军界人物有联系，所以由其督湘一定能够胜任。

冯国璋听后，一边把他已经看过的命令一件一件递给恽宝惠，一边对张志潭说：“恐怕不见得吧！你还是回去跟总理商量商量。”

冯段二人的年纪都比较大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喜欢到处走动。段祺瑞到总统府的次数不多，冯国璋也一样，就算他不认同段祺瑞的意见，都不肯去找段当面商谈解决，而是直接干脆地予以否决。

冯国璋无疑给段祺瑞出了道难题。傅良佐的父亲与段祺瑞是盟兄弟，傅良佐则是段祺瑞的学生，有着这两重关系，使得他对段祺瑞极

为恭顺，见面总称段为“老伯”。同时，傅良佐不仅自日本士官学校读书起就成绩优良，而且本人还有很好的中文根底，写作俱佳，自然而然更得段祺瑞的赏识和提携。

世谊兼学生，亲信兼幕僚，允文允武，还正好是湖南人，人地相宜，段祺瑞就算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再到哪里去找这样合适的人选。

可是冯国璋不同意怎么办？这时候段祺瑞想到了另一个人。

险途

傅良佐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不久，曾作为借用人才，由袁世凯介绍给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徐世昌发现傅良佐颇有文才，对他也很赏识，以后见其办事认真负责，又升了他的官。

因为有这段经历，段祺瑞便不对傅良佐直接任用，而是请徐世昌出头推荐。徐世昌的资历比段、冯都高，徐世昌亲自出面荐人，冯国璋没法驳他的面子，同时段祺瑞也免去了任用私人的嫌疑，可谓一举两得。

于是，张志潭在盖印的时候便又以徐世昌推荐的名义旧事重提，并且转达了段祺瑞让步后的新提议，即不让傅良佐兼任湖南省的军政长官，而是只专任督军。可是冯国璋仍然变着法地加以拒绝：“我原来是准备让谭延闿……”

段让步，冯寸步不让，照这样子，冯段真的有可能闹僵了，张志潭很着急，只得用眼睛示意一旁的总统府代理秘书长恽宝惠，意思是

要恽宝惠帮他说几句话。

恽宝惠回看了张志潭一眼，忙紧扣着冯国璋的话说：“我们就是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他也未必肯就。现在既是内阁提出傅良佐来，依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冯国璋一听，知道恽宝惠在调和气氛，加上碍于徐世昌的老面子，这才没有再说什么反对的意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傅良佐督湘的消息传出，同事朋友奔走相告，都来给他道喜。傅的好友陈文运闻讯也到傅家造访。

当陈文运赶到傅良佐家中时，贺客已经散去。见周围没有熟人，陈文运开门见山地对傅良佐说：“别人都来给你道喜，我却劝你别去。”

傅良佐听了很诧异，忙问为什么。陈文运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段老师的学生，又是湖南人、日本留学生。你到湖南去，只许做好，不许做坏。”

陈文运给傅良佐分析了他此去所要面临的严峻形势：西南方面正在搞独立，湖南内部也不一致，情况如此复杂，非一般人所能应付。

除了这些，还有的东西陈文运不便明言，那就是傅良佐虽然办事认真负责，但办事的能力却不足，尤其缺乏应变之才。

民国建立后，傅良佐一度担任多伦镇守使，其间突然发生叛乱。尽管叛军离多伦还有二百多里地，但是傅良佐仍然手忙脚乱，慌成一团。因为发现傅良佐能力短绌，难以应付事变，后来袁世凯就将他内调到统率办事处去了。

在处理例行公事方面，不擅应变的傅良佐倒能够应付自如，这才使得他能够成为段幕中的重要角色，直至升为陆军部次长——当然有时也会露出马脚，比如由他做主策划的“公民团请愿事件”，就几乎把段祺瑞推入绝境。

同为段幕中的重要角色，徐树铮、傅良佐都是段公馆的常客。徐树铮脾气大，又好挑毛病，见着谁都是恶狼恶虎似的，家人们只要一看到他，便都躲得远远的。可是另一方面，众人又都不得不佩服徐树铮确实是个人尖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人家有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吗？”

与徐树铮的“有才”相比，傅良佐差远了。可为什么“老头子”不但看不出来，还要委以重任呢？段府家人私下的解释别出心裁：靠打牌。

徐树铮到段公馆不谈私事，只谈公事，而且三言两语，从不耽搁。同时他也很少参加公馆的宴会，不陪老段打牌，来来去去，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面孔。傅良佐则不同，他常陪老段打牌，双方一个“老伯”一个“世侄”地叫，就跟一家人一样。

听说傅良佐被派去督湘，段府家人就在背后偷偷地议论：“傅良佐打牌打出来一个督军。”

段祺瑞当然不至于糊涂到靠打牌选督军，但段府家人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他们虽说不懂政治，可是来来往往的能人见得多了，反而更能鉴别出谁是真厉害，谁只是银样镴枪头。

陈文运深知傅良佐不是做湖南督军的材料，弄得不好，下场会很惨，为此他诚恳地向好友发出忠告：“我看你还是不去湖南为妙，不如

继续在北京做你的次长吧！”

傅良佐听了之后眉头微微一皱，似乎思索了一下，可是很快就答复道：“总统已经有明令了，我哪能不去呢？”

陈文运见他官兴正浓，也不便深谈下去，更不能再说你不是那块材料之类的话，只好说：“咱们交情很厚，我不得不说，请你考虑考虑吧。”

傅良佐表面上连连称谢，感谢好朋友直言相告，但陈文运还是看出他内心有怪自己多管闲事的意思。

话不投机，陈文运匆匆告辞而去，傅良佐也就此踏上了一条他本不能胜任的险途。

隔阂

不出陈文运所料，傅良佐督湘的明令一发表，立即招致湖南和西南各省的反对。他们认为傅良佐虽然是湘籍，但自幼便随父随宦在外，无论过去的出生之地，还是现在的做事方式，都只能被归入北人之列，不符合“湘人治湘”的要求。

陆荣廷出面给冯国璋发来一份电报，要求收回成命，并主张划湖南为南北军的缓冲地带，继续维持湖南现状。

冯国璋由于已同意段祺瑞派傅良佐督湘，故而难以作答，只得把陆荣廷的这份电报交给段祺瑞。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陆荣廷，把更换湘督说成是“为事择人”，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1917年8月下旬，傅良佐以“衣锦归乡”的姿态，辞别段冯，离京前往湖南就职。

段祺瑞在发表任命时，曾表示傅良佐虽督湘，但不带北军入湘。可是面对各界如此强烈的反对，如果真的让傅良佐一个光杆司令入湘，段祺瑞自己也不放心，为此他在傅良佐赴任的同时，就派了两个师的北洋军开往湖南。

谭延闿内心不是不想抵抗，但原本答应援湘的桂滇军还没行动，北军已经大兵压境。至于湘军，只有两个装备较差的师，而且谭延闿还只能控制其中的半数，自然无法抵御北军。

在此情况下，谭延闿只得放弃抵抗。有人问他是否愿意留任省长，谭延闿说：“当惯了婆婆，如何能做媳妇？”

傅良佐到长沙后，谭延闿一俟办完交接手续，马上借口回籍省亲，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

谭延闿绝非俗辈，当年曾与谭嗣同等人并称为“湖湘三公子”。离职之前，他在与西南各省加强联络的同时，派原零陵镇守使望云亭赴京迎接傅良佐，望云亭的职务则由刘建藩署理。

谭延闿的举动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对北京政府的服从，其实暗藏机锋——望云亭是段祺瑞留在湖南的一个内线，把他调走乃为调虎离山之计；继任的刘建藩参加过“二次革命”，让他镇守零陵，无异于埋下了一颗反对傅良佐的定时炸弹。

傅良佐在就职的第四天也发现了谭延闿所布的这着棋，于是下令撤换刘建藩。刘建藩早有准备，不仅拒绝从命，而且通电全国，宣布

独立。

消息传到长沙，傅良佐立刻慌了手脚，一面宣布长沙戒严，一面派兵前往讨伐。不料派去的本省军队全是软脚蟹，没几下就纷纷溃败。

傅良佐再命随其南下的那两个北洋师出战。北洋军久经沙场，炮火又相当猛烈，非刘建藩等所指挥的湘南军队所能抵御。在湖南地方的屡次请求下，10月中旬，西南方面组织湘、粤、桂联军，分路向北洋军发起反攻，湖南问题迅速演变为南北战争。

与南北战争相伴随的，是第二次府院之争的正式浮出水面。自傅良佐督湘事件以后，冯段就产生了隔阂，而且从此一天天地加深。

段冯本来当面接触的机会就不多，这时候越发少了。难得有一次，冯国璋突然打电话给段祺瑞，请他到府里来谈谈。段祺瑞接了电话说："一定是四哥想打麻将了！"说完便高高兴兴地带了两百元现钞赶去总统府。

段祺瑞喜欢打麻将，但一般都在晚上下班之后。这次他上班也要打麻将当然不是纯粹为了玩，而是希望利用打麻将的机会重新加强二人的私人联系，冲淡彼此感情上的不愉快。

可是冯国璋在和他谈完公事之后，却并没有谈到打麻将的话。段祺瑞也不便提出，只得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冯国璋本人其实不爱打麻将了，他也知道段祺瑞的癖好，但就是不肯迎合对方打上那么几圈。这也使得段祺瑞不能不怀疑"四哥"是在摆他的总统架子。

后来又有一次，段祺瑞主动去拜访冯国璋。当时恰巧府内有一处木桥坏了，段祺瑞的汽车无法通过。有了打麻将的尴尬经历，段祺瑞自然而然地认为冯国璋仍在故意摆阵势，不准备和他见面，于是当即就命令车夫掉转车头，愤然打道回府。

战而不宣

冯段之间越闹越僵，冯国璋也开始像他的前任黎元洪那样，频频对院方动用否决权。

刘建藩等人宣布独立后，段祺瑞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予以讨伐。可是命令送到总统府盖印时，冯国璋却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由拒绝盖印。

冯国璋不盖印，段祺瑞也没办法，结果湖南那边已经打得昏天黑地，这边北京政府的讨伐令仍未颁布，段内阁也因此被外界讥刺为“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及至南北战争爆发，段内阁下令罢免以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西南三军头，冯国璋又拒绝盖印，理由还是原来大事化小的那一套。

冯国璋闹起别扭，比黎元洪更麻烦，因为“泥菩萨”其实没有什么强硬资本，冯国璋却有着不小的本钱，这就是从北洋系中逐渐分化出来的直系。

北洋系形成于小站练兵时期，还在其发展扩张过程中，内部就因权力之争而初步形成派系，只是在袁世凯的统驭下，派系现象受到了

压制。后来袁氏称帝，尽管北洋系中的相当一部分军人已不完全听命于袁，但仍不至于公开分裂。

北洋系的加速分化是从袁世凯暴毙以后开始的，最终形成了直皖两大系统——冯国璋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以他为首的北洋军人集团称为直系；段祺瑞出生于安徽省，以他为首的北洋军人集团便称为皖系。

当时的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号称“长江三督”，三人皆为直系的骨干分子，他们在长江下游联成一气，成为冯国璋在京的有力后盾。

南方联军誓师出征的当天，“长江三督”就联合提出解决南北问题的四项意见，不仅主张停止湖南战争、撤换傅良佐，而且还要求改组内阁、整理皖系倪嗣冲等部。

“长江三督”的意见一发表，即遭到皖系的强烈反弹。一部分皖系激进派以硬对硬，甚至酝酿要发动政变，以对付站在幕后的冯国璋。从1917年10月下旬起，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在京的北洋军人要软禁总统。

毕竟自己身处京城，这样的迹象和谣言不免令冯国璋感到害怕。他这才做出让步，勉强同意罢免广东督军陈炳焜，但仍将罢免陆荣廷等其他二人的命令留下不发。

罢免陆荣廷本是段内阁罢免令的重点，冯国璋却来了个避重就轻，段祺瑞对此很不满。他又重新拟令，将陆荣廷调职来京，并催促冯国璋盖印。

见段祺瑞紧盯不放，冯国璋只好将命令交印铸局盖印后予以发表。可是到了晚上，他又后悔做出了这一决定，派人把命令从印铸局追了回来。

第二天，段祺瑞未见到总统命令发表，一问才知道冯国璋居然将命令追了回去，不由大为光火，当即声色俱厉地对冯国璋进行质问：为什么讲好发表的命令还要变卦？总统岂能出尔反尔？

冯国璋被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待段祺瑞走后，就无可奈何地把命令重新送至印铸局。

此时南北两军正在湘南交战，北军略占优势，已先后攻下衡山等地；而在四川境内，川军刘存厚部也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击败了入川的黔军、滇军。段祺瑞不断收到捷报，自认为拿下西南已指日可待，于是便决定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援引"临时约法"中的有关条例成立临时参议院。

临时参议院为代立法机关，有权修改"国会组织法"及"两院议员选举法"，并根据新法召集新国会。冯国璋是旧国会选举出来的总统，如果是新国会进行选举，变数就增大了许多。

亲段势力本身也有要推倒冯国璋的意图，他们内部有两种意见，"政变倒冯"是其中之一，但段祺瑞并不同意这么做。除了"政变倒冯"，另一种意见就是"合法驱冯"，成立临时参议院无疑为"合法驱冯"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这让冯国璋大感威胁。

俗语说得好，狗急了就要跳墙。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又被喻为"狗"，在此内外交困之际，他也想到了一招。

幸灾乐祸

1917年11月14日，正在湖南指挥作战的两位北洋军师长王汝贤、范国璋突然在前线发出主张停战议和的通电，提出他们不愿为“政客利用”。通电发出的当天，二人即率部撤出战斗，由衡山向长沙方向退却。

王汝贤、范国璋是直隶人，其所部官兵也多出于直隶，他们虽没有正式归入直系，但和直系渊源很深，王、范平时也多看冯国璋脸色行事。二人做此惊人之举，当然不像通电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他们恰恰乐于被“政客利用”，只不过利用他们的“政客”不是段，而是冯罢了——秘密指使他们停战的，正是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

傅良佐是个缺乏应变能力的人，一看到前线通电便手足无措，当晚就和新任湖南省长携带印信，乘坐轮船一同仓皇逃出了长沙。在此之前，段祺瑞为了支持傅良佐督湘，还从山西调来商震一个混成旅赴湘作战。由于商震和王、范没有直接联络，傅良佐又不通知，所以导致晋军要撤的时候都撤不下来，最后近乎全军覆没。

王、范通电到京后，冯国璋表现得幸灾乐祸，连声说：“快快送院，快快送院。”别人问他：“湖南问题闹大了怎么办？”冯国璋没好气地答道：“我有什么办法？有责任内阁。”又有人问：“王汝贤、范国璋擅自通电停战，此风殊不可长，总统以为如何？”冯国璋仍然是那句话：“问责任内阁。”

这些话传到段祺瑞耳朵里，他气呼呼地说：“问我，我只有一个办法，辞职！”

段祺瑞说到做到，当即递上辞呈。第二天，他又发出了一份言辞痛切的电报，称为“铣电”。在“铣电”中，段祺瑞认为北洋系是如今中国的正统势力，无北洋即无中国，与此同时，他责备直系军人不顾大局，“启阋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而西南却正好施离间计来破坏北洋团结，即“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

对于“铣电”，冯国璋倒也没什么感觉，按他本意，最好是立马批准辞呈，让对方滚蛋了事。可就在段祺瑞发出“铣电”的当天，总统府的日籍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即奉命来访，转达寺内内阁的意向，说：“欧战在紧张进行，中国内阁不宜有所变更。”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警告说：“倘因中国内阁变动引起纠纷，日本难以坐视。”

即便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也面临着不小阻力。身处北洋元老地位的徐世昌就认为，“铣电”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段祺瑞于此时辞职，一定会引起北洋分裂，切不可行。

处于内外压力之下，冯国璋只得暂时放弃立即罢免段祺瑞的念头。他一面对段祺瑞进行再三挽留，一面装模作样地通电申斥王汝贤、范国璋，说这两个人“不顾羞耻”，把“军人面皮丧尽”。

段祺瑞随后收回辞呈，通电各省督军表示愿意继续任事。正当众人都以为府院之争已暂告平息时，在冯国璋的秘示下，“长江三督”又掀起更大风浪，他们联名要求撤兵停战，与西南方面和平解决问题，并声明愿做调停人。

“长江三督”的联名通电对段祺瑞的政治主张和威望造成了很大打击。为争取主动，段祺瑞立即下令免除傅良佐督军一职，其职务由王

汝贤代行，所有长沙地方治安也均由王汝贤、范国璋完全负责。

王、范擅自在前线撤兵停战，不仅没有受到军纪国法的处分，反而还要加官晋爵，这在段祺瑞的带兵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是为了稳定湖南局势，他又不得不做出违心之举。

尽管如此，冯国璋还是没有要善罢甘休的意思。他除了趁机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兼职，由王士珍继任其遗缺外，还要求严惩傅良佐。段祺瑞虽然有意袒护傅良佐，但在自己也深陷困境的情况下，也不敢公开包庇，只得同意将傅良佐交付军法会审。

不过段祺瑞随后又提出一项意见，指出傅良佐名义上是湖南督军，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权操于王汝贤、范国璋之手——王、范公然发表通电主张议和，又擅自撤兵，傅良佐赤手空拳，焉能在长沙继续坐镇下去，除了逃走还能有什么办法?

段祺瑞的结论是，傅良佐擅离职守，固然应当惩办；但追根溯源，王、范应负更大的责任，必须彻底追究。

心照不宣

段祺瑞长年在政治场上摸爬滚打，岂是可以任人揉捏的。沿着他所提出的意见，就会涉及很多极为复杂的内幕。比如王、范通电议和究竟是自作主张还是奉有政府的命令？若是前者，王、范作为军人，在发电之前就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若是后者，到底是谁代表政府下的命令?

负责傅案的人初步查了一下。段祺瑞是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但国务院和陆军部可以断言没有下过命令，这样颁发命令的人就只可能是冯国璋了。

按照法律，一旦确证冯国璋曾向王、范下达过明令，那么不仅王、范可以不负责任，傅良佐也能够得以完全脱罪。退一步说，即便搜集不到冯下达明令的确切证据，作为总统，他最低限度也应该出席军事法庭作证。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对段祺瑞而言都是有利的。可真要彻查下去，伤及国家体面不说，在南北分裂的形势下，北京政府估计也存在不了几天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段祺瑞不会走到这一步，冯国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冯段心照不宣，谁都不再提及军法会审傅良佐的事了。具体经办的人见状，自然也不敢继续深入。于是乎，这桩公案就遵循北京官僚圈子里的“潜规则”，先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接着就不了了之了。

段祺瑞罢免傅良佐，容忍王汝贤、范国璋，为的是让后面这二位能够将功折罪，卖把力气将南方联军逐出湖南。可是王、范自恃有冯国璋撑腰，对此并不领情，只是一味想与南军谈和；更有意思的是，南军对王、范的谈和请求也不领情，上来照旧是一顿猛揍。

王、范慌忙抵挡，但他们麾下的北洋军早就因谈和而失去了斗志，稍一开仗便纷纷溃散。王、范见势不妙，也只好双双逃走。不久，南军便长驱直入，控制了长沙。

面对被直系搅得一团乱麻的湖南局势，作为负全责的总理，段祺瑞自感责无旁贷。这天，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到总统府盖印，盖印的时候便转述段祺瑞的话，说段祺瑞深悔用人不当，准备“引咎辞职”。冯国璋听后，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了一个“噢”字，没有丝毫慰留的表示。

非但如此，过了三五天之后，张志潭又来盖印，冯国璋竟然问他：“总理还不辞职吗？”此语一出，连一旁的恽宝惠都感到总统问得实在有些冒昧。因为不管冯段之间有什么仇什么怨，段祺瑞毕竟还是一个责任内阁的总理，在总统还没有找到继任人选之前，怎么能够任由总理递交辞呈呢?

恽宝惠怕张志潭感到难堪，但从段祺瑞到张志潭，显然对冯国璋的态度都早有准备。当着冯国璋的面，张志潭表情严肃地回答道：“辞呈就上来！”

辞呈果然很快就送了过来。这时冯国璋才意识到段祺瑞的替代人选还空缺着，于是加紧物色。

他首先想到的新总理是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此亲自坐着汽车前去拜访，请陆徵祥出面组阁，但却遭到了拒绝。

接下来，冯国璋又请熊希龄和王士珍一同来府商谈组阁问题。熊希龄在袁世凯时代曾出任总理，可他也无心再续前缘，并且郑重声明：“我是决不做冯妇的！”王士珍跟着开了句玩笑：“你不做冯妇，我倒可以做冯道！”

熊希龄马上笑容满面地说：“聘老（王士珍字聘卿）既然愿意做冯道，这件事还不好办吗？”

王士珍发现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急忙微笑着一再向熊拱手作揖，表示只是玩笑话，没有做总理的打算。

此后，冯国璋单独对王士珍进行劝说，请他顾念多年交情，勉强出面组阁。王士珍则说自己和段祺瑞也是几十年的交情，怎好卖友?

不管冯国璋如何苦口婆心，王士珍始终予以婉拒。事实上，为了顾及和段祺瑞的那“几十年的交情”，他甚至连陆军总长一职也称病不肯就任。

一圈人问过来，最后冯国璋找到了外交总长汪大燮。汪大燮正在生病，也不太愿意跳此火坑，为了摆脱冯国璋的苦求，他便在病榻上提出了一个就任条件：只做几天总理，只签署两个公文。

汪大燮以为这样古怪无比的条件会令对方死心，未料冯国璋一口答应下来。

冯国璋的这些情况都传到了国务院。看到“四哥”逐走自己的心情竟然比原来的黎元洪还要急切，段祺瑞的脸上无论如何都挂不住了。他马上赶到总统府面请辞职，冯国璋又假意请他荐贤。段祺瑞推荐的也是汪大燮，并表示愿意亲往劝驾。

1917年11月22日，冯国璋下令准予段祺瑞辞职，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

操盘手

汪大燮只肯做一个星期的过渡总理，在这一个星期里天天催请冯国璋发表继任人选。

冯国璋不能自食其言，只好再请王士珍出来相助。王士珍还是不肯，但答应帮他物色人选，问题是王士珍所物色的人选都是冯曾经请过的人，自然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冯国璋急了，对王士珍说："总理问题且先放下，请看我的老面子，先就任陆军总长吧！"

王士珍一听这话，就像要杀了他似的，头摇得更厉害了。

已经辞职的段祺瑞得知情况后，为免冯国璋下不了台，遂登门拜访王士珍，请他以北洋团体为重，先就任陆军总长。王士珍不肯就职，担心的就是老段有想法，现在老段已经表了态，他也就答应先到陆军部看几天大门再说。

冯国璋这边趁热打铁，把王士珍单独请到家里，要他以陆军总长的名义兼署国务总理，并且对他说："老聘（冯国璋对王士珍的爱称），你还能看我的笑话吗？"

王士珍见冯国璋实在没有别的人好请，也只好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

王士珍兼署国务总理后，府院倒是异常和谐，因为主意全是冯国璋拿，他说要和平统一就和平统一，要交好西南就交好西南。唯一一次闹得不愉快，是冯国璋派人去联系陆荣廷，可是又让国务院负责报销这笔"交际费"。

王士珍认为冯国璋太过吝啬，为此难得地大光其火，说："这件事（指出任总理）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儿似的，我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后来有人提醒说盐务署有一笔按月送来的机密费，可以用于报销，王士珍也就不再和冯国璋计较了。

王士珍如此迁就冯国璋，是抱定了给老朋友帮忙的态度，但冯国璋的逐段之举却大大惹恼了另一个老朋友的部下，这个人就是徐树铮。

徐树铮一生死忠于段祺瑞，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他马上也跟着辞去了陆军次长一职，之后便成为皖系在幕后行动的主要操盘手。

日本政府因在华利益与段内阁息息相关，所以对段祺瑞辞职一事极为关切。日方代表特地询问徐树铮：为什么段辞职，各省没有进行挽留?

如果照实说，寺内内阁和西原很可能会对段的实力感到疑虑，进而放弃对他的援助。徐树铮回答得很巧妙："这是以退为进。"

日方疑虑顿消，并表示寺内内阁对华方针不变，仍认定段祺瑞、徐世昌"为中国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为此，日本政府停止或减少了对西南军事力量和其他势力的援助，集中财力、物力，对段祺瑞及其皖系予以全力支持。

实际上，徐树铮对"各省没有进行挽留"的真实原因非常清楚。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同被称为"北洋三杰"，王士珍的政治倾向基本上与冯国璋一致，也就是说，三杰里面有两个人主张"和平"，只有段祺瑞一个人要求使用"武力"，再加上傅良佐事件和"长江三督"的影响，这才导致各省督军无法在拥段上形成一致的步调。

总结前一阶段的得失，显然段祺瑞在声誉和威望上已经失分不少。徐树铮接下来采取的做法，和现代社会中西方政客们竞选期间的伎俩相仿，那就是开动舆论机器，不遗余力地对段的竞争对手进行攻击和丑化，以期把对方的形象分打压下去，至少不能居于段之上。

徐树铮在北京城内和各省安插了许多眼线，随时收集掌握冯、王的言论行动，同时集合段派的谋臣策士，如曾毓隽、叶恭绰等人，在天津租界里终日开会，针对这些言论行动展开攻击。

虽然民国报界并非娱乐至死，但花边新闻同样为当时的读者所喜闻乐见，政客们若运用得当，其火力和杀伤力甚至远超正规的社论报道。徐树铮便经常亲自操刀，写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在报纸上发表。

在“徐氏花边”中，王士珍被指为“认贼作父”，里面抖的自然都是他忠于清室以及与张勋复辟有染的料。这还不算猛的，相比之下，最让人喷饭的是“总统卖鱼”。

反击

冯国璋爱财，乃是北京政治圈内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据说他有一次饭后散步，看到中南海的池塘里养着很多漂亮的鱼，就问随从：“这都是些什么鱼啊？”

随从回答说什么鱼都有，最近放进去的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由河南进贡的黄河大鲤鱼。这些鱼全部为珍稀品种，最令人称奇的是，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搞放生活动，被放生的鱼的鱼鳍上都拴有作为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

冯国璋听了不由脱口而出："嗯，不错，把这些鱼卖了肯定能得不少钱吧！"

随从以为他只是开玩笑。不料这位总统真的动了卖鱼的念头，过后即开价十万出卖中南海的捕捞权，最后以八万元成交。一时间，北京的饭馆里都开始出现并竞卖"总统鱼"。

徐树铮将"认贼作父"、"总统卖鱼"等直接作为文章标题，并放大成头号字在报上刊登，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对冯、王的声誉进行极力贬损。

除了冯国璋、王士珍，被徐树铮列入黑名单的还有"长江三督"中的江苏督军李纯，因其对冯国璋跟得最紧，"和平统一"的调子也唱得最高最响。

徐树铮在报纸上把李纯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说李纯是北洋的叛徒。有一次李纯要召集各省议会代表到南京开会，以"协商和平"，徐树铮便让京师警察厅具呈，以违法为由请求取缔，同时通知各省督军不许参议会派代表前往参加。

在报上损人固然带劲，但更有效的显然还是让北洋军人们直接站队发言。北洋以杂牌居多，皖系或亲皖军人又主要集中于杂牌，如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等。这些杂牌督军早已响应段的号召主战，可是他们在实力和声势上仍远不及那些嫡系将领。

当时的北洋嫡系部队一共有六个师，这六个师实际都是由清末的北洋六镇演化而来。第一师原为"京旗镇"，驻于北京，既然段已下台，当然就指望不上了。第二、第四、第六师的师长即"长江三督"，徐树铮判断第四师师长陈光远、第六师师长李纯都是铁杆直系，无法

拉拢，只有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因身在湖北，如果被南军逼紧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倒还可能转过头来跟皖系一道主战。

剩下来的两个师中，第六师师长曹锟身兼直隶督军，本身属于直系，不过徐树铮认为可以拉也应该拉。原因是曹锟与皖系也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号称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另一方面，第六师近在直隶，兵力又最多，可以随时威胁中央。若把这部分力量用上，让他们到前线去攻城略地，胜了，皖系沾光；败了，反正不是皖系的嫡系部队，对皖系而言，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为了拉住曹锟，徐树铮亲自跑到天津对其进行游说。他先对曹锟许诺，说明只要曹锟肯站在主战派一方，不久召集新国会时，一定想办法捧他为副总统。接着又举反证，指出如果曹锟想站到主和派一边，则不会再有出风头的运气，因为“长江三督”以李纯为首，早就在主和上拔了头筹。如果南北和平真的实现，李纯的政治地位必然提高，而曹锟却必然一无所得。

曹锟听后大为动心，于是立即单独发表“马电”，主张以南军首先退出长沙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六个师中的第五师师长张怀芝驻于山东，虽然该师战斗力并不强，但是资格老，而且听从段祺瑞，让他跟着走没有问题。

1917年12月2日，在曹锟和张怀芝的主持下，全国七省三区的督军和都统代表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这次会议除“长江三督”未派人到会外，几乎囊括了北洋系所能控制的各个省区，其规模和声势之大，不亚于过去的徐州会议。

天津会议是主战派的大联合，也是皖系对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一次有力反击，而冯国璋在这种反击面前又几乎找不到什么抵御的借口——说好要“和平统一”，可是南军却仍旧没有要与北军立即实现“和平”的迹象，不仅湖南方面的南军已攻至岳州附近，而且入川的滇黔军也攻克了重庆，吴光新已被迫弃城东下。

冯国璋曾责成李纯与陆荣廷接洽，主张南北军在湖南先行停战。陆荣廷倒是答应了，但南方联军中的湘桂军还想夺回岳州。岳州为湘北门户，驻守岳州的北军又属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部队，王占元当然也不肯轻舍。

冯国璋派人携自己的亲笔信到天津，要求天津会议本着“有备无患，先礼后兵”的精神进行，然而主战派已在会上占据绝对优势，一致要求组织强大兵力讨伐南方。

冯国璋被南军和主战派夹在中间，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忍不住对女婿陈之骥说：“瞧瞧我都被他们弄到这个地步了，想想黎黄陂（黎元洪），也真难为他了！”

不是总理的总理

出于形势所迫，冯国璋只得把段祺瑞和王士珍一并请到总统府商议解决办法。段祺瑞表示除下讨伐令外，别无他法，这本在冯国璋的意料之中。他找王士珍前来，就是想一道说服段祺瑞，以抵制天津会议的压力，可是没想到王士珍也变得一筹莫展，乃至说出了“如须作战，不如请芝泉（段祺瑞）出来主持为好”这样令他大失所望的话。

这时不仅国内形势波诡云谲，国外的“一战”也出现了变数。眼看德、奥将败，原在东线与德国作战的俄国突然爆发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了“一战”。这不仅意味着德国减除了来自东线的威胁，而且当时还有一种猜测认为，它很可能会从苏俄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

如此一来，对于协约国方面还能不能取胜，北京政府内部又产生了新的争论，有人认为参战乃失策之举，身为总统的冯国璋也有些胆战心惊。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与苏俄的大规模战争，冯国璋决定设立参战督办处，并打算由段祺瑞负责。当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时，段祺瑞未有任何犹豫或为难之色。他先是让冯国璋坚定信心：“俄国虽然撤兵回家革命，但参加协约国的已经有十九个国家，德势已孤，寡不敌众，结果必败。”接着又慨然表示：“我决不推卸责任，总统不要怕，参战督战办令一下，我决不推让，立刻走马上任。”

1917年12月18日，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同一天，他还下达了一道手令，规定以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

冯国璋的算盘打得很精明，他是要一箭双雕，一方面让段祺瑞去替他应付棘手的外战，另一方面又要把段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可是最后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参战督办并不隶属于内阁，段祺瑞的一切决定都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则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取得外援。

冯国璋自己要搞的参战督办，结果却让段祺瑞重新掌握了国内的军政大权。段祺瑞虽然已辞去了本兼各职，但自此以后，凡国内重大事务特别是南北问题，他都要不断予以过问，成了不是总理的总理。

1918年1月中旬，正在陆军部任职的陈文远奉命到前线视察。此前冯国璋、王士珍已让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希望谭能够收拾残局，阻止事态继续扩大，但谭延闿却无意回任，而湘桂联军更是乘胜追击，不肯罢手。

陈文远到湖北时，湘桂联军距岳州已只有几十里路。为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他冒着危险亲自去了一趟岳州。可是下火车后，什么人也找不到，于是陈文远只好在城内草草巡视了一番，结果发现驻城部队虽然不少，可大多为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部队，其中既有王汝贤、范国璋的残部，也有山西商震的一部分败兵。这些残兵败将无一例外地都无精打采、狼狈万状。

陈文远不敢在岳州逗留，连忙又乘车返回武昌。一见到湖北督军王占元，他就直言相告:“我看前方军事危急得很，而且士气颓丧，岳州恐怕也难久守。岳州一丢，（北军）在湖南就站不住了，战事立刻会扩展到湖北省来。你还不赶紧想办法吗? ”

王占元皱着眉头对陈文远说:“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力量单薄得很，要想守住湖北都不容易。”

见王占元尚未完全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陈文远想了一下说:“我在岳州匆匆看了一下，人心已经慌乱到了极点，地方上经过这场战事，真是糜烂不堪了。我看再经过十年，也不容易恢复元气吧。”

王占元一听这才慌了，急忙请求和陈文远联合拍个电报到北京，申述地方危急的情形，请立即派队伍前来，以安定人心。

王占元虽为“长江三督”之一，但正如徐树铮所分析的那样，火如果烧到他的家门口，就不可能再装腔作势地“主和”了。王占元的请求正中陈文远下怀，他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刻拟了一份电稿，让人发往北京。

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

陈文远在湖北也没有再停留，随即就动身回京。一下车，顾不得回家休息，就先到总统府，把所见到的情况和与王占元的谈话内容向冯国璋进行了详细汇报。他结合所见所闻，极力强调湖南乃南北之枢纽，现在南军即将完全占领湖南，而湖北也岌岌可危，如果政府再不出兵，将来形势恐怕很难乐观。

冯国璋已经看过电报内容，见连王占元都要求派兵，自然不能再重复“先礼后兵”之类的托词。只见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我本来一向主张和平，不愿国内再见战事，免得生灵涂炭，但南方既然坚持用兵，那也就说不得了，只好用武力周旋周旋。”

冯国璋让陈文远去找段祺瑞：“请他从速布置军事行动吧。你告诉他，就说我说的，马上准备派军队到湖南去。”

陈文远立刻赶到段公馆，向段祺瑞转达了冯国璋的意见。段祺瑞听后说：“早就应该如此。国家不用武力统一，各省都不听命中央，那还成什么国家！”

段祺瑞以为冯国璋已下定了对南方用兵的决心，但总统府依旧未能出台“讨伐令”。冯国璋如此犹豫不决，是因为他知道南北全面战争一旦重开，直、桂两系的联盟势必要被打破，而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将大大降低。

几天之后，岳州被湘军占领，北军全部撤离湖南省境。消息传来，北京政府大为震惊，冯国璋也更加心慌意乱。情急之下，他向徐世昌求教，徐世昌便出主意让他主动邀请段祺瑞商议对策。

由于对冯国璋迟迟不肯下达“讨伐令”很不满意，在被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后，段祺瑞只是冷冷地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问他意见，他也只说了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该讲的都讲过了。”

冯国璋这时忽然站起身来，开始大骂南军，说南军欺人太甚，不把北洋派当回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其态度之慷慨激烈，倒仿佛他一直“主战”，而在座的段祺瑞、徐世昌一直“主和”，并且已经挡了他主战的道路似的。

段、徐和冯国璋在北洋系里共事二十多年，从来也没见过对方这种样子，二人顿时被弄得莫名其妙。

骂完南军，冯国璋宣布:“为了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败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理由很正当，但就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大骂南军一样，段、徐仍然不知道冯国璋今天的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兵都还没出一个，大总统就先御驾亲征?

徐世昌滑头，来了个“未置可否”，只有段祺瑞很认真地劝冯国璋不必亲自出征，可是冯国璋态度固执，非要亲自出征不可。

接着，冯国璋又把王士珍内阁单独召至春耦斋，宣布要“南巡”，不过理由又与先前有所不同：“我这次到南方去，主要是为了征询南方他们几个人（即‘长江三督’）对于和、战问题的意见，往返最多不过七天。”

说完之后，他用眼神向众人扫视了一遍，意思是征询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自总理王士珍以下，大家起先都沉默地坐着，谁也没有什么表示。就这么沉默了一两分钟，内务总长钱能训才说了一句：“总统还是不要轻动为好。”

当时盛传徐树铮已和奉天的张作霖拉上关系，准备进兵北京，发动政变。钱能训担心，如果奉军真的进关“称兵犯阙”，冯国璋出京城容易，回来可就难了。

冯国璋似乎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他紧接着钱能训的话说道：“现在非我亲自走一趟不能解决。”

冯国璋的行动计划就这么定了下来。不过从他离京开始，“御驾亲征”的说法便不攻自破——前线在两湖，出征该走京汉线，但冯走的却是津浦线！

冯国璋在临行通电上为他的南下提供了另一种由头，所谓“南行巡阅”。可是他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未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所谓“南巡”被证明根本不是事实。

不是“亲征”，不是“南巡”，只剩下了他对内阁所说的理由，即征询“长江三督”的和、战意见。然而若认真推敲，这种话更是欺人之谈，因为谁都知道“长江三督”都是附和其意见的主和派，即便湖北督军王占元因面临自身地盘被夺的威胁，不得不向京城请兵，但基本政治倾向还是反对对西南用兵。

试问，大家本来就属于同一个阵营，冯国璋还有什么和、战问题需要向他们征询呢?

此路不通

有人说，冯国璋在出发之时，不仅专门挑选了一旅精兵护卫，还携带子弹两百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传言后来被证明不是事实，冯国璋南下，只带了一个姨太太和很少几个随行人员。

纵使轻装简从，但在冯国璋走后，连总统府的人都纷纷议论，说这次总统到了南京之后，如果看到北方情况对他不利，他就会暂时留在南京不回来了。

总统府的人站在冯国璋的角度，仅仅认为是主战派或奉军可能入关的压力，逼得冯只好逃离京城。段祺瑞分析后，则判断冯国璋不是逃离这么简单，他其实是在用“南巡”的手法，继续维护其主和政策，甚至于在脱离主战派的包围之后，还会宣布总统蒙难，并以南京为临时行辕，反过来联合南军对皖系进行讨伐。

段祺瑞赶紧密令安徽督军倪嗣冲予以阻止。冯国璋的专车还没到蚌埠，倪嗣冲就命令车站将信号旗落下，铁道岔开，使火车不得行进。等专车到达后，他又登车将冯国璋强劝下车，迎入自己的督署。

双方坐定，倪嗣冲问冯国璋为什么要南下。冯国璋回答说：“我离开南京已经半年，想念同人，要去慰劳他们，并与秀山（李纯的字）有事相商。”

对冯国璋的这番说辞，倪嗣冲早已有备：“我已打电话给秀山了。北京是国家首都，各国使节都住在那里，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我劝大总统还是回去。”

冯国璋哪里肯听，执意要等李纯来接他，而李纯早就接到了冯国璋要来南京的电报，可是他打心底里其实也不希望冯国璋来南京。

李纯虽然向以冯国璋的忠实信徒自居，但如果冯国璋真的以大总统的身份长居南京，便无异于在他的旁边安上了一个什么事都要过问的“婆婆”。对他来说，由“媳妇”升“婆婆”比较容易接受，再由“婆婆”降为“媳妇”，那就太难熬了。

李纯遂以生病为托词，派自己的参谋长作为代表由南京赶到蚌埠，与倪嗣冲等人一道劝冯回京。

李纯方面都这么说，证明“此路不通”，冯国璋只得怅然北返。临登车时，他气得发牢骚说：“要论咱们北洋的资格，其实还轮不到我。谁叫你们当初把我拥戴出来呢？既然把我拥上了台，又都不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呢？”

倪嗣冲马上回敬道：“我们拥护你，是希望你给我们当家做主。现在你却一点担子也不肯担！”

倪嗣冲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声色俱厉，态度很不礼貌。冯国璋下不来台，便又愤愤地说：“哼，项城（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你们再

也不敢这样。”

此话不说犹可，一说倪嗣冲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他是当年最忠于袁世凯的督军之一，也是首先上表称臣劝进的所谓“洪宪余孽”。就在袁世凯最后召开御前会议，徐世昌、段祺瑞都劝袁世凯急速取消帝制的时候，倪嗣冲还坚持说：“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群丑而后已。”

冯国璋对袁世凯的背叛，恰恰就是导致袁世凯垮台的直接因素之一。今天冯国璋突然提起袁世凯，倪嗣冲被触及旧恨，顿时便朝对方开起了连珠炮：“袁大总统在时他能给大家做主。可是他要做皇帝，当年若不是你带头反对，他的皇帝早已上当了，何至于气死呢！话又说回来了，他要不死，大总统也轮不到你呀！”

冯国璋被数落得哑口无言，只得忍气吞声地回北京去了。他这一趟南下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搞得威信扫地，至此，只要他一出台倾向于和谈的政策便立即遭到官员们的反对。面对这一尴尬局面，连素以和事佬著称的国务总理王士珍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无奈之下，冯国璋只能向段祺瑞和主战派做出全面妥协。1918年1月30日，他终于下达了他几个月来曾用各种方法加以回避的“讨伐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奉令率部南下，对南军“痛予惩办”。

第七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迫使冯国璋下达了“讨伐令”后，冯段关系也没有变得更好，原因是冯国璋仍然处处埋设伏笔。比如，“讨伐令”并非出自大总统命令，而是使用了“参陆办公处”的名义，这么做就是为了保留他自己讲和的余地。徐树铮对此大加讥讽，说：“什么参陆办公处，那不过是听值员司抽烟喝茶歇歇腿的午朝门罢了，怎么可以下命令指挥军队呢？岂不是天大笑话！”

又比如，北军南下要假道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偏偏拒绝假道。段祺瑞亲赴总统府，要求对陈光远予以惩戒，冯国璋则说要惩戒陈光远也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先对傅良佐有个说法。冯段为此大吵一顿，彼此间都不惜恶语相向。

最让段祺瑞感到生气的莫过于对冯玉祥事件的处理。在讨伐张勋时，段派重新起用冯玉祥，冯玉祥也响应段祺瑞的号召，参加了讨伐战役。按照道理，冯玉祥似乎应该站在皖系这一边，但在冯国璋、李纯的笼络下，冯玉祥却投向直系，而后又在南军发动进攻时，拒绝服从段祺瑞的作战命令。

段祺瑞要求冯国璋下令将冯玉祥调至福建，其本意是让冯部远离比较敏感的长江地域。冯国璋调倒是调了，可调冯玉祥去的地方却不是福建，而恰恰是最为敏感的湖北。

就在北军杀向两湖，南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突然在武穴发出主和通电。武穴地处鄂皖赣三省交界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冯部的这一行动自然也影响到了北军的南进计划。

大礼

虽然冯国璋并未直接指使冯玉祥阻挠"讨伐"，但他在发出"讨伐令"后仍与西南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恽宝惠已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有一次他到总统府去盖印，恰巧看到内务总长钱能训正一手拿着一支毛笔，另一只手捧着个水烟袋，在那里摇头晃脑地低声吟诵，就好像旧时私塾里的学生在写文章一样。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则站在钱能训身旁，嘴里不停地和他一起推敲着几个字。

恽宝惠走近一看，原来这两个人看的是一篇由张一麐拟写、冯国璋具名的发给西南方面的密电稿。

恽、张、钱都属冯派，但钱是总统府外的人，一般情况下，冯国璋不会也不敢请府外的人来斟酌这样的密电稿，钱亦不例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据恽宝惠估计，一定是冯国璋认为密电关系重要，乃至于对秘书长的水平都有些信不过，所以才把长于文笔的钱能训找来帮忙。

冯国璋与直系明里暗里的小动作，使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在重启后再次陷入步履维艰的状态：在两湖，冯玉祥的武穴通电直接

导致张怀芝的两万人马被迫滞留九江，其余各部官兵的情绪也大受影响；在四川，川督刘存厚在滇军的压力下，已经表示要与西南一致。

冯国璋既然已经下达了“讨伐令”，段祺瑞要想从根本上扭转眼前的不利局势，就只好依靠他自身的军事实力了。

段祺瑞虽然已实际掌握军权，可以调遣国内部队，但由于北洋系内部派系分化严重，使得军权也成了被稀释的军权。具体来说，对于皖系或亲皖力量，段祺瑞是调得动的。问题是像张怀芝、倪嗣冲这样的部队，不是战斗力不强，就是凑数的杂牌，这也使得皖系尽管看上去人多势众，其实真正能打仗、敢打仗，可以派用场的却不多。段祺瑞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讨伐令”下达之前，他在与徐世昌、徐树铮讨论时，就认为要制止直系与南方和谈，单靠皖系是不行的。

皖系不行，“两栖督军”曹锟等人倒是很能打，并且已杀上两湖前线。可人家毕竟属于直系，上阵时都怀着自己的小九九，不可能完全听你调遣。

这时徐树铮提出，应该加速实现“借奉打直”和打击南方各派的计划。

分化后的北洋系除出现直皖两大系统外，还形成了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的若干小集团，奉天巡按使张作霖的奉系即为其中之一。

奉系虽为北洋旁系，但这个集团的发展势头不错，隐隐然已有赶追直皖的势头。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在士官学校期间即为好友。徐是七期，杨是八期，二人给外界的印象都是“大言不惭，狂妄过人”，彼此也特别气味相投。徐树铮通过杨宇霆了解到张作霖久有向关内扩张之志，便想对这部分力量加以利用。

徐树铮主张引奉军入关，并分别将其驻扎于京汉、津浦两线以助战，这也是奉军入关和在北京发生政变传言的原始出处。不过他的这一主张起初并没有得到段祺瑞的同意，因为段祺瑞深知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奉军入关，再要让奉军退回关外绝非易事。

现在眼看形势恶化，段祺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也只能饮鸩止渴，放手一搏。徐树铮随即前往东北，亲自实施“借奉打直”方案。

张作霖乃胡子出身，生就的也是胡子脾气，上他的山头如果不带点礼物、给点甜头，人家凭什么要白白给你卖力?

这笔礼物从何送起呢？段祺瑞在辞去总理前，曾订有中日军械借款协定。冯国璋便利用该协定向日本借款购买了一批军械，其中光是步枪就有两万七千余支。

段祺瑞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冯国璋也未与其商量。依照冯国璋的安排，这批军械准备用来扩张自己的个人势力，即将直系的两个旅扩编为两个师。不料此事不仅为徐树铮所侦悉，而且他还探听到了军械运抵秦皇岛的日期。

徐树铮于是决定劫械。他知道段祺瑞不会同意，所以在没有进行请示的情况下，就与杨宇霆商量好了行动步骤，并交给对方一张他在任陆军次长时所留下的盖有陆军部关防印的空白公文。

杨宇霆拿着公文，以要用于南征为由，率部在秦皇岛截留了军械。军械一到手，徐、杨就进行了瓜分，其中奉军获得的枪支就有一万七千余支。有“大礼”在手，徐树铮这才大大方方地到沈阳会晤张作霖。

奉军当时只有三个师，而且所有武器装备都很陈旧，张作霖久欲扩军，只是苦无军械。徐树铮送给他的这批军械枪炮齐全，已足够编成六七个混成旅。兴奋之余，他一口答应派奉军入关南征，并按照徐树铮提出的条件，授其以统帅权——在随后成立的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名单上，张作霖本人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但可代行总司令的一切职权，入关的奉军也由徐树铮直接指挥。

教猱升木

一个离职的陆军次长，公然盗用关防，与人合谋劫取枪械，还在无中央正式任命的情况下当了奉军副司令，此事在北京政治圈中传为奇谈。徐树铮胆子之大，令北洋系内部全都为之咋舌不已，段祺瑞听闻后也很吃惊，对左右说："又铮（徐树铮的字）闯祸了！"

众所周知，徐树铮乃段之心腹。徐树铮闯了祸，段祺瑞不得不帮他擦屁股，于是一边给徐树铮发电报，责备他"违法乱纪"，一边向张作霖下命令，要求将扣留的军械运回北京。

张作霖哪里肯将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他复电说奉军本来就要兴兵对南方进行"讨伐"，正打算筹措军械呢，现在中央主动把枪械送来了，正好！

徐树铮则致电陆军总长段芝贵，说明此事与段祺瑞无关，并要他转告段祺瑞，说张作霖扣留这批军械，将用于编练入关的奉军，对主战派是有利的。

后来有一天，徐树铮和曾毓隽都在段祺瑞那里，段祺瑞便又提起了这件事，认为徐树铮劫械是"教猱升木"。

“教猱升木”乃中国的一句古语。猱者，猴也，教猴子爬树。也就是教唆坏人干坏事的意思。段祺瑞话里有话，他认为徐树铮是以枪械为诱饵，引诱奉军入关，属于一种不道德的政治行为。

徐树铮马上说：“那么‘长江三督’之‘升木’（暗指主和）又是谁教的呢？”段祺瑞顿时语塞。

冯国璋得报后，固然心疼丢失的枪械，但与劫械案相比，奉军入关才是真正要他性命的大事。

徐树铮到沈阳本是秘密行动，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京城内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对徐树铮此番用意也是说法颇多，有说他要助张作霖复辟的，有说要助张作霖倒冯的。冯国璋听到后，急忙派人给徐树铮发电报，要他“回京息谣”。

徐树铮回了封电报，大意是：“一不复辟，二不倒冯。”

冯国璋再让段祺瑞召徐树铮回京。段祺瑞无法推辞，便照他的意思给徐树铮发了电报。徐树铮回电云：“国事日亟，匹夫有责，树铮只知有国家，他非所知，一时不等即回，异日当赴师门领责。”

1918年2月中下旬，奉军一部开进关内，分驻于秦皇岛等地。2月26日，冯国璋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奉军入关。会上，他质问段祺瑞：“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命，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祺瑞回答说不知道。

冯国璋又接着大声问道：“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做何勾结？”段祺瑞更难以作答。

冯国璋开这个会是想要段祺瑞叫张作霖撤兵，可奉军原本就是段祺瑞召来的，他本人即便不同意劫械，却也不反对奉军入关。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怎么叫张作霖撤兵呢?

退一步说，就算他老段出于引狼入室的顾虑，肯去跟张作霖说，事到如今，那张作霖也要愿意听啊！

奉军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关，其中有一支队伍甚至开到京津线上的廊坊，且人不解装，马不卸鞍，戒备森严。

京城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随之谣言四起，议论纷纷。冯国璋赶紧给张作霖直接发去电报，问对方用意何在。张作霖复电言称要“保护总统”。

冯国璋跟着就又发去一份电报，说政府既没有命令，北方也没有战事，我这个总统要你保护什么？他同时以边防重要为由，命令张作霖召还入关部队。

张作霖不再加以掩饰，他直言奉军入关，执行的是北京政府的“讨伐令”，部队一到南方战场，就会归曹锟、张怀芝节制。接着，徐树铮通电就任奉军副司令，并开始指挥关内奉军为前线的直鲁两军建造运输桥。

至此，奉军进关的秘密水落石出。国务总理王士珍一看主战派竟然摆出了这样的阵势，便再也无心给冯段之争当垫背了。他让国务院秘书长恽宝惠替他拟了一个请假的呈文，并且叫恽宝惠代他呈递。之后也不向冯国璋打招呼，便换上便衣，悄然挂冠而去。

恽宝惠原以为冯国璋会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惊诧，或至少在脸上露出各种复杂的表情。可是奇怪的是，当冯国璋看完王士珍的呈文后，却并未有任何诧异之色。只见他很自如地在呈文上批了几个字，意思是请假照准，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兼代。

等恽宝惠办好命令，送到钱能训的家里请他副署时，钱同样干脆得很，拿过命令就在后面写上了“钱能训”三个字。

在恽宝惠看来，这是冯派在主战派的猛烈打击之下，已毫无还手之力的一种表现。事实也正是如此，王士珍逃至天津后，即提出正式辞职，并写了一封信给冯段二位老友，发誓今后决不回京任职。紧接着，冯国璋又在段祺瑞等人的压力下，公布了“国会组织法”等条例，这就意味着一旦时机成熟，段祺瑞就可以通过新国会的选举登上总统的宝座，冯国璋连自己屁股下的那把交椅都岌岌可危了。

众望所归

面对着皖系在军事、政治上双管齐下，冯国璋所能做的除了服软还是服软。他不得不亲自登门拜访段祺瑞，邀其出来组阁，后来见段祺瑞一再婉言谢绝，又请徐世昌出面相劝。

段祺瑞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道冯国璋并非真心希望他再次组阁，另外，他还听从了曹锟的建议，认为如果急于出山，可能会导致主和派的李纯“惊而致变”，从而影响前线部队的士气。

段祺瑞和主战派能够恢复主动地位，奉军自然立了首功。利用徐树铮送来的“大礼”，张作霖一共新编了六个混成旅，其中四个旅暂驻于关外，只有两个旅即刻开入关内。此时段祺瑞虽然只有一个参战督

办的名义，但对国内部队的组建拥有核准权，奉军这六个混成旅最后也要到他那里备案。

张作霖的报告送上来以后，段祺瑞估计张作霖不愿意把所有新编部队都放入关内，就按照这一实际情况，在正式文件上批示将关外的四个旅划归张作霖指挥，关内的两个旅划归徐树铮指挥。

看到报告，徐树铮认为入关和归他指挥的奉军太少，起码应该关内关外一半对一半。由于文件已经段祺瑞批示，他不能怪自己的幕主，便把火发到了张作霖身上。

曾毓隽为息事宁人，就劝他说，何必计较一旅之得失，我代你筹措两百万元，给你补充一个旅的人马怎么样?

徐树铮依旧觉得不公平，认为被张作霖这个“胡子”狠狠宰了一刀。曾毓隽见状要做和事佬，便在天津宴请张作霖、徐树铮，杨宇霆也奉陪末座。

酒喝到一半，徐树铮忽然对张作霖说：“大哥你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可你不要逞强！我现在固然兵力单薄，不能打败你，然而如果实在不行，我将来总有一天要带日本兵打你。”

徐树铮的一番话引得满座失色。张作霖的态度却非常冷静，他急忙举杯对徐树铮说：“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

曾毓隽作为东道主非常尴尬，第二天便告诉了段祺瑞。段祺瑞听了只是摇头：“又铮到处树敌，亦徒呼奈何？”

剑走偏锋向来就是徐树铮的风格，此举固然有得罪张作霖之虞，可是也把话说到了明处，而且恰恰暗合了张作霖的做事方式。之后张作霖把关外的那四个旅也全都派入了关内，其中两个旅用于江西，两个旅用于湖南，其余两个旅归参战督办处统辖。

奉军的全力加盟，使得北军在兵力使用上更加游刃有余。1918年3月18日，曹锟所部由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指挥，一举攻克岳州，南方联军沿粤汉铁路南逃。主战派由此声势大振，“长江三督”也不敢再唱反调了。第二天，曹锟领衔联合包括“长江三督”在内的十九省区的督军、都统致电段祺瑞，请其立即出山组阁。电文中称，在此“国家不幸，变乱迭生”的环境下，朝野上下“咸以声望素著、中外信仰者，非公（指段祺瑞）莫属”。

同一天，北洋元老徐世昌告诫冯国璋：“非段复出，恐有兵变。”日本公使林权助连连会晤有关人士，催段复出，他还特地让人转告段祺瑞，要段拿出政治勇气，不要再推辞了。

就像曾在三造共和中展示过的那样，段祺瑞再次以众望所归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冯国璋却几乎成了和黎元洪一样的陪衬，以至于没有谁会把稳定局势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

从接到联合电文那一刻起，冯国璋这个既倒霉又可怜的代大总统就已彻底认输。在再次敦请段祺瑞接受组阁大命时，他指天发誓愿与段祺瑞同生死、共患难，同时还自动承认了向院方完全交权的各项条件，就差没跪下来哀求了。

见此情景，段祺瑞方才答应出任内阁总理，不久又组成了由清一色皖系政客所组成的新内阁。

段祺瑞上台时，政府“财政困窘，朝不谋夕”，这也是王士珍要挂冠而去、冯国璋要再三再四地请段帮其收拾局面的原因之一，而要在短时间内缓解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段内阁所能采取的又只能是老办法，即向日本借款。

西原借款

“一战”期间，日本财政界为了制止金融混乱，调剂物价平衡，其首脑人物正极力鼓励向国外投资，以便减少国内筹码的过度集中。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实际就带有一定的投资放债性质。西原还曾经主张，所有对华借款均应由中日实业家先行协商妥定，然后再交双方外交部承认。

可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这种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

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上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日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它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

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烂账”。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寺内内阁乐于如此赔本赚吆喝似的不断借钱给中国政府，最主要的条件还是要看到段祺瑞“有所作为”，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段内阁能够持之不懈地对南方用兵，以完成南北统一。在商定新一笔借款时，日方明确告诉段内阁，称此次借款是认定北京政府尚有统一能力，若北京政府不能戡平“粤乱”（指护法战争），则西南尚有“伪政府”（指护法军政府）存在，即使条件谈妥，借款也不能交付。

负责经办对日借款的“亲日派”曹汝霖曾提出一个观点：没有列强实力作为后盾，谁也不能统一中国。段祺瑞对这一观点是赞同的，他也认为，自己要完成南北统一，暂时不能不借助于日本的力量。

段内阁和寺内内阁尽管出发点大不相同，但在促成中国统一这一目标上，却能达成惊人的一致。段祺瑞因此主张“内政方针不能不随外交为转移”。他对皖督倪嗣冲表示：“粤乱不平，则政府无由存在，故无论如何困难，必先戡定粤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段祺瑞通令各省，称北军为“国军”，南军为“敌军”，不许再用南军、北军字样，同时要求“所有前敌将帅，仍当振励士气，迅赴事

机”。已经回到北京的徐树铮也公开声称，此番不打到广州，决不罢休。

在组阁后的第四天，徐树铮与段祺瑞商定了新的用兵计划，准备乘攻占岳州的余威，以直军为主力肃清湘东的南军，同时抽调鲁军、浙军、赣军、奉军“援闽、攻粤、入川”。

1918年4月中旬，北军虽在湖南打了一些胜仗，但在湘东连续失利，不少师旅溃不成军，有的旅伤亡过半，有的师只剩下数百人。为挽救湘东失利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段祺瑞断然决定“南巡”。

这次“南巡”责任重大，不仅要振奋前线士气，还要对李纯等“长江三督”进行协调，而就在段祺瑞乘轮赴宁，即将与李纯会晤的途中，却差点因此遭遇不测。

昏招

当时段祺瑞乘坐的是“楚育舰”，一部分随员乘坐的是“楚材舰”。在行至汉口刘家庙附近时，适值招商局的“江宽号”客轮开来。“楚育舰”速度快，已经开过去了，“楚材舰”则与“江宽号”撞个正着，前者的船头碰着了后者的船腰，两船都几乎沉没。

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段祺瑞的义子罗凤阁曾被人收买，欲行刺段，后又中途悔悟并离开了段公馆。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原谅了他，他也重新到陆军部办公，这次随段南下，他正好就坐在“楚材舰”上。

发现兵舰可能要沉没，罗凤阁和一个姓杨的团长急忙坐上救生船，之后他拔出佩刀，要砍断救生船的缆索。可是没想到忙中出错，只砍了一边的缆索，救生船直吊起来，把罗、杨抛入江中，二人都因此被淹死了。

对义子死于非命，段祺瑞极为惋惜，难过伤心了好几天。不过这次“南巡”确实成果不小，除了暂时安抚住李纯等人外，段祺瑞还在汉口召集督军会议，对作战行动重新做出部署。

会议决定对广东、四川只预定作战方案，如果西南“再肆反抗”，才发动进攻。湖南则成为北军需要肃清的重点，曹锟、张怀芝、张敬尧被责成共同作战，以克复衡阳、衡山。

会议一结束，吴佩孚即率部沿铁路直趋长沙，南方联军望风披靡，纷纷向湘南撤退。随后，吴佩孚与张敬尧会师于长沙，张怀芝进入醴陵，包括奉军在内的其他部队也都相继开入了湖南。南方联军总司令谭浩明见势不妙，赶紧逃往广西桂林。南方联军自行瓦解，其中的粤、桂军各回本省，湘军则退集粤桂边境。

虽然在汉口会议上宣布要放弃“攻粤、入川”计划，但段祺瑞内心里其实并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因为只有“攻粤、入川”，才能最终完成他的统一设想。回京后，段祺瑞在向冯国璋详述南下经过时，仍强调：“北军应以攻粤为优先。”

接到攻湘胜利的消息，段祺瑞喜不自胜，他当即给曹锟发去急电，要曹锟转令吴佩孚继续追击湘军，直捣“两粤”（即两广）。按照这一电令，吴佩孚率部相继攻克衡阳、衡山，但随后却按兵不动，不再向南进攻。

事情还得先从吴佩孚的上司曹锟身上讲起。徐树铮引奉军入关，奉军首先进入的地域是直隶，而直隶又是曹锟的地盘，这就已经让曹锟感到了不安。接着冯国璋又暗地通知他，说段祺瑞、徐树铮要升他为两湖检阅使兼湖南督军，徐树铮自己则出任直隶督军。曹锟听后，认为段、徐是在对他施行明升暗降、调虎离山之计，于是慌忙从武汉跑回保定。等徐树铮闻讯赶到武汉向他做解释时，已经迟了一步，曹锟在当天上午就动身北上了。

徐树铮对此很不高兴，慨叹："曹三（曹锟在家排行第三）目光短浅，放着大功（指在南北战争中建功）不就，真是坐失良机！"曹锟却仍对徐树铮那不知真假的"夺位之举"耿耿于怀，说："这小子太损了，要把我这摊连锅端哪。"

曹锟是北洋督军中的第一号实力人物，又是主战派大将。他若有个风吹草动，将对主战派造成极大打击。段、徐只能做出让步，段祺瑞为此还请求总统府特授曹锟勋一位，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可是段祺瑞的这一笼络手段并未让曹锟感到满足，后者仍然一个劲儿地请辞和请假，这又反过来令段祺瑞和徐树铮感到对方有了异心。奉段祺瑞之命，徐树铮亲自到汉口劝阻曹锟不要辞职或请假，他同时在汉口做出新的部署，把南下奉军的两个旅编为一个支队开往前线，名为增援，听候曹锟的调遣，实际是对曹锟所部的行动进行监视。

正是由于不再信任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在给曹锟发急电，要求吴佩孚继续追击湘军的同时，又任命皖系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曹锟本身是直隶督军，他当然可以不在乎一个湖南督军，吴佩孚则不然。就实际情况而言，攻湘最卖力气、战功最大的是吴佩孚，张敬尧在湘东曾多次败给湘军，这个败军之将能够进入长沙只不过是借了吴佩孚的光。如果论功行赏，新任湘督应该是吴佩孚，而不是张敬尧。

看到湘督居然落到了他很看不起的张敬尧头上，吴佩孚极为愤慨，认为段祺瑞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为他卖命的走狗，常说："做走狗，也不是这样做法！"段祺瑞催促他乘胜前进，直捣粤桂，他就偏偏置之不理，按兵不动。

另外，吴佩孚和冯国璋还有一段渊源。曹锟早在率部南征之前，就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师长。当时有人也想夺这一职位，便向总统府写匿名信控告吴佩孚。冯国璋先找人打听了一下吴佩孚的品行，然后就表示谁也不能撤吴佩孚，要坚决保住他的师长位置。

吴佩孚得知后自然对冯国璋感恩戴德，现在见段祺瑞这样"不辨贤愚"，就更增加了对冯国璋的好感。冯国璋主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于是吴佩孚也拥护冯国璋的主张，不但不再向南进攻，还与湘军往来接洽，商定南北两军各守原有阵地，互不侵犯。

发现湖南战场陷入停滞，段祺瑞马上明白自己出了昏招。他赶紧设法补救，派徐树铮赴湘南前线，对吴佩孚重点拉拢。孰料此举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曹锟闻讯后认为徐树铮是在收买自己的部下、拆自己的台，对此极为不满。在未经段祺瑞批准的情况下，他就又擅自跑到天津"养疴"去了，临走时还带走了司令部的全部人马。

至于吴佩孚，到底是个品行经过冯国璋考查的人。他毕生所坚持的军人品质之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背叛有恩于自己的上司，无论是冯国璋还是曹锟。徐树铮在他身上同样一无所获。

“买卖”

由直系带头，前线官兵厌战情绪高涨，北军将领们也纷纷开始出现懈怠情绪。曹锟前脚一走，山东督军张怀芝后脚就跟着溜之乎也，抛给段祺瑞的理由是“湘赣两省无须检阅”，他得“回鲁剿匪”。

见北军各部都在溜号，刚当上湘督的张敬尧不免心慌意乱，居然也发来电报，要求暂行停战，与南军议和。老段复电狠狠训斥了他一番，严令无中央命令，不许停战议和。

张敬尧是本系人马，段祺瑞可以对他进行训斥约束，不准其停战议和，但张部实力有限，难堪大任。除去自己的皖系，段祺瑞能依仗的便只有奉系了。段祺瑞、徐树铮打算在汉口设立奉军前敌总指挥部，将关内奉军全部投入湖南战场，继续对南军作战。

问题是奉军既不是他老段的，也不是小徐的，归根到底，它属于张作霖所有。在其他北军纷纷后退或作壁上观的情况下，张作霖又岂肯拿自己的资本去给皖系做赌注?

曹锟、张怀芝不听约束，奉军不为所用，眼看统一南北的梦想又将有化为泡影的可能，段祺瑞致电徐树铮，发出声声叹息：“此次顿挫，实出意外。”

在南北战争进行的同时，京城内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正进入高潮，这就是新国会选举。

冯国璋自入京就任以来，其身份始终是代理大总统，而非正式总统。其间，段祺瑞成立了临时参议院，这一机构的成立，在为主战派“合法驱冯”提供便捷之路的同时，也让冯国璋看到了扶正成为正式大总统的机会。在段祺瑞辞职下台之后，冯国璋便密嘱手下帮其提早策划和准备。

冯幕人员对宪法、国会选举这一套缺乏研究，最后经人推荐，把财政总长王克敏叫到大总统府，让他负责经办这宗“买卖”。

王克敏起初听到让他办这件事很高兴，但回家后仔细一想，认为此事还得慎重。原因是冯国璋爱财吝啬是有名的，如果到时要滑头，要他王克敏在财政部或银行先行借垫活动费用，那自己就亏大了。

王克敏拿定主意，只有冯国璋肯自掏腰包，才答应帮忙。于是他第二天就邀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同见冯国璋，并且一开口便提出此事需款两百万元。

冯国璋听后被吓了一大跳，过了一会儿才勉强说道：“现有南京汇来的利息四十万元，先拿去用吧。”

冯国璋一边把四十万元的支票亲手交到王克敏手里，一边郑重地对他说道：“此事须办得有把握。”

经费被缩水到了两折，还要办得有把握，王克敏真是无语了，同时也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他迅速把支票移交给宪法研究会，让研究会负责打理，之后便向冯幕人员声明：“只此一次，下次不管！”

研究会具体打理的人系山西商人出身，凡事都要精打细算，又得知经费是总统从自己腰包里抠出来的，更加不敢怠慢。他把四十万元分派给各省在京的旧国会议员，让这些人回籍“办理”选举——每人发给交际费及路费两千元，以能当选为限，若不能当选，原款还得退回。

此时旧国会已被解散了将近一年，议员们潦倒京城，经济上都十分拮据。听到这一办法后，许多人都不愿回籍“办理”，怕万一冯国璋不能当选，会还不起这笔债务。

冯国璋虽花了代价，做了准备，但他对新国会选举显然缺乏信心，所以才视“国会组织法”等条例的出台为威胁。事实上，冯国璋运作政治的水平和技能，确实不能与段祺瑞、徐树铮相提并论，宪法研究会也绝非安福系的对手。

安福系的称谓始于临时参议院开会期间。当时徐树铮让同样出自段派的王揖唐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租了一座较为宽大的四合院，作为亲段议员经常聚会之所，名为梁宅。

聚会梁宅的议员既无组织，亦无领导，只是大家在夜间无事的时候，随便在里面坐坐。当时人也不多，或三五人，或十余人，彼此闲谈。闲谈的内容虽然有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没有任何会议形式，仅仅是同人之间交换政见、联络感情而已。

后来知道梁宅的人日渐增多，便添设了娱乐设施，像棋类、麻将牌什么的、应有尽有。这样，梁宅又兼有俱乐部的性质。

大势已去

梁宅真正热闹起来，是在临时参议院将要结束之时。因为大家都知道，“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必将公布，有关未来新国会选举的事情已成为中心话题。

这时徐树铮计划帮助段祺瑞成立政党，以便在新国会选举中取得优势。他让曾组织过政党的王揖唐负责筹划。王揖唐就在一次聚会中提出，将来要到各地方“经营”选举，就必须成立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方好号召。

民初因党争激烈，政党二字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大家都觉得取名某某党派不妥，但“梁宅”又是叫熟了的名称，好像也不太合适。于是有人提议说，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字不仅脱俗别致，还含有吉祥之意，不如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

与会者一致同意，梁宅就此摇身一变，成了安福俱乐部，也即后来轰动一时的安福系。

安福系在本质上与政党也有很大区别，它既无党纲，又无政策，说到底仍相当于一个议员招待所，只是大家每月都固定接受着徐树铮、王揖唐的津贴和招待。最早安福系的列名议员也很少，不过数十人而已，但这数十名议员各省皆有，新国会选举一开始，他们就各回本省，代表安福系“经营”选举。

与第一届国会相比，新国会选举有了很大不同。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时，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不久，政治势力和金钱对选举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还不是太大。当时能够操纵选举的，也主要是省议会和县议会，选出来的议员一般都是当地士绅或有名望人士。

到新国会选举时，政治势力和金钱已经完全渗入选举之中。冯国璋紧紧巴巴掏出来的那四十万元根本就不够用，段祺瑞花在竞选上的钱只多不少，不过这些都没有要他本人操心，交通系和徐树铮早早就把经费都筹措好了。

此外，对选举的操纵力量，也从地方上升到了中央。冯国璋及其幕僚直到选举开始都搞不清如何运作，只知道把钱扔给宪法研究会，而宪法研究会也是把经费分配出去就算了事。安福系则不是这样，徐树铮、王揖唐全都如临大敌，直接在中央坐镇指挥，徐树铮还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指挥地方长官对选举进行干预。

在具体选举方法上，安福系采取的是“分区包办”法。比如山东省被划分为四个选区，每个选区发给选举费一万五千元，由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民国时隶属于省长的地方官员），按徐树铮所圈定的名单“选举”。在湖南，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督阵，将大量伪票投入票箱，使得原定候选人全部“当选”。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容易操纵。黑龙江即为一例，该省分两个选区，分别为龙江道选区和绥兰道选区。担任绥兰道选区监督的道尹是与直系有关的人，这就对安福系操纵选举造成了很大障碍。徐树铮采取的办法是，在选举前夕便以国务院名义，调该道尹进京咨询。在其离开黑龙江省期间，另择听话的人代理职务。

其实，如果撇开其中过多的弄虚作假及舞弊成分，安福系的竞选不可谓不认真，其认真程度甚至与西方社会的那些竞选班子有一拼。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宪法研究会等班子简直如同渣渣一般——黑龙江省的选举结果出来了，二十多员议员，被安福系全锅端！

黑龙江省一省如此，其他省份亦大同小异，即便在冯国璋的老巢江苏，安福系亦大获全胜。

宪法研究会败北，冯国璋的那四十万支票也没能要回来，这让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临终时还对自己的长子说：“王克敏这小子骗去了我四十万元……”

新国会尚未组成，冯国璋已知大势已去，便一再向外界宣布自己不再参加总统竞选。

这时段祺瑞也正在考虑总统的人选问题。皖系内部已经有人主张举段为总统，他们的理由是本系在选举中费尽气力，自然就应该选举自己的首领当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最好还是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

就当时的情势来说，段祺瑞只要参加总统竞选，就一定能选上。可是他考虑到，北洋系已分裂为直皖两系，冯国璋身为直系首领，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导致直奉两系的分化趋势更为严重。

在皖系内部，也有人推举徐世昌为总统。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与皖直两系都有渊源，以徐代冯，无人可以反对，直系也能够接受。段祺瑞本人决定采纳这一意见。

考虑成熟后，段祺瑞就登门拜访冯国璋，这也是他再次组阁以来第一次拜访总统。冯国璋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段祺瑞摊牌之后，他马上表示愿将总统让给徐世昌。

段祺瑞又对他说：“四哥愿屈尊退当副总统，芝泉亦无异议。”

中国人向来都习惯了能上不能下，“退当副总统”哪里是“四哥”能够接受的。冯国璋摆了摆手，说：“算啦，我已决定息影林泉。”接着他又带着疑惑的神情问段祺瑞：“芝泉你呢？”

冯国璋显然对段祺瑞是否留任总理的事非常关心。段祺瑞知道，如果冯国璋选择彻底离开政坛，则他的总理也不能再当了，否则难以平息冯国璋及其直系的怨愤。于是他连忙说：“芝泉亦不当总理。”

此语一出，二人相视而笑。

重新摆一副棋局

段祺瑞以为自己不当总理，与冯相约共同下野，就可以对冯有个交代，但他想错了，对冯而言，失去总统宝座的“创伤”岂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抚平的?

段祺瑞走后，冯国璋恨恨地对身边的亲信说：“国璋在北洋军政界混了几十载，倘竟使老段得志，真是枉活一世！”

冯国璋要反击、要报复，竞选场上做不到的，他得从别的地方再找补回来。老段对什么念念不忘？毫无疑问还是南北统一，是主战政策。既然如此，那他冯国璋就要继续推动主和，让老段不能“得志”，而这正是他和直系的优势所在。

当初冯国璋被迫下达“讨伐令”，但冯玉祥一个武穴通电，便让段祺瑞及其主战派陷入了困境。这一事件的直接幕后策划者是李纯，跑到冯玉祥那里指使他发通电的则是陆建章，冯国璋就是要用陆建章来重新摆一副棋局。

陆建章在清末时在段祺瑞手下任协统，由于他脾气傲上，和段祺瑞常闹意见。有一次二人又发生冲突，段祺瑞气愤之余，罚他下跪，陆建章受此屈辱，一怒而辞去了协统之职。

到了袁世凯执政时期，陆建章着实红过一阵，并曾作为袁的心腹出任陕西将军。不久，护国战争爆发，陆建章被逐出陕西，从此失意于政坛。等到段祺瑞掌权，陆建章不甘寂寞，欲顺着段祺瑞这架梯子图谋复出，可是段祺瑞对他印象不好，也没给他机会，这让陆建章非常不满，便常仗着老北洋人的资格，倚老卖老地大骂段祺瑞。

冯国璋与段祺瑞，一个主和，一个主战，府院双方明争暗斗。陆建章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拥冯反段的行列，开始南下北上地为主和派穿针引线。

冯玉祥原为陆建章的部下，陆建章对其极为器重，不仅将冯玉祥从营长一路提拔到旅长，还将自己太太的侄女许配给冯，与冯结成了姻亲。因为这层关系，陆建章特地跑到湖北，鼓动冯玉祥发出武穴通电，从而打响了反段主和的第一炮。

离开武穴后，陆建章潜往南京，住在其子陆承武的家里，与主和派首领之一、江苏督军李纯秘密往来。李纯送给他十万元，派他到上海活动，以反对北京政府对南方用兵为名，与孙中山派来的南方代表进行接触和联络。

这么一圈跑下来，陆建章已是名声在外，直皖两系都对他不敢小觑。获知督军团即将在天津举行会议，冯国璋便暗中授意陆承武把他父亲从上海请到天津，准备让这位主和派的“运动专家”说服各方，使得督军团会议全面有利于主和，从而给老段一个下马威。

陆建章由沪回津本是一次秘密行动，但民国新闻自由，记者无孔不入。他刚在天津码头下船，就被记者发现了，第二天陆建章到天津的消息已经刊登在报纸上。

当时奉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的河北造币厂内。徐树铮的副官长首先看到这一消息，急忙向任奉军副司令的徐树铮报告。徐树铮一听就知道了陆建章所为何来，遂让副官长与陆建章联系一下，说想约对方谈谈。

副官长遵命给陆建章打了电话。陆建章还以为徐树铮不知道自己来津的目的，而且他也想见一见徐树铮，借以观察段派动静，便反过来约请徐树铮到自己的住所来晤谈。

徐树铮听后答复说，因为公务特别忙，无暇分身，只好请"老伯"到云贵会馆一聚。云贵会馆是奉军司令部在津办事处所在地，陆建章的儿媳就劝公公不要前往，免生意外。

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与徐树铮是士官学校的同学，陆建章的这个儿媳也就是陆承武的太太，与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此前，由陆承武介绍，陆建章已与徐树铮见过多次，每次见面，徐树铮都是一口一个"老伯"，以晚辈自居，态度很是恭敬。

另一方面，徐树铮虽然已跻身武将之列，可是平时给人的印象都是文质彬彬，一副儒雅气度。这些都让陆建章觉得，尽管双方政见不同，但徐树铮这个"晚辈儒将"还不至于会拿他这个"老伯"怎么样，儿媳妇的担心纯属多虑。

真小人

这天上午9点，陆建章依约前往云贵会馆。他出门时意态悠闲，行若无事，身边仅带有随从一人。二人起先套的是马车，马车行至一座桥头，站岗警察一看陆建章身份不一般，急忙举手敬礼，谁知就在他一举手的瞬间，一股风将他的帽子吹落于马前。受了惊的马回身便跑，赶车人也约束不住，最后马一直跑到了陆建章的家门口才停下来。

按照旧时代的说法，这就跟大风吹断了军营旗杆一样，乃不祥之兆，可是已经答应徐树铮要赴约，总不可能因为一个听上去颇为荒唐的理由就取消约定，那岂不让知晓内情的人笑掉大牙?

陆建章从马车上下来后犹豫了一会儿，才让家人打电话给汽车行，把汽车叫来后重新坐车前往云贵会馆。

到云贵会馆门口时，早有保安队吹着接官号列队迎接，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也已亲自站在门口恭候。随即杨宇霆便将陆建章迎入客厅，随从则被安排到了传达室。

在客厅里，陆建章并没有见到徐树铮，他急忙问杨宇霆："徐司令上哪儿去啦？"杨宇霆回答说徐树铮正在外面开会，很快就会回来，请他稍等片刻。

陆建章这才放下心。时近中午，杨宇霆陪着他吃了午饭。就在快吃完饭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喊"徐司令回来了"。

少顷，徐树铮直入饭厅。见到陆建章，依旧还像原来那样恭敬谦逊，先问"老伯安好"，再问"吃得合适吗"。

寒暄一番后，徐树铮让陆建章到后花园花厅内休息，说自己随后就来。陆建章以为花厅僻静，便于谈心，因此没有产生一点怀疑。

两个长袍马褂的人领着陆建章进后花园。进了后花园，陆建章却没有看到有什么厅屋，更不用说花厅了，这才知道大事不好。

领陆进花园的其中一人这时说道："送大帅升天！"陆建章悔之莫及，不由哀叹了一声："我不值得死在一个小孩子手中……"话音尚未落地，即被一枪毙命。

徐树铮诱杀陆建章，就跟策划劫械案一样，都是先斩后奏，段祺瑞事先完全不知情。当有人将徐树铮设计扣留陆建章的情况向他报告，并请求对陆建章从宽发落时，段祺瑞听了还很诧异，说："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你赶紧回天津，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胡来。"

那人走了之后不久，徐树铮的副官长就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向曾毓隽报告了陆建章被杀的消息。曾毓隽急忙转报段祺瑞，段祺瑞听闻后惊讶万状，瞪目半晌才说出话来："又铮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吧，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当成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当曾毓隽跑到总统府的时候，冯国璋也已经得到了消息。不等曾毓隽开口，他就先问道："你是为了又铮的事情来的吗？"

曾毓隽赶紧回答："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该怎么办？"

冯国璋愤愤地说："又铮在芝泉（段祺瑞）左右，一向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说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

徐树铮诱杀陆建章一案发生后，有两个人同时给外界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一个自然是徐树铮。他与陆建章的儿子儿媳皆为留日同学，彼此相处也很好，然而仅仅因为政争，竟然就六亲不认、先发制人。其下手之狠辣干脆与不计后果，实在令人侧目。

另一个则是冯玉祥。陆建章于他有知遇之恩，又是至亲，可是在诱杀案发生后，他不但绝口不提此案，表现得像一个没事人一样，而且还主动向段祺瑞和主战派示好，自告奋勇要前往福建打广东。

如果说在这幕大戏中徐树铮扮了一回真小人，那冯玉祥的角色无疑就是伪君子。事实上，他们后来的种种言行作为，也恰如其分地验证了人们对他们的这一印象。

徐树铮的做法在北洋系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连段芝贵都发出了“相煎何急”的感慨。段祺瑞也觉得徐树铮行事太过分，以至于说了好几个“该死”，然而事实已成，又不得不予以迁就。

徐树铮一干掉陆建章，就让人将事先草拟好的一份致国务院、陆军部的电报发了出来，同时，又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方枢打电话，要方枢拟就一道命令，革去陆建章的军职、勋位、勋章。

方枢只得照此办理，并在命令上照本宣科，写上“兹据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来营煽惑，当场拿获枪决”等词句。

风向突变

虽然冯国璋已经声明怎么盖印都可以，但方枢拿来请他盖印的这道命令仍让他觉得难以容忍。他把眼光停留在命令上有两三分钟，似乎在凝神注视，但同时又像在思索着什么，之后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

冯国璋一面用手指着命令，一面转过脸对方枢说："陆朗斋（陆建章的字）就是有一百个该死，徐树铮也不是能够枪毙他的人，况且徐树铮这个副司令，到底是谁给的他？所以我认为这个命令可以不下，你们再斟酌斟酌吧！"

在冯国璋说这些话时，方枢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冯国璋说完之后，他仍然一言不发，如同木雕泥塑一般。

大概觉得像这样的僵局就算再坚持个八分钟十分钟，也不会再有什么好结果，冯国璋就随手把"陆令"放到一边，接着再看其他还没有看过的命令。最后，他把所有命令全部看完了，已从国务院回到总统府的恽宝惠也全部盖好了印，并且一件一件递还给了方枢。

就在这时，冯国璋又把"陆令"重新拿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足足看了三四遍。说是在看，其实倒不如说是还在思索什么，终于，他似乎下定了"由你们去造吧"的决心，带着极不满意的表情将"陆令"往恽宝惠面前一推，意思是可以盖印了。

等恽宝惠把印盖好，交还给方枢时，方枢仍是一言不发地收拾着所有命令。完了，他向冯国璋鞠一躬，便退出了春耦斋。

方枢走后，冯国璋才愤愤地对恽宝惠说："你看，这有多么荒唐！徐树铮这么胡闹，难道芝泉（段祺瑞）就一点儿也不管吗？"

从劫械案到诱杀案，段祺瑞对徐树铮确实一路纵容下来。这固然是因为小徐在他心目中独一无二，即便闯下天大的祸，也愿意替对方背下黑锅，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徐树铮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归根结底还是为他老段着想。

如同劫械案后改变了主和派的被动局面一样，诱杀案也使得随后召开的天津督军会议风向突变。本来与会者已倾向于主和，只要陆建章再放一把火，就足以让会场变成主和派的专场表演。可是陆建章的人头落地，把好些人都给吓坏了。

陆建章是袁世凯武卫右军（即小站练兵的基本部队）的老人，曾经做过陕西督军，生前虽已无实权，但还是上将衔的陆军中将。可是说杀就杀了，死后还要革去军职、勋位、勋章。主和还是主战，不就是张嘴表个态吗，多大的事啊，犯得着触这个霉头?

连冯玉祥都做了缩头乌龟，更没有谁愿意逆势而动。于是会议基调立刻由主和转向主战，众人不仅一致同意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还一致赞同继续对南方用兵，这里面既包括原来的主战大将张作霖、倪嗣冲，也加入了曹锟、张怀芝。

要继续南征得有人领衔挂帅。几个重量级的人物，张作霖、倪嗣冲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地盘南下，曹锟指盼着当副总统，也不肯走，只有张怀芝因为在回到山东时，督军位置已被别人抢走，所以乐于向南找地盘。

1918年6月20日，北京政府连发数道命令，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一周后，段祺瑞下令湘南、湘东各部队开始总攻，恍惚间，他似乎又看到了南北统一的希望。

可是事与愿违，张怀芝在北洋系中资格虽老，却实在不是一个惯于征战的良将。相比之下，吴佩孚在军事上颇有韬略，且已成为北军中的第一号杀手，然而他又偏偏不买段祺瑞的账。

为了使吴佩孚能够为己所用，老段可谓想尽了办法，使尽了招数。发动总攻之前，他以总理和北洋元老的身份，破例屈尊直接打长途电话给吴佩孚表示慰问，接着又授予吴佩孚“孚威将军”的称号。

“将军”本身是个代表荣誉的虚衔，一般情况下只有督军一级的人物下台后才能被授予。吴佩孚仅仅是个师长，既未下台，又无督军资格，竟然能获得这样的头衔，民国创建以来从无此先例可循，由此足见段祺瑞对他的重视和拉拢。

问题是，吴佩孚虽为北洋新秀，但在自命不凡、刚愎自用方面，却与段祺瑞这个老前辈绝对有一拼，更主要的是他只效忠于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待他再好、恩宠再多，也休想让他改换门庭。

7月3日，吴佩孚公然派代表参加衡阳各界人士召开的罢兵息战大会。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也在湖南常德宣布停战，整个湖南战局由此急剧动摇。

反手一巴掌

面对这一情况，段祺瑞急忙授意再次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以商讨应对之策。会上督军们在口头上仍坚持要南征，当谈到谁来当前锋时，大家都公推奉军。与会的张作霖一听，马上表示自己只愿当各军的预备队。

各军在前面耗实力，奉军在后面捡现成便宜。其他督军没有一个会犯傻到连这点小心眼都看不出，于是都不乐意了。

与会者吵吵闹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肯当先锋的人选。不过大家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就是向北京政府索要军饷。

督军团倒也不是完全在借机要挟政府，自古以来，打仗都不能没有军饷，这跟吃不上草料的马没法跑路是一个道理。于是段内阁又在钱的问题上动起了脑筋。

其实在段祺瑞重新组阁前后，北京政府可以说就是依靠着对日借款而维持下来的。即便这样，一旦遇到计划外的大笔开支，仍然不敷使用，比如这次天津会议，督军团一开口就是一千五百万元。为此，西原提出了一个以“币制借款”为准备金，在中国国内发行“金本位纸币”的设想。

当西原征求时任交通次长的叶恭绰的意见时，叶恭绰问他：“实行金本位，是不是需要铸造金币？”

西原回答：“不必，可以日本金圆做准备。”

叶恭绰认为这就是个问题，因为日本并不是一个产金国家，自己也缺乏生金，以日本金圆做准备并不可靠，同时从中国这一方面来说，“若不造金的硬币，那金纸币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接着他又向西原提了一堆“纯技术”问题：例如若以日本金圆做准备，国际比价怎样定法？中国金币和日本金圆的比价又怎样定法？

西原是政治幕僚，不是财政专家或经济学家、银行家，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

不过西原的设想还是得到了新交通系首领、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的赞同。曹汝霖遂向段祺瑞建议实行币制改革，其主要措施是成立币制局发行金币券（即西原所说的“金本位纸币”），数额为两亿四千万元，同时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

有了这两亿四千万元，段祺瑞自然就不愁给督军团发军饷了。他接受曹汝霖的建议，随后就让人拟制金币券发行条例，交冯国璋公布施行。

不料金币券条例公布后，立即遭到了四国银行团的反对，四国银行团认为中国要搞币制改革必须事先征得它的同意，不能单独进行。日本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宣布对于“币制借款”暂时不做考虑，同时将西原撤回了国内。

因为夭折的“币制借款”，一直以来北京政府都在向日本秘密借款的事也被报界披露出来，一家通讯社还发表了“二万万亡国大借款”的消息。消息一出，顿时举国哗然，人们对于“二十一条”的遗恨被重新勾起，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对段内阁乃至段本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作霖这次参加天津督军团会议，无意中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从段祺瑞重新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饷550万元，但奉军只收到180万元。

少掉的那370万元到哪儿去啦？原来都被徐树铮拿去“经营”国会选举和编练“参战军”了。

事情还不仅限于此。六个新编奉军旅有两个旅归参战督办处统辖，徐树铮把这两个旅的旅长位置都给了他的士官同学。有人便向张

作霖告状，说徐树铮挖了奉军的部队，“徐、杨（杨宇霆）合谋，内外结成一气，并将部队挖去两个旅，而杨另有所图，乃大患也。”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虽然徐树铮曾送来一份“大礼”，可账算到最后，自己竟然吃了一个更大的暗亏。张作霖气得直跳脚，他先去段祺瑞面前告状，段祺瑞却很诧异地对他说：“他是副司令，你不在，当然由他行使职权。不然，何必设这么一个副司令呢？”

张作霖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又直接把徐树铮找来算账。以为真相败露后，对方会惊慌失措乃至讨饶，没料到徐树铮竟然也表现得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之感。

在徐树铮看来，自己对奉军和他老张算是不错了。奉军自入关之后，就不断地向他要饷，而他不得不为此到处张罗，最紧张的时候曾派人分赴江、浙筹款。可是饷项发了，奉军却又不积极作战。这使他感到奉军实际不起作用，反而成了一个只知要钱的包袱。

二人大吵一通，张作霖吼道：“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副司令了！”随后，张作霖将徐树铮、杨宇霆双双免职。六个新编旅除归参战督办处统辖的那两个外，全部收回。本来他还想向徐树铮索要少掉的那些军饷，经段祺瑞从中说情方才作罢。

就在后院火光遍地的当口，前线也出现了更加不令人省心的情况。1918年8月7日，吴佩孚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在电文中，他公开打出议和的旗号，痛斥皖系主战派的“武力统一”政策，指责其“耗资数千万、糜烂十数省”，“实亡国之政策也”。

“阳电”如同一篇讨段檄文，对段祺瑞的痛骂程度甚至超过了西南方面和“长江三督”。

8月21日，吴佩孚又联合冯玉祥等十五人通电全国，再次呼吁停战，并要求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颁布通体一国罢战之明令”。

对于吴佩孚等人的呼吁，冯国璋当然不便直接答复，但西南方面和“长江三督”都纷纷响应起来，对段内阁造成了极大压力。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电报战，段祺瑞起初保持沉默，想借助于调解，与吴佩孚达成谅解。尔后见对方的势头越来越猛，只好用老师和长辈的口吻发电斥责吴佩孚，说：“师长职位卑小，不应对时局妄发议论。”同时又退而及己：“尔从吾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

段祺瑞自称老师，吴佩孚却不想给这位“老师”留面子。他在复电中称，他之所以要通电主和，其实就是仿照了“我师”当年通电宣布共和的例子——都是您老教育我这么做的，您现在就别再自怨自艾了。

吴佩孚的反手一巴掌，直接就把段祺瑞的军事指挥权威给扇掉了。8月31日，段祺瑞被迫宣布暂停对南方用兵，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

在军事失败的同时，皖系在政治上却打了个大胜仗。在新组成的国会内，共有议员800多人，时称“八百罗汉”，其中安福系就占到230多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新国会第一大派系。管理安福系的王揖唐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如果说在旧国会里，国民党足以呼风唤雨，新国会则被烙上了很明显的段派印记，时人干脆称之为“安福国会”。

徐树铮虽然在“安福国会”中并没有位置，但却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北洋系中，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都属于具备政治眼光的元勋级人物，他们以下，不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骨干，就是北洋系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些“近亲繁殖”的北洋系官员，即使进过军事学堂的，说到底也只是一介武夫，不懂什么政治。他们之间虽然常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但多数仅出于意气之争，很少经过缜密的考虑。

徐树铮非“近亲繁殖”的北洋军人，所以他在北洋系中一直被称作“外来户”。他这个“外来户”自命文武兼资，除了军人身份外，同时也具有政治家的特质。在当时的北洋军人中，像他这样有个人的政治理想和一套具体办法的，可以说绝无仅有。风头正劲的吴佩孚虽然也是秀才，且以文采自负，然而要讲起政治，却远不如徐树铮。

另一方面，徐树铮内心向以文人为尊，看不起一般粗野少文的武人同僚，唯对社会上公认的那些文坛名家推崇优礼。比如小说翻译家林纾就曾被徐树铮请到自己创办的成达中学担任教职。

因此之故，段派嫡系军人能够接近徐树铮，但和他并不亲近，倒是那些文人幕僚能够和徐树铮亲近。像曾毓隽、王揖唐、梁鸿志这些人，本身也都是一些自命不凡之人，然而对徐树铮都极为倾倒。他们尚且如此，国会中的一般议员就更不用说了。

毫不夸张地说，徐树铮就是安福系和“安福国会”中的天王巨星。很多议员想尽办法要接近徐树铮，哪怕从中得到一言半语也引以为荣。他们打听到徐树铮每个周六的晚上都要在家里举行会议，于是便纷纷在这天晚上拥进徐宅。

徐树铮有时需要在会上与段幕的其他幕僚们商议要政，不方便让这些议员参加，可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于是只好暗地里将例会由星期六改为星期二，并特地关照王揖唐，让他转告议员们："没事不要瞎跑！"

接下来要搞总统选举。在段祺瑞放弃当总统的前提下，徐树铮同样把徐世昌作为心目中的新总统人选。

徐世昌在清末时中过进士，是袁世凯生前所说的"三个半翰林"中的一个。与少时就考中秀才的徐树铮一样，徐世昌是个"读书种子"，徐树铮对此老很是佩服，而他对徐树铮也很欣赏，常约徐树铮前去吟诗作文。二人一老一少，堪称惺惺相惜，时人称之为大徐、小徐。

徐世昌之前的政界职位是袁世凯时代的国务卿，后来再未当过一官半职，对于过一过总统瘾的诱惑很难拒绝。当段祺瑞派人征求其意见时，他立即表示可以勉为其难："既然大家说非我不可，我也不妨卖卖老面子。"

不过徐世昌又向来自命清高，以淡漠于功名利禄的形象示人，所以他还有话在先："倘若叫我出来奔走竞选，那种钻营觅缝的事我是不屑为的。"

听说老徐肯出来，只是尚有一些顾虑，小徐随后便去劝驾。他先说了一番"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类的话，接着把胸口一拍："只要鞠老（徐世昌号鞠人或菊人）肯出山，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

为了帮助徐世昌竞选，徐树铮动用了安福系的全部资源。安福系的内部组织其实较为简单，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家商店，则徐树铮相当于商店老板，王揖唐相当于外柜掌柜。安福系的经费由徐树铮这个"商

店老板”提供，但“外柜掌柜”无权随意开支，因为徐树铮又另外找人当了“内柜掌柜”，一切支出都必须经“内柜掌柜”核定。

在安福系列名的议员每月可得到一张三百元的支票津贴，支票上还盖有“任重致远”的图章。最早议员较少，后来新国会组成，列名议员急剧增加，一个月光议员津贴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些都需要徐树铮提供。

在被张作霖撤掉奉军副司令一职后，挪用奉军军饷已经不可能了，但徐树铮有新办法。随着段祺瑞组阁，他也复任陆军次长。当时各部队“吃空饷”之风盛行，徐树铮就派员到部队点名，按实有人数发饷，多余之款由陆军部截留，谓之“截旷”。陆军部每个月都有一笔为数甚巨的“截旷”，徐树铮也就每个月都从中取出款项，作为议员津贴。

王揖唐是段祺瑞的同乡，也是一个能文能武、自命不凡的人物。在段幕之中，除了徐树铮，就数他的脾气最大。可是他在徐树铮面前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更别说贪污津贴了。

后来王揖唐被委任为南北和议代表，对安福系无法兼顾，有时就不能按时发放津贴。随之而来就有议员告发他克扣津贴，听到这个消息后，议员们全都群集于曾毓隽家中，嚷嚷着要讨一个说法。

徐树铮闻讯，急忙将发津贴以及竞选的具体事宜转付曾毓隽，此后安福系便由徐树铮、曾毓隽共同负责，议员也再未有过异议。

竞选过程非常繁杂，这也是老徐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毓隽每天吃完晚饭，只小睡片刻，就要驱车前往安福胡同。其间，人事纠纷，政局问题，纷至沓来，足以令曾毓隽应接不暇。

曾毓隽忙，徐树铮也不闲着，他尽管不管具体琐碎事务，可是大政方针全都需要他来拿主意、定调子。那些天里，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梁宅仍然是车马盈门，高朋满座，至午夜始散，乃是常事。

揖让一堂

安福系应该算是当时北方政坛最好的竞选班子了，但在听取“班子”的报告后，段祺瑞认为还不妥当，必须先向各省督军疏通好，才能确保没有阻力。

督军之中，比较成问题的是“两栖督军”曹锟。此君一向在冯国璋、段祺瑞，主战派、主和派之间摆来摆去，政治态度不太坚定。

可是曹锟也有个“小辫子”被徐树铮抓在手上，那就是想做副总统。徐树铮说：“曹三（曹锟）有什么了不起，许他个副总统，他就摇着尾巴跟我们走了。”

以前为了让曹锟投向主战派一方，徐树铮已经用过这一招，结果曹锟成了最激烈的主战派。如今故技复施，居然也一样有效，曹锟马上同意拥护徐世昌。

搞定了曹锟，段祺瑞仍唯恐有失。他亲自出马，以巡游长江为名，和各省督军挨个秘密交换意见。在全都得到满意答复后，他才放下心来。

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举行总统选举，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新一届总统。

当选总统后，徐世昌还半真半假地一再表示退让。于是乎，各省督军捧场，议员竭诚拥戴，议会电催就职，真的呈现出了一幅“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画面。看到这一情景，徐世昌才应允就任总统职。

总统为国家元首，老徐竟然不费半点气力就唾手而得，可以说全赖段祺瑞、徐树铮之功。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一边为了“谢票”，忙着给议员们赠送亲笔所书的对联及签名照片；一边表示，他当大总统只能一次，下次大总统必须由芝泉（段祺瑞）来干。

10月10日，在新旧总统交接典礼上，冯国璋向徐世昌正式交出了权力。当天，段祺瑞遵守约定，辞去总理职务，并声明以后专任参战督办，不再过问国内的兵戎之事。

冯国璋虽然被形势所逼，只能跟段祺瑞共同演出一幕“揖让一堂”的剧目，但他内心其实既不甘心失去总统职位，同时对段祺瑞的相携退出也不完全领情。

典礼一结束，在新任大总统徐世昌的特别交代下，冯国璋仍得以坐着总统专用的汽车返回私宅。这时他对随同的幕僚们说了一句真心话：“这一回，咱们是栽给芝泉（段祺瑞）了。歇两天，将来再看咱们的！”

徐世昌上台后，为了安慰冯国璋，特准其仍节制北洋军的两个师。冯国璋后来又从家乡去北京，表面是处理两师争陆军部军饷事宜，实际是想联络直系，欲图东山再起。不过这次他倒没忘记到段公馆做客，并且跟老段打上四圈麻将。

以冯国璋不甘寂寞的心态，假以时日，未尝不能大显身手，再和段祺瑞上演新一轮府院之争。可惜的是他已力不从心，两个月后就因

病在北京的私宅内去世了。

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赶赴冯宅吊唁。他到的时候，冯国璋还没有入殓，于是便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跟前，把盖在冯身上的“盖帘”掀了起来。

眼前的冯国璋已经不会言动，那一声亲亲热热的“四哥”更是显得无比遥远和陌生——

“四哥快来！”

“你们看，芝泉这个粗！芝泉这个粗！”

……

如果这段对话没有发生，或许兄弟俩就不会在残酷的政治场上将彼此伤害得遍体鳞伤了吧。

没有人知道段祺瑞那向来毫无表情的严肃面容背后，会不会也有几许酸楚和悔意。人们只看到，他在端详冯国璋的面容之后，便把“盖帘”放下，转身离开了。

后来，冯家收到了一副段祺瑞亲拟的挽联，挽词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

打仗第一名

在段祺瑞辞职下野前，他派出了一支部队远赴西伯利亚作战。

此时“一战”已进入尾声，但鉴于俄国爆发革命并与德国单独媾和，协约国方面仍认为东线战场有重新恢复的必要。由于英法两国本身都深陷于西线战场，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前往东线，于是它们便号召其他成员国尽量派遣军队前往远东，以对白俄军队进行支援，这一出兵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西伯利亚干涉”。

尽管赴欧华工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都奋勇当先，早已成为协约国作战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是一些协约国成员仍然心理上不平衡，认为中国参战较晚，牺牲和贡献较小，然而却同样可以参与战后的利益分配，属于“投机取巧捡了个大便宜”。

此次干涉行动发生于远东，自然不能继续让中国“白捡便宜”。英国驻华公使、日本驻华公使先后出面对中国外交部进行劝说：“中国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但并未出兵参战，恐在和会中难以取得与其他战胜国同样的条件。应出兵海参崴，会同协约国围攻俄国革命党，借以取得和会中有利地位。”

一方面是考虑以后在和会上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西伯利亚干涉”对协约国最终取胜所具有的意义，段祺瑞深感确有出兵的必要。可是如果让各省督军派兵吧，还在对德宣战之前，他们就都表现出了怕到欧洲打仗送命的态度，特别是非嫡系的直系、奉系，更别指望。一旦向他们提出派兵的要求，准是又要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拒绝或推迟出征，而在军饷方面照例还会狮子大开口。

求人不如求己。段祺瑞当时可以直接控制的北洋正规军不多，驻防南苑的陆军第九师为其中之一。他于是下令从第九师中抽出第三十三混成团，以该混成团为主组建中国陆军第一支队（以下简称中国支

队），立即开赴海参崴作战，同时前往海参崴的还有包括“海容舰”在内的两艘军舰。

中国支队以第三十三混成团的三个步兵营为主，外加一个骑兵连、一个机关枪连和两个炮兵连等特种部队。组编完成后，官兵由支队司令、原第三十三混成团团长宋焕章率领，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哈尔滨进入俄境。

协约国派往西伯利亚的部队数量不一。英法以联合军的形式参与，在海参崴也不过只驻了一个营，另外配土耳其的一个旅供其指挥，才不至于显得过于寒酸。出兵最多的是日本，据说出动了七个师团，仅在伯利就有两个师团。相比之下，中国派出的兵力不算多，但也不是最少。

“西伯利亚干涉”期间，苏俄正忙于内战，无心和协约国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在远东对干涉军进行牵制的主要是苏俄游击队，当时称为“穷党”。

这些穿便衣持枪的“穷党”昼伏夜出，出没无常，而且几乎到处都是。与他们作战，各国干涉军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占有优势，但中国支队却表现优良，居然被评为“打仗第一名”。时隔一年，当第九师师长魏宗翰等人前往海参崴慰问官兵时，英法联军某上校司令还特地发表讲话，盛赞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并希望合作到底。

第九师系由袁世凯时期的模范团扩编而成，在北洋军中本就属于第一流精锐部队。中国人在近代总被老外欺负，为了能够在此次国外军事行动中不辱国格，陆军部又对中国支队进行了精心组编和训练，

所以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都已是优中选优——装备在干涉军中被评列为第二名，军纪方面则高居榜首。

中国军队的军纪能保持得这么好，以至于连“穷党”都引为“好朋友”，除了支队官兵本身素质较高外，与后勤充足也有着莫大关联。

阴影

中国支队归陆军部直辖，出发前，所有官兵均由陆军部制发上中等黄呢子制服。在支队开拔的同时，陆军部即在长春设立总兵站，从沈阳、哈尔滨到支队司令部所在的俄境双城子，也均设有分兵站。

魏宗翰等人到海参崴慰问的一次，仅带去的慰问品就计有：在南苑宰杀的大黄牛两头、在北京城内所烙的约一万斤面的山东大锅饼、在上海买的美丽牌香烟和毛巾、在长春总兵站购买的两千斤白干酒等。所有这些慰问品，把一节铁闷罐车都装得满满的。

除了后勤充裕外，中国支队自进入俄境起，行动就很谨慎，不仅从上至下保持着良好军纪，不扰民不滋事，而且夜间也从不出动，只有白天才会在防地附近巡查。

巡查时免不了遇到“穷党”。“穷党”远远看到是中国军队，便会用俄语大声呼喊：“中国人和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打你们，你们也不要打我们！”

中国兵听到后，立即从远处放一排枪过去，“穷党”也不还击，就全都躲开了。不管“穷党”究竟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考虑，总之中国支

队可以在基本不打硬仗、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把防务完成得很好，这就是“打仗第一名”。

其他协约国特别是投重兵于西线的欧美国家，对干涉行动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够重视。美军的装备最好，但是派来作战的士兵素质很差，一听到枪声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庄里去，以至于让美军获得了“打仗最差”的评价。日军大概是协约国中对“西伯利亚干涉”最为重视，也最花力气的，可同时也是投入产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亚气候寒冷，缺少青菜，作为亚洲人，对这种生活非常不习惯。日军又向来不重视后勤，士兵的待遇很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他们的军纪之坏在参战国中排第一。

“穷党”不打中国人，但对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军兵营常常遭到“穷党”夜袭，部队一营一连地被围攻缴械，损失很大。

中国支队主要负责分担海参崴以东铁路附近的防务，另抽出一个骑兵连到伯利归日军指挥。到伯利去的那个骑兵连遇到了和主力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即“穷党”只要望见中国国旗就会大喊：“我们是好朋友，谁也不能打谁。”

由于和日军一道行动，骑兵连很怕被“穷党”看成是日军，行军时都不愿和他们衔接在一起，总是或前或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蒙受的损失也不大。

中国支队和华工赴欧一样，都是在国力弱小的情况下，竭力争取国际地位的一种努力。与当地华侨接触时间一长，他们能切身感受到华侨们对故国那种希望和失望并存的复杂心境。

“威海卫华工营”的华工在法国见到过一个中国女子。这名中国女子是北京西郊海淀人，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掳到法国来的。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不仅北京城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就连距离北京城十五里的海淀也未能幸免。她那一年才十八岁，家里开一家香烛店，结果香烛店被焚毁，一家人都被杀光了，只有她因被一名法国军官掳走而侥幸活了下来。

华工见到这名女子时，她还不到四十岁，独自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她有两子三女，因为“一战”爆发，两个儿子都参军上了战场，只有三个女儿陪伴在身边。母女四人见到中国人都分外亲热，总是用酒和咖啡招待他们，并借以打听国内的情况，尤其是她家乡海淀的情况。

有一次被问到法国人待她们怎样时，女子说，周围熟悉的人都很敬重她们，只是一提到“中国人”这三个字，就显得不够尊重。为此，她感慨地说：“这是祖国太乱太弱之故。”

女子的法国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夫妻之间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学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报纸，也了解国际大事。这时“一战”已经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时称“巴黎和会”。她在法国的报纸上看到，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竟然在和会上说：“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这句话让她备感伤心。

中国参加“一战”，乃至加入“西伯利亚干涉”，其原始动机都是要获得参与巴黎和会的机会，并在和会上争取失去的权益。如今该付出的付出了，也得到了参加和会的资格，可是克里孟梭的那句话却分明已经给中国的和会之旅罩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第八章　莫负荒沙万里行

徐世昌就任总统后，即授命钱能训组阁。1918年12月1日，中国政府应协约国之邀，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

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代表团必须先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再从日本登轮去巴黎。可是在离开日本登轮时，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陆徵祥却发现丢了一个公文箱，里面装的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

陆徵祥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外交人才，只不过是“大礼官的材料”。现在这种评价似乎又得到了进一步确证，加上陆徵祥又是“中日民四条约”的签字者，引得国内舆论对其更加不满。

陆徵祥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箓代行部务。陈箓资历甚浅，社会声望不高，被认为也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建议下，徐世昌便在总统府另外设置了一个外交委员会，用以制定和会的相应政策。

中国代表团到巴黎不久就遭遇了困境——日本代表依据“一战”初期与英、俄、法、意达成的谅解，向和会递交提案，要求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代表同时声明，如不照此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

火烧赵家楼

日本人一撒娇，主导和会的大国立即做出让步。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拟定《凡尔赛条约》三条款，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全部让与日本。

中国对于恢复山东主权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陆徵祥也考虑过不签和约，将来与德国直接进行交涉，可是他又对此没有把握，于是便致电北京征求意见。

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商讨，商讨的结果是不签约。随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前往总统府，将拒签电稿呈交徐世昌。徐世昌看完表示同意，遂令国务院将电稿拍发给代表团。

可是国务院的意见却与外交委员会相左，第二天就密电代表团签约。国务院电报处正好有一个林长民的同乡，他发现后便偷偷地跑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林长民。

汪大燮、林长民闻讯大怒。汪大燮命令即刻结束会务，并亲自写下辞呈送交徐世昌。林长民则密电正在法国的梁启超，请他通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对签约进行反对。

做完这些后，汪大燮仍觉得声势不够，尤其是作为总统的徐世昌面对他的辞呈未再做任何表态，说明其意见已与国务院一致。

正在感到焦虑，有人对他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诉蔡先生？"

蔡先生指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已经获悉了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为此召集学生代表，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奋起救国。学生代表们于是决定举行游行示威运动，日期定于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正是在四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了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

汪大燮听后，即坐马车前往蔡宅，将政府主张签约的事告诉了他。蔡元培于当晚在自己家中召集学生代表开会，会议决定将游行日期提早三天进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云集于天安门附近举行示威游行，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开始了。

在钱能训内阁中，大部分阁员为段内阁的旧人，其中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都曾是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游行学生同时要求对这三人进行惩办。

撇开曹、章不谈，段祺瑞对陆宗舆的印象其实并不好。他有一次曾说陆不是一个好人，别人问为什么，他的回答倒也颇有趣味：一打牌，就能测出来了。

陆宗舆是段公馆牌桌上的常客。打麻将的时候，别人都把票子放在桌上，他却把钱放在自己衣袋里，等到输了，才慢吞吞地一个子儿

一个子儿摸出来。段祺瑞以牌品论人品，觉得陆宗舆很不男人。

等到陆宗舆遭到声讨，有人就问段祺瑞："陆既是坏人，老总（指段祺瑞）过去为什么要重用他呢？"段祺瑞的回答颇有些耐人寻味："项城（袁世凯）重用他，我未曾重用他。"

对段祺瑞而言，向日本借款是利用日本人，反正以后也没打算偿还，而帮他办理这桩事的政府要员，其作用也仅限于此，所以算不上是重用。

某种程度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是做了段祺瑞其实并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现在段祺瑞下了台，他们还在台上，也就活该要倒霉了。

五四运动爆发时，传说曹、陆、章三人正在曹家开会，学生们便直接冲向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

曹汝霖和寄住在他家的章宗祥见学生来势汹汹，急忙四处躲藏。学生破门而入后，没找到人，刚好看到有一箱火油，便纵火焚烧赵家楼。章宗祥见屋内火起，急忙从藏身处逃出，不料与学生撞个正着。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立即一拥而上，饱以老拳。章宗祥顿时被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

据说当时赵家楼内有几十个武装警察，但看到学生冲进来后根本不敢阻止。直到学生纵火，军警赶来灭火，才逮捕了36名来不及逃散的学生。

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篇"火烧赵家楼"。在此之前，蔡元培曾让学生代表转告学生，要求游行过程中严守秩序。"火烧赵家楼"之后，他

一面递交辞呈，一面与其他大学的校长一起前往警察总监处具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由于释放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国民外交协会决定在5月7日到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外交协会与外交委员会同时成立，当时为的就是与外交委员会相互呼应。该协会共有会员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的学生和西南代表。

5月7日晨，外交协会秘书梁秋水从中央公园门口路过时，发现园门已经关闭，门外有十余个武装警察，架着机枪。显然，政府已经掌握开会的消息并预先做了防备。

梁秋水到会所后，又有三十余个武装警察进来，把院子都占满了。问他们所为何来，对方称奉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命令，禁止协会在公园开会，若不遵命就逮捕会员，封闭会所。

梁秋水马上问他们：“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

警察们老实作答：“是中国机关。”

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国的钱？”

答：“是中国的钱。”

再问：“诸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公园开会？”

“不知道。”

来者不怕，怕者不来

原来你们还不知道！梁秋水就告诉他们协议开会是为了反对签订和约。他接着侃侃而谈：“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开会。”

警察们都没话说了。梁秋水遂请他们进屋休息，抽烟喝茶。

坐了一会儿，为首的头目突然想到上峰那里难以交差，便赶紧对梁秋水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

梁秋水毫不退让：“俗话说得好，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这时会员已来了一百多人，他指着这些会员说：“自来送死的越来越多了。”

警察头目口中的“死人如麻”不过吓唬吓唬人，哪里敢真的开枪。见相持许久，协会的人仍难以搞定，他只得央求梁秋水帮他想个办法，好让他对上面有所交代。

梁秋水沉吟了一下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那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警察头目听了便向上司打电话，反反复复打了几次后，他终于告诉梁秋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警察也就散掉了。外交协会的会员们随即整队向天安门进发——说好不在公园开会，也没说不到街上游行。

在新华门前，会员们与刚刚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合兵一处，沿路一边高呼“反对巴黎和约”，一边散发传单，至下午四五点钟方散。

五四运动不仅没有就此停步，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除北京学生继续上街游行示威外，上海、南京等地还实施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市和抵制日货行动。

1919年6月3日，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周后，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呈，虽然未获批准，但其不堪重压之态已显露无遗。

尽管如此，府院双方仍认定签约为正确选择。徐世昌在递交辞呈的同时，就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也再次给代表团发电，指示可以签约。

6月28日是和会规定要签约的日子。当天，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

就算是留学生们不包围寓所，代表团也未必敢签约。五四运动的消息早已传到巴黎，各处要求拒签的电文更是如雪花般一封接一封。其中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的全文赫然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外交协会的电文尚不算最凶最猛，后面喊打喊杀的还有的是。

代表团中除团长陆徵祥有“好好先生”之称外，其他如顾维钧等，都堪称人精中的人精，他们即便专为个人着想，又岂肯背负签约责任，来蹈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覆辙?

好了，反正现在寓所已被学生包围，想去凡尔赛宫签约也不可能了。大家于是索性哪儿都不去，只向巴黎各报社发去一个正式声明，历述前后原因经过。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

五四运动的汹涌浪潮非但挡住了和会签约，还震垮了内阁。总理钱能训早在5月就一再向徐世昌请辞，但因为国际国内都处于多事之秋，更换内阁不易，所以一直拖到6月，徐世昌才接受其辞呈，派龚心湛暂代。

就在这时，北京政府突然接到中央驻库伦都护使陈毅的报告，说外蒙古已有回归中国之意。

直到清末，外蒙古仍在中国的疆域范围之内，其北端与俄国贝加尔省相接壤，共立有中俄国界标牌九十六处。辛亥革命后不久，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受沙俄政府的唆使，才宣布外蒙古独立，其后便一切听命于沙俄。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了解决这一分歧，中国、俄国、外蒙古三方进行了多轮曲折复杂的谈判，最终签订“中俄蒙协约”。根据协约，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协约又规定外蒙古对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仍未脱离俄国的势力范围，中俄两国在外蒙古也都分别驻扎着军队。

从那时候起，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外蒙古撤治准备条件。袁世凯为了显示国家威信和实力，还特地从国内挑选人高马大的骑兵作为驻军。这些驻军全部配发黄呢军服和新式武器，军纪也很好，颇受驻地百姓的欢迎。

最大的障碍仍是俄国，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却自动为中国消除了这一障碍——原驻外蒙古的沙俄军队陆续撤回国内，闹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又因忙于内战而无力兼顾外蒙古。

随着俄国在外蒙古的统治暂时陷入真空，一部分外蒙古王公担心日本乘虚而入，便联系陈毅，表示愿意撤治（撤销自治），重新回归中国。

一段佳话

徐树铮时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得知外蒙古的情况后，立即提出“西北筹边大纲”十条，要求派兵充实边防，并建议由大总统特任“西北筹边使”一名，以节制西北边境部队，兼兴办垦务，开发西北。

徐世昌对徐树铮的想法很感兴趣。他对徐树铮说，外蒙古问题复杂，如果处理不善，势必影响国家主权，甚至引起外交干涉，所以非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不足以胜任此艰巨任务。言下之意，徐树铮本人就是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不二人选。

徐世昌说到做到，随后就向国会提出了“西北筹边使”官制案。按照官制案，西北筹边使拥有非常大的权限，可以负责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新疆、内外蒙古等地的边防。

当时各省地盘都已被捷足先登者染足，西北地大物博，大有可为，而且外界又都知道了老徐有意让小徐担任西北筹边使的消息，因此官制案一经提出，便招致了各派疑忌。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直系，该系议员指责政府在因人设官，摆明就是让徐树铮控制西北。他们还对已与徐树铮闹翻的张作霖进行挑拨，说徐树铮经营西北是在为吞并东北打基础。张作霖愤怒之下，授意东三省六十余名议员投票反对。

虽然国会内的反对声浪很高，但安福系毕竟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官制案仍勉强得以通过。

官制案一过，徐世昌即特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之后又任命他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准其招募军队。

昨天小徐不遗余力地拥护老徐当元首，今天老徐不避嫌疑地将小徐扶上马，怎么看都像是一段佳话。可是世上的佳话，真正经得起推敲的向来不多，这段忘年交的故事也是如此。

徐树铮诚然是徐世昌上台的最大推手，但当徐世昌做了总统之后，最感到担心和忧虑的人物，也恰恰是这个他曾经倍加欣赏的“小文友”。

原因自然还是徐树铮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式的“真小人”性格。他为了给徐世昌竞选创造条件，曾经向曹锟许了一个副总统的空头支票。可是等到徐世昌正式当选总统，他又生怕选出曹锟会造成第二个冯国璋，从而在北洋系内部与段祺瑞捣乱。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徐树铮暗中操纵“安福国会”，以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的方式，致使副总统选举流产，曹锟也因此空欢喜一场。

接着，徐树铮又把矛头对准了原国务总理钱能训。钱能训是冯国璋的旧人，与西南方面有联系，热衷于南北和议。徐树铮对他甚为不满，经常策动“安福国会”和各省督军与之为难。

由于擅长呼风唤雨，徐树铮还得了一个绰号“小扇子”。可想而知，有一个能量如此之大的“刺儿头”长在身边，徐世昌的心情会如何。事实上，他晚上连觉都睡不踏实，巴不得赶紧找个理由把对方调出京城，外蒙古问题正好为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不管徐世昌到底打着怎样的肚皮官司，反正徐树铮已经大权在握。面对眼前“建功边疆”的蓝图，他兴奋不已，跃跃欲试。

由徐树铮任总司令的西北边防军其前身为“参战军”，也就是准备用于“一战”的军队。它和远赴西伯利亚的中国支队一样，最初的经费都来自“西原借款”中的“参战借款”。“参战借款”一共两千万元，这里要用，那里也要用，并不怎么够开销。

还在中国支队派出之前，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有一次去见段祺瑞，对他说：“现在既然已经参战，无论多少总得派点军队参加。不知已做了怎样的计划？”段祺瑞回答：“他们（指徐树铮等幕僚）的意思想出一万兵。”

叶恭绰马上又问道：“出一万兵，准备了多少钱呢？”

段祺瑞提到有“参战借款”。叶恭绰不以为然：“从中国到欧洲，要走许多的路程，花许多的时间，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也不知道。两千元供应一个兵恐怕不够吧？”

什么叫作“两千元供应一个兵”？叶恭绰当着段祺瑞的面算了一笔账：两千万元的“参战借款”，出一万兵，每个兵身上只能摊到两千元。

段祺瑞听了再也作声不得。

独树一帜

段祺瑞尚在头疼钱的问题，“一战”就结束了，参战督办和刚刚成立的“参战军”也相应改为边防督办、边防军。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其

实并不是一个概念，边防军其实已突破“参战军”的范畴，除西北边防军外，它还包括陆军第九师等其他段氏嫡系部队。西北边防军则是单纯由“参战军”扩展出来的部队，由徐树铮直接指挥，其费用也主要靠徐树铮个人从皖督倪嗣冲、陕督陈树藩等人那里“化缘”。

西北边防军在习惯上又被称为西北军。这是民国时期最早以西北军冠名的军队，共辖三师四旅，其中第一、第二混成旅就是徐树铮任奉军副司令时，归属于参战督办处的那两支奉军旅，算是从张作霖手里挖过来的。第三、第四混成旅系按徐世昌的命令招募，这两个旅的招募区被指定为皖南，由于招募期间得到了倪嗣冲的竭力协助，所以用很短的时间便募得满额。

西北军为清一色的日式装备，步枪、机枪是“三八式”，山炮是“大正六年式”，其他如交通通信等设备也都来自日本。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些装备在全国各军队中都处于拔尖地位。

除了一流的装备，西北军还拥有一流的军官素质——各旅军官以正规军校出身者居多，单纯行伍出身的军官为数较少。

在旧的北洋系四分五裂之后，能够完全听从段祺瑞调遣的北洋精锐部队已经不多了，这使得他和徐树铮吃尽了苦头，行事也多受掣肘。西北军类似于当年袁世凯的模范团，是自直、皖对立以来，段、徐所创建和直接指挥的第一支嫡系武装，而且底子又是如此之好，所以二人都对它格外重视。

按照段祺瑞的吩咐，徐树铮以洛阳为据点，对西北军展开了极具自身特色的军事训练。

正志中学（后曾改名为成达中学）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这所具有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名校，乃徐树铮一手创建，建校款项就是当年经袁世凯特批，他从美国军火商那里拿到的佣金。学校建成后，徐树铮担任了首任校长，并亲自制订教学计划，遴选教员，林纾等文化名家都曾被他请为教员。在此期间，徐树铮还有过将正志中学改成大学的计划。北洋系军人中虽不乏尊师重教者，但能做到像他这样认真的，却极其罕有。

更令人称奇的是，徐树铮的办学模式也与众不同。当时的普通中学一般都不设军事操，在课程设置上，古文也已被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徐树铮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志中学的学生必须练军事操、读古文，缺一不可。他还常向学生讲话，号召学生学好本领，将来好征服日本，一雪自甲午以来的国耻。

军队同样被徐树铮灌注了这样的个人理想。他希望自己的部下“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既会拿枪杆，又会拿笔杆。为此，他规定西北军的所有军官都必须读《孙子兵法》《管子》《孟子》《战国策》等古书，且每两周或一个月必须写作文一篇。作文题目由徐树铮拟定，不限体裁，不限字数，文言白话均可，篇幅亦可长可短。写好之后，徐树铮不假人手，亲自批改。文章写得好的，还能得到纸、笔、墨盒等奖励。

与军官不同，士兵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刚刚招募进来的甚至大多不识字。徐树铮对士兵的“扫盲教育”抓得很紧，经过“扫盲”，一年之内，士兵中能读白话报及写家书的，不在少数。

民初军队的士兵训练，均注重操场上老一套的制式训练，拔慢步往往被看得非常重要。徐树铮对这些形式化的东西不太在意，他在意

的是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对官兵的体力训练，如器械体操、刺枪、劈剑、负重跑步和负重超越障碍物等，尤要求严格。

在军队的公文格式直至军纪方面，徐树铮也做了一些革新。他发现有些公文格式非常烦琐，有时公文的正文才两三句话，废话却有一大堆，不仅费事无用，而且容易将办公文的人和看公文的人都弄糊涂。徐树铮通令予以废除，之后公文就变得简便清楚多了。

对士兵的体罚，曾盛行于民初各军队。当时军队里还特制了一种责打士兵的专用军棍，名之为“黑红棍”。徐树铮下令废除“黑红棍”，并严禁体罚和打骂士兵。士兵犯错需要处罚，一律只关禁闭。

这些改革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却极具轰动效应，尤其不体罚士兵这一条，一般军队是难以做到的。

骑虎难下

人尚未去西北，就已经弄得这么风生水起，免不了遭到反对派的忌恨和各方面的猜疑。民国是个相对开放的时代，英杰们大多脱不开风流二字。徐树铮平生以“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自命，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同时，也从未忘情于声色。他是京城八大胡同的常客，曾经娶过一个妓女，且对之十分宠爱。当了西北筹边使后，又同时娶了两个妓女，只是这两个妓女都不像前一个那么得宠。于是乎，八大胡同就纷纷传说：“徐树铮娶这两个人，不为自己，是为了蒙古王子，他想唱一出昭君和番呢！”

就在徐树铮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之际，外蒙古的撤治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经过多次谈判，1919年8月4日，王公们在库伦召开大会，

与陈毅商定了撤治的两条原则，即“恢复前清旧制”以及由王公总揽政权。

陈毅随后将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龚心湛内阁讨论后，对达成的两条原则无意见，但提出应该走一下程序，也就是先让外蒙古王公以全体人员的名义呈请恢复前清旧制，然后再由政府与之具体磋商条件。

接到北京的训令，陈毅却没有照办，只是敷衍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协商的方式谈妥各项条件，否则便不能安心撤治。

外蒙古高层由王公和喇嘛共同构成，但在撤治过程中，陈毅一直是与王公打交道，从未与喇嘛直接接触。自库伦大会起，撤治的商谈过程以及达成的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国及喇嘛都毫不知情。

对于喇嘛，陈毅的想法比较一厢情愿，他是希望让王公去说服喇嘛，再通过喇嘛去说服活佛。王公们答应去对喇嘛进行说服，对于说服的结果，他们提供给陈毅的信息也非常乐观。陈毅信以为真，他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至于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

9月26日，他再电北京：“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

10月1日，陈毅派秘书黄成垿将与王公磋商好的条件草案送往北京，这就是“外蒙古善后条例”，共六十三条款，也可简称“六十三条”。此时陈毅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不愿让徐树铮介入，于是就在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嘱咐他避免见到徐树铮，以免让徐树铮知道此事后分去自己的功劳。

黄成塄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成塄按照陈毅所嘱，尽量避免与之见面。徐树铮是何等样人，平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黄成塄来京的消息又岂能躲过他的视线？但因为黄成塄没有主动来联系，暂时也就未予理会。

陈毅没有想到，王公们给他提供的有关疏通喇嘛成功的消息居然全是假消息。就在他派黄成塄进京的同一天，活佛哲布尊丹巴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六十三条”表示明确反对。

陈毅在办理撤治过程中的一大错误，就是先与王公议定条件而非先请撤治，这使得他和王公在事发后骑虎难下，连回旋的余地都失去了。这时，他才想到徐树铮的作用和价值，于是便在黄成塄到京的六七天后，赶紧给徐树铮发去一封电报：“黄成塄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

陈毅既要徐树铮派兵来库伦助助声势，又不希望他本人涉入撤治事务，这导致黄成塄在见徐树铮时，始终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徐树铮问他到底有什么“秘密要务”，他就掩饰说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要请假去奉天，奉陈毅之命顺道来北京催队伍。

徐树铮一听，便知道其中一定另有玄机，当下也不点破，就笑着把黄成塄打发走了。

陈毅让黄成塄“催队伍”，至少说明事不宜迟，应立即动身。10月23日，徐树铮由北京启程，急赴库伦。

出发前一天，他去谒见徐世昌，谈到自己还没有见过撤治的条件草案。徐世昌马上让他去向国务院秘书厅调卷，这一调来的卷宗正是

陈毅派黄成垿送来的“六十三条”，上面还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在徐世昌的允许下，徐树铮得以携带此卷北行。

在决定自己入蒙的同时，徐树铮命令西北军第三混成旅由宣化徒步前往多伦，然后再在那里乘汽车前往库伦——自出任西北筹边使以来，他就未雨绸缪，购买了8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与之相应，西北军里校、尉一级军官都有一个与其他军队不同的技能要求，即必须学会开汽车、火车以及掌握车辆调度等知识。

在那个时代，80辆大型卡车是个惊人的数字，让军官普遍学会开车也殊为少见，由此亦可见徐氏的远见卓识和非同凡响的气魄。

鲁班面前弄斧头

从多伦至库伦约有两千里路，途中多沙碛，尽管徐树铮事先已在路途上设立交通站、开凿水井，但仍时时会遇到缺乏饮水的困难。这样的话，就算以汽车输送，预计也得五到六天。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徐树铮又特别多加了一天，规定七日之内到达，他自己的座车则与先头部队一道前行。

10月29日，徐树铮一行到达叨林，此地距库伦尚有140里。他忽然下令停车，并通过电话，与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徐树铮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日本人对话用不着翻译。当松井本人亲自接电话时，徐树铮先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

日本在库伦的驻兵是100余人，徐树铮也已经侦察到了这一情报。他故意夸大其词，只是想诈一诈松井，让他自己承认日本有驻兵在库伦。

松井不知是计，果然急忙申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人的武装部队呀！"

徐树铮听罢哈哈大笑，"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

松井这才明白徐树铮说话的用意所在，可要否认也来不及了，他支吾半天，才为自己找到理由："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

松井"鲁班面前弄斧头"，真是越辩越乱，越乱漏洞越多。两国之间，即便派再少的军队到对方国去，也必须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才行。松井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已经明显越轨。

徐树铮见状也不再跟他客气，遂严正告知松井："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

他要求松井必须在三小时之内，将驻兵的武器送缴中方驻库伦的办事处，"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

松井理屈词穷，喉咙里好像有十五个虫子在爬。他又生怕徐树铮真的带来了大批军队，到时无法应付，于是赶紧说："阁下的要求未免

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做答复。”

徐树铮听出松井已有惧意，不过是想借此再拖延一点时间而已。他当即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做一肯定的答复吧！”

松井顿时被噎得脸上七青八黄，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嘴巴对着话筒，一个劲地用干咳进行掩饰。

眼看已经把日本武官唬得腿肚子都转了筋，徐树铮也顺势给他留下一个台阶，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

说完之后，不等松井回话，他就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

不到半个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徐树铮这才下令车队继续向库伦开进。

吓退日本人之后，接下来还得对蒙古人进行心理战。在挥军开入库伦之前，徐树铮做了特别的布置，他要求每一辆卡车限载二十名官兵，每名士兵都将所携武器尽量显露在外，以此给人造成器械鲜明、军容甚盛的印象。

卡车进入库伦市区后，又特意绕着几条繁华街巷徐徐前行，接着才开往库伦西郊的红城军营。

进入军营，士兵一律不下车，而是在军官的监视下，俯伏于车厢之内，加上车身以巨幅帆布覆盖，车外根本看不到车内有人。这些车子在营房内稍事停留，即开到离库伦不远的地方，重新混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之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

如此来来往往，把库伦城的外蒙古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道西北军究竟来了多少人马。

奉若神明

红城军营乃袁世凯当政时下令修建的驻军区域。这座军营规模很大，能够容得下足足五个师。徐树铮只带来了一个旅，虽然西北军混成旅的编制名额比一般部队要多，但也只有八千多人，无法住满营房。徐树铮的设计是，每个连应入住容纳一个团的营房，即便营房内人不多，但营房门口必须布满哨兵，并严禁当地人接近营区。

外蒙古人不知真相，看到后以为每座营房都住满了人。这样粗略估计下来，进入库伦的西北军至少不下五万人，与进城时的气派完全对应。

此时日本驻兵的缴械事件已经传遍全城，令一般外蒙古人对徐树铮更是奉若神明。

外蒙古人其实并不好骗，徐树铮抵达库伦后，就发现他们的性格中有多疑的一面。这让徐树铮想到，如果今后在谈判交涉时使用翻译，不但会失去原意，还很容易导致误会。为此，他在到库伦的第三天就请来一名蒙古语翻译，向对方学习蒙古语。他还特地关照左右：“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

徐树铮在京时就对蒙古语有所留意，加上他天资极高，所以仅花了两周时间“恶补”，就已经能大致掌握蒙古语。后来与外蒙古高层的谈判交涉，他都是自己说蒙古语，而不用翻译。

除了学说蒙古语外，徐树铮还对外蒙古高层的情况做了详细了解。

外蒙古有自己独特的官僚政治体制，其高层分为两派，其中王公称为黑派，喇嘛称为格鲁派。在前清时，外蒙古实行政教分离，黑派王公治政，格鲁派喇嘛管教，各有所司。自宣布独立起，活佛哲布尊丹巴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哲布尊丹巴信赖喇嘛，于是在沙俄的支持下，格鲁派喇嘛便得以全面把持政权，黑派王公则受到了排斥。

概而言之，王公一派提出撤治，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归附中央，而是想趁着俄国内乱，无力兼顾外蒙古之机，摧毁喇嘛秉政的政治法律依据，以夺回他们手中失去的权力。

在掌握这些内幕后，徐树铮认为陈毅抛开喇嘛，只以王公为唯一交涉对象的做法是不对的。道理很简单，撤治是王公的一致意愿，没必要再做什么工作，现在的阻力全部来自喇嘛，他们为了维护既得权位，对王公所提出的撤治倡议必然抱有本能的敌意。

格鲁派喇嘛不可忽视，除了他们实际把持政权外，还在于宗教对于外蒙古的政治和世俗生活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在这里，即便是王公，若不借宗教之力，也“不能行其权”。

徐树铮得出结论，外蒙古撤治之关键不在王公，而在喇嘛。他明确表示：“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一流人物，未可过于抛荒。”

接着，徐树铮又发现，陈毅自鸣得意的“六十三条”也存在很大问题。

陈毅非常希望达成撤治，以建成不世之功，但他却不知道要巧妙地利用王公与喇嘛之间的矛盾，以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古主权的目的，而只是很呆板地和王公代表商讨办法，结果导致“六十三条”简直就是他在帮蒙古王公向北京政府“争取”自治，而不是“撤销”自治。

在前往库伦的路途中，徐树铮一路上对“六十三条”进行研究，已经弄清了其中的利弊所在。一到库伦，他就找陈毅商量此事，但陈毅把徐树铮招来库伦，不过是想借重一下西北军的声威，其实根本不想让徐树铮插手自己一手经营的撤治交涉。

自此以后，只要徐树铮一谈到与撤治有关的事，陈毅就刻意回避，其态度和黄成垿类似。另一方面，他又继续钻牛角尖，在哲布尊丹巴已经公开表明反对意见后，索性和王公们抛开喇嘛、活佛，单独实施撤治行动。10月底，王公具名递送了一件请求撤治的呈文，由陈毅电达北京。

在格鲁派喇嘛看来，王公们一意孤行地向北京递送撤治呈文，无异于在自治政府内部发动政变，他们岂能容忍。于是，格鲁派的态度变得比黑派还要强硬，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

与此同时，哲布尊丹巴又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前往北京，送来他致徐世昌的第二封亲笔信，继续表态不承认“六十三条”。嘉亨尊莅京后，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还“意欲请美使援助”。俄、法等国闻讯后，也闻风而动，分别就喇嘛入京一事向中方提出了问讯。

此时靳云鹏已继龚心湛组阁。意识到外蒙古局势不断恶化，徐树铮直接致电新任国务总理靳云鹏，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十三条”有“七不可”，若完全依据该条例行事，即便撤治成功，外蒙古也将由王公总揽政权，中央无法行使完全主权，撤治云云不过是徒托空言而已。他同时要求待他召集筹边会议研究后，再决定下一步策略。

徐树铮不上书还好，这一上书，事情却变得更复杂了。

水火不容

靳云鹏、徐树铮同为段祺瑞的幕僚出身，也是段幕中被公认为最有才能，同时也最受段祺瑞赏识的两个人。靳云鹏虽然天资不如徐树铮，但做事特别勤奋卖力，加之出道较早，名位一直在徐树铮之上，所以被新闻界封为段幕四大金刚第一名（另三人依次为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

靳、徐之间一向都互不买账。在靳云鹏看来，自己从小兵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不像徐树铮原先一天兵都没当过，只是因为留洋回来就做了军官。同时，他在徐树铮之前就受到了段祺瑞的提携，因此理所当然地视徐为后生晚辈。

徐树铮则以能文能武自豪，认为靳云鹏出身行伍，虽然说不上是目不识丁，但也只不过粗通文字而已。他内心里看不起靳云鹏，也根本没有靳云鹏所期望的那种对“前辈”的敬畏感，平时有了分歧便照吵不误，不肯给对方留一丝情面。

段祺瑞固然对徐、靳都很赏识，但如果一定要他从中选一个最欣赏最亲近的，无疑仍是徐树铮。

与靳云鹏和段祺瑞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不同，徐树铮是段祺瑞真正的嫡系门生。朋友虽近，总不如学生可靠。更重要的是，徐树铮只忠于段祺瑞，政治关系较简单，靳云鹏却关系复杂，他和冯国璋做过同学同事，和曹锟是把兄弟，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也就是说，几乎和所有的当朝权势人物都有瓜葛。因此，段祺瑞对靳云鹏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信赖，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中，也不免有偏徐而抑靳的趋向。

靳云鹏的功利心和虚荣心都很强。段祺瑞的这一态度毫无疑问对他造成了很大刺激，使其更加由妒生恨。

早在讨伐张勋期间，段祺瑞将幕僚人员做了一个分工，让靳云鹏在天津负责策划，徐树铮、曾毓隽到外省进行联络。徐树铮因为有事来津找段祺瑞商量，正好段祺瑞不在，徐树铮没进屋就离开了。

靳云鹏知道后，以为徐树铮是来找自己碴儿或到段祺瑞面前告自己状的，于是马上跑到办公室门外，对着徐树铮的背影怒目而视，并且用山东土话大骂道：“徐树铮你奶奶个腿儿，你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你来查谁呀！你管得着吗？婊子的儿，整天价不干人事，出坏主意，你是人做的吗？王八蛋！”

徐树铮不屑与之对骂，便假装没听见他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加快脚步离开了。

早在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时，徐、靳的矛盾就已由暗斗走向表面化，靳云鹏常常被气得请假不来办公。段祺瑞知道后，便授意吴光新、曲同丰等人进行调解，但二人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之后段祺瑞改变方法，转派靳云鹏代表他出外做联络工作，一方面利用靳云鹏

各方面关系较广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减少靳、徐之间的摩擦。

可是这样一来，靳云鹏却认为段祺瑞是有意对他疏远，反而对徐树铮更加怀恨在心。

徐、靳虽然一开始就不和，但争斗还不算激烈，围绕着究竟该由谁来出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双方才逐渐变得水火不容。

靳云鹏是督办处督练，徐树铮是督办处参谋长，按照这个职位设置，靳在徐之上，有统辖边防军的权力，他似乎更有理由出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可是在段派嫡系军人这个圈子里，多数人都认为靳云鹏人品卑鄙，很看不起他，就是边防军的三个师长，也都跟他不对付，尤以第一师师长曲同丰为甚。

辛亥革命前，靳云鹏在昆明任第十九镇总参议。十九镇统制是钟麟同，靳云鹏与之不睦，曾陷害过钟麟同。当时曲同丰也在十九镇任协统，和钟麟同关系很深。因为这段过节儿，他每谈及靳云鹏便咬牙切齿。

靳云鹏是三个师长的直接领导人，后者距离段祺瑞还隔着一层。可是师长们的心目中都只有段祺瑞，并不把靳云鹏放在眼里，有些事情甚至还会直接去向段祺瑞请示。这样靳云鹏就被悬在中间，成了一块挂名的招牌。

靳名位较高但难得众心，徐能够服众却职务不够，双方各有优势短长，又互不相让，令段祺瑞一时也难以决断，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也就只好长久地空缺在那里。直至徐世昌用徐树铮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这桩悬案才算了结。

靳云鹏与徐树铮有宿怨，不愿看到对方建功，所以尽管外交部也支持徐树铮对“六十三条”的看法，但他仍给徐树铮泼去了一盆冷水。

徐树铮主张不应按王公要求撤治，靳云鹏就说内阁已经如此决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他还直接否决了开会进行研究的提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古撤销自治案，已经交给陈毅专办，不必他人越俎代庖。

徐树铮对靳云鹏的指示置若罔闻，他致电国务院：“撤治但求成功，何分畛域？”

以徐树铮的性格，只要他认为做得对而且能做好的事，必然一往无前，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更别说靳云鹏的指示了。在给徐世昌的另一封电文中，他声明自己从抵达库伦之日起，没有做错过任何一件事，“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

美男计

徐树铮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事事能把握问题重点。相反，陈毅则言过其实，志大才疏，用徐树铮批评他的话来说，是“心思不能沉细，自觉明于万里，其实蔽于目前”。

1919年11月10日，当徐树铮再次找陈毅谈“六十三条”时，陈毅还是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使得徐树铮意识到，陈毅已经被自己制造的假象困住，走不出去了。如果这时候他撒手不管，不但撤治

一事必将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中国政府在外交、政治上也将面临非常棘手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徐树铮而言，撒手不管其实是最轻松也最安全的，不单政府那里完全可以卸责，也不会造成与陈毅的关系紧张。可是，“听取国家损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徐树铮不顾政府明令，毅然决然地从陈毅手中抢过了交涉权，他同时向国务院立下军令状，誓言他将不用一刀一枪，在三五天之内就完成交涉。假如不能成功，甘愿“息影南归”，待陈毅办结之日，再去负荆请罪。

11月11日，徐树铮召集筹边会议，对撤治事宜进行磋商。会上，针对陈毅交涉失败的症结所在，他提出了两条新的交涉原则：主权原则，撤治后政权应收归政府，不能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实；策略原则，交涉对象以王公为主改为以喇嘛为主。

自抵达库伦以来，徐树铮一直在观察喇嘛高层的态度。喇嘛高层共有四位显要，徐树铮经过接触发现，担任外蒙古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巴特玛多尔济乃掌握政府实权的核心人物。他由此认定巴特玛多尔济是一个必须极力争取的突破口，“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拿定了主意，徐树铮便主攻巴特玛多尔济，对其“结之以信，感之以情”，同时又对症下药，尽量满足对方个人的要求。

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活佛拥有王爵册封权，结果造成了封王过多、册封不公的弊端。在喇嘛高层的四位显要中，巴特玛多尔济年纪最大、权位最重，可是其他三人都封了亲王，而他偏偏只有王衔，没

有实际被封。他对此耿耿于怀，在与徐树铮的交谈中，他答应会去劝活佛撤治，同时提出希望事成之后，中央能够册封他为亲王。

徐树铮听后，当即向他许诺，表示一旦撤治完成，马上由中央加封他为亲王，“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

与巴特玛多尔济谈话的第二天清晨，徐树铮一个人独坐默思，考虑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的答复，应该怎么办。

西北军到达库伦后，陈毅曾向徐树铮建议应对喇嘛一派示威。徐树铮不同意，他认为边事与兵事的道理相通，不外“恩威并施”四字，若一味示威炫武，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不足取。

在徐树铮看来，外蒙古人性格多疑，初期不能太过示威，过威则不易近，所以一定要先结之以恩，也就是采取怀柔政策。结恩之后，时间一长，可能又会被蒙人轻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威以折之”。徐树铮料定，蒙古人无实力，必然因惧而就范。接着再待之以恩，以结其心。

徐树铮精通古史，视这种恩威并施之法为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的运用。蒙古版的“七擒七纵”看上去有些麻烦，但这是攻心为上，确保外蒙古不勾结外援，转而听命于俄国或日本的长远之计。

现在“恩”已经施给了巴特玛多尔济，假如活佛一时劝说不了，巴特玛多尔济又因此产生了畏难情绪，徐树铮就打算示“威”了——自然活佛是不能动的，但包括巴特玛多尔济在内的四位喇嘛高层都能动，到时可以给四人定个“不能善辅活佛”的罪名，假装予以拘禁，以逼迫他们再对活佛施压。

徐树铮正在一个人想着心思，巴特玛多尔济忽然匆匆前来。据他说，昨晚分别后，他连夜拜见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自治，并痛陈利害，为此还哭了鼻子。在他反复劝说下，哲布尊丹巴已口头同意撤治。

在此之前，徐树铮已在活佛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是徐树铮身边的红人，同时还是个美少年。他和一位活跃于库伦社交场的蒙古贵妇好上了，二人传出了罗曼史，而这位贵妇其实是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弟媳妇，由于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很有力量。

徐树铮得知后，就让王荫泰施展“美男计”，通过活佛的弟媳妇对活佛进行游说。活佛最后能够同意撤治，据说主要还是来自这位弟媳妇的劝告。

鸿门宴

活佛同意，还不能够一锤定音，因为秉政的是格鲁派喇嘛。涉及他们的权利，必须还要讨价还价，且不说时间会拖得很长，就算最终达成协议，也极可能是一个喇嘛版的“六十三条”。

巴特玛多尔济是个城府极深的老狐狸，他能这么爽快地把消息告诉徐树铮，本身也有施缓兵之计的目的。徐树铮将计就计，对巴特玛多尔济说今晚就和他一起去与活佛面商撤治的办法。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徐树铮还担保这一定会是一个春风拂面似的谈话过程，“决不令活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

巴特玛多尔济称谢而去，临行时又再三让徐树铮保密，说待撤治成功后再发布消息，告诉他人云云。

这一分别，二人在心里都偷偷地笑了。巴特玛多尔济笑，是以为自己既借徐树铮之手排挤了黑派王公，又落得一个册封亲王的好事。徐树铮笑，则是因为他可以擒贼先擒王，沿着这一突破口实施穷追猛打了。

1919年11月14日，徐树铮风风火火地闯入巴特玛多尔济的寓所，要对方履行约定，和他一道去敦促活佛率众请求撤治，并且要求把具体撤治的条例完全简化，一切详细办法待撤治完成后再另行商定。

徐树铮的这一说法与“春风拂面”已经完全不同，就是一个霸王硬上弓的做派。巴特玛多尔济见势不好，只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推诿。

徐树铮顿时变了脸，他声色俱厉，放出了“祸蒙之罪，不在活佛而在喇嘛”这样的狠话，接着又恶狠狠地表示他可以将撤治的日期再宽限一天，但事情必须在第二天晚上解决，否则就不用谈了——他会马上逮捕活佛，巴特玛多尔济本人也别想跑，“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巴特玛多尔济哪里料得到白天态度还温婉亲切、彬彬有礼的这位汉家大将会突然变脸，而且变得如此彻底冷酷，当场被惊得目瞪口呆。在徐树铮的逼迫下，第二天他赶紧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决定先由自治政府的各部部长在自请撤治的呈文上签名盖印，然后再让活佛率众向北京政府送上呈文。

王公们仗着与陈毅有交情，托陈毅来央求徐树铮，答应日内一定把事情办妥，请他当晚不要再苦苦相逼。徐树铮缓了口气，说如果这

样的话，今晚就算了，但一定要从速办理，不得再迟延。

会议还没结束，巴特玛多尔济就匆匆忙忙地要赶回寓所。众人问他为何如此匆忙，他可怜巴巴地回答说，昨天“徐公”（徐树铮）限定今晚六点和他碰面，不敢不早点在家里等着。

徐树铮见到巴特玛多尔济后，又换了一副脸孔，还因昨天晚上的态度向巴特玛多尔济道了歉。

徐树铮对外蒙古人的“狂暴”举动令陈毅都不太适应，觉得太过分，还是应该采用怀柔政策为好。徐树铮给他的回答是：只有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也才能做出非常之举。

陈毅听后颇不以为然，但交涉权既然已经被徐树铮夺了过去，他觉得多说也无益。

11月16日晚，徐树铮邀陈毅小聚。二人放量痛饮，徐树铮的酒量很厉害，把陈毅灌得酩酊大醉，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徐树铮告诉他，活佛哲布尊丹巴已经在给中央政府的呈文上签了字。

陈毅听了大吃一惊。原来徐树铮唯恐夜长梦多，等不及让活佛再考虑考虑。就在他和陈毅举杯痛饮的同一时间，他办了一桌“鸿门宴”，令参谋将哲布尊丹巴等人请来吃饭，席间就有言在先：活佛不在呈文上签字，今晚谁也不能走！

对撤治而言，这是最关键的一天，陈毅和王公交涉了十多个月而未果的撤治问题，就在这一天以极其干净利落或者说“霸道”的方式解决了。

非常之功

11月17日，外蒙古自治政府将自愿撤治的呈文分别送交都护使陈毅、筹边使徐树铮，请求代转呈送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收到呈文后，徐世昌即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宣布取消外蒙古自治，同时废除相应的中俄条约。

外蒙古取消自治，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徐树铮10月29日到库伦，11月17日尘埃落定，在短短的18天时间里，他不用一枪一弹，不费一兵一卒，仅凭“恩威并施”手段的运用，就得以大功告成，使外蒙古重归中华版图，确实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

至此，徐树铮完成了一生之中最为得意也最为重要的一次壮举。11月24日，他载誉回京，向政府述职。各方面的贺电贺函已如雪片一般飞来，皖系内部自然是击掌相庆。梁士诒贺函云：“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连孙中山也来电祝贺，称自清末以来，割地丧权之事不绝，中国已久无汉代陈汤、班超、傅介子那样能出塞为国建立殊勋的人物。徐树铮在短时间内就建此奇功，足以与上述这些古代人杰比肩称雄。

在当时南北对立的情况下，孙中山的这一表态引起了某些国民党人的抗议。孙中山不改初衷，批复道：“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对徐树铮建功塞外，最为高兴的恐怕还得数“老幕主”段祺瑞了。老段出面希望徐世昌、靳云鹏论功行赏，将靳云鹏所兼的陆军总长授予徐树铮。

对于徐树铮的功劳，徐、靳自然也都赞不绝口，但段祺瑞此议一出，不仅靳云鹏不愿意，表示“碍难照办”，徐世昌也不赞同。徐世昌认为，国务院里如果插入了徐树铮，内阁恐怕将从此多事，不会有一天安静日子。现在府院之间尚无什么冲突，若因此生出什么事来就不好办了。

徐树铮本人倒不一定特别想进内阁，但他提出，既叫他负责西北边防，那么所有西北各省都应划归他统一管辖。靳云鹏一听，更不乐意了，说这等于割裂中央政权，形成国家中的国家，比广东独立的形势还要糟。

徐世昌说得更实际：“小徐是援清朝开国时左将军的旧例，要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各省督军之上，可是要叫他们（各省督军）头上再戴一顶帽子，他们未必肯干吧。”

虽然徐树铮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但他在西北特别是外蒙古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国务院决定裁撤库伦都护使署，原都护使陈毅奉调回京，改任豫威将军，外蒙古事务交由筹边使署全权处理。

不久，徐世昌又特派徐树铮为册封专使，负责到外蒙古主持活佛的册封典礼。出使之前，段祺瑞亲率政府官员、议员百余人在故宫保和殿举行了欢送大会。

重返外蒙古，紧张和忙碌已被轻松所代替，但心情却更为激动。上一次徐树铮随身所带的是“六十三条”，这次则是一本《汉书》。

徐树铮的诗文水平很高，自称填词海内第一，其诗句“美人颜色千丝发，大将功名十万骑”在当时广为人知，而它也恰好可以作为《汉书》的题记——如同孙中山所列举的那样，这本古书所记载的汉代，

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雄健的时代之一，其间涌现出了太多的勇士和外交家，傅介子、张骞、陈汤、班超……他们出使西域，安定边陲，言必信，行必果，其事迹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

徐树铮走一路，看一路，吟一路，途经驿站时，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便忍不住披衣下床，在驿馆墙上题写七律一首，开头第一句便是:“冲寒才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徐树铮顶风冒雪，风尘仆仆地再次回到库伦。外蒙古军民出郊十里，夹道相迎。进入库伦城后，大街小巷已经全都挂上了民国的五色国旗。

1920年元旦，徐树铮在库伦佛宫主持册封大典，典礼十分隆重。据蒙古人说，乃千年未有之盛举。当徐树铮将册封令与七狮金印交到活佛哲布尊丹巴手中时，整个库伦城一片欢呼之声。

当天，北京政府明令授徐树铮勋二位。志得意满之余，徐树铮决心施展抱负，悉心筹谋治理外蒙古，并进一步争取蒙古人的信任。

心病

外蒙古的贸易主要掌握在山西人手里。晋商很善于做生意，他们常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古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容许他们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先买去，只规定在一个时间段必须归还。蒙古人因为不用现款即可拿到所喜欢的东西，于是就放开量地买，需要的买，不需要的也买，晋商因此在外蒙古生意鼎盛。

蒙古人不用货币，都是实物交易，晋商就趁机以此蒙骗他们。比如，价格议定是100头羊，到年底偿还时，晋商就牵走140头羊。蒙古人不解，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晋商回答说："羊要生小羊啊！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

这话当然是极不合理的，难道100头羊不需要喂养？而且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也实在太黑了一点。

蒙古人虽然多疑，可是本质非常老实，听了晋商的话还觉得挺有道理，就任他们牵走了140头羊。

徐树铮认为这样欺负蒙古人不行，他一面要求蒙古人不得赊欠，以免今后背负重利；一面勒令晋商等从内地来的商人诚实经营，即便蒙古人有赊欠的情况，也不许到付账时索取额外的羊。

徐树铮同时注重改善外蒙古当地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他设立边蒙银行，发行以骆驼队为图案的钞票，又从德国聘来一位教授进行调查，拟定了逐步开发外蒙古地下资源的计划。

外蒙古市场上原来几乎没有蔬菜。发现这个问题后，徐树铮便在可以种蔬菜的地方引种天津大白菜。两年以后，大白菜即成了当地的大众食品。

徐树铮本来还有一个规模更大、更能保证外蒙古长治久安的计划，这就是移民塞边。

至1920年，西北军已扩充至五个混成旅（新成立的第五混成旅只有一团新兵，实际仍为四个混成旅）。按照徐树铮的设想，五个混成旅将分别驻守外蒙古的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又分为五个道尹驻在

区，以混成旅旅长兼道尹。道尹以下再设县，每县驻一个营，营长兼县长。

至于士兵，他不仅将分给每人一份土地，还会从内地挑选适龄女子，送至外蒙古与士兵结婚，从而使得西北军的士兵逐渐成为当地的居民。

移民塞边的计划听起来不错，但需要一定的经济物质作为保障。外蒙古地方贫瘠，西北军若整军常驻于此，仅饷械一项就难以筹措。先前徐树铮之所以要求统辖西北各省，就是想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生财成了徐树铮的一块心病，他只好仍回北京打主意。这次，段祺瑞把靳云鹏和徐树铮一同找来，对西北军的军饷、驻地问题进行会商。段祺瑞本来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很快就被徐树铮说服，表示赞同按徐树铮的计划行事。于是徐树铮就按边防督办的名义，照计划拟了一份文件，交给靳云鹏批阅。

靳云鹏说容我考虑考虑，就把文件留下了，之后再无回音。

徐树铮很不痛快，就又去找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是清末时的老官僚，在宦海浮沉多年，早就掌握了一套被人叫作“琉璃球”的办法，也就是遇到不想办的事时，就给你来个模棱两可，不着边际。

徐树铮固然才气高、能力强，可同时也具有恃才傲物，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的性格特点。见徐世昌也对他如此敷衍，一生气便脱口而出：“当年不是树铮多事，到处奔走，总统今天还在辉县（徐世昌的隐居地）享清福呢，何至为国事操心，这样大的年纪，还要着这份儿急！”

徐世昌听出徐树铮在拿话讽刺他，不由面红耳赤，忙期期艾艾地解释道："这是边防军的事，不是西北边防军的事（意指徐树铮越俎代庖，使用了段祺瑞的职权）。你这样把持，要把翼卿（靳云鹏的字）搁在哪儿呀？"

"段爷那里已经说好了，没有问题，我可以完全负责。"徐树铮一顶上了牛便不肯再退下来，"总理和陆军部有点故意留难，我才来麻烦总统。如果都不负责，将来还怎么办事呢？"

见徐树铮抬出"段爷"，徐世昌拉下了脸："你找督办说去吧。"

徐树铮闻言一跺脚："也好，反正势在必行。总统和总理既然对国家大事不敢负责，难怪国会方面辄有烦言了。"

众所周知，徐树铮对"安福国会"的操纵能力，因此这句话在徐世昌听来分外刺耳，那意思分明就是在说，我小徐能把你老徐扶上台，就有本事把你赶下台。

徐世昌尽管很有涵养，但徐树铮一走，还是忍不住大发脾气，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树铮也太目中无人了！"

六卦先生

在靳云鹏、徐世昌面前，徐树铮成了一个最不受欢迎的客人，即便有段祺瑞帮着他说话，但最终仍是毫无所得，而徐树铮又不是一个甘于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人，你越对他这样，他越要设法组织反击。

自此以后，国会和段派阁员便在徐树铮的策动下，处处与靳、徐作对。徐树铮本人见着靳、徐，表面上虽还不失礼貌，然而也不再掩饰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据接近徐世昌的人说，他到后来一见徐树铮就感觉如芒刺在背，有好几次还被气得老泪横流、放声痛哭。

段祺瑞、徐树铮在把徐世昌推上总统宝座之前，总以为他好说话，是个和王士珍差不多类型的人。徐世昌上台后，起初看上去也确实有一种超然于直皖两系之外的样子，对两系表现得不偏不倚，当时有报纸还说他采用的是两面手法，常以“徐娘”、“秋波”来揶揄这位大总统。

可是段、徐都弄错了一点，徐世昌绝不是王士珍，不仅不是，而且他要么不与人争斗，一旦展开手段，绝对够招惹他的人喝上两壶。最早看透此老的人，恰恰是被视为大老粗的皖督倪嗣冲。在徐世昌做了总统之后，他有一天对曾毓隽和吴光新说：“你们还记得‘六卦先生’的外号吗？昏天黑地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八卦少了乾坤两卦，所以称为六卦。乾为天，坤为地，少了天地，便只能昏天黑地了。徐世昌的外号就是“六卦先生”！清末时，大部分北洋人都知道徐世昌的这个外号，也知道他政治手腕极其高明——你想，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代的军师，是容易对付的吗？

无论是段祺瑞、徐树铮，还是曾毓隽、吴光新，都不可能不清楚徐世昌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因为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一直未在政府内从事任何职务，最多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出现，才让人慢慢淡忘了他曾经的峥嵘，居然把他跟真正淡漠处世的王士珍混同起来。

徐世昌处心积虑准备对付徐树铮。与徐树铮把劲儿使在明处不同，他是从暗处发力，而且所用招数，还是偷师了“徐树铮手法”。

过去徐树铮与黎元洪斗，与冯国璋斗，最惯用的手法就是借力打力，即用外来力量向对手施压，或发联名电报，或开督军团会议。徐世昌深悉直皖两系的矛盾，他要效法这一套，利用直系的外力来拔去身上的芒刺。

冯国璋下台后，直系已经形成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新核心。曹锟早在南北战争期间就与徐树铮之间结下了旧怨，加上徐树铮许诺他可以当副总统，结果总统选出，副总统却流产了，曹锟情知上当，对徐树铮更加不满。

吴佩孚则是因为没当上湘督，对段祺瑞一肚子意见，后来听说段祺瑞的一切举措都由徐树铮所策划，便也把一腔怒火都集中到了徐树铮身上。

徐树铮此后出了一个险招。他打听到吴佩孚下面的旅长张学颜可以利用，便秘密电召其进京，指示机宜，让张学颜设法取吴佩孚而代之。不料事机不密，东窗事发，吴佩孚虽然出于稳固军心等目的，仅将张学颜予以遣散，而未将事情闹大，但自此以后便视徐树铮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时吴佩孚因能征惯战而在北方将领中显得分外醒目，逐渐在曹锟面前有了左右一切的力量。靳云鹏和吴佩孚是山东同乡，又有师生关系，还在政治上经常帮助吴佩孚，于是他便因此成为徐世昌借力打力策略的一个主要实施者。

除了与徐树铮之间势不两立外，靳云鹏其实对段祺瑞也有了不小的意见。段祺瑞在国务总理任上三进三退，但始终担任边防督办（以前为参战督办），而靳云鹏即便在组阁之后，也还兼任边防军教练处处长一职。加上他们之间固有的师生关系，段祺瑞在靳云鹏面前便仍以老上司自居，将靳看成下属，经常向靳批转有“交靳核办”字样的文件。

靳云鹏是个喜欢揽权的人，你叫他光有总理的名义，却不能实际当家做主，心里怎么可能会舒服？可是不舒服归不舒服，靳云鹏内阁除他自个儿外，段派人物几乎包办了各部部长的席位，这些人皆唯段祺瑞马首是瞻，靳云鹏在内阁里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

靳云鹏虽想摆脱故主，背着段祺瑞另搞一套，但出台的相关措施要么在阁议时通不过，要么被阁员们提前透露给了段祺瑞。

一个师生关系，把段、靳套得很紧。靳云鹏身为现任国务总理，在段祺瑞面前却还得守学生规矩，毕恭毕敬，而老段也始终把他当小学生一样看待，不太讲究什么礼数。有一次，得知靳云鹏向外界透露了“参战军”的秘密军费来源，段祺瑞立即把靳云鹏叫过去加以斥责，警告他“不要挟外援以自重”。

靳云鹏不敢公开反对“太上总理”，便处处拿徐树铮来借题发挥，经常对外表示徐树铮如何嚣张、如何跋扈，其主张又是如何荒谬，态度是如何固执。当然，最主要的是对他本人的攻击和“陷害”。

靳、徐逐渐发展到了见面不说话的地步。在一次会见客人时，靳云鹏直言不讳地说：“徐树铮在老总（段祺瑞）左右极力离间我和老总的关系，并百般陷害我，我要用拳头对付他。”

清君侧

靳云鹏的“拳头”就是尚远在湖南的吴佩孚。在靳云鹏的暗中鼓动和指使下，吴佩孚接受了西南方面六十万元的运动费，随后便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苦不堪言”为由，一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撤防北归。

吴部如果一撤，湘南空虚，南军必然乘虚而入。同时在吴部撤至北方后，直系兵力猛增，对京师也是一个威胁。皖系的西北军当时主要布防于北方，并无多余兵力接替湖南前线。作为暂时缓和之计，有人建议干脆改西北军为京师警备队，仍由靳云鹏指挥，归陆军部直辖，徐树铮则率其中的两旅南下援湘。

这一建议马上遭到曹锟、吴佩孚的反对，徐世昌、靳云鹏便以也此为由，对建议不予采纳。

段祺瑞起先想要用拖的办法来阻止吴部北上，后来见拖不下去，又计划撤换动摇于直皖两系之间的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吴光新继任，并令吴光新部移师河南。

河南居南北要冲，京汉线纵贯其间，乃吴佩孚所部北返的必经之所。如果段祺瑞的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就可以成功阻止吴部北返。

徐世昌、靳云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待吴佩孚北上“勤王”，自然不能同意段祺瑞的做法。徐世昌首先拒绝罢免赵倜，声称：“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靳云鹏也采取消极抵制态度，说：“赵周人（时任河南督军赵倜，字周人）在河南干得好好的，我怎么能够无缘无故换掉他呢？”

由于段祺瑞事先已跟靳云鹏打过招呼，所以靳云鹏的这一态度大出段派意料，一些段祺瑞的部下便公开讲，靳云鹏已经背叛了段督办（段祺瑞）。

在徐、靳的坚持下，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将河南易督一事推迟办理，而这一事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反而将赵倜逼上了梁山——这位豫督本来还想在直皖两系之间左右逢源，现在见段祺瑞要撤他又没撤得掉，遂马上改变中立态度，通电“保境自存”，实际倒向了直系一边。

见吴佩孚执意北返，赵倜又要大开绿灯，段祺瑞急了，他干脆直接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要求曹锟阻止吴部撤防，同时又以陆军部的名义对吴佩孚下达命令：在中央未有明令之前，不得擅自行动。

曹锟、吴佩孚在已得到徐、靳鼓励和默许的前提下，选择了对任何北京政府命令都置之不理。经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及其曹锟本人安排，平汉铁路的火车几乎全部被集中起来，专门用于运送吴部北上。

看到吴佩孚撤离湖南，张敬尧开始还松了口气，以为再无人跟他抢湘督这把交椅了。孰料吴部前脚一走，湘军后脚就杀了过来。

张敬尧其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相当于皖系里面的一颗老鼠屎。他的部队军纪极坏，督湘期间，不仅个人巧取豪夺，兄弟姐妹也横行霸道，湘民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湘军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三千余杆子弹奇缺的旧枪，但在当地百姓的支援下，照样将号称“十万大军”的张部打得落花流水。

张敬尧急忙向北京告急，然而徐世昌在抛给他一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便听任其被南军所痛击。到张敬尧兵败退入鄂境，他却又板起脸来，下令将张敬尧撤职查办，张部残余也被鄂督王占元或改编节制，或缴械遣返。

张敬尧虽然治军无方、名声很臭，但话又说回来，在皖系之中，他也已经算是一员骁将了。他的垮台及所部被解决，使皖系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有人甚至认为，直系北返及张敬尧被逐，“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

吴佩孚在率部到达北方后，即将部队分别进驻于郑州至保定一线的各军事要地。接着，在接见记者时，他又进一步挑明了北上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要“清君侧”，“远小人”：打倒徐树铮，推倒“安福系”。

段祺瑞当时还没考虑到直皖战争那么远，但张敬尧痛失三湘，已经验证了他先前关于南军将会乘机长驱直入的担忧，他对吴佩孚不听命令、擅自撤离湘境北返感到异常愤慨，而吴佩孚所谓的“清君侧”、“远小人”，则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他对曾毓隽说：“徐树铮并未见任何发端或举动，而吴佩孚自由行动，政府不加惩戒，如是还有黑白之分吗？”

段祺瑞极力促请徐世昌、靳云鹏下令，要求将曹锟、吴佩孚予以革职拿问，并提出如果继续置之不理，听任这二人违法乱纪，政府将不成其为政府，威信必然扫地以尽。

要是以前听到这些话，徐世昌可能还不得不嗯嗯啊啊地应付，如今可不同了，“勤王之师”就在眼前，还怕你老段不成?

太上总统

徐世昌的嘴脸如此，有人又告诉段祺瑞，说其实吴佩孚就是徐大总统引来的，为的是重整直系旗鼓，对抗皖系的军人势力。段祺瑞听了大为惊讶，他认为他从推举徐世昌当总统之日起，一直强调地方必须服从中央，不说全都是为徐世昌着想吧，客观上总是有利于总统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威。他实在想不通，徐世昌为什么要反过来把矛头对准自己。

段祺瑞对左右说："我推重此公（指徐世昌），他这么做，跟自己掐自己的喉咙有什么区别？"

徐世昌在选择让靳云鹏组阁时，曾征求过段祺瑞的意见，可以这么说，没有段祺瑞，靳云鹏不可能当到总理。可是令段祺瑞郁闷的是，靳云鹏居然和徐世昌保持一致，也对他采取了阳奉阴违、消极抵制的态度。

一个是看好并支持的总统，一个是得意学生兼心腹亲信，段祺瑞绝难想到有一天这两人会如此对待他。一气之下，他表示此后"不管闲事"，随后搬出京城，住到京郊的团河去了。

团河是清代皇帝打猎时的行宫，行宫内只有一个大殿可住。段祺瑞就住在大殿内，副官用木框钉上白细布，将大殿间隔出卧室、餐厅、客厅、浴室以及打牌下围棋的大小房间。大殿两旁还各有一排平房，主要由随从及卫队人员休息居住。

除西北军外，驻于南苑的第九师、第十五师也都属于段祺瑞的边防军部队。南苑跟团河仅七八里路，段祺瑞住进团河后，魏宗翰和第

十五师师长刘询便都移至团河办公住宿，这样平时既能陪着段祺瑞打打麻将散散心，也可以给失意的老段壮一壮声威。

靳云鹏虽然早已与段祺瑞貌合神离，并且站到徐世昌方面一起暗中倒段，但在表面上仍需维持与段的师友关系。在段祺瑞到团河的第三天下午，他就赶来谒段。

段祺瑞正在同魏宗翰、刘询等人打麻将，听说靳云鹏到了客厅，便没好气地来了一句："他来找我干什么，这个地方也归他管吗？"说完照样打牌，但是鼻子已经有些歪了。

半个小时过后，负责禀报的副官怕段祺瑞忘了，又特意提醒他："靳总理还在客厅内等着见总理（指段祺瑞）呢。"段祺瑞还是置之不理，说："叫他等着吧！他愿意等，怨谁呀？"

四圈牌打完，魏宗翰劝说道："靳总理等了很久啦！他既是来了，总理还是见见他为好。他是总理的学生，有什么话不可以和他说呢？"

刘询也跟着从旁解劝。段祺瑞这才勉强踱到客厅，他一进门就厉声对靳云鹏说："你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你也要管吗？"

靳云鹏站起身，赔着笑脸道："我怕老师在这里住不方便，特来看望。"

段祺瑞听罢，哼了一声："你心里还有我吗？你应该想一想，你和谁近哪，不要上人家的当！"

"师恩天高地厚，此生难忘。"靳云鹏忙解释说，"我和各方面礼尚往来，还不是为了老师领袖群伦的地位，以便联络大家都来拥护老师。我没有别的意思，流言止于智者，请老师勿信小人离间的话。"

段祺瑞并没有被他的巧舌如簧所迷惑，而是直奔主题："你是陆军总长（靳任总理兼陆军总长），吴佩孚的第三师归陆军部直辖。他不听节制，力图破坏中央的统一政策。你先之以放纵，继之以包庇，法纪荡然，风气日坏。试问，中央的威信何在？我的领袖地位（指北洋领袖）何在？"

靳云鹏既不肯照段祺瑞的意思做，却也不敢当着面顶撞自己的老师兼老上司，只得默默聆听，之后便告辞而去。

靳云鹏走后，徐树铮来见段祺瑞，知道靳云鹏曾经来过，他立即对段祺瑞说："靳云鹏通敌有据，老师姑息养奸，此人不除，必有后患，老师悔无及矣。"

段祺瑞知道徐、靳早已势同水火，他生怕徐树铮做出过激举动，连忙予以制止："你不要胡闹，没有你的事。"

段祺瑞虽然对靳云鹏十分失望，但实际还将他当成自己的学生，而他这种做法，恰恰又进一步刺伤和惹怒了靳云鹏——想想看，一个堂堂的国务总理，大老远巴巴地去看望一个人，结果愣是让对方晾在客厅里一晾就是半天，见了面还要挨一顿训斥，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去看望的这个人是现任总统倒还罢了，问题是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督办，一个"前前总理"！

在靳云鹏看来，段祺瑞岂止是自居"太上总理"，简直已经升级到了"太上总统"。他回去后越想越气，遂命令秘书处替他草拟辞呈，决心用掼乌纱帽的方式来挽回一点丢掉的面子。

正式递交辞呈之前，靳云鹏再次前去谒见段祺瑞，自称有病不能办事，只好辞职让贤。段祺瑞听了丝毫没有慰留之意，他冷笑一声道：“你果然有病，暂时休息休息，倒也无所谓。只不过，将来你可不能说是有人排挤你，让你干不下去，被迫辞职的啊！”

靳云鹏本意是要将老段一军，不料反而自讨没趣。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家就把辞呈交给了徐世昌。徐世昌正要用靳反皖，哪里肯放其离去，在极力慰留的同时，他还对靳云鹏说了一句妙语：“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理他做什么？”

靳云鹏一连交了四个辞呈，徐世昌才勉强准假十天，其职务暂由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

靳云鹏对反皖确实非常关键，他在写辞呈的同时，就暗中通电吴佩孚，告知了这件事。他这里辞呈一递，那边吴佩孚马上以追悼阵亡将士的名义，在保定召集各省师旅长开会，准备掀起新的风暴。

第九章　悔青了肠子

在徐、靳一手挑起的新直皖冲突中，直军仅仅是先过河的卒子，在它后面，赫然还有一个以“三督为重”的十三省反皖同盟。

“三督”分别是直督曹锟、奉督张作霖、苏督李纯。以曹锟、李纯为代表的直系素来都是皖系的冤家对头，张作霖和他的奉系本是徐树铮为皖系拉来的盟友，可惜的是，在上次南北战争结束之前，张、徐就闹翻了。在和奉军分家时，徐树铮除留下两个旅作为“参战军”乃至日后西北军的家底外，又把奉军的服装、粮秣拿去不少。在徐树铮想来，张作霖乃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草莽英雄，一定有些江湖豪气，不会在这些方面和他斤斤计较，殊不知张乃“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一点一滴都会记在账上，徐树铮此举只是加深了二人的矛盾而已。

其后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令张作霖对他有了防范之心。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一向过从甚密，便趁此机会对张作霖吹风，说徐树铮在西北发展势力，意在由西蒙直捣东蒙，夺取被奉军视为后路的吉、黑两省。张作霖听后，对徐树铮的敌意更甚，也由此成为反皖同盟中的重要一员。

债务

包括张作霖在内，十三省反皖同盟的形成过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段祺瑞、徐树铮为他们曾经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必定要偿还的“债务”。

赵倜就不提了，他在反皖同盟尚只有七省时加入，七省同盟一下子成了八省同盟。尔后反皖同盟的雪球之所以越滚越大，则多与徐树铮有关。

段祺瑞几度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就全国各地的督军来说，有关请饷、领械、编制队伍……几乎没有哪一件事不要通过陆军部，而这一切都必须徐树铮答应才能算数——如果直接向段祺瑞请示，他总是说：“找又铮去。”

徐树铮这个关口不通过，就意味着什么事也办不成；而只要徐树铮一点头，即使段祺瑞不知道，也能如愿以偿。无形之中，徐树铮不知为自己树了多少敌。

徐树铮在具备过人能力的同时，也有气量褊狭、不能容人的一面，有人评价他“成见太深，自信太强”，可谓入木三分。因为这一性格缺陷，他又额外得罪了许多人，甚至有很多将领、政客本属于段幕或打算投段，也被他逼得只好另找出路，加入了反皖同盟的行列。

张志潭在段幕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人幕僚。冯国璋当总统时，他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继王士珍之后重任国务总理，遂又任命张志潭为院秘书长，明令已经发表，张志潭也已到院接事。那时徐

树铮正在天津，一个电话就把张志潭叫过去，当面把他训了一顿，说：“上次你当秘书长，不听我的话，这一次你不用到任了。”

张志潭解释说昨天已经到任，可是徐树铮却让他马上呈请辞职。张志潭知道惹不起徐树铮，只好当面写了一个辞呈交上来，说：“我暂时不回北京了，请你代我交了吧。”

徐树铮立即收下辞呈，并发电报给段祺瑞，说张志潭乃是张国淦的死党，和总统府互通声气，决不可以当秘书长，“我已叫他呈请辞职了”。

张国淦就是黎元洪时代的那个“千年和事佬”，其实也不能算是总统府方面的人，只是徐树铮对他抱有成见而已。段祺瑞对徐树铮的说法本不以为然，但他在公事上很少有不依着徐树铮的，听说张志潭的辞呈也交了，就没太当一回事，说：“不让他来就不让他来吧。”

张志潭虽然是自己递交的辞呈，可是刚刚到任一天就辞职，还得另换别人接替，总是说不过去，于是段祺瑞就安排了秘书方枢暂代。方枢亲眼见到了前任秘书长的悲剧，从此以后就是徐树铮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徐树铮诱杀陆建章后，方枢即奉其命以政府名义写了枪决令，一丝一毫都没敢犹豫。

徐树铮如此行事，效率固然高了，但也极容易给自己制造仇家和设置定时炸弹。张志潭就是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由于对徐树铮怀恨在心，他就倒向靳云鹏，平时常将皖系内部的情报透露给各省督军，对反皖同盟的捏和起到了一定作用。

还有想主动投段而不成的。比如吴光新下面曾有一个叫李炳之的混成旅长，因为和吴光新闹矛盾，辞职不干了。他是段祺瑞的学生，

于是就来找段谋事，段祺瑞表示同意，批了一个“交陆军部任用”。徐树铮看到批文，随手写上“此人无大用处”，就把李炳之的事给搁浅了。后来还是靳云鹏派他为将军府参军，他才找到差事。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炳之很快也走到曹、吴那边去了。

吴佩孚保定集会，其实就是十三省反皖同盟的一次大示威，在会上，他们向皖系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要求予以满足，其中核心的两条是解散安福国会以及罢免徐树铮。

消息传出，京师震恐。徐世昌虽然暗中支持反皖，但他本人就是经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可以说无安福系，他就当不上大总统，而且这时西北军第一师又与吴佩孚的直军第一旅形成对峙，气氛相当紧张，战火已是一触即发。

拨了半天火，却发现火有可能会烧到自己，徐世昌心里有些发毛了。他赶紧给曹锟、张作霖、李纯下达电令，要三督入京共商大计，实际是希望说和各方，以便不让事端越出自己可控制的范围。

收到徐世昌的命令，李纯称病告假，曹锟则推说要抚慰归来的部队，不能轻离保定，最后欣然赴约的只有张作霖一个。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打着“调停时局”的旗号，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乘专车抵达北京。

对张作霖来京的目的，徐树铮看得很清楚，他认定靳云鹏与曹锟、张作霖早就“狼狈为奸”了，现在张作霖名为调停，实质是要暗中窥探段祺瑞的动静以及袒护曹锟。

徐树铮急忙到团河找魏宗翰商量，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张作霖肯定要来团河见“老总”，十五师可就近派兵埋伏在团河附近，将张

作霖截住和扣留在团河。

按照徐树铮的设想，如果扣张成功，既能断绝曹、张的联合，又可以使曹知所警惧，俯首听命。

魏宗翰却觉得徐树铮过虑了。在他看来，张作霖虽然与徐树铮已经撕破了脸，但和“老总”并没有到这种程度。

对等条件

就私人感情而言，张、段其实一直相处得不错。从前张作霖每次来京，都要到段公馆和段祺瑞打牌，而段祺瑞对他同样是另眼相看。段祺瑞有严禁收礼的家规，即使是徐树铮、曾毓隽、靳云鹏这样关系相对亲密的部属幕僚也不例外。每年段祺瑞过生日，众人要表示表示，亦只能自行集资，每人拿出三五元钱交给段公馆的厨师，预备两桌酒席，凑一个热闹。若说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就是曾毓隽、靳云鹏还曾送过几盆花，给府内作为点缀。

段祺瑞对张作霖的另眼相看之处在于，张作霖每年春节都会送来黄羊、人参等一大堆关外特产，段祺瑞先是不收，张作霖的副官再三请他赏收，他才勉强收两条江鱼，而这对于段祺瑞来说，已经是给了莫大的交情和面子了。

还有一个例子。几年前张作霖进京和段祺瑞谈话，正好段祺瑞六岁的小女儿由女仆领着到后院闲逛，逛着逛着，小女孩儿自己跑进客厅，来到了段祺瑞身边。段祺瑞便指着张作霖对她说：“这是张督军，你来见见。”

论辈分，段祺瑞要高出张作霖一辈，所以张作霖马上对小女孩儿说："你叫我张大哥。"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这是一点见面礼，你拿去买糖吃。"

段祺瑞没有按通常的习惯拒收，而是对他女儿说："你留着买点东西吃吧！谢谢你张大哥！"

如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老段非常看重和张作霖的关系，为此不惜打破自己所定的规矩，为其网开一面；而张作霖一直以来给段祺瑞和除徐树铮外的皖系人员的印象是，他也很重视维护与老段的关系，并没有像徐树铮所说的那样，已经与曹锟"狼狈为奸"。

参与"西伯利亚干涉"的"中国支队"属于魏宗翰的部队，在魏宗翰前往海参崴慰问"中国支队"时，直皖矛盾已经尖锐化。段祺瑞便命令魏宗翰借慰问之机，在路过沈阳时观察张作霖对曹锟的态度。

魏宗翰到沈阳后，张作霖一再向他表示尊重段祺瑞，拥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决不会偏袒曹锟。张作霖还说直皖系相争是两虎相斗，大者伤小者亡，对北洋实力俱有损伤，至必要时，如果段祺瑞同意，他愿以中立的资格出头调解。

离开沈阳时，张作霖的部将吴俊升到站为魏宗翰送行，并赠送两麻袋高粱米，礼数非常周全。接着魏宗翰车抵锦州，驻防锦州的张作霖之子、旅长张学良不仅亲率官兵到车站列队致敬，还亲自上车对魏宗翰说："我父亲要我来给魏老伯请安。"

张学良走后，魏宗翰对部属们说："现在看到张学良对我的态度，更可以相信他父亲的话了。"

慰问之旅令段祺瑞、魏宗翰对张作霖不偏不倚和愿意调解的立场均深信不疑，因此魏宗翰不同意扣留张作霖，他向徐树铮表示：“我看张作霖能维持其中立地位。”

徐树铮仍然坚持说：“张作霖见利忘义，狡诈多端，绝不可靠。”魏宗翰见状认为事情太大，他不能做主，必须请示段祺瑞。第十五师师长刘询也同意魏宗翰的意见。

段祺瑞性情耿直，对人对事喜欢直言不讳，向来不主张采取阴谋暗杀的手段。即便他事先知道张作霖与己为敌，也只会当面指斥对方，而不会想到扣留对方作为人质。这也是徐树铮先找魏宗翰，而不是直接向段祺瑞建议的原因。

稍后当徐树铮不得不去请示段祺瑞时，段祺瑞果然不同意。他还责备徐树铮：“各方树敌，非厚道载福之道，应当力戒。”

第二天上午10点，张作霖即在北京谒见徐世昌，随后驱车到团河拜访段祺瑞。

张作霖此行表面是奉总统之命，调停直皖争执，看上去不偏不倚，其实屁股是完全坐在直系这边的。他在谈话中表示，只要段祺瑞接受反皖同盟条件中的三项，就可以不解散国会。这三项分别是：取消中日密约、拥护靳总理以及撤换徐树铮。

对三项条件，段祺瑞一一进行了权衡。他在当国务总理时虽然向日本借了很多款，但并没有什么密约，吴佩孚所谓的“取消中日密约”，与他一贯的高调相符，其实质不过是要以此对皖系进行要挟和攻击罢了。既然原本就没有密约，取消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在段祺瑞看来，靳云鹏完全是自愿辞职，也没有谁对其进行逼迫。他对张作霖说：“靳翼青（靳云鹏的字）是真心真意要辞职，何必非为难他不可？换个别人，也可以商量。”

三条之中，唯有撤换徐树铮，让段祺瑞觉得难以接受。在段祺瑞看来，徐树铮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最近又取消了外蒙古自治，提高了中央威信，怎么会没有功反而有过呢？他实在想不通有什么理由要撤换徐树铮。

段祺瑞最后对张作霖说，可以开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一职，改任其为远威将军，留在北京办事，只不过他还有一个对等条件，只有这个条件满足了，他才会全部做出妥协。

分赃

靳云鹏为什么要背叛皖系，从段祺瑞当时的理解，似乎只是靳想抛师弃友，另立门户，他还不知道靳云鹏其实就是吴佩孚北返的主要促成者。

因为不了解吴北返的内幕，段祺瑞就把吴佩孚认作了祸首。他认为，要不要撤换徐树铮，要不要挽留靳云鹏，中央自有权衡，你吴佩孚一个小小师长，怎么可以在外面越俎代庖，过问中央大计？此风一开，以后中央政府威信何在?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挑战中央权威早非一日，段祺瑞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南北统一之梦是怎样终结于此人之手的，甚至于若没有吴佩孚从中搅局，他很有可能不会那么快就结束总理生涯，皖系也不至于出现在这种局面。

段祺瑞列出的对等条件相当于同归于尽："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吴佩孚是直系和反皖同盟的当红炸子鸡，怎么可能拿掉？张作霖只好姑妄听之，但他心里很清楚，段祺瑞就是不愿撤换徐树铮罢了。

张作霖与段祺瑞谈了一个小时后即离开团河。路上正好碰上来团河的徐树铮，徐树铮随身只带了一个副官，看到张作霖的车队，他首先下车，接着张作霖也下了车。

二人握手寒暄，徐树铮说："大哥你见着老总了吗？"张作霖答："已见着，很好。"各自应付一下后即上车分头而行。

张作霖来团河算得上是戒备森严，除他自己的专车外，身后还跟着两辆汽车，车上满载穿灰布大褂、暗藏手枪的卫士，张作霖的部将汤玉麟据说能双手打枪且可命中飞鸟，此次也化装成卫士随行。段祺瑞的卫队在团河大殿两旁架着机枪，本来只是例行的警卫措施，但传出去，外界就以为张作霖在团河遇险而且成功脱逃了。

虽然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但当张作霖驱车到达保定时，仍被曹锟、吴佩孚当成了从敌营中逃出来的英雄。晚上，曹锟为张作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十三省代表尽皆与席，张作霖则被推为首席。

席间吴佩孚发言最多，而且照例还是旁若无人式的高谈阔论，他说道："内忧外患，都是安福祸国，小徐擅专！"

张作霖坐在上面，却是越听越别扭——现在大家都是关起门来说体己话，又不是约见记者或发电报稿，用得着这么装正经吗？难道你敢说你反皖不是因为老段不让你做湘督，而纯粹是忧国忧民？再者说

了，十三省代表皆在，你上司曹锟也在，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大话欺人?

张作霖从奉天老远跑来，可不是为了听人给他讲课，而是来“分赃”的！先前他听说吴佩孚如何如何了得，但一见面却印象很差。

众所周知，吴佩孚是曹锟的主心骨，直系实际上由吴佩孚说了算。张作霖也不好把自己的不快直接表露出来，于是他就趁吴佩孚信口狂言之际，侧过脸去问曹锟：“三爷，咱只问你一句话，边防军人数比你多、兵器比你好。这个仗，你能打吗？”

曹锟朝吴佩孚望了一眼，才断然答道：“能打！”

“你有把握？”张作霖又追问了一句。

“三爷”还是望着吴佩孚：“子玉（吴佩孚的字）说有把握，那就是有把握了。”

张作霖马上打断吴佩孚的发言，先让他坐下，然后才对曹锟说：“既有把握，那就得打。咱们这会儿别讲大道理，先商议该开什么条件。”

张作霖知道曹锟等人绝不会认同段祺瑞的“同归于尽”，便弃之不谈，只让众人自开价码。一帮人顿时都来了兴致，价码也越抬越高，甚至商议要“杀徐树铮，毙段祺瑞”。吴佩孚认为仅此还不够，于是决定第二天继续开会。

第二天议决了七条办法，“杀徐树铮，毙段祺瑞”因为与会者自己也觉得做得太绝，最终没有被包括在这七条之中，而代之以“罢黜徐树铮”。在此之前，张勋因复辟失败之恨，也要求加入反段阵营，并曾托

张作霖帮他官复原职，张作霖临时想到这一节，便又提议把“开复张勋原官”加进去，作为办法中的第八条。

张作霖认为八条办法跟自己的设想很接近，会议结束后，他满意地对曹锟等人说：“吴佩孚这小子真不错，我一定帮忙。”

我还怕他吗

大概没有一个调停人会像张作霖这样，不“调停”还好，一“调停”，曹锟方面的条件反而变得比保定会议时更加苛刻了。当张作霖带着八条办法再回团河找段祺瑞时，段祺瑞自然很不高兴，他表示除其中的靳云鹏复职以及撤换曾毓隽等内阁三总长两项不成问题外，余者皆予以严词拒绝。

张作霖立刻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说：“不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撤换王揖唐，不罢免徐树铮（八条办法中的核心三项），曹吴是不肯罢休的，吴佩孚在保定会议上早已有声明在先。”

“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罢了，居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这还成什么体统！”不提吴佩孚便罢，一提吴佩孚，段祺瑞分外激动，“他（指吴佩孚）要不服，大可以和我兵戎相见，决一雌雄。我还怕他吗？”

张作霖悻悻地说如果段祺瑞不能答应八条办法，他就不能再负调停人的责任了，但会永保中立以固边疆。临行时，他还声言日后如果还有需要他奔走之处，仍愿遵命办理。

张作霖随即辞出。段祺瑞送至殿门，目视其上车后才返回。

张作霖到北京向徐世昌告辞，准备回转关外。徐世昌赶紧拉住他，恳请他再到保定去和曹、吴做最后的接洽。

张作霖给徐世昌这个面子，便又到保定去了一趟。曹、吴一听段祺瑞不肯就范，态度也同样强硬：“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换王揖唐，还可以通融。如不罢免小徐，决不能承认。”

吴佩孚自命文武兼资，一向不可一世，也从来不曾真正把段祺瑞这样的“老朽”放在眼里。他说：“老段要和我们兵戎相见吗？他倚仗有日本的后台，想凭借日本的势力吓唬我们，我们堂堂中国男儿，是他吓不倒的。我们正准备在疆场上和他见面呢，看看到底谁是孬种。”

张作霖最反感吴佩孚喋喋不休的书生腔调。虽然曹、吴都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过，不打则已，一打必赢，可要真打起来，孰胜孰败还是件说不准的事，毕竟西北军的装备和官兵素质摆在那里，谁也不是吃素的。

为了赶紧回去调兵遣将，做好应付大战的准备，张作霖以调停失败为由，匆匆返回奉天去了。

对于兵戎相见，吴佩孚早有准备，可是段祺瑞却没有做好充分的计划和准备。他之前竭力阻止吴佩孚北返，也主要是考虑南军会乘虚而入，根本没有想到吴佩孚敢于直接发难，总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吴佩孚与徐树铮一样都是秀才出身，平时以吟诗作对为能事，就在他率部从湖南撤防经过武昌时，曾写了一首五言古诗，其中有两句是：“不图辇毂下，妖孽乱京畿。”

西北军参谋长张藻宸在报上读到了吴佩孚的这首诗，反复吟诵之后，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对自己的同事说："吴佩孚这次回师北上，显然是向我们宣战。何以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位同事的回答相当乐观："他敢与段先生作战，准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等到调停失败，段祺瑞认识到直皖大战已经难以避免，吴佩孚随时将指挥直军由保定北指，这才发现周围形势是何等严峻，而皖系的军事实力也远非原来估计的那么强大。

皖系内部对此也议论纷纷，傅良佐来找曾毓隽商谈，说战则两败俱伤，张作霖对"老总"的私人感情还不坏，如果让"老总"开口，示意张作霖入关武装调停，或者能挽救危局。

曾毓隽听了，便和傅良佐一起星夜乘汽车赶到团河，向段祺瑞说明了他们的想法。此时段祺瑞对张作霖尚抱有幻想，听了觉得不无道理，起码也是一个向直系施加压力的办法。当下，他就写了封亲笔信，用边防督办处的名义，请张作霖入关共商军事，其中也就隐含了请张武装调停之意。

曾毓隽受命拿着信去奉天，车到秦皇岛，段祺瑞就又发来急电，下令沿途截住曾毓隽并让他赶紧回京。原来徐树铮反对这一提议，认为张作霖当初调停直皖时，就声明必须满足八条办法，如今要他帮忙，条件也只会多不会少。

很快，报纸上出现的一条爆炸性消息，让段祺瑞终于明白了寄望于张作霖有多么荒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督联衔发表通电，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即"祸国殃国、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大局、

以下杀上、以奴欺主”。在通电中，三督声称一定要“谨厉戒行”，“扫清君侧”。

看了通电，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张雨亭（张作霖的字）分明是跟曹、吴沆瀣一气，通谋倒皖，甚恨自家瞎了眼，还把他当调停人看待！”

此风万不可长

三督明着只是“清君侧”，但矛头所向，毫无疑问都是段祺瑞及其皖系。到了这个时候，皖系其实已无退路，要么迎战，要么被清算，可是皖系内部仍然和战不定，甚至有些胆小的人还想抛出徐树铮作为牺牲品，以为满足直奉的胃口后就可以万事皆安，只是碍于段祺瑞不敢直接说出来而已。

徐树铮从来都不是一个肯在压力下低头的人。他约齐段芝贵、曲同丰、刘询三名将领，说直皖一战无法避免，战败则罢；若战胜，从直系手中夺过来的直鲁豫三省就是你们的。

三将一听，顿时来了劲头。徐树铮便带着他们去见段祺瑞，表示自愿率兵与吴佩孚一战。

段祺瑞原先就怕将领们不愿打，看到众人都这么积极主动，便立刻应允下来。当天，他在团河召集紧急会议，进行作战准备，皖系的文武将领尽皆与会。

为了进一步提振皖系内部的士气，彰显“大安徽主义”、“北洋正统”，段祺瑞还特地请来毅军统帅姜桂题列席。

姜桂题是安徽人，在当时仍在世的北洋将领中，数他资望最高，其麾下的毅军在清末民国均赫赫有名。段祺瑞对他也非常尊重，平时见着姜桂题，照例都要含笑问一声：“老嫂子可好？”

段祺瑞一向非常严肃，无论对谁都是板着面孔，很少露出笑容，更不会说什么玩笑话。如此亲昵的表现，对他来说绝对是非同寻常的。

姜桂题早年是条汉子，战场上勇猛无比，段祺瑞以为把这位“从长矛子杀到机关炮”的老帅请来，可以让部将们更加热血沸腾，孰料会议却差点儿被他给搅和黄了。

姜桂题是站在徐世昌一边的，他先前仗着老资格，曾跑到保定找曹锟调解直皖之争，结果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老头儿一肚子闷气和表达欲，正没地方发泄呢，段祺瑞恰好为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场所。

在段祺瑞说完开场白后，他摆出北洋元老的姿态，对段祺瑞说：“吴佩孚年纪轻，不懂事，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叫他赔个不是好了。何至于劳动国家的军队，对内开起仗来，让老百姓受罪？”

段祺瑞听了哭笑不得，只好保持缄默。姜桂题还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芝泉，你真要打吴佩孚吗？”

“真要打！”

姜桂题冷笑一声，又问道：“你打得过他吗？”

“打得过！”

姜桂题大概认为段祺瑞也和曹锟一样，不愿自己调解，于是居然开始倚老卖老地当众挖苦起段祺瑞："这年头的小孩子，可比我们老一辈的厉害多啦！芝泉，你不时常说民国是你首创的吗（指建立共和）？你打胜了吴佩孚，中华民国还可以靠你。万一你败了呢，你叫中华民国靠谁呀？"

就在段祺瑞忍无可忍，几乎就要发作的时候，姜桂题却又突然板起面孔，扭头骂起了徐树铮："什么坏事，都是你这个小把戏闹出来了！"

徐树铮不敢说什么，段祺瑞忙为他解围："不管怎样，又铮总是帮着我的。"

姜桂题年纪一大把，还挺敏感，一听就来了火，认为段祺瑞语带双关，是说他不是自己人。当下他勃然色变，站起身就走，一边走一边气呼呼地说："那你把我请来做什么？"

对把这个姜老爷子请到会场，段祺瑞简直悔青了肠子，然而更让他悔青肠子的恐怕还是当初推举徐世昌为总统的决定。

在发现直、奉两系已经联手向皖系发出挑战之后，徐世昌决定公开偏向直系。1920年7月4日，他首先拿徐树铮开刀，发布命令，特任徐树铮为有职无权的远威将军，同时免去其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务，西北军也着即裁撤，所部由陆军部接收办理。

段祺瑞对徐世昌的这道命令极其气愤。他赶到总统府，当面质问徐世昌："又铮有功不赏，还免他的职，岂不令人寒心？"又说："将领不受约束，妄干国政，此风万不可长。"

总统命令已经下达，质问也是多余的。面对直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主动发起反击成了段祺瑞的必然选择。7月8日，段祺瑞在京召开紧急会议，政府阁员及军政首脑百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发表了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通电，实际上是一次讨伐曹、吴的誓师大会。

会前一小时，曹锟派亲信持其亲笔信来谒见段祺瑞，大意是承认错误，并将约束和处罚吴佩孚云云。看了亲笔信，段幕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曹锟的缓兵之计，万万不能相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开步走也走到天津了

按照紧急会议的决议，由段祺瑞领衔发出呈文，请总统徐世昌下令对曹锟、曹瑛（曹锟的弟弟，亦为直军将领）、吴佩孚革职拿办。

段祺瑞拿着呈文再赴总统府。徐世昌见对方动了真格的，急忙说：“老大哥何必这样生气，又铮的筹边使本来和筹边署办有些叠床架屋，罢免他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等到风头过去，就可以另行安插。请他在总统府委屈一下，闲散一两个月，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

徐世昌已经把屁股挪到了直系一边，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肯罢免曹、吴。他说：“曹、吴克复长沙，久戍湘南，全国舆论都加以称赞。如果有功不赏，还免除他二人的职务，恐怕会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而且可能引起曹、吴等人的巨变，那就小不忍则乱大谋了。”

要说功，徐树铮收复外蒙古之功是当时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连孙中山都致电祝贺，你免他的职，怎么就知道全国舆论不会反对？段祺瑞当然不服。

至于曹、吴巨变，此前两天，段祺瑞已对西北军第一、第三两师及陆军第十五师发出动员令，让各部开往保定，准备对吴佩孚作战——要打就打，谁怕谁来?

段祺瑞愤愤退出总统府，返回团河。由于过分激动，有人看到他“两颧发红，精神颇有错乱之象”。他随后派人告诉徐世昌，说徐树铮被免职一事，他可以不再过问，但曹、吴擅自撤防北返之罪，不能不问。如果徐世昌依然故我，他段祺瑞为维护国家纲纪，“必兴问罪之师”。

迫于压力，徐世昌只得下达明令：吴佩孚撤职，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整顿；曹锟督率无方，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自吴佩孚擅自北返而可以不受政府任何制裁之后，北京政府的权威和命令都已大大贬值。曹、吴对政府的免职令丝毫不予理会，吴佩孚则不仅不交卸军队，反而继续统兵北进，而段祺瑞也已改边防军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做出了“讨伐”的姿态。

7月12日，曹锟联络张作霖、李纯、王占元等人联名发出通电，说段祺瑞是在“施一网打尽之计”，表示“迫不得已，唯有秣马厉兵”。第二天，张作霖又另外发通电进行响应，决定“派兵入关，扶危定乱”。

徐世昌引吴部北上，是要利用直皖矛盾巩固权位，他没料到挑起的火会越烧越大，最终呈蔓延之势。眼看着自己不但不能左右逢源，而且连总统宝座都可能保不住了，徐世昌赶紧又发布一道命令，要各军一律退驻原防。可是这道命令为时过晚，在戏幕已经完全拉开之后，还要不要演、如何演，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按照先前在团河会议上的部署，在正面作战的皖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总指挥为徐树铮，对面直军为曹瑛所部。

归徐树铮指挥的是原驻廊坊的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徐树铮练兵，本来就比较重视实战训练，第二旅的旅长宋子扬及以下一批军官均来自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而冯玉祥的练兵方式又与徐树铮比较像，所以该旅对演习、射击和体力训练就抓得更紧一些，在西北军的四个旅中，第二旅的声誉也最好。

徐树铮到前线指挥，问宋子扬对战事有没有信心，宋子扬当即表示："这没问题，司令下命令，开步走也走到天津了。"

直皖战争在7月14日正式打响。东路开始相当顺利，第二旅于黎明起对直军所驻守的杨村发动进攻，不到两个小时，即将杨村攻下。接着又向前追击，部队在玉米地中捡得军衣，军衣上系着白领章，另外还捡到了两支三八式步枪。这都是奉军的军装样式和他们惯用的枪支，徐树铮这才知道，奉军也已经加入了对他们的作战，为谨慎起见，遂命令第二旅暂时停止前进。

段祺瑞在派徐树铮指挥东路的同时，另授命段芝贵指挥西路作战。可是这一任命实际上是段祺瑞不善用将的一个典型佐证。

段芝贵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以应酬见长的官僚，而非合格的战将。他虽然也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但在校的学习成绩非常一般，以后又长期混迹于宦海，精力主要都用在对付人上面了，他对于军事学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不懂，并且严重缺乏带兵经验。

水平不高，倘若认真一些，没准还勤能补拙。可段芝贵又不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他平日最注重的便是"享受"二字。

据说段芝贵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数次，出门时副官一定要随身带着一大包衣裳备用，而他的副官也以衣饰华丽著称。与穿衣服相比，更讲究的是，段芝贵到哪儿都得带着他的御用厨师，非这位御用厨师做的菜就入不了口。

御用厨师姓李，老被段芝贵这么“惯”着，脾气便上来了。有一次段芝贵在屋内骂他，他也回骂。段芝贵气得将他逐出了段府，可是李厨师一走，段芝贵就因此吃不饱了，于是又将李厨师请回。如是者三，以后段芝贵在屋内小声骂，李厨师就在院内毫不客气地大声回骂，段芝贵还拿他没有办法。

别的总指挥上阵，随其左右的都是幕僚卫队。段芝贵当然也带着幕僚卫队，但对他而言，李御厨和拎着一大包备用衣服的副官或许更让他挂心。为此，他还特地准备了配有餐车及头、二、三等俱全的七节专车一列，上面满载洋酒、罐头、火腿、板鸭、纸烟。知道的明白他是去指挥打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到哪里去度假呢。

偏偏他阵亡了

战争开始后，段芝贵除了偶尔看一看战报外，就是终日打牌。先前张作霖为了麻痹他，曾邀其推牌九。段芝贵赢了四十万元，但张作霖当场没付钱，只在事后派人送来公债票四十万。公债票折合现款连二十万都没有，段芝贵在打牌时便经常唠叨，说张作霖“输不起别来呀，太小气了”。

主帅如此，前方会部署成什么样可想而知。在西路参与作战的主要是边防军第一师和陆军第十五师，作为主力的第一师对作战基本无

准备无计划，部队不但出发时忙乱，开火后同样如此，各部队全部自由行动，以至于开战几天后，营军需官都还未弄清团部在什么地方，更不必说旅部和师部了。皖军的军需本来相当充裕，但第一师连个补给机构都未成立，也没有指派统一指挥后方的负责人。

所幸第一团团长王兴文主动挑起了重担。王兴文原在保定军校讲授战术课程，很有心得，是北洋军中有名的战术专家，而且他指挥作战时也能身先士卒，颇得士兵拥戴。

战事初起时，王兴文用骑兵在前冲锋，炮兵随后掩护，向直军发起了极为猛烈的攻势。第一师的下级军官多为军校学生，虽然缺乏作战经验，但经徐树铮训练整顿后，却颇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势。第一师师长曲同丰自己对此也颇为满意，对人说：“边防军的连排长都是拿戳子称过的，一个个服从命令，勇敢善战，都是好样的。”

直军被打得望风披靡，各部相继后退，溃逃中又被皖军俘去了一个整营。身为前敌总指挥的段芝贵闻讯乐得手舞足蹈，当晚就在作为指挥部的专车上开怀畅饮。

西路战场位于京汉路沿线，直皖两军的主力都集中于这一路，双方都势在必争。吴佩孚见战况不利，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和生力军到前线迎敌，并使用集中火力的战术，对皖军正面发起猛攻。

北方夏天是多雨的季节，直皖开战后几乎天天下雨。北方的道路又多半是凹形，像沟一样，田在上面，路在下面，一下雨道路就成了天然排水沟。直军久在南方，对这样的大雨泥泞满不在乎，照样冒雨赤脚作战，皖军却都穿着雨衣，脚下还怕打滑，战斗力因此大打折扣。

在直军的猛攻之下，王兴文的骑炮组合很快就垮了下来，皖军被迫败退至高碑店，攻势转为了守势。

战场上的吴佩孚确实名不虚传，他紧接着又发起夜袭，双方战斗激烈，王兴文也在激战中被直军的炮弹击中身亡。

第一师的团营长大部分是旧军官，他们具备旧军官的一般特点，即平时爱财，战时怕死。王兴文是一个例外，他一死，直接影响了第一师的士气。师长曲同丰事后哀叹："只有一个王兴文真不含糊，偏偏他阵亡了。"

段芝贵位于琉璃河车站的指挥部也遭到了直军的迂回攻击。发现直军袭来，以师长身份任段芝贵参谋长的魏宗瀚惊慌失措，段芝贵则吓得躺在专车的地毯上，连续大喊："不要乱打枪啊！"

专车急急后退，事后才知道抄袭指挥部的其实仅有直军一个连。

在直军进行迂回时，与第一师并肩作战的陆军第十五师不仅按兵不动，而且还向第一师的炮兵阵地开了炮！

第十五师的前身是冯国璋在南京成立的一个混成旅，士兵多为冯国璋的同乡，军官也与冯非亲即故。冯国璋死后，刘询率部投段，才被编为了第十五师。

直皖战前，有人认为第十五师官兵与直系关系太深，让他们与直军作战恐怕不妥。段祺瑞就派魏宗瀚、陈文运去见刘洵，问他部下是否靠得住，刘询极力保证没有问题。魏宗瀚等人为了坚其心志，便又对他说："事完了，你接曹三爷的事吧！"

刘询自己发誓效忠，又有让他做直督的许诺，段祺瑞深信第十五师不至于发生问题，便放心地将该部部署到了主战场。

战争开始后，刘询倒真没什么大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对部下是否可靠所打的包票。有人说，曹锟曾派人用二百万元的高价收买刘询，刘询不为所动。于是曹锟又派人收买齐宝善、张国溶，一共花了一百二十万元。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但齐、张与直系早有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张国溶为人较有心计，战前还曾去过保定多次。

总而言之，第十五师一部在齐、张的策动下倒戈了，这一突然倒戈给西路皖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除了指挥部因此遇袭外，第一师也遭到直军和倒戈部队的夹击，师长曲同丰连同师部都被直军所俘虏。

没有办法的办法

外界对段祺瑞不善用将的批评，并非仅从直皖战争开始，南北战争时的傅良佐、张敬尧、吴光新都可以说是很失败的例子。

与傅、张相比，吴光新要强上一些。他的学识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但为人脾气古怪，对部下高高在上，同时还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带领军队其实是不太适宜的。段祺瑞将他用在南方战场上也始终没有成功过，皖系多有人对此表示不满。

有一次，陕督陈树藩就趁着打牌的机会脱口而出："老师（指段祺瑞，陈树藩曾是他的学生）一生许多事都误于吴三爷（即指吴光新）。"段祺瑞便说："小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段祺瑞用笑话来解嘲，一方面是承认吴光新不免让自己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袒护和不肯认错的意味。

随着张敬尧早早折戟，皖系在南方所能依恃的就只剩下了吴光新。吴光新时任长江警备总司令，辖有第二十师及暂编一师，约一万多人。随着直皖战起，吴部可随时出兵河南，攻袭直军后路。直系方面于是由鄂督王占元出面，邀请吴光新到武昌赴宴。

环境已经如此复杂微妙，这宴岂是好赴的？吴光新的一些亲信部下极力劝吴光新不要去，恐有意外，吴光新却骄傲自大，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们过于胆小。

第二天，王占元又来电话催请。“胆大”的吴光新带着随从和马弁乘着“楚材舰”过江登岸，上岸后转乘马车直入王占元的官署，随后便被王占元扣个正着。时人讽之：“方为座上客，即做阶下囚。”

以扣押人质的办法来擒贼先擒王，本是徐树铮向段祺瑞所献之计，老段没有用，结果别人倒先用了。吴光新被扣之后，其部投鼠忌器，均不敢轻举妄动，王占元则趁机派各师旅分途急进，采取分别包围和解决的办法，将吴光新所部或缴械解散，或接收改编。

战事进行到此，皖军虽然在西路和南方都落得了个大败的结局，但直军还远不能说已经完全奠定胜局，因为在其他方面，胜的不是直奉军而是皖军——

徐树铮所指挥的东路部队已进入追击阶段，所部距天津仅三十里；边防军第三师在与直军接触后，节节胜利，距保定已不足百里；山东方面的边防军第二师已前进至河北省境内，自此以北，直军只有旧巡防军一旅，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

即便是西路，也不是没有办法转败为胜。比如第一师除师长曲同丰及师部被俘外，全师的人员武器均未受到多大损失，可以说是全师

而退。第十五师损失较大一些，但该师本来也没有对皖军作战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何况魏宗瀚的第九师还尚未投入，完全可以弥补第十五师的战损。

就当时的全面战事来说，皖军不仅没有失败，而且极占优势。如果段祺瑞能够迅速赶到前方，对西路败退部队进行督促整理，必能军威复振，反败为胜不是没有可能。

实际上，皖军的情况使得他们比直军更适宜于持久战。战前安福系为皖军讨伐直军提供了大笔军费，仅在团河会议上，就筹集了五六千万元。战争结束后，直军缴获到的皖军给养之多，令他们也感到无比吃惊：麻袋装着现洋，每五万块一麻袋，不计其数；五十多门各种大炮堆放在地上，炮衣都还没有取下；步枪子弹遍地都是，谁也不知道确切数字。

战争才打了几天而已，如果打它几个月甚至半年，皖军就算熬，也能把直军给熬垮掉。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段祺瑞还愿意把战争继续下去。

段祺瑞军人出身，政治上主张武力统一，然而他基本的思想基础却是儒、佛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事物的标准。从这一角度出发，段祺瑞一向都认为，北洋军无论直皖，都是一家人，是他这个北洋领袖的部下学生，伤了谁都痛心。他“讨伐”直系也是被逼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的只是除去曹、吴这两个北洋的“害群之马”。

直皖战争爆发前，有人曾主张派飞机去保定轰炸曹锟居住地及其他重地。段祺瑞坚决不同意，说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只有曹、吴二人，不能殃及无辜。

段祺瑞发起直皖战争，要的是速胜，这样才有可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将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事与愿违。现在倘若他不想速败，就要抱着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与直军死磕，而这又与他最初的愿望和想法背道而驰。

就饶他一条命吧

据参与直皖战争的人说，这场战争其实打得非常简单，就像举行一场秋操一样，只有西路最初一战和高碑店一战比较激烈一些。可就这样，战争也暴露出了其残酷的一面。除了王兴文等官兵阵亡外，西路皖军在溃退时又发生过惨剧——因为山洪暴发，第十五师及琉璃河车站的溃兵聚集桥上，拥挤难行，正好段芝贵的专车倒行过桥，桥上的很多士兵不是被专车轧死，就是掉进河里淹死。

可想而知，当段祺瑞知道这些情况后，不可能无动于衷。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傅良佐奉徐世昌之命前来对他进行劝说，让他主动通电下野，并下令皖军停止作战。

傅良佐虽然还在段祺瑞左右，但和张志潭一样，早已经成了靳云鹏的人。段派嫡系军人多对靳云鹏不屑，傅良佐原本也站在徐树铮一边，他到湖南做督军，就是出自徐树铮的推荐。及至傅良佐擅离职守，从湖南逃回，徐树铮每次与他见面，都要数落他："不中用，太丢人。"傅良佐因羞转恨，便也转附了靳云鹏。

徐世昌、靳云鹏一体，傅良佐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说客。只是让段下野的话，如果直接出自徐、靳之口，段祺瑞未必会听，出自傅良佐这个"贤侄"之口，效果就不一样了。

通过傅良佐，徐世昌给段祺瑞传达了一个信息：你的定国军总司令系各军拥戴，和你本人无关，只要你肯通电下野，我作为总统，可以保证你本人和部下的安全。

有了徐世昌的这一保证，段祺瑞决定以自己下野的方式，为直皖战争画上句号。1920年7月19日，他发表通电，声明辞去本兼各职，同时解除定国军名义，命令前方各将领即刻停止进攻，并立即退归原防。

因为这一个通电，事前大张旗鼓的直皖大战，不出五天就以直系的胜利结束了。可是段祺瑞想的又实在太理想化了，他的对手不是西方绅士，即便老段已经放下了枪，他们也没有半点要罢手的意思。

在直军占领琉璃河车站之后，王士珍等北洋元老前去求见吴佩孚，打算替双方和解。吴佩孚表面上对这些元老极尽恭维谦和之态，说："让元老们屈尊前来，怎么办，怎么好？我一定尊重元老们的意见。"

他的部下们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大骂段祺瑞，说段祺瑞"扣押直军兵饷，借债卖国扩军"。这些人还说："我们是回防，并没有侵犯别人，他（指段祺瑞）却派队伍来打我们。现在打败了，派几位来了，早干什么去了！那不行。边防军一个也不能留，都得缴械，非把老段抓着，讲讲理不行。"

其实这就是吴佩孚事前布置好的一出戏，意在表示不是他吴佩孚得势不饶人，而是段祺瑞已犯了直军将士的众怒，不打不行。王士珍等人见状只好辞去，临上火车时，他们还恳求吴佩孚："等两天吧，不要前进了。我们一定有办法，让你们消得下气去。"

王士珍等人所乘的火车刚刚开走，吴佩孚立即下令所有部队继续追击，只以暂时不入北京为限。

在段祺瑞发出下野通电后，皖军各部都已受命停止作战，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将领幕僚也已先后逃回北京。他们在京唯一能躲的地方也就是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了。公使团曾经公开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收留亡命徒，但日本使馆顾念段祺瑞执政期间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一直较好，所以还是破例为他们提供了藏身之处。

段祺瑞也可以去东交民巷，但他不愿在这个时候乞求日本人庇护，从而进一步坐实曹、吴等人对他“卖国”的指控，于是便坚持不肯离开府学胡同的住宅一步。

见直军仍不肯罢手，段祺瑞只得又引咎自劾，写了一篇呈文，然后拿着呈文去见徐世昌，表示愿一人承当战争责任。

虽然直奉大战也不在徐世昌的期望范围之内，可是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老段居然落到如此地步，徐世昌还是从里到外地觉得畅快。看完段祺瑞的呈文后，他付之一笑，末了不忘奚落对方一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徐世昌随后派靳云鹏、张怀芝赴津与曹、吴商议如何了局。双方见面后，曹、吴对于段祺瑞、徐树铮尚有余愤，说一定要将二人处死，以绝后患。靳云鹏自然巴不得徐树铮人头落地，但对自己的老师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因此竭力替段祺瑞说情。

曹、吴也知道段祺瑞在北洋的威望，若真的对段下手，难免引起非议，对直系本身也不利。吴佩孚于是笑一笑说：“老段不肯逃走，还像是一个人，就饶他一条命吧！”

曹锟、张作霖和吴佩孚商量下来，向徐世昌提了一大堆条件，除战前的那些以外，又加上了惩办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成员、取消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以及直奉军永驻京畿等更为苛刻的条款。

对这些条件，徐世昌都表示基本同意，只有对于严办段祺瑞一项，他密电曹、张、吴，要求加以通融。

十祸首

1920年7月21日，直奉两军开入北京城，入城的头一件事便是对安福系成员悬赏缉拿。当天下午，段公馆遭到包围，段祺瑞的卫队被缴械遣散，仅留下二十名看门管事的家人。段祺瑞一时羞愤莫名，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幸被家人夺下手枪，才未自杀成功。

此后，段祺瑞不逃不走，坐在家里静候直奉两军对他的处置，而且从早到晚一言不发，无论谁跟他说话，均以摇头作答。

7月下旬，徐世昌先是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的处分令，接着批准免去了段祺瑞边防督办等本兼各职。段祺瑞对此早有心理准备，让他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徐世昌还发布了“安福系十祸首通缉令”，下令对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十人予以惩办和通缉。这是让段祺瑞感到非常难堪的一件事，也意味着徐世昌完全背弃了他在战争结束前对段的承诺。

次年姜桂题去世，尽管这老爷子曾站在徐世昌一边给过段祺瑞难堪，但段祺瑞仍以老友身份前去吊丧。在乘车去姜宅的途中，他忽然长叹一声，对同车的曾毓隽感慨地说：“姜桂题死了，我应当去挥泪哭

老友。可是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如果万一有这么一天，我恐怕没有眼泪哭他。”后来有一次，他更对人说道：“菊人的人品实不足道，他要是死了，我连挽联都不会送！”

段祺瑞过去很少开口讲感情色彩如此浓厚的话，即便在与冯国璋闹矛盾时也是如此，足见他对徐世昌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痛心疾首。

“十祸首通缉令”发布的当天，北京城内的军警、便衣就倾巢出动，在各城门、要道以及东交民巷的出入口设置岗哨，十个人的相片则贴得到处都是，相片旁边还规定了多少不等，多至三万、少则三千的拿获赏格。徐树铮排在“十祸首”的第一名，赏格也是最高的，一旦拿获到案，即赏大洋三万元，徐世昌、靳云鹏及直奉系对他的仇视，可见一斑。

在通缉令发布之前，事先得到风声的这十个人就已逃遁，其中除一人进入华俄道胜银行外，其余均向日本公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并先后被送进了日本公使馆护卫队兵营。他们都曾是政府要员，手头不缺钱，进入日本兵营后，物质生活上并不差，曾毓隽和段芝贵还每人花三千元钱，在兵营里盖了一座楼房，段芝贵住楼上，曾毓隽住楼下。

唯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就是不能自由出入。在他们进入日本兵营后，北京外交部即向日本公使馆交涉引渡。日本公使馆拒绝引渡，但在照会中答应将断绝“祸首”的对外交往及一切政治活动。

“祸首”都是搞政治的，对一个政客而言，没有什么比限制从事政治活动更让他们难受的了。徐树铮首先表现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在

太阳旗下避难的生活将可能遥遥无期，形同软禁一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日本的民族特性之一是崇拜强者，哪怕这个强者曾是他们的对手，或战胜过他们。徐树铮曾在“莫负荒沙万里行”的过程中，将驻库伦的日军逐出库伦，可很多日本人恰恰对他的才干和学问非常仰慕。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军需部门有一个叫小野寺的尉官就是如此，他与“祸首”中的一个人认识，从这个人口中知道徐树铮有出逃的意图，便马上让对方将他引荐给徐树铮，并自愿全力相助。

在研究出逃计划时，徐树铮曾问曾毓隽：“你看这样办稳当吗？”曾毓隽老实回答：有些冒险——谁都知道徐树铮与北京现政府和直奉结怨之深，如果被抓到，别人尚可活命，他绝难幸免。

徐树铮想了想说：“我们避居日本兵营，终非长久之计。过分的冒险固然不可，但为了家国事，一点不肯冒险也是不行的。我决定拼它一下！”

按照计划，徐树铮藏入了一只大号柳条行李箱。小野寺在这只事先买好的行李箱里垫了靠垫被褥，又在箱子上凿了许多气孔，上面用毛笔写一行大字“大日本帝国陆军用品”，借以掩饰。

小野寺利用日本兵夜间换防的机会，带着这只“随身行李”，在当天夜间离开东交民巷，上了前往天津的列车。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来往车站的行李是无权检查的，小野寺因此一路畅通无阻。

徐树铮在途中吃了不少苦头，前后几个小时蜷曲在箱子里，手脚都麻木了。到天津时，他自己爬不出来，得好几个人把他搀扶出来，又替他按摩揉捏了半天，才得以行动自如。

小野寺将徐树铮偷运出兵营是他自己的行为，事前并未得到上级同意，为此他被调回国内，并受到革职处分。第二天，日本使馆被迫以照会的方式，将徐树铮已经逃亡的事实通知了中国政府。

徐树铮是第一个逃离日本兵营的，其逃离过程也最为惊险和曲折。以后随着政局发生变化，其他人也先后以各种方式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或上海的租界地。

折戟沉沙

直皖战争结束后，接下来基本就是一个直奉为刀俎、皖系为鱼肉的过程。皖系军队全部遭到改编或缴械遣散，无一幸免——“边防军一个也不能留”其实就是吴佩孚自己的心声，他在战争中已经看到了边防军的潜力，又怎么可能再听任这样一支军队存在下去?

西北边防军因为徐树铮的关系，更被直奉认为势必除之。徐世昌下令撤销西北筹边使官制及西北边防军，至此，西北军在编制上寿终正寝，其存在时间仅仅只有一年零七个月。张作霖本来还想把被徐树铮“挖”去的那两个旅要回去，但两旅坚持“愿再战不愿缴械，愿改编不愿归奉军”。张作霖见状，便将枪支收走，人员一律遣返原籍。

西北军第三混成旅系徐树铮当初带到外蒙古去的驻军。该旅留在国内的部分率先被缴械遣散，只有在外蒙古的主力被暂时保留。在徐树铮失势之后，原库伦都护使陈毅已重回外蒙古掌权，此人认为徐树铮抢了他在外蒙古撤治上的功劳，对徐树铮及其西北军一直抱有妒恨之意，这时便落井下石，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将第三混成旅“调回内地遣散，以去疑窦”。

北京政府不是不想调第三旅，奈何外蒙古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白俄军队趁中原动荡、无力兼顾外蒙古之机，欲谋夺库伦。发现库伦战事迫在眉睫，北京政府只得对第三旅暂缓内调，将其改为陆军第二十五混成旅，直属陆军部。

这支塞外孤军遭到了白俄军队的大举进攻。旅长褚其祥连电北京告急，并派参谋长及库伦中国商会会长赴京求援。可是求援人员刚刚到京，库伦就已经失守。在白俄的胁迫下，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再次宣布“独立”。

退出库伦的第三旅分途退向祖国，其中退往张家口的全部因冻饿死于途中，褚其祥所率另外一部被苏联红军解除武装，次年，他与几个中级军官由苏军押送，经海参崴遣返回国。在此之前，苏联红军已击破白俄军队，占领库伦，并在库伦成立了由苏联扶持的“蒙古人民政府”。

在徐树铮二返外蒙古途中所作的那首七律上，有一句这样写道：“中原鼎沸谁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相隔徐树铮和西北军出塞仅仅两年，他们做出的努力、建下的功业，就被“中原鼎沸”给覆盖得无影无踪了。

就在褚其祥旅折戟沉沙的那一年，原被派往海参崴参加“西伯利亚干涉”的“中国支队”也撤回了国内。那时他们所属的陆军第九师已被直系改编，师长也换了人。这支同样曾经立声名于外的功勋部队一样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只得在他们所暂驻的吉林牡丹江“就地落草”，接受吉林督军的改编。

往前推一年，1920年春，那时直皖战争尚未爆发。服务于“一战”的“威海卫华工营”准备启程回国，许多华工前去向那位出生于北京西郊海淀，如今已定居于法国的女子辞行。大家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女子说：“怎么不想？做梦也在想！不过一年多来，我向许多同胞问了国内的情况，倒使我迟疑起来。祖国太乱了，人民太苦了，简直是一个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

临别时，女子的眼眶里全是泪水，她一边哭，一边拉着同胞的手说：“我多么盼望祖国统一、独立和富强啊！”

这个希望转瞬就成了泡影。回国后的华工也有很多人被迫卷入直皖战争，他们没有死于“一战”，却死在了内战之中。那位在华工营中具有很高威信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华工朋友和他通了几次信，但直皖战争后去信几次都无回信，可知一定是已经战死了。

中国嗜于内斗的“传统”，仿佛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它骨子里的无可救药！

内斗就像一个在屋内开设的大赌场。在直皖战争的这一局里，皖系是个大输家，“十祸首通缉令”中的十个人都是输家中的一员。照理说，通缉名单上的人应该是最惨的，但实际上不是。傅良佐因为投靠徐世昌、靳云鹏，并替徐世昌劝说段祺瑞通电下野的“功劳”，而受到庇护，没有被通缉。他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事，不料曹、吴却不想饶过他，不久他就被直军给逮捕了。

这个倒霉劲儿！早知如此，还不如跑日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了。傅良佐被抓后，家人行贿二十万元，对方仍不肯放人，令傅良佐又气

又恨。过了一年多，郁郁寡欢的傅良佐患了精神病，这才得以保外就医，但回家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原段幕人员中，只有靳云鹏算得上是赢家。直皖战争结束后，他成了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大红人，1920年8月，他再度组阁，风风光光地做了总理。

官场极品

靳云鹏组阁后，即前往府学胡同面见段祺瑞。又一次见到恩师，靳云鹏的心情颇为复杂，其中既有得意，但也不乏歉疚之情，而段祺瑞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我现在当了老百姓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靳云鹏低着头说："我没有想到局面会演变到这个样子，我很关心老师的生活。学生有不对的地方，还得请老师原谅！"说到这里，他扑通跪倒在地，向段祺瑞请罪。

这一跪把段祺瑞的心跪软了。他长叹一声："唉，你起来！用不着这个样。事已至此，责备你还有什么用呢？"

等靳云鹏起身后，段祺瑞又接着说："你愚而自用，没有我，你能站得住吗？"

靳云鹏不答，只是告诉段祺瑞，自己今后将保证他的安全并负责一切生活费用，然后便告辞而去。

过了不久，吴佩孚进京，也来与段祺瑞见面。不过他穿的是便衣，而且随身只带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兵。段祺瑞并不因为对方掌握

着生杀大权而变得低声下气，他厉声对吴佩孚说：“你来了好极了，我在家里等着你呢，你看着办吧！”

段祺瑞在台上时，吴佩孚恨之入骨，现在成了平民百姓，吴佩孚反而很钦佩对方的勇气和骨气。他一口一个学生，说：“学生久违教诲，不知我师起居饮食如何，时以为念。”

段祺瑞见状，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对吴佩孚说自从歇在家里后，睡眠的时间多了，胃口也比以前好，“方知清闲是福”。

吴佩孚书生意气，在直皖战争前和战争中对段祺瑞及皖系极尽攻击之能事，其攻击的重点之一就是说段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向日本大量借款，借以自肥。这里面本身就有很多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东西，比如有说段祺瑞在合肥老家广置田产，又在东北边境圈占了荒地二十万公顷；还有说他在很多官僚企业中都占有数目不小的股份；等等。

吴佩孚入京后也调查过。一调查就会明白，这些传说与事实相去甚远。实际上，段祺瑞在合肥既无房产也无土地，而且他向来不做生意，所谓圈地占股份皆为无稽之谈。再深入下去，还能发现段祺瑞简直堪称“官场极品”——他不建别墅、庄园，不收贿赂、礼品，不抽鸦片，不打茶围（即过去的逛妓院），更不徇情卖官鬻爵。

在当时的军人、官僚、政客中，能做到段祺瑞这种样子，是比较少见的。吴佩孚本身在军人中也算廉洁自律的典范，在段祺瑞已对直系不存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产生出了敬意。

吴佩孚对段祺瑞说：“老师总兵符国政很久，因不事家人生产，故素无积蓄。学生本‘束脩以上’（即学生向老师馈赠礼物）之意，愿随

时为老师家居提供需要。”

段祺瑞婉拒了吴佩孚的好意，吴佩孚随即辞去。之后曹锟、张作霖也先后到京，他们虽未登段公馆的门，但却派人持“沐恩”字样的名帖，联名给段祺瑞送来了一桌燕翅酒席。段祺瑞无法推托，只得收下，并给了来使一百元赏钱。

客气都是表面的，说到底，新的掌权者们对段祺瑞这个“老百姓”还不是很放心。段祺瑞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北京是不能久待了，于是便携全家搬到了天津。

段祺瑞在任时不贪不占，平时段公馆的日常开支主要由陆军部之类的政府机关负担，比如他家里吃的粮食就是到陆军部去领。又比如，段祺瑞常请棋手来陪他下棋，当然不能叫人家白陪，所以按月还要送给棋手干薪。干薪少则八十，多则一百，加起来每月也在一千元以上，这笔开支同样是由陆军部出。

以往即便下野，段公馆的费用总还是能够得到基本保证。这次不同，一方面，段祺瑞身上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另一方面，他又谢绝了靳云鹏、吴佩孚等人的资助。在全家人都只能单纯依靠以往积蓄维持的情况下，段祺瑞不得不紧缩开支，家里辞退了一些男女用人，棋手也不能再请那么多了。

一门学问

段祺瑞生活简朴，四季穿的都是布制衣服，只有以前去国务院上班，或遇到参加大典，才会穿军服或礼服。他在家里时经常是一件长

衫，头上再戴一顶没有帽疙瘩的瓜皮帽，别人看见，绝对想不到这是权倾朝野、赫赫有名的北洋领袖。

从前做总理或督办时，段公馆请有一流的厨房大师傅，其做菜的手艺比当时北京有名的大饭店，例如东兴楼、福寿堂的还要高，厨房内也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可是这些只有段祺瑞陪客人用餐时才用得上，他自己吃东西其实非常简单，一般都是粗茶淡饭。他还有一个习惯，吃山芋经常连皮一块儿吃，他的妻妾吃山芋是要剥皮的，唯独在他面前吃则不敢剥皮。

要说段祺瑞个人有什么大一些的开支，也就是打麻将时会有输赢，以及下棋要给棋手送干薪了。段祺瑞非常喜欢下围棋，但他的部下僚属多不擅长此道，这是他得从社会上另请棋手陪他下棋的原因所在。退居天津后，尽管家里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请的棋手也因此减去不少，但每天还是有人来陪他下棋。

段家所请的棋手为清一色高手，其中甚至包括顶尖级的，比如有“昭和棋圣”之称的吴清源和民国围棋大师顾水如。吴清源进入段公馆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棋艺。段祺瑞非常喜欢他，常让他陪着下棋，给的干薪也是最高的，即每月一百元。顾水如是吴清源的老师，他当时就已经独步北方棋坛，自然更受段祺瑞的青睐，顾水如也因此曾被延入段幕，并在南北议和时担任了北方代表。

段祺瑞爱下棋，但他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到段公馆对局的人为照顾他的面子，总是要让他三分。段祺瑞赢了就非常高兴，要求再来一盘。一旦输了，也像普通人一样沮丧不已，或者推盘而去，或者将棋子一扔，说：“不下了，不下了！”他一生气鼻子就歪，输了棋鼻子更歪。

高手们的棋艺都比段祺瑞高，如何跟他对局就成了一门学问——陪他下棋，一定要输给他，但一般情况下，只能输一两个子。若输多了，他又会认为你是“屎棋”，瞧不起你，并且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做棋友了。

顾水如是名声在外的围棋国手，他要既做到每战必败，但同时还不能明显让步，使段祺瑞有所察觉，则更加困难，可以说，绝对不比战胜一个同段位的棋手来得轻松。

顾水如为此费尽了心机。他的办法是操纵局中棋形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使己方在没有过于明显破绽的情况下，走向自然崩溃；另一方面又因势利导，使段祺瑞在落子时顺流而下，自然而然地走出杀着，从而一举歼灭他的大棋。

见自己的大棋被歼灭，顾水如还要故作悔恨状，检讨棋局得失，并“诚恳”地请段祺瑞指出其谬误所在。这样，就可以让段祺瑞“赢”得更为踏实放心。

段祺瑞下野后，把好胜心更多地转移到了围棋上，弈必求胜，负则大怒。顾水如很能理解老段的心境，他决定换个玩法，于是便以段祺瑞棋力上升，双方棋力不及为由，要求让子。

最初段让顾两子，顾屡败，又让三子，还是败，直至让到了四子。之后顾水如就不敢再要求段祺瑞让了，因为知道再让，老段就要生出疑心。

让四子后，顾水如不像以前那样一味“输”了，而是先互有胜负，再旗鼓相当。段祺瑞认为自己已让对方四子，对于平局乃至输局也就不会那么介怀。

段祺瑞不介意，别人介意，特别是棋坛的专业人士，他们觉得莫名惊诧：亘古迄今，哪有国手被让四子的？你顾水如这种水平，还能被称作国手吗?

大家坚持要顾水如将败局复盘，以便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顾水如不得已，只好勉强复了两盘。在他复盘时，围观者笑声不断，到顾水如设计棋形变化的“引人入胜”之处时，就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捧腹大笑了。

段祺瑞棋艺不高，他的长子段宏业的棋却下得特别好，已达国手水准，连顾水如在让其三子之后，轻易也下不赢他。可是，段宏业除了棋下得好外便一无是处，而且吃喝嫖赌抽大烟，五毒俱全，简直就是一个乃父的反面。段祺瑞一提他这个儿子就很生气。

段宏业有时也跟他老子下棋。大多数情况下，他会毫不手软，把老段杀个片甲不留。这时候，段祺瑞总是把棋盘一推，指着段宏业的鼻子大骂：“你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就会胡下棋！”

偶尔段祺瑞也会赢，但赢了棋的老段仍然可以把儿子骂个狗血淋头：“下棋是雕虫小技，你连这方面也不行，真是没用！”

段宏业：……

牺牲品

到天津之后，段祺瑞生活上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开始每日吃斋念佛。在他看来，这是对过去自己作为军人，动刀子指挥杀人的一种反省。

为此，段祺瑞还专门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每天早晨起来就焚香诵经，作为照例的功课，以后这种习惯始终没有改变。吃素也是这样，他晚年因夏天贪吃西瓜而闹肚子，最后又发展为胃溃疡，病情持续加重。他的侄子和医生都希望能开荤，以便增加营养、增强体质。段祺瑞誓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未几，果不治身亡。

虽然吃斋念佛，但像老段这种吃了一辈子政治饭的人，要完全做到四大皆空是比较困难的——就算他自己看破红尘，以徐树铮、曾毓隽等人为首的学生、旧部们也不让。

这些学生、旧部有时会来天津看望段祺瑞，他们常说现在国内遍地烽火，生灵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日要收拾这盘残棋，让老百姓过个太平日子，还得老师东山再起不可。

每逢听到这样的话，段祺瑞虽然嘴上不会说什么，但他那严肃的脸上总是多少会露出一丝笑容，显然这些话他还是很听得进去的。

就当时国内的形势而言，段祺瑞的学生、旧部们并没有夸大其词。内战的祸根仍然出在军人直接用武力干政之上，事情还得从直皖战争结束时的“分赃”说起。在直皖战争中，奉军参战兵力不多，出的力也很少，但他们却机缘巧合，得以接收了大批皖军军械，“西北军新购之器械，大多数为奉所得”，这自然令直系感到眼红和心理不平衡。接着划分地盘，直系得到了鄂豫陕赣皖五省地盘，而奉系只拿到一个较为贫瘠的热河，于是奉系又不忿起来。

“分赃”主要由曹锟约张作霖密谈。最初吴佩孚也在座，他一向喜欢说话，一战而胜皖系之后更是扬扬得意、高谈阔论。张作霖非常厌

恶他，便冷冷地对曹锟说：“三哥，今天这个会，是咱们两个人的会，别人不能参加。如果说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也有几个师长呢！”

吴佩孚听后脸色大变，一句话没说就气愤地走了出去。事后他对自己的幕僚说：“他张胡子不要觉得自己不错，赶明儿叫他认识认识我这个师长！我不打到沈阳，决不姓吴！”

直奉相争，首先被拖出来开刀的牺牲品却是靳云鹏内阁。段祺瑞离京之前对靳云鹏说的“没有我，你能站得住吗”，那可绝不是气话，而是大实话——靳云鹏始终没有搞清楚，一手把他培养起来的段祺瑞对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事实是，段祺瑞一失败，靳云鹏对于直奉乃至徐世昌来说就失去了重要性，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也就可有可无了。

组阁不久，靳云鹏就被一度逢迎他的直奉夹在了中间，和徐世昌也有了矛盾，整个人如履薄冰，其处境之难远甚于直皖战前。

靳云鹏内阁中直系势力较盛，内务、交通、财政三总长均为直系阁员。在他们的推动下，国务院通过了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的决定。张作霖一直对吴佩孚表示轻蔑和不屑，这一任命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不久，他便亲自来京，指责直系阁员不配留在内阁之中，并且要求内阁改组。在他和徐世昌的夹击之下，靳云鹏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

靳云鹏自此再未有机会重返政坛。若干年后，段祺瑞在上海病逝，灵柩运回北京安葬，靳云鹏也到浦口迎灵。在专车上，大家鄙视靳云鹏过去背叛了段祺瑞，全车没有一个人和他讲话，甚至卧铺都没

为他安排。靳云鹏自感无趣，便临时下了车，自己重新买票换车返京。

赶走靳云鹏后，根据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又授命梁士诒组成了新内阁。梁士诒是旧交通系的首领，而新旧交通系原先都是皖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内阁一成立，即对直皖战后被通缉的皖系成员予以赦免，同时在军饷分配上，采取了厚奉而薄直的政策。

梁内阁此举又大大惹恼了吴佩孚。正好梁内阁当时应允日本公使，同意向日本借款以赎回胶济铁路，吴佩孚便利用民情，以这件事为靶子，对梁士诒进行猛烈攻击，称他是中国当代的李完用（朝鲜亲日派首脑，被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张邦昌。

梁士诒自然要为自己的行动辩解，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电报战。其间，各省的直系督军们也纷纷通电传檄，为吴佩孚摇旗呐喊。张作霖既为梁内阁的推荐和支持者，也只得出面为梁辩护，指责吴佩孚只会唱高调、说大话，对梁内阁“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攻击”。

吴佩孚本就看张作霖不顺眼，手痒痒得想要揍他，张作霖自投罗网，被他一把揪住，其通电宣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杀尽，以除国贼。”

未几，梁士诒被迫宣布请假，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总理。张作霖脸面大失，一边表示“万万不能使自己所拥护之人被斥去位”，一边以“捍护京畿，拥护梁阁”为口号，拥兵入关，讨伐直系。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战前，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一些人还以为奉军兵强马壮，剽悍善战，若对直系战而胜之，不啻为一张新

的护身符，可是没想到奉军只是徒有其表，很快就被吴佩孚打得一败涂地，败出关外。

生不见面，死不吊祭

经过直奉战争，北京政权由直奉共同挟持变成了直系一家独霸，而曹、吴根本就不把徐世昌这个总统放在眼里。

欲用曹、吴，竟为曹、吴所用，这是徐世昌在使用“借力打力”之计前，打破脑袋都想不到的，不由得“废然自伤，有拒虎进狼之叹”。为了与直系求得彼此相安，他特地让人带话给曹锟：“自此以后，公欲如何便如何，我无成见。”

可惜事到如今，有没有成见都不重要了，人家甚至都不想再让你发表任何意见。曹锟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总统梦”，他表面答应徐世昌的请求，暗地里却以徐世昌是“安福国会”所选总统，所以是非法总统为由，对其进行逼宫。

一天之内，曹锟的部下三次发电报到总统府，问徐世昌走没走，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问到问死你的劲头。

徐世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知道不走不成了。他发出请柬，遍邀各国公使来吃饭，席间从容自若，神情与平日无异。吃完饭，他悄悄告诉一同赴宴的汪大燮：“我将去位，车站已经备好车了。”汪大燮愕然，随即便一个个地跟公使们打招呼，请他们送总统登车。

直奉战争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徐世昌就以通电辞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此后便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

想想政治权力这东西也真是够可怕的。任职总统之前，徐世昌与段祺瑞的关系，虽然比不上冯国璋与段祺瑞那么亲密，但也算是很多年的老友，要不然段祺瑞不会全力推举他上台。至于他和徐树铮，若没这档子事，也仍然会成为诗酒唱和的一对忘年交。可就因为要保住总统的权位，徐世昌与老朋友、小朋友全部反目成仇，并结结实实地坑了他们一把。

如果这样能够真正达到目的，倒也罢了，悲哀的是，临到头来，还被别人窝窝囊囊地赶下了台。更悲哀的是，即便已经同是天涯沦落人，徐世昌、段祺瑞仍旧不相往来。段祺瑞病死上海后，其灵柩经过天津。徐世昌就在天津家中，然而既未往吊，也没有派人到北平致祭，对段来了个“生不见面，死不吊祭”。

虽然段祺瑞曾恨恨地说过，要是徐世昌死在他前面，不会流一滴眼泪，也不会写挽联，但依段的性格及一贯的做事方式来说，这么说不过是气话，他应该不会真的这么做。负责护送段祺瑞灵柩的魏宗瀚为此感慨地说：“若徐先死，段必不如是。徐之逊段者如此。”

从来觉得悲哀的不过都是局外人，局内的可没有一个肯主动申请离开。早在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即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孙中山，从而初步结成了共同反直的三角同盟。

经过直皖战争，皖系一蹶不振，连皖督倪嗣冲都被解职，到天津做了寓公，皖系势力仅剩下浙江督军卢永祥一根独苗。当时上海在卢永祥的直辖范围之内，也是段派嫡系残余的唯一根据地。

卢永祥是山东人，清末时曾为段祺瑞旧部。他性格耿介，与段祺瑞颇多相似之处，平生也最为崇拜段祺瑞，堪称老段的超级粉丝。曹

锟虽说也做过卢永祥的上级，但卢永祥极鄙视曹锟的为人，所以即便在直系势力已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仍拒绝合作。早在直奉战前，他就已通电宣布浙江省自治，不接受北京政府的控制。

吴佩孚原为卢永祥的部下，他曾派代表持亲笔函秘密到杭州谒见卢永祥要求合作，并以副总统之位相诱。卢永祥不为所动，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子玉（吴佩孚的字）到现在还记得我？”最后连信也没有回，只是对那名代表说：“请转达子玉，保全我的人格。”

就地域势力而言，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实际就是粤、浙、奉的三角同盟。在这个同盟中，段系的曾毓隽、吴光新在奉天活动，徐树铮则往返于上海、杭州，为卢永祥出谋划策、整顿军队。

由于段派势力已形同瓦解，卢永祥颇有独木难支之势。于是在直奉战争结束后，徐树铮又秘密潜入福建，打算策动福建督军李厚基独立，以与浙江相呼应。

李厚基系由段祺瑞一手提拔，又是徐树铮的表兄，徐树铮认为策动应该不成问题。不料李厚基却不敢以一隅之地与直系相抗，他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还怕徐树铮久留福建会给他惹来是非，准备即日将其礼送出境。

徐树铮费尽唇舌，也不能打动李厚基，最后急了，对李厚基说：“别看我徐某现在没有一兵一卒，但是我管教你在福建待不下去！”

猪仔议员

此时因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拥护孙中山的许崇智被挤出广东，来闽进行活动。徐树铮和许崇智是士官同学，就乘机和他取得联络，同时争取了驻兵于福建的老部下王永泉。

在徐树铮的谋划下，许崇智、王永泉合力夹攻省城福州。李厚基在福州没有什么兵力，只得仓皇逃走。几天之后，徐树铮与许、王会师福州，随即发出通电成立制置府，军队称为建国军，他自任建国军总司令，同时尊奉孙中山、段祺瑞“二老”为领袖。

就像对李厚基说的那样，徐树铮未费一兵一卒，即在南方为皖系打响了第一炮。消息传出，皖系人马大为兴奋，并都把重振本系的希望寄托在徐树铮身上。段祺瑞更是点头称许，说：“还是又铮有办法！”

发现皖系在福建竖起了反旗，直系立即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调兵进剿。面对大兵压境，已当了闽督的王永泉十分恐慌，便不顾徐树铮对他多年的栽培，翻脸逼其离开了福建。至此，皖系想在南方另搞一个局面的计划只能付诸东流。

尽管徐树铮功败垂成，但反直三角同盟却越走越近。1923年更成为三方联系最为频繁的一年。当年6月，粤、奉、皖三方代表齐集广州，商讨反直事宜，标志着反直活动逐步走向公开、激烈。

从这时候开始，已经沉默了三年的段祺瑞又重新成为国内政治旋涡中的重要人物，各省各方纷纷派人前来天津，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他自己也积极加入到反直浪潮中，不但频频对外发表意见，还在反直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曹锟是个缺乏政治远见的人。外面反直声浪已经如此之大，他却认为自己实现“总统梦”的时机已到，要通过选举正式成为总统。段祺瑞则针锋相对，他从浙督卢永祥那里拿到一百万元活动经费，准备设法使曹锟的这一希望落空。

这一百万元经费的用法是，通过亲皖系的国会议员章士钊、杨永泰等人在参众两院进行活动，以旅费三百元、每月生活费三百元为代价，策动议员们从北京、天津转移到上海，从而达到使国会无法召开，总统也无法当选的目的。

此时北京新国会的议员人数和“安福国会”时相仿，还是八百多人。面对诱惑，“八百罗汉”中领款者竟达七百多人。钱花出去后，段祺瑞以为大功告成，不料曹锟搞贿选，亮出了每张选票五千元到一万元不等的“赏额”。议员们听说后眼都红了，当下又纷纷潜回北京参加投票，使得曹锟如愿以偿。

想当初，徐树铮“办竞选”时，也是金钱开道、花样百出，但操作者毕竟还要掩人耳目、用点技巧。曹锟选举则是连起码的节操都不要了，直接拿钱砸——除选票明码标价外，每个议员出席大选还有“出席费”五百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二百元。就这样，大选时人数还凑不够，又决定凡临时出席者另发五千元。

民国以降，议员的政治品格和操守真是一茬不如一茬，与曹锟选举相比，袁世凯时代的那些议员简直可以说是品德高尚了。也因此，这一届的“八百罗汉”特别让国人看不起，称之为“猪仔议员”。

曹锟过于明目张胆的贿选立即激起了国内舆论的激烈反弹，也为三角同盟提供了反直的最好理由。段祺瑞在天津以通电和向记者发表

谈话的方式加以谴责；卢永祥作为段的追随者，也紧跟着发表“豪电”，主张各省派代表开联席会议商讨国是。

“豪电”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孙中山、张作霖等人都纷纷派代表到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上海俨然已由皖系根据地转变为反直根据地。

始终不肯和直系合作的卢永祥成了曹、吴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们借口反对卢永祥扩充军队，调兵自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面向浙、沪进行压迫，从而挑起了江浙战争。

为了履行三角同盟的义务，广东出兵北伐，张作霖也分兵三路入关。北伐军因受后方的陈炯明和广州商团的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战果不大，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还是直奉两军，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二次直奉战争。

奉军在经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后，接受日本援助，实行了“整军经武”，战斗力大增。关键时刻，直系将领冯玉祥又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及段祺瑞的游说，在战场上突然倒戈，进而挥师入京，通过发动政变将曹锟幽禁起来。

吴佩孚腹背受敌，就算再能战也已回天乏术，十几万大军顷刻土崩瓦解，吴佩孚的总司令部及其残部则被围困于天津。奉军还准备进一步占领塘沽，切断天津至塘沽入海的交通，果真如此，吴佩孚必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最有希望振兴北洋的人

眼见覆亡在即，吴佩孚在天津东站给段祺瑞打了个电话，说：“我打算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

段祺瑞回答：“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了连声说：“老师，我遵命。”

虽然段祺瑞的身份还是个老百姓，既无实权也不掌军队，但作为皖系领袖、三角同盟的首领之一，说话是有分量的。同时，吴佩孚了解段祺瑞的品格，知道对方绝不会做出落井下石的事，所以才会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独独求救于他。

段祺瑞随即联系奉军，使得奉军同意暂缓向塘沽前进。吴佩孚趁此机会率数千士兵，乘船由塘沽浮海南下。临走时，他的粮食、弹药都留在火车上无法携带，于是便在火车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段府家人听说这件事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吴小鬼（吴佩孚）无路可走了，要求老头儿给援助一下。老头儿眼看吴小鬼要掉在井里头，就小辫儿提一提，指给他一条明路。”还有人说：“上次直皖战争，老头儿失败了。吴佩孚通缉别人，但没损伤老头儿一根毫毛，所以这时候老头儿也不能不关照他一下。”

曹、吴在第二次直皖战争被赶下了政治舞台。对于推翻曹、吴，三角同盟和冯玉祥能够达成完全一致，可他们也只有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才是相同的。对于推翻曹、吴之后如何设立中央政府，以及如何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则各有各的主张和打算，而且根本无法调和。

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目的是要各自独霸一方，扩充地盘，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担任政府和国家的元首，但同时，他们又都想尽可能插手中央、控制中央。张、冯既有如此打算，有资格入主中央的便只剩下了孙中山和段祺瑞了，拥段拥孙也因此成为各方所必须面对的尖锐问题。

还在战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粤方代表就曾来到上海，与皖方代表商谈孙、段日后在政府中的安排。粤方主张，如果孙任大总统，段就应该做国务总理；或者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亦可。

皖方赞成由孙任大总统，段任国务总理，但也向对方恳切表示，这一方案必须得到张作霖的同意。汪精卫听后即赴沈阳，与张作霖进行商谈，张作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奉方拥段。

张作霖对于拥段的态度可以说是铁定不移的，完全一面倒。在当时尚在世的北洋元老中，王士珍做了名士，徐世昌重新退隐，唯段祺瑞仍具备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让卢永祥、徐树铮等人为其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虽然因为徐树铮的缘故，奉皖曾经反目，但张氏父子和奉军一般高级将领对段祺瑞始终都很尊敬，并把他视为最有希望振兴北洋的人。

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历史关系，则远不能与张、段相提并论，而且孙中山的个人魅力主要局限于南方和国民党内部，北洋则自袁世凯起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奉军私下一般都称孙中山为“大炮”，说他只会吹牛放炮而实质上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也有人说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未可轻视，但这不过是说孙代表着一种时代思潮，把他当作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

从张作霖那里得到如此明确且不留余地的答复之后，汪精卫大失所望。他在辞归路经天津时，又特地去拜会段祺瑞。按汪精卫的算盘，最好能够让段祺瑞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这样张作霖没有选择余地，便只好拥孙。不料见到段祺瑞本人之后，汪精卫更失望了。

段祺瑞时年不到六十岁，只比孙中山大一岁，作为一个需要积累阅历和经验的政治家而言，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加上反直派多有拥戴，外面请他复出的呼声又此起彼伏，使得他本人早已做好了出山大干一场的准备。当与汪精卫谈话时，老段不仅没有流露出一点要继续退隐的想法，而且言谈间还大有舍我其谁之意。

什么是真统一

在第二次直皖战争中，段祺瑞确实发挥出了他举足轻重的作用。卢永祥在浙江的作战固然引爆全局，而冯玉祥的倒戈也与他有着直接关联。为促冯倒戈，段祺瑞事前派亲信携其亲笔函见冯，提出“不赞成内战，并希望冯对贿选有以自处”。除亲笔函外，他还设法筹集十万大洋，转送给冯玉祥，作为临时倒戈的代价。

不过在拥孙还是拥段的问题上，冯玉祥的态度一度较为微妙。据说那时冯玉祥已读过三民主义的书籍，而且很感兴趣，他对孙中山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敬仰，而在北洋系中，冯玉祥又基本属于思想“异类”，与段祺瑞、张作霖打交道时不免感到势孤，如果能够与孙中山互相呼应和支持，自然对他是有利的。

由于冯玉祥有拥孙的可能，所以曾有消息说张作霖、冯玉祥已发电报到广东，请孙中山到北京主持一切，然而不久这一消息就被证明

纯属误传。

冯玉祥倒戈后，以他为后盾的摄政内阁只是一个过渡。冯玉祥练兵尚有一手，但搞政治是其最大的短板，时人评价他将政变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同时，他又被直系视为叛徒，直系长江各省均予以通电讨伐。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冯玉祥等人乃联名拥段为“国民军大元帅”，欲借助其声望来减轻自身所受压力。

蛰居四年，终于要出山了。这本是段祺瑞一直以来所期待的，然而当命运的大门即将向自己开启时，他又不由得踌躇起来。最主要的担心，就是不知道各省对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几年前，当他辞去督办下野时，人们可是弹冠相庆，如果这回贸然出山，再遭各方反对，那岂不是自讨没趣，这老脸可往哪里搁?

段祺瑞于是对冯玉祥等人的拥戴既不表示接受，也不加以推辞，既不说来京，也不说不来，只是表示:“此时将自重，必等各省一致拥戴，然后出山。”

战事稍定，段祺瑞就发电报给冯玉祥，让他速来天津商议国是。冯玉祥到天津的第二天，张作霖也到了天津，奉军两个师还先行在津驻扎。

冯玉祥到天津后，立即发现段、张均完全无意于孙，而奉军又咄咄逼人，连自己从吴佩孚手中收编的一些部队也被奉军给缴了械，这使得冯玉祥不仅完全打消了拥孙的念头，而且被迫对张作霖唯唯诺诺，装出一副全无成见的样子。

张作霖在战争中击败吴佩孚，其气势就跟以前的吴佩孚一样，恨不能立马扫平天下。在天津会议上，他甚至主张继续派兵南下，从而

一举扫清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实力。冯玉祥同样想借机到南方抢占地盘，于是也表示赞成。

武力统一曾经是段祺瑞一贯坚持的政治理念，如果是放在过去，他还恨不得敦促奉、冯两军昼夜南下呢，可是现在他自己已对这一理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曾经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批评很厉害的一个人，是著名政治活动家章士钊。章士钊认为，武力统一乃是“欲以一派势力消除它派势力”，是“不知国家根本组织之道”。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它们利益不同、情感不同，自然意见和希望也不同。国家要做的事，是调和、容纳这些势力，“使之得相安”，倘若强行以武力消灭以达成所谓的统一，那是假统一，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什么是真统一呢？章士钊忠告段祺瑞：“真统一者，乃在国家意志之统一而不在独夫之专擅也。”

退居天津前，段祺瑞对章士钊的批评，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就是当成了书生之见，压根儿没放在心上。他真正感觉到这些批评言之有理，是在退隐静思，细细回味那些经历过的失败之后。

就在息影的第三年，段祺瑞很感慨地说：“曹（曹锟）、张（张作霖）、吴（吴佩孚）皆我提拔出来。我扶植他们长大，可是后来却又全部打起我来了。我致力于武力政策，结果如此，现在觉悟了。”

段祺瑞终于明白，如果单纯靠武力统一，打掉一批老的实力军头，又会养成一批新的实力军头，到最后免不了还是一场空。

因为有了这样的新认识，段祺瑞不同意张、冯的用兵主张。他认为，曹、吴在长江各省的势力还很大，困兽不可穷追，一穷追，对方就会合力死斗，到那时候就不好办了。

段祺瑞提出，只要长江各省能“竭诚赞助统一”，同时又不再支持曹、吴，就不应继续用兵。张作霖、冯玉祥听了，觉得长江各省“合力死斗”的情况未必就不会发生，于是也都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段祺瑞的意见。

第十章　手无寸铁

1924年11月15日，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发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拥戴电文一出，各省皆通电响应。北方直奉两系自不待言，由于段祺瑞不再坚持武力统一，而转向与冯国璋相似的“调和统一”政策，长江流域的直系方面，甚至包括西南方面也都不再反对段氏登台。段祺瑞如愿以偿地成为各省一致拥戴的中心人物。

段祺瑞即将担任执政一事，在让段派欢欣鼓舞的同时，还顺便让段祺瑞曾经的“灵魂”摆脱了困境。原来江浙战争爆发时，徐树铮一直协助卢永祥作战，无奈寡不敌众——苏、皖、赣、闽四省的直军本来就已经很多，后来山东、河南、湖北的直军又源源南下增援，浙沪军孤悬华东一隅，不久就败下阵来。

兵败之后，卢永祥由上海乘轮船逃往日本，一部分浙军残部由徐树铮安排，撤至上海闸北。徐树铮为了鼓舞部队的士气，带着一笔钱，同上海大亨杜月笙等人一道前去慰问。慰问结束，在返回位于公共租界的家中时，闻讯赶来的巡捕房拦车进行检查。当时车上还有一

大袋地图，巡捕房即以在租界内从事军事活动，危害租界治安为由予以逮捕，被拘捕的还有同车的杜月笙等人。

杜月笙等很快就被取保释放，徐树铮被羁押了一天一夜，经疏通方得以取保回家，但仍被巡捕房派人监视居住。

徐树铮不怕被租界拘留或监视，他怕就怕被引渡给直系，为此，他提出愿意出国游历，以换取租界将其释放。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徐树铮被监视居住期间，一名日本驻上海的中佐武官不知道是不是也跟天津的那个小野寺一样，属于徐树铮的“铁粉”。他主动找到徐树铮的朋友，共同商议营救徐树铮的办法。当时日本人出入徐宅可以不受限制，这名武官提出，可以先让徐树铮化装成日本人，然后自己再进入徐宅把他带出来。

朋友如实向徐树铮转达了日本武官的计划。徐树铮说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我不干了，也不想再同日本人瞎胡闹，我决计出国，其他什么都不想。

通过这几天的闭门静思，徐树铮把先前从政的经验教训都重新过滤了一遍。在他看来，“老总”（段祺瑞）几次当国，对于外交方面都过分地依赖日本，光讲“中日亲善”，在其身边的日本通如曹汝霖、王揖唐等人也数不胜数，而接近英美的却没有几个人。

徐树铮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英国人来拜访段祺瑞，急切间找不到懂英语的人。他刚好在那里，虽然对英语不精，但也能应付一二，

这才化解了尴尬。

段祺瑞在下台之前，皖系实力那么强盛，为什么反而还会败于直系之手？徐树铮认为与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由于外交政策所出现的偏差，导致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政治声誉上升；而段派和皖系却被对日借款等问题所连累，一再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他对朋友说：“一意拉拢日本，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当然眼红，所以直系的曹、吴便成为奇货可居了。我们这次所受的挫折和侮辱不就是明证吗？”

徐树铮苦思之后得出结论：处在新的国际局势之下，要想搞政治就要竭力多争取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他这次就准备趁机会去趟欧洲，认真了解一下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有机会还要和各国的政治家加强接触，以便对“将来老总出山”能够有所帮助。

获得租界当局的许可后，徐树铮搭乘外轮离开了上海。外轮中途需要在香港暂停，香港总督府得知徐树铮在船上，怕得罪直系，因此早早就派人在码头守候并声明拒绝徐树铮上岸。

就在徐树铮窘迫万状、不知所措的时候，到了下午，香港总督府的态度突然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派员持请柬登船，邀请徐树铮到总督府参加当天的晚宴。

总督府所以前倨后恭，就是因为收到了英国驻华公使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段祺瑞已被拥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获知徐树铮正在香港，按照段祺瑞的本意，是不想让他出国的，但徐树铮决心已定，于是段祺瑞就委派他为欧美考察专使，让他名正言顺地踏上了出国考察之旅。

徐树铮的出国，虽然使重新组成的段幕少了一位中坚分子，但一位能人的新近加入，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此人就是建议段祺瑞实施“调和统一”的章士钊。章士钊因能文善思，早已蜚声南北，而且他这时的政治见解和理想已完全为段祺瑞所接受，二人再次见面，可谓一见倾心。

进入组阁和构建班底阶段，段祺瑞在天津本宅设立了办事处，任命章士钊为秘书长，让他和长子段宏业共同负责处理相关事务以及接待八方来客。

自段出山的消息传出后，办事处门前即冠盖如云，来此奔走的政客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段祺瑞上了年纪，吃不消喧闹纠缠，便深居楼上，楼下则由章士钊和段宏业负责接待，无论何方人物，必须经二人同意，才能上楼晋见段祺瑞。

章士钊深感段祺瑞的知遇之恩，办事非常尽心尽力。为了能够随时与段祺瑞商讨有关问题，应付各方面的关系，他干脆搬到段宅，住在楼下，晚上就与段宏业共宿一榻。

在徐树铮缺席的情况下，章士钊部分代替了他的角色，成为段祺瑞新的军师。不用大总统或大元帅，而以“临时执政”的名义主政，即为章士钊的主张。之所以要采用这一制度设计，主要还是吸取了以往“府院之争”迭起的教训，于是索性将总统、总理的权力合二为一，全部收归“临时执政”所有。

章士钊被段祺瑞采纳的另一个建议，是查办参与贿选的国会议员。查办名声已经臭到家的“猪仔议员”名正言顺，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同时由于原国会议员大部分都参与了贿选，剩下的拒贿议员不足

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这样就可以使“临时执政”在理政时不至于受到国会的过多牵制。

在认为准备就绪之后，段祺瑞决定启程进京。1924年11月24日，他与作为临时过渡性质的摄政内阁完成交接，正式在京就任临时执政。

现实是残酷的

有章士钊所做的前期设计和铺垫，乍看起来，临时执政似乎已经具有了可以不受任何方面掣肘的大权，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大干一番。段祺瑞也曾雄心勃勃地对幕僚们表示，自己将对政府做“根本改革”：政府用人将重才而不重党阀派系，外交取独立态度，财政要治本，不借外债。总之，就是要使国内实现不分派系的大统一，国际上则不再依赖于任何列强。

然而设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经历直皖战争和江浙战争，皖系的军事实力已丧失殆尽，“最后的堡垒”卢永祥也成了无兵无勇之人，段祺瑞所能依恃的仅为一批文人政客和官员，可以说是“手无寸铁”。

没有本系实力作为后盾，就算是有再精妙的制度设计，也无法按个人意志行使权力。最早让段祺瑞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对章士钊的任用。作为段幕现阶段的首席幕僚，章士钊在天津时即为段祺瑞的秘书长，到京后，段祺瑞已内定他为执政府秘书长。岂料张作霖力荐段祺瑞的另一个幕僚梁鸿志出任该职，段祺瑞拗他不过，只好改委章士钊

为司法总长。虽说章士钊精通法律，当司法总长也算是专业对口，但毕竟非原来所愿。

不仅张作霖对中央事务有插手欲，冯玉祥也同样不遑多让。就在段祺瑞抵京的当天，冯玉祥对他手下的重要将领说：“段已到京，张雨亭（张作霖的字）再到京，即是段、张、冯三大头，若说不干涉政事是不可能的，就是段大元帅（‘国民军大元帅’，用以指段）出山，也是个木头人。”

当时的报纸什么都敢登。北京报纸就刊登了一幅漫画，在图上的三杆步枪交叉架上，有一顶写着“临时执政”字样的军帽，意思就是说段祺瑞是由冯、奉、直三大军事势力捧上台的，他不但不能得罪冯玉祥、张作霖，连长江各省直系的脸色也要看。

面对尴尬的处境，段祺瑞的部下幕僚们开始从最初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某日，段祺瑞与曾毓隽谈论局势，曾毓隽表现得情绪悲观，他认为段祺瑞能够上台执政，只是因为推翻曹、吴后群龙无首，冯玉祥、张作霖拿他作为“暂时之马首”，并非真心拥护，而且冯、张也是暂时互相利用对方，必定难以长久合作。

段祺瑞见状说：“云沛（曾毓隽的字），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

曾毓隽说他并非消极，而是觉得担心，感到“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两条腿的桌子，一推便倒。

段祺瑞也没想到入京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会这么大，但他素来不以困难为惧，想想青少年时代靠“一块钱起家”，动辄徒步跋涉千里，现在再难，会比那时候更难吗?

正好手里拿着一只茶杯，段祺瑞就当场以茶杯为喻：“此杯固是锯合而成者。我握之掌中，可暂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矣。”

看到老段仍以“救世主”般的心态在做事，曾毓隽忍不住脱口而出：“杯不由我碎，待碎时由我全之，则反易耳。”

段祺瑞毕竟早已不是一个靠热血和青春闯荡江湖的少年，他不能不承认曾毓隽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他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不但要面对重重困难，还要承担随时可能“杯碎”的责任，而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保证“茶杯”不“落地碎矣”。

这么一想，真不如冷眼旁观，然后从容收拾时局来得轻省便宜啊！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以前做总理时，还能跟总统要要性子、撂撂挑子，现在总不能自己挂冠跑回天津去吧。

迟疑半晌，段祺瑞对曾毓隽说：“你说得很对，那么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段祺瑞是想问曾毓隽有何补救之策。曾毓隽的建议是加强与南方的合作。当时的南方势力之中，除西南的滇唐（唐继尧）、蜀刘（刘湘）外，就数东南的孙中山声势最大，同时段、孙又曾同为反直三角同盟，因此曾毓隽建议段祺瑞迎孙中山北上，与之共商国是。

以段祺瑞之老到，并非不知孙氏之潜力。在与孙结成同盟时，他就曾评价说：“中山可称中国之绝色人物，确守一定主张，始终不渝，此余所以深悦与之携手也。”

后来曹、吴败走，有人主张开国三大元老同时入京，开国是会议。所谓开国三大元老，孙中山、段祺瑞、黎元洪是也。段祺瑞当时

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向冯玉祥解释："中山西南领袖，吾们与雨亭（张作霖）偏向北方，故统一西南事，应征取中山意见，吾迟迟入京以此。"

曾毓隽说段祺瑞"急于上台"，其实是指他没有能够坚持这一主张，把联孙进行到底——在被拥戴将成为临时执政后，为了进一步取得长江各省的支持，段祺瑞在事先未与孙中山商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发布了宣布政见的"马电"，令孙中山大为不满。

接着，梁鸿志、段宏业等人又怂恿段祺瑞先入京，并且说："先入关者王，主人也；中山后至，宾也，何必候孙？"段祺瑞听信了他们的话，放弃等待孙中山，先一步到京就职，这就意味着段祺瑞一人执政之局替代了"三元老方案"。孙中山当时已即将抵达上海，听到这一消息后，只好绕道日本，推迟入京。

话不投机

对曾毓隽重提的联孙话题，段祺瑞深以为然，遂再次派人敦请孙中山早日入京。1924年12月31日，已在途中身染重病的孙中山应邀扶病入京。第二天，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同时电邀孙中山、黎元洪以及在京的国民党人参加。

按照"三元老方案"，应该是先开国是会议，再讨论就职，现在段祺瑞却是以执政的身份主持会议，而且孙中山随后对会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未被段祺瑞所接受。孙中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除他自己拒绝与会外，同时命令国民党人一律不参加会议。黎元洪和西南要人也都以拒绝与会作为抵制。

因为到会人数不足，善后会议被迫拖了两周时间才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虽然段祺瑞的执政地位通过这次会议获得了法律依据，但他的两大愿望都落空了，既不能与国民党顺利合作，也无法取得西南诸侯的支持。

抛去西南方面不谈，孙、段其实从根子上就无法融合。孙中山是革命领袖，他的那套三民主义及其三大政策，与整个北洋系都格格不入。段祺瑞作为北洋领袖，本身就自有一套，当然更无法接受和吸收孙中山所提出的东西。

自孙、段以下，情形也是如此：一般段派人员基于南北成见，对国民党人不能推诚相见，而国民党人对段政府同样猜疑加指责，始终不能信任。

随孙中山一同进京的汪精卫曾到段公馆与段祺瑞见面，但却话不投机，越说越拧。双方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弄得很不痛快。

也许求同存异的唯一办法，就是双方领袖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认真地谈一谈，但自孙中山到京后，孙、段始终未能正式会晤。某次，有人问随孙中山一同进京的汪精卫："先生（孙中山）北来，老段有没有拜会过先生？"汪精卫回答："这个契弟（汪的口头禅，用以指代他所不喜欢的人）怎会来看先生的！"

其实汪精卫说的并不是真话。自孙中山来京后，段祺瑞曾多次要亲访孙中山，以交流意见，但都被汪精卫等人挡驾。国民党人倒也不是故意要为难老段，而是在京名医在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会诊后，一致认为病人应完全静养，严禁会客。平时能够与孙中山见面的仅汪精

卫、孙夫人宋庆龄等少数人，连许多国民党元老都被迫打消了同孙中山会面的念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虽然政见不合，但段祺瑞总体来说对孙中山是尊重的，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出席国务会议，听闻后立即宣布散会，除派人到孙中山行辕吊唁外，还批准内务部所议，对孙中山采用国葬的方式下葬。

反而在京的国民党中执委认为在广东有己方的政府，不能承认北京政府所做的决定，因而拒绝国葬，只同意采用国民葬礼。

到了孙中山发丧公祭的日子，根据原定安排，段祺瑞本来要亲临吊奠，他也已经穿好大礼服，准备登车前往。这时京师警察总监朱深来段公馆报告，说他刚刚由设祭的中央公园赶来，并且说他已侦听到，国民党人将在段祺瑞设祭时施以非常手段。

曾毓隽正好也在段祺瑞身边，他不相信朱深所说，认为太过离奇，不足为信。朱深赌咒发誓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乃至于声泪俱下。其他人见状都站到了朱深一边——且不说朱深吃的是警察饭，没有确凿证据，不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撒谎。即从早期国民党人的处事风格来看，刺杀乃其家常便饭，未必就不会有国民党人因孙氏的去世而迁怒于段，从而做出极端之事。

当然，也很有可能朱深只是神经过敏。可是试问，段祺瑞若真的去主祭，谁能确保他绝对安全？谁都不能，曾毓隽亦不例外。

段祺瑞患足痛症已有四五年之久，严重时，即便用大量的麻醉剂也无法减轻疼痛，必须将两脚放在装满冷水甚至冰水的桶内泡上半个

小时，方可减轻疼痛。当是与段比较熟悉的军政界人士经常看到的一幕。

就在公祭前两天，段祺瑞又正好足痛症发作，于是他便以腿脚肿胀，不能穿鞋为由，临时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主祭。汪精卫、李烈钧等国民党人本就对段政府心存种种误会，见此情景，更令他们大发雷霆，认为段祺瑞是有意托故不来参加。李烈钧公开大骂段祺瑞，说是“死总理吓倒了活执政”，前来主祭的龚心湛也被禁止从中路进入灵堂。

段祺瑞失去了与国民党恢复情感联系的最后一次机会。至此，段政府与国民党的关系完全破裂，国民党表示坚决不会再与段合作。与之相应，广东国民党政府决定仍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继续为北伐进行准备。

金法郎案

在无法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提下，段祺瑞不得不独自与张作霖、冯玉祥周旋。尽管他没有什么自己的力量，看似高居朝堂之上，其实只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周天子、汉献帝，但他本人却决不以此自居，一旦进入执政的角色，仍然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办事，甚至遇到与张、冯相抵触的地方，也照旧敢于函电相责。

在段祺瑞的心目中，张作霖是胡子出身，冯玉祥在他做统制时还是一名小兵，这二人虽然手下兵多将广、势力强大，但要坐下来跟他谈治国理政，都还差得远哩！

与每一次上台执政一样，段祺瑞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钱的问题。当时各省税收尽为地方截留，分文不上缴中央，就算是中央政府名义上可以过问的京畿地区，有油水的地方也尽为冯、奉两军所得，而这两军还要反过来向中央索取军饷，其中尤以奉军索取最急。

段祺瑞在召开善后会议时曾提出财政案，希望通过立法使地方能分一杯羹给中央，但因遭到各省代表的反对而被迫搁置。此时，中国因参加“一战”而得以停付庚子赔款的“红利”早已结束，中央得到的关税、盐税在偿还庚子赔款后便无余款，而军政及教育等各项费用却都积欠颇多。

过去段政府用于缓解类似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对日借款，可是现在这一套路已经不灵了——“西原借款”除第一笔外，全都本利无归，日本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发行债券归还银行。同时，寺内在任时所谓的“中日亲善”也没能实现，反日浪潮在中国国内呈风起云涌之势。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寺内内阁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大为不满。

虽然段祺瑞执政后亲自写信给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希望日本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田中为免重蹈“西原借款”的覆辙而遭受本国舆论的攻击，对段祺瑞的这封信始终未予答复。

眼见北京政府的财政濒临绝境，段祺瑞不能不寄望于加快解决“金法郎案”（当时也称金佛郎案）。金法郎案是法国提出的一种还款办法。中国原来都是以法郎向法国偿还赔款，但是一战后，法国金融混乱，发生了通货膨胀，法郎跌价严重，已不能维持其票面价格。

法国政府认为，如果还按老办法还款，他们吃亏了，于是便希望中国在还款时以“金法郎”代替贬值的法郎。所谓“金法郎”并不是实有

货币，只是确保法郎不贬值的一种虚拟货币。

法国是庚子赔款的大户，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如果中国政府按照金法郎计算还款，须多付整整八千多万元！这当然是中国所不情愿的。

西方人谈判时，习惯胡萝卜与大棒一道上，在提出金法郎案的同时，法国表示可以将部分还款退还中国，其中一部分用于中法合办教育及慈善事业，另一部分用于恢复一战期间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后面这家银行曾吸收了中国的大量私人存款，如果恢复，历年存款自然就可以兑现了。

由于很多政府要员都在中法实业银行有存款，所以历届政府中都有人为此奔走说项。1922年7月，由曹、吴控制的北京政府以照会回复法国公使，表示赞同金法郎案。消息传出，遭到举国一致反对，在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决议否认以金法郎偿付赔偿款。

你这边否认了不要紧，那边却已答应人家了。这关系到国际信用问题，而在国际社会中，信用问题通常又非常重要，乃是国与国交往的第一法则。徐树铮在自己所著的《建国铨真·邦交章》中曾写道："抱信者，事可许人，许之，勿待苛求。不可许，至死勿许也……"

觉得不能赞同对方的提议，便死也不要答应；一旦答应了，则最好不要中途反悔，否则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法国认为中国出尔反尔，遂通过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按金法郎所应折算的赔款数，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的中国关余、盐余（即关税、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的所余款项）尽数扣留，不准中国政府提用。

除此之外，法国还以批准“九国公约”作为交换条件，声明若中国一天不批准金法郎案，他们就一天不批准相关协定。

到1923年上半年，曹锟希望能够退回被安格联扣留的款项，遂打算依照法国要求解决金法郎案，结果引起国内舆论鼎沸。北京政府不敢触犯众怒，金法郎案遂再次成为悬案。

段祺瑞在天津时也曾以在野身份通电反对金法郎案，但等他上台，解决金法郎案已成了执政府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他对财政总长李思浩说：“你如再不办（金法郎案），连执政府的日常开支也没法应付了。”

我一定要做

同样是解决金法郎案，曹锟时代仅仅为了用于救急，至于佣金损失如何，债权债务关系怎样，都未仔细考虑。李思浩领衔的财政部则专门成立了“金法郎案研究委员会”，把有关该案的一切文卷、资料都调齐了。委员会悉心研究修订解决大纲，对所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认真推敲。过后，解决大纲又被送交司法部逐条审查，以确定没有违法之处。

专家们认为，虽然改用金法郎赔款之后，国家要遭受一定损失，但法国已决定将其中的部分退款退还中国，这样一算，损失并不是太大。最重要的还是从长远来看，中方得大于失。在曹锟时代，关税问题因时机未至尚谈不到，而临时执政政府在成立伊始，各国外交使团就已同意中国提前召开关税会议，只等法国批准“九国公约”。换句话说，一俟法国松口，中方即可提高海关附加税，乃“虚损而收实利”。

当时正在法国考察的徐树铮根据自己的认识，也认为解决金法郎案恰在其时，遂连续发电报给段祺瑞和李思浩，极力主张速办。

这些都成为段祺瑞敢于顶着反对声浪办理悬案，并把自己与曹锟划分开来的重要依据。

一切手续都弄好了，就剩下身为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签署交办了。段祺瑞连发七道手谕加以催促，但李思浩那边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为此，段祺瑞找到李思浩，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你是怎么回事，老把金佛郎案拖着不办？"

李思浩回答："执政一定了解这件事办了以后的后果。思浩身败名裂，乃至送掉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有不少人正找机会要为难中央、为难执政。因此，不能不再三考虑。"

段祺瑞听了，这才稍稍收起怒容，但还是严肃地对李思浩说："你我相交多年，你还没有摸着我的脾气？我这个人，不是那么患得患失的。我一定要做（这件事），不要说因此丢了官、丢了地位在所不惜，就是送了性命，我也是不顾的。有我负责，你快去办吧！"

与李思浩谈过之后，段祺瑞仍不放心，他召来曾毓隽说："你去问赞侯（李思浩的字），他对金佛郎案敢办不敢办。他若不敢办，我叫别人办或你来办。"曾毓隽赶紧安慰道："老总不要急，我明天和赞侯研究研究。"

第二天，曾毓隽往访李思浩。得知来意，李思浩不禁诉起了苦："不是我不敢办，而是此案相当复杂，牵连面较广，不能不周密考虑和多方联系。请四哥（指曾毓隽）帮我办好吗？"曾毓隽说："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协助。"

直系北京政府两次向法方表示赞同金法郎案，又两次反悔，如今再与法方交涉，细节方面的操作就比原来更复杂，而且很容易节外生枝。李思浩了解到国民党人李石曾和法国政府关系较深，同时也是解决金法郎案的支持者，便想请李石曾出面协助他与法国公使沟通。

李思浩和李石曾不太熟，乘此机会，他问曾毓隽能否代为联系。曾毓隽痛快地答应下来。

曾毓隽其实和李石曾也不熟。经过打听，李石曾在民初时曾患伤寒，中西医皆束手无策，后请来京城名医陆仲安才得以妙手回春，李、陆由此来往甚密。恰好曾毓隽与陆仲安早就相识，经陆仲安介绍，曾毓隽见到李石曾，二人晤谈多次，李石曾欣然同意相助。有李石曾从旁协助，李思浩迅速与法方谈妥了双方的操作细节。

对内方面，由于国会已无形解散，倒不用顾虑了，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舆论界特别是上海舆论界的反对。当时正好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来京有事相求于李思浩，李思浩就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托其进行疏通。经虞洽卿打过招呼之后，上海舆论界的反对声音果然减弱了不少。

1925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与法国公使完成签字、换文手续，从而达成了解决金法郎案的中法协定。

虽然此案一公布，段祺瑞执政府就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舆论特别是在野党口诛笔伐，但实事求是地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执政府对解决金法郎案还是十分慎重的，段派自段祺瑞、李思浩以下，也无一人敢于从此案中妄取分文。

得意之笔

当年7月，法国政府批准“九国公约”，中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障碍至此得以解除。此前中国的关税是签订“辛丑条约”时所定，税率为值百抽五，这么低的税率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本身就带有如庚子赔款一样的侮辱和惩罚性质。

中国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后，中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问题，理由是战败国尚无协定关税特例，中国是战胜国，更不应受此约束。各国代表无词可驳，于是决定在“九国公约”生效后，中国可召集各国来参加关税特别会议。

如果说金法郎案背后是一片叫骂之声，关税会议在国内赢来的则多为叫好声和掌声，但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没有金法郎案就没有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正是执政府解决金法郎案所换来的结果。在段祺瑞本人，则把解决金法郎案和召开关税会议作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始终全力以赴。

在关税会议筹备期间，有一天段祺瑞在和曾毓隽谈及一些有关会议的主要问题时，曾毓隽不无忧虑地说道：“关税会议各国未必能顺利通过，即使如愿以偿，内部纠纷势必甚于今日。”

段祺瑞甚为惊讶，立刻问他：“何以见得？”

讨论自主关税，必然涉及近代中国一个很特殊的税收制度，即厘金制度。厘金最早产生于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时是为筹集兵饷所临时设置，后来便成了一种新税种。这是一种非常杂乱、无法

度可守的税制，而且从清末开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为地方所自由处置，被认为是地方擅专和割据的经济基础。

各国要求中国将裁撤厘金与海关加税同时进行，即“裁厘加税”。曾毓隽所提到的“内部纠纷”就跟裁撤厘金有关，他对段祺瑞说：“大家一向所争的是地盘，不完全集矢于中央，一旦决定裁厘加税，各地在争权夺利时，势必把矛头全部集中在老总一人身上。”

段祺瑞听了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内部纠纷可由内部解决。”

段祺瑞对关税会议寄予了无限期望，他认为开幕式关系到国家主权和财政税收，因此决定亲自出席，以示重视。为了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内容，他需要配备一个会多国语言的翻译。这种人才在国内非常稀缺，段祺瑞想到了被喻为“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就让曾毓隽的叔父、时任执政府外交次长的曾宗鉴出面邀请。

曾宗鉴是辜鸿铭的学生。他认为由自己突然邀请老师担任翻译不够礼貌，还不如让曾毓隽代为约请。

曾毓隽是辜鸿铭的小辈，但与辜鸿铭却是忘年交，朋友说话反而比师生更好措辞。他也因此向段祺瑞建议：“约他（指辜鸿铭）参加关税会议不难，不过最好给以高等顾问的名义，每月馈赠数百元的车马费。”

取得段祺瑞的同意后，曾毓隽第二天就前去拜访辜鸿铭。见面之后，他首先代段致意，随后拿出了高等顾问聘书和两个月共一千元的车马费。辜鸿铭为人非常机敏，不待曾毓隽开口说明来意和要求，就说：“段执政想利用我当关税会议场中的喉舌吧？”

在得到曾毓隽的确认后，辜鸿铭答应得非常爽快：“关税会议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这是我义不容辞的，到时我一定参加。”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如期召开。除九国公约的参与国外，美国还介绍了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加入，从而由九国变成了十二国。段祺瑞亲自出席开幕式并致开幕词，辜鸿铭也随段祺瑞出现于会场。他身着长袍，套上大袖口的马褂，脑后拖一根辫子，神态怡然，随听随记随译，举止格外拉风，引起了会场上中外人士的一致注目。

开会第一天，中国政府即按普通品至奢侈品的不同规格，提出要加征值百抽五至值百抽三十的临时附加税。各国代表对中国的开价如此之高表示惊讶，认为已经超过“九国公约”的范围。经过谈判，中外商定在裁厘未实现之前，先设一个为期三年的过渡期，在此过渡期内，关税依照“九国公约”，对进口商店一律按普通品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值百抽五的办法征收附加税。

平衡木

关税会议的召开，令段祺瑞大为振奋，但是正如曾毓隽所言，与外交及加税相比，裁厘和解决国内纠纷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难题。

在当时国内的政治版图上，虽然南北方的军政实力已呈现出明显的彼长此消之状，但国民党人还未能占据政治中心位置，加之民众有着尊崇正统的心理，作为段祺瑞执政基础的北洋系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重心所在，即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

如果北洋足够团结，其实占据两广的国民党和僻处西南一隅的滇唐蜀刘都不难对付。问题就在于北洋早已四分五裂，几次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说来说去削弱的都是北洋自身实力，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对北洋内部而言可谓大伤元气。

站在执政的位置上，段祺瑞不可能有“杯碎时由我全之”的自由和从容，他要确保“杯暂不碎”，便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尽力对北洋系进行整合。具体来说就是取消“安福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来平衡各派势力，避免北洋内部继续发生冲突。

各派之中，最感棘手的自然还是如何摆平冯玉祥和张作霖。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个北洋派别，冯、奉两派不仅均力图左右中央政治，而且彼此之间矛盾尖锐——冯玉祥鄙视张作霖是“胡子”，张作霖则认定冯玉祥是个有野心、难相处的吕布之徒，双方争来夺去，互不相让。

如何对待冯、奉两派，段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且也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即所谓的“国舅派”和“太子派”。

“国舅”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内弟，段公馆的家人称他为“吴小舅子”。“吴小舅子”性格蛮横、脾气大是有名的，嘴里经常不干不净，骂骂咧咧。俗话说，外甥多似舅，段宏业的脾气也很臭，家人们常说段宏业“跟他舅舅似的”。

段宏业是吴光新唯一的嫡亲外甥，可是说来也怪，舅老爷和大少爷的感情却极其恶劣，一对坏脾气更是针尖对麦芒，往往戳在那里互不相让，最后简直形同水火，二人见了面连话都不说。

段祺瑞虽然早年对段宏业这个宝贝儿子深恶痛绝，一向不给好脸色看，但年纪大了以后，不免也产生了常人的舐犊之情，隐隐然已视段宏业为自己的接班人。自天津筹备入京起，他授命段宏业在段幕中负起责任，便有加以培养之意。

被钦定为“太子”的段宏业也渐渐变得跋扈起来。在段幕内，一般人都称他为“大爷”，一般公事都要先向“大爷”请示，“大爷”同意之后，才能请示“执政”。

一位舅老爷，一位大爷，都是段祺瑞的至亲，手中都握有一定权力，偏偏又水火不容，于是段幕人员也无形中分成两派：一派以吴光新出面，称为“国舅派”，主张拉紧张作霖，打击冯玉祥；另一派拥护段宏业，称为“太子派”，主张联络冯玉祥，抑制张作霖。

两派都主张靠拢一方，排斥另一方，彼此观点极端对立，经常一见面就吵。有人觉得这种现象不太好，就请执政拿个主意，但段祺瑞却听之任之，对哪一派都不支持、不反对、不干涉。

段祺瑞自己对张作霖、冯玉祥的态度也很微妙。在张、冯之间，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私人交情要更好一些。有一次，段宏业向他请示，说张学良要同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应如何回复。段祺瑞说：“他的兵可以同你拜把子，他的儿子却不能同你拜把子。”

段祺瑞极重尊卑长幼之分，他自认比张作霖及其部下要大一辈，所以才让小儿女称张作霖为“张大哥”。按照他的观念，段宏业应与张作霖同辈，比张学良又大一辈，是不能拜把子的。不管段宏业在回复张学良时如何措辞，都有些伤感情，张家父子的脸色也极可能不太好看。有人分析，这与段宏业后来主张抑制张作霖不无关系。

换个角度想想，老段虽讲原则，但绝非食古不化，何况如果段宏业和张学良真的拜了把子，也不至于就会引起什么闲话，这只能说明段祺瑞对与张家距离过近本身就存在顾虑。

实际上，段祺瑞采取的是一种“平衡木”的办法——奉军实力最强，所以不能无冯，否则无以制张；国民军控制着京汉线，所以又不能无张，否则冯将无法驾驭，并对自己构成威胁。

倘若像“国舅派”或“太子派”所主张的那样，完全倾向于冯、张中的任何一方，则段祺瑞所苦心维持的这种平衡势必就要被打破，那对执政府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段祺瑞深知其中玄机，所以他才会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之上，有意无意地利用“国舅派”、“太子派”达成目的，即以“国舅派”拉张，以“太子派”拉冯。

玩“平衡木”并不轻松，执政不到两个月，就有人拿段祺瑞与徐世昌对比，称他“已入十年东海境地”。冯玉祥曾在日记中写道：“段公上台对军事不敢以命令式指挥……凡事均不好办。”连张作霖也讥讽段祺瑞的处境是“北京烤鸭”，两面受到烟熏火炙。

好在段祺瑞政治经验丰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之下，他仍得以把北洋各派放入自己的棋盘，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制衡，从而促成或维持了各派的“均势”——甚至于长江、西南都成为段祺瑞的砝码，被他用来搞政治平衡。

一名奉军将领这样解释段祺瑞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所谓“吸不住”，自然是指段祺瑞缺乏派系实力，无法随心所欲地指挥调度各路兵马。所谓“罩得下”，是说在北洋这个圈子里，无论自居北

洋正统的长江直系、从直系中分离出的冯玉祥，抑或力量强大但非北洋嫡系的奉张，还是向被视为“北洋远亲”的西南诸侯，暂时都只能接受段祺瑞，或至少是口头拥段。

群儿相斗

北洋内部的这种“均势”维持了将近一年，但是就在这一期间，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也时有发生，新的危机开始不断出现，并且显示出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势头。

1925年10月，长江直系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向奉军发起总攻击，浙奉战争爆发。此时，冯玉祥接受苏联援助，使得国民军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于是便开始与孙传芳密商反奉计划，不久又与奉军将领郭松龄订约，建立起反奉同盟。

为了对付国民军，张作霖也抛去前嫌，与吴佩孚结成了直奉同盟。自此，各派大动干戈，段祺瑞苦心经营的“均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调和统一”更无从谈起。

归根结底，段祺瑞还是不具备整合北洋系的真正实力，也可以说，在袁世凯之后，能够被北洋各派始终公认的权势中心其实一直都没有形成过。

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的“均势”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有人把他比喻成给一群儿孙分苹果的老妇，虽然想尽办法要做到公平合理，可是苹果再多，也就那么一篮子，何况还有大小酸甜之分，所以最后仍不免群儿相斗，甚至迁怒至他这个老妇。

“群儿”之中，最难打发的仍是自恃有拥戴之功的冯玉祥、张作霖。冯玉祥在执政府刚开局时，就因所获得不到满足而心生怨怼。张作霖更是气焰万丈，得寸进尺，得到河北地盘之后，又复要山东。

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长随段之左右，他和“太子派”的一些人进言，希望段祺瑞对张作霖的一些过分要求予以严词拒绝，如果拒绝不了，就立刻离京，通电下野，并且说不这样做将威信尽失，以后会越来越被动。

段祺瑞因为自身缺乏实力，做事已不像过去那样坚毅果断。虽然他认为段宏纲说得很对，但并未能坚持下去，在听了“国舅派”的另外一番劝说之后，仍任命奉系将领张宗昌为山东督军。

国民军方面对此非常恼怒，认为段厚于张而薄于冯，于是便把气都撒在段祺瑞身上。他们首先夺去北京治安军警权，接着便蓄意对段幕成员尤其是“国舅派”展开打击报复——在冯玉祥的授意下，冯的嫡系亲信、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兼警察总监的鹿钟麟先后下令逮捕了执政府总参议曾毓隽、司法院长姚震，财政总长李思浩见势不妙，赶紧避往东交民巷，陆军总长吴光新则借着到日本观操的名义，逃到天津去了。

此时执政府风雨飘摇，身为执政的段祺瑞已无能力保护自己的这些幕僚和部下，他只能尽全力阻止各方冲突的进一步加剧。

发现冯、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他特派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的邓汉祥到各处接洽，劝阻冯玉祥等人不要用兵，但邓汉祥出去跑了一圈，结果是毫无所获。

邓汉祥回来后，将各方非打不可的情形详细告诉了段祺瑞，劝他以“电主张未能实现”为由通电自动下野。段祺瑞并不是一个恋栈之人，过去因总统不能接受他的意见，也曾多次愤而辞职。可是这次他却不能不恋栈了，原因就是关税会议尚无结论。

当时各国在会议上已原则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决定在元旦裁厘实现后正式施行。尽管段祺瑞知道在自己任上要实现裁厘的目标已经非常渺茫，但仍想勉力一试。另外，半途因内乱弃职而去，他也担心这样会令中国在国际上丢脸。他对邓汉祥说：“现在有五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开关税会议，我若毅然决然宣布下野，国际友人难免不责备我们对国家太不负责任。”

就在他心神不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署名人是已经暌别很久的徐树铮。

能够有什么作用

徐树铮已经回来了。当初出国时，他对考察活动有着通盘考虑。他先是单人独骑到法国，接着又与在国内组织的考察团会合于巴黎。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一些是他亲自挑选的西北军旧部，异国相逢，令徐树铮非常高兴。

旧部们眼中的“又公”（对徐树铮的尊称），一头短发已呈灰白色，然而壮志未泯。他对待考察团就和培训西北军一样认真，早餐之后就给大家讲孟子。当时孔孟学说在中国国内除了一些遗老或学者外，已没有什么人提及。徐树铮坚持要这么做，源于他自己日益形成

的治国理念：中国已“衰敝之极”，必须通过尊经来提高国人素养，除此之外，“别无返魂之药，足续垂绝之气”。

讲完孟子，他再指定当天考察的日程。按照徐树铮的要求，每个人在考察过程中都要记笔记，回来之后还要写日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想，第二天再交由徐树铮批阅。

徐树铮的这种努力，与法国外交部司长柏里索的意见倒有合拍之处。柏里索当过袁世凯的顾问，他在中国时间很长，对中国国情也比较熟悉。他有一次对考察团的成员说：“中国革命后，太无纲纪，不学无术者竟占据要津。中国不是无希望的，可惜在上者毫无治国之法。”

柏里索或许对徐树铮一行寄以希望，但大多数外国人却不这么看。当时中国派往外国的考察团太多了，说是考察团不如说是观光旅游团更为恰当。老外们看在眼里，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徐树铮的考察团也是如此，“没目的，没计划，玩一趟回去，能够有什么作用？”

出面接待考察团的各国官员出于礼貌，当面总会说一些好话，比如“中国派遣专使得人”、“此次出洋考察，获益必多”，等等，可他们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些类似的批评。至于各国民众和舆论，因为没有官员们这些顾虑，便往往直接采取讪笑和鄙视的态度。

有一次徐树铮穿着军服，带着考察团参观法国某菜市，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一边走一边听到法国人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不在自己国内好好练兵治国，却到这里来游荡、招摇过市干啥？”又有一次，巴黎中国使馆举行茶会，徐树铮好昆曲，便在赴会时唱了数首昆曲以助兴。不料德国报纸很快刊出巴黎通讯，说中国将军徐树铮不乘马观操、参观军港，却在茶会上高歌入云，沉湎于音乐……

外国人不理解、不认同，考察团成员其实大多也心不在焉。即使从前那些跟随徐树铮的西北军旧部，之所以能够相从出国，也有镀层金，以便将来回国后谋求个人名利的考虑，谁能料想得到徐树铮对于考察会来真的，还抓得这么严这么紧呢?

除了徐树铮本人外，考察团的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心不在焉。早饭前听徐树铮讲孟子，有的人打瞌睡，有的人精神涣散听而不闻，到后来甚至有托故不到的。考察时规定要人人记笔记，但记的多少和质量，并无固定要求，于是便逐渐流于形式。一国考察结束，笔记就要收齐保存，以备日后整理，可是收与交都得不到严格执行，徐树铮发了脾气，这才交了上来。

考察团在考察时，徐树铮通过中国驻各国公使，特地请人做专题讲述。讲述者均为所在国高级官员或专家教授，按理这样的专题讲述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有些考察团成员纯粹是应付差事，不得不出席，其间不仅不能认真做记录，而且好几次还有昏昏欲睡的。讲述者虽然不好意思说什么，但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明显表现出了不高兴。

在国外的那段日子里，最令徐树铮感到沮丧的恐怕还是国人对他的态度。考察法国时，正值孙中山在京逝世，旅法同胞在巴黎开追悼大会，徐树铮特派留学生出身的林子峰等二人参加，却遭到了反对。中国留法学生还广发传单，对徐树铮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大加攻击，称他们是“与帝国主义亲善之公使及北京军阀所派之代表”，林子峰等人被禁止上台讲话。

继先后对英国、瑞士、意大利进行考察后，徐树铮率考察团返回巴黎进行短期休息，并做赴德考察的准备。在意大利时，国内传来了上海大罢工、广州骚动、北京学生大游行乃至捣毁外交部的消息。这

一系列事件显然与徐树铮“尊尚经训”、“以教养挽救中国”的理念有着极大冲突，也使他感到了深深不安。虽然他表面上似乎一直都很平静，但内心其实波动很大，有一天晚上忍不住在床上仰卧痛哭。

回到巴黎之后，徐树铮对随行诸人说：“赴德考察日期，须视国内情形酌定。”

“卖国贼”

种种不顺，让考察团内人心浮动，林子峰等人相继辞职归国。考察团秘书翁之熹因为家里有事也微露辞意。翁之熹系徐树铮在西北军时期的幕僚，曾随他做“荒沙万里行”，一同出使过外蒙古库伦。考察期间，翁之熹奉命每天为徐树铮写起居注，徐树铮准备以此为基础，回国后写一本视察记，以便与他以前写的《建国铨真》相互印证。

徐树铮见翁之熹也想走，不由大怒，说：“子峰可行，你不可行。若大家不想干，大家卷铺盖，我专使亦可不做了！”

林子峰回国前，徐树铮在巴黎皇家饭店为其饯行。饭店内灯红酒绿，一名红衣少女频频为客人起舞。徐树铮触景生情，即席写诗一首赠予翁之熹，诗中有“天涯风雨故人情”一句，劝对方打消辞意。

尽管徐树铮的赠诗令翁之熹颇为感动，但眼看着众人纷纷离去，在考察团内也几乎看不到什么出路，他仍然还是提出了辞呈。

翁之熹走后，徐树铮一行即动身前往德国。当时盛传徐树铮是奉北京政府之命与德国签订秘密条约，在德留学生对此极为愤怒。徐树铮到德国后，即打算召集留学生开会，以说明情况。

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一听，急忙劝止，说："留学生年纪轻，什么都不懂，到时一定会有不利于专使的举动。专使身处国外，只身无护卫，使馆内也缺乏保安人员，千万不可尝试。"

徐树铮回答："留学生读书必明理，我以理导之，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陈箓就是不肯让他出面，说着说着还跪下了。徐树铮见状，只得放弃了这一计划。

在德留学生听说徐树铮已到德国，立即包围了公使馆，要求陈箓交出"卖国贼"。陈箓不敢出来交涉，仅派门卫阻拦，说："公使赴宴未归。"

留学生们哪有这么好糊弄，立即做出要群殴的样子，把门卫和保安都给吓跑了。他们冲进公使馆，正要登楼，陈箓的夫人上前拦住，对他们说："公使不在楼上，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我的寝室。"

众人愕然止步。突然有一个学生冒出惊人之语："今日之事，国家大事也，怎能以男女之嫌，而置国事于不问？"说着，居然就跑上前去，强行把陈夫人推到了门外。

学生们蜂拥而入，到处搜寻，最后在盥洗间把吓得哆哆嗦嗦的陈公使给找了出来。问他要徐树铮，陈箓可怜巴巴地说："现在我自顾不暇，还能包庇别人吗？徐树铮确实不在这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有人出了个主意："请公使以电话把他召来，千万不要说我们在这里。"陈箓坚持说："确实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我可以担保徐树铮绝无卖国行为。"

相持了四五个小时，陈箓说得口干舌燥，而学生们仍无退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陈箓提出：“我立据担保如何？”

得到众人同意，陈箓执笔写道：“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徐树铮君此次来德，确无卖国行为。”写完之后，他还被迫在上面按了指印，众人这才散去。

徐树铮得知这件事，只得匆匆离开了德国。

考察团一共考察了十二个国家，最后一站是美国。当他们抵达美国的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已开始发生动荡，段祺瑞顾及徐树铮的安危，屡次发电报叫他暂缓回国。可是徐树铮觉得恰恰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才更需要他出力，因此到美国不久，即取道日本回到了上海。

自江浙战争之后，江浙的局面已为孙传芳所完全控制。孙传芳是直系中的新兴力量，也是继吴佩孚之后最为善战的直系将领。虽然在江浙战争时，他曾与徐树铮为敌，但时过境迁，直系已对段祺瑞表示“拥戴”，反而奉、冯两方由过去的反直盟友变成了段的肘腋之患。

孙传芳与奉、冯都没有密切联系，而且他和徐树铮还是士官学校的同学。徐树铮便借着这层同学关系，与孙传芳进行联络，希望运用孙传芳的力量来改变段被奉、冯夹击的尴尬处境。

完成与孙传芳的联络，徐树铮就准备进京述职，同时把与孙传芳商量的一些办法提供给段祺瑞。可是接到他的电报，段祺瑞却马上复电劝止他来京，认为北京形势对他可能不利。

大摇大摆地回去

徐树铮没有听从段祺瑞的话，仍然决定先一步去天津，但当时的局势确实非常严重，尤其北方政局的动荡不安达到了极点。当他从上海出发时，所谓的“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已经爆发，冯玉祥与奉军李景林部在京津间发生激战。由于冯玉祥策动了郭松龄，战事很快向有利于冯的方向发展，徐树铮刚刚在天津下船，李景林就已溃败，张作霖则因为郭松龄之变而无力入关，京津一带遂完全为冯玉祥所控制。

得知徐树铮到了天津，段祺瑞连发函电和派人劝阻他入京。徐树铮在天津的亲友也都劝他这时候万万不能进京，有的亲友甚至为此痛哭流涕。他们把曾毓隽等人的事告诉徐树铮，以此证明北京局面确实非常危险复杂——曾毓隽、姚震皆为政府要员，冯玉祥却可以想抓就抓，遑论他人？你徐树铮进京简直是自投罗网！

不料徐树铮听后却用他那惯有的自傲自大的语气说道：“我怎么能同云沛（曾毓隽的字）、赞侯（李思浩的字）比呢？段老总的事多半是坏在这两个人身上。”又说：“我非去不可！我要看看老先生，也要让人们看看，我当年怎样出来的，现在还要怎样大摇大摆地回去。”

徐树铮如此胆大，其实还有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宋子扬是徐树铮的士官同学，先后做过冯玉祥、徐树铮的部下。当徐树铮尚在欧洲的时候，宋子扬即以徐树铮的名义与冯联络，那时冯玉祥同张作霖的关系愈搞愈坏，但其力量还远不如奉军，于是便想利用宋子扬将徐树铮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为此还特意对着宋子扬说了一些尽弃前嫌、重新合作之类的话。

宋子扬向徐树铮转述后，徐树铮信以为真。后来局势转变，冯玉祥得以控制京津，他自认为势力已成，于是立刻放弃了拉徐树铮的计

划。可叹徐树铮未能看透这一点，因此对大家的劝阻才会置之不理。

宋子扬一来可能也被蒙在鼓里，二来又希望徐树铮能重掌大权，以便有所攀附，所以极力怂恿他进京。这时由于冯、奉战事的关系，京津铁路的交通尚未恢复，暂时只能乘汽车入京。由于公路要经过冯军占领区，徐树铮也怕路上遭到拦阻，宋子扬见状一拍胸脯："我有个旗子，可以在冯军占领区域通行无阻。"

徐树铮于是和宋子扬乘坐汽车，沿公路入京，果然一路上无人阻拦。当他远远地看见北京城楼时，心里非常高兴，不由用昆腔轻声哼了起来："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徐树铮一到北京，即去段公馆拜见段祺瑞。见到徐树铮，段祺瑞又惊又喜，二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多时"。

段祺瑞问他为什么一再阻止，还要冒险入京。徐树铮回答时很动感情："怎能不来？以公论，我是奉派出国专使，回国多时，理应向政府述职。以私论，我与老先生分开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来问候起居。至于某系（指冯派）对我个人有何不利的说法，听之而已。"

老爷子只是担心徐树铮会有危险，能够见面当然非常开心。二人共进晚餐，不过吃完饭后，他仍然催徐树铮早早离京，免生意外，并指点怎么走才最安全："你要由西车站坐京汉车到郑州，再转陇海线回徐州。"

第二天，根据徐树铮的意见，执政府举行了专使觐见执政复命的典礼，随后徐树铮又向各部总长报告了出访情况。

听说徐树铮回京，以前的那些朋友都替他捏把汗，说：“小徐真敢回来，好大胆子！”大家纷纷劝他多加小心，李思浩还派人请他到东交民巷见面，意思是劝他一道留在那里避难。

北京的紧张气氛也让徐树铮感到联冯可能并不成功，但他住了两天后，发现冯玉祥方面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这反而使得他放下心来，对朋友们的善意未再多加考虑。在此后的六七天里，他除了和老朋友们聚会外，还到自己所创办的正志中学进行演讲，给学生们讲述旅欧观感。

有些热心的老友看到北京的环境对徐树铮实在不利，又劝他赶快离开。徐树铮则说：“既来了，现在离新年只有两天，何不等元旦给老总拜年后再走呢！”

几位老友一再苦劝，段祺瑞也让他不要再等，徐树铮这才决定启程，并请执政府打电话给火车站准备专车。不过他没有按照段祺瑞指点的路线走，而是打算乘车去天津，因为在联冯不成的情况下，他已经约了友人在天津等他，准备转过头来商量如何联络奉张。

离开京城前，段幕的一群朋友给他饯行。听说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当场有一些人表示反对。理由是徐树铮在京城已经耽搁了这么多天，又是典礼又是报告会的，冯玉祥所部不可能不知道，绝不会轻易放徐树铮离开。如果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势必经过廊坊，廊坊现由冯玉祥的部下、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率兵驻扎，到时恐怕后果难料。

这些朋友建议徐树铮还是谨慎从事，改乘飞机或乘汽车绕道去天津。徐树铮犹疑了一下说：“我的专车已经备好，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并且我现在还是专使的身份，他们怎能擅动呢？冯就是想和我为难作对，也绝对不能轻易动我。”

他让众人放心，说相信此行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听了他这一席话，也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段祺瑞突然发现自己的书桌上有一张纸条，上写“树铮不可行，行必死”。他赶紧叫人送给徐树铮，徐树铮看了也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专车离开北京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徐树铮上车后就在包房里睡着了。

借刀杀人

睡梦中的徐树铮尚不知道，其实从他由津入京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被鹿钟麟给牢牢盯上了。

鹿钟麟首先用了一招借刀杀人计，并特地怂恿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为父报仇。杀父仇人不共戴天，陆承武自然不好推托说不去。鹿钟麟又从手枪队里拨了二十个兵给陆承武，让他率队在京城潜伏，伺机对徐树铮实施暗杀。

陆承武虽是毕业于士官学校的职业军人，其实却是个只会抽大烟的大烟鬼，根本没有胆量杀人。徐树铮在北京好多天，他都不敢下手，最后被逼得急了，只好提了个让鹿钟麟哭笑不得的建议：设法让徐树铮来警备司令部拜访鹿钟麟，再请鹿钟麟预先通知，然后他带人于司令部门前予以狙击。

且不说究竟该怎么把徐树铮骗来，若是在警备司令部将他杀了，那不摆明事情就是鹿钟麟干的了吗？还用得着你动手？鹿钟麟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馊主意，他对人说：“陆承武连这点子事都办不到，亏他还带了这么多打手，真是‘癞狗扶不上墙去’。”

得知徐树铮要乘车返津，鹿钟麟急命参谋处与丰台车站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车已开过丰台，计时尚未到达廊坊。”于是他便向张之江下达追杀令。张之江听后认为：“此事重大，不宜鲁莽。”鹿钟麟不由分说：“这是命令！”

徐树铮的专车到达廊坊后，因为错车，停在了廊坊车站。张之江的参谋张钺早已率卫队在车站等候多时，他首先进入车厢，问哪一位姓徐。

徐树铮的秘书薛学海听成了问哪位姓薛，就走上前说是不是找我。张钺说不是找姓薛的，是找姓徐的。这时徐树铮也听见了，就穿着睡衣从包房里走出来，说我姓徐。张钺接着问了一声：“您是徐专使吗？”徐树铮回答说：“是。”

确认徐树铮的身份后，张钺说：“司令请您到司令部去一趟，有几句话要和您谈谈。”徐树铮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以为真的是张之江请他到司令部商议什么，于是就对张钺说自己这几天在北京太过疲劳，声音都哑了，谈话不方便，现在也不能下车。“我到津休息几日，随时可约定时间，或是我到这里来，或是请张都统（张之江）去天津都可以。”

冯玉祥的部队也叫西北军，但此西北军非彼西北军，该部官兵多为大老粗的士兵出身，缺乏修养。见徐树铮不愿下车，张钺立刻撕下

面具，用手强拉了徐树铮一把，说：“哪有这些说的，走！”徐树铮这才知道来者不善，连忙说：“等我穿上衣服……”

张钺非常蛮横：“还穿什么衣服！”命令士兵连拖带拉地将徐树铮架下了车。

徐树铮下车不久，薛学海等随从人员也被带下车，关进了路旁的一间小土房子里。那间小土房子连房顶都没有，天气又很冷，大家只好听天由命。

徐树铮被单独折磨了几个小时，据说先是用绳子绑勒，然后是几个士兵将门板压在他身上，站在上面跳……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薛学海听见门外有说话的声音，似乎从门前走过了许多人。接着又听到有人“唉”地叹了口气，他立刻就辨别出这是徐树铮的声音。这些人走过去没多长时间，便传来了两声枪响，他们当时就知道“徐头”（部下们对徐树铮的称呼）完了——事后查明，徐树铮共中两枪，太阳穴和脑后各中一弹。

戎马书生终误我

鹿钟麟接到廊坊方面关于枪决徐树铮的电话后，立刻派人告知陆承武，要他于当夜赶往廊坊车站。陆承武在睡梦中被叫醒，得知徐树铮已被处决，他还懵懵懂懂地对来人说：“还需要我去吗？”那人说：“你不去怎么行？非去不可！”

陆承武不得已，只得连夜赶到廊坊，去扮演替父报仇的角色。按照设定好的戏码，薛学海等人被接到司令部。陆承武出面对众人讲

话，说徐树铮是他杀父的仇人，他已经将徐树铮处死，这事和别人没有关系云云。

听到“徐头”果然已经被害，大家就用请求的口吻对一名军官说：“现在徐专使已经死了。我们和他在一起共事多年，是不是可以看看他的尸首？”

军官同意了，众人被士兵带到一片松林里，在那里看到了躺在地上，已经死亡的徐树铮。随后他们又被带回司令部，军官语带威胁地对他们说：“今天的事是私人的事，不跟大家为难。你们知道徐树铮是被陆承武杀死的就行了，别的不许多讲。”

薛学海等人还被逼着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说明与徐树铮的关系。第二天才被张之江派人送往天津。

徐树铮遇害时，千里之外他的一位老师梦到了他。这位老师是居住于南通的清末状元张謇，自号啬庵老人。徐树铮在动身前往平津前，曾专程到南通对他进行拜访。

在徐树铮心中，其实一直都潜藏着一个脱去戎装、专意于文章学问的想法。出国考察期间，他曾在伦敦参观英国文学泰斗约翰逊在世时常去的老酒店，还在约翰逊坐过的椅子上坐了坐。虽然徐树铮并未读过约翰逊的作品，但他对约翰逊生时穷愁困苦，死后却能以文豪的身份享受盛名，接受人们永久纪念这一点非常羡慕。

想到自己半生戎马，尽管有着显官厚爵，可是仆仆风尘之间，功业转眼就会化为云烟，将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记得自己的名字，徐树铮顿感失落。他一时兴起，便在老酒店的来宾簿上写了一篇短文，记述了自己的这一情结。

与先前奔波来去，大多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不同，徐树铮赴南通的目的较为单纯，就是想拜“状元”张謇为师，向他请教学问。在张謇的居所，徐树铮以后辈晚学的身份，一连数日向张謇虚心求教。张謇学问渊博，所谈时局学问，句句扼要，徐树铮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场对张謇说：“从今尔后，树铮将奉啬老（张謇）为师矣。”

徐树铮走后的一天，张謇突然在睡梦中听到徐树铮给他诵读一首诗。从梦中惊醒后，老先生还能记得诗句，遂赶紧披衣挑灯，根据记忆写了下来：“与公生别几何时，明暗分途悔已迟。戎马书生终误我，江声澎湃恨谁知？”

张謇读罢黯然神伤，说：“徐树铮必有事故，看他诗中有悲伤悔恨之意，莫非是来与我作魂梦之别的吗？”没多久噩耗传来，张謇遂作《满江红》一词致哀。

正所谓“戎马书生终误我”，徐树铮的不得善终其实早有迹象，当年他在处决陆建章后，外界就有了“杀人者人恒杀之”的评论。无独有偶，奉系的杨宇霆与徐树铮同有“小诸葛”之称，日后同样是死于非命，若就性格而言，杨、徐的取祸之道可能都在于锋芒太露，风必摧之。

可是在东瀛军界，徐树铮却能得到很多军人的欣赏和仰慕，尽管他本人对日本一直都有防范和敌视之心。

那些日本武官在未经上司允许的情况下，冒着违纪撤职的危险要援救他且不说。后来日军侵华，身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初到北平（即北京），就问徐树铮的后人有没有在京的。当时

有人回答，徐的长子徐审义任法部秘书。冈村便说，故人之子应加照顾。不久，徐审义就得以升任伪教育总署文化局局长。

冈村和徐树铮实在谈不上什么故人，只能说，徐树铮在日本军人中的声名确实很不一般。这或许也是民族性格差异的一种表现吧。

断我股肱

段祺瑞很早就知道了徐树铮遇险的消息。原因是时任交通总长龚心湛为段派人物，当徐树铮的专车在廊坊被扣时，铁路局的段长第一时间就向龚心湛报了信。

段祺瑞听到消息后震惊莫名，可是又无计可施，只好抱着侥幸心理，想慢慢地找寻渠道，设法把徐树铮给解救出来。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得到报告："专使下车，什么话也没有问，就被枪毙了。"

段祺瑞一生以沉稳老练著称，无论遇到多大的险情和困难，都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镇定从容。可是这一报告却让他几乎晕了过去，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断我股肱！断我股肱！"随从段祺瑞多年的人都说："跟老头子这么久，还没有见过他这么伤心呢！"

悲伤之余，段祺瑞欲派人找回徐树铮的遗骸进行装殓，可是却没有人知道遗骸到底被埋在了哪里。过了几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信，信是廊坊驻军司令部的一名姓洪的军医写来的，他自述原名段大槐，后归宗姓洪。清末时他曾在段祺瑞的江北提督衙门给幕府当差打杂，徐

树铮教他读书写字，洪军医遂拜徐树铮为师，并在徐树铮的帮助下考进了天津军医学校。

洪军医说他代收了徐树铮的遗骸，将即日运至北京。原来张之江的部下处决徐树铮后，只是随便挖了个坑，将他的遗骸埋在了附近的野地里。

洪军医听到后便去向张之江请求说：“我小时候在江北提督衙门里伺候做幕的师爷们，徐师爷看我不错，把我送到天津学医，这才有我的今天。他跟都统（指张之江）有什么仇恨，我不知道。念他过去待我有恩，可否容我给他收尸？”

张之江杀徐树铮不过是奉命行事，他跟徐树铮之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个人恩怨，便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于是就说：“大丈夫恩怨分明，你收你的尸吧，我不拦你！”

得到张之江的允许，洪军医把徐树铮的尸体从泥土中刨出来，放进自备的一具薄木棺材，然后用驴车运到北京，停放在永定门外的土地祠里。

段祺瑞为徐树铮的遗骸重换了装裹和棺木，并亲撰“神道碑”，回顾了二人相与的过程，对徐树铮极尽褒扬。他还嘱咐自己的子孙后代，要求以后每年摆供祭祖时，必同时祭供徐树铮牌位。

在徐树铮被害的第二天，京津各报就都登出了陆承武的通电。这份通电实际上是鹿钟麟的北京警备司令部事先早就拟好的，在通电中，他们以陆承武的口吻指称是陆承武亲手杀死了徐树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一般不晓内情的人都知道陆承武的父亲陆建章系徐树铮所杀，所以对于陆承武的举动也深信不疑。

段祺瑞则深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所谓仇者伪也”，他坚决主张明令缉凶。此前迫于各方特别是冯玉祥方面的压力，执政府已成立了国务院，内员多为亲国民军或与国民军方面有渊源的人。国务总理贾德耀是冯玉祥的把兄弟，又系冯玉祥一手推上台，看到段祺瑞所发的缉凶令后，执意不肯在上面副署，事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段祺瑞虽然暂时不得不忍气吞声，但经过这件事，他和冯玉祥之间的关系也就走向了彻底破裂。

徐树铮能够成为段祺瑞的“灵魂”，不仅是由于他的谋划和活动能力，更在于二人在政治理想上高度契合。段祺瑞曾亲自撰写《内感篇》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道，国内的一般学人在游历欧美后，都想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立刻移植过来，就好像是拿别人的装饰物，来美化自家厅堂一样。殊不知上层建筑的东西绝非如此简单，毕竟西方人对他们的那一套早已习惯，而国人在此前的三千多年里，一直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如果一定要强行移植，只会带来东施效颦的结果。

段祺瑞与徐树铮一样，都认为中国的“立国要素”仍是传统的孔孟之道，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其治国之道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纲纪为先”。

作为段幕后起的重量级幕僚，章士钊的政治理念与段祺瑞、徐树铮可谓如出一辙。他是一个“以农立国”论者，竭力主张恢复体现“农国”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礼教，并视礼教为拯救社会危机的对症良药。

可是此时的社会风潮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对北京政府的“纲纪”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段祺瑞慨叹：“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

为此，在执政府尚能维持局面时，段祺瑞便让章士钊由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想通过这位名士出身的政治家来整顿学风。

心力交瘁

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伊始，他下决心从三件事抓起，即宣布大学统一考试，教育部专设考试委员会，主抓学生的入学及毕业考试；教育部设编译馆，督促奖励各大学教授著书、译书；合并北京八所大学。

章士钊的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皆切中时弊，但在当时遭到了教育界及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因阻止学生参加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章士钊自己的住宅也被激愤的学生捣毁，各校学生还聚会请愿，要求罢免章士钊。

章士钊整顿学风的举措归于失败，他被迫呈请辞去本兼各职，经段祺瑞挽劝，才重任司法总长职。

此后，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更为积极踊跃。段祺瑞索性将司法总长委与他人，专调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意图整顿教育，抑制愈演愈烈的学潮。这时正好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的学生要求撤换杨荫榆，章士钊便率先拿女师大作为典型开刀。

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遵循西方教育理论，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不要参加和过问政治运动，在相应的校规校纪上也很严格苛刻，由此激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抗议。

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前往教育部，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章士钊对学生的这种激烈行为非常恼火，决心以强力压制的办法加以整顿。在他的公开支持下，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

女师大学生针锋相对，决定驱逐杨荫榆，发起“驱羊（杨）运动”，从而爆发了女师大风潮。其间，鲁迅、钱玄同等七名教育界名士联合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鲁迅还因此被章士钊开除了在教育部的职务。

鲁迅早就在文坛声名远播，其杂文之杀伤力更是无人能及。他不仅在文章中将章士钊骂得狗血淋头，毫不客气地称章“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而且还拿起法律武器，告倒了这位昔日上司。

最终扛不住的不是学潮中的师生，而是早已丧失实力的执政府。除杨荫榆被免去校长职务外，章士钊也在其住宅再度被学生捣毁后，被迫辞去教育总长一职。书生本色的章士钊在加入执政府前颇负时誉，但掌握教育部却让他背负了太多的骂名，结局可谓潦倒。

事实上，执政府如此“弱不禁风”，与学潮背后的政潮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国共两党当时为反奉倒段，采取了联合冯玉祥及国民军的策略。冯玉祥则密嘱鹿钟麟对运动加以保护。这样在国民军控制下的北京，由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便日益高涨，而且都将矛头集中指向了奉系和段祺瑞执政府。

段祺瑞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饱受舆论指责和攻击外，在北洋系内部，冯玉祥对他百般迫害，“挟天子以令诸侯”；张作霖也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与执政府断绝一切行政关系。

虽然段祺瑞一直高度重视的关税会议仍无具体办法出来，但他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于是决心辞职。1926年1月6日，段祺瑞让人拟好了辞职电稿，但电文尚未发出，各报就已刊出内容。有的幕僚就趁势劝他不能示弱，段祺瑞性格耿直好强，也便将电稿收回，不再提辞职这件事了。

这时的执政府已形同虚设，政令不但出不了北京城一步，就连执政府的大门都出不了，段祺瑞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用于诵经、下棋。虽然他表面上显得十分悠闲安详，但其实忧心如焚，在这一期间所写的《因雪记》中，他叹息道：“纲纪荡然已久，太阿倒持（指大权旁落）有年，人事计穷，欲速不达。心力交瘁，徒劳无补。”

令段祺瑞忧虑的另一件事则是北方“阴云惨淡，兵气沉霾”。曾经由冯玉祥占据上风的“国奉战争”已出现新的转折，一度被逼得差点要下野的张作霖来了个绝地反击，他先是打败并枪毙了起兵反叛的郭松龄，接着又联合直鲁晋各军，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了起来。

夹于各方缝隙之中，冲突方彼此间挤压得越紧，也就意味着无权无勇的执政府越要倒霉了。

其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3月9日，直鲁联军在北塘登陆，被国民军击退。国民军随即封锁大沽口，不准任何船舶驶入。大沽口涉及“辛丑条约”，天津外国领事

团及北京外交使团因此先后提出了抗议。鹿钟麟只得答应重新开放大沽口，但提出条件：外轮不得为直鲁联军运兵运械，外船入口不得有直鲁舰船尾随混入。

3月12日，日本领事馆通知国民军，说当天上午将有一艘日本军舰进入海口，要求国民军放行。国民军方面答应了，但日舰一直拖到下午3点才进入海口，而且后面还跟着一艘船（后查明是另一艘日舰）。

国民军生怕直鲁联军跟在日舰背面发动偷袭，遂开枪要求缓行，日舰即开炮向岸上还击。经过一阵交火，日舰退去，双方互有伤亡。

事后，日本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联合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向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天津、大沽口一带的战争，撤除对大沽口的封锁，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行动。

通牒设定的期限是3月18日正午之前。3月17日，执政府外交部做出答复，除为了维护国家体面，空泛地表示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内容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外，实际上完全接受了通牒的要求。

当天下午，北京各民间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联席会议，决议在天安门前举行大型请愿活动，要求执政府驳回通牒，并驱逐八国公使出京。

执政府的卫队旅旅长宋玉珍年近六十，且身体又不好，具体事务方面主要由参谋长楚溪春负责处理。楚溪春就在这一天接到了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将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当时所在地）和执政府门前请愿，卫队旅被要求到时分别在这两个地点严加戒备。

因前线战事紧张，鹿钟麟已经带着部队到天津与奉军作战去了，冯派的另一名骨干李鸣钟代理北京警备司令，楚溪春接到的就是李鸣钟所下达的命令。李鸣钟在命令中还一再叮嘱，要求在与学生接触时必须万般忍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

这让楚溪春感到十分为难。之前北京已经有过几次学生游行，均未出过事故，原因是那几次都有鹿钟麟的大刀队在两旁随行，大刀队兼维持秩序，同时与游行组织者也形成了默契。这次大刀队也随鹿钟麟去了前线，李鸣钟派不出人来与游行队伍随行，完全都要靠卫队旅独立维持。

楚溪春与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是保定同学，私下关系很好，他对段宏纲诉苦道："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的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只好安慰他："只有兄等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防止，其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卫队旅名为一旅，实际仅有两个步兵营和两个机枪连。楚溪春分了一下工，他亲自到吉兆胡同部署警备事宜，执政府那边则由卫队旅参谋王子江负责。部署时，规定前几排的士兵不准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殴打；中间几排的士兵可以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面几排的士兵才允许携带武器。

1926年3月18日上午，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首先到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国务院门前请愿。游行队伍公推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名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

当时段祺瑞在吉兆胡同，贾德耀已匆匆躲开，卫队便答复说二人均不在。这一答复引起群情激愤，众人高唱着《国民革命歌》和"打倒

列强除军阀”、“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向执政府冲去。

据在场的上尉军械员邱霖说，当游行队伍冲击执政府时，学生用带着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并且痛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这时士兵还能遵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规定，只是一个劲儿地被迫后退。

眼看着学生就要冲进执政府的大门，负责指挥警卫的王子江从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急忙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的本意是让士兵朝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开始士兵也确实是向空中鸣枪的，但是并未能够吓退游行人群。游行队伍中还有组织者大声喊道：“不要怕呀！是放空枪，不要怕！”

人浪继续往前涌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卫队终于失控，他们竟然向游行队伍实施了平弹射击！

铁狮子胡同地方狭小，游行队伍人多拥挤，无法卧倒或躲避，顿时血肉横飞，陈尸遍地。现场气氛恐怖，惨不忍睹。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时，楚溪春正在吉兆胡同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从时间上看早该来了，但还迟迟没有露面，他正想通过电话向执政府方面进行询问，就听到西方传来了枪响。

听到枪声，楚溪春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那边一定出了事故，于是还没来得及摇电话，就乘着汽车直奔执政府而去。

当楚溪春驱车赶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间时，看到很多学生拿着小旗迎面跑来，神情都非常慌乱，其中有丢了鞋帽的，有满脸沾满泥土的，还有人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

因为太过拥挤，汽车没法再往前开，楚溪春便下车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了执政府大门前，只见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卫队旅的士兵打红了眼，还在端着枪四处搜寻。楚溪春当即吹响口哨，命令士兵赶快回到自己营房集合。

随后，李鸣钟等人也坐着汽车赶到了。李鸣钟惊慌失措地对楚溪春说：“晴波（楚溪春的字），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溪春无奈回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

在楚溪春返回吉兆胡同之前，段祺瑞已得到消息，并派段宏纲探视了现场。得知学生伤亡惨重，段祺瑞甚为伤感。在听李鸣钟、楚溪春分别报告情况后，他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才发生了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今后要特别当心，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

不过在楚溪春后来的描述中，却提到段祺瑞正在家里和吴清源下棋，而且他还声色俱厉地对李鸣钟大声说：“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如果不能，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又让楚溪春转告卫队士兵，说自己不但不会惩罚他们，还要赏他们，“这一群土匪学生……”云云。

实际上，吴清源早在前一年夏天就去了日本，和段祺瑞在北京下棋的可能性为零。“声色俱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段最弱势的时

候，李鸣钟直接代表冯方，他哪有那么大的威风训斥对方？同样的，尽管段祺瑞始终反对学生游行，可是无论从他每日吃斋念佛、时时反省早年杀生行为的举止，还是由一个成熟政治家对后果的本能预判上，他都不会对楚溪春说出那些不近情理的狠话。

段宏纲彼时就在段祺瑞身旁，他对此进行了坚决否认，认为完全与事实不符，而从楚溪春的立场分析，之所以要这么说，不外乎是想推托自己在此案中的责任。

据中国济难会调查，游行学生群众共死亡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四十人受重伤。李大钊、陈乔年等中共北方领导人都在惨案中受了伤，当然这里面最著名的死难者还是女师大风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刘和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司法部、高等法院、陆军部组成联合机构，对该案进行会审。由于段祺瑞、贾德耀均未下达过开枪命令，被认为无直接责任，法官便召楚溪春到庭作证。

楚溪春为了让自己和部下不负罪责，出庭前专门开会让众人搜集游行学生的“罪证”。比如找来几支旧手枪，就说是学生们的凶器，找来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则说是学生要拿来火烧执政府。

唯一真实的物证是一大捆学生们用的旗子，因为旗上写着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的字样；另外，执政府南面楼上的玻璃窗上还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圆孔。

圆孔确实是当场被子弹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而极可能是卫队士兵开枪时打偏了。当时正好卫队旅也有一个卫兵被子弹打死了，虽然楚溪春自己都弄不清这个卫兵是怎么死的，有人猜测极可

能是混乱中死于同伴的流弹，但他就索性以此作为证据，指证是学生先开枪，卫队旅乃被迫自卫。

法官听取证词后便以此结案，卫队旅官兵从上至下均未受到处分。到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段祺瑞及其执政府，他们受到了全国的一致声讨，知识界、教育界更是同仇敌忾，纷纷予以谴责。鲁迅连写多篇杂文进行声讨，《纪念刘和珍君》即是其中之一。在这些杂文中，鲁迅称惨案发生当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执政府“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在从政的几十年前，段祺瑞的社会声誉不是没有经历过如同过山车一般的起伏跌宕，他曾因“三造共和”而到达顶峰，又因“亲日”和对日借款不断受损，其间也是曲曲折折，既有下落，也有回升。

“三一八惨案”厉害就厉害在，它是直接一锤子将段祺瑞砸落谷底，老段的政治声望和资源几乎全部都被砸碎了。

段夫子

“三一八惨案”后，国民军面对直奉联军的攻势已无抵御之力。冯玉祥感到除与旧日的上司兼好友吴佩孚重归于好外，别无出路，于是决定趁着执政府因“暴力枪杀良民”而落入窘境，在京城上演一出捉段放曹（曹锟）的武戏，以便讨好吴佩孚。

1926年4月9日夜，鹿钟麟率警备司令部的大队人马包围了吉兆胡同。幸好已经自行脱险的曾毓隽事先得到消息，派人通知了段祺瑞。由于大街上已经戒严、盘查，段祺瑞便由卫队长护送，暂时到同住于一条胡同的老同学家里躲避。

鹿钟麟本来想指挥人马冲进段公馆，活捉段祺瑞，后来发现胡同口有机枪连布防，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双方对峙达三小时之久。对峙期间，北京城里满街都是士兵，气氛十分紧张。

为了防止国民军突破火力布防，强行闯入段公馆，或者在附近进行搜查，曾毓隽灵机一动，特地通过报社连夜发出号外，称段祺瑞已进入东交民巷。鹿钟麟看到号外后，信以为真，只得撤兵回府。

鹿钟麟一返回司令部，即以北京警备司令的名义释放了一直被他们幽禁的曹锟。天亮后，他与其他国民军将领一道发出联名通电，在逐条列举段祺瑞罪状的同时，宣布“保护总统（指曹锟）恢复自由”。联名电还大拍吴佩孚的马屁，说吴为“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国民军“此后动定进止，唯吴玉帅（吴佩孚）马首是瞻”。

怕吴佩孚仍弄不清他们的真意，国民军方面又让重新获得自由的曹锟给吴佩孚发电报，望其与国民军合作对付奉系。未料吴佩孚不但一口拒绝，而且要求国民军全部缴械接受改编，他在给鹿钟麟的电报中甚至称“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至此，冯玉祥才算完全绝望。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城，扼守南口。

段祺瑞虽得以复职，但其政治能量已丧失殆尽。张学良代表奉系，明确表示对维持段祺瑞政权没有信心，只能保护段祺瑞安全离开北京。4月20日上午，段祺瑞在外交总长胡惟德不知情的情况下，特任其兼署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权。当天下午，他乘坐张学良调派的一列专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这是段祺瑞第三次到天津过寓公生活。他在天津没有房产，以前都是住段芝贵或吴光新的宅邸，这次来津，开始是在日租界的寿街租

了一间房子，但有一次他无意中将自己的姓“段”和寿街的“寿”联系了起来，觉得不太吉利。吴光新听说后，便劝他搬到自己位于日租界宫岛街的寓所。

吴光新的这座寓所建于1916年，外形奇特宏大，施工质量很高，可与日租界清逊帝溥仪所居住的张园相媲美。缺点是此处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比较近，经常有日本军政官员来访，段祺瑞不胜其烦，只好经常托病不见。

得知段祺瑞想找一个清净的住所，老部下魏宗瀚就把他接到了日租界须磨街自己的寓所。

下野后的段祺瑞自称“正道居士”，每天吃斋礼佛，十分虔诚，但他的须磨街住宅却并不显得门庭冷落——他的那些部下幕僚，如曾毓隽、章士钊等人全都不离不弃，一路从北京跟随到天津，而其他各路的说客和谋士也经常前来登门“劝道”。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老段真的像他表面宣布的那样只谈佛经不问政治，“政治”也会时不时地来光顾和过问他。问题是，此时的国内政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政坛上的中心人物了。

甚至连段祺瑞本人都不会想到，他实际担负着最后一次挽救和整合北洋系的使命。在段祺瑞黯然下野和段记执政府“杯碎”之后，北洋各派继续相互削弱，使得整个北洋系以加速度奔向自己的末路。

段祺瑞对于北洋系乃至于整个近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吴佩孚是在很久以后才领悟到的。那时候，他也成了被政坛抛弃的落魄寓公，而段祺瑞刚刚去世。

吴佩孚特请人代表他到段宅吊唁，并亲撰挽联。他告诉别人：“我对合肥（指段祺瑞）之丧，一度任秘书，一度任帖写（指挽联等均系吴本人自作自写），此为有生以来第一次，唯对段夫子一人而已。”

吴佩孚所写挽联的联文很长，道尽了他历经波折沧桑之后的感悟：“天下无公，未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知，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吴佩孚送的祭幛为“木坏山颓”。大匾上款为“芝泉夫子”，下款为“受业吴佩孚敬献”，四个大字乃“还我河山”。

那一刻，这位曾经书生意气并无比叛逆的秀才将军，成了最懂段祺瑞的人。

糟得很

北洋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弱，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党却在孙中山去世后，迅速调整了内部关系，并借助苏联的援助而得以壮大。初建的“党军”北伐军和黄埔军校让人耳目一新，以至于许多有志于建功立业的青年都心向往之，连作为北洋后起力量的保定派（主要为保定军校生）也纷纷脱离北洋，投奔南方。

段祺瑞之所以能够在缺乏实力的前提下担任临时执政，靠的是北洋领袖的招牌，以及北洋内部残存的那一点向心力，如今连整个北洋系都要崩溃了，谁还会在乎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头子?

段幕的一群人希望尚存实力的派系能够拥戴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但他们四处奔走，却四处碰壁。就在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向段的左右建议与逊帝溥仪合作，还说：“宣统皇帝是块大招牌，合肥如能与他合作，号召力就比单干大得多了。”

段祺瑞一时昏了头，竟然也听信这些话，想和溥仪拉拉关系。由于溥仪仍自尊为皇帝，不肯枉驾段的寓所，而段祺瑞也不愿降低身份，主动去溥仪所居住的静园，于是双方就相约在溥仪的生父载沣家中见面。

段祺瑞是把溥仪作为一个可以合作的政治伙伴，但溥仪却不这么想，他还把自己看成是大清皇帝，而段祺瑞只是当年那个湖广总督，所以见面时态度十分傲慢，气氛也颇为尴尬，协商合作之事自然就更谈不上了。

段祺瑞又羞又恼，告辞出来后对等候在侧厅的手下说：“我总还当过中华民国元首，这小子竟在我面前摆皇帝的臭架子，真正岂有此理！”

作为“三造共和”的元勋，不仅悄悄地去见了逊帝，对方还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对段祺瑞来说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曾毓隽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就趁旁边没有外人的时候，问段祺瑞：“听说在不久之前，老总和溥仪见了面，有这么一回事吗？”

段祺瑞经此一问，脸上立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接着便很不耐烦地说：“糟得很，糟得很，不要谈了！”

看到段祺瑞那躲躲闪闪、左顾右盼的神态，曾毓隽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其实即便溥仪不摆架子，他与段祺瑞也不可能合作成功。原因就在于二人的目标并不一致。曾毓隽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既是同乡又是世交，往来比较密切。陈宝琛有一次对曾毓隽说："希望你能在段祺瑞身边为逊皇尽一份力量，从中斡旋。能合作更好，不能合作，希望芝泉（段祺瑞）不要反对。"

曾毓隽深知段祺瑞之心，他当时就回答陈宝琛："段一向主张共和，若要求他和逊皇搞复辟，段生性刚愎，这一点我想很难在他面前说得通。"

渐渐地，段祺瑞终于明白复出已完全无望，只得继续过他的寓公生活。与当时住在天津的其他前清、北洋遗老显贵们不同，段祺瑞一生不事敛财生利，闲居时间一长，经济状况便日见窘迫。段祺瑞不得不亲自审查账目，以想办法节约开支。

为减少日常开销，他连麻将都不打了，仆人也减到了最少。幸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前来帮忙打杂，段宅才不至于弄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政坛失意，家境冷落，固然让老爷子心情郁郁，但最令他伤心和难过的，恐怕还是眼看着北洋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尽头，而自己却无能为力——1928年，北伐军攻入北京，由南方发动的新一轮"武力统一"取得胜利，曾经盛极一时的北洋时代终告谢幕。

就在诸事不顺之际，突然有人给段祺瑞寄来了一封信。信是以一个学生的口吻写的："老师可记得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个蒋志清否？那就是我……"

段祺瑞当年在保定筹办军校时，确曾选送学生去日本学军事，但他的学生那么多，哪里还记得一个“蒋志清”？再看下去，才知道“蒋志清”原来就是写信人、现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想到自己培养出来的后辈居然成了新政权的领军人物，而且在得以大红大紫后仍不忘其师，这令段祺瑞大为欣喜，以后常对人说：“蒋介石是我学生。”

我是中国人

1928年秋，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即北京）。当时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居住在北平，且与蒋介石的幕僚吴忠信认识。经吴忠信介绍和陪同，蒋介石与段宏纲相约在北京饭店见了面。

一见面，蒋介石就对段宏纲说：“我亦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接着便询问了段祺瑞的起居生活情况。

随后，蒋介石对吴忠信说：“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段先生，请你代表我去。”当天下午，在段宏纲的陪同下，吴忠信到津谒见段祺瑞。

返回北平后，吴忠信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得知段家生活确很困难，蒋介石马上让人给段祺瑞送去两万元。在以后的三四年内，他还向段祺瑞赠送过几万元生活费，段家的生活问题遂得到了解决。

蒋介石此举，既是念及往日的师生情，同时也有加强政治联络的考虑。因为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北方的政治力量还比较薄弱，亟须借助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惦记着段祺瑞的，不光有他的学生，还有蠢蠢欲动的日本人。1931年，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慑于国际舆论，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直接对东北进行统治，于是就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寻找到适当的人选做傀儡。

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为此在天津积极活动，准备在溥仪和段祺瑞二人中择其一出关组织政府。段祺瑞能够进入土肥原的视线，当然是因为他在北方的影响力以及过去执政时“亲日”的历史，但段祺瑞“亲日”有个前提，那就是得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与之相悖的事他是坚决不愿做的。

在接受天津《大公报》的记者采访时，段祺瑞说：“盗已入室，但亦未必即据为已有，只有给他些东西，让我们自己收回来再说。”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白，即他可以在东北另外成立一个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也可以答应日本的一些要求，但绝不同意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段祺瑞的态度让土肥原深感这老头不好糊弄，即便到了关外，也未必肯俯首听命，到那时弄巧成拙，反而对日本不利。这样他只好把溥仪拉到大连，并于1932年3月成立了伪满洲国。

1933年年初，日军先攻榆关，再攻热河。东北军不战而溃，战火烧向长城一线。日本外务省次官吉田茂奉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之命，来天津找到曹汝霖，要他请段祺瑞出面，与西园寺一道，以中日在野元老的身份共同“调停”斡旋，商定中日两军“就地停战”。

在曹汝霖的陪同下，吉田茂拜见了段祺瑞。得知对方来意，段祺瑞当即明确答复，“调停”可以，但撇开东三省，“调停”就无从谈起。

“我们在野之人出来调停，说话要有根据，当局若问到东三省，将如何答复？我看单从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怕没有这样简单。”

他认为：“现在中国军队气焰之高，不下于关东军。若说停战，应由日本先停，因为这次是日本先开战的。”

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可能为日方所接受。吉田茂见话不投机，很难再谈下去，只得起身告辞。

送走吉田茂，曹汝霖忍不住抱怨道：“芝老，人家是真心希望和平的呀！况且当初支持你又不遗余力。”

段祺瑞则犹有余愤：“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本一边举兵对关内发动进攻，一边酝酿建立“华北国”，所选中的第一个人就是段祺瑞。王揖唐利欲熏心，在看望段祺瑞时，常常用含蓄的话进行试探，企图劝段祺瑞出来为日本人做事。

蒋介石风闻后，不断派民间人士和专使北上，请段祺瑞南下，并说明他如果继续留在北方，恐为日本人所利用。经过南方代表这么一讲，段祺瑞才明白王揖唐的用意，于是便准备动身去上海。

王揖唐知道后急忙前来劝阻，而且话语渐渐露骨，说段的事业都在北方才能取得成功，虽然现在家里穷，将来总有机会出头，千万不要南下。段祺瑞对此很不满意，对家人说：“王揖唐不怀好意，我要教训他。”

等王揖唐再来，段祺瑞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应该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先、父母和子孙后代。我决计到南方去，以后不要再来多说了。”

除王揖唐外，段宏业等少数人也曾对南下持有异议，段宏业甚至为此和吴光新拍了桌子，但段祺瑞一言裁决：华北局面愈来愈复杂，我离开这个旋涡乃是上策。

1933年1月21日凌晨，段祺瑞乘专车离开了天津站。这位自称“吾老矣，无能为”的老人在告别北方的这一刻，也为自己过往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足以自豪的句点。


蒋介石巩固其在国民党内地位
中
民国军

中原大战

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关河五十州★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 关河五十州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43-3299-5

Ⅰ. ①中… Ⅱ. ①关… Ⅲ. ①蒋冯阎大战- 通俗读物 Ⅳ. ①K263.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625号

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作　　者　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　张　霆　许君达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299-5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关键时刻

第二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

第三章　仇敌满天下

第四章　一石掀起千层浪

第五章　大玩家

第六章　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

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关键时刻

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万全之策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外，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

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致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

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精诚所至

黄郛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尤其对黄郛出版的“一战”专著极为欣赏，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郛，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

黄郛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他邀请黄郛定期去南苑军营，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以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从北平到南苑，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黄郛向有胃病，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经常捂着肚子叫痛，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然而黄郛仍坚持不懈，他说：“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让他们）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或者可以少误国事。”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冯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次黄郛讲演结束，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便饭。虽然请的是晚饭，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黄先生（黄郛）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

黄郛的工夫没有白费。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冯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更进了一步。当年美国《每周评论》发起民意测验，在“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名列第二，超过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脑吴佩孚。

眼见“首都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黄、冯经过多次密谋，决定发起政变。通过政变，冯玉祥罢黜了“贿选总统”曹锟，解散了声名狼藉的“猪仔国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

很多时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南京政府的国民党要员，不管老的还是新的，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深。

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甘辞厚饵”的情况下，黄郛出面稍一斡旋，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徐州与其见面。

1927年6月19日晨，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一时间，郝寨车站的站台上冠盖如云，众人都屏息以待，静候着那个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很久，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

军乐队赶紧奏起欢迎曲，按序排立在月台上的蒋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肃衣冠，并纷纷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前面的车厢是“花车”，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里面有卧室、起居间和饭厅。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

大家一齐向后走去。令人诧异的是，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

等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个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着众人招手，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暄。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反过来，让他帮武汉打南京。

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谁也不打。他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专车抵徐，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会商过程中，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竭力赞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上力主"调解"，并且说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内部不能再进行自相残杀了。

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让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晚宴上，冯玉祥一语惊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

紫气东来

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来又赴苏联考察，这让他在北方军人中几成异类。张作霖和吴佩孚都说：“南方的‘赤化头子（南赤）’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北赤）’是冯玉祥。”

冯玉祥的惊人之语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开始借题发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

有蒋介石“师爷”之称的吴稚晖心领神会，立即呼应道：“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

6月21日，蒋介石拿来拟好的一份电报稿给冯玉祥看。冯玉祥看后无异议，便与蒋介石共同在电稿上签了名，这就是“马日通电”（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

“马日通电”出自于黄郛手笔。黄郛自始至终参加了徐州会谈，他起草的这份通电有两个内容最为重要，其一是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生意场上，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蒋介石为“马日通电”付出的代价是，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两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

冯玉祥从徐州返回郑州后，即将“马日通电”发出。武汉政府顿时陷入孤立和被动，汪精卫曾经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以“左派领袖”的面目与蒋介石进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和平分共”。

宁汉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亏的汪精卫以“在夹攻中奋斗”为口号，派张发奎率粤军“东征”，武汉政府也准备随之东迁。为了抵抗“东征”，蒋介石将徐州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南京进行防御，结果造成徐州空虚，被孙传芳趁机予以攻占。

有人建议缩短战线，退守淮河，但蒋介石认为徐州乃战略要地，放弃徐州，势必助长北洋政府和武汉的气焰。他调来嫡系的第一军两师，亲自指挥对徐州发起反攻。

出师时，蒋介石誓言说，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与愿违，不但徐州没有打下，而且败得很惨。

徐州反攻战的失败，让蒋介石认识到不搞定武汉就无法分身北伐。于是他召来负责前线指挥的何应钦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讨汉事宜，不料白崇禧却不愿服从命令，而主张与武汉讲和。

蒋介石闻言非常生气，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讲和好了。”

白崇禧话一出口，就让老蒋栽了个悬梁的大筋斗：“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又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白崇禧并非出言无意，实际上是在“逼宫”。

“逼宫”不是偶然的，这是新桂系蓄谋已久的一次突袭行动。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对于已被他们扫荡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这支崛起于广西的新兴地方军事集团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时人也常以“李白”并称。

“李白”的桂军第七军在北伐军中占据八分之一，蒋介石对他们不能不重视。李宗仁可以时常出入于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从来无须预先约定。他们谈话有时是为了公事接洽，有时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闲聊时，蒋介石突然问他：“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岁。”蒋介石便说：“我大你四岁，我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也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连忙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哇！”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蒋介石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兰谱。

李宗仁又推辞：“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

蒋介石站了起来：“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他抢上两步，把兰谱塞入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并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去之后，把蒋介石所写的兰谱拿出来一看，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介石写完誓词，郑重签上“蒋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陈洁如”四字。

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换兰谱，拜把子，甚至结为儿女亲家，只是当时南北双方要人拉近彼此关系的习惯做法。新桂系不是这样，他们强调的是团体，从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广西的三把手黄绍竑，三人都没有金兰结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对与蒋介石结拜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除了老婆外，也没向任何一个人提及。

然而蒋介石却是认真的。他对李宗仁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呀！”过些日子又继续追问：“帖子写好了没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难为情，实在推托不了，他便支吾着说不知道如何写法。蒋介石想了想说：“那你就照我给的那种方式写吧。”

蒋介石如此一说，李宗仁也就真这么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为“李宗仁，妻郭德洁”。

白崇禧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白崇禧原在第七军任参谋长，蒋介石筹组北伐军司令部时，就提议把白崇禧调升司令部参谋

长。他找李宗仁商议，李宗仁还颇觉意外，说：“恐怕健生（白崇禧）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则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最后内部探讨下来，决定由资历较深的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由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留守，其职权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间，军中仍呼白崇禧为“参谋长”。

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后，北伐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站在蒋介石一边。这种情况连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

这还不是兵变吗?

白崇禧要往老蒋眼里插棒槌，这根棒槌搁不搁得住，就看旁边的何应钦如何反应了。

何应钦时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在所谓的“黄埔系”中，俨然蒋、何并称，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从黄埔时期开始，蒋、何就有了默契合作，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尤其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中，当蒋介石的指挥部被包围时，何应钦曾亲自督队冲锋，挽救危

局。那一天后来还被蒋介石定为他和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在此之前，何应钦对蒋介石一直是言听计从，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如今遭到白崇禧的“逼宫”，蒋介石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何应钦身上，他希望何应钦赶紧站起来，即便不扇白崇禧一个漏风掌，起码也得让对方噎到话都说不出来。

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应钦居然一声不吭，对老上司的求助暗示视若不见。

蒋介石的脑袋顿时蒙了，他气得当场拂袖而起：“好，好，我这就走罢。”

回到寓所后，蒋介石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达半小时之久。第一军虽然被称为他的嫡系部队，但实际上该军只有刘峙一个师算是绝对忠诚于蒋，其他两个师都不太靠得住，如果身为军长的何应钦再不表示支持，确实就完蛋了。

直到此时，蒋介石仍然不愿相信，在自己再次遭到“包围”，政治生命即将面临覆亡危险的时候，何应钦真的会见死不救。

考虑再三，他传来侍卫长：“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字敬之）来！”

何应钦接到电话后随即赶到蒋介石的寓所。蒋介石尽量用很亲切的语调问他：“敬之，你以为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提议如何？”

何应钦回答道：“在当前形势之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说完，就返身告辞而去。

蒋介石把何应钦看成左右手，可是何应钦却有另外一番想法。他自认与白崇禧私交甚厚，不愿轻易与之翻脸，而且以他的眼光来看，徐州新败，南京政府腹背受敌，这种情况下，若再与武汉交锋也确实不智。

显然，今日之鲍叔已非昨日之鲍叔，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

见蒋介石已完全落于下风，南京政府的军人都纷纷站到了新桂系一边，有人甚至说："不管长衫佬（指吴稚晖等文官）赞成与否，我们主张与武汉合作。"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蒋介石想到以辞职相威胁。"师爷"吴稚晖则赶紧召集在宁要员开会，要动员大家对蒋介石进行挽留。

会上，吴稚晖首先发言，不外乎是目前正在北伐，蒋介石又担负北伐的军事主责，所以绝不可以辞职云云。他刚刚坐下，何应钦就站起来说："总司令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

接着白崇禧也站起来发言："革命是大家的事，总司令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相对来说，李宗仁的话算是比较客气："请总司令自决去处。"不过他的实际意思其实和何、白并无不同。

吴稚晖仍想站起来替蒋介石说上几句，有人从背后伸手拉了他一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低语道："这还不是兵变吗？你不要老命啦？"

“兵变”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在召开会议之前，李宗仁已经把第七军部署在了南京以西，同时又联络反蒋的周凤岐，让后者派部队进入南京外围，从而对南京城形成了包围。

蒋介石明白大势已去，只好主动表白，说他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会议遂不欢而散。

8月13日，在“李白”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刚刚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与蒋介石共进退，几天后也宣布引退。

能忍人所不能忍

蒋介石下台后，冯玉祥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精卫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松弛了不少，于是李宗仁决定前往武汉商谈宁汉合作事宜。

这时孙传芳已陈重兵于江北。北洋军在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炮声终日不绝。李宗仁所乘的“决川”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他们乘夜间跑到下关上游约二十里的江面，以芦苇为掩护，才得以安全登船。

8月22日黎明，“决川”驶近安庆江面。晨光熹微中，李宗仁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分布着许多武汉方面的部队。过安庆时，两岸的唐生智部队更多，不仅岸上有络绎不绝的步兵，江面上也出现了载运辎重及火炮的运输船只。

安庆连同整个安徽在内，早就被新桂系视为俎上之肉，但因为徐州失守，第一、七军均调驻南京，安庆附近并无驻兵，武汉部队占据安庆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队并不属于原先“东

征”的张发奎。张发奎因追击南昌起义军已经跑到广东去了，现在占领安庆的是唐生智。

李宗仁对此自然极不满意。在庐山会谈时，他特地强调了沿途所见的情形，并坚决要求唐生智停止东进。

李宗仁讲完后，汪精卫便说：“德邻同志（李宗仁字德邻）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他把目光移向唐生智：“孟潇兄（唐生智字孟潇），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头看了一下汪精卫，接着又把视线转移到李宗仁的脸上，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与蒋介石的不怒自威相比，汪精卫比较有亲和力，谈话过程中风度翩翩，彬彬有礼，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同时他的口才也十分了得，语言简练清晰，层次分明，很少有废话，每次演说的记录不需删改，便是一篇好文章。据说当时的青年人初次见到汪精卫，很少有不被他折服的。

可是乱世之中，亲和力也是需要实力依托的，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汪精卫不掌兵权，张发奎曾是他依赖的主要骨干力量，张发奎一走，他就只能依恃唐生智。唐生智当场不给面子，让他十分尴尬，连平常口惹悬河的舌头也变得不好使了。

见汪精卫一声不吭，两手搓个不停。众人只好把目光都集中在李宗仁和唐生智身上，李宗仁停了半晌才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果开

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生智把两眼一瞪：“我可不管这些！”

李宗仁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你的军队能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生智摇摇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所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李宗仁又建议唐生智把兵北调到巢湖，说芜湖只是米市，巢湖才是真正的鱼米之乡，而且这样还可以北上截断津浦路，与南京方面形成呼应。

要让唐生智把即将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唐生智板着个死人脸，一字不饶地说：“李同志（指李宗仁）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唐生智执掌的是湖南湘军。在依附广东革命军之前，他被吴佩孚逐出长沙，并准备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李宗仁已先一步在革命军阵营中“入伙”，接到唐生智的求援电后，他立即派援兵将吴佩孚阻遏于衡阳。

按照李宗仁的说法，他因担心桂军的力量独力难支，又积极促成了援唐北伐。不仅如此，唐生智能够在刚刚“入伙”的时候就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也有李宗仁的一份推荐之功。

李宗仁后来回忆初次见面的情景，他还记得那时的唐生智身材高大，留一撇北洋军人常爱留的八字胡，一上来就和他握手言欢，谈笑

风生，并且还说要报答他。

时间过去并不是很久，唐生智那可爱的八字胡还在，但人却变了。当然不是现在才变，自打攻入武汉起，李宗仁就感觉到了。

随着湘军实力的恢复和扩大，唐生智开始变得不可一世，并隐隐然以清末曾国藩的后继者自居。因为桂军起自于从前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唐生智便以“老长毛”呼之，还称两湖、三江一带加入桂军的新兵为“新长毛”。到武汉政府预备“东征”，唐生智更是以“打倒老长毛”来号召部属。

加上这次庐山会谈中唐生智表现出的蛮横态度，李宗仁得出的结论是，他已经彻底翻脸不认人了。

想想这小子以前为吴佩孚所败，穷途末路时，对我是何等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啊！一旦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至极！

猴子拉稀，小人儿也会坏肠子，李宗仁对唐生智愤恨不已，但他并没有当场发作。在广西，李宗仁能被公认为新桂系老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他“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说白了，也就是比一般人更善于打利害算盘，知道什么时候得夹着尾巴，不轻易干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傻事。

见唐生智不肯相让，李宗仁强压胸中一口恶气，不再与之争执。在他的要求下，汪精卫另派谭延闿、孙科随其回宁，以便显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

宝刀未老

李宗仁一行乘舟东返，在到达芜湖江面时，突然有数十艘帆船从上游急驶而来。船上的人分排就座，一看就是孙传芳的北洋军，其中离得最近的一艘帆船仅仅只相隔二十米。

李宗仁以作战勇敢顽强著称，人送外号“李铁牛”。面对意外状况的出现，他丝毫不惧，反而还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你们是敌人，赶快缴械！”

对方的那艘帆船一声不响，直到两船距离拉近至七八米，一个连长模样的人才一跃而起。只见他从船夫手中抢过竹篙，然后高高举起，想用竹篙一头的铁钩来钩“决川”的船沿，与此同时，他还招呼自己的士兵：“冲锋，登船！”

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大声向卫士们下令：“这是敌人，快开枪！”

李宗仁的警卫排全部配备驳壳枪，立即与北洋军展开短距离的隔船互射。一时间，烟雾弥漫，弹药横飞。

李宗仁和孙科、谭延闿原来都站在船侧的走廊甲板上，此时赶紧避入舱房。孙科、谭延闿一文一武，孙科是个纯粹政客，吓得满地躲子弹。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长期督领湘军，且少年时即喜骑射，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他和李宗仁一道凭窗观战，见有一名副官枪法不准，老是打不中，就对那副官说：“你把驳壳枪给我！”

谭延闿年近五十，却宝刀未老，接过驳壳枪后弹无虚发，迎面冲过来的敌船竟然被他打得人仰船翻。

这时归“李白”指挥的陈调元正驻军芜湖，闻讯也派了一个机枪连前来援助。北洋军队虽然船多，但火力被完全压制，最后有的沉没，有的逃回岸边，一场水上枪战宣告结束。

李宗仁把庐山会谈的情形简要地跟陈调元说了一下，陈调元也告诉李宗仁，唐生智确有东下迹象。两人分手后，陈调元果然接到唐生智的一封信，信中让陈调元把芜湖让开，不要阻止他东下之路，以免“误会而发生意外”。

陈调元发来的电报，让“李白”又气又急，但他们还是告诉陈调元，如果唐生智真的逼近芜湖，就立即率部向南撤退，避免与之发生冲突。

“李白”已经顾不得跟唐生智计较了。因为他们正面临着比芜湖遇险更为惊心动魄的形势——孙传芳从龙潭南渡，直逼南京。

孙传芳的部队素来能战，是北伐军的头号大敌。此次孙传芳又效仿项羽的“破釜沉舟”，亲自在龙潭督战，因此其攻势极猛。相比之下，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自蒋介石下野后，士气和斗志都受到很大影响，负责防守南京的第一军各部禁不住北洋军的猛烈冲击，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程度，而因为通信断绝，何应钦又无法通知和指挥沪杭线的其他部队。

当防守部队溃退至南京城外时，城郊也同时出现了孙传芳的便衣队。南京城内闻风震动，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党部、报馆纷纷将招牌取下，国民党的相关人员随时准备在城破前逃往汤山。谭延闿、孙科同样惶惶不安，他们一个晚上给李宗仁打了几次电话，向他探询前方战况。

谭延闿在芜湖遇险时尚如英雄出世，此时也颇有些后悔随李宗仁来到南京，他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莫不是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哇？”

当时南京军事实际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共同负责。白崇禧因筹军饷已去了上海，李宗仁见情形危急，连忙前去第一军指挥部寻找何应钦。

民初的南京只有一条马路，其余街道都不能通汽车。当李宗仁乘汽车到达总指挥部所在的巷口时，发现那里人声嘈杂，行李堆得满巷都是，似乎正在做撤退的准备。

何婆婆

看见李宗仁到来，指挥部人员均让路敬礼。李宗仁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众人齐声回答：“在里面，在里面。”

李宗仁走进指挥部，却见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他忍不住叫道：“何敬公（何应钦字敬之）！为什么搬行李出发呢？”

何应钦一抬头，看见是李宗仁，脸上便现出了忸怩不安的神态：“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就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李宗仁是在子弹中泡大的，这点虚招哪里瞒得了他：“现在战局这样紧急，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况且你行李都捆绑好了，人员全都集合在巷子里，这不是准备出发开拔了吗？”

何应钦见搪塞不过去，只好摊牌：“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李宗仁哪里肯放他走：“首都（指南京）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

何应钦一脸苦相：“德邻兄，我的军队打不得了呀！”

李宗仁顿时声色俱厉：“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应钦见李宗仁脸色都变了，赶紧说：“你要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你要我怎么办？”

李宗仁把心一横：“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民心军心，南京就守不住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应钦在军中有“何婆婆”之名，常给人不够刚猛的印象，但若有人从旁施压，亦肯拼死坚持，过去棉湖之役就是如此。见李宗仁如此坚决，他马上吩咐自己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随后便与李宗仁同车赶往军委会，一起商讨如何发起反攻。

此时一个巧合帮了他们大忙。原来白崇禧在从上海返宁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正好可就地调动沪杭路的第一军向龙潭反攻，以此形成了对孙传芳东西夹攻之势。

由于和南京的有线电话已被破坏，随身又未携带无线电器材，白崇禧便在无锡车站使用车站电话联络上海，再由上海方面用无线电转发南京。

接到白崇禧夹击孙传芳于龙潭的电报，李宗仁、何应钦不禁精神大振。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八百万发子弹，由何应钦负责保管，必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李宗仁便问何应钦：“现在我第七军、十九军缺乏子弹，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

何应钦很谨慎地问道：“你要多少呢？”

李宗仁报了个数：“六十万发！”

何应钦皱着眉头：“德公，太多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一样，打仗时都是不算经济账的，何况南京战局又已经如此紧张。他对何应钦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呀！”

何应钦笑了笑：“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李宗仁对“何婆婆”抠抠唆唆的小气劲颇不以为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但也不便再与之争执，就说：“好了，好了，就三十万发吧！”

白崇禧率第一军出乎意料的夹攻，令北洋军腹背受敌，战局顿时为之大变。孙传芳的“破釜沉舟”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必须一击而胜才能取得成功，现在被夹在中间，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加上缺乏补给，最终只落得个一败涂地、全军覆灭的下场。

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白崇禧在这一战役中被认为居功至伟，谭延闿在设宴慰劳作战将领时，曾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联曰：“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实际上，“李白”能在龙潭之役中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种种巧合，也可以解释成是天亡孙传芳或者北洋，其中谈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战略战术。

除了运气使然之外，当然还得靠硬拼。拼士气、拼武器、拼后援，成为当时国内正规战的一个普遍特点，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本身敢拼能拼，是他们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

“李白”因龙潭之役而身价大涨，心也随之变得更大了。他们曾打出过“反蒋拥汪”的旗号，但当通过庐山之行，发现汪精卫连手握重兵的唐生智都驾驭不了时，便不再把他放在眼里。

泥菩萨

9月5日，汪精卫偕武汉政府要员自武汉抵达南京。当天街上便贴反汪的不署名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

汪精卫岂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欢迎会上，他当面质问李宗仁：“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谁敢贴标语骂你呢？”李宗仁做一脸无辜状，“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汪精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李宗仁居然还能继续劝导：“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

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驻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可没有李宗仁所说的那种“淡然处之”的涵养，在南京稍一逗留，便前往上海租界。汪精卫毕竟拥有政治号召力，他一走，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都纷纷去了上海。

中国的玩政治，跟美国选总统完全是两码事，说穿了，要诀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拉人站队。李宗仁自身在国民党内无根基，拉人方面比较弱，他便着意与谭延闿、孙科等人结交。谭、孙虽然是原武汉政府的官员，但两人并非汪系官员，现在见李宗仁这么把他们当回事，也就乐得拉着他一道去上海开开眼界。

这时的上海冠盖云集，从中央执监委到西山派，能来的都来了，只有蒋介石因为仍在和汪精卫闹意见，所以没有出席。

开了几天谈话会后，各方决定合组“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机构，同时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政府成员。

特委会主要由沪、宁、汉三部分委员组成。宁汉是蒋汪两系的人物，所谓沪是指整个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以张继为首，包括林森、邹鲁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人，且均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持有异议。孙中山去世后，这些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集议，主张坚决反共，从而与当时以容共为号召的蒋汪相对抗，由此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

由于涉及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西山派与蒋汪都矛盾极深，这甚至已经超出了反共容共的范围。即便后来宁汉分裂，宁方已

经“清党”，蒋介石对这一派别的态度仍无丝毫改变，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经常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西山派也一样对蒋汪始终保持着敌视的态度。张继公开说，蒋汪都曾与共产党合作过，都是有罪的人，不能让他们参加特委会和未来的南京政府。

在上海，李宗仁和西山派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李宗仁有枪杆子，但缺政治资源，亟须这些“年高德劭的老同志”推上一把，于是便称赞对方“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

西山派的人见新桂系声势日隆，又与蒋汪不对付，也存心拉拢。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这些老头子就处处对李宗仁表示好感。

双方一拍即合，里外一吆喝，对汪精卫展开夹攻。他们紧紧抓住汪精卫在宁汉对立中“反共过迟”的把柄，对汪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和谩骂。汪精卫有苦难言，被迫一再声明：“及时引退，听候处分。”

9月15日，特委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张继做政治报告。会议同时任命了一批国府政务委员和军委会委员。

虽然汪精卫也被任命为国府政务常委，但他失去了控制权，而且宁、汉两派在特委会中的名额也均不占有优势。汪精卫为此大失所望，遂以患病为由拒绝加入特委会，之后动身离开上海。汪系人士亦随之离开了京沪。

特委会和军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新桂系大权独揽。南京政府表面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实际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白”的意旨。军委会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个军事指挥机构一共有三个常委，分别是程

潜、何应钦、白崇禧。程潜虽位列常委之首，但他的老部队早就被蒋介石解除，新部队又不受重视，“李白”不过是利用他的老招牌来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与白崇禧的私谊不错，又有帮助“李白”“逼宫”、合力促成龙潭大捷的功劳，然而因为他终究不是新桂系团体的成员，所以“李白”也始终不把他当自己人对待。

何应钦当然有理由表示不满，可是凭他的那点能力和心眼，要独自与新桂系抗衡，也是件不可能的事。在军委会，何应钦的处境和程潜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无权过问具体事务的“泥菩萨”。

栽赃陷害

一场角逐下来，蒋汪两败俱伤，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势力从此开始抬头，这让唐生智感到了压力。

唐生智曾趁“李白”苦战龙潭，无暇分身之际而占领芜湖。龙潭战役后，他知道“李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就派叶琪出使南京，声言他绝不放弃安徽。

李宗仁告诉叶琪，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琪说，唐生智连安徽省主席都任命好了，省政府也已经在安庆办公很久，所以最多只能答应让出芜湖，不会放弃安庆。那意思，放弃安庆不是单纯地盘的问题，而是还涉及个人面子——如果“李白”坚持要把安徽全都收过去，“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

“唐总司令”真是太不明事理了。经过龙潭之役，李、白、何的部队损失很大，一时难以补充，这是他预料得到的。他没料到的是，另

外还有两个人和他过不去。这两个人的加盟，在弥补南京革命军损失的同时，又令对方如虎添翼。

两个人，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谭、程历史上都担任过湘军总司令，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来在湘军内斗中被逐出湘，才率部“来粤就食”。按照唐生智原先的设想，谭、程都是湖南人，纵然不帮他的忙，至少也不会和他为难。

可是唐生智想错了。都是湖南人怎么了？大家还都是中国人呢！帮忙抑或为难，跟哪里人没关系，跟你以前表现怎样，对人家做过什么极有关系。

唐生智这个人，只要一得意，屁股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谭、程在湖南时都和他打过仗，也都对他印象不佳。当初听到援唐北伐，谭延闿就不起劲，他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

老谭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讲话一般都留有分寸。程潜就没有他这么含蓄了，而且对唐生智余怒犹存：“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依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还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

谭、程都是有部队的人，一个是第二军军长，一个是第六军军长，在最初参与北伐的八个军中都各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兵固然没有唐生智的部队精悍能战，可若与新桂系合为一处，那就不容小觑了。

除此之外，汪精卫及其所代表政治派系的分崩离析，也让唐生智失去了所能借重的政治势力。实际上，无论军、政哪一方面，唐生智

都没有一点可以与“李白”“周旋”的把握。

退一万步说，就算唐生智愿意吐出安徽，基于过去的积怨，“李白”肯不肯放过他还是个问题，何况他还舍不得吐呢。

民国纷争犹如春秋演义，要么不打仗，打仗就得师出有名。说唐生智抢了自己地盘，或者骂自己“老长毛”之类，很难上得了台面，要想上台面，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栽赃陷害！

南方人眼里的坏人是北洋，若是唐生智与孙传芳有一腿，自然他也就成了坏人。“李白”便说唐生智与孙传芳互相勾结，意图夹攻南京政府于京、沪、杭三角地带。他们为此编了个段子：唐生智在听到孙传芳兵败龙潭的消息后，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你为什么不等我的部队到达南京，然后再渡江发动攻势？你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是自招覆灭，祸有应得！

作为实物证据，“李白”还举出，在龙潭之役后，南京革命军缴获了孙传芳的秘密文件，里面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的字样。

不管唐生智承不承认，反正这盆脏水是泼他脑袋上了。10月19日，“李白”联合谭延闿、程潜，发起西征讨唐的战役。因为程潜是军委会名义上的第一常委，加上唐生智的根据地又在湖南，所以在“李白”操纵下，程潜便被任命为西征军总指挥。

西征的准备行动非常隐秘，所有部署都以北伐为掩护悄悄进行，部队也都是黑夜渡江，以避开侦探的耳目，唐生智对此毫无察觉。

唐生智派出的特使叶琪虽属湘军，但他是广西人，且与“李白”等都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同学，所以“李白”待之甚厚。其间叶琪住在第七军军长，同时也是他的同乡兼亲戚的夏威家里，李宗仁特地关照夏威：“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夏威终日带着叶琪游山玩水，叶琪对“李白”发兵的事也毫不知情。

到西征军正式发起进攻，已用不着对叶琪保密了。叶琪知晓后勃然大怒，说你们要打唐生智可以，但不应该瞒着我。他要求按照“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立刻放他回武汉。

李宗仁把人情做到底，将叶琪送到下关，同时他也乘轮西上，到前方去指挥西征军。两人都要乘船出发，只是心境和目的大有不同，这一番握手道别的情景倒也颇有意思。

问问再说

唐生智的部队号称百团，但基干主力实际只有三个军，其余大多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并不强。同时，这三个可供指挥的军又都分别集中在安庆、芜湖、武汉，每座城市驻一个军，成了一条长蛇阵，力量很分散，并不利于作战。西征军势如破竹，为时不足一月，便已攻至武汉城下。

其实唐生智本来有更好的选择。早在蒋介石遭到“李白”“逼宫”时，黄郛和蒋百里就曾到汉口找过唐生智。他们认为，以当时军事人物所拥有的影响力而论，蒋介石、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可谓并驾

齐驱。既然蒋与桂已有意见，黄郛建议唐生智与蒋合作，然后以蒋、唐合作为中心，再联合阎、冯，这样，新桂系就不敢动了。

蒋百里也向唐生智强调了与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甚至还说："你们可以拜把子嘛！"

那个时候，唐生智谁都看不起，无论蒋还是桂，遂一口回绝。

黄郛来汉口，当然是替蒋介石说话。与之稍有不同的是，蒋百里主要还是为唐生智着想。作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兵学家，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唐生智就读于保定军校第一期，在校时学习成绩优异，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

眼见得唐生智终于被新桂系一步步逼至绝境。蒋百里又重新联络已从日本归国，即将准备复出的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仍愿意与唐生智合作，并授之以计：能打垮新桂系就打，否则按兵不动，并退回湖南，经济上可由他负责接济。

唐生智的部队以湘军为主体，收缩至湖南后，他们既有熟悉地形之利，又能相对地集中力量，至少守住湖南是有可能的。要说有问题，其实也就是经济会遭遇困难，过去唐生智遇到军费不足的情况，都得靠湖北、安徽两省的税收接济。

在蒋介石已经承诺由他补贴银子的情况下，蒋百里感到这是帮助唐生智摆脱困境的一条上上之选，因此急忙托人转告唐生智。

没想到一番好意却并没有能够得到爱徒的理解。唐生智认为，蒋、桂以后终究要发生冲突，如果他同蒋合作，桂一看情势不对，也可能会迅速改变立场，转而与蒋合作，那还不如回到先前的状态呢。

唐生智的说法可以说有道理，也可以说毫无道理。民国交战，本来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这种分合也都会依条件维持一段时间。蒋既答应跟唐生智合作，只要不出现太大的意外，不见得就会马上抛下自己的合作伙伴，否则于情于理都不太讲得通。

唐生智实际上还是看不惯蒋介石，不想跟他合作。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会议，着重讨论军队整编问题，唐生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认为蒋介石持论不公，私心很重，从此就对蒋心怀不满。

在唐生智的心目中，他是把自己和蒋、桂放在一个盘子里的，所谓三足鼎立。按照他的算计，如果他不下野，就会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他不出所料地被桂打垮，那么他将和桂两败俱伤，占便宜的是蒋介石。第二种，发生奇迹，新桂系被他打垮，但唐、桂还是两败俱伤，占便宜的仍然是蒋介石。第三种，蒋、桂合起来打他，那他唐生智就可能万劫不复了。

为了不让这三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发生，唐生智下决心离开部队，通电下野。当然他的下野跟老蒋一样，都是暂时离开，没有打算从此洗手不干。

无论湘军还是桂军，维系首领与军队关系的，都不是什么“革命”，而是私人感情。说穿了，就是首领与各层面军官们的利益关系。因为军官们都知道，只有提拔自己的大头头在，他们的利益和位置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唐生智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他的湘军不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两三年后等他回来，那些军官大部分还在，他仍然可以掌握住这支军队。

唐生智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早就练就了一套生存技能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决心既下，他立即做出部署：自己东渡日本，部队退回湖南。

这时唐生智得到情报，说程潜与张国威、何键有联系。张国威是第八军第一师师长，何键是第三十五军军长，先前他还被唐生智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两人所掌握的部队都是湘军主力。有人建议将张、何一齐杀掉。唐生智回答道："不要把部队搞散了。目前不必操之过急，先找他们来问问再说。"

对程潜联系何键、张国威，唐生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毕竟大家都是湖南小同乡，程潜又主湘多年，过去与何、张都有些旧关系，来打招呼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奇怪。他要确定的是，何、张是否真的已变了心，若果真有了异动，再杀头也不迟。

在乘船离开武汉的当天晚上，唐生智把三个主力军的军长李品仙、何键、刘兴叫到自己的公馆，对他们说自己将去日本，部队"暂时撤回湖南，把湖南搞好"，今后的问题由三人负责商量。

正在谈话的时候，张国威也应召走了进来，并报告了对军队布置的情况。见何键、张国威都在，唐生智就把他们与程潜有联系的事提了一下。

何键与张国威是同乡兼同学，都毕业自保定三期步科，两人同时在部队见习，又同时靠搞地方游击队起家。不同的是，何键在那一期步科中年龄最大，城府最深，相对而言，张国威则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听唐生智提到程潜，何键情知不妙，顿时吓得浑身发抖，唐生智

问什么他答什么，不敢有丝毫隐瞒。张国威却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程潜委任他当第八军军长的事也继续瞒着不说。

唐生智见状，便让张国威退出了，其他人继续讨论。

张国威是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部下，但平时却不大听从李品仙的指挥。这时李品仙被触动了情绪，便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反正也指挥不动这个张国威，不如和唐生智一起下野出洋（出国）的好。何键和张国威在被唐生智收编时就有很深矛盾，如今牵扯到程潜的事，为了帮自己解脱，也连忙插嘴说："我们的部队向来很好。部队不听指挥，那还行吗？"

唐生智本来已暗暗做出判断，即何键无反心，可不予处分，而张国威则有意谋反，罪在不赦。何键的落井下石，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马上让副官再把张国威叫回来。

对外的装饰品

张国威已经去旅馆准备睡觉。副官来叫，他也不想想叫他去干什么，便不假思索地重返唐公馆。

唐生智当着几个人的面，说了一堆大家今后要搞好团结，如此才有办法之类的套话，接着便宣布散会。将领们纷纷下楼，张国威正想跟着下去，突然被唐生智叫住："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张国威遵命留了下来，没想到唐生智又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

张国威一个人傻傻地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就领着几个士兵从他的身后冒了出来，这些人不由分说，拿一根绳子套住张国威的脖子。张国威竭力挣扎，但寡不敌众，被强按在了地上。

张国威这时始知大祸临头，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啊……"然而求饶已经晚了，他被拖进了唐公馆隔壁的一栋房子里。

李品仙等人尚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来探视，只见张国威已被勒毙于地，其状惨不忍睹。李品仙后来与人谈及此事，依然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晚上十一点，唐生智乘着日本轮船，带着"不久我还要回来"的豪言走了。他走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又在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商量今后怎么办。

李品仙是广西人；何键虽是湖南人，但他的活动能力较强，商量下来，便由这二人负责政治，也就是在政治方面与新桂系联系，刘兴负责军事。可是这种分工其实不抵什么用，李品仙、何键联系了一下，毫无头绪，于是他们只得按原计划撤往湖南。

西征军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原来主持省政府的孔庚、李书城与程潜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私交很好，程潜又发现新桂系主要强在军事，党政组织方面却没有什么办法，便有意留用这些官员。他在汉口发表演说，提道："此次西征系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的党部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

这时南京政府已发表程潜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就是湘鄂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原湖北教育厅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等人本已准备逃往日本，听到程潜有如此表态，便又回到汉口日本租界，打算复职。

程潜是以南京政府也就是中央的观点来处置事务。新桂系可不是这么想，他们认为两湖是他们的，得由他们说了算。程潜的讲话令新桂系诸将十分不满，“闻之大愤”，尤其鄂籍的胡宗铎、陶钧更是如此。

随着新桂系势力的扩大，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白崇禧开始鼓吹保定同学大团结，希图在新桂系中另拉出一支以他为首的“保定系”，以巩固其地位。胡宗铎、陶钧都是保定生，且都较为勇猛善战，由此受到白崇禧的特别赏识。李宗仁则因为胡、陶在西征中颇有战功，又是湖北人，为了加以笼络，也对他们比较放纵。

在程潜就职并讲话之后，陶钧公然扬言：“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胡宗铎）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

胡宗铎自己更是急不可耐，有一次当面对李宗仁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李宗仁笑着回答：“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

军民分治起自于袁世凯时期，表面意思是尊重民意，军人不干涉政治。依李宗仁所言，他和白崇禧、黄绍竑作为现役军官，都曾立誓

不当广西省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象，广西省政说到底还是李、白、黄从中摆布。省长之类的职务在李宗仁等人的眼里，更像是一件对外的装饰品。

屠户

胡宗铎对李宗仁讲的那一套可谓心领神会。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保荐他相中的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所有湖北党务。

胡宗铎身为“李白”手下的一个军长，居然能保荐新的省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张知本原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自己认为能在新省府中当个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就不错了，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和新桂系的关系，居然能得到省主席的高位。

“李白”随后保荐胡、陶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另外还任命他们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副司令。这样胡、陶拿张知本做挡箭牌，却得以在幕后操纵了湖北的一切军政要务。

胡、陶性情粗暴，特别是陶钧，更以杀人如麻著称，过去作战行军，遇有士兵落伍，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枪，这让李宗仁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新桂系刚入武汉时，正逢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便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许多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其中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送审时，陶钧看都没看，就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然后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他，一次杀这么多

的学生会失去人心，对还未在湖北站住脚跟的新桂系不利。陶钧想了想，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九名学生就这样命丧黄泉。

武汉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聚集地，继汪精卫宣布“分共”之后，他们再次成为新桂系屠戮的重点。有一次军法官将一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然后大笔一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画入圈中，连军法官的名字也随手被圈了进去。军法官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提醒陶钧，陶钧便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过去盛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陶钧的发明，原话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男女被杀者，一次达到二三十个之多，其中除了党人和学生外，不乏一般无辜百姓。胡、陶也因草菅人命而被鄂人称为“屠户”。

在新桂系的极端残杀政策下，前湖北省政府成员亦在劫难逃，李汉俊、詹大悲均被逮捕。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他早已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则是辛亥首义元勋，他参加辛亥革命时，新桂系的一帮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程潜闻讯急忙前去保释，但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在被逮捕后不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孔庚、李书城也被抓了起来，只是慑于二人年老资望高，还有利用价值，才没有被立即处死。

程潜为人比较拘谨，平时不大表示意见，但愤懑之下，也忍不住通过与记者谈话进行抨击："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程潜的锋芒所指，自然是新桂系，不过因为西征还没有结束，退入湖南的唐部尚未得到清除，才使得他与新桂系的矛盾没有全面爆发出来。

1928年1月，西征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分别率领，程潜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经鄂南进攻湘北。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

拥蒋抑桂

何键是个善于多方应付的圆滑角色，自他在湖南军政界崭露头角起，便秉持“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巧妙周旋于湘军各派之间。谭延闿、程潜不齿于唐生智，但对何键的印象都很好。

程潜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他对何键的部队相当重视，而何键也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潜表示竭诚拥护。当时程潜已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他的举荐下，何键得以出任清乡会办。

程潜本身还兼有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他几无暇过问，基本上全部交给何键主持，这样何键在湖南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程潜认为自己是兼管两湖的中央大员，可是新桂系却一如既往地认定两湖是他们打出的天下，好处不能让外人得，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快便重新爆发出来。

此时白崇禧已到平汉路上指挥北伐，李宗仁来到武汉，他用以控制两湖的组织机构是武汉政治分会。

政治分会只是“临时性政治机关”，而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真正的二级机关。新桂系联合西山派成立特委会时，曾下令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李白”西征讨唐，更指责唐生智“盗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窃据两湖”。

事过境迁，李宗仁不仅允许武汉政治分会继续存在，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名义来“窃据两湖”了。

通过控制湖北省府，新桂系已把湖北的税收全部装进了自个儿腰包，可是李宗仁又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要求由政治分会财政处对湖南的烟、酒、盐等税收进行直接征收。

程潜当然不同意。此时李宗仁认为两湖地盘已经到手，程潜这个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于是便趁对方来汉开会之际，将其予以扣留，另由鲁涤平主湘。

新桂系以拙劣的政治手法翻云覆雨，其旁若无人、不可一世的气焰必然引起各方侧目。蒋、汪曾经势同水火，但这时也决定联合起来。汪精卫自广东专程赴沪，与蒋介石作了一系列会谈，讨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可能性，以便打破当时新桂系专权的局面。

蒋、汪首先约集国民党在沪部分委员开了一个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达成了一项重要决议，规定南京特委会在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取得预备会议的同意。毫无疑问，这是对新桂系权力的一种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发出通电表示反对，说四中全会必须到作为首都的南京去开，上海租界所开的预备会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价值。

按照“李白”的真实想法，这四中全会最好永远都不要开，让他们控制的南京特委会和武汉政治分会一直维持下去。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只能给政敌们出难题。

“李白”坚持要到南京开会，是因为当时南京只有新桂系的少量部队，他们预料蒋、汪必不敢冒险来开会。

“李白”自己的政治手段不高明，就以为人家也一样，殊不知蒋、汪特别是蒋，在这方面要比他们高出好几个段位。蒋介石探知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正在津浦线上指挥北伐，便让贺耀祖的军校同学给他写信，约其赴沪商谈。

贺耀祖原来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深，但他对新桂系大肆揽权和扩张地盘的做法十分不满，接信后立即决定“拥蒋抑桂”。为谨慎起见，他分别探询了刘峙、顾祝同的态度。刘、顾都是第一军的核心将领，也都是蒋介石的铁杆亲信，二人对贺耀祖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并催促他迅速行动。

贺耀祖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南京，在打发新桂系留京的部队开赴汉口后，重新部署了卫戍事宜。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会谈。

根据会谈结果，贺耀祖在南京向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通电，希望他们速来南京开会。“李白”狂妄自大，事先也想不到贺耀祖敢行此大事，等他们发现时，已无法阻止全会的召开。

明争暗斗

蒋介石此番卷土重来，在北方得到了冯玉祥、阎锡山的共同支持。早在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之前，冯玉祥便把一份拟好的电报稿发给阎锡山：“我愿意请蒋介石回国来，不只请他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也愿意归他指挥，你喜欢不喜欢？”

论历史，阎锡山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比蒋介石还要早，但他有别于蒋介石等人之处，在于其政治立场一直随时局在变化。特别是在南方革命军陷入低潮的阶段，他曾一度退出国民党，附从于北洋，后来虽然重新与南方建立了联络，但因畏于奉军仍迟迟不敢明白地表示态度。

直到革命军在龙潭战役中取得大捷，阎锡山终于认识到北洋政府的垮台只在顷刻之间，这才坚定了加入南方阵营的决心。和冯玉祥一样，他也非常清楚蒋介石的分量和价值，知道和这样的南方实力派人物结盟意味着什么，因此在看到冯玉祥的电报后，便立即复电，表示愿意共同署名。

冯玉祥、阎锡山的支持，刘峙、顾祝同、贺耀祖等人的拥戴，令蒋介石十分高兴，现在让他不满的就只剩下了那位曾经视之为嫡系亲信，可是在“逼宫”中又态度暧昧的何应钦。

蒋介石怀疑：这小子对我复出一点都不热情，莫非是铁了心要和我分道扬镳啦?

他让人给南京的李仲公写信：“介公有事请兄来沪一谈。”收到信件后，李仲公迅即赶到蒋介石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临时住处。

李仲公曾做过蒋介石的文案，同时与何应钦的私谊又不错，能够在蒋介石、何应钦之间沟通关系。蒋介石问他：“你见了敬之没有？”

李仲公回答：“敬之已来沪，但还未见着。”

蒋介石的口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现在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对我的拥戴电已经发出，我准备即日入京，为什么他还不发？你去问他，他在打什么主意！”

李仲公听后赶紧替何应钦解释：“没有别的，这正说明敬之在政治感觉上的迟钝，我这就去催他将拥戴电立刻发出。”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说：“好。”

李仲公就去找何应钦。他先择蒋介石的话中不算难听的部分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专等第一军将领们的拥戴电入京，冯阎都发了，你为什么还不发？”

何应钦回答道：“我就不像他那一套独裁专制的作风。第一军发拥戴电，我得先问一问经扶（刘峙字经扶）、墨三（顾祝同字墨三）等前方将领，他们的复电还没有到，所以暂时没有发。”

李仲公一听急了：“他上次因为健生（白崇禧）逼他走，而你未曾支持他，已经对你不满。你再这样做，岂不更增加了他对你的疑心?

黄埔军和你都是他的灵魂，你现在却说发拥戴电还要征求将领们的意见。这样的理由，怎么好拿去回复他？我看，你今天必须把电报发出才好，否则……”

李仲公没有把话说下去，但何应钦已经听得很明白了。他很不自然地说：“好吧，那就请你代我拟一电好了。”

何应钦的拥戴电发表后，蒋介石在复出上更操胜算，各派围绕全会召开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也越加激烈。截至1928年1月底，已有二十余位中委抵宁，其中李宗仁和蒋介石因为各有自己一套打算，是到南京最早的两个人。

就在会议召开前，一直拥汪的张发奎发动了反对李济深和新桂系的广州事变。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共借机在广州举行起义，虽然张发奎是直接祸首，但事情牵连到了汪精卫。

新桂系岂肯吃这哑巴亏，他们立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张发奎，通缉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海受到了警察的严密监视，不得不在一个漆黑之夜，冒着黄浦江上空的飘雪，秘密登上一艘货轮前往法国。

汪退出，蒋犹在。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系人马不仅收复失地，而且最大范围拓展了领地：蒋介石除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

“李白”真是缺少算计。汪精卫不出局，凭他的政治能量，至少可以和蒋在政权、党权上争一争选票。等到汪精卫退出竞赛，党权、政权、军权全都落到了蒋的手里。

按照全会决议，蒋、冯、阎、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的部队先后进行了改编，即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蒋介石（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出任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其余不属于这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会议开罢，蒋介石启程前往徐州。此时何应钦和李仲公都尚在南京，一天上午，陈立夫忽然给李仲公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请兄即来徐州一谈，伯群兄（王伯群）能来更好。"

陈立夫告诉李仲公，说有一节专车在浦口车站等着，希望他们能立刻上车。李仲公又惊又疑，忙问蒋介石找他们有什么事。陈立夫推说不知道，但李仲公猜到准跟何应钦有关，便去找王伯群商量。

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当时正生病卧床休息。两人说着话的工夫，何应钦的夫人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不好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住宅的卫队都撤走啦！"

王伯群问自己的妹妹："敬之呢？"对方回答："出城打猎去了，已派人去叫。"

不一会儿，何应钦气急败坏地来了，开口便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什么意思？"

杀威棒

听何应钦讲完前因后果，李仲公和王伯群才知道，原来蒋介石昨天晚上就到了徐州，而且在不通知何应钦的情况下，便撤去了他身上的第一路军总指挥等本兼各职，只调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过去蒋介石将白崇禧由第七军参谋长调任北伐军参谋长，那叫提升，何应钦这个自然只能是降职了。何应钦又羞又恼，说："我的面子丢尽了，不管怎样，我决不就职，听候他的发落好了！"

李仲公宽慰道："不用急，我看不要紧。即使他对你有些疑心，你同他毕竟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而他又是一个重感情重利害的人，他既然叫我同伯群到徐州去，那么只要和他做一番解释，想来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说到这里，李仲公话锋一转："不过，他的脾气你也知道，爱之加膝，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在平时的谈话中，李仲公曾经试探过何应钦，问何应钦有没有把黄埔系完全掌握在手里的把握，何应钦老实作答，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于是他这时便郑重地劝告何应钦："你要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他对你猜疑和最不放心的地方，不外乎是你和桂系的关系，你今后务必处理好。"

何应钦觉得李仲公言之有理。他叹了口气，说他可以"屈就"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他休一个短假，以便到上海去治病。

李仲公知道何应钦很要面子，便说："只要你肯当参谋长，一切的话就好说了。"

他转过身问王伯群去不去徐州，王伯群说去不了。何应钦只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李仲公身上，对他说：“就这样吧，望你替我周旋。”

第二天早晨，李仲公乘车到达徐州，蒋介石委派的副官已在车站迎候。到蒋介石的临时行营后，蒋介石问李仲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来时见过敬之（何应钦）吗？”

在得知李仲公已与何应钦见过面后，他又问：“敬之讲些什么？我调他做参谋长，他就不就？”

李仲公连忙说：“他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如何不就。”

蒋介石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接着他对李仲公说：“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又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这次的拥戴电，他竟然迟迟不发，到底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叫我对北方怎样说话？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看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蒋介石还说：“没有我就没有他（指何应钦），他必须知道。”这句话他重复强调了几次，之后又大吼一声：“叫他滚出洋去罢，看我离了他行不行！”

李仲公听了，对蒋介石在“逼宫”中所受的刺激有了更深体会，也明白蒋介石对何应钦已不仅仅止于猜疑，而是已痛恨到了极点。这次“入壁夺符”，讲穿了就是要在调动三军之前，对何应钦动用杀威棒。

李仲公把已准备好的一些话拿出来，替何应钦做解释、打掩护，无非还是说何应钦不懂政治、头脑简单、行动迟缓之类，并一再申明：“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确是忠诚不贰的。”

见蒋介石仍然怒气难消，李仲公就用了一个比喻，说何应钦好像是蒋介石的双臂。双臂的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但当头脑命令双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时，双臂未必能达到要求——很可能，动是动了，但只动了一臂或者两臂动得极慢，甚至有时迷失方向乱动起来。

李仲公以此论证何应钦其实对蒋完全听命，只是因为“才庸性缓”，所以在蒋看来，才会有不听指挥甚至异动的嫌疑，并担保何应钦“不会有异动，更不敢有异心”。

蒋介石阴云密布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看来李仲公的比喻还是得到了他的认同：“好，好，既然这样，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开部队时间久，第一军的军风军纪已日渐废弛，他可以先到上海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成立第一集团军，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

蒋介石提笔唰唰地给何应钦写了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信函，让李仲公交给何应钦，还说：“敬之对政治认识不清，你须同伯群多帮助他才好。”

在李仲公上车回宁前，蒋介石忽然又让副官把原函要了回去，仅交代口头转述，这在当时曾令李仲公颇为不解。

耻辱与残酷

蒋介石的信从黄埔建军讲起，历数他和何应钦在东征等役中患难与共的过程，并说到“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语言非常亲切动人。

当然他也没忘记继续给何应钦敲警钟，让他与新桂系保持距离：“桂系野心甚炽，不恤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

何应钦听李仲公转述后，转嗔为喜，除遵令就任参谋长外，又请了两个月的假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果然，不出一个月，蒋介石即将他召回南京听用。

不过“逼宫”给蒋介石造成的余悸仍未完全消除。尽管信的末尾曾有“我不能常在前方，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之语，但他并没有马上把兵权交给何应钦。这也正是蒋介石临时起意，把信从李仲公手中要回的主要原因。

被杀威棒打了屁股之后，何应钦更加小心谨慎。后来他虽出任军政部长的要职，但连任用一个营长都要签请蒋介石批示，对于黄埔学生的进退，若无蒋直接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签呈，也不敢擅自做主。至于军界以外的所谓党国大计，更是自动消失，绝不再随便开口。“何婆婆”之名，从此算是坐实了。

在“何婆婆”就范的同时，被蒋介石称为“野心甚炽”的新桂系则继续给他唱反调。李宗仁一再滞留南京，拒绝前往武汉就职集团军司令，第四集团军也就迟迟成立不起来。

蒋介石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北方冯、阎特别是冯的关系。他亲自从南京来到郑州，与冯玉祥再次见面，还预先托人告诉冯玉祥，说想同对方换帖做盟兄弟。

冯玉祥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冯玉祥也写了帖子。两人见面后交换帖子，并互相拜了四拜，就此成了把兄弟。

有了冯玉祥这个把兄弟撑腰，蒋介石不再顾虑李宗仁肯不肯上阵。4月5日，他在徐州誓师北伐。之后一声令下，蒋、冯、阎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向奉军发起进攻。北伐军所到之处，奉军节节败退。

第二次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胜券在握。对蒋介石来说，唯一需要担心的其实是列强的干涉，尤其将成为北伐主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一直是日本极力扩张势力的地区。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为了试探日本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曾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过秘密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发现，只要他一提到“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的时候，田中的脸色就变了。

蒋介石曾期望日本能像当初支持他“离俄清党”一样，继续支持他实施北伐，但这次会谈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必将妨碍我北伐之行动，以防止中国之统一。”

5月1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克复济南，已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也应召来到济南。

两天后的上午，济南城内忽然枪声四起，黄郛所住的津浦路局办公处被驻济南的日军包围，子弹嗖嗖地飞进来。

黄郛上到二楼，用日语朝楼下的日本兵高声喊：“我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要动武！”日军这才停止开枪。

黄郛乘汽车前往蒋介石所住的督办公署，但那里也不安全，于是又把总部移往一个叫党家庄的小火车站。

这就是“济南惨案”（即“济案”）。据事后中方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军民共被日军打死打伤四千七百余人，蔡公时等十余名外交人员也遭到残杀。身为外交部长的黄郛对日军的野蛮行径深感震惊，他说：“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

“济案”发生时，冯玉祥的专车已抵泰安车站。蒋介石让人给他打电报说：“不要来了！”老冯倒很有点把兄弟的义气，当即复电：“愈有危险，我愈要去。”

蒋、冯会合后，与黄郛等人聚集在党家庄的一所清真寺外面。大家坐在草地上，商量应付之策。蒋介石问冯玉祥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办。冯玉祥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说！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生平未有之伤心事

冯玉祥说得很解气，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黄郛在冷静下来之后，判断“济案”绝非偶然，实际是日本干涉中国的一个信号，也是其阻止北伐的明确表示。如果革命军此时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会使准备已久且胜利在望的北伐功败垂成，而且会迅速激化中日矛盾，导致中日提前开战。

黄郛向蒋介石建议暂时不与日军直接对抗，绕道济南继续北伐，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对付日本人。

黄郛的想法道出了蒋介石的心声，他决定接受黄郛的建议。冯玉祥听后表示同意，对蒋介石说：“你有那种忍耐力我也赞成。”

随后，蒋介石改变了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令黄郛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进行谈判。

民国年间，凡在对外交涉中喊打喊杀者总是能引起拥护和喝彩，比如老冯的“俘虏了再说”，谈判则会让主张者声誉受损，而且很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盖因外交本身就包含着妥协和忍让，而缺乏实力基础的弱国所需付出的妥协和忍让往往更多。

蒋介石虽同意交涉，却也很害怕因此损害自己“北伐英雄”的威名和形象。他电告黄郛，让黄郛以个人名义与日方谈判，而不要再用他“蒋介石”的名义。

同是把兄弟，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之间实际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政治结盟，黄郛与蒋介石就不同了，他们的确有早期革命党人身

上常见的那种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至少黄郛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在兰谱中的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因为在济案谈判中替蒋介石分忧担“丑”，黄郛个人饱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并被舆论迅速定格为“亲日派”。他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诉苦道：“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

至5月中旬，黄郛基本确定了解决“济案”的各条具体办法。之后，他准备到前线去与蒋介石商量，不料形势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继续北伐和对日交涉事宜。说到快要成功的北伐，大家都笑。说到对日交涉，都发愁。蒋介石叹了口气对冯玉祥说：“膺白（黄郛）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冯玉祥趁势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人交涉？”

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的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同时也为了确保自己在北伐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不因“亲日”而被新桂系等政敌所攻击，他决定采纳冯玉祥的意见。

第二天，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蒋介石致电黄郛，让对方“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免职。后来他在给张群的一封信中写道：“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悲愤交加之下，黄郛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

同为蒋介石的幕僚，蒋介石视张群为部下，对黄郛则相当尊敬，平时见面都称黄郛为二兄，黄郛的夫人为二嫂，绝不以普通宾客相待。见义兄真的发了火，蒋介石也慌了，他连忙给黄郛发去电报，一面解释情况，一面劝黄郛以大局为重，不可一并辞去兼职。担心电报说服不了，蒋介石又让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出面，致电黄郛慰留。

黄郛的个性与何应钦等人有很大不同，属于外柔内刚型，一旦做出决定，绝不轻易动摇，而且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仅靠私人关系帮蒋做事，本身也说明，对何应钦适用的一套在他身上并不能够奏效。

黄郛自此离开政坛，带着妻女到莫干山隐居去了。后来济案解决，他的朋友曾向黄郛提出，可以由这位朋友出面，请蒋介石在济案纪念周上加以申明，以免后世不明真相，仍然将“济案”的全部罪责扣在他一个人头上。

这时蒋介石的地位已经相对稳定，无论是对当初“丢马保车”的内疚，抑或出于此后敦请黄郛出山的需要，他都会愿意这么做，但是黄郛认为“恐妨碍国家，妨碍介石地位，主张不必”，没有接受朋友的好意。

作为蒋氏幕府中最具战略眼光的首席幕僚，黄郛不仅在决定蒋介石沉浮的关键时刻多次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而且在自己归隐之前，还为蒋介石推荐了另一位不可多得的谋略之士。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可能在波谲云诡的民国权斗中涉过新的险滩。

第二章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

第二次北伐开始后，李宗仁及其新桂系迟迟没有动静。外界纷纷传言，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成见仍然相当深，所以才采取了这样敬而远之的态度。

李宗仁越是如此，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越要表现自己的不计前嫌和宽宏大度。他多次派辛亥元老、北伐军司令部顾问吴忠信前来劝说。最后一次，吴忠信对李宗仁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

看看面子也挣得差不多了，再作态下去，就怕北伐的功劳簿上只有蒋、冯、阎的名字。李宗仁也就来了个见好就收："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去就职了。"

在冯、阎就职一个多月后，李宗仁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同时就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第四集团军原定于4月底在武汉乘车北上，但因为车少轨坏，运输困难，遂改由白崇禧率部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白崇禧到达石家庄，在那里，他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民国军政界有许多名人都出自于日本士官学校，比如蔡锷、蒋百里、程潜、赵恒惕，这些人一看就是矫健、精干之辈。白崇禧以为阎锡山也和他们一样，没有想到对方却是一个身穿棉衣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的"老朽"。

其实阎锡山当年也不过四十五岁，只是面相显老。谈话时，他讲一口山西五台的方言，不仅难懂，而且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听得十分吃力。

当白崇禧告诉他，自己的部队即将陆续抵达时，阎锡山高兴异常，他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

一点脾气都没有

第二次北伐进入中期阶段后，阎锡山的晋军各部会攻冀中，在方顺桥一带与奉军展开激战。方顺桥为保定门户，一旦失守，保定即暴露于冀中平原，将导致四面受敌，奉军因此往方顺桥一线调集了大量兵力，形成了对晋军的压倒性优势。

危急时刻，阎锡山把卫队旅和宪兵营都拉上了火线，并连连致电冯玉祥，请他派位于方顺桥东南方向的韩复榘部紧急支援。

韩复榘对面已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他本人也答应支援，然而冯玉祥却以津浦线方面另有需要为由，把韩部给调走了，仅留少数骑兵在前线进行警戒。

韩部撤离后，晋军右翼顿失屏障，阎锡山用于进攻方顺桥的部队险遭奉军合围。发现形势危急，阎锡山电促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料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其驻扎于京汉线上的部队：“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

西北军不进不退，为的却是要报复阎锡山。原来几年前，冯玉祥在南口战败西撤，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从后路进行袭击，让西北军受到了不小损失。

南口战役时，冯、阎并未站在一条战线上，阎锡山联冯还是讨冯，其实都无可厚非。现在大家已经联合北伐，冯玉祥居然还要利用这一机会来公报私仇，就显得太过分了，因此连白崇禧都为之不平，认为“冯玉祥完全是不讲信义的人”。

桂军先头部队的赴援，令晋军转危为安。至5月下旬，西北军、桂军均已进入河北境内，阎、冯、桂三路北伐大军开始向北京齐头并进。当奉军的侦察机发现南方仅装载援军的火车就达到百余列时，张作霖深感力不能敌，遂被迫离京出关，结果又在皇姑屯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杀。

6月上旬，北伐军占领平、津。这时全国除东北外，形式上已具备统一雏形。15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同时昭告天下：“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

北伐和统一曾是蒋介石的第一要务。可是随着这一目标的逐渐瓜熟蒂落，他不仅没有能够因此松口气，反而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首先是地盘的分配。第二次北伐本以蒋冯结盟为开端。这种结盟当时对双方来说都是互利的：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蒋的个人声望。同样的，蒋介石仅手中那块中央政府的金字招牌，就让冯玉祥觉得，只要与之靠拢，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蒋冯的关系也确实比较密切。两人在北伐进行的过程中多次会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北伐功成，冯为了表示对蒋的拥戴，甚至提出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像，最后在左

右的劝阻下才未付诸实施。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屡屡夸赞西北军一路披坚执锐，斩关夺隘，为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蒋的“师爷”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玉祥发电报，更是称誉冯“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按照蒋冯之间曾经这么亲密的关系，在地盘分配上，似乎蒋介石更有理由倾向于冯，但在与阎锡山会面后，蒋介石马上改变了主意。

就在这次会面中，阎锡山讲起了冯玉祥如何在方顺桥战役中公报私仇，拒不援助晋军的事，言下不胜唏嘘。末了又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

蒋介石先前已经从白崇禧那里知道了方顺桥战役的经过，阎锡山旧事重提，让他的后背顿起凉意。西北军的实力他是知道的，一旦有了更多更好的地盘，那他们的势力岂不是发展得更快，将来更难以控制?

阎锡山的意思也很清楚，冯玉祥倒戈之名可谓如雷贯耳。有评论者甚至说，在冯玉祥崛起的十余年间，国内掌兵符的大帅，皆畏其如虎，打仗时，他们最怕的不是冯玉祥畏战后退，而是冯主动要求“精诚合作”或“效命自驱”！

冯玉祥的反叛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他勤于叛，善于叛，也乐于叛，凡此种种，其印象已深入国人之脑髓。面对这样一位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倒戈将军”，你老蒋能保证自己的运气会比他以前的那些倒霉上司更好吗?

经过一番计议，蒋介石决定将山东、河南、青海、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分给冯玉祥，将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分给阎锡山。这些地盘中，税收比较丰厚的当属山东、河北以及平津两

市。冯玉祥虽得到了山东，但当时山东的胶东和济南都仍在日军的占领控制之下，乃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不如河北、平津。

估计冯玉祥可能不会同意，蒋介石又把北平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给了冯，依靠这两个“肥缺”位置，冯每月可多收入约二十万元。蒋介石希望以此来平衡冯的心理，但为慎重起见，在正式做出决定之前，他还是专门征求了冯玉祥的意见。让他想不到的是，冯玉祥的姿态特别高，说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怎么分都可以。

老冯这么可爱，反倒弄得老蒋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他连忙跟老冯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分配——从地盘大小来看，西北军有六个省，不少了；晋军只有四个省，不算多。

至于平津两地，那里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酿成第二个济案。老蒋说老冯你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所以只能把它们交给老阎去应付了。言下之意，还是为老冯着想。

老冯诺诺连声：好的，没问题，你怎么安排都行。

可是老蒋一走，老冯就骂开了娘。

表演本领

冯玉祥长期局促于西北苦寒之地，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要向国外购买一些武器装备，真是太不方便。”

在北伐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冯玉祥十分卖力，他让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进兵河北，直取平津。鹿钟麟和韩复榘都是河北人，鹿钟麟在“首都革命”后那两年一直代表冯玉祥统治着北平，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期望，也说明冯玉祥早就有了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的打算。

老冯以为，西北军在打退奉军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就算不论他和蒋介石的那点兄弟交情，单单论功行赏，也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

结果老蒋的分配方案令他大失所望。可是不同意你就说不同意好了，老冯这人却还有个特点，在地盘、金钱之类比较“俗”的问题上，他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就怕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

以后冯玉祥在河南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既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他内心对蒋介石和阎锡山已极度不满，自然也再不会有给蒋介石铸像的闲情逸致了。

6月中旬，蒋介石电邀李、冯、阎到北平举行善后会议，冯玉祥便以生病为由，复电不来参加，并让其驻汉口的代表向李宗仁进行解释，希望对他原谅，实际是想探测李宗仁对善后会议的态度。

“李白”分到的地盘是广西、湖南、湖北、汉口。他们对此也十分不满，认为自己不是没有参加北伐，却未能从北方分得寸地，更没有能够拿到可从外国购买军火的出海口，乃是蒋介石从中作祟。

此时北伐刚刚结束，“李白”都还不太好意思跳出来公然争夺或吵闹，不仅如此，李宗仁还特意表现出来了一点高姿态，他一边派人到

新乡去对冯玉祥进行慰问，一边给冯玉祥发电：“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

冯玉祥一看李宗仁铁定与会，也怕不去开会要丢掉点什么，遂复电：“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

7月上旬，同道北上的蒋介石、李宗仁在郑州与“扶病”而来的冯玉祥会合。这时候的老冯已经是满面红光，脸上看不到丝毫病容。

可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冯却又频频咳嗽。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便知道他是假咳嗽，于是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他身旁的李济深。

散席后，李宗仁问李济深：“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济深微笑道：“他在扮戏！”

第二天，一行人乘车抵达北平郊外的长辛店，阎锡山、白崇禧等人早就在车站迎接。这是李宗仁和阎锡山第一次见面。除了和白崇禧一样，觉得阎锡山“皮肤黧黑，长相看老，说一口极重的山西土音”外，李宗仁还对此人得出了另外一个印象：态度深沉，寡言鲜笑，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与冯玉祥粗放的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阎锡山士官学校的学历依然引起了李宗仁的兴趣。李宗仁曾听阎的同学程潜说过，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的成绩其实一般，加上平时装扮又土里土气，当时谁也没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不料回国之后却渐露峥嵘，成了整个士官系中混得最好的人物。

7月6日，大家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任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四人行礼已

毕，然后打开棺材盖，瞻仰孙中山的遗容。

这时蒋介石忽然扶着棺材哭了起来，冯、阎二人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

只有老李一个人木然肃立，并未落泪，而且他觉得其他三人都太过矫情，他本人没有这种表演本领。

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和“李白”都很熟。他对“李白”的看法是，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钱昌照也认同这一看法。

不过要说哭泣的三个人都是在装样子，也并不尽然。至少蒋介石的痛哭是有一些真情的，四人中以他跟随孙中山的时间最长，孙中山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也最多。再想到，如今虽然好不容易完成了北伐，可周围还是群雄环伺，难题成堆，当事者的心情确实是五味杂陈，一旦抚今思昔，难怪要“热泪如丝”了。

后面一大堆人里面，看不惯蒋介石的大有人在，有人已在嘀嘀咕咕地开骂：“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

冯阎李开始劝蒋不要再哭，这一劝不要紧，蒋哭得更厉害了。一些人不耐烦起来：“叫他哭吧，我们走了！”

蒋介石这才勉强止住哭声。孙中山的棺材盖被盖下，一场各怀心事的哭灵宣告结束。

神仙会

祭告典礼只是一个必要仪式，大家齐集北平，主要还是为了开善后会议，而善后会议的议程之一，乃是会商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幕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一年前提出过一个“分治合作”理论，主张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分立的地方政府在政治、军事、财政上保有自主地位。蒋介石又考虑到北伐军若出兵东北，日军必然又要像“济案”那样加以阻挠，于是便倾向于将“分治合作”理论运用于东北，这就有了改旗易帜。

改旗易帜简单说来就是将东北政府的五色旗改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表示归顺中央，但实际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召开善后会议之前，蒋介石特派吴铁城等人到东北进行了改旗易帜的游说。

张作霖被暗杀后，张学良子继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从此开启了东北的张学良时代。张学良自知凭实力难以与北伐军抗衡，同时也认识到仅凭东北一隅无法抵抗日本人的入侵，只有通过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牵制日本，因此很快就接受了改旗易帜，并派代表到北平做进一步接洽。

有人认为，东北易帜乃中央与地方势力妥协的产物，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统一。北伐军高层在对此展开讨论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冯、阎和奉系之间有宿怨，同时又都有分割东北之心，两人便力主在东北辄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的情况下，继续向关外发动进攻。

与他们相反，新桂系的根据地位于南方，桂军也主要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李宗仁估计即使顺利拿下东北，他也沾不得多少光，那里必然是冯阎的天下，所以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

蒋介石早就打定主意要实行东北易帜，不过因为要在会上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结果导致东北代表在北平待了十几天还没能得到接见。其间这些代表不但常收到恐吓信，还被人用言辞进行羞辱，感觉自己好像亡国奴一样，十分难堪。为了以退为进，他们放出风声，称如果再无说法，就将离开北平。

李宗仁听到后，即告之蒋介石，蒋介石于是顺势派员前去与东北代表晤谈。这样东北易帜的方案终于得以确定下来，以后奉军也就被改称为东北军。

东北问题虽然费了周折，但还不算过于棘手，最难的其实是善后会议的另一个议程，那就是裁兵。

至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属于国民革命军方面的部队计有四个集团军和李济深的第八路军，约三百个师，合计兵额二百二十万以上。每年军费需八点七亿元，可是中央财政只能拨付二点一亿元，其中有将近六亿元的缺额。

浩繁的军费开支，足以令中央财政濒于崩溃。此前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上，便有代表提交裁兵案，认为应先削减超过五分之一的军费，在压缩军费的基础上，达到减少兵额的目的。

诸侯们虽然都无法公开对裁兵表示反对，但他们的抵触情绪显而易见。时任第十一军军长的陈铭枢有意在投蒋后弃武从政，为此极力以裁兵主张游说各方。他跟李宗仁谈，李宗仁笑他是傻子，并且郑重地对他说：“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指文官）是不行的。”

之后，陈铭枢又到北平见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其气焰之盛，甚至让陈铭枢都不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裁兵”两个字。

蒋介石很清楚裁兵之难。早在举行祭告典礼的那一天，他就在即席讲话中强调“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先给众人打了一剂预防针。

7月11日，蒋介石在北平西郊汤山召集善后会议。他首先讲话，说了一通缩减军队，服从命令的大道理。他刚刚说完，李济深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

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新桂系，但却一直是新桂系的扶植者和同盟者。他的这一番含沙射影，显然是暗指蒋介石要以裁兵为借口，故意削弱其他诸侯包括新桂系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济深还说：“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这些话又是针对蒋介石射来的机枪子弹，因为蒋军里有好多是收编自北洋的“杂牌军”。蒋介石听得坐立不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善后会议没有制定详细的议事细则，更没有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形式上只是一个座谈会，蒋介石无法以主持者的身份硬性施压。他的那几位靠嘴巴吃饭的谋士幕僚，比如吴稚晖、戴季陶，赶紧拍马上阵，为自己的幕主帮腔掩饰。

虽然第一天有了一点交锋的火药味，但总体而言，气氛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是座谈会，大部分时间里，与会者都是在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瞎侃一通，反正也没人追究对错和结果。吴稚晖最擅长此类插科打诨，他颇有些乐在其中似的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

预计可能会比较紧张的善后会议开成了"神仙会"，会上和风细雨、融融一堂，会下社交饮宴、联络情感。

喜剧段子

所有与会者中，蒋介石大概是最忙的。他听说一帮北洋遗老正在天津大连活动，且段祺瑞也身居其间，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段祺瑞下达了一纸通缉令。

李宗仁向来认为有枪杆子的才能成事。他很天真地问蒋介石，段祺瑞虽为前北洋巨头，可如今两手空空，在天津都隐居了五年，何必再通缉如此老朽?

这样的问题就显示出了蒋与李的差距。蒋介石告诉他，通缉段祺瑞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抓起来，为的只是打击段祺瑞的威信——说白了，吓吓这老头子，同时杀鸡儆猴，免得给咱们捣乱。

过了没多久，段祺瑞就致函蒋介石，否认参与了活动，遗老们的背后串联也逐渐销声匿迹。

打击别人的同时，最好还能抬高自己。

蒋介石到日本留学，本是奔着士官学校去的，但当时规定，中国学生先要在振武学校毕业，然后在日本的基层部队见习，最后才能进入士官学校。蒋介石已经进入了见习期，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放下学业回国，所以最高学历也就止步于振武学堂。

现在蒋介石出了名，士官学生同学会的负责人便主动上门化缘。蒋介石也乐得给自己添些光彩，便以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向同学会捐款五万元。

一些货真价实，但在国内混得较一般的士官生对此不满，跑来质问同学会负责人：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

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人家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

当然，发生在蒋介石身上的事尚算不上可乐，要说滑稽，再滑稽都滑稽不过冯玉祥。

老冯一直有一套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标准，可谓是“老要癫狂少要稳”的典型。早在徐州蒋、冯初次会晤时，他站在铁皮车门口招手的那个镜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到济案党家庄会商时，老冯又有惊人之举：原来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爬起来，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马路边，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

这回是老冯做东宴请大家，包括蒋、阎、李、白在内，赴宴的有百余名中央要员。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又有百余名大小职员和工友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全都排着队走进了餐厅前的天井。

与宴者不知道这些人究竟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等不速之客们在天井里站定，老冯起立讲话，他说：“我冯玉祥在民国十三年将

清废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

接着他大声向天井内喊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照直说，宣统（指溥仪）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站在天井中的人一齐回答：“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老冯的声音越发洪亮，他又大声问道：“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证人”们再次回答：“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老冯于是转身向各位宾官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众人哄堂大笑，感觉比看一场喜剧段子还过瘾。

老冯演完捧腹的喜剧，就轮到老蒋来演严肃的正剧了。在善后会议的最后两天，蒋介石突然提出“军事整理案”和“军事意见书”，会场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这次蒋介石用“编遣”代替了大家都不愿听的“裁兵”。“裁兵”听上去是一刀切，所有人都得平均割肉，“编遣”则不同，它是有选择性地进行改编，其中有亏有赚。蒋介石说，他计划将各个集团军质量较好的部队挑出来，分别编成五十个师（东北除外），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其余老弱则予以淘汰遣散，以节省国库开支。

冯、阎、李、白防来防去的是“裁兵”，未料到平地里又冒出“编遣”，缺乏心理准备，自然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加以反对，因此

最初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众人开始陆陆续续发言，其中白崇禧提出了“裁兵”“编遣”之外的另一个主张。

白崇禧在北方的部队系以李品仙、廖磊的湘军为主力，再配以少数桂军编成。他本欲同阎锡山争夺平、津，但阎锡山先到先得，把平、津的大大小小机关都占据了，行政、财政、税收、交通一把抓，凡是白崇禧推荐的人，阎锡山一个不用，使他根本无法染指华北事务。

白崇禧也一度想过率部回师武汉。回师武汉无论走平汉路，或津浦路转陇海路再转平汉路，都得经过河南、山东，这两省都是冯玉祥的地盘，要经过就得冯玉祥同意。白曾派代表见冯，请求让路，可是冯玉祥的态度模棱两可，始终不做肯定答复。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花样最多。在既不能夺取平津，对回师武汉又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决定另辟蹊径。

这时新疆正好发生内乱，省长被刺身亡，白崇禧便在会上引述了这一事件，认为新疆鞭长莫及，较难治理，而他是一个穆斯林，自愿率部移戍西北，塞边垦荒，为推行兵工政策做示范。

小诸葛固然聪明绝顶，座中诸人也绝非笨蛋，都知道白崇禧戍边新疆是假，以此躲避“编遣”，顺便再捞一块固定地盘是真。先前对分到手的地盘，李宗仁嫌小，冯玉祥嫌穷，都不满意，也都想借机调整。现在一看白崇禧带了头，他们二位不管有口才还是没口才，都哗啦啦地说一大堆，反正都是要找出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便从“五十个师”的大蛋糕上切出最多的份额。

自始至终，有一个人都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不主张自己的意见。

这个人是阎锡山。

钱鬼子

阎锡山能从学生时代的“成绩一般，土里土气，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混到士官系中无人能出其右，自然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在公众印象中，他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精明、会算计。

阎锡山的父亲是小商人，山西人称“钱鬼子”，属于能把算盘珠子拨拉到啪啪作响的那种。阎锡山从小随父亲在钱铺做学徒，耳濡目染之中也成了“钱鬼子”，日后当他把这种精打细算的商人手段应用到政治场中时，便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乃至无往而不利。

老阎的地盘原来仅有山西，现在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在他看来就是大赚特赚了。虽然他也面临着被“编遣”的危险，有可能会亏掉一些，但还不至于把前面赚来的本钱全亏掉，因此他就犯不着像冯、李、白那样猴急猴急。

阎锡山不作声，蒋介石总算是轻松了那么一点。其他几个人的发言，白崇禧要带兵远戍，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他发展成为中央无法控制的又一股地方势力，加上西北又是冯玉祥的地盘，也不会容别人擅闯，所以便提出：“兵工计划先从导淮做起，然后冗兵移边垦荒，充实国防。”

你要去新疆不是不行，不过有那心，不如先就近改造一下淮河再说。

堵住白崇禧的嘴后，蒋介石对冯、李的要求也未一概否决。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编遣计划，让阎、冯、李共同签名，说这只是原则大纲，具体怎么编遣可以到南京再商量。

阎锡山在会上一直对蒋表现得唯唯诺诺，态度十分恭顺，当即便在计划书上签名。冯、李见状，也只好跟着在上面签了字。

会后，蒋、冯、李、白相继南下。冯玉祥对南下胸有成竹，离平的时候，还坚邀阎锡山做伴同行。阎锡山则强调自己兼任着平津卫戍司令，负有卫戍平津的责任，不能说走就走，必须稍作停留。

如何对付蒋介石，已成为冯、阎、李内部共同的热点话题。先前在与高级将领和幕僚纵论天下大事时，阎锡山甚至设想到日后与蒋兵戎相见的情景，认为自己不一定就打不过蒋："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用的重武器。"

当然，不到迫不得已，阎锡山绝不会傻到挽起袖子主动去跟蒋介石打肉搏战，更何况，蒋介石要修理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为什么要上赶着冲到前面去呢？对此，他有一个极为精辟的分析："蒋介石虽占据江南，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如汪精卫等恨蒋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

阎锡山估计李、冯、白这一去，十有八九会与蒋介石发生争执，他不愿掺和进去，更不愿替这些人火中取栗，而且凭他老阎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遇到这种事切不可抢先，如此才能确保自己前后都有退路。

在阎锡山承诺，至多耽搁一天即行动身之后，冯玉祥才离开北平。第二天，他得知，阎锡山也从北平出发了。

冯玉祥对此仍不放心，他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对方的专车向南开来，方肯继续前进。

冯玉祥坚决要拉着阎锡山南下，自然是因为后者在善后会议上表现暧昧。这就好像赌桌上的三个赌徒，在前面的牌局中，两个输了，一个赢了，赢了的那位就想赶紧拔脚走人，输的注定不会乐意，人家还想在下面的牌局中把输掉的钱再捞回来呢。

更何况，南下是要合起伙来向老蒋争取利益，这种情况下，多个人就多张同老蒋交锋的嘴啊！

令冯玉祥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鬼点子更多。专车往南开不假，但在开过石家庄进入河南境内时，突然又折返石家庄，随后回到了阎的山西老巢。

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阎锡山的解释是：因父亲患急病，故中途折回，俟父亲病好即去南京。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反对的理由，也是阎锡山再次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告诉幕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说话，必取怨于蒋，会开不成不算，我还得罪了蒋。若顺着蒋说，又必取怨于冯、李，反正是两面不讨好。与其这样，不如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时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我就好了。”

冯玉祥身上常被人贴上标签，谓之“伪善终日，欺世盗名”，蒋介石虽然没那么矫揉造作，但也一向以忠孝仁爱作为标榜。大家都争着

当“为人至孝”的大孝子，当然也不能阻止别人尽孝。

一直以来，阎锡山的优势都是心计，他跟冯玩的是心计，跟蒋玩的也是心计。他颇有几分自得地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可以说既希望阎锡山来南京，又怕阎锡山来南京。正如阎锡山所预计的，如果他与冯、李联合起来跟蒋斗，蒋是非常头疼的。

现在阎锡山虽然迟迟其行，但即便李、冯联手，其能量也不在小。蒋介石担心：南京会议会不会像善后会议那样无果而终呢?

柳暗花明

从北伐结束的那一天起，让蒋介石感到寝食难安的，就不再是“北洋军阀”，而恰恰是身边这些曾经的“革命同志”。冯、阎、桂这三路诸侯均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无论在地盘和兵力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鼎盛期，也均具备对抗中央的实力。相比之下，蒋介石所谓的中央却控制不了多大的实际区域，数来数去，不过苏、浙、闽、赣、皖五省和宁沪两市，政令不出东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古往今来，这种腿比腰粗，趾与腿齐，外强内弱的状况都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忧患，蒋介石又怎能等闲视之，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得。

就在蒋介石苦思良策而不能得的时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面呈一计，顿时让他有眼前一亮、柳暗花明的感觉。

熊式辉说的是：削藩。

“削藩”一词源于西汉文景时期。当时的情况也是枝强干弱，诸侯王纷纷坐大，御史大夫晁错遂向汉景帝上书，“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这就是著名的“削藩策”。

一语唤醒梦中人，蒋介石认为“削藩策”正合自己的心意。再一问，原来此计并非出自于熊式辉本人，而是由一个叫杨永泰的人所提出。

听到杨永泰的名字，蒋介石的内心大受触动，因为这是义兄黄郛曾在他面前提及过的一个人。

过去黄郛给蒋介石出谋划策，在“任方面”之外，还建议要“储才”。所谓“储才”，也就是广招人才。黄郛说，旧时政治家都极重幕僚，但到了民国，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诸党派，几乎全都是紧筑樊篱，“人才更分彼此而显得空虚”。

针对人才不足的状况，黄郛感到既忧虑又着急。他认为，新式政治家面对的挑战和变化比旧时还要严峻广泛，只有引入各种智囊，才能弥补政治家在精力、经验和知识等方面所可能出现的欠缺。

关于“储才”，黄郛最初只是贡献原则，并没有保举特别的人选。后来他随蒋介石一道复出，出任外交部长，才向蒋介石推荐了钱昌照。

钱昌照是黄郛的连襟，此人在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造诣很深。由于黄郛的关系，他一入幕就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幕中地位与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并驾齐驱。当时陈立夫管党和政，钱昌照就管经济、外交和教育，凡有关经济、外交、教育方面的文件，他都有权代蒋批阅。

蒋介石是军人，缺乏国际知识，钱昌照就每天给他讲国际上发生的大事，让蒋介石逐渐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了了解。同样因为军人的身份，蒋介石之前与知识界少有渊源，而民国时的大知识分子又大多清高，用权势和金钱都不一定能搞定。也是在钱昌照的努力撮合下，蒋介石开始频频和一些大知识分子见面或邀请对方为他讲学，这样他在知识界、舆论界的声誉便渐渐好了起来，人们都说蒋介石“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

钱昌照在蒋氏幕府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专长主要是经济，蒋介石一直感到帐中还缺乏一位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佐政之才。在复出准备第二次北伐期间，有一次与黄郛闲谈，他便要求黄郛放弃其他职务，直接进入幕府辅佐自己。

黄郛那时候就感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政治上意见不合，日后势必引起内争，而自己与冯玉祥私交深厚，如果身处中枢，会引起冯玉祥的不满，因此决定举贤自代。

他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我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我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杨畅卿就是杨永泰，畅卿是他的字。

海内奇才

杨永泰系秀才出身，不仅有比较好的传统文化底子，还接受过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十多年身居官场的经验，更让他练就了一套“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懂行政”的本事。在北洋政府时代，他曾是一位极为活跃的风云人物，黄郛长期在北方军政界活动，对此非常清楚。

杨永泰的苦恼之处在于，尽管他踌躇满志，才华横溢，但一直怀才不遇。当然，他的怀才不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怪他自己缺乏恒心和眼光。

杨永泰最早也曾投奔过孙中山。孙中山内定让他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但当他认识到，孙中山其实没有实力，只是个空架子，财政厅也是既无权又无财时，便不仅不愿再出任，还跟着别人一起在背后开口闭口地骂孙中山是“孙大炮”。他的这种投机态度，引起了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人，包括胡汉民等人的极度反感。

护法时代，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确实不过是西南实力派诸侯的一块御用招牌，他们几时不需要了，就可以一脚踢开。这一点杨永泰倒是看得一点不差，在护法军政府完结后，他转投了西南实力派。

然而好景不长，西南实力派也垮了台。杨永泰自知在广州无法立足，又北上投奔北洋政府，并在曹锟的国会里出任参议院议员。

哪知道曹锟家的议员还是做不长久，一个“首都革命”，令“猪仔国会”顿时解体。无奈之下，杨永泰只得离开北京，到上海做了寓公。

就在蒋介石下野的那段时间里，杨永泰看准时机，向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现时政治的主张，并希望能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新桂系所用。

如果“李白”识才用才，杨永泰极可能为新桂系跃上政坛最高峰助一臂之力。在看过万言书后，“李白”也对其中深刻的政治见解表示赞赏，然而他们对杨永泰的态度却是不予理睬，也就是“然其言，不用其人”。

究其实，是“李白”十分鄙视杨永泰的为人，认为这样一个投靠过北洋，投靠过孙中山，又投靠过西南诸侯的幕客，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完全不值得吸纳！

对杨永泰，胡汉民等国民党的政坛老手是知道的，蒋介石一度带兵打仗，在南方政坛上也只是个后起之秀，在黄郛郑重予以推荐之前，他虽然也听别人说起过这个人，但并不是很了解。现在见黄郛将杨永泰说得如此高明，他有些半信半疑，加上忙于北伐，也就没再顾得上理会这位“海内奇才”。

黄郛素知蒋介石的秉性，同时杨永泰的特殊经历，也让他认识到若操之过急，反而会阻碍杨永泰的进阶之路。之后他便将杨永泰、钱昌照召入外交部，一边让二人参襄机要，一边准备寻找新的机会予以举荐。“济案”发生时，杨永泰、钱昌照都随黄郛在济南经历了风波，只是蒋介石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黄郛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后，按照民国时的传统，作为黄的亲信随从，杨、钱也只能辞职离开外交部。半年后，钱昌照由张群介绍，正

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府，得以大展宏图，而在此之前，杨永泰已经在为接近蒋介石暗暗进行设计。

他首先在交通部王伯群手下谋了个顾问的职位，通过向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部长）、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人打听蒋介石的起居住行等情况，以便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在此基础上，他才写出建议书，然后经好友熊式辉之手，向蒋介石条陈时事。可以说，“削藩策”能够让蒋介石眼前一亮并拍案叫好，绝不是偶然的。

杨永泰的这种进身方法，在中国历代权臣传记中都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唐书》中就记载李林甫：“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李林甫在历史上是以奸相的面目出现的，此类方法也被许多人认为过于投机取巧，但在实际运用中它又确实是有效的。

在经历被“李白”拒之门外等诸多挫折之后，杨永泰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见解高不高明是一回事，别人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再能干的谋士，再厉害的谋略，也只有在符合幕主需要，能够解对方燃眉之急的情况下，才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杯酒释兵权

前有黄郛的极力推荐，后有“削藩策”的横空出世，让蒋介石对杨永泰刮目相看。他问熊式辉：“熊司令，此人何在？”

熊式辉连忙答道：“此人正在我的警备司令部内做客。校长若要召见此人的话，我明天便派车把他送来。”

“不，我马上要见！你带我去你的司令部。”蒋介石已经急不可耐。

见蒋介石对杨永泰如此感兴趣，熊式辉既为老朋友从此能够有机会出头而高兴，又不免有些担心。他小心翼翼地提醒蒋介石：“总司令，杨永泰的过去您计较吗？”

蒋介石回答得很爽快：“我也了解他的经历，但过去的事，我不计较，只要他今后跟我好好干就行了！”

命运终于向杨永泰露出了笑容，这是他长久以来非常期待的一刻。看到蒋介石亲自莅临，杨永泰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很礼貌地向对方行了个鞠躬礼：“畅卿拜见蒋总司令。”

蒋介石马上拉住杨永泰的手：“吾辈革命，备感艰辛，求贤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望先生施展管仲、诸葛之才，以贡献国民革命。”

杨永泰何等机敏，当即表明心迹：“我奋斗半生，今日始得一见明君。总司令知遇之恩，日后我当肝脑涂地，以报于您。”

双方寒暄后在客厅落座。蒋介石很谦虚地说道：“杨先生对今日天下大事有何高见，我蒋某在此洗耳恭听。”

杨永泰落魄了许多年，屡受各类幕主的冷落，现在蒋介石不仅“御驾亲临”，而且如此不耻下问，真让他有受宠若惊之感，因此立刻施展平生所学，开始纵论滔滔。

蒋介石听完之后，犹如看到太阳照进屋子里，心里这个亮堂：那些曾经让他一想到就睡不着觉的难题，竟然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都一一得到了答案。

原来黄郛没有夸大，对面坐着的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佐政奇才！

蒋介石马上决定破格重用杨永泰，但却遭到了对方的婉言谢绝："中国问题艰巨，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以一书生微薄之力，难担此重任，恐误党国大事。"

人才流动也必须符合奇货可居的价值原理。想当年刘备访贤，诸葛亮若是在他登门时就巴巴地一口答应，那就跌份了，在刘备心目中的光环也势必要黯淡不少。杨永泰时年已经四十八岁，这可能是他毕生最后一次创业机会，从他为入幕所做的种种努力来看，他的决心就是不入蒋幕便罢，一入就要为蒋所重用。

果不其然，杨永泰这种不卑不亢、半推半就的态度，对蒋介石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他也像刘备遇到诸葛孔明那样，拿出三顾茅庐的姿态，诚恳请求杨永泰能够辅佐自己。

等到杨永泰终于答应出山，蒋介石问他："畅卿打算任何职比较理想？"

杨永泰深明"无功不受禄"的古训，他知道自己初入蒋幕，在未立寸功的情况下，若贸然接受高官，容易引起其他人的不服，于是便说："听凭司令安排，我只想贡献，不图职位高低。"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那好，那好，你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我左右，日后我亏待不了你。"

杨永泰入幕之后，非常用心尽力，遇到具体问题总要预备两三套解决方案。善后会议只是一个对诸侯进行"火力试探"的初步方案，以

探测李、冯、阎的不同态度和胃口。紧接着的五中全会作为第二套方案推出，为的是调虎离山，便于各个击破。

8月8日，五中全会在南京正式揭幕，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表政府任命，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三人长住南京，共商国是。

三顶乌纱帽都来自于杨永泰的建议，这叫“杯酒释兵权”。

得意忘形

蒋、冯、阎、李之中，以冯的西北军部队最多，当然需要裁掉的兵也最多，所以给他的乌纱帽也最大。蒋介石和杨永泰都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冯玉祥在裁兵中带个头。

给官帽的同时，蒋介石也没忘记动用他的情商，极力弥合因为地盘问题而与冯玉祥之间产生的裂痕，为此他还特地邀请冯玉祥到南京的汤山去泡温泉。

蒋介石在汤山有专用温泉别墅，名为“陶庐”。老冯去那一看，第一印象就是“布置得好极了”，院子里有各种花草，厨房里还预备着点心和饭食，什么时候去吃都可以。

“陶庐”门外有宪兵站岗，这地方不但普通百姓和小官进不去，就是与蒋介石没有私谊的大官也不能入内，冯玉祥能够受邀，算是给了他一个天大的面子。

泡完温泉，两人从池子里爬出来，蒋介石突发感慨：“（他们）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

这里蒋介石说的都是新桂系，分别指北平的白崇禧、广东的李济深、上海的张定璠、武汉的胡宗铎。其中张定璠现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他在北伐时期是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上海市长的职务也系白崇禧一手保荐。

听到蒋介石能够对着自己说出如此的体己话，老冯十分激动，他当即站在老蒋的立场上，慷慨激昂地说道：“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就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时时刻刻在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下功夫，又能实际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

其实蒋介石说到新桂系的“野心”，只是为了向冯玉祥倒倒苦水，好拉近双方的距离，他可没耐心听别人讲大道理，尤其是出自于老冯这样的“土包子”之口。偏偏老冯又是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打从军政部长的乌纱帽戴上的那天起，他便过起了下命令的瘾，往往今天令蒋介石，明天令李宗仁。像这样“当面指教”蒋介石，在他看来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眼见老冯越说越起劲，蒋介石赶紧转移话题：“没有什么。”

又有一次，蒋氏夫妇来看冯玉祥。冯的副官说冯不见客，蒋介石一个“你们不要管”，便直接闯入屋内，走上了楼梯。

蒋介石送给冯玉祥一棵很长的人参，又邀他出去吃野餐。短时间内，蒋、冯仿佛又回到了当初换谱做兄弟的时候。

看看时机差不多了，蒋介石宣布正式召开编遣会议。他再次重申，全国除东北外一共编五十个师，各集团军自己研究，看编多少合适。编遣会议也相应分成非正式会议和正式会议，非正式会议主要用于交换意见，作出提案后再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

这时候的老冯在“李白”等其他派系看来，早已经得意忘形。他不会再与别人一起合斗老蒋了，而只想超越众人，独自登上权益的最高峰。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主张精兵原则，并提出了四项编遣标准，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

这些标准除了“革命性”那条过于主观，难以掌握外，其他几乎都是在为西北军量身定做，以此来衡量，西北军应编的占大多数，应遣的只占极少数。

何应钦当即问道：“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玉祥大言不惭地回答：“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

众人哗然。蒋介石也极为失望，他是要让冯玉祥带头裁自己，可不是带头保自己裁别人。于是便很不高兴地哼了一声：“那你提个方案吧！”

老蒋的表情让老冯幡然醒悟：这样只顾着自己确实不好，以后谁还肯和你一块愉快地玩耍?

回去后，老冯真的又拟了一个方案。这次他没敢再把自己放第一位，而是与蒋介石拉平了，同时又把阎李及其他杂牌继续压低。

过了几天，开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冯玉祥将他的方案公布于众：西北军和蒋军各编十二个师，桂军和晋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蒋介石听了自然还是不满意，“李白”和其他人也不甘心。于是蒋介石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就把冯的方案搁置起来。

在老冯看来，这就是最佳方案，也是他在编遣过程中可以容忍的极限，当下不管方案会不会通过，就今日一电令，明日一电令，自顾自地在西北军内部裁并起来。

以后又陆陆续续开了几次非正式会议，与会者话不投机，争吵不休，离主题也越来越远，几乎酿成僵局。

有赚无赔

打破僵局的希望，逐渐被放在了迟迟未能与会的阎锡山身上。蒋介石给阎发去让他担任内政部长的电报，并询问他父亲的病情，意思是催促他尽快赴京。

阎锡山首先回电称不能在南京供职，仅保荐心腹赵戴文出任内政部次长，以代理部务。阎锡山此举令白崇禧拍案叫绝，称为“阅历深，见得远”，而不像冯玉祥“近视眼，不度德，不量力”。

接着，针对蒋介石让他尽速与会的要求，他又编了一套谎话，说是在老父生病期间，他一直亲自服侍汤药，现在虽然父亲的病刚刚好了一些，可他自己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所以还是不能立刻赴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确实虚了，阎锡山还真的将家搬到太原崛围山休养去了。

对蒋介石急于通过编遣会议毕其功于一役的情绪，阎锡山看得一清二楚。他有些不屑地对亲信幕僚说："蒋介石这人器量狭小，排除异己，遇事操之过急，终不能成大事。"

在各方函电交促下，阎锡山一直拖到编遣会议中期才前往南京。南京的军政大佬们无不翘首以待——蒋介石应付不了冯、李，指望他能从中转圜，而"李白"见冯玉祥与蒋似乎靠得很紧，惧怕蒋、冯真的合作起来，也期盼阎锡山加入他们的阵营，以便增加声势，共同对付老蒋。

骤然升高又如此集中的期望值，使得阎锡山未来南京之前就造成一种气氛，好像只要他一来南京，关于编遣问题的一切症结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当阎锡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时，他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充分证明这次的投机生意又是有赚无赔。

阎锡山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派晋军总参议周玳到白崇禧处拜访，以便摸一摸这次编遣会议的底。一见面，周玳就问白崇禧："你们近来做了些什么？"

白崇禧哈哈大笑：“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成绩？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倒是大做特做。他的口不大，肚子却很大，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

白崇禧接着讲了冯玉祥在南京这段时间的言行，并讥笑冯玉祥：“他现在第一步想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他好独霸中国。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荡过多年，哪里像曹三爷（指曹锟）一样容他摆布。”

白崇禧对周玳说：“你瞧着吧，不久他（冯玉祥）就会吃亏的，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我想，因为方顺桥那段故事，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

周玳急忙回应：“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方顺桥的事他当然不会忘记。不过他看出老蒋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免得唇亡齿寒。”

白崇禧在方顺桥战役中曾经爽爽快快地帮过晋军的大忙，虽然双方在争夺平、津地盘上有矛盾，但表面上仍客客气气。周玳问白崇禧，既然冯玉祥已经提了方案，为什么你们不也跟着提一个方案？

白崇禧回答，和蒋介石共事，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所以索性不提了。

“龙天表”是道教中法师焚化的一种符箓，大致相当于送给神仙的私密信件，白崇禧以此表示跟蒋介石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夜访结束后，周玳把白崇禧的话详详细细地转告给阎锡山。他建议：“冯焕章准备了提案，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以免临时措手不

及。”

阎锡山老谋深算：“不必着急。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再提，也还不迟。”

过了三四天，何应钦来见阎锡山。谈到编遣会议，他也特别谈到冯玉祥的提案，并且如阎锡山所料提出了请求：“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的意思，是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

“中央区”是给谁用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看来蒋介石也把阎锡山当成了可倚仗的对象。阎锡山考虑片刻，不敢马上答应，便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

何应钦走后，阎锡山召集周玳等幕僚研究提案内容。此时他想到对“中央区”还是得表个态，毕竟这个话要让蒋介石自己说，确实有些难以出口。

北伐之后，阎锡山实际成为地方诸侯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仅不想真的和“李白”搞在一起，跑去触老蒋的龙须，甚至于还要依靠老蒋做后台，力保平、津。

因为有可能跟阎锡山争夺平、津的，其实正是白崇禧。白崇禧老是赖在华北，让阎锡山时时有芒刺在背之感，对这个小诸葛，他既不能得罪，可也绝不肯让对方占到什么便宜。

一份考虑周全的阎提案就此出笼。

羊肉馒头没得吃

几天之后，编遣会议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当天出席列席的所有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地坐在台上。他在会议致辞中说：“我们的军队既不用对外，就应尽量缩编，该编者编，该遣者遣。至于按照什么标准，本人没有成见，大家可以从长计议。”

接着他让何应钦将冯、阎的提案都读了一遍。冯提案已不新鲜，大家注意听的是阎提案。阎提案：蒋军、西北军各编十个师，晋军、桂军各编八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六到八个师。最后剩下的六到八个师待编名额，可以由中央处理。

阎提案可以说是得罪一家，讨好大家。蒋介石的“中央区”有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觉得自己在兵额上跟冯玉祥相差不大，心理也能够平衡。于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多数人赞成阎提案，反对冯提案。

蒋介石很高兴：“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中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会场上沉默了三四分钟，冯玉祥突然放开喉咙喊道：“咱们刚刚打完仗，军队还没有复员，似乎应该缓口气再进行编遣。”

蒋介石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顿时语塞。看到蒋介石一副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在座的吴稚晖急忙接过话茬，引经据典地大谈古今中外的治国之道，借此开导冯玉祥：既然已经通过了编遣的决议，就不能再拖下去。

吴稚晖的嘴功是有名的，即便临场发挥，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足以让老蒋缓过劲来，并想出应对之策。他哼哼了两声：“对，对，编遣也并不是即刻就进行，不过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机构。我们这个会只要讨论如何把机构组织起来，就算达成了任务。”

蒋介石打算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委员会里还要设一个管理财务的经理组，组长则由阎锡山担任。阎锡山听后沉默片刻，答道：“好吧，我一定勉为其难。”

“勉为其难”的背后，是满载而归的喜悦。经理组组长的油水有多厚，谁都清楚，这也是老蒋给阎提案的回报。

老冯瞧在眼里，心里这个窝囊劲就别提了，正是“羊肉馒头没得吃，空教惹得一身臊”。

会议结束，老冯两眼喷火，怒容满面地走出了会场。一回到寓所，就对幕僚说：“咱们的裁并电报以后不要再发了。”

这时候西北军已经自行裁并了八九个师，幕僚有些不明所以，只听冯玉祥气呼呼地说道：“人的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

第二天继续开会，冯玉祥称病不再赴会，只派代表参加。在与会者陆续到达会场而蒋介石还没有露面时，白崇禧开玩笑似的对阎锡山说：“经理组是个花钱的事，你当心左右为难。”阎锡山还没答话，冯玉祥的代表便含酸带醋地揶揄道：“百川先生（阎锡山）有办法。”

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公布了他的一个新想法，即将每个集团军作为一个编遣区，每区设一个编遣主任委员，但集团军司令不再兼任，而另由集团军司令挑选下次一级的人员担任。

蒋介石自己选定了何应钦，冯玉祥的代表选鹿钟麟，阎锡山选周玳。轮到李宗仁，他停了好一阵，才说选白崇禧。

之后，蒋介石照例又说了许多官样套话。台下，“李白”等人一个个犯困打盹儿，只有阎锡山毕恭毕敬，心领神会般的默默静听。

接下来有两天休会时间。蒋介石便派孔祥熙代表他前去慰问“生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年少时想当传令教习，曾经四年如一日地练习喊口令，结果练出了一副惊人的大嗓门，他的声音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就在孔祥熙走进院子时，还听到冯玉祥在和许多人说话，但一进屋，却看到冯玉祥倒在床上，盖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

孔祥熙上去摸摸他的头，发现他又没有发烧，可见不是真病。至此，冯玉祥得了“心病”的说法便流传开来。

作为堂堂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有影响力的地方诸侯，跑到京城来装病自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可是老话说得好，“一日不识羞，十日不挨饿”，只有脸皮足够厚才能吃饱饭，这可是他老冯多年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老冯的态度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既然你老蒋不够意思，让我阴沟里都翻了船，那我还有什么义务再陪你玩？

蒋介石十分不悦，晚上他请阎锡山去吃饭，当着阎的面，就表示出对冯玉祥的极度不满。

对冯是不满，对阎则是赞赏。蒋、阎二人一直闲聊到晚上十一点，阎锡山才含笑回到自己的寓所。

在南京城里，阎锡山真正成了一块热腾腾的香饽饽。接下来，老蒋又单独找他商讨了好几次，征求他的意见，并研究如何才能把会开好。

阎锡山一边极力表示拥护编遣会议，一边劝蒋不可操之过急，他还答应会去劝说冯、李不要固执己见。蒋介石对此甚为满意。

李宗仁和冯玉祥那边也一个不肯落下，他们或亲自或派人，上门劝说阎锡山反对编遣会议。阎锡山则对他们说这不是好办法，若是操之过急，弄成僵局，蒋固然不爽，于他们冯、阎、李也很不利，还是应该徐图良策才行。冯、李虽不以为然，可表面上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阎锡山左右逢源，好不得意，他高兴地对周玳说："咱们迟来的办法是做对了。"

耍赖最方便

重新开会，蒋介石为了强调编遣的重要性，特地提到了日本军制。当时日本是征兵制，中国还是募兵制。老蒋认为，这是中国士兵素质不如日本士兵的主要原因，"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

蒋介石刚刚说完，冯玉祥的代表就抢白道：“一般军队素质不好，因为是拉来的壮丁，没有经过选择。我们第二集团军便不是如此。”据他说，西北军都是先由各县征集，再经中下级军官选拔，剔出一半较差的，剩下来的人还要由冯玉祥和其他高级军官一一验看，不合格的人仍然要继续剔除。

“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绝不是无赖、流氓、土匪。”冯玉祥的代表话中带刺，说得很不客气，显然是有备而来。

蒋介石猝不及防，十分尴尬，会场也陷入了沉寂，没有人出来搭腔。幸亏阎锡山见势不好，急忙站起来打了个圆场，才没有陷入僵局。

冯玉祥的搅和，让蒋介石很是恼火。虽然会场上制度很严，没有出席证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场，同时也不许新闻记者前来旁听，但列席的军政人员不少，总是要维持些起码的体面才好。

明知冯玉祥是装病，蒋介石也不得不当成真的一样对待。除安排阎锡山前去探视外，他自己更是两度偕夫人宋美龄上门慰问，在希望对方不要借机闹事的同时，也想重新弥合双方的裂痕。

由于冯玉祥对会议持抵制态度，编遣会议已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白崇禧等人推举阎锡山出面，以阴历除夕将至为由，要求离开南京。

眼见众人都无心议事，蒋介石只好宣布：“那么咱们就休会，我给你们预备专车。”

阎锡山、白崇禧都走了，冯玉祥找来谋士张钫商量今后怎么办。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一个编遣会议把各人的真心假面全都暴露得清清楚楚。冯玉祥认为自己和老蒋大概是尿不到一块儿去了，但今后最有可能斗得跟俩乌眼鸡似的人，绝不会是他和老蒋，而只会是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

蒋桂暗斗，预示着内战将起。冯玉祥打算学习阎锡山，暂时避开这个旋涡。

冯玉祥的幕僚大多出身行伍，缺乏新型政治理念。张钫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冯氏幕僚中眼界较宽的一个。他就此建议冯玉祥回西北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参加关外乒乒乓乓的打斗，先用三年时间休养生息，“保持西北一片净土”。等有机会再出关问事，到时西北军兵强马壮，若争霸中原，不由得什么老蒋、老阎、老李不服，所谓“风声所树，一切事自然迎刃而解”。

计是好计，关键是眼下如何脱身。冯玉祥在和张钫计议后，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借个名义出国；二是直接返回自己的军队。

如果要求出国，蒋介石必然不会同意，毕竟冯头上还套着一个军政部长的官帽。如果要返回军中，以现在这种蒋、冯已经形同破裂的关系，估计老蒋不仅不会答应，还会加重疑虑。

思来想去，冯玉祥还是觉得要赖最方便。于是他便以不告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了南京，直到渡过长江后，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信请假，理由是：养病。

当蒋介石得到消息时，冯玉祥已经在数百里之外了。

曾被外界寄予极大希望的编遣会议就此无疾而终，除了热闹热闹大家的眼睛，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蒋介石对此嗟叹不已，说：“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系抗命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

冯阎李，只有李宗仁还留在南京上班。这是因为新桂系跟冯阎不同，其地盘皆另外有人掌控——两广有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有胡宗铎、陶钧，就连北方的唐山、山海关还有一个白崇禧。这些地方，李宗仁都用不着亲自坐镇，非但如此，他长住京师，还能起到打听内幕并暗中掌控的作用。

编遣会议是冯玉祥第一个搞砸的，也让蒋介石对冯玉祥有了新的认识，只是以蒋军彼时的实力，实在奈何西北军不得。冯玉祥离开南京后，老蒋便想缓和与李宗仁的关系，用蒋、桂联手的方式来合力对付冯玉祥。

李宗仁固然不乐意冯玉祥，但比之于冯玉祥，他更不喜欢的恰恰是老蒋，因此他不但不肯接受这一建议，还反过来劝老蒋要对冯玉祥“感之以德”，说假如老蒋肯这样做，冯玉祥“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

蒋介石哼了一声：“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

李宗仁说服从不服众是一回事，能不能对付是另外一回事：“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个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

接着，李宗仁又打了个比喻，说冯玉祥今日的作用，就像穿制钱的绳子一样。有绳子在，制钱一提即起，如果绳子断了，钱便会撒一地，再捡起来就麻烦了。

知道李宗仁不愿合作，蒋介石只能知难而退。这时的新桂系势力自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至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一样俯瞰华东，处于全盛时代的他们确实不需要，也不屑于看老蒋的脸色。

正因为势力发展过快，其实从很早开始，新桂系就有些找不到北了。

借力打力

当初，为了与李宗仁携手北上参加善后会议，蒋介石曾在武汉绕了一圈。在李宗仁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新桂系位于两湖的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均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借故不肯出席，给老蒋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第二天，蒋介石循例检阅驻汉部队。在他做了简单训话后，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突然站到阅兵台前，提高嗓门，说："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

蒋介石固然心中不快，但也只好装成没事人一样，暂时隐忍不发。

编遣会议召开前后，看到老蒋在对付诸侯方面似乎仍然力有不逮，新桂系又在两湖掀起了新的风浪。

两湖中的湖南系广西门户，且是鄂桂通道，新桂系要巩固后方，势必将湖南政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李白"以程潜主湘，固是迫于形势，以后软禁程潜，由鲁涤平继任，其实也出于权宜之计。

鲁涤平是湖南人，为谭延闿的嫡系，他所率领的第二军，其前身就是谭延闿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利益，作为其嫡系，鲁涤平的立场自然也比较接近中央。新桂系始终持反蒋态度，这时候的反蒋也就是反谭，反谭也就是反鲁。他们能够用鲁涤平主湘，仅仅是因为此前已连续扳倒了唐生智、程潜，如果再以外籍人继任湖南省主席，恐招致湘人的公愤和反弹。

对于鲁涤平，新桂系只视之为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在鲁被发表主湘的次日，叶琪请他吃饭，席间他屡次宣扬“李白”的“威德”，意在窥察鲁涤平的态度。

鲁涤平不知对方究竟用意何在，神色略带惶恐，表示不敢就职。叶琪又劝他放手去干，并推荐自己的人协助其工作，实际上是安插“内线”，对鲁涤平实施监视。

鲁涤平不是不明白叶琪的用心所在，但回湘后，仍委任叶琪的“内线”为湖南省政府军务科长。不但如此，叶琪每次来长沙，他必定都要亲自到车站迎送。

叶琪以前做过鲁涤平的部属，鲁任团长时，他是连长；鲁任师长时，他是团长。对一个老部属极尽奉承讨好，在民国那种氛围下并不多见，也很容易惹人笑话。

鲁涤平当然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而是不敢不这么做。因为叶琪跟夏威关系密切，夏威遇到事情必要先跟他商量，可谓言听计从。夏威时任第七军军长，乃是新桂系在两湖的实力派，鲁涤平深知，叶琪可能几句话就能决定自己的去留。

新桂系在两湖已经嚣张到了何种程度，而鲁涤平对他们又害怕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鲁涤平主湘后，照例兼任湖南清乡督办，仍以何键蝉联清乡会办。以前程潜主湘时，湖南事务多交给何键主持，自己很少过问。鲁涤平继任后，表面上虽然萧规曹随，但已明显不同于程潜。程潜那时候是认为自己兼管两湖，他经常要往武汉跑，湖南这边想忙也忙不过来，而鲁涤平只有湖南可归他管，何键管多了，就等于和他争权一般。

清乡督办署是掌握湖南省地方武装的枢纽。鲁涤平想要独揽督办署的大权，可是因为初次打理湘政，他对于湖南的军政情形颇为生疏，而何键对湘事摸索日久，心中有数，结果鲁涤平还是只能将督办署交由何键主持。

何键随着羽翼渐丰，也感到湖南有鲁，自己在湖南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始终只能屈居于“会办”这样一个助手的地位。如果他想完全掌握湖南的地方政权，则非驱鲁不可。

何键为人深沉，平时喜怒不形于色，鲁涤平同样不是那种喜欢咋咋呼呼的人。两人尽管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并且猜忌防范之心日甚一日，然而彼此仍虚于周旋，没有爆发过任何剧烈冲突。

从何键方面来说，单靠他自己来驱鲁，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他得借力打力，而这个能借到的力就是新桂系。新桂系此时虽然还没有公开喊出反鲁的口号，但忌鲁驱鲁之心，与何键并无差别。

新桂系在鄂将领多为保定生，何键也是保定生，这是没进过保定军校大门的鲁涤平无法相比的。何键便利用这一优势，与新桂系中的

“湖北派”拉上关系。

何键并非新桂系主湘的理想人选，但他们认为何键是保定军校同学，较之亲南京政府的鲁涤平毕竟要好一些。“李白”以下将领均认为有拉何制鲁的必要，叶琪在与人闲谈时说：“湖南这个地方要抓住，鲁胖子（指鲁涤平）想过主席的瘾，让他过过瘾。以后的事就要靠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了。”

弄清新桂系的意图后，何键便时常赴汉，与“湖北派”加强联系。同时，他对清乡督办署的事务也抓得更牢，已达到完全一手包办的程度，鲁涤平几乎无从过问。

一次，叶琪由鄂来湘，鲁涤平设宴招待，宴席上他对同桌的人说：“湖南的事，只要芸樵先生肯替我帮忙，是大有可为的。”不安之状溢于言表。

汉口之约

一山难容二虎，鲁涤平开始苦寻反制何键的办法。此时湘赣边区的红军力量正日益壮大，于是他向南京政府建议，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根据鲁涤平的提议，南京政府批准设立湘鄂“会剿”总指挥部，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

鲁涤平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请辞总指挥职务，以何键代替；一面向省务会议提议裁撤清乡督办署，并将督办署的全部人员移至“会剿”总指挥部。

如此一来，何键不仅被剥夺了督办署的实权，而且在他带兵到江西“剿共”之后，也实际被赶出了湖南。

何键为人圆滑，尽管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他也没有立即与鲁涤平闹翻：你说撤督办署就撤督办署；你说让我去江西，就去江西。

背地里，何键与新桂系靠得愈加紧密。他除以报告湖南事项为名，到武汉面谒李宗仁外，还在胡宗铎的陪同下，到北京拜见白崇禧，以此得到了新桂系两位老大的首肯。

当“湖北派”表示要何键担负湖南全部责任时，他便趁势说道：“责任是愿负的，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为之奈何？”

“湖北派”马上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胡宗铎拍着胸脯说帮忙帮到底，还说：“鲁咏安（鲁涤平字咏安），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煦苍）、翠微（叶琪字翠微）来共同对付他。芸兄（何键）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何键心领神会，遂安安心心地到江西萍乡就职，同时集中兵力，做好了应变倒鲁的准备。

编遣会议结束后，“李白”侦知，蒋介石已决定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自老蒋复出，新桂系就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合法组织是武汉政治分会，一旦政治分会被撤销，用以罢免鲁涤平的工具就没有了。

正好蒋介石此时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新桂系决定抓住时机，先发制人。李宗仁不再回武汉，而是来往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他主要还是为了装出一副好整以暇的态度，以便

在事变后，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在减轻责任的同时，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跟冯玉祥学，装病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湖北派”的邀约下，何键到岳阳与叶琪商量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1929年2月19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何键继任。鲁涤平被免职的理由和以前给程潜的罪名大同小异，说他“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

当天晚上，胡宗铎电告何键：“汉口之约，今日实现。”

第二天，叶琪、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按计划分路南下。何键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跑回自己位于湖南醴陵的部队驻防地，坐等鲁涤平下台。

北有阎锡山，南有何键，都是善于多方应付的聪明人，对事也常常会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为了防止出现鲁桂交兵，相持不下的尴尬结果，他一边借口要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一边特地打电话告诉鲁涤平：“鄂方有军车南开，请预为准备。”

对鲁涤平来说，何键的两面派式预警已为时太晚——因为桂军调动极其机密，连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事先都被完全蒙在鼓里，未能提早向长沙发送电报。等桂军的军车越过汨罗江，接近鲁部防线时，鲁涤平才接到相应报告。

叶琪此前每次来长沙，鲁涤平都把他哄得跟个大爷似的，现在突然翻脸，自己也觉得不太近人情。行军途中，他给安插于鲁涤平身边的“内线”发去急电，要此人劝鲁涤平速离长沙。“内线”给鲁涤平一

讲，鲁涤平大吃一惊，赶紧让他乘专车前去与叶琪接洽，并且说他愿意自动辞职，请桂军不要开入长沙。

“内线”马上在鲁涤平的宅邸打电话，向铁路局要车，得到的回答却是铁路上军车太多，专车已开不出去。

21日，见桂军兵临长沙，鲁涤平乘坐外国轮船，由九江转赴南京，跟蒋介石、谭延闿诉苦抹眼泪去了。

在鲁涤平的部队撤退时，何键还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湖南，以此表示自己置身事外，同时给日后与鲁涤平见面留下余地。

水浒的世界

鲁案（又称湖南事变）毫无疑问是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是对蒋介石权威的一次严重挑衅。武汉政治分会尽管还没有被撤销，但相关条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无权任免该区域内的人员。桂军兵至长沙，更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

惊闻鲁案爆发，蒋介石忙从奉化赶回南京。在听鲁涤平讲述完事变的经过后，他大为气愤，认为新桂系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亏，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即电呈南京政府，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之后他推托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医院里躲了起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还提到新桂系此举，“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的确，看到自己的嫡系丧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为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蒋介石一样对新桂系极为不满。

另一个让谭延闿感到不高兴的人是何键。尽管何键在事变中给自己留了余地，可这如何能瞒得过大半辈子都在官场上厮混的谭延闿?从鲁涤平的哭诉中，谭延闿完全能够判断出何键就是倒鲁行动的主谋者之一，以及在这次事变中担当了怎样两面讨好的圆滑角色。他对人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趁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是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

鲁案后，南京政府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难题。根据法理，武汉政治分会的任免是非法的，何键当然也不能主湘，可现在的问题是木已成舟，如果对何键的新职务贸然加以否认，不仅可能使湖南局面更加陷入僵局，而且必然会将何键进一步推向新桂系一边。

正因如此，当鲁涤平手下的一些幕僚愤愤不平，纷纷对何键展开攻击时，谭延闿又选择了缄默不言。他和蒋介石商量一致的结果，还是要暂时稳住何键，以防湖南再次出现动荡。2月27日，南京中央会议做出决议，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不久便正式督湘）。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主力部队集中至安徽境内，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盘踞在长江上游的桂军，而桂军也不甘示弱地摆出了一副决斗架势。

看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鲁案，李宗仁遂请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白崇禧也称病请辞前敌总指挥职。

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进行要挟的手段。在新桂系内部，早已通过秘密带信、传发密电等方式对军事

方案展开讨论。

在新桂系的三巨头中，“李白”都以军事指挥见长，偏重于攻，唯有黄绍竑以政略见长，被称为新桂系的“阴谋家”，偏重于守。黄绍竑认为不能急于同蒋介石开火，他主张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不惜放弃武汉和北平。这样至少可以确实控制住广东和湖南，达到进可战、退可守的目的。

白崇禧却认为黄绍竑的战略过于消极。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新桂系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热烘烘局面就自己垮掉了。他计划派自己在唐山的“桂系湘军”（指唐生智旧部）徐州直趋浦口，而以武汉的“桂系鄂军”（指胡宗铎、陶钧两部）顺长江东下直取南京。

白崇禧的观点得到了胡、陶的支持。李宗仁见状，便也站到了白、胡、陶一边。

“李白”不肯舍弃尺土寸地，当然是缘于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但同时也是因为得到了冯玉祥的许诺。

西北军的兵力超过蒋、桂中的任何一家，可以说冯玉祥选择跟谁合作，谁就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蒋、桂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竭力与冯玉祥套近乎，一时信使往来，颇为频繁。最后，李宗仁派出的代表抢先一步得以在河南拜见冯玉祥，并带去了“李白”的意见，称老蒋要以编遣的名义压迫冯桂两军，现在“李白”决定倒蒋，约冯一同行动。

蒋、李曾是结义兄弟，可是一转眼也就翻了脸。李宗仁为此大发感慨，说兰谱中的话真不可靠，所谓的“亲如兄弟、同生共死”转瞬间就会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无怪乎“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他

指的当然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但实际上对他们这些身在政治场和利益圈中的人们而言，不过彼此彼此。

蒋、冯的关系也是一样，昨天还是山盟海誓，第二天就可能谁都不认识谁。老蒋把河北和平、津给了阎锡山，已经让老冯相当不快，后来在编遣会议中结成的恩仇，更令老冯视蒋为敌。

在离开南京时，老冯曾有一个不参加蒋桂之争，回大西北整军经武的计划，但这个计划需要有能静下来读老子庄子的心，而外面的世界却是水浒的世界，那个热闹与喧嚣，他又如何有这等定力?

各方面代表一活动，冯玉祥就逐渐改变了原先不加入内战的计划。他告诉李宗仁的代表：“烦请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

冯玉祥开始进行反蒋准备。谋士张钫劝他不要理会李宗仁，还是按计划速速西去，冯玉祥则复电说：内战将起，奈何奈何。

有了冯玉祥的承诺，“李白”信心大增，这也成为他们不屑于收缩兵力的一个重要理由。

从来新桂系内部的大事都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共同商量，然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过去三人的意见一般都是一致的，很少出现争执，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

见“李白”坚持己见，黄也就不好再加以反对了。包括黄绍竑在内，三个人当时都不知道，从这时候起，失败的阴影已经开始紧紧地笼罩于他们的头顶。

八抬大轿

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他将南方的新桂系视为一股，北方的冯、阎视为另一股，称这两股力量都足以与蒋争霸天下。

冯、阎、桂一旦实现大联合，对蒋政权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杨永泰论述道：“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

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表明“政治削藩”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杨永泰转而主张在冯阎桂联手之前，逐一进行“武力削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新桂系。鲁案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理由。

即便抛开冯、阎，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要想用军事手段单独消灭新桂系，似乎也是一个很难达成的目标。桂军从南到北，从两广到两湖，再到山海关，战线长达千里，已经形成了可以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一字长蛇阵”，蒋军不攻便罢，一攻很可能成为对方的“腹中之食”。

显然，若想仅靠打仗来解决新桂系，胜负难有定数。杨永泰的办法是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相结合，对新桂系分散在各地的势力予以各个击破。

他首先把目光盯在了广东，所用之术是“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

陈铭枢早就投入了老蒋的阵营，陈济棠也与南京政府暗通款曲，但广东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二陈，而是李济深。李济深在两广拥有过人的威望，陈铭枢、陈济棠等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就算他人不在广东，只要能够继续发号施令，二陈仍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正好国民党三大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纷纷赴京。李济深本来也应率代表与会，但处于这种敏感时刻，还要不要到南京去，他颇费踌躇。躲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希望李济深能以广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新桂系，不愿他为蒋所谋，所以也力劝其不要赴会，并预言李济深到南京只会凶多吉少。

见李济深犹豫不决，徘徊不进，蒋介石决定派吴稚晖到广州迎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孙中山的同辈人，当他名满天下，以反清革命家、国民党元老、教育家的形象跻身于民国政坛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一个小学生，两人年龄相差居然有二十二岁之多。

仅看两人过去的履历和年龄差距，似乎更应该是蒋介石给吴稚晖牵马坠镫才是。当然，如果说吴稚晖想借助蒋介石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之梦，这倒也可以理解，可实际情况是，吴稚晖并没有什么做官的瘾，其人生信条为“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担任过的最长时间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常委，除此之外，并没有在南京政府当过大官，连蒋介石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都被他一口拒绝了。

有人觉得蒋介石坏，宁死也不肯做蒋介石的官，吴稚晖是完全相反，他满心满眼都觉得蒋介石好，就连坏的都是好的。在吴稚晖看

来，自己不做官的好处之一，也是能更好地为蒋介石奔走呐喊。他曾一再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过问国事，帮蒋先生说话，不是比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人说话更方便吗？”

与陈布雷等“文胆”不同，吴稚晖的本事主要不是笔，而是嘴。蒋介石让他到广州去拉李济深，老头子立即赶赴广州。去了之后，便不顾鞍马劳顿，喋喋不休地跟李济深讲起了务必要赴南京开会的道理。

吴稚晖与李济深本是儿女亲家，这种关系加上吴稚晖那张锋利的嘴，终于让李济深招架不住，答应动身北上。

3月11日，李济深率一批代表抵沪。这时全会还没开幕，李济深暂时不来南京也无不可，但蒋介石又向他发出邀请，请他来南京居中调停中央政府与“李白”的矛盾。

李宗仁见状，再次劝李济深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到时广东必陷，广西也会随之失去援助。听完他的分析后，李济深觉得很有道理，当即说，自己决不去南京。

李济深不来，蒋介石自有办法，他让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元老出马，要求即便用八抬大轿，也非得把李济深抬到南京来不可。

张静江等人对此事都不太热心，只有吴稚晖特别能体谅蒋介石，在劝李入南京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一到上海，四老就前去拜访李宗仁，同时约李济深来李宗仁的寓所谈话。吴稚晖代表四老对李济深说：“蒋先生命我们四人来劝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入南京面谈，请任公不要推辞。”

李济深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说："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南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回答："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他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如果任潮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三路并进

即使有了蒋介石的"人格担保"，李宗仁也坚持不让李济深去南京——你蒋介石不是要调解吗？可以，就在上海调解好了。

他对吴稚晖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在南京谈判，究竟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稚晖对在上海谈判不予考虑："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

眼看蒋介石的信用得不到对方的承认，吴稚晖把自个儿都给摞上了桌："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李宗仁并不相让："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接下来，任吴稚晖说破了嘴，李宗仁只当是两片瓢，惹得吴稚晖暴跳如雷，跳着脚大喊：“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老与二李的谈话足足持续了两天之久，第二天更是从上午十一点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让吴稚晖特别来气的是，李宗仁始终以李济深的保护人自居，一再阻止其赴京，这使得他真恨不能上前捶李宗仁两拳才好。

突破口还是在李济深自己身上。经常出入南京政府的钱昌照对二李有一个基本评价：李宗仁比较忠厚；李济深不仅比李宗仁更老实忠厚，而且心肠较软，容易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

李济深以前就因为相信汪精卫而吃过苦头，在吴稚晖的软硬兼施下，他的态度最后又软了下来。他告诉李宗仁：“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告，从上海来到南京。最初，蒋介石倒没有像李宗仁所说的那样，立即翻脸不认人，李济深也得以与蔡元培一起，对鲁案提出调查报告。

李济深与新桂系形同一体，当然只会向着“李白”说话。这份由他主导的调查报告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以李宗仁“因公留京，事前并未与闻”为由，免去李宗仁的责任和处分。至于板子，则打在了张知本、胡宗铎等人身上。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做出决议，宣布免去张知本、胡宗铎等人的职务。

鲁案到此似乎就可以了结了，但蒋介石显然对“三一三决议”并不满意。他所满意的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李济深已身陷南京，并受到了秘密监视！

设法困住乃至于诱捕李济深，只是杨永泰各个击破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整个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并进，使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

杨永泰建议蒋介石：用新桂系的政敌俞作柏来拆李宗仁的台，同时让唐生智收回旧部，以进逼白崇禧。

俞作柏当年在广西与李、白、黄等人共同打天下，此人恃才傲物，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他不但不屑白崇禧，甚至于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李宗仁都看不起，曾经对人说：“把一只狗甚至一只猫扶上树是可以的，但一头猪无论你怎么扶，它还是上不了树。”话里的“猪”隐喻的就是李宗仁。

对这样的刺头，“李白”自然难以容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感到在新桂系里站不住脚，就自动辞去本兼各职，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作为新桂系中最先分裂出去的头目，俞作柏虽然已无兵权，但对桂军仍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现任第七军第一师长李明瑞是他的表弟，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奉蒋介石之命，杨永泰手持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香港找到俞作柏。除了那封信件外，他还向俞作柏赠送巨款，并且许诺：“如果俞将军能够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将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

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钱昌照与杨永泰同为蒋介石的幕僚，然而钱昌照对杨永泰却素无好感，他认为杨永泰喜欢搞权术，不够光明磊落。事实上，钱、杨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不同。后来有一次杨永泰曾半开玩笑地对黄郛说："乙藜（钱昌照字乙藜）真傻，蒋先生对他很信任，而他就是不在蒋先生左右安排耳目。"

归根结底，钱昌照搞的是经济，杨永泰搞的是政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到今，政治领域就没有完全光明一说，如果连权术都不会，充其量也就是个书生而已。

如何亲近知识界，蒋介石要靠书生钱昌照，而在如何搞阴谋诡计方面，政客杨永泰则当仁不让。

俞作柏接受了杨永泰带来的巨款，答应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在杨永泰陪同俞作柏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上将参议，并决定由杨永泰协助他到汉口，与李明瑞进行秘密接触。

新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其中，第七军为桂军老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九军都是后来收编的。

在早期的老桂军中，夏威、胡宗铎并列，称为"夏胡"，对胡宗铎当军长，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只有陶钧是由旅长越格提拔上来的，而资历比陶钧更深，战功也更高的李明瑞等人却未能得到提拔，他们的内心自然极为不满。

而后，“李白”又搞“鄂人治鄂”，放纵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夏胡”一变而为“胡、陶”，夏威反倒处于若有若无的地位。

陶钧为人骄横，升任军长后即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不甘人后，将榷运局搂于怀中。两局的收入，除归入胡、陶私囊外，其余大部分留给十八军、十九军使用，导致这两支新部队的生活反优于第七军。

由于待遇不平等，在第七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李明瑞等人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夏威向胡、陶交涉，可是夏威却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桂鄂不合，让俞作柏的汉口之行非常顺利。通过李明瑞的居中牵线，俞作柏与杨腾辉等第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共同行动。

天津策反几乎与武汉策反同时进行。唐生智的部属借着以军队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来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桂系湘军”对蒋竭诚拥护，并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对他们进行指挥。

蒋介石此时已派人和从日本归来、正寓居于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让他去天津接收“桂系湘军”，同时承诺一旦唐生智完全掌握部队，便给予名义。

3月20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证实两路策反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加上李济深又虎入牢笼，在南京受到秘密监视。基于这些情况，他认定解决新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便在三大上发表了对付新桂系的意见，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只有命令，绝无调停的可能。”

这意味着“三一三决议”被蒋介石完全推翻，他要对新桂系动武了。

在此之前，李济深也察知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颇有悔不当初之感。他的幕僚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接洽，派一艘法国军舰到下关来把他接出去，但李济深在已遭到密探监视和跟踪的情况下，生怕自己还未到江岸就被暗杀，所以只能放弃这一出逃计划。

3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宴请李济深，宴席之上，即以“勾结桂系，拥兵自护”为名，将李济深公开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

老蒋不顾“人格”、背弃诺言的举动，令原先在上海做过保证的四老全都目瞪口呆。蔡元培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张静江与蒋介石是结拜弟兄，私下只称蒋为“老三”，他气得顿足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最尴尬的是吴稚晖。到了这个地步，你要让他真的“在墙上碰死”，他也做不到，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没有装聋作哑，或一溜了之，而是抱着铺盖卷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并让人带话给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

张静江、李石曾出于内疚之情，也常去汤山看望和抚慰李济深。这些对改变李济深本人的现实处境都不无帮助，但要想让他获释，老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月26日，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宣布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犯了“叛党乱国罪”，决定予以撤职查办以及“永远开除党籍”。第二天，蒋介石又亲自发布了“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在被三大定罪的前一天，李宗仁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到达广州。他那里前脚一步，后面张定璠就因此被蒋介石撤掉了职务。

广东方面，虽然李济深的旧部第八路军中还有人为其鸣冤，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3月30日，二陈发出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李宗仁在广东无法立足，不过二陈对他尚算客气，没有立即翻脸不认人，当李宗仁表示想去武汉时，陈济棠还为他提供了飞机。倒霉的是，那些天春雨连绵，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只得暂时回到广西，也相应失去了坐镇武汉直接进行指挥的可能。

第三章　仇敌满天下

武汉是蒋介石要攻取的重点之一。杨永泰曾建议，要破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必须先击首腹后斩尾，也就是先解决武汉、平津的桂军，而后再直捣新桂系的广西老巢。

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有利于蒋的趋势，蒋、桂位于长江中游部队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除此之外，“李白”还有另外一个希冀，那就是冯玉祥已答应出兵相助。从现实情况来看，只要西北军南下响应，新桂系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令“李白”感到意外和不安的是，蒋桂开战后，西北军不但没有依约南下，反而还向后撤退了。当时冯部大将孙良诚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有一天夜里，他突然让部下在两小时之内把行李备好，准备由泰安撤退。部下不明其意，问道：“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由北南下直驱浦口、南京，驱蒋下台呢？”孙良诚回答：“我接到冯总司令的密令，叫我们往开封方向撤退，内幕我不知道。”

西北军中搞不清状况的人还有很多。有人直接问冯玉祥：“这一次撤退的战略意义何在？”冯玉祥一面握起拳头做缩回来再打出去的姿势，一面说：“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又有人请他预测一下这次蒋桂战争的结果，冯玉祥说：“他们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个月至两个月才有分晓。”

冯玉祥的真实意图是要坐山观虎斗，坐看战局发展而从中渔利。他固然恨蒋，欲借此机会反蒋；但另一方面又垂涎于新桂系所控制的地盘，打算一旦“李白”力竭或者落败，就趁机将河北夺过来，以便使河南与湖北连成一片，达到既控制长江形势，又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为了“一举而得两虎”，冯玉祥暂时实施回缩战略，他将孙良诚部作为预备队集中到豫西一带，将韩复榘部布置在京汉路南段，以便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后发力。

眼前一黑

“李白”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作为“李白”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又惊又疑，非常害怕西北军联合新桂系夹攻自己。为防不测，他除调动所有可以使用的正规部队外，还将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编入作战序列，其中一部分直接到前线作战；另一部分发给实弹，做保卫南京的准备。

继李宗仁的代表之后，蒋介石的代表也拜见了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部内盛传，代表带来了蒋的三个条件：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要孙良诚继续回山东当主席，同时青岛特别市亦归西北军接收；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作为回报，冯玉祥必须通电声讨新桂系，出兵湖北。冯玉祥听后告诉蒋介石的代表：“论公论私，都不能让你们独任其艰，我出十三万兵力相援，怎么样？”

代表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见冯玉祥已经表态，蒋介石立即改订战斗序列，临时任命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他自己也乘舰由南京至九江，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向鄂东进攻。

哪知道冯玉祥嘴上答应得好，实际仍是虚与委蛇，不但没有发出一个字的讨桂通电，韩复榘部也奉命止步不前。说来说去，他还是舍

不得放弃他那坐山观虎斗的妙想，就想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蒋、桂两败俱伤。

当时蒋、桂在长江中游的兵力配备大体相当，蒋军虽然人数上稍多几个团，但论战斗力，桂军却还要强上一些。3月30日，蒋介石在九江下达总攻击令，但只是虚张声势，各部前进很迟缓，都不敢冒险猛进。

然而当蒋军进入鄂东境内时，桂军也始终没怎么抵抗，众人对此颇为不解。由于李宗仁无法亲自到武汉指挥作战，桂军在军事上主要由胡宗铎、陶钧主持，当有幕僚表示担忧时，陶钧说："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引敌深入。敌军攻坚，伤亡必大，可一鼓而歼灭之。军事我们很有把握，你不必担心。"

胡宗铎代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更是对着幕僚摆出了一副用兵如神的姿态，说："将来武汉附近听到炮声隆隆，是打得很好听的。请你转告亲朋和一般市民，不要惊慌，没有危险，结束很快。"

胡、陶之所以敢于"引敌深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蒋桂战争酝酿之初，他们就耗费两百多万元，在鄂东前线打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二人认为，凭借这一深沟高垒和强兵猛将的组合，不愁蒋军不伤亡惨重，到时他们再率部一冲，自然就能够"一鼓而歼灭之"。

3月31日，胡宗铎已做好到蒋军兵败，新桂系重新入主南京中央政府的准备。他认为："这次战事很快就可以结束，打到九江就没有战事了，我们乘船东下，一帆风顺到南京，不会像上次那样吃苦（指北伐时期）。"

胡宗铎叫来自己的幕僚：“我打算明天出发，想约你同行。到南京后，关于政治党务，还是要你帮我布置布置，在作战中途也有一些大文章要请你大笔一挥！”

4月1日晨，胡宗铎正要出发，却见夏威拿着文件跑了进来，并且招手让胡宗铎到卧室密谈。

听夏威讲完事情经过，胡宗铎顿时眼前一黑。

按照胡宗铎的计划，第十九军防正面，第十八军防右翼，第七军防左翼。由于夏威本人患扁桃腺炎住院治疗，无法到职指挥，第七军临时由李明瑞统带，这给武汉策反中蓄谋已久的兵变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第七军出发之前，李明瑞就在汉口密约团长以上多名将领，商定全军开至前线后，即发动兵变。为免不测，李明瑞这时候还不敢说是要投蒋，只说是反对胡、陶，因此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到达鄂东前线后，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立即行动。当天黄昏时分，李明瑞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了，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比如蒋介石、胡宗铎、陶钧等人就是。”

接着他列举了蒋、胡、陶的罪状，当然重点讲的是胡、陶如何把持湖北地盘，横征暴敛的种种事实，特别强调“我们的官兵，在北伐各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现在倒落得个食不饱、衣不暖，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的地步”。

第七军本是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的母体，可是在“桂系鄂军”吃香喝辣的同时，第七军却在军饷被服的补给等方面饱受歧视，甚至连军装都发不出。大家早就对此愤懑不已，那真是“提起心头火，咬碎口中牙”，李明瑞的讲话立刻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共鸣。

李明瑞说，胡、陶把第七军摆到最前沿，等于是让第七军给他们做挡箭牌、牺牲品，完全不值当——“现在蒋介石的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的内部又有胡、陶的军阀部队，即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他们这些新军阀造机会？结果我们还是吃亏的！”

见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李明瑞决定绕至主题：“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一场肮脏的战争，听他们两方面的新军阀自己去拼吧。等到他们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不管哪方面打赢，我们再把他们消灭。我的意见，大家看看怎样？”

李明瑞这么一问，大多数军官都举手高喊“同意”。有几名军官是李宗仁、白崇禧、夏威的亲信，他们内心虽然不同意，但在多数人都赞成的氛围下，也只好被迫跟着举了手。

统一意见后，李明瑞即集结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等夏威得到消息时，李明瑞、杨腾辉早已率部撤至孝感了。

丢了西瓜捡芝麻

事已至此，胡宗铎问夏威打算怎么办。夏威知道自己责任非小，连忙说：“我还是出发到前方去吧。”胡宗铎尚有些犹疑：“你的喉痛怎样，去得吗？”

夏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喉痛：“不要紧，我决定还是去的好。”

去往前线的专车上，有不明真相的人还在兴高采烈，高谈阔论，说：“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是胜利的先兆。”

胡宗铎越听越郁闷，已全无平时狠拍胸口的那股牛气；夏威更是一言不发，情绪极度低落。

突如其来的内部兵变动摇了桂军的整个军事计划。胡、夏到达前线后，立即召集陶钧等人开军事会议，众人研究至深夜，最后决定变守势为攻势，冒险向蒋军出击。

不料天亮后，胡宗铎又接到报告，称李明瑞、杨腾辉贴出了“打倒胡、陶”“再不为湖北人打仗”等标语。这种情况下，如果十八军、十九军继续出击，第七军极有可能抄袭他们的后路，到时“桂系鄂军”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为了不白送枪支”，胡宗铎、夏威、陶钧只得率部向鄂西退却。撤退途中，夏威压力很大，接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直到他的亲信所带的几个团跑回来，表示愿意继续服从他的指挥，夏威这才吃了一碗饭，并且说：“老子拼到一兵一卒还是要拼的。”

当胡、夏、陶不战而退出武汉时，他们连李宗仁的行李都一道遗失了，其中也包括李宗仁那张跟蒋介石做盟兄弟时的交换帖子。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

武汉的军队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白崇禧名义下共有两支改编部队，一支属北方部队，驻于北平的西苑和南苑；另一支就是“桂系湘军”，驻于河北唐山，他自己的总指挥部则设在北平城内。

在发现北方部队不可靠，甚至有可能将自己抓了送蒋之后，白崇禧被迫由北平出走，前往唐山开平，住进了廖磊的寓所。

蒋桂开战前后，各方来电都汇集至开平，白崇禧经常通宵不睡，以制定决策和批阅来电。他不睡，译电员自然也无法休息，一连十几天都是如此。

当蒋军向武汉进逼的时候，白崇禧一边抓紧联络冯玉祥，一边准备率李品仙、廖磊两军回救武汉。可是长江战事结束之快出乎预料，冯玉祥在震惊之余，赶紧放下悠悠然垂钓的心情，匆匆忙忙地发了一个讨桂通电。

世情如纸，只有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冯玉祥的通电一发，便意味着“桂系湘军”回救武汉的路被彻底截断了，与此同时，白崇禧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桂系湘军”所属的两师官兵大部分为湖南人，西征之役中被新桂系收编乃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内心里都盼着自己的老长官唐生智回归。

为了切实消化这支部队，白崇禧一面撤换湘籍军官，用新桂系成员替代；一面对最上面几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头头加以笼络，尤其

待廖磊甚厚，引为心腹。廖磊对白崇禧也知恩图报。蒋桂开战后，白崇禧日理万机，廖磊怕他身体顶不住，每晚都让自己的太太蒸制人参或高丽参，送给白进行滋补。

可是新换上来的军官却不给白崇禧争气，除了死要钱“不关饷”（即不发军饷）外，还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惹得官兵恨之入骨，盼唐生智回归之心反而更加迫切。李品仙、廖磊等人虽然和白崇禧的关系很好，可是中下级官兵不听调遣，他们也只能随波逐流。

上兵伐谋

随着武汉桂军的迅速失败，外界纷传新桂系即将垮台，唐生智回归有望。湘军官兵为之暗自欢喜，跃跃欲试，有的部队已经集合官兵，公开宣布反对新桂系。一时之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贴到了开平至平、津的列车车厢上。

看到内部反对他的浪潮如此高涨，白崇禧惊慌失措，生怕再也走不出去。还幸亏廖磊不忘旧情，亲自将他护送到塘沽坐上了出逃的轮船。

事有凑巧，唐生智搭乘同一艘轮船到达塘沽。两人一个上船，一个下船，只是没有正面碰头而已。

为了验证自己在老部队中的影响力，唐生智下船后没有直接去唐山，而是在天津住了几天。李品仙等旅团长以上的军官闻讯，纷纷赶到天津迎接，即便自己不能亲自来的，也都派了代表。

廖磊因为与白崇禧的那段关系遭到唐生智的冷落，在求见一面而不可得的情况下，被迫挂冠而去。他觉得非常冤枉，临走前对着李品仙痛哭流涕地解释道：“我是始终拥护老长官的，我保住团体，没有更换过一个人，总算对得起老长官。我对白健生（白崇禧）只是碍于同乡情面，不能不应付他一下。我原想向老长官说明我的苦衷，今既不见谅，只得离开。”

唐生智对待被其视为已经“变心”的部下，向来冷酷无情，这一点在当初处理张国威事件中已显见无遗。尽管廖磊在他的复出之路上确实并未设置过多障碍，可仍然遭到了扫地出门的下场。

在展示威风，扫除异己之后，唐生智才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中前往唐山。蒋介石最初还顾虑唐生智离开部队已久，怕他掌握不住，至此终于放下心来，随即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4月5日，在闻知桂军也已经撤出武汉的情况下，蒋介石亲率一个团乘军舰抵达汉口。当他进驻武汉时，各攻击部队居然都还落在后面。

自第一次北伐以来，蒋介石所经历的大小阵仗无数，但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经过激烈拼杀，这让他非常伤神：仗打输了，免不了受到各方指摘，甚至被迫下野；而即便是打赢了，在嫡系部队已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同样会地位不稳。

蒋桂战争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崭新同时也极为成功的开始。他采取杨永泰的谋略，第一次将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从而做到了“一兵不出而定北平”以及“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请问，还有什么结果会比这个更圆满更令人满意的呢?

蒋介石心情愉悦，他在汉口大摆庆功宴，把中校以上的军官都找去会餐，而且会的还不是一般的餐——是极为时髦，好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餐。

吃完第一个凉菜，蒋介石站起发言，他说："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北平和武汉呢？"

对首先率部到达武汉，蒋介石也颇为自得："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主席，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

训完话，蒋介石现场示范了一下"本主席"的绝招，也就是教授众人吃西餐的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对在公众场合最喜欢装一本正经的老蒋来说，此举殊为难得，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

会餐结束，他仍然意犹未尽，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合影留念。

"上兵伐谋"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两天后，他决定双管齐下，一面对桂军进行追击，一面对胡、陶实施招抚。

这时胡、陶的"桂系鄂军"尚有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夏威手下也有好几个团，因此李品仙、白崇禧仍希望他们能通过力战，渡江取道湘西回广西。

曾几何时，胡宗铎、陶钧、夏威都被李宗仁夸为“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但驻扎武汉的那段时光，在极短时间内就让他们成为了骄奢淫逸的典型。其中夏威沉迷于女色，大有乐不思蜀之概，对部队不管不问。胡宗铎抽上了鸦片，整天“吞云吐雾，不亦乐乎”。陶钧把持着禁烟局犹嫌不足，又借“清乡”之名，到处捞钱。

上梁不正下梁歪，桂军的中下级军官也大多狂嫖滥赌，军中卖枪和克扣粮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每当夕阳西下，汉口法租界的旅馆里就挤满了疯狂聚赌和寻花问柳的军官，兵痞们借酒闹事的大小乱子由此层出不穷。

贪污腐败使得桂军早已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桂系鄂军”尤甚。力战不是空口说白话，是需要拿性命去拼的，夏威等人虽然一度信誓旦旦，可哪里代替得了他们的色厉内荏。很快，胡、陶、夏便决定接洽投降，并联名向蒋介石发出通电：“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

此后，宋子文接洽了一艘英国军舰，将胡、陶、夏送至香港做寓公，余部被缴械改编，“李白”曾经盛极一时的第四集团军主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生存之道

除湖北外，湖南原本也被新桂系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桂军刚刚放弃武汉西撤，何键便派代表往武汉迎蒋，之后又趁机收编了叶琪的部队。新桂系很鄙夷何键的两面派做法，叶琪称：“我上了芸樵（何

键）的当。”因为何键两肩下削，李宗仁更是借此对他进行讥讽：“芸樵无肩膀。”

鄙夷归鄙夷，有一点不能不认，那就是置身乱世之中，要想活得长久一些，两面派常常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新桂系曾经辉煌一时，自然是不屑于骑墙的，可蒋桂战争这一跤也足以摔得他们心胆俱裂。当李宗仁、白崇禧以光杆之身逃回广西时，盛极一时的桂军居然只剩下黄绍竑留守广西地方的三个师了。

新桂系三巨头内心的懊丧和恼怒自不待言，白崇禧更是按捺不住，暴跳如雷，他主张用剩下的这三个师集中攻打广东，以便在占领广州后扭转反蒋的不利局面。

黄绍竑认为，在新桂系全面落败的情况下，如此孤注一掷过于冒险。无奈“李白”已经输红了眼，二人不顾一切地想要翻本，他们坚持广东方面还有不少忠于李济深的人，如果不及早帮助这些人把反蒋的旗帜树起来，此辈迟早会被消灭干净。

这是新桂系内部第二次出现重大分歧。黄绍竑再次处于票数上的劣势地位，当然他要坚决反对也是可以的，只是那样的话，新桂系内部就将面临分裂的危险，因此，尽管黄绍竑内心很矛盾，但他仍然服从了“李白”。

李、白、黄随后做出分工，李宗仁负责到香港联络各方，白崇禧指挥军事，黄绍竑则继续留守广西。

桂军攻粤，换来的又是一场大败。此时，何键奉蒋介石的命令进入广西境内讨桂，尽管桂军新败，但何键的湘军仍不是对手，被打得

一败涂地，余部仓皇逃回湖南。

可是随后杀来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对方也是老桂军，而且还是老桂军中的精华部分。白崇禧、黄绍竑见势难抵挡，被迫逃出广西，由越南而至香港，与李宗仁会合。

难兄难弟又聚到了一块儿，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手中甚至连一个兵也没有了。

在蒋桂战争中，搞投机的其实不止何键一个，冯玉祥做的也是这种生意，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以湘军战前那么微不足道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何键不仅得以总揽湖南军政大权，其部队还得到扩编以及蒋介石的军费资助。冯玉祥的实力绝非何键能比，可他却偏偏把好端端的生意给搞砸了。

归根结底，老冯做投机生意的心是有的，然而他的手眼身法步还差着不少火候。

韩复榘处于最前沿，对战局观察得很清楚。在武汉桂军突然遭遇失败时，他就准备直扑武汉，不管老蒋事后答不答应，先把湖北地盘占了再说。可是老冯还想再等等，为此把韩复榘大骂一顿，说他“太不懂事”，接着便命令他向北撤退。

真到武汉桂军迅速瓦解的时候，战事也结束了。老冯虽然补发了一个马后炮式的讨桂通电，可是老蒋已经不愿意再兑现原先的那几个条件了。

老冯苦就苦在，他一个子没得不说，还把蒋桂双方都给得罪了，两边都认为他做事无诚意，老冯本来就不咋样的诚信记录这下更加让

人不忍卒看。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滋味可不好受。老冯把账全都算到了老蒋头上，决计出兵倒蒋。1929年夏天，他下令山东、河南驻军一律西撤，集中在河南西部及陕西境内待命。

西北军从陕、甘、宁、青，一直摆到豫、鲁，战线长达几千公里，一旦开战，马上就会有与人搏斗时，直伸双臂却无法用力的感觉。桂军败于蒋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不肯收缩集中兵力，从而导致被各个击破，一溃千里。冯玉祥看在眼里，又如何能不吸取教训。

更何况，蒋桂战争改变了整个中原战场的形势，蒋军今非昔比，不是轻轻一推就能倒掉的了，开练前一定得摆好架势才行。为此，冯玉祥决定沿用老思路，先把两臂收回来，然后再打出去，以确保到时能发挥出足够的力道。这也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另外，在过去的南口战役中，西北军曾吃过晋军抄袭后路的大亏。如今晋军依旧布防于黄河北岸，随时可能乘西北军南下时，再从后攻袭，从而使得西北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这次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在把队伍摆好后，压迫阎锡山表明态度，让他一同反蒋——同意固然好，要是不同意，就先打山西，再打蒋介石！

冯玉祥此议一出，便遭到了谋士张钫的反对。早在冯玉祥决定介入蒋桂之争时，张钫就不同意，见冯玉祥这次不仅又要反蒋，还要放弃河南、山东，他更是大摇其头。在给冯玉祥的电报中，他说："不见敌而放弃两省之土地人民，政略、战略均有损失。"

张钫坚持三年整军计划不能放弃：“退处西北，三年整军，不问国事，言犹在耳，时未三月，计划全盘改变，窃所不解。”

张钫与冯玉祥来往六七次电报，进了许多忠言，但冯玉祥都听不进去。

张钫是谋士，冯玉祥就算不喜欢听他的话，也知道要给对方留足脸面。反过来，对于那些被他“视之如匹夫”的战将，他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在华阴召开的西北军将领会议上，韩复榘大着胆子询问冯玉祥：“敌人未曾压迫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呢？”冯玉祥不但不说明撤退的原因，反而怒气冲冲地斥骂韩复榘：“小孩子懂得什么，要你退你就退。”

散会后，韩复榘在路上碰到了另一名西北军将领刘汝明。谈话中，韩复榘提起华阴开会的情况，称受到了冯的责骂，并且眼泪汪汪地说：“我要开小差不干了！”

刘汝明当即予以安慰，之后在华阴向冯玉祥进行了报告。冯玉祥听后，只认为韩复榘是一时的气话，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想给韩复榘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没打通，也就算了。

然而韩复榘说的绝不是气话，他是真的要爆发了！

栗栗自危

韩复榘是冯玉祥当混成旅旅长时的营长。那时冯部下有中下级军官十三人，除了韩复榘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石友三等。这十三人都是军中的活跃分子，遇到有事，常常越过本方长官而直接找冯，冯也喜欢直接指挥他们，以便更好地控制最基层的部队。因此之故，十三人在冯面前炙手可热，被冯视为嫡系亲信，时称“十三太保”。

韩复榘等“十三太保”由士兵而升军官，由中低级军官而升至高级将领，以后大多显山露水，甚至成为一方诸侯，都与冯玉祥擅长练兵和能够不拘一格地挑拔将才有关。

冯玉祥很懂得士兵的心理。他的挎包里常带着剃头刀、剪刀、修脚刀，到军营查访时，看到士兵中有头发长得长的，便立刻找来脸盆盛好水，亲自给士兵剃头洗头。他还会让士兵脱掉鞋袜，看脚指甲是否长了，长的话也亲自予以修剪。

一传十，十传百，冯玉祥关心士卒的名声便由此建立起来。但凡他到部队驻地视察，当地市容和军队焕然一新，街上溜达的零星军人也随之减少，甚至于因公外出的官兵都穿戴得整整齐齐。

如果说练兵是冯的特长，那么用将则是冯的软肋。有冯玉祥的老部下评论他对部将的态度：“冯先生出身寒微，以‘战将’脱颖而出，故始终于能战之将，爱之而不重之，视之如匹夫焉。”

“匹夫”就是冯玉祥对部将的定位。对这些“匹夫”所提意见，哪怕是正确的建议，他往往都不屑一顾，以“不懂事”“小孩子见解”等等大家长的语气加以斥责。

北伐前一段时间，韩复榘的部队一直没能拿到薪饷。冯玉祥承诺北伐成功后便予以补发，北伐结束，韩复榘想起了这件事，就写了封信让人带给冯玉祥。信上说：“几年来，大家生活都够苦的，高级将领们都是老先生（冯玉祥）一手培育的，虽然没有什么闲话，而许多下级官兵，都随总司令（冯玉祥）不久，长此不发饷，恐怕不好维持，请求总司令补发一下欠饷。”

冯玉祥看过之后，顿时脸色通红，把信一摔，大声对信使说：“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发给你们的钱还少吗？”

冯玉祥所说的钱是他发给韩复榘的“维持费”，而韩复榘信里讲的却是以前欠发的薪饷，并不是一回事。北伐后，冯玉祥有了更多的地盘，也就相应有了更多的钱，但他手里一有钱，便拿去扩充军队，自然不可能再补发欠饷。

面对冯玉祥的蛮横无理，信使除了连声答应“是，是”，不敢有任何反驳。回去之后，他也不敢说出冯玉祥发火的事，只能报告韩复榘：“总司令说，目前经济困难，补发欠饷一时不易办到。”

在“十三太保”中，韩复榘、石友三是自认遭到冯玉祥另眼相看的两个人。缘于南口战役时，晋军腰击西北军，韩、石于穷途末路之中，不得不暂时投降阎锡山，靠山西供给粮饷，以资维持。后来冯玉祥东山再起，声言对韩、石不予追究，但彼此在精神上始终存在着隔阂。

北伐之役，韩、石出力不小，尤其在克复平津的过程中，韩复榘第一个率部进入了北平。可是冯玉祥却对他们的战功只字不提，只对

孙良诚一味表扬提拔，称孙为常胜将军，称孙所带的部队为铁军。冯玉祥这样的做法，让韩、石很是不满。

孙良诚首先被保荐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虽然也被发表为河南省主席，然而又穷又苦的河南如何能够与山东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将韩身上所兼任的二十师师长给开了缺，另由石敬亭接任。

石敬亭时任西北军参谋长，冯玉祥对他十分看重和信任。石敬亭治军极为严格，接任二十师师长后，他不仅将师部里韩复榘的亲信大部予以撤换，还在集合部队训话时，痛骂该师纪律不好，说："韩复榘把你们二十师带成土匪了。"

韩复榘由此认为，冯调任他为河南省主席，不是像对待孙良诚等人那样论功行赏和予以重用，而只是作为撤销他兵权的一个手段。石敬亭的一系列言行，更令他在伤心之余，还加上了愤恨和反感。

金钱也不是万能的

河南省主席本由冯玉祥兼任，韩复榘当主席后，各厅厅长都还是冯兼主席时期的原班人马，他们直接给冯办事，一个也不能随便撤换，所以实际上韩复榘只是当了一个没多大职权的空头主席。

韩复榘其实有一定的地方治理才能，可是在既理不了政，又管不了军的情况下，他也只好索性丢开省府之事不问，整日以嫖赌玩乐自遣。

应该说，韩复榘的所作所为在民国年间并不算太离谱，但冯玉祥严禁部属嫖赌玩乐，即便高级将领也是如此。他在知道韩的行为之后

极为震怒，便在官兵大集会的时候，大骂嫖赌玩乐之人，其实就是暗指韩复榘。韩复榘也在会场上，自然甚为难堪。

骂，那还是轻的。对这些自己一手从士兵提拔起来的将领，冯玉祥仍与对待一般士兵一样，见面叫名字，从没有叫号的，而且动不动就罚跪。当初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驻军南苑，因为上课迟到，就曾被冯玉祥责打了好几十军棍。

冯玉祥每每以此自鸣得意，常在人前夸耀："张作霖、吴佩孚对于高级将领，是用赌博、妓女来联络。我对高级将领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像普通士兵一样，严肃敬事，一丝不苟。用这一点来比较，可知谁胜谁败了。"

有一次，冯玉祥下令韩复榘把手中最精锐的手枪队调来洛阳做警卫。韩复榘不愿意，冯玉祥把他叫到洛阳，当着面大发雷霆："你现在当了主席，很威风了，在家里有人守卫，出门有人保驾，你们都不管我了。好啦，我这里没有人守卫，你给我站岗去！"

韩复榘堂堂一省主席，然而敢怒不敢言，只得老老实实地走到冯的司令部门外，站了两个多钟头的岗。后来经过一些人再三求情，冯玉祥方肯罢休。

石友三比韩复榘更不济。冯玉祥再怎么对韩复榘苛严，还把自兼的河南省主席给了他，就连被韩、石认为从没有带过兵，也没有立过战功的石敬亭都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而石友三根本都没能摸着省主席的大门在哪里。石友三对此十分气懑，常常对人大发牢骚。

韩、石都认为自己有投降晋军的一段历史，无论怎么卖力气也不会在西北军中有什么前途，冯玉祥也一定会找种种机会来为难他们。

北伐的时候大家集中精力，一致对付北洋，彼此都顾不到这些事情，韩、石的疑惧心理还不太突出。到北伐战事停止以后，韩、石不仅未能得到他们认为应得的封赏，还不断遭到冯玉祥的羞辱，两人就此有了鸟尽弓藏的感觉，整天心怀不安，栗栗自危。

编遣会议结束后，冯玉祥由南京跑回河南开封。当时韩复榘和石友三都在开封，一听到冯玉祥将回开封的消息，韩复榘就托词赴许昌考察，石友三也跟着溜之大吉。冯玉祥下车时，没有见到韩、石去接，就问左右："韩主席为什么没有来？"副官说："韩主席到许昌考察去了。"又问石友三，答复是石友三去了郑州。

冯玉祥明知韩、石有意躲避，随后便一言不发，脸色很是难看。第二天，他在河南省府召集军政人员讲话，公开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全都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就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在河南娶了一个戏剧演员为妾，冯玉祥说"弄个唱戏的"，无疑就是对他进行不留情面的讽刺挖苦。

省府里有许多人是韩复榘的亲信，马上就把冯的话转告给韩复榘。韩复榘听后五味杂陈，十分难堪。

西北军内部的这一矛盾被杨永泰所知悉。早在蒋桂战争爆发时，他就提出，在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的同时，应以经济方法瓦解冯。具体而言，就是要以重金收买韩复榘、石友三。

韩、石需要"重金"吗，当然需要，但金钱也不是万能的，它还得再搭配一点冯玉祥身上所没有的东西。

蒋桂战争中，冯玉祥一着失算，让蒋军抢先攻占武汉。蒋介石到达汉口后，即令韩复榘停止进兵，但同时又召他见面。

这次见面，带着夫人同行的韩复榘受到蒋氏夫妇的盛情款待。席间蒋介石对韩复榘推崇备至，一再呼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而不称其名，并且说："现在北伐成功，正宜努力建设，不应再有内战。今后如再有称兵叛乱之事，中央还要借重向方兄出兵戡乱。"

韩复榘立刻被震到了，倒不是因为那番和平戡乱的大道理，而是蒋介石对他的极力褒奖和一口一个"向方兄"。韩复榘向来见冯，冯总是连名带姓地叫他，不但毫不客气，还不断给他碰钉子，让他难堪。

冯玉祥牛吧？当然牛，可是跟蒋介石比呢，人家可是国家领袖！一个国家领袖如此恭维你、高看你，这是怎样一种情怀？

韩复榘顿时受宠若惊，又是感激，又是高兴，当即站起来说道："复榘一介武夫，蒙钧座不弃，今后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

蒋介石听了一边说好，一边与韩复榘握手。临别之时，又送了韩复榘十万元。

与韩复榘会面后，蒋介石接着派钱大钧赴襄阳慰劳石友三，送给他三十万元。

应该说，蒋介石送给韩、石的钱还算不什么"重金"，尤其对于韩复榘，你要说靠这十万元就能让他如何如何，甚至背叛冯玉祥这样的西北军大佬，那也把韩某看得太不值钱了。

可是有了情感搭配，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与蒋介石的武汉会面，为韩复榘带头叛冯播下了种子，而冯玉祥在华阴军事会议上对韩的当

众责骂，则让这颗种子最终发出了芽，结出了果。

老江湖

华阴会议结束后，韩复榘马上赶往陕州（今陕县），前去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队二十师。石敬亭此时已经离职，二十师师部里韩的亲信虽然大多已被撤换，但旅长以下的军官并没有太大变动，这些人仍效忠于韩。

韩复榘把二十师拉至洛阳，然后集合讲话。在他看来，西撤既不利于军，也不利于民："豫陕两省连年旱灾，百姓全没吃的，这次大军西撤，人马众多，将如何维持生活呢？总司令命令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河南的百姓又吃什么呢？"

韩复榘对席地而坐的官兵们说："我们打了几年的仗，官兵伤的伤，亡的亡，受的罪不小，我看不能再打了。我要主张和平，才由陕州回来。你们想一想，愿意跟着我走的，蹲着别动，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站起来走，我决不勉强。"

等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动弹。于是韩复榘就说："好，全都愿意跟着我，那我们就一齐走！"

5月22日，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电文中有"关西同胞，大半粮尽，大兵西退，其何以堪"这样的话。第二天他又给蒋介石发去两个"梗"电，表示拥蒋。

在"养"电中，包括韩复榘在内，总计有旅长以上十二名西北军将官列名其上。这些人除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与韩复榘有所联系

外，其他人全都蒙在鼓里，名字是韩复榘给代列上去的，为的是壮大声势。

韩、石是结盟兄弟，且因为同病相怜，所以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过他们在性格上又有着很大差异，韩复榘为人胆大敢干；石友三则比较胆小多疑。石的行动差不多都是唯韩马首是瞻，韩不动，石就不动；韩一动，石也会举旗一致行动。见韩带头首倡，石友三立即率部从南阳驻地赶来郑州与韩会合。

马鸿逵的总部正好撤至洛阳。韩复榘派参谋长带话过去，说："我们的队伍从前都是经由西北打出潼关的，西北地方的穷困，我们亲身经历过，现在又要退往西北，军队岂不都要饿死？"又说："你又不是冯的嫡系，打起仗来，先得牺牲你，不如我们回师郑州，再作良图。"

马鸿逵急忙召集幕僚商议。幕僚认为："不可背冯，况且老都统（指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西北回族元老）现在潼关和冯玉祥在一起，如随韩东开，岂不要连累老都统吗？"

马鸿逵为人胆小，在这一点上跟石友三有相似之差。他左右为难："如不随韩，恐被其解决。"眼泪鼻涕地哭了一场之后，还是决定随韩东开。

庞炳勋和马鸿逵一样，都不是冯玉祥的嫡系，所以也在韩复榘的拉拢范围之内。之前韩复榘曾对庞炳勋进行试探，当着他的面，庞炳勋痛哭流涕，说："总司令排外，我的部队打过多少次硬仗，损失很大，硬是不给一点补充。总司令待人不公平，我们有如孤哀子，没人管……"

韩复榘觉得比较靠谱，一边百般安慰，一边在心里把庞炳勋列为了自己的同盟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动计划差点就栽在了庞炳勋手里。

庞炳勋打仗时瘸了一条腿，外号“庞瘸子”。这是个老江湖，素来机诈过人，他朝着韩复榘掉几滴眼泪，骂上两句，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拿韩当亲人朋友的意思，更不能说明他有了反冯之心。

几年前韩复榘曾扣留庞部所缴枪支，庞炳勋对此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见韩复榘真的要叛冯，马上便翻了脸。韩复榘屡次和他打电话联系，他都拒不接听，同时又在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构筑工事，以拦截韩部东进郑州。

黑石关地形险要，是韩部东进的要道，不打通黑石关，许多列车都无法通过。韩复榘又气又急，大骂“庞瘸子不是东西”“反复无常，（说的话）尽是假的，非揍他不可”，但是他把一个旅都打光了，也没能把黑石关给拿下来。

由于东面受到庞炳勋的截击，西面又受到孙良诚的追击，韩部已溃不成军。无奈之下，韩复榘只得带着残部离开铁路，绕道逃往郑州，与石友三会合。

虽然韩、石被打了一记闷棍，但他们的起事，无疑还是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发现西北军突然西撤，蒋介石估计冯玉祥是要对付他，可是又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尤其搞不清楚冯玉祥为什么不先动手而急急往西撤兵。就在他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的时候，忽然接到了韩复榘的电报，顿有如梦初醒、喜出望外之感。

接到“梗”电的当天，蒋介石就复电予以嘉奖，规定所有驻陕甘部队今后概归韩复榘指挥，并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此外，韩、石还得到了现款五百万元（一说为一千万元）的犒赏。

三寸不烂之舌

韩复榘发表反冯通电时，冯玉祥正在华阴与高级幕僚们议论军事。他谈到南口战役时，由张之江、鹿钟麟两位大将进行指挥，结果二将意见不和，导致全军瓦解，有的弃械逃亡，有的投靠晋军。讲到此处，冯玉祥颇为自信地断言：“这次由我主持，就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了。”

话没说完，韩、石倒戈投蒋的报告就到了。冯玉祥最初还不太相信，等消息得到证实，他如同是晴天里听到了一声霹雳，顿时变得面色苍白，神情颓丧，随后便绝望地说：“这样一来，整个讨蒋计划就全完了。”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

冯玉祥经常会当着众将士哭，甚至还满地打滚，但那不过是一种表演。唯有这一次，他是真伤了心，身上的家长威风也被一扫而空。

在被韩、石打乱阵脚的情况下，西北军已无心应战，不久便全部渡过黄河，退入潼关自守。退入潼关后，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冯玉祥仍未缓过劲来，开始日夜哭泣，不停地咒骂自己，还打自己的嘴巴。他恨韩、恨石，恨马、恨所有背叛自己的人，不过最恨之入骨的依旧是这一切的祸端——蒋介石。

5月25日，南京政府发出讨伐冯玉祥的命令。阎锡山投蒋所好，对蒋介石表示愿做调停人，以息争端。在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阎锡山即由太原致电冯玉祥，劝冯下野出洋（出国），并表示自己愿意全程陪同。同时他还让冯玉祥将军队交由中央，听候编遣，以避免“整个的党变成破碎，统一之国形成分裂”。

此时的冯玉祥连对那些未参与倒戈的部将都失去了信心，更不敢想象要统率西北军单独与蒋军作战，当然他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地盘出洋。想来想去，只有下野一个办法，接到阎的电报后不久，冯玉祥就选择了通电下野。

下野电是发了，可是肚子里的那口怨气尚未找到出处。冯玉祥再三考虑：自己既然不能够单挑老蒋，为什么不能找人合作呢?

曾经有力量对抗蒋介石的几大诸侯，李宗仁、白崇禧已亡命香港，只剩下了阎锡山。

冯、阎曾经是一报还一报的冤家。南口战役，阎袭击了冯，于是冯便在方顺桥之役中报复了阎。到编遣会议召开，阎又利用冯与蒋、李的矛盾，让冯翻了一次船，间接报了方顺桥的一箭之仇。

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深知得罪了冯玉祥，北返时，都不敢从内陆经过冯的地盘，也就是山东和河南。为此，阎锡山秘密让人在上海包了一艘轮船，他先化装乘火车到上海，从海上在天津登岸，然后再由天津返回太原。

不过两个循环过去，若冯无意就编遣会议上的事继续报复阎，双方也就算暂时结清了账，尤其到这个时候，对冯而言，相互取暖比彼

此寻仇来得更迫切，也更重要。他对此感触极深，曾说：“以前我们各干各的，所以被他（指蒋介石）各个击破，以后要好好地联合。”

冯玉祥以邓哲熙等幕僚为使，前往太原拜见阎锡山，约其共同倒蒋。

阎锡山此时只想靠做调停人向蒋介石邀好。冯玉祥虽然发了下野电，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地盘和部队，无异于“假下野”。只有让冯“真下野”，他阎锡山才算立了大功一件。

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并无倒蒋之心，那邓哲熙可能掉转屁股就走了。阎锡山如此精明的人，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在与邓哲熙谈话时，他故意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其核心意思是约冯过黄河到晋面谈。

如果能把冯玉祥骗到山西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但阎锡山也知道冯玉祥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也不可能轻离自己的老巢。

果然，在邓哲熙等人回去复命后，冯玉祥又让邓哲熙再到太原去找阎，并当面告诉邓哲熙：“只要阎能够共同反蒋，除去不能应允亲自到山西这一个条件以外，其余条件都可以接受。”

邓哲熙领命由潼关渡黄河，刚到对岸的风陵渡，就与阎锡山派来的李书城不期而遇。

李书城并不是阎锡山的人，他是唐生智的总参议。唐生智与新桂系势不两立，对蒋介石也从没有好感。在蒋桂战争中，他虽因蒋而得以重整旧部，再度崛起，但彼此都清楚，那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背地里，唐生智常有反蒋之心。

李书城与阎锡山是士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智命他做客于太原，为的是代表他与阎锡山商谈反蒋之策，然而这时候老阎的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并无任何造反的想法，李书城只得暂时收起这一念头。

闲谈中，李书城听晋军将领孙楚等人谈起，冯玉祥虽然已通电下野，却没有接受阎的劝告，无意出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书城与冯玉祥本有历史渊源，“首都革命”的时候，他在黄郛的摄政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从此与冯玉祥相识。由于李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还曾出任黄兴的参谋长，所以冯玉祥也向来对他都很尊敬。

当着孙楚的面，李书城夸下海口，说如果阎真的下决心与冯共同出洋，他愿意以阎代表的身份出使冯方，并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冯玉祥。

单刀赴会

孙楚立即把李书城的话报告给阎锡山。阎锡山一听大喜，第二天就派汽车送李书城启程上路。

在风陵渡巧遇之后，邓哲熙将冯玉祥不能考虑赴晋的意思向李书城复述了一遍。李书城听了，就说你邓哲熙也不用再去太原了，不如前面带路，陪我一道去见见你们总司令。

冯玉祥正处于伤心愁苦之际，见李书城远道而来看望他，自然表示欢迎。两人促膝交谈，李书城从冯玉祥如今最为痛恨的老蒋身上展开了话题：“蒋自打垮李宗仁以后，在排除异己方面更见毒辣，唐生智和两广方面，连阎锡山在内，都想反蒋。”

冯玉祥乐意听的，就是这个，但是李书城聊到这里的时候，话锋一转，又说到“唐生智对你素有恶感”。

唐生智反感冯玉祥这件事，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有一次报上误载蒋百里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冯部加以否认。否认当然是必要的，可是冯玉祥的幕府缺乏政经人才，出面否认的人不知蒋百里的分量有多重，又不会说话，言辞之间很不客气，这让蒋百里非常生气。

蒋百里是唐生智的恩师，唐生智对他极为尊重，除了在与蒋介石合作等少数问题上达不成默契外，其他大多言听计从。一看冯玉祥居然不把自己的老师放在眼里，他也就对冯玉祥极端厌恶。

与唐生智结下的这个梁子，是冯玉祥完全想不到的，只是现在再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了。李书城告诉他：“唐一定要先打垮你，才反蒋。”

冯玉祥发愁的正是这个，他找不到帮手：唐生智和阎锡山都不是没有反蒋之心，可眼下还不想和他一起干。

李书城因势利导：“目下桂系新败之余，蒋的气焰正盛，你要反蒋，没有帮手，形势对你不利。况且韩、石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无异是自己的亲子弟，竟至突然叛变，如果马上兴兵反蒋的话，那你就不能不考虑对自己军队的把握问题了。”

李书城的话句句触中冯玉祥的心病。他眼巴巴地望着李书城，希望“先生教我”。

李书城说：“我看阎的为人尚称诚实，他现在约你一道出洋（即出国），你何不趁此机会，躲闪一下，和他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们

同去。”

绕了一大圈，终于绕到了主题。

要出洋的话，军队怎么办？这可是几乎和自己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李书城让冯玉祥放心：“你出国后，把军队交给将领，力量还是整个的，蒋绝不敢打他们。”

出洋不光是玩，李书城告诉冯玉祥，还有附带的不少好处：“你在军事上威望很高，但在政治方面还需要树立威信。你在国外与外国的政治家往来接触，取些联络，有时对国内发表一些政治评论，借此提高声望。”

李书城预言：“不出半年，国内反蒋之战必起，那时你回到国内，重新掌握自己的军队，其他反蒋的势力一定会推重你。你振臂一呼，蒋介石非垮不可。”

古书中说，俗世有三张嘴最厉害：秀才口，骂遍四方；和尚口，吃遍四方；媒婆口，传遍四方。

民国犹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擅长于合纵连横的辩士说客如云，他们靠嘴吃饭，成天就练嘴皮子功夫，可谓把“秀才口”“和尚口”“媒婆口”三张口的厉害之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李书城正是此中高手，他的话犹如饥时饭、渴时浆，深深打动了冯玉祥，搔着了冯玉祥的痒处。

遥想当年西北军在南口战败，众人全都心中无主、前途茫茫的时候，正是因为冯玉祥到苏联去了一趟，才给离乱不堪的部队带回了大

量军火和重新崛起的信心。那是冯玉祥攀向另一个事业高峰的起点，当时听到他从苏联兼程赶回的消息，部将们全都一个个悲喜交集，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就好像良家忠厚子弟受了欺负，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就不免悲从中来一样。这些部将里面，有孙连仲、孙良诚、宋哲元、刘汝明，当然也有韩复榘、石友三……

与李书城谈话之后，冯玉祥热血沸腾，马上张罗着要亲自前往太原。

对冯玉祥这个决定，冯的部下多不赞成。他们一再向冯进言，认为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万万不可轻信。冯玉祥则认为除此之外别无良策，纵可能出现意外，亦不能不冒险一行。

直到冯玉祥登车准备启程，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还站到汽车前力谏拦阻："总司令是全军首脑，不宜轻往。如有必要，可另派代表前往商洽，千万不要亲自出马。"

冯玉祥对他说："大哥不必过虑。请问什么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您且看我这次单刀赴会，谅他老阎也不敢对我怎样。"说完，下车把邓长耀拉到道旁，握手道别。

每一步都设定了价码

6月21日，冯玉祥携妻带女，跟着李书城来到了太原。阎锡山见李书城竟然真把冯玉祥拉到了山西，不由得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冯玉祥和阎锡山过去也拜过把子，哥儿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阎锡山对冯玉祥百般安慰，发誓会与冯合作到底。过后，他专门在晋祠

为冯玉祥安排了“晋祠行馆”居住。“晋祠行馆”是一个叫江瀚的山西大学文科教授住过的房子，又名“江氏花园”，其实只是一座平房四合院，不过休养闲居倒是挺适宜的。

阎锡山每隔三五天就会去“江氏花园”看望冯玉祥。知道冯对反蒋感兴趣，他会与冯商谈反蒋的办法，同时也允许冯的部下前来探望，甚至于其他地方的反蒋代表如果要见冯，也不阻拦。那段时间，连冯的部下都觉得阎对冯礼遇极优，是很够朋友的。

阎锡山从来不肯做亏本买卖，他的付出都得有代价才行。冯玉祥一到太原，他就把这作为自己的“调停之功”报告给蒋介石，并说自己之所以留冯于太原，是为了设法对其进行劝导，使之不得逞兵作乱，以尊中央，而维和平。

接到报告后，蒋介石很快给予回报，不仅给予台阶，让阎锡山暂时不要出洋，而且还派他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

阎有阎的算盘，冯有冯的计较。住在晋祠期间，但凡见到前来拜访的客人，冯玉祥总是首先露出一副自怨自艾的表情，说：“我从前以为我做别的事不行，练兵还是行的。在今日看起来，我练兵也失败了。”

他让阎锡山给他请了几个老师，教授经济学和书画，还自撰自书了一副对联，曰：“家居好山好水地，人在不夷不惠间。”

退隐山林，不问世事，这当然不是冯玉祥的真实想法。发现阎锡山确实够意思，没有把他“献俘”于蒋，而且两人也不必马上出洋后，老冯又开始琢磨起如何倒蒋的事。

晋祠位于太原附近，又是风景名胜区，用于闲居自然不错，但要是开什么秘密军事会议，或者接见各地反蒋代表之类，就很容易引人注意。于是冯玉祥便提出要换个地方住。

阎锡山也顾虑蒋介石“派到太原来的侦探不少，一举一动，很难保密，故不可不慎”。阎锡山的老家在五台县河边村，那里距离太原很近，只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乘汽车来往，仅需两三个小时。阎锡山平时常住河边村，有事才来太原，事毕再回去。河边村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西会，阎锡山正在那里新修别墅，于是就准备把冯玉祥的住所换到西会。

两人说走就走。按照当时报纸的报道，冯玉祥自晋祠、阎锡山自太原出发，前往五台游览，实际上就是去的西会。

在冯、阎动身的前两天，阎锡山提早派人到河边村，向老父阎书堂打了招呼。河边村与外界都通有汽车，冯、阎到达的那一天，阎书堂亲自来到汽车站迎接，并请冯玉祥到家里休息。冯玉祥忙说：“老太爷迎接，玉祥不敢当，与百川约好今天先到西会，容改日玉祥登门拜见老伯！”

阎书堂是当地的富商大贾，也见过很多达官贵人。冯玉祥的装扮让他很是惊异，临分手时，他还拉着冯玉祥的半截大衣，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你就穿这衣裳？”

冯玉祥素来爱以艰苦朴素示人，到西会一看，发现别墅富丽堂皇，显然不合他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别墅还没有全部竣工，完工的部分也湿墙湿屋，并不适于居住。

冯玉祥觉得不满意，阎锡山就继续派人勘察，最后决定将冯的住所定在西会东南的建安村徐宅。

住所安定后，冯玉祥提出要接见张培梅。张培梅是阎的部下，当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张培梅曾奉阎命出兵石家庄，算是间接帮过冯玉祥的忙，冯玉祥因此认为张培梅是和他共过患难的朋友。

见到张培梅，冯玉祥开门见山，说他到建安村乃是为了开会，现在既然已住了下来，正可以开个会。冯玉祥的意思是让张培梅给阎锡山传个话，两人在建安村开几次秘密会议，订出军事计划，他好早点回潼关去准备对蒋作战。

张培梅敷衍说他前来建安村，只是朋友之间的相聚，他不能向阎锡山传达这些话，但是回去之后，还是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报告。

冯玉祥要反蒋，冯玉祥要回去，如何回应，这是阎锡山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继第一次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也叫编遣实施会议。几个编遣区均由编遣主任出席会议，阎锡山那边是周玳。会议闭幕当天，蒋介石约周玳吃晚饭，闲谈时问周玳：“你觉得冯玉祥这个人怎样？”周玳说：“我很恨他。”

蒋介石问为什么。周玳便又提到了北伐时的方顺桥战役，并且说：“（冯玉祥）大有搞垮晋军而独占华北之意，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所以我恨透了他。”

蒋介石听完后表示非常认同，说：“这人向来如此，实在要不得。”

从蒋介石与周玳的闲谈中，阎锡山看出了蒋介石必欲去冯的决心。

宁得罪冯，不得罪蒋，是阎锡山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就秉持的原则。至少是目前，他不会联合冯反蒋，也不会放冯回去。

当然得罪不能白得罪。商人本色的阎锡山每一步都设定了价码，晋祠是晋祠的价码，建安村是建安村的价码，如今冯玉祥蠢蠢欲动，反蒋之心不死，又到了要进一步得罪的时候，先前老蒋开出的价码可就不太符合市场需要了。

主意一定，阎锡山开始准备出洋的服装用具，好像他和冯玉祥真要联袂出洋了。之后，他给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请蒋介石准其偕同冯玉祥一道出洋考察。

发完电报，阎锡山便以出洋前必须检查身体为由，住进了北平的德国医院。

随行就市

阎锡山以退为进，为的是显示自己在华北的影响力和重要作用。蒋介石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演戏，但也不能不上台配合。接到电报，他连忙带着吴稚晖等人亲赴北平与阎见面，对阎进行极力挽留，要他留下来负责，只让冯玉祥一人出洋。蒋介石还拨付了二十万元作为冯出洋的费用，让阎锡山转交给冯玉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阎锡山心满意足，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慰留。一场双方都演得特别认真的戏剧宣告落幕。

发现冯玉祥奇货可居，阎锡山立即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自此不再与冯商谈反蒋，亦不与之见面。

不过阎锡山也并没有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送冯出洋。他这么做，当然还是为了挟冯以自重，继续拿来赚取利益。

冯玉祥所住的建安村一带全部变成禁区，沿途的卖票汽车也一律停驶。村子周围还驻有阎锡山的卫队旅，由旅长杜春沂亲自监视冯的行动，实际上已将他软禁起来。

冯玉祥提出要见阎锡山，阎锡山总是托词回避。冯玉祥便径直乘汽车驶出村外，声称要到太原找阎。杜春沂拦不住，只好跪在车前，哀求冯不要出村。

怒不可遏的冯玉祥置之不理，仍然让司机继续往前开。杜春沂见势不好，急忙打电话给沿途驻军，让他们在公路上挖一条壕沟，再放一些木栅栏。冯车开到半途便无法通过障碍，只得又折返回来。

发生这件事后，阎锡山进一步加强了对冯玉祥的看管，冯住处的房前、房后、房顶上皆有卫队旅士兵把守。凡去建安村的人员都要受到便衣特务、警官的反复盘问和检查，然后由他们领着越过壕沟、木栏，再换乘特备汽车驶往建安村。据说这些汽车司机全部由阎锡山亲自指挥，每天都必须向阎报告情况。

冯玉祥深感自己受了阎锡山的欺骗和愚弄，内心十分愤慨，与人谈话时经常流露出郁闷之情。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牢笼，虽

然也曾想过只身潜回潼关，但凭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要想化装瞒过重重叠叠的岗哨，显然非常困难。

冯玉祥的私人医生倒是在身材样貌上和他有几分相似之处，如果将冯玉祥扮成医生的模样混出去，或许也有几分出逃的可能性，然而随侍的邓哲熙又认为过于冒险，劝阻冯玉祥千万不可造次。

和冯玉祥住在一起的，还有李书城。李书城说动冯玉祥来晋，本意并不是真的要他和阎一起出洋，而是要促成冯、阎、唐联合反蒋。现在阎锡山对冯玉祥如此，他感到很是不安，每天打坐习静，表示一定要在建安村住下去，与冯玉祥一同“坐监”。

见实在无法走出建安村，冯玉祥只得下达手谕，任命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为代总司令。手谕由前来看望冯玉祥的幕僚秘密带至潼关，总算缓解了西北军群龙无首的纷乱局面。

落到这个地步，老冯算是窝心到了头，阎锡山则从中大获其利——蒋介石派张群等人携带大量资金到山西活动，要求阎锡山送冯出洋，或至少不要容纳他在山西避难。

阎锡山随行就市，南京代表的来头越大，老蒋给的代价越高，他对冯的看管越紧。只有在南京代表离开后，对冯的看管才会稍松一些。

就像在第一次编遣会议时那样，阎锡山又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除了蒋介石的代表外，上海的反蒋团体、新桂系、西北军都纷纷派代表进入太原，力图促进冯阎合作反蒋。

为此，阎锡山特地配了两套人马，一套专门接待拥蒋代表，另一套专门接待反蒋代表；接见地点也不相同，拥蒋代表在太原公开招待，反蒋代表在河边村招待，比较秘密。

所有来晋代表与各自幕主间都有频繁的电报往来。这些电报统统由阎锡山的行营电务处函电课所掌握，被称为“外电”，也就是阎集团之外的电报。

函电课每天不断把“外电”抄件送交电务组进行破译。通过破译的“外电”，阎锡山不向外派驻代表，就能了解到各方面的内幕，并有针对性地筹谋对策。同时，各方面的代表有什么要求，打着什么算盘，由于事先已经看到了电报，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应付阙如。

对拥蒋代表，特别是南京来人，主要是表示竭诚拥蒋。对反蒋代表，阎锡山上来一般会先痛骂南京政府：“南京贪污浪费，宋美龄穿一双袜子都要花二十几元，穷奢极欲，真骇人听闻。”

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揭竿而起，可是他还有自己的苦衷：“现在第二集团军（西北军）和第四集团军（桂军）先后被蒋介石击败了，仅仅我第三集团军（晋军）还作为完整的革命势力存在着，假若再不谨慎，又为蒋介石所乘，我一人失败不足惜，但整个革命势力就不存在了！”

阎锡山让代表们转告自己的幕主：“我决不拥护贪污政府，不过我不能轻动，须要到革命紧要关头，才能有所动作。否则，稍不谨慎，就可能被蒋介石先发制人。”

反蒋代表由此很难捉摸阎锡山的态度，你说他不反蒋吧，他骂南京是贪污政府。你说他反蒋吧，他又不肯下决心有所动作。总之是好

人一定要当，得罪金主的事情则坚决不做。

阎锡山稳坐钓鱼台，把生意做到日进斗金、红红火火，这时的西北军却不但骤失核心权威，而且还陷入了韩复榘倒戈时曾预料过的经济困境。宋哲元等人既痛恨阎扣冯以向蒋讨好的市侩手段，又需要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困难，因此决定恢复与南京政府的往来。

西北军本来也算是朝中有人。鹿钟麟一直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在南京代理军政事务。他是那种做谁的下级都能得到欢心的人物，原因就是他除了能无条件完成幕主交代的任务外，还能在外在表现上做出绝对服从的样子。

冯玉祥的规矩，接他电话一定要立正。西北军的一众高级将领，如韩复榘、宋哲元等人都不能免俗，但他们都是在开始讲话和讲话结束时立正一下，以虚应故事。鹿钟麟则不然，每次接到冯的电话，都是全程立正，通话不结束绝不敢“稍息”。大庭广众之下，他的所有动作都能做到分毫不差，就像冯玉祥真的站在他面前一样，这一点最让冯玉祥感到舒服。

鹿钟麟在蒋介石面前亦如是。蒋介石召见他，话才刚刚出口，鹿钟麟就会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唰地来一个立正。老蒋跟他交谈，半数以上的话都是“请稍息谈话”“稍息”。

不管军政部长还是军政次长，都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橡皮图章，老蒋也想趁西北军失去中心人物的机会，对西北军进行分化，于是就让这位表面上对他俯首帖耳的家伙正式接替了冯的军政部长一职。

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由此趋于缓和。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去拜见蒋介石，弄到了一些补给。蒋介石也先后派于右任等人赴西

安，对西北军进行宣慰和点验。

见此情景，阎锡山大为不安。归根结底，他能把买卖做得跟铁桶一般，全是因蒋、冯势不两立，他可以从中起到中介作用，一旦西北军直接和蒋接近，也就没他这个二道贩子什么事了。

必须得换个活法了。

白捡了一个大便宜

在地方诸侯中，阎锡山曾是最顺从蒋介石的一个，起码表面上看来是如此，但是如今他也有了真真切切的反蒋之心。

他的这种情绪从与老蒋在北平会面时就已经开始触发。那一次，老蒋会的不光是老阎，还同时将张学良召了过去——注意，是秘密的，完全瞒着他阎锡山。蒋张密谈后，张学良就匆匆返回了沈阳。

北平曾是张学良父子的地盘，在这里搞一些神神鬼鬼的勾当，你们想干什么？阎锡山为此大动肝火，他对左右说："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不知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行动诡秘，不叫我知道，其中必无好意。看样子，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

有生意可做，这些尚可忍耐，到了无生意的时候，就得计较计较了。阎锡山认为，有必要让老蒋再次认识一下他在华北不可或缺的地位。

某个中秋之夜，阎锡山难得地来到建安村。他主动找冯玉祥谈心，称自己终于下了联合反蒋的决心，但是希望冯玉祥能命令宋哲元

先行发动，他随即再举兵响应。

冯玉祥信以为真，于是便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10月10日，宋哲元、石敬亭等西北军将领自潼关发出讨蒋通电，推阎锡山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宋哲元为代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自二次北伐起，冯玉祥领第二集团军，阎锡山领第三集团军，外界习惯都称为“冯阎”，代语为“马二”“门三”。阎锡山未动一兵一卒，只是多做了几次生意，多拨了几回算盘，就在声誉上成功地超过了冯玉祥，“冯阎”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阎冯”。

问题是“阎冯”在名号上并没有完全商妥。潼关所贴出的布告，最早一种写的国民军总司令仍是冯玉祥，后来冯玉祥让人发电给宋哲元，才列阎锡山为首。就是这一疏漏，让阎锡山很不高兴，也就未马上出兵响应。

有人评价说，冯玉祥的外交“手段拙笨”，但也有人认为阎锡山是块皮糖，太“难缠”，毕竟人家电报上已经发了，而且接着也更正了过来，又何必如此在意细节呢。

不在意，那就不是阎锡山了。在西北军出兵潼关后，蒋介石一面下令缉拿宋哲元、孙良诚；一面派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由北平至太原与阎锡山进行会晤。

何成浚与阎锡山是陆士同学。当着这位老同学的面，阎锡山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他说他向以拥护中央、和平统一为志，宋哲元等人起兵造反，他一定尽力制止。

何成浚弄清阎锡山并没有如通电中所说起兵反蒋，且冯玉祥仍在其监控范围之内，便马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冯部叛乱，“只要解决其骁将一、二部，战事即可解决”。

杨永泰在“削藩策”中，主张以经济方法瓦解冯，以军事方法解决桂，对阎则建议以政治方法加以安置。所谓政治方法，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地给阎锡山封官加爵。在此紧要关头，为了更好地稳住阎锡山，蒋介石很大气地送了他一顶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帽子——陆海空军总司令是蒋自己，副司令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几天后，阎锡山高高兴兴地在太原通电就职，等于又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就职当天，他在报纸上发表致宋哲元电，力辟“冯阎合作”的谣传，还声明他当初“除不妨害贵军觅食外，绝无其他承认”。

获悉阎锡山背信弃诺，冯玉祥急得跳脚。春秋时吴楚相争，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乞援，连哭七天。冯玉祥学习申包胥，几天都不吃饭，“绝食曾效秦庭哭”。

阎锡山不为所动。看看就算饿死了也无济于事，冯玉祥又想回西北军进行指挥，可阎锡山哪里肯放。

获取必须要有代价，不能让客户白掏银子，这套商业伦理早已在阎锡山的脑海深处根深蒂固。他知道蒋介石让他做陆海空军副司令，除了不让他支援西北军外，还有看住冯玉祥的用意。

为了防止冯玉祥乘带来的汽车冲出防护线，阎锡山特地乘夜间雷雨之际，派人将建安村通往外面的桥梁炸毁。虽然炸毁了桥梁，但桥下的河水有时很浅，甚至没有水，并不妨碍汽车通行。于是阎锡山又在那里添驻部队，多设了一道关卡。

阎锡山要的是坐收渔翁之利，当然不会把事情完全做绝。建安村附近有一座紫金山，阎锡山在紫金山设了一座电台，允许冯玉祥通过无线电指挥军事。

蒋介石察觉后，让阎锡山进行查剿。阎锡山并没有真的查，只是另外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以后冯玉祥向西北军发电报，都改由山西军用电信局代为传达，该局先通过用电话念密码的方式，将相关内容报送至风陵渡口的一座村庄，再由驻扎该村的西北军人员电传前线。

因退却而战败

阎锡山违背承诺，不出兵响应，固然影响了西北军的士气，可是要解决它的“骁将一、二部”，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关的西北军如同下山猛虎，势不可当。这时候的蒋军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央军了，但最初投入作战的几支中央军，如徐庭瑶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等部，没多长时间就被西北军给打垮了。

在河南负责防堵西北军的还有唐生智的部队，也就是第五路军。因蒋介石已对唐生智联络阎锡山的事有所耳闻，故一直把唐生智留在南京，不肯放他回部队，此时唐的下属便接连电请蒋介石派唐生智回来指挥作战，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发一份电报。眼见前线形势急如星火，蒋介石只得将唐生智放回郑州。

唐生智此前曾趁冯玉祥被软禁于太原，西北军群龙无首之际，派参议到西安游说，要宋哲元拥戴他为领袖，以共同倒蒋，结果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这次他一回郑州，即将第五路军全线压上。

蒋介石随后也带着总部参谋长熊式辉等人赶到郑州，他打电话到前线，说要与唐生智见个面。唐生智让蒋再等一天，因为当晚第五路军还在进行攻击。他与蒋约定，一旦攻击得手，即赶去郑州与之见面。

是役，第五路军发起猛烈冲击，西北军不支溃败。当唐生智回到郑州时，蒋介石一见到他就上前热烈拥抱，并称赞备至。

这一战让蒋介石见识到了唐生智作为蒋百里的得意门生、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在军事指挥上拥有的能力和水平。他有心加以重用，知道唐生智与阎锡山有往来，就对唐生智说："我们南方人性情直率，尤其是你很直率。北方人最阴险，特别是阎锡山、冯玉祥，阴险万分，你无论如何搞他不过。"

蒋介石当场下达手令，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全部归唐生智指挥。他还在手令中写道："孟潇（唐生智字孟潇）有军事天才，我不及他，你们都要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指挥，也就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

西北军溃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唐部特别能打，或者唐生智在指挥上有超常发挥。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冯玉祥缺席的情况下，西北军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核心，将领们全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宋哲元虽是代总司令，但他的实力却远不如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良诚，而孙良诚也自恃得到冯玉祥的宠信，不服从宋哲元的调遣。宋哲元指挥不了孙良诚，只得亲赴前线督战，同时屡屡用密电跟对方说好话："（此战）如不成功，欲为平民而不可得，望吾弟努力苦撑。"

作战过程中，孙良诚的一部分军队被中央军包围，撤不下来。孙良诚想了一计，他派人假装与中央军接洽投降，并表示愿意逼迫宋哲元也投降，实际是想借此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

可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孙良诚事前却未与宋哲元商量，更没有向上报告。宋哲元得到情报，还以为孙良诚真要投降，赶紧下令全军撤往潼关。

这一撤不要紧，官兵们都以为前方已经完全失利，撤退马上变成了溃退，孙良诚部队亦失去斗志，损失很是惨重。一位西北军顾问对此长叹不已："别的部队因战败而退却，而西北军则因退却而战败。"

情急之下，宋哲元想到了石敬亭。因被认为在韩、石叛变中负有一定责任，石敬亭此时已辞去参谋长一职，仅出任后方总司令，但他跟随冯玉祥时间较长，在西北军中仍具有一定的声望。

宋哲元一面在潼关收容溃兵；一面给石敬亭发去急电，要他速来潼关会商应对之策。待石敬亭赶到潼关后，宋哲元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孙良诚倒戈相向，我们该怎么办？"

石敬亭听后，认为孙良诚不像是要叛冯降蒋的样子，先前宋哲元得到的情报可能只是出于误会，因此向宋哲元建议："我先邀他来潼关开会，他如果肯来，就不是叛变，万一不来，再想办法。"

宋哲元点头称是，于是石敬亭就给孙良诚发去了一份电报。孙良诚接到电报，很快就带着少数卫队乘汽车赶回潼关。一见宋哲元，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拍着桌子大骂："你下令全部撤入关内，是有意置我部于死地！现在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请问今后怎么补充，怎么抵挡敌人？"

宋哲元被骂得张口结舌，作声不得。石敬亭赶紧居中调停，劝孙良诚：“绍云（孙良诚字绍云）兄不必生气，这不过是彼此的一时误会，些微损失，何足介意。况且大敌当前，兄弟何能反目？”

石敬亭又承诺对孙良诚的损失进行补充，甚至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队伍拨出来给他。孙良诚有了台阶可下，这才冷笑作罢。

将领不和导致前线兵败的消息传至建安村，令冯玉祥大为沮丧。他后来痛责宋哲元、孙良诚，说：“你们作战，互不支援，部队撤退，各不相谋，只是带着部队拼命地向潼关一个老鼠洞里钻，怎能不垮？”

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泪尽而继之以血”地亲笔起草电报稿，劝慰宋、孙等固守潼关，并询问道：“我军此次转进，哲元、良诚定有意见，如何，盼复！”

宋、孙当然不肯承认是因为双方关系不和谐才导致了失败，因此在复电中说：“哲元即良诚，良诚即哲元，我两人毫无意见！”

冯玉祥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指示宋哲元要团结其他西北军将领的亲笔信，让专使薛笃弼带至陕州前线。薛笃弼到达陕州时，街上已充斥着从洛阳退下来的散兵游勇，而且满街都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的大幅标语。

薛笃弼感到很是奇怪，因为前两天他离开建安村时，那里仍被严密封锁，冯玉祥根本出不来，而且也没有说要回来，何以会有这样的标语?

细想之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部队溃败，所以宋、孙才故意放出冯要回来的假消息，以安定军心。

显然，此时最重要的已不是如何加强团结，而是要守住陕州，防止追兵涌入潼关。冯玉祥急电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出兵增援。吉鸿昌正在宁夏剿匪，接到电报后，提出后方空虚，须留一部兵力驻守宁夏。冯玉祥再发一电：“吉总指挥所部悉数开往前线，勿在宁夏逗留一人也！”

就在众人翘首以盼吉鸿昌到来的时候，宋哲元得到情报，说是蒋介石已委任吉鸿昌为讨逆军总指挥，而且马鸿逵等人还发去了贺电。

孙良诚刚刚排除“叛徒”的嫌疑，吉鸿昌又加入了进来。这支救兵还要不要用，宋哲元犯起了嘀咕。

石敬亭与吉鸿昌关系甚笃，认为吉鸿昌和孙良诚一样，也不至于投蒋。吉鸿昌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亲自设宴为对方洗尘，席间试探道：“据报蒋已发表老弟为讨逆军总指挥，马鸿逵等人都有贺电到陕。老弟如果要走这条路，你我至交，不妨直说，我马上可以把我的军队全交给你用，助你成就大事。”

吉鸿昌听罢即刻起立说：“您尽管放心，鸿昌生为西北军的人，死为西北军的鬼，决不能出卖团体，投靠蒋贼！蒋蓄意破坏我们的团体，奈我不为利用，也是枉费心机。我明天早晨就率部开赴前线增援，先打垮唐生智，以表心迹。”

石敬亭闻之大喜：“老弟果能如此，真是团体之幸。现在天气已冷，我这里存有冯先生的一件猞猁皮大衣，尺寸太大，我挑不起，愿借花献佛，转赠老弟。”说罢，他即命副官取来大衣送给吉鸿昌。

次日早晨，吉鸿昌不负所托，率部驰往陕州前线增援，潼关一度紧张的局面这才得以化解。

从没有忘记来捣捣乱

中国历史上，雄主欲在乱世中平定天下，一般可走两种途径：一种是曹操式的，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种是朱元璋式的，所谓“缓称王”。

两种各有利弊，蒋介石选择的是前一种，这使得他在天然拥有法理优势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从北伐结束起，蒋介石就已经陷入了仇敌满天下的局面，不单单冯、阎这样的大诸侯不断制造麻烦，就连一些刚刚形成气候的小诸侯也从没有忘记来捣捣乱。

在蒋桂战争中，俞作柏协助蒋介石，策反李明瑞阵前叛桂，接着又南攻广西，迫使白崇禧、黄绍竑亡命异域。桂系既倒，蒋介石践诺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

可是俞作柏驱桂只不过是借此来取得广西地盘，从而打开另一政治局面，并非真心拥戴蒋介石。在觉得自己已能控制住广西局面后，俞作柏便决定与正在海外掀起反蒋运动的汪精卫合作，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

俞作柏要掀老蒋的桌子，但结果自己刚站起来，屁股下面坐的椅子就先被别人给搬了——不仅新桂系旧将吕焕炎、曾在武汉与他们一同倒戈附蒋的杨腾辉先后举起叛旗，就连李明瑞的心腹将领黄权也抡刀砍了过来。

广西局势转变之快，完全出乎俞作柏的意料。蒋介石趁势下令免去他和李明瑞的本兼各职，分别以吕焕炎、杨腾辉替换，同时命令陈

济棠调兵由广东进入广西，会同吕、杨等部向南宁进逼。

众叛亲离下，俞作柏、李明瑞所能控制的兵力仅剩下了两个团，已无力与各方力量抗衡。俞作柏只得走上被他推翻的白崇禧、黄绍竑所走过的老路，取道越南赴香港，而李明瑞则去了百色，所部也改编为红军。

俞、李垮台后，黄权投向吕焕炎一边，杨腾辉为另一边，双方在声望和实力上均无控制广西局势的把握。杨腾辉电请吕焕炎到南宁主持全省事务，吕则复电给杨，照样请杨到南宁主持军事和编遣事宜，但两人互相猜忌，彼此都不敢到南宁来。

杨腾辉感到与其受制于吕焕炎，不如仍请新桂系三巨头回来主持，遂派人到香港欢迎李、白、黄回桂。黄绍竑率先潜回广西，以“大广西”的一套思想对黄权等人进行游说，从而取得了除吕焕炎外，广西将领对李、白、黄的一致拥护。紧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回到南宁，新桂系得以重掌广西残局。

居港期间，李宗仁对蒋桂战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桂军那么能打，军事上不存在多大问题，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没有政治靠山替他们撑腰。想来想去，当时能在国民党政坛上与蒋一战的，只有“党国元老”汪精卫，新桂系若不拥汪出来倒蒋，未来绝无成功希望。

正好汪精卫也在四处收罗反蒋武装，他给李宗仁发来电报，提出尽弃前嫌，重新合作反蒋，并表示张发奎的第四军可归李指挥，以联合进攻广东。

汪、桂一拍即合。李宗仁当即组织“护党救国军”，他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张发奎虽听从汪精卫

的要求与桂军合作，但他并不甘心充任李的部下，因此没要任何名义，仍然是当他的第四军军长。以后两军在一起作战时就被合称为“桂张军”。

蒋介石得报，赶紧让新近投奔他的石友三抽调军队南下援粤。蒋介石本希望石部的南下，能为解救广东局势助一臂之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举不仅没有给广东那边帮上什么忙，还差点让自己遭遇阴沟里翻船的厄运。

幺二三

西北军将领公开场合或着戎装，或穿长袍，西装革履的人少之又少。石友三就属于极少数的“西装革履”，他的孤僻和不合群由此可见一斑。

非常之人往往能行非常之事。韩复榘、石友三同样是反叛冯玉祥，但韩更多是出于不得志；石却是在骨子里就有反叛的基因。

西北军里的人背后给石友三起了个绰号，唤为“石幺三”或“幺二三”。此典出自北方赌博时的场面，赌徒在掷色子时，通常都会在一旁叫喊，希望出现某个点数，叫作赶点。所有点数里面，“幺二三”是最小的点数，如果庄家掷出这种点数，对家就不用再掷了，可以直接赢钱。

一个奔着“幺二三”来的赌徒，在掷出这个点数之前，会看着色子不断变化。人们以此来形容石友三的反复多变，所谓“石幺三”，就是石友三的谐音和“幺二三”的简称。

西北军将领从内部叛出，多少都会背负心理压力，韩复榘就是如此。他把反叛主要归因于石敬亭的逼迫，在集合官兵讲话时，几次提起：“西北军有石敬亭在，就没有我们的饭吃。”还说道：“我的离冯，是石敬亭逼的。”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包袱。

与韩复榘不同，石友三毫无类似的压力感。他的口头禅是“老哥们儿”，凡属西北军的人，无一不为石友三口中的“老哥们儿”。某次，石友三与友人一起喝酒，喝到酣处，友人跟他开玩笑：“你总是亲热地称你那些同僚是‘老哥们儿’，可为什么又要对这些‘老哥们儿’时叛时降呢？”

石友三脸不变色心不跳：“泥菩萨碰了头，还得叮当乱响，老哥们儿说不好，就揍一场，那还值得稀奇吗？揍完了，气一出，谁赢都是一样，反正大家都是老哥们儿嘛。赢一把，输一把，又算得了个球？”

石友三首次投蒋，算是掷了个“幺二三”。蒋介石不仅封其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还另外委任他为安徽省主席。这让从未得到过属于自己的地盘的石友三来说，可算是喜从天降。

接到蒋介石要他抽兵南下的命令时，石友三尚未在安徽正式就职。他可不想在还没能过上瘾的情况下，就扔下即将到手的地盘出去给老蒋打工，也不太愿意分自己的兵，就故意发电报过去，请求准许他全军南下。

石友三的意思，老蒋需要他屯守安徽，断然不会同意这一请求，那就可以顺水推舟赖着不去了。谁知此举恰得其反，不发电报，老蒋还只是持试试看的想法，你石友三能抽就抽，抽多少都随你。电报发

过去，老蒋会错了意，真以为石友三积极性高涨，欲到前线去为他立功，居然来了个复电照准！

这下轮到石友三进退两难，大伤脑筋了，不得已，他只得率部南下。按照蒋介石规定的运兵方法和路线，石部须先由浦口分乘木船到上海，然后再乘海船前往广东。当他们到达浦口车站时，汪精卫派来的使节邓粹英前来拜见，并极力游说石友三反蒋。

邓粹英翻动唇舌，煞有介事地说：“蒋很可能利用你军全在船上的机会，中途各个消灭。”

浦口的木船每艘都载不了多少人，船与船之间的距离也拉得很长，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相互之间很难照应。若是蒋军真的要动用海军逐个消灭，石部完全无法抵抗。

如果邓粹英面对的是其他人，这套说辞未必会起到太大作用，因为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道理，毕竟都只是阴谋论，邓粹英也提供不出任何有力证据来加以证实。可是“石幺三”不一样，反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要有一丝威胁到自己的可能，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动这个念头。

一身冷汗

石友三个高清瘦，面容削长，其相貌不似通常所见的军中莽汉，倒更像是一位中学的学生领袖。只有在说话时，那一口一个“八代祖宗”“兔崽子”才会泄露本色。

虽然粗鄙少文，在西北军这个“粗人天地”中也不甚得志，但石友三的志向却不小。有好友劝他改一改朝秦暮楚的毛病，他先喟然叹道：“算啦算啦，打从穿上二尺半（指军装）这一天，就没打算能活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总算咱石友三命大，没死个不明不白。事到如今，能多活一天，就算咱多赚了一笔。”

要说这些话还都不算太离谱，离谱的是下面这一句：“有一天，造化大，能做个几天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那还不都是咱祖上的德性？”

原来石友三连老蒋的交椅都惦记着。现在加上邓粹英的一番挑拨，他便决定造老蒋的反。

石部的数十门大炮被排列在浦口江岸，对准南京就是一顿乱轰，同时石友三还派便衣队潜入南京城内乘势扰乱。

蒋介石根本就没料到石友三会来这一手，事先没有任何防备，南京城内也只有一个团多一点的宪兵以及黄埔军校的数千学生，根本无力招架。炮声中，南京政府各部院纷纷迁逃，城内乱成一团。

眼看着石友三就要一鼓作气攻进南京城，但这厮在喜好掷“幺二三”以及好高骛远的同时，却又有着另外一个毛病，那就是胆子特小，不敢做大事。炮轰南京后，他不是继续进攻，而是北撤退入河南，依韩复榘为食去了。

虽然广东方面未能从石友三那里得到援兵，但因事前蒋介石已察觉张发奎有回师攻粤的计划，提早就让何应钦率部到广东协助陈济棠，并在广州外围打造了坚固防线。桂张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面

对守军的深沟高垒难有进展。李宗仁见状，只得将桂张军全部撤回广西。

饶是最终转危为安，蒋介石也已被石友三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这石友三炮轰南京不说，在北撤河南途中，还缴了沿途驻军的枪械，津浦线的车皮也被他搂草打兔子全部带走，着实可恶至极。

石友三避入的河南乃是韩复榘的地盘。自韩复榘叛冯投蒋之后，蒋介石不但继续保持了他河南省主席的地位，而且还赠送大宗款项和大批武器，韩复榘由此得以扩充兵力，所部由数千人发展到三万多人。

韩复榘属于那种“一次失了节，以后再也不想守贞”的人。不管蒋介石如何待他，他始终对这个新主子抱着极强的防范心理。投蒋之初，他就想把石友三、马鸿逵两部都拉在一起，以结成一个足以自保的军事集团，只是蒋介石棋高一着，封官许地时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韩复榘的意图这才未能得逞。

韩复榘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南京军政部为防止韩部暗中扩充，要求点名发饷，但韩复榘却坚决拒绝，一定要统一领取，自行分配。此外，在军政设施和人事问题上，也是独断独行，并不完全按照南京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韩复榘还暗中对蒋介石以外的实力派进行多方拉拢，在北平、东北、山东、河北都派有代表，随时准备依风向而动。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多有耳闻，只是鉴于时局动荡，以及进一步分化西北军的需要，不得不暂时予以容忍，但是涉嫌反叛就不一样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韩、石关系密切，早在石友三炮轰南京时，蒋介石就认定韩复榘可能参与了这次叛乱，为此特地给身在郑州的唐生智发去一份密电，大意是：据报韩复榘不稳，他来郑州会你时，希予以扣留。所遗河南省主席一职，由你兼代。

唐生智收到密电不久，南京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奉蒋命，亲自将一部分弹药和军费押送郑州，送给唐生智作为对付韩复榘之用。

随后，韩复榘果然由开封来到郑州。两人见面时，卫士都留在了外面，唐生智如果要予以扣留或擒拿，简直易如反掌。

寒暄已毕，唐生智突然对韩复榘说：“石友三已经动起来啦，你拿他怎么样？”

当初韩、石、马一同叛冯投蒋，之后韩复榘驻河南，马鸿逵驻徐州，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三人之间订有密约，结成了三角军事政治同盟。加之韩、石关系密切，所以之后石才会投韩，韩也甘于冒风险予以收纳，但这并不表明韩复榘会和石友三一起叛蒋，事先他对石友三反叛的事也一无所知。

听唐生智说完，韩复榘随口便答了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唐生智见状，就把蒋介石的那份密电给掏了出来。韩复榘接过一看，脸色陡变，顿时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唐生智面前，连声哀求：“请总司令救命！”

唐生智一边将他扶起一边说：“你怕什么！如果我要为难你，会把这个密电给你看吗？”

原来唐生智这时也正要反蒋，所以根本不想执行蒋介石的密令。

蒋冯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有心重用唐生智，对他说："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是东北边防军事长官，将来你就担任西北边防军事长官，负起建设西北的责任。"

屯兵西北，曾是白崇禧极力谋求而不可得的权利。蒋介石打算让唐生智坐镇西北，并将徐源泉、杨虎城甚至于蒋鼎文、杨杰等中央军部队都交由他指挥。

唐生智当时却不以为然地说："建设西北嘛，我看起码是三十年后的事。"

蒋介石见没能打动唐生智，又准备请唐生智帮他训练中央军："如果不去西北，我们就重新训练军队，德国顾问已经找来了，就请你负这个责任。"

唐生智仍未置可否。蒋介石最后表示："你希望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机会到外国去走一趟也可以。"

蒋介石却不知道，唐生智真正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取彼而自代。

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石友三的心大，唐生智的心也不小。只不过石友三多少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唐生智却拥有与雄心壮志相匹配的足够资本。

当然了，相信自己有能力坐天下的人绝不止一个。唐生智能够始终不渝地惦记着老蒋的龙椅，除了平生所受到的军事教育、多年征战

的军事履历和指挥能力给其信心外，还有着他所认为的天助神佑作为支撑。

民国时候的打仗就跟出海打鱼一样，谁都不知道出去了是满载而归，还是葬身鱼腹。唐生智历经战事，眼见同辈之人伤亡过半，触景生情处，也不免常有兔死狐悲、空虚寂寥之感。有一年他乘在省城开会之际，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去听人讲经说法，一听之后，令他大为惊异。

唐生智并不是“石幺三”那种土包子军人，一般胡吹乱道的星相、巫师根本就看不上，而当天主持说法的人也确非等闲之辈。此人是一名居士（即在家的佛教徒），名叫顾伯叙，从小学儒，十九岁开始学道，两年后又转而学佛，对儒道释均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

与顾伯叙见面详谈后，唐生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顾伯叙主张“入山门不言俗，出山门不言道”，这让唐生智在战争内外有了新的心理支撑，从此他不仅决定自己持斋礼佛，还拜顾伯叙为师，称为“顾老师”。顾伯叙则以唐生智为护法（指保护佛法的人），两人相约，唐不再找第二个老师，顾也不再找第二个护法。

自北伐开始，唐生智就定期请顾伯叙去军队布道，据说他的第八军官兵都曾由顾摩顶受戒，因此称为佛教军。唐生智曾希望顾伯叙直接出来做官，在对方坚辞不就的情况下，便采取了留在幕中，有事请教的方式。顾伯叙亦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他从不主动参与军事政治活动，任何情况下唐生智不来找他，他就绝不去找唐。

顾伯叙的声音非常洪亮，辩论说理，滔滔不绝，他还喜欢讲笑话，加上身材较胖，平时看上去不似佛教徒，倒更像一个名士派的风

流人士。当时社会上对他也有各种传言，有说他行径反常的；有说他拥有六房姨太太的；有说他酒量奇好，一次能喝白兰地两大瓶的；还有说他身为佛教徒，却每天宰鸭杀鸡，且只吃鸡鸭内脏的。

李宗仁听到的有关顾伯叙的八卦更为不堪，说顾伯叙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乃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至于顾伯叙有多大神通，李宗仁也根本不信。虽然李品仙等人称“顾老师”有时的确很灵验，连唐生智家里的琐碎事务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李宗仁认为，顾伯叙可能就是一个能干的侦探，一个包打听而已。

两人同在北伐军营时，李宗仁曾饶有兴致地缠着唐生智，让唐生智给他介绍“顾老师”一见。唐生智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就知道李宗仁不信这一套，只是拿来开心而已，便选择了笑而不答。

李宗仁不会了解顾伯叙的重要性。唐生智如果只想看个手相，测个风水，他就不会一直把顾伯叙留在身边。事实上，顾伯叙不仅是唐生智的精神导师，还能在一些唐生智本身尚把握不定的地方给他打气。

昔在长沙，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检阅唐生智的第八军。当他骑马从军乐队前经过时，其坐骑受到号声惊吓，突然拔足狂奔，将老蒋从背上甩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阅兵堕马事件，顾伯叙的解释是“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蒋氏失败，继起者或者就是他唐生智也未可知。那时，顾伯叙已经看出，唐生智今后要想成就霸业，蒋介石将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若不把老蒋打掉，他的幕主兼护法就只有认命给人打工的份了。

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唐生智自视极高，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愿意服侍别人的，包括老蒋。顾伯叙所起作用，不过是通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示，来进一步强化这种心理。

既然佛都说了，自己最有可能取蒋而代之，唐生智便一直存有觊觎老蒋之心，别说给蒋做部下，就是同殿称臣他都不愿意。这也是当初蒋百里极力戏说他联蒋而遭到拒绝的内在原因之一。

被新桂系击败并被迫下野，无疑让唐生智沮丧过一阵，但是复出后顺利掌握旧部，并在蒋冯之战中令蒋介石都刮目相看，又让唐生智的自信心像气球一样膨胀开来。

唐生智曾经扬言，要先打垮冯，才反蒋。蒋冯之战虽然并没有能够让冯玉祥垮掉，但也已经打得西北军不敢出潼关了，于是接下来，他便布置起了反蒋这件头等大事。

偏向虎山行

为了回应当年的老蒋阅兵堕马事件，唐生智将自己部队的编号恢复为老第八军。在内部召开反蒋会议时，他强调："非常的事，应有非常的动作。"

众将中，唯有第五十一师师长龚浩对反蒋持有异议。他认为唐生智过去在武汉附汪反蒋，到这次被蒋介石起用，相距还不到一年。尤其是唐生智在蒋冯之战中的表现得到蒋介石认可后，蒋对他更为重视，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这种情况下，还要扯出反旗，就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了。

龚浩主张韬光养晦，继续投于老蒋麾下，借蒋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无奈唐生智主意已定，对龚浩的建议不予采纳。

碰壁之后，龚浩又转而劝唐生智快干，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唐生智仍不接受，他指着地图，很生气地对龚浩说："你不看路程好远吗？"

龚浩十分失望，此后便常常不穿军装穿长袍，消极情绪溢于言表。

不顾军中有识之士的反对，唐生智开始用慢火细炖的办法来酝酿反蒋。他没想到的是炖着炖着，却让冒冒失失的石友三给抢了先，在没有任何征兆和铺垫的情况下，浦口反蒋的炮声居然就响在了他前面。

再不上场，风头就全是别人的了，唐生智按捺不住，决定马上动手。老蒋发来扣留韩复榘的密令，他在拒绝执行的同时，还准备借此机会将韩复榘也拉下水。

被吓得战战兢兢的韩复榘从唐生智那里听到了一句令他十分意外的话："不要怕，今后我们一起来反蒋吧！"

韩复榘急忙说："我以后绝对服从总司令，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包括韩复榘在内，列名通电者共有阎锡山、何键等二十多位。与韩复榘反冯时，被列在通电上的大多数人事先毫不知情不同，唐生智这份通电上的人，是他在酝酿期内"炖"出来的，其中大多数人都联系过，也都在反蒋上表了态。

冯玉祥与唐生智不睦。不过事前双方已达成协议，唐生智单独倒蒋，西北军则待着不动，也不攻击唐部。冯玉祥为此特地指示宋哲元、孙良诚等人：“河南境内皆属友军，我军万勿反攻。”

通电反蒋的二十多人里面，最重要的自非阎锡山莫属。这次他之所以能够答应唐生智反蒋，缘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自从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后，阎锡山即将平津两市税款留为己用。接着宋子文到了北平，要划分国税和地税。宋的要求名正言顺，阎锡山不能反对，只得应允将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但他同时向宋子文提出，今后平津卫戍部队的薪饷也应由财政部拨付，山西方面不能承担。

宋子文答应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了。阎锡山觉得自己吃了亏，便又以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为军费为由，申请发行省公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

报告打到南京，蒋介石不同意，山西的三千万元就此打了水漂。阎锡山一辈子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无论是谁，但凡多占了他一分钱的便宜，他都会恨之入骨，更不用说三千万这样一笔巨款了。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不敢用兵来打我们，只有从经济上来困死咱们。”

那段时间，蒋介石在南方整垮新桂系，在北方小虐西北军，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阎锡山则觉得即便为了他那打水漂的三千万，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必要。

阎锡山平生最得意的是与袁世凯打交道。他对人说："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聪明、最凶恶的一个家伙。他把辛亥时期的都督不是杀掉，就是赶走，而我却能够把袁世凯应付过去。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

此时阎锡山在北方的声望已全面超越冯玉祥等人。各方代表纷至沓来，里面有酝酿反蒋的，也有探听消息的，有国民党的，也有北洋的。

吴佩孚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份情报，说蒋介石想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蒋家天下。蒋排除异己的顺序是，首先消灭西北军；其次消灭"五台山大王"（指阎锡山）；最后消灭关外的"胡子军"（指张学良的东北军）。吴佩孚在情报上亲笔批了几个字"来源甚确，请百川（阎锡山）注意"，然后让代表带到山西交给阎锡山。

不管情报真假，吴佩孚欲借反蒋之机复出，阎锡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吴佩孚毕竟已经失势，在政治场中，失势人物也就只能担当个包打听之类的角色，不可能得到太多的重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北洋军人就不是阎锡山能随便小觑的了。

难得的机会

蒋、张北平密谈，曾引起阎锡山的百般猜忌，并成为他怂恿西北军发动反蒋战争的诱因之一。可是事实上，在这之前，阎、张就已经有过秘密接触。

在阎、张接触中，张学良并没有亲自跟阎锡山面谈，他派的是代表。张学良通过代表传话，说他年轻无知，对关内事不知该如何应付，而阎锡山是他的父执（父亲的朋友），所以请求阎锡山对他进行指导。

这分明就是反蒋的表示，只是没有明言而已。

自东北易帜以来，张学良一直持“拥护中央统一”政策，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以反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龃龉主要来自“中东路事件”。

自1929年夏季开始，中苏因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启衅之初，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张学良的支持，允诺可出兵十万，拨付军费数百万，这使张学良下决心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之后东北军便与苏军在东北边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史称中苏同江之战。

蒋介石曾答应援助张学良，可是因为中途发生了蒋冯战争，使得他无暇再兼顾东北，致使一兵未出，一文未拨。东北军独立与苏军作战数月，终遭惨败，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

“伯力协定”不仅使得中东路的控制权重回苏军之手，而且还把黑瞎子岛割让了出去，内容甫一公布，就被舆论认为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于“伯力协定”只是东北政府的单方面行为，事前并未得到过南京中央政府的许可，所以张学良派代表莫德惠晋谒蒋介石，要求中央在对苏外交上进行授权，实际就是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对该条约予以承认。

蒋介石在骨子里是一个民族意识极强的人，而且又自居为全国领袖，哪肯为此背负骂名，莫德惠便“以统一问题相威胁”。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莫德惠见识不明，称就算南京政府授权他去苏联交涉，事情也未必能得到全部解决。

张学良怪蒋介石出尔反尔，关键时候不能出手相助。蒋介石则认为是张学良自己不争气，打仗打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东北内政腐败，用度繁杂，冗员过多，还不如他老子张作霖的北洋政府时期。试问，以这样的见识、性情和水平，又怎能不被日苏所欺凌?

阎锡山所认为的蒋、张北平密谈，其实就是在一些类似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协调，与阎锡山没有半点关系，而对于处于这一敏感时刻的张学良来说，产生联阎压蒋的念头也一点不让人感到奇怪。

阎锡山何其老练，见张学良那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自然也不会把题目点明。他对东北代表说:“汉卿（张学良）如有困难，我一定竭力相助。将来晋奉双方如有结合必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请告汉卿，可以放手做去。”

到反蒋已成公共话题，各方反蒋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连吴佩孚都派人来山西向阎锡山示好的时候，张学良便也选择了向阎锡山靠拢。他派秘书长王树翰来晋进言，说他再也不愿受南京压迫，希望阎锡山能率领国人共同倒蒋。

阎锡山气定神闲地回复道:“我再三考虑，对蒋本人，深感到拥之不足，倒之可惜。就是说，蒋之作风，殊不足以使人拥戴，但因倒他而影响了国家的大好形势，又未免可惜。”

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吴佩孚、张学良……不管面对哪一方面派来的反蒋代表，阎锡山翻来覆去的托词，不是“拥之不足，倒之可惜”之类的废话，就是说时机尚不成熟，须看情况再定。

一般人不清楚阎锡山的真实想法，都认为他还是不敢倒蒋，以致坐失良机。

谨慎小心当然是一方面，但阎锡山所谓不成熟的含义，其实主要指的还不是倒蒋。按照他的估计，有了西北军、晋军，再加上总数约为二十万人的各类杂牌军，至少把蒋介石打到长江以南不成问题，再加上东北军又做了愿意参加反蒋的表示，倒蒋还是有把握的。

没把握的恰恰是倒蒋后的善后问题。阎锡山认为倒蒋之后，他会理所当然地成为老大，那么善后问题就全要由自己来处理了。蒋介石在善后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和难堪，他是亲眼看到的，仅一个军队编遣，就差点要了老蒋的命，若是换成他上，会不会也成众矢之的呢?

显然，蒋介石倒掉之后，如果他在善后问题上也处理不当，前途同样不堪设想。阎锡山夜以继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秋天研究到冬天，始终没能想出一个稳妥的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唐生智找上了门。他派顾问袁华选出使太原，请阎锡山支持他反蒋，并提出愿意拥护阎锡山出来做领袖。

阎锡山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能错失，也就不管什么善后不善后，先行答应下来。

倒是李书华对阎锡山多了一个心眼。他鉴于之前阎对冯反复无常的事实，与袁华选商定，要求阎锡山代拟反蒋通电，以此坚定双方的

盟信。阎锡山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准备送给唐生智五十万元军费，并已开好支票只等银行兑付。

有了阎锡山等人的倾力加盟，唐生智很乐观地认为，只要发出这一通电，光气势就能把蒋介石给压倒，可能不待他出兵，老蒋就会乖乖地自动下台。于是发出通电后，他就开始在家里静候佳音。

当时南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冯、阎，谁也没有想到被蒋介石如此器重的唐生智会首先从内部发难。南京政府内部颇显慌乱，各方都认为，只要阎、冯通电响应，蒋介石就只有下野一途了。蒋介石自己也认为事已至此，进退只能取决于阎，因此在唐生智发出通电的当天，他就赶紧派赵戴文回晋，以便劝说阎锡山“拥护中央”。

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五台老乡，早在阎锡山做革命党人的时候，他就跟着阎一起打江山，资格非常老，是阎之外的山西第二号人物。当初蒋介石将阎锡山封为内政部部长，但阎锡山不愿被调虎离山，于是就保荐赵戴文为内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在南京代理部务。

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为了酬谢阎锡山，对阎保举到南京政府去的人员都一律给予了重要职位。赵戴文先是升任内政部部长，接着又被提升为监察院院长。

赵戴文做着蒋介石的官，但心是完全向着他的老乡兼幕主阎锡山的。这位有着几十年儒学沉淀的老幕僚曾经公开承认，他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次回晋，既是受蒋介石所托，更是出于维护阎锡山利益的需要。

又溜了号

赵戴文到达太原时，在车站与蒋介石的驻晋代表方本仁不期而遇。方本仁已在阎锡山那里碰了壁，只得离晋赴平，不过这并没有动摇赵戴文斡旋时局的决心。

见到阎锡山后，赵戴文极力向他阐述联唐倒蒋的有害无益，并且对阎锡山说：你若反蒋，我便出家（当和尚）！

阎锡山幕府中，贾景德、赵丕廉皆属反蒋派，主张联唐倒蒋。赵戴文对他们破口大骂，甚至说要派宪兵把他们抓起来。赵戴文拥蒋的态度如此坚决明显，令方本仁十分感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次陇（赵戴文字次陇），眷顾大局者。有伊在此，可保大局无虞。"

冯玉祥听说后，忙派薛笃弼前去太原，向赵戴文陈述联唐倒蒋的必要。赵戴文不听则已，一听怒气勃发，他当即从座椅上站起来，把一只细瓷茶杯连碟带盖猛掷于地，大声斥责："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百川哩。"

见老爷子在房内走来走去，怒气难消，薛笃弼赶紧解释道："冯意无他，为的是阎先生。"

赵戴文根本就不想听："打了唐生智再说！"

薛笃弼不敢再说下去，只得回建安村向冯玉祥复命。他给驻扎潼关的宋哲元、孙良诚发去电报："此间自赵次陇归来，政局陡变，由联唐变为反唐，由反蒋变为拥蒋。"末了又说："总之，阎对时局尚和缓，次陇说话太露骨，望诸兄妥慎应付为幸。"

冯玉祥给西北军发电报，都要先送阎锡山审阅，由他批"发"或"扣"，甚至篡改电文。通过这种方法，阎锡山更便于在某些方面支配

西北军的行动。

看到薛笃弼的这份电报后，阎锡山立即批了一个“扣”字，也就是留住不发。他还另外大写两字“次陇”，意即可将电报交给赵戴文看看。

其实在赵戴文回晋之前，阎锡山已处于懊恼之中。联唐倒蒋，本来说好是让阎锡山领衔，可是到正式发通电时，唐生智一看，这么多人跟着反蒋，想想造反的事已经是缸里掷色子，没跑儿了，便又临时变卦，把领衔人换成了自己，声称“统兵三十万，倡导和平”，俨然以最高统帅自居。在郑州张贴的标语上，也只说“尊重阎先生”，而没有表示拥阎。

老阎是何等样人，那是长处掐，短处捏，能算计到不行的主。一看唐生智居然来这一手，马上把支票收了回去。虽然方本仁在他那里碰过钉子，但阎锡山反蒋的态度也已经出现动摇。

赵戴文此行回晋，除了一张嘴巴外，还带来了蒋介石抛出的若干优惠条件。这让老阎甚为动心，于是就坡下驴地改变了主意。

获悉赵戴文回晋已有成果，蒋介石乃致电阎锡山，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

阎锡山立即复电，以戡乱自任，并且说他并不是对蒋没有一点意见，但他原本的想法是党争由党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武力只居于缓冲地位，唐生智曲解了他的本意。

和蒋桂战争时一样，阎锡山又溜了号。冯玉祥深知阎锡山此举，对唐生智的反蒋行动意味着什么，他不顾一切地准备乘汽车偕随员前

往太原，以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负责看守的卫队旅旅长杜春沂连忙打电话请示阎锡山。阎锡山下达命令，要求予以阻止，无论如何不能让冯玉祥来太原。

杜春沂紧急集合卫队，将冯玉祥和他的汽车围了个密不透风。冯玉祥走不出去，他时而痛哭，时而大骂，甚至怒斥：“杜春沂，你把我枪毙了吧！”

冯玉祥还把他来晋的经过，以及这次与唐生智代表接洽的内幕全盘端了出来，给卫士们做了一番生动的报告，然后说：“我要到太原问问他（指阎锡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冯口才了得，尤其在普通士兵当中非常有亲和力，当然晋军不是西北军，没有被他一煽动就跟着跑的道理。可这也把杜春沂给紧张坏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亲自指挥警卫人员各显其能：有举枪做威胁的，有下跪苦苦哀求的，还有卧倒于汽车旁，举着手枪对准开车司机的。

双方从上午八九点一直缠磨到下午两三点，直到冯玉祥的文学老师王瑚出来劝解，冯玉祥才快快回到村里。

第二天，阎锡山派人到建安村，对冯玉祥进行抚慰式拜访，但在拥蒋讨唐的问题上却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轻剑即是轻人

自古好手不敌双拳，双拳不如四手。虽然阎锡山临时变卦，但通电上还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军头，若是他们都出兵讨蒋，阵势也是够吓人的。

只是当蒋介石按照名单一个个发电报前去确认时，却发现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此事，均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拥护中央”。向来谨小慎微、首鼠两端的何键是如此，就连最后拉来的韩复榘也是一样。

不错，在郑州的时候，唐生智对韩复榘等于有救命之恩，韩复榘也曾当着面对唐生智说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并不等于韩某真的肯冒着杀头的危险跟着造反，这是两码事，一搭归一搭。

发现唐生智放走韩复榘后，蒋介石也改变了态度，不但未对韩复榘收纳石友三一事进行追究，而且还派人给韩复榘送去了一笔款项，对他加以安抚，告诉他：不用怕，只要你没有反我的心，一切好说。

韩复榘毕竟不是“石幺三”那样叛变已成习惯、乃至不知轻重的货色，自己几斤几量他还是掂得出来的。蒋介石既已放他一马，他哪里还愿意再跟着唐生智出来瞎折腾。

原本以为能掀起一场集体倒戈的风暴，结果却只能演一场孤孤单单的独角戏，唐生智的心里这才忐忑起来。他的嫡系部队不过才两万人，诈称三十万，是把通电上列名的军头们都算上了，甚至西北军也包括了进去。为此，西北军的人私下还曾表示不满，说：“唐生智妄自尊大，竟然把我们西北军也算作他的军队。”

用区区两万人讨蒋，唐生智深感毫无胜算，无奈通电已经发出，想收也收不回来，事到如今，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顾伯叙向唐生智建议:“如今武汉空虚，何不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

顾伯叙对形势看得还是很准的。当时武汉并无重兵，蒋介石则正在平汉线的一辆专列上指挥作战，若唐部一鼓作气打过去，克复武汉重镇不说，蒋介石也势必会束手被擒。

唐生智依言指挥部队沿平汉线南下，向豫南的确山挺进，直逼武汉。

武汉果然十分空虚，听到唐部南下，城内人心浮动，各机关人员都把行李搬上轮船，准备向南京撤退。蒋介石的专列上警卫不多，也因此变得手忙脚乱，慌乱不堪。

如果不是一场罕见的大雪骤然降临，“蒋总司令”可能真的就要倒在“第八军这一关”了。

雪来得非常蹊跷。下雪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信阳以北，恰好就是蒋唐作战的前线，同时雪也非常大，据当地农民说，几十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有的地方已经厚及于腰。由于到处都是雪，蒋唐两边的前线士兵不约而同地都把身穿的棉大衣翻过来——棉大衣里面是白布做的，打仗时可以作为士兵的保护色。

天降大雪，寒冷异常，唐生智在用兵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他询问顾伯叙的意见，顾伯叙说，不如等到黄道吉日再开战。这实际上就是等天气转暖一点再打的意思，但经“顾老师”之口说出来，自然更有利于安定军心。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天时变化只是让蒋介石的被动局面缓和了一些而已，一旦唐部缓过劲来，武汉方面的中央军仍然招架不住。

一股奇兵的突袭，令所有剧情都得到了改变。奇兵是杨虎城的部队。杨虎城原来也是西北军的将领，当然是和马鸿逵一样的杂牌，不过他的胆子比马鸿逵、石友三之辈要大得多，见冯玉祥势头转弱，便打算跟着蒋介石干。

杨虎城的基本政治倾向偏左，幕僚中有很多是原来武汉政府的人，他们自然反对杨虎城投蒋。杨虎城则说："凡是新旧军阀都是反革命。蒋是反革命，冯也是反革命，脱离这个反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是一样的。投蒋后，可以利用其地位，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后到西北的机会多些（杨虎城为陕籍）。"

在冯玉祥令西北军西撤时，杨虎城便趁机与冯玉祥决裂，率部投向蒋介石。此时冯玉祥正因韩、石反叛而伤神，对杨虎城这个杂牌也就更兼顾不上了。

杨部驻于河南南阳，属唐生智指挥。在唐生智的反蒋通电上，杨虎城也名列其中，当然作为杂牌部队，唐生智在杨虎城身上下的功夫自然不会有对阎锡山等人那么多。

轻剑即是轻人，杨虎城对此很是不满，他说："唐孟潇太看不起人了！我革命的时候，他还是北洋军阀的小喽啰。对蒋介石造反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至少他应当事前和我商量商量，他这样搞太看不起人了！"

在到底跟谁干这个问题上，杨虎城一如既往地实际："我跟蒋是杂牌，跟他唐孟潇也是杂牌，他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随后杨虎城便通过他驻南京的办事处，向蒋方澄清自己有造反的意图，但是他并没有通电否认，所以唐生智便以为杨虎城即便不站在己方，至少也不会与自己作对。

就在唐部因雪停止进兵的时候，杨虎城突然对其位于驻马店的前进指挥所发动了袭击。驻马店的驻军很少，当他们发现杨部由南阳向驻马店移动时，还以为是友军，连抵抗都没有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让杨部给端了老巢。

唐生智与顾伯叙正在围炉赏雪，闻知杨部不战而入，两人急忙乘乱逃出，情形甚为狼狈。

驻马店处于唐部的中腰位置，中腰一断，唐部前后方便失掉了联系，局面立刻被动起来。

看到唐生智的失败命运已无可挽回，周围的大小诸侯纷纷趁火打劫。先是阎锡山举兵讨唐，抄袭唐部后路，令其腹背受敌。接着韩复榘等人也加入进来，并联名致电唐生智，劝他解甲出洋。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唐生智又用拆字的方法来预卜吉凶。他最后挑出一个“道”字，道者，“首领要走”也。于是他决定通电下野，并用一种不无怨尤的语气回复韩复榘：“今日之事，非弟一人之意，现各方既已翻异，弟又何必固执。”

唐生智认为自己落到这样的地步，乃是“天时不利”以及“人谋不臧”。天时不用多说了，没有那场诡异的大雪，很可能唐部已拿下武汉，甚至于活捉蒋介石。

人谋则可以说是唐生智的政治智商严重不足。当他宣布起兵时，连南京城里的官员们都觉得纳闷，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蒋冯战争爆发之初，或者是西北军尚未战败时与其联合，而一定要到西北军既败，南京政府已应付裕如的时候再跑出来招惹是非。

退一步讲，即便蒋冯战争那个机遇错过了，难道不会再等下一个适当时机吗?

蒋唐战争期间，唐生智每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仍然自称“职”。胡汉民遂把唐生智和石友三这两个奇葩联系到一起，写下两句打油诗：“造反犹称职，称兵不渡江。”

通电下野后，唐生智即化装逃往天津，重新踏上流亡之路。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掌握旧部的机会了——蒋介石下令对唐部就地缴械遣散，“第八军”从此成为历史。

从唐山复出，到郑州通电反蒋，仅仅十个月时间，这位曾经的“军事天才”就已如流星一般地坠落深谷。

第四章　一石掀起千层浪

阎锡山有心反蒋不假，但就算是反蒋，在他眼中也是一桩生意。当然这是一桩投资特别巨大，风险也特别巨大的生意，弄得好，可能盆满钵满；弄得不好，也可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所以阎锡山时时都要权衡其中的损益利弊。像唐生智那样，毫无拥戴他的表示，完全是一副自己要做首领的做派，那就别说投资了，根本连声援的价值都没有。

冯玉祥这边，离谈拢也总差那么几步。当时在建安村与太原城之间奔走，极力鼓吹冯、阎联合倒蒋的，主要是李书城和王鸿一。李书城在唐生智倒蒋失败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冯、阎身上。王鸿一乃山东名士，平生喜谈王霸之术，讲起类似话题也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二人为冯、阎设计的愿景是，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主党，在北平另组新政府，最后消灭蒋政权。

应该说，阎锡山对这一框架基本还是认可的，但他却舍不得放弃冯玉祥这一筹码。因为他认为如果把冯玉祥放在身边，至少可进行操纵，若纵虎归山，以后就难以控制了，特别是不能保证西北军不借机进行报复。

阎锡山不放冯玉祥，联手就无从谈起。被软禁中的冯玉祥对此又气又恨，但他知道现在还不到真正跟阎锡山翻脸的时候，只有先把阎拉下水，自己才有出路。至于和阎的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迟——打倒了蒋，回过头再来收拾阎，就要容易多了。

为了把阎锡山拉下水，冯玉祥想到了要用一个人，定一条计。

仇则不共戴天

冯玉祥想到的这个人就是鹿钟麟。

冯玉祥向来爱战将而不重战将，但他对所谓儒将则是既爱又重。西北军中有两个公认的“儒将”，一个是宋哲元；另一个就是鹿钟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冯玉祥，所以很得冯玉祥的欢心，可惜他自己运气不好，在蒋冯战争中因与孙良诚不和，打了败仗，几乎把陕西都丢掉了。

宋哲元没法再用了，得用鹿钟麟。鹿钟麟长相忠厚老实，然而城府极深，为人处世“外方而内圆”。内圆，其实就是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侍尧则吠桀，侍桀则吠尧”。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还可以为上面遮掩。

在模仿冯玉祥方面，鹿钟麟比宋哲元更胜一筹，几乎能做到天衣无缝，其伪善与矫揉造作的功夫，“与冯焕章（冯玉祥）先生如出一辙”。

你可以就此说鹿钟麟“无男儿骨格”。可是冯玉祥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幕僚，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怕他趁机坐大，同时对自己的所有决策也能做到无条件绝对服从。至于什么眼光啦，点子啦，个性啦，都在其次。

冯玉祥对鹿钟麟的欣赏认可程度，甚至超过了石敬亭等西北军中公认的有识之士。韩、石叛逃后，他对身边的很多谋士、部将，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钟麟始终被他引为身边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冯玉祥这样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来津津乐道。有人用嘲讽的语气评论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钟麟字伯

瑞）为其爪牙，补其不足”。

鹿钟麟在蒋冯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已经“离职潜逃”，去了天津租界。乘发生蒋唐战争，蒋介石、阎锡山的注意力转移之机，冯玉祥密召鹿钟麟来建安村面谈。

鹿钟麟得信后，立即化装由天津至太原再转往建安谒冯。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书写了手谕，下令免去宋哲元所兼的代理总司令，让鹿钟麟接替，同时授以远交近攻之计，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冯玉祥已经想清楚了，只有把阎锡山逼到绝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个生意人的立场和态度，就算阎锡山仍然执迷不悟，那要是假劝真唱，拿下山西，也是大赚了一笔。为此，他将不惜与他曾经无比痛恨的蒋介石、韩复榘、石友三建立暂时的战略联盟。

鹿钟麟奉命回陕后，按照冯玉祥的手谕提出新口号：“拥护中央，开发西北。”随即，他就派代表密赴南京拜见何应钦。代表出发时对联蒋反阎还有些心理障碍，鹿钟麟对这位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出于分化西北军内部的一贯目标，何应钦一见鹿钟麟所派代表，马上便对鹿表示好感，希望他掌好西北军的舵，不要上冯玉祥的当。

从冯玉祥被诳至山西开始，太原就成了倒蒋派活动的中心，各地代表来往之密集，已经到了宾馆都住不下的地步。南京政府看在眼里，对阎锡山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极度反感和警惕。现在鹿钟麟表

示愿意联合起来共同倒阎，何应钦很是赞成，他承诺说：“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

一与南京拉上关系，鹿钟麟即召集众将商讨。大家一致认为，西北军必须以西北为根据地，但是如不除掉阎锡山，不把山西拿到手，则西北军就要永远受威胁，而一旦西北军占领山西，就可立于进可战、退可守的有利战略地位。

冯玉祥制定联蒋讨阎之策，有一半目的是想逼阎反蒋，到将领们这里可就不太一样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的都没这么深这么远。他们对阎锡山恨之入骨，是真的要除掉阎锡山和想拿下山西！

在鹿钟麟等人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长于守、短于攻，西北军在进攻山西时，只要避免打攻坚战，胜算还是很大的。

要避免打攻坚战，就要尽量采取突袭方式。阎锡山对西北军一向有所提防，靠西北军自己突袭比较困难，但若是韩复榘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韩属于蒋系将领，又受阎锡山指挥，参加讨唐之战，阎的警惕性必然不会那么高。这正是冯玉祥指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的原因所在。

可是因为反叛的事，西北军与韩、石之间已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现在一下子要联合他们，人家会干吗?

冯玉祥不能不有所考虑。薛笃弼见状，便提出了一个建议。

一箭双雕

依照韩复榘一直挂在嘴边的说法，他和石友三之所以叛变，并非反冯，乃是因为与石敬亭有隙，才被逼上梁山，走了投蒋这么一条独木桥。薛笃弼认为，既然症结出在石敬亭身上，只要免去石敬亭的本兼各职，请他离开西北军，即可将韩、石召回。

冯玉祥急于施计而行，也没有多加思量，就采纳了薛笃弼的建议。他随即给石敬亭写去了一封密信，说："吾弟热爱团体，兄所深知。今为召还韩、石，不得不请吾弟权且休息一时，以后另有重用。"

石敬亭收到密信后，不跳不骂，心平气和地离开了西北军。

在蒋冯战争后期，若没有石敬亭力挽狂澜，西北军将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西北亦可能不保，他对西北军实有大功。冯玉祥之举引起很多议论，有人说："忠贞不贰的免职，叛变投降的召还，像这样倒行逆施，怎能不丧失人心呢？"

韩复榘叛变乃多种因素所诱发，石敬亭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借口，他和石友三当然不会就此重回西北军。不过他们对联合西北军一起打阎却很有兴趣。

对老蒋授意唐生智抓捕自己那件事，韩复榘一直心怀恐惧，他一方面积极进攻唐生智，以图重新获取蒋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重新投奔一个主子。

冯玉祥那里是无论如何不会回去了，北伐前韩复榘和石友三曾投降阎锡山，于是韩复榘便打起了阎锡山的主意。宣布讨唐之前，他专门派人去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拥戴之意，阎锡山也派来亲信杨爱源等人到开封与韩联络。

杨爱源对韩复榘说，蒋介石为人奸诈，把持中央，排除异己，只有北方人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持华北局面，今后才有办法。

韩复榘也装出很坦率很诚恳的样子，竭力为自己过去的变节行为洗白：“我之所以离冯投蒋，完全是石敬亭逼的。他在冯的面前搬弄是非，冯对我越来越怀疑。去年在华阴，冯命我过河压迫你们共同讨蒋，我当时提出异议，几乎被冯枪毙。这都是石敬亭的把戏。我惹不起他，只有躲开他。”

扯完这些陈年老账，他又对杨爱源的话做出回应：“至于蒋介石的阴狠毒辣，我又何尝不知道。如果百公（阎锡山）出来主持华北大局，我是竭诚拥护的。现在河南境内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没有一定的主意，郑州防务现在在第三路（即韩部）的手里，最好请百公来一趟，大家商量一下，即能解决一切问题。”

杨爱源回晋复命，阎锡山当即拨给韩复榘手提机枪五百挺、军饷四十万元，接着便出兵河南，他自己也亲赴郑州督师。

韩复榘存心叛蒋投阎，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阎锡山是吃个鸡蛋还得挑四四方方的人，他对韩复榘这种名声不太好的“二五仔”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而且也不愿冒险突然反蒋，之所以又给钱又给枪，不过是为出兵河南买张门票而已。

韩复榘一个劲儿地抛媚眼，但阎锡山却给他打闷葫芦，见了面总是开口闭口拥护中央。

韩复榘还算是个率直快语之人，不太善于虚与委蛇的一套。在认为阎锡山不够诚实，纯属拿废话搪塞自己后，他立刻感到上了当，对

阎锡山怀恨在心——用杨虎城的话来说，就是跟谁都是做杂牌，难道跟你阎老西儿（阎锡山的绰号）做杂牌就香一些？摆什么臭架子！

石友三也积极参与了打阎计划。他本来也曾派代表来太原联系反蒋，负责接待的赵丕廉见石部经济困难，未经请示，即答应提供一百万到两百万元的经费。阎锡山知道后勃然大怒，坚决不予承认。石友三自然恨阎之心更切。

正当韩、石商量如何对付阎锡山的时候，鹿钟麟所派来使正好到达开封。韩复榘问明来意，并得知石敬亭已离开西北军后，不由得抚掌大乐："好极了，我们正计划着捉老西儿呢。"

韩、石都觉得应该把阎锡山给扣起来，并且认为这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好事：除了能博得老蒋的欢心外，还能以阎为人质，通过以阎换冯，在昔日的西北军伙伴面前挣回一点脸面，取得一些谅解。

韩复榘说："冯先生在山西很受气，我把阎扣起来，请他放冯先生。他一日不放冯，我一日不放他，他尽管不放冯，我尽管不放阎。"

不赏而诛

韩、石跃跃欲试，阎锡山却仍被蒙在鼓里。当他在专车上指挥韩复榘等人断唐部后路时，幕僚突然发现韩复榘卫队人员的数量剧增，怀疑韩复榘有非常举动，于是急忙劝其北返，以免遭暗算。

阎锡山本来也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到郑州后，他就派人常驻电报电话局，检查往来电报并偷听电话。起初，监听电话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风吹草动，阎锡山也就没有把幕僚的话放在心上。

1930年1月14日，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方本仁与韩复榘会商扣阎一事。正巧另外一个杂牌将领王金钰也在阎锡山那里没捞到好处，同样预谋扣阎以献蒋，他给韩复榘打电话商量，韩复榘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更巧的是，阎锡山的幕僚孔繁蔚与王金钰乃莫逆之交，他在王金钰那里打牌，出来小便时就正好听到了这段对话。

无心人说话，只怕有心人来听。孔繁蔚听得汗毛倒竖，急忙找了个借口，溜到专车上去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闻悉，即命副官告诉韩方接待人员：“总司令要安静休息，有事再叫你们。”

接着副官就去跟车站的人讲，说阎命他回去取要紧的东西。车站人员不知就里，便用车头挂了一辆铁闷子车。阎锡山换上便服，携赵戴文、孔繁蔚等人钻进这辆车里，然后星夜出奔新乡，再由豫返晋。

第二天一早，有人才慌慌张张跑来向韩复榘报告：“阎锡山不知为了什么事，昨晚十二点多忽然化装逃走了。”

韩复榘听后甚为愕然，但是不管怎样，事情做也做了。回开封后，他便公开对僚属说：“我要扣阎老西儿的事，你们大概都听说了。因为冯先生在山西受尽了委屈，这次我本想把老西儿扣住，要求他放出冯先生，否则我也不放他，以此报旧日冯对我的恩情。”

说到此处，韩复榘长叹一声：“不料事机不密，让他一下子跑掉了，全怪我说话不留神，真是可惜得很。”

蒋、韩之谋只是你知我知，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脱险后的阎锡山没有傻到嚷嚷得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宣布离开郑州的

原因是：“即日返晋一行，料理晋钞兑现事宜。”同时撤回了原驻郑州的晋军。

事件没有发生之前，阎锡山一直以为自己在算计着蒋介石，没有想到蒋介石也会算计他。这一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

阎锡山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倒蒋的问题。他认为历代统治者在感觉坐稳江山后，都很少能保全其同事及其功臣。蒋介石平定了唐生智之乱，江山比过去更稳当了，可是作为他的功臣，处境却比以前更危险了——要不然自己助蒋平乱，本有大功，为什么蒋介石反而不赏而诛呢?

生意只有是在没有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笃悠悠地做起来，现在连生意人的安全都无保障，如何再计较来计较去？阎锡山咬着牙要倒蒋，并且认定，只要能够倒蒋，一切在所不计，诸如善后、收拾烂摊子之类的事暂时也可不予考虑。

阎锡山的幕僚中本有两派，以赵戴文为主的拥蒋派是多数，但赵戴文等人已经回了南京，留在太原的，除军人外，只有贾景德、赵丕廉、梁航标。贾景德、赵丕廉从辅佐幕主当国家元首出发，一贯主张反蒋，尤其贾景德向来都是反蒋的绝对支持者。这三人中，只有梁汝舟持拥蒋态度，因此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梁汝舟系阎行营办公处处长，电务组就是他的下属机构，电务组所破译的“外电”除他和阎锡山外，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阎对他的信任。正是由于身份特殊，梁汝舟在是否要由自己直谏的问题上比较犹豫。后来他发现徐永昌与他意见一致，便有意

通过徐永昌向阎陈述，可是徐永昌说他是军人，不便主动说话，还是希望梁汝舟本人设法多进言。

梁汝舟只好鼓足勇气，向阎锡山阐述其间的个人利害关系。他认为在唐生智覆灭后，南京政府内部较以前更为团结，说明国内的反蒋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大家研究的都是如何倒蒋，现在好了，连能否迫使蒋介石自动下野都成了问题。梁汝舟分析说，若贸然发动军事倒蒋，无论胜败，阎锡山都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败了的话，将无枝可栖；即便侥幸成功，也是玉石俱焚，不堪设想。

梁汝舟建议阎锡山，趁此助蒋平乱之机，以最大诚意协助南京政府整编西北军、晋军，然后心甘情愿地辅助蒋介石。这样蒋成则阎有功，蒋败则阎可顺理成章地继任大统。“到那时，您虽欲逃避，亦不可得，何必于此时和他角力以争呢？”

梁汝舟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阎锡山。过了良久，他突然问道：“你说我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

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

功臣就算交出兵符，人头也会很快落地，这是古代历史书上最常见的记述。阎锡山怕就怕一旦交出“最大诚意”，蒋介石正好给他胸口上来一颗子弹。

梁汝舟曾被喻为“三晋奇材，秀容拔萃”，对历史也很有研究。他说中国古代皇帝那样残杀功臣，都是为了在自己行将老去时，为子孙

顺利继位铺平道路。现在蒋介石年富力强，对功臣自有驾驭之法，又何必加以杀戮呢？说到子孙继位，时代毕竟不同了，蒋介石再没脑子，也不至于像袁世凯那样干出恢复帝制的蠢事来吧，而他如果因为这个杀戮功臣，更是匪夷所思。

阎锡山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对梁汝舟说，自己的精神有些异常，心里感到烦躁，看见茶樽酒杯就想摔。他还说，这种情形只在辛亥革命前发生过一次，革命爆发后才恢复正常。

阎锡山的思绪已经凌乱了。他明知继续反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如果中止反蒋，前景真的有梁汝舟描绘得那么好吗?

“削藩”的道理，蒋清楚，阎也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时代的四个集团军大佬，只要有一人坐庄，其他三人的日子就注定不会好过。如今冯、李都失势了，阎能明显地感觉到蒋的矛头已经指向他，即使他不反蒋，蒋也不会容许他的势力继续存在下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阎锡山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蒋活动，其实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其中的内幕老蒋完全明白，也迟早会和他清算这笔账。郑州遇险便是先兆。

阎锡山只要一想起郑州的那一幕，就不能不全身打一个寒战。危险哪，若不是王金钰正好给韩复榘打电话，孔繁蔚又正好出来小便，自己的一条小命离见阎王爷也许就只差一层玻璃纸了。

凌乱来凌乱去，阎锡山还是决定反蒋，而反蒋就要准备打仗。晋军将领绝大多数是阎锡山所一手提拔，而且全都对阎唯命是从，基本上是阎锡山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左右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只有时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不同，他虽然也是山西人，但系来自客军，同

时其人非常有头脑和主见，与一般的晋军将领截然不同，其一言一行对山西军政界的影响都很大。

阎锡山主要还是怕徐永昌不同意反蒋，他派人到北平给徐永昌带话：“阎先生教我密告于你，我们要准备与中央摊牌，恐怕有战事，要你去打仗。请您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阴历年过后，即先回太原一趟。”

这是徐永昌第一次听到阎锡山要反蒋。接着，阎锡山为了避免外人注意，又特意让周玳代发电报，邀徐永昌来太原开会。

徐永昌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太原。他先到周玳家中，一见面就问：“有何要事相商？”

周玳还跟他打哑谜：“你猜。”徐永昌脱口而出：“打蒋。”

在周玳予以确证后，徐永昌直接坦露了自己的观点：“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锡山）说来，也不利于打仗。”

徐永昌说，要是不打仗，人人还会像现在这样，争着来吹捧阎锡山，当他是爷爷。可如果打起来，这些人一定又都要向阎要这要那，阎为人又很吝啬，哪能予以满足？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反过来恨他，于是爷爷就变成了孙子。

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打仗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徐永昌很清楚阎锡山的性格缺陷及其弱点，他知道他的“总司令”根本就不能打仗。

如果徐永昌这话让贾景德听到了，对方一定会这样反驳：又不是只有我们晋军打蒋，不还有冯玉祥和西北军吗?

徐永昌原在国民三军，对冯玉祥的认识最为深刻。他以为，冯玉祥在语言和外表都竭力装好人，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手段也很是毒辣。比如冯玉祥平时惯用痛哭流涕的办法来迷惑人，拉近与别人的距离，可是只要有了利害上的冲突，不管亲疏，都会遭其暗算，“多少人都吃过他的亏”。

当初，冯玉祥自统的是国民一军，徐永昌曾亲眼见到他用缴械的方式，将跟着他走的国民二军予以吞并。徐永昌没有跟着跑，才未上冯的当。

以性格而言，阎锡山只适于守财，冯玉祥则更利于打劫。徐永昌知道他的野心非常大，也知道冯玉祥常在背后骂阎锡山“窝囊废”。这样的合作者，能够让人放心吗?

西北军对阎和山西的敌意那就更不用说了：冯玉祥已经被软禁了好几个月，哪有不恨之理。至于其部下，更是恨阎恨得不得了。比如鹿钟麟就常常说要先打阎再打蒋。

无论个人品质，还是双方关系，徐永昌都不认为这种联盟有多么可靠。要是双方协同对蒋作战，到了紧要关头，一旦冯玉祥出什么新花样，阎锡山必然会落得倒蒋不成，反吃大亏的下场。

有哪一个靠得住

即便徐永昌觉得西北军不可靠，估计贾景德也不会就此服输：“总司令”只是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们的同盟军多了，除了冯玉祥，还有

李宗仁、白崇禧、刘文辉，乃至韩复榘、石友三、唐生智，哪一个不反蒋?

对这些“同盟军”，徐永昌同样觉得没有多少相助的价值和作用。说“李白”吧，虽然他们已在广西重夺政权，可是桂军实力与鼎盛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能不能打到武汉都很成问题，加上南北相隔如此之远，实在很难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

刘文辉是川军首领，这时势头也很猛，并且很早就开始派使入晋，与阎锡山商议共同反蒋。问题是四川连自己内部都没能统一，川军也从来没有走出过蜀中，刘文辉究竟拿什么东西来联合反蒋呢?

接着是韩、石，且不说二人起码表面上已投蒋，在郑州还预备对阎下手。就算他们又重新打出反蒋旗帜，以二人已经臭掉的名声，徐永昌也料定，“再过二三年，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

对于唐生智等人，徐永昌更是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唐生智已毫无实力，简直提都不用提。至于其他林林总总的杂牌军头或者说客，都不过是一些没找到饭主满处游飞的家伙，到处诳人骗钱而已，有哪一个靠得住?

徐永昌很恳切地对周玳说：“如果打起来，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担起来，你看这个仗怎么打？我希望开会时你要力主不打。”

当天下午三点，阎锡山将徐永昌召至自己的机要室。徐永昌得知张学良已派代表来太原签字。

如果张学良肯联阎反蒋，徐永昌倒是觉得比其他同盟军都靠谱一些，因此他忙问张学良派来的代表是谁。得到的答复是邹鲁。

邹鲁是西山派成员，当然是反蒋的，可是徐永昌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跟张学良有什么很深的关系，怎么能代表张学良签字呢？换成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还差不多！

面对徐永昌的质疑，阎锡山嗫嚅着说："此一时之志同，即可以道合，用不着有何深交。"说着他又反问徐永昌对反蒋的看法。

徐永昌说："第一不要走打仗的途径；第二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

阎锡山听了很是不悦："要你回来就是和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样说，是不是你认为打仗必败？"

徐永昌直言不讳："张汉卿（张学良）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

阎锡山听了半晌不语，在屋里绕了好一会儿圈子。他转而说只是要准备打仗，不一定就要打仗，如果徐永昌等将领有决心做出最后倒蒋的表示，仅需一个通电，不用打仗，老蒋也只好乖乖下野。

赵戴文已回太原，也参加了机要室谈话。此老头脑一向清楚冷静，对阎锡山的反蒋企图也绝不赞成，但是他刚刚与阎锡山一起经历过郑州之险，又在南京政府担当要职，说话便有些吞吞吐吐，态度不像先前那样坚决。

谈话无果而终。当晚十点，阎锡山秘密召开将领会议。他首先把蒋介石想用经济手段扼杀晋军的情况叙述了一番，接着说："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意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次辰（徐永昌字次辰）你看怎样？"

徐永昌回答说：“我一来就和子梁（周玳字子梁）研究，这仗打不得。我并不是怕打仗，但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接着，他当着众将的面，将对周玳说过的不能打仗的理由又重新叙述了一遍。

通过机要室谈话，阎锡山其实已经知道了徐永昌的态度，他只是不甘心而已。沉默几分钟后，他说：“次辰，你说的也对，但是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

徐永昌规劝道：“咱们可以另想不打仗就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阎锡山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次辰，我倒想出一个不打仗的办法——只有我出洋。”

徐永昌觉得这个主意不妥，问：“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阎锡山回答：“这容易，你们可先对付蒋，如果他逼得你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们可以投降他。”

徐永昌听了脸色全变：“总司令，你要这样说，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

阎锡山见状又道：“次辰，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再商量。”

第二天早晨，徐永昌找到周玳：“我看老总已经下了决心。你也不要再提了（指主张不打蒋）。”

自行车国手

如果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阎锡山则有留人之技。自徐永昌投奔山西后，阎锡山始终没有要求对方取消国民三军的番号，并且还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也就是说他与冯玉祥不同，从人格上对这位部下非常尊重。

士为知己者死。尽管徐永昌并不同意阎锡山的意见，但出于三年多来的公谊私交，他也不能不挺身而出，为阎担负作战事宜。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接下来徐永昌就希望研究一下如何打。可是让他感到烦闷不已的是，阎锡山天天研究的还是打不打。

有一天，徐永昌忍不住对阎锡山说："我说你不要打仗，你非要打不可。我说你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你一定要让我做指挥官。现在我已答应做指挥官了，你要研究怎么打可以找我，若研究打不打，我已说定不可以打，你就不要再跟我研究这个了。"

阎锡山嘴上答应着，可还是天天要来找徐永昌研究打不打。徐永昌都快要被他给逼疯了。每次一谈完这事，就跟害场病一样，过了段时候，徐永昌还真的生了胃病。

就在阎锡山仍纠结于打不打的时候，自编遣会议开始就引发的军队编遣问题重又喧腾起来。大家都知道，第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可是蒋介石却要求把第一集团军与中央分开计算，再外加一个中央区，算成两个单位。

别人才一个单位，还要削减，你有两个单位，还要扩大。这成了助饷之外，引发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最大原因。

可是当初这样的编遣方法，正是阎锡山自己在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他又不能否认，只能眼泪倒回去往肚里流。

哥流的不是泪，是血呀。正好阎锡山已起倒蒋之念，便趁势与蒋介石展开笔战。2月10日和13日，他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戡乱不如止乱，并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以弭争端——以前我糊涂我错了，我都认，可如果你糊涂你错了，也得认！

对于这种突袭式逼宫，蒋介石经历过多次，早就练就了一套金钟罩似的心理素质。他立即复电予以驳斥："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

一石掀起千层浪。随着蒋阎分歧的公开化，南京为之震动，各种谣言纷传。蒋系的政客幕僚都赶紧拿起笔杆应战，除胡汉民、谭延闿等发电报对阎锡山进行责备外，吴稚晖也亲自出马，给阎锡山发去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

吴稚晖说阎锡山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什么戡乱不如止乱，什么下野出洋，都是虚的。"党国破碎，责在戎首"，明说吧，你就是阴谋发动战争的主谋，再不悬崖勒马可就危险了！

蒋阎正式撕破脸，乃是冯玉祥最乐意看到的。冯玉祥观察到了阎锡山态度上的变化，他派秘书嘱告鹿钟麟等人："阎对我方抱留有余地之合作。"还说："你们闹得越厉害，我在此越平安。"

得到冯玉祥的指示后，鹿钟麟即在报上刊登消息，说他愿意按照编遣方案缩编部队，只请南京政府发放西北善后公债两千四百万元。暗中，他派代表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代表熊式辉洽谈真正的条件。

当时中央和地方关于编遣的另一个公开性争议是，二、三、四集团军，也就是西北军、晋军、桂军，愿意按比例裁兵，但是他们希望在裁兵的同时，由南京政府提供一部分军饷。蒋介石则认为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盘，中央也从中收不到税，所以不能助饷。

为了更好地争取鹿钟麟，熊式辉除要求西北军编成十师外，还许诺这十师的军饷由中央关发，鹿钟麟本人还可担任与张学良相等的职务，条件就是让西北军通电反冯。

冯玉祥能够重用鹿钟麟，就是料定鹿钟麟不敢背叛他。西方谚语中将上谀下傲之徒称为“自行车选手”：为了减轻上方的压力，选手要尽量作折腰状，同时为增加车行速度，又必须双腿踢蹬如狂。

鹿钟麟不只是“自行车选手”，他还可以被称为是“自行车国手”。此人对上卑恭顺从，对下高傲苛峻，西北军中人，十之八九都对他抱有微词。显然，如果鹿钟麟要想脱离冯玉祥独自搞一套，别说黄袍加身了，可能连性命都堪忧。

鹿钟麟自然不敢答应熊式辉提出的条件，只能说“西北军官既就中央新职，反冯通电似可不必”。蒋介石那边也认准了，只要你不发反冯通电，官帽有价，绝不免费奉送。

蒋介石和西北军一度势不两立，但现在大家毕竟可以谈条件了。倒是曾经关系不错的蒋阎之间却越搞越僵，双方开始互相攻讦，电报措辞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

在短短十八天内，阎、蒋围绕“治党治国的原则”“统一之方式”“国民党三全大会之评价”，往来电文达到二十一封，平均每天就有一封。阎锡山提出要“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

而蒋介石则坚持军队“惟党国之命是从”，“若割据称兵，实为内乱”，中央“惟有讨贼戡乱之一途”。

随着阎蒋笔战进入白热化，阎锡山作为反蒋核心的重要性也愈加突显。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从老牌的西山派，再到新晋的改组派，均从平津频频发出函电，敦促阎锡山领导反蒋，新桂系和各路杂牌军头也分别派代表到太原劝驾。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军。鹿钟麟等全体将领一面暗中和南京政府谈编遣的条件，一面推庞炳勋为总代表到太原拥阎。仍被软禁的建安村的冯玉祥更表示，只要阎锡山肯领导反蒋，自己唯命是从，愿竭诚拥护阎为全国军政领袖。

在笔战中被蒋介石弄得脸面全无的阎锡山由衷地感到高兴：泰山虽高，尚有天山，寰海之外，还有渤海，你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看到全国上下对我的支持和拥护没?

就在阎锡山自我安慰的时候，一封有关西北军的密报送到了他的案头。

快来了

自郑州突袭失败后，冯玉祥、鹿钟麟并未放弃原来逼阎反蒋或者直接拿下山西的计划，同时仍与韩复榘、石友三保持着密切联系。

蒋阎笔战期间，韩复榘派代表来太原观察形势，代表向他报告：“冯先生（冯玉祥）仍在建安村，每日由晋方送以鸡鸭等好食。”韩复榘认为这都是前期逼阎带来的好处，对倒阎信心更足，他致电鹿钟

麟："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永远不会太平。"

鹿钟麟对韩复榘的态度大加称赞，并且在复电中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

对于联合攻打山西，韩复榘表现积极，石友三也不惶多让。因为他认为可以伺机取得一块自己的地盘，免得再跟个乞丐一样找韩复榘讨饭吃。

鹿、韩、石共同商定："韩、石会攻天津，我军（指西北军）相机进袭太原。"按照这一办法，石友三已经开始移动部队。

所有这些往来电报均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截获并译出，并密报给了阎锡山，阎锡山闻之大惊失色。

冯玉祥在太原的代表不知道这件事。薛笃弼、邓哲熙仍在到处活动，和晋方要员们会商冯、阎合作反蒋的办法。有一名要员实在忍不住，突然极为愤慨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谈什么合作？你们卖的是什么假药？再谈下去，你们西北军就占了太原了！"

薛笃弼等人听了非常诧异，连忙追问究竟。那位要员气呼呼地说："你们还是回建安村问冯玉祥吧！"

代表回到建安村后，冯玉祥一听，就知道逼阎反蒋的计划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懒驴终于要被逼得上磨了。

他让薛笃弼直接面见阎锡山，并带话给阎锡山："第一，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第二，我同阎先生在反蒋的问题上会合作到底。第三，

事态紧急，请阎先生相信我，放我回去，我去说服他们（指鹿、韩、石）。”

冯玉祥还说：“现在他们已向山西出兵了。如不相信我，顶多就算我带领他们打山西，而我冯玉祥绝不是那样背信弃义的人。”

冯玉祥的信用早就不知贬值到哪个角落里去了。问题不在于冯玉祥的信用，而在于阎锡山已无路可走：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谋划反蒋活动，且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果他再不迟迟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真的联合起来向山西发动进攻，他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

2月26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拜会冯玉祥。那时阎已很久都对冯避而不见，这次见面不免又要大演苦情戏。两人抱头痛哭了一番，一如冯玉祥刚刚到山西时候的情景。

冯、阎在室内密谈了两三个小时，随后共进午餐。吃完饭还来了个歃血为盟，在李书城、王鸿一等人的见证下，二人誓言：“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阎锡山临走时，约定后天早上八点再来建安村一趟，将冯玉祥迎至太原。

眼看反蒋一事木已成舟，徐永昌的心情极为沉重。在贾景德公馆，他看到庞炳勋、薛笃弼等西北军的说客仍在不停地怂恿贾景德，让贾景德鼓动阎锡山迅速反蒋。

冯玉祥裹挟着阎锡山反蒋，山西必然失败，西北军也讨不着好，这是徐永昌的基本认识。他对庞炳勋说：“你们是成功了。你们本来是

没有办法，现在则有了办法，不过你们将三集团拖下水，结果必是弄得一齐没办法为止。”

庞炳勋“矮黑而陋”，其外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宋江，但论气度格局，却与宋公明相去甚远。他对徐永昌的话似懂非懂，也没有徐永昌那种大格局和大视野，一时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只好嘿嘿一笑，算把尴尬场面应付了过去。

2月28日，是阎锡山说好要迎冯回太原的日子，但上午八点就快到了，阎锡山仍迟迟没有现身。冯玉祥有些急了，他问晋方驻建安村的接待人员：“阎总司令怎么不来？你打电话问问！”

接待人员打过电话，告诉冯玉祥：“已经起身，快来了。”

当天，冯玉祥被阎锡山迎至太原。贾景德、徐永昌、周玳、庞炳勋以及各方面代表都出城迎接。

冯玉祥被招待在太原的另一名胜区傅公祠居住。下午，阎、冯与各军代表会议，会上一致公推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冯、阎一起商讨了共同打蒋的计划，阎锡山又将预先拟好的讨蒋通电文稿念给冯玉祥听，征求对方的意见。冯玉祥听罢奋然而起，拍案连呼：“痛快呀！痛快呀！这真是一篇理直气壮的好文章。”

在潼关的鹿钟麟等人收到消息后还是不太放心，他们致电西北军在太原的代表：“日来谣传纷纷，有谓冯公已出洋者，有谓已遭不测者，军心摇动堪虞。”

鹿钟麟希望阎锡山能将冯玉祥送至潼关，或至少让冯在风陵渡照个相，以证明确实已获得人身自由。冯玉祥让代表复电：“这话暂不必说。”

不是冯玉祥不想回潼关，是阎锡山还不肯放人：一则冯玉祥本身的信用成问题，他怕冯回陕后不忘前嫌，对山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二则他还想在蒋进一步施压时，再利用冯玉祥做做戏。

覆水难收

只要阎不让步，蒋就会继续施压，而蒋阎笔战也就不可能从弥漫的硝烟中挣脱出去。

3月1日，南京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开幕。全会做出决议，特派张继、赵戴文等人到山西对阎锡山进行责问，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过脑子的乱发议论，还是真的要起兵谋叛?

蒋介石则指责阎锡山出尔反尔：是你自己说要和冯玉祥一道出洋的，最后是你出洋了，还是冯出洋了？编遣会议的提案可是你拿出来的，到底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电各地党部，更是大揭阎锡山的老底：“阎锡山阴险诈伪，不顾信义，所辖兵力又极薄弱，自觉捣乱之不足，反叛之事难成，于是不惜骗出冯玉祥以增其厚其反动声势。阎自谓与冯相携出洋，不过遮掩听闻而已。”

阎锡山不肯相让。3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政府分别发出“江电”，声称：“主张未蒙鉴纳，请开去本兼各职。”

两天后，阎锡山又演起了“携同出洋”的老把戏。在向南京发去的“歌电”中，他说：“此次主张国是，原为止乱，何忍因止乱而起乱。锡山同焕章即行出洋，以明初志。”

为了一个“携同出洋”，蒋介石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亏，甚至对这个词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极度气恼之下，他给韩复榘、石友三发去秘密的“鱼电”：“特派韩复榘为北路挺进军总指挥，石友三为副总指挥，克日向平津进发。”

被截获并破译的“鱼电”又落到了阎锡山手里，阎锡山在上面批了“次陇”二字，让人送给赵戴文看。赵戴文看后哑口无言。

“携同出洋”连一点点宣传的价值都没有了，而蒋阎关系也已恶化至无可挽救，但问题是阎锡山对放冯回陕仍意犹未决。这让冯玉祥的近侍、幕僚们十分焦急，一夕商谈后，他们公推薛笃弼前去催促询问。

薛笃弼到贾公馆拜访贾景德，痛陈冯玉祥必须回军之利以及不回军之害。他还向贾景德表示，自己是山西人，父母妻女都在山西，如果阎锡山肯放冯玉祥渡河回陕，他愿意留在山西做人质，冯玉祥的夫人也可以不随冯回去。

磋商至午夜，贾景德答应向阎锡山进行传达。

第二天早上，薛笃弼到傅公祠见冯玉祥。冯玉祥对他说：“我除倒蒋外没有第二条路，我只为国，绝不因私害公。可请煜如（贾景德字煜如）转告百川（阎锡山），请他千万放心，我是真诚拥护他的。”

薛笃弼听了，又赶紧把这些话捎给贾景德。

阎锡山听贾景德讲完这些情况后，终于下决心释放冯玉祥。赵戴文问道：“你一定要放他？”阎锡山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作答：“不放他，二集团就跑了。”

赵戴文知道覆水难收，遂掩面大哭而去。

在冯玉祥临行前一天，阎锡山用看似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反蒋，使大哥受到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

行家莫提犁把话，冯、阎都是假客气方面的能手，冯玉祥知道对方的这套检讨和请罪只是前奏，下面必有真意。果然，阎锡山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

他还慷慨许诺：“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阎锡山当场送给冯玉祥现款五十万元、手提机枪两百挺、面粉两千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对于阎锡山而言，这样的诚意倒也足得要溢出来了。

说来说去，还不就怕我打你，放心，我不打你就是了。此时的冯玉祥归心似箭，他慨然表示，对于以往的事确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心一德，共同倒蒋。

3月8日晚，明月当空，周玳把傅公祠的警卫和服役人员集合到偏僻地方做冗长训话。本来人们还要为冯玉祥送行，但他害怕夜长梦多，便趁此机会循着墙影走出门外，然后乘着事先预备好的汽车驰往潼关——阎锡山也颇做得出，他还真把冯玉祥的妻女作为人质给留在了太原。

一言堂

得知冯玉祥将返回潼关，鹿钟麟等人的心态极为复杂，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老长官脱离牢笼，西北军残局总算有核心负责了，忧的是随着冯玉祥这个“强势婆婆”回归，驱阎取晋的秘密方案很可能将成为泡影。

冯玉祥和鹿钟麟见面时，首先问鹿钟麟：“今后应该怎么办？”鹿钟麟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

冯玉祥听了就把联阎打蒋的计划说了一遍。忧的事情果然出现了，鹿钟麟暗暗叫苦，便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最好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通个气。

第二天，冯玉祥召开师长以上将领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并且说：“我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我们一定要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与会将领中除一名师长主张讨蒋外，其余人在思想上都扭不过弯来，他们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锡山的亏，受阎锡山的骗，如果不把阎锡山打倒，西北军在西北就难以发展。

尽管这么多人有意见，但没有一个敢说出来。所谓商量、通气，到最后仍是冯玉祥的一言堂。

当然开完会发牢骚是另外一回事。孙良诚在会后就对别人说："我看先生（冯玉祥）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

宋哲元等人的态度要和缓一点，但也认为西北军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不宜马上打蒋。

一句话，西北军将领普遍恨阎不恨蒋，冯玉祥在软禁期间设计的联蒋驱阎计划已接近于弄假成真了。另外，大家通过过去的经验，也都掌握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个性。一般而言，冯玉祥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是个外行；阎锡山则活像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由此可以推测，联阎打蒋纵然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

鹿钟麟的幕僚干脆对鹿说："应坚持拉蒋倒阎，除去肘腋之患！"

他的理由是，如果冯玉祥与阎锡山合作，就算是侥幸胜了，蒋介石可以在退到江南后凭险固守，冯阎联军连长江都过不了。同时，在联合对付的目标暂时消失之后，冯、阎之间一定又会出问题，结果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等于白忙活了一场。

打胜仗还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幸打了败仗，那就更加不堪设想了，到那时，西北军甚至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

鹿钟麟觉得幕僚的话很对，可是看到冯玉祥的决心那么大，这位"自行车国手"又不敢明确提"拉蒋倒阎"的话，怕挨冯的训。他只能将

“拉蒋倒阎”下降为“不拉蒋不联阎”，并在向冯玉祥请示时，拐弯抹角地提出来：“我军可控制在郑州、开封及西南地区，坐观蒋、阎鹬蚌相争。”

冯玉祥不以为然：“我们应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踩了我一脚，我就要踢他一腿。联阎既成事实，就要共同倒蒋。”

冯玉祥的气量其实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大。有一次召见驻宁夏的将领彭国桢，他问对方：“你们知道我这两年在什么地方吗？”

彭国桢回答：“我们知道总司令在太原。”

冯玉祥又问：“你们知道我在那里究竟是做客，还是做囚？”

未等彭国桢答复，他就自问自答道：“我在那里是做囚而不是做客！一个囚犯怎么能和一个执行囚禁的人做朋友呢？你看，将来该怎么办？”

彭国桢说：“没有关系，等咱们打完了蒋介石，回头再去揍阎老西儿。”

冯玉祥点头赞许，认为深得己心。他也拿这一套来教导其他仍然心存疑虑的将领：“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骂战

与西北军将领对联阎打蒋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相一致，冯玉祥的幕府中也以倒阎派为多数。倒阎派认为：“阎言万不可信。阎若反蒋，必

在危害我军之后，总座（指冯玉祥）往事，可为痛哭！”

有一天，冯玉祥召谋士张文穆到潼关谈话，询问他对时局实际就是倒蒋的看法。张文穆进言：“现在的时机还未成熟，不宜劳师动众，操切从事。”

当时陕甘两省连年遭灾，旱荒不断，饿殍遍野。张文穆主张应首先设法救灾，以纾民困。他还建议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通过修筑公路、开采矿藏、兴修水利、设立工厂等途径，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

张文穆预计，只需一两年的时间，西北便能缓过劲来，到时如果倒蒋，则胜算更大。同时，他也有着与晋军徐永昌一样的想法，即倒蒋必须联合国内一切反蒋势力和中间势力，尤其不能忘记联合关外的张学良。

冯玉祥听完含笑道：“张先生所说甚好，可是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到胡匪儿子（指张学良），何足介意。将来北京新政府成立后，给东北方面一两个阁员就行了。您且看我，不出一个月，就能直抵浦口，活捉蒋贼。”

见冯玉祥听不进逆耳之言，张文穆只好说：“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最好是迅速胜利，早日结束战事。万一旷日持久，就怕东北方面起而乘其敝，终属可虑。”

冯玉祥不以为意，连连说：“张先生不必过虑，张先生不必过虑。”

自此，西北军不再与南京政府就编遣问题进行明里暗里的谈判，反蒋态度昭然若揭。

冯玉祥回到潼关后，他的谋士刘骥作为常驻代表，负责与阎锡山接头，并每天向冯报告各方情况，使用的密码本为“菊密”。实际上，“菊密”早就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所破译，但冯玉祥和刘骥并不知晓。

刘骥在太原拟就讨蒋通电，他随即给冯玉祥发电，请“阅后由潼关太原两地同时拍发”。电报被电务组提前拿到后，梁汝舟按照阎锡山的意思，将“太原两地”抹去，改成“有线无线”四个字，这样全文就变成了“阅后由潼关有线无线同时拍发”。电务组则据此重改电码，然后发给了冯玉祥。

阎锡山卖弄机巧，在仍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同时，又有意为冯玉祥招仇恨。果然，潼关的讨蒋通电一发，蒋阎笔战马上延伸至蒋冯笔战。

3月13日，吴稚晖致电冯玉祥，称冯虚悬爱民之志，实质不过做了阎锡山的傀儡，同时劝他摒除干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投入建设——你有这闲工夫闹事，多救济一下大西北的灾民吧！

冯玉祥接电后大怒，他自认熟读《三国》，又嫌幕僚写的文章太过文雅含蓄，便亲自执笔，用《三国》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笔体，草拟了一封复电。

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老冯游戏笔墨，写来甚是酣畅淋漓，在他的想象当中，吴稚晖一读之后必然会气满胸膛，然后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可惜的是，吴稚晖的脸皮并不像王朗那样吹弹即破，也就不可能发生被骂死的情况，反过来，老冯自己倒很快就被动起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他与张布雷等笔杆子不同，笔战其实不是他的真正强项，他最擅长的还是打嘴仗，“放屁”乃是他的口头禅。冯玉祥亲自上阵来吵嘴，恰好点燃了他急欲喷发的肾上腺素。

吴稚晖先是提笔起草一封复电，将正在得意扬扬中的冯玉祥一顿臭骂。于是，起初讲究论经据典的笔战迅速发展成以人身攻击为主的骂战，“老少年”在其中如鱼得水，好不惬意。

在吴稚晖的诸多“骂作”中，有一篇名为“从东说到西”的文章最为有名。在这篇大作中，他从东到西，将参与反蒋的三个大人物冯、阎、汪全都拎出来骂了个遍——

冯玉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要东张西望，说的就是你。你还不要会错了意，你虽有曹操的野心，可注定取得不了曹操一般的功业。你问我这是为什么，简单，因为你是“草包出身”！

阎锡山：治世的村中魑，乱世的狐狸精。我给你算过命，你终有一天会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中！

汪精卫：治世的好阿团，乱世的泥公仔。别看你自诩什么党的领袖，没用，成不了多大的气候，最后只会跌进汤罐里，越弄越糟！

……

总有一个投对的

在“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前，自然谁都不甘心就范。冯玉祥一离开太原，阎锡山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已将冯送回潼关，以后凡涉及冯的事请和冯直接电商，他本人不再负从中调解之责。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阎锡山紧接着又发了一份伪称要下野的通电。通电一发，西北军将领、晋军将领便先后联名发电，坚决对阎锡山进行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奋斗到底。包括西北军、晋军、张桂军在内的国内57名将领更联名通电，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他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一次人气的大测试，蒋介石所面临的局势突然变得相当不利。蒋介石急忙再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

何成浚首先找到周玳，对他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战事。”周玳早有所备，他根据阎锡山交代的意思回答：“只要发清平津卫戍部队的欠饷，并且保证以后按月发放，同时解决山西省发行公债的问题，我可保证不会发生战事，不然就很悬了。”

何成浚等人又去找阎锡山，阎锡山也如此说了一番。

都到了这个时候，阎锡山的生意人本色依然不变，他记挂的还是钱的事。何成浚等三人见状，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并由吴铁城回南京向蒋介石当面进行报告。

吴铁城回南京后给太原发来电报：“委座承认这些条件，可能会照办。”

方本仁、何成浚把电报送给阎锡山看，阎锡山看过之后仍满腹狐疑：什么叫“可能”？得“一定”！让蒋介石亲自打个电报过来才能算数。

过了几天，蒋介石按照要求发来电报，但电报上却没有对此做确切答复。阎锡山十分生气，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

方、何知道阎锡山对蒋不满，赶紧说：“我们回去再与委座谈谈这个问题，看看情况。”

方、何一走，劝阎打蒋的各方代表们便又活跃起来，其中以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新桂系的代表潘宜之怂恿最力。

周玳深恐阎锡山上了这些人的当，劝谏他说：“你不要听这些人的话，冯这人极不可靠，你忘了方顺桥的事吗？这仗是打不得的。”

阎锡山听了摇摇头：“你不能老是看过去。要知道蒋介石几次要收拾冯，冯对蒋恨极了。现在要是和我共同打蒋，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阎锡山认为，自潼关首发讨蒋通电后，冯玉祥在反蒋上已无退路，不太可能再变卦了。

对于今后如何拿捏冯玉祥，他也显得成竹在胸：“（冯玉祥）好贪眼前的小利，只要我们在物质上能满足他的欲望，哪能再生半途捣乱之心呢？他固然很狡猾，打完蒋以后可能会捣乱，但他是个老粗，没有远见。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你不必多虑。”

包括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内，各方反蒋实力派的兵力加一起，要比蒋介石的兵力大一倍有余，阎锡山据此认为准能打垮蒋介石。当务之

急就是赶快把这些实力派都拉拢到一块儿。

韩复榘、石友三是谁都想要的。在正式表明立场之前，这哥儿俩就预先进行了商量，商量下来，认为蒋阎的势力都很雄厚，胜负难料，为将来计，两人应各投一方。这样无论蒋阎之间谁胜谁败，两人中间总有一个投对的，到时仍能互相接济。

韩复榘厌恶阎锡山，选择拥蒋，石友三也不喜欢阎锡山，可是因为浦口之变，他更怕蒋介石不容，所以还是选择了拥阎。

石友三派代表来太原联系。阎锡山认为石部实力相当雄厚，而且军队驻扎地河南新乡又正当要冲，若关系处理不好，将来打蒋会有不小的障碍，于是就派赵丕廉去与石友三洽谈。

以前赵丕廉曾许诺给石友三提供资金，可因没有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事后又被推翻了。这次他多了个心眼，特地就此向阎锡山请示。阎锡山给了句话："石如要款，你可斟酌答应。"

赵丕廉认为这是放权让自己看着办的意思，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洽谈结果很好，石友三提出打蒋的代价是八十万元，赵丕廉觉得这个价格尚在尺寸上，不算离谱，就当场应允下来。

谁知赵丕廉回晋复命时一谈到许诺的这笔钱，阎锡山的脸就拉了下来，他很不高兴地对正好也在场的周玳说："咱们的代表一到外边就做起皇帝来了。"并斥责赵丕廉："你先回去吧！"

阎锡山是嫌给石友三的钱太多了。过了几天，他怕石友三有变，又派别的代表与石友三联系。

石友三对此很生气，但是韩复榘派人对他说：“你已与蒋决裂，就不能再和阎翻脸了。你还是应该派个代表去见阎，商量打蒋的事要紧。”

石友三听了认为有理，这才勉强与阎恢复联系。按照双方重新商洽的结果，“开拔费”由八十万元降至五十万元，阎委任石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外，并将山东省主席许给了他。

除石友三外，阎锡山另外还以河南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等未来虚拟的官帽为饵，拉拢了万选才、孙殿英等其他杂牌军头入伙。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张学良，那个曾经被蒋、冯、阎、李逼到关外，如今却足以左右南北情势的人。

举足轻重之势

阎锡山所谓邹鲁代表张学良签字一事，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整桩事情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论政治远见，阎锡山比冯玉祥要强多了，他可不认为“胡匪儿子”不用介意，而且也了解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实力。早在与蒋介石发生笔战之前，阎锡山就让邹鲁携带一封电报稿去沈阳，以征询张学良的意见，而这封电报稿就是阎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的那封通电。

鉴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所起争执，主要来自对苏交涉，阎锡山还答应，一旦将来组织起反蒋政府，外交部长可由张学良推荐。

可是直到通电发出，邹鲁别说征求意见，根本连张学良的面都没能见着。

阎锡山只记得蒋、张由对苏交涉引起了纷争，其实那段故事早就已经翻篇了。蒋介石岂能不知道东北军对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除了在日记中发泄发泄外，他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开罪张学良，反而能迁就便迁就，能妥协就妥协。

在与张学良的使节莫德惠谈话，并在日记中发了一通牢骚后，他马上就给张学良发了一封长电，以很委婉的语调阐述了中央在对苏问题上的办法及用意，并在文末嘱咐张学良推荐赴苏代表以及外交部次长人选。

早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就强调要用外交方法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除了在北平密谈中对张学良进行积极拉拢外，又在1929年冬派吴铁城赴东北，对东北军政高层进行宣抚。

吴铁城不是首次来东北，东北易帜就是他的杰作，也是他一生最引为自豪、最为骄傲的经历。当年他曾遍访东北各地，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那时正是东北人心惶惶之时，吴铁城的低姿态和好口才立即博得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界的好感。

再赴东北，吴铁城主要就是为了抚平东北军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所受到的委屈。当年南京政府首颁青天白日勋章，用以奖励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吴铁城代表南京政府，将第一号到六号勋章分别颁发给了张学良等六名东北军将领。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敌意由此少了很多，不过他仍希望与阎锡山站在同一阵线，以便在对蒋问题上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蒋唐战争期间，张学良曾和阎锡山一起发出联名通电，宣布拥护中央统一。

蒋唐战争结束后，当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的力量已经加强，而阎锡山的威信反而降低了时，曾对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开始有意识地在蒋、阎之间选择不偏不倚的立场。蒋阎关系的破裂，对他而言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他乐得不参与其中，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这就是他迟迟不肯接见邹鲁的主因。

闻知邹鲁不得其门而入，阎锡山又派梁汝舟出使东北，并且对他说："中止反蒋，对各方面牵制掣肘甚多。冯先生（冯玉祥）昨日派人来说，反蒋是正义，不能以利害定行止。我看你还是去沈阳走一趟吧。如能使东北加入反蒋行列，则希望大些。"

梁汝舟回复："我的意见，义不容隐而不言，至于最后决定，当然是您的事。既然决定继续反蒋，我就起身赴沈阳，并以迅速为好。"

邹鲁只是不为南京政府所容、到处游说的一个无主政客，梁汝舟却是阎锡山身边的要人，可直接代表阎锡山的意志。张学良自然不能再简单地将这位山西来使拒之门外。他接见了梁汝舟，并且说："我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我。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

张学良所说的老前辈，是指和他父亲张作霖同一辈的东北军元老，如张作相、杨宇霆、万福麟、汤玉麟。之前，杨宇霆因被主所忌，已遭到诛杀，张学良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由于他上台

系得到了“辅相”张作相等人的支持，因此仍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的意见。

过了几天，张学良来到梁汝舟下榻的寓所，对他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思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

话说得这个份上，梁汝舟不可能再勉强人家，只得动身返晋。

梁汝舟成为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达沈阳并得以与张学良会晤的人。五天后，南方的方本仁才奉蒋命来到沈阳。

主张公道

方本仁曾是北洋政府旧人，做过江西督军，传说和张作霖还有金兰之谊。方本仁自然是要劝说张学良拒阎拥蒋，但因为已被梁汝舟捷足先登，此行收效不大。

蒋、阎发生笔战时，张学良采取的方式是通电呼吁和平。蒋、阎都给张学良发了复电，阎锡山在复电中说：“我主张戡乱不如止乱，正是为呼吁和平。”蒋介石则声明他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

虽然张学良在通电中没有明显偏向于任何一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电文中却把蒋、阎同等看待，称为“介、百二公”。显然，这就是张学良所说的实际偏向于阎方的“善意中立”。蒋介石因此在复电中专门叮嘱张学良要仗义执言，促阎悔悟。

正是看到张学良在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阎锡山又增强了拉张的信心。阎锡山对张学良的估计是，张学良是少年派，子承父统的威力还相当大，这个年轻人不太容易抓住。不过张学良在关外因受到日本的控制和威胁而头疼，因此也一直有向关内发展的趋向。

张学良要向关内发展，首先要进入的区域便是华北。阎锡山认为，如果他提出关外东北各省和关内黄河沿岸各省实行统一合作，一定可以引起张学良的兴趣。因为东北华北统一合作，并不就意味着反对南京政府，而是可以视为“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同样张学良也不需要动用东北的兵力，从他的立场和利益考虑，应该可以接受。

阎锡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主张公道”。所谓“公道”，按照他的解释，就是要大家为公，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共同解决问题。不管到哪里讲话，他张口闭口总是“主张公道”或“主持公道”。口头如此，公文上也最喜欢用这四个字，甚至后来出师南下的晋军士兵都戴着“主持公道”的袖章，因此有人将阎锡山戏称为“主张公道的将军”。

阎锡山用以抓住张学良的办法，就是首先由阎领衔，冯、张副署，共同发表一份通电。这份拟好的电稿发至沈阳后，阎锡山对周玳说：“张汉卿（张学良）可能会同意照办。此电如由沈阳发出，力量就大得多了。张如能参加打蒋，那么我们就既无后顾之忧，还能增加一股很大的生力军。”

在阎锡山看来，要是张学良能参加打蒋自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只要他能采取“主张公道”的态度，站在阎、冯一边说话，就可以解决一大半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见方本仁、何成浚在阎处铩羽而归，又改派赵戴文持自己写给阎锡山的亲笔信，由南京赴太原，再度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有兵刃的气壮，无家伙的胆虚。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赵戴文此行威风了不少。他一到太原，立即见阎，并且声色俱厉地对阎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忸怩着说："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谈。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还没等阎锡山说完，赵戴文就打断了他的话："委座（指蒋介石）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阎锡山尚未能回过神来，贾景德和薛笃弼恰好来到了阎府。这二位并不知道赵戴文回晋，只是有事找阎，没承想一进门就撞上了怒气冲冲的黑煞神。

贾景德虽然平时也雄论滔滔，但正所谓"蓝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他怕就怕遇上赵戴文。过去十多年，赵戴文都住在阎锡山的督军署里，结果贾景德就不敢踏进督军署半步。贾、阎商谈，只能利用一条仅通两人的电话以交换意见。

作为阎的主要幕僚，赵、贾应该说对阎都无二心，但在拥蒋还是讨蒋问题上，态度泾渭分明。赵戴文是明知阎不是蒋的对手，不愿阎因触龙须而遭不测之祸，贾景德则一心想着要辅佐阎成为国家元首。因此之故，两人更不相能，几乎到了有你无我，有赵无贾的程度。

一看到贾景德，赵戴文便气势汹汹地拿手杖指着他说：“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薛见势不妙，急忙落荒而逃。逐走冤家对头后，赵戴文更加精神抖擞，他接着规劝阎锡山：“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

荒唐啊荒唐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起，赵戴文已在南京待了一年多，他了解蒋介石的实力：“他（蒋介石）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可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吗?他们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

赵戴文对赶集似的跑来太原的说客最为不屑：“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给赵戴文这么一敲打，阎锡山讨蒋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准确地说，是被吓住了。他随即电告张学良暂时不要发布讨蒋通电。

对于要不要列名于三人联衔的讨蒋通电，特别是还要由关外发出，张学良也正处于犹豫彷徨之中。他固然不肯冒险，可是如果冯、阎真的停止反蒋，就怕面前的跷跷板失去平衡，自己在与蒋的关系上重新处于不利位置。

恰在左右为难之际，阎锡山来了这么一个电报，让张学良心里更加没底。他不知道阎锡山究竟在捣什么鬼，难道蒋阎又和解了?

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奉命到太原察看动静，并重申张学良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以便万一蒋阎真的和解，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结果王树翰去了一看，居然是这么一回事：一心要做反蒋领袖的阎锡山被人几句话就给吓尿了！

荒唐啊荒唐，最荒唐的不是别的，是阎锡山竟然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

张学良闻报，便顺势复电阎锡山，称这份联衔电稿尚有需要商酌的地方，因此不必急行，等彼此酌定后再如何如何。

晋军将领在惊疑不定的同时，也都为"总司令"的窝囊之举感到脸上无光。周玳跑去问阎锡山："这是干什么？"阎锡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吓尿了，勉强找了个理由说："这是缓兵之计，是应付省党部的。省党部见报，必然告诉蒋，这就会稳住他的心，不再做积极准备。"

周玳听了，知道阎锡山这么说是纯粹为了给自个儿遮脸，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徐永昌看到阎锡山将谈话登报后，也急匆匆地找到周玳，一见面就说："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

徐永昌和赵戴文的意见原来的确是完全一致，但那还是在放冯玉祥回陕，或者说决定打不打之前。现在冯玉祥已经回陕，蒋阎也已经决裂，"打不打"早就变成了"如何打"，这时怎能再轻易动摇决心?

赵戴文虽然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但作为一个文人本质的政客，有时亦不乏腐儒之见。在徐永昌看来，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不是不知道阎锡山起兵在即，已难以勒住缰绳，他是故意安排了一场阴谋：先以造反的罪名吓住赵戴文，再通过赵戴文吓住阎锡山，这样无论阎锡山最终出兵与否，最后对内对外的威信都将一落千丈。

除了影响威信外，徐永昌料定，在蒋阎决裂之后，蒋介石必然已抱定一劳永逸地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的决心。若是山西方面就此软下来，让蒋介石得寸进尺，各个击破，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过河的卒子难回头。到了这个阶段，徐永昌表现得义无反顾。他对周玳说："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指阎锡山）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玳作为代表，向阎锡山陈述了徐永昌及各将领的意见。阎锡山听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入府进行详细商讨。

各方面代表闻知因为赵戴文来晋，阎锡山在讨蒋上又产生动摇，也纷至沓来，对阎进行游说。

这个攻击赵戴文："赵次老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蒋介石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连走路都予以照顾，如出门口和上下台阶，蒋介石必亲自扶持，赵次老受宠若惊，早就迷糊了。他不晓得这是蒋介石惯于使用的虚伪手段，所以他对蒋也就忠心耿耿了。"

那个让阎锡山放宽心："蒋的内部情况，决不是铁桶子，除了少数嫡系之外，都是同床异梦。至于那些杂牌军队，更不会为他卖死命，

千万不要再犹豫。”

阎锡山至此才拿定了讨蒋的最后决心。他对王树翰这样解释：“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所以仍请汉卿（张学良）支持。”

你以为讨蒋是儿戏吗？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对他缺乏尊重，纯粹在耍他玩，因此内心十分不满。针对阎锡山“照前进行”的要求，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联络张学良的大事，就这样让赵戴文给贻误了。阎锡山悔恨交加：“唉，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

一片大好

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虽未能改变山西联冯讨蒋的结果，但却为他自身在拉张的竞赛中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隙。方本仁在2月底再到沈阳，自此一直到东北军入关，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驻于关外，除负责搜集北方情报外，也从未放弃对张学良进行拥蒋的游说。

此时蒋氏幕府中已产生出一个观点，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张学良。在这一观点上，吴铁城和杨永泰基本一致，吴铁城凭借两赴东北的经验，更认为如果像方本仁那样，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去打动东北君臣是不够的。

3月中旬，吴铁城第三次奉命前往沈阳。这一次，他是在花钱方面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同意后才成行的。一到沈阳，吴铁城并不急于对张学良进行说项，而是整日在所下榻的饭店里与东北军政要员们欢宴赌博。

东北军政界赌博之风十分盛行，上至张学良，下至一般官员，几乎没有人不打麻将、玩牌九，而且赌资不小。吴铁城与张学良的重要幕僚顾维钧、汤尔和等人一起搓麻将，输赢常在数千元之巨。

吴铁城是麻将桌上的高手，也常常是当仁不让的赢家。如果那天他赢了钱，除留下五百元作为酒宴开支及赏钱外，其余全部退还；而一旦输了，则痛快掏腰包付账。

有一次吴铁城举行宴会招待东北要员，一共开了十几桌。饭后打麻将，他在每张桌子的四个抽屉里各放两万元，给要员们做赌资，输赢在所不计。

吴铁城和方本仁，一个花钱，一个动嘴，加上阎锡山自身在讨蒋上的前后反复，使得张学良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对阎“善意中立”慢慢转向完全中立。

一股规模空前的反蒋浪潮在中原大地上呈迅速蔓延之势。自阎锡山发出讨蒋通电后，各方反蒋将领立即联合发表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南宁同时宣布就职。随即阎、冯一再电催张学良就副总司令职，但张坚守中立，未予理会。

当战火铺开，河南成为反蒋联军第一个要杀入的区域。之前冯玉祥多次联络韩复榘，希望韩复榘能够一道参加他的联阎反蒋行动。

韩复榘则已抱定了反阎拥蒋的念头。在致冯玉祥的密电中，他列举了阎锡山过去对不起西北军的种种旧事，说明自己为什么在郑州会有“扣阎之举”，言辞之中，仍对那次突袭的失手表示惋惜：“惜事机不秘，致阎走脱。”

韩复榘坚持“如若讨阎，愿为前锋”，但如果是附冯打蒋，他是绝不愿意干的。与此同时，他又不想与西北军作战，除了多少有些顾念旧情外，怕部下倒戈投冯是主要原因。为此他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至山东境内抵御晋军。

蒋介石认为韩复榘是一员悍将，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强，以此在山东抵挡晋军应该是合适的，于是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事实证明韩复榘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在率兵东撤时，麾下一个骑兵师乘机脱离队伍，回归了西北军。

随着韩复榘东撤，河南空虚，西北军兵不血刃，顺利进占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

至4月中旬，全国反蒋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阎、冯的几大盟友，南方的新桂系虽然受到广东粤军的牵制，但在讨蒋上已做好了军事准备，说出发就能出发。汪精卫则给予了阎、冯极大的政治支持，明确同意在讨蒋上与阎、冯进行合作，共襄盛举。

只有东北的张学良还没什么动静，不过也答应可以将武器弹药卖给阎、冯。这表明只要形势一直好下去，东北军入兵讨蒋绝不是不可

能发生的事。

阎、冯由此信心大增。有人在太原写了一首诗，用以描述阎锡山的心情：漫多晋北望江南，云气盘空剑气酣！云里乱穿关外月，几时飞过太行山?

冯玉祥同样激情澎湃，他对幕僚说："这次行动，我们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政治上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先入关中者为王

阎、冯一致认为大举讨蒋的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瓜熟蒂落，就应该积极准备进攻了。5月1日，两人会于新乡，之后又同车抵达郑州。

到郑州的第二天，阎锡山即举行军事会议，确定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进攻目标，分三路发动进攻，其中晋军主攻陇海线、津浦线，西北军主攻平汉线。

会后，有幕僚对冯玉祥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

在很多人心目中，晋军善于打防守战，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却缺乏经验，之所以要包下陇海、津浦两线，只不过是想"先入关中者为王"罢了。

不过冯玉祥没有计较，他对幕僚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这是阎、冯最齐心的时候。之前，西北军驻天津的代表经太原返回潼关，沿途见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刷的许多旧标语仍然残留着，比如"打倒西北叛逆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于是便给刘骥发去电报，请他转告山西方面予以除去。

这份电报被山西电务组截获。尽管山西省、县的国民党党部早就被查封解散，但阎锡山看到电报后仍然很重视，他当即限令各县县长在三天内将旧标语洗刷干净，尤其是对公路两旁、车站附近等显要地段更要派专人督办，绝对不准再留下痕迹。

等到刘骥去找阎锡山交涉时，事情早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

5月6日，郑州会议结束，阎锡山返回太原，冯玉祥亦回洛阳。

临行前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

阎锡山的合作态度让冯玉祥十分满意，对前途也表现得越来越乐观。一回到洛阳，他便把西北军主力集中起来，举行阅兵誓师。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阅兵过程中，冯玉祥率领作为阅兵官的将领们骑马绕场一周，对以营为方队的各部进行检阅。某部军容较为整齐，引得众人纷纷勒马赞叹：西北军所处环境艰苦，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冯玉祥听到后立即下马，高声问营长在哪里。营长听见呼喊，也赶紧下马驱前行礼。冯玉祥握着他的手说：“老兄弟，辛苦了！”营长按照上级通知的措辞回答：“为民服务，不辛苦！”

接着，冯玉祥回头让随从人员拿出一条俄国毛毯、一只金壳手表，作为奖品赠送给这位营长。此谓树标兵以励斗志。

阅兵已毕，轮到主帅训话。冯玉祥让孙殿英先讲，孙殿英推托不过，只得开腔道：“我是孙奎元哪（孙殿英的名字，殿英是他的字）！这个名字大家大概不常听说，孙殿英大家比较常听说，在河南最响的名字是孙老殿！”

一说“孙殿英”“孙老殿”，台下有很多人耳熟——这不是那谁，盗东陵的盗墓贼吗?

果然，台上的人应承了：“我在东陵偷过皇上家的坟！”

孙殿英原属蒋介石旗下，新近刚刚加入反蒋联军。对于那段“鬼吹灯”的经历，他不仅没有丝毫羞赧之色，还从中就势牵出了叛蒋讨蒋的理由：“我在慈禧太后的坟里，弄出她枕头里的一个翡翠西瓜，一双珍珠鞋。宋美龄听说后（想要这些东西），便许给我装备新武器的一个混成旅，但是东西骗走后，什么也不给（我）。”

孙殿英俨然以下层可怜人自居：“大家想想，我是偷坟劫墓的贼小子，她骗了我还有人味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

在这里，孙殿英把因果完全颠倒了。实际上，是东陵案发后，他自己主动把翡翠西瓜和珍珠鞋拿出来，四处打点贿送，以求逃脱罪

责。现在加入反蒋阵营，跟什么宋美龄骗他也没丁点关系，而纯粹只是出于杂牌们“顺风草、见风倒”的势利本性。

孙殿英固然难登大雅之堂，可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在只要谁肯跟着他一道拿菜刀去砍老蒋，冯玉祥都愿意吸收和接纳。

轮到冯玉祥讲话了。冯玉祥体格比一般人都更胖大魁梧，站在讲台上十分醒目。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出了名的大嗓门，面对十几万人讲话，根本就不用麦克风：“铁喇叭不如我的肉喇叭！”

如何煽动士兵的情绪，冯玉祥比“盗墓贼”孙殿英要内行得多。他讲到此次出征的意义时，着力强调打倒蒋介石不仅是为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救中国——此间的逻辑关系就是蒋介石乃卖国贼，打倒卖国贼自然就是救中国。

说到最后，冯玉祥先把双臂前伸，然后按扇形方向，上下颤动着从队伍的一侧移动到另外一侧，嘴里高呼：“咳！咳！咳！”不知情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军队里负责布道的洋牧师呢。

打蒋就是一切

阎、冯发动中原大战时，孙连仲的部队分驻于甘肃、宁夏和青海，孙连仲本人也不太愿意与中央军作战。接到冯玉祥要求全军东下的命令后，孙连仲起初还想留下一些兵力以控制西北局面，冯玉祥坚决要求他把全部兵力调出来，在电令中甚至还说出了“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这样的话。

孙连仲见状，不敢违令，只好将兵力全部东调。

什么时候得用力气，就是这时候得用力气，而且是全力。历次反蒋，以这一次老冯下的决心最大，铆的劲最足。西北军的总兵力一共二十六万余，被他一个不少地动员到了前线，真正是到了砸锅卖铁、破釜沉舟的地步。

对此时的冯玉祥来说，打蒋就是一切，谁挡着这条道，谁该死。

早在蒋冯战争时，谋士张钫因多次进言，坚持休养生息，反对仓促讨蒋，从而引起了冯玉祥的不满和猜忌，遂被冷落一旁。直到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冯玉祥有所感悟，对张钫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从山西回到潼关后，张钫从冯玉祥那里接到一个差事，让他劝韩、石及地方有关方面参加讨蒋。如果是鹿钟麟那样的乖觉之辈，幕主说煤是白的，他不说是黑的；幕主说太阳从西边出，他绝不说从东边出。抑或是薛笃弼、邓哲熙之类纯靠嘴皮子混饭吃的说客，替幕主拉人乃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既然幕主吩咐下来，岂有不去之理。

偏偏张钫是个有头脑有见识的，且禀性忠直，无论自身处于何种境地，都不会认同太阳从西边出这样的谬论。他从大局出发，不顾冯玉祥已对自己产生了成见和看法，再次去电劝谏：“去春西去，今春东来，旌旗所指，民心惶惑，意若大战将临，大难即至，人心如此，公意若何？”

说完真实的民心民意，张钫又提到了退处西北的计划：“公如登陇，我愿追随，否则不敢苟同。公如不察，与阎合作，必贻后悔。”

劝冯玉祥休养生息的幕僚并不是只有张钫一人，另一位谋士张文穆也提出过相同的意见，但张文穆不敢犯颜，在憋宝似的憋了几句大

实话之后，一看冯玉祥神色不对，马上就知难而退，转而祝冯玉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

张钫的话最直接、最坦率也最容易得罪人，他甚至还在电文中写道：“秦豫荒旱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冯玉祥看到这些话后，认为张钫是在有意动摇军心，不仅不听忠谏，反而勃然大怒。

张钫体察民情，也愿意帮着百姓说话。冯玉祥派孙良诚率部乘车前往河南作战，部队与难民争车，以致发生冲突。张钫见此情景，连忙致电冯玉祥，让他约束军队，以恤灾黎。

冯玉祥一收到电报便跳了起来：这是在败坏我的军誉，阻挠我到河南的大计，杀！

一说杀，马上就有人头落地。冯玉祥的军法官萧楚材支持张钫的见解，并且对冯玉祥的举动也曾有所批评。冯玉祥派人将萧楚材予以逮捕，未经审讯，即活埋于开封。

处决萧楚材的同时，冯玉祥给前敌司令官鹿钟麟下达了一道密令，让鹿钟麟在郑州就地逮捕张钫。

此时西北确如张钫所言，灾民流离，嗷嗷待哺，各处救援西北的运粮车络绎于道，张钫正在郑州负责接收赈粮车。

在将赈粮分拨于灾民后，尚不知情的张钫前往西北军前敌司令部拜访鹿钟麟。鹿钟麟看到张钫后，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马上说他现在要接见外国人，让张钫先到里屋坐一会儿，稍等再谈。

张钫进屋后见到了同为幕僚的秦德纯，而秦德纯的态度也和平时不同。虽然想不到事情会那么严重，但张钫此时已有所警觉，他对秦

德纯说："我要找秘书长王钊志谈谈。"

王钊志一来，张钫就试探着说自己将去洛阳见冯玉祥。王钊志为人老实，说："这样做好极了，老朋友一见面，啥闲话都完了。"

张钫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全明白了。他对王钊志说："瑞伯（鹿钟麟字瑞伯）会外宾完了还在等我，有话要谈，谈完我就开车到洛阳去。"

与王钊志握手辞别，张钫即从别的院子绕出门去，乘汽车逃往开封。

发现张钫逃走后，手枪旅旅长吉星文派兵对郑州火车站以及张钫所住旅馆进行包围搜查，但一无所获，只得回去向鹿钟麟报告。

鹿钟麟让吉星文坐下来研究，结果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研究出一个结论和方案——张钫在西北军中有一定声望，而且在冯玉祥回潼关之前，鹿钟麟自己对讨蒋也存有异议，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他内心里不同意对张钫下毒手，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好让对方逃脱。

潘多拉魔盒

驻军开封的杂牌军将领万选才过去曾是张钫的部下，刚刚才被阎、冯授以河南省主席。他告诉从郑州逃回来的张钫："您这次去郑州真是危险极了，冯不原谅您，要逮捕您，回来就不要紧了。过两天孙殿英要来，我俩会到洛阳去向冯疏通。"

虽然万选才这么说，但对张钫而言，危险仍如影随形。这时他仍未忘记自己身负赈济灾民之责，经过两昼夜不眠不休的努力，在将救济款和存储的粮食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后，他才乘卡车离开开封。

张钫先登泰山，继而打算由青岛转赴天津蛰居，并从此闭门谢客。可是他下泰山的那天晚上，却被驻军山东的马鸿逵知道了。马鸿逵乃西北军旧人，知道张钫曾是冯玉祥帐下的重要谋士，因此一边向蒋介石和韩复榘报告，一边把张钫"请"至济南。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从会场上走出来，将领们相视愕然，神情极度不安，显然他们也都被蒋介石的情绪给感染得不轻。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听说张钫在济南，蒋介石大喜过望，连忙让韩复榘等人去对张钫进行劝说，约其至徐州一晤。

张钫本不愿再过问时事，可惜这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了。到济南后，他得知，自己在开封的家已被冯玉祥查抄，和他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多被捕杀，老母也被迫自陕西入晋逃往天津。

冯玉祥斩尽杀绝、诛连九族的举动，无疑把张钫逼上了梁山。蒋介石对他则是另外一种态度，在济南的蒋系军政人员，从韩复榘起，都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逐一前来拜访说好话，要张钫去徐州。

有人讥讽蒋介石有用人之量，所以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虽然才能平庸，却也能被拿来充关羽、张飞、赵云，而根本想不到替换更强的新人。不过话说回来，蒋之用人尤其是使用政治型幕僚，确有冯、阎不及之处，起码人家是知道哪一种谋士有真材实料，而且也肯拿出三顾茅庐般的诚心诚意。

张钫一来无路可走，二来盛情难却，遂应约前往徐州。

5月8日，张钫在徐州蒋介石的专车上与蒋见面。蒋介石说他要讨伐冯、阎，即日起兵，并且马上和张钫商讨起了作战计划。

张钫虽早就被冯玉祥排斥于决策层之外，但对旧部万选才的情况非常了解。当谈到万部固守的归德城时，他告诉蒋介石，归德现由万选才的部将万殿尊防守，万殿尊最不禁打，一攻即下，不过以后当中央军前进至兰封时，就很难通过了。

听张钫说完这句话，蒋介石拿起地图正准备察看，刘峙、杨杰等将领幕僚入帐。张钫一见，便很自觉地退了出去。

当天日落时，蒋介石统兵西进，向反蒋联军发起进攻。

银弹外交

中原大战的整个形势是，陇海线位于全局中央，津浦、平汉是其左右两翼。蒋介石认为，陇海线的得失胜负，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不仅亲自对这一战场进行指挥，而且把主要兵力都用在了这一方面，手下能打一些的将领及其中央军精锐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其间。

按照郑州会议的决议，阎、冯在战略目标上曾将徐州与武汉同等看待，即陇海、平汉两线兼顾，但在两边幕僚的建议下，最后决定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徐州。起初由晋军单独主打陇海线的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调整为晋军、西北军共同主打陇海线。

阎、冯任命徐永昌、鹿钟麟为陇海线的前敌指挥官，所使用部队包括晋军的三个主力军以及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在各自体系中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劲旅。

战略可以随时调整，距离却不能任意加以改变。在战争初期，西北军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驻于关中平原，离陇海路较近外，其他大多东调不易：张维玺、刘汝明驻于陕南，沿途需经过山岳地带，行程艰难，而且还受到襄樊一带中央军的牵制；孙连仲更是远在甘、宁、青，全靠徒步行军，要到达陇海战场需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之相比，蒋介石掌握着铁路和航运等主要交通线，军运便捷，短时间内便可将兵力集中于陇海战场。

冯、阎经过磋商，决定采用败中取胜之计，即在西北军全部到达陇海线之前，先以晋军、杂牌军为主打。其中，作为杂牌军三大主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又用在晋军之前，分三路向徐州搜索前进。若行动顺利，自当按计划直取徐州；若遭遇挫败，三部抵敌不

住，则诱敌深入，撤至晋军两翼，此谓“先计败”。之后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便合兵一处，对中央军实施两翼包抄，此谓“后计胜”。

5月11日，中央军与陇海线上的万选才、孙殿英开始大规模交战。万选才所部对外号称十万，其实只有五六万人，战斗力不济。孙殿英仅有近万人，打起仗来更差劲。激战几天后，万、孙两军渐渐不支，于是只得按照“先计败”的预定计划节节后退，其中万部退至归德，孙部退至亳州。

张钫说万殿尊不禁打，蒋介石便决定把刚刚训练好的教导第一师（以下简称教一师）拉上去试试身手。

蒋唐战争之前，蒋介石曾邀唐生智帮他重新训练中央军，还说已找来了德国顾问。事实上，早在第一次编遣会议召开时，蒋介石身边就已经有了德国顾问。即便是开会期间，他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让德国顾问给他上一节军事课。

后来随着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的地盘和税收都有了大幅增长，其建军条件也是“鸟枪换炮，越吹越壮”，最让他感到得意的就是建立了教一师。

教一师是蒋介石按照德军制式，并聘请德国顾问进行训练的第一支新型部队。该师共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新兵多为由江苏各县征来的青年壮丁，装备的武器则全部从德国购进。

当时国内的步兵建制通常是一营四连，但教一师是一营三连，三连之外再配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小炮排。所谓小炮，乃是平射曲射两用步兵炮，或者是高射平射两用机关炮，其威力要超过迫击炮，而在

一般部队，一个营里别说配置德国小炮，能有两门迫击炮可用，就得向上磕头烧高香了。

教一师不仅装备优良，而且官兵的待遇也比其他部队要好，军官穿呢子军服，士兵穿黄卡其布军服，一看排场就不一样。

可是漂亮和实用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归德之战是攻城战，也就是搬着云梯不顾性命地往上爬的那种。教一师官兵均缺乏实战经验，打这类硬仗、恶仗，远不及那些成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职业老兵，结果攻了半天也攻不下来。

教一师攻城不下，蒋介石只得另谋他法。

作战期间，杨永泰一直随军参赞。他的“削藩策”可概括为“四法对四军”，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以政治方法应对阎锡山的晋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桂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四法对四军”，蒋介石先后度过了编遣会议、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等一系列危机。

现在这套谋略里面有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那个“以经济方法瓦解西北军”。只不过杨永泰又重新进行了引申，名之为“银弹外交”。

归德城内设有孙殿英的军官学校，该校校长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派人与这名校长和另外一名黄埔出身的教官进行了联络。两人作为内应，打开归德大门，把教一师放入城内。

万部在撤退出城后又遭到教一师的伏击，部队大半被缴械，万殿尊本人也被俘虏。

闻知部将折戟，身在开封的万选才急忙将防务交由晋军，星夜赶到前线进行督战。途中他路过刘茂恩军部驻地，于是决定先见一见刘茂恩。

刘茂恩是附属于晋军的杂牌，归晋军直接指挥，但在部队部署位置上，万部位于战列部队之前，刘部位于战列部队之中，万选才觉得既来前方督战，便有必要跟刘茂恩打声招呼。

万选才和刘茂恩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一道打江山的哥们儿。

你为什么这样消极

早在辛亥革命时，张钫在陕西振臂一呼，率部出潼关讨伐清军。彼时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乃张钫的手下，后来刘镇华独立发展，下面才有了万选才和刘茂恩。也就是说，若追溯起来，他们这些人都是由张钫带出来的，张钫是他们的“师公”。

刘镇华在清末时中过秀才，是个正统思想很浓的人。他认为蒋介石把持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一定能成功，因此虽为杂牌，然而拥蒋之心坚决。这使得刘氏兄弟在蒋冯战争中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万选才则是土匪出身，他虽由刘镇华收编，但一直对刘氏兄弟心怀不满，原因是刘镇华在军需、人事及作战任务的分配上，对他的弟弟刘茂恩多有偏袒。

感到在刘部无发展空间，万选才便趁蒋冯战争的空隙叛刘投冯。刘氏兄弟猝不及防，在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情况下，只得暂时投阎

自保。

刘部是杂牌。杂牌就跟孤儿一样，虽然看似到处都可以找到养父、养母，但你不是人家亲生的，得到的待遇就完全不同，尤其阎锡山素以悭吝著称，做他的杂牌就更为不易。

自从投阎后，刘部一直处于“饥寒交迫，困难万状”的境地。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冰雪载地，而刘部还穿着单衣，一夜之间竟冻死了三十七人。刘茂恩请阎锡山发给棉衣，得到的复电却是“库无存储，无衣可发”。

无可奈何之下，刘茂恩给基层官兵下令，要他们只要感到寒冷，就随时集合跑步，以御寒意。从此无论昼夜，刘部军营都可以听到跑步声、唱歌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

伙食方面，刘部能得到的标准也只是不饿死就好，士兵每天就着食盐吃小米，连用于下饭的青菜都没有，于是一个个都变得面黄肌瘦。

刘部在蒋介石那里是做杂牌，在阎锡山这里也是做杂牌。可同是做杂牌，有官有钱的蒋介石比阎锡山还是要大方得多，起码不会用“蚊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肉”的一套办法来克扣他们，棉衣和吃饭的钱总是有的。

如果不是阎锡山看得紧，刘氏兄弟早就跑回去找蒋介石了。在他们内心里，更是依旧认定蒋介石才是“真命天子”，有机会一定还要拥蒋。

当中原大战刚开始露出苗头时，刘镇华就曾奔走调停，希望阎、冯不要反蒋。最后发现于事无补，为避开这个是非旋涡，刘镇华决定出洋考察，只留下刘茂恩控制军队。

阎锡山决定要联冯打蒋了，才开始找刘茂恩谈心，并问他有没有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北方各将领讨蒋通电。

刘茂恩当然看到过，但是他回答说他近来根本就不读报，自然什么消息也不知道。

阎锡山感到很是惊奇：“为什么你连报纸都不看？”

刘茂恩说：“报告副总司令（蒋介石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我不敢欺骗你，可以说我每天都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阎锡山更加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消极？”

刘茂恩：“因为看到我所带的这群饥军，太可怜了！”接着，他便趁势讲起本部挨饿受冻的窘境，并且强调他们已经很久没能从太原方面领到军饷了。

阎锡山听得明白，这是向他讨要军饷的，便敷衍道：“这种情形我根本不知道，今后自当想法。”

阎锡山的意思是要刘茂恩发一个电报，以响应将领们的讨蒋通电。刘茂恩很不情愿，但嘴上也只能胡乱答应，正好阎锡山派他到陇海前线，他便把发响应电的事给支吾了过去。

“银弹外交”的“银弹”并不是乱扔的，得看人，如果对方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要投奔你的迹象，扔了也是白扔。正是因为看出刘茂恩意

有所动，所以蒋介石才通过大将陈诚，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携重金前去对刘茂恩进行游说。

这一颗“银弹”扔过去可谓是正逢其时，立即得到了刘茂恩的响应。刘茂恩随即派人间道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部队近况，请示今后机宜。

派出去的人尚未回来，却来了一个万选才。虽然内心不免有些忐忑，但为避免打草惊蛇，刘茂恩还是硬着头皮前往迎接。

一见面，刘茂恩首先问道：“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早？”当得知万选才系因前方战事不利，不得不星夜赶来督战时，他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万选才有抽鸦片的嗜好，趁其吞云吐雾之际，刘茂恩将话题慢慢地引入眼下时局，意在对万选才的态度与趋向进行观察。

天意

万、刘的对话，鲜明地体现出当时各杂牌军头对形势的不同看法——

刘茂恩问：“你看此次阎、冯与中央对抗，将来胜负谁属？”

万选才答：“胜败因素很多，很难确定，若按一般情形而论，胜利定属阎、冯。”

刘茂恩又问：“阎、冯胜利的条件是什么？”

万选才说，若从兵力上比较，阎、冯的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而蒋介石所指挥的中央军，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万。

刘茂恩显然不相信，但万选才有万选才的算法。按照他的估计，晋军约有三十万人以上，西北军也有四十万，他万选才、孙殿英、石友三等杂牌军加一块亦在二十万以上，如此，正好是百万以上。

可蒋介石不也有杂牌军吗？万选才动用春秋笔法把这个环节给去掉了，他的理由是："蒋的部队虽然在名义上很多，但是很多省份都反对他，不仅不会出兵帮他打仗，反而还要牵制他的很多军队，尤其四川、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不出兵来打他，已经是好的了，哪还有出兵帮他的呢？"

刘茂恩不便反驳："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胜利条件？"

万选才说：还有。

晋军、西北军在自家地盘里自然是正牌，但对于南京政府来说又是杂牌。他们"一向受到中央歧视，军中怨气沸腾"，特别是西北军，一直吃不饱，穿不暖，更是"怒气冲天"。相比之下，中央军待遇优厚，士兵生活安定，且以正统自居，难免产生一种骄气。

在万选才看来，前者怨怒，遂有必死决心；后者骄傲，则厌战而无斗志。

说到这里，万选才忽然反问刘茂恩："你对这场战争胜败谁属的看法如何？"

当时刘茂恩因不明虚实，身边只带了一个随从，而万选才的随员警卫却有满满两卡车五六十人。刘茂恩哪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经

反复催促，才迟疑着说道：“你一定要我讲，我只好讲，但不管说得对不对，你可不要取笑我。”

投阎之前，万选才与刘茂恩地位相当，甚至因刘镇华的缘故，无形中还低刘茂恩一头。如今却不同，万选才和冯、阎的关系更为接近，还被封为河南省主席，他就有些瞧不起刘茂恩，相应也没有原来那么防范。

刘茂恩欲言又止，万选才还真以为对方是出于见识所限而不敢议论，于是很大方地一挥手：“咱们兄弟，多少年来都是无话不谈。你说得对不对，我还会笑你吗？请你快说好了。”

发现万选才确无疑心和戒备，刘茂恩也想趁机说动对方一道投蒋，开始侃侃而谈：“依我不成熟的看法，与你有点不同。胜败的因素，实在太多。”

刘茂恩举出了蒋介石必胜的三大条件，首当其冲者，就是刘氏兄弟一直念念不忘的正统观。

中央军出兵作战，打的旗号是讨伐叛逆，维护国家统一。你甭说合不合理，至少人家站在他那位上，做这些都理所当然，名正言顺。阎、冯则不然，不管他们如何数落南京的罪状，只要一出兵，就有了动摇国本、称兵作乱的罪名，舆论上极其不利。

在前面的作战中，中央军确实暴露出了中看不中用、实战经验欠缺等弱点，但各部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阎、冯各有领袖，双方全系利害结合，各为其利而避其害，部队形同散沙，哪里还谈得上团结，指挥上更不可能做到灵活机变。

举完两个条件，刘茂恩又举了最后一个条件：天意。

万选才笑了："你还讲迷信吗？"

其实刘茂恩说的天意并非卜卦算命，而是指民心，也就是张钫、张文穆等有识之士屡次提及的"民乱迭起，民灾频仍，人民望治之心久矣"。

万选才听了若有所思，时而频频颔首，时而手摸烟枪，默然无语，看得出他也认为刘茂恩说的不无道理。

刘茂恩见状，大起胆子，以质问的语气对万选才说："去年春末，总指挥（刘镇华）曾对咱俩说过几句话，你还记得吗？"

一不做，二不休

那还是蒋冯战争的时候，刘镇华做反冯动员，他对万选才、刘茂恩说："四集团（李宗仁）之事刚了，二集团（冯玉祥）之变又接踵而来，长此以往，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其不亡国可乎？你们记着，我们永远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着中央走，我们只有一条心，就是保国保民的心。这也就是做人的道理。"

万选才突然恍然大悟："你不要再往下讲。你的意思我已明白了，是不是想叫我到中央去？"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万选才说："你想得太天真。我已同老蒋打了这么多天，他还会饶我吗？"

刘茂恩以为万选才已经心动，赶快说：“此次变乱，罪在阎、冯，其余多系被动，中央绝能原谅。倘若能够率队而往（指投蒋），中央只有欢迎，怎肯再加罪责？”

与刘茂恩认为阎锡山刻薄寡恩，时时想离开不同，万选才从冯、阎那里得到的好处更多一些，纵然蒋不加罪，对眼前的待遇也颇有恋恋不舍之情。他对刘茂恩说：“冯、阎对我不薄，给我做了主席。我如果背叛他（阎锡山），不唯不义，也太对不起他。”

万选才不提“主席”还好，一提刘茂恩就是一肚子气：不都是杂牌吗？就因为你万选才早投了冯、阎，便弄了个主席当，而我刘茂恩就只配挨饿受冻，临到要打仗了，才临时敷衍几句？

刘茂恩很激动地说：“正因为他（阎锡山）给你做主席，就该揍他！你仔细想想，阎、冯部下，文武人才有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派你们石、万、孙三个做省主席？”

为什么？摆明是不信任哪，“怕你们在后方捣乱，故以高官来笼络你们，使你们在前方与中央拼命、对销实力，以减弱他们敌人的力量。”

刘茂恩预言万选才的主席交椅一定坐不长久：“若中央败退，你的军队就得向前推进，这个位置就再也不会给你了。如你被中央军打败，他会说你作战不力或擅自后退，然后解除你的武装，绳之以法，这个主席自然也随之丢掉了。”

当然，更不妙的还有一种——“你被中央消灭”。到那时，“他更是乐得解除内顾之忧，这时主席还是你的吗？”

刘茂恩一股劲地往坏里说，希望说到万选才彻底改变主意，“当机立断，速与中央联系”。与此同时，他也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将自己与蒋介石已暗中通好的事情泄露出来。

不仅如此，为了麻痹对方，刘茂恩还特意装出很恳切的神情对万选才说：“你要到中央去的时候，千万要把我带过去，并请中央把咱的部队编在一起，使我能追随大哥，永不分离。”

万选才就此以为刘茂恩只是跟他讲讲体已话，便也和盘托出了内心所想：“你的看法也很有道理，不过绝不是那么简单。老弟还不知道，我与孙殿英、石友三之间早已定有密约，只要阎、冯危害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我们就一致对付他们。”

刘茂恩见状，连忙附和：“你们的秘密结合，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出来？害得我替你瞎操心。”

看来，万选才无论如何不会舍得丢弃他那个省主席的宝座，也绝不会轻易投蒋。刘茂恩下定决心，他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写了一张给部将武庭麟的字条，令武庭麟在路上将万选才予以扣押。

写好之后，他喊随从送手纸，趁此机会把字条塞给了随从，并让随从前去送信。

约二十分钟后，随从返回。刘茂恩又说要去解手了，万选才觉得奇怪：“你不是刚解手回来吗，怎么还要去？”

答道：“腹泻。”

按照刘茂恩先前的吩咐，随从装作倚门咳嗽，将回执偷偷交给刘茂恩。刘茂恩在厕所里展开一看，上面写着“遵命办理”四个字。

等刘茂恩再回到屋中时，万选才起身告辞。刘茂恩担心武庭麟那边还没准备好，就以鸦片可以止泻为由，将万选才的鸦片要过去吸了一会儿，然后才任由万选才乘车而去。

万选才一走，就在公路上被武庭麟逮个正着，刘茂恩随即宣布反阎投蒋。万部不仅失去首领，而且背后还被捅了一刀，只得全线溃退。在亳州的孙殿英由此孤悬一隅，与友军失去了联系。

刘茂恩一不做，二不休，又向驻地附近的晋军发起进攻，晋军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也纷纷朝兰封一线溃退。

反蒋联军想靠“先计败”来取得“后计胜”。可是还没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包括一个晋军炮兵团在内，联军损失的兵力高达三万多人，而且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

烫手哇

“银弹外交”打开胜利之门，中央军由此士气大振。蒋介石亲往归德督战，指挥刘峙的第二军团向兰封发动猛烈进攻，希望能够一鼓作气，趁西北军尚未赶到，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完全击垮。

不料与晋军的作战很不顺利。第一天，第二军团就伤亡了五六千人，而且见不到敌踪。

蒋介石闻报很是吃惊，他想起张钫曾说过兰封难以通过的话，便给陇海铁路局局长发电，要求立刻派车将张钫送来归德。

等张钫赶到归德时，蒋介石恰好已返回徐州，他就径直去前线找刘峙了解情况。

据刘峙介绍，两日来该部死伤已逾万人，可还是搜索不出晋军的主力所在。更严重的是，“火力从三方面射来，进退都要有重大损失，敌人若趁此时机反攻，我们就万分危险”。

张钫长在北方，对兰封地区的地理非常熟悉。兰封一带河堤重重，沙岗连亘，南北百里柳墩密布，最适合用来掩护。晋军又向来善于打防守战，这就是中央军不见敌踪而伤亡很重的原因。

张钫向刘峙献计：“停止前进，退后十里布防。”

地形宜守不宜攻，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张钫估计，只要中央军后退布防，晋军亦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这时蒋介石来了电话，说已到归德，并命令刘峙马上将张钫送来见面。

见到张钫后，蒋介石开口即问：“兰封为什么这样难攻，你在前方是如何与经扶（刘峙字经扶）商谈的？”

张钫复述了一遍，蒋介石听了给刘峙打去电话：“你就按照伯英兄（张钫字伯英）所谈的办法即刻办理。部队今夜要全部转入新阵地。”

陇海战场的形势就此稳定下来，双方由一攻一守变成了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

正在这时，孙殿英派人前来接洽，称愿意投降。蒋介石便派张钫前去进行招抚。

归于蒋氏幕府之初，张钫只答应从旁帮忙策划，不愿担任名义，然而蒋介石仍任命他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让他在归德组织省政府。

那时河南全省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只有六七个县，所谓河南省主席，亦不过是挂一块招牌，但这也表明了蒋介石的器重，毕竟张钫还没来几天，以前的身份又是敌方谋士。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明知此行不无危险，张钫仍无可推辞地踏上了去亳州的行程。

张钫到亳州后，孙殿英称平汉路上所运货物和友人还未到，需迟几天表明态度，让张钫再等等。实际上，他和万选才一样，都不想投蒋，只是因为亳州处于中央军的左后方，又是孤军，为缓敌待援，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拖延时间的招。

张钫只身犯险，倒让孙殿英被动起来。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有代表驻于亳州，发现张钫到了亳州，两边的代表立刻向阎、冯进行了报告。冯玉祥让孙殿英把张钫解送郑州，条件是赏银三十万。阎锡山则要孙殿英将张钫解送到晋，他愿出的赏银虽没冯玉祥多，但也喊出了二十万的高价。

阎锡山的电务组给力，蒋介石的无线电系统也不是吃干饭的，阎、冯的无线电消息均被其截获。于是蒋介石也致电孙殿英：你既请张钫前去做客，就不应卖友，希望即日将张放回。

阎、冯不是都出了价吗？蒋介石干脆把他们两方的赏格加一块，一口价，五十万！

钱谁不喜欢，何况是曾经的盗墓贼孙殿英，问题是这钱并不好拿，烫手哇，而且拿哪家的都是。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张钫开玩笑说：“你老就在这里多住几天吧。现在票价越来越高，你放心，我不会卖你，我将来还可以多多分润哩！”

除了蒋、阎、冯，鹿钟麟也跑来凑热闹。他给孙殿英发来电报：“闻张伯英（张钫）到兄处，张是兄之老长官，又是侠义之士，兄千万不能献长官以邀功，但也不可将他放走。彼去则无异添了十万敌人。”

鹿钟麟让孙殿英不要把张钫交给蒋、阎、冯中的任何一方，只是扣住不放，并要孙殿英转告张钫：“如果我们战胜，我们两人赠送你二十万元，送你出洋游历。蒋介石如战胜，你自有事做。你实立于不败之地，请静以俟之。”

孙殿英拿着鹿钟麟的电报给张钫看。张钫自然一心想的都是如何脱身，他对孙殿英说：“你们大家为我计划得很好，但是这种办法于你是不是有利，你也应该考虑一下。”

不管张钫怎么说，孙殿英仍然觉得鹿钟麟的办法不错，到底还是不肯放他离开。

犯上这件事

孙殿英虽处于中央军的后方，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中央军已构不成威胁。蒋介石不但不攻孙殿英，对石友三等部也没有用什么兵力去打，而仅仅是采取监视态度。他所需要操心的还是如何从正面攻下兰封，毕竟不能老这么对垒着呀。

在对兰封的地理特点和晋军主阵地的位置进行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蒋介石集中刘峙师、顾祝同师、陈继承师、陈诚师、蒋鼎文师等雄厚兵力，向陇海正面的晋军防线展开了潮水般的进攻。

这时阎锡山也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并且宣布谁肯打仗就优先给谁补充，从而使得敢打仗的部队在建制上始终能保持充实完整。

按照中央军的编制，一个师就相当于晋军一个军，所以中央军在兵员数量上仍占有优势，但即便这样，仍难以撼动对方阵地。

晋军在北伐前就有善守之名。他们的防御阵地布置严密，凡有利的地形都用上了，所编织的步兵火力网可以直射、斜射、侧射，从多个方向对敌军进行阻击。

除了阵地设计巧妙外，晋军步兵的防守还依赖于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系山西兵工厂为防御战和山地战而特制，俗称“地瓜”，其个头比一般手榴弹要大，爆炸时范围又细又宽，而且很少会瞎火，有人戏称它是“又干又脆，一炸粉碎”。

晋军平时就很注重手榴弹的投掷训练，官兵投弹技术普遍较好，这使得晋军手榴弹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机步枪。

山西兵工厂不仅制造大量“地瓜”，还能够独立生产山炮、迫击炮和炮弹。作战时，晋军炮兵分散配置，集中射击，对步兵火力起到了很大的协同作用。

见正面攻坚不利，蒋介石下令陈诚由陇海路南侧挺进，沿晋军右翼进行迂回。

侧翼迂回的战术在最大程度上削弱了晋军的优势，转而发挥出中央军的长处。中央军的步兵武器相对优良，尤其是轻重机枪较多，轻机枪平均每连达到九挺。当时的轻机枪是新式武器，晋军、西北军都缺乏轻机枪，好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轻机枪是什么模样。在步兵第一线，只要听到轻机枪的声音，基本就可以判定该方向作战的部队为中央军。重机枪方面，中央军可装备至营以上，平均每个步兵营有六挺，而且弹药充足。同时，经过规范化训练的中央军部队，一般来说射击技术都很不错。

所有这些长处在陈诚师身上表现明显。陈诚师出击后进展很快，使得晋军侧后受到极大威胁。

发现情况紧急，冯玉祥不得不在后续西北军主力尚未赶到的情况下，让控制在郑州，原本只作为机动预备队使用的孙良诚部提早投入战斗，同时派吉鸿昌协同孙良诚，在杞县对陈诚展开侧击。

在冯玉祥返回潼关之前，吉鸿昌本已下狱。原因是他不但不听从鹿钟麟的命令，还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并印成名片到处散发。每遇到一个西北军将领，吉鸿昌都要先递名片，然后阐述一番“开发西北，安定民生”“反对内战，枪口决不向内”之类的言论。

这类言论若由张钫等谋士向冯玉祥进谏，尚属职责范围，然而出于吉鸿昌之口，又是在冯玉祥尚未回归的情况之下，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对团体的背叛和挑衅。

宋哲元、孙良诚等人共同密议，认为吉鸿昌为人狂妄、桀骜不驯，实在难以驾驭，弄得不好，陕西地盘沦于此人之手也说不定，于是便请鹿钟麟将其收捕法办。

鹿钟麟即借召吉鸿昌来潼关开会之机，扣押了吉鸿昌，解除了他的兵权。

正在此时，冯玉祥恰好回到潼关，鹿钟麟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冯玉祥有一个特点，如果下下级绕过下级向他报告或对他负责，他总是特别高兴，并视之为掌握基层部队的独门绝技。吉鸿昌等人都是通过种方式由士兵一级级爬上来的，有人戏称：“冯先生相信只有自己亲自孵出来的鸡娃才会下蛋。”

吉鸿昌犯上这件事，如果犯的是他冯玉祥，那他绝不会手软，可吉鸿昌犯的不是鹿钟麟吗？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等将领们散去，冯玉祥把吉鸿昌叫来，一见面就揍了他两拳，骂道：“你这小子，我不在家，谁的话你也不听！”

一般人做出这种举动，表明已愤怒至极，那个挨了打骂的下级基本上也就可以拿着铺盖卷滚蛋回家了。可冯玉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有一个副官长因“纳妓”与“滥赌”，触犯了军令，曾被冯责打了数十军棍，然而打过之后没几天，冯玉祥又突然下令，将这名副官长提拔为经理处长。

由于知道冯玉祥有这种“规矩”，西北军中颇有些求官逐利之徒，整天巴望着老冯的军棍能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呢。

犯上作乱性质严重，非“纳妓”“滥赌”可比，当然不能升吉鸿昌的官。冯玉祥另有计较，他随手写了一张“高级副官室”的字条，对吉鸿昌说：“把这条子贴在你住房的门口，跟我来当副官。”

不久，冯玉祥便让吉鸿昌官复原职，率原部开来河南作战。

冯玉祥此举，令其他西北军将领极为不满，可又无可奈何。孙良诚就在背后发牢骚说：“好不容易才把吉鸿昌拿掉，现在冯先生又恢复了他的师长职。将来如何，冯先生自然会知道。”

还有人说得更直白：“总司令一回来就让他官复原职，将来遇变，必成祸水。”

好险哪

不管怎样，吉鸿昌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他号称“吉大胆”，一口大刀片舞得虎虎生风，手下的大刀队更是如狼似虎，猛不可当。

陈诚师的官兵就怕大刀片，一看到大刀，抱着脑袋就往回跑。吉鸿昌趁势举刀大吼：“兄弟们，杀呀！不关饷、不扰民的铁军，一定能打过关饷扰民的公子少爷豆腐兵啊！”

在西北军中，同样经常被冯玉祥夸赞为“铁军”的还有孙良诚部。在这两支“铁军”的猛攻下，陈诚师遭遇很大挫折，几度被围。幸亏该部武器优良，靠轻机枪组成的炽盛火力才得以突围而出。

蒋军射术尚可，但劈刺技术很差，除陈诚师外，其他部队也被打得节节后退。有的一线部队甚至还没打，就被突然跃出来的吉鸿昌大刀队给吓退了。有的部队则靠拆毁民房筑成地下堡垒，才勉强挡住吉鸿昌等部的凌厉攻势。

反蒋联军中，以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最快，但是两翼的晋军却前进迟缓，大大拖了西北军的后腿。鹿钟麟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

徐永昌对此叫苦不迭：“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吗？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比了。”

抛开步兵武器，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各有优势，阎锡山有炮兵，冯玉祥有骑兵，蒋介石则有空军。

当时中国国内拥有飞机的一共只有两家，除了蒋军就是东北军。蒋军一共拥有大小飞机五六十架，分布于东西战场。蒋介石夺取归德后，为了便于对西北军、晋军进行监视，同时也为了给己方的指挥和通信联络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情报，就在归德部署了一个临时航空班。

临时航空班的飞行员主要由飞行教官和学生组成，所驾驶飞机为无武装的英国教练机。这种飞机需要的机场面积很小，随便找一块平地就可降落。

就在兰封正面激战之际，冯玉祥派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对归德机场实施了偷袭。5月31日晚，郑部骑兵疾驰八十余里，将归德机场予以破坏，共烧毁十二架飞机，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人。

对蒋军而言，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行动组织者对归德方面的情况能够做到完全掌握，蒋介石的损失还将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他的专车就停在机场附近的柳河车站内！

那天午夜，专车上熟睡的所有人都被枪声和爆炸声惊醒了。看到飞机场上空火光冲天，蒋介石连忙下令开车，但因为没有准备，火车头与他们坐的车厢不在一起，没法开。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急得大叫：“火车头呢？”

专车上只有一个特务营，共两百多名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万一骑兵到达车站，蒋介石就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见情况紧急，蒋介石连通常从不离身的黑色披风也顾不上披，便带着几名卫士跳下火车，然后往东急奔，一直跑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村庄才停下脚步。

郑部在破坏机场后，也曾打算往车站方向突进，但机场到车站这个方向已被密集的火力封锁，加上机场周围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骑兵们发动几次冲击都冲不过去，只得原路返回。

孙良诚也是突袭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日后一提起这件事就叹气，说真是便宜了老蒋，如果当时分开来，一部袭击飞机场，一部去烧火车捉老蒋，估计这两个任务会同时完成。

得知险情解除，蒋介石专车上的人都长吁了一口气："好险哪！"蒋介石在庆幸之余还非常生气，因为他之前曾特地指示负责归德外围防御的顾祝同，让对方提防西北军用大刀队实施袭击。

现在大刀队变成了骑兵部队，可道理是一样的，西北军袭击成功，就说明顾祝同有失职之处。蒋介石把顾祝同叫过去，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自此，顾祝同更加小心翼翼，每当师部移动，总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就怕夜间再遭到西北军的偷袭。

激战十余天，中央军在陇海线上已全线动摇，不得不继续向后撤退。

蒋介石集重兵于陇海线，本欲一锤定音，不料一波三折，仅有的胜利和进展居然都是靠"银弹"给搞定的，实在令人汗颜。南京政府内

部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不无担心地问蒋介石：“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将来何以善其后呢？”

蒋介石听后愤然作色。他是一个毅力和韧劲都很强的人，虽然蒋军包括教导师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颇让他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流露出丝毫颓唐的神情。

口袋里的法宝又不是只有一件，这件不行不会用另一件吗？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对质疑者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第五章　大玩家

在对中原大战进行准备的阶段，蒋介石估计阎、冯不会在平汉线上投入主力，而只会抽出一支精兵南下襄阳，以威胁武汉。按照这一预估，他决定将第三军团部署于襄阳。

第三军团是一个杂牌军的混编军团，部队编号五花八门，但没有一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团的三大主力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也跟反蒋联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相仿，都是靠吃几家饭、穿几家衣一路混过来的。

蒋介石之所以要将第三军团用于平汉线，固然是出于战略考量，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其嫡系部队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反蒋联军，在将主力部署于陇海线和津浦线之后，剩下能编入平汉线作战序列的部队，也就只能是清一色的杂牌了。

蒋介石希望这些他通过给官给钱的方式拉来的杂牌，能在平汉线上帮他挡住反蒋联军的南下之师，以保证他在其他两个战场上能一举奠定胜局。为此，在中原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他曾专门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并在会上对第三军团的杂牌将领们作了一番铿锵激越的训话。

混世诀窍

作战的关键是什么？对于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多杀人！

蒋介石说你们在战场上只要记着多杀就行，不要怕没有弹药，打完了我可以立即给你们补充——枪械弹药库里有的是，既可以自己制

造，也可以向外国购买。

在军事学上，这叫作大量杀伤敌方有生力量。蒋介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战事。他还说："如果能够杀伤他一团的兵员，他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补充训练完成，直至投入战场。三个月时间，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你们必须注意！"

当说到"杀伤"这两个字时，蒋介石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散会后，将领们便三三两两地走到街上去吃饭。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几个人进了一家饭店的饭厅，大家把皮包放下来，拉开椅子坐下，彼此相视一笑，原来的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众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金钰首先说："老总（指蒋介石）今天的精神很好，对战事也满有信心，我看这一仗不会失败的。"

徐源泉接过他的话茬："是的。不过老总的说法我觉得太露骨了。打仗嘛，本来就是杀人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那么说？"

说完之后，徐源泉将在座的人都扫了一眼："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回去对部队不好那样传达，太残忍了。"

王金钰深表赞同："是啊，我们打的是内战，杀的都是中国人。老总今天的讲话，不像是'国家最高领袖'对内作战的说法。敌人的兵员同样是中国老百姓。我想，我们不能这样传达下去。"

其他人也都点头慨叹："太不像'国家最高领袖'了。"

徐源泉、王金钰包括在座的几位，平时没有一个是吃斋念佛的善菩萨，也都无缘参加外战，讲穿了，大家都是靠打内战才打出了自己

的一方天地。他们在背后如此议论“国家最高领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觉得“杀伤”两个字太过血腥气或不愿参加内战。

杂牌部队就像是岩缝中长出的野草，能活到今天，都得有一点自己的混世诀窍。这些诀窍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时时刻刻都要保存实力；二是根据时势需要，随时随地“择良木而栖”。

蒋介石发表那通杀气腾腾的训话，毫无疑问是想驱使杂牌们不惜血本地为他卖命，可这也正好触犯了杂牌军“保存实力”的禁忌，难怪要引起不满。

事实上，在中原大战初期，阎、冯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些杂牌军的拉拢。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杂牌军头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脚踏两条船的打算，他们均与阎、冯保持着信使往还，同时对战场形势抱着观望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人肯为老蒋出死力打硬仗?

蒋介石对此其实了然于心。他的参谋处在阵中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冯逆（冯玉祥）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奸谋迄未得逞”，不等于没有得逞的可能性，而且就算他们不倒戈相向，若是始终出工不出力，给你来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也够麻烦的。

于是，如何驾驭控制这些杂牌军队，使其不被对方所收买利用，而为自己效命疆场，便成为蒋介石在战争之初就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情最后归结到究竟由谁来当第三军团的总指挥，蒋介石决定选择何成浚。

何成浚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辛亥起就领兵打仗，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算出众，以致还让蒋介石产生了鄂籍将领都不善于打仗的印象，并下达手谕：“选将，慎用鄂人！”

何成浚考取过文秀才，并在张之洞经办的书院肄业，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并被保送至日本留学。按照这一金光闪闪的履历，他至少也能混成一个“儒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何成浚不爱读书，也从不研究稍微深刻一些的时政问题，甚至他连看报刊都是走马观花，泛泛而过。

不读书，肚里自然就无货。据何成浚曾经的幕僚回忆，他竟然从未见何成浚能够在公众场合发表一篇有条有理的演说。

为将一般，为政似乎也只能在及格线上下徘徊。何成浚长时间在湖北任职，并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因此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湖北家长”，然而他在湖北也没有做出过太多让人称道的政绩。

众所周知，蒋介石比阎、冯更重视政治型幕僚的选用，幕府中高手云集，且不说黄郛、杨永泰的深谋远虑，钱昌照、张群在政经、外交方面的专业才能，就是陈布雷的笔、吴稚晖的嘴，也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在这个圈子里，何成浚若是真的一无所能，早就靠边站了。他能够始终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正是缘于有一套人所不及的特殊本领。

孟尝君之风

民国初年，天津人孙洪伊在北方政界颇有影响。后来他加入了同盟会后，通过罗致一部分人而形成一派力量，称为“小孙派”，与南方孙中山的“大孙派”比肩而立。

把孙洪伊拉进同盟会的就是何成濬。何成濬因此在同盟会内名声大噪，并受到黄兴等人的信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军政部部长，何成濬是陆军部副官长。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他超常的社交能力逐渐为人所熟知。何家经常住有闲人，他不仅招待食宿，有时还给点零用钱或帮助介绍工作，人称有“孟尝君之风”。除了慷慨疏财外，何成濬对上门之客都是求见必见，热情招待。

一传十，十传百，各地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复杂，有革命党人，也有湖北同乡、各路军人、政客、失意书生、党混子，乃至上门寻求帮助的普通老百姓。

何成濬虽不可能做到有求必应，但他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总是尽力而为：来找事做的，就安排工作，即便一时没法安排的，也招待食宿，临走时再赠送路费。

何成濬每个月用在这方面的开支都不少，除了公家开支外，有时帮他招待客人的助手也得贴进去很大一部分薪水。

从蒋桂战争起，何成濬便利用他在社交方面的影响力和才能，南来北往地帮蒋介石“跑外交”。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并不是做说客，而

是对杂牌军进行拉拢和策反。

民国年间，由于诸侯割据与时局变动过于迅速，杂牌军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一些杂牌军头看到蒋介石的力量越来越大，想投奔过来，倚为靠山，可是他们又听说蒋介石为人狠辣、奸险多变，怕吃亏或被蒋介石吞并，这时候何成濬就能在中间起到一个搭桥担保的作用。

何成濬的经历显赫。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早期士官生、黄兴的老部下兼老同事、辛亥革命元勋，这些头衔拣任何一个出来，都够炫耀上半天，更是那些资历较浅的杂牌小军头们所不能望其项背且为之肃然起敬的。

如果有谁说何成濬配不上“军事家”这一称号，那你就太较真儿了。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军事家”都是战神级别，而且何成濬吹起他的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也同样是纵论滔滔，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

除了“老革命”“军事家”外，何成濬可谓是中外皆通，讲国外，给你来日本的明治维新；讲国内，秀才出身的他对于士大夫圈子的一套周旋应付手法更是极其娴熟。这些都足以令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老粗军人为之倾倒，且自惭形秽。

当然，让人敬是一回事，让人亲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蒋老总”，很多人都敬他畏他怕他，但是亲近他的杂牌军头却委实不多。

说起来，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倜傥过风流过浪荡过，只是中年以后才开始学曾国藩写日记，并且变得越来越像个清教徒。中原大战期间，为了拉近和马鸿逵等杂牌军头的距离，他曾邀上刘峙等人与马鸿逵打麻将。麻将桌上，蒋介石输给马鸿逵三四万元，马鸿逵又输给了

刘峙，于是蒋介石对刘峙说：“经扶（刘峙），你给拨下账好了。”那三四万元就这样抵销掉了。

蒋介石要亲近马鸿逵的目的达到了，可是这种亲近其实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人家一看这做派，就知道你老蒋不是真正的赌徒——麻将桌上无父子，更无上级与部下，哪有让人抵销的道理?

何成浚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大玩家，不仅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行行皆通、样样出色，而且玩得很认真，绝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敷衍。

“战略物资”

有一年夏天，何成浚和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的刘文岛等人在汉口俱乐部赌博，玩摇骰子押单双。刘文岛当庄家，何成浚下注。何成浚那天的运气不好，还没赌一会儿，就输了几万元。之后他看准一宝（即押宝），在“双”上押回了两万元，其他人也纷纷在“双”上押注。

这个赌博游戏的道具包括酒杯、碟子和骰子。骰子放在碟子上，用被称为“宝盖”的酒杯盖着，如果摇过之后，骰子的点数显示是“双”，那么作为庄家的刘文岛就输了；反之则赢。

刘文岛很精明，他怀疑这一宝可能就是“双”，不敢贸然揭宝，便要将“双”卖出，可是因为赌注太大，无人应买。于是，刘文岛就宣布这一宝作废重摇。

作废重摇本是赌博中允许的，但是赌桌上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凡作废的宝，不能打开宝盖，必须接着再摇，让众人重新下

注。

不管这一宝是“单”还是“双”，就成了永远的谜。刘文岛太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了，他不顾规矩，伸手将“宝盖”揭了开来。

大家一看，果然是个“双”。

何成浚平时在钱财方面非常大度，输赢对他来说无所谓，但刘文岛这一举动让他非常生气，当场说了声：“不玩了！”便甩手而去。

何成浚对于玩是很认真的，绝不苟且。那些杂牌军头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土匪，有的属于三教九流，讲江湖义气，有的嗜好鸦片，热衷吃喝嫖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仅引何成浚为同道，而且视其为老手。

肃然起敬之余，军头们转而乐于和何成浚亲近，反正是大家一起玩嘛，何分彼此?

为蒋介石拉拢杂牌，何成浚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他和蒋介石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老蒋尚未发迹时，两人曾一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买卖，算得上是一道吃过、喝过、玩过、乐过的老朋友。

何成浚或许无真知，但大事不糊涂。他这一辈子，一没有办过军校，二没有当过军事教官，三没有训练过军队，更没有说建立属于个人的军政小组织或单独成立军队了。

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当过几次总指挥，但我手里实际没有兵权，如果我直接带兵，蒋介石就不会相信我。”

由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蒋介石也不像阎锡山在给官给钱方面缩手缩脚，所以何成浚就敢于替蒋当家，他去拉拢杂牌的时候，腰包里都装满空白委任状和钱，只要事情能谈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后来到了抗战，军统局有个专职搞策反的处长，他认为何成浚是策反方面的老前辈，便特地前来求教。何成浚对他的策反经验毫不隐讳："搞策反工作就要大量用钱。我在天津搞策反，不知用了多少钱，如果蒋介石要清查我的账，恐怕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当时国民党内有三个官员都擅长奔走拉拢和周旋应付，除了何成浚外，尚有陈调元、刘镇华。何成浚字雪竹，陈调元字雪暄，刘镇华字雪亚，人称"三雪"，但以何成浚在杂牌中的号召力最大。

对杂牌们来说，何成浚近乎等于一种信用的保证。有的军头说："只要何雪公（何成浚）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有的说："我们只认你何雪公。"

有一个何成浚招抚过来的旧式军人，听说老蒋要召见他，也不知是福是祸，心中十分害怕，就打电话给何成浚说："我要求先见了你，再去见委员长，万一出了事，我死了也甘心。"

蒋介石委任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真不需要考虑来考虑去，因为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选了，而且军团里的很多大小杂牌军头本来也是由何成浚给收编过来的。

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设于漯河车站，何成浚就在由武汉开来的一列专车上办公。漯河是豫南粮食集中市场，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资供应非常齐备，但这些都是土货，何成浚看不上眼，他所需要的日用品

全都是从汉口运来的：不但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高级烟酒样样俱全，而且还有四川、云南及印度的大烟。

如果仅仅为了个人享受，何成濬没必要搞得这么铺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日用品实际上是他指挥作战时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或者说“战略手段”。

以上仅属初级。何成濬专门从汉口调来一批中外名厨，日夜制作各种各样的点心和筵席，流水般地用于招待所有杂牌军头。就“战略物资”而言，这算中级。

最高级也可以说威力最大的“战略物资”，是成批从汉口搜罗来的高级妓女。何成濬一面将这些高级妓女乱点鸳鸯谱式地分配给各个将领（他自己也不例外），一面在漯河街上一所相当宽大的四合院里布置了一所陈设考究的“军人之家”。然后他就和将领们各自带着妓女住进院子，并且每天在院子里吃喝吸赌。

这是其他那些洁身自好或自命清高的高层官僚绝对做不到的，但人家何成濬不在乎：说好要一起愉快地玩耍嘛！

战争期间，只要能帮他哄好杂牌，蒋介石也同样视而不见。他以后搞“新生活运动”，专跟黄赌毒作对，那都是在自觉屁股已经坐稳，暂时无人能对之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负责向漯河供应“战略物资”的大员，就是蒋介石的兵站总监俞飞鹏。俞飞鹏由于擅长赌博，还是各个赌局的组织者。他和何成濬一拍一档，配合十分默契。

何成浚既是收编杂牌的能手，又是统驭杂牌的内行，用蒋介石在公文中最喜欢使用的一句话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酒桌前的杯盘狼藉，赌博台上的吆五喝六，烟灯旁的吞云吐雾，乃至和身边妓女们的嬉笑谑浪，都不过是他用以交好这批难以应付的杂牌军头，并最终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之服服帖帖的专用手段。

冯玉祥也派人收买平汉线方面的杂牌军头，但都在何成浚面前败下阵来。徐源泉收到冯玉祥送来的一份委任状，上填“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他马上将这份委任状交给何成浚，再由何成浚转交蒋介石。事隔不久，蒋介石便委任徐源泉为“讨逆军第十六路军总指挥”。

紧箍咒

中原大战之初，冯玉祥一共组织了五路部队，其中四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陆续向河南进发，以参与陇海线战事，只有张维玺部一路负责平汉线。

张维玺部后以张维玺为总司令，改称为南路军。南路军由陕西汉中府东进，与何成浚第三军团在许昌附近进行交战。

杂牌军装备较差，战斗力也不强，加上杨虎城等或是冯玉祥旧部，或与冯玉祥有联系，都不肯主动出战，所以导致第三军团在交战过程中屡屡受挫，几乎没胜过一仗，而张维玺也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为缓解陇海战场的不利局势，又要何成浚从平汉线抽调一部分军队去兰封前线进行增援。

蒋介石的命令毫无疑问会让第三军团的处境雪上加霜，留在平汉线上的各杂牌军也势必要承担比以前更重更难的作战任务。这些将领平时对于蒋介石就牢骚满腹，心怀怨望，对于这一部署自然都不乐意接受。

何成浚刚宣布完命令，众将便都一个个地叫起了撞天屈。他们先是诉说自己的兵力如何单薄，编制如何不足，继而埋怨待遇如何不公，苦乐如何不均，最后便把所有锋芒都集中到了“蒋老总”身上，讲到激动处，还有人开口谩骂起来。一时间，事态变得极其紧张和严重。

在这一过程中，何成浚始终一言不发，慢条斯理地在大烟灯旁边烧着烟泡，并不时从嘴里吐出一口一口的烟圈，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是事不关己的表情。

等到众人都发泄得差不多了，何成浚才从烟榻上坐起来说话。人们都以为他会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装腔作势地教训上两句，不料“何雪公”却对大家表示了“诚恳的同情”，而且居然也发起了牢骚。他感慨万端地说：“你们太不了解蒋老总的为人了，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

何成浚又诉说起了他的革命往事。不过这回重点不是炫耀，而是诉苦——

知道不？我当年跟孙中山闹革命，跟黄兴做部下，跟陈其美（蒋介石的义兄）做朋友的时候，“蒋老总”不过是一拎包小弟，他不知道多奉承我呢！

后来？后来我和“蒋老总”一道闯上海滩，玩股票，逛妓院。嗨，那时的“蒋老总”一文不名，还骗过我的钱哩。当然，我是不会跟他计较这些的。

再后来？就到北伐啦，我帮“蒋老总”打天下，不说功劳，苦劳数数都一大堆。

在滔滔不绝地复述完这些历史后，何成浚以“不胜感慨系之”的口吻说：“蒋介石今天当了领袖了，可是他对得起谁？”

不是有军头忍不住已经骂了老蒋吗？何成浚也顺势将老蒋大骂一通，而且表现得比将领们更加痛心疾首和淋漓尽致。

何成浚的“同病相怜”和“惺惺相惜”，让众将犹如服了一剂清凉剂，那个轻松和愉快，起初那种沉重、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成浚接着一声招呼，周围立刻酒肴杂陈，美女环列，“军人之家”的欢乐时光又降临了。

眼见都已吃饱喝足，何成浚这才把手一挥，让妓女和仆从退下，和众人商量起正经的，也就是怎样分担部队被抽调后的空缺。

他不讲任何大道理，只有一句话：“军人嘛，打仗就是唯一的职业，不管到哪里都得打仗，否则就会没有饭吃。”

话虽不多却意味深长，老粗们一听就懂：你们骂也骂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都没关系，接下来就得干事了，不然哪个主子也不可能赏饭，更别指望刚才的那些美女佳肴了。

有八卦相生，便有五行相克，有孙悟空，便有紧箍咒。何成浚就是杂牌们自觉自愿戴在头上，最后想脱又脱不掉的紧箍咒。

面面相觑之后，众将除了接受了“何总指挥”的命令，也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飞机与乌鸦

在中原大战中，杨永泰建议蒋介石采取“双弹战术”对付反蒋联军。双弹者，一为“银弹”；一为“空弹”。所谓“空弹”，就是用空军对反蒋联军进行威慑，达到从心理上动摇和瓦解对方的目的。

驻于漯河的蒋军航空第三队不仅担任西线的侦察轰炸任务，还协同陆军攻击驻守许昌的樊钟秀部。樊钟秀在西北军中亦属杂牌，其特点是“兵无纪律，官有积习，不能打仗”。在南路军序列中，樊部被作为前锋，但樊钟秀在到达许昌后，便开始拥兵自固，勒马不前。

樊钟秀以前跟西北军打过仗，冯玉祥对他并不信任，把樊部放在最前面，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眼见樊钟秀不肯往前推进，冯玉祥也不敢将张维玺的南路军主力置于樊部之前，就怕樊钟秀反戈相向。樊钟秀一看张维玺不上，也正好有理由取巧不进。

于是平汉线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虽然南路军占尽场面优势，但双方却没有大战，仅有小规模的接触，而其障碍所在，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樊钟秀。

樊钟秀成了南路军中名副其实的鸡肋——张维玺的其他部队既不敢出其前，又不愿留其后，只好跟随樊部一道与第三军团“对峙”。其

实如果他们抛开樊部，直接挥戈南下，汉口可能早就拿下来了。

徐永昌讽刺说，南路军在平汉线上与其说是与敌军对峙，不如说是与友军对峙更恰当。

樊部避开了地面作战，但避不开空中打击。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遭到飞机的数次轰炸，损伤尚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官兵以前从未见过飞机，突然看到一种空中大鸟竟然会朝他们俯冲投弹，个个惊恐万状，士气亦为之动摇。

冯玉祥知道后亲临视察，并在对樊部的集中训话中打了个比方："你们看到的飞机与乌鸦，哪个多？"

众人回答："乌鸦多。"

冯玉祥又问："乌鸦小便时，有没有尿到你们头上？"

众人哄笑："从来没有过。"

冯玉祥由此得出结论："既然这样，那么当飞机投弹时，能命中你们的机会就更少了。"

众人一想似乎很有道理，于是都欢呼起来，对飞机轰炸的恐惧心理大减。

6月4日，航空第三队再次对樊部实施轰炸，樊部官兵遂以"飞机与乌鸦"理论作为精神武器，连躲都不屑于躲了。

结果可想而知，樊部被炸得死伤过半，樊钟秀也被当场炸死——冯玉祥的比方听起来很有趣，不过他或许忘了，乌鸦不会特意朝人的

脑袋上撒尿，可飞机炸弹却是专门奔着人堆人群去的。

在“空弹”的支援下，第三军团在地面作战中也取得进展，他们不仅完全占领许昌车站，而且还对许昌城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许昌守军十分恐慌，冯玉祥闻讯，急忙再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同时从陇海线抽调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驰援许昌。

第三军团进攻许昌，使西北军受到牵制，对改变整个中原战场的局势起到了很大作用。晋军方面就认为冯玉祥抽兵陇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着：“冯玉祥不分轻重缓急，东西兼顾，致失陇海方面主力战的胜机，殊为可惜。”

与冯玉祥东西兼顾不一样，蒋介石始终将陇海置于平汉之上。除了从平汉线抽调援兵外，他还将教导师（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二师、教导三师）等部队全部增加过来，这使得中央军终于稳住了阵脚，陇海战场也再次形成对峙之势。

在西北军增兵平汉线的同时，南方的张桂军紧密配合，起兵攻入了湖南。

蒋桂战争后期，“湖南王”何键附蒋讨桂，想到广西境内去打个秋风，最后却被杀得大败。从那时候起，何键就知道桂军不好惹，于是他又开始脚踏两只船，暗中与新桂系联系起来。

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有一天，他把何键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张慕先叫过去，让左右拿出一张电报给张慕先看。

张慕先一看，原来是何键拍给“李白”的电报。还没等他看完，蒋介石就已愤然作色，拍案大骂：“芸樵暗中捣鬼，中央已经截收了他发

给“李白”的电报，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告诉芸樵，要他放明白点！”

张慕先吓得默然无言。几分钟后，见蒋介石的脸色稍缓，他才为自己幕主进行解释，无非是强调“何主席”处境困难，不得不与“李白”虚与委蛇，并且说如果何键与“李白”的关系搞得太僵，“他们（指“李白”）就会勾结边区散匪，从中捣乱，徒然贻患地方”。

蒋介石听后就再没有说别的话。

收到张慕先的电报，何键深感不安，便趁蒋介石到武汉之便，亲自赴汉谒蒋。这一次，他除了报告湖南军政情况外，还把湖南地处粤、桂门户，他只能灵活应付，但拥护中央之志决不动摇之类的话又详细阐述了一遍。

蒋介石也怕把何键给逼急了，真的跑到“李白”一边去，便当面对何键表示了谅解，同意他“灵活应付”。

此后，何键在联系新桂系方面便不再躲躲藏藏。他对此自鸣得意，经常对人说：“我是联络西南，拥护中央。”

可是到了中原大战，何键就得意不起来了，张桂军攻入湖南，等于逼着他表态：你究竟是联络西南，还是拥护中央，只能二选一！

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

面对紧张局势，何键如同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乱转。

他把幕僚找来商量，一名幕僚对他说：“我们反正要靠一方的，靠桂系不如靠蒋。当前桂、张、阎、冯反蒋的声势虽然很大，但他们之

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不会同心协作，将来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何键认为言之有理，当即说：“李宗仁、白崇禧太不给我面子了，硬卡着我的脖子要我投降，这样我不干，我要打。”

可悲的是，要打还打不过。湘军被张桂军一直赶到衡阳，然后衡阳又失守了，长沙眼看亦将不保。

对于还要不要死守长沙，湘军内部争论激烈。一派说长沙乃省会重地，如果丢了，将来责任担当不起。另一派则主张放弃长沙，等蒋介石所派的援兵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何键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最终决定放弃长沙。6月5日，张桂军占领长沙，三天后又进占岳州。

这是张桂军气势最盛的时候。按照预定计划，他们将直取武汉，最后与冯、阎会师于中原。可是就在张桂军准备向湖北推进的时候，阎、冯却给李宗仁和张发奎发来了一封电报，称“本军”（指晋军和西北军）已与蒋军血战数月，行将获得胜利，武汉是“本军”给养之地，如“贵军”（指张桂军）先到，请向下游发展，共同会师南京，驱逐蒋介石。

究竟是会师武汉，还是会师南京，这可是一个关系着战略方向的大问题。李宗仁和张发奎不免心生踌躇，动作也变得迟疑起来，而黄绍竑率领的断后部队又没能按时跟上，使得前后部队出现了严重脱节。

趁此机会，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麾下的蒋光鼐、蔡廷锴部（又称蒋蔡军）出韶关入湘。蒋蔡军一入湘就占领衡阳，从而截断了张桂军的

后路。

为消除后方隐患，张桂军主力只得退出长沙，回师衡阳，这就给南方战事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阎、冯（其实主要是冯）未入武汉就把武汉当成“本军给养之地”，自然是认为在他集重兵于平汉线后，打垮第三军团将易如反掌。事实也的确如此。6月10日，冯玉祥下令在平汉线上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第三军团就已被打得摇摇晃晃，露出了自己杂牌军团的虚弱本色。

再有毅力和韧劲的人，如果老是吃败仗，也会心虚。蒋介石亦不例外，在平汉线受挫，陇海线又无转机的情况下，他开始运用缓兵之计划，从幕后策动“和平运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分歧，但是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

“和平运动”的另一调解人是张学良。与阎、冯忙得已经顾不上联系张学良不同，蒋介石不管仗打得有多激烈，都从未忘记要不遗余力地对张学良进行拉拢。

当时的东北在经历中苏同江之战后，兵疲民困，加上政府腐败，理财无方，导致经济十分萎靡。东北有较强的军工业体系，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曾表示可向阎、冯出售武器弹药，为的就是要以弹换钱，缓解东北面临的经济危机。

东北武器的售价较日本要高，以步枪而论，日本三八大盖每支二十五元，东北方面的开价是其一倍以上。太原本身也有兵工厂，阎锡

山便不愿意再向东北购买，而吴铁城则力主向东北订购武器，在他的建议下，南京政府先后向东北订购了十万支步枪。

阎锡山算的是经济账，吴铁城算的是政治账，订购十万支步枪，就等于送了二百五十万元给张学良，默默地支持了东北财政。都说中苏同江之战中，是中央有负于张学良，现在也算是把这笔账给偿清了，张学良的心里能不舒坦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方交战之时，第三方肯源源不断把武器出售给其中一方，也相对地表示支持该方。方本仁就通过东北向南京出售武器枪弹这件事，断定张学良决不会与阎、冯合作。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虽然表面上仍维持中立，但在内心里确实已明显倾向于南京。6月3日是张学良的三十岁生日，东北各军政要员齐聚沈阳为其祝寿。张学良趁便召集众人开会，以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意见分成三派：一派以张作相为主，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一派以王树翰为主，主张与南京合作；剩下的则是唯张学良之命是从的少壮派，也就是于学忠这些人。

因为内部意见不一，张学良颇感举棋不定。恰在此时，恰好李石曾以祝寿专使的身份到达沈阳，以促请张学良居中调停。

与李石曾进行晤谈后，张学良马上致电阎、冯，提出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区，立即停战。至于阎、冯呼吁的政见公开，可以“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

蒋介石已经做出了让步，可是反蒋阵营在军事上正处于全面占优的时候，正所谓“拉口子要见血，刨树木要见根”，没有人肯轻易就这么放过他。

一通呼吁下来，“和平运动”的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在这片古老而坚硬的土地上，历来只回荡着一个真理，那就是枪杆子里见输赢，其他说什么都白搭。

李石曾沈阳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即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请张学良出兵助蒋。

会商后，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在张作相等人不赞成出兵的前提下，张学良准备亲率四个嫡系师和于学忠部入关。蒋方则同意先汇款两百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同时协助解决奉票的金融问题。

自“中东路事件”以来，奉票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虽然东北发行了补助奉票的“现大洋票”，但财政仍有匮乏之虞。如果东北再出兵入关，关外金融可能会立生险情。

钱款汇出的第二天，李石曾即偕同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赴沪。胡若愚南下，对外宣称是为了替张学良答谢送寿礼者，并且准备在上海就医治病，但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东北金融问题。

在李石曾的陪同下，胡若愚与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了洽商，宋子文同意帮助稳定住奉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电李石曾，要他转告张学良，奉票的稳定绝没有问题。

陷阱

请张学良出兵相助的同时，蒋介石自己也在摩拳擦掌，连做梦都指望着他的部队精锐能有上佳表现。

打仗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进化的过程。跟晋军打仗，让蒋军认识到了阵地的作用，于是他们的阵地也变得讲究起来。

豫东平原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处村寨，凡是蒋军占据的村寨，都用交通壕相连。轻重机枪就布置在交通壕交叉的地方，用于进行斜射和侧射，从而加强了火力网的严密程度和杀伤力。

坚强的阵地，加上相对精良的步兵武器和准确的枪法，这样的防线似乎应该坚不可摧才是，但当西北军扑上来的时候，它忽然就不起作用了。

你不是火力强吗？人家避开白天，晚上偷袭。

至6月上旬，预定参加陇海线作战的西北军主力已有相当一部分到达指定位置。如果仅仅只看装备，西北军简直就不配跟晋军、蒋军同处一个战场：士兵没有背包，仅有一卷夹有铁铲的棉被，然后背后再插一把大刀，机枪大炮等重武器在西北军中更是极少能够见到。

可是西北军的厉害之处，恰恰就体现在这些装束寒酸可怜的士兵身上。

冯玉祥以善于练兵著称，对士兵的训练极其严格，而且特别注重夜战、劈刺、摸爬等方面的特战训练。在西北军里，大刀被置于与步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位置，几乎人手一把，因此他们的劈刺术其实就是指刀术。西北军士兵没有不会要大刀的，夜战近战时多用大刀进行格斗。

摸爬技术是西北军的另一个绝活。在北京南苑驻军时，石敬亭曾按照冯玉祥的要求，下令各部队在营房外筑成连绵不断的假山，官兵

每天早起后就围着营房“跑”假山——注意，不是爬，而是跑。先是徒手跑，然后是全副武装地跑，并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

因为有这样的训练基础，西北军在摸寨子时便变得驾轻就熟，士兵们搭人梯上高墙，在交通壕之间纵横来去如履平地一般，往往蒋军的哨兵还未察觉到，对方已经提着刀悄无声息地摸进来了。

蒋军驻扎的寨子，前面小一些的，或驻连部，或驻营部；后面大一些的，或驻旅部，或驻师部。西北军一般都是先解决这些指挥机关，然后迅速撤掉。到了白天，当西北军的主力部队发动冲锋时，寨子里无人指挥的士兵便只能整营、整连地垮下来。

西北军中又有一类特种部队，即所谓的手枪队、手枪营、手枪旅，兵员每人配备三大件，即手枪、大刀、马枪。这些特种部队士兵的刀术和夜战技术都特别强，他们精通四式拳、四式刀、四式枪等拳脚刀枪功夫，手眼身法十分灵活，而且夜袭时专摸大据点，连带四周小据点，有时一晚上就能摸掉四五个。

蒋军刚刚才在晋军身上找到了一点感觉，很快又被西北军给吓住了。官兵们普遍产生恐惧心理，士气也大为低落，乃至于上级不下死命令，就没有人敢做主动出击的尝试。

蒋介石对此感到气急败坏，他在给刘峙、蒋鼎文和陈诚等人的信中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

为了振作“革命军人之精神”，写完信不久，蒋介石便在陇海线上策动了新的攻势。他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

人，在炮兵的配合下，计划来个釜底抽薪，绕道对开封实施奇袭。

行动开始很顺利。根据飞机侦察，奇袭部队所需要经过的区域兵力空虚，估计原来的守兵都已经被调到平汉线上去了。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各部长驱直入，向开封大胆挺进。

可是这其实是一个早已布好的陷阱。

偷鸡不成蚀把米

此前，第三军团在平汉线遭遇惨败，军团总指挥何成浚下达了撤往漯河以南的命令。从许昌到漯河距离不短，最远的部队要走六十多公里。下面的参谋和各旅团长都觉得不可理解，认为即便要撤，也没必要撤这么远——敌前做长距离撤退，等于自行崩溃，如果西北军乘胜追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令人奇怪的却是西北军并没有进行追击，第三军团因此出人意料地在撤退中取得了成功，各部既没有损失辎重骡马，也没有减员。庆幸之余，人们纷纷议论："第三军团糊里糊涂地撤退，真是莫名其妙；冯玉祥军不追击，更是莫名其妙。"

第三军团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南路军的将领也在跺脚。他们认为这正是一个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不需要用很大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效果，放弃了极其可惜。

放弃追击正是冯玉祥本人的决定。他认为，在张桂军已退出长沙的情况下，西北军纵然打到武汉，对张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反而有可能因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而陷入被动——中央军主力在

陇海而不在平汉，一旦从豫东发动进攻，西北军势必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处境。

第三军团，不过是一些缺乏战斗力的杂牌嘛，遭此挫败，短时间内更不敢北上。我正好可集结重兵于豫东，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这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哩。

抱着这一如意算盘，冯玉祥采取了新的战略，即对豫南的第三军团仅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的中央军精锐给予狠狠的重创。

在击溃第三军团后，冯玉祥即命令张维玺的南路军停止向南追击，只要能够与第三军团相持于漯河一线即可，同时将孙连仲、张自忠调回豫东。

蒋介石发动新攻势之际，正是冯玉祥将兵力从平汉线上抽出之时。后者将计就计，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迅速后撤，以便给对手造成可乘虚捣隙的假象。

发现蒋介石中计，冯玉祥即采取“正面截堵，两侧包击歼敌”的策略，下令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从正面堵击，自平汉线调回的孙连仲、张自忠从右翼兜抄，晋军从左翼堵击，孙殿英在后方进行扰乱，从而对蒋军形成一个四面包围的口袋阵势。

接到冯玉祥的密令，各军大为振奋。负责在晋军、西北军之间进行联络的张樾亭更是欣喜于色，说：“蒋介石执行这个强袭开封的打算，用的都是他的基干精锐部队。只要我们协同努力，联系密切，别让他跑了，定能将其消灭。”

如果不是一封神秘电文的到来，中原大战这场活幕剧确实可以宣告落幕了。

蒋介石并不是从中原大战开始才实施“银弹外交”的。事实上，在大战前，他就已经对西北军里的通信译电员进行收买并发展了内线。

那封至关重要的密电就来自内线之手。看了密电，蒋介石才知道冯玉祥不仅已将孙连仲、张自忠从平汉线调回，而且还给他设了“口袋阵”，不由得大惊失色。

为了解救这场危机，他再次亲临柳河车站坐镇指挥，一面改变部署，下令出击部队撤退，一面急调平汉线的上官云相师，并限其三个日夜到达陇海前线。

上官云相原系孙传芳麾下悍将，在杂牌军中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中原大战之前，蒋、阎、冯都对他进行了争取。上官云相说他本属北方部队，似乎应该站在阎、冯一方才对，但在他困顿的日子里，阎、冯对他却没有一点照应。比较起来，蒋尚能相容，又代表中央政府，所以决定跟着蒋走。

上官师到达陇海线后，被用于攻击“口袋阵”的两侧，特别是晋军一侧，从而使出击部队获得了很大的突围空隙。

尽管如此，原有的出击部队也已被截成数段，损失较为惨重，其中损失最大的，是担负掩护任务的教导二师。教导二师由张治中任师长，其装备和待遇与教导一师相仿，但作战能力都是一样薄弱，因此经常遭受友军的讥笑和谩骂，被说成是好看不好吃的废物。

吉鸿昌派敢死队发起冲锋，敢死队先投手榴弹，再用大刀砍杀，把教导二师打了个落花流水。当时豫东正下着大雨，到处都是沼泽泥泞，教导师官兵急于奔逃，身上穿的呢子衣变成了“泥子衣”，脚上的大皮鞋也变成了“高靿马靴”。

奇袭行动偷鸡不成蚀把米，而精心培养的教导师又如此不给自己长脸，蒋介石真是被郁闷坏了。他只得继续下达严令，用火车紧急向陇海线抢运援兵。

第十二师是从后方赴援的部队之一。由于军运频繁，车辆调度很慢，每次只能运一个团。各团一到柳河，就马上被蒋介石派往了前线最紧急的地方，最后师长金汉鼎身边仅剩下炮兵营、工兵营等特种部队。蒋介石在召见他时一开口就问：“你的工兵营能打仗吗？”

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所以金汉鼎觉得蒋介石问的这个问题很怪异，便顺口答道：“很能战。”

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工兵营派上第一线。

由于撤退和赴援及时，反蒋联军并没有能够大量歼灭对方，除重创了教导二师等少数部队外，只截获了百余辆汽车和一些辎重。中央军实力仍在，而且经过调整部署，加强工事，又打造了一道坚固阵线，双方重新形成对峙之势。

这次中央军奇袭行动的失败，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东北军出兵助蒋本来已经水到渠成，不料在6月中旬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出兵入关的提案又遭到了否决，反对者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央军在陇海线失利了。

长驻关外的方本仁、吴铁城闻听这一消息，均不胜诧异。在前线指挥的蒋介石自然更是沮丧万分。一名将领在谒见蒋介石的过程中，发现老蒋满面怒容，而且地上有许多瓷器碎片。出了门后，他赶紧问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委员长心情不畅，是何原因？"

侍从副官回答："（蒋介石）一看到或听到前方战况不利的消息，经常用骂人和砸器物来撒气。地下是茶杯碎片，刚砸的。"

监军

与尚能形成对峙局面的陇海、平汉线相比，蒋军在津浦线上还要吃紧。

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几乎把蒋军主力全都投入到了陇海线上，其他两条线便只能靠杂牌军团勉力支撑，平汉线靠的是第三军团，津浦线靠的是第一军团。

尽管中原大战前特别是石友三叛蒋后，蒋介石对韩复榘多有猜忌，甚至一度动过将其拿下的念头，但是之后韩复榘站在蒋的立场上讨唐、反阎，又重新获得了蒋的信任。

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委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并且对他说："今后关于山东方面的军政事务，即请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全权处理。"

接受任命时，韩复榘一方面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感到责任重大。第一军团除他的部队外，只有陈调元、刘珍年、马鸿逵三部人马可供调遣，其中刘珍年部驻于鲁西，指挥起来并不方便。

韩复榘还听说刘珍年与阎锡山早有勾结，就怕刘部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从背后倒戈。

见韩复榘面有难色，蒋介石对之慰勉有加，说他可以保证刘部不会出问题，同时正式委任蒋伯诚为军事联络员，对韩复榘予以协助。

蒋伯诚原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一直在蒋、韩之间担任联络。此人城府较深，善于揣摸别人的心理。进入韩部前，他了解到韩复榘性格倔犟，遇事吃软不吃硬，于是便投其所好，整天陪着韩复榘吃喝玩乐，并且处处表现出很贴心的样子。

韩复榘本质上是个粗人，头脑比较简单，想不到很深很复杂的东西。随着与蒋伯诚相处的时日渐长，慢慢地韩复榘就把蒋伯诚当成了自己人，对他极为倚重，决定什么事也都不背着他。

因为这个缘故，蒋伯诚可以随时向蒋介石汇报韩复榘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起到了监军的作用。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肯给予韩复榘极大权利和充分信任，也与之有一定关联。

就在陇海线爆发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首先开始对鲁西发动进攻，蒋介石把陈调元、马鸿逵都集中到鲁西参与作战，整个第一军团只剩下韩复榘部在鲁北抵御晋军，防务上十分空虚。韩复榘电请将陈调元部调回鲁北协防，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只答应一旦鲁西形势好转，即让陈、马两部归还第一军团建制。

一个军团支持津浦线，现在变成了一支孤旅独撑津浦线，韩复榘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通过蒋伯诚了解韩复榘的心理状况后，蒋介石特派曹浩森前去给韩复榘疏通打气。

曹浩森原为西北军总参谋长，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期，曾在南京政府出任军政部陆军署署长，后随冯玉祥弃职而去。直到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于建安村，他深感前途渺茫，便又跑到南京寻找出路。

蒋介石听说曹浩森到了南京，不但没有责备，还亲自召见，重新任命他为陆军署署长。曹浩森感激涕零，从此便加入蒋氏幕府。

曹浩森对韩复榘说："蒋总司令对向方兄（韩复榘）确实很倚重。这次阎、冯的联合，内中矛盾很深，我看他们决不会成事。"

作为曾经的上下级，曹浩森比别人更清楚韩复榘的性格脾气，这人一向直来直去，不喜欢听虚头巴脑的空话套话，因此他很快就转入了那些一眼就看得到的实在话题。

"晋军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清楚的（西北军内部一向对晋军的作战能力不屑一顾），希望向方兄好好地干一下，将来山东还不是你的吗？比河南就好多了。还有一点，少云兄（马鸿逵字少云）也不愿和西北军作战，将来北调，我看不成问题。"

曹浩森的意思很明确，只要韩复榘守住了山东，以后山东省主席铁定就是他的，而山东之富足自非河南可比。

韩复榘听完后心花怒放，本来积蓄在心底的那一堆牢骚和怯意也随之烟消云散。他当即对曹浩森说："没有什么意见，浩森兄是我们的老参谋长，今后诸事请帮忙，并盼不客气的请教，我无不遵从。请报告总司令一切都没有问题。"

闹腾

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军事开始时系由阎锡山亲自指挥。他将傅作义部等六个军，外加一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沿津浦线南下，准备渡黄河夺取济南。

晋军刚刚进入山东境内之时，恰逢各大反蒋派别的代表集中于北方，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进行酝酿。阎锡山向来重政治经济胜过军事，于是便匆忙离开了行营。津浦线战事遂由行营主任傅作义代替指挥。

傅作义和韩复榘先在位于济南西北的禹城发生激战。韩复榘亲自乘铁甲车到前方督战，并指挥手枪团实施攻击。晋军不支溃退，此后傅作义变更方略，转为由两翼绕道渡河。

晋军有六个军，韩复榘只有一个军，为了分兵到东西两翼阻敌，兵力开始变得严重不足。蒋伯诚建议韩复榘索性放弃黄河北岸，集中兵力到南岸消灭已过河的晋军。韩复榘没有同意，蒋伯诚只好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请示。

蒋介石支持了蒋伯诚的见解，同时接受韩复榘的请求，调马鸿逵部北上进驻泰安，以巩固韩部后方。

韩复榘虽依言将人马全部撤回南岸，并拆卸了黄河铁桥，但为时已晚，从两翼渡河的晋军已经源源不断地涌向济南。韩复榘急忙动用其主力展书堂旅，在归德镇进行扼要防守。

归德乃晋军进占济南的必经之路，它的左边是黄河，右边是山地，中间仅有六七里的平地，地形十分险要。展旅又事先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工事，所挖出的战壕、外壕深宽各达一丈有余，防守上很是严密，以至于晋军使用了百余门火炮和数个主力团都未能拿下。

傅作义下令重新制订作战方案，对步炮协同的战术也做了进一步修改。第二天早晨，展旅尚在睡梦之中，便遭到猛烈炮击。晋军在半小时之内，向其阵地连续发射了两千余发炮弹，展旅的许多指挥机关和机关枪阵地都被摧毁。

此后乘炮击未停，晋军第一线步兵以烟雾为掩护发起冲锋。他们将成捆的谷草投入外壕，将外壕填成平地，然后一层一层地越过外壕，冲入主阵地内部。

归德镇遂落入晋军之手。韩复榘接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两手也一直在发颤。

在济南失去屏障的情况下，韩复榘被迫弃城而逃，退往胶东，与此同时，马鸿逵也放弃泰安，向兖州撤退。

当济南战事处于紧张之际，南方的拉张活动曾经出现过一波小高潮：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由张群将相关委任状和印信送至沈阳。张学良也一度考虑是否要就任该职，已分别电询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人。

可是因为晋军攻陷了济南，张学良又像以前一样改变初衷，重新对出关助蒋抱起了谨慎态度。

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进入了最被外界看好的时期，政治宣传自然也得紧紧跟上。为了加强宣传效果，阎幕府的政宣班子改动了北伐时期传唱的“国民革命歌”。原歌中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前两句被他们改为“打倒老蒋，打倒老蒋”，成了“打倒老蒋，打倒老蒋，除军阀，除军阀。”

改动后的歌词写在一张接一张的标语上，然后贴在原先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阎南下讨伐蒋军阀宣言”旁边。各校学生都被要求学唱这首改动后的歌曲，以制造气氛，加大声势。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晋军中还有一首自创的反蒋歌，听起来更是壮怀激烈：“前进，前进，大军都出娘子关，会师中原入武汉，不怕死，不偷生，打倒蒋介石，扑灭反革命！”

中原大战前，在山西公开的宣传口径中，蒋介石代表着中央政府，是革命分子，为什么他突然又变成了要被打倒和扑灭的反革命，谁也解释不清楚。晋军下层官兵对于为什么要打仗，更是糊里糊涂，倒是各种传说盛行：“蒋介石专横独断排除异己；宋美龄每天用牛奶洗澡，鞋子上一颗珠子就值几千元，因此要打倒他……”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没有人会去认真理会其中的真假是非。

别说普通人，其实就连冯玉祥自己，除了一些空洞的宣传口号外，也讲不出什么政治大道理。他这个人喜动不喜静，而且向来只注重军事，对党务、政务兴趣不大，自中原大战开始以后，便一心在前线抓军事，党务、政务等事宜完全交由阎锡山主持。

阎锡山与冯玉祥恰恰相反。他对军事不上心，平时就喜欢思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个人到花园里漫步沉思，且神情动作相当投入：时而微笑，时而一手攀着柳枝，一手撑腰，低头作冥想状，时而撒手即走。

阎锡山也很注意听别人谈政经类的话题，凡是听到感兴趣的素材，他都会拿到自己头脑里，重新制造成自己的东西。

时人对老阎的评价是“优于考虑，缓于判断，长于静如处子，而短于奔如脱兔”。不过即使是这样，老阎也快被纷拥而至的政客们给急出病来了。

“活跃”如果用另外两个字来代替，就是“闹腾”。原来最闹腾的地方是太原，当时有两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之间的争吵十分激烈。其中一个是西山派。这个派别其实已经分化，张继、林森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南京政府当了高官，他们和谭延闿等人一样，屁股早就挪到蒋介石一边去了。之后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邹鲁、谢持。

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改组派，代表人物为陈公博、王法勤。该派主张改组国民党，并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两派都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西山派因反对国共合作，首先在国民党二大上遭到重击，邹鲁、谢持被永远开除党籍，迫使他们只好躲到上海自己搞了一个二届中央（简称“沪二届”）。

到了国民党三大，百分之八十的会议代表都由蒋介石所指派，西山派、改组派当中，除了汪精卫等两人外，没有一个人当选。由于对三大的合法性表示质疑，改组派的多数人被开除党籍，汪精卫也遭到书面警告。汪精卫、改组派因此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并开始积极策动反蒋。

尽管改组派、西山派在倒蒋的最终目的上完全一致，并且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来成立反蒋政府，但在到底该由谁来召集会议这个关键点上，两派却产生了尖锐对立。

大家的马儿大家骑

改组派反三大，不反二大，包括陈公博在内，本身就都在二届中央里面。他们认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新的会议应由二届中央来召集。

邹鲁等人则说，西山派在上海也有二届中央，要召集的话，应由两个二届中央（即“汪二届”和“沪二届”）联合召集才对。那意思很明白，大家的马儿大家骑，反蒋这座庙就是个“大家的马儿大家骑”的地方，要热闹大伙儿一起热闹。

陈公博嗤之以鼻：说你胖，还真喘上了。你那个自己张罗的二届中央是合法的吗？非法的！

他认为，改组派之所以要倒蒋，就缘于蒋所操纵的三大没有合法性。如今邹鲁居然要让“非法中央党部”来召集会议，这不是也违法了吗？以违法伐违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结果只会自坏法统，徒授老蒋以口实。

比之于汪精卫等元老，陈公博属于国民党内的青年一辈，但其政治能量却着实惊人。这位北大毕业生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接着脱离中共，又迅速得到汪精卫的信任和支持。短短几个月内，便以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一举跃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陈公博年少得志，常有觑天下如无物之感。他在参观晋祠的贞观古碑后，写下一首七绝：“虎步龙行天日姿，中原争霸尽凡儿。我来剔鲜扪残碣，碧水青山吊晋祠。”

在陈公博的眼里，即便蒋、阎、冯之流都属“凡儿”，你们这几个西山派的老朽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偏偏邹鲁、谢持也都是倔强到底的老毒物。陈公博、王法勤有新精神和新朝气，他们就摆老资格和老派头，总之就是不肯让步，甚至说即便反蒋大事不成，也决不放弃“沪二届”。

两派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已经达到了势同水火、相互倾轧的地步。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住在一起，于是在太原时，西山派便住山西大饭店，改组派住傅公祠。

阎锡山、冯玉祥和其他方面都希望能说和这两派，以便尽早成立反蒋政府。有一次，薛笃弼借看望客人之名，到傅公祠去拜访陈公博、王法勤，劝说他们牺牲成见，顾全大局，也就是反蒋第一，不要过分在意其他细节。

居中调解本是世上一件难事，轻轻一句话都可能把人给得罪透了。改组派在意的就是细节，薛笃弼却说细节不重要，王法勤一听勃然大怒，站起来举拳就要揍薛笃弼，幸亏被旁人给拦住了。这个时候，陈公博坐在一旁看报，一声不响，但显然也很恼火。

其他方面代表也有想对西山派进行劝解的。有人在会议上对邹鲁说：“如果你们私下在上海产生的二届中委，也要同正式的二届中委相提并论，那么，党内的其他派别、秘密产生的小组织很多，各有各的中委，岂不也可以提出来算一份吗？”

邹鲁听后很不高兴，不仅不接受对方的意见，而且以后只要见到这个提意见的人便予以冷面相对。

改组派和西山派在太原的协商最终以破裂告终，陈公博、王法勤负气离晋赴平。两派争吵的战场也随即迁至北平，双方人员在北平的

报纸上互相进行攻击甚至谩骂。由于担心事态扩大，北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还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各报尽量不要登载此类消息。

当时在太原的还有各军事代表的组织。他们害怕因此耽误反蒋政府的成立，于是纷纷建议在北平召开军事代表会议，通过军事代表会议来产生政府。

国民党向来以党治政，政府要从党里面产生，不然在合法性上就会大打折扣。阎锡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不同意军事代表的意见，而主张等汪精卫北上，弥合两派分歧后再说，为此哪怕缓组政府。

在阎锡山这里碰了壁后，各派又去潼关找冯玉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想法上惊人地一致：望汪早日北来。

自1927年宁汉分裂起，汪精卫在国民党政坛角逐中就陷入了屡斗屡败的恶性循环，直至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他因遭到新桂系的排挤而被迫流亡海外。

不过汪精卫在国内的政治声誉并没有从此落到谷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与蒋介石的争斗，从1929年至1930年，他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先后发表了《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等一系列文章，并提出“于党恢复民主集权，扶植民主势力”的口号。

汪精卫逐渐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精神领袖，乃至改组派和许多反蒋派别都要以拥汪为旗帜，才觉得能立得住脚。1929年9月间，改组派终于把这尊大菩萨从法国搬回了香港。

自那一年被迫出国，汪精卫就一再鼓动他的追随者“要用十二分勇气，来战胜这些困难与障碍”，要“忍受这些失败与怨恨”。他还曾用诗一般的语言为众人打气：“悬在我们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风骇浪之中一个放出光明的灯塔。”

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向反蒋和有可能反蒋的力量颁发了委任状。除一、二路总司令留给阎、冯外，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分别被委任为三至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一时之间，从南至北的反蒋武装“俨有气吞河岳之势”。其后爆发的蒋张（张发奎）之战、蒋唐（唐生智）之战、蒋石（石友三）之战，在政治上都以拥汪为旗帜。可惜的是，这些军事反蒋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现实似乎始终和汪精卫过不去。在中原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悬在他面前的始终不是什么“光明的灯塔”，而是一系列如陈公博所说的“苦笑录”。

汪精卫只能继续等待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时机。他译述雨果的共和史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共和之神从指麾，百难千灾总不辞。若云共和在天路，便当与子冲云去。”

阎、冯与蒋介石的兵戎相见，终于让汪精卫在无奈苦笑之后，眼前又见“光明的灯塔”。

钥匙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皆为文人政客，在军事上没有本钱，固然需要依靠阎、冯等军事实力派撑腰。反过来，阎、冯要想在政治合法性和声势上与蒋争锋，也非找汪不可。

冯玉祥喜欢的是军事，对政治不太懂，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搞不清楚，但是政治有多么重要，他是知道的。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发动“首都革命”，却被段祺瑞、张作霖抢了果实，总结教训，就是自己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之故。

国民党虽然松散，毕竟还有一个三民主义，比冯玉祥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要强得多，而要想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比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元老更好使的了。另外，汪精卫一直积极反蒋，冯玉祥对汪也素有好感，因此他主张请汪北上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中原大战的帷幕一拉开，冯玉祥首先派代表到港向汪精卫致意，说以前各方面反蒋都是各自为政，步骤也不统一，结果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现在不同了，阎、冯在北方合作，李宗仁也在南方响应，反蒋联军的兵力已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中央军。

军事不需要汪精卫操心，冯玉祥只想请他赶快到北平主持大计，以便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

汪精卫听后大为兴奋：“焕章先生（冯玉祥）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

过了几天，阎锡山的迎汪代表也到达香港。汪精卫设宴招待阎、冯的代表，同时准备动身启程，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刘茂

恩投蒋事件，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被完全打乱。汪精卫闻讯很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也未再做明确表示。

汪精卫不到北平，那两派就依旧吵得像锅粥。各军代表对此已经有些忍无可忍：都是一群俩肩膀扛一张嘴，只会吹牛的货，少了你们，难道我们就不干事了?

他们促请阎锡山另外采取直接办法产生政府，以便对付外交和进行筹款，同时声明他们并非不尊重“党”，而是“党”自身闹僵了，怪不得别人。

阎锡山虽然仍坚持按秩序进行，“政生于党，党务未决，政无由产”。可是面对西山派和改组派那总也解不开的死结，他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直反对讨蒋的赵戴文眼见大势所趋，也开始在讨蒋上为幕主排忧解难。在阎锡山幕府中，冀贡泉一向颇有见的，赵戴文就特地把冀贡泉约至阎锡山的“督军府”进行商谈。

阎锡山首先问冀贡泉：“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

冀贡泉答道：“没有留意，说不上来。”

赵戴文对冀贡泉说：“育堂（冀贡泉字育堂），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见说吧，蒙（五台方言，‘我们的’之意）总司令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正是为此。”

冀贡泉见状便不再绕弯子：“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

冀贡泉说，不管是挂共产党的红旗，还是挂北洋的五色旗，总得有个明显旗帜，“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赵戴文立刻接过话茬：“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搬来了箱子，没有取得钥匙。”

其实阎锡山和反蒋派别对于树旗问题已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从太原到北平，可以说一路就没停过。

有些人建议阎锡山在北洋和国民党之外，再重开一个局面，也就是领头再建一个新党或政治派别。阎锡山则知难而退，他认为，连孙中山生前都没“箍得拢”（即掌握得住）国民党，他姓阎的何德何能，就敢插手其中？

西山派则另想了一个损招。他们计划运动北洋遗老段祺瑞参加国民党，让段祺瑞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拿孙中山的政治资本来树立新帜，同时以阎锡山为副，作为军事资本。

段祺瑞是个自信心非常强的人，从来就没相信过什么三民主义。阎锡山知道段祺瑞不会理会，于是只能对这些异想天开的政客一笑置之。

打旗，还得打国民党的旗。赵戴文一语道出了阎锡山的想法：“我们就确定用现在的青天白日旗不行吗？大家都有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关系，只是要能组成个政府。”

阎锡山把他那著名的“主张公道”也套用到了举旗问题上。他认为应本着“公道”之心，让各派都能参与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党部会议中

来，而且范围越扩大越好，最好是把凡不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人都收拢进来。

阎锡山倡导将会议开成“扩大会议”，他现在为此头疼的就是西山派和改组派总谈不到一起，而且“愈商议纠纷越多，（会议）闹不起来”。

冀贡泉因为在太原有职务，没有像其他幕僚那样跟随阎锡山到北平去，所以对两派在北平明争暗斗的情况不了解。阎锡山就让赵丕廉给他介绍了一下经过。

冀贡泉听完后略一思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

此次掀起反蒋联合大行动，国民党除拥蒋者外，各派代表都到了山西的势力范围太原和北平。在冀贡泉看来，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举行扩大会议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症结也并不在此处。

冀贡泉随后得出的结论让在座诸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事态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恰恰出于山西自己身上，是山西举棋不定，诚意不够，从而自设了障碍。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质问冀贡泉：“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诚意不够？”

冀贡泉说：“这次发动，山西方面显然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其他人都要唯山西马首是瞻。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轻重的责任？”

众人笑了起来，又都觉得冀贡泉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要害问题。

山西方面怎样才能显示主动，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呢？

冀贡泉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覃振，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当年可与孙中山称兄道弟，乃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元老，亦是持反蒋态度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

覃振与邹鲁、谢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并不反对。覃振长居北平，冀贡泉建议邀他出山，以联合各派，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同时也借此向外界表达出山西希望扩大会议能够开成功的最大诚意。

犹如荒漠中见到了绿洲，阎锡山眼前一亮，立即同意了冀贡泉的建议。

青年革命家

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冀贡泉到北平后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同赵丕廉约定，凡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律由两人控制起来，经他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自家的通讯社也一视同仁。

各派磋商期间，北平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扩大会议以及任何冲突的消息。处于这种相对安静平和的氛围之中，政客们相对而言也更客观冷静一些，不至于弄到谁都不肯妥协和让步的程度。

在最后一次磋商中，各派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按覃振所提方案行事，争吵多时而不得结果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各派联名发电，征询汪精卫的意见。汪精卫不仅赞成，而且正式将随后要召开的会议定名为“扩大会议”。

这时反蒋联军继续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反蒋政府来进行号召。6月18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表示党务问题一切听从汪的主张，“望速北上，一切问题，立即解决”。

汪精卫的答复却是：“适患肝炎。”

患肝炎只是一个托词，汪精卫其实另有难言之隐——蒋介石的根基在南京，汪精卫的根基则在广州，他在寄望于阎、冯有所作为的同时，更期盼张桂军能在南方取胜，他好在广州就近开府。

可是张桂军很不争气。白崇禧、张发奎在衡阳城下打了个大败仗，被蒋光鼐、蔡廷锴的蒋蔡军揍了个鼻青脸肿。张部几乎全军覆灭，所部只剩下几千人，连军建制都编不起来了。桂军也损失大半，一蹶不振，暂时失去了往外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开府无望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肝炎”也好了，不再对北上推三阻四。当阎、冯再度联名致电汪精卫促其北上时，汪精卫一口答应下来。

7月15日，汪精卫从香港启程。1924年，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北上，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汪精卫一路陪同，由香港赴日本长崎，再转赴天津至北平。六年后，他不厌其烦，继续遵循了这一行程路线，以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

汪精卫的身价确实不低。轮船一到塘沽港，便受到了陈公博等四十余人的隆重欢迎。岸边军乐齐鸣，士兵举枪致贺。

离船登岸当天，汪精卫身着灰色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黄色头盔帽，不时露出笑容，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汪精卫）“除双颊略现清瘦外，其余与民十三（即1924年）随中山先生北来时无少异，自其精神及礼质上言，固仍一青年革命家也”。

阎、冯为汪精卫北上提供了严密的防卫措施。在由塘沽至天津途中，铁路沿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水面上还有小炮艇进行配合警戒。行人若无天津警备司令部所派发证件，一律不准在附近逗留。

到了天津车站，更由天津公安局特务主任率特务员贴身保护。车站上每隔五丈设两名警察，十丈设一名宪兵。在车站欢迎汪精卫的人员也必须持有统一证件：一个临时的蓝色符号，上面盖有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印章。

汪精卫本人对此次北上也表现得踌躇满志。在赴天津途中，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己对党务与政务的主张，与阎、冯趋于一致。同时他认为，蒋介石要对国内两年来发生的战争负责，应该自行辞职，以谢国人。

僵住了

不到山穷水尽，蒋介石当然不会自行辞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在此之前，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也都寸步不让，不过焦点已逐渐移至孙殿英所驻守的亳州。

蒋介石虽未陷入冯玉祥的“口袋阵”，但经过那一劫，却让他意识到了孙殿英在侧背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一面继续遣使到亳州对孙殿英进行游说，一面派第三军军长王均进攻亳州。

王均起初以为孙部不过是乌合之众，未等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便率部独攻亳州。未料孙部守城很有一套，士兵们凭借投掷手榴弹，使得第三军不仅没能攻下亳州，还受到了很大损失。蒋介石知道后来电申斥：“自由行动，轻进轻退……纵使弹药堆积如山，亦不够该军消耗。”

不久，王均奉蒋命再攻亳州。蒋介石专门调拨给他四门榴弹炮，加上该军原有的大炮，在城外一字排开，对亳州城实施炮击。可是这次炮击对城内目标的破坏程度十分有限，随后投入进攻的步兵也士气不振，进攻行动又失败了。

之后王均便采取了长围久困的办法。航空第三队也参与助攻，飞机每天都要对亳州轰炸好几次，亳州城北门被炸得浓烟滚滚，火光一片。

从5月到7月，亳州被围了整整两个月。孙殿英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向阎、冯救援。阎、冯回电说：“援军即去助兄攻蚌取皖。”

阎、冯每天都有类似内容的电文发到亳州，可是最近的援军尚在六百里之外，远水难解近渴。

孙殿英当时有四种选择，只是他对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把握：战，力量薄弱，难以奏功；守，缺乏援兵，恐难持久；降，利害关切，顾虑太多；走，四面封锁，无路可走。

战、守、降、走四个字在孙殿英的脑袋里盘旋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特地将软禁于城中的张钫约至家里谈了一夜，经过一番权衡，到午夜三点，他终于下决心投降，同时释放张钫。

拂晓六点，孙殿英让人将张钫送出了城。张钫进入城外的王均军营后，马上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没有忘记之前关于拿五十万元换张钫的承诺。他派指挥空军的毛邦初亲自驾机，先带十万元现款前往亳州，并让毛邦初捎话过来：“前方款项不够，容飞徐（徐州）再取四十万元交给殿英，以践将张（张钫）放回即给五十万元的诺言，表明决不失信，然后再谈其他问题。”

上午十点半，毛邦初在城外军营下机，正好孙殿英也派人来到城外。原来在张钫出城两个小时后，孙殿英就接到了冯玉祥发来的电报，得知孙连仲将率四个师星夜增援，当晚已到达鹿邑，预计明天早晨就可以抵达亳州。

张钫将毛邦初带来的十万元交给来人，请对方即刻回城，商定办法再来磋商，同时他也暗自庆幸，多亏了那两个小时，要不然孙殿英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放他出城了。

孙连仲率重兵来援的消息令围城部队大为紧张。王均的第三军共有三个师，除王均自己统领的第十师有些战斗力外，其他两个师的战斗力都不算强。

张钫一边向蒋介石报告，一边请毛邦初到鹿邑一带进行侦察。毛邦初立即驾机实施高空侦察，他在鹿邑至亳州间没有看到军队踪迹，但在降低飞行高度后，就发现路边两旁的田地中存在人足马蹄的痕迹，痕迹很宽，说明部队数量不少，同时树林中隐隐约约也有人马在走动。

第二天，孙连仲果然率大军杀到，且来势凶猛，孙殿英则自城内进行接应。亳州西南由此解围，孙连仲、孙殿英当晚成功会师，但城北、城东的蒋军仍在进行抵抗。

第三天，二孙计划自夜半发动进攻，对这两面的蒋军实施夹击。孙殿英在城内等待孙连仲发出进攻信号，然而一直等到拂晓都无结果，天亮后城外的援兵更是变得踪影皆无，一问才知道孙连仲居然率部向西撤退了。

孙殿英闻听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乘汽车追至鹿邑，质问孙连仲为何来去飘忽，撤退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孙连仲未予置辩，他将一份命令交给孙殿英。

孙殿英接过一看，顿时表情也僵住了，那正是“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进”。只见命令上写着：“速退太康、杞县之线，万勿通知殿英，切切。”

别说孙连仲执行命令时一头雾水，就连孙殿英看了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冯玉祥为何做此决定。

把肠子都悔青了

孙殿英如今的处境极其尴尬：刚刚准备投蒋吧，援兵来了；以为可以解围了吧，援兵又跑了；再投蒋既不可，蒋若再攻，自身又独木难支。

我这是前世烧了什么断头香，怎么这么倒霉?

梦想中的安徽省主席看来是当不成了，只有舍去亳州的地盘，保全实力才是上策。计议已定，孙殿英恳求孙连仲在鹿邑再多待一天，为他全军退出亳州提供掩护。

这个人情孙连仲不能不给。于是孙殿英又赶回亳州，组织部队对蒋军实施了一次佯攻，然后趁天黑出城往鹿邑追赶孙连仲去了。

天一亮，亳州绅士即欢迎蒋军入城。王均喜出望外，他向蒋介石报告:“二孙西走，亳州克复。”

其时谁都搞不明白二孙为什么要撤，事后才弄清楚是冯玉祥中了蒋介石的反间计——张钫一出亳州，蒋介石就故意四处散播消息，说孙殿英业已投降。冯玉祥信以为真，他唯恐孙连仲吃亏，才发去了那份电文。

得知孙殿英其实并未投降，并且已和孙连仲合兵一处，冯玉祥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失去了也还可以再夺回来，而且以二孙合成一股的实力，攻下亳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冯玉祥的原计划是令孙连仲先解亳州之围，接着再会同孙殿英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如今只要增加一个夺取亳州的步骤，计划仍可照常实施。

冯玉祥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二孙实施这一行动，可是却遭到了二孙的反对。

孙殿英在亳州被困过久，亟须休整。孙连仲数月以来辗转行军、长途作战，同样面临着士兵过于疲劳和部队损失重大的窘境。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亳州离津浦线较远，二孙若深入敌后，弹药和粮草的补给将变得非常困难。

西北军长期驻防于贫瘠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也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一向都很紧张。因为任务紧急，运输不便，开往前线部队的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平均每支步枪的配备子弹不足百粒。

行军路上常常发生这样的笑话：前边士兵的布制子弹袋破了，一排步枪子弹漏出来掉在了地上，后边士兵拾到自己装了起来。前边丢了子弹的士兵知道后向他索要，不给，于是两边就吵起来。

阎锡山在战前曾承诺会对西北军的给养予以全力支持。刚开始他尚能说到做到，但到了后来不仅数量变少，而且还不及时。西北军的军费由此越来越紧张，前后行军作战几个月，上至师长，下至兵夫，不分级别，一律只发给每人十元银币，并通令全军：“勉筹巨款，以示体恤。”

中原大战爆发时，似乎天公也被这些彼此打来打去的武夫们给激怒了。西北军一进入洛阳就开始干旱，到了夏收季节，河南全境更是

遍遭冰雹袭击，已熟的小麦还没来得及收割就被砸倒在了地里。官兵们拿着那可怜巴巴的十元银币都很难买到吃的，有时甚至连咸菜糠米也找不到。

要是晋军的待遇也差不多，大家同甘共苦，倒也不去说它了。问题是晋军按月发饷，给养充足，还发有罐头食品。西北军士兵一看到晋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如果说生活待遇方面尚能容忍，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器材对于打仗而言，却是绝对不能或缺的，偏偏山西在这方面的供给更为苛刻，渐渐已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这也越来越影响到西北军的作战效率，比如一直驰骋于蒋军后方的郑大章骑兵部队，特别需要配备无线电讯的联络，可是却始终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要不然他们对蒋军的威胁将会更大。

自进入陇海战场后，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孙连仲部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兵员伤亡又未能及时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孤军深入确实很危险。

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上述问题，冯玉祥亦无法解决，他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撤至柘城、太康。

阎锡山正借召开扩大会议之机，在北平“摆下诸仙大阵”。北方的“落伍军人和退休政客”一个个都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孙殿英虽失去亳州，但因为撤退迅速，部队毫无损失，自然又是英雄中的英雄。

赵戴文出面设宴欢迎孙殿英，陈公博和晋军将领商震作即席讲话，对孙殿英推崇备至。陈公博说：“我以前以为孙殿英先生是个三头六臂的人，现在一见，才知道是个白面书生。”

商震过去招安过孙殿英，两人有历史关系，评价起来也就有了一点叙旧的味道。他说：“我当年就认识孙殿英同志。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勇敢善战，有正义感。”

“孙殿英同志”是个大麻子脸，识字不多，哪里像白面书生？说到打仗，同是杂牌将领，孙殿英还远不如石友三。只是众人现在都要拉拢他出力，所以才不嫌肉麻地纷纷加以恭维。

汪精卫和覃振也出席了欢迎宴会。陈公博和商震是吹捧“反蒋英雄”；覃振则在私下大讲宋美龄的坊间笑话，从另一个侧面来贬低老蒋。听覃振讲得津津有味，坐在对面的汪精卫含笑不语，怡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误再误

实际上，当时前线的不少人都认为，亳州解围相当失败，乃是典型的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以抽出兵力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埠、宿县，在战略上是动摇津浦、陇海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本是一招出奇制胜的妙招，可惜又中途变卦，这是再误。

“一误”可以说是冯玉祥上了老蒋的当，但“再误”则只能归咎于阎锡山对西北军支持不够，以致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初期，北平的小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冯玉祥，每个人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蒋的左手拿着“钱”，右手拿着“官”，表示谁到我

这里来就可以加官晋爵；阎的左手拿着算盘，右手拿着账本，表示凡事都要为自己盘算；冯的左手拿着个窝头，右手拿着把大刀，表示只能穷拼。

冯玉祥在听人讲起这件事后，笑着说："真缺德！"

当时众人都把它当成笑话听，可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笑话渐渐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其实就是靠"钱"和"官"在起作用，以后冯玉祥还将有更多部属因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叛冯投蒋；阎锡山一贯持"保本主义"，答应承担西北军的弹药粮秣，之后又自食其言；冯玉祥连窝窝头都快啃没了，拿着大刀的手也越来越乏力。

阎锡山并不只是在陇海线上"误"，事实上，他在津浦线早就犯下了大错。

早在傅作义攻下济南，战事极其顺利之际，阎锡山突然决定下达一纸命令，委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并以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觉得莫名其妙，认为如此任命对战事只有弊大于利：张荫梧和傅作义关系不睦，素来势同水火，这在山西军政界乃是公开的秘密。

周玳问阎锡山："那方面（指津浦线）原有行营主任指挥作战，现在又派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究竟谁指挥谁呢？这不是添麻烦吗？"

阎锡山回答：“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就下令吧！”周玳猜测阎锡山这么做，一定另有作用，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其实阎锡山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以张荫梧来监视和牵制傅作义。事情起因是张荫梧给阎锡山发来密电，告了傅作义一个黑状：“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这个会议，请注意。”

张荫梧到达济南后，阎锡山发给前线的给养、弹药等都责成张荫梧分配。不久，傅作义就来电说，张荫梧不发给他弹药，没法打仗。张荫梧也来电指责傅作义，说傅作义不听指挥。

两人相互攻讦，大闹意见，致使部队无法向前继续推进。周玳知道后，急忙对阎锡山说：“津浦线方面，我们是主攻。济南攻下以后，应当乘胜急速南攻才对。他们这样争吵，导致战事迟滞不进，如何是好？”

阎锡山既不愿放弃对傅作义的监视，又不想离开北平或太原，他采取的办法，是派参谋处长辜仁发带着他的银质私章到前线替他指挥。

辜仁发到达前线后，傅作义还听指挥，说怎么指挥就怎么打。可是张荫梧桀骜不驯，不听指挥，当着辜仁发的面只一味说傅作义如何如何不好，却始终不一起研究战事。

辜仁发只好强调，他来是为了代阎锡山指挥作战，而不是听关于傅作义的坏话。张荫梧一听更不买账了，他说傅作义不听他的指挥，这个样子不能打仗，就是阎锡山本人亲自来，他也要跟阎锡山讲讲理。

两人大吵一顿。阎锡山以为，张荫梧、傅作义看到他的私章就犹如看到令箭一般，哪敢不服从指挥，谁知他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权威，没有人把他那枚小小的私章当回事。

辜仁发指挥不动张荫梧，第二天就跑回后方复命。

阎锡山见状，又让周玳去济南指挥。周玳叫苦道："辜仁发比我精明能干得多，他都指挥不了，我如何能行？"

阎锡山坚持说："他（指辜仁发）的威望不够，你去了他们不敢不听。"

周玳无法推辞，但又不想如辜仁发那样灰溜溜地被赶回来，就向阎锡山建议："张、傅两人既已水火，不能协同作战，不如把两人分开。正好韩复榘已向胶济路方面东撤，我军如南下进攻，颇有后顾之忧，不如令傅率重兵南攻，令张率本部东进，将韩复榘逐下海去。"

阎锡山同意按此方案执行。周玳即前往济南和张荫梧面商，张荫梧答应照办，但又在周玳所定的分兵方案上，多要走了一个军。

周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便打电话通知傅作义率部南进。因此前傅、张相争，晋军未能及时地乘胜追击，马鸿逵等部已退入曲阜、兖州据守。傅作义便下令对这两座城池展开围攻。

周玳的方案只是无法之法，其实并未让傅部在给养上得到根本改善，再加上官佐贪污，使得军用品不敷使用。

攻城期间，正值大伏天，山东大雨连绵，但很多部队根本没有防雨设备，有的纵然有也不顶用，军鞋在雨地里穿一天底子就破了，士

兵们只好赤脚行军打仗。傅部的粮食供应不足，只能就地征集，可是征粮又不给钱，自然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粮食不够吃，“料面”倒有的是。中原大战前，山西已二十多年未遭兵灾，百姓称得上安居乐业，同时吸大烟和“料面”（海洛因的俗称）的陋习在山西又一直盛行，从普通家庭妇女到军队里的士兵，很多人有此嗜好。

山东人说：“阎锡山的队伍，每人带有两支枪、一支炮，枪是步枪、大烟枪，炮是高射炮（将海洛因放在烟卷中仰面吸食，称为高射炮）。”当地还流传一个笑话，说点“高射炮”时，须拿烟卷裹上“料面”，可是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料面”受潮，火柴也点不着，结果晋军士兵个个困于毒瘾，无力作战。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傅作义在感到阎锡山对自己不信任后，也不免泄气。虽然晋军还不至于仗仗皆败，但从此以后没打过什么好仗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傅作义的指挥下，攻城部队曾几度攀上曲阜的城墙，不过都被打了下来，以至于一连损失了两个团仍无法得手。

周玳的分兵方案还极大地削弱了晋军的南下力量。由于兵力不够，傅作义在用主力部队攻城的同时，只能以保安纵队等部掩护其侧翼。

保安纵队是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匆匆扩建的新兵部队，为了掩饰备战的企图，才命名为“保安纵队”。士兵大多是从绥察两省和山西雁北等灾区招募来的灾民，年龄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年龄小的仅有十二三岁。这些人入伍时个个面黄肌瘦、步履蹒跚，且都披着无面的白板破

羊皮袄，有的下身还裹着破麻袋一类的东西，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当地人戏称为“皮袄队”。

保安纵队所发的武器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老套筒”，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人只配给十发。虽说战前已训练了半年，但士兵们不仅未进行过一次实弹训练，甚至连一般的制式教练都没有完成。

山西晋商遍天下，山东境内也有许多晋商。他们看到这些子弟兵所携带的破旧武器，都感到既疑惑又惊诧：“你们带的家伙连此地红枪会都不如，去山里打仗，行吗？”

行与不行，也就是上来凑个数而已。保安纵队扼守的是一座石山，上面光秃秃的，一棵树木也没有。本来计划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但他们并没有配带镐锹一类的工具，老套筒上连刺刀都没有，加上附近的老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也无从搜借，于是他们只好把部队散摆在山脊上，借以虚张声势。

这种空城计骗鱼腩部队可以，若用来骗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那就是自己找罪受。很快，保安纵队便明白了这个道理。

触犯了众怒

先前老蒋只专注于陇海线，指望仅靠韩复榘等几支杂牌部队就拖住晋军、石友三，但在韩复榘兵退胶东，马鸿逵也迭电告急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从陇海线上抽出部队用以援鲁。

陈诚师首先到达津浦线。发现傅部侧翼薄弱，陈诚没有去曲阜正面应援，而是由左翼迂回，在悄悄接近保安纵队的阵地后，突然发起攻击。

陈诚师装备着轻机枪，轻机枪一扫，暴露在石山的守军便慌了手脚，他们的老枪旧弹不是打不响就是卡壳拉不开栓。几个老兵投出几枚“地瓜”手榴弹，试图稳住阵脚，但也不顶用，其他人都在没命地向后奔逃。

保安纵队的指挥官们严令据山死守，不得再退，并亲临阵地督战，然而部队还是兵无斗志，没人肯打死仗。只见退下来的兵被赶上去，赶上去后又退下来，反复多次，最后依然是一窝蜂地向后溃退，一退便无法收拾。

由于侧背受到威胁，傅作义被迫将进攻曲阜的正面部队也撤了下来。进攻兖州的晋军也放弃攻城，加入了溃逃的行列。陈诚则会同马鸿逵等部，分路进行追击。

晋军在溃逃时也未忘记自己的嗜好。一名犯了瘾的副团长让人前拉后推，哼哼嗨嗨地大声呻吟，实在熬不住，就让士兵围拢过来，帮他堵着风吸“料面”，一边吸还一边大叫：“我是不走了，让我死在这里吧！免得活受罪。”不过才四十里山路，这伙人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

晋军的后续增援部队一面堵截收容，一面节节设防。为了扫清视野，迟滞中央军的前进，他们将遍地将要成熟的玉米、高粱、谷子等秋庄稼从根部踏倒，踩编成辫子式的纵横交错的障碍物。结果沿途两百余里青翠茂密的青纱帐，顷刻之间全都变成了铺满田野的“大地毯”。

山东为孔孟之乡，曲阜存有孔庙、孔林等遗迹，过去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战乱年代，各路兵马大多会选择绕城而过，但晋军却执意要攻下此城，这件事早已触犯了众怒。现在看到他们又如此暴殄天物，当地农民不由得愤而发起反击。

手持刀矛的红枪会从四面八方扑过来，争相拦截收缴溃兵的武器。这些由农民组成的红枪会员在气势上比溃兵们要足得多，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即便一个人对付十几个溃兵的围攻，仍然叫喊跳跃毫不示弱，反正一句话，不把武器留下，就别想走人。当晋军各部三三两两地跑回后方时，不少人已成了徒手兵。

陈诚等人乘一时之兴，并不敢远追，之后他们就停留在距晋军前沿阵地较远的防守线上，以待大军集中。

在此次津浦线作战中，陈诚部最为卖力，也实际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其表现之优异，比蒋介石一直精心打造的教导师要好出许多。

原先蒋介石认为在他嫡系部队中，只有第一师比较有战斗力，现在又添了一个陈诚师，这令他有一种无意中捡拾到珍宝般的欣喜。事后陈诚部被扩编为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成为第十八军的基本骨架，陈诚被破格提拔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

中原大战前，陈诚的职务还只是代师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升至军长，这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是最特殊的。

我退一寸，人进一丈

晋军在津浦线上面临着危机，亟须将胶济线上的张荫梧调过来，或至少调一部分过来，这是很多人都能看清的事实，然而阎锡山、张荫梧却计不及此。

韩复榘退出济南后，济南商会会长马良替阎锡山奔走，跑去对韩复榘说："阎总司令绝不计前嫌，如果双方息争，山东商民同深感戴。"

韩复榘此时不便得罪马良，便说："我很感激老先生的好意。现在只要人家不打我，我保证也不去打人，请先转告对方停止进攻，我绝对尊重民意。"

韩复榘虽有此表示，但并没有和马良谈妥息兵言和的具体办法，马良心里无底，也就未再请示阎锡山。

实际上韩复榘说的是真话。他所避居的胶东一带土匪很多，这些土匪又大多已被阎锡山委任为别动队，这使韩部面临着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韩复榘曾一再对幕僚们说："咱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上山当土匪。"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晋军不打韩复榘，韩复榘决不敢主动打晋军，更何况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仍驻于韩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复榘颇为复杂的心态。

冯玉祥、石友三与韩复榘有历史关系，他们也接连给韩发电，要韩表明态度，共同讨蒋。

讨蒋与息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韩复榘自然不肯轻易表态，他和蒋伯诚商量，希望能通过蒋伯诚催促蒋介石尽快在津浦路上

发起大规模反攻。

蒋伯诚很同情韩复榘的处境，几次代韩向蒋告急，说明韩“度日如年”，如果再不发动反攻，就没法支持了。与此同时，他又为韩复榘出主意，让韩给冯、石发电，先是说“（讨蒋之事）待与阎总司令妥商后再行宣布”，接着又说“俟领得本月份饷项即行发动”。

蒋伯诚想用缓兵之计来让晋军停止进攻，可是这一招并未能够奏效。张荫梧一心要拿下韩复榘，以便与傅作义争功，其他一概不理，他一边继续从正面发动猛攻，一边亲率大部人马从北面绕攻韩部后方。

韩部兵力单薄，难以应付，只得继续向后撤退。撤退过程中，韩部既要挡住步步紧逼的晋军，又要随时击退各路土匪，弄得手忙脚乱，以致未能在预定的防线稳住阵脚，部队损失很大。

韩复榘意气消沉，颇有山穷水尽之感，不禁又流露出放弃胶济线，到沂蒙山区当土匪的念头，为此还发了一份下野通电，电称“煮豆燃萁，摘瓜抢蔓，我退一寸，人进一丈”。

蒋伯诚见状很是恐慌，他把韩部的三个师长找来共同商议。众人一致认为，韩复榘此时发出这份下野通电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会招致晋军的乘势进逼。

商量下来，决定由三师长联名发出挽留韩复榘的通电，以挽回下野通电对军心士气的影响。之后，三师长又一起去向韩复榘阐述意见，并向韩保证会固守现有阵地，一直等到援兵到来和津浦线发动反攻。

见手下仍愿意继续坚持下去，韩复榘心定了不少，遂表示：“大家的意见，我也同意。好吧，咱们就撑撑看。”

天时地利在这个时候帮了韩复榘一个大忙。山东半岛的河流有两个特点：一是平行的河流多；二是所有河流都是从南向北横向流入渤海。加之大雨不断，河水猛涨，晋军在前进时受到不少阻碍，步伐便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

在增援津浦线的同时，蒋介石仍未完全放弃在陇海线上决胜负的初衷。他决定接受陆海空军总参谋长杨杰的建议，向反蒋联军实施锥形的“中央突破”，以期打开缺口，取得主动地位。

民国时国内有两大军事理论家：一个是蒋百里；另一个就是杨杰。论理论造诣，蒋百里要胜过杨杰，但在实际的军事指挥上却未能有太大成就。杨杰曾评价说：“蒋（蒋百里）通好几国文字，勤学苦练，古今中外战法懂得很多，惟所遇非人，未能大露头角。”

概而言之，杨杰认为蒋百里无出色战绩，与其本人无关，与跟错了幕主有关。

杨杰是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的校友，不过他后来又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是该校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学生。从陆大毕业回国后，杨杰先为程潜所器重，接着又受知于蒋介石。“择明主而事之”，成了他觉得自己的成就有可能超越蒋百里的重要依据。

杨杰才气纵横，每以姜尚、孔明自拟。中原大战开始没多久，有人请教他对于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阎、冯之间以及阎、冯与其他各派之间，各怀鬼胎，意见不一，政治上是脆弱的。”

至于军事方面，杨杰认为：“阎军、冯军在给养上有差别，很难同心协作，结果是要失败的，但也不是一两个月所能了局，可能要打一两场恶战才能解决。”

这些意见都体现了杨杰不同一般的军事眼光和智慧。蒋介石对杨杰也十分器重，不仅采纳其计，而且将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也全部交给了他。

早在日本陆军大学就读期间，杨杰就以图上战术和应用战术作业见长。日本陆军大学有一种名叫野外参谋旅行的教学形式，也就是指挥演习，杨杰曾被指定为野外参谋旅行的统裁官和演习师长。班里同学，谁演参谋长，谁演旅团长，谁演骑、炮、工指挥官，都由杨杰负责分配。

知道“中央突破”乃是在幕主面前体现自身价值的绝佳机会，杨杰遂也拿出平生所学，不仅拿出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还操刀为各部队制定了明确的作战任务和作战线路图，后者连对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的动作要求都讲得非常详细。

杨杰的作战计划看上去精美绝伦，但总攻还是失败了，特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出在他的计划上。

杨大炮

外界流传着很多关于杨杰在日本求学的逸事——

全球兵学界悬赏征求解答一道战术难题，最后是杨杰解答了。陆军大学的日本同学们惊羡不已，有人还要用皮尺量他的头，认为他的

头脑特别发达。

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好，日本老教官劝杨杰加入日本国籍，还要把女儿许配给他，但被他以需要努力钻研军事、富国强兵为由，予以拒绝。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正准备收拾行囊回国，杨杰突然接到了日本天皇要求召见的通知。在华贵的接见大厅里，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天皇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最后天皇说：“以你优异的学业，朕打算留你在日本军界任职，不知意下如何？”

杨杰自然是深明大义，他委婉而坚决地予以了拒绝：“回禀陛下，学生蒙国家器重被派来贵国求学，安敢弃国而他留？学生去向，当由国家而定。”

……

所有这些逸事的第一传播者都是杨杰自己。除此之外，他私下最乐于讲述的，还有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种种事迹。

据杨杰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由于无法挽回颓势，曾九次电邀他北上问计。有一次，他陪同蒋介石驻于柳河车站，忽有飞机从高空来电，称：“漯河西北方向发现敌军一个骑兵大集团，正在向车站疾进中。”

蒋介石听报异常惊慌，忙问杨杰应当如何处置。杨杰回答说：“现在没有工夫详细说明，只要立即告诉站上，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那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郑大章的骑兵军在车站附近出现了。杨杰知道敌众我寡，不能力战，就命令安好机头的列车向北急开，开至二三十里后，又向南开，如此南北往返二三次。骑兵跟着列车跑，跑来跑去，跑得精疲力竭。郑大章在无可奈何之下，便派兵去烧归德飞机场了。

归德机场上的轰炸机已经起飞，本来是要向敌军骑兵投弹的，但没有找到目标，只得返回原地。按照空军原则，轰炸机降落前，必须中途把炸弹扔掉，以免降落时发生爆炸事故。杨杰在得知郑大章要烧机场后，便不准飞机卸下炸弹。

当骑兵们焚烧机场时，飞机上存留的九枚炸弹被先后引爆，声震如雷，硝烟弥漫。郑部以为遭伏，慌作一团，杨杰趁机令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率特务营下车发起冲锋，终于击退了郑大章的骑兵军。

听到敌军退却，老蒋转忧为乐，笑着对杨杰说：“耿光（杨杰字耿光），不是你在此，我们一定当了俘虏了。”

这个故事与“蒋介石柳河遇险”以及“郑大章火烧归德机场”高度重合，但细节上却有相当大的出入，而且除了蒋介石曾两次出场外，并没有其他人可提供旁证——其实蒋介石的出场，也只是像陆大故事中的日本教官和天皇一样，用以衬托男主的英明神武而已。

很多人都不相信杨杰的话，说他只会吹牛，因此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喜欢吹牛倒也算不上是什么绝对的坏事。左宗棠没发迹前，不是还吹嘘他在船上把十几个水盗都打得落花流水吗?

不幸的是，杨杰把他这种浮夸的毛病也带进了参谋业务之中。他所做的作战计划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全都是闭门造车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完全对不上号。

西北军可不光是会舞大刀片，事实上，他们在土木作业方面的技能水平也很高。

谁也不打谁

1922年至1923年，在冬季最冷的时候，冯玉祥曾在南苑举行了全军夜间挖战壕比赛。当时地面冻土厚达四五寸，而且还严禁用火烤化冻土，在这种情况下用大镐凿土，就像碰到石头上一样，不能凿进半分。

最后全军士兵都把练操用的铁杠打成扁头凿土，有人手腕都被震伤溃烂了。比赛过程中，因工负伤的官兵多达数百人。

在陇海战场上，西北军各部不论行程远近，每天到达驻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外壕，以挖至三丈宽两丈深为标准。各部自营长以下，除伙夫及专勤人员之外，一律要参加挖壕，而且谁先完成土方，谁才能先去吃饭睡觉。第二天不管外壕暂时用得上用不上，部队照常行军。

当蒋军攻到西北军阵地前沿时，发现对方的前沿战壕又深又宽，根本冲不过去。可部队上去之后又不能随便撤退，于是只好在壕边趴下，就地弄个沙堆挡住头部，然后一直熬到天黑再撤下来。

因为给养跟不上，西北军后来主动从原阵地上撤退了。即便在这种无阻击的情况下，蒋军也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才得以越过西北军所筑的这道战壕。

对晋军的一侧的突破同样因计划制订机械、缺少变通而遭遇挫折。阎锡山将控制在郑州的两个炮兵团调去增援，加上原有的七个炮兵团，九个炮兵团三百二十四门大炮齐轰，蒋军连人家的阵地边沿都无法接近。

“中央突破”行动的失败令蒋军元气大伤，有的旅只剩下一千六百人，仅合正常编制的一个团。同时因向津浦线抽调部队的缘故，陇海线上的兵力变得愈加单薄，部队重新分配防线时，就算是一千多人的旅也需承担十五公里的防线。

旅长领到防守任务后去向师长报告，两人相对泪下，师长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上面命令我们守，不能不守。至于守得住守不住，再说吧！”

还好，蒋军本来最怕的西北军也打惨了，加上给养不足，也没有多少主动进攻的动力。双方在陇海线上不再比谁打得最狠，而是比谁挖的工事最深最宽，最适宜于躲避敌方的枪炮子弹。

深沟高垒之下，前线官兵大多已丧失斗志。以蒋军为例，每逢蒋介石下达攻击命令，各部总是只派出少数部队敷衍了事，然后做些假报告，捏造些假的伤亡数字。

陇海线上，枪炮声依然整天响个不停，但谁也不打谁，都是拿来骗骗高层大官们的。时间一久，对阵双方竟然还交起朋友，互相来往起来。

蒋军樊崧甫旅的对面是西北军赵登禹师。有一天，赵师向樊旅阵地派来一个士兵代表，此人上身一丝不挂，下身也只穿一条短裤，赤脚草鞋，手拎一只篮子，隔得老远就喊：“不要开枪，你看我没带武器，我送一篮面给你们吃。”

旅长樊崧甫在电话里听到汇报后，让部下将这名士兵代表接进阵地，并尽量用好酒好饭招待。

之后樊旅仿效赵师，派士兵着同样装束，拎一篮大米，老远就朝对方喊：“不要开枪，送大米来给你们吃。”赵登禹闻讯，也下令款待樊旅的士兵代表。

自此前沿官兵往来频繁，甚至约定进攻时互相通知，朝天放枪。某次樊旅奉命派一个连进攻赵师阵地，少数人到达了外壕边沿，其中一个士兵受伤跌进了壕里，另外三个士兵跳下去救他。这时赵师中有人喊“打打打”，马上就有人说：“他们大头儿争天下，管我们小兵什么事，不要打，让他们把伤兵抬回去吧。”于是樊旅的四个兵都得以安全返回。

对这一情况，蒋军的师旅长都知道，但又都假装不知。蒋介石三番两次下达的总攻击命令因此全都沦为空谈，各部扭股儿糖似的谁也不肯向前，这让蒋介石十分沮丧。

人的毅力和意志不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一旦到达容忍的极限，一样还是绷不住。蒋介石终于绷不住了，他下令后方辎重先行后撤，准备全线总退却。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幕僚张群曾告诉晋军将领，说如果当时晋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乘势出击猛攻，蒋军马上就会崩溃。

这当然属于马后炮，彼时晋军和西北军都没有想到对手会准备总退却，也没有主动发起进攻的任何计划。

就在蒋介石欲乘车撤回后方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看完电报，蒋介石喜形于色，对幕僚们说："下车！下车！"

张群急忙问什么事，蒋介石说："局势大有转机，你看看这个电报。"

定海神针

石友三所部有三四万人，且战斗力较强，在反蒋联军的杂牌部队中属于一流档次。为了对他进行笼络，让石友三在攻取山东时多卖些力气，阎锡山便发表他为山东省主席。

不料晋军很快就靠自己的力量拿下了济南，这下阎锡山又后悔了，觉得自己是做了一桩亏本生意。他暗中派人在济南一带拉拢当地的青红帮，准备将来给石友三捣乱，让石友三的省主席当不成。不仅如此，他还派人在河南石部的后方进行破坏，阻碍石友三收税和拉壮丁。

除了暗的一手外，阎锡山还有明的一套。按理，山东的地方官员都应由石友三委任，起码表面上要让他核准一下，可是晋军在进入山东之后，每占领一个县，除民政外，其他所有机关要职包括县长和税务局长在内，全都由阎锡山亲自委任，尤其是财税方面，一分钱也不许石友三过问。

石友三十分不快。当时阎锡山对石部提供的补给，也像对西北军一样，起初还算及时，以后是屡要不来，最后就变成了千呼不应。石友三借题发挥，对着部下们大发脾气，说：“大敌当前，危急存亡之秋，竟这样不关心我们。才回婆家尚且如此，将来还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阎锡山要当恶婆婆，石友三也就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坏媳妇，战事稍遇阻碍，他本人就常驻开封，不愿再上前线了。

石友三不但负进攻鲁西之责，还掩护着陇海线上反蒋联军的左翼，他打仗如此不上心，无疑让担任前线指挥的徐永昌、鹿钟麟等人十分头疼。徐永昌认为，阎锡山不能善待石友三，其实与冯玉祥不放心樊钟秀一样，都是因小失大，导致战事不能成功的典型例子。

后来听到阎锡山正在北平酝酿未来政府的人选，石友三觉得既然山东省主席已名存实亡，不如到北平政府里去谋个差事，于是就向阎锡山提出要一个军政部长的职位。

阎锡山不同意。周玳从旁进谏：“正在打仗的时候，应当满足他的要求。如果不想要他，打完仗再说。”

小马倒嫌路窄，这说的仅仅是政治，在军事领域，石友三不仅不是小马，还是悍马，千万得罪不起。可是周玳能看到的，阎锡山却看不出来，他还在为授石以山东省主席那件事后悔呢，哪肯再轻易答应让石友三入阁。

在与汪精卫磋商时，他特地强调：“石友三反复无常，贪得无厌，又是一个粗人。如果把军政部长给了他，也太不拿政府当一回事了，别人还怎么干？”

阎锡山的话又传到了石友三的耳朵里。旧恨添新仇，石友三顿时勃然大怒，他立刻让前线部队停止作战，以静观时局变化。

石友三素有“倒戈将军”之称，他先叛冯投蒋，接着又叛蒋投阎，在倒戈事业上已属二进宫。从来有了一、二，就不会在乎三，背弃阎锡山在石友三看来不会有任何心理障碍。

他需要考虑的只是弃了阎锡山后再投谁。因浦口事变中炮轰南京，蒋是不能投的，投冯的话，又受不了过去那种给人当孙子似的拘束和委屈。石的幕僚中有几个人是东北籍，就劝石友三投靠张学良。石友三是吉林人，乡土观念也相当浓厚，于是立即表示同意。

随后，石友三便给张学良发去一份密电，大意是阎锡山狡猾无信，排斥友军，万难与之共图大事，他愿意率部北上，听张学良的指挥，共同打阎。

石友三的密电恰好被蒋介石的电讯机构所截译，蒋介石在专车上收阅的正是这份电报。

原先蒋介石虽移兵津浦线，只是救一时之缓急，对在津浦线上决胜负并无充分信心和把握，其原因不外是顾忌鲁西石友三以及鲁北晋军的实力甚强。

现在好了，石友三打定主意要反戈相向。至于鲁北晋军，蒋介石通过情报分析注意到，津浦线上仅有傅作义指挥的一个军，兵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前线将官的指挥权限划分上又存在着很大问题：傅作义主打津浦线，可他只是前敌副总指挥，张荫梧才是总指挥。

这两个因素都导致傅部行动迟缓，无法给陆续调至津浦线的蒋军援兵以有力打击。

津浦线不仅可攻，也必攻，因为它还关系着张学良出兵与否。在张群、吴铁城的一再催促下，张学良曾经口头表示：如果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

决定战局的，既不是陇海线，也不是平汉线，而是津浦线。津浦线才是中原大战的定海神针！

意识到这一点后，蒋介石马上决定改变总退却的计划，他要紧紧抓住机会，重新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

第六章　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

在曾经群情沮丧的陇海前线，蒋介石召集将领们开会，说明情况，要求各部队坚持苦撑，以等待战局的进一步好转，同时他下令将阵地向后收缩。

阵地收缩后，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继陈诚师后，又大批抽出重兵投入津浦线，其中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三师、第一师等部，在蒋军里都属于主力部队。

除此之外，蒋介石另从湖北调李蕴珩部参加胶济线作战，从广东约请的第十九路军（即“蒋蔡军”）这时也准备用于津浦线的反攻。

蒋介石的电信机构为老蒋立下汗马功劳，阎锡山的电务组亦不是吃素的，石友三给张学良的密电、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的往返电报均被其截译。

石友三走到这一步，已是积重难返，无法补救，引起阎锡山充分重视的是十九路军的北上增援。十九路军具备着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骨血，其战斗力之强，从在衡阳击溃张桂军就可窥见一斑。闻听十九路军北上，沿途的蒋军各部官兵无不面有喜色，士气为之大振。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焦急，并且认识到必须速战速决，在十九路军到达指定位置前，就将津浦线上的蒋军予以击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傅作义已经在津浦线受挫，阎锡山没有把握独自搞定这件事，必须借助于冯玉祥。阎、冯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从冯玉祥开始，大多数西北军将领都对阎锡山心怀忌恨，认为他“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公认的大滑头”。如果冯玉祥不是受了韩、

石倒戈等事件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与阎抱团取暖。之后两人虽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但仍旧貌合神离、各怀异心。

从来的“政治夫妻”，都是“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现在阎锡山“势孤”了，想到冯玉祥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在和周玳商谈一番后，阎锡山亲自写了一封长达十余页的信，并准备了五十万元现款和大量弹药、面粉，让周玳一并带去给冯玉祥，以便敦请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在陇海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

子鱼论战

在兰封以西的罗王车站，周玳见到了冯玉祥。周玳先是透露了十九路军即将北援的消息，接着说：“若是一直这样相互对峙，旷日持久，殊非良策。”

周玳建议冯玉祥，趁蒋军各部全力北调，后方异常空虚之机，从陇海线抽调六个至十个团的有力部队，组成大纵队，并以孙殿英为前导，向徐州实行大迂回，以抄袭蒋军后路。

周玳预计，如果西北军、晋军能够按照这种办法在陇海、津浦两线实施协同进攻的话，“敌军必然受挫，我军趁势进取徐州，直捣南京，纵然不能活捉蒋介石，也可以隔江而治，平分天下”。

周玳没有想到，冯玉祥看了阎锡山写的信，又听了他的话，竟然泪如雨下，哭了。

冯玉祥的部下对此场景大多见怪不怪，更有甚者还会争相仿效，唯晋军中难得见到这种奇景，周玳一时不知所措。

冯玉祥梨花带雨般地哭了好几分钟，才对周玳说："百川老弟（阎锡山）不知道我后方的部队都是新兵吗？这些青年未受锻炼，若令其突攻徐州，是谓'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是白白叫他们送死吗？"

之后不管周玳如何再三解释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冯玉祥都置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冯玉祥到底在想什么，也许从他的幕僚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出端倪。当周玳带着钱物弹药来到兰封时，幕僚们便悄悄议论开了，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他要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情况。"

幕僚们认为，阎锡山之所以在械弹粮饷的供应上"拖后腿"，是因为自知晋军力弱，又不愿意力量更强的西北军率先拿下徐州，取得胜利。冯玉祥起初对这些说法还表示不同意，说阎对他是真诚的合作，可是冯的气量其实也不大，很快他就和幕僚们有了一样的感觉，说："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正好蒋军的飞机前来轰炸，冯玉祥便借机躲了起来。周玳找冯的副官长，说想和冯玉祥继续商谈。副官长推托说冯的去处很多，他也不清楚冯到底去了哪里，没法找。

周玳等了一天，都没有见到冯玉祥，只好回去复命。经过兰封时，他向正在兰封指挥作战的徐永昌谈了见冯的情形。徐永昌向来都对冯玉祥抱不信任态度，听了之后更是连连跺脚："冯现在又动了野心，万顺桥撤兵的把戏可为前车之鉴，今后没有好戏唱了。请你回去

赶紧在黄河铁桥上铺好木板，并多架设浮桥吧（意即做撤回山西的准备）！”

阎锡山的另一员大将杨爱源也在兰封。他认为事情并没有徐永昌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冯一向要打蒋，现在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他却借新兵之名，不听阎的话，其中必有原因”。

杨爱源估计到，应该是冯玉祥对阎锡山提供的补给不满意，周玳身兼兵站总监之职，虽然在物资调拨上实际做不了主，但也连带着让冯玉祥不满意，所以才对周玳推托支吾，乃至躲着不肯见面。

他问对西北军内部情况较为熟悉的张樾亭有什么办法，并想让张樾亭到罗王去找冯玉祥再好好谈一谈。

张樾亭有些为难：“周（周玳）是总司令的总参议兼兵站总监，他去都不行，我人微言轻更不行啦。”

杨爱源说：“不，你与周大不相同，你与冯有旧关系（张樾亭曾在西北军任职），周子良（周玳字子良）如何能比得上你呢？你去说话比我们都方便，事关重大，你就去吧。”

张樾亭无法推托，只得硬着头皮来到罗王。见到冯玉祥后，他报告了中央军从陇海线大量调兵以及津浦线方面晋军的被动情况，再次说明，陇海线方面的西北军和晋军发动联合进攻，将中央军击败，乘胜攻占徐州和进捣南京的时机已经到了。

冯玉祥旧调重弹：“你不知道我们的部队都是新兵吗？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冯玉祥说的“不教而战”典出《论语》，张樾亭有备而来，他也从古史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典故。

春秋时，宋楚交战，宋襄公非要等对方摆好阵势再打，结果被楚军打得一败涂地。国人责备他，他还不服气，于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子鱼便批评道：“明耻教战，求杀敌也。”

子鱼的意思是，打仗就是要杀敌，只有不怕死敢杀敌才能制胜，怕死不敢杀敌者必败。作为三军指挥，不仅不能太讲求仁慈之道，还要多教导士兵，让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鼓动他们奋勇向前。

张樾亭还举例说，西北军中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等部都是由新兵扩编而成的，但都很有战斗力，证明西北军的新兵因为受过专门的训练，在战场上既不怕死，又善打仗。

一说到西北军的新兵也如何如何厉害，老冯顿时就得意起来。其实孔老夫子的话，他本来就不太相信，不过是拿来搪塞而已，他真正信的就是“子鱼论战”的一套。

冯玉祥话锋一转：“你看，阎锡山亲率晋军基干八个军，有十几万人，可是要靠他打到徐州，恐怕也不可能。”

如果冯玉祥面前坐着的是周玳，这话怎么听怎么刺耳，但张樾亭是个曾经在西北军中混过的人，他知道西北军内部对晋军有多么不屑，于是马上顺着冯玉祥的意思答道：“不可能是必定的，但是（我们西北军）不能坐失战胜之机啊！”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知不觉中，张樾亭已经把自己的立场转移到了西北军方面，为冯玉祥考虑起了得失。

“若坐失战胜之机，跟着就会来败势。现在蒋介石将精锐近十万人集中到津浦线上，比晋军强大，晋军如何能敌得过？蒋的作战原则是各个击破，一旦他击破晋军，必然会乘胜转过头来，在陇海线方面打我们。那时候（西北军）要战胜蒋军就困难了。”

一番话说得冯玉祥哑口无言。他开始问张樾亭对陇海方面作战有何意见，张樾亭讲了许多。谈话结束时，冯玉祥说：“你回去，有事再来。”

尽管冯玉祥并没有当场明确表态要在陇海线发动攻势，但显然已有意这么做。张樾亭摸清了冯玉祥的底牌，一回兰封即告诉徐源泉，事情有戏，“不过还要再撑撑劲，我们如能找一位有力的人，促请冯出兵，或有可能，当然总司令（阎锡山）还要充分适时地对冯军进行补给”。

杨爱源随即给阎锡山发去密电，报告了张樾亭希望办理的两件事。

因为听周玳说冯玉祥不愿进攻，阎锡山愁上加愁，收到杨爱源的密电后，他才感到眼前一亮。当时汪精卫正在石家庄与他商讨扩大会议的问题，于是阎锡山便趁此机会，请汪精卫这位“有力的人”来出面促成此事，同时他还向冯玉祥竭力保证，只要西北军发起攻击，给养方面一定不会耽误。

有了台阶和保证，冯玉祥不再推三阻四、扭扭捏捏。8月上旬，他制订了一份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的作战计划，石友三也被算成

其中的一路，任务是出晋军右翼进攻柳河。

作战计划以密令的形式发至晋军前敌司令部。杨爱源一看便犯起了嘀咕，他对张樾亭说：“石这人是个名利之徒，反复无常，说变就变。现在叫他攻柳河，不正经干还是小事，万一他步刘茂恩的后尘，那我们左侧就危险了。”

石友三虽然发了那么一份密电给张学良，但毕竟还没有公开举起反旗，阎锡山也不敢把这件事曝光出来，怕的就是在这关键时刻，石友三真的“步刘茂恩的后尘”。因此之故，杨爱源并不知道密电的事，他只是认为对石友三不能不防。

杨爱源问张樾亭与石友三熟不熟。张樾亭回答不但熟，而且可以随便说笑话。

杨爱源马上说：“那好，请你到石处去一趟，以我们关怀其给养为名，侦其行，察其言，观其色，探询其意向，同时顺便到刘春荣处问问他的给养如何。回来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以防万一。”

刘春荣部也是反蒋联军中的杂牌军，在此次攻势中负责协助石友三。杨爱源料到石友三、刘春荣之辈平时在供给上都是一肚子怨气，现在需要他们出力了，就不能不改变一下服务态度。

果然，张樾亭到石友三的司令部去一问。石友三直言不讳：“要么是有吃的，没打的（指武器弹药）；要么是有打的，没吃的。不能适时供给。”

张樾亭答应回兰封后，即报告徐永昌、杨爱源，让他们给阎锡山发电报，以便及时供应。

接着张樾亭试探着问石友三：“你这回攻打柳河是率全部人马吧？”

石友三回答：“留一部守原阵地，加强工事，以备万一退回来扼守。”

杨爱源、张樾亭早就猜到石友三不会“正经干”，石友三的回答并不算出人意料，但张樾亭仍心有不甘，遂鼓动石友三：“你攻敌右侧背柳河，闻蒋介石已到柳河指挥，若能活捉蒋，是全局的胜利，你的声威将震动全国。”

石友三来了一句：“心有余而力不足。”张樾亭急忙说：“晋军和刘春荣可以策应你。”

当着张樾亭的面，石友三毫不客气：“刘部力小，晋军势弱，不能依赖。”

张樾亭无法辩驳，只得说：“你单独制胜，声威更大。”

石友三对这些哄小孩子的伎俩丝毫不感兴趣：“你快回去，叫徐、杨将我部给养充分准备好，我就要出动了。”

临分手时，张樾亭提出了他最关心也最敏感的话题：“你可别变。”

石友三笑了：“哪能老变呢！”

辞别石友三，张樾亭又到了刘春荣处。问他给养如何，刘春荣回答：“有时够，有时不够。”

张樾亭答应上报后予以补足，同时叮嘱他："这次石友三率部攻柳河，关系全局，希望你与他妥切联系，努力策应。"

刘春荣说："尽力而为。"

不用拳击而用五指

回到兰封，张樾亭将经过情形向杨爱源进行了汇报。杨爱源说："从石友三的言行和态度来看，对我们很不高兴，可是对你还不错。刘春荣对我们的供应也不满意，他的态度与这次进攻会很有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张樾亭坦言："石友三正经打不正经打，我不能保证；他变不变，我也不能保证。"

不过他认为刘春荣的问题反倒不大。

刘春荣的部队也不少，作战时，他一般都是把一个团放在前面充样子，另外七八个团则在后面进行训练，其实并不与蒋军交战，前方也少有战事。徐永昌曾派人前去视察，视察的人在说到刘部训练如何之勤，军容如何之盛时，对着徐永昌耳语："又一冯焕章（冯玉祥），行将看其异军突起也。"

徐永昌戏谑地说："恐其只能异，而不能突起也。"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倒戈将军"。徐永昌了解刘春荣，知道这位杂牌军头向来都喜欢取巧观望，并非现在才如此，而且他也害怕蒋介石对他玩"先拉、后吃"的一套，叛阎投蒋的可能性很小。

张樾亭的看法与徐永昌相似，他告诉杨爱源："刘没有什么，适时予以足够补给，总司令（阎锡山）与之妥切联系，时加慰勉，就可以啦。"

二人重新分析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按照计划，晋军右翼为孙良诚、吉鸿昌，显然右翼不会有危险，于是他们决定侧重注意石友三所在的左翼，为此专门调集了两万余人到这一侧作为预备队，名义上是协助石友三、刘春荣攻柳河，实际亦有防止石友三哗变的用意。

料理了晋军这一茬，杨、张又研究起冯玉祥的整体部署。他们发现，冯玉祥这次攻击以"胜败在此一举"为主旨，确实是已经全力以赴，七路进攻部队中，除孙殿英一路较差一些外，其余皆为西北军和晋军的精锐部队。

什么东西都怕细琢磨，尤其是打仗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情，纵使你力大如牛，还得心细如发。张樾亭经过仔细推敲，认为冯玉祥兵分七路的做法值得商榷："攻击蒋军阵地不分重点，分散平均使用兵力。"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相持对峙，中央军的阵地工事也已经非常坚固，张樾亭指出："不用拳击而用五指，想戳穿敌人固守的坚固阵地，在一般情况下很不容易，而且时值雨季，万一遇上连绵大雨，河水泛滥，就更困难了。"

他主张："应该进行重点突破，以柳河为第一。我们须注意这一点，可否请徐总司令（徐永昌）直接与冯谈谈。"

徐永昌对冯玉祥有看法，战前就反对打蒋联冯，自然不会愿意向冯玉祥说这些话。至于冯玉祥方面，也对徐永昌当年投晋不满，就算

是徐永昌肯说，也不会听得进去。考虑到这些因素，杨爱源就建议张樾亭直接给冯玉祥写信阐述看法。

冯玉祥在军事上个性很强，对于自己制订的作战计划，一向不肯割爱，不愿放手。张樾亭跟随冯玉祥的时间虽不算多，但深知他这个毛病，所以认为光写信无效。

在杨爱源的坚持下，张樾亭还是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冯玉祥送去。之后果然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对于打仗这件事，如果冯玉祥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他就不叫冯玉祥了。在布置这次总攻的时候，冯玉祥就对整个战局做了一番梳理，他认为主要战场和过去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是陇海线第一，津浦线第二，平汉线第三。

徐州作为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如果能将徐州攻下，津、陇两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后，影响所及，平汉线的那支杂牌军团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到时纵不能全取天下，最低限度，大江以北也不会再有中央军的立足之地。

如同作战计划中所显现出来的，冯玉祥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所有兵力都被他使用到了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作气地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多米诺骨牌

8月6日，冯玉祥在陇海线上发动全线总攻，时称“八月攻势”，其攻击重点并非柳河，而是宁陵。

攻势发起时，中央军在宁陵方面的很多主力部队已被调去津浦线，填补空白的多为新练部队，缺乏阵地战经验，遭到猛烈进攻后，稍遇挫折，就因不能沉着应战而溃退下去。

旗开得胜，不由得北方的政客们不欣喜。8月7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均因指挥军事而双双缺席，但扩大会议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得以正式召开。会议选举汪精卫等七人为中央常委，汪精卫同时出任组织部秘书主任。经过一番酸甜苦辣的争斗，这位常常自称“生平不识畏惧”的“革命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党魁之席。

第二天，改组派又在北平中山公园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举办了欢迎会。大会主持人在致辞中称，汪精卫的到来，“如同增加我们前线二十万兵力”。

当年孙中山从欧洲带来了革命精神。致辞中说，汪精卫这次到北平与之相仿，“也是带来革命的精神”，“汪先生到了以后，倒蒋问题即可解决，国民革命即可完成”。

汪精卫北上以及扩大会议的召开，虽然没有主持人说得那么玄乎，但至少在精神上对反蒋阵营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就在会议开幕之日，太原张灯结彩，学生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人人都认为蒋介石必定失败，南京政府必定垮台，由扩大会议产生的新政府也必定会有一番新气象和新作为。

阎、冯极力拉汪并促成扩大会议，是因为知道军事无法脱离政治。不过归根结底，军事仍是第一位的，若无战场上的胜利，一切皆

无从谈起，这也是阎、冯不得不缺席他们企盼已久的扩大会议的主要原因。

8月上旬，青纱帐已布满田野，对面都不能见人，十分有利于西北军发挥其擅长夜袭近战的特点。可是正当西北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军阵地扑来时，滂沱大雨突然不期而至。

连日大雨令河渠暴涨。部队冒险争渡，往往才走到半途，就被洪水所淹没。一时之间，枪炮雷雨震撼之声与士兵喊叫呼救之声混杂一片，真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最奇特的事情是，炮响则雨来，声停则雨止。

西北军中，孙良诚、吉鸿昌部一向最被看好，也因为过于瞩目，蒋介石特地将从平汉线上调来的上官云相配置在了孙、吉对面。上官云相部虽是杂牌军，却很能打仗，一直凭借坚固阵地死守，加上连日大雨，孙、吉整日挣扎在泥泞之中，以致进展缓慢。

上官云相久经战阵，善于用兵。就在孙良诚部一度要有所突破时，他主动利用天时，率部星夜掘土作为胸墙，然后引河水入壕，成功阻止了孙部的进攻。

设若冯玉祥能听取张樾亭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一个点上发动进攻，即便两个上官云相也守不住阵地，但兵已分出，没法再收拢，冯玉祥只得提前动用本来作为预备队的宋哲元部，以协同孙、吉作战。

在“八月攻势”中，阎锡山并没有敢在给养上加以克扣，卡西北军脖子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西北军的运输工具大多是原始的民间大车：以四个木车轮托一个古战车式的木槽，前边用几头牲畜拉。一个驭手

负责赶车，车后两侧还要再跟两个人，这两个人手持木橛，一旦大车转弯，就要用木橛帮忙，以保证后面的车轮能顺利转动。

这种大车在晴天还凑合，到了遍地泥水的环境下便寸步难行。宋哲元上去后，不但没有能给孙、吉帮上大忙，还加重了运输的负担，弄得补给更加不济。

西北军中不断出现断粮的情况，即便运到的粮食也以霉湿腐烂者居多，这大大影响了西北军的战斗力。上官云相则抖擞精神，以一敌三，就是不肯稍作退让。

本来冯玉祥还布置了一支骑兵，也就是郑大章骑兵集团。他想用骑兵来袭扰蒋军后方，甚至重演一把奇袭归德飞机场的好戏，但这一计划也因为大雨不停，骑兵行动受到阻碍而泡了汤。

依靠上官云相的突出表现和雨季的帮忙，蒋军终于在宁陵一线挡住了西北军的攻势。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官云相以杂牌军将领的身份，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视。

在西北军对宁陵方面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晋军和石友三部也兵进柳河，柳河外防线的多处要点已遭突破。柳河、归德均岌岌可危，而蒋介石在柳河已基本无兵可调，只有附近的两个营可用于防守。

鉴于情形危急，蒋介石一面分电各将领务必守住各自据守的城池，并宣布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即官升两级，赏银五万元；一面在柳河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从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退却，以缩短战线。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总参谋长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撤退极为不利，还是应继续苦撑数日，视情况的发展，再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

“杨大炮”虽短于实际操作，但他就和三国时的那个马谡一样，宏观视角和战略眼光并不差。曾在西北军担任过总参谋长的曹浩森支持了杨杰的观点，他提出冯玉祥作战向来都崇尚稳扎稳打，没有十分把握，决不能冒险深入。

二人都建议蒋介石把柳河附近的那两个营加上去进行重点突击，俟稳住阵线后，再根据形势变化做新的部署。

被当成宝贝一样的两个营原属教导一师，它们被从教导一师抽出来后，一直担任蒋介石司令部的临时外围警戒任务。两营中有一个营还是自动步枪营，营的每个连都拥有四十挺轻机枪，火力相当猛。

参加会议的陈调元见状，也自告奋勇，愿意率所部同时发起反攻，以分晋军兵力，确保陇海线正面无虞。蒋介石听罢，这才决定中止退却计划。

石友三参加“八月攻势”，本来就只想来走个过场，从晋军那里混点补给，遭到蒋军的反攻后，即以部队精疲力竭为借口，撤守原阵地。刘春荣一看石友三溜之大吉，马上有样学样，将部队撤回了原阵地。

如同打多米诺骨牌一样，晋军见石友三、刘春荣撤退，左翼露出了一个大空当，也不敢再往前进攻了。

在宁陵以北、归德以西，蒋军与反蒋联军重新形成了胶着状态，只不过蒋军阵地已被迫由原来的直线变成了直角。

这已是双方第三次在陇海线形成对峙局面。对于此次功败垂成，西北军和晋军两边互相埋怨。西北军认为晋军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前进迟滞，无法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形成密切配合，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说到难过处，冯玉祥简直痛心到了极点：“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晋军则以为，冯玉祥固执己见，不将最有力的部队使用于柳河，却用于洪水泛滥、行动不便、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的宁陵，可谓是“以有用之师，用之于无用之地”。

按照晋军方面的意见，如果当初冯玉祥肯将西北军主力用以柳河，石友三攻至柳河边缘便不致退回，晋军也不致停止追击。要是双方再进一步，乘胜联手向归德进攻，则宁陵以北、归德以西的蒋军必然会被全部围歼，陇海战事将胜利在握。

杨爱源恨恨连声：“冯玉祥不分轻重，只顾自己，不顾友军，私心太大，这样的队伍，就应了徐次宸（徐永昌字次宸）所说的‘以后没有好戏唱了’。”

与前两次形成对峙不同的是，这次反蒋联军特别是津浦晋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和危险。

冷板凳

在津浦中央军即将发起反攻的前夕，南北双方的拉张活动都进入了极其关键的时刻。

阎锡山打算派薛笃弼、贾景德出使沈阳，与张学良商谈组织北平政府的方案。正值葫芦岛建港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张学良便以主持典礼为由，前往葫芦岛“休养身体”，此后在葫芦岛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对薛、贾避而不见。薛、贾请示直接去葫芦岛谒见，张学良告诉他们“岛上一切十分不便”，仍然拒绝接见。

葫芦岛是看人打发的，对冯、阎的代表自然是“十分不便”，对蒋介石的代表张群、方本仁、吴铁城却是再便利不过了，后面这三位一直陪同在张学良身边，尤其张群和吴铁城，忙着和张学良一道“砌长城”还来不及！

山西方面曾经最早向沈阳派去代表（梁汝舟），还获得了“善意中立”那样一个好的开局，可惜的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如今沈阳早已没有他们可待的地儿了。

蒋介石在拉张上投入的本钱绝非阎锡山可比。蒋氏幕府中凡擅长交际，或与东北要员关系较好的幕僚几乎都先后被派往沈阳：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甚至何成浚在担任第三军团总指挥之前，也曾随方本仁到沈阳去客串了一把。

这些负责拉张的幕僚只要开口，蒋介石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委任状给委任状，真正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度。张群在赴沈阳之前，恰值银行休假，不能提出现金作为活动经费。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总部便致电沈阳分行，允许张群到沈阳后，可以随时支用款项。

从沈阳到葫芦岛，张群、吴铁城几乎每晚都要和张学良玩上八圈麻将。大家搓搓打打，相处得十分融洽。张学良虽然在麻将桌上不会明确表示什么，但是却会经常把薛、贾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告诉他的牌友。

薛、贾固然吃的也是策士这碗饭，逞起苏秦、张仪之舌，也非寻常人可比，可是要论这种曲线外交的功夫，却只能相形见绌、甘拜下风。况且就算会玩麻将，薛、贾也只敢赢，不敢输——阎锡山给的钱少，若是输光了，他们可能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在沈阳这块地面上，不会搓麻将和送钱，谁也不会管理你，更不可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囊悭术钝的这两个“老实头”只有傻乎乎地坐等张学良从葫芦岛返回沈阳，真是望穿秋水，度日如年。由于经费实在有限，他们还不敢久住沈阳，在坐了几天冷板凳之后，只能空手而归。

过了不久，张学良总算给阎锡山发来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他说要是你们的兵在平汉线打出武胜关，在津浦线打过蚌埠，东北一定响应。

此时西北军距离武胜关还很远，晋军在津浦线上别说打过蚌埠，就算想保住济南也面临着困难。张学良提出的响应条件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阎锡山收到电报后只能付以一笑，说：“（如果仗打得这么顺）何必还要他表示？都打了胜仗了，谁都会那样做。”

在太原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议论起来。大家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原来阎锡山给薛、贾等代表用于打点的钱很少，只有两千多元，那点钱就连张学良的门房都糊弄不过去，而蒋介石的代表们却可以无

限制地花钱。他们认为，张学良毕竟是一个花花公子，敌方挥金如土，己方却在那里土头土脑地办事，这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劝阎锡山放开手脚，也尽量满足张学良的胃口。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东北军中元老派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张学良在父亲猝然去世的情况下，能够诛杀杨宇霆等人，成为东北军新的军事领袖，仅凭这一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就判定张学良“断非花花公子，他是能够打军事算盘的”。

在云集太原的各个党派中，青年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青年党有不少人在东北，其中也有一些跟张学良有过接触。据青年党首领常燕生说，虽然人们经常只能在烟榻、舞场、赌台见到张学良，但张学良实际就在这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细心考察问题。

常燕生还说：“张学良不像老阎这样神秘。他与青年人只要相处得好，就会把话匣子打开来与你谈心。他说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这些家伙与他有杀父之仇，除了日本问题使他感到非常困难以外，别的问题他总有办法解决。”

常燕生得出的结论与阎锡山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样看来，他（指张学良）是很自负的，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

正是瞅准张学良别有怀抱这一点，阎锡山在遣使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另辟秘密管道，直接结纳张作相。张作相是杨宇霆之后，东北军“老派”（即元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对与蒋合作一直持反对态

度。他曾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老派"是东北军内部各派系中最为守旧的一派。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就属于"老派"，他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他像万福麟、汤玉麟等人也支持这种主张。

7月下旬，张学良再度就是否要出任南京委派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与张作相等元老相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三人皆劝张学良应继续"保持中立""随机观变"。万福麟还写了一封长电，表示东北如能中立最好，万不得已时，"则与其接近中央，莫如接近西北"。

不花钱也不一定就办不成事，只要你具备足够的头脑。这一回合，阎锡山虽然未能将张学良争取过来，但至少让张学良继续保持中立的目的是达到了。

重陷危机

常燕生在评论不应该把张学良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同时，还做出了另外一个预言："（张学良）很有机智，老阎斗不过他。"

尽管张学良以内部意见无法统合为由，依旧没有就任蒋介石给的职务，也不肯干干脆脆地出兵助蒋，不过他却为蒋介石取胜山东提供了一项极大的便利。

蒋介石计划派李蕴珩部由海路登陆青岛，以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所控制，登陆青岛

必须获得其同意。在蒋介石的请求下，张学良下令沈鸿烈大开方便之门，准许中央军停靠青岛码头登陆并加以掩护。

这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出兵助蒋。因为北方的近海海域都由东北海军控制着，只要得到东北海军的帮助，蒋介石一样能派兵从天津登陆，阎锡山的后方将大为动摇。

7月31日，中央军在津浦线发动全线总攻。对于正面进攻，晋军在后援的助力下尚能支持，但当十九路军突然从后路抄袭而来时，便再也招架不住了。

傅作义见无法抵御，只得下令后撤。晋军后方有一条大汶河，原来是一条干涸的河，但适值大雨，山洪暴发，河水很快就涨了上来。各部被迫争着从河上的铁桥通过，桥小人多，徒涉时淹死了不少人。后来为了防止中央军追击，傅作义下令炸掉铁桥，有些部队又被堵在了对岸。

傅作义以一个独立旅守泰安，欲挡住进泰山的隘口。不料十九路军充分发挥它行动迅速、出其不意的特点，置泰安城于不顾，越过泰山东麓，经一天激战，攻下了济南东南面的中宫镇。

在津浦线发起总攻的同时，韩复榘协同李蕴珩部、刘珍年部由胶济线发起反击。张荫梧败退至济南，他和傅作义一看十九路军已逼到了家门口，于是急传口令，仓皇渡河北逃。

黄河的泺口大铁桥成为晋军北逃的唯一通道，大家你抢我夺，都希望能迅速过河逃命。由于蒋军的飞机反复俯冲投弹，一列火车被当场炸毁，然后堵在了桥当中，铁轨两边的人行踏板则已失落多块，人马拥挤，使得桥上的秩序乱到了极点。

有的部队鉴于过桥太难，就用民船抢渡，结果由于载重过量，许多船沉到了河底，晋军官兵失足落水者难以计数，河面上到处可见向下游漂去的浮尸，其状惨不忍睹。

8月15日，蒋军完全占领济南。之后所有残留在南岸的晋军见过河无望，都陆续向蒋军缴械投降。

张学良曾经说过，只要蒋军能攻下济南，他就会出兵助蒋。就在蒋介石让门客们催促张学良兑现诺言的时候，一桩突发事件使他的拉张计划又重陷危机。

此前由于张学良在出兵助蒋问题上一直犹豫反复，迄无结果，蒋介石开始另辟路线，通过其他关系对东北军中下层军官进行拉拢。

他先后三次让人带信给驻于山海关的东北军大将于学忠，希望于学忠能举兵西向进攻阎、冯，同时表示于学忠想在华北得到什么样的地位，他均可答应。

于学忠不是东北人，他先后效命于吴佩孚、冯玉祥，后来才投至张氏父子麾下。不过张学良对他非常器重，于学忠也由此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重要成员及张学良的心腹干将，外人轻易无法拉拢。接到蒋介石的信后，于学忠一边将原信送给张学良看，一边回信蒋介石，说明自己只唯张学良之命是从。

在于学忠面前碰壁后，蒋介石又让何成浚继续想办法。何成浚过去在华北时曾委任其下属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陶敦礼后来出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按其资历，本不屑于担任这样一个芝麻绿豆的地方小官，之所以肯就此职，就是为了伺机对驻军临榆一带的东北军马廷福旅进行策动。

马廷福向自己的上级于学忠透露此事，意在旁敲侧击，劝于学忠同他一道行动，结果遭到了于学忠的拒绝：“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

接到何成浚的命令后，陶敦礼向马廷福开出了给予两百万元、马部扩编为三个师、马廷福本人升任军长的条件，其中的一百万元已提前汇入沈阳中国银行。

马廷福乘着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奉榆火车又正好不通的机会，决定率部向西进军。他带着团长孟百孚、安福魁等人来找于学忠，仍要于学忠和他们一道起事，安福魁还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是不干，就把他这么着。”说着，做出了砍头的手势。

于学忠见情况紧急，一边让他们稍缓行动，一边暗中向张学良进行了报告。

张学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表现出了不同于“花花公子”的另一面，他闻报后态度镇定，毫无惊慌之色，还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马廷福即将叛乱，我不相信。”

于学忠以为张学良真的不相信马廷福会叛乱，赶紧说：“事急矣，不可不防！”

张学良这才道出了他的隐忧：“马廷福如果真的受人愚弄，有此行动，我个人的安危事小，而暴露东北军的内部不团结、不一致，贻人耻笑事大。”

接着，他果断采纳于学忠的建议，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孟百孚、安福魁以及陶敦礼等人全部予以扣押。

事情见诸报端后，从平津到上海，均盛传“马廷福事件”完全由蒋介石所主使。受此影响，原本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张学良在对待南北双方的态度上突然发生转变。外界甚至认为蒋、张已经正式决裂，东北必定会加入讨蒋行列。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曾判断“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他在日记中感叹，张学良和阎、冯其实并没太大区别，“北方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陈，不能破除”。

对牛弹琴

蒋、张生隙，自然为阎、汪乘虚而入创造了机会。既然阎锡山已多次遭遇挫折，这次就轮到了汪精卫。恰值张学良又去北戴河“休养身体”，汪精卫就派幕僚郭泰祺以避暑为名，前去北戴河刺探情况。

郭泰祺早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张学良的幕僚顾维钧认识。顾维钧也在北戴河，他赞成汪精卫再派人来和张学良洽谈，并答应到时予以引见。

汪精卫决定派覃振、陈公博前往。汪精卫很清楚张学良的实力，早在他身在香港的时候，就给陈公博写了一封介绍信，让陈公博乘便去拜访张学良。当时外界都报道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汪精卫则说张学良这个人贪玩是贪玩，但脾气还算直爽，而陈公博也是个爽快人，他认为两人见面交谈后或许会很投机也说不定。

陈公博那时候整天忙于跟西山派的人吵架，一直无暇分身。后来汪精卫到了北平，时间是有了，可是当看到薛笃弼、贾景德在沈阳吃

了闭门羹之后，陈公博想想自己也是一介名流、国民党内的青年精英，岂肯再去丢这份脸。

现在情况有变，又听郭泰祺说那里的人事没有沈阳复杂，陈公博便硬着头皮决定随覃振一道去做说客。

当覃、陈抵达北戴河时，看到在车站迎接他们的，除了郭泰祺外，还有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郭泰祺以一种喜滋滋的口吻告诉他们，张群和吴铁城都跟着张学良来到了北戴河，不过张学良始终都没有和这二人深谈，看样子，张学良纵使不助阎，也决不会助蒋。

情况似乎比预料中还要可喜得多。按照计划，顾维钧打算次日在自己的别墅里请张学良和英国公使吃饭，饭后打麻将，他让覃、陈、郭晚上十点在别墅见面。

第二天晚上，覃、陈、郭如约而至。这时英国公使刚走，客厅里已经在为打麻将布局。趁着这一空隙，陈公博、覃振、郭泰祺，再加上张学良、顾维钧，站在厅外的走廊里谈起了话。

张学良好玩，谁跟他谈正事都只能像海绵一样挤出这么一点空，这也是覃、陈、郭能够对张学良游说成功的唯一机会。

覃、陈、郭三人之中，郭泰祺主要负责敲边鼓，不大说话，陈公博年纪轻，也不便多发言，担任游说主力军的是覃振。

覃振以《战国策》的口吻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说到他这次来见张学良，不但是要救中国，还要救张学良本人。

可惜覃老弄错了对象。张学良既不把这个所谓的“救中国”放在眼里，更不需要别人拯救。他说他姓张的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游说，他父

亲把东四省交给他，他就只管东四省的事，凡是对东四省有利的事他就做，否则免谈。

说了一会儿，张学良便起身告辞，说要入内解手。众人等了好久，他才出来，解释说是因为夫人闹肚子疼，他得照顾她。

其实都不是。后来陈公博才听人说，张学良吸毒，是吗啡针瘾发了，得让副官给他打了针以后才能出来继续谈话。

覃振的那些话，或许对张口闭口救中国的冯玉祥有作用，碰上喜欢听人讲政治经济的阎锡山，也可能会坐下来认真倾听，但对于谈几分钟就得打一剂吗啡针的张学良而言，几乎等同于对牛弹琴。

陈公博见状干脆单刀直入：“汉卿先生（张学良）的意思我很明白，但东四省是没有办法中立的。今日战事已成僵持的局面，我以为你不帮助阎，帮助蒋也是一个办法。”

“公博先生，你的意见很好，但无论如何，我非从长考虑不行。”张学良果然如汪精卫所说是个爽快人，陈公博出人意料的坦白终于让他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客厅里已再三催促张学良入场，谈话只得宣告结束。陈公博随众人走进客厅，只见里面珠光宝气，无数夫人小姐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方城中鏖战起来。

陈公博是个事业型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在国民党内居于高位。他平时就不好玩，国内所有的避暑胜地，除了牯岭因公去过两三天外，其他都没有去过，北戴河也是第一次来。说到打麻将更是不擅此道，仅仅和张学良等人摸了四圈后，他就跑回旅馆睡觉去了。

到底是不惯过夜生活的，陈公博还由此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三天便赶回北平。

一行人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可是如果照直这样说，不免会动摇己方的军心士气。于是就由覃振出面，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的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了恶感。

汪精卫在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时也说：“张汉卿（张学良）以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

张学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由郭泰祺带回，这封信也被汪精卫作为张学良对北方示好的证据。他说：“郭复初（郭泰祺字复初）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

北方政客们闻讯，自然一片欢呼雀跃，张群和吴铁城也因此愁闷了好几天，但知晓内幕的陈公博却断言，张学良将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其中立态度。

放出了大招

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早在“马廷福事件”发生时，他就对于学忠说：“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

到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关外的张作相怕张学良拿不定主意，曾致张学良一电，大意是说应该坚守原来的中立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其实张学良完全不需要别人这样叮嘱，他心里自有一杆秤，在给张作相的复电中，他说：“名分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很清楚对方的要价，他或亲自给张学良发电报，或通过何成浚、方本仁、张群、吴铁城等人，对“马廷福事件”再三进行解释，说明自己虽希望张学良出兵助己之心甚切，但绝不会背着张学良策动其部下，那都是陶敦礼这种“极愚妄者”才会做出来的事。

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为此，蒋介石亲飞济南，召集将领们开会，下令各军不过黄河，以便把北岸军事留给张学良去处置。

张学良时年刚刚三十岁，在这样的年纪就跻身中央要津，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军政第二把手，本来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如今又能扩大东北地盘，将势力扩展至华北，无论是为个人计还是为东北计，都不能不令其怦然心动。

蒋、张尽释前嫌。不过张学良这个“白相人”的胃口，早已经被关内那三个认真得像头牛的家伙给宠坏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还要继续观望，直到瓜熟蒂落，直到蒋、阎、冯被迫向他割出更多的肉来。

蒋军奉令不过黄河南岸，北岸的晋军则因为损失惨重，也无力发动反攻，两军隔河形成对峙。

津浦线、胶济线战事结束时，蒋介石虽将所有山东军政事务都交由韩复榘全权处理，在政治报告中也称“韩总指挥复榘深明大义”，但对是否要实现当初的诺言，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仍有些踌躇不决。

蒋介石是怕韩复榘仍与冯玉祥、石友三藕断丝连。最后曹浩森竭力为韩陈情，认为既然有言在先，就不应反悔，韩复榘这才如愿以偿地得以主鲁。

中央军在津浦线的反攻取得胜利，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八月攻势”却以失败告终，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转折点。从这时候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上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分别调至平汉、陇海两线作战。

平汉线原由何成浚第三军团负责，该军团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部包括上官云相师和郝梦龄师，自第三军团撤退至漯河后，王金钰本人就托病请辞，到莫干山休养去了，他的职位由上官云相升任，所属的两个师也都增援了陇海线战场。

除去王金钰，平汉线的主力就只剩下了徐源泉和杨虎城。杨虎城部驻于南阳，在前线打仗的实际只有徐源泉一家。蒋介石于是决定将第三军团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另由蒋军接管正面作战任务。

在津浦线获得的成功，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使他在战略上决定将大战之初的“先难后易”改为“先易后难”，即先解决平汉线，再考虑陇海线。

蒋军的进攻重点随之被移到了平汉线。这回蒋介石不再用菜刀，他要用斧头来砍翻平汉线上的南路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陇

海线反蒋联军的后方形成威胁，进而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到时陇海线亦能不攻自破。

两把“斧头”，分别是蒋鼎文师和赵观涛师。蒋军共分为甲、乙、丙三种师，三个师的兵员依次递增，其中丙种师两个团，乙种师四个团，甲种师最多，按一师三旅、一旅三团进行编制，有九个团。蒋、赵部均为甲种师，不仅兵员充足，而且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比西北军要好。两师一到平汉线，即对许昌展开进攻。

张维玺的南路军在西北军中虽不是最精锐的部队，但一样具备着西北军能打和敢打硬仗的特点，先前因为碍着一个樊钟秀，部队束手束脚，以致进展不大。现在见中央军威逼过来，身上所潜藏的凶猛之气得到激发，反而能够屡挫强敌。

交战过程中，张维玺打电话给绰号“王虎”的旅长王赞亭，下令他率部偷袭蒋鼎文师驻地。出发前，王旅官兵一律脱下白衬衣，并将之扎在脖子上，以识别敌我。深夜十二点，当他们摸到距蒋师阵地二十多米处时，每人向阵地投出两枚手榴弹，将对方炸得乱成一团，随后便趁机用大刀砍杀。

夜袭战歼灭了蒋师一旅主力。张维玺得知后报告冯玉祥，冯玉祥又通报全军嘉奖，后来天津的《大公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依计而行

斧头碰到钉子上，卷了刃。如此结果，颇令蒋介石尴尬，他这时又想到了“削藩策”中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的策略，于是决定继续派人对

西北军内部进行分化。

派谁去呢，这个人既要对西北军的情况熟悉了解，又要在北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起到一呼即应的效果。

不用去另借锣敲，眼前就有现成的钟可敲，张钫不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吗？只是张钫在经历亳州之险后，就有了引退之意，并曾想乘车去上海养病，是蒋介石让人中途在车站截住，又硬请回来的。

为了打消张钫退隐的念头，蒋介石便托劭力子等几个张钫的友人前去进行劝说。劭力子对张钫说："战事胶着不能解决，实为国家之患，地方人民都受其害。"

说完大义，劭力子又强调张钫纵使隐退，但只要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取胜，一样不会放过他，"你纵然不放一枪，冯也不会对你原谅"。

无论公谊还是私恨，张钫似乎都别无选择，照劭力子的话说，只能"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为国家效劳"。

张钫考虑之后，答应从命，但要求蒋介石必须满足自己提出来的两个条件。

张钫所提的两个条件，一是让蒋介石为他准备大宗款项和子弹，且由他自由支配；二是变更战略，准备在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

蒋介石眉头都没皱一下，就全部答应下来，张钫这才向蒋介石献计，谓如何如何采取行动。

他推断冯玉祥为人多疑，即使听到风声，也会因犹豫不定而无法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正确的对策。等到他这边部署既定，就算冯玉祥知道该怎么办了，面对颓势也已无法挽救。

只要西北军崩溃，收复中原便指日可待。这一前景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他当即任命张钫为第二十路总指挥，授权其依计而行，并再次承诺，张钫所需军饷和弹药，电要即发，决不迟误。

蒋、张都认为，计划要确保成功，必须“秘密而且迅速，使敌人措手不及，才能奏效”。第二天，张钫就乘飞机前往漯河，为了保密，仅带了一名随员。

张钫到漯河，对外声称是设立河南省府办事处，以履行河南省主席的职责，暗中却派人到西北军所属的各个杂牌军中去做分化收买工作。

在平汉战场上，从一开始，冯玉祥就把依附于他的杂牌军置于外围，不到万不得已，自己的主力部队始终都缩在里面，不肯拿出来牺牲。杂牌将领早就与冯貌合神离，加之给养困难，张钫把军饷、弹药一拿出来，没有多少人能抗拒这种诱惑。

从豫南的万选才旧部、樊钟秀旧部，到豫西的那些亦兵亦匪的各类杂色部队，均手到擒来，一一收编，西北军的外围防线由此开始逐渐瓦解。

外围一旦得手，张钫便按照预定计划，抽调部队到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一两周内完成，冯玉祥果然如张钫所说的那样，起初犹豫彷徨，等到要想办法加以阻止时，局面已经变得难以收拾。

前线的军事形势窘迫，后方的政治活动也不如意。本来阎锡山曾想靠汪精卫的帮助，以扩大会议的名义，在北平搞出一个声势浩大的阵营，可惜汪精卫虽然写起文章字字珠玑，谈起问题也天花乱坠，但做起实事来却问题多多，而且汪本身的号召力也还嫌不够，从而导致扩大会议的热度和对外界的吸引力一直呈下降趋势。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汪精卫反过来也觉得阎锡山太过刁滑，很难抓住。据说汪、冯曾在某处进行了单独会谈，汪以国民党军事领袖许冯，冯则对汪说："汪先生当然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

按照这种说法，汪精卫有意绕过阎锡山，以西北军为军事本钱与蒋对抗，为此他还在得到冯玉祥同意的前提下，专门派了一些改组派人员到西北军中去做工作。

不管传说到底是真是假，阎、汪都不再对扩大会议寄予很大希望，而想专靠军事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只有负责具体事务的人还在继续较真，比如冀贡泉。

关外的风向

在扩大会议的开幕式上，与会者选出了七人常委，但名单公布之后，南方的唐绍仪和东北的张学良都未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表示。

唐绍仪乃北洋和国民党的双重元老，选他只是借其名望，有没有其实并无所谓。张学良就不同了，这尊菩萨是不能缺位的。这时正好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应邀来到北平，他们都是公认的张学良身边要人，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常接近。冀贡泉便想到，只要能把这三人拉

进内阁当部长，就可以在实质上看成是张学良接受了阎锡山对他的委任。

冀贡泉将这一设想向阎锡山进行了报告，并在阎允许的情况下，在阎公馆宴请了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

不久阎锡山和赵戴文回太原商讨成立政府的事，冀贡泉则作为阎的代表继续留在北平，以照应扩大会议的一干事宜。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车站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刻到车站去进行谈话。

电话是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打来的。二人正在去往东北的途中，列车就要东开了，他们说想在车上同冀贡泉讲几句要紧话。

冀贡泉感到非常吃惊：不是马上就要成立政府了吗？薛、贾这时候跑东北去干吗，而且行色又是如此匆匆？

等冀贡泉赶到车站，听薛、贾一讲，方才知道原委。

原来这就是太原商讨的结果。阎锡山已经做出最后决定：暂不组织政府，而先由薛、贾出关去请张学良共商大事，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再组织政府。

吃惊立刻变成了失望，冀贡泉就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薛、贾出关毫无意义和价值。

张学良会因为薛、贾出关相请，就答应入关合作吗？怎么可能，要知道蒋介石也在派人请他倒阎、捉冯、赶汪呢！

冀贡泉说："小张（指张学良）正处于两难关头，你们（出关）顶好的结果，就是把扩大会议停滞起来！"

最坏的结果呢，只会适得其反，"小张先你们入关"，不过不是助阎，而是助蒋。

冀贡泉劝薛、贾给太原发电报，阐述自己的这一意见，但薛、贾表示阎锡山决心已定，不便再多此一举。

冀贡泉自受邀组织扩大会议以来，投入了极大热情和精力。预感到扩大会议将因此停滞，他不由得悲愤交加，当场很生气地对薛、贾说："去吧！我将'见君之出而不见君之入也'！"

其实就算薛、贾给太原发电，阎锡山也注定不会改变主意了。他的一位幕僚告诉别人："老总认为当前的任务完全要靠军事。军事不是靠硬打，关外的风向好不好，关系成败很大。"

由于拉拢张学良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山西方面都对此感到非常紧张。阎锡山虽然嘴上说只要张学良能够继续保持中立，"主张公道"，不转方向即可，也不一定要参加反蒋战局，但心中已十分焦虑不安。

薛、贾常出入于阎总部，自然能感受得到这种氛围，所思所想也就与冀贡泉出现了很大区别。概言之，扩大会议是次要的，组织政府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是探知"关外的风向"并使这个风向有利于阎方。

此前薛、贾已分别在阎锡山、冯玉祥那里得到了明确指示，来北平后又深夜谒见了汪精卫。汪精卫当时已经入睡，但仍从床上爬起来

接见并与薛、贾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他同样对出关请张十分关切。这种情况下，薛、贾又怎么可能再掉头转帆呢?

薛、贾原本准备出关，但是一打听，张学良又到北戴河休养去了，二人只好同去北戴河。

这次张学良倒没有让他们吃闭门羹。薛、贾在到达北戴河的当天黄昏，就前去拜访张学良。张学良也还算客气，在二人代表阎、冯问好后，同样问了阎、冯好。

接着薛、贾递上阎锡山亲笔写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蒋介石专横自私，排除异己，要救国必须倒蒋”。之后他们按照阎锡山的交代，对张学良展开游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人，他利用你的时候就用种种手段拉拢你，到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过河拆桥，一脚踢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就是例子……”

在薛、贾鼓动唇舌的时候，张学良始终精神萎靡，闭着眼睛在打瞌睡。眼见实在谈不下去，薛、贾只得告辞回旅馆去了。

大事不妙

都已经快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任何冠冕堂皇的说辞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也难怪张学良要打瞌睡了。

8月30日，张学良启程返回沈阳。薛、贾紧随而至，不过沈阳方面无人接待，连旅馆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现在薛、贾手上还有一份合作办法。这是他们借以打动张学良的最后希望，同时也是阎锡山能够拿出来的最后一点资本。

阎锡山固然有抠门的毛病，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是，到中原大战中后期，老阎确实已经力不从心了。

既要负担晋军，又要负担西北军和其他杂牌军，可怜阎府也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如此浩繁的军用开支，早就令他捉襟见肘，叫苦不迭。战争期间，阎锡山曾发行战时赋税通用券，也曾打算以富贺银矿、井陉煤矿为担保，向日本、美国借款，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其财政困窘的状况。

阎锡山坚持张学良并不是只知道死要钱的“花花公子”，因此无须像蒋介石那样挥金如土，但实际上他也没有钱去东北烧香上供。

乌纱帽早就抛出去了，奈何对方不屑一顾，张作相那条路子又不牢靠，最后剩下的办法便只有让出地盘了。

在合作办法中，阎锡山明确表示愿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永久让与东北，晋军撤回石家庄，与西北军共守郑州、洛阳。

阎锡山向来锱铢必较，精于计算，可谓“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现在轮到他在自己身上剥金刮漆，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合作办法的条文末尾，阎锡山特地添了这么一句话：“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谕。”

次日早晨，薛、贾带着合作办法前去少帅府拜张。这是薛笃弼第一次光临少帅府，只见大门口刀枪林立，警卫森严，客厅里富丽堂皇，陈设豪华，为其一生所未见。过了一会儿，张学良从楼上走下来

接见他们。贾景德把合作办法拿了出来，张学良略一过目，就把文件放在了茶几上。

没有想象中的喜形于色，更没有点头或者摇头的表示，只是普通地应酬了几句，张学良便表示今后将由秘书长王树翰负责接洽，随后端茶送客。

王树翰负责接洽，彼此也无法深谈，这让薛、贾十分苦恼。隔了一天，王树翰请薛、贾到他家吃饭。吃完饭后，又留二人打牌。贾景德对打牌搓麻将还比较在行，唯薛笃弼不擅此道，然而为了能在牌局结束时与王树翰谈正事，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勉强应付。

从太原启程时，阎锡山发给贾景德旅费一千元，冯玉祥发给薛笃弼旅费五百元，经费紧张得很，所以薛笃弼在打牌的过程中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就怕把他的费用全部输掉，连粥都喝不上或者连家都回不去。

幸好，输是输了，没有大输，否则薛笃弼非得当场晕倒不可。

好不容易熬到牌局结束，薛、贾终于得以和王树翰谈论时局，他们希望从对方那里知道张学良对合作的态度，可王树翰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令薛、贾完全摸不着头脑。

薛、贾在沈阳几乎是两眼一抹黑，薛笃弼一个人都不认识，贾景德的消息还灵通一点，当他们打听到，蒋介石的代表已携巨款前来活动时，两人都感到了大事不妙。

他们的消息已经迟了。在此之前，李石曾就已会晤张学良，两人再度商谈了东北军的出兵条件。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为

由，要求南京政府除即付五百万元作为军费外，再借公债一千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

蒋介石接到李石曾发来的电报后，照旧不打一点折扣地全部应承下来，同时电请财政部长宋子文予以筹措。

南京虽得到东南财团的支持，但宋子文在前线所需军费同样浩繁的情况下，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尤其是一千万公债，也让他感到十分难办。

见宋子文在复电中有所怨言，蒋介石批示道，如果不给这一千万公债，怕就怕张学良在出兵问题上又生借口，所以“请兄忍痛筹付，勉过此关为盼”。

有锡天下乱

你可以说蒋介石花钱没有概念，但是只要考虑到一旦平定天下，银子就不愁没有出处，他的这些大手大脚又无疑都是正确的。毕竟军事胜利决定一切，打赢了仗，一切皆有，打输了仗，万般皆空，而在中原大战持久不决的情况下，能够决定战争胜败的又只会是张学良，谁赢谁输可都只取决于他的一句话啊！

能答应的全部答应，不能答应的“忍痛”也要想办法答应。不久以后，蒋介石又承诺张学良，东北军只要入关，驻平津部队的薪饷也由中央负担。

阎锡山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也同样授予了这项官衔，而且含金量比阎锡山的还要大得多。

除了封官，蒋介石还许了一堆愿。他早就表示：“北方诸事托汉卿（张学良）全权处理”“黄河北岸军事，皆交汉卿全权处理”；北方官员以后都可由东北系统的人担任；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均由“汉卿”先行派人接收，俟时局稍定，再行荐员由中央委任；允许“汉卿”参与中央政府人事权，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是想过过官瘾吗，没问题，他们均可由“汉卿”保荐，进入中央政府出任要职，内政部、参谋部部长亦如是……

孰优孰劣，即便傻瓜都看得出来，何况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聪明机智。

随着东北方面消息的沉寂，聚集北平的政客们都消沉起来，会虽然还经常开，但赴会的人却日见其少。一些人甚至认定阎、冯、汪的事业已经陷于失败：军事既遭极大挫折，政治上又一无主张，一个政府折腾了数月都成立不起来。

眼见得再等下去将有散伙的可能，阎锡山只得放弃了“在张学良同意的前提下组织政府”的计划。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成立当天，张学良即婉拒出任国府委员，同时召回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让他们加入北平政府。不过张学良却又保荐并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东北系人马进入南京政府，并分别出任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事已至此，阎锡山只能指望张学良既不助己，也不助蒋，继续在关外保持中立，然而他在陇海线的大将杨爱源很快就送来了一个让他倍感失望的答案。

杨爱源探听到的消息的是，张学良准备率部进入山海关，而且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发动进攻。考虑到蒋介石已调集大部兵力于陇海、平汉两线，杨爱源深感情势危急，他对张樾亭等人说：“与其被击溃而退，不如先整师而退，撤据山西以自固，另外良图。”

张樾亭表示赞成：“对，战不胜就要退，保存实力，有本钱才能做买卖。”

杨爱源让人拟稿，并用特密电向阎锡山进行报告。

9月6日，蒋介石一面任命刘峙为陇海线总指挥，何成浚为平汉线总指挥，以郑州为目标在两线发起总攻，与此同时，他将平汉线以西的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组织多个纵队，分途向登封、洛阳挺进。

因为张钫的策反，西北军由杂牌组成的外围防线已经提前瓦解，加之蒋军士气高涨，与反蒋联军的情形相比，正好是一上一下、一正一反。总攻发起后，孙殿英、孙连仲便相继落败后撤，登封、洛阳方面也警报频传，张维玺鉴于两翼均遭威胁，不得不撤出许昌。

冯玉祥虽然不想在平汉线上大动干戈，但许昌失守超出了他的心理底线，于是急派冯治安率部增援。

蒋介石发动的这一波攻势倒替阎锡山下了决心。他一边给徐永昌、杨爱源下达密令，让二人做好向黄河以北撤退的准备，一边抱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似的心理，匆匆忙忙地在北平披上了黄袍。

在民国时代的要人中，存在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反而越容易“迷信”。仅以蒋、冯、阎、李四人为例，冯玉祥和李宗仁都没怎么认真上过学，冯玉祥虽然号称“基督将军”，但他对基

督教的诚意显然没法跟信仰佛教的唐生智比，而李宗仁更是对这些东西一概免疫。

蒋、阎则不同，说起来他们都是留日学生，然而“迷信”思想却根深蒂固。在南京参加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有一天适值放假休会，阎锡山让周玳陪他穿着便服一道去游无锡。无锡有座锡山，恰好与阎锡山的名字相同。阎锡山听说后，便兴高采烈地带着周玳一道前去游玩。

上了山，他忽然问周玳：“这里名叫锡山，为何没有锡呢？”

周玳哪里知道，于是他就向在旁闲步的一位老人打听：“老先生，这里叫锡山，却为什么没有锡呢？”

老人是当地人，随口解答道：“这里有句老话，‘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

阎锡山听罢，没有和老人做任何寒暄，就扯着周玳往山下跑。不但那位老人目瞪口呆，就连周玳也感到他举止反常，十分诧异。

过后周玳才想通，是一句“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犯了阎锡山的名讳，让他备受刺激。

迷信，迷信，人不迷于时事，又如何会信？

中原大战仿佛就正好对应着这一魔咒。作为中原大战的主要发起者，事是阎锡山挑起来的，自然是“有锡天下乱”，但他绝不希望得到“无锡天下安”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就不能是“无蒋天下安”呢？

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正式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就职，就是为了取好兆头，取其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亦表示阎某人今天是身登九五了。

由于时间上有四个“九”，北平政府也被称为“四九小朝廷”。有人打趣说，阎锡山其实是弄巧成拙，四九合起来是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这哪里是什么吉时吉日，分明晦气得很哪。

逐客令

说晦气，晦气就跟着屁股来了，杨爱源所探听到的那个最坏的消息即将从天而降。

9月10日，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张学良在会上首先发言，从这番发言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其实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和犀利的认识。

“老派”以阎、冯毕竟是北洋系统的旧人为由，极力主张宁愿联阎、冯也不联蒋，张学良说你们以为阎、冯是什么好东西？——“‘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当初入关与北伐军作战，请阎锡山与我们合作，并承诺我们绝不干预山西事务。阎锡山当时答应得很好，但为时不久，即将‘先大元帅’派往山西的使者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

张学良还提到，当年奉军大将韩麟春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就是因为阎锡山的失信而气愤病死的。

说起当年恨事，张学良虽不至于到“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的程度，但愤懑之情也已溢于言表。他认为冯玉祥的为人和阎锡山差不多，一向都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这二人应负其责。

你们是不是现在都觉得阎、冯可怜？活该，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就算抛开历史旧怨、派系归属不提，张学良也不觉得把赌注押在阎、冯身上会给东北带来实际利益：“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中央军已攻下济南，退一步说，即便阎、冯事如有成，他们也一定会决裂，而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事成之后还是会将东北摒于局外。”

至于扩大会议，张学良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他看来，改组派和西山派从来都是互相诋毁和谩骂，即便一时结合，将来也势成水火，难有作为。

骂完阎、冯，张学良也没放过蒋。他说蒋介石与东北并无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且亦“一具有阴谋的野心家”，从“马廷福事件”就可以看出蒋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

总之，阎、冯、蒋没有一个是好人，全是坏蛋。东北方面何去何从，不是看好人坏人，而是应该看倒向哪一边更有利于东北利益。张学良的意见是，在“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的旗号下出兵助蒋。

张学良讲完，张作相、张景惠等元老照旧持一贯论调，说什么保境安民，不过问关内事乃是张作霖临死前留下的政治遗言，应予遵循云云。与以往常作尊重元老的姿态不同，这次张学良表现得极不耐烦，说你们要是这样，我唯有辞职不干，接着便愤而退席。

顾维钧、王树翰、万福麟等人赶紧从旁协调缓冲，又把张学良请进会场。张作相也连忙对张学良让步："你是司令长官，你有不得已的苦衷，可以不遵守大元帅（指张作霖）的遗言。我和叙五（张景惠字叙五）为大元帅的部属，更可以放弃主张。你不必生我的气，由你做主好了。"

其实自杨宇霆被张学良诛杀后，所谓"老派"已无力量，东北军实是张学良所主导的少壮派的天下，张学良做任何决策，并不真的要看这帮老家伙的脸色行事。

张学良决心既定，东北四省的国民党员即致电南京中央党部，称参加扩大会议的人都是"军阀余孽，失意政客，野心党痞，不逞之徒"。

在未正式表明态度之前，张学良对驻于沈阳的薛笃弼、贾景德尚能表面敷衍，虚与委蛇，到了这个时候就要下逐客令了。王树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告诉薛、贾："汉帅（张学良）将通电请各方罢兵，以纾民困，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东北军即日入关，拥护中央，嘱告你们回去。"

薛、贾听了之后犹如天灵盖里被浇了一桶冰水，虽然他们事前已预料到大事不好，但没有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快。第二天早晨，两人即丧魂落魄地乘火车离开了沈阳。

目瞪口呆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措置”。由于这份电报的言辞较为隐晦，甚至赵戴文都还以为张学良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只有阎锡山心知肚明，反正也做好了撤退的打算，便当即拍发了一份倒填日期的电文，表示他在张学良呼吁和平之前，就已经准备退避三舍。

见到阎锡山的电文，正在北平主持扩大会议的汪精卫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让冀贡泉致电阎、冯询问究竟。当天深夜，他得到了“巧电”的全文，匆匆读过之后，他也没有注意到其中“静候中央措置”一句的分量，因此同样幻想张学良不致出兵。

第二天，汪精卫给张学良发去“皓电”，提出四项党政问题与张商量，说如果张学良真心谋和平，应该先把这四项问题解决了再说。

“皓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到了傍晚，汪精卫才得知，东北军已经动员，不由得大惊失色。

事实上，张学良在发表“巧电”的前一天，就已经在内部发布了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发表“巧电”的当天，他还在对天津《大公报》驻沈阳特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

张学良明白地告诉记者，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也不完全与南京政府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

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每隔三小时就发一列运兵车入关。这已是东北军历史上第四次入关，由于东北军将领尤其是“老派”将领多为土匪出身，部队军纪较差，所以以往三次入关，这支“胡子军”给关内的印象一直都不佳。

此次入关，张学良有了在华北站稳脚跟的打算，便有意改变东北军的这一形象。在东北军出发前，他对率部出征的于学忠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了倡导和平，促成统一。我把一切事情都交付给你听，你要往漂亮去做。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

于学忠了解张学良的心思。他说如果东北军只前进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如果还想要更多的地盘，则山西指日可下，并不用费太多的军力。但这样做，一者会得罪很多的人，二者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

张学良认为于学忠考虑得很周全，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

于学忠和晋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是同学，在行军途中，他就让人带信给徐永昌，说明自己是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此后东北军每至一地，就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以避冲突，而晋军也只好以阎锡山主张“礼让为国”和退避三舍为由先期撤退。

晋军陆续撤退后，于学忠率部于9月21日到达天津。获悉东北军大兵压境，齐聚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政客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埋怨“老派”真是不济，以致张学良被一众“佻达急利之徒”所包围，有人认为张学良出兵，暴露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戏院，哪一处不是张学良及其左右日思夜想的?

当然还有人一语道破机关：张学良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轻而易举间就能将华北收于囊下，他为什么不干?

让众人稍感安心的是，入关东北军系由于学忠率领。大家都知道于学忠跟徐永昌有同学关系，北平的治安又由兼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所掌握。据此推断，于学忠应该不会逼迫过甚，至少一齐再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还有时间。

这时北平政府只有阎锡山草草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其余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处于如此颓势下，除了那些特别想过官瘾的糊涂虫，稍微明智一些的，你就算是三顾茅庐，用八抬大轿去请，人家还高卧不敢就聘哩。

阎锡山尚在石家庄坐镇，汪精卫便牵头在北平怀仁堂临时开会进行商议。他首先表示要去山西，其他人听了都随声附和，于是便决定先撤石家庄然后再转太原。

阎锡山得知后来电表示欢迎。这让大家的心里又好受了许多，以为既有太原可以落脚，总不至于做“小张”的阶下囚了。

阎锡山拨来一笔款子，汪精卫给每人分发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不愿登车西逃的都可以各奔前程。会议一结束，人们便开始倾箱倒箧，搬取各种文件和器物。怀仁堂内人影幢幢，慌乱之状，颇有几分《红楼梦》中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

几经周折，弄到了一辆晋军的军需列车，大家将三十箱党部文卷装上车，之后乘车南逃。行至半途，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邓哲熙上了车。邓哲熙劝他们返回北平，并且说前方军事情况很好，后方不可轻易动摇。

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汪精卫等六名扩大会议的上层人物仍然继续南下，以便与阎、冯晤商下一步的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随邓

哲熙折回北平，对外宣称阎、冯即将回平组织政府。

第二天早晨，薛笃弼、贾景德自东北到达北平。从他们嘴里，赵戴文、邓哲熙等人才知道张学良这回是动了真格的，北平决非可以久留之地，于是又慌慌张张地撤出北平，乘车前往石家庄与汪精卫会合。

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

张学良出兵入关，把整个反蒋阵营都逼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担任反蒋联军总参谋长的刘骥特地向冯玉祥呈献上中下三策，并且恳切地说：“冯先生，我希望你取上策，万不得已才取中策，而下策是绝不能采取的。”

刘骥的下策是破釜沉舟，在郑州外围和蒋介石决一死战——即便冯玉祥想采取此计，他也已经有心无力，所以刘骥多虑了。

刘骥极力推荐上策，即在军事、政治已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避免和蒋介石决战，迅速退入潼关，励精图治，东山再起。问题是冯玉祥并不甘心如此了局，他仍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来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这样就只能取刘骥认为万不得已的中策了：以郑州为中心和蒋介石再打一仗，胜则乘机追击，败则迅速西退。

光靠西北军决战郑州，冯玉祥自己其实也无胜算，他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希望阎锡山能够抽调有力部队到河南。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但自己实力尚存，只要阎锡山能跟他一起坚持到底，局势仍有扭转的可能。

致命杀着

冯玉祥一面将宋哲元撤到洛阳一带，以确保从郑州到潼关这一交通线的完全，一面缩短平汉、陇海两路防线，将大部兵力集中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助下与中央军展开决战。

在派邓哲熙劝汪精卫等人保持镇定和返回北平的同时，冯玉祥已经派幕僚张允荣前去谒见阎锡山，陈说继续打下去的理由，并请阎锡山抽兵河南。

阎锡山还想把南岸的晋军都撤到北岸去呢，哪里肯再反向为之。他接见张允荣时态度消沉，连声说道：“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

张允荣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说：“退到山西再说罢。”

张允荣还想继续说下去，阎锡山即岔开话题。眼见话不投机，张允荣只得悻悻而归。

直到在阎锡山那里碰了钉子，冯玉祥才感到郑州决战是多么不切实际，但等他想弃中策取上策，把军队移到陇海线西段时，已经来不及了。

蒋介石的致命杀着并不是正面进攻，而是依张钫之计，截断西北军的西归之路。在平汉线以西，他安排各挺进纵队取洛阳、占潼关，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杨虎城部亦是挺进纵队中的一支。因为曾是西北军旧将，冯玉祥一直在拉杨虎城，这在当时早已不是秘密。何成浚率部撤退漯河后，主要也就是做杨虎城的工作。他把杨虎城安排在漯河的“军人之家”，天天喝酒玩耍，关系日渐融洽。

中央军取胜于津浦线，让所有跟随蒋介石的杂牌将领松了口气，暂时都收起了三心二意的投机念头。杨虎城对自己的部下说：“这一次

我们的生意做成功了。冯玉祥是个单干户，而且树敌过多，他一定会失败。”

杨虎城一直想在西北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在得到蒋介石授命后，即下令部队进攻龙门、洛阳、潼关乃至直达西安。杨部有三个旅、两个特务团，还有配合作战的别动队，在各挺进纵队中属于实力较强的一支。同时，杨虎城还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政治部以及农民运动组织者中收纳了许多人作为他的政治干部，这些人曾在河南组织过农民运动，在当地颇有群众基础，从而使得杨部在进军途中得到了河南当地民团和农民的不少协助。

负责防守郑州至潼关一线的宋哲元兵微将寡，手下仅有葛运隆、赵登禹两个师，无力抵挡杨虎城等部的冲击。早在9月17日，也就是张学良发表“巧电”的前一天，杨虎城便一马当先地攻破了洛阳附近的龙门天险。

龙门既破，沿陇海线西撤已不可能，西北军也就仅剩下了过黄河、退豫北一途。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扩大会议的人员在石家庄会合后，委员们和相关人员都已先行撤往太原，汪精卫和陈公博因为还要等阎锡山制订新的军事计划，所以暂时只能停留在石家庄。

观察局势，虽然晋军正在从山东平津撤退，但只要西北军在陇海线上还站得稳，反蒋阵营尚不至于全盘崩溃。汪精卫向陈公博提议，

说不如趁此机会到郑州去一趟，见见冯玉祥。

于是汪、陈在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天便乘着专车前往郑州。火车白天无法进入郑州车站，原因是每天都有中央军的飞机前来轰炸，要进站的话，必须算好时间，在黑白交接之时到达。

晨光微亮，专车通过黄河铁桥，随后进入郑州车站。在那里，冯玉祥已派汽车到站相接。

陈公博年纪轻，此前与冯玉祥素未谋面，有关于对方的点滴，都是来自各种传闻——有人说他冬天穿着大兵的衣服，可是里面却套着狐皮；有人说他请客好用粗米白菜，客人走后却大嚼鱼翅；有人说他在南京当军政部长时，放着政府提供的华丽汽车不坐，却和士兵一同挤货车；有人说他对手下的高级军官毫不客气，动不动就打军棍和罚跪。

这些传闻让陈公博对冯玉祥留下了一种特别古怪而且模糊的印象，由于前后反差太大，他甚至无法在脑子里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关于冯玉祥的个人图画来。

当然陈公博与冯玉祥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过交接。1927年，冯玉祥有意与蒋介石联合北伐，那时陈公博是蒋的门客，冯玉祥就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件老羊皮袍料。

后来陈公博离开蒋介石，跟着汪精卫到武汉去了，也就是在武汉的时候，他对冯玉祥的印象开始变差了。

陈公博早就听说冯玉祥治军很严，西北军的所有文武部属都要穿布衣，早上还要上早操，即便年纪再老，也不准缺了这堂课。可是他

在武汉所看到的却是，冯玉祥的代表每次来汉，无不大嫖大赌，冯玉祥的参谋长到了这个花花世界，同样是每天晚上都要在华商总会俱乐部打麻将赌博，而且赌得还不小，都是五百元一底的麻将局。

陈公博由此断定，冯玉祥在公开场合再怎么亲民和善于练兵，最终仍不免于败。道理很简单，水至清则无鱼，你制定的规矩太违背人性常理，部下根本没法做到，他们只有通过作伪来糊弄你，这种作伪一旦人人仿效并形成风气，迟早会导致全军崩溃。

现在军事上全靠冯玉祥支撑大局了。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部队会崩溃吗？这些都是陈公博迫切想知道和了解的。

和传说没有太大差别，冯玉祥果然以简陋示人，他的司令部设在离城墙不远的一间破庙中，他自己住在另一间小破庙的神廊里。几个人见面后，便只能在神像面前促膝而谈，天一亮，又同去墙边的一座棚厂内吃油条和稀饭。

中央军飞机轰炸的时间每天都是固定的，一般是早上八点和下午两点。到了上午八点，飞机真的来了。那时国内还没有防空哨的概念，只是前沿阵地见飞机经过，给城里打个电话，然后城墙上站岗的哨兵看到飞机飞近，再长吹一声哨子，就算发出空袭警报了。

西北军包括整个北方也没有高射炮，在飞机进入郑州上空后，一两门野炮对着天空乱轰一阵便对付了过去。

不过在陈公博看来，飞机远非决战的最有效武器。他了解了一下，中央军飞机的轰炸目标集中于郑州车站，但投的都是小炸弹，乃至于炸了一个多月，郑州车站都未受到损伤，只有几列货车被炸毁。

轰炸结束，一行人从防空洞里走出，到草棚去吃午饭。陈公博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桌上摆着一盘炖鸡、一盘猪肉、一盘蔬菜、两盘馒头，此外还有几个小碟。虽然并不丰盛，可也绝不像传言中所说的请客只用粗米白菜。

饭后到草地上散步，西北军的一位宣传处长告诉陈公博，冯玉祥吃饭一向如此，有没有客，饭菜都是这几样，外界宣传冯玉祥恶衣恶食，确实是过于夸大了。

看来冯玉祥的平常起居，倒还不是太出乎人情，陈公博对冯玉祥的看法至此有所改变。当然，冯玉祥治军过于严厉，以及陈公博在汉口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它们将来会对西北军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危害，现在还无人能够预知。

大事不好了

要认真说来，飞机轰炸对反蒋联军的威胁，还远不如那些窝里反的杂牌军将领。

访完冯玉祥，汪精卫和陈公博又在回石家庄的途中顺道去看了石友三。早在8月底，得知张学良将派兵入关，石友三就致电张学良，表示“即行撤兵北上，服从东北，愿效前驱”，随后便擅自放弃阵地，率部北撤新乡等地。

石友三原来负责在陇海线上掩护反蒋联军的左翼，他一声不响地往后一撤，留下了一个大空隙，使得西北军和晋军差点被中蒋军“包饺子”。石某如此逍遥，阎、冯却还不敢拿他怎样，就怕把他给惹急了，

真的造起反来。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前乘车经过新乡时，亦有此体会：从石家庄至新乡一线，几乎没有多少军队，如果石友三把专车拦截下来，他俩立刻就会成为俘虏。

拜访石友三实乃冒险之举，可又不得不做。当时阎、冯两军中都传说石友三已和张学良发生关系，阎锡山便再三恳请汪精卫顺路去看望石友三，希望借着汪精卫的面子，使石友三不好意思把这一残破之局搅得更残更乱。郑州会晤，冯玉祥也赞成这么做，于是汪、陈便在郑州车站预先给石友三打了个电话，准备车至新乡时见个面。

在汪、陈之前，薛笃弼和贾景德在南逃途中也曾在火车上碰到过石友三。石友三满脸骄气，看到他们也爱理不理。薛、贾气得不行，贾景德还写了一首名为《异军突起》的诗，以发泄胸中的愤懑。

石友三过去在浦口反蒋中，曾与汪精卫有过联系，并打过拥汪的旗号，所以他对待汪精卫不像对待薛、贾那样骄横无礼。汪精卫的专车一到新乡，他就亲自跑到车站来与之会晤。

汪精卫把石友三拉进车厢，对他说尽好话，并且说如果他的军队真的需要整理，退至新乡亦无不可，假使阎、冯因此产生什么误会，自己可以替他解释。石友三顺水推舟，解释自己实无反意，之所以撤至新乡，只是因为部队经过几次作战，亟须补充，可是阎、冯又不体谅他的困难。

交谈结束，几个人到车站上去散步。车站上站着石友三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新军装，军帽很高，样式与阎、冯迥然不同。

陈公博以为那是法国式军帽，甫一开口，旁边就有人低声说："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军的式样。"

谁还会怀疑石友三和张学良没有勾搭在一起？连军装都换了！陈公博的心里透过一阵凉意，他感到反蒋联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了。

回到石家庄，阎锡山已经把他的新军事计划拿了出来。此时陇海线的西北军、杂牌军，加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马。阎锡山打算在放弃河南的前提下，将这股力量集中于河北，先把东北军驱逐出关，然后再据黄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

阎锡山征求汪精卫等人的意见，陈公博以为不易实行。从晋军在山东平津的“退避三舍”中，他就看出晋军已失去了斗志，至于陇海线上的杂牌军态度如何，只要瞧瞧石友三的样子也足以令人心冷大半。

西北军曾是希望所在，虽然郑州会晤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一些，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证明内部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一天，刘骥正好来石家庄，汪精卫有意无意地对他说：“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刘骥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公博在旁边听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刘骥是西北军参谋长，他在汪精卫面前这样说，纵使不代表所有西北军的意见，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

西北军军心已变，晋军失去斗志，杂牌军又不足恃，陈公博的眼前飘过了戏剧中打败仗的将领常念的五字道白：“大事不好了！”

可是除了新军事计划，也再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了。汪阎讨论了很久，觉得只能这么办。

事情必须通知冯玉祥，怕来往电报说不清楚，阎锡山想请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南下郑州，他也陪同前往。

专车刚过邢台，有人前来报告，说石友三的部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已东向斜出大名，似乎正与东北军联系接洽。阎锡山闻言变色，他认为如果消息确实的话，此行经过新乡时必定凶多吉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石友三的俘虏。

踌躇片刻，阎锡山把专车分成两半，自己挂一个小机车北返，却要汪、陈继续南行。

阎锡山怕做俘虏，汪、陈也怕，但两人别无选择，只好仗着都是文人，又与石友三有过那么一点关系，大着胆子硬闯险关。

还算幸运，一路无人截道为难。天色微蒙之时，专车终于抵达了黄河铁桥。

这已是他们在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毫无睡意的陈公博透过车窗，看到河面上有一两只水鸟正在上下低飞，不由得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流亡大夫

郑州，还是在那座破庙里。听汪精卫说明来意，冯玉祥对新军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

这回倒是汪精卫有些犹疑起来：“这事办起来，恐怕会有许多困难吧？”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回答得斩钉截铁。

在西撤路断之后，有人曾向冯玉祥献计，说不如乘晋军已全部出晋之机，索性开入山西境内，从而使得晋、陕联成一气，这样仍可在西北形成一个局面。

冯玉祥既没有立即采纳，也没有明确否决。他倒不是说不忍心抢合作伙伴的地盘和饭碗，而是觉得还有必要拉老阎继续作战，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按照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西北军立足河北，进可击败东北军，换来战局转机，退可鸠占鹊巢，拿老阎的家当自己的家。对于早晚都要撤到黄河以北的冯玉祥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原则敲定，剩下来的细节就不是文人需要考虑的，那是武人的事。中午，冯玉祥、汪精卫休息睡午觉，陈公博跑到参谋室和西北军的几个幕僚一边吸烟一边闲聊。

这些幕僚认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已经无望，即便据河自守也难以挽救整个局势。问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有人主张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有人建议索性与张学良接洽，让对方给收编了算了。

陈公博感到特别心惊的倒不是幕僚们会有这些想法，而是他们在谈论时毫不避讳，说明类似话题在西北军中早已经公开。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

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

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

连锁反应

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

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

到。”

徐永昌一语惊人：“我们如抢先渡河，危险更大！”

他分析说，由于为西北军提供的给养不足，西北军官兵异口同声，都把责任推到晋军头上，对晋军怨恨很深。现在西北军正在黄河铁桥附近撤退，若两军争渡，很容易发生相互攻击的事件。一旦中央军乘此围歼，晋军、西北军都有全军覆灭之虞。

徐永昌素来行事缜密。开战之初，他就让阎锡山给他预备几百艘民船，阎锡山觉得诧异，徐永昌解释说在河南作战，不能不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光一座黄河铁桥是不够用的，还得用民船摆渡。阎锡山随即引起重视，并特地交代周玳置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几百艘民船也就都派上了用场，既避免与西北军争抢铁桥通道，又为己方顺利过河提供了保障。

10月3日，上官云相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中央军各部也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

当晚，徐永昌到达郑州，第二天上午即前去拜见冯玉祥。冯玉祥已搬到城北，住在一座野外帐篷里。此前他刚刚会见完吉鸿昌派来的代表，吉鸿昌让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老大：“你看我现在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大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

冯玉祥把这番话讲给徐永昌听，并且说：“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以守一个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

说到军费拮据，冯玉祥又说：“郑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钱，我们还要好好待一个时期。”

其实冯玉祥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当天，阎锡山、汪精卫都秘密来到郑州与其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冯玉祥在下午第一个过黄河，阎、汪亦于晚间离郑北返。

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西北军负责殿后的梁冠英接洽归降，被蒋介石发表为“讨逆军第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部是孙良诚的核心主力，梁冠英一降，孙良诚总部的手枪团也跟着受编，所谓西北军的“铁军”从此不复存在。

随着西北军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已无成功实施的可能。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再没有足够的实力攻占山西，打通陕、晋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都知道反蒋联军会垮，但垮得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分外吃惊。

民国初期，河南有一个叫岳维峻的督军，手下号称有七十余万兵。岳督军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与其他诸侯的鏖战中，不出两个星期，他那七十余万的队伍便烟消云散，岳维峻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陈公博当时看到这一消息时还感到极为骇异，以为即便这七十余万人都不抵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别人砍，两个星期也砍不完。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陈公博才明白什么叫军心离散不可收拾，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也领悟到了《史记》所记载的垓下之战

中，项羽的部卒为什么会在听到楚歌后一夜散尽。

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都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

眼看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为了能够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决定以“宽大”态度对待善后问题。10月上旬，受蒋介石之托，与西北军孰有历史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来到河南，与鹿钟麟商洽收拾西北军的办法。

马、张代表蒋介石，提出对华北的军事可以一了百了，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列举了三个条件，除了同意冯玉祥下野外，另要求由鹿负责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以豫西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当然，这不是白让你编的，得拨三百万编遣费过来。

若是放在战前，冯玉祥、鹿钟麟或许还能再把蒋介石当成冤大头宰上一刀，可到了如今这个境地，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老蒋已经胜券在握，他岂能允许西北军这个团体继续存在下去并和他作对？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不在乎拿出三百万，但他要的是把西北军化整为零，逐步为己所用，或者干脆一个个地予以消灭，一了百了。

谈判者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共同点，结果可想而知，双方虽然几经磋商，仍然毫无成效。蒋介石见冯玉祥不肯就范，便派兵继续向潼关发动进攻，以求彻底阻断冯玉祥退至西北收拾残局的希望。

比之于西北军，晋军各部相对比较团结。蒋介石一时无法将他们拆得一块一块的，便只能首先要求阎锡山下野。阎锡山和冯玉祥一

样，都不肯下野，为此他想到了要联络张学良。

在反蒋联军刚刚溃败的时候，阎锡山曾经对张学良极度痛恨，也做好了与之决一死战的准备。孰料张学良却公开表示，他受蒋介石之托出兵解决黄河以北纠纷，只为安定北方，并不想侵扰山西。

就和当初发的“巧电”一样，张学良此语给阎锡山造成了不小的错觉。阎锡山为避免下野，又打起了与张学良合作的主意，于是便派赵戴文等人到东北接洽。

阎锡山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可是在中原大战中，比他更精的是张学良。这位刚刚崛起，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北少帅绝不是对染指山西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往漂亮去做”，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全取华北的目的。偏偏阎锡山不知趣，硬要缠上来，张学良只好跟南京方面打招呼，让蒋介石来整治他。

蒋介石立即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措辞相当不客气：“你快走，否则轰炸。”

发现阎锡山赖着死活不肯走，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天天派飞机对太原进行轰炸，以后甚至连河边村都没放过。

飞机轰炸使得太原市面更加萧条，白天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只有掌灯以后才有人出来做买卖。金融也因之更显混乱，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报道：“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

经济困顿在令太原市民不堪其苦的同时，也让扩大会议的人深受威胁。许多人北上时拖儿带女，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萧瑟的秋风中

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的惶恐。

当初阎锡山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本意仍是指望“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但事与愿违，扩大会议不仅对阻止军事溃败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反过来沦为了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阎锡山人还在石家庄，汪精卫也不好意思单独为这件事去烦他，只好自掏腰包，给扩大会议的人每人赠送了五十元，以聊表雪中送炭之意。

汪精卫此举，固然让大家很是感激，可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些人初步得出教训，认为继续跟着汪精卫或反蒋都没有出路，今后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蒋介石，要么当共产党——后来确实有人投到蒋介石幕府，也有人参加了共产党。

作为改组派中仅次于精神领袖汪精卫的二号首领，陈公博能够深切感受到组织内部的这种动荡不安。有一天在山西大饭店的客厅里，他碰到了李宗仁的代表卢蔚乾，卢蔚乾问他：“衮衮诸公，有何妙计安天下呢？”陈公博苦笑作答：“怕不是衮衮诸公吧？”

卢蔚乾当即口占一绝：“诸公衮衮策升平，滚滚黄河骇浪惊。早识老西不中用，问君何事客并城。”

封建残余的小脚

“老西”不中用，老冯更尴尬。他现在是西行北上都无路可走——西行之路被杨虎城切断，北上之路又被石友三所截住，耐人寻味的是，杨虎城、石友三还都是他的旧将。

只能入晋了。在西北军分崩离析之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入晋，冯玉祥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反正你老阎不让进，我就打你。如今西北军残部实力有限，没准“打”字还没说出口，倒先让别人给灭了。

正是“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冯玉祥一路上都沉默寡言，心情抑郁。到得山西边境的晋城，他让人传话给城头，希望能大开方便之门。

晋城驻扎着晋军一个旅，旅长听说冯玉祥率部入晋，准备派兵阻击。县长认为事关重大，便劝旅长不要轻举妄动，他自己则率全县官民和士绅代表出城迎接。

阎锡山闻讯发来电报，要求不让西北军入晋，但为时已晚。既然已经进来了，老阎也就只好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退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暂时驻扎于晋城，冯玉祥本人及其总部人员则可由娘子关入太原居住。

冯玉祥到娘子关后，与阎锡山、汪精卫在车站进行了会谈，协商善后问题。冯、阎都不肯下野，也不愿接受蒋介石提出来的条件，同时，张学良又根本不可能与他们“合作”。三人商量一番的结果，只能据娘子关以自守，看看时局变化再说。

第二天，陈公博陪着汪精卫返回太原。汪精卫这么一回来不打紧，却把和他同住一家饭店的麦焕章给急坏了。

麦焕章也是李宗仁的代表，曾留学法国，本人喜好女色。倒霉的是因为和汪精卫住一起，以汪之级别，饭店门口自然要设警卫，这就限制了他选花征艳，为此十分苦闷。正好汪精卫去了娘子关，警卫撤

了，麦焕章以为汪精卫这一去，起码得有好几天不会回来，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招了一个小脚土娼前来伴宿。

他没想到汪精卫如此快就返回。汪回来，门卫就要重设，土娼也就不能出去了。无奈之下，麦焕章只好从外面将房门锁上，索性把土娼关在屋里。

麦焕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干着什么勾当。卢蔚乾和他一起去见汪精卫，碰巧覃振也在坐，覃振就笑着问他："麦先生，你那位贵相知还在房里吗？"

麦焕章大窘，一时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作答。大家都哄笑起来，连向来正经八百的汪精卫也忍不住笑了。

卢蔚乾问麦焕章："你为什么爱上了一个小脚女人呢？"麦焕章倒也回答得振振有词："你要知道我在巴黎和本国各大城市所搞的大足女子不知多少。到这个偏僻所在，封建残余的小脚也别有风味。"

才笑完麦焕章，这边大名鼎鼎的陈公博居然也"出事"了。

广东人陈树人无任何派系背景，但他与改组派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一天他带着老婆到戏院去听梆子戏，看到陈公博也在，而且样子非常投入。直到十点，陈树人夫妇离场回家，陈公博还没有走。

陈公博和汪精卫一样，私生活都比较严谨，不是麦焕章那样连"封建残余的小脚"都觉得别有风味的家伙。"公博捧戏子，真是奇迹"，陈树人马上把这件事传播开来，说陈公博既如此捧那位戏子，想来对方必定出色，大家不妨随兴去看看。

一传十，十传百，山西中央党部来了个空营而出，全都去“一睹芳容”了。

改组派的山西籍干部讨论了一下，认为值此危难之际，不应该捧女戏子，而且“公博同志”又是本组织内部有头有角的人物，还应更检点一些才是。

有两个人被大家推举出来，前去对陈公博进行劝告。陈公博得知来意却哈哈大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党员心思乱如麻

陈公博属于层次比较高的文人，在上海、香港等城市都见过世面。在他眼里，太原差不多是一个“荒凉的堡垒，古典的庙宇”，梆子戏之类地方戏曲当然也不会有多少欣赏的价值，更谈不上捧戏子了。可问题是晚上在太原无事可干，外地的报刊又找不到，就只能靠看戏打发光阴。

那一次陈树人离开戏院时，他本来也恹恹欲睡，但想到一个人回饭店还不是睡觉，于是便继续熬了下去。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管陈公博如何辩解，他捧戏子这件事都已经在太原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在争相打听陈公博所捧的女戏子究竟是谁。

因为那个女戏子并不是梆子戏里的名角，所以海报上都不刊登她的名字，但仍有好事之徒打听得出，其人艺名叫粉菊花，真名叫郭艳霞。郭艳霞由此一炮而红，都说她颇有姿色，唱腔清脆，色艺俱佳，

一时观众趋之若鹜，连覃振、卢蔚乾都慕名跑去观赏。覃振听完戏还吟了一首诗：“慢道香君情义重，桃花扇影总堪嗟。”

反蒋势力落败的颓唐之状，或许能与南明挂上一点钩，但要是说郭艳霞就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陈公博怕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过了一个星期，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到了太原。陈璧君对郭艳霞特有兴趣，一定要撺掇着陈公博带她去看。陈公博实在拗她不过，只好说如果陈璧君想看，他可以出钱请客，但亲身奉陪就免了。

陈璧君觉得这个条件不错：“好，这也使得。”她还很为陈公博着想：“我主要看她漂亮不漂亮。如果漂亮，传传谣言，倒还值得，倘若不漂亮的话，那倒太冤枉了。”

陈公博果真出钱买票，订了两间包厢请陈璧君等人看戏。晚上，陈璧君看完戏回来，从陈公博的房间经过时，就拍起了他的门：“公博，你真冤枉了。那个戏子不是不漂亮，而是太不漂亮。手臂全是黑的，黑得像起了鱼鳞！”

听陈璧君这么说，赋“香君诗”的覃振不信，他想办法把郭艳霞找到山西大饭店见面。近距离一看，手臂上还真是全黑的。原来郭艳霞本无丽质，在戏班中也原为下等角色，出名之前每天都要烧菜煮饭给别人吃哩。

扩大会议的秘书马小进是广东人，在公余之暇专好作打油诗以自娱。他和陈公博混得很熟，便信手写了一首咏郭艳霞的诗，诗曰：“国事真是丢那妈（‘丢那妈’为广东口语，骂人的话，意同于‘他妈的’），党员心思乱如麻。从来不喝山西醋，今日喜看粉菊花。”

马小进写了一打的打油诗，没有一首能流传开来，独有这一首却不胫而走。只是作者被张冠李戴，成了陈公博……

陈公博虽然确实没有捧女戏子之心，但其情绪之消沉却一窥即知。他和麦焕章恰好代表了民国时期有志于改良政治的两种人：一种如麦焕章，张口闭口反封建，但私生活中连小脚女人都不肯放过；还有一种如陈公博，有理想有主张，奈何在中国这片大陆上，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文人或政客，而是军人。

说来说去，要想局势有所转机，还是得靠军人。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他画了一幅晋祠周柏，画中柏树倾斜，水流其下，可谓韵味天成。画好之后，题诗者甚众，冯玉祥亦题一绝云："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

有人说冯玉祥写的都是"丘八诗"，不值一看，但他题画的这一绝其实还挺有气势和意境。为了"能耐风霜不畏寒"，10月8日，冯玉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共商下一步策略。

两人认为，既然蒋介石坚持要他们下野，梗着脖子死顶终究不是良策，不如先做点表面功夫，假装依允了再说。于是他们发出声明，声称要出国暂避，各自的军政事务方面则分别委托给鹿钟麟和徐永昌。之后，冯去晋城，阎回太原，对事务进行交接。

西北军得以退到黄河以北的残部，分别由孙连仲、张自忠、刘骥直接统带，其中孙连仲驻于豫北的焦作，驻于晋城的为张自忠、刘骥两部。在冯玉祥未来晋城之前，张自忠和刘骥已经商妥，两部合编成一个军，刘骥任军长，张自忠任副军长。责任分工上，张自忠负实际责任，刘骥则负责在外面接洽军队的改编和对各方面的联络。

冯玉祥到晋城，对外宣称是要在交代事务后出国远游，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要当甩手掌柜的意思。他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然后带到西北去谋出路，同时还有意继续扶植孙良诚统领各军。

在不报请冯玉祥的情况下，张自忠和刘骥就自行决定合编，摆明就是要另立门户。更何况孙良诚此时已无一兵一卒，谁又能服气让他来指挥自己呢?

进退两难

冯玉祥遭到抵制后，立刻认识到张自忠、刘骥是要抛开他来抓军队。他赶紧求助于尚在焦作逗留的鹿钟麟，并亲自发去电报："所有前后方部队均归予指挥，盼弟即日来晋城共商今后办法。"

自从与马福祥、张之江商洽失败后，鹿钟麟就预感到西北军前景不妙，要像以往那样做到左右逢源已不可能了。眼下且不说冯玉祥不肯放权，就是放权，到山西去做客军，过寄人篱下的苦日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比如当山西方面试探孙连仲是否愿意入晋时，孙连仲就回答得很直接："不客气地说，谁肯上山西受穷困去？反正我的队伍是不去。"

孙连仲另有打算，他派人到济南，通过韩复榘的关系去了山东。就连冯玉祥的卫队旅，也不愿退往山西，而宁愿随孙部一道行动。

作为"自行车国手"的鹿钟麟当然是最识时务的。他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边打电报给冯玉祥，说他即日将骑马前往晋城，一边

又对外宣称要派人前往沈阳去与张学良交涉。实际上他却秘密地搭乘秦德纯的专车去了天津。

刘骥闻讯心灰意冷，便也以到太原见徐永昌为借口，向冯玉祥请假，到天津躲了起来。

冯玉祥掌握不住张自忠，只好寄望于留在陕西的宋哲元、刘郁芬撑住局面。在西北军的将领中，宋哲元对冯玉祥应该说还是比较忠心的。他在洛阳时，收到过蒋介石空投的一张委任状，上面授命他为第二十四路总指挥，宋哲元看过之后就把委任状给撕掉了。

以后宋哲元率残部退至潼关，冯玉祥电令他和刘郁芬坚守潼关待援。刘郁芬原系甘肃省主席，宋哲元是陕西省主席，在宋哲元率部参加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又调任刘郁芬为陕西省主席。

主陕当然比主甘要好得多。刘郁芬见宋哲元回到潼关，怕他回西安抢自个儿的交椅，于是急电旧属孙连仲回陕，并暗中约定由刘郁芬主陕，孙连仲主甘。

为了达到强孙弱宋的目的，刘郁芬曾用大卡车给孙连仲送去棉军衣一万套、棉鞋一万双、现款十万元，而仅发给宋哲元两百件棉风衣和两千元钱。

实际上，中央军早将陇海线西段截成数段，孙连仲无法通过，以后也就渡黄河到豫北去了，刘郁芬输送给孙部的物资丝毫无助于潼关防守。

宋部撤至潼关时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应战，宋哲元因此商请刘郁芬派兵来潼关接防，以便将部队撤至后方整顿补充，待稍事休整后，

再来潼关换防。可是刘郁芬因为不愿意让宋哲元来西安，就借口部队不能调动，拒绝了宋的要求，同时也没有采取帮助宋哲元防守潼关的任何措施。

刘、宋关系由此严重恶化。恰在此时，冯玉祥又给宋哲元发来电报，说：“闻吾弟处亦有不稳之说。”

冯玉祥意有所指，所谓“不稳”明显是认为宋哲元有可能要步吉鸿昌、梁冠英等叛将的后尘。宋哲元看完电报后便伤心地哭了起来，说：“强敌当前，刘既见拒，冯又见疑，真使我进退两难。只有披发入山，以谢团体。”

入夜之后，宋哲元即秘密带领数名幕僚和三百余名手枪队员，潜行渡河到了山西。当时山西方面有人主张阻宋入境，已经代阎锡山处理军政事务的徐永昌提出不但不要阻挠，还应妥为接济，“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10月26日，在宋哲元逃往山西的第二天早晨，杨虎城部探悉了这一情况，于是马上西进，结果未遭任何抵抗，便得以安然进驻潼关。

宋哲元不会回西安了，可杨虎城也打到家门口了。刘郁芬对此毫无准备，急忙以视察渭北公路为名逃往山西。

刘郁芬一到渭北，就被当地民团给包围了。杨虎城的部下赵寿山闻报，派员与刘接洽，同意在交出武器的前提下，派兵保护他去山西。刘郁芬等人不得已将武器全部交出，这才得以渡过黄河。

进入山西境内后，有人劝刘郁芬去见冯玉祥，刘郁芬哪里还敢再去触碰老冯的霉头。对方劝之再三，他怫然变色：“大哥如再相强，我

就只有自裁！”

无人无枪的刘郁芬先是选择了和鹿钟麟、刘骥一样的道路——到天津做寓公。后来又不甘寂寞地投靠了蒋介石，在南京做了一名军事参议。

听到杨虎城占领西安的消息，冯玉祥这才完全陷入绝望，不得不离开军队前往太原晋祠隐居。在他身后，那支他曾经惨淡经营达二十余年的军队也随之发出了如冰山崩裂般支离破碎的声音。

有熟读三国的好事者如此评论冯玉祥：“其人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然运只袁绍耳。”

离别

阎锡山的疑心不像冯玉祥那样重，事务说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但他仍不肯离开自己盘踞长达二十年的老巢。他打算继续指挥晋军固守娘子关，到实在守不住时，就退陕西、走宁夏。

就算老阎仍有“能耐风霜不畏寒”的精神头，他的军队能不能做到还是两回事。晋军士兵都舒服惯了，中原大战中远征河南、山东已令他们叫苦不迭，再要背井离乡、千里裹粮，事实上绝不可能。况且西北又以贫困著称，西北军这次之所以会在大战末期崩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害怕重回陕甘。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民间的支持率也在下降。虽然地面尚无兵火，但中央军飞机的轰炸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了恐惧——其中有两

次轰炸都伤到了人。大家都希望阎锡山早日离开太原，以免民众遭受池鱼之殃。

内外夹攻之下，阎锡山终于坚持不住了。某天一大早，他把徐永昌叫过去，对他说："看来我是非走不可，否则无办法。"随即又问徐永昌，对应付眼前局面有何办法。

这时候的张学良已在沈阳正式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会晤时，蒋介石再次宣布将黄河以北的事务全部交给张学良料理，蒋、张关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张学良声称会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华北问题。徐永昌据此判断，山西方面即便无法与张学良进行合作，但对方也不会骤然对山西动用刀兵。

万一东北军真的打山西怎么办？徐永昌过去有与张学良作战的经验，他认为张的部队不足虑，亦不足畏。

阎锡山不能说徐永昌的主张没有道理。不过他还是建议向蒋介石和张学良同时派去代表，或至少向南京派去代表，"这是万不可少的做法"。

徐永昌却哪边都不肯派代表，认为既然已经打了败仗，再派代表很丢脸，而且也不知道该让代表说什么。

阎锡山见徐永昌连南京都不愿派去代表，顿时就急了，说："是不是你不想应付这一局面？"

为了说服徐永昌，他特地引述了一段周文王遭难脱险的典故："文王拘于羑里，是用策略脱身的，你最小限度也应当有个策略以保残

局。我看你最好还是向双方派代表，如果能派不派，能做不做，简直是要坐待其坏。”

徐永昌听完后仍然不以为然，阎锡山为此愁眉不展。两人对坐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其实时局恰如徐永昌所分析的，蒋军不会过黄河，张学良又一意取巧，如果阎锡山派去代表，反而可能正中张学良的下怀，他又可以像耍薛笃弼、贾景德那样把山西耍得团团转了。倒是徐永昌的不卑不亢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感到难办，生怕将山西逼得过急，从而骤生剧变，在华北引起连锁反应。

一番商议后，蒋、张提出了新的和平条件，表示只要阎锡山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全，对山西军队也不会进行分割。

山西和晋军都是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当然求之不得。于是阎锡山立即正式给蒋介石发出电报，承诺会于12月1日经石家庄赴津，然后乘轮船出国。这一行止路线与日期也同时电告驻北平的张学良。

此时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还在太原开约法会议，并且已经完成了约法草案。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约法和宣言。次日，该约法和宣言即以扩大会议的名义予以发表。

在宣言中，汪精卫指责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结果“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

给蒋介石戴的这些帽子中，起码个人独裁是不冤枉的，那所谓的“削藩策”可不就是封建帝王们曾搞过的吗？在汪精卫等人看来，制定约法就是为了以民主的精神来限制蒋介石的专制。可问题是到了这种境地，又靠谁来执行和监督约法呢？

随着山西代表络绎前往北平，太原显然已非政客们的久留之地。汪精卫决定将扩大会议移至天津，在他们离晋之前，阎锡山专门从山西省银行拨出纸币一百万元，作为扩大会议移津后的秘密活动经费。

阎锡山所表现出的难得的慷慨大方，更加重了人们离别时的感伤。继冯玉祥之后，汪精卫亦在“晋祠周柏”上题诗，只不过情绪已大为低落：“枕流端为听寒泉，别有虬枝接上天。此树得毋通卧佛，沉沉一睡二千年。”

11月1日，汪精卫等人改装易服，星夜潜离太原，经大同、北平转赴天津。途经雁门关时，面对古长城的残垣废墟，汪精卫感慨万千，遂赋诗一首：“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汪精卫终究没有能够逃过历次和蒋斗法无一得胜的厄运，也没有从一落败就暂时丧失斗志的规律中摆脱出来。他在天津发表宣言，声称“愿作在野派”。陈公博对此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充足：以中国的现状，南京怎么可能容纳在野派？

报纸上很快就登出了汪、陈破裂的电讯。陈公博随即离开天津，奔赴香港。陈公博前脚一走，汪精卫便按照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在天津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派，之后他便乘船经长崎转赴香港。

至此，喧闹一时的扩大会议也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呈现在旅人们眼前的依旧是茫茫黑夜、滚滚波涛，依旧是古老磨盘上周而复始的一个又一个轮回。

关河五十州 ★

四

四川王和他的天下

铁血川军团系列

关河五十州★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王和他的天下 / 关河五十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10

（铁血川军团系列）

ISBN 978-7-5143-7294-6

I．①四…　II．①关…　III．①刘湘（1889-1938）- 人物研究　IV．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1527号

四川王和他的天下

作　　者： 关河五十州

责任编辑： 张　霆　邸中兴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4.75

字　　数：365千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7294-6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乱世枭雄
第二章　隆中对
第三章　恶的诅咒
第四章　皇叔幽灵
第五章　瘾君子
第六章　真命天子
第七章　一川不容二流
第八章　五龙闹川
第九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第十章　夹缝里求生存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乱世枭雄

在刘湘显山露水之前，熊克武已经成名很久，川军的历史，也正要从这个人开始讲起。

熊克武名字中的“武”字，无意中透露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无比焦躁的情绪：它曾经以文明著称，但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下，也不得不走上以武自强的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间出现了一幅著名漫画，画上豺狼虎豹全都扑了过来，偌大的东方国度眼看将被撕扯到四分五裂。此时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意识到，不改变不行了，于是变革大潮汹涌而至，很快就将包括熊克武在内的无数年轻人卷入其中。

熊家曾经寄望于熊克武的是子承父业，做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中医，但熊克武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医人不如医国，谈文不如论武，只有投笔从戎，用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武装自己，才能抵御入侵。

方向已经定位，年轻人需要的是一个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机会。

说起来，中日两国其实最早都是以欧美为师，只是两个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甲午战争，曾经不显眼的日本竟然后来居上，一举反超了曾经很辉煌的中国。伤你最深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最有本事的人，中国人非常想知道的是，这个东瀛小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

成功秘诀。为了寻找答案，日本从此正式替代欧美，成为中国海外取经的第一标杆。

留学日本有公费和自费两种方式。公费当然是好，可问题是设有门槛，非得在国内就是优等生不可，熊克武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留给他的只有自费。可是自费又需要很多钱，如果以此画线，经济状况一般的熊家就只好干瞪眼了，幸亏熊克武的叔父经商有道，每年都能赚取数百两银子，足够供给侄子学费。

在叔父的支持下，1903年冬天，熊克武启程赴日。人生的樯帆已经扬起，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好理想也似乎指日可待，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它的轨迹却在中途发生了变化。

醍醐灌顶

熊克武要学的是武，但按照清政府规定，只有公费生才能被保送进入日本官办军校，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振武学校。熊克武的运气还不错，当他来到日本时，已经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就读于日本私立军校东斌学堂。

当时在国内尚无立足之地的革命党正在日本积极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和动员，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中迅速得以蔓延。某日，熊克武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来到了东京。

太好了！熊克武到处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临时住所。

1905年7月25日，这是熊克武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孙中山一见面就问他：“熊君在此学什么？”

得知熊克武在学习军事，孙中山又问：“为什么要学习军事，你认为学来有什么用？”

答：“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

令熊克武感到意外的是，孙中山断然加以否定：“熊君错了！”接着，这位未来的国父侃侃而谈：“当前国势如此微弱，并非仅仅因为军事不如列强，不如的地方很多，那么根子到底出在哪里呢？就在于清廷腐败！”

孙中山循循善诱地对熊克武说，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不可能真正使用和善待人才，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们肯用，也来不及了——等大家好不容易学成回国，国家已经亡了。

对熊克武而言，孙中山的话绝非空洞缥缈的大道理，而是触目可及的事实，仅仅从先前清政府对待他们这些自费生的态度来看，一腔热血换来的极可能是报国无门。

曾经的踌躇满志，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茫然，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孙中山把答案告诉了熊克武，那实际上是革命党的基本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叫作醍醐灌顶。就在这一刻，它属于熊克武。此后的一切均顺理成章。1905年8月19日，熊克武加入了同盟会。

履行完宣誓仪式，孙中山把他带到隔壁：“祝贺你，自今天起，你就不是清人了。”

加入同盟会的川籍留日学生共有数十人。熊克武参与了同盟会总部的机要工作，在他所要掌握的联络暗号中，被清晰地打上了民族革命的印记——

问：你是哪里人？答：汉人！

问：持何物？答：中国物！

问：做何事？答：天下事！

革命党人口诛笔伐的“腐败清廷”可不是木头，东京的热闹景象让他们倍感惶恐和吃惊，他们急忙动用外交牌，请求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加以管束。

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要拓展自己在东三省的利益，自然不能置中方的要求于不顾。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新规则，规定中国留学生不管是进入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律必须由驻日公使出具担保。

留给自费生学习军事的唯一一条出路也被堵死了。新规则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强烈反弹，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罢课抗议，一部分人决定直接罢课回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鉴湖女侠秋瑾，熊克武也名列其中。

袍哥

留学生回国后，有的兴办学堂，比如秋瑾，有的组织武装，比如熊克武，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发动起义。

同盟会总部经过分析认为，长江流域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四川又位居长江上游，因此必须第一个拿下来。

革命党人多数由白面书生演化而来。要发动起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寻找同盟者，后者得天不怕地不怕，敢造反能造反。恰好巴蜀盆地最不缺的就是此类好汉，这就是哥老会，当地称为袍哥。

清末的江湖组织并不是只知道收取保护费，或者为了一己私怨打打杀杀，人家除了吃饱饭外，还有政治上的理想追求，比如袍哥就是如此。袍哥创立于明末清初，其宗旨是“反清复明”，两百多年过去了，甚至连他们自己对辫子旗装之类都已习以为常，却从未放弃当初的誓愿。

革命党要“驱逐鞑虏”，袍哥要“反清复明”，大家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志。在熊克武回国之前，袍哥中的舵把子佘英已受到革命党的格外关注。

舵把子相当于江湖大哥。佘英高大魁梧，义气盖云，在会党中拥有极大号召力。更为难得的是，他忧国忧民，倾心于《革命军》和《警世钟》，并在群众中广为宣讲。据说当他在市井演讲时，“听者如堵”，围观民众没有不被他打动的。

经川籍同盟会员相邀，佘英赴日本拜谒孙中山，随后加入了同盟会。熊克武在确定起义地点时，考虑泸州是佘英的家乡，袍哥力量又很强，遂将泸州定为四川的首义之地。

想要攻打泸州，光靠本地袍哥还不够，须从外地增调会党，但这样无疑会带来一个问题。试想一下，一座小城，一下子轰隆隆地涌进来这么多不速之客，官府的神经再迟钝，也免不了被触动。

佘英是泸州当地人，他想到了办法。泸州有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节日期间，到处人山人海，周围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很多，几千人插进城来不算什么，不会引起官府的特别注意。

办法不错，缺点是时间太紧，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武器和人员来不及准备。顺着日历再往后面翻，大家都把视线聚焦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

190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九。当天是慈禧太后的寿辰，和其他地方一样，泸州官府要跟在后面拍马屁，忙前忙后，粉饰太平。假如在这一天发动，准保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众人一致决定，利用端午节陆续向泸州城调集人马，最终在11月14日这一天举行起义。

尽管事前已经反复推敲，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首先是武器准备方面出现意外，熊克武等人在手工制造炸弹时不小心引发爆炸，不仅伤了自己人，还惊动了官府。其次，党人们来得太晚，当他们齐聚泸州时，龙舟赛已经结束，又没有其他赶集一类的活动，所以尽管众人的身份都改换成了客商，可是仍不免惹人猜疑。

起义的保密工作做得也不尽如人意。相关消息在袍哥内部不胫而走，而且已经传到了社会上。有人在外面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出现了，他不久就要做皇帝，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泸州知州杨兆龙是泸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爆炸案虽然并非发生在他的辖区内，但仍给他敲响了警钟。接着，底下差役报告，说泸州城内外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把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都挤得满满的。加上越来越多的民间传言，杨兆龙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他为此如坐针毡。

苦思之后，杨兆龙向佘英发出邀请，请他入衙议事。

在从江湖大哥转变成为革命党人起，佘英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认为接近杨兆龙，可以在起义前刺探官府情报，甚而争取杨兆龙，因此没怎么犹豫就决定赴约。

等待他的是一个陷阱。官衙里面内藏杀机，持刀拿枪的堂勇奉命埋伏在帐后，随时准备冲至堂前。

如果佘英被随从前呼后拥，又或者入衙后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杨兆龙早就下令捉拿了，可惜都不是，只见佘英单人独骑，神态自若，与他原先的想象和预测大相径庭。

在和佘英客套几句后，杨兆龙找了个借口溜进内室，让幕僚们提供意见。这些幕僚各抒己见，有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佘英既然敢单刀赴会，又如此镇定从容，说明他心里没鬼，民间传言或许只是谣言。还有人心有余悸地说，佘英是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能量惊人，就连官衙的差役堂勇也多半是他徒弟。万一传言不实，草率拘捕，闹出乱子可怎么向上面交代?

杨兆龙被说得忐忑起来，一时难以决断，而他的犹豫不决，恰好为佘英提供了脱身之机。

症结找到了

幕僚们没有说错，很多堂勇实际就是隐藏身份的袍哥。见知州久不露面，其中一人给佘英悄悄咬耳朵，当然用的都是暗语：“大爷，水涨了！”

水涨了，就是事泄了。等杨兆龙拿定主意，下决心要将佘英扣下时，佘英已经在堂勇们的掩护下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明知事泄的情况下，熊克武被迫做出临时调整，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孰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官府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后对客店进行大肆搜查。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难以形成呼应，在泸州发动起义失去了可能。

虽然第一枪哑了火，但熊克武并没有放弃起义计划，他转而启动后备方案，组织革命党人分路奔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一旦起义成功，影响也更大，而从情报上看，11月14日那天晚上，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会府”。

会府又称万寿宫，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并不是要向傀儡皇帝问好，而是为了给掌握朝廷实权的太后祝寿。这样就更没人敢缺席了，要想将成都的大小官员一网打尽，这是最好的时机。

按照计划，泸州起义的主力以袍哥为主，成都起义的主力则是新军。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无力已成

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根据清廷的安排，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清廷编练新军的部分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也差不多，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可是对革命党来说，比之于守旧的绿营八旗，这些洋化的新军更容易进行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反过来成了同盟会的秘密武装力量。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再到正规新军，都隐蔽着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也不在少数，仅泸州就将调去三千人，早已集结于成都的会众更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泸州一幕竟然再次在成都上演：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段比泸州知州杨兆龙更为老辣凶狠。新军和弁目队里的内线全部暴露，不是当场牺牲就是遭到通缉，熊克武、佘英等人还被列入了重点通缉的首要人犯名单。

泸州、成都起义相继失败后，熊克武又在叙府（今宜宾市）策动起义，然而这次同样没能摆脱失败的怪圈，而且仍是被官府抢到先手，随之使整个行动胎死腹中。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个泉眼的痕迹也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死。在接下来的时

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把渔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竭力想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从三次起义的策划阶段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赛龙舟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时机都把握得不错，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需要检讨的是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已退居幕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和新军的地下人员。

熊克武猛一击掌，症结找到了！

同盟会在新军里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落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终于可以勾勒出来了。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袍哥走漏消息后，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根本难以占到上风，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熊克武等人变得豁然开朗，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是得靠自己。

起义失败的教训提醒大家，武器非常关键，也就是说手里一定得有枪杆子，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可靠而又强大的同志军。

拼命三郎

1908年2月，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通过同盟会总部，从日本民间购买到了枪弹。当他押运枪弹，秘密返回国内时，忽然注意到，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顶大多被摘掉了，有的虽然还在，但也染了颜色。上前一打听，原来跟慈禧太后有关——祝寿不能挽救寿命，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

国内正在举办国丧。在此期间，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别说瓜皮帽上的红顶，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熊克武意识到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契机，于是立刻展开了精心筹划。

之前发动起义，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当地官府已是戒备森严，再要插进去比较困难。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地理位置相反的川东北，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警戒方面相对疏松，而且州署旁边只有一个保安营。

1909年3月1日，同盟会在广安待机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起义都不同，这次将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并由熊克武亲自指挥，以攻打广安州署。

同志军人数不足，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从日本运来的武器也以子弹为多，配备的长短枪很少。熊克武采取的方案是兵分两路，除同志军外，另由佘英召集会党，从保安营夺取枪械。

当天，熊克武派人去和佘英联络，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佘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

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广安当地的会党并非佘英的旧属，他们参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仍没见到钱的影子，众人不干了。

这不是普通营生，舍了一身剐，要把皇帝打，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你迟迟不给，算搞的什么名堂?

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他既是四川同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又出于实际需要，由佘英介绍，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得知佘英陷入困境，熊克武急忙赶去城外，对情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钱要给，事情也要办，等钱运到了，必然一个子儿不少地补发给大家。”

这边刚帮佘英解了围，眼看着天就黑下来，起义时间到了。广安城里，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士兵们也不甘寂寞，有的上茶馆，有的去酒肆，要出击的话，实在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

熊克武飞奔回城，进行统筹指挥。人数不多的同志军化装成警察，一路押着“犯人”混进了衙门，随后短枪齐发，将门卫撂倒在地。州署外府本来就没多少值班堂勇，见到如此场面，全都被吓傻了，短时间内便逃散一空。

同志军很快就占领了外府，剩下的任务，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直到活捉知州为止，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向熊克武迎面袭来。

按照计划，佘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实施突袭。州署附近就是保安营，也就是说，现在保安营方向也应该是枪弹声齐鸣了，可是那里却一片寂静，寂静到可怕。

熊克武预感到，袍哥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假如这一路行动失败，未受牵制的保安营必然不会置州署于不顾，他们会包围上来，与里府尚存的堂勇对起义军形成内外夹攻。

熊克武果断改变了活捉知州的计划，转而指挥人马向保安营发动进攻。保安营的营房和州署一样空虚，在熊克武率部冲进去后，大部分房间都显得空空荡荡，仅几个房间有少数士兵留守，见起义军杀入，他们吓得躲到墙角瑟瑟发抖。

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通往外界的要道，一边派人联络佘英，让他带会党赶快来保安营搬取枪械。谁知左等右盼，佘英始终没有露面，相反，州署内却咚咚咚地敲响堂鼓，发出了调集援兵的信号。

城内外的官军正不断赶来，继续坐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完蛋。熊克武只得下令撤退，大队在前，他带着两个人拖后掩护。

他们刚刚才跑出保安营大门，就从州署方向就追来了一群堂勇。因为开枪怕暴露目标，熊克武收起手枪，拔出马刀，上去就是一阵乱砍。

早年的革命党人都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好汉，堂勇们完全不一样，上班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都指望着别人上去挡刀锋，做替死鬼。可是一家人做饭，谁天生是上灶的？你不肯卖力，我不肯卖力，结果是全都畏畏缩缩，熊克武等人趁势突出了重围。

夜色深沉，厮杀之中又无法保持联络，在熊克武突出重围后，才发现自己落了单，其余人早就冲出了城。他向城门口跑去，两个官军正要关上城门，熊克武二话不说，先一刀砍翻一个士兵，另外一个士兵吓得一愣神，还没反应过来，熊克武已经远去无踪。

广安起义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与官军面对面较量，尤其熊克武表现出色，不仅判断和处置果敢，而且在与敌人近身搏斗时也毫不畏惧，犹如一个拼命三郎。

断蛇坡

在四川境内连续组织和发动四次武装起义，熊克武要想不引人注意都难，一旦外出，总少不了被盯梢。不过他每次都能成功地将盯梢者统统甩掉，负责跟踪监视的警察和密探都觉得奇怪，怎么跟来跟去就跟丢了，难道这个嫌犯飞上天了不成?

熊克武不会飞，但他行走的速度很快，据说可以一天走二三百里，中间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人称“铁脚板”。盯梢者只要弯下腰来喘口气、喝口水什么的，一抬头，人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要练出铁脚板的功夫，必须具备足够的意志和毅力。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不断地经历失败，但从未想到过放弃，几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目标：乐山（时称嘉定府）。

乐山位于川西南，跟成都、泸州、宜宾接近，乍一看，好像不是一个适合再次发动起义的地点，但这只是死的一面，还有活的一面——乐山官军正奉命围剿凉山地区的彝人武装，后方空虚。

如果要再次出拳，无论如何得砸出点声响来了。广安吃亏，就吃亏在从日本购买的枪支不敷使用，同志军规模难以扩大，所以不得不继续依赖难负重任的袍哥。为了寻枪，熊克武绞尽脑汁。根据情报，成都督署将向凉山前线解送大批枪支弹药，其中仅步枪就有一千支。熊克武于是便在沿途设伏，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走漏了消息，预期中的押运官军并未出现。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乐山官军被大量调出后，需要地方团练维持治安，成都督署特地向团练局下发了枪支，而同盟会在团练局正好

也有内应。

在广安起义中，熊克武采用的是双管齐下，即一路夺枪，一路攻署，起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能夺到枪，导致攻署亦功败垂成。这次他决定改换思路，先夺枪，再攻署。

1910年1月22日，乐山起义打响，当天早上起义军首先谋袭团练局。团练局教练是同盟会会员，在他的指令下，团丁们将枪支往操场上一架，都坐进教室听课去了。起义军埋伏在操场之外，团丁们一走就来了个照单全收。这样一共夺得步枪一百余支，加上原有武器，足够武装出数百人。

在距离乐山仅十几里路的新场，起义军会合一处。每一次起义开头通常都要出点状况，唯有这次异常顺利，熊克武很是激动，他又抡起自己的铁脚板，马不停蹄地前去泸州组织其他援军。

假如起义军能够即刻顺流而下，直趋乐山，必然能打官军一个冷不防。可是大家都太兴奋了，也缺乏经验，起义军光在新场吃饭就耗去了整整一两个时辰。在此期间，乐山知府已经得到通报，并做出防备。等起义军往乐山进发时，他们才发现，不仅城头枪炮林立，就连城外都布满了岗哨。

在辄生意外和变故的情况下，众人都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熊克武不在，佘英临时负责指挥，决定率部回撤。

第二天，乐山官军便追了上来，起义军就地迎战，双方各不相让，战斗激烈。本来若光是阻击追兵，起义军尚能应付，然而背面又开来一支官军，这使他们立刻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见形势不利，起义军只得且战且退，没想到中途再度遇官军。三支官军一拥而上，前后左右全是敌人。熬到天黑，起义军才得到分散突围的机会，但就在突围过程中，作为指挥者的佘英与大部队失散了。

佘英正身患虐疾，幸好他从小练武，考中过武秀才，凭着一身拳脚功夫，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一口气跑到了川滇边境的豆沙关。

豆沙关是古代由蜀入滇的第一险关，从这里一步跨过去，便可以到达云南。不幸的是，在镇上的一座茶馆里，佘英的行踪被密探侦察到了，随后茶馆便遭到官军包围，已是插翅难飞。

茶馆所在地区另有一个名称，名唤断蛇坡。“蛇”与“佘”正好同音，断蛇等于断“佘”，身处绝境之中，连这位横跨革命党与会党两界的英雄也感到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无奈和悲哀：他曾那么执着地放飞理想，如今风筝还在天上，只是手中的线已经断了。

佘英被捕后由官军押回宜宾，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一名革命党人。在审讯对质时，佘英故意指着他说：“此人不过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把他抓来有什么用呢？”

佘英想要解救自己的同志，然而对方大声争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你怎么说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佘英等革命党人从容走上了刑场。就义前，佘英手书绝命诗：“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心不甘。”负责审讯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站在他们面前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革命总要冒险

随着乐山起义的失败，熊克武在泸州组织到的援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所能做的，只有冒险探监和安抚烈属。在四川同盟会所发动的所有起义中，乐山之役是最壮烈的一次，包括佘英在内，死难者达两百多人，四川革命党的损失极其惨重。

要想在四川境内继续组织起义，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了。熊克武向同盟会总部建议另择一处要地，集中全国革命党人的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以便毕其功于一役。

自成立之日起，同盟会所组织的中小规模起义已不算少，仅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就达九次之多，类似四川这样由各省自行策动的起义更是不下数十次，可惜无一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只有经历血和泪的事实，才会有血和泪的体验。大家都对这样的零打碎敲式的起义失去了耐心，熊克武的建议，几乎是同盟会内的一致共鸣。1910年秋天，同盟会各地代表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集会，确定在广州发动起义，目标是“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为同盟会的另一位领袖级人物黄兴。黄兴在海内外“选锋”，即挑选骨干组成先锋队。加入先锋队的知名四川籍革命党人中，除熊克武外，还有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而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

器。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炸弹制造，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法，也就是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圆，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圆制炸弹，开支不小，同时制造过程又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从而发明出了一种符合实战需要的安全炸弹。

潜伏广州期间，喻培伦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制造出了三百多颗不同分量的炸弹。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近距离侦察，发现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一看，把守炮台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事，他们竟然向游客兜售茶叶甚至聚赌抽头。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炮台的防守力量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由于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所有既定步骤都被打乱了。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确实曾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孚琦并不在暗杀名单中。广州城当时一共有三个清廷大吏，孚琦是三人最昏庸无能的，被同盟会盯住的人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他才称得上是革命党的心腹之患。

孰料同盟会首轮派出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中途不得不换人。换人之后，倒是行刺成功了，可是阴差阳错，让孚琦做了李准

的替死鬼。

没打着真正的蛇，却提前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了戒备。起义军原拟于4月13日举行起义，这样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指挥部，起义进入了倒计时。由于官府已听到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对城内进行策应，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可是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仍未到达，一些领导人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部分基干人员外，将其余起义人员全部撤回香港。

那时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已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见黄兴尚有些犹豫不决，喻培伦进而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黄兴听后十分感奋，当即拍案，定于4月27日准时发动起义。他随后致电香港，要求起义军总部重新派人前来广州。

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晨，熊克武奉命接应，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四点，从香港出发的客船已经到了，人还一个都看不见。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起义军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基干人员也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留在广州的基干人员一共只有一百二十人，若要如期发动起义，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的行动就不可能实施了，只能箭发一处，主攻督署。

在进行攻打督署的准备时，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与进来，说："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牺牲，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大家还是劝他留下来，说反正起义军里又不少你一个。喻培伦依然不改其志："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27日下午五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轿夫向门卫递上名片，上面写着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抬抬手就放行了。

其实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改扮的，为首者便是熊克武。按照计划，法国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就可以用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了孚琦的广州将军。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可是张鸣岐并不为此感到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时刻担心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一颗心，张鸣岐已如惊弓之鸟，在警卫方面极其谨慎小心。熊克武等人虽骗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督署内立刻发生混战，熊克武掷出炸弹，炸翻了警卫，但等他冲入三堂寻找张鸣岐时，却遍寻无人。后来得知，张鸣岐早就已经逃走了，匆忙之下，他甚至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在督署门外，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他自带一路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率另一路埋伏于督署后门外。众人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督署接应。

听到里面炸弹声响，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就冲了进去。后门敢死队亦闻声而起，喻培伦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并非虚言，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性无人能及，只两颗炸弹甩过去，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队员们沿着洞口一拥而入。

直到起义军全部冲进督署，大家才知道熊克武的刺杀行动没能成功。就在这时，闻讯赶来的李准率水师发起反击，起义军赶紧组织抵抗。

喻培伦在作战中可谓神勇无比。广州城内的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敌人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直炸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相持到半夜，起义军寡不敌众，决定分散撤退，从此，熊克武再也没有见到过喻培伦。

敌人穷追不舍，熊克武身边的同志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川籍同乡、他在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两人想要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可是往上看去，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了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名敌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他差一点就被刺刀给捅了窟窿。

熊克武从坡上滑下后，敌哨兵不敢下坡搜查，只是不断地朝下面放枪。熊克武和但懋辛躲在死角，一动也不敢动。此时天空飘起了细雨，两人都很清楚，在天亮之前，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概率已经越来越低了。

离藏身之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一了百了。"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也颇有走投无路之感，两人一起跳入池塘，可是一跳下去，发现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死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

借股票

广州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株连九族的危险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

广州居民不仅没有向官府告密，相反还向潜逃中的革命者伸出了援手。正是在他们的收留和掩护下，熊克武最终脱离了险境。不过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国际社会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各国领事一看履历，喻培伦等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在广州牺牲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社会精英和热血青年。伴随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将武汉三镇全部予以控制。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如湖北民军称鄂军，江苏民军称苏军，浙江民军称浙军。

只是在有关于民军的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川军的影子，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过一切都还来得及，武昌起义前，熊克武正在陕西，准备在当地策动起义。得知武昌起义爆发，他马上赶到武昌，与黄兴等人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清军进逼武昌，他又奉命前往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起到间接援助武昌的作用。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都已云集上海，得知熊克武的来意，大家都有些急不可耐："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京还远得很。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袖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熊克武觉得这是个办法，于是点头同意，尔后众人趁热打铁，一致推举他站出来牵头组建蜀军。

涉及组建军队，最让人头疼的不是兵员，而是军饷，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于是有人建议向川汉铁路公司借款。

川汉铁路公司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这是一家民营铁路公司，正是因为清廷试图将其收归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买了一些股票，如今多数已成了没什么用的垃圾股，只有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做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正好都住在上海，向川汉铁路公司借款，其实就是说向这两名商董借股票。熊克武听后，认为也只好如此。

可是借股票说的容易，做起来却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两名商董始终不肯出借。

“兰格志”股票成了上海滩的唐僧肉，谁知道了都想上来咬一口。在武昌起义中，原清军将领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在武昌之役中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位黄某是四川人，晓得“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也是一番托词。黄某眨巴眨巴眼睛，唰地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两位商董被吓得脸色发白，只得同意就出借股票一事开会表决。

开会那天，黄某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表决结果尚未出台，他就不由分说地将主持会议的商董关进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其他人见势不妙，便一齐到沪军府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后，随手便塞给来人一排新兵。告状者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来求助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子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派参谋王子骞前去协助。

蜀军

王子骞赶到现场时，黄某留下的一班人正三三两两地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两位商董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王子骞时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他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自然气势逼人，再加上带来的人较多，黄某的看守士兵连命令都不敢查看，当即就乖乖地将扣押的商董交了出来。

经过几番如同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什么世道？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与横蛮无礼的黄某相比，熊克武的态度和做法已经是春风拂面，反正都要交出去，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终于如愿拿到了股票。黄某虽然看着眼热，但沪军府既然有令，他也就只能自认晦气了。

上海多的是外国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熊克武决定从日商手里购买武器，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做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至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和质量鉴别都不陌生，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能够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可以绕过中间商，节省费用和开支。

双方本来谈得不错，说好以“兰格志”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可是就在行将谈妥，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蜀军据说要实施北伐，当然是居无定所，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讨债往往比借钱还难，这就叫作“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日商因此提出，光股票抵押还不行，必须找一个地方长官做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商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但他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与熊克武并不熟悉。好在王子骞人际交往能力出众，通过攀附乡情，总算把江苏都督拉过来做了担保人。

有了担保人，日商很快就用轮船将军火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的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征招的士兵也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蜀军虽不能代表川军的全部，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以后便被称为新川军。

与新川军相对的，是老川军。四川原拟编三镇新军，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三镇最终只编了一镇，也即第十七镇，由第十七镇新军改编而成的部队为老川军，他们与蜀军共同构成了最早的川军体系。

如同熊克武与新川军的关系一样，提到老川军，绝不能忽略了尹昌衡。尹昌衡个子很高，绰号“尹长子”，且他的智商也几乎能跟身高相匹敌，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经因事被衙役拘走，他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当场被驳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将其父放回。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慧，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时，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这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是绝对的尖子生。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毕业于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当时中国国内的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他在学成回国后，即被分配至广西担任了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结交，或收其为学生，或与之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昌衡身上，他已经快乐得有些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了。

谁是将才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打人家。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闻声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尹昌衡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他实际上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后辈竟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得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了。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但尹昌衡认为自己受到了忽视怠慢，很快就向张鸣岐递交了一封辞职信。

在尹昌衡离职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他饯行，席间郑重告诫：“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尹昌衡依旧充满自信地回答：“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尹昌衡回到四川，当了本省的督练公所编译科长，成为四川总督赵尔巽的属下。赵尔巽是四川新军的创始者，四川新军系由其一手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人，他带来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到协统，也大多是外省籍，新军中的川籍军人对此甚为不满。

别人不满，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起酒杯：“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军官们见状全都跟着起立举杯，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尹昌衡说：“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忘了举杯。”

尹昌衡如此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两句不懂。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道：“这话怎么说？”尹昌衡侃侃而谈：“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所以我说要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赵尔巽听了不禁一愣：“那依你之见，当如何练兵？”

尹昌衡慨然答道：“择将！”

“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举了一个老资格川籍军官的名字，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经过询问，赵尔巽才知道尹昌衡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可是难道士官生就能这么不知轻重吗？赵尔巽随手朝在座的军官们一指：“他们不都是士官生吗，学的课程完全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已经强出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的善辩本领：“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做宰相，秦桧也以学士做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然当场就被问得张口结舌。眼见总督大人快要下不了台了，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因“胆气粗豪，敢于说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和支持。赵尔巽深谋远虑，他认为尹昌衡固然狂妄冒失，然亦不失才气，而且从平衡军官间的省籍关系出发，也确实值得重用提拔一下。

当年秋天，四川新军分成南北两军进行演练。赵尔巽特地指定尹昌衡为中央裁判官，希望借此考察他的军事才能，同时提升其在军中的地位。

南北两军的指挥官都是外省籍协统，偏偏在这次演习中又都大失水准。演习总结时，尹昌衡毫不客气地把两人大骂一通，说他们简直是饭桶：“指挥凌乱不堪，毫无战术常识……”

此时尹昌衡的正式职务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编译科长，但因为他已被指定为中央裁判官，所以两个协统都不能反驳，只能低着头挨骂。围观的川籍军官感到扬眉吐气，朝尹昌衡直竖大拇指，至此，尹昌衡凭借胆大敢言的形象，一跃成为川籍军官的意见领袖。

十日都督

赵尔巽不久转调他处，四川总督一职由其弟弟赵尔丰接任。一场保路运动，让赵尔丰身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出，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了成都军政府（正式名称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

此时聚集成都一地的军队众多，从保路同志军到新军、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都如同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成了“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了“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偏偏蒲殿俊又是个书生政客，论从政经验，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为了稳定军心，他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有人劝他说，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蒲殿俊却不以为然：“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可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朱庆澜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既快又爽。

发现士兵中出现哗变的迹象，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他的都督一共才做了十二天，川人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蒲殿俊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已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拥上街头，见室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

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在兵变中，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此娶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于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实际上，成都兵变与川籍军官的煽风点火也有一定关系。直到蒲殿俊担任都督，新军军权仍一直掌握在外省军官手中，川籍军官闹了几次，尹昌衡才得以升任军政部长，但其他人依旧看不到升官的希望，川籍军官对此很是不满。据说在兵变发生之前，他们曾给在藩库站岗的卫兵送去指示：“如果街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立即打开藩库抢银子。”

兵变犹如在田野里放火，火一点燃，就连唯恐天下不乱的川籍军官自己都控制不住。眼看蒲殿俊跑了，外省军官又争相开溜，川籍军官个个面无人色，都唯恐祸及自身。

点名发饷大会还在继续，因为没有人宣布散会，所以整个主席台上，只剩下了军政部长尹昌衡一人。马夫要拉他离开，才走几步，就中流弹而失足倒地，倒下的时候还在喊：“尹部长，快躲开，危险……”与此同时，尹昌衡的坐骑因受到惊吓，自行挣脱缰绳，冲进了校阅场。

尹昌衡被激怒了，他大吼一声：“大丈夫死何所惧！”然后飞身上马，从城外调来新军，并指挥新军将兵变镇压了下去。

尹昌衡成了挽救成都乃至四川危局的最大功臣。事后讨论新都督人选，有人说：“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此言一出，赢得在座军官一致赞同，尹昌衡遂出任新一任都督，掌握了成都政府的军政大权。

尹昌衡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这个小伙子凭着“亦文、亦武、亦仁明”和一往无前的态度，终于在最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大用”。当年尹昌衡与张鸣岐的对话，分明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奋斗环境及其价值观。张鸣岐说的是治世，尹昌衡讲的是乱世，在乱世之中，“不傲、不狂、不嗜饮”，反而不能成为“长城”，只有抡着板砖呼啸而过，才能引来热闹和加冕，这就叫乱世枭雄！

轮到尹昌衡当家了。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真正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很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以后用了一年时间才慢慢恢复正常营业。

一方面，商业凋零使得成都政府难以收到钱税，成了一个穷棒子政府，只能依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持运作。另一方面，政府虽然穷了，来蹭饭的人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面对困境，尹昌衡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袍哥政府

保路同志军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依样画瓢，自己也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名为“大汉公”，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大汉公”的牌子被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从此以后，尹昌衡便挨个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尹昌衡每到一处地方，袍哥都要给他披一道红，以至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出去拜客。也就是说，尹昌衡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似的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他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拥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都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称要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过于久远，谁也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成都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

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蹬花靴的，还有的干脆就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此举在令人瞪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除了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还有重庆的“蜀军政府”。成都政府内多为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以革命党人占多数，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宣布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及其他军队，也都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

蔡锷一打一拉，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对重庆政府加以肯定，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助重庆政府“讨伐”成都政府。

蔡锷的话是说得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当时都到了畏滇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重庆政府专门派人跟滇军拟订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而且所过之处，居然是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都一样对待，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四川人认为，滇军所谓援川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实为侵川。尤其让成都政府不能容忍的是，滇军还占领川南的自贡盐场，对盐场的盐税大肆截取。

自贡的盐税是成都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滇军抢去盐税，无异于要了成都政府的半条命。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摆出了不惜与滇军火并的姿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蔡锷才对四川的两个政府采取了一拉一打、分而治之的对策。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罢了。

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个著名术语叫作“鲇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鲇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骄悍的鲇鱼。

蔡锷主政云南，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的时期。力量对比摆在那里，川军同室相煎的结果必然是唇亡齿寒，被鲇鱼给逐一吃掉，当然如果他们要跟滇军来硬的，也只会输到一干二净。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将滇军这尊神平平安安送走。无奈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日子正过得滋润，岂肯轻易退出。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西南方面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鲇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实际是想一箭双雕，将其从境内支走，为此他们答应全额负担滇军北伐的经费，并且预先支付三十万元。

五百元股东

面对北洋军队的威胁，南京临时政府也在酝酿北伐，陆军总长黄兴就此向熊克武问计。熊克武认为，各省民军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军官大多刚刚由清军转正而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如若贸然北伐，打了胜仗还好，一旦战事不顺，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倒戈。

熊克武的设想是，把新成立的蜀军调到四川，将四川打造成北伐的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北伐军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用意是将蜀军扎根于重庆政府，给四川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临时政府随后下达命令，让熊克武率蜀军先行赴川。

部队要出发，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艘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本来说好运费一万元，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却神神秘秘地对王子骞说："一万元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清朝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实在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可算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一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快要签字时，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日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答：“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折扣，自然还有还价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多掏了五百元出来。

王子骞没有将这些钱收入个人腰包，回去后即登记入账，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往往却并不像“五百元股东”那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四川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查账。

没有四川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保路运动，没有四川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取得成功，再说开去，缺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兰格志”股票，蜀军都无法开张。可是要查它的账，却绝非易事，这家公司的账目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完全是门外汉，且不论查账必备的会计统计知识，他连通常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毛牛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四川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交代。”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兴奋得一跃而起，当即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与宜昌办事处负责人李某取得了联系。查账这一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神色，举手投足间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暄之后，李某把毛牛带进了一所大房间。毛牛一走进去就吃了一惊，只见房间里的卷宗账簿堆积如山，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还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显然人家早已有备。

李某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赔笑：“所有账目都在这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毛牛的一个脑袋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他随手抽出两本账簿，信手翻了翻。

不翻还好，一翻，把他的汗都给翻出来了。别说核对账簿上的数字了，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甚至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毛牛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再耽搁下去，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他急中生智，忙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说完之后，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过了些天，见客轮久候不至，熊克武决定转乘木船溯江西上，查账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骨灰级人物

要查四川铁路公司的账，实在还轮不到蜀军，那应该是保路运动发起者的事，可是现在早已没人理这个茬儿了，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尽快将滇军从四川境内支走。

重庆政府本想用联合北伐的方式达到目的，没想到才过几天，黄兴就从南京发来电文，告以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重庆政府就不用再掏费用，可是滇军来了个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坚持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事先说好的三十万元也一个子儿不能少。

成都的尹昌衡听说后非常气愤，便向重庆派去军队，想帮着重庆政府逼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打起来。

滇军的军营扎在重庆，一打起仗来，甭管输赢，最后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付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出重庆。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四川就此得以统一，按照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受人以柄，尹昌衡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部被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在公开场合，暗地里袍哥还是照旧可以活动。

重庆也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了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此人名叫胡景伊。

说胡景伊是骨灰级，是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胡景伊和蔡锷是士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同时他也是毕业于士官学校的第一批四川学生，在他被官派保送日本留学的时候，武备学堂还没成立呢！

等胡景伊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他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教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的名分。

不光是书本上的学问，胡景伊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学中也堪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级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胡景伊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胡景伊在东京留学时，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是当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喝道：“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把你们交出去！”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的本能，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眼前的局面，就连老谋深算的张鸣岐、赵尔巽、赵尔丰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可能早就答应了，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了，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其实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该出手时得出手啊！

只不过一夜之间，以前根本瞧不上的“乱党”突然变得奇货可居，看来自己真是瞎了眼，赶快着手补救吧。

开场秀

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经他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新军协统的履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便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

谈判结束，尹昌衡正待回重庆复命，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合格。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就直接去了成都。

重庆、成都政府虽已合并，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统一之后，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命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党。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套近乎、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Q要革命，洋先生却不准他革命，以至“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都被一笔勾销掉了。有了这一过节，胡景伊就像阿Q一样，开始对革命党人因爱生恨。

拿着尹昌衡颁下的委任状，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众，胡景伊由此扬扬得意，不可一世。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哼了一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最让胡景伊感到痛恨的，莫过于在上海“羞辱”过他的熊克武，偏偏他又听到消息，熊克武即将率蜀军开赴重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打手来对付蜀军，阻其入川。他找到的打手外号人称“刘罗汉”，是原驻于重庆万县的巡防军管带，辖有巡防军千余

人，后经人游说才宣布反正。

刘罗汉是见风使舵者的典型，名义上他与革命党人虽已是同志，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他在万县贪横不法，残杀党人，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同志”。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但墙有缝，壁有耳，重庆本是党人据点，熊克武提前掌握了这一情报。1912年4月10日拂晓，他先发制敌，指挥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

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武器质量，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尤其在近现代战争中，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这玩意儿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不到半天工夫，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当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时，甫至城下，他就得到党人捎来的情报，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针对的就是蜀军。

半几，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军不得入城，只能驻扎于江北县城。如此苛刻待遇，在其他人看来，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的意思，但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对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来，就不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将扩大为新老川军之间的战争。

熊克武下令部队开入江北，同时禁止士兵进入重庆，官佐要去重庆探视亲友，也必须一律换穿便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尽管熊克武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但胡景伊做贼心虚，依旧害怕熊克武因刘罗汉的事对他进行报复。经他向尹昌衡提议，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他也借机离开重庆，跑回了成都。

在胡景伊走后，蜀军得以移驻重庆，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了下来。

第二章　隆中对

1912年夏，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宣布实施军制改革，原清军的官制名称统统被更改。按照规定，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共编成五个师，其中一到四师为老川军，第五师为蜀军（新川军）。

胡景伊被尹昌衡任命为军团长，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在整编仪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的泰斗，在座诸位，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的师长，都是武备学堂学生，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更是多数出自武备学堂。也就是说，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一个派系：武备系。

尹昌衡同意取消重庆镇抚府，将胡景伊召回重庆，一方面是要借胡景伊加强他对武备系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胡景伊商量一件大事。

英雄情结

自近代以来，英国多次派兵侵藏。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欲请中央政府帮助他抵御英军，但在他由印度回藏后，又被英方笼络，转而亲英。在达赖的影响下，川边巴塘、理塘一带的土司发动暴乱，杀害了北京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

中央政府立即派兵前往镇压暴乱，奉旨出征的就是赵尔丰，他不仅平定了暴乱，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制度，重新设立行政机构。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绩。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他仍在川边忙碌，直到保路运动爆发，他在成都被赶下台，成了一个平头百姓。

成都兵变后，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一个交代，可是因为投鼠忌器，他又不敢追惩乱兵，想来想去便只有杀赵尔丰，同时借此立威这一个办法了。

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对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尹昌衡最终还是将赵尔丰抓了起来，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凶，予以斩首示众。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有擅战之名，乃至“藏人畏恨”，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甚至比普通人更狼狈——尹昌衡杀他时，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分别。

不过赵尔丰曾经坐过的那个位置也决定了，谁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样的使命，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到了拉萨，“亲英反汉”的势头卷土重来，并且愈演愈烈。

赵尔丰被杀前后，不仅“改土归流”中途夭折，驻藏军队也已大部内调，在防守上极其虚弱。叛乱后的藏军一路东进，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分割包围，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理塘，川边形势岌岌可危。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他很信任胡景伊，之所以把胡景伊召至成都，就是要再听听他的意见。

当着胡景伊的面，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此君经营川边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要是我去的话，收获当不止于此。”

还是那种“尹氏风格”，目中无人，睥睨一切，但大敌当前，却也颇有一番英雄气概。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他对尹昌衡说：“以你诛杀赵屠户（赵尔丰以出手狠辣著称，川人称其为赵屠户）的声威，叛乱的藏兵听了，定然是丧胆溃窜，荡平不成问题。”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随即便向北京政府正式请缨西征。1912年6月14日，北京政府复电同意，尹昌衡被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

都督离境，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张培爵，但尹昌衡对张培爵不放心，怕他乘机夺权。想来想去，还是胡景伊更可靠，于是就在出发之前，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即代理都督）。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言，藏兵素来畏惧赵尔丰，而这个“尹长子”竟然能诛“赵屠户”于成都，自然是比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心理上便未战先怯。尹昌衡西

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至多万余人，且是分路攻击，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结果畏之如虎，自个把自个给吓得够呛。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势如破竹，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三个月，便收复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本拟一鼓作气，率军直趋拉萨，以彻底驱赶英人势力和影响，但这时北京政府发来电文，下令他停止进军。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觊觎之心的英国。英国政府对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声称如果西征军继续前进，他们将拒绝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会“助藏独立”。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接连来电十余道，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半步。尹昌衡出征，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结。他曾经说过，如果他生在汉朝，“烈不敢让关壮缪（关羽）”，生在宋朝，“忠不敢让岳武穆（岳飞）”。

可是关羽、岳飞碰到的尴尬，也同样发生在了尹昌衡身上。归根结底，他如今已是国民政府将领，再不是清末民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可以说造反就造反。袁世凯发来的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脚。

另外，兵马出征，离不开充足粮草，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朝廷派赵尔巽出任川督，就是为了从后方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凯不光发金牌，还断粮饷，西征军要继续前进，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着力经略川边。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他再进一步，用整整两年时间，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为后来的西康（即川滇边区）建省打下了基础。

因西征之功，尹昌衡被另授以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一职，军衔晋为上将。这个年轻的川军将领从未改变自己的个性，照样傲，照样狂，可对于四川百姓来说，他毫无疑问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咬人的狗不露齿

尹昌衡在川边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他忽然得知，成都老家早已起了变化，有人鸠占鹊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更加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悉心提防过的副都督张培爵，而恰恰就是他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豪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宛然一个干练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有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在送尹昌衡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尹

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护理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胡景伊却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脚。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脚，非得找个强有力的后台不可。这个后台，便是北京的袁世凯。胡景伊与袁世凯并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就必须重新设法。为此，他专门向北京派去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凯身边的亲信陈宧拉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下。

有了北京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凯的好恶。其时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理想，而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的梁山盗贼，等到国民党成立，这种鄙视又转变成了厌恶和害怕，因为国民党显见得已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袁氏的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之感。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张培爵掌民政权。为了把民政权也抓在自己手里，胡景伊告诉袁世凯，张培爵是国民党员。袁世凯马上来了份电报，将张培爵调到北京，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一手兼理。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他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跑了。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里拒不露面。在舆论的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倒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京，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孰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待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宧，陈宧再转呈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京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一边，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使舵，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

醉翁之意不在酒

北京政府几乎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的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加下，便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是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都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太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密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

了。”

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京，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还要问成死罪。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上将们并不都肯听任袁世凯的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之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杀赵尔丰即为其中之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国家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又过了几年，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予以特赦，得以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尹昌衡自豪的一部分。

胡景伊阴谋得逞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都被迫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胡景伊则视蜀军为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更成了他的不贰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是四川都督，熊克武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足够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唯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

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碴儿。蜀军上报的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瞧不下去了，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为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搞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了招，上了当，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静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的做法渐渐也行不通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标志着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感到不能轻动，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确实到了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的时候了，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这是什么革命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终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所以讨袁必先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要攻下成都，又必须首先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还是这些人马该如何用法，有人向熊克武献计，说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是熊克武在日本东斌军校的同学但懋辛，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还不幸被捕，他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录，却也是九死一生。其所献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不意，就像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设若当时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了。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平时指挥决策多采用圆桌形式，甭管什么作战方案，都要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众人都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派王子骞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迅速将周骏的第一师调到了泸州。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讨袁军第一支队，也同样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至为激烈。

武器的优劣与否，是对战场风向进行评估的一个基本标准。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武器。老川军的武器虽然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但已显得过于老旧。尹昌衡当初评论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固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不过它们相比于蜀军的“最新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绌。

蜀军不仅武器精良齐整，而且军官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同事战友之间，相处犹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激战中，第一支队前仆后继，多名营长阵亡，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落于地，便用左手拾枪，继续大呼前进。

在蜀军的舍命攻击下，周骏师作战失利，被迫退入泸州城中，继而遭到四面包围。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军开始发力了。在袁世凯的统一调度下，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顶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还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就已经失陷。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各支队被袁军分割包围，处于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窘境，“分”竟然演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没，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潜藏于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其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寓意就是梁山的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在此基础上，胡景伊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人家就多

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得家破人亡。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熊克武等人被迫再次亡命海外。辛亥革命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和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削藩风暴

三人同台，如果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奸雄最吃得开，由不得胡景伊不得意。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当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仍处于实际的独立地位，大小事务皆由本省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理了个干净，而且还震慑住了一些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加强了

自己的权威。

袁世凯并没有就此止步，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他，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从而掀起了一股猛烈的削藩风暴。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袁世凯很快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当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是要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胡景伊沾沾自喜，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1915年2月，驻京代表处传出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宧到四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让胡景伊感到不安的是，陈宧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四川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宧来与袁世凯拉关系，以至陈宧对胡景伊的情况已摸得很透，而且陈宧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响力，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宧七十万巨款，想请陈宧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宧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百万也打发不了。驻京代表预感到胡景伊已日暮途穷，便不声不响地卷裹着巨款，脚底抹油溜掉了。陈宧到达成都后，和胡景伊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自认晦气。

6月22日，陈宧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所谓的“图川大计”。

袁世凯派陈宧督川，最终目的是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正在悄然涌动。

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和他的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不过在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政治立场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倒好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是在四川的一亩三分地里蹦跶，蔡锷却是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对方感觉是活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民众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夺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如同滚雪球一样地不断进行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云南本是一个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然而这时的军事力量已执西南之牛耳，周围省份没有一个不怕它的。

可是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在地方上再厉害，上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袁世凯。蔡锷没能逃过削藩风暴，袁世凯就像对付尹昌衡一样，将其召至北京，并且削掉了他的权力。

同样是处于逆境，尹昌衡的狂傲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蔡锷比他机灵多了，进京后该服软就服软，即便袁世凯举行的复辟帝制活动，他也一步不落地跟着参加。

在逐渐消除老袁的戒心后，蔡锷潜回云南，发起了护国运动。

英雄

蔡锷发起护国运动，是捏住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软肋。说到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尽可以做伪君子，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但要想当真小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其实袁世凯当皇帝，真不见得比做总统舒服，要知道，他的大总统可是终身总统，就算自己下来，还可以指定儿子接班。更何况，此

皇帝并非彼皇帝，袁世凯“登基”之前，连宫女太监甚至跪拜这一套都让他给废除了。冒冒失失“登基”的结果，只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真不知道这老头儿究竟图什么。袁世凯曾自比曹操，应该说，前半段差不离，可到后半段，他也就只配给人家提鞋了。

尽管如此，在护国运动之初，袁世凯并没有把蔡锷当一回事。道理很简单，过去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尚能够组织起南方数省的民军相抗，论整体实力，要远远高于滇军，可还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北洋军给干翻啦？滇军不足为虑，姓蔡的小子一定要现眼，就让他现眼去吧。

事实上，蔡锷面临的困难，比袁世凯预计的还要糟。被“削藩”后，他已不是名正言顺的云南都督，云南都督换成了唐继尧。唐继尧曾是蔡锷手下的一名管带，慑于蔡锷的威望，不能不加入反袁行列，但始终对蔡锷盯着防着，怕对方趁机把军权全部揽过去，抢了自己尚未坐热的宝座。滇军有足足两万多人，唐继尧肯交到蔡锷手上的，才不过两千一百多人，而且全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

袁世凯方面，且不论即将开来的北洋军主力，就算是陈宧的部队，数量上也非滇军可比，不客气地说，蔡锷如今的境遇尚不及癸丑讨袁时的熊克武，难怪老袁要对之不屑一顾了。

可是这次的蔡锷超出了枭雄的框范，他将成为英雄，而英雄所要做的事，本非常人所能及，也是袁世凯这样的奸雄所算计不到的。

袁世凯曾经走过许多好棋，其中之一，就是于不动声色中走马换将，让陈宧督川。袁氏身边亲信众多，尤其在他成为当红炸子鸡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但你要让他拣一个最信得过的，毫无疑问就是陈

宧。蔡锷也被袁世凯赏识过，但是老袁说，蔡锷固然是不错，但是不如陈宧。

并不是陈宧在军政才能上要强过蔡锷，此君的真正厉害之处其实是拍马奉迎和见风使舵的功力，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小袁世凯。很多好事之人爱拿陈宧和蔡锷比较，甚至有人还穿凿附会地评论说，蔡锷之所以要组织救国军，就是要让袁世凯知道他和陈宧之间，谁才是真正的贤者。

蔡锷不是尹昌衡，他绝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但是现实赛场偏偏还是把他们两人关到了同一个笼子里——陈宧在四川，实际上等于控制着整个西南，他是蔡锷起事后难以绕开的障碍，如果不清除陈宧这个拦路虎，滇军别说讨袁，很有可能连西南都走不出去。

陈宧入川后，对川军进行了缩编，但川军仍有两师二旅，此外还有他带来的北洋军三个旅，兵力大大超过滇军，双方若是要真刀实枪地开练，陈宧一方无疑更占优势。可要是置换一个战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战场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它存在于每个人心里。

对陈宧来说，趋利避害是基本的人生法则，以至每一步都要计算好，自己在这件事上能不能得利，有没有好处。这样的人很少会去冒险，他们的心理也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悍。

蔡锷瞅准了陈宧身上的薄弱之处，他要打的是一场心理战。入滇的第一天，他就给陈宧发去密电，断言袁世凯必然失败，要陈宧站到反袁阵营这边来。

接到电文后，陈宧笑了：蔡锷，你就使着劲吹吧，北洋军有多威猛，你的滇军有多薄弱，简直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啊！

陈宧复电蔡锷，大义凛然，严词责备，俨然是袁世凯身边死不改悔的忠臣一个。在复电的同时，他调兵遣将，将驻泸州的川军刘存厚第四师派去前线堵截滇军。

可就在这时候，陈宧突然发现情况不对劲了，不管他怎么催促，刘存厚就是迟迟不动弹。

脚踏两只船

蔡锷的攻心战可不只针对陈宧一个人，川军将领个个点名，刘存厚当然也在其中。

陈宧督川，倚仗着有三个旅的北洋军撑腰，对川军编制大删大砍，四个师被缩掉近三分之一。对留下来的两师二旅，他也没有一点客气，尽量安插亲信，刘存厚的旅长就是陈宧带来的北洋军官。

完成整编后，陈宧又在四川组织“清乡”。“清乡”时，他让川军在前面卖命，“以川军杀川人”，北洋军则懒洋洋地跟在后面督阵。都是打仗，川军损失了，不补缺额，剩余枪械一律缴库，而北洋军稍受损失就能立即得到补充。

“清乡”尚未结束，第四师就被分割成了两半，并时时面临着被陈宧继续派人予以渗透的危险。刘存厚对此又恨又怕，每天都做着遭陈宧暗算的噩梦。蔡锷的密电一到，他就开始合计起来，因此一直在泸州赖着不走。

作为腹黑高手，陈宧时时都在揣度别人的心思，刘存厚在打什么主算，他早已猜透了几分。为了把刘存厚驱至前线，陈宧再次去电进行催促，同时派周骏的第一师去泸州换防。

刘存厚见拖不下去，这才不情不愿地率部开往前线，但一到前线就投入了反袁阵营。军官们在前线秘密宣誓时，还有人生怕陈宧会对他们尚留在成都的家属不利，旁边马上就有人安慰道："不用怕，陈宧是个有心计的人，不会鲁莽从事。"

大家都把陈宧看得透透的。你别看他拥护帝制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这家伙其实一直在做着脚踏两只船的准备。陈宧的幕僚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帝制，一派拥护共和，他就像操纵木偶的提线艺人一样，看哪边形势对自己有利，就跟哪一派咬耳朵。

蔡锷的第一份密电到达时，陈宧只给帝制派看，所拟复电用的也是与帝制派商定后的语气。待到刘存厚反袁，他又撇下帝制派，拿着他与蔡锷的往来电报，急急忙忙去找共和派商量。

共和派主张联合蔡锷，并阻止袁世凯随后派来的北洋军入川。按道理，陈宧既然是老袁的"忠臣"，就应该怒目而视，否决共和派的提议，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要已在川的三个北洋旅反袁是不可能的。

既称小袁，陈宧的猜忌心之重几乎与老袁不相上下。眼前的一堆筹码只要少了一个，他就要犯嘀咕，因为一个刘存厚，陈宧给其他所有川军将领都打上了相同的问号。

川军肯定是信不过了，但仗着手里还有三个北洋旅，陈宧依旧抱有侥幸心理。他把三个旅长召来谈话，希望对方能够为自己保驾。最

早赶来相见的旅长是云南人，他一来就对着陈宧发牢骚，说他的祖宗坟墓都在云南，实在不想跟滇军作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宧这下连嫡系部队也不放心了。事实似乎也验证了他的这一判断，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在川的北洋旅被集中至宜宾与滇军作战，结果作战时打得乱七八糟，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弄到最后各部皆不战而退。

陈宧收到战败消息，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的刘一清恰是共和派的重要成员。对陈宧来说，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

前线电报发来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陈宧哪里还睡得着觉，他急唤邓汉祥来见。

邓汉祥也属于共和派，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刘一清临上前线时，曾偷偷地告诉他，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无论什么情况，陈宧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尽管如此，当得知陈宧这个时候召见他时，邓汉祥仍是有些心惊肉跳，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前来见面。

陈宧正绕室彷徨，见到邓汉祥犹如看到救星，说：“宜宾一线吃了败仗，我看刘总指挥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我们还是下决心干吧，要不然就晚了。”

对陈宧“干”的含义，邓汉祥当然清楚，就是要联蔡反袁。可陈宧是什么人，一个如假包换的小袁世凯，常常是上面扔馅饼，下面设陷阱，跟他打交道，非得多长一百个心眼儿才行。

会不会是故意在套我的话，让我把刘一清给供出来，然后将我俩一网打尽？想到这里，邓汉祥赶紧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

陈宧越说要干，邓汉祥就越说干不得。争来争去，把陈宧给弄急了，知道邓汉祥还是不相信他，于是当下就提起笔，唰唰地写了一份电稿。

这是一份写给刘存厚的电稿，上面写着：“宜宾方面，刘一清已有部署，请你速联系蔡锷，以便共策将来。”

明明是陈宧亲自拟的稿，可是末尾署名却是邓汉祥。这回轮到邓汉祥急了，连说不可。

陈宧信誓旦旦：“我们这种关系，你还不放心吗？”

邓汉祥不放心，一点都不放心。知道你老人家想反水，可把我名字写上去算怎么回事，万一出了差错，那我不就惨啦?

都是精明人，就得用精明人的办法相互沟通。陈宧见邓汉祥神色犹疑，便说：“这份电稿是我亲自拟的，都是我的笔迹。你发出电报后，可以把原稿存起来。”

听完陈宧的这番表白，邓汉祥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也才相信陈宧不是故意在设圈套诓他。

智和勇

陈宧为了自保，开始暗中同蔡锷互通声气。经过双方约定，宜宾一线公开打起了假仗，双方军队都是坐地打冲锋，喊杀声震天响，但就是看不到他们往前冲。

蔡锷原本在四川战场上要两线作战，兵力捉襟见肘，根本就不够用。宜宾方面的战局松弛下来后，他立即将滇军主力抽出，全部使用于泸州。泸州之敌才是蔡锷所必须面对的真正强敌，这里已聚集了袁世凯从北方派来的北洋军三个师，领衔者为曹锟。

此时贵州已宣布独立，继刘存厚的川军之后，黔军也加入了护国军作战序列。只是黔军力量微弱，刘存厚师由于在“清乡”时已被陈宧分割，仅有一个旅能参加起义，川滇黔军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五六千人，仅为北洋军的一个零头。

最令蔡锷头疼的尚不是人少，而是缺乏后援。滇军从云南出发时，只领了两个多月的军饷，就这还是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把祖产拿出来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来的。为了解决军饷不足的困难，蔡锷拉下脸，求爹爹告奶奶，滇黔两省才又合凑了十七万元送来，可是对于消耗巨大的战场而言，同样是杯水车薪，顷刻便会告罄。

云南本属落后贫瘠省份，全省收入每年不过两三百万，辛亥革命之前经济上都得靠四川接济，不过自云南独立以后，仅截留中央税款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加上其他筹款，已足够前线军饷需求。问题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用作扩充自己的实力，多一个子儿都不愿拨出来。

唐继尧口惠而实不至，不肯向前线提供军费，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但他生平不好货财，虽统军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想做到毁家

纾难都不可能。无奈之下，他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用以继续维持军队开支，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已经负债两百万元。即便这样，蔡锷在四川鏖战一年，也只能给官兵发放伙食津贴，根本不敢提及任何战功奖励。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是弹药的匮乏。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没有子弹，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为此，护国军甚至不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用冒充枪声的方式来迷惑北洋军。

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护国军很快就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乃至“全军惶惑”，士气受到不小打击。蔡锷在泸州战场上诚然指挥出色，多次以弱胜强，但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无米的好粥，1916年3月7日，他被迫下达退却命令，指挥护国军转攻为守，缩短战线。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全军撤退后，他“形容清瘦，颇有劳悴之色”，日子难过啊！

可是护国运动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赢的战争中，他把自己的智和勇都发挥到了极致。

军饷困难，蔡锷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宧联系，商请陈宧暗中接济。陈宧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但实际仍在骑墙，他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战场的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但在撤退前，北洋军的伤亡要比他们大得多，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曹锟仍不敢发起追击。也就是说，蔡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的主动撤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他们随时可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陈宧是个中行家，当然看得出来，

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还得讨好对方，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

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陈宧宣布独立，风险太大，依陈宧的性格，是绝不肯如此做的。蔡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只向陈宧要钱。对陈宧来说，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没有理由拒绝。

护国军从陈宧手里拿到了军饷，未几，云南方面也运来了子弹。虽然对战场而言，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但已足够维持一段时间。

战争赢家

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有关，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

战争归根结底打的是后勤。护国军的后勤补给糟糕透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算能击败曹锟，也无法席卷中国，直捣北京。蔡锷唯一的胜算，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去，这样一来，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做出决择，加入反袁护国阵营。

有鉴于此，蔡锷决定利用刚刚到手的这点军饷和弹药，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而是要击垮他们的信心。总攻发动之前，蔡锷宣布“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官予以正法，使得三军大为震撼。

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攻。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果，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也没能攻入泸州城，但蔡锷的目的达到了。第二天，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五督”（即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便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长江五督拥兵十多万人，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其中，他们态度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

实际上，北洋内部的矛盾，早在袁世凯发动削藩风暴时就已埋藏下来，但最终爆发，却要归功于四川战场上护国军的不俗表现。

如今的局面，几乎就是武昌起义时的翻版，当时袁世凯如何要挟清廷，现在他的部下也如何要挟他。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并要求与护国军进行停战谈判。

老袁不是一般的强人，轻易从不会服软，他能服软，说明他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之大，已超出常人想象。

其实就算袁世凯不主动停战，蔡锷也得收兵，因为他的弹药粮草已经再次耗尽。区别在于，袁世凯先叫停，成了输家，而蔡锷则成了赢家。

老袁精明一世，但输也就输在他的过于精明上。他只知道陈宧不像过去那么卖力了，不知道这个“忠臣”已同蔡锷搭上了钩。由于一直被蒙在鼓里，到了双方谈判的重要阶段，他居然仍授命陈宧为己方谈判代表。

作为战争赢家，在停战谈判过程中，蔡锷继续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气势，他除继续要求袁世凯退位、撤销帝制以及交出总统职位外，还倒逼陈宧，让他早点站出来宣布四川独立。

陈宧仍在犹豫，但这种犹豫，已不是不知道赌注应该加在哪一边，而是他觉得安全没有保障，生怕一旦公开背叛袁世凯，会遭到报复。

这种危险时期，如果没有得力部队护驾，人头随时可能落地。曾归陈宧辖制的川军，除已投奔蔡锷者外，其余只要陈宧宣布独立，一准会举戈相向。在陈宧看来，只有带到四川的三个北洋旅可以指望了。

这三个旅，一个远在川东，剩下的两个如今都服从于一位旅长的指挥。陈宧之所以犹豫不决，也就是要看他的态度，此人名叫冯玉祥。

冯玉祥是陈宧的老部下，早在陈宧任统制时，冯玉祥还是他手下的一个队官。陈宧入川前，打听到冯玉祥已在陕军中升任团长，便特地向袁世凯保荐其为旅长，并带到了四川。打那以后，陈宧便将冯玉祥视为自己绝对的嫡系，所辖部队里面，都优先补充他的枪械，冯玉祥旅也由此被扩充成了混成旅。

陈宧和袁世凯一样，都好猜忌，但并不是说他们谁都不信，只是能让他们信的人比较少而已。至少，陈宧是信得过冯玉祥的。如今冯玉祥几乎就是陈宧在苦海中的指路明灯，宣布独立与否，冯玉祥说可以就可以，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在军事会议上，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这让陈宧放下了心，认为自己宣布独立后，就算袁世凯要报复，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也没什么可怕的。

1916年5月22日，陈宧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击穿了袁世凯那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袁世凯忧愤成疾，随即发布命令，将陈宧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继任。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他没有动用曹锟的北洋军主力，是因为他知道，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就足以驱使周骏拼着命去争抢了。

你这是什么用意

接到袁世凯甩过来的乌纱帽，周骏果然呼地就跳了出去，用不着任何人去催他逼他。一路上，他连口号都想好了，叫作“川人治川”——我周骏是四川本地人，你陈宧是外地人，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打成都，积极性比谁都高。第一师自东而西，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蛇，把大路都给塞满了，在其身后，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同样是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这阵势吓坏了陈宧，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我要走了。”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蜀军被灭，周骏师就成了第一，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与周骏对决，冯玉祥并无胜算，更

何况，就算打败了川军，后面还有曹锟的北洋军主力在虎视眈眈，所以他只能率部撤回陕西。

假如冯玉祥一走，陈宧能用于防守成都的部队，就只剩下了一个卫队团，无论如何挡不住周骏。共和派的刘一清、邓汉祥是“联蔡反袁”的倡导者，商量之后，二人便代表陈宧，一起去求见冯玉祥，恳求他能再作考虑。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冯玉祥都不为所动，只是强调：“四川人排外难斗，我若与周骏作战，遍地皆是敌人，将防不胜防。”

听冯玉祥的意思，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刘、邓急忙说：“四川人反对袁世凯，可以说完全一致。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乃是全川公敌，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问：“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为了能够让冯玉祥坚定信心，刘、邓建议召集一个扩大会议，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呼声。冯玉祥听后，点头表示同意。

刘、邓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三百名代表，聚会于成都皇城（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此时为军政府驻地），冯玉祥果然也应诺出席了会议。

开会发言时，一众代表都表示，周骏助袁西犯，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灭此朝食”。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他厉声说：“我起初不知道你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回北方，现在清楚了。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也明白保卫地方乃军人的责任，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正要鼓掌，冯玉祥却又来了一句："不过……一般士兵知识有限，如何才能激励他们，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代表们马上领会了冯玉祥的意思。有人马上问道："请教冯旅长，究竟需要多少数目？"

冯玉祥笑道："各位先生都很高明，这个不用我说了吧。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怎么好说数目呢。"

会场上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有人慨然允诺："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你们的粮饷，陈宧将军负担不起，我们四川人负担，马上就去发动凑集。"

冯玉祥见状，神情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周骏要是打得过来，把我冯玉祥的鼻子割了！"

此言一出，会场上掌声雷动，莫不称快。当晚，成都各界便购买了猪牛羊肉、面粉、大米等物资，全部送交冯部，此外，又赠现款二十多万元。

众人以为，这下事情应该妥妥的了，但是其实冯玉祥并没有真正改变撤出四川的念头。部队行军和迁移他地，需要粮草军饷补给，这批物资现款正好填补了空缺，所以冯玉祥照旧传令部队向城门开去，准备离开成都。

陈宧怒不可遏，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负责从中牵线的刘一清、邓汉祥认为自己被冯玉祥耍了，更是对冯恨之入骨，他们瞒着陈宧，特地在其卧室周围安排了伏兵。

冯玉祥应召而来，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还跟着一个营的卫兵以及几十人的手枪队，显然已有所戒备。刘一清、邓汉祥互使一个眼色，提出陈宧要在卧室召见，而卫兵和手枪队不便紧紧跟随。

冯玉祥想想也对，就在刘、邓的陪同下，走进了陈宧的卧室。见冯玉祥进门，陈宧一拍桌子："冯玉祥，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是扶持你的。开军事会议，你主张独立，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你这是什么用意？"

对于匆匆宣布独立，陈宧如今可谓追悔莫及，他恨恨地对冯玉祥说："我告诉你，我七十四岁的老母，现在就住在皇城，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我是不走的……"

未等陈宧说完，冯玉祥便伏地痛哭："我冯玉祥并无别意，是恐怕打不过那个周骏，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就在陈宧、冯玉祥谈话之际，刘一清、邓汉祥借故把陈宧喊出来，把预设伏兵的事告诉了他。刘、邓的想法是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再由陈宧自兼该旅的旅长。

不料陈宧听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法，会将冯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就先杀你们"。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

在陈宧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剑影，但陈、刘、邓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宧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一场失败了的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1916年6月25日，陈宧被迫逃出成都，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紧接着也率部撤离了四川。离川时，冯旅搂草打兔子，把成都军火库给清了个空。为了便于行军，官兵们把大部分行李都扔掉了，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6月27日，周骏进入成都，随即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

陈宧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蔡锷同意援川，但直到陈宧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在出兵进川方面，滇军内部本有分歧。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提出在护国战争胜利之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便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于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鼠肚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做是否师出有名，以及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大局观较强，而且知道如何把握事件处理的时机与火候。以陈宧向他求援为例，如果不答应，陈宧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但要是在第一时间就派兵前去，帮助陈宧把周骏赶走，那么陈宧就有希望在四川站稳脚跟，而滇军很可能依旧被排斥在外。

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宧，等陈宧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

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周骏岂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见势不妙，他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败退撤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得几千人马，用"仓皇"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凄惨之状。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犹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敢予以收留，都唯恐引火烧身。

想想周骏也真够倒霉。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样，开始赢了一大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开心一下，转眼之间就又输到了血本无归。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里去？哪一个省又会

容得下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个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自己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到了一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头衔，虽然是聊以度日，但也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全力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来四川捋老虎须?

从蔡锷生前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他确实也有以四川为中心，再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局面的构想。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终于有望得到稳定与安宁了。可是天不遂人愿，因为劳累过度，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8月8日，他在去电北京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是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还说，他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出点事情，可惜现在又病疾严重，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说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蹭四川的油

蔡锷出国之前，推荐了两个人分别代理四川军政，其中一人是他的参谋长罗佩金。

罗佩金毕业于士官学校第六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年蔡锷在广西屡不得志，就是罗佩金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将蔡锷调到了云南，并甘居其下，从而促成了一位栋梁之材的脱颖而出。在罗佩金识拔过的人才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为小字辈的朱德。

除了眼力好之外，罗佩金也很有谋略。他在滇军中向有“智囊”之称，云南起义时，真正能控制滇军和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蔡锷，而是罗佩金。

在护国运动的策划阶段，蔡锷曾让罗佩金帮他制订作战方案。罗佩金拟订的方案是“先实后虚”，即让护国军以剿匪为名，向四川发起进攻，在拿下重点城市后，再宣布云南独立。

蔡锷出于种种考虑，最后将方案改成了“先虚后实”，既先宣布云南独立，再起兵相向。应该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蔡锷讲的是政治，罗佩金着眼的是军事，若仅从军事角度而言，罗佩金之计实有奇兵效果。

滇军准备誓师出征，却苦于军费无着，又是罗佩金一咬牙，将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都拿出来抵押，才贷来了首批军饷。护国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蔡锷排第一，罗佩金仅位居其下，他也因此被誉为“护国中坚”。

因为蔡锷的推荐和本身在护国运动中的功绩，罗佩金继蔡锷之位，担任了四川督军。可是履任新职之后，他的立场却还站在云南那一边，不仅思维模式和唐继尧如出一辙，而且就好像是唐继尧的参谋长，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唐继尧需要罗佩金做的，无非还是蹭四川的油，来养云南的兵。在护国运动前期，唐继尧不肯多投入兵卒，后期已经进入停战谈判，他却大举增兵，导致护国之役结束时，滇军已先后入川达十二个营，除损失掉两个营外，仍剩下十个营。

不打仗了，滇军理应大部撤回云南，可是实际上一个都没走。之后罗佩金又从云南大批招兵，加上原先的十个营，编足了两个师的驻川滇军。这些从云南招来的新兵都是徒手兵，是空着两手跑到四川来的。罗佩金一声令下，把四川兵工厂半年所生产的枪支全部取出来，用以武装新兵。滇军的装备原本很差，多为杂色枪，罗佩金便干脆把驻川滇军老兵的武器也全部换成了川造的新式步枪。

四川兵工厂是当时西南唯一的兵工厂，据说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生产设备均系进口，能仿造德式步枪，而且拥有日产五十支步枪的生产能力。自罗佩金督川后，这家兵工厂便俨然成了滇军的定点军火库。

罗佩金就职后，在成都设立了卫戍司令部，每天派滇军巡查队在成都的各条街上巡查。巡查队架子十足，知道的是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排在第一列的只有一个士兵，该士兵双手捧令箭，令箭一尺多长，箭头用油布包着，呈箭头形，油布上写着朱红大字“令”；在持令箭的士兵身后，跟着两个手持短军棍的士兵；再往后面，才是一队排成两行的士兵，这些士兵人人荷枪实弹，杀气腾腾。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出巡凶多了。从成都警察到川军，见到令箭一律都要行最高军礼。巡查队员瞅站岗的警察不顺眼，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给以一军棍，有时还要报以老拳，弄得值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川军官兵也不敢惹巡查队，他们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个个避之唯恐不及，碰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迟的，都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我看会起变化的

现实生活永远不会如人们设想的那么富有逻辑，它就像俄罗斯方块，稍不留神，就会把许多人的人生放错位置。罗佩金天生是做军师、摇鹅毛扇的料，而并不是一个统帅之才，当这样的人被放错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悲剧离他不远了。

在罗佩金的影响下，驻川滇军官兵变得越来越狂妄骄横，甚至一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乃是家常便饭，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称滇黔军为“红边边”，称川军为“灰边边”。想当初，蔡锷率滇军入城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因护国运动之功，也一改从前的“滇寇”形象，成为一支被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渐渐褪色的情况下，他仍以为自己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北京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京政府给出的办法，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损失，川军挨刀却是一点价都没得还，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编制可以随时被撤。在待遇方面，两军也相差很大，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和中央政府直辖军队一样的待遇，川军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一。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成都会议之前，为了敷衍川军，罗佩金曾假意向北京政府报告，请求保留川军五个师的编制，北京自然是不同意。得到北京的支持，罗佩金便有恃无恐地在会上对编遣决议进行强制推行。

见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脸色一沉：“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笑。

护国战争结束时，最为失望和气愤的，莫过于刘存厚。刘存厚曾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为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当时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一度还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密谋兼并他的部队，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保持与滇军的距离。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督川，他最早发动阵前起义，之后负责联络陈宧，并参与了对曹锟的作战。及至周骏逃离成都，又是他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负责代理军政事务和维持地方秩序。

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法，刘存厚隐隐然已有了这种期盼，当然他也知道论威望、资历和能力，自己绝不可能与蔡锷比较，所以如果蔡锷有意，他愿意让贤。当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确实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刘存厚可以在蔡锷面前低头，但罗佩金就另当别论了。蔡锷赴日就医前，保荐罗佩金为四川督军、戴戡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么事。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所能统领的也仍然只是原先自己的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刘存厚甚为气愤，他断定，这是滇军方面对他一贯轻视和疏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滇军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蔡锷在，肯定是斗不过蔡锷，可是对罗佩金，我难道就没有斗过他的希望和可能？看出了刘存厚的心思，一个部下趁机进言：“军长，你以为四川这个僵局就无法打开吗？我看会起变化的。”

刘存厚见他话中有话，忙追问有何破局之法。此人道：“依在下看来，你军事上没有问题，现在身边缺的就是一位才智卓越、长袖善舞的谋略之士，所以政治上常处劣势。若能有高士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刘存厚一拍大腿：“你说的是啊，可我究竟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高士呢？”

“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正有一人要推荐给你。”对方答道。

茅塞顿开

刘存厚的部下要向刘存厚推荐的高士，名叫吴莲炬，任职于贵州，他与刘存厚还有过一面之缘。刘存厚喜出望外，当即让这位部下帮助联系，并预先汇去旅费，请吴莲炬务必入川相助。

吴莲炬应邀秘密到达成都，见面后，两人连谈了三天。当刘存厚问吴莲炬，有什么办法可以制约罗佩金时，吴莲炬笑道："罗佩金早已身处险境，只不过他自己还糊里糊涂罢了。"

吴莲炬的这番话甚合刘存厚的胃口，可是话不能光拣痛快的说，除了"是什么"，刘存厚还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治蜀不力，民心向背，诸如此类，都可算成是罗佩金的"险境"，但说句老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只是附加条件，或者说是事后给失败者定罪时的点缀，刘存厚要听的可不是这些，吴莲炬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所以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些。

吴莲炬要说的，首先是京城的政治内幕。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两个人执掌政权，也就是总理段祺瑞和继任总统黎元洪。段祺瑞个性倔强，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黎元洪成名于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扶持起来的，所以他对南方革命党多有掩护。两个人名为搭档，实为对手。

力量对比上，段祺瑞人称"段合肥"，乃北洋元老，掌握实权。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没有力量，不过是泥菩萨一个。吴莲炬对刘存厚说："这就是大势所向，你今后一定要看准大势，跟着段祺瑞，以北洋军人为友，才能稳操胜券。"

讲了远的，再讲近的，吴莲炬提到了尹昌衡这个过往的川中著名人物。尹昌衡有平定西藏叛军、经略川边之功，可他后来为什么还会遭人暗算，以致滚鞍落马？吴莲炬分析说："无他，全在拥兵取忌故也。罗佩金督川后，将驻川滇军一下子扩充到两个师，这是在重蹈尹昌衡的复辙！"

听到此处，刘存厚几乎有茅塞顿开之感。高人啊，你怎么会把世事看得如此透彻呢？

"罗佩金是国民党员，论派系阵营，属南方革命党人。"吴莲炬继续往下说，"据我推断，罗佩金督川，黎元洪或许会偏袒此君，却绝非段祺瑞所喜。你只需以政略指导战略，如此如此，伺机行动，将来发展当不可限量。"

吴莲炬的"如此如此"，包括了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等多条谋略，几乎就相当于三国时诸葛亮提供给刘备的"隆中对"。

刘存厚不是刘玄德，可他也有像皇叔那样称雄巴蜀的念头，当下听得兴奋不已，用手抚着吴莲炬的肩膀连声说："老兄高论，实获我心。"

在吴莲炬的"隆中对"中，"外拥中央"最重要也最关键。刘存厚的前上司胡景伊如今正居于京城，刘存厚始终和他保持着联系。胡景伊身挂闲职，仍能蒙过去的老部下这么看得起，自然对刘存厚抱有好感，他也一直在尽力替刘存厚说话，可惜人微言轻，始终起不到什么明显效果。

不过刘存厚在北京并非只有胡景伊这一个人脉，他还有重要棋子没有使用。刘存厚计划派一个人，以驻京代表的名义前去北京，从而

把这枚棋子运作起来。

吴莲炬闻言，立即毛遂自荐，请缨前往。刘存厚大喜，特聘吴莲炬为军部高等顾问，每月赠舆马费千元，并拨付活动费两万元。

吴莲炬在成都停留了五天，五天后即行北上。刘存厚也真跟刘备待诸葛亮那样，恭恭敬敬地送到郊外，然后才握手告别（如果说古今有什么区别，大概也就只有将鞠躬改成握手了）。

吴莲炬到京城后，首先拿着刘存厚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靳云鹏。这个靳云鹏就是刘存厚所说的重要棋子，时为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多面外交

刘存厚与靳云鹏颇有渊源。清末时，靳云鹏在云贵总督衙门任军事幕僚长。蔡锷、罗佩金等人为了谋划起义，便派刘存厚打入靳府进行刺探。

靳云鹏并不嫌刘存厚身份低微，常常主动与之商讨时局。在靳云鹏看来，朝廷重用皇室亲贵，而这些亲贵又都昏庸无知，因此清政权迟早是保不住的。靳云鹏不反对革命，但他对孙中山怀有成见，认为孙中山空喊革命，不过是一场空，以后的政权不管是搞君主制还是民主制，终究得由掌握军权的人说了算。

刘存厚并非熊克武那样的革命党人，他参加起义，说穿了无非是不甘寂寞，想趁机干出一番事业而已。靳云鹏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

说："你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听我的话，抓住军队，将来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其时靳云鹏的地位之高，连云贵总督都要谦让三分，他的推心置腹和赏识器重，差点把刘存厚感动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伯乐啊！刘存厚一直认为蔡锷和罗佩金瞧不起自己，现在感到靳云鹏识才用人的眼光远在蔡锷之上，就觉得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负有特殊使命的刘存厚反而被靳云鹏说动，成了靳云鹏的人。只是造化弄人，时隔不久，靳云鹏自己先被"枪杆子理论"给推翻了——蔡锷、罗佩金发动云南起义，占领了总督署，靳云鹏化装逃往北方，刘存厚依靠靳云鹏在云南谋求发展的希望也随之泡汤。

在此之后，虽然天隔一方，但刘存厚并未与靳云鹏中断联系，眼瞅着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

从靳云鹏到段祺瑞，就其内心来说，对蔡锷、罗佩金等人都没有好感，理由也跟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类似，认为此辈皆靠造反起家，不过是水泊梁山里强盗一般的人物，难登大雅之堂。靳云鹏当年就是被蔡、罗从云南赶出来的，自然更是怀恨在心，看完刘存厚的信后，马上决定拉他一把。

在靳云鹏的引见下，吴莲炬拜谒了段祺瑞。得知来意，段祺瑞很干脆地对吴莲炬说："翼青（靳云鹏字翼青）负西南事务专责，又是你们刘军长（刘存厚）的老上司，你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必要时再直接找我。"

除了拜谒段祺瑞外，吴莲炬又马不停蹄，在京城中不停奔走，大到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中到胡景伊等在京官员，小到一般的川籍共和

党议员，他无不接洽。

与此同时，刘存厚则在四川对“内固实力”进行逐一落实。按照吴莲炬所嘱，他创办了一份名为四川新闻的报纸，作为自己的喉舌，还拨出一笔专用经费，让人给京津沪渝的大报按月送去津贴，一般情况下，报馆要么拒收津贴，收了对刘存厚就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

多方宣传很重要，延揽“贤豪”更不可少。刘存厚从四川朝野招揽了一大批人，分别聘为顾问或参议，且每月给以高薪。这些人或者给刘存厚出谋划策，或者帮他在四川议会中进行鼓吹。

无论是在演义还是史实之中，刘备都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在这方面，刘存厚颇有相似之处，他的处世哲学是多面外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作“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讨口子”。这是四川话，“讨口子”是指叫花子，意思大致是说，即便是叫花子，也不能只朝着一家富户要饭，得逛千家门，吃千家饭。

与此相应，他另有一句妙语，谓之“下棋要多走闲着”，也就是必须广结人脉。当时四川的党派中，除了国民党外，还有共和党和进步党。刘存厚本身属于共和党，所招揽的政客也以共和党这个圈子为主，但他并不拒绝进步党的加入。

在四川进步党人中，以张澜的风头为最劲。因为盛传罗佩金与刘存厚有隙，张澜特地从川北赶到成都，表面上是调停罗刘矛盾，实际也是为了预测一下风向，看看罗佩金对他的态度。

张澜在川中是一个忽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偏偏就被罗佩金给忽视了，而且是严重忽视。罗佩金的言谈举止都骄横不可一世，他以为

张澜不过一普通政客，对其不屑一顾，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礼贤下士的意思。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澜在罗佩金处碰了壁，便转身去找刘存厚。刘存厚与罗佩金全然不同，他不仅将张澜奉为上宾，还当面许诺，在驱逐滇黔客军后，除他自掌军政外，会将民政一职委于张澜。

自古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张澜于是决定帮助刘存厚击败罗佩金。

第三章　恶的诅咒

《三国演义》里讲到，蜀中名士张松原本想把西川地图献给曹操，但孟德公不待见他，刘备倒是把张松当个人物，于是张松便转而把地图献给了刘备。

张澜向刘存厚“献出的地图”足够丰厚。由于他在进步党中讲话极有分量，使得进步党与共和党得以联手，同时张澜与川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私谊极好，而第三师实际是进步党所依恃的武装力量，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刘存厚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不但如此，张澜还告诉刘存厚，他会给居于京城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发电报，争取他们也支持刘存厚。

梁启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蒲殿俊乃丧失权柄的空头政客，可谁又敢小觑他们的能量？袁世凯就没把梁启超当回事，结果一个护国运动弄到身败名裂。

笔杆子和嘴皮子，有时候一点不比枪杆子逊色。刘存厚深知其中的分量，所以马上用密电方式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吴莲炬。

收到刘存厚的密电，吴莲炬又去拜见梁启超、蒲殿俊等人，把京城能打、可打的交道几乎全部运转起来。

换了山头换山歌

段祺瑞对罗佩金越来越苛刻，罗佩金发往北京的请示报告不是遭到冷遇，就是被劈头盖脸一顿驳斥。比如罗佩金想以护国有功的名义，再把一批滇军将领给提拔上来，段祺瑞就来了个置之不理，其态度仿佛是过去的胡景伊之与熊克武。

正如吴莲炬在“隆中对”里所言，黎元洪在朝中与段祺瑞素不相能，他对罗佩金这样南方党人出身的督军也向来比较维护。只是黎菩萨终究不是段合肥的对手，在外援上，罗佩金始终处于劣势。

罗佩金并不知道这都是刘存厚私下活动的结果，他只清楚一点，那就是刘存厚对他不服，为此他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将刘存厚调京，以滇军将领接替。按照过去的惯例，督军要下面哪个军官走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地方，基本都会照准。

可是在罗佩金打了多次报告之后，段祺瑞不仅不予支持，还在电文上批了一句话：“所请调拨撤换者，实不止刘存厚一人。”我看你想换的下属不止刘存厚一个，我劝你不要一不顺心就换人，就算换了刘存厚，你这个督军就做得好了?

若是罗佩金知晓吴莲炬奔走京城的细节，也许会不寒而栗：段祺瑞明知刘存厚有取罗自代之心，在罗佩金已危机四伏的情形下，仍要抛出一份偏向性很强的裁军方案，毫无疑问是有把他放在火上烤的意味。

罗佩金一心想着要借北京的方案，来达到削弱川军实力的目的，哪里会把事情想到这么深。在裁军会议上，他坚持将川军缩编为三师一旅，同时执意要取消川军的特种兵。

川军现存的五个师里，只有刘存厚师配有特种兵，对刘存厚来说，罗佩金的矛头几乎就是直冲着他来的。刘存厚要推倒罗佩金，等的就是这样一个理由，如今罗佩金自己提供了理由，倘若再不动手，岂不是傻?

吴莲炬在他的“隆中对”里，曾告诉刘存厚，团结川军很重要。刘存厚通过张澜的关系，已跟第三师师长钟体道达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接下来，就看其他三个师的态度了。

除刘存厚自辖的第二师以及钟体道师外，其余三个师里，刘存厚最无把握的是第四师。该师师长陈泽霈虽为川人，但他在云南给罗佩金当过参谋长，当初罗佩金任命陈泽霈做川军师长，无疑也是想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对川军进行控制。

裁军会议结束的当晚，刘存厚在府里设宴，邀请川军各师师长或代表入席。宴桌之上，刘存厚开宗明义道:“罗督（罗佩金）如此改编军队，实在太不公平。滇黔军可以编为国军，川军却全部沦为地方军，这是什么道理? 我请大家联名致电中央，反对这一办法。”

众人纷纷附和，让刘存厚意想不到的是，陈泽霈的响应居然最为热烈。

还是那句话，换了山头换山歌，陈泽霈的自我定位要比罗佩金准确得多，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是川军将领，就势必要向着川军说话，我指挥的第四师凭什么只能做地方军，而且还是“暂编”?

刘存厚话音刚落，陈泽霈已经抢过纸笔，草拟出电稿，并请各师师长共同签字。一圈转下来，五个师只有一个师不肯署名，这个师是驻重庆的熊克武第五师。

早在蔡锷举护国旗帜，从云南出兵入川时，作为国民党代表，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即随军参赞，但当时只能从事一些宣传联络工作。直到护国军从泸州战场撤退，战局陷于僵持，熊克武抓住机会向蔡锷提议，这才获准以蜀军流落于民间的残部为基础，组建出新的第五师。

熊克武没有亲自出席编遣会议和赴宴，所派代表但懋辛表示："我是熊师长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外的事，我无权过问，所以不能在电稿上签字。"

但懋辛言之凿凿，刘存厚却心中有数：你纵然无权直接决定，不还可以请示嘛，无非发个电报而已。不能者，实不肯为也！

于是第二天，刘存厚再约但懋辛单独谈话，这回但懋辛不再支支吾吾，而是直接予以了回绝。

兔死狐悲

第五师跟从前的蜀军（即老第五师）一样，属于纯粹的党人武装，跟北洋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是不是"国军"并不在乎。这个师名为一师，实际只有一旅，怎么缩编也缩不到他们，况且没有蔡锷、罗佩金的提携，第五师又怎么建立得起来？更不用说，罗佩金也是党人，党人如何可以为难党人，跟着刘存厚这些老川军去瞎折腾？

刘存厚见难以争取，便对但懋辛直言相告："这样吧，请你转告熊师长，将来发生冲突，他只要保持中立，不要跟滇黔军合在一起打我就可以了。"

熊克武既不愿与罗佩金反目，也没有力量得罪刘存厚。对他来说，中立的提议没有什么不好，反正远在重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你们打架好了。

尽管熊克武不愿介入是非，但为壮大声势，刘存厚仍然把他的名字列入电稿，发往北京。这封五师长联名电，立刻使罗佩金陷入了极度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川军将领还罢，那个滇籍的陈泽霈，别人都以为是他罗佩金最大的嫡系，没想到关键时候竟然“背主求荣”，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更让罗佩金感到困窘不安的是北京政府的回应，从京城传来消息，段祺瑞认为罗佩金督川不力，扬言要将他换下来，另派他人来四川做督军。对于段祺瑞的这一态度，罗佩金感到愤懑不已：五师长之所以会发联名电，追根溯源，还不是因为我执行了你的编遣命令，现在却将所有责任和过错都一股脑儿推到了我的身上！

这时正好广东督军请假入京，罗佩金便也打了个请假报告。广东督军请假是真有公事，罗佩金哪有什么公事，他不过是要借此撒撒娇，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而已。

之前罗佩金发往北京政府的电报，要么不予批复，要么迟迟没有回音，这次却出乎异常的明了和快捷，段祺瑞当天复电：准假！

无公事而请假，不过是请辞的另一种好听说法。从四川省长到周围各省的督军均被蒙在鼓里，以为是罗督军自己负气要走，大家碍于情面，都纷纷跑来劝解。同样不知就里的唐继尧还专门给罗佩金发来电报，责备他不能这样一甩袖子就跑：你跑了，留在四川的滇军不是连口粮都没着落了吗?

罗佩金有苦难言，只得告知实情。唐继尧这才知道，不是罗佩金自己想走，是北京政府希望他走，于是连忙予以补救，亲自去电北京，强调四川裁军刚有点儿眉目，不能这时候让罗佩金请假。

以唐继尧在西南的分量，加上黎元洪也力挺罗佩金，段祺瑞这才收回成命。暂时脱离危机的罗佩金一头冷汗，犹如从悬崖边上被人硬拽了回来。

不能往上撒娇，但我还可以朝下使劲。罗佩金看准了，变着法一心要跟他捣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是已经沦为“叛徒”的陈泽霈，另一个就是刘存厚。

身为滇军“智囊”，罗佩金虽无过人的深谋远略，却并不缺乏出色的战术构思。就像当初制订入川方案一样，他决定发动奇袭，打身边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1917年4月13日，罗佩金突然召见陈泽霈，陈泽霈稀里糊涂就去了，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被罗佩金给生生扣了下来。

第一拳打得甚是漂亮，然而第二拳落了空。罗佩金几次约见刘存厚，刘存厚都托故不来。实际上，自领衔发表五师长电后，刘存厚一直都很小心，其戒备程度之深，犹如刘备之防曹操，罗泽南每次在督署召集将领会议，刘存厚都只派代表与会，怕的就是遭到暗算。

对于罗佩金而言，网只要是已经撒了出去，能捞到一个也是好的。1917年4月14日晚，他正式下达命令，宣布撤去陈泽霈师长一职。

陈泽霈被瓮中捉鳖，顿时让刘存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他原先只想以五师长联名电这样的方式，给罗佩金来个下马威，将其逼走。罗

佩金一走，以他在川军中已实际获得的老大位置，川督自然非其莫属。

刘存厚没有想到罗佩金的反击会如此犀利。至此，他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连家里都不敢待，抱着铺盖卷就去了师部，而且晚上睡觉还要换好几个房间。

密电

靳云鹏让吴莲炬转来一封密电，刘存厚看完后更是大惊失色。密电中透露，罗佩金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将第四师予以彻底遣散，以此杀鸡给猴看，吓唬住其他川军，同时他还计划将对付陈泽霈的模式原样复制到刘存厚身上，第一步就是用滇军将领来取代刘存厚。

后面这个设想，罗佩金曾多次上报北京，只是都没有通得过。这次他话里有话地说刘存厚"怯懦兵弱"，而他对刘存厚"非不能强制，实不忍也"，意思是刘部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北京政府仍然采取不作为的态度，他就要自行解决了。

慑于罗佩金的压力，段祺瑞破天荒地对其要求全部予以满足，但也留下了玄机，即一边下令撤掉刘存厚的师长一职，一边扣住新师长的任命不发。在密电中，靳云鹏明白地告诉刘存厚：撤你的职务，并非出自段祺瑞本意，你要好自为之！

刘存厚就此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段祺瑞其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他如果迟疑不决，使得罗佩金继续采取主动，北京方面可就有点儿罩不住了。

北京政府的让步，无疑令罗佩金大受鼓舞，他开始加紧筹备第四师的遣散事宜。1917年4月15日，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命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部队到达广场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让众人始料不及的是，到场的督军罗佩金并没有训话，而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扣留军官，驱逐士兵。

被驱逐的川军士兵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强行遣散，他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饥寒交迫的士兵们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对此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第四师的士兵又重新出现在街头。再次现身时，士兵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都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苦。

除了黄白纸钱，士兵们大多手持短刀利刃，少数赤手空拳的则沿街向屠户借杀猪刀，或者朝居民要菜刀。显然，刘存厚的一顿饭不仅填饱了他们的肚子，还壮了大家的胆气。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了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游行士兵虽然手中只有刀，但在后面为他们保驾的其余川军却

都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罗佩金和刘存厚闻报，均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的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了血腥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首当其冲地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侦探”，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滇军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人们也同样有理由对罗佩金等人当年发动起义的初衷进行质疑，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被他们赶下台的旧官僚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大多数曾经信誓旦旦发过的誓言，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兑现了。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

一国三公

滇军的凶残暴虐，迅速招致了当地民众的反弹。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多数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谓之“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将他们的武器予以收缴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又将武器全部夺了过去，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激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革命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刘罗之战”开始了。谁也不见得是好人，但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刘存厚当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欲同滇军一拼，那些被遣散士兵在上阵后更是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至于只能据皇城以守。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在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后加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这在西南叫作“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相比之下，在争取民心方面，刘存厚倒

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几个川军曾经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赫然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撂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元上升至十几万元。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省长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贵州宣布独立并派戴戡入川助战。和唐继尧一样，贵州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

黔军兵既不多，武器还差，刚入川时，士兵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等于抓瞎，戴戡在四川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连防区都差点丢掉。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岂止刘存厚对此不服，就连罗佩金也认为戴戡无功受禄，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他，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个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了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便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一国三公”里面，戴戡算是最乏善可陈的，一方面，他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另一方面，又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在还未来省城时，戴戡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的师部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则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渐渐地，他就流露出心灰气短的情绪，私下与别人闲谈提及蔡锷逸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他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下去。就在戴戡几乎已经打算辞职不干的时候，刘罗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

鹬蚌相争

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他实际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处，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名将领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打不倒谁的格局，"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需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劝解，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全新装备？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至于胳膊肘儿往外拐吧。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现在仗打起来了，戴戡倒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

外拐，可问题是也没有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刘罗之战前，北京的段祺瑞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最好的处置办法，只能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1917年4月20日，北京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京。

刘罗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他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得以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发现彩球抛到了自己身上，戴戡不由得喜出望外。渔翁既然已经得利，就可以让一对鹬蚌住嘴了，1917年4月21日，他把北京电令告知刘罗，要求双方执行电令。

可是刘罗谁都没有主动停火。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职，而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呢，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争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能够解决战争的终究还是战争。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川军的第一炮就击中了他们的会议室，当场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民初时期的大炮从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够做到指哪儿打哪儿，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只是罗佩金不会这么想，川军的炮击把他的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罗佩金唯有寄望于其他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刘存厚早就防到了此招，成都巷战的同时，他已派钟体道师兵分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以便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信心完全崩溃，1917年4月24日，他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了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个昼夜的巷战方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而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名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戴戡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摆出了一副就要当家做主的派头。

很多有识之士都为戴戡感到担忧，包括在川的进步党。事实上，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没有真正接受北京政府的电令，两人都不愿意去北京赋闲，与此同时，罗佩金的滇军仍在四川，只不过驻于成都城外而已，刘存厚的川军也拒不撤出成都，仍然守着老防区一动不动。

张澜虽助刘存厚，但他毕竟是进步党人，为戴戡着想，便亲自来成都晋见戴戡，劝他让出一个会办的头衔给刘存厚："你不是有三颗印吗？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又何必如此吝惜？"

对于张澜的建议，戴戡拒不接受，因为三颗印，他一颗都舍不得腾出来让给别人！

赢家通吃

一场武戏下来，刘存厚累到大汗淋漓，结果好事竟然全都跑到了别人头上，对他而言，犹如是参加护国之役的重放，真正是晦气到了极点，愤愤然之余，只能寻找新的出路。

段祺瑞弃刘用戴，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属于权宜之计，他通过吴莲炬告诉刘存厚："川事未了，幸勿退缩，中央当作最后处理。"

还没等段祺瑞再作决定，北京政局风云突变，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段祺瑞一气之下，弃职跑到天津去了。紧接着，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辫子兵入京，但入京之后马上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政局的一连串变化，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以致连吴莲炬这样的智谋之士都不知道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了。不过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即下台后的段祺瑞不管身处何方，仍然是说话管用的铁腕人物，其态度非常重要，于是吴莲炬急忙赶到天津，拜谒并请示于段祺瑞。

段祺瑞自己就是让黎元洪和国会给气跑的，张勋解散国会，无异于在政敌背后开了一枪。段祺瑞自然很是高兴，他对吴莲炬说："你怕什么？快去北京找张勋吧，顺便带去我的慰问之意。"

吴莲炬摸清门道，返京后立即求见张勋，替刘存厚表示效忠之意。

你要效忠，还不是想效就能效，得人家看得上才行。张勋开门见山地问吴莲炬，刘存厚有多少实力。吴莲炬的反应相当迅速："刘部有两师一旅，为川军重心，吃得开，绝无问题。"张勋放心了，1917年7月1日，他在北京策动复辟，同时委任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从前玩儿命似的也没能搏到一官半职，现在一个电令过来，就梦想成真，成了堂堂封疆大吏，把个刘存厚给乐的，恨不得把委任状大声念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可是紧接着传来的一个密电，却又让他张不开嘴了。

密电是吴莲炬发来的，他特地叮嘱刘存厚，说暂时还不能对张勋的任命表示态度，因为时局尚在变化，目前看不清风向。

知道吴莲炬信息灵通，刘存厚只好依言暂时隐忍不发。

京城的最新任命也让戴戡着实吃了一惊，张勋复辟后，各省均以巡抚为一把手，但其他省都是以督军为巡抚，唯有四川另择了人选。

这一边，刘存厚已被任命为巡抚，那一边，戴戡的督军还没被取消，等于一省之内出现了两个一字并肩王。四川的政治氛围立刻变得波云诡谲，原本就不对付的川黔两军也都行动起来，双方各守防区，遍布岗哨，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是赞成复辟，还是赞成共和？是当督军，还是做巡抚？刘存厚无所谓，戴戡其实也无所谓。这就跟过去的护国运动一样，关键还是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按照赢家通吃的原理，究竟复辟好还是共和好，并不取决于它们本身，而只取决于赢家的意见。

在答案揭晓，或者说赢家亮相之前，大家都在猜谜语，无论刘存厚还是戴戡，都不敢随意表态，他们只能继续观察北京的动静。

1917年7月2日，梁启超自天津给戴戡发来急电，告知段祺瑞已到马厂誓师，准备号召北洋军队讨伐张勋和维护共和，曾经被段所认可的张勋转眼之间已成了“逆”。

看完急电，戴戡长长地松了口气，没什么好说的了，段祺瑞必是赢家，张勋必是输家，他立即下令戒严，通电讨逆。与此同时，他又给刘存厚打了个电话：“我决定明天就住进皇城，旧督院已腾空出来给先生了，请赶快搬过来做巡抚吧。”

“刘先生”这时也接到吴莲炬的密电，了解到了北京政局的变化，接到戴戡的电话，他赶紧说：“巡抚之职，我得辞谢，我决不能做，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戴戡：“你来做你的巡抚，我照做我的督军就是，何必辞谢！”刘存厚这才弄清楚，戴戡不过是在讥讽他，不由得恨得直握拳头。

刘罗之战已经让川滇军队两败俱伤，刘存厚短期内并不想再与黔军开战，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倒是戴戡得理不饶人，他抓住刘存厚“附逆”的罪状不放，并视之为一举解决刘存厚的绝佳机会。

当然，要解决刘存厚绝不是一件举而易举的事。刘存厚拥有一师一旅，不仅总兵力达到一万三千人，而且部队含特种兵编制，步、骑、炮、工、辎等五大兵种齐全。戴戡带来成都的黔军仅有一个混成旅，计六七千人，仅数量而言，就只有对方的一半，双方若是发生直接冲突，谁更有优势，这笔账戴戡还是会算的。

为了弥补军队实力的不足，戴戡想到了要滇黔联手，他派人与罗佩金联络，约定一旦川黔开火，滇军即星夜赶来援助。罗佩金答应了他的请求，这让戴戡变得气壮如牛，有恃无恐。

你们慢慢玩

1917年7月4日，戴戡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存厚出席。刘存厚自己不敢去，只托病派了个代表。会上，戴戡把桌子一拍，责问代表，刘存厚为什么还不取消“伪职”。代表赶紧分辩说，对于张勋任命的“四川巡抚”，刘存厚根本就没接受，何谈取消。

戴戡就是要找碴儿，哪肯轻易放过，他说刘存厚态度不明朗，不能让人放心。代表当即表示，回去后就发通电“讨逆”。

第二天，刘存厚拟好了声讨张勋和反对复辟的电稿，不料戴戡事先已经封锁电报局，电稿发不出去！

就在刘存厚气急败坏的时候，戴戡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还不通电表态。刘存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要我表态，你应该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人员。"

戴戡扔下电话，传令发起进攻。当天下午，黔军便向川军防区攻了过来，"刘戴之战"也即第二次成都巷战爆发了。

刘存厚的部队虽然总量很大，但驻守成都的只有两个营，没有黔军多，因此一开始，黔军来势汹汹，好像一口就能将对手给吞掉。7月6日，川军渐呈不支之状，黔军沿路连抢带烧，十分得意。

这是一个堪与滇军媲美的弱智举动。肆无忌惮的焚掠让成都居民愤恨不已，认为黔军比滇军更坏，因此全都自动站到了川军一边。打巷战，必须对街道路径熟悉，居民往往大声叫着为川军指路，使得他们可以从被烧毁的断垣残壁中自由穿越，而黔军只知道守街口，猛一回头，才发现川军竟然已经抄到自己后面去了。

黔军招架不住了，纷纷撤往老皇城。刘存厚看出戴戡据皇城以守是早有计划，不用说，必定是在等待滇军来援，如果滇军一到，里应外合，川军就危险了，因此他必须在滇军到来之前，将黔军消灭于皇城之内。

把罗佩金从皇城吓跑，靠的就是大炮。刘存厚依葫芦画瓢，把炮兵阵地置于城墙之上，朝皇城内猛轰。可是几十发炮弹打进皇城，却没有一发落在黔军阵地上，皇城区域很大，黔军既然毫发无伤，也就不把川军的大炮当回事了。

刘存厚瞧着这个来气。城墙离皇城太远，他干脆下令把大炮搬到皇城下，直接对准皇城的城门进行射击。

川军的火炮是抛射炮，不是平射炮。刘存厚不懂，他拿炮当枪使，以为瞄准什么就能击中什么，结果炮弹根本就没朝城门去，而是呈弧线状落进了皇城以内。

原来以前能打中会议室纯属巧合！眼见炮击无效，刘存厚转而组织敢死队攻城，并规定凡攻进皇城的士兵，每人赏大洋五十。悬赏令一下，图利的就来了，敢死队很快就凑足了两百人，他们在前面用长梯登城，后面则继之以大队步兵。

黔军既不怕炮，也不惧人。川军敢死队架梯子时，他们不声不响，再往上爬，也不理会，一直等到敢死队员在城垛缺口露出脑袋，才一梭镖刺过去，对方立刻应声被刺落城下。

敢死队员在皇城下已经死伤了足有一半人，刘存厚也没了法子，只得绕城修筑工事，将皇城紧紧困住。

刘戴之战打响后，刘存厚最担心的就是滇军来援，因此已提前拨出了一部分打援部队，戴戡也满心期望罗佩金来救他，可是几天过去了，滇军连个影子也没出现。

罗佩金不是不救，是不想早早地来救。说起渔翁得利最早的发起者，还得数人家罗佩金，但谁都没想到戴戡后来者居上，在刘罗之战中狠狠地摆了他一道。向来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何况利益场上没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君子，罗佩金回过头来也要摆戴戡一道，一方面是出口气，另一方面是要抢过“最佳渔翁”的荣誉席位：油才刚刚放进锅，还没热起来呢，你们慢慢玩！

黔军守皇城，并没有守个一年半载的准备，滇军迟迟不予增援，粮食就成了问题。戴戡又是个没决断的人，究竟是固守还是突围，老

是拿不定主意，导致军心也渐渐涣散起来。

戴戡跟罗佩金约好，黔军最多坚守五天。五天过去，仍然杳无音信，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强行突围。然而晚了，刘存厚已经将皇城封得严严实实，黔军根本突不出去。

历来的破城之法无非那几样，继炮击、敢死队之后，刘存厚又想到了用地雷爆破。这其实是当年太平军的发明，只要照方子抓药就行。川军从民间征用了一口柏木棺材，将火药放进去，外面加上铁箍，然后挖一隧道，直通皇城的城墙底下，为的就是把火药棺材放进去。

当地雷爆炸时，声音惊天动地，皇城城墙被炸开了三丈多长的豁口。爆炸停止，敢死队立刻顺着豁口冲了进去。黔军也很机警，他们其实早已发现地雷，预先就埋伏在豁口周围，当先的敢死队员刚冲进去就被刺倒在地，随后豁口也被再度阻断。

三国大战

地雷攻城虽未成功，但它所制造出来的声光电效果，却对戴戡及其所部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次日，黔军在皇城城头上插起白旗，同时用绳子放下两名使者，要求川军允许他们从成都撤退。

刘存厚认为戴戡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遂表示同意，但没想到这是黔军使的一诈。黔军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后，并没有出城，而是直接冲上城墙，欲控制城头。城头作为制高点，在战争中至关重

要，川军自然也得以死相争。短兵相接处，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只能用长矛和刺刀进行拼杀。

经过这么多天的围困，黔军已经又饥又疲，偏偏这种肉搏战还是力气活，渐渐地就支撑不住了，加上川军援兵越来越多，终于又被迫退回皇城。

整整十二天过去了，滇军还是没有露面，戴戡终于彻底死掉了坚守待援的心。他通过当地的知名人士做担保，向刘存厚交出三颗大印，再次请求撤出成都。

刘存厚同意了——不过是使诈，川军对撤退的黔军进行半路伏击，黔军全军覆没，戴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自尽。

诈术跟权术一样，属于潘多拉魔盒里面的灾难，魔盒一旦打开，就会让不加节制者后悔莫及，因为你会用，别人也会用，谁都会使诈，到头来伤的还是你自个。

喜欢摆龙门阵（侃大山）的川人，给戴戡这个外乡客送来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一生惯作秦庭哭”，下联是“死后方知蜀道难”。两句联语都跟滇军有关，滇军“侵黔”，实系戴戡所为，是他在云南“哭秦庭”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滇军扶持，戴戡无法得势，然而他死于“蜀道”，亦是为滇军所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刘戴之战结束，北京局势也已尘埃落定。段祺瑞驱走张勋，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复出政坛，其风光直追当年的蔡锷。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半个月后，刘存厚的师部如愿以偿地挂上了“四川督军署”的横匾。

罗佩金本来要选最佳时机出手，就像护国战争时对待陈宧那样，可惜渔翁尚未得利，鹬蚌相争已经有了结果，好好的一口锅眼看着给烧到了焦煳。罗佩金夺不到川督之位，不过就是唐继尧的一个普通下属，唐继尧对他极不满意，索性将其召回了云南。

在成都巷战这一轮全武行中，滇黔都相继吃了亏。吃了亏就得找补，唐继尧增派大批滇军入川，贵州督军为了替戴戡报仇，也调拨黔军主力入川，滇黔两军合计达到四万多人。与此同时，参与混战的川军也从先前的两个师上升到了三个师。

恩怨情仇的主角，已由三个男人变成了三群男人，这意味着“三国大战”的杀人游戏进入了升级阶段。川滇黔轮番鏖战，战争从成都延伸到四川全境，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场面也一次比一次残酷激烈。

眼见大火已经快蔓延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北京政府急忙派大员率北洋军前往查办调处，然而面对混乱的战局，即便中央大员亦束手无策，只能看着各方继续打来打去。

在“三国大战”中，川军起初占有上风，但在滇军奇袭重庆后，战局变得对滇黔军有利起来。滇黔军知道段祺瑞站在刘存厚一方，因此把北洋军和川军放在一起打，唐继尧甚至编了个谎，说是段祺瑞要把驻川滇军全部解散，然后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给他这么一忽悠，滇军打北洋军比打川军还凶，南下的北洋军不过两个营，哪里经得起如此狠揍，只得狼狈退出川境——说是南下查办，到头来却让别人给“办”了。

川军各师大部分都参与了“三国大战”，但有一个师始终冷眼旁观，这就是熊克武的第五师。和云南贵州人打架，同为四川人竟漠然视之，似乎难以理喻，但熊克武自有他的一套逻辑：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与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对立，刘存厚等老川军既以段祺瑞为靠山，就与国民党是敌人，依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老川军就是敌，滇黔军才是友。

概而言之，熊克武虽是四川人，但他更是一个国民党人，从他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党派利益远比乡情更为重要。在“三国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有人希望第五师加入川军作战阵营，熊克武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第五师还戴着护国军军帽，跟滇黔军一样是‘红边边’，护国军不能打护国军，‘红边边’也不能打‘红边边’。”

熊克武不光是坐而望之，他实际还暗中拨出了一部分兵力协助滇黔军作战，到北洋军退出川境时，更是沿路袭击，果然不愧为“川军中的‘红边边’”。

这当然也是渔翁观景的一种，而且得到的利同样不少。

西霸王

在“三国大战”的末尾，四川重又变成了双头政府，一头是成都，一头是重庆，成都由新督军刘存厚掌握，重庆则是熊克武和滇黔军的据点。

试想一下，假如不傍着滇黔军，光凭第五师，熊克武哪有实力和刘存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一山容不得二虎，熊克武和刘存厚迟早还

要一搏，不过依照规矩，在搏之前，一定还要找一顶帽子来戴。这顶帽子叫作护法运动，护法运动最初的动因是为了反对张勋复辟，维护南京约法和国会，但张勋在台上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段祺瑞一脚从舞台上给踢了下去，于是反张勋又变成了反段祺瑞。

在护法运动的大旗下，滇黔军和重庆川军组成靖国联军，熊克武任四川联军总司令，率领三军“讨伐”刘存厚。“讨伐”的理由不管怎样都能成立：要反张勋，刘存厚就是张勋曾任命的四川巡抚；要反段祺瑞，刘存厚正是段祺瑞所加封的四川督军。

靖国军出兵后仅一个多月就已逼近成都，刘存厚发现情况不妙，急忙发出宣言，要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无奈熊克武和滇黔联军并没有要引他为“同志”的意思——“护法”犹如“革命”，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阿Q想要革命，还得洋先生和赵白眼他们允许才行哩！

1918年6月，熊克武将刘存厚驱出四川，自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完全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

熊克武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唐继尧给的，他的四川联军总司令即为唐继尧所授，唐继尧自己是三省联军总司令，四川总司令得服从三省总司令，换句话说，唐现在已经把自己看成是熊的老板，那个扶他上战马的人了。

很多时候，口号都犹如华丽丽的糖纸，包裹在里面的，其实不过是人的各种野心和欲望。比如说唐某，从辛亥革命，再到护国护法，可以说无役不与，拣好事都有他的份儿，但革命来革命去，正义来正义去，落到实处，却还是想把四川这块肥肉放到他个人的餐桌上去。

唐继尧的这种野心，名为“大云南主义”，也就是把川滇黔都置于他唐继尧的统制之下，以此成为独霸三省的“西霸王”。在唐继尧的如意算盘中，罗佩金曾是“大云南主义”的马前卒，相应策略为“以滇人制川人”，但罗佩金被刘存厚逐出成都，说明罗佩金已失去利用价值，“以滇人制川人”也失败了。之后唐继尧便想到了“以川人制川人”，而熊克武正是这一计划中的理想棋子。

唐继尧授命熊克武为四川联军总司令，本应事先向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推荐，由军政府委任，可他直接绕了过去，为的就是要让熊克武知道：你以后是我的人了！

按照这个定义，熊克武的成功自然就是唐继尧的成功。在熊克武驱走刘存厚后，唐继尧理所当然地认为，四川已唾手可得。1918年9月16日，当唐继尧到重庆主持召开联军会议时，其仪仗之盛，已活脱脱是一个西霸王的规模。

走在前面的是骑兵。骑兵所乘之马均经过精心挑选，青、枣红、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士兵们身背马枪，腰挎战刀，足穿皮靴，头戴钢盔，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紧接着是唐继尧的禁卫军，号称佽飞军，以古代一个叫佽飞的勇士命名。佽飞军的装扮不中不洋：头戴钢盔，肩上扛着的却是吕布那样的方天画戟。

还没到头呢，接下来尚有掌旗官，扛一面杏黄大旗，上绣一个斗大的“唐”字，与传统评书中经常描述的画面简直毫无二致。

跟着“唐”字大旗的，是一顶八抬大轿。不过唐继尧并不在轿里，他在轿后，骑一匹黄骠马，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这就叫威武。

……

路上负责迎接的四川文武官员无不咂舌，以为古时王侯亦不过如此。

这算什么，唐继尧在重庆已建好了行宫，特地邀请众人去吃西餐，顺便开开眼。走进行宫，官员们犹如刘老老进了大观园，看得眼睛都发直了，里面的奢侈豪华真是难以形容啊！

西霸王的排场，震动了整个山城，重庆报纸记载："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出警入跸，俨若帝天。"

唐继尧是老牌的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可这又怎么样呢？倒是港版的电影《鹿鼎记》很形象，剧中陈近南要动员韦小宝潜伏皇宫，告诉他："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托佛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因为"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和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韦小宝绝顶聪明，马上明白了，原来复明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要紧的还是"抢回无数的银两跟女人"。

也许唐继尧刚开始并不是这么想，他在念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很可能非常真诚，但在"驱逐鞑虏"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又的的确确只是围绕"银两跟女人"在打转。

同样曾经"侵川"，蔡锷要的是名，唐继尧除了图名，更看重利——更大的排场，更多的"银两跟女人"。

当他一脚迈进重庆时，距离这些只是一步之遥。

以党人制党人

唐继尧为重庆会议专门准备了一个计划，即“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同盟计划中最核心，同时对熊克武来说也是最要命的，就是四川兵工厂和税收的归属，唐继尧要将其划归联军总部所有。

唐继尧以为熊克武的官是他封的，他说什么就应该是什么，但熊克武拒绝签字。熊克武是强人，不是傀儡，他岂能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联军总部谁当家？还不是唐继尧。唐继尧这么一划，就等于四川的枪和四川的钱，全部流入了他唐继尧的腰包。

唐继尧在利用熊克武，熊克武其实也在利用唐继尧，即利用唐继尧的滇军，驱走刘存厚。现在刘存厚已经滚蛋，四川军政大权在握，凭什么还要听你摆布，签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会议开了一周，毫无结果，唐继尧大为扫兴，返回云南后就开始从“扶熊”走向“倒熊”：你既然不愿做我“图川”的滑滑梯，偏要做绊脚石，那我就必须除掉你！

以前是“以川人制川人”，现在国民党掌控四川，唐继尧采取的是“以党人制党人”。第一个被唐继尧拿来当牌打的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熊克武之间其实久已不睦，而他们的矛盾，实际起自孙中山和黄兴的矛盾。孙黄有隙，是二次革命后的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失败原因归结于大家都不听他的，于是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以示效忠，但此举遭到了黄兴等部分老资格党人的拒绝。

“按手印事件”加剧了党人内部的分裂，黄兴等人离开东京，前往南洋，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南洋派”，留在东京的党人则被称为“东京

派”。熊克武原先属于东京派，他自己也在志愿书上按过手印，但后来因与川籍党人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便离开东京投奔黄兴，从而加入了南洋派。

熊孙之间自此开始产生隔阂，熊克武再度回川后，两人即很少有书信往来，熊克武基本不向孙中山报告川省情况，一切都是由他自己判断自己做主。孙中山起初任命四川督军时，提名的也不是熊克武，只是最初被提名者自觉资历尚浅，自动退出了。熊克武知道此事后，气得连督军都不肯就任，仍然当他的四川联军总司令。

赢家通吃的法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适用。假如熊克武在“三国大战”中失败了，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他赢了。孙中山由于事先没有把筹码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后就尝到了苦头——他委任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却自行发出通电，宣布由他本人兼摄军民两政，同时派但懋辛代理省长。

杨庶堪手里拿着孙中山的委任状，四川方面却早已名花有主，弄得这位先生只好滞留上海，直接将近半年之后才得以在成都就职。

杨庶堪早年执教于四川高等学堂，其人学贯中西，是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博学之士，向来深受孙中山器重。由杨庶堪来负责治理四川民政，应该说是上上之选，他本人也很愿意协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业。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熊克武此刻早已视之为孙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说难听点，是孙中山在他身边安的钉子。有钉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处处对杨庶堪进行掣肘。

杨庶堪要办民政，当然离不开钱，恰恰熊克武就在这方面掐脖子，以致闹出了“熊杨争款，几于用兵”这样的荒唐事。在一筹莫展的

情况下，杨庶堪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保举廖仲恺为四川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长，欲以这两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熊克武毫不客气，立即利用四川省议会来加以反对。廖蒋都是明白人，中途听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欢迎，就马上折回了广东。

都是同志，可是有时候同志之间的仇恨，还胜过敌人。熊克武此举，不仅让孙中山难堪，而且也令杨庶堪备受打击。杨庶堪为缓和双方矛盾，无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为由请假。

孰料熊克武仍没有一点要收手的意思，在杨庶堪假满复职后，他又以督军的名义，接收了本来应由省长指挥的全川警备队。

原形毕露

1920年2月，熊克武通电就任四川督军，此时距离孙中山的任命已过去将近一年。在这封通电中，熊克武竟称北京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其时南北已完全对立，北京政府接到通电后，自然对南方党人极尽嘲弄之能事。

除了利用孙中山与熊克武的矛盾，对熊克武进行牵制和打压外，唐继尧甩出的第二张牌是“实业团”。

四川国民党人一直有两大派别，或者说两座山头。一派叫作“九人团”，这一派为熊克武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内，都是日本军校的留学生，前后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作“实业团”，由四川学界的师生组成，辛亥革命后，其中一部分人从政，另外一部分人投笔从戎，成为所谓的“长衫军人”。

简单说来，九人团偏重军事，实业团关注民政。实业团名称的来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将革命活动转向经济活动，因此实业团不像九人团那样动辄喊打喊杀，具体观点上也颇多分歧。

熊克武及其九人团与实业团之间向来不对付。熊克武在重新编组部队时，对长衫军人所率的民军多持歧视态度，民军在护法战争中所损失的枪弹也得不到补充，这使得实业团与熊克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遵从孙中山指示，“拥杨反熊”（拥护杨庶堪，反对熊克武）。

3月，孙中山在给唐继尧的电文中，毫不隐讳地拿出了自己的“弃熊计划”，实业团的反戈一击正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业团要“拥杨反熊”，但缺乏足够力量，正好唐继尧需要借用川军力量，双方便结成了“倒熊同盟”。

一旦拥有扳倒熊克武的把握和实力后，唐继尧便开始对熊克武步步进逼。唐继尧的代表到成都与熊克武见面，在欢迎会上公开扬言，说云南人说爱国是壳子话（即吹牛），所以滇军将领之间也不免有意见，但是打起仗来，丝毫意见没有。这些话摆明就是说给熊克武听的。

黔军历来有好处就上。“倒熊同盟”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参与，其代表直接朝川人喊话：“川事自然要由川军来解决，滇黔不打算过问。可要是川军解决不了，滇黔当然不能坐视。”

山雨欲来，熊克武感受到了威胁，他一面紧急扩充军队，一面对老川军进行极力争取。

在此之前，熊克武也曾坐看滇黔军与川军打得不亦乐乎，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他号召川军的立场就不能是党人立场，而应是川人立

场，即“川人不打川人”。与此同时，他还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四川当地报刊媒体，痛骂唐继尧是在“以日本式的野心侵略川省”。

彼时九一八事变尚未爆发，但日本侵华的野心已透过“二十一条”等初露端倪，国人深以为耻。熊克武把唐继尧比作西南的日本，自然是为了引起川人的同仇敌忾。

做了这么多铺垫后，一部分老川军终于加入了熊克武的阵营，但与倒熊同盟军相比，实力上仍大大逊色，连舆论和民心也无法完全抵销这一差距。1920年5月，唐继尧指挥盟军向熊克武发起进攻，熊克武双拳难敌四手，被迫退出成都。

盟军紧追不舍，只因天气酷热，很多官兵染上疾病，才停止追击，给熊克武留下了一条生路。

两年前，有一个人也像熊克武一样被追杀，他们的经历相似，结局相似，连逃亡的路径都相似，此人就是刘存厚。被熊克武赶出四川后，刘存厚逃到了陕南。这个可怜虫虽经数年寒窗苦读，成绩仍是一塌糊涂，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原形毕露了。

在刘罗之战、刘戴之战等历次战役中，钟体道都是刘存厚最可靠和最得力的同盟伙伴，当熊克武进驻成都时，曾劝其归顺，但遭到了钟体道的严辞拒绝。钟体道随刘存厚一路逃到陕南，风餐露宿，患难与共，这样的朋友铁不铁，可交不可交?

够铁，可交，但问题是刘存厚已经用不着他了，反而两人同为师长，钟体道对刘存厚而言还有威胁。

刘存厚名不副实，他的内心其实一点没有存下“厚道”这两个字，他先克扣军饷，接着又挖墙脚，再之后甚至动用了鸿门宴，连逼带吓，直至把钟体道赶走了事。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

陕南至此只剩下了一个刘存厚，他成了“汉中王”，可汉中王不是川中王，当地实在太穷了，没有一点油水可捞。

刘存厚的两个师是北京政府认可的“国军”，饷械皆由北京拨付，应付军队的正常开销勉强够用，但刘存厚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所以他对官兵的军饷只肯发七成，另外三成生生都给扣掉做了经费。官兵拿不全工资，便自找门路，开烟馆的开烟馆，设赌场的设赌场，刘存厚自己也卷起袖子，逼当地人种植鸦片，以便按亩收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陕西督军对刘存厚下达逐客令，陕西方面七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让刘存厚立即滚蛋，并且声称，如果北京拿不出办法，陕军会自行解决。陕西人为此还给刘存厚拟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来此地地无皮。”

陕军进逼，陕人唾骂，陕地又如此贫瘠，刘存厚也早就不想待在陕南了，可问题是北京政府一圈问过来，没有哪个地方肯收容他。

四川自然是对他关紧大门。问甘肃，甘肃人急得差点跳起来，唯恐北京政府把这个灾星强塞过去。再跟湖北商量，湖北那边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怎么都行，但千万别把这货给送过来。

刘存厚不再是人见人羡的皇叔，甚至连编草鞋的都不如，他就是一送不出去的瘟神！

人生真是没有奔头啊，就在刘存厚深感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熊克武。熊克武就在川陕边境的阆中，与刘存厚所处的陕南靠得很近。陕南够穷了，阆中还要穷，以致熊克武不得不伸手向刘存厚乞援。

面对熊克武的落魄，刘存厚完全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仿佛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两年前，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两年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混得很惨，一样走投无路。

是谁，究竟是谁，把我们搞成了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当然是杀千刀的滇黔军。

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熊刘决定联手发起反攻，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920年8月，刘存厚沿西路向成都，熊克武沿东路向重庆，分道率部进川。

此时的驻川滇军正处于实力上的顶峰阶段。自蔡锷督滇，滇军便名将辈出，如今罗佩金已经过时，顾品珍、赵又新才是其中的佼佼者。顾品珍以智将著称，在成都巷战后的“三国大战”中，滇军起初处于劣势，正是他策划对重庆发动奇袭，才得以扭转乾坤，驱走刘存厚。赵又新则是蔡锷帐下的第一猛将，护国之役之所以能够赢定，大反攻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赵又新所部正是那次大反攻的主力。

顾品珍有个人主见，不是什么都听唐继尧的，相比之下，赵又新对唐继尧比较忠心，唐继尧让他到东绝不去西，但是两人又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想赖在四川。

没办法，天府之国实在太富足了，躺在这个温柔乡里，谁都不想回家。顾赵在四川大修生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本乡本土人氏，顾品珍的生祠叫作“顾公祠”，生祠落成的当天，他就把自己的“禄位牌”给供入了祠内。

熊克武、刘存厚的目标是要将滇黔军赶出四川，顾品珍、赵又新自然不能接受，就算唐继尧不下指令，他们也得“毅然决然以图孤注一掷”。

除了拥有名将压阵，滇军的士气也极为旺盛。西南各军，向以滇军作战最为顽强，他们一方面与其主将一样，视四川为乐土，另一方面由于入川以来常胜不败，便逐渐生出了一股傲气。

滇军自以为是，跟在他们后面的黔军同样嚣张得不行。在滇黔军的控制之下，四川人几乎变成了下等人的代名词。一个四川记者悲哀地写道，从前说起西南，总是川滇黔，后来变成了滇川黔，如今应称滇黔川。

正是这一现状，令四川政局率先发生了变化。实业团引狼入室的初衷，其实与当初熊克武借滇黔军之力驱走刘存厚一样，都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熊克武既败，他们就要站出来主张四川的权益，可是唐继尧哪里会予以理睬。实业团在大为丧气之余，也就自然而然地生起了驱逐滇黔军的念头。

实业团的转舵，代表了四川中上层社会的舆论走向。曾参与驱熊的川军将领举办茶话会，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士绅代表当场就说：“我们希望各军能把川土收回，甚至于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们还我们的银钱！”语毕，在座士绅掌声雷动。

老川军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军士兵十分藐视，几乎把他们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戴联军总部要求统一佩戴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极度仇视。

当兵的倒霉，当官的亦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成都巷战及“三国大战”的川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就升不成旅长。旅长回去做团长的工作，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

以死报我四川

川军从军官到士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赢得了人心，川军各部纷纷加入。不过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即刘存厚给一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各自为战，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五个手指攥成拳头。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他们最初也都没有把川军的集体反攻当一回事。

顾赵没有想到的，是镜子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在“为桑梓而战”口号的激励下，川军各部争先恐后，“驱滇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各路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个营，约合十三个旅。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两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此地有一处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地势平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

顾赵计划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是人人争先，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是你推我挤，乃至互不相救。

顾赵认定，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借张飞营之险，击溃其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这就像是一只气球，吹得再圆再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九昼夜血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他们坚持到了顾赵所谓的“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一点办法。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这么高尚，讲穿了，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利”，不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

直至面临山穷水尽，在最危难的时候得到成都庇佑，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一位成都士绅来给川军打气，他先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

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舍弃成都。”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报我四川！”

在护省爱乡之情的感召下，川军鼓足勇气，誓死保卫成都，滇军屡攻不克。顾品珍、赵又新对此大感意外，他们的处境也渐渐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是攻城战可能旷日持久，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攻下成都，另一方面成都以外的川军已从侧后袭来，此时滇军尽抽主力于龙泉山前线，后路十分空虚，受到的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顾赵决定改变作战计划，撤出龙泉山和张飞营，以便收缩战线，整军再战。滇军历经半个月的苦战，一天都没有好好地休整过，早已疲惫不堪，结果一退就无法收拾，部队很快就由有秩序的撤退演变成了毫无秩序的溃退。

发现滇军溃退，川军立即发力猛追。他们在城内以逸待劳，吃饱了饭，养足了精神，在这场追逐赛中占尽优势。滇军实在太困太乏了，沿途落伍官兵络绎不绝，而且通常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川军不用作战，就俘获到了大把大把的滇军。

客走主留

古语“两手劈开生死路”，现在留给川军的是生，留给滇军的是死。顾赵的整兵再战成为最大失策，当川军追到泸州时，滇军已然陈尸遍地，有的甚至是人马俱毙，死人俯卧在死马之上，其状甚惨。赵又新在泸州被击毙，尸体被抬回其军部时，门口一对红纱灯笼还亮着。

川军收复泸州后，标志着西战场已以川胜滇败告终。接下来，川军又继续分道穷追，进入以重庆为中心的东战场。后来的共和国两大元帅当时各为其主，刘伯承在川军任团长，为熊克武的部下，朱德在滇军任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民间盛传两位开国元帅在东战场展开拼杀，川军打败了滇军，朱德随滇军逃回了云南。

实际上，自溃败于泸州起，滇军就已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和意志。顾品珍在从龙泉山撤出时，下属向他进言，说我们进行的这都是不义之战，也不知道究竟要打到哪一天才能止，不如返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踏踏实实地过点日子。

顾品珍听后微笑不语，这是因为他仍以为自己握有胜算，根本没有想到会一溃如斯。在这次战役末期，顾品珍虽未像赵又新一样死于阵前，却染上了重病，导致卧床不起，憔悴不堪。

其实，比他们更可怜也更可悲的是战死于荒野的滇军士兵。这些云南子弟曾跟着蔡锷参加过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可是自己宝贵的生命以及热血换来的所有荣誉，就这样因为上层某几个人的私利而扫地以净。

我们进行的确实是不义之战，我们要回家！滇军已全无斗志，唯一肯在东战场与川军继续角力的只剩下黔军。可黔军向来都是跟着滇军混，滇军退缩，黔军一对一根本就打不过川军。很快，滇黔军残部就都退往贵州，而且自此再无力量入川。

四川曾经是一块人人可以食用的大饼，除了滇黔军，入川占领地盘的还有豫鄂两军。随着滇黔军共同“侵川”的历史结束，四川将豫鄂军也一并赶出了省，同时还收回了原先由滇军占有的自流井盐款。

客走主留，不过问题是大厅里的主人已不止一个。刘存厚和熊克武都是督军，区别只在于一个由北方政府任命，一个由南方政府任命。刚刚起兵驱滇时，他们曾相约在胜负未决之前，均不使用督军名义，但是随着胜利渐露曙光，两人就开始争着封官许愿，并都竭力标榜自己才是正宗督军。

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入驻区域，刘存厚驻成都，熊克武驻重庆，各挂各的牌子，刘存厚的官署叫“四川督军公署”，熊克武官署一个字都不差地用上了同一名称，如此一来，两个“正宗”就势必要打起架来。

与刘存厚打架，熊克武明显吃亏。北方政府虽然也内讧不断，却比南方政府还稳定一些，相比之下，南方更乱——广州军政府没撑持多久，就被支持孙中山的粤军给推翻了。孙中山虽然即将上台，但也只是可能，因为下一届军政府组成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熊克武感到非常彷徨。事实上，在告别驱满时代后，像熊克武这样无所适从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初任四川督军时，熊克武在就职通电中称北京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其实也并非无意之失，而是一种暗示和试探，只可惜段祺瑞不领这个情，他只认刘存厚，不认熊克武。

此后，熊克武又悄悄地派代表去北京找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倒有意接纳他，不幸的是徐世昌在北京政府的处境没比前几任好多少，他们都得听段祺瑞支配，自己完全做不了主，熊克武想重投门庭的希望再次落空。

南方军政府的倒台，给熊克武带来的是双重打击，他真正到了无枝可栖的境地。

那段时间，各种糟糕的事每天都在熊克武周围接连发生，让他不再相信好运能够到来，“川省自治”的提议也由此浮出了水面：南北双方，我谁都不靠了，至于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也毫无关系，反正我又不靠你们活着。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刘存厚看来，熊克武已经成了没人要的弃儿，只不过埋着头不想让外界看见而已。自治？村长还能封自己做国王呢，真会瞎掰！

刘存厚快乐得像一只上蹿下跳的猴子，要说靠山，还是我的靠山硬吧。当然了，得意归得意，他表面上还得装腔作势一番：“唉，我事情多，忙不过来，要不请川边镇守使来帮帮忙？”

川边镇守使指的是熊克武，那是以前北京政府封给熊克武的官职，只不过熊克武嫌小，从来没受领过。刘存厚以正宗自居，他从来

不称熊克武为督军，仅呼“使”。

在熊克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存厚给北京政府发去密电，要将熊克武提升为省长，他认为这样就算招抚了熊克武：你落魄了，我还拉你一把，这是什么魄力，什么情怀?

这时的北京政府总理为靳云鹏，当然拥有实权的还是“太上总理”段祺瑞。靳云鹏心思缜密，他知道熊克武自视甚高，怕反而因此惹怒熊克武，所以一时决断不下。刘存厚倒还挺上心，又让吴莲炬在靳云鹏面前扯了个谎，说这件事已征得熊克武部下的同意，同时熊克武本人也正巴不得呢——已经混得那么惨了，咱们偶尔给他一个笑脸，都可能乐得屁颠屁颠，更别说高升为省长了。

靳云鹏信以为真，于是很正经地发布明令，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省长。

太上老君的金钢琢

刘存厚以为骗住了熊克武，没想到熊克武接到明令后，脸腾地就红了，而且是那种羞愤到极点的红。

什么狗屁省长，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熊克武把不开眼的北京政府称为“非法政府”，相应任命电在他看来，更是“滑稽太甚”：简直太可笑了，你们发布这样的电令前，为什么不仔细瞧瞧我熊某究竟是何等样人?

给熊克武这么一堵，刘存厚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了自个脚的感觉：你姓熊的好不解风情啊，换别人能活两辈子的事，到你大概一辈子就完了，我推荐你当省长是提拔你，有人削尖脑袋想当，我还不让呢！

这话说的也是。当初无论罗佩金还是戴戡，若有一个这么关照他刘存厚，最后也就不至于弄到要撕破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可问题是价码这东西其实每天都在更换牌价，今天跟明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假使刘存厚肯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如果再让他当个省长或者会办什么的，他会愿意吗？放在熊克武身上，是一个道理。

这样的道理还可以继续推导到其他人身上。比如，刘存厚将刘湘提升为重庆护军使，然而刘湘认为，以他在驱滇之役中所取得的军功，完全应该当省长，到头来竟然还只是个"使"，有什么意思？

刘存厚兴冲冲地封官授勋，以为是在种一盆盆养眼的鲜花，没料到点燃的是一盆盆越燃越旺的火苗。熊克武带头发出通电，对刘存厚表示反对。在通电中，他再次祭出了"川省自治"法宝，为了带头实践，同时表明不贪慕官位，熊克武干脆以辞职的方式，把头上的四川督军帽子也给摘掉了（当然是自己辞职，自己批准，因为广州军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继熊克武后，为响应他的主张，由刘湘领衔，川军将领发出了联名通电，都嚷嚷着要搞"川省自治"。在这封通电中，但懋辛这样的熊氏嫡系自然是一个不少地加以署名，让刘存厚感到特别吃惊的是，里面竟然还有他的部将，等于是在搞窝里反了。

大家限刘存厚于五天内做出答复。可见刘存厚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督军的威风，众人皆可以嗤之以鼻：当个屁大的官，你就当自己是孙悟空了，你就是一弼马温！

刘存厚蔫了，先前的美好感觉顿时荡然无存。熊克武所祭出的“川省自治”四字更是犹如太上老君的金钢琢，足以将他砸到头晕目眩，脑子里就没什么完整的画面，全是零零碎碎的东西。

“川省自治”向来是北方政府所忌讳的话题，如果刘存厚轻易接受“川省自治”，必然会遭到北方政府的反对。刘存厚很清楚，他的靠山就是北方政府，只有依靠北方政府，他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才能控制全川。假如脱离北方，在实力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必将陷于孤亡境地，被立马灭掉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对“川省自治”不予理会，熊克武、刘湘和这些川军将领又绝不会买账，刘存厚被弄得一头汗。他发现，政敌们原来既没当他是孙悟空，也没当他是弼马温，就当他是一白老鼠，正张着个笼子，等着他往里面钻呢！

能钻吗？当然不能，可是不钻的话，打你就没商量了。无奈之下，刘存厚只得施出拖延战术，他一边说“川省自治”没有错，一边又说，川省刚刚“驱滇”，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需处理，必须等处理完后才能实施自治。

熊克武名为下野退居幕后，其实正是这场戏的总导演，他一直握着大棒紧盯着。一看，想要花招？做梦吧你！

熊克武直截了当地给刘存厚发去电报：“川局安危，在兄一言决之。”不过一句话的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干吗？

这是最后的通牒。刘存厚急了，他也顾不得北方政府的感受，慌不迭地就成立了“四川省自治筹备处”，并拉来名流做处长，表示自治已经开始。

管你开始不开始，就跟护法时代一样，熊克武手里的大棒是注定要砸下去的。1921年2月18日，熊克武与但懋辛、刘湘等人联名发出通电，给刘存厚罗列了十宗罪，其中之一赫然就是“阻挠川省自治”，全不顾人家那里的自治已经开张了。

第四章　皇叔幽灵

自治时代的川军分成三大集团，分别是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其中第一军由但懋辛负责，实际由熊克武遥控指挥，第二军是刘湘所部，第三军原为刘存厚所掌握，可是刘存厚一个不留神，被熊克武和刘湘找到机会渗入进去，结果第三军竟然临时“变节”，对其反戈相向。

急切之下，刘存厚便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转而把刘湘的第二军拉到自己一边。不料刘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提前识破刘存厚的套路之后，将被其暗中收买的对象给扣留了起来。

仗还没怎么打，胜负已各有归属。三个军合起来打一个刘存厚，刘存厚纵有三头六臂也对付不了，而实际上他还是个残疾人——自陕南回川后，刘存厚虽然也招抚收编了一些人马，但这些部队多为草头班子，拿的枪还是土造毛瑟，根本打不了硬仗。

1921年3月22日，刘存厚自动下野，离开成都。

见好就收

说来说去，大家还是得比膀子，膀子一比完，就什么都出来了。熊克武膀子粗，他的下野就是假的，刘存厚膀子细，他的下野则是如假包换。

刘存厚要去的地方还是陕南。半年前是怎么离开的，半年后又只能怎么回去，对这条逃亡奔命之路，他早已是驾轻就熟。自然，陕西人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嘲讽和唾弃都是少不了的，刘存厚也唯有厚着脸皮默然受之，因为他实在无家可归了。川人遂送刘存厚一个浑号“刘厚脸”。

赶走了刘存厚，熊克武松了口气。由于将北方政府的乌纱帽弃之一旁以及“驱刘”，他跟北方政府之间已经彻底弄掰了，新的南方政府又没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南不北的“川省自治”进行到底，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一个省自治，太孤单，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能找个邻省一起搞，别的不说，起码可以用来壮胆，这就叫“联省自治”。四川的邻省里面，滇黔是世仇，暂时没办法考虑。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自北洋，理所当然不肯脱离北方政府，熊克武游说半天也没效果，于是便转向了湖南督军赵恒惕。

赵恒惕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与熊克武是党内同志，同时他本人也有自治的想法，两人在这方面可谓一拍即合。

四川、湖南要实施联省自治，插在中间的湖北却与之唱反调，自然让熊赵对湖督王占元很是不满。正好湖北人也不喜欢这位王督军，他们成立了自治军，并派代表到湖南向赵恒惕求援，欲借邻省之兵，用里应外合的方式将王占元驱逐出去。熊赵对此可谓求之不得：早就看姓王的不顺眼了，如今还有人上门来请，那就别客气，咱们合起来揍他丫的！

1921年8月，熊赵各出五个混成旅，合力打响了“援鄂之战”。由于长江水涨，影响了交通通信，熊克武从湖南发出的密电，迟了五六天才到达重庆，加之出现了一些其他因素，致使川军出兵晚于湘军。等到他们紧赶慢赶，进入鄂西门户宜昌时，又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干扰，以至于始终无法与湘军合兵一处。

这股力量，来自长江军舰上的洋人。援鄂之战一起，他们为了监控战场状况，保护可供他们使用的沿岸码头，晚上便用军舰上的照明灯指向陆地，并向阵地上空发射照明弹。川军作战，擅长于“摸螺丝”也就是夜袭，给这么一干扰，想袭也袭不成了。与此同时，川军士兵从来没有见过照明灯、照明弹，以为是什么高级武器，被吓得惊恐万状，混乱不堪，闹出了一系列笑话。

国人见国人，谁都不怕谁，但大家无一例外都不敢对洋人轻举妄动。日英美等国领事便乘势出面，要求川军休战一段时间，用以协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川军前进不得，只好依言而行。

虽然未能与川军会合，但率先动手的湘军在战场上仍然压倒了鄂军，其先头部队距离武昌仅百余里。王占元惊慌失措，赶紧学着刘存厚，发出通电，称要“顺应自治潮流”，然后逃出了武昌。

这时的北方政府由吴佩孚掌握实权。王占元一逃，吴佩孚立即另立督军，并亲自赶到武汉，对湘军发起反击。吴佩孚是用兵高手，赵恒惕哪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逼回了长沙。

吴佩孚胜利在望，但他通过英国人出面，提出与赵恒惕谈和。赵恒惕怕就怕北洋军乘胜追击，让他连长沙老巢都待不下去，见吴佩孚主动伸出橄榄枝，马上便爽快地在和约上签了字。

吴佩孚之所以肯放湘军一马，当然不是因为心慈手软，而是为了回过身来对付川军。在他的指挥下，所部迅速赶到宜昌，与川军展开争夺战。双方互不相让，战况之激烈达到了援鄂之战的顶峰。

宜昌争夺战打了十天，其间川军几进几出宜昌街头，危急关头，吴佩孚把身边卫队都派上去厮杀，终于击退了川军。

无论湘军还是川军，被证明都不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吴佩孚的对手。吴佩孚本可乘胜追击，但这时候他又像对付湘军那样，选择了见好就收。

什么叫牛人？只能够单挑不叫牛人，牛人就是有本事跟一群人挑！吴佩孚在北方还面临着张作霖的叫阵，在他与川军开打之际，张作霖的奉军已集中于锦州一带，行将大举入关，所以吴佩孚在击败川军后，才会再一次主动谈和，而且他提出的条件非常优厚，允许川盐运销湖北且盐税两省平分。

在前线指挥援鄂之战的是刘湘。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你就是给他一百个理由，他也不肯与吴佩孚为敌了。在征得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的同意后，他马上在和约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湖北自治军一直通过保定同学等关系，与川军将领套近乎。谁知川军突然一声招呼不打，全都哗啦哗啦地退入了四川，这下子他们少不得要大发牢骚："什么同学，什么援鄂，都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靠自己吧。"

如今的川军真的已顾不上"援鄂"了。他们即将关起门来，通过实力的较量，来决定传说中巴蜀之王的归属，而领衔这场劲爆大戏的两大男主角，一个是熊克武，另一个正是刘湘。

因笑惹祸

先得从头至尾好好说说刘湘。

刘家如果划阶级成分，算得上地主，他父亲是贩谷子的，且家有余田。可旧时代的小地主也很可怜，就经济条件而言，仅能供刘湘上学而已，甚至晚上刘湘要读书，家里连油灯都舍不得让他点。

偏偏刘湘还很用功，常常趁父母睡着了，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偷偷地点灯夜读。刘父发现后，很是生气：你老子白天累死累活挣点钱容易吗？敢情一晚上全让你给烧光了！

油灯被父亲拿走了。没有灯，刘湘就溜出门，到月光下去读。他母亲很是担心，晚上等儿子上床后，便干脆把房门也给锁上了。刘湘无计可施，只好躲在床板上背诵白天读过的书。

对于这样一个爱学习已近疯魔的孩子，谁不喜欢？刘家父母偏不喜欢。这倒并非因为刘湘不是他们亲生的，而是觉得刘湘读书没什么效果——他的在校成绩虽然不能说差，但也绝对没到拔尖的程度。

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缘故，刘母便找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靠算命吃饭，自然要胡诌一通，一会儿说刘湘犯了“夜马星”（一种小孩子可能触及的禁忌），一会儿说孔圣人不高兴，恐怕他老人家故意捉弄一下你儿子也说不准。

算命先生提供的解决办法是画一道符，用布包着给刘湘戴在胸口。刘母如法施行，以后刘湘一到晚上果然就消停了，虽然他的在校成绩依旧还是老样子。

刘湘长大后才对母亲说出了真相，原来他知道母亲为自己算命的事，晚上背诵书本的习惯也并未改变，但为了不被母亲追究，便选择了故意不背出声的默诵方式。

聊到这里的时候，母子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刘湘读书如此用功，为什么成绩还不能拔尖？他自己从未对此进行解释，但从他日后的作为来分析，刘湘读的书很可能并不是学校课本，而只是《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课外读物，他的所谓挑灯夜读、月下读书、床上背书之类，也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读野书”方便，专门拿来蒙老爹老娘的。

当岁月流逝，少年时再荒唐的往事，都早已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许连刘湘自己都不知道，他日后成功的秘密，其实就蕴藏在这样看似微小的生活细节之中。

到刘湘读书的时候，私塾已经变成了学校，但除了到西洋留学的青年外，大多数从教者所熟悉和掌握的，还是孔孟的一套，同时又因为科举中途被废除，导致孔孟之学亦是夹生饭，其间闹出的笑话层出不穷。

某日，县衙门督学来到刘湘所在的小学视察。视察时，他发表了一通演讲，论证孔子比周朝皇帝大一辈，这种结论本来就已经十分荒谬，而他的论证方式则更为滑稽可笑：周朝皇帝自称周天子，孔子被称为孔夫子，“夫”比“天”高出一个头，所以孔夫子比周天子老。

大家都被眼前这位不学无术的学界官僚给逗乐了，台下包括刘湘在内的几个小学生忍不住笑出声来。督学大怒，立即当着全体师生的面，责令这几个因笑惹祸的学生跪到讲台上来。

跪不光是膝盖弯着就行，每人脑袋上还得顶一张板凳。板凳的重量尚在其次，主要是上面搁了满满一碗水，谁要是把水洒掉一点，就得劈头盖脸地吃一顿“竹板饭”。如果不想被竹板打，就得看各人头上的功夫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戏班的武生在练功呢！

被处罚以后，刘湘等人气不过，商量着一定要以牙还牙。刘湘因为个子高，胆子大，便被众人公推为报复行动的领头人。正好县里来了戏班唱戏，他们发现督学每天都要喝得醉醺醺地去看戏，于是便决定趁此机会下手。

这天晚上，督学果然又去看戏了。戏散了场，他摇头晃脑，哼着小调打道回府。在他必经的一个巷口拐角处，突然黑影一闪，一瓢不明物体泼到了他身上。

督学受惊之下，闻到的全是臭味，原来不明物体竟然是大粪。“啊呸呸。”督学又羞又怒，抬眼望去，几个孩子正急急忙忙地往学校方向逃去。

谁跟自己有这么大仇？自然是前两天跪讲台的几个小屁孩。督学追赶不及，朝着他们的背影愤愤地喊道：“你们跑吧，跑得过三十，跑不过初一！”

这句话，参与整蛊的几位都听到了，也知道事情已经露馅。

怎么办？刘湘是领头的，他把胸脯一拍：“不怕，追究起来我担着，哪怕是坐牢。”

商量了一会儿，有人出了个主意，说刘湘要不你就去报考弁目学堂吧，这样督学就抓不到你了，也不敢去抓。

就好像《三国演义》中常见的桥段，某人犯了事，闯了祸，只能跑路。众人当下你凑一点我凑一点，帮刘湘攒足路费，助他踏上了一个新的人生之路。

有你飞黄腾达的一天

等督学在家休息了两天，要来学校找碴儿的时候，校方便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刘湘身上。问刘湘在哪里，回答说已经离校考入了弁目学堂。

弁目学堂不属教育系统，属军队系统，督学哪里敢惹，只得捏捏鼻子，自认晦气。

弁目学堂的全称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也称速成学堂。清末编练新军需要培养大量下级军官，由此便促成了速成学堂等一大批军校的设立。军校时代的刘湘，怎么看都没有要发达的迹象。他性格内敛，深沉而不露锋芒，成绩也不过中等水平，甚至他都不怎么爱外出活动，自然难以引得外界瞩目。

刘湘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睡觉。此君平时的标准形象是，拖两行清水鼻涕，眯缝着眼睛，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而且仿佛要么不倒下睡觉，一倒下去就会长眠不醒，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刘瞎子”。

没有人瞧得起刘湘，他也几乎没有朋友。毕业后，刘湘被分到了周骏的第一师。第一师是第十七镇新军的基干部队，军官们眼光都很高，刘湘在军校被人看扁，到了军营还是一样。

军营之外，却有一个人分外看好刘湘。这是个编织篾篓的匠人，姓王，乃一字不识的文盲。王篾匠的业余爱好是相人算命，他算命不收钱，但据说算得比瞎子还准。除此之外，不管寒暑，他每个月都要抽出几天夜观天象，以便“预测天下大事”。

见到刘湘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军官，王篾匠眼睛一亮，直呼刘湘前程远大，不可等闲视之：“好好努力吧，有你飞黄腾达的一天！”

王篾匠是不是在瞎掰，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他做出的这个预测确实应验了。刘湘从排长开始，先后升为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如果说排连两个阶段，尚算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话，从营长开始，就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每打一次仗，他的官就升一级，“遇缺即补”，最后连老上司周骏都倒掉了，仍挡不住他火箭式的蹿升。

刘湘的官运为什么会这么好?

首先得承认一点，在战乱时期，军人不能打仗是很难升职的，刘湘符合能打仗这个标准。清末民初那个时代，说你能打仗，主要不是说你有多高明的技战术，而是只要够胆，敢闭着眼睛往上冲就有资格入行了。川人称刘湘为刘莽子，莽子在四川话中是猛的意思——你别看他平时眯缝着个眼，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但在某个僻静的拐角处，敢向你泼大粪的，正是这小子。

事实上，确实有很多次，刘湘所在的部队本已陷入危局，都愣是靠刘湘死战才得以反败为胜。比如，他在担任旅长的时候，曾攻某一阵地不下，不得已退回司令部。正好上司在大发雷霆，副官报告说刘旅长到，上司大喝一声：“难道刘旅长就杀不得吗? ”刘湘闻言转身就跑，不是逃跑，而是到前线亲自督师反攻，结果一鼓而克。

军队里面，猛人莽汉很多，刘湘超出他们之处，在于会动脑子。尤其在一些难度极高的攻坚战中，要是没点绝活，光知道拿血肉去挡子弹，有多少莽子也得完蛋。

当时国内已逐渐开始流行自来得手枪。说到自来得，有人可能不知道它是何方神圣，但如果改个说法，叫它驳壳枪、盒子炮、二十响、快慢机、大肚匣子……大家也许就会有如见老友的感觉了。

没错，从民初一直到抗日战争，驳壳枪从来都是中国军人向往的标配武器。这种手枪可以连发，一梭子过去，其火力甚至可与轻机枪相媲美，在近战中威力很是惊人。刘湘由此钻研出了一种看家战术，他精心训练了一支手枪队，每当遇到紧急关头时，便把手枪队压上去，往往能收到奇效。

估计是小时候看演义看多了，刘湘把手枪队比作岳飞的钩镰枪，他就靠“钩镰枪”来破敌人的“拐子马”。

速成系

刘湘战功赫赫，难得的是，他并不骄矜自负。还在他当团长时，本来按其战功和资历可提前晋升为旅长，但上司把这个机会给了另外一个人，刘湘的部下对此多不服气。

刘湘读过古书，也了解一些掌故，他对身边的人说：“清末有个叫杨遇春的名将，功劳不小，他就不和同僚争功，以此避免了灾祸。我刘湘难比先贤，不过也可以加以效仿。”在他的劝说下，众人释然，事情这才平息下去。

甚至，刘湘在军校中的木讷表现，也成为他得以平步青云的原因之一。清末时，从新军军营到速成学堂等各类军校，都少不了革命党人活动的身影。刘湘的同学皆蠢蠢欲动，有人已经与革命党人有了接触，唯有刘湘从来都不关心这些东西。除了上课训练之外，他就一个爱好，即喜欢唱军歌，因此之故，每次班上做游戏，刘湘都被推举为领唱。

直到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新军与保路同志军交战，已经入伍的刘湘也奉命参战。回到军营后，他还糊里糊涂地问别人："你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吗？"

刘湘平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职业军人，既不朝"南"（南方党人），也不向"北"（北方政府）。开始大家都觉得他傻，后来才发现他最聪明。那些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同学，或许可以得用于一时，但很快就会被抛弃于一旁，因为政局变化实在太快了，一会儿党人摇旗呐喊，一会儿北洋上台执政，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般人哪里搞得清楚和反应得过来。

癸丑讨袁时期，胡景伊征调周骏的第一师与熊克武作战，有两个营长临时投向蜀军。胡景伊一查，这两个营长均系速成生，这下好，他对几乎所有速成生都产生了怀疑和排斥。

轮到刘湘了。胡景伊翻开档案一看：刘湘，速成生，自军校开始，就无倾向革命的嫌疑，且生活简朴，不嫖、不赌、不抽鸦片，作战非常勇敢，屡立战功。

简直是一个一尘不染的白天鹅啊，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军官，请问？胡景伊当场拍板要予以重用，从此刘湘的仕途变得更加坦荡。

没发达之前的刘湘，类似于正埋着头编草鞋卖草鞋的刘备。你要说那个时候刘备就知道自己今后能三分天下有其一，多少有些扯。同样，当夜观天象，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预言刘湘今后将飞黄腾达的时候，刘湘自己想象中的飞黄腾达，顶到天也不过是做个将军。

旅长的相应军衔是少将，不就是已经将军了吗？人生的最高目标都实现了，还图个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湘看上去都本本分分，没有什么太大野心，平日里他只知道服从上级，厚待下级，政治上不南不北，战场上竭尽所能。

刘湘的变化，是从当上师长开始的。当上师长，一方面意味着他拥有了过去周骏所拥有的权力，成为老川军精华力量的合法继承者。另一方面，刘湘生活俭朴，自奉微薄，守着一个老妻便能过一辈子，不像很多川军将领还要讨三妻四妾。在有机会到达一个特定的位置之后，他若再没有远大一点的志向和目标，这人还图啥?

刘湘询问一位高士："四川包括南方的局面老是搞不大，弄不出像北洋那样像点样子的政府，是不是南方军人不如北方军人的缘故？"

这位高士曾游历北京，与保定军校校长、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交流过类似话题。蒋百里说，南方军人大多出自正规军校，素质和潜力都要比行伍大老粗出身的北方军人强，之所以不如北方军人，局面搞不大，是由于这些军校生还不够团结的缘故，如果能够团结，"善于交朋友"，未来一定会超过北方军人。

高士将蒋百里的话转述给刘湘，刘湘听后很受启发。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先知先觉地在广交"朋友"，而所谓的"朋友"主要都是他在速成学堂的同学。这些同学陆陆续续地聚集到刘湘周围，他们都

想靠刘湘升官，也因此形成了自武备系之后，川中最大的军事派系——速成系。

武备系早期的核心人物是尹昌衡和胡景伊，后期是刘存厚，但武备系的结构相对较为松散，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不是很强。相比之下，速成系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干人等皆视刘湘马首是瞻，并期待着能够依靠刘湘攀龙附凤，封官晋爵。

那个气贯长虹、矢志天下的皇叔幽灵终于又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要对人家仁义嘛

最早想做现代刘备的是刘存厚，可惜他名为存厚，却实在不够厚道。比如说对待投靠他的人，用得着时当你是兄弟，用不着时就当你是草鞋，抓起来随手就扔。

就凭刘存厚落魄陕南时把钟体道逼走的一幕，以后谁还敢再跟着这样的老大？难怪此君折腾来折腾去，终究还是只能抱着一个“刘厚脸”的臭名声，回到他最不愿意待的地方去。

知道真正的刘玄德是怎么论兄弟的吗？“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甭管这话听起来有多么虚伪，起码他把兄弟当回事，要不然关二爷、张翼德这样目空一切的神人，又怎么肯死心踏地地跟着他混？

刘湘比貌似精明实则愚陋的刘存厚强了不知多少段位。这么说吧，他有尹昌衡式的善战，有胡景伊式的心计，有熊克武式的俭朴，有刘存厚式的实力（自然是指其鼎盛时期），却唯独没有这些人的缺点，他再不兴，还有谁能兴?

算命这东西，所谓真假，其实大半都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心境和揣测。王篾匠的预言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如果说刘湘眼前有一座山峰的话，这座山峰的海拔正在不断增加：师长之后是军长，军长之后是总司令，总司令之后是统一四川，统一四川之后是问鼎中原。

这不正是一千多年前刘备走过的道路吗？现在刘湘要重走一遍。至于走得通走不通，你没走过，怎么知道?

速成生都是刘湘的同学，相当于兄弟。以速成系为基干，他又先后办起了军官教育团、军官研究班、教导总队、学员队等机构，这些机构培养出来的军官跟刘湘就是完完全全的师生关系了，相当于小弟。

左有兄弟，右有小弟，后面还跟着老川军的精锐，刘湘一步步地为自己未来争夺天下聚积力量，他的声望和实力也一天比一天看涨。早在熊克武、刘存厚联手驱滇之前，刘湘所部就已经发展成为川中除滇黔军外最大的实力派，大有“与楚则楚兴，与汉则汉胜”之势。也就是说，各派势力，从熊刘到“倒熊同盟”，没一个敢小觑刘湘，都得争相拉拢。

在研判各方势力后，刘湘定下了“拥熊送客”，即拥护熊克武，驱走滇黔军的策略，而恰在此时，“倒熊同盟”也派使上门了。得知来使登门，刘湘的部下和幕僚商议认为，既然已决定拥熊，自然与倒熊一

方势不两立，为此不如将使者扣留起来，然后再与“倒熊同盟”把话挑明。

决议已定，众人便去找刘湘拿主意。刘湘听后直摇头：“不可不可，我们怎么能搞阴谋诡计呢？要对人家仁义嘛。”

仁义厚道是《三国演义》里刘备的标志性特征。《三国演义》里的几个大人物，要论起家资本，刘备只能排在倒数。比之于身后有大家族作为支撑的曹操和孙权，他几乎是一无所有。那么，他究竟靠什么赢天下?

不是靠他动不动拿出来唬人的皇叔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更不是靠编草鞋卖草鞋的手艺，就是靠一个字“厚”。在刘备的奋斗生涯中，他每时每刻都不会忘记要“厚”，刘湘也是，他不仅没有扣留来使，还非常客气地款待了对方。

“厚”不是傻，必要时候，一些政治技巧是少不了的，否则安能立足乃至与人争夺天下？这就是有人抨击刘备“假仁义、装厚道”的由来，刘湘同样对此有所继承，他甚至和来使商讨了进攻熊克武的办法，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继续和熊克武联络，并成为驱滇之役的前敌总指挥。

驱滇之役对刘湘而言，非常关键，也是他平生投出的第一个大赌注。如果赌赢了，自然会青云直上，但如果输了，那就是血本无归，连四川都待不下去，只能跟熊克武、刘存厚他们一样往边角旮旯里逃。在战事遇到挫折，也就是龙泉山大败时，刘湘也跟他的榜样刘备一样，眼泪直流，并表露出了要离开部队出川流亡的意思。

部下幕僚们都恳请刘湘不要走："虽然暂时败了一阵，但切勿灰心。一切事在人为，我们还有部队，再努力一下，尚大有可为。"刘湘惶恐焦灼，除了确实已到危难关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要看看这些部下幕僚是不是还肯跟着他卖力。一看大家都挺得住，他自己也就释然了。

玄德的眼泪从来都不会白流，抹干眼泪后的刘湘更是马上露出了沙场枭雄的本色。他先是以退为进，使川军在成都城内得到整合，接着在滇军后撤，组织防线拦截时，又亲赴前线指挥，下令将所有山炮集中于一点进行猛烈轰击。滇军防线被炸开了一个致命缺口，沿着这一缺口，川军蜂拥而入，滇军由此一溃千里。

在驱滇之役中，刘湘功立第一，熊克武、刘存厚都得往后排。刘存厚尚自我感觉良好，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熊克武却早已掂出了刘湘的分量，战争尚在进行时，他就通过但懋辛致意刘湘，说想让位于他。刘湘回答："等打完了仗再说吧。"

熊克武说要让位于刘湘，只不过是为了加大自己的砝码，以便对付刘存厚而已，讲穿了，那是一句连他自己都不信的谎话。驱滇之役后，熊克武和刘湘之间尚隔着一个刘存厚，等到两人合力将刘存厚推倒，一山不容二虎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

以退为进

熊克武的第一军由原蜀军和新老第五师发展而成，相当于原来新川军的延续，而刘湘的第二军则是老川军的代表，新老川军整日里互相猜忌，明争暗斗。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到最后一刻，大家都不会闹到操刀互砍的程度，而只会按照各自拥有的筹码来讨价还价。眼看第一军从实力上要压倒第二军，熊克武便授意各军，公推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

经过这么多年的升沉荣辱，熊克武早已从一个热血的革命党人转变成冷血的政坛高手，他的一招一式都暗藏玄机。眼前这一招从政治策略上讲，叫作“以退为进”。

按照各自军队实际控制的地域，成都归第一军所有，重庆归第二军所有，和蜀军时代正好是一个互换。熊克武虽然名义上早已辞去督军，却能够通过第一军控制成都，而刘湘就算是做了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其势力范围也无法超越重庆。

刘湘履任省长，必须到省会所在地的成都就职才符合规定，熊克武也来电邀请刘湘前去赴任。成都是熊克武的势力范围，究竟去还是不去，刘湘拿不定主意，便召集一班幕僚进行商议。大家都觉得去成都就任不是个好主意，有人说，重庆如今是老川军的事业基地，如果去成都的话，就会远离基地，受人控制。还有人则直截了当地说：“别看熊克武表面下野了，但你如果和他同住成都，他一定会倚老卖老，什么都得干涉。到时你不听？老川军远在重庆，到时只会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

听了幕僚们的意见，刘湘倒吸一口凉气，连连点头：“熊克武太厉害了，我搞不过他。依诸君之见，我不去成都了，就在重庆上任。”

这样的省长，有跟没有几乎是一个样。重庆周围还有一些防地在第一军手里，刘湘的部下提出，应该让第一军把重庆的防地全部交出来，否则宁可不当省长，谁爱当谁当去！

刘湘找但懋辛交涉，熊克武没法拒绝，最后总算勉强把重庆的防地交了出来，刘湘这才在重庆就任省长。

幕僚们说得没错，刘湘去了成都会无所作为，可是留在重庆被证明同样无所作为。凡是刘湘任命的县长，都只能在他的第二军防区活动，其他防区根本甭想插足。

刘湘有一次委任一位姓张的人为川西道尹（相当于副省长）。张某带着委任状，兴致勃勃地去成都上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前任。找不到前任，张某就没法顺利履任，因为双方需要交接印信。

张某只好在政务厅里坐等前任，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对方始终没有露面。一打听，原来前任得到消息，早就以出巡为名，跑到别的地方躲起来了。

张某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无奈之下只得拂袖走人，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通电登在成都报纸上，说："这位官员（指前任）在职务行将交卸之时，还要出巡，像这样办事认真、不辞劳苦的人，你们见过吗?反正我没见过。川中既有如此难得之干员，应请刘湘省长收回成命，明令慰留。"知道内幕的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此通电一出，皆引为笑柄。

除了成都和重庆实际分立为两大军政中心外，熊克武还以军实督办（负责管理武器和粮饷的官职）的名义，控制着成都兵工厂和自贡盐税收入。

当一个名不副实的省长倒也算了，最让刘湘放不下的就是成都兵工厂，这可关系着他以后能否争夺天下啊！刘湘派了一个旅常驻成都，专门看着成都兵工厂。工厂日夜加班加点，枪弹一下生产线，马

上往重庆押运。成都方面如何肯让，一着急，竟然不惜动用武力阻止起运。双方火药味十足，眼看着扔根火柴就能爆起来，刘湘不得不下令将部队从成都原样撤回。

由于和刘湘的关系太过紧张，以策动联省自治为根本的熊克武才更倾向于发动援鄂战争，他认为这样既便于川军向外扩展，对四川内部的矛盾也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熊克武要援鄂，光靠他的第一军不行，还得借助于刘湘的力量。刘湘则认为，以后可以同他争四川的，也就一个熊克武，如果熊克武在湖北立住脚并且回过头来再打他，那岂不是亏大了？因此，刘湘在同意出兵的同时，又额外提出一个条件，即必须由他兼任援鄂总司令。

刘湘的这个条件着实难住了熊克武，他迟迟缩缩，很晚才答应下来。川军在援鄂战争中之所以出兵较晚，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援鄂战争发动前，谁都没办法准确预估输赢。赢了的话，自然是皆大欢喜，偏偏又输了，虽然通过议和弄到了一条川盐运销湖北的条款，可是与当初的目标相比，毕竟还只是小头。这下参战双方可有得互相埋怨了，第一军怪第二军无能，第二军骂第一军软蛋，本来就脆弱不堪的伙伴信赖关系荡然无存。部队撤退时，原来计划好的路线也不走了，大家都情愿走人迹罕至、鸟不生蛋的地方，为的就是怕遭到对方暗算。

就熊克武来说，这种谨慎非常必要，因为刘湘真的想暗算他。

姜还是老的辣

吴佩孚不会长久留在南方，他临走时，任命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常驻宜昌。刘湘派代表与孙传芳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份联防密约，大意为，如果孙传芳受攻击，刘湘就拔刀相助，反过来也一样，假使刘湘在川中被围攻，孙传芳亦不能坐视不顾。

第二军实力雄厚，兵强马壮，谁吃饱饭没事做，会去主动招惹刘湘？说来说去，他还是想先打别人的主意，而且矛头其实就是冲着第一军去的。

没办法，本来说要矛盾外移，结果不但没移成，矛盾还扩大了，不打何待？为了能够稳操胜券，刘湘的谋士献计，让他以四川总司令的身份下令，将第一军的一个主力混成旅以援陕的名义调到川省以外，以便分散其兵力。

刘湘依计而行，抽走了第一军的一个主力旅，但这也让熊克武从中察觉到了刘湘的真实意图。此时刘湘与孙传芳秘密联络，并可能结成同盟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熊克武的耳朵里，于是成都方面所面临的形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

第一军在实力上本就不及第二军，再抽去一个主力旅，加上孙传芳的掺和，若是打起仗来，还有多少胜算？这事若是放到一般人身上，或许双腿就得发软，但是熊克武气定神闲：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刘湘，我得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

早在熊克武第一次赶走刘存厚，担任四川督军时，由于驻川的滇黔军带头把持防区，控制税收，导致熊克武一直收不到什么钱，可这

么多军队又都需要发饷，怎么办？熊克武的办法是制定防区制，就地划饷，即你的军队驻扎在哪里，就从哪里的税收里面切出军饷部分，然后照划给你。

起初是就地划饷，渐渐地演变为就地筹饷，各路川军从此各有各的地盘，俨然成为大小诸侯，熊克武和刘湘只是这些诸侯里面最大的两支而已。

熊克武以前当家时，对割据一方的中小诸侯们非常头疼，现在不当家了，倒一下子对他们产生了特别的兴趣——这不正是用来对付刘湘的棋子吗?

在公开场合，熊克武本人照例都不出面，出面的是但懋辛。但懋辛一面质问刘湘，为什么要派兵援陕，究竟有何根据，一面密告各诸侯，说刘湘志在消灭第一军。

如果诸侯们对此无关痛痒的话，但懋辛会接着告诉他们：连第一军这么大的店面都要被迫关张，你们觉得你们那小店面还生存得下去吗?

就是后面这句话，让大伙都坐不住了，传言中姓刘的要统一四川，是不是真的啊？诸侯们纷纷给刘湘发电质疑，刘湘应接不暇，狼狈不堪。

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熊克武和但懋辛暗中捣的鬼，解铃还须系铃人，刘湘只得邀请但懋辛来重庆一叙。他本以为但懋辛可能会找这个借口那个理由，赖着不肯来，就算来，也得摆足架子，给他难堪。没想到但懋辛欣然而至，并且说的全都是替他着想的体己话。

但懋辛对刘湘说："你不要听你身边那些狗头军师的话，以为把我的第一军灭掉，就可以一了百了。你得知道，你可是一省之长，倘若无缘无故出手打第一军，唇亡齿寒，各军必然人人自危，都要同情那被打之人，这样一来你是吃不消的。"

刘湘已经吃不消了。他原先确实只想到第一军是他统一四川的最大障碍，没想到背后障碍还有这么多。事到如今，他也只好赔着笑脸，央求但懋辛去安抚诸侯。

但懋辛的神情却变得更为严肃起来："不管你信不信得过我，有一句实话，我一定得讲出来，这些诸侯全是四川的祸害啊！"

此语让刘湘猛吃一惊，什么意思?

但懋辛很认真地问刘湘："川省为什么一直不得安定? "不等刘湘回答，他便自问自答，"没有别的原因，唯一原因，只在兵多，就是大大小小诸侯太多了。这些家伙有防区就有军费，有军费就不断扩军，扩了军就不把省政府放在眼里，如此川省怎么可能会安定呢? "

刘湘听得瞠目结舌。对但懋辛的这番表白，他不仅认同，而且坚信这就是熊克武和但懋辛的真实想法。

刘湘着急要消灭第一军，那是真把熊克武当对手的，而且是唯一能跟他竞争的对手。这就仿佛曹操在煮酒论英雄时，对刘备说的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在刘湘看来，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统一四川，那么这个人不是他刘湘，就是熊克武，自然他能想到的，熊克武也会想到，他所认为的障碍，熊克武也会认为是障碍。

刘湘对着但懋辛拊掌叫好：“你说得太对了，可是有什么办法保证川省安定呢？”这话的意思是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那些烦人的诸侯摆平呢?

但懋辛说了两个字，听完之后，刘湘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秘密约定

这两个字是“裁军”！

仅仅两个字，操作难度却大到没边。当年罗佩金垮台，直接原因即来自裁军，那时候的川军，不过才五个师。如今总计有十个师、九个混成旅、一个川边军、一个边防军，编制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到五倍，怎么裁法?

但懋辛倒是成竹在胸：“难度是不小。无论一军、二军，假使要单独搞定的话，都犹如登天。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诚意合作，则并非难事。”

刘湘竖起耳朵细听，原来但懋辛的方案是，由一军、二军带头做榜样，先从本部裁，再督促各军裁。但懋辛说：“到时候，诸侯们谁敢抗拒不遵？如果抗拒不遵，正好给我们借口，联起手来进行修理，所谓杀鸡给猴看，裁军不难推行。”

听说第一刀先要切在自己的肉上，刘湘不免有些犹豫。但懋辛看出了他的心思：“别说你肉疼，我也肉疼啊。可是退一步想想，你不裁军，用武力统一的话，军队数量只会越打越多，更加不能解决问题。”

两人议论越久，刘湘越觉得但懋辛言之有理，尤其他最后总结的一句话更能拨动其心弦：“如果你我合作，相信统一后川省必能自强，到时如形势需可，我们还可以问鼎中原哩！”

统一四川、问鼎中原，那不都是他刘湘的终极理想吗？当然了，要是真的有问鼎中原的那一天，熊克武、但懋辛可能早就被他灭掉了，不过在此之前，为了解决各个防区犹如蚁群一般的诸侯，的确须以大局为重，实行强强联手才行。

说干就干，刘湘马上坐下来和但懋辛商量裁军的具体办法。办法议定之后，两人又相约绝对保密，谁都不许向外走漏一点风声。

刘但二人在密室进行商议。等到刘湘走出密室，外面等候的部下幕僚都争相围拢过来，这些人众口一词，均主张将但懋辛就地扣留于重庆，尔后乘第一军群龙无首之际，立即出兵发动袭击，如此定可一举消灭第一军。

刘湘哪里肯答应。但懋辛直到离开重庆，身上一根毫毛也没掉，刘湘的部下幕僚们则顿足捶胸，以为失去了一个擒贼先擒王的大好机会。

你们遗憾这个，叹息那个，是不知道内幕啊，刘湘暗暗觉得好笑。在他和但懋辛的秘密约定中，裁军的第一个步骤是一、二军各裁一旅，为诸侯们带头，而且但懋辛的姿态很高，主动提出先裁第一军的独立旅，人家这样诚恳，我又向来是仁义之君，怎好去行不义之事？

按照既定程序，刘湘先发布命令，将但懋辛答应裁掉的独立旅调往指定地点，然后他就一心等着但懋辛自己率兵去执行缴械任务。

独立旅收到命令，开过去了，然而但懋辛本人迟迟无所动作。刘湘还以为是但懋辛忘记了，又专门发了个电报过去，催他快点启动。不料但懋辛仍然含含糊糊，支支吾吾，似乎完全忘记了有密约这回事，始终迁延不进。

刘湘更纳闷了，发电报去问他为什么还不动身。但懋辛回电了，在电文中，他竟然把责任都推到刘湘身上，说是刘湘故意泄露密约在先，想把预定裁掉的那个独立旅给并到第二军里面去。他愤愤地说："看来你还是蓄意要解决第一军，恕我不能奉陪，不能再跟着你玩下去了。"

刘湘莫名其妙。自从但懋辛走后，他基本上是守口如瓶，连身边的幕僚谋士都被蒙在鼓里，怎么可能泄露出去?

就在刘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但懋辛突然又做了一件让他猝不及防且倍感震惊的事：两人在密室会谈的内容，被但懋辛详详细细地通报给了各个诸侯！

注意，是详详细细，而不是原原本本，因为但懋辛对谈话内容进行了重新整理。经过整理，刘湘成了裁军计划的倡议者和主导者，但懋辛成了完全被动的一方，而且是第一个受害者。

但懋辛连物证都有，就是刘湘的调令和他们的来往电报——要没这回事，你突然调动第一军的独立旅干什么？又为什么要一个劲地催我但懋辛起身?

但懋辛的这份通报，算是把诸侯们的心头之火给完全点燃了，以前还是疑神疑鬼，原来真有其事。

诸侯们一个接一个给刘湘发电报，那意思，你要想裁军，先问问我们的拳头答不答应。

忍耐和蛰伏

瞪着雪花似飞来的电报，刘湘傻了眼。

就算单挑第一军，能不能稳赢，他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若是旁边再添上这么多乱拳，情形就更不妙了。要知道，诸侯们块头小归小，却都是一些经常不要脸，偶尔不要命的家伙。

什么时候不要命？就是觉得你要拿走他们的命根子，也就是地盘的时候。

对着密室会谈的“整理版”，刘湘百口莫辩，他这才发现自己上了熊克武和但懋辛的当，被领到阴沟里去了。

什么诚意合作，什么共同裁军，原来都是骗人的幌子。熊克武确实厉害，他使的这招分明就是三十六计中的“上屋抽梯”之计：先把你骗上房顶，再将梯子一抽，四顾茫茫，你就等着跳楼自杀吧！

刘湘欲哭无泪，直觉屁股下面坐的已不是交椅，而分明是一座火炉。

1922年5月14日，刘湘通电辞职。真把人逼到了这一步，但懋辛等人又假惺惺地来电挽留，刘湘则做一脸绝决状，来了几句“樵山钓水，遂我初衷”这样的话，坚不复职。

与熊克武一样，刘湘的辞职下野，也不过是以退为进之术，他安排了幕前代理，自己隐身幕后进行操纵。在他下野后，第二军的一支部队因欠饷露出了不安情绪，刘湘以在野身份前去安抚，士兵问他为什么要辞职，刘湘故意说:“因为你们不愿打仗，所以我要辞职。”

士兵们想了想说:“是上头克扣军饷，不是我们不愿打仗，如果不克扣军饷，我们是愿意打仗的。”刘湘马上回应道:“你们的军饷，一定会按时发放。只要你们愿意打仗，我随时都可以复职。”

刘湘渴望东山再起，但他也同样知道忍耐和蛰伏的重要性。古往今来，忍耐和蛰伏是几乎所有枭雄的必备素质，比方说刘备，他的一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别人做小弟。有人统计，包括吕布、曹操、袁绍在内，刘备的东家前后计有七个之多。难道刘备真的甘心奉这些人为老大?非也，只不过时机未到耳。

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过伸之前，无论如何先得屈一下。刘湘多次告诫他的部下们:“我为什么被逼辞职，就因为现在如果刀兵相见的话，没有胜算。”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握有胜算呢?刘湘分析说，必须依靠北洋军的充分援助，而在与北洋联合方面，他虽然已与孙传芳达成联防密约，但仅凭这一纸密约，事情还不靠谱。总之，现在第二军能做的，就是加紧准备，而不是贸然与第一军开战。

刘湘唠唠叨叨，有一个人却始终听不进去。此人就是刘湘设置的幕前代理，名叫杨森。

杨森祖籍湖南衡阳，是清末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世代以耕读习武为本。杨森因是家中长子，父母对其期望很高，父亲给杨森立下的

规矩是，必须习文，不许习武，以免影响功课。

可是杨氏家族本有习武传统，杨森的叔伯兄弟中习武者众多，甚至杨森的父亲就考中过武秀才，能百步穿杨。杨森在读书余暇便瞒着父亲，偷偷摸摸地跟着练，到了端午节，家族组织骑射比赛，杨森像传说中突然习得真技的大侠霍元甲一样，冷不丁地大显身手，并勇摘第一。

杨父这才知道儿子偷练武术的经过，当着面狠批一顿，但是嘴上骂着，脸上却微露笑容，因为他知道，不管习文还是练武，都是要出人头地，而随着世乱迹象已显，文武兼备显然要胜过单纯习文。

在杨森的青少年时期，八股虽废，科举未停，于是他小小年纪就跑去报名应考，文武举都报了名，但结果均名落孙山——文举不合格，是新试题没练熟；武举不合格，不是技艺不精，是考官嫌他身材矮小。

杨森十分沮丧，师友如此安慰他："假使你考中了文武俩秀才，只能取一个，那你怎么选？倒不如一个都考不中了。"

杨森听了唯有哭笑不得。

面有反骨

杨森不是不聪慧，《古文观止》《八家诗选》等书都能背上八页之多，堪称同龄中的翘楚。全班命题作文，老师总是让他负责收卷，

还告诉他：“你收卷时，一定要先闻一下，那文章条理畅通的，一定有异香，不通的，闻了能让你吐三天！”

杨森的作文属于有异香的，可惜自从他文举落第之后，科举制度很快就被废除了，这使得他在中学毕业后，不得不去报考速成学堂。

考试时所要面临的尴尬依然如旧，杨森各门成绩都合格，唯独因为身高不够，体检老是过不了关。主考官周骏对杨森说明了不能予以录取的原因，杨森霍然而起：“我年纪小，所以才身高不够，等再过两年，一准是高大魁梧异于常人！现在怎么能因为这个，就阻碍我从军报国的远大理想呢？”

周骏听后大为惊异，感到杨森志向不俗，立即决定破格录取。日后杨森身材魁梧，果然没成为“杨矮子”，非但如此，他那种不混出头就决不甘心的劲头，还非得让人仰视才行。

中国民间喜欢给武将排名。关于三国武将的功夫高低，比较流行的排名顺序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许九姜维”。从“二赵”也就是赵云开始，三国迷们往往各有偏爱，推崇张飞的就会说这个榜单抬高了赵云、关羽，贬低了张飞——燕人张翼德手中一杆丈八蛇矛，所向无敌，能够“百万军中取上级首级”，凭什么只排在老六的位置?

唯有榜首的“吕”，大家都没异议。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三国演义》里面的武将，就没有能够在单打独斗中胜过吕布的。即便关羽、张飞合起伙来，仗着人多，打人家一个，还是拿他没办法。后来这三兄弟干脆就不要脸了，刘备也凑上去，三英战吕布，吕布左遮右挡，实在是忙不过来，才让他们占到了一点便宜。

假设把三国榜单搬到巴蜀，杨森便活脱脱就是一个川版的吕布吕奉先。四川百姓提起川军战将，往往会说这个人老是吃败仗，那个人吃过败仗，但也打过胜仗，他们给杨森的评语仅有一句：“杨森会打胜仗！”

杨森是四川人，但他最早发迹于滇军军营。这事说来话长，杨森和刘湘一样，都是速成生，毕业后辗转往复，投到了熊克武门下，当然最初也就是个龙套甲、龙套乙一类的角色。

在癸丑讨袁之役中，熊克武被打得一败涂地，滇军攻占重庆，杨森做了俘虏。滇军将领黄毓成在视察俘虏时说：“军官上前五步走。”这句话吓坏了俘虏里面的川军军官，他们最怕别人认出他们是军官，因为如果对方要杀俘的话，第一个要杀的便是军官，反而士兵往往会得到宽释。

上前五步是什么意思，站出来让你绑了枪毙？大家都一动不敢动，只有杨森挺身而出，并坦然自称：“我是少校营长。”

黄毓成见杨森态度坦然，毫无惧色，不由得暗暗称奇，随后不但没杀他，还把他带回了云南。自此，杨森便改换门庭，在滇军名将赵又新帐下听用。

杨森能成为猛人，全在一个字：狠。

翻开中国近代史，第一章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打完了，鸦片的命运到底如何，倒好像没什么人提了。事实是，朝廷来了个“放开搞活”：既然禁不住也堵不了，与其让洋人的烟土来大赚特赚我们的银子，倒不如自产自销。

在国产化的烟土产业崛起后，进口洋烟土严重滞销，瘾君子们都改抽国货了，新的“鸦片战争”果然不战而胜。

至清末民初，西南各省没有哪一省不种鸦片，云南的叫“云土”，四川的叫“川土”，贵州的叫“贵土”，其中以云土的品质为最好，是当时国产烟土的顶级品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云土的外包装上居然还贴着林则徐的肖像！

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杨森等很多滇军军官都染上了吸食阿芙蓉的嗜好，就连赵又新本人也不例外。不过大家都是偷偷地吸食，因为在公开场合，抽鸦片仍然属于违纪行为。

欺生是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杨森身为川人，一些滇军同事看他不顺眼，有一天便趁他正在家里“过瘾”的时候，派兵闯入杨家，将杨森予以拘捕。随后，为了加以羞辱，他们还要逼杨森自端烟具游街示众。见势不妙，杨森赶快写信求助，方才得以豁免。

经此风波，杨森一跺脚，咬牙把鸦片瘾给戒了！

戒鸦片有多难，大概只有瘾君子才会有切身体会，张学良晚年回忆，说那种滋味就是肉外面没有皮，直如身处地狱一般。

杨森的狠一以贯之，对自己狠，对别人也狠。在护国战争中，担任参谋的杨森见战况相持不下，便带着四个士兵往前纵横穿插，他们一路见人杀人，见佛灭佛，最后竟然闯入了北洋军的师指挥所附近，吓得敌指挥官狼狈逃窜。蔡锷深嘉其勇，向杨森颁发了亲笔奖状。

至靖国之役结束时，杨森在滇军已有能战之名，赵又新对其倍加赏识和重用，亲自提拔他为团长。同为川人的朱德当时亦在赵又新军

中效力，无论学历还是资历，朱德都要比杨森厚实得多，但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团长而已。

真的反了

大约就因为不是云南人，同时又锋芒过盛，个性过于倔强的缘故，除了赵又新，滇军高层普遍都对杨森存有戒心。赵又新的参谋长杨杰是抓杨森抽鸦片一事的主谋之一，当着赵又新的面，他不仅建议将杨森“去之”，而且力主“除之”——杀掉算了。

后来杨杰另调他职，临走时，又再次劝赵又新不可重用杨森，说杨森面有反骨，将来难免反叛云云。赵又新听了不以为然：“你我都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迷信活动？杨森做事有干劲，又有毅力，听说那次被你抓住抽鸦片，他就把烟瘾给戒了。一个闻过则改的人，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处罚他呢。”

见话不投机，杨杰不由得跺脚叹息：“你不信忠言，将来大事必然要败在这个杨森之手。”

对杨杰这些自以为是的“忠言”，赵又新毫不在意，在自己升为军长后，他把杨森提拔成了军部参谋长。

第二个看杨森不爽的是罗佩金。他让人转告赵又新，说千万不可重用杨森，更不能叫杨森带兵。对罗佩金的话，赵又新同样听不进去。

真奇了怪，就没有人同我一样，慧眼识英才吗？还真有，赵又新的顶头上司唐继尧说了一句话，让赵又新差点以为遇到了知音。

杨杰嚷嚷什么反骨之类，大概都是《三国演义》看多了的缘故，随口那么一说，唐继尧却真的知道一点相人之术。他到四川视察，滇军团长以上军官均被召见。召见之后，唐继尧问赵又新："那个叫杨森的人，你有没有重用他？"

赵又新大喜，以为唐继尧也看中了杨森，连忙回答："重用，当然重用。杨森特别能打仗，我每到战局危急时，均赖其转败为胜，岂能不加以倚重。"

不料，唐继尧说的其实是另外一番意思，他眼中的杨森极为不堪："从外貌上看，其人满脸横肉，目露凶光，门牙森森，状如鼠嘴。"

知道的，是他在说杨森，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描述某个土匪或逃犯呢！杨森真有这么丑陋龌龊？当然不是，说白了，相人术也不过是一种可以用哈哈镜把人变形的奇怪戏法而已。

唐继尧对杨森的评价是"残毒险狠，人面毒心"。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有反骨！"他嘱咐赵又新："你若是一定要重用杨森也就算了，如果不重用的话，一定要将他杀掉。"赵又新听后连忙说："我已经重用杨森了，应该没事的。"

唐继尧回到云南后仍不放心，再次密电赵又新，让他不管重用不重用，都直接将杨森杀掉，以绝后患。赵又新对唐继尧忠心耿耿，但这时也觉得唐继尧不免愚昧："怎么连你都信反骨这一套？"他不仅没杀杨森，还把唐继尧的密电拿给杨森看，以示绝对信任。

可有时候人确实还是迷信一点好，比如，在杨森这件事上。因为后来的事情进展表明，从杨杰到罗佩金再到唐继尧，他们起码有一点没有说错，杨森真的反了！

赵又新把密电给杨森看，当然是信任的表示，可对杨森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赵又新以后能取代唐继尧吗？看样子不可能。这就说明自己今后在滇军中的前途很渺茫，别说升官了，性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

在赵又新部队的内部，杨森也颇受同僚排斥。对于杨森以川人居要职，很多滇军军官由妒至恨，对其极为不满。大家晚宴后看戏，一些军官不顾杨森是四川人，常常当着他的面，大点《张松献地图》《取成都》之类的戏目，摆明就是要让他难堪。杨森如坐针毡，常常还没等到戏散场，就气鼓鼓地拂袖而去。

环顾整个滇军集团，所投来的几乎全都是冷冰冰的眼光，光靠赵又新一人庇佑有什么用？杨森意懒心灰，顿生另谋他途之念。正好赵又新的防区与刘湘接壤，因为杨森身居军部参谋长，又与刘湘是速成同学，赵又新就派他做代表与刘湘联络。

刘湘深知杨森乃不可多得的勇将，就利用这一机会拉拢杨森，杨森便也就势投奔了刘湘。

在《三国演义》中，吕布叛义父丁原，得到了一匹赤兔马，杨森弃恩师赵又新而去，得到的是官升一级，由团长升为混成旅旅长。之后杨森即反戈一击，围攻附近的小股滇军。滇军不敌，缴械了事，但偏偏有个缴了械的营长不识时务，大骂杨森不义，不该叛离军长（指

赵又新）。杨森在另觅高枝时，虽然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但终究还是有些心虚，听后不禁恼羞成怒，当场就把这个营长给毙了。

赵又新倒颇有名将风范，知道杨森反叛后仍很大度。他接到杨森的一封信，杨森在信中说：“我是川人，现在外面的口号都是‘川人治川’，所以我才舍公（赵又新）而去。今后川滇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杨森）当避之，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

赵又新看完信后很是感慨，他将这封信遍示部属，并且说：“杨森这么做，从他的角度看也没什么错，假使我是川人，亦当如此。”众人以为赵又新乃故作姿态，但观其神态自若，显见得对杨森确实没有怨言。

我就要把他喂饱

在与赵又新的恩怨纠葛上，赵又新或许是真君子，但杨森却未必，因为他很快就自食其言了。

驱滇之战前，刘湘又将杨森由旅长晋升为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杨森还能像他信中所说的，见赵又新就避吗？一味回避的话，如何向刘湘交代？又如何继续升官？

杨森不仅不避，而且打赵又新打得最狠。在刘湘用山炮将滇军防线击开后，他立即跑到最前方指挥，对滇军进行猛追。

杨森在滇军日久，对滇军的作战能力和特点最为了解，他知道顾赵一旦回过神来，其反击力度将难以遏制，所以一路上几乎是马不停

蹄，两天之内，追了五百多里，把滇军左右翼的部队都远远地甩在身后，然后直入赵又新所驻防的泸州城。

赵又新正在床上吸大烟，他没有料到川军会来得这么快，急忙问系由何人率领，左右回答是杨森。到了这个时候，赵又新仍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松了口气说："是杨森就好。我赏识和提拔过他，也算对他有知遇之恩。谅他不会加害于我，我被抓住后充其量不过是当俘虏，决不会有生命危险。"

手下差点被气乐了："是杨森才不好呢，打我们打得最狠的就是他。知遇之恩，哪年头的事了，他不是说战场上见军长就避吗，他避了没有？"

赵又新一想，的确如此，不禁悔恨交加。

世界上什么药都可以买到，就是后悔药无处可买。鉴于城池已破，赵又新只得打开后门登上城墙，用门板缒绳而下，只是他身材肥胖，行动多有不便，缒的过程较为缓慢。

杨森对赵又新的军部所在地非常熟悉，冲进去后发现鸦片烟盘上灯火未熄，知道赵又新离去不久，便跟着登上了城墙，正好看到赵又新在逃命。他问仍在缒绳的几个滇军士兵，下面是什么人。滇军士兵不敢不应，回答说是赵军长。

杨森嘀咕了一句："今日之事，公事也，不能以私废公。"他下令立即开枪（后来杨森推说是民团所为，其实没有他的命令，一个小小民团哪敢轻举妄动）。

赵又新身中数弹，被抬回军部时只剩下了一口气。面对这位过去的恩师，杨森自己也有些惭愧，对着赵又新喊道：“军长，我是子惠（杨森字子惠）！”

赵又新睁开了眼睛，杨森又说：“军长，我对不起你，请军长放心。”

赵又新看了看杨森，什么话也没说，只有一行清泪慢慢地从眼角滑出，旋即闭目而逝。

在告别人世的瞬间，这个人经历了世上最为残酷的一幕，他的确无话可说了。

面对唾手可得的名利，杨森会毫不犹豫，一往无前，但他的心毕竟也是肉长的，此情此景，不禁让他悲从中来，跟着潸然泪下。

杨森亲自备棺，将赵又新予以收殓，并派人运回云南安葬。他还挥笔写下了一副挽联，上有“回忆深情夙契，不忍将军上断头”一句。从文字上看，多少还有些不舍之情在里面，这比当年吕布毫不留情地摘下义父的脑袋，还是要强上一些。

杨森如此卖力，当然是要做给他的新东家刘湘看，而刘湘也对杨森相当满意。有人对刘湘说：“杨森这个人胃口不小，就怕难以喂饱。”刘湘回答：“虎将难得，我就要把他喂饱。”

在刘湘担任四川总司令后，杨森便被提升为第二军军长。在短时间内，他从一个半路出家的投诚之将迅速跃居为速成系老二，刘湘以下，就数他最大了。

一脚踩入陷阱

就在杨森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他的那些昔日同僚却大多混得极其惨淡，其中颇为值得一提的便是杨森在滇军中的四川老乡朱德。

驱滇之战后，朱德跟着顾品珍逃回了云南。他们推翻了唐继尧，但唐继尧很快又杀了回来，把顾品珍的班子掀了个底朝天，顾品珍也步赵又新后尘，举枪自杀身亡。顾品珍死后，朱德等人只好逃出云南，当他们乘船经过重庆时，便顺路来看望杨森。

人生就这个时候最得意。杨森特地安排隆重接待，并把刘湘一道请来叙谈。席间，杨森邀请朱德留在自己的第二军任职，被朱德婉言谢绝："我想去欧洲留学，寻找新生活。"

刘湘笑了："何必浪费钱，到峨眉山休息休息不就够了。"

在这种事情上，刘湘就是一个俗人。杨森很慷慨地朝着朱德拍了胸脯："等你回国，我这里一定虚席以待。"

杨森在重庆用足足一周时间款待朱德一行，临走时又是设宴，又是送钱——一人一万元旅费，大方吧?

就个性而言，杨森从来就不是一个大方的人，他这么舍得，实在是过得太风光、太顺利了，以至那颗怦怦乱跳的心要不用力按住，都怕它冷不丁地蹦将出来。

正是因为自我感觉太过良好，导致当一二军矛盾爆发时，杨森在对形势的研判上与刘湘完全不同。刘湘强调谨慎，没有十拿九稳的把

握，切勿动兵，杨森则不屑一顾，认为连滇军都不是老川军的对手，还怕什么？在刘湘面前，他力主出兵一战。

刘湘的谋士向刘湘建言："历来骄兵必败，杨森如此骄横轻敌，若与第一军轻启战端，你必败无疑。"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刘湘瞧瞧从普通士兵到杨森，全都干劲十足的样子，觉得要打的话，只要将士用命，也未必就打不赢。

正在难以决断的时候，有个部下对他说："你怕什么，杨森是在为你打天下，如果战胜了，功劳自然归你。如果战败了，由杨森负责，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刘湘认为有理，对啊，我怕什么呢？反正下野了，好赖自有杨森帮我扛着。于是他叫来杨森，当面指示："熊克武、但懋辛用兵诡诈，你切不可轻敌。记住，专打一军，不要牵动别的部队，以免树敌过多。"

1922年7月9日，杨森发布作战令，对第一军展开攻击，同时宣布只向一军作战。他为此还专门让幕僚写了一篇告官兵书，把以前对实业团军人的称谓原封不动地赠给了熊克武和但懋辛，称两人都是长衫军人。

"当年田横不过五百壮士，尚能盘据一海岛，第二军现有如此众多的人马，还灭不了这两个穿长衫的吗？"

杨森出阵，果然是气势磅礴，那模样真宛如吕布重生，手上一柄方天画戟，胯下一匹赤兔，谁也挡不住啊！

当杨森乘轮船登岸进入一军防区时，竟然已是营帐空空，敌军闻风而遁，整师整师地撤走了。再往前去，又是一座空城。第二军一连经过五座城池，都是如此，根本就不见第一军的踪影，倒是在地上捡了若干支废弃不用的破枪。

这情形，由不得杨森不得意。《三国演义》中的吕布说："关外诸侯，布视之如草芥。"杨森差不多也把第一军看成了草芥，感觉手都不用动，抬脚上去轻轻一踩，就能把他们给全部踩扁了。

吕布还有一句名言："吾匹马纵横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杨森的对面没曹操，只有熊克武、但懋辛，原先他以为这两人如何了得，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两个窝囊废，哪里能跟当年的曹公相提并论，手到擒来，何其易哉！

刘湘在同意杨森出兵时，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可轻敌，杨森开始也确实揣着小心，但实际战事如此顺利，想要不张狂都不可能了，更何况杨森本来就是一个很张狂的人。他号令所部："但懋辛已然崩溃，大家只管放开胆拼命追，就像当年追赵又新一样。"

这不像是打仗，活脱脱成了野外拉力赛。第二军官兵把腿都快跑得脱臼了，才勉强撵上第一军的殿后部队，刚要开打，对方又开溜了，而且溜得比兔子还快，一会儿便无影无踪，大家只能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满地捡拾破枪。

不知不觉中，杨森已经一脚踩入陷阱，而安排和布置这一切的，正是被他视为窝囊废的但懋辛。

给他几个耳光

刘湘说熊克武、但懋辛用兵诡诈，乃是行家眼光。熊但二人从留学归国起，就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在战火中历经磨炼，可以说，他们打过的仗比刘湘和杨森还多得多。从密密麻麻的枪林弹雨中冲过来，若不诡诈一些的话，恐怕不是没命的问题，而是不知要死多少回了。

早在癸丑讨袁时期，但懋辛就显露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当初如果他的突贯攻击战术能够付诸实施，成都或许早就在蜀军的掌握之中了。

早期的蜀军还处在成长期，中军帐里一天到晚都是吵吵嚷嚷的声音，年轻的军官们一个个心比天高，就算是但懋辛、熊克武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但懋辛有再好的计策也徒呼奈何。现在不同了，随着战场日趋激烈和残酷，军事民主已没有什么市场，指挥官们都越来越独断，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决策越来越有效率。

但懋辛身为第一军军长，熊克武不在时，即对全军负起指挥之责。杨森以为但懋辛是怯战，殊不知他采取的是一种极高明的战术，而且这种战术还有师承。

那还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师出同门的孙膑与庞涓决斗，甫一接触，孙膑便佯败后撤。庞涓连追三天，发现孙膑所部不仅在撤退，而且每天都在减灶：第一天尚有十万人在吃饭，第二天减了一半，第三天挖的土灶就只够三万人用餐了。

庞涓判断孙膑完蛋了，却不料这正是孙膑的诱敌深入之计。最后大家都知道，庞涓在一个名叫马陵道的地方被孙膑伏击，史称马陵之战，孙膑没完蛋，庞涓完蛋了。

孙膑由此一举成名，继他的老祖宗孙武之后成为一代军事大家，所传《孙膑兵法》也成了畅销书。但懋辛如今走的，正是两千多年前孙膑的路子，他连弃五城，也就等于给杨森放了五颗烟幕弹。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玄机。刘湘久经沙场，已感到前线的情形不太对劲，因此特地给杨森等人发来密电："听你们说连克五城，并夺得多少多少枪支，照这样推理，但懋辛所部应该是溃散无遗，怎么还能列阵抵抗呢？"他提醒杨森："但懋辛并非容易对付之人，你千万不要轻视他是长衫军人，谨防上他的当。"

曾助刘存厚一臂之力的张澜此时是个看客，他也对人说："但懋辛不战而退，明明是个计，杨森怕要吃他的亏啊。"

这些话都很有见的，然而此时的杨森就跟庞涓一样，已经完全被但懋辛的烟幕弹给弄迷糊了，哪里还听得进不同意见。

但懋辛每弃一城，即发布一次通电，弃五城，就发了五次电。这些通电其实都是给旁观的诸侯们看的，为的就是要煽动众人，一起对付杨森。五次通电下来，一个诸侯也没动。这些诸侯全都比鬼还精，你要跟他们探讨生存智慧，纯属白给。杨森不是说了吗？只打但懋辛，不及旁人。在胜负未料的情况下，没有敢轻易卷入局中——谁早进去一分钟，谁就可能早死一分钟！

诸侯们的心思，但懋辛当然清楚，他也没指望发个通电，就能招来援兵。说到底，命运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起码你得通过事实告诉别人，你有赢的希望和可能。

但懋辛被杨森一追就是半个月。在这半月内，第一军一个像样点的仗都没打过，就是不停地被人追，官兵人人为之愤慨，大家都嚷嚷

着说：“我们究竟还要退到什么地方去？敌人这样苦苦相逼，难道就不能回手给他几个耳光吗？”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但懋辛暗暗高兴。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待在军部，而是特意穿着士兵服，夹杂在军中步行。身为军长，一般的士兵并没有见过但懋辛，加上服装的掩护，竟然没人认出他来。

但懋辛如此装扮，当然不是为了便于逃命，他是要像刘湘一样，体察民情和掌握真实的军心士气，以便确定最合适的决战时机。一听“给他几个耳光”这样的话，他就知道有门了。古语说，哀兵必胜，士兵不用做任何动员，便嗷嗷地想打上一仗，这一仗要想打赢，就有了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再一问，部队已退到了杜家岩。

据说杜家岩早年也是古战场，乃白莲教与清军激战的地点，对于有反清渊源的但懋辛和第一军来说，这个地方足以让他们心中为之一动。

既是古战场，在地形上必有其独特之处。但懋辛就地察看，发现杜家岩居高临下，地形上占有优势，他于是下定决心：就它了，古有马陵道，今有杜家岩，我一定要让杨森尝尝做现代庞涓是个什么滋味！

谁也不许后退

但懋辛刚刚在杜家岩布置好阵地，杨森就已尾随而至，并在杜家岩对面摆开一线，双方相距仅有两里之遥。

兵无常规，必须随战场形势而变化，这时候就无法照搬照套孙膑的伏击战了，而只能打阻击战。但懋辛相信通过阻击战同样能击败杨森，因为他手中还握有一个撒手锏。

这个撒手锏是一个人：刘伯承。

刘伯承因在护国一役中伤了右眼，四川人称他为“刘瞎子”。战场上只要有“刘瞎子”出现，对手无不胆寒，刘伯承后来自己说，当年他曾偶然听见一个小孩子在哭，大人吓唬小孩子：“你再哭，再哭的话，让刘瞎子把你抓走！”小孩子立刻不哭了。

刘伯承原先负责赶造江面浮桥，以便可以让部队撤退，但是江水猛涨，浮桥屡被冲毁，总也建不好。正急得跳脚，但懋辛的征召令到了。刘伯承应召赶到杜家岩后，对官兵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现在已是背水为阵，唯有死拼一战，倘若再后退，这么多江水，我们是喝不干的！”

集结在杜家岩的双方军队，第一军有两师一旅，第二军有两师两旅，从数量上看，第二军超过第一军，然而就士气而言，第一军又要胜于第二军，特别是在这半个月里，第二军穷追猛赶，求战不得，已经明显露出了疲惫之态。

要让疲惫兵卒仰着脑袋往上攻，是件要命的事。杜家岩一战下来，第二军不仅没能攻下杜家岩，反而在被击退后又丢了两个据点，只得由攻转守，凭借一浅水小河与第一军对峙。

年轻时的刘伯承打仗有一股疯狂的劲头，要不然也不会成为但懋辛帐下最得力的虎将。他采用中央突破战术，挥师朝敌人的正面阵地

猛冲，怎奈杨森亦非浪得虚名，所部战斗力极强，第一军的多次冲击均无效果。

第一军已杀到力衰气竭，枪弹也接近消耗一空，胜利的天平再次朝向杨森。但懋辛手下诸将见状皆失了方寸，有人赶紧搬运辎重，为再次撤退做准备，然而他们都接到但懋辛的严令：“谁也不许后退！”这时正好有一支预备队驰援杜家岩，但懋辛旋即调给刘伯承，以作最后一搏。

刘伯承决定用预备队来继续实施中央突破。中央突破有危险，几乎人人皆知，你拼命钻，敌人拼命堵，火力全集中在一处，加之预备队彻夜行军，也已是人困马乏，因此带队军官面有难色。刘伯承对他说：“我们有预备队，人家也有预备队，就看谁先用在刀刃上。现在舍中央突破，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只能最后再做这一尝试。”

在刘伯承的指挥下，预备队发起攻击，在午饭时间突入二军阵地并撕开了缺口，其后随着第一军的后续部队不断拥入，第二军大溃而去。

杜家岩战役堪称信心之战，它不禁鼓足了但懋辛的信心，也替驻足观望的人们下了决心，告诉他们究竟应该把砝码加在哪一边——诸侯们迅速组成联军，加入了但懋辛一方的阵营。

第二军兵败如山倒，竟闹出黑夜之中，上万官兵被一两百人缴械的笑话。当杨森乘船逃往宜昌时，除衣兜内尚存一颗“杨森之印”的印章外，已是一无所有。

杨森大败，等同于刘湘大败。什么杨森负责之类都是屁话，大家都是跑江湖的，一起出来混了这么久，谁不知道你刘湘就是杨森的后

台老板，哪里能脱得了干系?

这是刘湘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败仗。因为“杨吕布”的莽撞行事，他别说统一四川，连重庆都待不下去了，最终不得不搬去老家成都大邑县闲住，用“樵山钓水”来打发日子。

第五章　瘾君子

川军规矩，每逢大战过后，都要为阵亡将卒开一次追悼会。川人喜摆龙门阵，好清谈者甚多，有人撰联曰：“自治哄人，追悼哄鬼，夫子自道也；做官向北，发财向南，先生将何之？”

联语幽默诙谐，道尽名利场上的奥妙。其实川军将领之中，善于哄人哄鬼且左右逢源者众多，比如说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就是此间高手。

刘成勋毕业于武备学堂，他最初在刘存厚部任混成旅旅长。熊克武发起靖国之役后，刘存厚逃往陕南，刘成勋没有跟着去，而是留在了川中。当年死心踏地跟着刘存厚亡命天涯的不乏其人，钟体道就是一个，与钟体道相比，刘成勋似乎既不忠心，也不义气，可是这样做对他个人有好处啊——刘成勋被熊克武提升为师长，而钟体道被刘存厚扫地出门了！

禅宗里面有个术语，叫作顿悟。刘成勋顿悟了，他从此正像川人联语中所说，“做官向北，发财向南”，忽南忽北，看你们哪家得势，就把屁股挪向哪边。刘成勋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属于他的江湖名号“刘水漩”，以此形容他的性格像水一样圆滑，任何时候都周旋得开。

滑头师徒

四川的倒熊行动开始后，眼看“倒熊同盟”势大，刘成勋一面暗中向其示好，一面却按兵不动，直到再三确认双方实力消长，发现还是熊克武强一些，才马上决定跟着熊克武干。

熊克武上台得了势，论功行赏，刘成勋由师长升军长，赚了个盆满钵满。

而后，熊克武和刘存厚二次开打。这次强弱对比一望可知，刘成勋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熊克武一边，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虚张声势居多，喉咙喊到山响，身子还没怎么动过，关键时刻都是别人在那里斗到死去活来。可是战争结束时，你敢忽略他吗？就因为他没怎么上阵，实力受损不大，也就有了随时可以跟你动粗的条件，这个时候，你不给好处试试？

一、二军决斗，虽然以杜家岩战役为最关键，但最终定局的仍然是诸侯联军的向背，而要比较联军各部实力的话，第三军名列前茅。实际上，早在杜家岩战役启动之初，刘成勋就得以接替刘湘，荣升川军总司令兼代四川省长，并俨然成为诸侯联军的临时总头目，连但懋辛对他都得百般讨好。

刘成勋一当上代省长，马上就有了跟过去的刘湘、如今的但懋辛平起平坐的感觉。坐在这样的位置之上，他同样觉得其他诸侯特别讨嫌，恨不能一夜之间把这些山头都给统统铲平了。

川军的惯例是，开一次追悼会，照例还要再开一次善后会议。会上，刘成勋抛出了“废除军长制案”，规定川军今后要以师为最高单位，军长职衔将被予以废除。

别人还好，把个邓锡侯给急坏了。

在四川人对川军战将优劣与否的评价中，“老是吃败仗”说的就是邓锡侯，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此君竟能做到逆风而行，吃再多的败仗都挡不住他升官，堪称军界奇迹。

要说邓锡侯有什么秘诀，他其实是照套了刘成勋的模式：先跟刘存厚，觉得刘存厚不行，马上倒向熊克武……

诸如此类，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若不特别加以说明，外界没准还会以为邓锡侯是徒弟，刘成勋是师父，他们是一对滑头师徒哩！

因为邓锡侯名字里有一个“侯”，恰与“猴”字谐音，邓锡侯遂被外界赐诨号“水晶猴”，形容他精明滑头得有如四川峨眉山上的猴子。

善后会议给邓锡侯的感觉，就好像他和“刘水漩”一道进山门，不料“水漩”先迈进门槛，然后咣的一声，把山门给关上了，他被生生地堵在了门外。

善后会议当然不光一个议案，议案多了去，还有制定省宪法之类，但邓锡侯统统不感兴趣，觉得这些东西跟他没丁点关系，他只知道他现在是师长，以后就应该按例升为军长，而“废除军长制案”一出，等于切断了他继续攀升的阶梯。

“过分了过分了，你吃香的喝辣的，怎么着，也得给兄弟们留点啊！”这是邓锡侯的心里话，但这种话不能说出口，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是另外一番言辞。

邓锡侯说：“这个议案不妥。”

为什么不妥？邓锡侯说的不是他自己如何如何，而是刘成勋将会如何如何：“杨森虽已退出川境，刘湘也已下野还乡，然而这两人均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我不是说废除军长制不好，是说时机不对。现在废除的话，各军不免就会有鸟尽弓藏之感，会不会有人不服气，配合杨森、刘湘卷土重来呢？那样的话，总司令（指刘成勋）就可能会面临不利局面。”

虽然刘成勋推出议案，本质上是怕邓锡侯这帮人后来居上，跟自个抢座次，但邓锡侯的这些话一出口，他就不能立马否决了，因为人家说来说去，还都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在考虑。

议案久拖不决，导致会议不得不暂时休会，而且一休就是好几天。几天后，会议重开，就“废除军长制案”进行表决，结果全场仅邓锡侯、陈国栋等两人投反对票，赞成票占绝大多数，议案获得通过。

必须自己救自己

中国的东西，能端到桌上的菜都是厨房里早就煎炒烹炸好的，极少寿司、沙拉这些半生不熟的玩意儿。利用那几天的休会时间，刘成勋、但懋辛已经在内部打好了招呼。对于“废除军长制案”，大多数诸侯都抱着随大流的态度，觉得只要不搞“统一”，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很不错了，加上出席会议的一军、三军代表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票能投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刘成勋和但懋辛废除了军长，并不妨碍他们继续扶摇直上。刘成勋觉得代省长的“代”字碍眼，便通过贿选加威迫的方式，让议员们把自己选为正式省长。但懋辛在会议结束后，第一个响应议案，第一军

军长也不做了，转任东防督办，结果东防督办的实际地位和职权弄到比军长都大。

如此，幕后操控的熊克武，台前吆喝的刘成勋、但懋辛，就成了执掌四川政局的三驾马车。

刘成勋们的喜剧无疑就是邓锡侯的悲剧。邓锡侯失望透顶，也伤心透顶，他暗下决心，不能就这么算了，断掉的升官梯还是得接上去。

陈国栋是另一个师的师长。与邓锡侯一个劲想往上升略有不同，他最担心的是上面揪着脑袋把他往下降。按照“废除军长制案”，军长被废除后，各师就要按实际兵力和枪支进行点编，如果达不到标准，便只能降为旅甚至是团。陈国栋师正是这样的不达标师，所以表决结束后，邓锡侯只是伤心失望，陈国栋却有如焦雷轰顶。百思无计，他想到了“找食进补”的法子。杨森败走时，曾留下一些旧部，其中一个团就在陈师附近，陈国栋于是计划收编该团，以便将自己的师可以扩充成满员师。

问题是这个团已经被刘成勋给收编了，陈国栋继续收编，等于是到刘成勋的碗里来抢食吃。刘成勋闻讯大为光火，他一面下令将陈国栋撤职，一面出动部队对陈师进行武力缴械。

邓锡侯正在设法寻衅，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决定帮陈国栋打刘成勋，不过他最初采取的方式却是假意调停：哎哎哎，你们不要打了，打架会破坏环境，要是误伤到旁人呢，怎么办？就算没有误伤到旁人，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

邓锡侯调停，不光用嘴，还用手——转瞬之间，他已与陈国栋合起伙来，一起向刘成勋展开围攻。

敢情你不是劝架，也是要跟我打架的！刘成勋这才回过神来，但为时已晚，邓陈把他给围在了成都。

刘成勋赶紧向他的同盟者之一赖心辉发出电文，请其率兵来救。赖心辉应声出援，这边邓陈攻城不下，得知援军将至，顿时都着了慌。

陈国栋是祸首，心理压力最大，他当即要求与刘成勋通话。电话一接通，他啪的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差点痛哭流涕："我并不敢背叛总司令，都是为了生存啊，我这就回原防区好不好？请你不要派兵打我了。"

刘成勋被围在城里，当然也很紧张，巴不得陈国栋早点撤围，但听陈的口气，分明是怕了援军，于是又气壮起来："我倒是很愿意答应你，可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单独做主，得跟但懋辛他们商量着办。"

陈国栋听后，果真战战兢兢地待在城下，从此"围而未攻"，指望刘成勋们"商量"后能放他一马。可是几天之后，他等到的只是对方援兵的蜂拥而至，赖心辉带着边防军来了。

川将之中，赖心辉的声名不比但懋辛小。他曾在刘存厚手下任炮兵团长，刘罗之战中吓跑罗佩金的那两炮就是他的杰作。虽说多少有点误打误撞，但赖心辉的名气一下子就叫响了，人赐外号"赖大炮"。

赖心辉一露面，邓陈便知大事不好，吓得打马就逃。陈国栋因身形肥胖，行动迟缓，差点被赖心辉生擒活拿，可谓狼狈之至。

形势危急之时，陈国栋只知道一个劲儿给人家磕头，邓锡侯却明白必须自己救自己。他的水晶猴之名不是白来的，这意味着他不光圆滑，而且还善于一刻不停、翻来覆去地不停倒腾。事实上，在与刘成勋开打之前，邓锡侯已经大施纵横之术，用“保定”二字在其他诸侯中煽风点火，拉这个拖那个了。

与武备系、速成系不同，保定生起先并无明确的派系意识，比如，熊克武的蜀军中，就有很多军官出自保定。邓锡侯本人也只是肄业于保定军校，并非纯粹的保定生，不过这没关系，水晶猴就有办法凭他上蹿下跳的能量以及三寸不烂之舌，把众人都鼓动起来。

邓锡侯散布的逻辑是，大家都是保定生，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天如果我挨了揍，明天没准也就轮到你们了。

见赖心辉对邓锡侯穷追猛打，划在保定系圈子里的人果然都坐不住了，有几个胆壮的率先加入了邓锡侯的“保定系同盟军”。由于他们的加盟，邓锡侯这边的部队迅速得以扩大，仅正面部队即由两个师增加为三个师，尽管如此，赖心辉的兵力仍要强过邓锡侯，他们加一块共有三个军，川人形象地把这场战役称为“三军打三师”。

让老夫来教教尔等怎么打仗

阵容变换之初，赖心辉仍是攻，邓锡侯还是守。直到赖心辉听说杨森也开始反攻四川，害怕后路被截，才决定收缩战线和全军撤退，于是场上形势又变成了邓锡侯追赖心辉。

赖心辉不仅会开炮，指挥作战的本事也很不赖，川中评语中的“吃过败仗，但也打过胜仗”其实说的就是他，他即便撤退，也撤得颇有章法，邓锡侯一时难以取胜。

邓锡侯以往确实很少能打胜仗，他也一直秉持着“不胜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密方，对他而言，看准风向才是王道。可是这回不同了，无法投机，大家都要完全靠本事吃饭，仗打赢了还好，输了家当就没了，更没有人会来升你的官。

水晶猴火烧火燎，另外两个师长也都心急如焚，可这三个人的本事都差不了多少，半斤对八两，谁也想不出什么克敌制胜的高招。

苦守在指挥所里看来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出去放松一下心情。三人于是外出散步，不知不觉中，他们走进了一座名叫庞公祠的庙宇。

庞公，指的是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庞统。想当年，庞统可是与诸葛亮齐名的智谋之士，卧龙凤雏，诸葛亮是卧龙，庞统是凤雏。庞公祠的走廊下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碑文，反正是闲逛，众人就凑上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读。原来那是一篇庞统的传记，当读到其中一段时，三个人的心都开始怦怦直跳起来。

这一段的背景，是说刘备欲取巴蜀，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取。庞统献上中下三策，供其选择。刘备当时选了中策，结果未能即刻全取巴蜀，庞统也在落凤坡中箭而亡，应了“凤雏殒落”的预言。

如果后人能够穿越时空，代替刘备决策，毫无疑问都会选上策，有可能庞统就不会死了。那么，庞统的上策是怎么说的呢？庞统说，应该挑选精兵，昼夜兼程，抄小路突袭成都。守卫成都的刘璋素来不擅武事，又没有准备，大军突至，可一举而定。

当读到这段文字时，三个师长都差点叫出声来，仿佛庞统先生正挨个敲打着他们的脑门：“笨小子们，让老夫来教教尔等怎么打仗。”

与三国时相比，现在的情形当然存在差异，比如，刘成勋可能要比刘璋强一些，但这种差异也实在有限，刘成勋就算是比刘璋强，也强不了多少。“水漩”就不是靠打仗升上去的，纯粹投机而已，时间长了，他甚至已形成个人习惯，一上阵就显得优柔寡断，别人都端着枪冲过来了，他还在一个劲儿琢磨：我究竟是不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呢？

上次邓陈围成都失败，是缘于赖心辉的解围，而此刻赖大炮正率大军驻于前线，难以顾及成都后方，这岂不正是乘虚而入的好机会？计议已定，三人分了下工：邓锡侯亲率主力，走小道直驱成都；其他两个师对赖心辉发动佯攻，以扰乱其视听。

随后，邓锡侯立即率部实施强行军。经过一天两夜，该部行程两百八十里，直抵成都。刘成勋没料到邓锡侯会再次兵临城下，而且加入围城的诸侯军队还在不断扩大，主要的共有八部人马，时人称为“八国联军”。

在“八国联军”的日夜围攻下，刘成勋六神无主，只得急电赖心辉回援，但赖心辉被联军的佯攻部队紧紧拖住，根本赶不过来。刘成勋再向但懋辛呼救，同样无果。

这下子，刘成勋真的成了民国版刘璋，除了坐困愁城外，无任何脱身之策。在中间人的调停下，他只得宣布通电辞职，与刘湘一样到大邑“樵山钓水”（两人是大邑同乡）。

至此，“徒弟”完全扳倒了“师傅”，邓锡侯纵横捭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见得比刘成勋还要厉害。有人给邓锡侯拟了一首打油诗：“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

在邓锡侯等人围攻成都时，驻守重庆的但懋辛不是不想援救，而实在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身也正吃紧，杨森杀来了。

所谓不打不相识，杨森在援鄂之战中见识了吴佩孚的能耐，便觉得吴佩孚是个不错的新东家——在这方面，杨森跟吕布的思想境界差不多，不管其他，谁吃得开有本事，就跟着谁干。

被赶出四川后，杨森直接北上洛阳拜见吴佩孚。吴佩孚早就听说杨森乃川中猛将，对方既然来投奔自己，当然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从吴佩孚手里，杨森得到了一张师长的委任状以及军饷军械等物，从而得以在宜昌重组出新的第二军。

此时恰逢滇黔相斗，一部分黔军被滇军逐出贵州，流亡于湖北，而陕南那个不甘寂寞的刘厚脸，也正做梦想回四川。吴佩孚从北洋军和北方各省军队中拨出一部分人马，和他们混编在一起，组成了“援川军”，以帮助杨森打回老家。

在吴佩孚的帮助下，杨森重新恢复了元气，乘着“三军打三师”的空隙，他嗖的一声钻进四川，直扑重庆。但懋辛打不过杨森，被迫退守遂宁。

我们还有什么怕的

四川政坛曾经的三驾马车，刘成勋回家待着去了，但懋辛虽仍留在舞台上，但处境已是朝不保夕，隐身幕后的熊克武再也无法安之若素，赶紧利用复出的机会走上前台。

熊克武所得到的这个新机会来自孙中山。孙中山刚刚在广东出任大元帅，重新成为南方政府的首脑。代表北方政府的吴佩孚要“统一四川”，孙中山也不能容许四川出现差错，双方都需要在川中找到能够代表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可靠武装。

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高层以九人团为核心，其军官多为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外界为“一军系”，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现实状况，第一军都可以称得上是在党人这棵藤上结出来的果。

不错，孙中山与熊克武曾有心结，他本人也是“拥杨反熊”的幕后支持者，但时间证明，像熊克武这样的实力派是很难反得掉的，唐继尧不行，杨庶堪、实业团一类的长衫客更是白给。

此前，孙中山曾经历过陈炯明“炮打总统府”事件，这让他对麾下所有战将都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包括对熊克武的态度和看法。他从此不再提及“反熊”，连左右偶尔谈起当年往事，他也矢口否认，说我从来就没有让你们反过熊克武啊！

不但如此，孙中山还派特使专程来川，主动与熊克武寻求和解。在谈判过程中，特使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过去的种种如今“一笔勾销”，谁也不许再提了，二是今后熊克武要“服从先生（指孙中山），拥护先生到底”。

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代表熊克武参加谈判的但懋辛兴奋不已，说：“只要先生肯给我们‘横披’，给什么，我们就挂什么。”

孙中山很快就把熊克武、但懋辛等人所期望的“横披”送了过来。他宣布成立“四川讨贼军”，任命熊克武为“讨贼军”总司令，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凡四川的党人武装，连同过去“反熊”的实业团在内，全部遵照孙中山指示，加入讨贼军系列并归熊克武节制。

讨贼军所要讨伐的对象，近指杨森及诸侯联军，远及吴佩孚及北方政府，自辛亥革命以来，南北双方在四川较量过多次，讨贼之役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遂宁处于成都和重庆之间，成都有“八国联军”，重庆有杨森的第二军和援川军，其实力之巨，远远超过一、二军决斗时期，遂宁也随时面临着被前后夹击的危险。抱得帅印的熊克武坐镇前台，召集众将商议对策。会议室里气氛悲观，但懋辛等人均愁眉不展：“以前我们打一面尚且吃力，现在要打两面，太难了。”

几乎所有人都在唉声叹气，唯一例外的是熊克武。熊克武说：“诸位错了，我们要打的其实仍然只有一面，而且那一面很弱，所以并不难。”

众人听了很是惊讶。熊克武从容不迫地把地图上的重庆给遮了起来：“杨森刚到重庆，必然有一个整顿部署的过程，短时间内无力西顾，我们现在根本不用管什么杨森，只需赶往成都，争取先打垮‘八国联军’再说。”

熊克武所说的弱的一面，即指成都的联军：“‘八国联军’是个临时组成的草头班子，八个诸侯各有各的算盘，凝聚力并不强，要打垮他们易如反掌。拿下成都，等于控制了兵工厂，再调过来跟杨森对阵，就有了可以跟他打持久战的本钱，我们还有什么怕的？”

众将恍然，不由得击掌叫好。

岁月有时候是杀猪刀，有时候却又是大力回春丸。熊克武几上几下，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作战，都愈见老辣，尤其在下野之后，他能够以局外人的身份冷眼观察，视野和思路自然也就变得更为宽广深入。

熊克武拍板定案之后，立刻致电赖心辉，商定两军共同出击成都。

烟尘滚滚中，讨贼军和赖心辉军杀奔成都。诸侯们闻讯惊慌失措，他们公推邓锡侯出任联军总指挥，在成都附近阻击熊克武。

西楚霸王

邓锡侯既是水晶猴，也是常败将军，奇袭成都不过是偶尔灵光一现，属于千年万年才有一次的奇迹，让他出任总指挥，实在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勉为其难了。邓锡侯本人却并不这么想，沐猴而冠之后，他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每次召集军事会议，这猴子都要高高地坐在一把虎皮交椅上，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俨然以常胜将军自命。

可惜水晶猴距离美猴王确实很远，联军上阵后还没怎么过招，便被对方截为两段。正如熊克武事前所预计的那样，联军不过是只软脚蟹，稍遇挫折，各部就你奔我逃，全线溃退。

等杨森赶到前线时，熊克武早已轻取成都。成都之战不仅使熊克武免除了身后之患，而且为他在同盟者中树立了权威，连赖大炮这样

的牛人都开始对熊克武俯首帖耳，成了他可以差来使去的一名部将。

杨森自然不比邓锡侯，此人可是川将中的第一条好汉，尤其这次回川后，转战一两千里，锐不可当，节节胜利。由赖心辉和但懋辛合战锋芒正锐的杨森，这是一般人都能想到的，但熊克武独辟蹊径，偏偏不这样做——“双英战吕布”都不一定能赢，他偏偏还要让赖心辉与杨森单打独斗！

熊克武如此部署自有他的道理。杨森“会打胜仗”，赖心辉“时胜时败”，若是对攻，赖心辉不是杨森的对手，但赖心辉可以不与杨森玩对攻，而是只凭险固守，其间不管杨森如何讨敌骂阵，他都只在辕门外高挂免战牌，如此一来，杨森纵有一身武艺，也奈赖心辉不得。

求战不得，杨森急中生智，便想趁夜晚来个偷营劫寨，不料赖心辉早有防备。

你知道我赖大炮靠什么出名的？大炮啊！一阵猛烈的炮火之后，杨军劫寨的人马被炸得稀里哗啦，东倒西歪，杨森的先锋官当场中弹毙命，所部争相溃退。

赖心辉借势杀出营寨，衔后追击，正在此时，但懋辛也突然出现在了杨森背后。原来在赖心辉与杨森相持时，他已奉熊克武之命间道而行，绕到了杨森部的后方。杨森腹背受敌，左支右绌，只得撤往川东。

川东早有滇军守候。熊克武施展长袖善舞之术，已从云南邀到了唐继尧相助。

在驱熊、驱滇两战中，熊克武与唐继尧曾经结下仇怨，但政治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唐继尧有段时间被部将顾品珍赶下台，复出后又除掉顾品珍，并且赶走了不服从他的黔军，大有重拾旧山河再做西南王的架势。

从政治派别上来讲，熊克武是党人，唐继尧也是党人，他们系同出一脉，名义上都受孙中山号召。现在杨森已公开投靠吴佩孚，给北方政府的“武力统一”充当马前卒。试想一下，四川若给北方“统一”了，熊克武靠边站不说，他唐继尧也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染指巴蜀，因此才肯“助熊讨贼”。

再次腹背受敌的杨森被迫放弃上川东，龟缩于重庆。山城重庆本身地形险要，又有杨森坐镇固守，并不容易攻下，但到了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挡住熊克武了。他先遣赖心辉从江南攻重庆，以吸引杨森主力，再派但懋辛与滇军配合，猛攻江北阵地。

江北阵地由流亡黔军据守，黔军战斗力较弱，重拳击下，哪里扛得住，当即弃守奔逃。江北阵地一破，重庆便无险可守，杨森也只有逃命的份儿了。

熊克武兵锋所向，敌方阵营到处呈现出狼奔豕突之状，争相逃窜的除了杨森、邓锡侯、“八国联军”、流亡黔军外，还有刘存厚、北洋军、豫军、陕军、甘军……其中甘军最惨，仅一天时间就被包围缴械，士兵全部空着双手逃回了甘肃。

秦末，项羽在巨鹿大战中首次大规模击败秦军主力，名扬天下。《史记》中这样记载诸侯们的神情心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诸侯们在进入项

羽的营帐时，全都跪着向前挪动，没有谁敢抬头与项羽对视。这是西楚霸王的威风，这种威风不是吹出来的，完全靠战场实绩所铸就。

熊克武在讨贼之役中三战三捷，转眼之间，已将成都、重庆两大重镇收入囊中，而从貌似人多势众的诸侯联军，再到不可一世的杨森，无人堪与匹敌，其用兵之老到、战术之诡诈，连吴佩孚这样的军事高手闻之都吃惊不已。

巴蜀的“西楚霸王”诞生了！

到处都是星星

在讨贼之役的第一阶段，原本大家都看好杨森，“川中吕布”嘛，总以为靠他手中一柄方天画戟便能所向无敌，哪里知道杨森一衰起来更呈不可遏制之势。这下，人们印象中的杨森完全变了味，杨森得以称霸武林的勇敢善战也成了有勇无谋和鲁莽轻率的代名词。

杨森者，远不足以济大事。事到如今，大家又怀念起了刘湘，那才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啊！

杨森已转投吴佩孚，实在不愿刘湘东山再起，可是周围要求奉迎刘湘的呼声实在太高了，遂也只好装模作样地一起联名公推刘湘出山。

眼见援川军兵败后混乱不堪，杨森又难以号令各座山头，吴佩孚也急需找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他于是顺水推舟，授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一职，命其协调三军，向熊克武发起反攻。

刘湘蛰伏于家乡，是在静待时机，时机一到，岂有不出之理？他立刻离开大邑，进入中军帐指挥作战。与此同时，动员令也发至各个诸侯的案头。川军派系之中，速成系的名头要远大过保定系，刘湘仅凭速成系首领这一个招牌，就招揽到了更多原先还在犹豫观望的诸侯，联军一方的实力得到迅速增强。

作为联军中的核心战将，杨森、邓锡侯、刘存厚等人在未败之前各怀私心杂念，满脑子都是如何分果果的盘算，作战效率自然大打折扣。等到他们被赶到边边角角后，意识到没了退路，反而开始抱团取暖，有了同仇敌忾之心。相反，大胜之后的讨贼军阵营里却是另一种景象。

经过连番大胜，熊克武已不把联军放在眼里，他认为只需部将们稍加用力，便足以把对方碾成粉末，哪里还用得着自己亲自出手。赖心辉随后被任命为总指挥，主持全部攻守要务，而熊克武本人在家中“稳坐钓鱼台”，不再过问前线的具体事宜了。

做了总指挥的赖心辉也并不安心，当着熊克武的面，他提出还想当省长。熊克武倒是愿意给他个省长干干，问题是刘成勋已经复职，并率第三军残部重新加入了己方的盟军阵营，人家也没说要辞职，怎么好把乌纱帽让给你戴?

熊克武左右为难，只好敷衍赖心辉，说已经将提名报给了孙中山。赖心辉仰着个脑袋等了半天，迟迟不见委任状下来，便知道是被熊克武给忽悠了。

人活在世，不过是行尸走肉的臭皮囊，而且早晚还得化作尘世中的一缕清烟，你不给我好处，我凭什么要给你卖力乃至卖命？赖心辉

干脆啥事不干，花天酒地，大吸鸦片去了。

但懋辛则嚷嚷着要向熊克武辞职。当然，他不是真的要辞职，虚虚实实之间，分明也是冲着省长去的。刘成勋不肯辞省长，赖心辉、但懋辛想当省长，熊克武光排解内部的人事纠纷就够了，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利用这段时间，刘湘得以从容整军。1923年11月，在他的指挥下，杨森从万县出发，一马当先，杀奔讨贼军驻守的梁山（今梁平县）。

梁山告急，赖心辉尚不以为然，他借故向熊克武请假，并将总指挥一职交由但懋辛代行。但懋辛到底是熊克武的心腹之将，见赖心辉赖着不动，他立即收回辞职书，抖擞起精神到梁山指挥御敌。

讨贼军看上去有好几个军，但其实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第一军。但懋辛指挥嫡系的第一军，自然是得心应手，他也满以为可以像先前那样一战而捷，不料甫一接仗，自个脑袋就砰的一声撞到了墙上，到处都是星星啊！

这才知道，第一军也不好使了。

第一军将士大部分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们一方面富有朝气，能搏敢拼，另一方面，其人生履历就是直接从学校到部队，社会经验和谋生技能极少。对于他们来说，有部队才有前途，保自己首先就要保部队，部队垮了，个人也就完了，所以以往几乎每战都能拼死搏杀，也得以涌现出了刘伯承等一批名将。

可人终究不是机器，讨贼军攻下重庆后，大家都以为大事已成，懈怠轻敌的思想由上至下，也传染给了基层官兵。于是乎，众人脑子里翻腾的不再是如何沙场制胜，而是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各种点滴，大体上表现为士兵要加饷，军官要升职。

偏偏熊克武就卡在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四川本来财政充足，可经过这么多年一刻不歇的战争，即便原来有些钱，也早已被折腾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熊克武从孙中山和南方政府那里得到的，除了一块招牌外，其他都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能给官兵发些伙食费，很少发饷。打仗时士兵顾不得计较得失，等到一安定下来，免不了影响军心，以致滋生出各种不满。

军官升职的渠道也不畅通。第一军最强的骨干部队是混成第二旅，它在当时的巴蜀军界甚为有名，向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誉。混成第二旅能够打出威名和声誉，靠的是该旅的两个团长刘伯承、刘慕贤，然而这么多年仗打下来，刘伯承始终都只是个团长，哪怕他在杜家岩一战中决定了一、二军的胜负归属。

刘伯承在杜家岩战役中以团长的身份来指挥全旅，靠的不过是个人威望，但细细想来，这得让人有多么憋屈！在讨贼军攻下重庆之前，刘伯承再次受伤，伤愈后他便以休养为名不再归队。

这个时候，就应该熊克武或但懋辛出面挽留，就算你不给人升职，说两句好话总应该吧。结果却是无人过问，真正是用时取之，不用时弃之，如此对待脱颖而出的优秀将才，怎不令壮士寒心？

草木皆兵

刘慕贤性直而勇，与刘伯承可以说是并驾齐驱，但他也跟刘伯承一样，老是只能窝窝囊囊地当一个团长。直接根子应该说是出在旅长张冲身上，熊克武早就想提升张冲当师长，但他坚不就职。熊克武认为张冲不错，不贪图名利嘛，其实他是怕当了师长后，兵权分散，不好掌握部队。

张冲不肯升师长，二刘就不能升旅长，刘慕贤话里有话地对别人说：“我是在旅长以下、团长以上，想来是官居准将？”当时军队编制里并无准将之衔，可见年轻人之愤激。

刘慕贤虽未像刘伯承一样离队，但采取的是另一种消极态度，在部队进入重庆之前，不管张冲说什么，他都默然不发一言，此后便称病不出。

张冲不甚知兵，由他直接指挥的第二混成旅在战力方面也不再强悍。以第二混成旅为典型，整个第一军都呈现出萎靡不振之状，与杨森所部的气势汹汹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看，但懋辛的落败也就毫不意外了。

但懋辛折戟梁山，赖心辉不能不起身了。赖心辉督阵的地点是张关铁山，此处山高坡陡，就防守而言，属于绝佳地形，其实用不了太多人防守，赖心辉却差不多把讨贼军的一大家子全带了过去。

张关铁山因地势所限，人一多反而摆不开阵形，赖心辉便向夷陵之战中的刘备学习，做前后连营布置。刘备在夷陵之战中的布阵本来就是个失败的案例，赖心辉照搬过来也仍然是失败的：讨贼军黑压压地连营百里，看上去气势不凡，其实关键时候调动不灵，而且各军彼此信息隔膜，稍有动静便会互相惊扰。

刘备当年的致败之因，全部都被复制在了赖大炮身上。前方刚刚响起枪声，杨森还没怎么进攻，讨贼军的总预备队就发生动摇，率先往后撤退。总预备队一退，其他友军弄不清状况，都以为败了，遂也乱哄哄地跟着撤退。那情景，像极了昔日淝水之战中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山上山下的通道并不算窄，但也吃不消这么多人拥堵在一块，各部人马自相践踏，沿路遗弃的粮草辎重更是不计其数，连赖心辉本人也几乎被俘。张关铁山大战是决定两军胜负的关键，杨森突破对方防线后毫不放松，继续衔尾追击。

如果划分战将类型，杨森属于勇战派，打仗靠的就是一股舍我其谁的气势。可以说，他那股气势要是真上来了，一般人根本就挡不住。面对这位战场上的凶神，讨贼军各部无不胆寒，完全失去了固守重庆的勇气，遂全部引兵西退。

前线的风云突变，令熊克武十分吃惊。成都再不能丢了，但在无兵可援的情况下，困守成都又非善策，熊克武便让刘成勋守成都，他自己赶到成都东北的三台督师，争取能在三台遏制住杨森。

在距三台三十里外的高地之上，熊克武设立防御阵地，并派出一个警卫旅驻守，大部队则随指挥部集结于三台城中。比之于赖心辉在张关铁山的百里连营，熊克武的部署当然要聪明多了。他派出的警卫旅组建已有两年时间，即便在第一军里也可以算是老部队了，而且旅长出自第二混成旅，虽不能与二刘相比，但亦是忠勇之将。

熊克武预计，杨森一旦到达，以警卫旅的能力，足以凭险与之缠斗且挫其锐气，到时他再调大部队包抄围攻，定能让杨森马失前蹄。

设防初期，从熊克武到警卫旅都很紧张，警卫旅对前方进行严密监视，熊克武也随时要求听取侦察报告。他接到的第一份报告是说在高地附近出现了几百人，但是仔细一辨认，对方并不是杨森所部，而只是一股路经此地的土匪。紧接着城外响起了枪声，据估计是警卫旅正在驱逐这股土匪。

熊克武吁了口气，从正常的行军速度来看，杨森离三台和成都还很远，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赶到，难道他是神仙？过了一会儿，警卫旅又送来报告，称战斗很激烈，土匪很难对付，请熊克武派兵增援。

什么时候打土匪都这么困难了？熊克武啼笑皆非，想想警卫旅没准也和自己一样，太紧张了，大部队是要留着包抄杨森的，岂能拨去帮你们打土匪？

正好一个师长找熊克武商谈军务，熊克武也就没把警卫旅的请援要求当一回事。他不知道，杨森已经来了，其速度快到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就好像真的是骑了古代赤兔飞驰而来。

攻心战

杨森的闪电突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刘湘的“拉开三边，保障八九”之计。所谓“三边”是刘成勋第三军和赖心辉边防军的合称，“八九”是指第八、第九两师，其中第九师为杨森直接统率，“拉开三边，保障八九”的意思，就是牵扯刘成勋、赖心辉的力量，保证杨森能够长驱直下。

警卫旅发现的“土匪”其实是杨森派出的伪装袭扰部队，他们一左一右进行攻袭，目的是引诱警卫旅，分散其兵力。警卫旅不知是计，果真左右分开，这样中间就露出了空当。杨森率主力师从空当处一穿而过，一会儿工夫便冲到了三台城下。

守城部队对杨森动作如此之快同样无法理解，他们还以为兵临城下的是自家弟兄，竟然主动开门放行，结果被杨森全部予以缴械。熊克武仍被蒙在鼓里，听到城内响起枪声，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士兵在打架，便挥挥手，派卫队前去弹压。

卫队派出去后，枪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密集。熊克武又派一名军官前去察看，并让他转告卫队：“劝住打架就好了，不要胡乱开枪射击。”

军官出去一看，哪里是什么士兵打架，分明是杨森攻进了城，并且已直奔熊克武的司令部而来。军官急忙回来报告，熊克武闻之大惊失色，急忙率众人由后门冲出，沿城墙缒城而下，这才勉强得脱。

三台之战的失败，令第一军损失惨重。不过只要成都还在，熊克武仍拥有反败为胜的机会，1924年1月，他召集盟军首脑开会，决定在成都举行会战。这时刘湘也已统领杨森等联军各部，在成都城外摆开阵势，双方盘马弯弓，作势一搏，观察者均认为这是又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死大战。

依照杨森的性格，这种大战役正合他的胃口，作为主帅的刘湘却另有一番计较。

熊克武曾有西楚霸王般的威风，可眼下也就像被围于垓下的项王一样，虽然还能支持着再打一下，然而军队士气已是一落千丈。面对

处于下风的项羽，当年的刘邦最容易想到的便是发动强攻，但贸然这样做的风险其实很大，因为人的潜能是无穷的，特别当项羽及其所部处于绝境时，他们极可能会把自身的生存欲望和斗志全部激发出来。

刘邦最终采取的是更阴险更有杀伤力的做法，那就是“四面楚歌”，他发动部属围着垓下大唱项羽家乡的歌曲，直唱到项羽和他的子弟兵个个毛骨悚然，不知所措为止。楚歌唱罢，连虞姬都清楚，“大王意气尽”，项羽作战的意志和信心皆无，预示着这场战事完全没救了。这叫什么？这叫攻心战，刘湘如今打算采取的战法如出一辙。

讨贼军在经过短暂休整之后，士气已有所恢复，大家都想在接下来的会战中一雪前耻。不料到预定决战的这一天，熊克武却突然发布命令，说今天不打了，各部队只需严守阵地待命。他还给第一军师旅以上军官传去一道密令，要求假如会战打起来，务必先掌握好自己的部队，不要使部队受到损失。军官们十分纳闷，前半句还好理解，主要是后半句，哪有打仗不受损失的？

原来会战之前，刘湘提出了一个口号，说他专打讨贼军，不打刘成勋和赖心辉，而且传闻刘湘已暗中与二人进行接触。经过三台之败，熊克武的内心早已不再强大，这样的口号和传闻让他又惊又疑，感觉刘成勋和赖心辉随时可能叛他而去。

几天后，“接触”云云被证明是扯淡，刘成勋和赖心辉也并无背叛的迹象，可是这三股人马再也不可能齐心了，他们彼此提防，以邻为壑，未战就抱定了“不受损失”的宗旨。

会战开始了，才两三个小时，盟军方面便全线溃败，呈不可收拾之状，成都被联军一举而下。熊克武不仅因此失去了最后的据点，而

且在撤退途中，他历经多年培养出来的精锐部队也一个个土崩瓦解，其中便包括曾名震巴蜀的第二混成旅。

刘湘的攻心战成功了。

回娘家

战乱时代，实力就是话语权，既有枪杆又有地盘，可以称军阀，既无枪杆又无地盘，只能沦为谁都瞧不起的流浪汉。熊克武无法容身于四川，只得像过去的刘存厚一样混迹他乡。可是其他地方也都有人拿枪看着守着，绝不会随随便便让你染指，所以熊克武要想固定寄居非常困难。

这时孙中山酝酿北伐，熊克武的部队也被纳入了北伐之列，熊克武便以北伐为名进入湖南，在湘西建立“建国联军”（也称“建国川军”）。湘督赵恒惕对此很不高兴，过去他跟熊克武合作搞联省自治，也曾经勾肩搭背，亲热到不行，但此一时彼一时，熊克武已经穷到连立足之地都没了，得来湖南挤他的地方住，这还能是一个态度吗?

可是赵恒惕又不敢冒冒失失地赶熊克武走，因为不给熊克武面子，就等于不给南方政府面子。在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后，南方政府实力大增，连段祺瑞、张作霖都邀请孙中山去北京谈判，岂能轻易得罪。

熊克武重新拥有了崛起的希望，他的“建国联军”扩编到四万人以上，孙中山也已写来密信，让他随时进图武汉。可惜天不遂人愿，孙中山突然在京去世，北伐计划也随之不了了之。

孙中山一死，赵恒惕再也憋不住了，他向熊克武发出逐客令，限其两周内离开湖南，否则便发起进攻。熊克武没有击败湘军的把握，想来想去，只能回娘家，也就是开往广州。有的人愿意去广州，有的人不愿意去，最后随熊克武前往广州的共有三万多人。

熊克武认为他是回娘家，但南方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可不这么认为。当时蒋介石正率黄埔学生军在东江与陈炯明作战，广州兵力空虚，冷不丁冒出来的这三万大军对蒋汪而言，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

留守广州的汪精卫得到消息，说是熊克武已与唐继尧联络，有同南方政府对着干的企图，这让他更为紧张。在熊克武经过广西时，他便发信函给熊克武，要求“建国联军”停驻于广西，暂时不要来广州。熊克武接到了信函，但他并未停步。

接着，汪精卫又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招呼，欲借桂军之力，阻止川军前进。可李白二人唯一担心的是熊克武停在广西不走，只要熊克武没有这个心思，他们才不会轻易去得罪人呢！

“建国联军”一路行进，未遭到地方军队拦阻，但从湘西到粤北，沿途大多崇山峻岭，皆为地瘠人少的所在，在粮饷两缺的情况下，就算不打仗也会大量减员，以致部队抵达粤北时，仅剩下了两万多人。

即便只来了两万多人，蒋介石、汪精卫也觉得不好对付。恰在此时，他们又得到密报，说熊克武不仅派特使和陈炯明联络，还与其有书信往来。

蒋汪急忙与熊克武对质，熊克武解释说，他跟陈炯明联络，只是想一起劝陈炯明归降而已。蒋汪对此半信半疑，为了测试熊克武，他

们便提出让熊克武调兵增援东江前线。熊克武答应了，但“建国联军”去的地方并不是指定作战区域，而是几个较为富庶的所在，而且之后便来了个按兵不动。

这一轮试探结束，蒋汪以及南方政府的其他要人认定，熊克武即便不与陈炯明是同伙，也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建国联军”这哪里是在回娘家，分明是要乘我们在前线打仗分不开身，来借机夺权啊！

要打，作为南方主力的黄埔学生军正与陈炯明的部队交斗在一起，难以抽回，不打，又怕熊克武率先出手。众人急得团团乱转，文人政治家汪精卫更是显得束手无策，大家都只能寄望于一个人：从东江前线赶回的蒋介石。

我做第三者

除了没有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外，蒋介石的经历和熊克武其实极其相似，他们都是老同盟会员，在国内经历了各种兵火及阴谋的考验，早已是百炼成钢，区别仅在于，蒋介石的政治手腕比熊克武更高超。

能不打仗的事，就用不着打仗。蒋介石对熊克武说：“我过几天就要去前线指挥了，看熊先生何时有空，我约熊先生谈一谈。”

几句话便消除了熊克武的所有戒心，蒋介石设宴相请，他也欣然赴宴。席间，乘其饮酒大醉之际，蒋介石将熊克武及其随行的王子骞等人全部扣留，秘密关押于虎门炮台。

熊克武的“建国联军”虽有两万之众，但实际战斗力已很薄弱，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很快便自行瓦解。这支前身被称为蜀军、第五师、第一军，曾经在四川战史上显赫一时的军队就此永远消失了。

直到一年半后，熊克武才得以释放。此时陈炯明垮了，唐继尧亡了，北伐军已攻下南京，而熊克武的原有部属早已星散无踪，关押他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

虎门要塞是个低洼潮湿的地方，熊克武长期被关押，出狱时手脚麻木，已患有严重风湿症，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了。

有人曾把熊克武挑出来作为时代的标本。他曾经是不惜献出生命也要推翻清廷的热血青年，后来却慢慢地蜕变成了一个热衷于战争的军阀，再后来，人们就只能在混迹官场的政客中寻找他的身影了。

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一件事，不仅是熊克武，还包括但懋辛、王子骞……许许多多人。

在熊克武先后斗败刘存厚、刘湘、杨森，乃至成为四川版的西楚霸王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的大概只有“过瘾”二字。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他不是失势败离四川，不是中了蒋介石的计，他当然还会继续斗下去，因为这种瘾，他已经无法靠自己来戒除了。

还是那句话，当欲望失去羁绊，便成了毒品，它会一步步牵引着你，直到让你变成一个彻底的瘾君子。

熊克武兵败出川后，就数杨森笑得最欢。当时外界都认为刘湘和刘存厚最有资望收拾残局，他们一个现为速成系首领，一个曾是武备

系核心，二人又都担任过杨森的上司。早在部队向成都进发时，有人就问杨森，一旦获胜，刘湘和刘存厚之间，他会偏向谁。

杨森笑而不答。此人察言观色，忽然冒出一句："然则君自主之？"——或者你自己想做老大?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藏着，说出来可就难听了。杨森面红耳赤，立刻跳起来叫道："我做第三者，我做第三者！"意思是他用不着附依二刘中的任何一方，而完全可以成为除二刘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你们这帮没眼力见儿的家伙，怎么就知道二刘，不知道我杨某呢?

可是不管杨森有多生气，舆论导向依旧如故。部队占领成都后，连吴佩孚给杨森发电报，也问他认为二刘之中，谁更有资格成为巴蜀之首。杨森一边吞吞吐吐，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边又让他驻洛阳的代表前去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壮志。

吴佩孚明白了，是杨森想坐川中老大的位置。在吴佩孚眼中，刘存厚人老珠黄，他和他那个武备系早就风光不再了，刘湘虽有众望所归之势，但让人捉摸不透，甚至连以后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真要扶一个人上马，他只会扶杨森，之所以顾虑重重，是因为深知杨森有勇无谋，若贸然助其上位，反而可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

1924年5月，吴佩孚以北洋政府名义，授杨森为善后督理，刘湘、刘存厚为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看起来，杨森和二刘都没能抢到头把交椅，倒是水晶猴成了匹黑马。

其实这是一个暗藏私心的布局，善后督理拥有统率各路川军的职权，事实上就是以前的督军，吴佩孚这是要"扶杨抑刘"，除此之外，他又用徒有虚名的省长职务拉住邓锡侯，以牵制刘湘。

刘湘对此很不开心，想想看，若不是他复出督师，杨森根本就不可能打败并驱走熊克武，现在有功而不得奖，倒让昔日部下反超了自己，实在是既失落又没面子。不过刘湘同时也是一个很能忍的人，既然杨森已在成都走马上任，当下他便拿着委任状搬到重庆，来个眼不见为净。

一道搬出成都的还有邓锡侯。他要搬家不是对杨森不满，而是知道杨森的个性——此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跟他在一座城里共事会有的你好受，所以还是搬走清净。

看到大家都远远地躲着自己，杨森认为原因只有一个：羡慕嫉妒恨嘛！

在杨森看来，邓锡侯能做上省长，就该祖庙里烧高香了，这猴子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谅来不会再闹腾，不仅不会再闹腾，没准还不会容许别人闹腾，他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刘湘。刘湘这人深不可测，又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万一心理失衡，带着众人跟你往死里掐，那就不妙了。

有人说杨森有勇无谋，但这并不表示杨森没智商，起码怎么拉拢和讨好别人他还是知道的。当着刘湘的面，杨森大拍胸脯，表示刘湘在川东，他在川西，两人相互协作，一定能把四川“吃通”。为了证明自己说到做到，他特地把成都兵工厂制造的成品分出一半给刘湘，以示双方利益均沾。

新政

自从当了善后督理，掌握军权之后，杨森已经不甘心只扮演吕布的角色了，他还要试试做刘备是一个什么感觉。

杨森提出的新口号是“建设新四川”，他大肆招收归国留学生，并且给这些留学生全都挂上秘书头衔，帮其出谋划策。由于秘书实在太多，已超出正常规模，时人称“秘书连”。

“秘书连”当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筹划拿出了修建马路等各项新政。成都街道素来繁华，然而从没有马路这一说，普通市民的思想又都很保守，这使得马路修建事宜很难推行下去。杨森为此颁发命令，要求商户们锯去屋檐，缩进门面，以便好把街道拓宽成马路。

可是命令下达后，没人执行。杨森闻讯大怒：好好跟你们讲不听，派军队下去，强拆！

商户们见势不好，急忙公推“五老七贤”去督理署，呈请杨森缓拆。所谓“五老七贤”都是成都城里的名流，想当年成都巷战相持不下时，他们也曾从中调停，历届四川督军、省长，只要不想跟民间舆论过不去的，都要给他们三分薄面。

老头儿们来到督理署后，你一句，我一句，听到杨森头都要炸了，当即打断他们：“我现在拆一点房边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放上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随之暴喝一声，“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杨森大发雷霆，把自恃德高望重的“五老七贤”都给吓蒙了，一个个哆嗦着鱼贯而出。

再没人敢劝阻马路开工了，继“川中吕布”之后，杨森再得一诨号“蛮干将军”。某文人在小报上发表对联，加以讽刺：“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四川俗语中的开车，跟滚差不多）。”

然而也正因为有了“蛮干将军”的蛮干，成都才得以开天辟地地拥有了历史上第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十字交叉，中间还辟有街心花园，称得上新颖别致。马路修成后，杨森专门请一位清举人为其题名，这就是后来成都最繁华街道春熙路的由来。

杨森在观念上追求新潮，非常“崇洋”，认为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他本人拥有一个英文签名，并配有英文秘书，平时喜欢穿西装，吃西餐，就连子女要学中国乐器，他也表示反对：“有什么学头？如胡琴，就是瞎子算命要饭的东西嘛！”杨森说，要学，就学外国的乐器，如钢琴、提琴、黑管、长短号，那才叫艺术。

由于杨森喜好新潮事物，所以其新政内容虽包罗万象，但都离不开破旧立新的主旨。杨森让人制作成标语，抄录于木牌，然后钉在人们能看见的电线杆、树木和墙壁上。

这些标语颇具特色，因为前面一律要加一个“杨森说”：

“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足！”

“杨森说，不准蓄指甲，蓄指甲的行为既不卫生，又说明你懒惰！”

“杨森说，天天打牌，会把壮汉打死，但天天打球，可以使弱者变壮！”

“杨森说，夏天在公共场所赤膊是不文明行为！”

……

这些标语可不仅仅是摆着看看，供人一乐的，杨森有巡查队在街上负责巡查，对照语录，谁要是违反了，就得拉到一边打手心。

成都乃封闭老城，一些上了年纪或思想保守的人免不了在背后唾骂杨森，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瞎折腾，倒是很多年轻人对杨森极为崇拜，认为他做事有魄力，敢想敢干。

不管别人怎么说，杨森都一意孤行，干得十分起劲。只是能供他改天换地的地方实在太少了。除了成都，只有极少几个县，也就是他的驻兵防区，这让他很是不爽。

不行，我要统一四川，做真正的四川王！

统一对诸侯们而言最为敏感，最后免不了还是要大打一场。杨森命令兵工厂加班赶制武器，本来一天只能造一百支步枪，人为增加到一百五十支。他还让造币厂铸造成色较低的银圆和铜圆，以便能够多凑些军费。

银铜圆还好，反正是拿去蒙老百姓的，一时半会总能糊弄过去，武器不好就有人骂了。由于超出生产能力，很多步枪机件粗糙，让基层部队感觉是领了一根根擀面杖，但当部下反映枪支简陋时，杨森便说：等我统一四川后，再造好枪换给你们！

枪支好不好先搁到一边，重要的是可以招兵买马了，仅仅半年之内，杨森的部队便急剧扩充至十五万人。人一多，粮饷就紧张，“擀面

杖”又不能当饭吃，狭小的防区渐渐难以承受，杨森只能用“饥兵政策”来压缩粮饷，时人谓之“官长领衔，士兵吃米”。

本性

对于如何干掉川中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杨森肚子里自有一本账。其实也无非就是遵循自然界的通行规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先拣看起来最弱的灭起。

大鱼暂时是碰不得，如刘湘，甚至由于他在速成系中的影响力，最好还得跟他提前打好招呼。1924年秋，刘湘因回老家扫墓经过成都，杨森与之协商，提出要合作统一四川。

杨森要做的这篇文章早有铺垫，要知道，成都兵工厂的那一半枪支可不是白给的。刘湘也爽快地答应了杨森的要求，最后两人定下的策略是，由刘湘负责监视和牵制重庆附近的诸侯，杨森则就近向保定系里的小诸侯率先开刀。

倒在杨森刀下的第一个屈死鬼是刘斌。刘斌属于诸侯中最小、最弱的虾米，他的防区又与杨森离得很近，杨森于他而言，就犹如一只龇着利齿的超级大鳄一般，随时可能冲过来将他一口吞掉。刘斌光看看杨森的样子都觉得肝颤，为此，他不惜百般讨好杨森，不仅亲自到成都和杨森换帖子拜把兄弟，还主动把部分防地让给杨森，以求苟安。无奈这些举动并不能真正打动杨森，因为杨森要的是全部，不是部分。

杨森先找了个借口，免去刘斌师长一职，随后便向其发起进攻。刘斌自然不是对手，很快便如丧家之犬一样选择了出逃。可怜沿途还无人敢收留他，就连邓锡侯也不例外，自己不出面，仅派他的部属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敷衍一下，就把刘斌给打发掉了。

刘斌无奈下野，接下来的其余小诸侯也无一是杨森的对手，有人明知打不过，干脆就把自己的地盘许给了别的更大的诸侯。后者开始还很高兴，兴冲冲地赶来接收，但等到他们把旗子插上了城头，一看杨森大兵杀到，也只好立马卷旗走人，根本就不敢和杨森抗衡。

只剩下一个人还有与杨森一争的实力，那就是刘湘。刘湘曾与杨森约定合作统一，但现在两人已撕破了脸。

杨森不仅勇武上与吕布相像，在其他性格特点上双方也有得一拼，比如，喜好美色，小家子气。胡兰畦乃袍哥之女，才貌双全，是当年四川的名媛，身后自然是追求者云集。只是胡兰畦的性格跟女作家丁玲类似，明明是文小姐，偏要做武将军。因杨森“崇洋”得比较彻底，很得年轻人追捧，胡兰畦也是其中之一，杨森就利用这位女粉丝为他搜集军事情报，并许诺，一旦他打下成都，就送胡兰畦出国留学以为酬谢。

后来成都打下来了，杨森却对酬谢一字不提，反而通过老婆牵线，欲纳胡兰畦为妾。胡兰畦又羞又恼，说：“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是大袍哥，袍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

既贪色贪利又悭吝小气，这就是杨森的本性，对待女粉丝是如此，和政敌们打交道时概莫能外。比如，他当初答应从兵工厂分一半枪支给刘湘，就纯粹出于迫不得已，每当看到枪支运往重庆，都犹如

在剜他的心头肉一般。想想实在不甘心，杨森便在成品上做手脚，武器出厂时，质量较好的枪支上会烙一“A”字，由他提留自用，品质较差和粗陋一些的就送给刘湘。

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到后来他索性就食言自肥，吝而不予了。刘湘拿不到枪支，还纳闷呢，派参谋长来成都索取，杨森没好气地回应道：“刘湘不是有自己的防区吗，为什么跟我要？”

来人也是个一根筋，说我们有过口头约定，你不能毁约啊！杨森闻言勃然大怒，啪啪两耳光扇过去，跟着便将其推倒在地，准备狠揍一顿。经幕僚极力劝解，对方才得以抱头鼠窜而去。

刘湘同意与杨森合作统一，除了有让杨森冲前面打头阵的算盘外，杨森肯分他枪支，也是情面上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杨森过河拆桥的行为使得双方的关系日趋破裂，便逐渐开始针锋相对。

又奸又雄

杨森既以吴佩孚为靠山，刘湘也必须寻找自己的政治后台。

段祺瑞虽已以下野姿态寓居天津，但刘湘很清楚此老的潜力和资源，为此他专派特使前去天津拜访。一见面，段祺瑞首先问特使：“四川人才以谁为最？”

特使自然要抬举刘湘，于是回答：“川中人才实在很多，不过像刘湘那样大度包容的，只有一个。”特使要表达的意思是，四川的诸侯尽

管多如牛毛，如今风头最劲的也不是刘湘，然而刘湘能容得下这些人，所以他才有机会成为最后的王者。

段祺瑞沉吟片刻，答道：“能容不能断，此一大病。”

段祺瑞执政，如他的姓氏一样，以刚愎著称，擅长于“断”，他就怕自己扶持的人魄力不足，优柔寡断。在这方面，他也是有教训的，比如，当初他曾把赌注全都放在刘存厚一人身上，可是刘存厚犹如三国时的阿斗，总是扶不起来，结果枉费了他的一片苦心。

尽管对刘湘的能力尚存疑虑，但事实上段祺瑞除了收纳刘湘，已别无良途：刘存厚沦落成了废人，杨森投奔了吴佩孚，剩下的大多是小泥鳅，翻不出什么大浪。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南逃，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主持国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四川人事重新进行调整，杨森被任命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湘为川康军务督办，邓锡侯被免去省长职务，专任师长。

任命一下，杨森无动于衷，认为督办跟督理没什么区别，反正地盘都得靠自己去抢，于是想也不想就在成都就任了新职。邓锡侯则认为自己白“忍”了一场，之前杨森大动干戈，他之所以一直束手束脚，身为保定系首脑，连本系将领都不敢收留，说到底还是因为舍不得他的省长乌纱帽，没想到最后帽子还是被摘掉了。

杨森、邓锡侯都不知道，这份人事调整方案虽然用的是段祺瑞的名义，但幕后的构思和策划者却是刘湘。

杨森认为前后没区别，其实区别太大了，在职权上，杨森的四川军务督办和刘湘的川康军务督办不分上下，实际就是把刘湘提到了至少与杨森平起平坐的的地位。至于免掉邓锡侯的省长一职，却是想要解放水晶猴的思想，卸除他的包袱，以便让他舍得与杨森一搏。

谁才是川中真正的奸雄？答案不言自明。川人的评语："邓锡侯奸而不雄，杨森雄而不奸，刘湘又奸又雄。"

杨森想不到也没时间去琢磨这些。前段时间他通过灭掉一些小诸侯，虽然已使自己的防区得到扩展和延伸，但一打仗，所需粮饷马上又成倍增加，财源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即便造币厂能够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毕竟你还得提供最基本的银铜材料吧！

钱，得找钱，两眼发红的杨森看上了自流井盐税。

自流井原为刘湘的叔父刘文辉所控，其盐税是民国年间四川最大的财源，每年都达千万元之巨，远超其他一切税收。显然，要想截取自流井盐税，就必然要与刘湘为敌，这是肯定的，但杨森已顾不得这许多了，他毫不犹豫地就派兵接收了自流井。

事后刘湘果然大受震动，发电报向杨森进行质问，而杨森仅仅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饥军就食，别无他意。"穷极了，弄点饭吃吃而已，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弄点饭吃吃当然可以，但你这是从别人的饭碗里抢饭吃啊！刘湘立即密电段祺瑞要求处理，段祺瑞电令杨森交出兵工厂和盐税，同时调杨森入京。

杨森根本不予理睬，他自恃有钱有枪，要在川中横扫一切：诸侯不论大小，我给你们来个全灭！

原先杨森对统一四川并没有明确蓝图，也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但这时他的帐中又多了一位高人。此人叫黄毓成，乃滇军名将，与尹昌衡、罗佩金、刘存厚是士官学校同学（士官学校第六期），还曾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给朱德当过老师。

早期滇军中有“四气”之说，分别为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黄毓成的“勇气”、罗佩金的“二气”（意谓傻气，跟现在“二”的意思差不多）。为什么黄毓成会独占“勇气”呢？缘于滇军将领在决定是否讨袁之前，唐继尧犹豫不决，其他人也多持观望态度，只有黄毓成坚持说，要么讨袁，要么把我毙了，别无他法。在黄毓成的感召下，唐继尧这才下决心呼应蔡锷，加入护国运动。

黄毓成与杨森亦有渊源。对杨森而言，黄毓成是他的恩公，当年正是黄毓成把杨森从俘虏堆里叫了出来，并加以照顾，甚至如果没有黄毓成的鼎力推荐，杨森也不可能被赵又新重用。

在滇军将领中，黄毓成和顾品珍是一拨的，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害怕遭到报复和打击，就跑到四川来找杨森。

还用选吗

因为杨森曾杀掉赵又新，所以外界都觉得他忘恩负义，黄毓成赴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若杨某肯念旧日恩情，就顺势助他一臂之力，反之则另投他处。

杨森正在发愁，他的“秘书连”全是留洋学生，修马路搞新政倒是在行，唯独不懂打仗。黄毓成一来，顿时让他眼前一亮，立刻待之如上宾，不仅一口一个“斐公”（黄毓成字斐章），而且再三推黄毓成居于上座。

黄毓成大受感动，于是决定先留下来辅佐杨森，待帮助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后，再组织“定滇军”打回云南。

杨森勇武有余，缺的就是智谋，现在终于有人帮他来填坑了，这令他兴奋不已，遂专授黄毓成为督署总参谋长。

1925年4月12日，杨森发起了四川历史上著名的“统一之战”。在战事的第一阶段，他依照黄毓成之计，采取远交近攻兼分化拉拢的办法对付各个诸侯。这一计谋相当务实有效。在杨森率部出击时，诸侯们都坐而望之，互不支援。赖心辉气得不行，发求援电时张口就骂：“衮衮诸公，盘盘大才，拉我上去，一个不来，我若垮了，你怎下台？”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杨森占领七十二县，接连击败了刘成勋、赖心辉、刘文辉等各部，接下来矛头便直指刘湘。

面对杨森的步步进逼，刘湘急忙派人前去议和，但杨森置之不理。议和不成，刘湘只好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利用速成系的关系，转而策动杨森的部下和分化其内部。这一手相当有效，当杨森邀请众将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时，一些事先被买通的速成系将领便开始找机会为刘湘说话。

讨论会上，黄毓成提出，应继续对敌人采取分化瓦解之术，即以消灭刘湘为重点，同时拉拢邓锡侯和袁祖铭。袁祖铭是流亡黔军的头

目，在黄毓成看来，即便邓锡侯、袁祖铭作壁上观，只要他们不参与刘湘阵营，打刘湘就没有问题。

拉拢必须付出代价，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代价还小不了，蝇头小利别人是根本看不上眼的。黄毓成主张，应将兵工厂枪弹及盐税分给邓袁，在击败刘湘后，所夺到的防区、部队、军饷，也应与邓袁进行分享。换言之，就是让他们入股，有了这么大的股份，不信邓袁不上钩。

几个心中有鬼的速成系将领不敢说不打刘湘，但他们争辩说，何必分这么多好处给邓袁呢，我们要打刘湘，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邓袁如果识时务，就保持中立，若与刘湘结成一伙，便正好搂草打兔子，“一鼓而铲除之”。

杨森果然舍不得再割肉出去，他虽同意黄毓成去策动邓锡侯、袁祖铭，开出的却都是空头支票。

在说动杨森一毛不拔的同时，“内鬼”们还趁机表示，部队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需休整一段时间才能与刘湘作战。杨森觉得有理，既然大局已定，消灭刘湘只是早晚的事，何必急于一时，那就先坐下来歇一歇吧。

黄毓成苦苦谏言，杨森仍顾左右而言他，黄毓成的话全没听得进去。

杨森跷着个二郎腿，以为稳操胜券，刘湘却乘此机会上下打点。他亲自找邓锡侯谈话，而且承诺只要打倒杨森，以后速成系以外的部队可以全部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归邓锡侯控制。

邓锡侯是水晶猴，当然要盘算来盘算去。就在他尚犹豫不决之时，刘湘又马不停蹄地联络袁祖铭。此时黄毓成也派出了特使，且就驻于袁祖铭处，袁祖铭渐渐已被说动，但他要求至少须分得一部分自流井盐税。

特使没有杨森的授权，自然无法正面予以回复。杨森见袁祖铭没有回音，便派兵将黔军从部分防区里赶了出去，他的这一无脑举动非但于事无补，反而等于把袁祖铭又推给了刘湘。

与杨森截然相反，刘湘对袁祖铭是有求必应。袁祖铭说希望以后每月能拨给他军饷四十万元，刘湘满口答应，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提出，倒杨之后，将让成都兵工厂尽快打造两万支步枪及大量子弹，以帮助袁祖铭打回贵州和驱逐滇军，直至进攻云南。

何去何从，袁祖铭还用选吗？他写了封亲笔信给黄毓成，信中说：“子惠无联帅器识，公亦迹近明珠投暗之陈宫。”杨森根本就没有刘湘的器量和见识啊，您黄公也不过就是三国里那个足智多谋却错投吕布的陈宫罢了！

在袁祖铭这里得手后，刘湘马上告知邓锡侯。邓锡侯一听，立即决定助刘倒杨。

孺子不可教

邓锡侯、袁祖铭统统变成了敌人，杨森这才有些着急，他托人转告邓锡侯，说愿送他一批钱和枪弹，然而为时已晚。

1925年7月，刘湘、邓锡侯、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向杨森发起反攻。

杨森震怒不已，欲举兵相应，进攻重庆。黄毓成连说不可："我急则敌合，我缓则敌分，如今应采用持久战略，联军久拖不决，内部必然分化，到时可各个击破。"

杨森哪里忍得住，等什么等，看我一拳把他们全给揍趴下。

不料联军早已蓄足了力量，杨森一拳打过去，差点把他自个的腰都给闪了。杨森这下坐不住了，他披挂整齐，决定亲自到前线督师。就在他离开成都的当天，留守后方的"内鬼"之一便挂起了反戈的旗帜。

这名"内鬼"名叫王缵绪，是杨森的主力师师长。刘湘给了他盐运使作为交换条件，但王缵绪说，他可不光是为了这份美差才会叛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认为杨森有罪在先。

罪状之一是厚此薄彼。杨森用人不拘一格，一些年轻军官原先资格不如王缵绪，也很快就升到了同一级别。王缵绪对此牢骚满腹，他对人说："杨汉域（杨森的侄子）才当个骑兵团长，团部却存有四十万颗子弹，为我们远远不及，看来我这个师长连团长都不如。"他还作诗说自己"虽无卫霍功，却称干城将"，但杨森"用人如积薪，后来应居上"，是不把他这种老前辈放在眼里。

罪状之二则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在川军将领中，杨森以老婆多、子女多出名，究竟有多少，他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反正是"老婆成排，儿女成连"。某天，两人私下吹牛闲聊，王缵绪问杨森："督理，你讨那么多老婆，不怕她们争风打架吗？"

杨森嘿嘿一笑，十分得意："养老婆如养马。要骑，牵来，不骑的话，就拴在槽上，她们要争风打架，我就用马鞭子抽。"

王缵绪就说，杨森对待同床共枕的老婆都如此刻薄，还会对部下好吗?

王缵绪对杨森的不满的确由来已久，但杨森一点都看不出，还以为王缵绪是个忠臣。原因在于王缵绪很会伪装，他给自己文身，左臂用针刺上"森"字，然后涂上蓝靛汁，使其渗入皮肤。与此同时，他命令属下官兵们也得每人都刺一个"森"字。

针刺固然很疼，可这就叫苦肉计，以此显示对杨森的效忠。杨森也真的以为王缵绪对他忠心不贰，出征前特地将后防重任赋予了王缵绪。

听到王缵绪倒戈的消息，杨森如闻晴天霹雳，一时六神无主，对众人说："王治易（王缵绪字治易）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

见杨森阵脚大乱，刘湘乘势指挥联军发起全线总攻。杨森发出通电，说他"非不能战，实不愿战"，把乱七八糟的军队全部丢给黄毓成整理，自己仓皇逃离。

黄毓成率几万主力军被联军包围于嘉定（今乐山市），他主张强行突围，但将领们暗中都已凭借同乡同学的关系，与联军方面牵上了线，均不愿再打仗。黄毓成回天无力，只得躲进峨眉山的寺庙，随各部自行其是，这就是统一之战中的嘉定缴枪事件。

因黄毓成在护国战争中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有旧，联军方面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专程派人请他下山。黄毓成联想到自己过往的所有努力均化作东流之水，不由得痛哭流涕，当着来使的面，他一边哭一边大骂：“子惠（杨森）孺子不可教！”随后，把他几十年来随身携带的一方翠玉私章掏出砸碎，发誓从此再不做军人，只愿去上海做寓公终老一生。

已经逃走的杨森早已脱去军服，换上便装，灰溜溜地离开了四川。当他来到汉口的时候，与正准备前往上海的黄毓成巧遇，杨森又羞又愧，开口闭口不离“斐公”二字，还让手下招待黄毓成住进高级饭店。

不管怎样，杨森统一四川的迷梦是彻底破碎了，他从此也再不能在巴蜀称王。在杨森失败出川之后，有人嘲以诗云：“十万雄兵出简阳，一王战败一王降，一王送出夔关外，回首巫山泪两行。”

第六章　真命天子

统一之战结束后，按照惯例得开善后会议。川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均称之为“分赃会议”。

说到分赃，刘湘首先得践诺，也就是兑现他先前对邓锡侯、袁祖铭的许诺，水晶猴比较好办，麻烦的是袁祖铭。

四川议会鉴于内战不歇、诸侯割据的现状，一致提出议案，要求将兵工厂改为实业工厂，立即停止制造枪弹，同时禁止各军自由筹款。这一议案虽然并不是针对袁祖铭一个人，但明显袁祖铭最吃亏，因为这意味着刘湘答应他的军饷和枪弹都得打水漂了。

刘湘事前并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变化，可是袁祖铭不管这些，他认为刘湘是故意想赖账，便派兵对刘湘进行监视，最后在刘文辉的保护下，刘湘才得以离开成都，以扫墓之名避往大邑。

刘湘走后，袁祖铭犹不解恨，紧接着跑到重庆，将刘湘公署予以占领，所有在渝川军的枪械均被其收缴，此事件被称为“渝变”。

刘湘的嫡系军队大多被隔离在川东，临时收编的杨森部队尚不能做到完全掌握，而邓锡侯之类猴精猴精的人在态度上又模棱两可，一时之间，刘湘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正在顿足叹息之际，逃亡在外的杨森却意外地派人找上门来，表示川人应一致对外，他愿意指挥旧部，与刘湘合作驱袁。

杨森是什么样的人，肚子里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刘湘当然比谁都清楚。他曾经想过要喂饱杨森，然而事实证明，杨森不愧是现代吕布，他的胃口是填不满的，除非你自己让位下野。

很明显，即将开始的合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甚至于引狼入室。刘湘思虑长远，但他麾下的将领们大多考虑不到这一层，只认为此一时彼一时，若从军事着眼的话，刘杨夹击袁祖铭甚为有利。

段祺瑞评论刘湘“能容不能断”，真是一语中的。他明明心里不想让杨森入川，但看到这么多人附议，就深怕别人说自己心胸狭窄，局面都如此濒危了，还惦记着原先的仇隙不放。

那就合作吧，刘湘宣布，凡统一之战后收编的杨森部队，一律归还杨森，同时在合作收复重庆后，两人可共驻重庆，川东地区也将完全交由杨森驻防。

我回来了

都说刘湘宽厚能容，真是名不虚传，杨森喜不自胜。统一之战失败后，他不恨刘湘，毕竟你先进攻人家嘛，他恨的是袁祖铭，要不是这厮临时投靠刘湘，我可不就大功告成了?

1926年3月，杨森到达万县，随即发了一个电报给其旧部。电文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回来了。”

凭其擅战之名，杨森在亲信部队中仍然很得人心。接到电报，杨汉域、范绍增等六支部队约定日期，迅速假道前往万县，这就是川军

史上的“六部东下”。

六部东下时，袁祖铭丝毫未进行阻拦，不仅不拦，他还下令沿途各县为之提供粮草，就差敲锣打鼓迎接了。原来袁祖铭一直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刘杨密约的内情，竟然还天真地以为六部东下是杨森在挖刘湘的墙脚，两人又要准备干仗了。既然他已经和刘湘翻了脸，对于这种事当然是乐观其成。

袁祖铭希望能帮助六部尽快到达万县，以便能早一点看到好戏上演。好戏果然上演了，但不是杨森跟刘湘打，而是杨森、刘湘把他袁祖铭夹在中间一顿痛扁。

袁祖铭被迫退出四川时已是鼻青脸肿。事情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本来道理都在他这一方，可惜此君过于矫情，得理不饶人，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弄到了灰头土脸的地步。

驱袁战争结束后，刘湘先一步到达重庆，众将都提议去万县将杨森接过来。这些武将笨头笨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谋士们可憋不住了，赶紧把刘湘拉出帐外并力陈利害：“自古二雄不能并存，杨森真的来了，他的职权何以处置，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有一句话忍着没好意思说出来：婚前天使，婚后恶魔，你们哪一次不是如此？！

刘湘也正为这事犯愁，只是觉得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不能不讲信用。当然了，春秋无义战，江湖上混的，究竟有谁真正讲过信用二字呢？但刘湘不同，他跟刘备一样，打的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招牌，自己不能砸自己的牌子呀！

刘备当年入蜀前，其实一心想要抢夺人家的产业，可表面还得装正人君子，为此只好一直在四川的大门口徘徊来徘徊去，那个纠结。如今的刘湘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听完谋士的谏言后仍然犹豫不决。

杨森在重庆等着刘湘派员来迎，可是好多天过去了，连根毛也没等着，一股无名之火噌噌噌直往上冒。他放出话来，说将率六团之众自己来渝，不要你们接了！

在渝文武百官又来找刘湘，说你看你看，我们说早点去接吧，难道非得把人逼得下不了台才罢休吗?

刘湘仍然举棋不定，不接不好，接也不好，只是一个劲地对身边谋士说："事急矣，奈何？"

谋士们开碰头会，再度向刘湘剖析其中的利害得失，刘湘这才下定决心要把杨森拒之门外，可他还是觉得这话不能从他这个"仁义君子"的嘴里说出来。

为了照顾刘湘的形象，按照事前安排，一个谋士在军事会议上发言，说："刘杨合作，自然之事也，既然这样，那么重庆的部队就是刘湘的部队，也等于是他杨森的部队，又何必率六个团来重庆呢，这算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武将们一片嘘声，认为谋士在胡扯。大家都带兵打仗，谁进城上任不得武力护卫啊，尤其杨森这样的纯武将，又不是文人，完全可以理解。

会上刘湘做出一副人云亦云很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像被无数猫爪子在挠，暗自着急啊。谋士把刘湘拉到一旁说：“实在没办法了，你要再不出手阻止的话，杨森就真要来了。”

刘湘也知道不能再躲在一边了，这才把面具摘下，以直辖部队全体将领的名义发表电文，把杨森来渝的路给阻死了。

杨森不能来渝，当然不开心，但杨森其人虽刚愎蛮横，却也不是刘湘那种扭扭捏捏、故作姿态的人，换句话说，他如果真要做小人，马上就做了，绝不会把自己打扮成一君子。

杨森去重庆，肯定是要赶刘湘走的，这没二话说，然而仔细一掂量，若是真打起来，自己未必就干得过刘湘，那还不如顺水推舟，先留在万县做个“万县王”，以后再慢慢计较了。

于是乎，杨森驻万县，刘湘驻重庆，两人与其他速成系诸侯们共居川东，而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则为邓锡侯、刘文辉等保定系诸侯所居，大家彼此对峙着，四川又进入了新的春秋列国时代。

我得管管这件事

万县是四川的一座江边城镇，常有外轮沿江来去。一天，杨森的一个师长在江岸候船，适逢英国商轮路过，就带着几个卫兵上了船，谁知一上船，卫兵身上的武装便被护航英军给解除了。

师长脸面大失，回来后将这件事告诉了杨森。杨森闻之很是恼火，说：“欺人太甚，奇耻大辱！外国船只在我们中国的内河航行，还

要缴中国人的枪，这是什么逻辑？我管你英美日俄，记得别犯在我手里，否则有你们的好看！”

1926年8月29日，杨森的宪兵押运盐款，准备搭英轮去万县。他们雇了三只小木船，欲通过小木船将装银圆的几十只箱子送上英轮。这艘称为“万流”的英轮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乘客登岸后，既不等小木船靠拢，也不发出信号，便加大马力驶离，结果所有木船都被撞沉，官兵被淹死四十多人。

川江江面狭窄，水急滩多，但英国轮船丝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安全，任意加快速度，此前已撞沉过许多木船。现在即便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故，“万流”仍然毫不在意，抛下撞沉的木船和落水之人后，便径直驶往万县。

杨森得报既惊又怒，拍着桌子大吼道：“英国人竟敢跑到中国内河来横行霸道，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我得管管这件事！”他马上派检查队登船，追查肇事原因。

英方闻讯，也连忙通知停泊在万县的英国海军军舰前去予以阻止。英军登上“万流”后，强行解除了检查队的武装，其间又开枪射击，导致两名中国士兵受了重伤。

在英军的纵容下，肇事的“万流”离开万县，继续做它的生意去了。英国海军军舰则卸去炮衣，将炮口对准江岸，做射击状。

“万流”虽离开了万县，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杨森另将两艘名为“万通”“万县”的英轮扣住，不准开动，同时向驻重庆的英国领事提出交涉，要求赔偿损失。

中英进行谈判，杨森亲自出面与英国领事谈，但双方连谈几天都谈不拢，英国人始终不肯做出赔偿。正在这时，杨森从袍哥那里得到情报，说有一艘名叫“嘉禾”的英轮被改漆颜色，加装机枪大炮，似有劫走被扣轮船的企图。杨森不信，连说：“他敢！他敢！”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下令沿岸加强监视。

9月3日晚，英国武装轮船“嘉禾”真的驶来了万县，鬼鬼祟祟的样子，使袍哥提供的情报得到了验证。杨森一边迅速向被扣轮船调派军队，一边在沿岸构筑掩体，部署防守。

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表面虽仍宣称要和平解决，暗地里却在调兵遣将。5日，在两艘英舰的配合下，“嘉禾”实施强行劫船行动，突然朝“万通”猛冲了过来。

“嘉禾”上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出击时机上经过精心策划，在他们展开行动时，“万通”上的中国军人正在吃午饭，待到发现英军企图，“嘉禾”已经逼近。随后，英军猛砍系轮缆绳，并用铁钩将被扣两船钩住，同时鸣枪警告，威逼中国军人撤离。

见中方坚不肯退，英军端起机枪便进行扫射，当场打死了两名中国士兵。“万通”舱内的中国军队忍无可忍，立即开枪还击，岸上的守军见状也冲上“万通”，两军合兵一处，向英军呐喊冲杀。

交战中，英军的一位副舰长被打死，陆战队士兵也被击毙多人。这种情况下，“嘉禾”本来应该撒腿就跑，但由于原计划中没有逃跑一项，准备不充分，加上部分英军士兵已经登上“万通”，需要重新接到“嘉禾”上来，所以导致其进退两难。

看到“嘉禾”陷入窘境，对其进行配合的另外两艘英舰忙一左一右冲上前来进行掩护。杨森得报，亲自赶到江岸指挥作战。他的侄子、手枪团团长杨汉印带领着水上敢死队，两人划一只小船，人手一把二十响驳壳枪，在两艘英舰的缝隙间穿梭来去，不停射击。英舰大而笨重，掉头不便，而且由于相互距离较近，还击很是困难，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被动挨揍。

得不到充分掩护的“嘉禾”左躲右避，老是无法靠拢“万通”。“万通”上准备撤退的英国兵把脚一伸，没有跨上船，却失足落进了江里。江水湍急，加上江面上子弹横飞，有的英国兵掉下去后就淹死了。

宝刀携出征

尽管英国在列强中的排名早已下降很多，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尤其在亚洲，仍然是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哪里吃过这种亏。恼羞成怒之下，两艘英舰护卫着“嘉禾”退至江心，并悍然使用国际上禁用的燃烧弹对万县城内施以炮击。

川军虽然也有火炮，但跟新式洋炮相比，已经相当落伍，还击时很少能击中目标，只有“嘉禾”挨了两炮。

英舰只顾放炮放得欢，不留神一颗炮弹落进法国教堂，把钟楼给击毁了。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法国人岂是好惹的。停在附近江面的法国军舰立马卸下炮衣，开过来对着英舰突突就是两炮，不偏不倚地正中英舰船尾。英舰被炸得冒出浓烟，在拉了一声长哨后，乘着黄昏往下游逃走了。

在当天的枪战中，英军遗尸十三具，这尚不包括淹毙和被打死在英轮甲板上的陆战队官兵。中国军队也伤亡了三十余人，一名军官小腿受伤，长统马靴被子弹打穿了好几个洞。

相比之下，万县民众的损失最大。在英军舰炮的攻击下，很多无辜老百姓被炸死炸伤，民居也被焚毁四百余家，这就是“万县惨案”。

1926年9月10日，杨森就“万县惨案”发出通电，在四川乃至全国掀起了对英示威游行的风潮。具体方略上，杨森向北洋政府请示，得到的答复是继续谈判。

因为在“万县惨案”中也死伤了许多官兵，英国外交部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惩肇事者。北洋政府推托自己管不了杨森，让英方直接和杨森进行谈判。英国人只好继续找杨森谈判，谈判桌上，他们扬言将加派驻宜昌的五艘军舰来川。杨森听后，立即决定在长江两岸设置炮兵阵地，并计划在三峡江面上布放水雷——欺负我没军舰是吧，试试我的火炮和水雷，看是不是吃素的！

布置完后，杨森当众表示：“英人野蛮成性，竟然能干出炮击万县这样灭绝人道之事，幸好被我击退了。倘若再来川反扑，杨某誓当一个不留，将他们灭个干净，以雪国耻而惩强暴！”

万县的某些胆小士绅，害怕英军再度来攻，从而造成比“万县惨案”更大的损失，因此都跑来劝杨森对英人服软。杨森把眼睛一瞪：“我死以后，你们再去讲和好了。”

英国人说要加派军舰，不过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把戏，见杨森动了真格的，甚至有要拼命的架势，反而撑不住了，他们要求与北洋政府直接谈判，以便尽快解决事端。

9月16日，北洋政府派代表与英方在军舰上举行谈判，最终英方同意赔偿中方损失并保证约束英舰。

协议达成，英方便想要回被扣船只及英军尸体，杨森却拖着不肯给，一定要英方先赔偿他的损失（即沉船部分）再说。

杨森粗中有细，协议上说的赔偿，是说互相赔偿，也就是英方须赔偿中方在“万县惨案”中的损失，但反过来，因为两艘英轮被扣，影响了它的生意，中方也得把这笔钱赔给英方。

这是一笔细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算，可是中国政局向来比伦敦的天气变得都快，明天都不知道是谁当家，如何等得起。杨森很清楚，如果他现在不拿点过来，随着时间的推延，赔偿或许将不了了之（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一直拖到年底，见杨森死活不肯让步，英方不得不暗中先把赔偿金付给杨森，这才得以领回被扣船只和尸体。

杨森这么干，似乎英国人应该对他切齿痛恨才对，可是恰恰相反，对方认为杨森是个勇敢的东方军人，对之又敬又畏。英国海军扬子江舰队司令推度少将一定要见见这个传说中的“杨森将军”，为谋一面，不惜请万县的洋牧师牵线，特地登门拜谒。甚至有一位英国高层军官因为仰慕杨森，还将他的一只狗取名为“杨森”（不要误会，中西文化不同，洋人给爱犬起人名绝不是糟践，而是为了表示尊敬）。

杨森曾给所属部队撰写十首军歌，其中一首为：“男儿乘风破万里，最好沙场死。国辱未雪怎成名，宝刀携出征。”川中吕布其实可爱之处甚多，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今后将会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御侮战

役，但当意料之外的“国辱”不期而至时，仍然不假思索地抽出了宝刀。壮哉！

重新起步

杨森在万县拔刀起舞的时候，重庆的刘湘正一筹莫展。

偶像不是那么好学的，刘湘虽然成功地在世人面前塑造了宽厚能容的形象，但他由于许诺给别人的好处太多，相应给自己留下的面饼也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了。

为了对付袁祖铭，刘湘原有的地盘一分为三，在杨森、刘文辉拿走其中的两份后，他自己只剩下巴县、璧山和重庆，几乎已由大诸侯沦为小诸侯。因刘湘字甫澄，甫与虎谐音，时人便戏称他为“巴壁虎”或“巴子国王”。

刘湘属下军队有十一个师，地狭兵多，刘湘供养不起，只能考虑缩编，可是一个命令下去，谁也不予理睬。更有甚者，武将们也渐渐不把他当回事了，各师用人皆自作主张，要用钱了，事前不经请示，便自己向税务机关提款，完全把刘湘当成了一个傀儡或泥菩萨。

是人都有个性。刘湘再黏黏糊糊，也忍受不了如此对待，气得他甩手就走：不干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刘湘脾气温厚，导致他在的时候，众将看见他犹如看见空气一样，不觉得有多么重要，没想到他这一走，倒反而把分量体现出来了——除了刘湘，剩下来的人谁也撑持不了局面。

大家急忙四处寻找刘湘，后来发现他躲到重庆对岸的日本纱厂去了，而且说什么也不肯复出。部下们赶紧承诺，以后都听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军队全部交给你改编，用人用钱，完全听命！”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刘湘方才转怒为喜，从纱厂里走了出来。之后他把十一个师缩编为四个师，不能当师长的降为旅长或改任他职，经过一番调整，总算是缓解了危机。

只是他未来的道路依旧漫长。

当年刘备创业一直殊为艰难，但他感到最艰难的时期，恐怕还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寄身荆州，对着刘表长叹功业不建，乃至“潸然流涕”之际。那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山峰，而且想要攀爬上去，然而已明显力不从心，其内心之痛苦与不甘完全可以体会得到。

刘备经常哭，他的哭往往被认为表演痕迹过重，不过可以相信，他在荆州流下的眼泪绝对饱含真情，甚少掺假。

假如刘湘还是个小兵，或者普通军官，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服从指挥，其他根本就不用操心。难的就是在他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并且还生出了不甘雌伏、一匡天下的雄心之后。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做着这同一个梦啊，结果却大多落得了身败名裂、铩羽而归的下场。

想那刘存厚离目标已经近在咫尺，谋士甚至连“隆中对”都给他端出来了，仍然功亏一篑，还被川人笑话成了“刘厚脸”。刘湘无疑比刘存厚更有资格接近历史上的皇叔，但谁又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在躲进纱厂的那一刻，盘旋在刘湘脑海里的，或许就只有现实的困扰和前途的渺茫了。

还是翻开那本经典的《三国演义》。就在刘备去荆州的这一章节里，故事又有了新的发展，只不过，命运对主人公的要求不是变得宽松，而是更为苛刻了——刘表听了老婆的话，连荆州都不让刘备待，用新野便把他给打发掉了。

新野仅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县城，而且还与曹操的疆界紧挨着，曹兵想过来的话一眨眼就能过来，你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刘表的借刀杀人之计。刘湘的地盘当然比新野要大，然而也大得有限，由于被强邻们包围，同样存在着被外界一口吞噬的可能。

他们面对的处境都不是一般的艰难和危险，几乎就是绝境，但刘备事业腾飞的新起点恰恰就在新野，而刘湘也决心从“巴子国”重新起步，别人称他是“巴壁虎”，他不仅不认为是讽刺，还暗暗以“龙虎”自许，并誓言要“奋发图强”。

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像刘备曾经做过的那样，刘湘极力从四方招贤纳士。他派重庆卫戍司令兼铜圆局局长王陵基为代表，专赴北京，从北京各校招纳川籍学生回川效力。

王陵基出身行伍，并非搞金融的专才，让他担任铜圆局局长，实在是勉为其难。自上任之后，几乎是月月蚀本，一查账，已尽亏四十五万两纹银，眼看快亏到连家都要不认识了。

王陵基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都说铜圆局是个肥缺，随便哪个人当局长都能发财，偏偏我当局长就赔钱，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霉

星。”

有个回川效力的北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向王陵基推荐了自己的同学刘航琛，说他是读经济的，现正在县中学当校长，能否叫来一试。

一个年纪不大的白面书生，能有多大本事？王陵基半信半疑，正好他在重庆还办有一家报纸，也是月月亏本，负债已达四万五千元，快要揭不开锅了，于是便安排刘航琛先去接管报社，准备看看效果再说。

刘航琛来了之后问王陵基：“假如我接管报社，你对我有什么要求？”王陵基一挥手：“只有一个要求，以后别再跟我要钱了。”

几天之后，刘航琛拿了一张四万五千元的银票交给王陵基，说：“报社欠你的账从此一笔勾销，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如其所言，报社很快走上了盈利的轨道，而且真的没有再向王陵基要一个子。王陵基大出意料之外，一了解，包括刘航琛交给他的银票在内，所有收入都是报社从正常渠道经营所得。

见年轻人居然如此能干，王陵基又惊又喜，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他当即任命刘航琛为铜圆局事务所所长，代他整顿铜圆局。

刘航琛籍贯四川泸县。泸县以生产大曲酒闻名，刘航琛的祖父一手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所以刘家称得上是经商世家。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商业氛围中的刘航琛而言，经营报社确实只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

刘航琛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也很用功。就读北大经济系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兴起，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争先恐后地上街游行，只有刘航琛坐在课堂里做功课，别人怂恿上街，他说了一句“何必多事”，又继续埋着头看他的书。

刘航琛的性格，注定难以叱咤风云，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实用型人才。临近毕业时，他交出的毕业论文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以至于批阅论文的系主任都不知道论据究竟引自哪本经济学专著，对刘航琛称赞不已。

刘航琛从北大毕业后有着很多不错的选择，但唯一不能选的是仕途，因为刘航琛的祖父定有家规，不许子孙做官。在这位老人看来，做官的人奴颜婢膝，俯仰由人，活得也并不见得有多开心，倒不如有钱在手，不做官也可以一生享福。刘航琛恪守祖训，选择了回乡从教，为此曾多次拒绝地方军头的入幕邀请。

在此期间，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刘航琛。他祖父在经营本地曲酒时，发现天津生产的玫瑰露酒很畅销，就自己买了一套蒸馏器，用以钻研出蒸馏技术，从而制成了品质超过天津露酒的“百花露酒”。当时四川酒大多用瓦罐盛装，只有刘家别具一格地改用玻璃瓶装酒，这一大胆创新使得百花露酒一举成名，其销量和口碑仅次于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曲酒品牌“温永盛”。

烟酒都要缴税，重庆的烟酒税征收局长是个糊涂蛋，他将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全都要课以重税，百花露酒也在此列。刘航琛到重庆进行申诉，在递给局长的申诉书中，他写道：“钧座所订章程，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假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洋人，可乎？”

局长读后大发雷霆，立即下令查封“爱人堂”重庆分号，并且还要逮捕刘航琛。

刘航琛迫不得已，四处托人说情送礼，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件事对刘航琛打击很大，让他深感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光教书而不入仕，极可能一事无成。

受命整顿铜圆局，让刘航琛得到了入仕的机会，也终于使他得以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智慧。

你是要我帮忙还是帮办

清末民初，通用货币都是银圆或铜圆。由于连年征战，四川铜圆的铸造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据说每年都出产亿枚以上。川中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如此消耗，重庆铜圆局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铸铜圆没材料，有了材料，好不容易铸出一点，投放市场后又获利微薄，还不如不铸。

四川没铜了，刘航琛就去上海买。当时市面上流行“二百文”面值大铜圆，他便将一枚大铜圆改铸成五枚小铜圆，面值仍为“二百文”，取名“新二百文”。买铜的钱款不需铜圆局掏一个子，全是刘航琛让知名钱庄垫的资，“新二百文”铸出后，铜圆局也不直接经营，而是让该钱庄负责包销。

“新二百文”很快打开了市场。货币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一开始，由于“新二百文”分量减轻，“老二百文”相对就值钱，人们需要用钢刀将“老二百文”切割成两片或四片使用，但这样以后钱币变得既难

看又不易携带，久而久之，“新二百文”成为主流，不仅川人乐用，还流行于西南各省。

刘航琛给铜圆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履职的第一年，铜圆局便扭亏为盈，不仅弥补了所有亏空，而且还净赚纹银九万多两，把个王陵基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王陵基赚到了钱，便把刘航琛举荐给刘湘。刘湘也正为此头疼，他的财务主管连换两任，都搞不下去，财政方面已负债达八九百万元，一时拮据到什么事都办不了，倒并不是经办的人滥竽充数。两个被迫离职的财务主管，一个随刘湘理财多年，另外一个是张澜所荐，也一向以理财见长。他们之所以束手无策，实在是因为当地的经济太差了。整个“巴子国”内，也就重庆作为四川当时唯一的通商巨埠，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但由于受战争拖累，也已经很不景气了。

一见到刘航琛，刘湘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你来，不是喊你来做官，是要你和我共事业。”

“共什么事业？”

“统一四川！”

刘航琛提了个问题：“你是要我帮忙还是帮办？”

刘湘来了兴趣，“帮忙如何，帮办又怎样？”

刘航琛说，如果是帮忙，一切还是你自己做主，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要叫我帮办，那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刘湘让他放心："肯定是帮办。能够替我盖章的人很多，我又何必来找你。"

刘航琛："那么，我想问一问，甫公（刘湘字甫澄）在财政上能给我多大权？"

刘湘笑了："我也想反问一下，让你办财政，我有哪些权，你有哪些权？"

刘航琛："甫公有两个权，第一，如果我舞弊，甫公对我有枪毙权。第二，如果我不称职，甫公有随时罢免我的权。除此之外，财政上的所有权都是我的。"

刘湘沉吟片刻，说："可以！"

刘航琛走马上任，得到财政大权后，首先朝收税机构开刀。"巴子国"虽小，各种各样的捐税机构却多如牛毛，机构负责人大多是师旅长们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把玻璃瓶装酒当洋酒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导致在机构开支庞大的同时，效率反而奇低。刘航琛为此成立了重庆税捐总局，并从刘湘手里请来尚方宝剑，将富余机构和人员全部砍掉，实行"苛而不扰"，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员来回奔波的麻烦，另一方面也节省出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比节流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开源。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刘航琛决定效仿当时的南京政府，通过发行库券公债，来实行"以债还债，以债养债"。

起初公债发行并不顺利。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持有者把债券当成烫手山芋，竞相出售，结果导致卖出的人多，买进的人少，被刘

航琛寄以厚望的新兴行业几乎成了有卖无买的单面生意。

见势不对，刘航琛赶紧说服金融界中的银行和钱庄进行认购。可是银行钱庄的胆子也不见得比一般证券持有人更大，川中连年混战，谁也不知道刘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不小心被人家给并掉了，这债券岂不等同于废纸？就算有人肯认，起码也得打不小折扣吧！

大多数人都不敢动，勉强认购一些的，也不过是看了刘航琛的面子，狠狠心，赌刘湘下次打仗能赢而已。

面对债券滞销的不利局面，即便是刘航琛这样的理财高手，也急得直抓自己头发，不过抓着抓着，一个灵感突然被他抓了出来。

神仙下凡

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镇江金山寺，看到长江上船只来来往往，热闹非凡，他就问寺中高僧，江上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

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

乾隆甚为不解：你就算扳着指头数不过来，也不至于告诉我这个答案吧。

高僧之所以为高僧，确非普通人可比，他的解释令乾隆也有醍醐灌顶之感：“我看到的就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上来来往往的无非是这两条船而已。”

名利，名利，其实名最终也是为利。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早就在《史记》中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不，大伙儿整天忙忙碌碌，要死要活，还不都是奔着一个利字去的，尤其是做生意的人，绕来绕去更是离不开利。

刘航琛想通了，要想使债券畅销，费再多口舌都是没用的，只有以利诱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他决定把债券打到七折甚至是六折，同时大幅提高利息，有的高达月息一分二厘。这些债券一面市，刘航琛即让刘湘所属的自有银行和钱庄带头认购，给外界造成的印象就是再不买，马上就会脱销了。

商家们果然都红了眼，纷纷上前抢购，证券所连发几次债券皆抛售一空，自此，债券的路算是走出来了。

刘航琛发行债券是为了应急，化远期款为现款。他是学经济的，懂得实业才是根本，否则就会摧毁信用基础。

民初的军头们大多把商人视为唐僧肉，割一块就走，全不管对方死活，刘航琛不是这样，他不对商人进行强行勒索和敲诈，而是看准机会，自己进行投资。他投资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因为到处"搭架子，打楔子"，有人将他比作四川工商界的木匠。

刘航琛在商海纵横驰骋二三十年，但向来只以同业（即同行）面目参与竞争，从不倚仗红顶商人的官势压人。更为难得可贵的是，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该自己的钱拿，不该自己的钱如数交账。他在外面为刘湘做采购，曾经得到二十万佣金，回到重庆后如数交给刘湘，坚决不入私囊。

在刘航琛这个财神爷的辅助下，刘湘晚上终于可以抱着金娃娃安心睡觉了，他也终于有勇气回味一千多年前飘荡在新野大地上的那首民谣：“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三顾茅庐是《三国演义》“新野篇”里的关键情节，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孔明诸葛亮，他的事业也才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自从有了刘航琛之后，刘湘自觉要缺，也就缺一个神机妙算、能够安邦定国的活诸葛了，毕竟刘航琛只能在经济领域如鱼得水，军事政治上帮不了他什么忙。

刘从云的名字早就传进了刘湘的耳朵。此人不仅是神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神仙”。据说他上通天文，下谙地理，袖藏乾坤八卦，能知过去未来，那真是才如诸葛，智赛刘基。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刘从云其实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之所以暂隐凡间，为的是等候真命天子礼聘他做军师，以便襄助对方一统天下。

说句老实话，当初从速成学堂毕业，几乎没有人能料到刘湘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那个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就是预言他前程远大，怎么样，真的应验了。

前程远大跟真命天子能不能画等号，刘湘急盼着再找一个人来算一算。既然刘神仙也在寻找真命天子，岂不正好？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刘从云，邀请他来重庆作客。

写完了信，刘湘有没有做好三顾茅庐的准备，外界无从知晓，人们知晓的只是刘从云接信后马上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演义毕竟是演义，在现实生活中，大吏委屈自己，礼聘贤才的情景差不多早就绝迹了。这一点，连“神仙”都清楚，所谓过了这村就没

了那店，还是主动点好。

一见到刘湘，刘从云就失声大呼：“我今天遇到真命天子了！我要做军师，辅佐督办，平定天下，统一中国。”接着，他还唾沫横飞地点评道：“督办的相貌，隆准凤目，实乃帝王之姿。”

相完了面，刘从云又论起风水，说刘湘的祖坟怎样怎样，不得了啊，后代一定会出皇帝。

教主

关于刘家祖坟，中间还有过一段曲折的过程。最早在为父母挑选坟茔时，刘湘曾特地请教一位阴阳先生，那人说，大邑鹤鸣山是张道陵、张三丰两位天师得道成仙的圣境宝地，若将坟茔建在鹤鸣山，必能福荫子孙。

刘湘依言而行，可是不久他的一个孩子就夭折了。刘湘夫妇十分悲痛，另一位阴阳先生便为他分析道：“鹤鸣山是道教仙山，张天师的领地，能随便动土吗？公子夭折，实乃天师之罚也。赶快搬吧，不搬还不知道会有多大祸事呢。”

刘湘深以为然，就让这位阴阳先生替他另觅好地，最后选来选去，决定迁葬于响台山。以传统风水学的观点来看，响台山确实是个好地方，特别是每当晴天傍晚，峡口便与八面来风互相振荡回应，宛如锣鼓齐鸣之仙乐。

刘湘对将响台山作为坟茔所在地一直感到比较满意，刘从云所说可谓是搔到了他的痒穴。不过更令他感到吃惊的是，刘从云特地向他申明，自己从未去过大邑。

你没去过，如何知道得这么清楚？刘从云说，他有慧眼，足不出户，不管千里万里，一律可以尽收眼底。

刘湘对刘从云佩服之至，当下就拜于刘从云门下，尊其为老师，并聘任刘从云为督署高等顾问。

诸葛亮打动刘备，还需要隆中对，刘从云仅凭一双所谓的“慧眼”就搞定了一切，成了刘湘身边的高级幕僚。

世人熟知的诸葛孔明向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正史传记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另一副面孔是民间演义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超人，刘从云所扮演的诸葛孔明大致就属于后者。

刘从云早年是个算命先生，靠摆八字摊头，给人算命拆字为生，邪门歪道的东西知道不少。在这方面，他比纯属业余玩票性质的王篯匠可要专业多了。入幕不久，刘湘家就发生变故，刘湘的弟弟患重病死了。刘湘赶紧找来刘从云，刘从云掐着指头给算了一卦，然后很肯定地说：“看来可能是老太爷、老太娘的阴宅出了问题。”

刚刚夸说祖坟好，祖坟就又不行了，刘湘着实有些不信，可是刘从云既如此说，还是一道回老家看看吧。

到了响台山，刘湘简直就要给刘从云来个倒头下拜了。刘从云不是神，而是太神了：响台山原有的“仙乐”竟已不复存在，试问这风水还能好得了吗?

问当地百姓，原来是近年来响台山挖土烧砖，环境被破坏了。

只能再次迁坟，此番刘从云亲自操刀，半年后，他在江油县找到一块所谓的风水宝地，随后正经八百地告诉刘湘：“拥有这块阴宅，日后钧座必有九五之尊。”

说来也怪，此后刘湘的事业和运气真的腾腾地往上直蹿，想慢都慢不下来了。

有史学家考证，刘备三顾茅庐并不仅仅是求贤若渴。事实上，诸葛亮也并非布衣百姓，他与荆州士族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刘备还是个外地人，正需要削尖脑袋挤入本地圈子。

与刘备类似，刘湘选定刘从云做自己的高级幕僚，也不绝仅仅因为刘从云能掐会算。

如果你把刘从云看成了一个单纯的算命先生或者风水师，那你就太小瞧他了。对刘从云来说，相个面，看个风水，已经属于业余兴趣，他的主业是当教主。

早年间，刘从云倒是只以算命为生，但从事这行当的人太多了，你抢我夺的结果，让生意和利润都变得越来越薄，渐渐地连糊口都变得极为困难。还好，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幸中的万幸，刘从云在无意中发现了另外一条致富捷径。

四川有一种创自于清末的教派，名唤“孔孟道”，又称“一贯先天大道”。刘从云加入了此道，后来又由骨干迅速跃升为该教派的执掌人。当时孔孟道的信徒已蔓延至四川许多地方，尤其偏僻农村信奉的人更多，原因也很简单——农村人见识不广，比较好骗！

刘从云不管走到哪里，逢人便宣传说“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将变成沧海”。这种类似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向来最能引起人们的恐慌，也最易蛊惑人心，那几年又正好是四川特别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两相一对照，真的好像末日要来了。

你想逃避浩劫吗？想啊，谁不想。好，那就信仰孔孟道吧。

最兴旺的时候，刘从云拥有信徒达到上万，他在本地区的关系网以及蛊惑煽动能力可见一斑，而刘湘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

互相耍

早在躲进日本纱厂的时候，刘湘就想明白了，他手下的这些武将都是一群乱哄哄的无脑之辈，除了升官发财、随风使舵外，其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关心。需要你的时候，把你当速成系领袖，不需要的时候，也同样可以弃之如敝履。

重新视事之后，刘湘开始轮流到各师督促训练，一方面提高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保证自己能切实掌握部队，以免再次沦为傀儡，但对于究竟怎样才能把武将们真正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仍找不到特别有效的办法。

有了刘从云，一切迎刃而解。刘湘除了自己入教外，传话下去，要求大小军官一律须拜刘从云为师，并定期听刘从云传道授业。

开始总会有人不服，但刘湘和刘从云自有办法让他服。这边刘湘下班回家吃饭，那边刘从云就告诉众人，说刘湘的桌上有哪几样菜，

他吃饭时说了哪些重要的话。有人半信半疑，一问刘湘，千真万确，没半点差池。

为什么刘从云能未卜先知？当然是因为他有着一双慧眼。在无处不在的慧眼覆盖之下，连刘湘都没了隐私，其他人还能不揣着小心吗?

假使你仍旧不当一回事，下面尚有更狠更辣的。

某天，刘从云在刘湘面前演示八卦，其间他掐指一算，脸色忽然阴沉下来。刘湘忙问究竟，刘从云说，有个连开到刘文辉防区的边境去了。

诸侯有如列国，防区的边境线就相当于各自的“国境线”。跑到“别国”的“国境线”，这个连很明显就是要酝酿“叛国”了，刘湘的脸也随之阴沉下来，他立即派部队予以追回，并将连长予以枪决。

处决令下，三军为之震动：这刘神仙也忒牛了，既能透视，又能卜卦，就算是孙悟空，也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啊！

官兵们都被蒙蔽了。与其说刘从云是在使神术，不如说他在变魔术更好。什么叫魔术？当然全是假的！

刘从云要“透视”刘湘，简直太容易了，两人搭档，刘湘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去做就是。至于那个被处决的连长，讲穿了就是个屈死鬼。之前刘从云对他说：“我给你算了一卦，某天你会有杀身之祸，必须将部队开到某处暂避两天。”连长颇为难，说没有督办命令，我哪能擅自移动呢。

刘从云说用不着："以后进行野外作战，经常需要宿营在外，现在就开始训练，有什么不可以的？"连长还是有些迟疑："可那边不是敌军防区吗？"刘从云进一步点拨道："你用不着深入嘛，就在边境上停住不动，待上一天就开回来。"说完又拍了胸脯："不要怕，有我呢，我给你做证明。"

连长傻乎乎地就真把部队带去了边境，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因此人头落地。

诱骗和枪决连长的节目同样需要一拍一档，而它的创意却来自三国时的孟德公：曹营作战时粮食不足，曹操密令粮官用小斛替代大斛，克扣士兵口粮，最后却以贪污罪把粮官给杀了，这就叫借人头买人心！

刘从云在重庆声势日隆，凡要到刘湘营中做军官的，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拜其为师。刘从云为此专门在重庆设馆传道，他的信徒除刘湘外，还包括王陵基、王缵绪等大小军官，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称作一百单八将，此为"以神治军"。

从政才是我的内核

按照真实历史，诸葛亮走出茅庐时才二十多岁，一个看上去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难怪关羽张飞要为难他了。刘从云最大的缺陷也是年轻，不过不是年龄大小上的年轻，而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看起来还太嫩。

有人为刘湘叫屈，说刘湘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被刘神仙耍呢？立即有人纠正：“不是神仙耍刘湘，是刘湘耍神仙。”旁观者笑了：“你们都错了，他们是互相耍，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

“耍”当然是很刻薄的用辞，你要搬到三国，能不能说刘备在耍诸葛亮，诸葛亮也在耍刘备？或许换成借用就比较好理解了。刘备要建立功业，就得借用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关系，同样地，诸葛亮若不依靠刘备为主公，也只会在南阳沉寂一辈子，他那自比管仲、乐毅的志向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就像刘湘最初只想当个普通军官一样，刘从云在刚刚转行传道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想发个财致个富而已。他的这个人生目标实现得最快，按照规定，入道信徒每人都要向他呈送见面礼，或曰“舆马费”，多少倒不拘，反正有钱的多给，没钱的少给。积少成多，刘从云这个昔日落魄的算命瞎子，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了阔佬。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吃饱喝足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这个需求满足后，一层层往上去的平台还多得很。刘从云吃饱喝足致了富，又有这么多信徒对他顶礼膜拜，自我感觉一直在向“超凡”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更高点的个人追求，那就奇了怪了。

在入幕之前，刘从云就时常对他的信徒们说：“我道是孔子的先天大道，自然也要按照孔子的教训去做，先修身，后齐家，最后要治国平天下。”见到刘湘时，他那一声失态的大呼，并非完全做作，他是真的认为从此有机会“治国平天下”了。

贴身弟子们对刘从云的心理摸得很透，他们积极制造舆论，说：“因为刘备在三国时没有能统一全国，所以留下遗恨。这次玉皇大帝派从云老师（指刘从云）下凡，就是要做大事，保卫汉室江山。”

刘从云自己也毫不掩饰：“当此中原逐鹿，乱世出英雄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舍我其谁！”

人人都以为刘从云只知道装神弄鬼，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更热衷的其实早已不是关在屋子里装神弄鬼，而是如何在国内的政治圈内一展拳脚——注意，神仙不过是我的外衣，从政才是我的内核！

事实上，刘从云的“神仙”外衣直接帮助他走上了政坛。刘从云的信徒，除大多数为基层农民外，也有一些是地方上的士绅和袍哥，刘从云从中挑选出一些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的人，并且逐个给他们大灌迷魂汤，说你的根基很好，是前代某某（历史或小说演义中的出名人物）转世，今后前程远大，定能安邦治国。

洗脑之后，刘从云便以这些信徒为骨干，派他们到处活动，在中上层社会进行宣传和拉拢。为什么刘湘早早就知道刘从云的名字？还不是宣传的结果。

渐渐地，加入孔孟道的川军将领扩展到了“巴子国”以外。这些人有的是被刘从云派出的骨干拉拢，抱着姑且一试的目的，有的是通过刘湘介绍，想跟刘湘攀个关系，以寻求保护，有的干脆就是受周围其他人的影响，看他们都加入了，觉得自己也应该加入。

这些将领都还只是一些小诸侯，但作为开头，这已经足够。刘从云又在成都、万县分别设馆，以容纳各方面的上层人物，事后他告诉自己的弟子：“从此英雄入彀了。”

就在一切都操持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刘从云突然离开重庆，前往武汉。他留给信徒及外界的说法，是重庆和成都道馆的“灵根”没有调好，作为教主，他必须四处云游去“调”一下。

实际原因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这一年是1927年，国内政局变化极其剧烈，先是北伐军在长江流域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出现“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两个南方产的国民政府一母同胞，却相互对峙。

南北谁胜谁负，基本已有定论，起码长江流域这一块是没有一点疑问了。川中诸侯不论大小，全都是转舵行家，一夜之间便全“咸与维新”，宣称服从国民政府，并受编成为国民革命军，其中刘湘反应最快，在加入国民党后，第一个就职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其他有点实力的诸侯也都有样学样，相继当上了革命军军长。

如果说这一点比较好解决，下面就比较难了。

刘存厚的谋士吴莲炬在“隆中对”中，曾提出一个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的策略。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到底拥谁为中央呢，是南京还是武汉？

最稳妥的办法是等等看，事实上，大家也都在等，就等南京和武汉决出胜负。可是稳妥有时也意味着落后，一旦人家那边尘埃落定，封王拜侯可就没你的份儿了。

要做大事就得冒点风险。刘湘像受编时一样，又是首先行动，暗中将赌注全部押给了蒋介石。

把部下全当恶人养

蒋介石那时对四川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刘湘这样的川中实力派主动投靠，当然没理由不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起码可以通过刘湘“以川制川”了。

为了方便联系，蒋介石专门在上海买了一部短波无线电机送给刘湘。据说当时这种短波无线电机一共才三部，另外两部，蒋介石自用一部，一部给了白崇禧。

刘湘除与蒋介石直接通电外，还派代表专驻上海，应该说南京那边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他所顾虑的是武汉。刘从云去武汉，一方面是窥测各方动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从外部总览四川局势。

按照《三国演义》的描述，当诸葛亮还未出现时，刘备总是表现得多灾多难，危机四伏。这几乎让每个读者都要为他揪一把心捏一把汗，但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大家就变得安心多了，已经大可以用一种吃着爆米花的心情来看闲书了。

只要诸葛亮在，就可以百战百胜，即便他不在，不还给刘备留下了锦囊妙计吗？刘从云去武汉之前，也给刘湘留下了一个“锦囊”，让他在碰到困难时务必如此如此。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正当刘湘在重庆做他的“新野事业”时，万县的杨森也没闲着，而且同样碰到了如何团结内部这一棘手问题。

杨森可来不了刘湘那种哭哭涕涕、欲说还休的样子，他也决不会装成戏剧里受了委屈的小生，一个人跑到角落里去跟部下将领们躲猫

猫，当然更没有刘湘搞“以神治军”的心眼儿，他只会下狠劲硬压，采用的是所谓“强干弱枝”政策。

杨森从各个师里抽调机炮重火力，成立机炮部队，又每师抽调一个主力步兵团，编成执法大队。这些部队全都由杨森直接掌握，看谁不顺眼，马上就给以颜色。

杨森得劲了，各师却无不被抽到骨软筋酥。师旅长们叫苦不迭，有人忍不住发牢骚：“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衫。昨天脱马褂，明天脱长衫，后天是不是要连裤子都剥光呢，这让我们如何见人？”

为了让众人消停下来，杨森创造了一套新理论，说：“养恶人如养鹰，饥之则附，饱则飞扬。”他把部下全当恶人养，给的薪资极低，使他们时时处于一种半饥半饱状态。有人发牢骚或不满意，杨森就随手新人换旧人，完全不顾任何情面。比如他觉得某师长不听话，就将其撤职，提拔某旅长接替，觉得某旅长不听话，再撤掉某旅长，升某团长为旅长。

以为能够压得住，没想到军官们反而吵得更凶了。一计不成，杨森再生一计，叫作“杀鸡给猴看”。他以阴谋叛变的罪名，派执法大队把师长杨春芳抓起来，要处以极刑。

杨森部队里很多出身袍哥的军官，杨春芳、范绍增均为此类。见杨春芳可能要人头落地，范绍增等人一方面物伤其类，另一方面出于江湖义气，纷纷站出来为其求请，说杨春芳半辈子刀口舔血，欠下的人命债委实太多，死是应该的，但是人人都可以杀他，唯独你杨森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两次投奔惠公（指杨森），口口声声称你为叔

父，并无半点要叛变的迹象，再说他打仗又向来卖力，多次充当开路先锋。这样的人，你杀之不仅不仁，而且不义，以后如何统率诸将？”

杨森心中有鬼，被说得无言以对，沉默许久方答道：“你们请回，容我再研究。”

范绍增等人以为妥了，遂放心离去，谁知杨森半夜里便下令执法大队将杨春芳给枪决了。第二天听到消息后，大家不由面面相觑，脸色发白，自此人人自危，平时若没有大批警卫跟随，都不敢随便走出营房。

杨森认定已经把一众猴子都给吓住了，还直得意呢，但因为范绍增的实力较强，防区又在万县之侧，所以他对之仍不放心，于是便借故把范绍增召来万县进行测试。他打算好了，如果测下来发现范绍增有反心，就当场扣在万县，甚至像杨春芳那样杀掉，若无反心，则先卸其兵权，然后慢慢图之。

双黄蛋

范绍增应召来到万县，已经走到杨森的办公室门口了，杨森却故意不叫他进门，也不理睬，生生地将他晾在门口达两个小时。

晾完之后，杨森忽然破口大骂：“如此扯风（四川话，大致意思与扯淡接近），我决心不干军长了，下台！”

这话当然是说给范绍增听的。范绍增绰号“范哈儿”（哈在四川话中是傻的意思），但他表面憨傻，为人却机警异常，江湖经验十分丰

富，当下便也装作生气的样子发起火来："人家说我反抗军长（指杨森），真正岂有此理！军长就像父亲一样，师长就像儿子一样，哪有当儿子的去反抗老子的。"

一番话完全出乎杨森的意料，但又恰恰搔到了他的痒处，两个字：舒服。

杨森转嗔为喜，走出办公室对范绍增说："你的枪太旧了，给你换新的。"这其实是要卸范绍增兵权，范绍增很清楚杨森的意图，立刻同意"换枪"，并且故作镇静地问杨森："什么时候换？都等不及了。要不我明天就把枪统统交来。"

杨森真以为范绍增是个傻子了，也就不再派人紧盯监视。第二天，范绍增说要出城打猎，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防区，随即便和其他不满于杨森的师长进行联络，加上主动入伙的赖心辉，他们组织"倒杨军"，发起"四部倒杨"。

"四部"相约造反，还觉得气势不够大，又请刘湘做主，要求再给个"倒杨"的正式名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刘湘"倒杨"的心比"四部"还来得迫切和彻底，只是他的行事风格向来极其小心谨慎，成功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事，基本不予考虑，更不可能贸然出兵。现在有"四部"主动去捅马蜂窝，就要省事多了，他所要做的，也就是给杨森安个罪名而已。

罪名很快就想到了：杨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在北伐胜利在望之际，他竟然还继续包庇和窝藏北洋余孽、老主子吴佩孚！

杨森一向换主子换得最勤，要不怎么叫“川中吕布”呢？可偏偏这次他换得有些不干不脆，原因是吴佩孚在被北伐军击败之前，曾封杨森为四川省长，他舍不得丢掉这个职位，随即便想到吴佩孚没准还能东山再起，到时再紧跟可就难了。

如何才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杨森的办法是脚踏两只船，他一边通过改换旗帜，得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职务，一边与吴佩孚暗通款曲，甚至迎吴入川。

有勇无谋的人要小聪明，通常都会演砸，杨森的这点心思更是只有白痴偶像剧水平，别人哪里会看不出来。刘湘紧紧抓住他的这一破绽，再经过添油加醋和夸大事实，到蒋介石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

蒋介石下令将杨森予以免职，另任他人。事到临头，杨森又不舍得把“革命军军长”让出来，反正你撤你的，他厚着脸皮照当他的。新任命的第二十军军长郭汝栋拿着蒋介石的任命状早已急不可待，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就职了再说。

这边不肯摘帽子，那边已经戴上了帽子，自当年刘存厚、熊克武的“双督军”之后，四川再出双黄蛋奇观，出现了两个“第二十军军长”。

刘湘在结结实实地暗算了杨森一把后，便以当家人自居，给范绍增等人封官加爵，鼓动他们拿着“天子令”尽快兴师万县。杨森先丢了官，再遭“四部”围攻，自然是又气又急，这时刘湘还不忘在对方伤口上撒盐，撺掇当年的“内鬼”王缵绪出面，发通电劝杨森下野。

王缵绪在通电中用词极其尖酸刻薄，他讽刺杨森，说你不是号称猛勇吗，一味扬言要以力服人，现在怎么样，一挫再挫，逊到不行，

眼看就要沦为难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吧？他还说，如果杨森愿意下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王缵绪就情愿生生世世做小沙弥，一心一意地服侍杨森这个佛主。

看到这份通电，杨森气到倒仰。刘湘和王缵绪的本意是要展开攻心战，羞辱和刺激一下杨森，顺便给攻向万县的“四部”打打气，但最后起到的却是反作用——杨森真的被激怒了，不过他不是“放下屠刀”，而是舞着刀就冲了过来。

说过了，杨森是勇战派的，一勇起来，千军难敌。

“倒杨军”看似声势浩大，咋咋呼呼，然而表壮不如里壮，转眼之间就被杨森打得首尾不能相顾，最后以分崩离析告终。

赖心辉有一个主力师师长，是杨森的速成军校同学，以前就曾被杨森俘虏过一次，此番再次上演“二进宫”。杨森打趣他：“老同学，你咋个又来啰？”

此人不羞不臊，坦然作答：“因为你上一次招待我很丰盛，迄今尚念念不忘，所以这次又来搅扰你了。老同学，我们不是梁山泊的兄弟，越打越亲吗？”

锦囊

杨森大获全胜，俨然已是一览众山小的派头，连刘湘也畏其三分，怕他乘胜攻进重庆，连忙一边调兵设防，一边派代表与杨森洽谈合作。

刘杨合作多次，可没有哪一次最后能够合作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作基础：刘湘要当帅，以杨森为将，然而杨森哪里愿意，他还恨不得反过来让刘湘做他的跟班小弟呢！

所谓合作纯属南辕北辙，完全谈不拢，不过杨森刚刚经历一场大战，急待喘息，也并不想打，所以尽管两人合作未成，但总算又可以相安无事了。

趁着前方太平，刘湘想到要把自己被扣留的一批军火给要回来。

重庆没有兵工厂，刘湘开设了一家武器修理所，其功能仅限于修理一下破枪，武器还得到国外购买。有刘航琛理财，刘湘不愁没有钱，愁的是没有人肯卖武器给他。由于中国连年内战，国际社会早已发布禁令，禁止军火贩华，步枪、机关枪一律不准运进来，并由英国海军负责监视。

当然了，不管洋人的规则定得有多严，篱笆扎得有多紧，终究还是有空子可钻。你不是说不能卖军火吗，那卖给我警察用品怎么样?

警察用品也是枪，不过是短枪。英国海军上船查货，验证到底是不是军火，其实就看枪身长短，长的是军人装备，短的是警察的防身之物。

手提机关枪（实际就是早期的冲锋枪）枪身很短，中国人就把它称作“警察用品”。照章办事的英国人不知其中猫腻，挥挥手就放过去了。

即便购买“警察用品”，也得持有进口护照。先前刘湘曾通过与蒋介石的关系，弄到了进口护照，但却被刘从云迎头泼来一盆冷水。

刘从云不是说不要买军火，而是说时机不合适。军火这东西，大家都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刘湘是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了护照，但依刘从云看来，蒋介石的地位还不够巩固，难保这批军火的安全。

彼时刘湘与刘从云的关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说算卦占卜传道，自然是刘从云专业，可是搞政治就不一定了。当时的形势，“宁汉分裂”已过渡至“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两个政府合并成了一个政府。在刘湘看来，蒋介石已执牛耳，他担保的军火不可能出问题。

我在这个圈子里都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难道眼力见儿还不如你一个初出茅庐的“神仙”？刘湘没听刘从云的话，下了十万订单，让驻上海的代表照购不误。

可是这一回他真失算了，十万军火倒是运进了上海，却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给扣留了下来。

白花钱还是小事，关键是等着用啊，刘湘愁眉不展，突然就想到了刘从云留下的“锦囊”。

这其实是一个无须拆开的“锦囊”——刘从云走之前曾嘱咐刘湘，说如果遇到困难而又不便发电写信时，就派亲信去武汉找他！

现在毫无疑问是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刘从云能不能给想个办法，但这事又不能发电写信，否则极可能泄密。于是刘湘便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派人到武汉找到了刘从云。

刘从云听完来意之后叹了口气：“我早就阻止不买，只是玉宪（刘从云给刘湘起的道号）不听。枪械已无希望。”

使者顿时心凉了半截，但是刘从云接着又说：“枪械虽然不可能再拿回来了，但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

使者私下揣度，“刘神仙”可能也没什么好办法，取回子弹云云多半也只是为了给自己遮脸。既然如此，他也就不急着回川，打算在武汉玩上两天再说。不料刘从云却告诉他：“你要立即启程，回去告知玉宪，重庆将有大战事，让他立即做好准备。”

见刘从云神色严峻，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使者也紧张起来。

刘从云已经预先又做好一个“锦囊”，让使者带给刘湘。在新的“锦囊”里，他不仅让刘湘把兵力全部集中于重庆，而且要求刘湘必须亲自出马，甚至于谁守谁战，谁警戒谁出击，都做了详细部署。

尽管重庆还未出现刘从云所说的大战迹象，但刘湘在收到“锦囊”后仍不敢怠慢（先前就是没听刘从云的话才吃了亏，如今非得小心不可了），赶紧照方子抓药，按照刘从云的计划行事。

刚刚把兵力部署好，大战果然就爆发了，这让刘湘一头冷汗的同时，也大为惊服于刘从云的神机妙算。

有一只猴子正在上蹿下跳

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拍到赤壁大战借东风这一节时，特地加入了一个诸葛亮在户外观察天气变化的桥段，这说明凡是有现代知识的人都明白，世间所谓“妙算”皆非天授，而实属人谋。

刘从云在武汉上层也传道，借助于刘湘的牌子和他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颇拉拢了一批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其中一人尤为重要，他叫贺国光。

贺国光是湖北人，但考上的是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他以前是吴佩孚的部下，在吴佩孚下野后，就死心踏地地追随蒋介石，并成为其帐中的重要幕僚。正因为一直伴驾于蒋氏左右，贺国光掌握很多不为外界知晓的高层权斗内幕。“宁汉合流”后，蒋介石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明里暗里想要给他一下子的人多了去，蒋介石也随时可能一跤滑倒。正是由于从贺国光嘴里了解到了相关信息，所以刘从云才知道刘湘的军火缺乏足够保障。

不久，蒋介石被政敌们以“北伐失利”为由排挤下野。当刘湘的军火在上海被扣留时，蒋介石已经去了日本，果然就算他想帮刘湘的忙都帮不上了。

在被扣留的十万军火里，除一千多挺德造手提机枪外，还包括从比利时采购的机枪枪筒（国人“钻篱笆”的功夫实在可令洋人望尘莫及，所有这些机枪枪筒进口时都不叫枪筒，叫“钢管”），只要配上枪托，就可以组装出两千多挺轻机关枪。如此大一块肥肉，放在哪里都不安全，刘从云断定，即便是蒋介石复出，这批军火特别是枪械也早就被哄抢得差不多了，剩下来最多只能惦记子弹了。

刘从云预料到重庆将有大战事，更是和诸葛亮借东风一个原理，即绝对不是手中鹅毛扇一扇，就能把东风扇来，实际凭的全是平时“观察天气”所积累下来的功夫和经验。

刘从云虽人在武汉，但信徒遍布巴蜀，上中下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他的耳目，刘从云所要做的，不过是对来自各方的情报进行汇总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打个比方，假使四川的诸侯们是在现代舞台上演川剧的演员，刘从云就犹如坐在演播室里的导演，在他面前，大屏幕，小屏幕，正镜头，侧镜头，哪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要写出一封具体详尽的作战计划也绝不是件很费劲的事。

根据刘从云的观察，有一只猴子正在上蹿下跳！

川中的“猴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邓锡侯，而这只水晶猴之所以又要跑出来搬弄是非，是因为他对刘湘极度不满。

因主动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在下野前特别预定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并让他主持川省将领会议，给邓锡侯等几个还没什么名分的诸侯安排席位。

刘湘素来出手大方，只要你肯跟着他，都会尽可能让你吃饱。他给邓锡侯安排的交椅是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谁都知道财政厅长是个肥缺，猴子可高兴了，但刘湘的任命仅仅是提议，最后还得交南京政府确认。

不知是不是由于蒋介石突然下野的缘故，南京政府明令发布时并未按照刘湘的提议去办，邓锡侯预定的财政厅长职务也被拿掉了。邓锡侯勃然大怒，认为自己被刘湘耍了一把。

这种事以前不乏先例，袁祖铭就曾因此愤然而起，恨不得要跟刘湘拼命。邓锡侯虽然一样气量狭小，但他做事绝不会像袁祖铭一般冒失唐突——在邓锡侯的眼里，袁祖铭甚至可以说是愚不可及，他甚至都弄不明白，就凭这傻瓜蛋那点智商，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邓锡侯要摆谁一道，绝不会走直线，而只会走曲线，而且在四处煽阴风点鬼火方面，也向来都是精力过剩，创意无限。在他的暗中张罗下，很快就组织成立了针对刘湘的“同盟军”。

被邓锡侯推到前台的“同盟军”成员主要来自军官系，这是自武备、保定、速成之后，四川军人中形成的一个新派系。军官系的“军官”指的是尹昌衡主政时期成立的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当该军校第二期毕业的学生到部队见习时，正值保定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大批涌入四川。保定的文凭在军界自然要比军官学堂吃香，双方在待遇上也泾渭分明，比如保定生实习三个月就可以当排长，军官生却需要熬上六个月。

军官生自然而然地开始抱团，以便争取在与保定生的竞争中占得优势。这当然不是易事，实际上，直到第一期军官生的代表李家钰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到达了当初赖心辉的地位，军官系才得以显山露水。

每个派系的形成都遵循着一个类似的轨迹，即先由一个人混出头，然后众人攀附，雪球越滚越大。李家钰是军官系中最早混出头的，在他发迹之后，只要是军官学堂毕业的同学，就算失业，都可以找到李家钰门下去谋个差使，于是渐渐地，李家钰也就成了军官系的首领。

做老大威风归威风，烦恼也不少，李家钰的烦恼是他的防区太小，来投靠他的同学又太多，若不积极扩充地盘的话，实在应付不了浩大开支。另外，由于刘湘在重庆扼住水路交通，导致物资难以运入其他诸侯的地盘，也间接使得他们这些后起的新兴诸侯迟迟难以做大做强。

李家钰给邓锡侯当过师长，邓锡侯便以老上司的身份，跑来给李家钰指了条明路：跟刘湘干到底，放心，又不是你一个人和他斗，还有杨森那个常胜将军呢！

邓锡侯把“同盟军”的旗帜树起来后，就把李家钰变成了前台的主持者，他自己又马不停蹄地去动员杨森。

单挑就是你一个打我们一群

杨森的心眼儿从来就没宽敞过，属于那种睚眦必报，隔一晚上再把你干掉都觉得特憋屈的主。事实上，刘湘怎样在蒋介石面前告他黑状，怎样怂恿和支持“倒杨军”，又怎样借王缵绪之口羞臊他，他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连一个字都没忘。

杨森能坐下来跟刘湘谈合作，只是以前亏吃得实在太多，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多少懂得和掌握了一些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如何消减自己狂躁情绪的法子。

听邓锡侯说，李家钰和军官系愿在共击刘湘的战役中助其一臂之力，杨森顿时心花怒放，没有丝毫犹豫，就一口答应下来。

终于不用夹尾巴了。有了朋友就有力量，自己已经神勇无敌，再有这么多人加盟，还愁“大耳贼”不灭吗？刘湘，你听着，从现在起，群殴就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单挑就是你一个打我们一群！

邓锡侯的穿针引线，李家钰的前台鼓噪，杨森的忽然变脸，都在刘从云的“神算”之中，若不是根据他所提供的“锦囊”早做布置，刘湘

很可能就要在猝不及防之中被人家给捅翻了。

尽管已有准备，但眼见杨森领着这么多人黑压压地扑过来，刘湘还是颇有些心虚。能不打最好不打，他派王陵基为说客，紧急赶赴万县。

在四川军人中，王陵基的特点是资格最老。他毕业于武备学堂，后来因受留日风潮的影响，随波逐流地到日本转了一圈，有人说他是士官生，但实际上不是。回国后，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教，刘湘、杨森都是他的学生。

说王陵基资格最老当然还要有个先决条件，即限定于尚在政治舞台上继续蹦跶的这些人，要不然的话，比王陵基资格更老的大有人在，比如胡景伊、尹昌衡、熊克武……所以，重要的是不能中途退场，一退就完了。

刘湘发达后，王陵基成了他部下，但刘湘颇有尊师重道的美德，仍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叫个不停，刘湘下面的一些军官也都跟着刘湘称呼王陵基为“王老师”。

王陵基由此岸然自高，身边熟悉的人取其“方舟”的号，称其为王老方，不熟的人看他整天头昂得高高的，倒跟道观里的灵官很像，加上陵与灵同音，便叫他王灵官。

有面子的人就得做有面子的事，刘湘的场面活基本都由王陵基负责承包，他自己对说服杨森也很有信心，乘着一艘德国军舰就去了万县。

见到杨森后，王陵基与其彻夜长谈，说你和刘湘都是我的学生，你们都是速成系的，怎么会跟军官系的搅在一起呢？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嘛，不应该打来打去。

杨森才不吃这一套，他就要打刘湘。

王陵基犹苦口婆心：“你别以为同盟军可靠，其实并不可靠，将来假定攻下重庆，这些人未必会遵你号令，不如你和刘湘捐弃前嫌，重修旧好。”他甚至还说只要刘杨和好，他这个速成系老师愿以性命担保，保证刘湘不会再对他杨森不利。

杨森摇摇头，回答了一句：“太晚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一定要打垮刘湘！”

王陵基无计可施，只得怏怏告退。临别时，杨森出于师生之情，将王陵基送到了江边。王陵基还在喋喋不休，杨森却已在向他挥手告别：“重庆再见。”

王陵基知道无可挽回，便说：“重庆还有一条大江咧。”意思是重庆也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杨森一笑：“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

1928年12月，杨森就任“同盟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气势汹汹地发起“讨伐”刘湘的军事行动。

刘湘早已针对性地见招拆招，李家钰固然难以策反，但他已另外设法，腾出资、内两县给刘文辉，从而取得了刘文辉的支持。刘文辉的防区与李家钰接近，这样一来，李家钰就有了后顾之忧，不敢抽出大部兵力投入作战。

参加盟军系列的共有八支部队，号称八部同盟，但除去李家钰，多为一些坐看风云的小喽啰，只有杨森和罗泽洲战力较强，他们在进攻刘湘时也最为坚决。

拼上了老命

战幕拉开，罗泽洲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王陵基奉命游说杨森时还负有另一层使命，即侦察杨森部队的动静。回重庆后，他告诉刘湘，杨森至少还有两天时间才能与罗泽洲会合。

罗泽洲的参谋长廖子玉曾建议他等杨森到达后再协同行动，但罗泽洲却说："你不知道，我早一点出兵是政治呀！杨森的声势那么大，如果让他先到重庆，哪还有我罗泽洲的事呀？"

罗泽洲怕的就是杨森跟他分肉，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他刚刚下达提前出兵的命令，便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前方，一个劲儿地催促前敌指挥官："你快点前进哪，快点给老子打响啊！"前敌指挥官只好胡乱答应："报告师长，马上就可以打响了。"

在罗泽洲催命一样的逼迫下，他的部队还没有能够完全展开，先头部队就忙不迭地开了火。廖子玉后来对人说："我们师长（指罗泽洲）的战法，就是个乌龟形，四只脚和首尾各算一个团……"

罗泽洲的单兵突进正中刘湘下怀，他马上任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实行各个击破，即在杨森到达之前，先打掉罗泽洲。

罗泽洲手下颇有几个军官系的能战之将，此前又从吴佩孚卫队那里收缴了一批精良武器，战斗力不容小觑。王陵基把王缵绪师调到前线，继而再把自己的师也压上去，最后几乎集中了刘湘的全部兵力，经过一天一夜的角斗，才得以击败罗泽洲。

等杨森赶到时，罗泽洲的“乌龟脑壳”已经快被敲烂了。在有勇无谋方面，杨森跟罗泽洲倒真像是双胞胎，由于跑得太急，他仅能在前线集中两师兵力，其余大部队都还在行军之中。有人说要不我们集中兵力再进攻吧，杨森把脖子一扬：“我只要这两师就可打垮刘湘了。哪里还需要更多的兵呢？”

杨森一路沿江进攻，直抵重庆南岸，这时候王陵基曾经对杨森说过的那句话应验了——刘湘事先已将船舶悉数调至北岸，杨森被长江所阻，没法渡河，只能隔江朝重庆放上几炮示威。

过不了江，杨森便挥师朝张关铁山前进，在讨贼之役中，他正是在张关铁山打开缺口并得以一举攻占重庆，现在不过是复制一下当初的场景而已。

可是打法容易复制，场景却并不容易复制，在杨森到达张关铁山之前，王陵基已将此山牢牢控制在手里。杨森所部抢山仰攻，整营整营地组织冲锋，一会儿工夫就死伤了几千人，但仍不能使王陵基动摇分毫。

速成学堂的老师不止一个两个，王陵基能够让刘湘在内的一干人等都尊他一声老师，可不光是倚仗着资格老，而是他在打仗方面也确实有两下子。换言之，他可能在别的领域一窍不通，纯属外行，但军事上你一定不要指望他会犯赖心辉所犯过的错误。再者，张关铁山一

战关系到刘湘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他王陵基今后的地位和前途，他敢马虎吗?

不打到你吐血，我就得浑身是血，王陵基在张关铁山拼上了老命。四川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王灵官其实是西南巫教中一个最凶狠的花脸神将，这种喻意放在此时的王陵基身上倒也毫不为过。

杨森是勇战派将领，但凡勇战派大多有个特征，即如果让他打顺了，别人便很难挡住他的攻势，但要是你能生拉硬扯，把他的锐气消耗干净，有可能都不用你亲自动手，他自个儿就会急到抹脖子。

作为古代勇战派最有名的代表，楚霸王项羽就是如此。垓下之围，项羽都快剩下光杆司令了，还能在纵横驰骋间，想摘谁的脑袋就摘谁的脑袋，可问题是包围上来的汉军一层又一层，密密麻麻，有的是脑袋，你摘吧，只要你吃得消！

人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有电池或汽油消耗一尽的时候，项羽最后终于吃不消了，只得自刎而死。

杨森率部远道而来，血战一天后又饥又疲，再看山头上的敌军阵地，仍跟铁打的一样，顿时之间，他身上的那股气势就噌噌噌地散了个无影无踪。

杨森倒也不至于自个儿抹脖子，但他只能放弃张关铁山了。作为在战场上泡大的武将，明知攻入重庆已不可能，杨森便想回到最初的起点，跟刘湘罢战言和。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王陵基，欲请他再做一回和事佬，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王陵基便来了一句:“请你进大门内来说吧！”

杨森曾经当着王陵基的面宣称，他攻占重庆易如反掌，“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王陵基这下总算找到报复的机会了。

战场之上，打胜仗永远是硬道理，任何人站在胜利者的位置都会变得咄咄逼人。杨森犹如被人劈面扇了一巴掌，摸上去火辣辣的疼，羞恼之下，把电话机都摔碎了。

第七章　一川不容二流

杨森不甘于败，他收拾残兵，还企图再搏一把，但对方已不会再给他这个机会了。王陵基暗中用轮船运兵，顺长江而下，一下子截断了杨森的退路。

杨森以侄子杨汉域殿后，杨汉域部被打得全体缴械，杨汉域本人藏在一个农民家的破柜里才得以身免。此时正值杨森所部士气低落、勇气不再之际，殿后部队被击破，使得其余部队也立呈崩溃之状。

王陵基随即跟踪追击，这回轮到杨森的部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从战场上一逃出来，杨森就将大衣脱下往床上一扔，连说："笑话，笑话！"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都没弄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败下阵来的，只感到头晕目眩，师生之战，终以学生完败而告终。

除了杨森，其余几路盟军也全都是败的败，逃的逃。一首民谣这样唱道："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即赶集）。"罗是罗泽洲，李是李家钰，哥俩如今成了难兄难弟，当然最难的还得数被迫"赶乡场"的杨森，刘湘把他的万县都给占了。杨森有家难回，不得不抱着脑袋往盟友罗泽洲的防区跑。

跑着跑着，没看到罗泽洲，倒离某诸侯的疆界越来越近。一看，是刘存厚。刘存厚也是八部同盟成员，杨森急忙向他求救，却遭到了拒绝。

魂飞魄散

刘存厚如今可再不是什么刘皇叔的接班人了，甚至于受他所累，曾经也夸耀一时的武备系都已经衰弱得不行。刘存厚大部分时间里都只能躲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要不然也不会挤在八部同盟里，跟李家钰这些后生小辈你唱我和了。

刘存厚谁也招惹不起，眼看着盟军已经完蛋，他哪里还敢与杨森有所牵连，以致引火烧身。杨森气急败坏，说你要不派兵支援，我就全军退到你的驻地里去。

对于彼时的刘存厚来说，外面的世界全是狼，杨森亦是其中一只，而且还是一只眼睛通红、饥不择食的饿狼，放他进来，自己将无活路。可要派兵支援，又怕挨刘湘的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取中庸之道：允许杨森经自己的防地过境，但规定不得逗留。

刘存厚让开通道，杨森玩命狂奔，跑到了罗泽洲的屋檐下，这才算把一口气给喘匀了，这时他回转身后再看跟随自己的部属，仅剩一万多残败之师。

在失去原有地盘后，杨森只能靠李家钰、罗泽洲接济维持。由于给养异常困难，士兵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成年累月穿一套军装，军装都快给穿烂了，出门若给根竹棒和破碗，就是活脱脱的乞丐。

士兵的日子过不下去，纷纷逃亡，杨森连下格杀令，仍不能禁止。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他想出一招，之后果然没什么人跑了。

外界不知究竟，奇怪杨森有何妙法。一打听，原来竟是“脱裤术”——他下令士兵每晚都要把裤子脱下来上交，第二天早上才能发还。

杨森还挺得意：“他（指士兵）没穿裤儿，两胯光溜溜地吊起一锤，看他朗格逃嘛！”众人啼笑皆非，有人拿这件事打趣他，杨森却又变得正经起来：“饥军政策，是要有这些办法的，有啥可笑呢？”

其实杨森如此做法不光是为了防止士兵逃跑，还有另外一层用意，那就是保护军服。虽然说士兵们身上的军服均已破烂不堪，但你还别嫌它破，杨森可再也提供不出第二套了，到时穿没了，总不能“两胯光溜溜”地去打仗吧。

转眼到了寒冬，杨森的部队连棉衣都没有，士兵们冻得直哆嗦。四川各军看杨森可怜，遂发起集体募捐活动，你凑一点，我凑一点，给他寄去棉衣费，这才让杨森把那年冬天给熬过去。

出来跑江湖，丢什么不能丢面子。杨森弱爆了，哪有什么面子可言，这个昔日战神级人物至此身价大跌，时论将他和李家钰、罗泽洲摆在一起，称为“李罗杨三将”。李、罗在川中只能算二流将领，杨森还排在他们之后，可见有多么落魄。

在这场被称为下川东之战的战役中，刘从云虽未直接参与指挥，但毫无疑问居功至伟，刘湘及其部将都对其佩服到五体投地。

刘湘向以布局谨慎得当著称，但通过这次战役，他发现自己原来漏洞不少。下川东之战前，由于未听刘从云的话，硬要买军火，结果折了老本。之后又只记得把军火要回来，没想到对杨森等人进行戒备，若不是刘从云提醒，差点被人家连锅端。

甚至于在战役临近结束时，刘湘也不小心使出过昏招。刘从云曾特地嘱咐刘湘，让他在对付杨森时尽量适可而止，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更不必打到万县。因为万县有刘从云所设的传道馆，一方面他可以凭借信徒的力量，迫使已精疲力竭的杨森就范，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孔孟道的“神通广大”。

可是刘湘杀得兴起，收不住，还是乘胜把万县给攻了下来。攻下万县，部队的子弹也快给打没了，刘湘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万县是杨森的老巢，在其老巢被攻占的情况下，他已无退路，如果向弹尽的刘军进行拼死反击，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杨森魂飞魄散，已经想不到要发起反击，不过刘湘的处境仍很危险——一旦诸侯们发现刘军实际虚弱不堪，连子弹都没了，即便是其中最小的诸侯也能乘机夺取重庆。

关键时候，又是刘从云为刘湘解了围。

三块匾的故事

战前，刘从云对使者说：“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这话竟然也兑现了。刘从云所说的“明年”，也就是1928年，当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复出，这次不同以往，他完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成为南京政府内部的第一号人物。随着蒋氏复出，刘湘被扣的军火也得以发还，不出刘从云所料，所谓发还只是空言，因为所有枪械都已被别人取走，连一挺机枪或者枪筒都没剩得下来。

幸好，作为补偿，蒋介石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拿了六百万颗步枪子弹送给刘湘。在下川东之战接近尾声时，这批子弹正好运到重庆，犹如及时雨一样替刘湘解了燃眉之急，以至于他连呼是子弹救了他的命。

刘湘从前总是不算成功，就像刘备那样，奔波十几年，南征北战，东拼西杀，虽然拥有过地盘，但很快又丢了，从来都守不住也攻不出。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刘湘只会独自怨天尤人，现在他总算弄明白了，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不是“能容不能断”，就是“顾前不顾后”。想想看，漏洞这么多，你能不败吗?

刘从云的入幕，真是太重要了。过去人们称刘从云一声“神仙军师”，重点还在“神仙”二字上，没多少人认为刘从云真会用兵或使计，这一仗过后，疑虑顿时烟消云散。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你只要想象一下，当年火烧博望坡的诸葛亮有多拉风，就知道如今的刘从云有多神气了。

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湘通过击败杨森和军官系，再次巩固了他在速成系中的盟主地位，同时通过这一战，重庆以下二十九县尽被其收入囊中，也表明刘湘在实力上，又重新走到了四川诸侯的最前列。

“李罗杨”已不在话下，邓锡侯也被一晃而过，川中谁可再与争锋？有，还有一个，他就是刘湘的幺爸（四川人对年轻叔父的称谓）刘文辉。

民初时的大邑将星闪耀，一共出了三个军长、四个师长、九个旅长，其中的三个军长，除了刘成勋外，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叔侄。

一座小小的县城，竟然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将才，有人便说是子龙庙的功劳。大邑的子龙庙相传为纪念赵云赵子龙所建，有这位三国时的无敌战神坐镇，看起来三个军长都是少的。

大家都想得到子龙庙的庇佑，纷纷抢着上供。刘成勋捷足先登，提前把他写的金匾挂在了赵云塑像的头顶。刘湘居次，来了之后，毫不客气地将刘成勋的匾移到塑像后面，换上了他的匾。刘成勋虽气愤不已，但“水漩”已日暮途穷，其圆滑高手的地位也早就被邓锡侯所取代，所以只能干瞪眼。

刘文辉来得最晚，却也相中了塑像头顶的绝佳位置，便派人给刘湘带话，让他挪一挪。刘湘不干，刘文辉将刘湘大骂一顿，随后将金匾挂在了庙宇正殿中间的穿梁上，正好与刘湘的匾针锋相对。

三块匾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对现实中三人明争暗斗的隐喻。在辈分上，刘湘得喊刘文辉幺爸，实际他的年龄比刘文辉还大好几岁。刘文辉在川军中出道较晚，起初名气也不大，但刘湘很快就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

刘湘任川军旅长时，刘文辉不过才是个小参谋，然而几年之后，他便得以与刘湘同列，成为“革命军军长”。刘文辉的势头如此之猛，有人说他靠的是“拼幺爸”，依赖了刘湘系（或称二军系）的关系，有人说他是得了川军中大邑系的好处，有老乡一路照应，还有人则说若没有保定系，刘文辉根本爬不到如此之高。

应该说，这些话都对，但又不全对。

作为侄儿，刘湘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军之战中败北，就是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的，而后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有刘文辉继续护持，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刘文辉一路高升，从营团长一直升到了师旅长。可问题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呢？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人，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刘文辉早在读书期间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旁注。

《战争论》自辛亥革命后引进中国后声名显赫，连毛泽东都受到影响，一到延安便找来阅读。之后毛泽东不仅拿《战争论》将与中国的《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还留下了研读《战争论》的读书笔记，据说他的名著《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即源自《战争论》。

总的说来，真正能把《战争论》读完读通的人并不多，毛泽东本人也没看完。学生时代的刘文辉就能研读到写眉批旁注的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斑。

刘文辉也极有毅力。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概莫能外，但他和杨森一样，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

精明强干、魅力十足、学识精深、意志坚韧，即便没有刘湘系、大邑系、保定系的背景，这样一个人也注定是要脱颖而出的。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受到了来自刘文辉的威胁。

天才演说家

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后，一定要先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都是当时四川的名优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乃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要表达的大概意思是，四川为天府之国，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内部经济搞好了不依赖外援也行。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有个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

身着西装的刘湘被驳得面红耳赤，随即退席仓皇而去。

民初的大学崇尚独立自由精神，敢向高官显贵放炮并以此为荣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当然，反过来也得替刘湘说句公道话，他作为重庆实际的土皇帝，虽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导致脸面全失，但事后既没发火也未报复，这就不是一般人，特别是那些平时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枪杆子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诸侯们所及得上的。你换杨森来试试，“蛮干将军”有可能当场发作，桌子一拍，暴喝一声：“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否则出去！”

刘湘对自己所塑造起来的形象也曾自鸣得意，所谓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这可是当年先主的取胜之道，然而在刘文辉崛起之后，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以刘湘为代表，军头们很少有思想和发言水准高的，但刘文辉例外，他几乎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刘文辉发言讲话，从不依靠秘书写稿，所有布局、段落、内容全是他一人构思，秘书至多不过执笔整理而已。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不讲重复内容，哪怕是同一主题，每讲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进其他素材和观点。有一个主题，他讲过十八次，十八次的发言稿竟然完全不同。

刘文辉在即席演说时，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就算他说的时间很长，听的人也丝毫不觉厌倦，与刘湘等人形成了不小反差。

演说这一门径向来是小瞧不得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口才，还能反映他的学识。试问现代西方的政治家有哪个不是演说家？不会演说，他们恐怕连政治这个门槛都迈不进去！

《三国演义》中说刘备“不甚好读书”，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继承了家族血脉，在这一点上他跟其先祖刘邦倒十分相像——刘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一段时间还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干过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使这样惊人的举动。

反观刘备的对手曹操就不一样了。尽管《三国演义》描述曹操的出场是“好游猎，喜歌舞”，凡是官宦子弟的喜好一个都不少，但他肯定是饱读诗书，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短歌行》那样的传世名篇?

读书跟不读书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而且大了。仍以《三国演义》举例，刘备的前半生始终飘零无依，其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助阵，却仍屡战屡败，原因之一便只能归咎于他书读得太少，在遇到诸葛亮之前，连“隆中对”这样的战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比之下，曹操的大局观就很强，他能成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也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喜读书、善读书。

刘湘是从刘备这个模子里脱出来的，似乎同样与读书无缘。他小学都没毕业，仅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务的速成学堂也远不能与保定军校相提并论，虽然小时候有一些所谓挑灯夜读之类的神话佳话，但只要看一下刘湘平庸的成绩单，就知道里面有多少水分了。

刘文辉则不同，他最喜读书，像《战争论》这样军政大家的书籍尤其珍爱。平时只要稍有余暇，即手不释卷，甚至在庭园散步时，都不肯浪费时间，一定要让秘书们给他选读杂志上的重要文章。

川中诸侯虽多如牛毛，然而像刘文辉这样军政两方面才能都极为突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包括刘湘在内，大多数人树立权威，依赖的

不过还是手中的军权，独有刘文辉，号称“以军为主，以政为辅”，也就是说他发号施令，靠的不光是膀子粗，还有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如果说刘湘是川版刘备，刘文辉就是川版曹操，从见识到气魄，莫不如此。

七雄四强

刘湘的“闭关亦能自守”并非完全口误，而更可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

二次北伐结束后，张作霖主持的最后一届北洋政府轰然倒地，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俨然已可号令天下。纵使刘湘曾不止一次有过“做皇帝”的梦，但到这个地步，也有了徒呼奈何之感。老实说，能够像刘皇叔那样“三分天下有其一”，他已经庆幸不已了。

刘湘的最高目标，已被他缩小到独守一隅的地方王侯，或者说是统一四川的四川王。有人根据刘湘迷信风水，不断迁移祖坟，就认为他仍想“做皇帝”，甚至还有人列出刘湘“称帝”的具体步骤和“国号”，实际都是捕风捉影，因为它既不符合刘湘相对务实保守的个性，也与其现实处境不相契合。

就在刘湘纠结于如何才能自守的时候，比他小几岁的“幺爸”却把目标定在了问鼎中原之上。

刘文辉不是看不清时势，但他认为，四川光守是守不住的——此处原本就非坐守之地，历史上你看谁坐守四川能守得住的？所以应该“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

刘文辉熟读史书，据他总结，中国历史上平民造反成功者少，而诸侯造反成功者多，既然诸侯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为什么要“闭关自守”，把目标定得这么低呢？

刘文辉公开声称，他要效法土耳其民族英雄基马尔，复兴中华，把中国带向现代化。

在近代中国，不知多少人都想“做皇帝”“当总统”“夺天下”，但大家都憋在心里不说，展示给各界的全是各种各样漂亮的口号，所以也有人劝刘文辉含蓄一点，没必要树大招风，刘文辉的回答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话语之中，孟德公那种敢说敢做、舍我其谁的气概毕露无遗。

刘文辉确实也有足够实力来支撑自己的目标。四川诸侯一度多如牛毛，其间人不安生，互相攻伐，据张澜统计，仅自熊克武建立防区制后，川中即经历大小战争四百余次。诸侯们从“春秋”杀到“战国”，最终大诸侯由数十个合并为八个，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杨森、刘存厚八家，李家钰和罗泽洲常被视为一家，因此又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种残酷而又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每个诸侯都朝不保夕，连刘湘也起起伏伏，多次跌入谷底，只有刘文辉始终保持着蓬勃的上升势头，加上他的防区多在川南，向为富饶之地，就在许多诸侯寅吃卯粮，连过冬都困难的时候，刘文辉的部队却依旧能做到按月发饷。

犹如当年的曹魏之雄踞中原，刘文辉想不做大都难，不知不觉中，他已超越刘湘，跑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在他后面，分别为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四人仿佛是战国时代的秦齐楚赵，所以又有好事者冠名曰“七雄四强”。

距离还在继续拉大。曹操能争霸天下，政治谋略才是他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刘文辉丝毫不让前辈，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直让人看到眼花缭乱。

依靠保定系的渊源，刘文辉首先罩住了邓锡侯和田颂尧。邓田既在四强之列，自然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刘文辉又巧妙地把刘湘系、大邑系牵扯进来，一有风吹草动，便通过与刘湘的家族关系，放风要与刘湘合作，从而对邓田进行威吓和挟制。

“秦齐”联手，“楚赵”必然完蛋，邓田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乖乖地待在保定系里面，跟着刘文辉使枪弄棒。

就算是李家钰的军官系，刘文辉也有办法连宗，因为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四川陆军小学，正是刘文辉曾经上过的学校。

刘文辉左拉保定系，右拖军官系，使得“七雄四强”中的三分之二力量都归入了他的阵营，在与刘湘讨价还价时占尽便宜。

也被他列入了菜单

在刘文辉面前，刘湘相形见绌，他只能以自己在军事方面或许比对方稍强而聊以自慰。可就这点小安慰，刘文辉似乎也不打算再留给侄儿了。

刘文辉用合纵连横来牵制大诸侯，对于实力弱一些的中小诸侯，则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打得对方毫无招架之功。

刘成勋是刘文辉的老上司，对其有知遇之恩，且两人同为大邑系，但刘成勋此时已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防区又与刘文辉毗邻，刘文辉就找了个理由，堂而皇之地将其一并了之。举手投足之间，他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绝情之状，似乎也与昔日的曹阿瞒极为神似。

吃掉刘成勋，刘文辉尽得三师三旅及大片地盘，防区扩展至整个西康。接着，他联合刘湘，对同样曾经辉煌，如今落魄的赖心辉发起致命一击，直至将其赶出四川，驱入贵州。并掉赖心辉，使得刘文辉的防区开始与刘湘密切衔接，两人成了邻居。

小虾米越来越少，刘文辉的胃口却越来越大。在下川东之战中，他连手指头都不用动，就从刘湘手里取得了资、内两县。当然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刘文辉此前与军官系的关系不错，拿下资、内两县，也就等于站到刘湘一边，与以李家钰为首的军官系翻了脸。应该说，刘文辉不是那种气窄量小，见了一点诱饵就忘乎所以的人，他敢伸且能伸手，就说明连"李罗杨"这样的"七雄"之将也被他列入了菜单。

李家钰由于基本没参加下川东之战，所以无论防区还是兵力都尚保存完好，但另外两人可就惨了，杨森是防区全部丧失，罗泽洲也在被打得抱头鼠窜的同时，连失两县。杨罗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都

主张出兵对刘文辉进行报复，同时夺取防区，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在吃食进补之后，也才有力量找刘湘报一箭之仇。

李家钰却并不积极。这位军官系首脑既能异军突起，由邓锡侯的部下起步，进而迈入“七雄”，与邓锡侯等人平起平坐，自非等闲之辈。他有个绰号叫作李矮子，有人说他是“矮子心多”，而李家钰也确实不像罗杨那么莽撞，处理事情比较稳重。

在李家钰看来，如今刘文辉兵强马壮，军官系又刚刚落败，此时并非主动向其出击的最佳时机，如果再次落败，他将成为被二刘追惩的罪魁祸首。退一步说，就算是胜了又怎么样？辛辛苦苦夺回几座县城，单是喂饱罗杨这两个饥肠辘辘的家伙都不知道够不够，他其实并没多少实际利益可得，因此这笔账不管怎么算，都划不来。

李家钰思前想后，认为效仿刘文辉，在“四强”中间玩平衡木才是上策，这样既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又用不着冒险。

见李家钰犹豫不决，罗杨心里都极不是滋味。不是说“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吗，你老人家自然是闲庭信步，怎么都不着急，我们可是度日如年哪！

罗、杨赶到李家钰的防区总部遂宁，哭着喊着求着，要让李家钰担任“同盟军”总指挥。消息一出，四川军官生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闲散的，也都纷至沓来，齐聚遂宁，并且都愿奉李家钰为领袖——只要你只要说一句话，让我们到哪就到哪，绳子一松，亮着牙就给你冲过去。

老大做到这个地步，夫复何求？过去“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待遇，想来也不过如此吧，李家钰欲罢不能，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只

得勉强接过了总指挥一职。

还没等李家钰正式下达出击命令，甚至他手里的绳子都没松，罗泽洲和杨森就龇着牙，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1929年4月，继下川东之战后，上川东之战随之爆发。

军官系闹哄哄的场面早就惊动了刘文辉：知道你们趁我一个不注意，就要出点幺蛾子，果然按捺不住了。

就算“李罗杨”肯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当宅男，刘文辉都有把他们摆上餐桌的心，何况还自己爬了上来，岂不正好？刘文辉集结强大兵力，对罗泽洲和杨森予以迎头痛击，打得他们丢盔弃甲。

盟军攻击受挫的同时，李家钰又收到了一个对他极其不利的情报：邓锡侯、田颂尧也搅入了这场是非，尽管他们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

李家钰、罗泽洲原本都是邓锡侯的部下，后来虽独立出去，但在名义上仍归其节制指挥。刘文辉放话出来，说：“李、罗、杨是四川祸乱根源。”在从政治上将“李罗杨”置于不利境地后，他指给邓锡侯两条路走：一条是惩处惹祸的下级，“平乱”后自有好处，另外一条就是跟我决裂，我另外和刘湘合作，找机会修理你。

同样的两条路也给了田颂尧。邓田都明白，虽然刘文辉出的题目貌似多项选择题，其实可供选择的答案却只有一个。邓锡侯赶快给李家钰和罗泽洲发去电令，要求他们停止作战，各自率部撤回原防，否则刘邓田三家将联合“平乱”。

“四强”中的三强联手，纵使刘湘也得退避三舍，上川东之战一共才打了四五天，就以李家钰宣布撤军而告终。

挖墙脚的人

上川东之战虽然结束，但事情并没有完。刘文辉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哪里肯舍，他裹挟着邓、田两部，继续在后紧逼围攻。李家钰被迫撤出遂宁，退居顺庆。

刘文辉又继续追到顺庆。鉴于李家钰实力仍保存完整，硬攻的话自己难免也要损兵折将，于是他便坐而屯兵，将李家钰围于城中。

李家钰既恨又怕。知道刘文辉狠，没想到会如此之狠，要知道，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曾被逼到那么不堪的境地，最后也没有将对手赶尽杀绝啊！

李家钰所部有六七万人，把个顺庆挤得满满当当。顺庆还算是个中等规模的县城，所以起初生活尚无问题，但以后一天比一天困难，三个月后，官兵不但无薪饷可言，连做到一日三餐都不易了。这时刘文辉又乘人之危，通过邓锡侯和罗泽洲，用挖墙脚的办法，对李家钰、罗泽洲的部队进行内部分化，引诱他们的部下叛离。罗泽洲的部队因此率先垮掉，李家钰所部素来团结，才没让刘文辉从中得逞。

刘文辉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亲自跑到重庆，鼓动刘湘出兵。刘湘出于种种考虑，未予应允，且态度冷漠，但是“二刘图顺”的谣言被刘文辉凭空造了出来。

“三军围顺”加码成了“二刘图顺”，“四强”都把进攻矛头对准了自己，坐困愁城的李家钰更加焦躁不安。恰巧那个给刘湘算过命，有“看相如神”之称的王篾匠就住在顺庆，李家钰便约了参谋长一道造访，以卜吉凶。王篾匠没什么废话，一见面就送了四个字“两人挤座”。

“两人挤座”，恰恰是李家钰此时境遇的暗喻。那请问“挤不过”怎么办呢？篾匠回答：“没坐处就走。”李家钰信了王篾匠的话，人家又不收钱，也没必要阿谀奉承你，还能说谎骗人不成，他决定撤离顺庆。

这次王篾匠真的救了李家钰一命。虽然刘文辉在取顺庆后仍不肯放过李家钰，想要来个一锅端，但邓锡侯顾及过去与李家钰有部属关系，起了恻隐之心，反对继续穷追，李家钰终于得以虎口逃生。

脱逃后的李家钰四顾茫茫，竟然只能寄身于杨森。杨森因为人马少，冲得快，逃得也快。他原先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趁着罗泽洲已垮，趁机接收了罗泽洲的部分防区。见李家钰逃了过来，他倒也顾及情面，把其中的营山腾出来，容许李家钰暂且跟他挤在一个船舱里取暖。

上川东之战发起之前，李家钰麾下有约三十个团，防区和兵力都接近于田颂尧，完全有希望成为新战国时代的第五强。战后只剩下十四个团，三万多人，连原先的一半都没有了，更惨的是还失去了诸侯们视之如性命的防区。

李家钰痛哭流涕，自此对刘文辉恨之入骨，直到刘文辉后来退至西康仍余恨未消。有人要去西康，他就对此人说：“你如果在西康见着刘文辉，只带我一句话，挖墙脚的人被墙打死！”

不知刘文辉听到这句话后会做何感想，但至少当时当地，他对这么做是一点不会后悔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把你们留着，迟早还是要跟我争，不如把你们打到灰飞烟灭，干净了才好！

每打一次仗，刘文辉的防区就扩充一次，经过前后历次兼并，他一人已占有川康八九十县，超过其余“六强”防区的总和，几乎相当于大半个四川，而且这些防区大多较为富庶，自贡盐场等尽在其中，无论地盘面积还是赋税收入，此时的刘文辉都无人能及。

打仗除了可以占有地盘，还能收编人马。有一段时间，刘文辉通过挖墙脚以及发动战争所编并的部队，比他的基本部队还多，最多时，他拥有一百多个团超过二十万人。

作为胜利者和成功者，各种名利都排着队争相向刘文辉涌来，他一人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第二十四军军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进入了他个人的鼎盛时期。

偏不信这个邪

从小，刘文辉就通过阅读线装古书，领悟到了“为政在人”这个至理名言。自发迹之日起，他便以善于拔擢人才而闻名。

有段时间，刘文辉经常到成都公园散步，偶然看到一个青年正在荷花池畔凝神读书。以后他每次去公园，每次都能碰到这个青年。遇到的次数多了，刘文辉就问他所奉何职，他原先以为对方是个学生，一问才知道个失业军人。

一个失业军人，居然能沉得下心来如此认真读书，刘文辉很是欣赏，立即带青年到军部，并直接委任其为连长。

大权在握后，刘文辉更是如周公吐哺般招贤纳士，对“干练之才，知名之士”，皆多方罗致，纳于幕中，平日在他府里出入的，不是腹有韬略的高级军事人才，就是学问广博的文化界名流。在刘文辉的军队里，四个主力师的师长都是他的保定同学，其余将官不是保定同学，就是陆小（四川陆军小学）同学，既干练能战，又服从调遣。

大邑刘氏家族对地方教育均非常重视。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不过一个乡绅地主，但也舍得掏钱在家乡修建中学，并不惜花重金为学校聘请最好的老师。刘文辉本有兴办地方教育之权责，自然少不了大手笔、大投入。他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自兼董事长，办学经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都来得丰厚，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学校实行全免费，毕业后还可出国留学。此外，刘文辉又将成都的多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由省政府出具明文规定，将收缴的肉税拨作该校的专用经费，同时设立“文辉助学金”，以利师生安心读书。

《短歌行》中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刘文辉意气飞扬，他似乎已提前站到绝顶之上，看到了山下的无限风光。这个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已经不满足于在峨眉山要把戏了，他要跳出四川，控制西南。

过去唐继尧倚仗滇军之盛，推行过“大云南主义”。西霸王那点胸襟和气魄，委实过于狭小，刘文辉提出的是“大西南主义”，走的路子与当年的蔡锷相仿。

乘滇黔军人发生内讧，刘文辉把两个异地军长分别扶上马，一个是滇军军长胡若愚，一个是黔军军长王家烈，支持他们打回各自的老家去。其中，王家烈得以成功主黔，胡若愚虽然失败，但所率滇军全部交由刘文辉收编，也算是让刘文辉做了一笔不亏本的买卖。

西南有了交代，接下来便是争衡天下，但与统一四川乃至控制西南相比，争衡天下的难度显然大不一样，而且在刘文辉还没打出西南之前，也早就有人宣布天下是他的了。

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特地用上等宣纸印了一本书册，里面收录了孙中山写给他的十几封亲笔信函。这些信件内容事先都经过精心挑选，以示他蒋介石早就是孙中山钦定的唯一接班人。

蒋介石紧紧抓住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不放，为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挫败政敌，号令天下。其间，他专派曾扩情出使四川，除将这本书册赠送与川中各大诸侯外，也顺便试探一下众人的态度。

刘湘表示拥蒋，他不仅甘居其下，把曾扩情作为“天子使臣”来对待，还跟上了具体行动。当新桂系在武汉起兵反蒋时，按照曾扩情的要求，刘湘立即派一师之众，顺流东下，以响应蒋介石“讨桂”。

见刘湘对蒋介石如此俯首帖耳，其他诸侯也跟着唯唯诺诺，只有刘文辉偏不信这个邪。

天地本无主，要说军阀，在没由你说了算之前，大家都是军阀，要说诸侯，在没让你夺得天下之前，大家也都是诸侯。尹昌衡、熊克武他们叱咤风云的那几年，又有多少人听说过你蒋介石的名字，可见你也和我们一样，不过是新晋军阀或诸侯而已，为什么要白白地把天下让给你?

运气实在太糟糕了

刘文辉并非冒失鬼。在蒋介石如鱼得水，特别是北伐胜利，宣布“统一中国”的时候，他不会突然跳出来与其叫板。他叫板，是在全国兴起反蒋潮流，新桂系、冯玉祥等人车马灯一般，轮换着跟蒋介石较劲的时候。

1929年12月，继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之后，唐生智在武汉打起反蒋旗号。经过前面那么多次反蒋战争的消耗，刘文辉认为蒋介石快吃不消了，或许只需唐生智轻轻一推，就得倒掉。

这不正是我刘文辉崭露头角、逐鹿中原的大好时机吗？袁世凯曾有诗云：“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刘文辉立即加入反蒋阵营，他虽然因远在四川，未及出兵，但还是与唐生智联名发出了反蒋的“东、冬”两电，署名的一干人中，他仅列于唐生智之后，排第二位。

蒋介石曾很看重刘文辉，对他的评估还高于刘湘。刘文辉头上最耀眼的两道光环，一个是四川省政府主席，一个是川康边防总指挥，它们全都是蒋介石给加上去的，但因为这次通电，两人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

发这样的通电，相当于赌博，遗憾的是刘文辉押错了宝。他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高估了唐生智的水平，蒋唐战争的结果是，蒋胜唐输。

这是刘文辉第一次在政治上犯下严重错误。如果他就此收手，像刘湘那样保持低调，或许一切还可挽救，但上了赌台的人，有几个是不红眼的？刘文辉急不可耐地又投下了新的赌注。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织讨蒋联军，并与汪精卫在北平合作组织新政府。至此，蒋介石在军政领域的几乎所有重量级对手一块抱团儿，发动了规模惊人的中原大战。

有了上次反蒋失败的教训，刘文辉这次“看火色”就不能不“看老一点”，他特地留了个心眼儿，没提早涉局，而是强自忍性，一直等到蒋介石似乎已无起死回生之力时，才发出了响应汪、阎、冯以及公开反蒋的“鱼电”。

刘文辉的运气实在太糟糕了，中原大战的战局竟然在最不可能逆转的情况下逆转了。蒋介石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大获全胜，最终将政敌们打得一败涂地。

接连两次致命失误，不仅意味着刘文辉逐鹿中原梦碎，随之而来，他控制西南的愿望亦成泡影——就连贵州的王家烈也不敢不听蒋介石的了。

当刘文辉不得不缩回四川老家，这才蓦然发现刘湘正向他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无论是实际年龄还是从军的资历，刘湘都比刘文辉老，在刘文辉面前本来应该有发言权，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看到的只是：叔父咄咄逼人，侄儿节节退让。

刘湘让步，不单是因为刘文辉占据着实力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更因为他这个幺爸的手腕实在太厉害了。虽然刘文辉已结仇于军官系，但其挟保定系以自重，仅凭一个保定系的力量，就已占去了“四强”中的三席。

在下川东之战前，刘湘派王陵基说和杨森，欲促成“刘杨合作”，当时确有几分诚意，其目的之一就是捏合速成系，抗衡保定系。无奈杨森一介粗人，光知道在速成系内部互争雄长，根本就不懂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

其实就算速成系本身没有裂痕，“刘杨合作”可以实现，速成系也未必是保定系的对手。刘文辉除稳坐省内保定系盟主之位外，还与一些省外军人和武装，诸如王家烈、胡若愚这些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刘湘相信，只要他们内外合力，联成一气，自己别说统一四川，就算想在四川站住脚都有问题。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让就让一点吧，何况再怎么说，他和刘文辉之间还有家族纽带、叔侄之亲。刘湘说要“让”就不会是让一点半点，地盘当然是没少送，就是一般诸侯都很眼热的乌纱帽，刘湘也没吝惜。刘文辉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便有他向蒋介石推荐之功。

问题在于刘文辉“志趣非凡”，你让一步，他进两步，你让两步，他进三步，就没有觉得满足的时候。

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将资、内两县交给刘文辉，当时签有协议，即地盘归刘文辉，收入两家平分，刘文辉拿了地盘，却一个子儿都不肯掏出来分给刘湘。

位于重庆上游的江津原为赖心辉的防区，二刘合力将赖心辉驱走后，刘文辉当仁不让地将江津据为己有，刘湘的部队被阻于城外。这还罢了，刘文辉在上川东一战中尽得李家钰、罗泽洲的地盘，加上江津，已经在事实上对重庆形成了半包围之势。刘湘有一种被人掐住脖

子，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他几次要求刘文辉把江津让出来，但刘文辉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根本就不愿做出任何谦让的表示。

再大度的人，也还有个限度和分寸，刘湘逐渐认识到，刘文辉已成为威胁其事业发展甚至生存的最大障碍，若不奋起直追，他将极可能步刘成勋和赖心辉的后尘，被这个幺爸踢出局外。

于是，当刘文辉高歌猛进，全力向外拓展之时，刘湘选择了收敛心神，大练内功。

桃园三结义

1929年夏，刘湘派使者前往武汉，代表四川的全体道徒欢迎刘从云回川。当刘从云在重庆登岸时，刘湘更亲率道徒到朝天门码头迎候。

自刘从云离川后，二人再次聚首，彼此皆唏嘘不已。刘湘对刘从云极尽推崇，倍赞其在下川东之战中的料事如神和运筹帷幄，并正式尊其为军师。他还在重庆买了一座大房子，布置得非常华丽，命名为“神仙府”，作为刘从云驻节之所。

在重庆内部，刘湘相当于刘备，刘从云自居孔明，自然还少不了关张。刘从云便怂恿刘湘效法“桃园故事”，和他的亲信部将潘文华、唐式遵“桃园三结义”。

有人在背后评论说，潘文华人称潘鹞子，打仗有勇有谋，说他有点美髯公的样子，勉强还说得过去。唐式遵绰号二瘟，性格蔫里吧

唧，怎么也没法跟猛张飞挂上钩，把他列入“关张”，真是乱点鸳鸯谱的味道。

可是看客并不能代替刘湘本人的心思，他所需要的“桃园兄弟”，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打仗猛，而是得“忠”，也就是对他本人效忠。按照这一标准，“白面张飞”唐式遵虽然性格温吞，但绝对够格。

桃园兄弟之外还有赵云。本来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应该是王陵基。王陵基在指挥下川东之战时技惊四座，事后刘湘即派他独立镇守万县，以王陵基的资历和战功，纵使混不上“赵云”，也应该可以弄个“黄忠”当当。

问题是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刘湘的部将个个都拜刘从云为师，王陵基名义上也入了山门，刘从云还特地赐予法号“玉豹”，但他表现倨傲，愣是不愿给刘从云磕头。于是外界便有传言，说王陵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刘湘的老师，应该与刘神仙平起平坐。

其实王陵基不给刘从云磕头是另有原因。

如果说下川东之战前，刘湘及其部下，或多或少还对刘从云在军中的作用存有疑惑的话，那一战之后的感受，就只有用《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张飞的话来形容了：“孔明真英杰也！”王陵基亦概莫能外，刘从云回重庆要经过万县，王陵基超出刘湘要求的规格，对刘从云予以了特殊款待，还请对方给他扶乩，简直把刘从云当成了个活神仙。

扶乩也是一种占卜，如果没有相关信息可供操作者参考，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赖于巧合。刘从云给刘湘扶乩，事关军政要务，当然要慎之又慎，有时还得两人商量着办，为的就是可以瞒天过海，蒙住他

人。相比之下，刘从云在给王陵基扶乩时自然就没那么尽心尽力，结果过了段时间，王陵基发现刘从云的扶乩好像并不灵验。

正好万县来了个跑江湖的王某，也自称神仙。王神仙比刘从云还要能吹，不仅自称能炼丹，可以点石成金，还说他会剑术——不是普通剑术，是飞剑术，可于百步之外取人首级。

不知道王陵基是不是爱看民国时流行的仙侠小说，反正王神仙这种神仙兼剑侠的传奇身份让他十分着迷，自此便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把王神仙供奉在了自己的公馆里。

王陵基既然供了王神仙，就不会再拜刘神仙。刘从云得知内情后十分不满，平时与王陵基也难以相容，他常对刘湘说，王陵基脑后生有反骨，所以才会目无长官。言下之意，王陵基不仅不是赵云、黄忠，而且极可能是第二个魏延。

刘湘虽然肉眼凡胎，看不出灵官身上哪根骨头是反骨，但他有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王陵基自镇守万县后，确实有些不同以往，甚至还偷偷扩充军队，因此已有人给王陵基送了“万县王”或“川东王”的称号。

对于刘湘来说，王陵基的这些行为毫无疑问都是犯忌之举，他早就有所顾忌，只是深沉未露而已，刘从云的魏延之说正中其下怀。

神鬼之道的降临人间，原本就不过是世人用来对付世人的技术方法，王陵基因为迷恋王神仙，让他在刘湘面前彻底失宠，刘从云把“赵云”安在了王缵绪身上。

有德者王

平时在刘从云的“神仙府”里召开秘密会议的，除了刘从云和“桃园三兄弟”外，王缵绪有时也被允许参加，相当于刘湘阵营的核心团队。这其中，刘从云专注于诡道之术，潘唐王只是遵命行事，最终还得由刘湘自己拿主意。

团队的热门话题，当然离不开如何对付刘文辉。刘文辉智勇兼备，军政双修，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真正刀枪不入的人——即便是古希腊神话中被尊为战神的阿喀琉斯，不也有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吗?

刘湘一直在对刘文辉进行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刘文辉的确太优秀了，但太优秀恰恰是他的致命弱点！

这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古往今来的经验之谈，西方的谚语叫作“知的多，老的快”，东方称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刘湘能够拿出来战胜刘文辉的法宝，是他的“厚”。具体方略为反其道而行之，即刘文辉进，他就退，刘文辉硬，他就软。比如，刘文辉对外要“控制西南，逐鹿中原”，刘湘便退到“统一四川，闭关自守”，刘文辉对内要“各个击破，唯我独尊”，刘湘则遵循“群雄并存，有德者王”。

“神仙府”里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周围的诸侯都想知道，力量微弱一些的诸侯尤其关心，他们的驻渝代表都影影绰绰地通过刘从云进行打探。

刘从云并不隐瞒：“就讨论你们的事呢！”

这话听得让人心惊肉跳，讨论什么？怎么兼并我们?

刘从云正色：“胡扯什么呢？我们聊的都是如何帮助和扶持你们。”

据刘从云说，他和刘湘已经商定，今后要对川中诸侯实行忍让和维系政策，做到“政治上一致行动，经济上予以支持”。

诸侯们如闻福音，如释重负。刘文辉疯狂的铁血兼并行动已经让这些“弱小国邦”患上了恐惧症，虽然还不知道谁是要被兼并的下一个目标，但想来轮到自己也不过是早晚的事。不错，刘文辉确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动静了，但对诸侯们而言，这种憋着心思让你猜的短暂宁静，其实更为可怕，弄得你得成天做噩梦啊！

刘湘固然也以统一四川为目标，但相比于刘文辉，终究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口饭吃，太意外，也太让人欣慰了。

担心刘湘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诸侯们一旦饷弹出现困难，或者沿长江西运的物资在万县被扣，就试探着走刘从云的门路，请他在刘湘面前说项。

一试下来，神仙果然灵验，除非你不去求或者不去说，否则大家的愿望大多可以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刘从云更神了，几乎成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一般的诸侯皆以能投于刘神仙门下和入道拜师为荣。

这当然又是一次成功的搭档演出，表面风光的是作为演员的刘从云，幕后赚到盆满钵满的是作为老板的刘湘。

自从刘湘及其团队打出“群雄并存，有德者王”的招牌后，连李家钰这样的新派掌门也要来投奔他了。

李家钰虽经杨森允许，得以驻军营山，但李军有三万余众，营山只是一座穷县，哪里养得起如此多的食客。无奈之下，李家钰只得派代表向刘湘投诚，表示愿归入麾下，听其指挥。作出这个决定，李家钰实在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他是下川东之战的发起者之一，如今却落魄成了叫花子，刘湘完全可以落井下石，趁机报复——要么羞辱一顿，拒之门外，要么编遣队伍，实行“不并之并”。

他想错了，刘湘非常大度。见李家钰穷极来奔，当即予以接纳，并慷慨承诺，今后将由他负责每月供给军饷。

李家钰顿解燃眉之急，可谓是绝处逢生，对刘湘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从此逢人就说：“我的军队能生存下来，全仰甫公（对刘湘的尊称）之德。”

刘湘的买卖当然也很划算。李家钰是一员能打硬仗的战将，仿佛是三国时的马超，有他投效和助阵，必然如虎添翼，而刘湘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一笔军饷而已。

李家钰投奔刘湘，对川中诸侯的集体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众星捧月，争相聚拢过来。刘湘的声势变得越来越大，加上其本身力量的增强，终于可以对刘文辉说不了。

寸步不让

蒋唐战争时，刘文辉曾发出反蒋的“东、冬”两电，那时刘湘虽走了另外一条路线，但从始至终未发一言。及至中原大战，刘文辉又在未事先告知刘湘的情况下，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发出了反蒋的“鱼电”。这次刘湘再也按捺不住了，拍桌子掀板凳地朝刘文辉发火，说刘文辉是在给四川制造灾祸，陷害他刘湘，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湘的愤慨和疑惧完全可以理解，他认为刘文辉不是向外发展，而是在内外勾结，想想看，倘若冯、阎获胜，岂不是把他给夹在了下川东？到时刘文辉和冯、阎想怎么解决他就可以怎么解决他，他的存身之处和政治生命也将一道完结。

还好，早在“鱼电”拍发之前，蒋介石就已说服张学良举兵入关，所以冯、阎失败早成定局，只不过刘文辉自己还懵懵懂懂罢了。

刘文辉的两次误判，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走向了无可挽救的境地，与此同时，刘湘则因蒋桂战争时助蒋，且两次都未有所异动，从而受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倚重和青睐。蒋介石再次派曾扩情入川，虽然曾扩情在任何场合下都避免谈及“鱼电”，当着刘文辉的面也表示了慰问和期许之意，但这不过是怕把刘文辉给逼上极端罢了，私下里曾扩情的使命之一，就是扶助刘湘，使之成为安定四川的重心，以免再出现类似“鱼电”的事件。

外有蒋氏倚重，内有诸侯归心，刘湘与刘文辉分道扬镳的时机已然成熟，不过在此之前，他仍问计于刘从云，为的就是听一听老天爷怎么说。

刘从云经过占卜，得出的结论是：“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川指四川，刘与流谐音）。”

就算是封建迷信也有它的一套理论，并非完全胡诌。川军有五行之说，邓锡侯的锡字从金，杨森的森字从木，刘湘的湘字从水，刘文辉的辉字偏旁可假借为火，田颂尧的尧字从土，合起来就是“金木水火土”。刘从云对刘湘说，水能克火，你注定要击败刘文辉，这是不可违背的天意。

迷信的一大功能，就是能从精神上给你撑把腰，这个道理连目不识丁的古代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每逢准备造反前，一定要搞个类似于“石人一只眼”之类的小把戏，既给别人壮胆，也给自己打气。刘湘听完刘从云的五行理论之后，顿时精神大振，“可以说不”也被他前移到了“寸步不让”。

曾扩情的装腔作势，刘湘的态度转变，都从不同侧面给刘文辉造成了某种危机和压力。他亲自赶到重庆，希望就发“鱼电”前未事先通气打招呼一事，向刘湘做出解释，实际是想继续维系住二刘合作的关系，结果刘湘找了个理由，避而不见。

刘文辉自认有错在先，对此尚不是很介意，倒是与他关系密切的部分家族成员不肯买账，认为刘文辉失了面子，所以非要给刘湘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刘湘的重庆公馆周围场地空阔，林木茂盛。有一天，突然从树上掉下一个东西，大家以为是猴子，细看却是个人。

不审不知道，原来此君竟是个刺客，来自宜宾，而宜宾是刘文辉的老防区，由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帮助维持。这名刺客从外围爬上树顶，藏在树叶丛中，企图寻机行刺刘湘，没想到刘湘防卫甚严，连续三天三夜都无法下手。

三天三夜无法从树上下来，也就等于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刺客也是人，不是机器，饥渴交加之下，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便咕咚一声地掉下了树。

又过了段时间，刘湘忽然头疼脑热，生病躺在了床上。有人跑过来打小报告，说甫公你这个病可不是无缘无故，而是事出有因。

四川军头很少有不迷信的，刘文辉读了那么多书，却也不能免俗，刘湘有刘神仙，他也有万神仙。万神仙不如刘神仙名气大，但做“神仙”的基本功还是有的。据打小报告的人说，万神仙在宜宾开坛做法，立了一个草人，草人上面写着刘湘的姓名和生辰八字。万神仙插刀于草人的头腹之上，念经诵咒，喃喃个不休。

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套绝不会感到陌生的把戏。比如在《红楼梦》中，赵姨娘便买通马道婆，用剪纸人和木偶人，来整治她所痛恨的凤姐与贾宝玉，后果十分严重：贾宝玉“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

赵姨娘和马道婆不过是想让人变成精神病，万神仙以刃加身，却分明是要置刘湘于死地。

刘湘得知后气愤不已：幸亏我身边有刘神仙护佑，要不然可不就一病不起啦！

哪有讲不清楚的

刘湘在家族内部将行刺、诅咒这两件事公之于众，事情被捅开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面对亲友们的诘责，刘文辉矢口否认与此有关，再三表示自己决不会做这种下三烂的事，当然，“他人不敢保证”，言外之意，此事乃刘文彩所为，他本人并不知情。他还向刘湘表示，愿意清查禁止，保证以后再不发生类似情况。

刘文辉的话可信吗？可信。刘文辉是一个富有大略的人，他吞并“七雄”的顺序是由小到大，“李罗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其他几雄尚存、自己又已处于不利境遇的前提下，他绝不会傻到把所有力量都提前消耗在最大强敌身上。

行刺、诅咒事件是真是伪，是否出自刘文辉的谋划，刘湘其实也并不真正关心。他之所以抓住不放且大肆渲染，不过是在使用先主故技而已，即在与刘文辉撕破脸之前，首先从道义和舆论上压倒对手。

舆论不过是一面旗，最重要的还是比拼实力。自第一次采购军火后，刘湘又两度从国外购进枪弹，其中包括德造轻机枪、英造重机枪和上千万发子弹。刘文辉一看急了，也赶紧通过自己的渠道，从上海购买优质钢材，准备运回自己的兵工厂制造武器，但这些钢材一到万县就被刘湘全部予以扣留。

刘湘在下川东之战中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占据了万县，从而得以一手控制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水道。诸侯们从下游采购物资，入川时必经万县，刘湘就像设置海关一样，在万县对物资进行审查，一般物资需要纳税后方能起运，而若是重要军需物资，即便肯交税也没用，一概实行禁运。

应该说，这条规矩并非只针对刘文辉一家，但刘文辉无疑最受触动，因为如此一来，就意味着今后他在军备上再也不能与刘湘抗衡了。

中国人做事，向来规矩是规矩，人情是人情。刘文辉硬着头皮再次来到重庆，想让刘湘网开一面，这次刘湘倒没有借故隐形，不过他说，万县现由王陵基镇守和负责，他不能插手或干预。

刘文辉听后，只从鼻子眼里笑了一声：王灵官再桀骜不驯，你说还我钢材，他能不听你的？不肯还钢材便罢了，还要装，再装遭雷劈！

来一次重庆不容易，既然钢材已没戏，刘文辉决定把话挑到明处，跟刘湘讲讲清楚。

大家都是聪明人，哪有讲不清楚的，说来说去，无非是谁做老大、谁做小弟这点破事。刘湘也不再顾左右而言他，他对刘文辉说："我虽然是你的晚辈，但别忘了，我年龄比你大，发达比你早，资历也比你老，你是受我卵翼起来的，应该听我的号令。"

刘文辉满脸通红："既然你还当我是你的长辈，实力又比你强，就应该由我来指挥和调度一切！"

事情倒是讲清楚了，然而问题更加难以得到解决。刘文辉负气离开重庆，回去后立即展开了报复。

重庆所需米粮均由江津下运，刘文辉便唆使自己的江津守将出面阻止米船经过，重庆方面遣人来问，他便以刘湘的话来回敬刘湘：江津现由某某镇守，那里的一切都由其负责，我不能插手或干预。

你不是不肯还我钢材吗？好，那我就不给你粮食，看谁耗得过谁。

江津一落闸，重庆马上陷入“米荒”，刘湘情急之下，只得跨省购米，以湖南的湘米来补充自身粮食的不足。

刘湘恼羞成怒：我当你是长辈，才叫你一声幺爸。你这回是不是吃错药了，给我来这一手，当我是好欺负的？

他向王陵基发去密电，按照其指示，王陵基从此只要看到是刘文辉的“嫌疑物资”过境，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扣住没商量，武器扣，钢材扣，通信器材扣，就连刘文辉为组建空军外聘的飞行员也被扣在了万县。

这还不算，刘湘又通过蒋介石，从源头对刘文辉进行封杀，刘文辉用重金买来的飞机大炮，全部被原封不动地查扣在了上海。

在刘湘一方，以刘从云及“关张赵”为主流，一直反对二刘合作，而包括王陵基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则意见相反，其中刘湘的参谋长钟体乾更是“二刘合作论”的坚定支持者。现在眼看二刘真的红了眼，不仅合作无望，和谈也即将关上大门，钟体乾等人急忙出来劝解。钟体乾对刘湘说，二刘若真能实现合作，实力将超过川军的三分之二，若发号施令，谁敢不遵？

对于同室操戈，谁也不服谁这个问题，钟体乾的建议是向外发展，比如刘湘向两湖，刘文辉向云南，邓锡侯和田颂尧向陕西。

钟体乾曾任陆军军官学堂教官，与刘文辉有师生之谊，但他这么说并不是要故意维护自己的学生，而是也在为刘湘着想。在钟体乾看

来，若刘湘能采纳其计，不仅能问鼎中原，还可减轻四川战祸，一举数得，乃上上之策。

只是钟体乾犯了跟自己学生一样的错误，如今的世道早就不是蔡锷、唐继尧的时代了，蒋介石对全局的掌控能力，也比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吴佩孚要强得多，刘文辉两次发电受挫，就是个明证。

不是说蒋介石的个人能力就一定超过段吴，而是时移世易，当“春秋”过渡到“战国”，你再拿“春秋”时候的观点来作判断难免会出错。在这一点上，刘湘看得很准很透，他当然不会听钟体乾的。

钟体乾资格既老且极有个性，见刘湘不纳其言，一气之下便不辞而别，到成都省城赋闲去了。

与此同时，刘氏家族也做了最后努力，族长亲自赶到重庆对二刘进行调解。这位族长不仅在族内德高望重，而且还是刘湘的大叔，但刘湘此次一反常态，认定了要与刘文辉一决雌雄，对于任何劝和的声音都听不进去，族内调解终告失败。

二刘对抗正式开始了，双方一面文电相责，一面调兵遣将，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你们觉得怪吧

《三国演义》有一个经典桥段，说曹操刺杀董卓事败，逃亡过程中为老朋友吕伯奢所收留。阿瞒生性多疑，晚上不好好睡觉，还偷听主人家讲话。吕老头出去买酒，他的几个儿子在隔壁商量着要杀猪招

待曹操，曹操却以为是要暗害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吕伯奢的家小。

等到双手沾满鲜血之后，曹操才知道杀错了人，可是他不仅不悔过，还将错就错，又把吕伯奢也给一道送入了地府，这就是那句著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原始出处。

刘文辉素有类似于曹阿瞒的这种性格，而且在他看来，刘湘已经负了他，当然更不用客气了。

刘湘在重庆结束阅兵典礼，坐小汽车返回公馆，路上围观人群密密麻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路边飞来一梭子弹，正打在刘湘乘坐的第一辆汽车上，刘湘应声而倒。行人一边四散奔逃，一边大呼：“不得了，刘军长遭人暗算了。”

刺客被当场抓住，一共五个，绳捆索绑地带进了刘湘的军部。等到他们一抬头，全都愣住了——刘湘端坐上方，连一根毛都没伤着！

军师刘神仙坐在刘湘旁边，盛气凌人地来了一句：“你们觉得怪吧？我们军长是天上星宿下凡，岂是你们几个能伤得了的。”

刺客们正惊疑不定之际，从侧门走出一名军官，相貌与刘湘酷似。原来当天被刺客子弹射中的人不过是刘湘的替身，而且也只是手上挂花。

经过审讯，这批刺客又是刘文彩所派，但毫无疑问刘文辉就是幕后指使。

一个刺客行刺不成，就组团行刺，说是下三烂的事情不做，一旦做出来，还上了规模和档次。面对刘文辉这个“真小人”，刘湘也再次

拿出了“伪君子”的范，不但不杀刺客，还每人奉送一百大洋，将他们送了回去。

当然不是纯粹白送，多少得干点活。刺客们负责给刘文辉带来了一封信，此信为刘湘所写，刘湘在信中说：“感谢你千里万里派人来指教我，提醒我，让我知道还有一个你这样的长辈在天天惦记着我。看到我对来人照顾得好吧，放心，如果你再派人来，我一定还会像今天这样盛情款待。”

刘湘把从刺客们身上收缴到的枪，作为刘文辉给他的赠品，在表示“感谢”之余，还不忘告诉对方：“战场相见之时，再当面谢过。”

刘文辉读信之后气到脸无血色。既然行刺不成，只好用看家本事了，他要用他最拿手，却也是最遭对手非议和怨毒的一招：挖墙脚。

要说刘湘其实也是挖墙脚的行家，王缵绪就是他从杨森那里挖来的，但刘湘因为一直戴着“仁厚”的面具，所以就没人记得这些了，结果反而使刘文辉成为这一行业公认的高手。

擅长挖墙脚的人，都得出手大方才行，在这方面，刘文辉向来是一掷千金，他把已被刘湘收为部将的范绍增作为挖墙脚的重点，支票一掏就是三十万。

不过这次刘文辉的绝招失灵了，范绍增颇讲江湖义气，不肯为了点钱就背叛自己的老大。他假装允诺，收下钱后就向刘湘报告，并将支票上缴给了刘湘。

刘湘对范绍增大加称赞，当即又把支票全部奖励给了他，据说范绍增还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新房。不过另外一名收到刘文辉贿赂的将

领就没这么好运了，因为知情不报，刘湘将其撤职扣留，此人直到刘湘死后才被释放。

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问题是狼未打着，孩子也没了。刘文辉赔了夫人又折兵，可又不敢对外声张，只得自认晦气。

金箍圈

刘湘、刘文辉叔侄二人整天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但作为富有经验的格斗选手，在对方未出现明显破绽之前，他们谁都不会率先出拳。

刘文辉的保定系联盟始终让刘湘十分忌惮，你想，“四强”里面占了三席，刘文辉自己已经实力强劲，再三对一，真打起来又有多少胜算?

刘湘的一个师长献计，建议可以先从内部分化保定系，与邓锡侯、田颂尧结成联盟，这样才能击败刘文辉。

分化保定系的主意，刘湘不是没有想到过，过去他在对付杨森时也经常上演类似好戏。问题在于，刘湘和杨森毕竟同为速成系，部下也以速成同学为主，凭借自己在速成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刘湘要从中做局的话相对容易，邓锡侯、田颂尧及其部属却尽为保定系，要从外面插手进去的话，情况就要复杂多了。因此，刘湘一开始对部下的这一计策表现得信心不足，说：“保定同学在川已成政治上的一种力量，彼此之间虽有矛盾，然而不难言归于好，怎能与我们联合？”尽管如此，他仍答应众人，“试图为之”，可以姑且试试看。

正在这个时候，田颂尧突然派人造访，二刘之争由此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转折。

保定系看似巩固，实则不然。刘文辉在未走向鼎盛时，对邓锡侯、田颂尧还多有谦让，之后则以保定系的唯一首领自居，渐渐变得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川军背后都称其为“幺爸”。他一面联合邓田来对抗刘湘，一面又时时挟制邓田，迫使二人寸步不离左右，完全把邓田当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弟使唤。

邓锡侯、田颂尧再怎么着，也算是“四雄”成员，暗地里免不了牢骚满腹，两人见面都一个劲地抱怨：“刘幺爸的气焰太大了，受不了。”

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邓田轻易还是不敢走出刘文辉用金箍棒给他们画的圈。因为刘文辉会时时警告他们：如果乖乖待在这个圈里，我可以保护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当心我跟我侄儿刘湘合起来将你们一起收拾掉！

两两对阵，三四名毫无疑问干不过一二名，所以邓田即便活得再苦再累，也只好把一泡苦水咽肚子里。

邓锡侯精明滑头，会说话，日子稍微要好过一些。田颂尧绰号冬瓜，冬瓜在四川方言中有傻的意思，他为人也确实有些傻头傻脑，便成了被刘文辉欺负的重点对象。刘文辉不仅从他手里夺走了成都兵工厂，还将“挖墙脚艺术”也移植到他身上，从田军拖走了整整一个团。事后从田颂尧本人到部下将领都大为愤慨，曾经开会决议，要刘文辉“拿话来说”，刘文辉的反应是连个屁都没放，而田颂尧也毫无办法。

田颂尧不仅吃了大亏，还丢了面子，一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二刘闹矛盾让他看到了走出“金箍圈”的一线希望。

别看田颂尧被人叫作冬瓜，但能在残酷激烈的丛林角斗中脱颖而出，且被列为川军第四强，起码的生存和斗争智慧还是有的。他虽然看到了希望，但并未敢轻举妄动，其顾虑跟刘湘离间保定系时的担心相仿，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二刘之间虽有矛盾，可人家毕竟是亲戚，闹了一阵意见后，不难言归于好，怎能与我联合？”

最好能有人先帮着探探路，牵牵线。人是有的，而且出自吾国一种古老的职业，叫作纵横家，也就是苏秦、张仪所从事的那种行当。

既然是“春秋战国”，哪能少得了纵横家们的身影，此辈三天两头地奔走于各大诸侯间，寻找可以投效觅食的地方。刘文辉乐于招揽有学问的高端人才，甚至也愿意接纳万神仙类的江湖术士，唯独看不上主动上门的纵横家。纵横家在他那里吃不开，倒是无脑的田颂尧愿意敞开大门，照单全收。

由纵横家穿针引线，田颂尧终于与刘湘接上了头。田颂尧主动前来联络，究竟是出于真情还是假意，刘湘对此尚不能完全确定，他在与田颂尧所派出的代表密谈后，即指示侦察电台对田颂尧的来往电文进行监听。

为了让自己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四川军头大多重视密电。刘存厚当年每月给绵阳电报局发放津贴，同时派亲信常驻该局，以便于与驻于京城的吴莲炬进行联络。田颂尧在派代表前往重庆后，也一直与自己的代表保持着频繁的密电联系。

有发密电的，便有截获和窃听密电的。所谓侦察电台，就是专门派一些人收听别人的无线电报，然后将其密码按照排列组合的各种可能，编成电报密本。在当时，侦察电台还属于非常前沿的一项技术，四川包括整个大西南都没有这套设备和人马，也没有人预防他们的密电会被人截获，自然就不存在作假的可能。

刘湘的侦察电台建在上海，机构很小却很实用。接到指令后，侦察电台很快便截收到了田颂尧与重庆代表的来往密电，并且成功地翻译出了全文。

刘湘一看，放心了，知道田颂尧没有合着刘文辉来诓他骗他，从此便放心地与田颂尧直接建立电报联系，双方密电来往不绝。

整到你服

刘湘的侦察电台固然是独一份的，但刘文辉通过直接买通田颂尧的密电员，看到了刘湘和田颂尧来往的全部密电。

以为冬瓜傻里傻气，没想到还第一个吃螃蟹，跟刘湘都勾结上了，刘文辉大吃一惊。如果他因此有所警醒，能够意识到以往对田颂尧过于苛刻，从而改弦更张，田颂尧或许还会回头，但他偏偏用的是相反手段。

你不是不服吗，我整到你服！刘文辉又从田颂尧手里抢走了一个团。

左一团，右一团，田颂尧有多少个团也吃不消这样被挖墙脚，而且虽然说都是一个团，但二者情况还有所不同。先前那个团，是上司犯错被田颂尧关了起来，其部因畏罪而投向刘文辉，可以说本身就有被迫的成分在。现在这个团却是驻于田颂尧的防区腹心，且正处于训练期间，在这种情况下，刘文辉都能把它拖走，令田军内部大为震动。

如果说从前挖田颂尧的墙脚，刘文辉还犹抱琵琶，羞羞答答的话，此番则是堂而皇之，不仅派部队前去掩护，还给归顺将领加官赠银。田颂尧忍无可忍，仗着已跟刘湘建立了秘密联盟，便急召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回川指挥，准备与刘文辉一战。

1932年10月，田颂尧调集约三十个团的兵力于成都等地，在城内街巷遍筑工事。他还与刘湘制定了密约，双方预定一个从成都，一个由川东，同时向刘文辉发起进攻。

田颂尧虽然摆出与刘文辉势不两立的架势，却并未下定拼死与之一战的决心。他的部将除孙震外，也大多对战事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田颂尧欲战不战，刘湘便率先启动，以联军总指挥的名义，组织各方诸侯环攻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洲作为联军旗下的急先锋，已率先火力全开。

刘文辉一下子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主要的敌人还是刘湘：如果只与刘湘一对一鏖战，并不一定落于下风，但如果田颂尧与刘湘联手，对付起来就要困难许多。

趁与田颂尧还未完全决裂，刘文辉急忙派部下前去疏通，甚至通过送钱的办法，让田颂尧的弟弟去向他哥哥进行劝说。未料田颂尧傻归傻，脾气很倔，不管谁说到与刘文辉和解的事，都是一盆冷水浇过去，没有一点可通融的余地。当然他也没有马上向刘文辉宣战。

冬瓜的脑子实在过于简单，他以为吓唬一下刘文辉就行了，或者纵使开战，也只需在成都“虚轰一阵”，即可迫使刘文辉让步，以泄心头之愤。

醒醒啊大哥，你的对手可是川版曹操！

刘文辉行事用兵，向来雷厉风行，没有一点拖沓犹豫。在看清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后，他立即将重兵调集到成都近郊。11月14日，刘文辉率先采取主动，揭开“刘田成都巷战”（又叫省门之战）的序幕，田颂尧仓促应战，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

刘田之战争夺的焦点为成都皇城内的煤山。煤山本非高地，不过是一座堆积起来的煤渣山，高不过二丈，也就是才六米多，但因为处于两军交战的中间地段，无论谁占领它，都可就地建立迫击炮阵地，从而威胁对方军部，所以大家均拼死争夺。

刘文辉先攻下煤山，田颂尧急调师长王铭章反攻。王铭章组织敢死队进攻煤山，敢死队员将纸钱烧成的灰糊于脸上或胸膛，以“已死恶鬼”的面目发起冲锋，才再次夺回煤山。

刘文辉见状也组织敢死队予以反击，田军夺到的煤山尚未在手中焐热就又丢掉了。田颂尧脸色大变，决定派孙震亲临前线指挥。在田颂尧的一众部将中，孙震素有善战之名，主战也最得力，他到前线后即下令部队依托城内的民房实行抵抗。

刘文辉的军队在技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们在大板车前面安上钢板，配备机关枪，用这种“土造坦克”向田军阵地发起强攻。见“土造坦克”刀枪不入，田军顿时就傻了眼，好在他们很快发现“土造坦克”没有顶盖，于是便居高临下，从民房上用机枪和手榴弹进行俯瞰打击，终于击退了刘军的攻势。

可是击退也只限于一角，刘军在城内完成三面合围，将田军困于西北一隅，田军粮弹两缺，情况十分不妙。

本来只是想吓一吓刘幺爸，一个不留神，反把自己给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田颂尧沮丧万分，与胞弟抱头痛哭：“不料我的事业就这样完蛋了。”

一旁的孙震尚不肯服输，说“决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但他也只是死了的鸭子嘴上硬，已经拿不出任何反败为胜的有效办法。

刘文辉胜券在握，遂向田颂尧发出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投降，部队接受改编。田颂尧已同意交出部队，但他的部属认为刘文辉欺人太甚，说宁肯“开红山”（即放火）也要冲开一条血路，而决不“俯首就降，任人宰割”。

田军要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刘文辉就觉得有些麻烦，而且这时他得知刘湘正取得节节胜利，并已直奔成都而来。

第八章　五龙闹川

刘文辉起初敢于置联军于不顾，单独打击田颂尧，缘于联军开局的极度不给力。

“杨李罗”在与刘文辉开战后，都仅止于小战，且稍一接触，便告败退。即便在刘文辉调主力离开后，其前线部队还是应付裕如，优哉游哉，将领们甚至可以一边作战，一边下棋。

刘湘担心“杨李罗”是想保存实力，不愿拼命作战，所以专门召集联军会议进行动员，在会上说：“大家要认真打仗，才能早得胜利，我会尽到我的力量，不过以后不要说我的防地占多了呀！”

其实“杨李罗”不是不想使出全力，尤其李家钰和罗泽洲都是在刘文辉手里栽过大跟头的，恨刘文辉恨到入骨的程度，主观上并没有藏着掖着的打算。

关键还是他们早已今非昔比。军官系按照实力重新排名，“李罗杨”变成了“杨李罗”。这里面，杨森的防区才不过四个县，李罗都没有自己的专属防区，罗泽洲在老部队被刘文辉挖墙脚后，新建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弱到简直可忽略不计，相当于川军里的林黛玉，风吹吹都会倒。

意识到“杨李罗”确实不济，刘湘不得不亲自上阵。他这次可谓是来者不善，别人最多一个陆军，他除陆军外，还另外带上了海空军。

海空军

刘湘的空军建立较早。因为经办空军的人外行，加上贪图便宜，从英法美订购到的十几架飞机不仅小，而且多是外国空军或废弃不用，或质量低劣卖不出去的货色。它们在飞来中国的途中便毁损了两架，其余不得不启用船运，才得以安全到达重庆。

在重庆试飞时，同样洋相百出。刘湘的一位师长觉得新鲜，硬要爬进机舱凑热闹，谁料即刻中彩，飞机刚刚飞到半空就坠毁，枉送了卿卿性命。

飞机不中用，飞行员也很差劲。好不容易从上海聘了一个德国人，这哥们儿为了炫技，从空中扔了两颗手榴弹下来，结果不偏不倚地落到人群中，伤了不少人（瞧这点眼力见儿，幸亏还没扔炸弹，否则便可能酿成不折不扣的大惨案）。

刘湘也想过招收本地青年进行培训，但空军不是一般兵种，对飞行员的要求非常之高，所招收人员大多不合格，短时间内也难以培养成才，最后仅几个人能聊以充任。

够简陋够低能吧，可是四川空军独此一家，刘文辉又缺乏高射炮，看到刘湘的飞机也只能干瞪眼。倒是刘湘自己小心翼翼，不敢让飞行员多带炸弹，怕这些技术粗糙的小子瞅不准目标，把炸弹全丢到平民堆里去——四川大内战当时已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大家都盯着看，一旦因此出现平民重大伤亡，刘湘连赖都赖不掉，因为飞机炸弹别无分号，就他能认领。

由于携带的炸弹很少，在大部分时间里，空军都只能起到一个侦察和威慑的作用。飞行员也应付差事一般，架着他们的破飞机，到敌军阵地上空漫不经心地兜上一圈就回来，反正只要保证自己不掉下去便没问题。有一次，飞行队长自恃技术比其他人好，将飞行高度降得低了一些，结果差点被地面机枪给打死，吓得他赶紧将飞机拉起，再也不敢逞强了。

空军不过玩个时髦，真正给刘湘争面子的还得数海军。

川人幽默风趣，有人给刘湘的海军做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是“警告沿江柏木船，浪沉兵舰要赔钱”。一般说来，只有军舰撞沉木船，哪有木船撞沉军舰的道理，其实就是打趣其军舰又破又旧。另外还有人说刘湘所谓的军舰，不过是从前吴佩孚留下的两只小艇，刘湘接收过来之后，放上几十个步兵，摆上机枪迫击炮便堂而皇之地拿出来充数了。

其实他们都说错了，至少在四川境内，刘湘的海军还没那么差劲。他一共拥有三艘主力舰，其中两艘浅水炮舰系在上海定制，由德国造船工程师主持设计，设计时参考了川江的水流特点，属于量身打造，刘湘分别将之命名为“巴渝”“长江”。

要说稍微寒碜一点的，应该是第三艘军舰。它原来是一艘川江商船，改装后命名为“嵯峨”。刘湘就以这三艘军舰组成川江公安舰队，并任命重庆籍的蒋逵为舰队司令。

有道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但实际上蜀中人才向来灿若群星，只看你需不需要，能不能重用他们。蒋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商船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双料生，出国见过世面，既能指挥海

船，又能驾驶飞机，称得上是难得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刘湘招纳到蒋逵之后，便将海空军都交其掌控。

当时二刘各据川江的一半，刘文辉据有上半段，即从乐山到泸州再到重庆上游的江津这一段。刘湘沿川江分段进击，使得江上几乎没有对手的川江舰队得以一出场便唱起了主角。

“巴渝”“长江”的设计为头尾安炮，旁设机枪。蒋逵在率舰队向江津驶近的过程中，遭到岸上刘文辉部队的射击，他下令以机枪对守军，以大炮对工事，分别予以还击。

蒋逵回川前，在北洋和北伐军中都服过役，有着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这么做，重点不在于杀伤对方，而是为了施行心理战术：当前线敌军听到枪炮声由远而近时，会认为舰队正向江津开去；炮声由近而远时，会认为舰队已驶近江津，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

刘文辉既无海军，他的部队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江上拦截，水下甚至连个障碍物都没有，川江舰队轻而易举地就穿过了岸上的火力网。如同蒋逵所料，他们果然慌了手脚，还没怎么交火，便纷纷向城内退去。

舰队到达江津附近后，蒋逵下令舰炮不得停顿，继续向江津城的后方轰击，同时指挥空军朝城里投弹——哪怕投的全是手榴弹也无所谓，重点是施加心理压力。

早在江津之役前，刘文辉已抽调重兵去成都，江津的守备力量本来就较为薄弱，他们先是被前线退兵搅乱了心神，接着又担心后路被包抄，便全弃城而去。

夜闯鬼门关

如果说江津的丢失还触动不了刘文辉的神经，江津之后的泸州就不同了，这里是他的经济命脉，丢不得。

虽然刘文辉此时正要进攻田颂尧，但仍抽出两旅精锐驻守泸州，同时鉴于江津失守的教训，他又把所有能集中的大炮都集中起来，放置在泸州江岸边，用以建立炮兵阵地，另外还象征性地在水下布置了一些障碍物，只是由于缺乏水雷，并不能起到多少实际效果。

四川人有句口头禅，叫作“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泸州号称小重庆，地形上与重庆接近，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著称。虽然说有了飞机大炮之后，天险已不足恃，但要攻破它也并不容易，从刘湘、刘从云到蒋逵都为此绞尽脑汁。

蒋逵经过策划，在离泸州不远的沙滩上建立了一个飞机场。飞机除毁损的外，一共还有十二架，他算了一下，如果把这十二架飞机都集中在沙滩上，大号飞机装四颗炸弹，小号的也能装两颗，平均每架次可装三颗，总计每次可装炸弹三十六颗。飞机由沙滩起飞到泸州只需几分钟，即便加上给飞机加油以及装弹时间，仍可做到每半小时对泸州轰炸一次。想想看，泸州才多大一点地方，又没有起码的防空设备，这样从早轰到晚，守军还能抵抗多久?

蒋逵算的是很精，可问题是要实施这样的大轰炸计划，作为“仁义之君”的刘湘根本就不敢，他害怕投鼠忌器，伤了民心，至于蒋逵和飞行员们，都不过是给老板打工而已，当然也不愿直接来背负这个责任。

在和刘从云商讨半天后，刘湘决定改变空军作战方案，他让蒋逵带五艘商轮，先开到泸州的对岸，在那里载运陆军，然后再对泸州实施强行登陆战。

登陆战的具体发起时间是由刘从云敲定的，为11月11日晚间11时（看数字就知道了，一定又是刘神仙掐出来的黄道吉日）。身为军人，蒋逵一生经历过很多战事，大多已记不起发起的时间了，唯有这一次，永远不会忘记。几个“11”凑到了一块，数字特别好记当然是一个因素，但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

接到任务后，蒋逵很纳闷，因为新的作战方案看上去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一定要到泸州对岸去载运陆军？直接在出发地点装上陆军，找一个火炮打不到的地方，把陆军送上岸不就行了，都用不着这么黑灯瞎火鬼鬼祟祟。

川江航道艰险，水流湍急，历来就没有黑夜行船的规矩，而且蒋逵已通过飞机侦察，知道刘文辉在泸州岸边部署了强大的炮兵阵地，水下还设有障碍物。三艘主力舰加上五艘商轮，这么多船鱼贯而进，不可能不引起岸上火炮的猛烈轰击，此行无疑将非常危险。

纵有再多疑惑，也抵不过军令如山，蒋逵只能遵令而行。

在舰队夜行过程中，为了避免暴露目标，舰轮必须全部熄灯，同时又要相互隔离，以免发生碰撞，真个是令人胆战心惊。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但泸州守军早已做足防御措施，舰队在距敌炮兵阵地不远的地方就被发现了，随即便遭到了火力阻击。

此时舰队进退两难，蒋逵身边的官兵从未经历过如此险境，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浑身哆嗦，神情十分紧张。蒋逵一边命令舰队加速前

进，一边给部下打气："敌炮没有什么可怕的，距离越近，不是更危险而是更安全，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炮放平，对准军舰打！"

舰队玩命狂奔，好不容易驶抵泸州城上游，脱离了岸炮射程，尽管军舰和商轮未受到大的损伤，但船上的烟囱都早已红似火炭。

说是不可怕，部队还是阵亡了好几个人。蒋逵下舱察看，发现一颗子弹打穿了司令部卧室的门隙，从床上穿过，若是他当时躺在床上，也就一命呜呼了。

后来蒋逵才得知事情真相。原来刘湘让舰队夜闯鬼门关的真实意图，竟然不是要载送陆军，而是为了复制江津之役，试图用舰队闯关来把泸州守军给吓跑！所谓载送云云，只是为了哄骗包括他在内的舰队官兵，以免海军胆怯，不敢执行任务。

在感到不寒而栗的同时，蒋逵也算是看清了刘湘"仁厚"外表下的另一张面孔。

神军

刘湘、刘从云处心积虑地玩花招，海军舰队也按照命令到达了泸州上游，可是泸州守军并未撤退。

对"神机妙算"为何没有成功，刘从云有能够自圆其说的借口。按照他的解释，舰队为了做出发准备，没能在当天晚间11时准时上驶，实际上是第二天，也就是12日凌晨1时才出发的。虽说也有个"1"，毕竟不同了。

泸州守军不肯撤退，海空军的功能也用到了极限，地面进攻便成为决定胜利的关键。刘湘调集的围城兵力多达四个旅，泸州守军一共才两个旅，但部队就是攻不进城。

不是攻坚火力不够强，事实上，川军之中没有比刘湘更强的了。

刘湘很早就在重庆办了一家兵工厂，对外称武器修理所，开始也确实只能修理，后来不断扩大，就变成了以制造为主。截至1931年，这家兵工厂仅机床便达三百多台，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扣留刘文辉的军用物资。

刘文辉喜欢招揽高层次文化人，刘湘则对礼聘技术型实用人才颇有心得。在重庆兵工厂，既有原成都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高级技师，也有在国外学习过机械制造的留学生，兵工厂的研制和仿造能力都很不一般。

刘文辉的成都兵工厂以生产步枪及其子弹为主，重庆兵工厂很少制造步枪，因为步枪随处可以买到，它生产更高端的：捷克式轻机枪。

重庆兵工厂前后一共生产了千余挺捷克式，分发全军各个步兵连使用。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四川出品的捷克式都质量优良。后来南京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来厂视察，连他也甚感惊异，说我们中央花了一百多万元也没能搞出捷克式，没想到刘湘这家厂却能制造，很了不得。

除了捷克式，重庆兵工厂还大量制造迫击炮，这些迫击炮分小、中、重三个类型，达千门之多，须常年用六七座大仓库才能进行储存。

泸州城下，刘湘把他的重型火力全都搬了出来，捷克式轻机枪和各种类型的迫击炮排得密密麻麻，白天袭，夜里轰，闹腾了好些个昼夜，却始终拿守军没什么办法。

看来还是不够神啊，有没有更神的？有，这就是“神军”。

海空军不用多解释，唯独这个神军，若不加以旁白，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神军者，刘神仙缔造之兵也，皆为各道馆的青年道徒，就连所持枪械也为道徒从上海集资购买。在刘湘军队内部，他们被编为一师，称“神兵师”，对外编号为“模范师”，师长由刘湘兼任，但整师实际由刘从云掌握。

神军与一般陆军有啥区别？回答是：刀枪不入。

组军之前，刘从云给这些道徒操办了三天三夜的“移星转斗会”，点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其声势可直追当年诸葛孔明的“北斗攘星大法”。

道徒们在“转移星斗，脱胎换骨”之后，刘从云便关起门来，焚香秉烛，把《三国演义》里的武将都“请下仙界”，附着在弟子身上，并教授道徒们“神功”，比如关羽的拖刀计，黄忠的百步穿杨。

刘湘号称拥有“海陆空神”四大兵种，神军是压轴的，在海陆空军都失败后，自然就要轮到这些天兵天将了。

神兵们自信刀枪不入，比普通陆军士兵要有胆得多，在他们那种似乎完全不知子弹为何物的气势下，泸州守军起初也有些发蒙，竟然让几十个神兵冲入了自家阵地。可是结局又是悲剧性的，守军试着开

了一枪，神兵立刻栽倒在地，一命呜呼。剩下的神兵没料到会有这一幕，傻在当场，被守军生擒活拿。

死了倒还好，可以宣称是升天了，被人家活捉可就把刀枪不入的牛皮都给整个捅破了，刘从云在听到战报后顿时面红耳赤。

神军折戟后，刘湘亲自到一线督师，但仍是一筹莫展，所部死伤过半，尸体都聚堆漂到了重庆码头，其部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泸州迟迟难下，弄得刘湘和刘从云均不知所措，有人讥讽他们说："海陆空神，打不进泸城，恼了刘湘，羞煞从云。"

就在刘湘无比沮丧的时候，又是新技术挽救了他的命运。

这项新技术就是侦察电台。在侦察电台得以破译田颂尧的密电后，刘湘立刻意识到了其重要性，随后就把原设于上海的侦察电台搬到了重庆。侦察电台日夜监控刘文辉的电波信号，泸州守军给刘文辉发去的一份份来往密电均被成功截获并破译。

泸州激战阶段，也正是成都巷战处于关键之时，刘文辉无法全军抽出，在接到泸州的请援电后，便答应派三个旅前往支援。刘湘按照侦察电台所提供的情报，派潘文华在途中分别截击，把三个旅都打了回去。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无论刘文辉还是泸州守军，都没有意识到是电报泄密，只以为刘湘是从别的途径得到了情报。尽管泸州守军拒守甚力，但久战之后，

弹药消耗很大，所以他们不得不再次向刘文辉发出一份告急密电，要求增援弹药。

刘文辉回复，会立即派人押运弹药，并定于某日从龙透关方面入城，到时请泸州守军出城接应。正是这份被破译的电报，帮了刘湘大忙，到了刘文辉约定入城的这一天，刘湘设伏于龙透关，不仅截夺了弹药，还乘势攻陷了泸州城。

拿下泸州，刘湘为自己翻了身，也给他的军师正了名——从截击到伏击，都被说成是刘从云的未卜先知，一方面是保密需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巩固刘从云“神仙军师”的权威。

鲁迅对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一句不客气的点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评论家当然有评论家的自由，但小说中诸葛亮的形象在现实生活里早就深入人心，有了这么一个“多智而近妖”的人在军中，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刘湘部队精神大振，继攻克泸州之后，又连破包括宜宾在内的七座城池，直迫乐山至成都一线。

早在刘湘兵临泸州城下时，面对不利战局和自己的艰难处境，刘文辉就曾声泪俱下，对多方树敌颇有悔意。此时成都巷战已近尾声，要灭掉田颂尧应该不成问题，但看田军那副咬着牙搏命的架势，结束巷战的时间必将因此拖延，他的兵力也将被继续牵制在成都。

谁才是最大的敌人，不是田颂尧，是刘湘！刘文辉急需回头，但又怕田颂尧死灰复燃，胶水一样粘在屁股后面，甩都甩不掉。正在踌躇之际，邓锡侯主动上门，要求帮他调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文辉喜上眉梢，在邓锡侯的安排下，他和田颂尧在成都的邓公馆会面，商谈停战。

这种时候，刘文辉能够放他一马，自然是田颂尧求之不得的事，两人互致歉意，杯酒言欢，席上商定，田颂尧除留一个团象征性地戍守成都外，其余部队全部撤走。

刘田巷战结束了，一共打了十一天，但给成都造成的损失，丝毫不亚于十几年前的刘罗、刘戴巷战，真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成都人心有余悸且激愤难消，在知名人士的倡议下，他们荷锄携筐，把煤山削到了平。虽说这是病乌及屋之举，但冥冥之中似乎亦有感应，此后成都再未爆发过类似巷战。

刘文辉需到前方与刘湘决战，成都后方怎么办，是不是得派人继续盯着田颂尧？邓锡侯自告奋勇，愿亲自镇守成都，为刘文辉解除后顾之忧。

刘文辉还有些不放心，对邓锡侯说："如果你无诚意，我现在一个电报就可以与刘湘言和。"

邓锡侯信誓旦旦："二刘作战，即是保定系与速成系作战。我是保定同学，最低限度也当恪守中立。请你放心，我不仅会守住成都，必要时还可亲自率部，协助你与刘湘一拼，一言为定。"他再三保证，在刘文辉得胜回朝之前，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一支部队进入成都，更不用说是田颂尧了。

朋友相处之道，不看怎么说，而要看怎么做，真做点什么，才能叫真诚。刘文辉对邓锡侯感激不尽："外界都说你滑头，是水晶猴，我看你为人很真诚，这个时候还肯助朋友一臂之力。"

有邓锡侯督军于后，刘文辉得以抽出精锐主力，一心一意对付刘湘，由于战事主要集中在刘湘已经占领的荣县、威远，所以称为荣威

大战。

二刘对决真正开始了，刘湘的手心里攥出了一把冷汗。之前在沿江区域，他的海空军作用不小，到了荣、威一带，军舰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空军虽仍能参战，但缺乏陆空协同作战的意识和能力，刘湘不仅担心伤及平民，更害怕两军混战，短兵相接时，飞机会把炸弹投到自家阵营（蒋逵曾编定陆空协同信号奉送陆军，无奈一打起来，众人就都忘了，以至于从未有人使用过这些信号）。

没有了海空军的襄助，只能陆军对陆军，想取巧已不可能了。再从兵力对比上看，刘文辉拥兵七万，刘湘拥兵五万，刘文辉处于攻势，刘湘处于守势，对刘湘而言，前景确实不容乐观。

战前必须制订作战计划，但川军的所谓作战计划，大多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大家上了阵，并不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而是习惯于直接下达口头命令："敌人在河对面，你们给老子拿下来，敢不敢去？不敢去的是乌龟王八蛋！"

既然作战计划订得好与不好，对实战都没有太大影响。为了图个吉利，争取中个头彩，刘湘便干脆让刘从云负责拟订作战计划，刘从云用扶乩的方法算了一通后，便把作战计划填好交给了刘湘。

老套的战法

与作战计划的落后简陋相应，以刘湘为核心的速成系，其作战方法和思维仍然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时代，体现在实战中就是防御不讲纵深，全部呈一线布防。

刘湘自己虽从军多年，还获得了刘莽子的称号，但冲过来杀过去，也不过就是在不停地重复这些攻防程序而已，其间完全没有多少创意或变化可言。

速成系之短，正是保定系之长。邓锡侯、田颂尧在保定系中尽管也属于大佬级别，然而他们指挥作战的水平，充其量只能排在中等，真正能够代表保定系技战术能力和素养的，还得说是刘文辉。

刘湘排兵布阵的缺陷和弊病，被刘文辉一眼看穿。荣威大战开始后，双方激战多日，胜负难分，此时刘文辉突出奇兵，向刘湘的侧背发起猛烈冲击，从而打开了缺口。

一线防御最怕的就是某一侧缺口被打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弱兵固然支撑不住，就算强一些的兵马，也不敢不撤，因为他们后面没有部队，不撤的话，等待着他们的便是遭到围歼。

刘湘被迫向老君台退却。老君台乃荣、威前沿的战略要地，刘文辉眼明手快，抢先拿下了这一要地。刘湘急忙上前争抢，两军都不肯放弃老君台，结果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总计投入兵力竟然达到了两三万人。

刘湘用的是一种很老套的战法，防御简单，进攻上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列成横队，一线冲锋”。在前线督阵冲锋的是潘文华，潘文华号称刘湘手下最勇之将，可与关云长媲美，然而落后的战法让他也大吃苦头，所部血拼竟日，当场战死者便达三千余人，伤者无数。

老君台一役成为荣威大战中的著名恶战。刘湘急调王缵绪、范绍增进援，但二将同样被杀得落荒而逃，与此同时，另一翼的唐式遵也

精疲力竭，仅剩招架之功。

在技战术落后的前提下，什么“绝对美髯公”“候补赵子龙”“白面张翼德”全都无济于事，刘湘的各路大军均告失利，只得退守荣、威，筑防固守。

刘文辉又出奇兵，他派精锐部队间道丛林，从背后绕袭荣县。这支突袭部队成功占领了荣县，后因未能与正面部队取得联系，才自行撤离。纵然如此，对刘湘的军心已造成极大打击。

面对一败再败的窘境，刘从云首先跳起来，认为是刘湘没有照他制订的计划作战，才会吃败仗。其实以前行军作战，刘湘也没有哪一次能够原原本本照刘从云的卜卦本子上课，包括泸州之战中的舰队闯关，不也错过时辰了吗？只能说，败仗吃得太多，大家都不可能再淡定得下去，互相埋怨是免不了的。

刘从云情绪失控，与神军受挫也有很大关联。他的神兵师虽在泸州出了糗，但实战多了也渐渐有了军事经验，道徒出身的官兵比一般军人更具优势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理很强大，在战场上敢拼能杀，这使得神兵师渐渐上升为刘湘军中不可或缺的主力部队。

可还没等刘从云得意呢，神兵师就蒙受了惨重损失，老君台一役，该师一个主力旅剩下千人左右，连一个满员的团都凑不足了，至荣县被占，师里的所有军用物资又都被刘文辉席卷一空。

刘从云心疼不已，他对刘湘大发脾气：“我这个计划乃扶乩得来，代表天意，你不按照我的计划作战，便是违反天意，违反天意怎能不败呢？”

“神仙军师”借题发挥，而且越说越来气，最后一甩袖子，回家，不干了。

军师走人，刘湘最为倚重的战将潘文华也身染重病，乃至卧床不起。刘湘一向稳重内敛，待人宽厚，此时忽然一反常态，竟然给潘文华下达了死命令：“不要说得了重病，你就算奄奄一息，也得给我爬起来指挥，绝不允许再退后一步。”

刘湘真是急糊涂了。荣威大战开始以来，他没有能在刘文辉身上占得一点便宜，这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极为罕见。

胜败本来是兵家常事，比如刘湘也曾多次败于杨森之手，但杨森打仗并没有脱离速成系的路子，不过是特别悍勇罢了，最起码，你知道怎么防他攻他，以及如何与之周旋。可是这些对刘文辉都完全不起作用，两军交战，真是防也防不住，攻也攻不上，刘湘能做的，似乎就是败了退，退了败，然后不断重复。

谁能来救他的命

就在刘湘不知所措之际，侦察电台送来了一份破译电报。这是刘文辉的前敌总指挥发给刘文辉的密电，上面提出了制胜的两条计策。第一条，是在已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对刘湘发起总攻，实战中仍突出一个“奇”字，即正面佯攻，出奇兵绕过防线，实行前后夹击。

对于保定系将领惯用的这种奇袭打法，刘湘倒是已见怪不怪，让他感到格外惊骇的是密电中透露的第二条计策。这条计策说，应乘刘湘专注于前线，派五个旅“附自贡之背”，乘虚直捣重庆。

刘湘本人就在自贡督师，所谓“附自贡之背”，就是从自贡的边上穿插过去，然后直达重庆。这时刘湘的主力都已集中于荣威战场，留守重庆的仅有一个旅，战斗力又很薄弱，五个强旅攻一个弱旅，要攻下重庆，基本上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可以预计，如果此计能成，刘湘一方等不到防线被攻破，败局就已不可避免，而且从此将永不能翻身。想到此处，刘湘的眼睛都直了，他一边给重庆守军发去急电，要求抢筑防御工事，以备坚守，一边刘文辉写了封亲笔信，让人拿着去找刘文辉，“向幺爸请和”。

在发出求和信后，刘湘仍然忐忑不安。知叔莫如侄，刘文辉是一个要么不打，要打就一定要清盘到底的人，何况他已经胜券在握，为什么要跟你讲和呢?

必须再找人施以援手。此时此刻找人求援，就等于是喊救命，着实有些丢脸，但有什么办法呢，再不喊，命可就没了！

关键是谁能来救他的命。“七雄”里面，刘存厚早已靠边站了，“杨李罗”退至末游，田颂尧在巷战中被刘文辉给打得一败涂地，能救刘湘的命的便只剩下了邓锡侯。

局外人可能觉得奇怪，邓锡侯又是帮刘文辉调停，又是守城，他凭什么会反过来救刘湘? 你要是这么想，就说明你还不是真正了解邓锡侯。

田颂尧给刘文辉挖了两下墙脚，就觉得受了天大委屈，恨不得嚷嚷到让全世界都站出来替他讨公道，做这种事的人，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冬瓜。邓锡侯不是冬瓜，他是水晶猴。

要说委屈，邓锡侯其实比谁都更委屈。刘文辉的挖墙脚和抽鸦片一样，已成癖好，哪怕是窝边草，都照吃不误，挖田颂尧的同时，他也挖邓锡侯，而且是狠挖，拼命挖。

田颂尧不过才丢了两个团，邓锡侯被刘文辉拖走的是一师两旅！

要照田颂尧的样子，邓锡侯绝对有理由跑到刘文辉的家门口，咣咣咣地朝大门踢上几脚，然后吐上一口唾沫，再在墙上给刘文辉贴一张大字报。

可是邓锡侯什么都没做，甚至也未像田颂尧那样派人与刘湘制定密约，他打碎牙和血吞，仍然装得跟个没事人一样，见到刘文辉依旧毕恭毕敬，当对方是保定系的绝对老大。

直到在成都门外，恭送刘文辉率师出征，邓锡侯的眼睛里才露出了凶光。

邓锡侯曾与刘文辉有约在先，不让任何其他部队进入成都，但刘文辉的背影一消失，邓锡侯便立即大开城门，把周围其他诸侯包括田颂尧、刘存厚甚至是刘文辉的死敌李家钰都放了进来，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局面搅混，甚至于联合更多的人来对抗刘文辉。

刘文辉在前方打得起劲，还不甚留意，刘湘一个劲败退，早就左瞻右顾，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鲁迅评价《三国演义》，还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所谓“伪”，也就是俗语中的“装”，其实三国中的刘备不是什么“似”不“似”，他就是很“装”。不过这也不难理解，一个人在生活

中再谦逊和善，他对某些人“长厚”是容易做到的，但要说对遇到的几乎所有人都“长厚”，不虚伪做作一点，怎么可能做得到?

刘湘的性格当中，也有很大“装”的成分，应该说，在这方面，他跟水晶猴颇有共通之处，可谓心有戚戚，所以对邓锡侯的把握和认识，相应就比“真小人”刘文辉来得更准确更到位一些。

邓锡侯一开城门，刘湘就知道了他对刘文辉的真实态度以及心中所存的危机意识。也就是说，邓锡侯虽然暂时还无力量与刘文辉单挑，但他绝不会坐视刘湘被刘文辉所灭，因为刘湘如果垮掉，刘文辉对他就不会只是挖墙脚，而是要大口吞并了。

这正是刘湘在极其危急时刻，只能也可以朝邓锡侯喊救命的原因所在。

咬人的狗不叫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拟一份求援电给邓锡侯了。假如实话实说，把自己的困境如实描述一遍，猴子油头滑脑，会不会不敢来？基于这一顾虑，刘湘在电文中写了一句话：“胜利在握，请速发动攻击，毕竟全功。”——我这边已经快搞定了，就差你搭把手，刘文辉一推即倒。

把这句话写完，刘湘自己也心跳不已。

心跳倒不是因为说了谎。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装”已成为基本生存法则，有时候甚至除了谎言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刘湘心跳，是觉得不踏实，想想邓猴子比谁都精明，前线战况真能糊弄得了他吗?

刘湘决定找一位能干的谋士商量一下。此人叫张斯可，毕业于速成学堂。据说学生时代的张斯可上课老爱打瞌睡，老师看到后便惩罚性地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不料张斯可对答如流，毫无破绽。

在成为刘湘的幕僚后，张斯可仍然保持着爱打瞌睡的习惯。他喜欢喝茶，而且用的是两只碗两种茶，一只碗泡的是成都产的花茶，一只碗泡的是重庆产的沱茶，张斯可喝一口花茶，就闭起眼睛养一会儿神，然后再饮沱茶，喝完之后再靠在椅子上打瞌睡。除了喝茶就是睡觉，他平日里似乎就做这两件事，但只要谈及正事，马上目光炯炯，且雄论滔滔，因此人称"睡诸葛"。

张斯可受召进帐，看完电稿突然问刘湘："你是愿意邓锡侯从速出兵，还是再观望一段时间？"

刘湘说当然是要尽快，越快越好。

张斯可一笑："如果邓锡侯看了这份电稿，他只会继续观望。"

刘湘忙问为何。张斯可分析说，邓锡侯其实是在坐山观虎斗，非得等到"大虎伤，小虎毙"时，才会露面。如果电稿上写"胜利在握"，基于邓锡侯对荣威战况的了解，他就会判断刘湘一方尚有余力，或还有什么绝招藏着没使出来，也就不会马上加入战团了。

张斯可一针见血地指出："邓锡侯拖得起，我们拖不起，如此岂不要弄巧成拙，误了大事。"

刘湘恍然大悟，看来确实低估猴子的智商了："那依你看，电稿该怎么写？"

张斯可早就替刘湘想好了，这么写——“湘智力俱竭，势难支持，请立进兵，以免功亏一篑，同归于尽”。反正必须让邓锡侯知道实情，告诉他，小虎将毙，大虎已伤，这场虎斗行将结束，你再不登场可就晚了。

张斯可断言：“只要邓锡侯收到这份改写后的电稿，必立即出兵，刘文辉腹背受敌，我们的困境可解。”

刘湘一听大喜，多少天来蹙紧的眉头也为之一展。

不出张斯可所料，邓锡侯在接到刘湘重新改写过的电稿后，果然再也坐不住了。趁刘文辉不注意，他派三个师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刘文辉军的后方。

与田颂尧嚷嚷之后却欲战不战不同，邓锡侯是不出手便罢，一旦出手，就一定要朝着对手的要害部位来，而且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这就叫咬人的狗不叫。

刘文辉措手不及，急忙从前线调兵援救其后方。刘湘通过侦察电台，发现唐式遵前的敌军正准备回撤，便下令唐式遵发起反攻。

唐式遵早就被打蒙了，身上已全无一点“白脸张飞”的气概，接到刘湘的命令后仍傻乎乎地站着一动不敢动。这时刘湘已经向刘从云赔罪，派人从老家把他接了回来。见唐式遵真的成了“二瘟”，刘从云拿起电话，对唐式遵说：“这是我算出来的，刘文辉的兵次晨拂晓必退，此为天意，你不可拂逆天意。”

经过不断的渲染渗透，军中对刘从云已形成一种迷信，都以为他算无遗策。特别是在泸州伏击战后，刘从云更俨然成为“多智而近妖”

的孔明化身，甚至他对荣威大战失利的解释，也被许多人认同。大家都在背后嘀咕，说要是刘湘不折不扣地按军师计划行事，哪里会败成这个样子。

刘从云的卜卦比刘湘的命令还管用，唐式遵第二天便率部出击。出击之后，他惊喜地发现，神仙的预言竟然分毫不差，刘文辉的部队都在纷纷撤退。趁敌军已无心恋战，唐式遵衔尾追击，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虽获小胜，但刘湘心里很清楚，他的部队已疲困不堪，若刘文辉弃邓锡侯于不顾，仍专心致志地发起总攻和奇袭重庆的计划，那他仍然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湘见好就收，给刘文辉写去了第二封求和信，希望幺爸看在家族情谊的分上放他一马，为此还引用了曹植那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句。

就是一碗毒药我也要喝下去

收到刘湘的信，刘文辉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除恶务尽，一竿子插到底，要么答应刘湘的请求，罢兵休战。

刘文辉有和刘湘打到底的必要，也有这个能力。邓锡侯说得好听是第三强，然而他的实力与二刘相比，还是相对弱小，从长远来看，能与刘文辉争霸四川的主要对手只能是刘湘。对于刘文辉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暂时放过在他背后捣乱的邓锡侯，集中全力，一鼓作气击溃刘湘。

可是刘文辉正痛恨着背信弃义的邓锡侯，怒火战胜了他的理智，他要借着刘湘的这封信，与刘湘达成和解，转过头来干掉邓锡侯。于是一个可能决定刘文辉后半生命运，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战机与之擦肩而过。

二刘停战议和，刘湘顾虑刘文辉可能会对邓锡侯进行报复，因此特地在和约条款上注明，要求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否则他将出兵援助邓锡侯。

其实签约时刘文辉就不打算遵守这一约定，要不然他也不会和刘湘议和，但让刘文辉没有想到的是，他坚决要打邓锡侯的念头，却遭到了陈光藻等部将的群起反对。

邓锡侯为人圆滑，圆滑之人的一大好处是不死心眼儿，很少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水晶猴通常都是先利己，利己不成，便宁愿与人方便。比如陈光藻原先在名义上是邓锡侯部的一名师长，但实际上搞了一些防区单干，后来他的防区被别人兼并了，日子过不下去，才跑到成都找邓锡侯想办法。邓锡侯防区也不多，就算想收容都接济不了对方，于是就好人做到底，设法把陈光藻介绍给了刘文辉。其他像李家钰、罗泽洲等人，最初也都是邓锡侯的下属，随着他们的事业越做越大，羽翼日渐丰满，邓锡侯或觉得自己无法驾驭，或难以养活，都一一采取了放飞的方式。

“刀打豆腐光两面”，邓猴子在保定系里的人缘不是很好，是非常非常好。刘文辉手下的保定系将领都反对将矛头指向邓锡侯，他们认为刘文辉在成都巷战中主动向田颂尧开战，已经导致保定系出现分裂，若再跟邓锡侯成为冤家对头，保定系必将分崩离析，以后将很难斗得过速成系。

“家里的事家里解决。我们保定系内部不能再互相残杀，这个仗不能打。邓锡侯有不对之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到底如何解决呢？将领们说，邓锡侯背后开枪，一定是有“奸人”在他耳边吹了什么邪风，邓锡侯受了蛊惑，现在只需让邓锡侯开除“奸人”，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刘文辉听后哼了一声，也不置可否，便打马率部回师成都。

刘文辉一向惯于审时度势，面对内部这么大的阻力，他不能不再三斟酌，在这种情况下，让他暂且饶过邓锡侯是有可能的。偏偏邓锡侯做贼心虚，他本以为二刘还会抵死硬拼，没料到战事会如此快就结束，自己首先就有些怕了，于是便唆使田颂尧、刘存厚、李家钰三部出面，把城门一关，不让刘文辉的部队进城。

刘文辉大为恼怒，说：“我身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却不能进入省城，真是岂有此理。”

见刘文辉发了火，四家经过紧急协商，这才同意刘文辉入城。

胸中一口恶气尚未消除，又意外地遭遇入城之辱，接着联想到荣威大战功败垂成，再难挽回，刘文辉对邓锡侯痛恨到了极点，也因此坚定了除掉邓锡侯的决心。

除掉邓锡侯，还来自刘文辉的一个现实需要。在前期的二刘之战中，由于刘湘夺走了包括自贡在内的大片地盘，导致刘文辉防区缩小，收入大减，而他的军队仍然庞大，一时僧多粥少，军费开支变得极其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扩充防区是最好也最有效的办法，邓锡侯的防区尽属膏腴之地，不正好拿来“进补”吗?

1933年春节刚过，刘文辉即召集军事会议，就此事展开讨论。会上，部将们仍不赞成对邓锡侯动武，在他们看来，邓锡侯虽为人狡猾，但对维系保定系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邓锡侯在川军中的关系网复杂，如果对邓锡侯发起攻击，不唯多树一敌，而且可能招致诸侯们的群起围攻，太危险了。

师长冷寅东乃保定系的中坚分子，仗着与刘文辉有同学、同乡兼拜把兄弟的关系，会后他向刘文辉私下进言，说要解决给养困难，可以另辟蹊径，不一定非要打邓锡侯不可。比如劝邓锡侯让出几县防地，再不行的话，刘文辉本部也可以自行进行缩编和减少开支，为此，他本人甚至愿意自动离职。

刘文辉越听越来气，邓猴子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这样替他打掩护？你们吃的究竟是邓家的饭，还是我刘家的饭？怒不可遏之余，他当场撂下狠话："这次打邓晋康（邓锡侯字晋康），就是一碗毒药我也要喝下去！"

部将们的力保，反而使得刘文辉除邓之心更加迫切，因为他无意中发现，邓锡侯在保定系里面竟然如此得人心，不除掉能行吗?

保定系不支持，就找亲信嫡系。后者以刘文辉的侄子刘元塘为代表，这些人大多是少壮派，加之行伍出身，资历浅，学历低，全都得仰仗着刘文辉才能鸡犬升天，自然是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刘文辉撇开保定将领，召集直属旅团长单独开会，众人一致主战，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是刺猪

邓锡侯起初并没想到刘文辉会打他，还以为已经风平浪静，至多推出个把“奸人”来顶杠就完了。自1933年4月起，刘文辉将部队大量调动到成都附近，开打的架势十分明显，这才让邓锡侯察觉到大事不妙。

归根结底，邓刘的性格相差实在太大。按照邓锡侯的哲学，所谓“背信弃义”，不过是他适当运用了一点生活中的小智慧而已，朋友嘛，本来就是既可以为你两肋插刀，必要时也可以先捅你两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再说了，你不是也挖过我的墙脚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何必扭扭捏捏。

在邓锡侯眼中，刘文辉是超级强人。一个超级强人，情感世界怎么会如此脆弱？水晶猴百思不得其解，但不管他能不能够理解，刘文辉的刀都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

虽然在二刘所签和约上，曾注明刘文辉不得对邓锡侯发起进攻，但和约签订还是半年前的事，半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谁知道刘湘还愿不愿意再搅进来呢？再看看实力对比，邓锡侯一共才拥兵四万，刘文辉却有一百多个团，十二万人，且全都能征善战。

一笔账算到邓锡侯浑身发凉。他一面派人谒见刘文辉，磕头作揖，请对方高抬贵手，一面与刘文辉的保定系部将们联系，呼吁“保定系不打保定系”，甚至同意将被指认的“奸人”予以免职。可是这些求饶和呼吁都不顶用，刘文辉决心已定，就是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了，他准备以设宴邀请为名，将邓锡侯予以扣留，从而擒贼先擒王，达到瓦解邓军的目的。

刘军中反战和同情邓锡侯的人颇多，有人便偷偷地跑出去将刘文辉的阴谋告诉了邓锡侯。邓锡侯闻报，七魂去了六魄，急忙以打猎为名，只带几个随从便乘车潜出城门，逃往了自己的防区。

即便躲进了防区，邓锡侯仍然惊魂未定。就在他匆匆忙忙部署防守的时候，刘军中又传来消息，说刘文辉已开出大价钱，要收买邓锡侯所部的高级将领。

刘文辉是著名的挖墙脚大王，他要挖谁的墙脚，鲜有不成功的，如今强弱又如此分明，不等于要未战先败了吗？邓锡侯把旅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说既然刘文辉死也不肯放过我，没办法，我还是下野吧。

讲这个话，邓锡侯是为了测试属下的态度，如果部将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没反应，那他就真的只好下野了。让他感到惊喜不已的是，部将们还都挺够意思，没一个希望他辞职。

相对而言，做邓锡侯的部下是比较自由和舒畅的。各师旅防区内的政税收入，一个子都不用交到邓的军部，邓锡侯只要求他们形式上叫他一声长官就够了。那邓锡侯的嫡系直属部队需要开支怎么办？这倒没事，成都造币厂就归他控制，造币厂造硬币，总是可以额外赚到点钱的，猴子就靠这个养活自己。

由于邓锡侯无为而治，所属将领都不愿公开脱离他。邓锡侯曾经说过一句话为自己解嘲：“别个坐轿子的，是硬要叫抬轿子的抬起来，我这个坐轿子的，是抬轿子的硬要抬我走。”

会上，一个旅长发言说：“军长，你说要下野，这下你倒是名利双收了，可我们咋个办咧？你不能下野，我们大家都坚决拥护你与刘老

幺（指刘文辉）作战到底。”

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其实别的将领也是这个想法，都想继续抬着邓锡侯走。

邓锡侯疑虑全消，一拍桌子：“好嘛，大家既不要我下野，我照大家说的干嘛！”

上层没问题了，邓锡侯还怕基层不稳定。刘文辉的挖墙脚可谓是无孔不入，驻军成都期间，他甚至会在公馆里接见邓锡侯下面的一个普通团长，并馈送钱物，极尽拉拢之能事。

所幸关键时候，基层军官也挺住了，没有受到刘文辉的诱惑。邓锡侯很是激动，他对军官们说：“刘文辉有野心，他想要吃掉我们的部队，把我们当成了猪。”随之话锋一转：“我们是猪，可我们是刺猪，他刘文辉吞下去是要卡死的。我现在就要看一看，你们的刺猪毛长得坚硬不坚硬，如果够硬的话，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回成都呢，今后究竟谁吃掉谁，也是件说不准的事。”

邓锡侯讲话时慷慨激昂，唾沫横飞，可他心里其实明镜似的：刺猪毛再硬，若是凭他现在这副小体格去跟刘文辉对耗，还是一样白给，田颂尧便是前车之鉴。

怎么打，邓锡侯已经想好了，他要靠一条河。

迎刃而解

这条河叫昆河，本是从都江堰引出的一条灌溉渠，河面既窄，水也不深，到了冬天，几乎可以涉水而过。

都江堰的水来自泯江。在分水堤坝的分隔下，泯江又可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灌溉。邓锡侯事先把外江的水放入内江，使昆河的水位相应升高，流速加快，从而造成了防守上的一道天然屏障。

刘文辉在发现邓锡侯逃走后，便立即率部追杀而来。为越过屏障，他征集大量木桶、竹筏用以组织抢渡，邓锡侯则集中山炮和迫击炮猛烈轰击，结果刘军的多次抢渡均未能够获得成功。

除了地理障碍外，刘文辉进兵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帅不齐心。主将陈光藻拒绝主动进攻，理由是他不能为了刘文辉的“新恩”，而不顾邓锡侯的“旧德”，其他保定系将领也大多出工不出力，刘文辉任命的两个总指挥，包括冷寅东在内，都迟迟不前，没有要坚决攻过昆河的意愿。无奈之下，刘文辉只得依赖刘元塘等少数亲信嫡系将领发动进攻，作战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双方隔河对峙一个多月，未分胜负，但邓锡侯到底心神不稳，怕时间一长，自己的部队会坚持不下去。他赶紧召集部众出主意想办法，旅长黄石子建议说：“现在只有催促刘甫澄（刘湘）出兵，才能击败刘文辉。”

向刘湘喊救命，邓锡侯不是没有想过，但荣威大战已过去将近半年，二刘当时所定的互助条款恐怕早已失效。再者，二刘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叔侄关系，常言说得好，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邓锡侯还

获悉，刘湘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兴师与入川的红军作战，这种时候，人家会顾得上他这个小泥鳅吗?

黄石子是刘从云的弟子，深知刘从云在刘湘幕中的分量。见刘湘有无从下手之感，他又献计道：“要刘湘出兵不难，只要找我的老师刘从云，他是刘甫澄的军师，凡军机大事，刘甫澄对他言听计从。”

邓锡侯做事，向来不会直捅捅地去自讨没趣，他认为那是田冬瓜那样特无知的人才会干的事。水晶猴喜欢转弯抹角，做聪明人，办聪明事。听了黄石子的话，他马上就开了窍：与其找刘湘，不如开个后门，找他身边最器重最信任的人。

“你快说，具体该如何操作。”

见邓锡侯已经心眼活络，黄石子便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如果军长能崇敬刘老师，给他当弟子，事情将迎刃而解。”

不就是拜刘从云为师吗，没问题！邓锡侯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催促黄石子星夜启程，一分钟都不要耽搁。

黄石子奉命赶到重庆，他在见到刘从云后，把经过一说，刘从云欣然应允。

荣威大战，虽然作战计划系刘从云拟订，却是由刘湘具体负责，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刘湘及其所部也未真正按照计划执行，刘从云对此很不满意，即便被请回后仍心有不甘，总合计着要找机会重新施展一下抱负。这个时候邓锡侯来投，可谓正中下怀。

刘从云找刘湘商量邓锡侯的事，没想到刘湘也正在犹豫要不要与刘文辉翻脸。

邓锡侯潜出成都后，曾给驻于城内的蒋介石代表曾扩情发出急电，告状说刘文辉突然出兵侵袭他的防区。彼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入川，对于南京政府而言，这才是头等大事，除此之外，并不希望看到诸侯间再起干戈。曾扩情急忙赶到刘文辉的公馆，查证其攻袭邓锡侯的消息是否确凿。刘文辉毫不避讳："实有其事。我的军队多地盘少，不能不要邓锡侯让出相当的地盘，来养活我的军队。"

没等曾扩情出言劝阻，刘文辉截住了他的话头："事出权宜，几天之内就可获得解决，战争不会扩大。"曾扩情只得默默退出。

曾扩情思忖，既然四川内战已不能避免，倒不如早一点把刘文辉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祸根铲除，以便一了百了。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授权之后，他赶往重庆，提醒刘湘：你要倾全力打红军，可万一你叔叔乘机从背后直捣你的巢穴可怎么办?

声势不是白摆的

蒋介石支持先解决刘文辉，对刘湘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他所要担心的只是一旦与刘文辉动起手来，究竟打不打得过对方。

经过半年整顿，刘湘的部队已逐步恢复元气，但荣威大战的教训依旧让刘湘君臣想起来就有些不寒而栗，他们深感刘文辉部无论在军队的数量、质量还是指挥人才上，都比己方占优，与之作战难有取胜的把握。

刘湘正在一个人左右掂量，刘从云来了，刘湘便向他问计：是不打好呢，是不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呢?

刘从云有备而来，斩钉截铁：“当然要打！昆河之上，刘、邓两军鹬蚌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我们出兵，刘文辉必然垮台，甫公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

这是谈政治，并非“神仙军师”的专长，刘从云最擅长的还是歪门邪道。他对刘湘说：“我给你卜卦相定的司令部大门和大厅都是向着西方的，这是因为你的命相属金，利于西征，刘文辉正在西面。上次作战不利，都是没有按我的计划用兵的缘故，此次若全部照我说的做，必能马到成功。”

听刘从云正的邪的来回一分析，刘湘信心倍增，随即授权刘从云全盘负责前方军事：“这次从计划到执行，全都你一个人来，我要遵从天意，打一个大胜仗。”

刘从云兴冲冲地拿到帅印，第一站便是直奔资阳与邓锡侯会面。邓锡侯已提前在资阳等候，他着急啊，眼看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刘湘的态度如何，昆河前线还能不能顶住。

见到刘从云，邓锡侯如见救星，得知刘湘已答应出兵，更是大喜过望。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两边接不上——万一在刘湘到达之前，刘文辉就已攻过昆河，自己岂不仍是一场空?

刘从云惯于察言观色，马上看出了邓锡侯的心思，他煞有介事地掐指一算，说：“不妨，河神保证你可在昆河守四十天，来得及。”

刘从云掐指算出的四十天实际是备战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不光刘湘所部需要作战前动员和准备，还需要联合其他诸侯，形成规模和声势。

邓锡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长头，执弟子礼，从此正式拜刘从云为师。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躺在病床上的重症病人，而刘从云则不啻于一个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活神仙，叫声师父又能怎的?

刘从云随即在资阳主持召开会议，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人皆应召与会，与会人等一致表示要拥护刘湘统一四川，同时接受刘湘指挥。

在来到资阳之前，刘从云就从刘湘那里拿了一张十万元支票，会后，他当着众人的面把支票交给邓锡侯:“你先用着，马上还有十万发子弹要送给你。”

邓锡侯激动到都快哭了，“杨李罗”也是个个振奋不已，认为刘湘这回是砸锅卖铁，真要跟刘文辉好好干上一架了。

声势不是白摆的。刘文辉得知资阳会议的情况后，马上从中掂出了分量，他先后两次致电刘湘，言辞卑微，希望刘湘不要对他动兵。

能让刘文辉跟卑微二字挂上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紧张，乃至于未战先怯，与其说是被诸侯们同仇敌忾的气势给吓住了，还不如说他是对内部分裂的日趋严重化已经无计可施。

刘文辉的保定系部将们对昆河大战一直持消极态度，导致在部分重要战场上出现了奇怪一幕:攻守双方隔河相望，人员自由往来，完全没有大战时的气氛可言。

在得知刘湘即将出兵以及刘从云主持召开资阳会议的消息后，这些将领干脆背着刘文辉，擅自约请邓锡侯一方的保定系将领会商，并订出了议和条件。这一议和条件以把刘文辉军已夺取的三县还给邓锡

侯为代价，要求邓锡侯在二刘之战爆发时严守中立，并在必要时支援刘文辉。

如果刘文辉本人知晓后，不同意议和怎么办？保定系将领一致决定，如果刘文辉拒绝议和，他们将全体通电脱离刘文辉，请刘文辉退至西康，再另立保定系盟主。

参加会商的将领回到成都后，公推师长林云根去找刘文辉汇报。众将以为，如此苦心孤诣，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刘文辉和保定系的根本利益，不管怎么说，联合邓锡侯来击败刘湘，总比让刘湘联合邓锡侯兴师问罪强吧，所以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偏偏负责汇报的林云根是个马大哈，一个口袋里揣两封密约，和约与“全体脱离”的盟约被混在一起，更糟糕的是，他首先摸出来交给刘文辉的竟然是盟约！

看到盟约，刘文辉脸色大变。林云根见状，情知有异，这才发现把两封密约给弄反了，急忙又将和约掏出。可是刘文辉对和约已经毫无兴趣，他认定这些保定系将领是心怀叵测，要弃他而去了，对和约内容，一个字都不肯看，只是连连摇头：“还有什么话说！”

第二天早上，刘文辉召集全体将领在公馆谈话，说着说着便失声痛哭，说：“经几十年缔造，我的事业才有今天规模，现在落得如斯结局，真令人痛心。”

这话说出来，就是不让别人说话的意思。众人不欢而散，无论和约还是盟约都已无从谈起了。

漫画

保定将领要联合邓锡侯，刘文辉偏偏不肯这么做，他情愿再与刘湘携手合作，以便于净彻底地灭掉邓锡侯。刘湘则认定这是他趁势击败刘文辉的绝好机会，如此天赐良机，岂能轻易错过，因此对刘文辉发来的两封电文均置之不理。

1933年7月2日，刘湘在大本营发布命令，由刘从云率模范师（即神兵师）以及本军主力向刘文辉发起进攻，李家钰、罗泽洲等其余联军人马随后跟进。

刘文辉鉴于腹背受敌，内部又不团结，于是决定放弃昆河并退出成都，转而固守岷江。

在刘湘入主成都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委任他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有权节制所有川军，同时敦促其尽快起兵向入川红军发动进攻。刘文辉是刘湘在川中最大也是唯一的对手，眼看击倒有望，刘湘哪里肯舍，遂致电蒋介石，要求“先安川后剿赤”。

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刘湘正式打出“安川军”旗号，命令大小诸侯抢攻岷江，史称岷江大战。

在四川难以计数的大小内战中，岷江大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动员兵力多达三十万。战端一起，便引起国内外的瞩目，上海一家画刊专门刊出一幅时事漫画，用以勾勒这次大战的来龙去脉，倒也妙趣横生。

漫画内容是，在一座院子里，四根木柱搭一藤架，架子上趴一猴，再吊一冬瓜。藤下有两头牛在角力，它们各不相让，向对方凶猛冲击，最后哗啦一声，藤架被撞垮了，冬瓜摔到稀烂，猴子惊得直叫唤。明言人都能看出，画中的猴说的是邓锡侯，冬瓜是田颂尧，两头牛分别暗指刘湘和刘文辉。

如漫画所示，藤架垮了，两头牛也都冲出了院子，它们要到江边来捉对死拼了。刘文辉退守岷江之举，避免了两面作战，如果能再整顿内部，倒也不失为以退为进、反败为胜的妙招，但结果是内部问题不仅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刘文辉不再信任保定系军官，岷江四百里河防，他让保定系军官所统带的部队一字排开，扼守于第一线，刘元塘等部被他部署于第一线后段，名为预备队，实际是起监视作用。这样一来，弄得各部队上下相疑，全都无心作战。

在收缩至岷江一线后，刘文辉的防区变得更加偏远狭小，供给也日益困难，他们从前过惯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很少吃过苦。处于这种相对艰苦的环境之下，大家一个个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刘文辉让众将献计献策。保定系将领们建议，与其困守岷江，不如十个团、二十个团、三十个团地分散打出去。刘文辉早就对保定系将领有很深的猜忌之心，他恨不得把所有团都攥在一个人的手心里，这样的计策，自然不会采纳。

刘文辉的亲信嫡系将领多为他的子侄辈，年纪轻，没什么政治头脑。有人竟然提出要派出一部分人伪装成红军，跑出去把局面搞乱，然后再攻击刘湘不顾“剿匪”大局，以便要挟其退兵。刘元塘对这种主

张最为起劲，刘文辉还没表示态度，他就把部下召集起来讲话，说：“现在我们军长（指刘文辉）行将下野，依我的想法，什么军长、川省主席也没什么了不得，不当就不当。我们倒不如乘此机会干他妈一下子！”

他越说越激愤：“如果我们的环境再坏下去，就坚决打出红军旗子，我当川南红军总司令，以下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团营长各奖大洋一万元，连排长各奖三千元。”刘元塘对红军的理解不光是升官发财，还包括“准许官兵自由行动”，反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和绿林好汉没什么分别。

给刘元塘如此一描绘，下面自然是欢声雷动：既然当红军这么好，还守在这里苦巴巴地煎熬个什么劲?

刘元塘喜滋滋地跑去向刘文辉进行报告，刘文辉当然知道是在胡说八道，不仅不同意，还劈头盖脸赏了他一通臭骂。

保定系将领信不过，信得过的又全是一些脑子抽风式的政治盲，一贯自信多谋的刘文辉也变得六神无主起来。

刘文辉虽然表面也搞迷信活动，但他对装神弄鬼的一套东西其实并不真正信服，他府中的万神仙不过是他用来抵御刘神仙的摆设或者说是傀儡。正式场合，刘文辉从来不允许此类妖人插手露面，这也是他与刘湘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

要预知未来，不一定需要装神弄鬼。比如著名的《易经》，据说就是周文王被关在牢里时的占卜工具，所以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刘文辉如今困窘已极，便想到了要用这种方式来占卜一下自己的命运。

祸起萧墙里

刘文辉带着少数高级幕僚去关帝庙进香，求来“牙牌”（一种民间牌九，可用于卜卦），此后便天天在办公室里占卜。有一天，他在卜卦上读到两句诗，令他怦然心动。

诗的第一句写道：“船到江心浪拍天，羡君飞渡得平安，这次飞舟渡河去，前途还有十八滩。”念到这里时，刘文辉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因为诗句中所言，简直就是他所处困境的真实写照。再接着读下去，第二句是：“一喜已成空，一喜不成喜，若遇草头人，祸起萧墙里。”

不仅是刘文辉，站在他周围的几个幕僚都差点叫出声来——这不分明在说，有一个“草头人”会使我们祸起萧墙吗?

草头人，应当指的是这个人姓名上有草字头，他是谁？大家都在猜，但是谁都不敢说出来，毕竟关系太大，弄错了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刘文辉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当然他也不能确定，只能说是怀疑。他怀疑草头人是师长陈光藻。

昆河大战中，陈光藻为了“旧德”，就不肯进攻邓锡侯，刘文辉对此早就疑虑重重，当时就曾派人对陈光藻进行监视。现在回过头来一想，陈光藻的藻字不正好是草字头吗。刘文辉决定继续严密监视陈光藻，并派自己的干儿子、旅长石肇武专门执行此项秘密任务。

1933年8月14日，刘湘下令安川军对刘文辉部发起全线总攻。草头人的真面目就在这一天揭晓了，但他不是陈光藻，而是陈光藻手下的

营长叶青莲。叶青莲早就被邓锡侯收买了，当天凌晨，安川军正是从他把守的缺口得以强渡过江。

陈光藻闻讯急忙打电话向刘文辉报告，刘文辉大吃一惊，莲也是草字头，原来叶青莲才是真正的草头人。他不无沮丧地告诉陈光藻："此事我早就知道了。"

既然陈光藻已经摆脱嫌疑，刘文辉便将卜卦上那两句诗念给他听。陈光藻这才明白，为什么一段日子以来，石肇武会对自己寸步不离，原来是刘文辉派来监视他的。

沿着叶青莲放开的缺口，安川军各部陆续过江，且势头猛烈，连刘文辉最贴心的旅长李玉书都打电话告急："实在抵挡不住。"

刘文辉知败局已定，被迫下令撤往雅安。他的勤务兵刚刚接到撤退命令就听到了枪声，于是赶紧将刘文辉的蚊帐一扯，包起床上的东西就跑，办公桌上的印章和作战地图都没来得及拿，可见其张皇之状。

刘军人心涣散，只有少部分听从命令后撤。倒是曾被刘文辉怀疑是草头人的陈光藻，一路忠心耿耿地为刘文辉殿后掩护，直至被安川军活捉。

刘文辉撤到雅安后，未随其撤离，仍停留于岷江一线的部队纷纷自谋出路。师长冷寅东手上仍掌握着一万多人马，但是缺乏粮饷，快要断炊了，他对刘文辉说想率部到雅安来。刘文辉听后叫苦不迭："目下，连随我退到雅安的部队都无米供养，你把部队带来我怎么供得起？"冷寅东走投无路，不久便派人向刘湘接洽投降。

警备司令邓和也想投降安川军，但是又不知道投谁好，幕僚说，要不投邓锡侯吧，都是保定系的，也有人照应。邓和头脑很清醒，说：“算了吧，你们看看刘湘这个架势，早晚也要把邓锡侯给吃掉，不如我现在就投刘湘，也免得将来再嫁第二家。”

第二师师长张清平比邓和反应快，他不等刘湘过江，就自己率全师渡江，跑去请求刘湘收编他们。此举被川军各部引为笑谈，说人家都是“抢渡收编”，你们却是“抢渡就编”，实在是四川战史中的奇闻。

目睹此情此景，刘文辉痛心疾首，说这么多部队一枪不放就拱手投降，让他想到了古代的一位四川女诗人。这位诗人就是花蕊夫人，她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其实刘文辉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还是很强的，他的许多部队之所以“竖降旗”，不过是跟冷寅东一样，为了临时混个饱饭吃吃而已。

五龙闹川

刘湘渡过岷江之后，仅收编刘文辉的部队就达到四万，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三部加起来，统共也才收编了一万。大家都争着要投降刘湘，除了看到刘湘必会加冕外，不能不说，他那个“待人宽厚”的招牌也起了很大作用。

只是此时的刘湘已经不需要用招牌充门面了。在杨森发动的统一之战中，刘湘击败了杨森，而后又收编了其旧部，刘湘把他们都当自

个儿子养着，供他们吃供他们穿，可是等到杨森在万县一亮相，这些人就来了个六部东下，学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前去归顺了旧主子。

刘湘可没有三国里曹操那样的度量，他表面装仁义，其实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介意得不得了。这次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刘湘的态度非常干脆："收编刘文辉部队，我再不学过去给人家当军需了！"他告诉负责收编的潘文华，此次必须"破碎收编"，只有"破师、破旅、破团"才能留营。

如此一来，原来的军官就没得饭吃了，就连"抢渡收编"的张清平也没能捞到一官半职，邓和原先想弄个师长干干，但最后刘湘只用一个虚职就将其打发掉了。

冷寅东与陈光藻一样，对刘文辉还很忠心，他的接洽投降，也多少是想学一点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得知刘湘存心要拆散其部队，他气得捶胸顿足，但舍此又无其他出路。冷寅东的旅参谋长曹善群从旁劝慰道："师长，四川这部战史就是这样，你吃我的部队，我吃你的部队，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刘文辉在四川又是出了名的专门挖人家墙脚、到处拉部队的行家。你要是刘湘也不得不防啊。"

见已无法挽救自己垮台的命运，为了保住面子，冷寅东便主动将部队交给刘湘，自己通电卸职而去。

刘湘在收编刘文辉旧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刘文辉继续穷追猛打。安川军追至雅安后，在山上架起大炮，对着刘文辉的行营猛烈轰击。刘文辉躺在行军床上，一发炮弹正好打中墙壁，离他本人仅有几步之遥，刘文辉差点因此送命。后来有人便传说，这是刘湘在泄刘文辉当日派人行刺之愤。

雅安不能待了，刘文辉只得拔足再逃。部队经过某地，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刘文辉走进供其用餐的宅院，一眼就看到正厅上挂着一幅匾额，上书“自公退食”四字。刘文辉号自乾，平时朋友、部属多称他为“刘自公”，看到“自公退食”，他认为犯了忌讳，于是饭也不敢吃，一步不敢停，出门打马就跑。

《三国演义》讲到败走华容道这一章时，说曹操“肝胆皆裂”，如今的刘文辉也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有诗讽之：“自乾本来性刚强，好比当年楚霸王。北剿南征无不胜，险些逼死在岷江。”

春秋无义战，岷江大战和此前任何一次四川内战相同，并没什么良莠之分。《大公报》一针见血，谓之是从“群魔乱舞”变成了“群魔又舞”——反正左右都是一帮贱人在瞎折腾。

民间的评论更是辛辣，老百姓把四川这么多年的打来打去，总结为“五龙闹川”：刘文辉原来的防地多，钱多，称为金龙；刘湘以侄犯叔，跟长辈动手，称为孽龙；邓锡侯的水晶猴子习性始终不改，称为水龙；田颂尧老在阿呆与阿瓜中间转悠，称为闷龙；杨森一度靠乞讨过日子，到处乱挤，称为滚龙。

经过岷江大战，“金龙”刘文辉被撵出四川的腹心地带，军力削弱十分之九，“孽龙”刘湘不损反增，光收编的人枪就达到四万多，最重要的是，他打垮了自己在四川的唯一对手，川军之中，再没有人敢或者能跟他叫板了。

接下来大家都在看“孽龙”要如何处置“金龙”。刘湘占据成都时，曾往访归隐的钟体乾，请其再次出山。刘湘说：“钟先生，你一气之下

便走了，你不知道我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不跟幺叔摊牌啊！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先生当谋更新之道，重新出来辅佐我。”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钟体乾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刘湘又登门相请，哪有不给面子的道理，但他仍遂嘱咐刘湘：“你对自乾只能适可而止，不应该太过分。”

刘湘马上接茬儿道：“我对幺叔，哪能有消灭他的心意，不过予以惩罚，削弱他的力量而已。幺叔长于政治，我长于军事，我们今后还是要合作的。”

这个时候的刘湘，外表假装谦逊，内心已是扬扬得意，他以“长于军事”自命，完全忘记了荣威大战是如何败于刘文辉之手的。

不过在跟钟体乾的谈话过程中，刘湘显然也意识到，刘文辉毕竟是本家叔父，是他的长辈。亲戚之间，打破脑壳都镶得起，必要时候他还是得给刘文辉留一条生路和余地，这样才能多少挽回一点“以侄犯叔”的不利影响。

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

岷江大战结束，刘湘达到了称霸巴蜀的目的，当然更有理由表现得宽宏大量一些，就好像刘备拿下西蜀，也一定会假仁假义地放刘璋一马一样。

刘文辉这边也尽量放低姿态，能多低就多低。他本人多次致电刘湘，表示认罪，愿意留在西康“巩固国防”，同时又由老婆出面，给刘

从云叩头，行弟子礼。

谁都明白，拜刘神仙为师，就是在彼此留下面子的同时，向刘湘俯首称臣的一种间接表示，说得更直接一点，便是“明拜神仙，暗拜刘湘”。

刘从云在众人面前大弄玄虚，掐掐算算，说是天意已定，刘文辉还应存在若干年。舆论一造出来，刘湘在内部就比较好说话了。他在成都召见已下野的冷寅东，对冷寅东说：“我们幺爸（刘文辉）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削弱他的实力，我还会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后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

冷寅东赶紧顺水推舟地替刘文辉求情：“自公（刘文辉）现在防区骤小，地方苦寒，处境十分艰难。甫公（刘湘）大人大量，不如放他回来吧。”

刘湘爽快点头，同意安川军撤出雅安。双方就此停止军事行动，协商善后。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率残部返回雅安。

记得昆河大战前，刘文辉曾经固执地表示，他一定要打邓锡侯，哪怕那是一碗毒药也要喝下去，没有想到他喝的果真是一碗毒药，喝完之后，人虽然还活着，但天地全变，部队及地盘已经失去大半，他彻底沦落为川军中的破落户，从此不再拥有如孟德一般称雄的可能和希望。对于曾有凌云之志的刘文辉而言，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和屈辱，据说他就是从此时开始吸食鸦片的。

一个人的梦破碎了，另一个人的梦实现了。刘湘挟大胜之余威，在成都召开军政会议，他身边坐着刘从云、钟体乾、张斯可，后排立

着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称得上是谋臣似雨，猛将如云，一时间，大有睥睨群雄、气吞山河之气概。

各路诸侯不仅对刘湘唯命是从，恭恭敬敬地仰承其意旨，而且都争相拜在刘神仙门下，以求生存。在刘湘这条真龙面前，什么金龙、水龙、闷龙、滚龙，都不过是现出原形的小泥鳅罢了。

“滚龙”杨森那是多自傲自恋的一个人，连他也不得不拜刘神仙为师。拜师就要叩头，杨森可怜巴巴地说：“我妈死了我都没叩头，对刘老师我行三鞠躬礼不行吗？”

直到拜师这一天，杨森还在为难，邓锡侯和李家钰不由分说，将他硬拉了过去。只见“刘老师”坐在太师椅上，各路大小诸侯一齐下跪，叩头拜师，众目睽睽之下，杨森没法再站着，只好也跟着叩头。

仪式结束，邓锡侯兴灾乐祸地问杨森：“今天有何感想？”杨森气急败坏，又羞又恼，说：“今天是我最大的耻辱，我这个头不是为我自己叩的，是为我的部下叩的，我心里把它当成是给我的部下祈福！”

回到防区后，杨森的心情仍不能平复，集合军官讲了这件事，告诫众人一定要发奋图强，以雪当日之耻。

像杨森这么较真的人，当然只是极少数，而且就算是他，也叩了头，拜了师，等于承认了刘湘的四川王地位。

除了对刘湘这个王者不得不敬，其他人私下里倒还是亲亲热热，无拘无束。四川军人有一个突出特点，打仗的时候可以玩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打完仗，照样也可以你好我好，搂肩搭背。

有一次，刘文辉来成都开会，邓锡侯设宴迎接。邓锡侯方面负责接待的副官又紧张又好奇，不知道这两个战场上的生死冤家会如何见面打招呼，会不会发生尴尬甚至意外之事。

刘文辉来了，他身着黑袍马褂，举止彬彬有礼，并向早已等候在客厅的邓锡侯微笑点头。邓锡侯则像见到了久别的好友，快步上前，拉着刘文辉的手连声说：“老幺，对不起，对不起。”

刘文辉满不在乎：“误会！误会！误会！”

邓锡侯笑道：“好说，好说，请！”

两人礼让一番，才相携走进客厅，笑谈之中，仿佛一切过往都已变得云淡风轻。

第九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成都巷战，把田颂尧打得很惨。当年四川民间给诸侯们列过多个实力榜单，其中以“七雄四强”最耳熟能详，除此之外还有“春秋五霸”，“五霸”分别为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在这些榜单里面，田颂尧虽然排名都不靠前，但每一次都落不了他，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在田颂尧鼎盛时期，他拥有四万多人马，防区囊括川北二十六县，这也是他敢跟刘文辉叫板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想学着刘湘建空军，并且正经八百地成立了“航空筹备处”，连机场都已经修了个样子出来。

经过成都巷战，冬瓜虽然还不至于像那幅时事漫画上所描述的，“摔到稀烂”，但已颓相毕现，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时的田颂尧已渐呈一蹶不振之势。

就在田颂尧既紧张又惶恐的时候，蒋介石送来委任状，将他由军长升为“剿匪督办”。蒋介石的这顶乌纱帽当然不是白白奉送的，其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入川，且杀入了田颂尧的川北防区，蒋介石急需包括田颂尧在内的四川诸侯在与红军作战时卖把力气。

田颂尧实力不济，蒋介石也看到了。随乌纱帽一道奉送的，有近百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军费，同时蒋介石还派人告知田颂尧：“胡宗南驻军陕甘边区，要是你觉得吃力，可以让胡宗南派两个旅进川协同作战。”

胡宗南的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号称“天下第一军”，战斗力自然是没得说。可是正所谓“送走者行孙，又来孙行者”，田颂尧就怕胡宗南来了之后赖着不走，于是他只派一个参谋去甘肃见了见胡宗南，却没有表示欢迎对方入川之意。看到他这种样子，胡宗南当然也就不好主动提出派兵入川了。

成功人士

田颂尧刚刚宣布就职，红军便在巴中创立了川陕苏区。田颂尧认为红军这是要建房上梁，做长居打算，为此必须予以驱逐或消灭。

论军政才能，冬瓜属于比较平庸的类型，他打仗主要靠孙震。孙震名为副军长，但实际权力很大，田颂尧的二十六县防区，他本人不过才直管五县，孙震却能直管十三县，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诸侯下面的小诸侯。长此以往，自有功高盖主之嫌，平时不打仗时，君臣之间难免会生出各种猜疑和冲突，孙震一气之下便托病去了上海。

要打仗了，田颂尧又想起这位必不可缺的悍将，便紧急召孙震回营，并力保其为“剿匪总指挥”。孙震当然也懂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所以田颂尧一降低姿态，他马上见好就收，应召回到了前线。

红四方面军战斗力强悍，入川后所过之处有如秋风扫落叶。田颂尧和孙震知道不好对付，所以最初在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上，都十分审慎小心，两个多月之后，他们如愿“收复”了被红军占领的巴中三县。

田颂尧蒙了，是那种随时都想喜极而泣的蒙。成都巷战后，连他自己都一度有了种不祥之感，觉得自己的军队可能要沦落为不能打仗的垃圾了，没想到这帮小子们如此争气长脸。

知道对手是谁吗？是连蒋介石也要惧其三分的红军，你们就算真被人说成是垃圾，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经历太多坎坷的“成功人士”，其表现也往往会有些反常。田颂尧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比较平庸拘谨，不然也不会被人叫作冬瓜了，可是自此以后，他却突然变得高调起来。在各种文告上，他使用的头衔都是“督办兼军长”，就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升了官，成了督办。

田颂尧一再“告捷”，每次都能得到蒋介石的回电嘉奖，称赞他“迭克名城”，并且还提出，要田颂尧把他“取得节节胜利的战略战术”总结一下，以便上报交流经验。

这抬举的，几乎就把田颂尧当成川中名将了，让冬瓜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以至于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闹出了不少笑话。

师长王铭章在占领巴中三县中的通江县城后，发电报给田颂尧，说通江城的各条大街都被红军改了名，改成了已故红军战将的名字，举例来说，某街的名字就叫“恽代英街”……

王铭章的意思是，红军这么做，自有道理，不如我们也跟着学，比如川军里面战死了谁谁谁，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换掉“恽代英”。田颂尧同意，并把电报交给幕僚办理。

这个世上，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田颂尧已经够冬瓜了，幕僚居然比他更有趣，看到电报上有恽代英的名字，如获至宝，马上跑去报告田颂尧：“我见过这个叫恽代英的人的名字，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在肯定是被我们打死了。这是大功一件，应该专案上报。”

田颂尧一听大喜，还以为恽代英是红军里面的小军官呢，原来是大人物，当然不可错过。当下他便上报蒋介石，说其部把“红军高级将领恽代英”给打死了。

恽代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对于有黄埔军校校长背景的蒋介石来说，不可能不熟悉。让蒋介石感到吃惊的是，早在两年前，恽代英就已经在南京被杀害，处决令还是他亲自下达的，怎么又在四川出现，而且被重新打死了一次?

可是田颂尧在报告中说得有鼻子有眼，活脱脱真有这么回事。“死而复生”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直接原因是死者身份没查清楚，也或者名气太大，有人冒名顶替。蒋介石考虑之后回了封电报，让田颂尧提供详细具体的报告：“恽代英”究竟是何时、何地、被何人打死的，死时情形如何，尸体在哪里，有没有证件证物。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田颂尧不敢怠慢，立即向王铭章进行询问。王铭章的回复是，他就看到通江城里有恽代英的街名，却不知详情到底如何。

田颂尧急得满头大汗，说你再仔细查查看，没准是基层部队干的呢？王铭章领命分别致电各部，自然全都石沉大海，谁都说与此无关——不是没人想冒功，可像这种蒋介石亲自过问，细到连证件证物都要追查的，又有谁活腻烦了，敢触这个霉头?

田颂尧这才明白，“川军打死恽代英”纯属子虚乌有。偏偏蒋介石对此事还很关心，一再来电追问，田颂尧无奈之下，只好红着脸，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实情。

上当

“恽代英事件”让田颂尧很是尴尬，但有一点，大家都不能否认，那就是川军攻城略地总没有掺假，起码巴中三县已经收回来了。不仅是田颂尧，就连孙震的自我感觉也同样良好，说：“红军的确厉害，可是他们跑到四川，遇到川军，就不得行了。”

北伐胜利后，川中诸侯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他们对此倒是拎得很清，知道自己虽然穿了新军装，然而仍属于北洋那棵老藤上结的果，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不是一码事。比如说田颂尧，最初就属于刘存厚的嫡系，四川新军才算是他的老祖宗，虽然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他都参加了，但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田颂尧最初接触到的革命军，是熊克武的蜀军和新老第五师，也即新川军，后来中共在四川也策动了几次武装起义，并拉起了队伍。不过无论是新川军还是这些中共地方武装，在老川军的重兵围攻下，最终都以溃散而告终。

革命军又不是没见过，想那熊克武何等了得，而今安在哉？按照田颂尧的评估，红军甚至还不如新川军，毕竟以前在单打独斗的时候，他并没能从新川军身上占到过太多便宜。

红军，可能也就比中共的地方武装强一些吧？“是经不住正规川军打的”！

如今摆在田颂尧面前的现实问题是，红军已退至通江北面的山区，还要不要穷追？

从战场形势来看，红军仍在后退，川军仍在前进，似乎没有理由不追，但还是有部将建议慎重行事：“红军只退不进，会不会在施诱敌深入之计啊，应该提防，不能轻进。”蒋介石派来的特使也提醒田颂尧，说红军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信的话，你知道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张辉瓒是怎么完蛋的，不就是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吗？

听了这些话，田颂尧心虚了。张辉瓒是士官生，堂堂湘军干才，生前已经位列国民党中将，连他都栽了进去，看来大意不得。

田颂尧赶快发电报给刘湘，借来了一架小飞机。他想通过飞机侦察一下，看现在红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如果兵力突然增多，就说明其中有诈。

受田颂尧之命乘机侦察的是少将参谋处长罗鹍。罗鹍身体很差，坐飞机都头晕，可又不能不去。登机后，他拿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比比画画，让飞行员开往红军活动区域。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应该说是比较精确了，无奈罗鹍早已头昏眼花，哪里能够真正用得起来，不过是信马由缰地随手一指罢了。飞行员水平也是一般，你那么一指，我也就那么一开，结果两人根本没有找到红军所在的中心区域。

得完成任务啊，罗鹍举着望远镜，胆战心惊地朝地面胡乱观察了一通，就草草了事，打道回府。回来之后，他告诉田颂尧，没发现红军大部队，只看到险隘地方有小股红军在活动。

田颂尧和孙震听后喜不自胜：不过“小股”，又是缩聚在一块小地方，不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时机吗?

田颂尧知道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他连徐向前都一并瞧不起了，对别人说：“徐向前的队伍，是一支流寇，目下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的胜利不过是指顾间的事。”基于这一判断，他们把部队集中开往通江以北，以便“围歼流寇”。

其实红军摆出弱兵姿态，一退再退，正是要引诱他们上当。川北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是陡险，至通江以北，更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田颂尧的前线部队在到达通江以北后，全都被阻在了山区，一步不得前进。

两三天后，见田军士气逐渐低落，红军迅速发起大反攻，田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

川军被外界称为“川老鼠”，就是说他们在战场上跑得比较快，无论进攻还是撤退。依照诸侯混战时的惯例，田军在逃跑时都将枪支弹药、辎重财物沿路丢弃，为的是让红军捡拾，以便争取时间脱逃。未料红军不是川军，各部队在战斗结束前根本就不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狠追，而这样凶猛的追击战术，田军从来没有见识过，那个狼狈！不仅前线大部队全部崩溃，就连原先位置较后的少数预备队也被顺势打垮了。

六路“征剿令”

田颂尧大惊失色，他本人驻于阆中，但包括阆中在内，都是一片空虚，因为他把部队全都摆到了一线，根本没留下做总预备队的足够兵力。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此时为止，田颂尧和孙震也没搞清楚红军的真实情况，既不知道对方究竟有多少兵力，也不知道他们最终想要打到哪里。

越糊涂越惊慌，越惊慌越没辙，除了逃命，两人全都没了一点招。阆中城外是嘉陵江，孙震传令架起浮桥，供各部撤退。可是人要倒霉的时候，连老天爷都不肯帮忙，突然天降大雨，河水随之暴涨。部队渡河效率大受影响，岸边的溃兵也越积越多，而且大家都抢着渡河，没有人肯留下来做掩护。

王铭章见势不好，赶紧召集所有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希望谁能发扬发扬风格当后卫，然而在军心已溃的情况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活菩萨？会上不仅无人肯殿后，还闹得不可开交，王铭章无计可施，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部下们磕起了头。

磕头也没用，大家仍是各自乱跑，跟老窝被端掉的野蜂没什么两样。田颂尧极其短暂的几个月“黄金时代”就此结束了，他不仅再度丢掉了巴中三县，而且继成都巷战后主力又再受重创，所调集的三分之二兵力，起码损失了三分之一，战后已经连一个稍为完整些的团或连都找不到了。

冬瓜真的摔烂了，遭遇惨败后的田颂尧别说进攻，要退而自保都觉得困难，他只好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剿匪”督办。

川军只是初次跟红军交手，蒋介石可是不知道和红军打了多少次交道，真实的红军有多厉害，他比谁都有数，因此他对待田颂尧的态度很客观：你先前得意，那是超常发挥了，现在一败涂地，倒反而在我意料之中。

蒋介石没有同意田颂尧的辞请，他属意刘湘前去“征剿”，并委任其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那时节，刘湘正忙着对付刘文辉，他给蒋介石的答复是“先安川后‘剿赤’”——让我打红军可以，但得等我先把四川盟主的位置坐稳当了再说。

岷江一战，刘湘大获全胜，也相应具备了统领各路诸侯的权威和声望。1933年10月4日，当着诸侯部属们的面，刘湘在成都正式宣誓就职四川“剿匪”总司令。之后，他发布六路“征剿令”，准备向红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其目标是“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苏区的红军”。

刘湘的所谓目标并非完全是大话欺人，而是确有一定的实力依据。这时川中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川军也决出了六强的名次，除位列盟主的刘湘外，其余五强依次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刘存厚，交椅排法参照的是“水泊梁山标准”，即武功与资历综合，但以武功为先，然后谁大谁坐前。

刘湘部署的六路，实际上也就是川军六强，当时的大部分川军精锐皆集中于此，计有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马。反观红四方面军，尽管在打垮田颂尧后即进行了扩充，但也只发展到五万余人，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新兵。

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自然是沙场制胜的王道，可是自古以来，战场又都是一个时时能诞生奇迹的地方。在刘湘正式宣誓就职之前，

红军就预先破掉了“六路”中垫底的两路：杨森、刘存厚。

杨森和刘存厚的防区都在川北，与田颂尧毗邻，田颂尧兵败，如同在他们头顶上响了个炸雷，让二人吃惊不已，顿有朝不保夕之感。

依照杨森以往的脾气，是非要斗一下不可的，但他如今的地盘很小，部队也少，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两万，仅是田颂尧“三路围攻”所用兵力的三分之一。再说了，蒋介石好歹还给了田颂尧一个“剿匪”督办，他杨森什么都没捞着，干吗非要去太岁爷头上动土?

与别的川军军头不同，杨森内心里并不把共产党看成是洪水猛兽。他的长子杨汉沂曾因散发纪念五四运动的传单而被捕，杨森让部属出面，通过疏通当局将他保释了出来。一天晚上，杨森与杨汉沂闲谈，问他被捕后是否声明自己是杨森之子，杨汉沂回答说：“没有。”杨森骂道：“你呀，不配当我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敢说是我的儿子？难道我的儿子就不可以当共产党？”

杨森并不害怕被别人指责与共产党有牵连或瓜葛。早在大革命时期，朱德、陈毅就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他的军队里面搞过兵运，因为害怕失去兵权，杨森最终对朱、陈下了逐客令，但也并没有威胁二人的人身安全。

实际上，在与共产党的关系处理上，杨森遵循的一直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的江湖策略。按照这一套路，他选择了另辟蹊径，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了“互相支援，互不侵犯”的协议。

打肿脸充胖子

与红军达成协议后，杨军便竭力避免与之交战：在后边追的，只远远跟着，在前面截的，也仅仅是摆摆架势，红军一过来就马上把路让开。

其间，杨森还给红军送去地图和药品，以示诚意。为了瞒过众人耳目，两边合作演出了“围堵红军”的戏码，即红军假装杀过来，杨森则派一个连虚张声势地大喊：“红军又过来啰！”喊完就乱放枪，放完枪冲锋，之后以冲锋为掩护，顺势完成所有物件的交接。红军拿到东西后，也迅速撤出了战场。仗打得如此蹊跷，连当地老百姓都觉得奇怪：“这次红军怎么撤退得这么快？”

红军本来可以充分利用川军内部的矛盾，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像杨森这种，如果能够合作，就没必要非跟他过不去。可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急功近利，他认为杨森的前哨据点直接伸入巴中，极大限制和影响着红军的行动，这颗钉子非拔除不可，所以不顾徐向前等人的反对，仍执意下令攻击杨森。

几天之后，红军趁着雨夜对杨森所部发起大突袭。杨森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于是不得不退守嘉陵江西岸，成了“田颂尧第二”。

接下来就轮到了刘存厚。刘存厚的防区也在川北。川军六强里面，数他的资历最老，邓锡侯、田颂尧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媒体也都称刘存厚为“老将军”。他能挤进六强，很大程度上卖的就是一张老脸。

刘存厚一生之中，最为得意的当然还是北洋时代。他也始终对此念念不忘，虽然早就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

部队所用军旗仍是北洋的五色旗，而不是其他川军通用的“青天白日”。刘存厚给本地中学题写匾额，落款时竟然用的是北洋赐给他的爵位：“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

在北洋政府业已灰飞烟灭的前提下，别人避之尚恐不及，刘存厚此举亦属难得。盘点他这一辈子，前半生之所以大业难成，或许是缘于没存下一个“厚”字，倒是临到晚年，还比较念旧一些。

刘存厚不但在形式和精神上完全继承北洋，他的部队似乎也停留在了过去的时代，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枪炮器械都没有什么进步。红四方面军初来乍到，但他们对刘存厚的评价和印象只有两个字：老朽。

打田颂尧和杨森，尚需智谋，打老朽，所有这些都不需要。

面对红军的攻击，刘存厚只有赔钱的本事，哪有赚钱的能耐。他向刘湘求援，发去的求援电报不亚于雪片飞舞，但即便到这般地步，此翁还死要面子，一边频频告急，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誓死坚守”。

刘湘知道刘存厚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派援的同时，也很坦白地对他说，你如果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撑了，只要记住，走之前务必要把运不走的武器销毁掉。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刘存厚反而不好意思马上遁形了。他找人在府中扶乩，想算算看自己能不能撑到援兵到达，结果算命结果还没出来，城内已响起枪声，红军先头部队冲进了城。

刘存厚带上家眷卫兵仓皇而逃，自然也顾不上销毁武器，用报上的说法就是，“老将军”不仅面子没保住，还给红军“厚赠了一笔礼物”。

包括田颂尧、杨森、刘存厚在内，到刘湘正式组织六路“征剿”时，川军实际已被提前打垮了三路。尤其是通过击溃刘存厚，红四方面军在占领绥定、宣汉两县的同时，部队顺势扩展至八万余人，声震全川。

和其他川中诸侯不同，刘湘并不是第一次和红军打交道，早在他和刘文辉发生惊天冲突之前，就已在湖北和红军结结实实地干过一架了。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而著称。军头们在四川既有财源又有兵源，不愁吃不愁喝，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肯背井离乡——你就说刘存厚吧，被人家赶出去那么多次，不还是厚着脸皮，哭爹喊娘地要回来吗?

这就造成了川军的一个显著特点，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甚至联合滇黔军等客军打对手，但他们自己很少打到外省去，以至于四五百场大小战役打下来，都是在家里摔桌子打板凳。

民初川军真正重大的出川军事行动也就一次，即熊克武和刘湘共同策动的援鄂之战。打那以后，川军几乎足不出户，直至蒋桂战争打响，刘湘才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后来鄂北红军借爆发中原大战之机得以发展，刘湘又应蒋介石要求，派部出川援鄂。尽管如此，刘湘的注意力始终都不在外部，每次部队出川，他都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

部下心领神会，于是这两次作战的结果便都是形式大于内容，出川部队相当于出省旅游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到了第四次“围剿”时期，蒋介石除派他的部队重点围攻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外，还向刘湘发出命令，要求川军协同鄂军，对鄂西洪湖的红三军展开围攻。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刘湘本来也想和过去一样，派一支部队出去摆摆造型，之后就打道回府，但考虑到此时的蒋介石权势日隆，已非蒋桂战争或中原大战时可比，太过敷衍的话，不仅交不了差，而且很可能失去蒋介石的支持，因此他一度觉得十分为难。

真是靠不住

照例，凡人判断或决定不了的事，不妨问问神仙。

在近代中国，皇帝其实从未消失，他们不过换了几身衣服罢了。刘湘迫于时势，早已断了做皇帝的念头，能在川中和刘备一样三分天下，就阿弥陀佛了，倒是刘从云出道以来，一路坦途，反而从来没有灰心过。

皇帝只有一个，既然你刘湘不做，我做！某天，刘从云和刘湘、邓锡侯在一起，突然大发豪兴，很得意地说：“我左手抱着晋康（邓锡侯的字），右手提着甫澄（刘湘的字），何愁天下不定？”

又有一次，刘从云居然当着刘湘的面说：“我扶了乩，乩仙说我将来要当皇帝，如果真的当了皇帝，一定把皇位传让给您。”

别人听了这些话会很生气，但刘湘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很高兴：没准刘神仙真能把蒋介石这类“伪天子”给挤掉呢，到时候我还能白落个皇帝当当哩！

在“出川远图”这一点上，刘从云和刘文辉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刘湘犹豫不决，他则毫不犹豫。当然，有些话还是不能直接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得让“乩仙”代言。

刘从云做了整整七天水陆道场，然后扶乩请神，“乩仙”很快就来了指示：“湖北荆沙（今荆州和沙市）一带，也都是刘家的天下，理应收复。”

刘从云把“乩仙”的判词拿给刘湘看，刘湘看了之后怦然心动，不仅欣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决定在“收复湖北荆沙”上动点真格的。

蒋介石随后任命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以王陵基代理此职，命他率三旅川军前往鄂西“剿匪”。

1932年9月，红三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退出洪湖，转入湘鄂边境实施游击战。刘湘和刘从云认为是他们赶走了红军，为此喜不自禁，都以为“乩仙”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不料二人机关算尽，算来算去，却还是算不过蒋介石。

“围剿”洪湖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老蒋就用他的部队接管了鄂西防务，鄂、川两军被全部打发回家。

花了这么多工夫，荆沙原来并非“刘家的天下”，还是他蒋家的。川军内部怨声载道，许多军官都对刘从云的“神机妙算”产生了怀疑，说刘神仙的话，真是靠不住。

相对而言，刘湘倒是能看得开，不就是损失了一些人马，而且没占到地盘吗，你们这些人的高度只有那么高，就是看不到更长远的

——蒋介石用了我的兵，但没给我地盘，就相当于欠了我人情，他不得还吗?

到了二刘相争的岷江大战，蒋介石果然站在了刘湘一边。

如果说对于出川作战，刘湘尚抱着可有可无，得失不介于怀的态度，红军入川就不一样了，双方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对于刘湘而言，一旦打不好，已不是能不能额外得到地盘的问题，而是要失去地盘乃至四川王的桂冠了。

刘湘任命王陵基为与红军作战的前线总指挥。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他斟酌再三，犹豫了又犹豫，因为他对王陵基早有疑忌之心。

除了刘从云因与王陵基不和，经常讲些关于王陵基的坏话外，在刘湘眼中，王陵基自身也确实有了离心倾向，比如擅自在万县招编人马，扩充部队，这不就是要独闯天下，拉旗杆做诸侯的架势吗?

刘湘和邓锡侯不同。刘湘只是表面宽厚，他绝不会像邓锡侯一样容许部下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子。对王陵基的一举一动，他貌似不置可否，内心其实非常在乎。有一段时间，他盯着万县的神情，就好像那里藏着一颗定时炸弹似的。

可他仍然要用王陵基，而且要重用。刘从云暗指王陵基是长着反骨的魏延，魏延有没有反骨可以另说，但他绝对是个将才，此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具奇谋，他献给诸葛亮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策，便为后世许多兵家所激赏。

魏延的计策再高明，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王陵基在下川东之战、出征湖北一役中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尤其是他还具备跟红军作战的

经验，这在当时的川中诸将中无人可及。退一步说，魏延造反，终究还是在刘备、诸葛亮去世以后，刘湘自信自己也能镇得住王陵基，即算对方是颗定时炸弹，只要定时钟表掌握在自己手里，终究不至于马上走火失控。

导火线

王陵基率部“进剿”后，一度夺取了曾被红军控制的绥定、宣汉两县，川军境况看上去逐步趋于好转。刘湘高兴起来，不过他用兵向来谨慎小心，生怕王陵基像田颂尧一样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正好又临近春节，便连电王陵基，让他固守原有防线，不得再纵兵深入。

见前方没有新的军事行动，王陵基便乘飞机回万县过春节去了。

你要快快乐乐地过春节，红军可没这打算。1934年2月12日，农历是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之后就是小除夕。红军突然发起夜袭，在击溃川军前哨阵地后，直趋王陵基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

川中诸侯作战，自有他的一套路子和规矩，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各归各家，完全想不到会招致红军袭击。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官兵伤亡近千人，被红军缴获的武器弹药和预备过节用的鱼肉食品数不胜数。王陵基闻讯很是惊慌，急忙赶回前线督战，但川军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他的主力部队之一许绍宗旅更被红军三面围困。

红军夜袭成功，除了出其不意，与担任副总指挥的范绍增援救不力也有很大关系。刘湘对王陵基“用而不信”，就需要有人替他在旁边进行监控和牵制，但因为王陵基在川军中资格老，潘文华、唐式遵等

人见了都得喊老师，让他们做监军，很难却得过情面。范绍增不同，他是绿林袍哥出身，才不管这一套，于是便由刘湘安排，成了王陵基的固定副手。

对刘湘来说，王范配的有利之处还在于，这两人以前就不太对付。出征湖北时，范绍增受王陵基之命，率先向红军出击，结果大受损失，他认为自己吃了王陵基的暗亏，从此便多了个心眼，防王陵基跟防贼似的。

在红军对王陵基的总指挥部发起夜袭后，范绍增装聋作哑，对战况不闻不问。王陵基对此当然很不满，他给范绍增的师爷、副师长罗君彤发了封电报，指责对方“隔岸观火，幸灾乐祸”。

罗君彤颇有范绍增的风格，平时不显山露水，关键时候吵起架来却也毫不示弱，他立刻反唇相讥，说王陵基是“温柔难舍，姗姗其行”——知道红军为什么会趁这个时候偷袭吗，还不是您老人家要窝在家里和老婆孩子热炕头，前线无人指挥的缘故。

王陵基无语以对，这两封骂战电报遂在川军中被引为笑谈。

除了红军，大家春节过得都不开心，王陵基如此，刘湘亦如是。红军夜袭，使得他的第一期总攻变得虎头蛇尾，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军”的承诺也沦为吹牛，噗的一声就破掉了。

这是一个导火索，刘湘与王陵基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眼看着就要全部爆发出来了。

关于王陵基的罪状，除了过去的那些，刘湘桌上新近又积了好大一摞，里面最刺刘湘眼睛的，仍然集中于“有反骨”一条。

前线有一个团长的职位空缺，刘湘要派员履任，但遭到了王陵基的拒绝，王陵基以“前线不能易将”为由，自行升任了一位营长。按理说，王陵基的这种做法也没什么错，一个前线总指挥，如果在团长任免上都没有职权，那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再者，王陵基以前就在这方面吃够了刘湘的苦头。从万县整军开始，刘湘对部下便控制得很紧，在王陵基的部队中，所有旅团长均需刘湘委派，而且这些军官经过刘湘的精心调配，都是从师旅长整编下来做的旅团长，王陵基很难进行驾驭。

王陵基在万县招兵买马，并非全如外界想象的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立山头单干了，而是他拿这些神人一样的“御用旅团长”没有办法，不得不另外建一些自己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亲兵部队。可是刘湘不会这么想，他对此非常痛恨，在王陵基自行任命团长后，他马上派王缵绪前往王部，名为襄助，实为监视，后又加派唐式遵为后备总指挥，以便随时替换王陵基。

一般的人恐怕都会有所警觉，唯有王陵基一向眼高过头，尤其在多次取胜的情况下，更是得意忘形，完全不知道自己已身处敏感之境，必须适当收敛或低调一下了。

攻取绥、宣两县后，王陵基收容了刘存厚的残部，又将刘存厚无能无为的情况写成材料，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蒋介石对刘存厚这样的老朽本来就看不顺眼，便顺势撤销了其军长职务。

刘存厚下了课，王陵基当仁不让，在蒋介石面前自荐顶替刘存厚，当第二十三军军长。蒋介石倒是马上批准了，但这件事光老蒋的

任命还不能作数，必须经过刘湘同意才行，刘湘坚决不同意，于是此议只得搁浅。

“魏延”可能要反

王陵基没当上军长不说，还引起了刘湘对他更大的猜忌：你竟然都能越过我，让蒋介石来升你的官了，你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可怕的念头是，“魏延”可能要反！

最早判定王陵基属于“魏延”的那位一直都没歇着，刘从云果断站了出来。

有一段时间，王陵基不信刘从云，笃信的是自家的王神仙，尤其着迷于此人所谓的点石成金之术——想想看，石头都能变金子，还有比这更妙的吗?

可是王神仙说，仙人有仙规，仙规里面规定，“点石成金”是绝不能轻授的，如果违反了规定，就算是神仙本人，也得像《封神榜》里一样，被押上斩仙台去问斩哩。

那怎么办呢？王神仙说有办法，可以先炼丹砂，再把丹砂炼成黄金。王陵基信以为真，便在万县的公馆里竖起炉子，以供王神仙“点丹成金”。不料到了开炉的前一天，王神仙忽然失踪，到处都找不到人，连随身衣物也不见了。王陵基这才明白上了当，所谓“点丹成金”，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王神仙早就找了个机会趁隙逃走了。

王陵基空欢喜一场，但是对外还不能承认，只说是王神仙已经从他的公馆飞升了。

神仙斗法，刘从云不战而胜，王陵基似乎已有足够理由拜倒在他脚下，可老王仍然整天昂着大脑袋，横竖不肯拜刘从云为师，这让刘从云大为恼火。

王陵基率部“进剿”后，刘从云耐不住寂寞，也在背后指手画脚，并拟订了作战计划，要王陵基执行。按照刘从云的所谓作战计划，部队出发不但要排好良辰吉日，还要指定行军大吉的方向和路线。你要说用这个来鼓舞军心，起点精神激励作用，倒还有些依据，但真要拿它用兵，却是漏洞百出（大概是刘从云对川北地形不太熟悉，不知道川北地形复杂，他所制订的某些路线，居然很多是朝着悬崖绝壁去的）。

王陵基是武备学堂的资深教官，又有多年指挥实战的经验，自然对刘从云的作战计划弃之如敝屣，这让刘湘和刘从云都很不高兴。刘湘不是刘从云，他也是军人出身，一路打仗打过来的，他不会真的认为刘从云的作战计划有多少科学性，但科学不科学是一码事，你肯不肯服从命令是另外一码事——你就算是应一声，然而实际并不照做，都没关系。可偏偏王陵基连应一声也不愿意，王陵基越是这样，刘湘和刘从云就越认为他是心怀鬼胎，于是一连发去了十几封电报进行逼问。

十几封电报，也就相当于十几道金牌，王陵基居然每次都回电否决。刘湘急了，随即又发过去一道训令。

军队之中，极少使用训令，因为这就等于死命令。王陵基有一堆绰号，除了“王灵官”“王老方”外，他还被人称为“酱黄瓜”。酱黄瓜是四川的一种家常咸菜，酱者，犟也，刘湘下达的训令，一下子把王陵基身上那老牛一样的犟脾气全都招引了出来，以至于他竟然不顾任何忌讳，回复说：“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命誓死反对！”

“刘妖”指的是刘从云，平时或许有仇家在背后这样痛骂刘从云，但白纸黑字地写在电文上，还是第一次。不仅刘从云被大大激怒，连刘湘也感觉很是难堪，遂下决心对王陵基采取行动。

可叹王陵基对此还毫无知觉。由于许绍宗旅仍被红军所围困，他便计划在对主力部队进行补充后，继续向红军发起进攻，以解许旅之围，因此一再请求刘湘赶快把军饷和枪弹运来前线，但刘湘的电令总是：“不可妄动”。

以前不要动，是要过春节了，现在春节早过，正是用兵之时啊！王陵基不明所以，发电报去问为什么。刘湘回复：“川情复杂，电报里说不清楚，王老师不如来成都当面商量吧。”

王陵基傻乎乎的不知是计，还以为其中真的有什么讲究。他急于当面说服刘湘，便依言乘坐飞机回到了省城，结果一落地便被撤去本兼各职，并被软禁于寓所，连出入成都的自由都没有了。

不比不知道

如何处置王陵基这样的川军元老，其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恰逢刘航琛从上海返回成都，刘湘把他召了过去，在说明情况后，刘湘

说：“我已电令王先生（指王陵基）即日飞蓉，来了之后，你先同他谈，然后我再请他吃饭。”

刘航琛系由王陵基最早识拔，两人关系非常好，刘湘的这番话自然别有用意。刘航琛心领神会，当他在刘湘的督办署会见王陵基时，首先便问起了王陵基“不遵命令”的事。

王陵基正气到暴跳如雷，见刘航琛发问，马上叫道：“都是刘神仙在捣鬼！甫公（指刘湘）不听我的报告，后来居然还来了训令，若果真照刘神仙指定的路线行军，我的部队打光了也上不去啊，怎么能从命呢？”

刘航琛点点头：“你说得在理，不过既然你知道是被刘神仙所陷害，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吃点亏啰。”

王陵基还要分辩，刘航琛干脆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甫公让我先同你谈，是知道你我的交情。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你少同他争辩，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事已至此，你应该学会逆来顺受才是。”

王陵基目瞪口呆，在弄明白事情的严重程度之后，终于不敢再乱叫乱嚷了。

刘航琛把话说得很婉转：“甫公能这样做，尚有几分人情味在内，你如果善为应付，以后还可以共事。你听我的没错，退一步，亦可为将来留下余地。”

王陵基是个读过书的人。历朝历代的臣子，只要被君王认为可能谋反的，最后有几个能得到善终？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刘湘真是

有够厚道。王陵基先前气焰冲天，是他一直处在高位，没看清脚下的危险，如今看清楚了，那颗心啊，差点就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了。

对刘航琛这个时候尚能不避嫌疑，顾及和维护老友，王陵基十分感动，说：“你的好意，我很感谢，你放心，我一定审慎应付。”

刘航琛一走，刘湘来了，他首先把“川情复杂”解释了一通，包括各路军队行动不统一，他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以及经费万分困难，等等。有了与刘航琛的事先沟通，王陵基识时务者为俊杰，点头跟鸡啄米似的，刘湘说什么，他就应什么，完全没了“王老师”的派头。

刘湘对此很感满意，临走时说：“王老师收复绥、宣，已经劳苦功高，今后还是在省城休养吧，不用再到前线去了。”当晚，他请王陵基吃饭，席间由刘航琛、张斯可作陪，气氛很是融洽。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王陵基得意之时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见他事败，便乘机报复。刘湘部有几个旅长发密函给刘湘，主张一不做二不休，除掉王陵基，让他人头落地。刘航琛因为与王陵基的特殊关系，对此无法置喙，幸得张斯可极力疏通，刘湘才没有为难王陵基，只是解除军权，任其自去。

1934年3月4日，刘湘电告前线，称王陵基因病请假，现“在省休养”，改派唐式遵继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负责执行第二期总攻令。

由于王陵基遭到整治，导致川军一直按兵不动，许绍宗旅已被围困达二十多天。唐式遵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其解围。

给许绍宗解围这件事，唐式遵做成功了，但他能做成功的，也就这一件，整个第二期作战乏善可陈。刘湘没有因此责怪唐式遵，他认为进展不大，可能是兵力不足的缘故——在唐式遵继任后，他仅向前线增派了一个旅。

第三期总攻，刘湘一口气拿出了约二十个团，使前线兵力从五万增加到八万，号称十万大军，目标是夺取万源，将红军压出川北。可是唐军除了不断伤亡，仍旧一无所获，更别说接近万源了。

唐式遵相形见绌的表现，不仅令刘湘懊丧不已，就连蒋介石都看不下去了，他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刘湘督军急攻，并且说："我迁移一日，匪（对红军的蔑称）即巩固一日。"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王陵基虽然脾气又臭又犟，可瞬息万变的战场，恰恰也正需要这样的人。与王陵基相比，唐式遵不像将军，倒活脱脱是个唯命是从的公务员，刘湘说什么他就照做什么，完全不敢越雷池半步：刘湘要他防守，他便蹲着不动，不知道战机已经从身边悄无声息地溜了过去；刘湘要他出击，他也依言扑出来进攻，可是又缺乏王陵基那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和韧劲，一旦觉得不行，马上又退了回来。

刘湘埋怨"二瘟"不给力，作为军师的刘从云也对唐式遵一肚子意见，说唐式遵打败仗，是因为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其实恰恰相反，唐式遵对刘从云的计划完全照办不误，在灵活机动方面，他甚至还不如荣威大战时的川江舰队司令蒋逵。据说，有的部队依照"刘神仙路线"行军，真的因此走上了悬崖峭壁，在当地传为笑柄。

与此同时，刘湘对其他诸侯的表现也非常不满。六路“征剿”，实际分成两个战场，刘湘的第五路与刘存厚的第六路负责东线战场，为主战场，其余四路负责西线战场，为次战场。刘存厚的部队早已名存实亡，东线战场就靠刘湘单打独斗。在王陵基收复绥、宣的时候，对于西线战场进展如何，他还不太放在心上，认为只要主战场打顺了，次战场推进慢一些也无关紧要。

现在主战场停滞，再看次战场，竟然好像从始至终就没怎么动过！

以水克火

四路之中，田颂尧吃亏吃得最早最惨，如今只剩下了一点嫡系部队，根本就不舍得拿出来用于消耗。在“征剿”时，他把进攻任务全都交给收编的非嫡系部队担任，嫡系各师则控制在自己手里，轻易不敢出击。

田颂尧既败于前，没有多少进攻的勇气和实力，这个尚可理解，问题是四路中的老大邓锡侯也不肯多花力气。

自刘湘发布六路“征剿”令起，水晶猴就有了不满情绪，认为如此安排，等于把他看成了刘湘的部下（当然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多少总得给人留点面子啊）。

更让邓锡侯感到无语的，还是李家钰的自成一路。李家钰虽已独立，但在名义上仍属他的部下，现在平起平坐，连“老长官”这三个字都捞不着了。邓锡侯气愤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说：“刘甫澄（刘湘）打压

我，把我同我的部属（李家钰）和他的部属（王陵基）对等看待，未免也太藐视我了。”

邓锡侯未战便对刘湘的指挥投了不信任票，说：“看他摆开六路，不过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中间我们还要受刘神仙的节制，打起仗来胜败就难说了。”

有了情绪之后，打仗自然提不起精神。邓锡侯把他的军队一分为二，一半“进剿”，一半整训，按时间轮流参战，反正就是做个样子就行了。

四路里面真正肯起劲的只有两路，李家钰和罗泽洲便是其中一路。李罗原来并非刘湘的部下，甚至还打过刘湘，但刘湘不计前嫌，一直对他俩进行扶植，这次又让他们分任第三路正副总指挥，与邓锡侯“同殿称臣”、并驾齐驱，可谓是重用了。哥俩因此都对刘湘感恩戴德，尤其罗泽洲，为人躁动，最爱打仗，只抽了两个团留守后方，其余都被他派到前方作战去了。另外一路是杨森，本来想暗中和红军达成协议，却被冷不防地揍了一顿，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

除了这两路，其余川军可以说根本没有和红军接战，即便偶尔交火，也不过是敲敲边鼓或和境内少数游击队接触接触罢了。以哥几个的这种状态来说，进展不进展已在其次，能维持着不致崩溃已经得算是奇迹了，也正是由于红军的大部分主力部队都在东线作战，西线兵力不多，他们才得以优哉游哉地原地转圈。

四路将领形式上都还是诸侯，不是像王陵基一样的直属部将，刘湘没法直接把他们给撤掉，只能用另外一种办法：让刘从云扶乩。

扶乩有个特点，每次跑出来胡说八道一通的所谓“乩仙”都会不一样。比如《红楼梦》里的妙玉扶乩，被她请出来的就是“拐仙”，也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

铁拐李的身份，只能诌一些诸如“青埂峰下倚古松”之类的闲散小调，说到用兵，还是武圣更权威。刘从云请的便是关公，关公说：“要打垮红军，非刘从云莫属。”

扶乩结束，刘从云当即向刘湘表示：“红军属火，你五行属水，打败红军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又是主帅，主帅不可亲征，那么只有我这个军师代你前往了。”他看上去对取胜相当有把握，说：“我能运用北方壬癸之水，以水克火，去扑灭它。”

“乩仙”关公不过是个木偶，在后面提着线的自然还是刘湘和刘从云，他们的这种配合其实早有先例可循，而且是成功的先例。

在当年刘湘派王陵基出征湖北，但寸土未得后，川军内部一度对刘从云产生过怀疑和不满情绪，认为他的话靠不住。为了重拾权威，岷江大战时刘从云便又做起了手脚，某天晚上，他和军官们一道开会，忽然心血来潮，随占一卜，说“城外某方位有乱象”。不一会儿，他所说的那个方位果然枪声大作。众人听到后脸色大变，却见刘从云不慌不忙又占一卜，说：“不要紧，乱象就要平息了。”

话音刚落，果然寂静无声。一众军官佩服到五体投地。

枪声忽起忽落当然是有缘故的，后来罗泽洲透露了真相：“那个乱象，是刘老师关照一个连长，按时朝天放了二三十枪，以震煞气。”

罗泽洲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就连他也不敢说“刘老师”是在装神弄鬼。在此之后，刘从云不仅重新在军队中树立起了自己神一般的地位，而且还将这种地位上升到了无人可以超越的地步，俨然成了四川军人的精神偶像。

如此全能型的偶像，若用他来指挥群雄，不是比刘湘本人甚至是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都灵验吗?

在造出声势后，刘湘发布了两道最新命令，第一道命令是发布潘文华为预备军总指挥。这是做给唐式遵看的：你再不拿点本事出来，下一个要换的就是你。

第一道是大家能够预料到的，但第二道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刘湘宣布，原督办署高级顾问刘从云出任四川“剿总”军委会委员长，代他指挥六路兵马。

捡到了便宜

刘从云虽在岷江大战中掌过帅印，但并无正式名义，套在头上的始终还是一个高级顾问头衔，如今骤升到如此高位，不是反常，是超级反常。

可是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对此说三道四。因为刘从云不仅“神机妙算，算无遗策”，而且从邓锡侯、田颂尧等诸侯，到刘湘的一众嫡系部下，都是他的门徒，让“刘老师”掌印，似乎又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刘从云受命之后，即驻节南充，遥控六部。此时正是刘从云最显赫之际，其随员出入于南充城，均抬一顶漂亮的八抬大轿，他坐在轿中，穿一身八卦衣，头戴道冠，手执一柄雕翎扇子，除胡子短了一些外，所有装扮和戏台上的诸葛亮一模一样，毫无二致。

刘从云的大旗也别出心裁，称得上是汇合古今的杰作，上面既有他的头衔“委员长”，又有“天下兵马都将军”等让现代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名称，中间还要再绣一斗大的“刘”字。怎么看，都仿佛是三国人物的一次成功穿越。

当然刘湘想要的效果也达到了，或至少是部分达到了。刘从云在南充说神道鬼，放出话来，要“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在他的压力下，西线的“邓、田、李、杨”四路都不能不打点起精神，尽量往前挪。

看到西线川军已经多少动了起来，作为盟主的刘湘自不能落后。1934年6月22日，他发布第四期总攻令，以东线为重点，向万源至通江一线发起猛攻。为了组织这次总攻，刘湘翻箱倒柜，拿出了全部精锐，其兵力的五分之四，十多万人，被一次性全部投入了东线战场。

在前线，潘文华的任命一发布，唐式遵就知道是冲着他来的，哪里还敢再“瘟”下去，于是一下子又由老实头变成了“白脸张飞”。在他的督促下，唐军攻势凶猛，而且很快便攻到了万源城南。

面对不利局势，红军决定改变策略，除留下少数兵力继续在西线防御外，大部人马全部移至东线，进入万源固守。

红军的这次东移，让西线川军捡到了便宜。一夜之间，四路川军倒有三路同时进入通江县城，他们在给蒋介石发电报时，都说是自己

收复了通江，弄得蒋介石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功劳算在谁头上，只得发电报让刘湘查查清楚。

刘从云名为节制六路，实际并无掌控全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他每天所能做的，不过是算算命、卜卜卦罢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要么几天没动静，一个电话也不打到前方，要么是一天连发几道命令，比如某时某刻向某地进攻之类，就连这些命令，其实也不是依据敌情，而是从八卦上推算出来的。

刘从云本人不在前线，隔着这么远，就靠一套八卦工具、一张平面地图进行指挥，如此推算出来的作战命令自然有不少错误和漏洞。四路川军本来就不是真听刘从云指挥，攻占通江后，争功还来不及，哪里还肯再卖力气向前进攻。于是他们也有意识地把刘从云颁下的命令夸张一把，说你要是认真执行的话，不是得碰到悬崖峭壁，就是扑个空，连一个红军也找不着，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干脆守在通江，哪儿也不要去。

红军舍弃通江，换来的是西线基本无战事，这下就可以腾出手来经营东线了。

刘湘最重视的也还是东线。他把刘从云搬出来，其实只是为了让西线川军能够既出工又出力，对性命攸关的东线战场，他可不敢完全靠八卦来打仗。1934年7月中旬，唐式遵向万源发起进攻。刘湘专门为此发布奖惩条例，规定若能攻取万源一带的红军主阵地，则给予奖金三万，擅自放弃阵地者要予以处死，各师旅必须将所部的三分之二兵力投入战斗，师旅长们凡不亲临现地指挥的，也要处以死刑。

严令之下，唐军向万源发起了波浪式密集冲锋，一个团攻不动，就投入两个、三个、四个。很多川军官兵光着膀子玩命冲锋，前沿阵地的红军每天要应付多达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一直打到天黑，阵前尸体积了一堆又一堆。

这是关系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血战，双方谁也不肯相让，都达到了勇的状态。当然勇与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唐式遵的勇，是被逼急了的张飞式蛮勇，红军的勇，却是深具战略战术眼光的智勇。

红军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西线，集中力量于东线，是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川军抵抗，不利红军反攻，相比之下，东线战场的地形南低北高，红军完全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阻击。在每个作战方向，红军均按照山势，自下而上筑成了数道乃至十几道堑壕盖沟，设有层层竹篱、鹿寨，并配有大量滚木礌石。依靠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出了名的悍勇，他们实际只需要部署少量兵力于一线，就足以守住阵地。

真是跑得快哟

经过二十多天的相持，红军在万源一线连续挫败了川军的五次大规模进攻，川军死伤万余人，但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时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川军官兵不堪其苦，士气一落千丈。四川报纸报道说：“前线士兵，形同乞丐。有开回者，令人视之，惊为僵尸。”

刘湘情急之下，又抬出了刘从云，而刘从云能够用的也还是那几招，无非是选定黄道吉日，然后是预言川军必胜。效果却是适得其

反，尤其是几次“失灵”后，惹得川军上下怨声盈野，大骂刘神仙是“骗人妖道”。

刘湘的精锐之师被熬垮之际，正是红军放鹰之时。1934年8月9日，红军通过夜袭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一直在二线休整待命的红军主力部队倾巢而出，瞬间便将川军的防御阵线一劈两半。

川军兵败如山倒，唐式遵失魂落魄，一度在战场上失踪，部队在失去首脑后更是混乱不堪，溃不成军。万源一战，因唐式遵用兵无方，导致川军子弟损失惨重，四川民间也因此有了“多少冤魂怨二瘟”的嗟叹。

红军在东线得手后，又迅速转入西线进行大反攻。得知东线崩溃，西线的四路川军早已心胆俱寒，没打几下，便争相溃退，最后一直退至嘉陵江西岸才敢停下来喘息。川人给军头们编了个打油诗，谓：“羊子（杨森）蹦索索，冬瓜（田颂尧）遍地滚，猴子（邓锡侯）摸脑壳，矮子（李家钰）遭鞭打。”

“摸脑壳”的邓锡侯又羞又恼，在整顿部队时对官兵们训话说：“你们进攻时，几个月才打到通江，现在逃跑，几天就跑回来了。我给你们算了一下，你们这趟一共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说起责任，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你们这几个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几个旅长在下面听得面红耳赤，默默无言。

前方大溃败的消息传出，刘从云惶恐万分，身上已全无一点诸葛孔明的镇静自若，坐着飞机便从南充逃回了成都。刘湘害怕动摇军心，派人前去阻止，但已经晚了一步。接着，他又听到了唐式遵失踪和全军覆没的消息，更让他有了一种连心带肺被撞击到的感觉。

一想到自己二十多年来苦心筹建，赖以称雄巴蜀的部队，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刘湘完全无法接受。那一瞬间，他突然精神失常，整个人都变得迷迷糊糊起来，后来听说，唐式遵已经现身，主力部队也得以保存，并未被红军全歼，这才清醒过来。

到底经过大风大浪，清醒之后的刘湘很快恢复到了指挥若定的状态，他一边让王缵绪在成都修筑防御工事，做好打“成都保卫战”的准备，一边电令已分别退至绥、宣和嘉陵江的川军各部，要求不得再退。与此同时，又启动督战队和潘文华的总预备军，让他们一个负责收容残部，一个负责兼程增援，这样才总算稍稍稳住了前方战局。

只是遭此惨败，刘湘屁股下面还没焐热的盟主宝座已经晃荡个不停了。军头们都将溃败的责任，归咎于刘湘的第五路军，认为正是刘军防守不严，导致东线率先崩溃，因而使得西线也无法固守。

第一个被拎出来开刀的是刘从云。川军将领们再也顾不得什么“刘老师”不“刘老师”了，他们众口一词，都对刘从云表示反对，有人甚至请杀刘从云，以偿败军之罪。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并由刘湘礼送其离开川境，以息众怒。

失去刘从云，意味着刘湘从此失去了“以神治军”的法宝，对各路诸侯更加难以做到统一指挥。除此之外，前线早已兵无斗志，军心一蹶不振，而后方更是完全炸了窝，有点钱的人家纷纷将存款兑往京沪，或携眷逃离川境，粮饷的筹措变得极其困难。

这是在内部，外部蒋介石也来电相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财竭兵溃的境地，刘湘一筹莫展，无计可施。1934年8月23日，他以“川军剿匪军事困难”为由，致电蒋介石，呈请辞去四川“剿总”及第二十一军

军长职务，随后便坐汽车离开成都，前往重庆。这一路上真是好不凄凉，当他下车渡河时，甚至曾绝望到想投河自杀。

即便这样，背后仍少不了冷言冷语。在电报中，刘湘称自己是“微服东下”。有嘴皮子痒痒的，看后不依不饶，说：“这不是自认畏敌潜逃吗？不是潜逃，为啥要微服呢？”

打仗也是玩艺术

刘湘一走，周围人等逐渐回过味来，并且陷入了新的恐慌。若是在平时，刘老大就是出个差，众人也会把嘴巴笑到有拳头那么大，没人管束了嘛，可以各行其是了，可这是什么时候，红军虎视眈眈，随时还会再撞门而入，怎么能没人掌控全局呢？

要不换个老大试试？环视各家，刘文辉早在岷江大战时就被打成了破落户，因远在西康，这次“六部进剿”都没能来，其余“邓、田、李、杨”皆已丧魂落魄，没一个能让人心服。

最后大家又都想到了王陵基。王陵基资格最老，且能打仗，迄今为止，如果要说谁在与红军交战的过程中有过胜绩，也就他了，就连如今川军赖以据守的绥、宣防线都是他在职时收复的呢！

战争年代，论英雄只能看成败。因为打了败仗，曾经万人仰望的刘从云从偶像的云端跌落，摔到粉碎，因为打过胜仗，曾经遭人嫉恨的王陵基重被抬到云端，甚至有人说，要是老王不被唐二瘟给换掉，哪里会吃败仗？

众人商议下来，一致拥护王陵基继任盟主之位。王陵基正在乐山闲居，听后说了一句："我不能接受任何名义。"随后他再不发一言，只提起笔来写了一张字条："副官处即购赴沪机票一张。"第二天一早，便坐着飞机去了上海。

王陵基不愿出面主持，刘湘又成了大家眼中的香饽饽，从各路军头到自家的谋士、部将，都轮番过来劝说，要他振作精神，收拾残局。

这么多天过去，憋在刘湘心里的伤心和委屈也释放得差不多了，像他这样的人，又哪里肯真的退隐。既然还有如此多的人拥戴自己，刘湘早就想复出了，实际上，自当年九月份开始，他就已经以"在野之身"在重整部队了。

检点"六路征剿"的落败之因，与各诸侯不卖力不齐心当然大有关系，但是打铁还须自身硬，唐式遵负责的东线战场先是进展不大，继而率先垮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荣威大战时，通过与刘文辉的较量，刘湘对自己军队战法的落伍已有认识，只是后来岷江大战制胜，一俊遮百丑，便没继续进行改进。若论战略战术之灵动高效，红军尚在鼎盛时期的刘文辉之上，跟这样的强敌交手，怎么会不吃败仗呢?

刘湘深刻地感受了一种切肤之痛：打仗也是玩艺术，还是得有点灵气啊！

此时一个叫杨吉辉的人给予了刘湘很大帮助。杨吉辉毕业于武备学堂炮兵科，后做过速成学堂教官，与刘湘有师生关系。此人曾赴国

外考察过军事，对最新的军事潮流颇晓一二，针对川军在训练和作战上出现的问题，他提出了新战法构想，并得到了刘湘的认同。

所谓新战法，具体来说，就是进攻时要注意疏散，以减少伤亡，防御时要编织火网，设置警戒阵地、前进阵地以及纵深配备。杨吉辉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教导队，从连排开始演练新战法。刘湘观摩后，认为值得向全军推广，但一些师旅长硬打蛮干惯了，反而觉得新战法用起来别扭，有人看了杨吉辉的防御阵地后，不屑一顾地说："这种阵地设了一层又一层，不是更疏散薄弱了吗？若是我的队伍，一冲就过去了。"

刘湘不同意这种认识，他要求在训练中强制推行新战法，自此，川军的军事训练便发生了质的转变。

每年刘军都要进行秋季大检阅。往年刘湘看演习，总是看见派完尖兵和侦探后，就是大部队行军。一群又一群人走来走去，走个没完，结果还没看到攻防，一天就过去了。他比喻成是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看上去浩浩荡荡，能不能打却全不知晓。

这次为了检验新战法的效果，刘湘和裁判人员强调不看表演，不看行军，只看部队如何攻防，同时要求各师都要以旅为单位进行对抗演习，双方各攻一次，防一次。对于这几次的演习，刘湘事后的评价很高，说："能真正解决问题。"

由于新战法的推广，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相比于其他川军，在战斗力上有了提高，战略战术也从呆板僵硬趋向于灵活多变，大致已经能做到进退有序、攻防有法了。

门户开放

军队有进步有起色，让靠枪杆子起家的刘湘有了些底气，但一想到正式复出后仍然粮饷两缺，又觉得难以为继。

能出手拉刘湘一把的只有蒋介石。刘湘宣布辞职时，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第五次“围剿”，分身乏术，急需有人在四川主持军事。四川军头虽多，但他一圈看过来，也确实挑不出比刘湘更好的，因此对刘湘连电慰留。

1934年10月17日，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突围西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征。蒋介石由此更加重视刘湘的作用，承诺只要他复出，可尽力提供军火和粮饷方面的援助。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和承诺，刘湘这才由重庆返回成都。

22日，刘湘通电复职。蒋介石立即践诺，发给川军炮弹五百发，枪弹两百万发，同时邀请刘湘面谈。

刘湘随即召集属下谋士和部将，在重庆，而不是成都，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是在刘湘家里面开的，可谓一次别开生面的“家庭会议”，同时它还将决定着四川的大门究竟是开还是关。

过去刘湘和刘文辉的一个重大分歧，便是四川的“闭关自守”问题。说是有分歧，但其实他们叔侄间并无本质不同，刘文辉打开门，也不是要放别人进来，他是要出去开人家的门。若放到现在的破落户地位，刘文辉估计也只会强调“闭关自守”——没办法，你的心胸再广，可身躯的宽度不够，还是一样白搭。

事实上，从红四方面军入川起，四川的门就已经被打开了，就是想关也关不上。另一方面，面对惨淡局势，若继续将蒋介石拒之门外，不等红军进攻，川军便可能先行崩溃。

会上众人都认为，指挥不统一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军头们在四川内战中与刘湘或敌或友，地位相当，刘湘在对自己的第二十一军进行奖惩时，固然可以令行禁止，但在指挥其他军头时就比较困难了，这样当然起不到指臂相连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呢？只要说是奉中央之令，谁敢不从？这么做，既用不着再顾及双方的面子，理由也冠冕堂皇：与红军作战是全国性的，不是四川一省之事，自应和中央连成一片。

开完会，刘湘接受众人意见，初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实施“门户开放”。

虽然“门户开放”在刘军内部已得到共识，但四川舆论对此却并不苟同。长达多年的滇黔军“侵川”历史，使川人对任何外省势力的渗入都分外敏感，就算是蒋介石的中央也不例外。蒋介石邀请刘湘面谈，刘湘还没动身出发，就受到了多方责难。

作为刘湘自己，对于和蒋介石打交道也不无心病。

早在曾扩情首次入川时，蒋介石就曾通过曾扩情邀请刘湘在武汉见面。当时刘湘答应得很爽快，所乘轮船和随行人员都指定好了，行李也搬上了船，谁知临行前夕，他却派人告知曾扩情，说是得了重病，生死未卜，没法启程。

曾扩情前去慰问，见刘湘在床上呻吟不已，迷迷糊糊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但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病容，情知对方是在托故装病。

刘湘装病，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尚存疑虑。为此他专门请刘从云卜了一卦，刘从云卜完卦，说武汉之行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好一点是给个虚衔，强留于南京，坏一点是予以软禁，像熊克武那样关在不见天日的屋子里，反正不管好坏，都没有再回重庆的希望。

刘湘闻言大惊，可是已经答应要去武汉，公然谢绝也不好，便只有装病一途了。

曾几何时，武汉和南京对刘湘来说，都是畏途一条。时隔数年，终于轮到自己要跑去南京巴结了，刘湘无限感慨，说：“从前人家（指蒋介石）请我坐上座，我硬不去，今天自己上门，提着蒲团辕门求见，真是大大不同了。”

后悔药是买不到了，刘湘深感前路难测，不知道此行蒋介石给他的到底会是上座还是冷板凳。在到汉口坐船时，他决定约一位谋士同行，顺便再商量一下行止。

刘湘身边谋士众多，除刘从云外，钟体乾、张斯可均以协理内政为主，只有这位谋士常年在外，替刘湘打着各种交道，他的名字叫邓汉祥。

敢问今后志趣何在

邓汉祥，贵州人氏，最初入幕于陈宧，护国运动期间，在陈宧面前极力反对帝制的，便是此君。陈宧倒台之后，邓汉祥赋闲了一段时间，不过能干的职业幕僚总不愁没有好主顾，不久之后，皖系的段祺瑞来聘，邓汉祥便做了段府的幕僚。

刘湘与杨森相斗时，刘湘等人派代表到北京，以安定川局为由，请求执政的段祺瑞免去杨森善后督理（即实质上的督军）一职，但杨森也派代表向段祺瑞示好，请段祺瑞对其进行维护。

刘湘那边人多，杨森是孤家寡人，但因为觉得刘湘“能容不能断”，段祺瑞仍一度倾向于维护杨森，他对邓汉祥说：“刘湘等几部分结合反杨，犹如手掌一样，五个指头伸起打出去，容易折断。杨森虽是一部分，但犹如拳头一样，打出去是有力量的。川事不能从人的多少来判断。”

邓汉祥则认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出发，段祺瑞的选择未必正确：“我们扶助刘湘等，如果打胜，则四川实力派从此就可以拉拢。即使打败，杨森也绝对不能把几部分同时消灭完。”

知道段祺瑞与吴佩孚是政敌，同时老爷子又对统一四川念念不完，邓汉祥进一步对症下药，说如果段祺瑞要扶持杨森，“杨是曹锟、吴佩孚的忠实爪牙，杨纵然打胜，我们是替政敌培养势力，杨若打败，则刘湘对中央既来依附，又未得到扶持，必然会敬而远之，甚至或演变成过去独立局面”。

段祺瑞听了邓汉祥的话，立即转变态度，下定决心扶助刘湘。

得知邓汉祥在段祺瑞面前为自己说话，刘湘在对邓汉祥感恩戴德之余，打算把自己防区内的四个县腾出来，私下“赠予”邓汉祥，具体

方式是由邓汉祥派亲信出任四县的县长和征收局长，等于是送了邓汉祥四座金矿。

诱惑大到无法拒绝，而且似乎也用不着拒绝，但邓汉祥仍然婉言谢绝了送上门来的“金矿”，婉拒的理由很具职业风范——他所侍从的是段祺瑞，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否建议扶助刘湘，其出发点都是帮段而不是帮刘，所以绝不能额外收受好处。

邓汉祥的这一举动，颇让刘湘感佩，也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为人幕僚者，当如是！

后来“能断”的段祺瑞也败了。临别时，老段总结了自己的成败得失，赠言邓汉祥，要他以后千万不要参加任何党派，以免受到牵制。邓汉祥深以为然，终身都保持着自由人身份，这果然为他日后在政坛便宜行事创造了条件。

邓汉祥盛名在外，蒋介石亦有心招纳。邓汉祥本已应召前去，但当他在旅馆读报时，一则头条新闻忽然使他改变了主意。那是国民党中央发布的一条通缉令，通缉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皖系首要十人。看完报纸之后，邓汉祥顿觉不安：我曾与这十人共事，现在他们却被蒋介石通缉，我反侧身求进，这种令人齿冷的事万万做不得。

邓汉祥遂以还乡为名相辞，立即动身返回家乡贵州。听说邓汉祥路过重庆，刘湘赶紧对其挽留，一见面就说：“这下你该要给我帮忙了。”

刘湘想委任邓汉祥为他的参谋长，邓汉祥回答：“既蒙不弃，当尽绵薄之力，但我与你的部队一无历史渊源，参谋长一职实难从命。”

刘湘正在考虑其他可以借重的职位，邓汉祥忽然冒出一句：“敢问今后志趣何在？”

那个时候的刘湘，和鼎盛时期的刘文辉差不多，西装革履之下都藏着一颗闷骚的心，他毫不犹豫地答道：“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固所愿也。”

邓汉祥略一沉吟，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公既具此雄心壮志，应宜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近攻之事，君自权衡，远交方面，我愿略效微劳。”

君臣一拍即合，此后邓汉祥便受命驻外，成为刘湘在京沪两地的“驻外使节”。

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丰富的游幕经历，使得驻外的邓汉祥基本可以做到“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尤其在中原大战期间，他更是为刘湘做出合乎其利益的政治判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原大战开始后，别说是刘湘叔侄，就连蒋介石都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成败。到了大战的后半段，角力的双方势均力敌，就看东北的张学良肯支持哪一方了。张群衔蒋之命，去沈阳拉拢张学良，张学良却吞吞吐吐，词语暧昧，始终不肯明确表示态度，把个张群急得团团乱转。

正好邓汉祥也代表刘湘来沈阳打探内情。在段祺瑞幕中时，邓汉祥曾数赴东北，与张学良有旧，当他以“与楚抑或与汉”相询时，张学良明确答复：助蒋。

张群在张学良面前碰了壁，转而询问邓汉祥。邓汉祥要为张学良保密，不便明言，只说：“看来你的使命一定是能够完成的。”

张群马上听懂了其中意味，于是急电蒋介石，谓已大功告成。这边邓汉祥也在第一时间给刘湘发去电报，使得刘湘没有像他的叔叔刘文辉那样一步失算，走出大败着。

包括张群在内，邓汉祥与蒋介石座下的另一位主要谋士杨永泰以及大将何应钦均素有深交，张、杨、何又都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京城重臣，这使邓汉祥成为刘湘身边最适宜于与蒋家打交道的幕僚，张、杨、何也因此被外界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

为确保刘蒋会谈取得成功，在刘湘启程之前，邓汉祥已经代表刘湘提前谒见蒋介石，并与张群、杨永泰多次协商，给刘湘铺好了路，现在见幕主相召，他又急忙从上海赶到汉口。

见到邓汉祥后，刘湘问道：“你看蒋介石这回约我去，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已知端倪，他告诉刘湘：蒋介石会提高你的地位，利用你来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但同时也免不了要以防堵红军为由，派重兵入川。

早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邓汉祥的实话实说，令刘湘愈加忐忑不安，可是他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只能解缆行船，边走边想。到了

武穴，他终于想通了，对邓汉祥说主意已定，阻止中央红军北上和防止其入川，“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能放蒋介石派兵进来”。

刘湘就此分析到，假使中央红军只是路过，即为虚惊一场，大家井水不犯河水。退一步说，如果中央红军的目的真是要拿下四川，川军出于保卫桑梓之情，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反之，若让蒋军进川，固然可以增强对抗红军的实力，但如同川军的湖北之役一样，到最后收取果实的将是老蒋，而不是他刘湘。

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船抵京。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很是隆重，除蒋介石外，其余文武大臣均至下关恭候。

稍事休息之后，刘湘便由杨永泰陪同，前去面见蒋介石。到了“进殿面圣”的关键时候，刘湘忽然变得笨拙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蒋介石颇为诧异，以为刘湘是奔波劳苦所致，只好让他先下去休息。杨永泰见状笑着对邓汉祥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

虽是劝谑之词，杨邓私下又是老友，但邓汉祥听到之后，仍立刻板起脸，正色道：“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其实刘湘只是因为害怕蒋介石当面提出派兵入川，所以才故意装傻而已。他的这一计谋算是成功了，蒋介石没有谈成，只得临时安排杨永泰等人与邓汉祥进行磋商。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是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简称“剿总”），授权其打破防区，统一军政，今后川军军费和军火也全部由南京政府负责发放。除此之外，四川可独立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近年来所积债务，缓和财政困境。

这些都是预期利好，接下来才是最关键最棘手的。鉴于中央红军很可能继红四方面军后开往四川，以四川一省之力来抗衡红军，恐难有把握，因此蒋介石拟派十个师的蒋军从川东和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川军作战。邓汉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客套几句，表示这种布置很周密，接着便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还应特别考虑四川军民的心理。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想，他们还是会认为你们是客军。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蒋军入川吗？居然还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都不肯相让，于是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撒手锏：中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剿总"了！

第十章　夹缝里求生存

蒋介石要入川，刘湘不想让他入川。几番来回之后，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只好打消了派兵入川的初衷，决定另派“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湘难以回绝，当下便点头应允下来。

1934年12月8日，由贺国光陪同，刘湘在谒蒋辞行后搭轮回川。刚刚回到重庆，消息传来，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刘湘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四川，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同时在长江以南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对红军发起攻击。

聪明的办法

预计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会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楚。中央红军中不乏刘湘过去的“熟人”，比如朱

德、刘伯承，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的宿将，他们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得谜底变得更加难解。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的攻势，无法把川军主力都调来对付中央红军，能够调剂出来的兵力有限，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线路上全都部署防守显然是做不到的。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以便随时作出应变。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辖的郭勋祺旅，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用来监控南岸红军的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泸州方向移动。他判断，一旦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必会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如今非常害怕红军入川。他认为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太过被动，这次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争取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把它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蒋介石所流露出来的意图，蒋军虽不会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率部前去堵截。不过当郭旅赶到预定地点时发现已经迟了一步，中央红军早就走在他们前面了。郭勋祺出身行伍，从普通士兵逐级擢升至少将旅长，其能力、战功及

其在战场上所要付出的代价，自当军校生可比。他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也一向以胆识过人著称，人送绰号郭莽子，和年轻时的刘湘“刘莽子”颇有一拼。当下郭勋祺也不管在他们前面的红军究竟有多少，便自作主张，下令部队改堵截为尾追。

自刘湘在他的第二十一军中推广新战法后，各师旅的整体军政素质都提高很快，郭旅尽管追得异常生猛，但并不毛躁，一路过去，都会进行掩护和搜索。27日，在郭旅主力部队徒步搜索到土城附近时，有人捡到了一张油印文件，这张文件四寸宽，被捏得皱皱巴巴，显然已经过很多人的传阅。

郭勋祺将文件展开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红军制订的一份秘密军事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军将实施伏击战，将他的部队予以全部歼灭。

联想到红军近日都是稍事抵抗便即行撤退，郭勋祺感到计划可能属实，于是赶紧传令部队停止追击。之后爆发的激烈战斗证明红军果然有在土城张网以待的打算，只是因为意外泄密，致使原定的伏击计划落空，歼灭战也变成了较为困难的攻坚战。

见一时难以歼灭郭旅，川军其余部队又可能随时增援而来，红军便主动撤出了土城。在这一战中，郭勋祺只是侥幸才没有沦为“张辉瓒第二”，他自己也深感庆幸，有人向他恭喜，说：“旅长的洪福大到齐天。”他撇了撇嘴：“什么洪福齐天，如果再打半天，子弹一完，管叫你们饮弹入地。”

土城战役前，正是川军士气普遍低落之时，急需“攻克土城”这样的战报提提精神。刘湘闻讯，立即晋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同时在

四川报纸上大肆宣扬，称之为“土城大捷”。

中央红军撤出土城后，便放弃了从泸州北渡入川的设想，本来还想经过叙永，从宜宾北渡入川，但叙永方面敌军的防守也很严密。经过商讨，中央决定改变路线，前往云南，这也意味着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入川，进而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原定计划不得不取消了。

此前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已做好了西渡嘉陵江的准备。自1935年2月初起，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兵出汉中打击杨虎城，但这只是虚晃一枪，为的是吸引嘉陵江沿线的川军北向，以便从嘉陵江中段实现突破。

嘉陵江边好清闲

在川军诸侯中，田颂尧部第一个与红军交手，也第一个遭殃，此后就留下了心理阴影，官兵无不畏红军如虎。偏偏分摊给田颂尧的嘉陵江防线还特别长，全长七八百里，三十多个团铺上去，平均二十多里地才分到一个团，根本无法兼顾，只能是守点看线。

真是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田颂尧只好自己骗自己，他先在江边转了一圈，看看筑的碉堡，想想红军若要强渡的话，必然要暴露于碉堡群的火力覆盖之下，红军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吧。接着又扫视了一下江面，似乎觉得更有把握了，因为他已经把江中所有船只都弄到西岸和下游去了，没有渡船工具，嘉陵江又不能徒涉，红军难道能飞过来？

虽然做了这番自我安慰，但田颂尧毕竟还是有些心虚。他及其部下向嘉陵江东岸派去了侦察，想打探红军的虚实，可是带回的情报又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由于始终弄不清红军的真实情况，旅长何瞻如干脆求上了神仙。他在关帝庙设了个神坛，找两个道士扶乩，把什么关公、观音、玉皇大帝一股脑儿全召了来，请这些神仙下发判词。神仙们很够意思，每人都来了一趟，而且都通过乩笔示意："红军要失败，要消灭，不会来。"

何瞻如高兴起来，他准备春节回成都娶姨太太，走之前，又去扶了一把乩。这次关公不仅亲自登坛赏光，还破例赐了何瞻如一首诗，诗云："跨骑赤兔下南天，嘉陵江边好清闲。将军各自放心去，红罗帐内戏婵娟。"

何瞻如乐得哈哈大笑，一颗心完全落了地，他立即打电报给田颂尧请假，得到批准后便放心大胆地去成都"戏婵娟"了。

可是嘉陵江边却并不清闲。田颂尧和何瞻如都不知道，红军已在离嘉陵江几十里远的地方大量造船，在发起强渡之前，这些船只均被抬到江边，只是做了伪装隐蔽，看不出来罢了。

1935年3月28日，一个风雨之夜，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其突破区域正是何瞻如旅所防守的正面。

红军发起强渡后，田军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彼此乱喊乱叫，负责侦听的红军通信队对此听得清清楚楚。听到电话里在问："红军到哪里啦？你们怎么样啊？"有人便插进去答道："老子是红军，

你们完蛋啦！”这都算便宜了田军，通信队有时还假装田军对答，结果更加剧了其内部的混乱。

在强渡嘉陵江一役中，田颂尧的沿江防线土崩瓦解，红四方面军强渡成功，打开了西进的通道。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明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接替指挥。

被撤职前，田颂尧已感到前景不妙，连忙急电自己驻重庆的代表李蕴鼎向刘湘求救。李蕴鼎从早上到中午，一连求见刘湘三次，都被门卫婉言谢绝。深知田颂尧危在旦夕，李蕴鼎又急又怒，撂下话来说：“今天见也要见，不见也要见，非见不可！”随即将名片摔在了地下。

刘湘深恨冬瓜不争气，早就不想保他了，只是见李蕴鼎赖着不肯走，才不得不出面接待。刘湘对李蕴鼎说：“我已将你们的意思转达给贺元靖（贺国光字元靖），他表示只能听候委座（蒋介石）处理，似无折中余地。”

李蕴鼎当然知道“听候委座处理”是什么结果，因此一再坚持：“甫公何不马上就以总司令的命令处理。”

田颂尧希望打两下屁股就算了，但蒋介石和刘湘决心已下，李蕴鼎拼命恳求，也只是让蒋介石的命令延迟发布两天而已。

1935年4月4日，孙震召集军官开会，宣布：“军长这两天有病，命令我暂时代理他。”说完之后他就离开了，但临走时在桌上丢下一张纸，众人捡起一看，才知道是对田颂尧的撤职查办令。

一朝天子一朝臣，孙震一俟完成职务交接，便来了个大清洗，田军军部原有官佐除个别留用外，全部停职遣散，让他们自谋生路去了。

田颂尧的亲信之一前去田公馆探视，发现公馆里竟然连个警卫侍从人员都没有了。田颂尧正患腹泻，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见到亲信前来探望，二人相对黯然，不觉泪下。

距离成都巷战三年后，田颂尧的事业终究还是彻底完蛋了，一只好端端的大冬瓜被摔得粉碎。

又心惊肉跳起来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虽然基本放弃了川陕苏区，但通过连克涪江流域的九座县城，部队又迅速扩充至八万，加上从川陕苏区撤出的其他人员，总计不下十万之众。蒋介石、刘湘急急忙忙从各个方向调兵合围，由于感到情况严重，刘湘已顾不得蒋军入川这一禁忌，于是胡宗南便顺势率部进入了四川境内。

无论北面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南面的中央红军，此时都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会合地点，西康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西康是刘文辉的地盘，此处地僻民穷，经济极为困难。岷江大战后，陆续来投靠刘文辉的旧部军官倒是很多，但他都只能暂时予以收容，连工资都发不出，与此同时，刘军自身也到了勉强果腹的程度，士兵衣不蔽体，跟叫花子差不多。

为了能向刘湘多要一点粮饷，刘文辉经常进行内部编制调整，一会儿扩团为旅，一会儿扩旅为师，可是扩来扩去，实际兵力尚不足两万，也就是说，西康时期的刘文辉比当初同样落魄的杨森还要可怜。

因为天高皇帝远，刘文辉没有被刘湘纳入"六部围攻"序列，使他避免了损失，内心里颇感庆幸，然而很快，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并且一直活动于黔西北，大有杀入西康之势，这让刘文辉又心惊肉跳起来。

此时的刘文辉两手空空，那什么诸葛亮的头脑、哪吒的风火轮、菩萨的法力，还有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他都恨不得有人能借给他，这样他就不怕红军了，可惜全没有。在既无实力阻击红军，也不可能一遁了之的情况下，刘文辉只好掩耳盗铃，用严密封锁消息的办法来避免军心动摇。

其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度回师贵州，做进攻贵阳状。刘文辉及其部下因此产生了幻想，认为红军可能不会再来西康了。未料红军在攻克叙永未果后，又突然一个回马枪杀往了云南。西康临近川滇边境，刘文辉不得不再度下令紧急戒备。

虽然做了中央红军由滇入川的心理准备，但刘文辉仍心存侥幸。支持他这一侥幸心理的论据之一，是红军由滇入川，必经金沙江及大渡河，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所走的线路，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石达开的兵败覆灭，即与此相关。

当然谁也不能保证红军绝对不走"石达开路线"。刘文辉派重兵在金沙江、大渡河沿线设防，同时寄望于在红军后面进行追击的蒋军薛岳部能够及早赶到——和刘湘一样，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头，他也顾不上提防中央军入川了。

受刘文辉之命堵击中央红军的将领，是刘文辉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他一反常态，在金沙江沿岸只布置了两个团，其余兵力都放在会理、德昌、西昌三线。

刘元璋如此部署，自有他的理由：金沙江的江防线和嘉陵江一样漫长，不易防守，若被红军突破一点，便会全线崩溃，因此，守江不如守城，守面不如守点。

实际上，刘元璋的出发点和刘文辉是差不多的，即都是将兵力集聚于县城，认为只要能够据城固守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离去。刘元璋在三线部署的兵力也不同，特点是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往后面兵力越多。他对此自鸣得意，通过自己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打仗内行，如此前轻后重的布阵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各城守军越来越强的印象，这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这刘元璋虽比三国的刘璋多出一个字，但打仗的水平不见得更高，三线布兵，说要“麻”红军，到头来“麻”的却是他自己——实战中，中央红军不但毅然决然地由滇入川，重走“石达开路线”，而且无论金沙江还是大渡河，都是一越而过，刘元璋的布阵法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甚至于起的还是反作用。

从未遇到这样硬手

经大渡河、泸定桥两战，刘文辉的两个主力旅都被红军给打残了，原先每旅有三个团，现在缩成两个团还编不满。若不是红军后来

因缺乏重武器而不再随意攻城，加上薛岳和其他川军在后面紧追，刘文辉几乎要陷入绝境了。

幸好中央红军未再向西康地区深入，他们避实就虚，翻越夹金山，去了川西北。刘文辉闻讯，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颇有一种死里逃生之感。

中央红军前往川西北，为的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制造分裂，中央红军不得不组织“北上先遣支队”单独北上，张国焘则率其余红军再次南下川西。

欲入川西，必经河谷走廊。在红军北上后，蒋军薛岳部一直在后面进行追击，一道追击的还有川军杨森、刘文辉两部。杨、刘两部在河谷走廊上占一边，他们都没想到红军还会再杀回来，因此战备极其松懈，营以上军官甚至昼夜赌博，连起码的警戒和侦察都扔在了一边。

南下红军包括了红四方面军以及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共计八万多人，战斗意志极其旺盛，一场大突袭过后，瞬间就将川军给打得歇了菜。

川军仓皇溃退，这其中以杨森所部为最惨，因为他们溃退时要经过夹金山。夹金山是座雪山，几个月前，中央红军曾翻越夹金山北上，它也是长征中红军所爬的第一座雪山，那时是夏季，加上红军所携带食物还算充裕，所以受的损失还不是太大。几个月后，夹金山一带已是另外一副模样，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甚厚，杨军又没穿棉衣，这个遭罪。特别是到了晚上，由于只能在雪山上集体露营，耳边通宵达旦地听见“妈呀、妈呀”的呻吟声。

杨军在夹金山冻死饿死了许多人，杨森用三天时间才将军队收容完毕，退至后方进行整编。

杨森虽惨，但他早就没了固定防区，反而可以到处流浪。刘文辉不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西康是他发展事业的唯一地盘，守不住的话，就得下课了，为此他将剩余的所有正规部队都收缩到汉源、雅安两城，并亲自坐镇于雅安。

按照原计划，红军并不打算留在西康，所以仅留下少部分兵力包围汉源、雅安，大部队则继续向东席卷，这才使刘文辉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轮到刘湘着急上火了。眼看四川腹地受到严重威胁，他不得不一边亲自赶到成都以西的邛崃县督师，一边急调模范师（郭勋祺师）沿路防堵。

郭勋祺在土城一役中得了便宜，便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得，大言不惭地要与红军在名山县进行正面决战。进入名山之后，郭勋祺见刘文辉的部队仍在争相逃命，拦都拦不住，便下令用机枪向溃兵扫射，还说：“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

等到正式与红军交手，郭勋祺终于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尽管郭师在占据有利地形的情况下，用重机枪、手榴弹和炮弹进行压制，也给红军造成了很大伤亡，但红军毫不动摇，中间只是稍停一下便立即重新组织冲锋，而且阵势一浪高过一浪。

郭勋祺智穷力竭，被迫弃名山而逃。与此同时，供刘湘直接调遣的另两路川军也被红军打得左摇右晃：南面的李家钰丢掉了战略重镇百丈关，北面的“常败将军”邓锡侯干脆都找不着北了。

红军若是再打下去，就将进入丰饶的川西平原了。刘湘为此急得吐血，说："打了二十多年仗，从未遇到这样硬手。"

此时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他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害怕蒋军入川，但处于绝境之中，也只能向蒋介石紧急呼救，请其派兵增援。蒋介石倒是巴不得以增援为借口派兵入川，问题是他此前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已将兵力调往陕西。那时候的部队都靠两条腿行军，蒋军也不例外，并不是打声招呼马上就能赶过来的。

1935年11月17日，红军乘胜攻向郭勋祺所退居的黑竹关。黑竹关距离刘湘所在的邛崃总指挥部已不足六十里，但这里地形险要，并且川军早就修筑好了碉堡群。

新战法的推行，使得刘湘所部初步形成了修筑碉堡的战术意识，这股风气也延伸到了其他川军，早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各路川军便已开始沿江修筑碉堡。不过同是修筑碉堡，还有修筑水平以及布置火力能力的高低差别，张国焘曾与徐向前一起指挥渡江战役，那个时候的川军碉堡，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蒋介石在江西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时，碉堡战术使用十分频繁，经验方面比川军要丰富得多。由贺国光领衔的参谋团入川后，提出口号"勤修碉，广筑堡"，他们把相关经验推广给了以刘湘部为主的川军，同时加以督促。贺国光在发给各路川军的电文中，每电必提碉堡，以至川军私下都称贺国光为"贺碉堡"。

在黑竹关碉堡群的修筑期间，上有参谋团坐飞机进行空中检查，下有军部来人实施就地监督，而且均非常认真，最后逼得郭师的旅长们都不得不亲自去搬木动土。这些碉堡的质量和实战效果也确实令人

刮目相看，黑竹关战斗打响后，张国焘直呼川军碉堡“威力较前大有进步”。

再无可退之地

红四方面军作战以猛和快著称，尽管川军依托黑竹关的碉堡阵地，用重机枪不停地对冲锋的红军进行猛烈射击，但红军依旧前仆后继，一眼看过去，似乎遍地都是红军，且势如潮涌，杀声震天。

郭勋祺忙再组织迫击炮和小炮施射，然而仍无法动摇红军的进攻意志。经过长时间的密集冲锋，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碉堡群，川军官兵无不心惊胆战，大有崩溃之势。

黑竹关背后就是邛崃总指挥部，再无可退之地。情急之下，郭勋祺赶紧派出手枪队增援碉堡群，并把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机枪都集中起来进行射击，这样拼尽全力，才在最后一刻击退红军的冲锋。

红军连续两天猛攻黑竹关都功亏一篑，到第三天，红军指挥部改变战术，用小股部队进行正面攻击，以吸引碉堡火力，大部队则直指川军的衔合部位。

战术很得当，可惜使用过迟，刘湘已经给郭勋祺输送了大量援兵及弹药，使其预备队加厚，红军攻击再次受挫，而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空军又加入了战团。

刘湘虽然早就建立了自己的空军，但水平很低，身为蒋军高级将领的陈诚曾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烂飞机，也叫空

军，连送封信也不敢。”除此之外，川军的陆空协同战术也很差劲，陆空军都不知道如何跟对方作配合，空军不投弹便罢，一投往往就会炸到自己人。

蒋介石的空军比四川空军可强多了，对红军的作战和行动也都造成了一定威胁。红四方面军南下时，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共有三百多名官兵伤亡，其中竟有近三百人是被飞机炸死的！

就在红军攻击受挫，被迫暂时后撤的时候，几架飞机自邛崃方向飞来，并向正在撤退中的红军投弹。红军毫无防备，部队秩序被打乱了，郭勋祺趁机下令预备队追击，从中得了不少便宜。打这以后，蒋军飞机便长时间地往返于百丈关和黑竹关之间，它们一边在空中盘旋侦察，一边作地毯式轰炸，使得红军在白天不仅无法发动密集冲锋，还必须分散隐蔽。

鉴于部队伤亡过大，弹药消耗殆尽，红军指挥部临时变更作战计划，部队撤回了百丈关。川军同样损失惨重，郭师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了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所以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把部队拉往邛崃后方进行休整和补充。

虽然保住了黑竹关，但只要红军仍占据着另一要点百丈关，对刘湘来说仍是心腹之患——百丈关是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有“获百丈者，必得成都”之说。

刘湘决定继续向百丈关发起进攻，他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并将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崃备战。在将后方兵力用尽之后，他甚至已没有一兵一卒可用于守卫成都，只得暂以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随着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扑向百丈关，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序幕。

这一天，是百丈决战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双方都拼尽了全力，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从黎明时分起，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通过稻田，整营整团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但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扫射下，又成批成批地被击毙在水田里。一眼看去，川军的尸体就像是庄稼收割后留在田地里的稻把，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片，但刘湘并没有因为所部伤亡惨重就下令停止冲锋。

刘湘一生中曾屡屡被逼入事业的低谷。他非常清楚，百丈决战成败如何，与他未来的命运直接挂钩，若再输的话，等待着他的将很可能是万劫不复，为此他不惜拉下脸，向邓锡侯、李家钰发出手令，强调此次若作战不利，一律军前正法。

对于嫡系部队，刘湘更是实行层层责任追究，规定如果排长违令，连长可立即枪决排长，以此类推，如果潘文华临阵退缩或谎报军情，他刘湘作为总司令，一样可以摘下潘某的项上人头！

继推广新战法之后，为契合与红军作战的需要，刘湘专门成立了军官教育团，加上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军训团，使得川军军官普遍接受了“急学急用”“吹糠见米”式的技战术课程教育以及精神训练。川军本身在进攻时就跑得很快，军法严令以及反复训练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

的狠劲——在组织冲锋时，军官全都不敢滞后，一般都是旅团长端着机枪督阵，营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

煮酒论英雄

1935年11月22日，经三昼夜厮杀，川军突入百丈关，两军展开激烈巷战。红军战士打得非常英勇，有人甚至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只是事已至此，部队不管付出怎样巨大的牺牲，都已无法挽回其总体上的被动局面。

据初步估算，自黑竹关之战起，红军共打死打伤敌人一万五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也已近万人，更重要的是，已没有多余力量可用，而川军才投入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百丈关，往西康方向转移。半年后，他们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两军随即离开四川，前往陕北。

强敌的离去，并不表明风平浪静，况且刘湘此时的心腹之患，也早就不是红军了。

时间推回到几个月前，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了四川省政府，省府一成立，他马上通电川中各大军头，要求立即交出防区，以“赞助四川统一”，原防区部队的军饷也改由他主要发放，不足之数，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这是借蒋介石的宝剑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军头见敷衍不过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了出来。

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实质性统一四川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步，从此四川不仅告别了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各个诸侯都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年田赋还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给提前预支了，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三十年以后。取消防区制后，刘湘将田赋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清朝，但总算遏制住了田赋的滥征滥收。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也都被刘湘所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原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均由军头们委用。他们任用官员时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这些县长和征收局长也往往不是军头们的家族子弟，就是和他们有着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其保荐的亲信，结果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在收回防区后，刘湘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用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县政务，以此防止官员的贪污和渎职行为。

监督不能治本，刘湘一方面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方式，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从而使公务员逐渐脱离旧的附庸关系，另一方面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内

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有真才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经过审查淘汰，许多新的工作岗位被腾了出来，急需人手接替，以维持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但与此同时，各方所争相举荐的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为此积极筹办县政人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公开招收社会青年进行集中训练，以此广纳人才。

办训练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还从外省引进优秀人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刘湘曾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至此，刘湘在四川的声誉达到了顶点。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邓汉祥摆起龙门阵，聊起了三国。两人聊的是极为经典的“煮酒论英雄”，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私下里早就以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现在是心情特别愉悦，才会对着真人吐真言。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看法是：“刘（刘文辉字自乾）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决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可能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生出了

类似于当年在重庆崛起时的那种气势和希望，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外来者

因为宣布门户开放，刘湘曾遭受到来自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不过这种担心起初却被证明是多余的。

参谋团来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虽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四川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对南京政府已明显表现出了欢迎态度。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南京政府的扶持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门户开放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在必须合作的军事领域，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蒋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然而蒋介石与刘湘毕竟不同，他的人生规划其实是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就是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于是好景不长，他在重庆的公开讲话就不再客客气气了，而是开始以川军为目标，经常夹枪带棒，批评这个，数落那个。

首先成为枪靶子的是川军将领的排场。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肯定都得有排场，常见的现象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个带枪的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还系一条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朝？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虽然说的只是一般川将，但作为川军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数落卫队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对于这些问题，四川的普通民众平时也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因此每每当蒋介石在台上讲到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时候，台下总是掌声雷动，一片叫好之声，只有刘湘一个人灰着脸坐在台上一动不动。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进入西康，蒋介石移驾成都，成都也由他所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的规模更是一次比一次大。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其实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暴一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将，这就使得集会时人数一般都不会太多。可是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参加集会人员均为成都各界代表，这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对于蒋介石而言，批评川军只是一个引子或者说是由头，他的真正目的和用意远不止于此。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万余人。这是自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边缘化。

在自认为取得舆论优势后，蒋介石就越发不把刘湘当一回事了，理由很简单，既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

神经讲话

蒋介石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其手下人。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两人冲突还较少，但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康泽就不一样了。

若仅仅从参谋团这条线论，贺国光是康泽的上司，康泽应服从他，然而实际情形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

其过问。这是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神秘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京城能够“上达天听”的人物并不多，据说当时能够不经过委员长侍从室登记而直接谒见蒋介石的人，一共就两个，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采纳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开始派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上对中央苏区进行瓦解。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移用了过来。

康泽一到四川，便动用别动队，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还经常干预地方事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县长和督察专员不堪其扰，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几乎就是来自京城的“锦衣卫”，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刘湘能做的，只能是很无奈地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忍。可是名利场不是光忍就行的，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各种麻烦事还会继续蜂拥而至。

蒋介石举办峨眉军训团，对川军将领进行训练。接到受训通知，川军将领们人人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训练期间，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经常抽空来作所谓“精神讲话”。有一次他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眉，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峨眉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学员们坐立不安，私下便把这种讲话称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瞪目。某次他甚至脱口而出，说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虽是军训团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陪着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郁，闷闷不乐。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让他讲特种战术。他故意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战和碉堡战术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其实明眼人都能听出，他所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神情，陈诚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可怕的是还被挖墙脚。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的军官都要到峨眉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只要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出面帮忙，就可以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少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默化中，便有了向南京政府靠拢的想法。

邓锡侯、刘文辉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尚有自立意识，孙震、杨森则都相继倒向了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对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很是佩服。杨森喜欢养狗，就学着洋人的习惯，把自己养的一只爱犬取名为“介石”，在这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儿就到哪儿，刘湘完全使唤不动。

由于刘湘在川军中提倡新战法，郭勋祺、刘兆藜等少壮派便得到了重用，相比之下，比较老派的范绍增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他还被刘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很多钱收买他，他也没背叛刘湘，其间多少次出生入死，数数身上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处。如今为了搞什么新战法，就突然翻脸无情，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可是再不服也没用，因为刘湘早已不是那个光凭义气混饭吃的江湖大哥了，他是对下属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四川王。范绍增正准备自认晦气，意外出现了——蒋介石不同意对范的处理！

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出来

刘湘的所有奖惩令都必须报经蒋介石批复。最初不过是形式主义，履行一下程序而已，但老蒋越来越不满足于形式，接到刘湘关于对范绍增的报告，他随手就批复道：“撤职留任。”

撤职留任其实就是还给留着饭碗，劫后余生的范绍增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反过来，对刘湘自然就横生怨怼。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即便刘湘身边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出现了离心迹象。以与刘湘关系最为密切的“关张赵”为例，唐式遵和王缵绪都变得有些动摇不定，只有潘文华一人还有个关云长的样子，对刘湘依旧很忠心。

自蒋介石开始贴身紧逼，刘湘可谓事事不顺，就连新政的推行也困难重重。他颁布命令，要在成都征收房捐，命令一出台，便遭到了成都居民的激烈反对。

一般老百姓比较好应付，让刘湘倍感头疼的是还有一些特殊人物，比如被称为“武备三老”的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

川军各派系中，数武备系资格最老，但混得最惨，远远落后于速成系和保定系，心理上本来就极不平衡。见民众对房捐不满，武备系便借机闹事，由“武备三老”率领部分武备生，牵头进行联合抵制，并以游行罢市相要挟。

眼看新政即将夭折，刘湘本人和四川省政府的威信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情急之下，刘湘使出狠招，他双管齐下，一面逮捕了几个带头闹事的武备生，一面派兵把尹、胡、刘的住宅包围起来，理由是外界谣言太多，会发生危险，实际上是软禁了三老。

就在事态即将得到控制的节骨眼上，蒋介石却突然横插一杠子，给刘湘下达命令，要求立刻撤去包围三老住宅的军队，同时释放被扣押的武备生。

在刘湘看来，蒋介石横加干涉的用意无非还是要借机收揽人心，就像对待范绍增一样，这一点，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出来，但为了新政能够继续得到推行，也为了维护他刘湘的权威，他决不能再予以让步了。

见刘湘拒不从命，让自己丢了面子，蒋介石也十分不满。原先两人的矛盾都还藏在彼此内心里，这时候就都从肚皮里爬出来，露到了脸上。

自蒋介石入川以来，仅仅半年不到，蒋刘已形同陌路，彼此看到对方，都是明明在眼前，却仿佛在天边。刘湘自认是弱势的一方，他其实并不想跟强势的蒋介石一直这么僵持下去，所以一直在思考着弥合双方裂痕的方法和途径。

1935年夏天，刘湘在重庆宴请蒋介石。对于此次“温情外交”，刘湘可算是用尽心机，不仅设宴于家，还提出要借用蒋介石的“御厨”，以便做出的菜肴能符合老蒋胃口。

邓汉祥奉命将借用“御厨”一事传话给杨永泰，杨永泰经请示蒋介石后答复说：“就用刘甫澄（刘湘）自己的厨子好了，不必在馆子里叫菜，也不要另约外客，只是参与机要的几个人作陪就行。”

双方经过商讨，决定以邓汉祥、杨永泰等少数几个人在席间作陪。蒋介石到刘宅后，先跟邓汉祥聊了一会儿，当蒋介石问起，邓汉祥身为外省人，如何会来四川做事时，邓汉祥便把昔年随陈宧入川的经历讲了一遍。邓汉祥注意到，在他讲到与冯玉祥的过往时，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历史恩怨也十分复杂，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会感兴趣，然而邓汉祥很快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正式入席后，蒋介石举止矜持，每上一菜，一定要等别人先吃，然后才动筷子。轮到喝酒时，也是举而不饮，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蒋介石拧巴，弄得大家都拧巴，这顿饭吃得很是费劲。

你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展示他的修养，但在这个敏感时刻，特别是联想到吃饭前的谈话，刘湘君臣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一致：老蒋不是嫌菜不好吃，是怕酒菜里有毒！

当年，邓汉祥曾向陈宧献计，让他给冯玉祥摆一桌鸿门宴，蒋介石很可能把这场家宴也视为了同一范畴。

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看来光靠吃饭还是难以打开僵局，刘湘只得再做一次尝试。他主动登门求见蒋介石，尽量用诚恳的语气对蒋介石说：“我患上了胃溃疡，现在病势沉重，自知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之所以还在勉强主持四川军政，一是要报委员长（蒋介石）知遇之恩，二是想以善政来回报地方父老多年的栽培。”

一个重症病人关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述，无异于一颗重磅催泪弹，换别人，恐怕早就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可是蒋介石似乎完全不为所动，他一脸淡然，看不出表情有任何明显变化。

刘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要加强国防，尽可放手为之。至于四川军政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我唯命是从，但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以收指臂之效。"言下之意，他不仅不敢和不会跟蒋争夺天下，还愿意对其俯首帖耳，条件不过是容他在四川当个诸侯王。

从"问鼎中原"，再到"三分天下"，直至甘为蒋介石治下诸侯，对刘湘而言，真是已经退让到了极至。他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和事业，是怎样从一轮光彩照人的明月，蜕变成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萤火虫。

刘湘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是真情流露，并非刻意做作。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

寥寥数语，听在刘湘耳朵里，不过是端茶送客的意思，他的"披肝沥胆"和"垂涕而道"并无任何实际功效，对方回赠的仍然只是敷衍和敌意。

在回公馆的路上，刘湘心凉如冰，他终于明白了，其实老蒋根本不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如今的刘湘，就相当于四川内战时期的诸侯，邓锡侯、田颂尧一类，蒋介石则俨然是当年志在统一全川的刘湘或刘文辉的翻版。让刘湘特别难以接受的是，即便他委曲求全，像邓锡侯、田颂尧一样，只图做个地方诸侯，蒋介石也不答应，这还让人活吗?

仿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故事，南唐后主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又是赔礼又是致歉，啰里啰唆，眼泪鼻涕一大堆。赵匡胤用一句话便把他

给踹到了九霄云外：“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李后主流了眼泪，刘湘也流了眼泪，都是在看似无法战胜的超级大鳄面前，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的本质不同也就显现出来：后主只会继续哭着写词，感叹“小楼昨夜又东风”，刘湘未等眼泪干透，就会发起犀利反击，而且不死不休。

眼泪不过是武器之一种，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软弱和投降，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

与蒋介石类似，刘湘同样有着一颗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心脏。回府之后，他立刻召来邓汉祥，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一遍，完了做出结论：“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刘湘过去被段祺瑞评为“能容不能断”，这也确实曾是他的致命弱点和软肋，在与熊克武、杨森等人周旋的过程中，他多次受累折戟于此，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在成熟期的刘湘身上已看不到这一明显缺陷了。

如同“煮酒论英雄”谈话中所分析的那样，二刘都是川中英雄，而他刘湘之所以最后能超越刘文辉，后来者居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刘文辉更能“断”！

事实上，在与蒋介石摊牌之前，刘湘早已左右盘算，把所有成败利钝都想清楚想透彻了，一旦决定要跟蒋介石相持下去，他便不会再有任何犹豫动摇。

无声的战争

1935年8月，四川各界在成都举行大会，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蒋介石未参加，由顾祝同代为主持，顾祝同发言后，便按例请刘湘讲话。

都以为这只是个形式和礼仪，追悼会很快就要结束了。不料刘湘一开口，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他大讲特讲建设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空军的重视，言辞之间毫不谦逊，让人感觉，仿佛蒋介石的空军都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会场上庄严肃穆的气氛没有了，就看到刘湘在主席台上雄论滔滔，连下面的普通听众都听出来，这是某个人在向社会和公众显示他作为四川首脑的地位及身份。

此后，刘湘一发不可收，凡是重大集会场合，只要有机会出声，他就绝不放过，必要发表一番宏论才肯罢休。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会议组织者事先做了安排，限定由蒋介石一人讲话。

蒋介石对此当然也有所觉察。不久之后，重庆、成都同时流出传言，称蒋介石要把刘湘与河南省主席刘峙进行对调。

刘湘闻言大为紧张，因为政治流言往往都不是凭空而来，很多时候，它其实都是有人为了试探特意放出的风声。

自入川以来，蒋介石虽无陈诚之刻薄，却也差不多把刘湘看成了民国版的刘璋，恨不得一夜之间取而代之，只是刘湘毕竟已在四川经营二十余年，关系盘根错节，就像老树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拔掉的。再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

特征。四川情况向来复杂，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影响全国局势，以蒋氏之老到，必然要反复权衡。

显然，流言所要试探的，是刘湘的虚实和四川民意。如果施放者认为得到的反映尚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再是流言，而成为事实。刘湘紧张，就紧张在这个地方。

尽管出了身冷汗，但刘湘的阵脚并不慌乱。你会传流言，我也能造舆论，刘湘及其班子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川人治川”：四川应该由四川人来治理，刘峙虽然也姓刘，可他不是四川人！

“川人治川”一面世，就遭到了一些社会名流的质疑，刘湘随即聘请张澜为最高决策顾问，用笔杆子进行还击。张澜不负所托，不仅著文对质疑者进行反驳，还干脆把“二刘对调”的流言摊到了明面上，通过旁征博引，论述撤换刘湘的不当，同时从旁观者的角度，呼吁蒋介石信任刘湘，以安川局。

被张澜这么一嚷嚷，蒋刘矛盾便被完全公开化了，蒋介石只好赶紧站出来，宣布“二刘对调”纯属谣言。

在闪身躲过对手的重拳后，刘湘对己方阵营做了进一步调整。

刘湘有一套自己的情报网络，王缵绪的心猿意马，范绍增的暗生敌意，都没有能够能逃得过他的耳目，他对此甚为失望。刘从云在的时候，刘湘一直怀疑王陵基是脑后生着反骨的魏延，但事实并非如此，王陵基离开四川前辞“黄袍”而不受的表现，让刘湘感动不已。

王陵基不是魏延，他应该是黄忠才对！时隔多年，刘湘又重新召回王陵基，并任命他为保安处处长。

川军原有五十万人马，蒋介石和刘湘初次会晤时，便建议他进行裁撤。刘湘也知道四川经济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规模过于庞大，因此同意将军队进行缩编。

要缩的话，大家都得缩。在各路诸侯军队进行整编的同时，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也被缩编了二十几个团，不过刘湘留了心眼，他在各专区设立保安团，各县设保安队，这二十几个团就被隐藏在保安团和保安队中，相当于刘湘秘不示人的预备部队。让王陵基做保安处处长，实际就是为自己主管预备部队，由此足见王陵基在刘湘心中占据的位置。

王陵基可备不时之需，潘文华能用以压阵，唐式遵尽管不太让人放心，但此君胆子不大，给几句狠话便会服软，这使刘湘对自己的军队又有了底，他把注意力重新移向政治权斗。

刘湘与蒋介石的权争，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两人既在拼毅力，也在拼体力。在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中，刘湘关于自己病情的描述并非完全夸大其词，他的胃溃疡确实已很严重，为此不得不到大邑老家静养，办公时间也因此被迫减少，连省务会议都无法经常出席。

刘湘急需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搭档和助手，但他的身边虽然谋士如云，能胜任这一角色的非常之少。不是谋士们不行，是他开出的条件实在太高了：这个人必须聪明睿智，既娴熟于内政，又擅长于外交，而且必须绝对忠诚可靠。

德一定得排在才前面

“神仙军师”刘从云早已名誉扫地，且不去说他。钟体乾、张斯可等人都是内政强于外交，难以独当一面。有一段时间，刘湘曾看好“财神爷”刘航琛。刘航琛的理财能力没得说，人聪明，年纪又轻，做官做久了，内政方面不过是一通百通，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去京沪两地出差，见过大世面，交际对他而言并非难事。

可也许正因为做官的时间太长，在刘湘眼中，刘航琛的个人形象开始变味。刘湘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里提了六十万现金，私底下拿出来送给他。

刘湘自奉俭约，也很注重部下的个人操守。刘航琛刚出道时公私分明，所有采购中得到的佣金都如数交账，曾因此获得过刘湘的赞许和欣赏，他想不到刘航琛会私下送钱给他，甚觉意外，当即严词拒绝。

刘航琛马屁拍到马蹄子上，急忙改口说：“这笔钱不是送军长个人的，而是拿来做团体基金。”既然如此，刘湘就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所有钱款都交由刘航琛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调查到，六十万现金其实跟团体基金并无关系，它先是被刘航琛拿去开办银行，之后就干脆进了刘航琛的个人腰包。刘湘对此愤恨不已，他给刘航琛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心术不正”。在组织省府班子时，他最初都不愿意让刘航琛出任财政厅长，只是南京方面知道刘航琛是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一再坚持，加上又无其他合适的人选可以替代，才勉强松了口。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那就是非常重德。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

不能得兼，那么德一定得排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刘湘不是在简单地模仿历史人物，事实上，这是他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概率也相应非常之大，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对己方阵营所造成的潜在危险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对他个人的忠诚程度。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职业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特别多，但从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曾派其驻沪代表吴晋航私下赠送邓汉祥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吴晋航所创办的和成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刘湘，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对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有些追随刘湘多年的部下僚属不服气，认为邓汉祥入幕时间不长，又整天在外面与蒋介石的人交结，谁能保证他会一直忠心耿耿呢？还有人说邓汉祥与刘文辉经常互通信息，怀疑邓汉祥暗中早就与刘文辉有了一腿。

刘湘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某次，他的侦察电台截获一封密电，是刘文辉的驻外代表发给刘文辉的，上面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效命，对其他人包括刘文辉在内都是意存敷衍，因此千万不可过分信任。刘湘将这封电报遍示左右，众人才不好说什么了。

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刘湘就任命邓汉祥为秘书长，替他筹划内外事务。邓汉祥也应命站到台前，与蒋系人马展开了明争暗斗。

化骨绵掌

蒋介石不断接到关于刘湘“桀骜不驯”的报告，他势必也要进行内部调整，以便加大对刘湘的压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两个月后，参谋团奉令撤销，人员被并入行营，贺国光改任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从表面上看，重庆行营主管川滇黔三省军政，但实际重点都在四川。行营的三个首要人物，顾祝同只是挂个头衔，并不具体理事，贺国光属于场面上的好好先生。唯有杨永泰锋芒毕露，是个寸步不肯相让的厉害角色，甫一到任，他就安插亲信担任督察专员，并以合办的名义，派专人对县政人员训练班进行控制。

康泽在行营内并无席位，但他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和调遣，与杨永泰一上一下，一唱一和，等于一个是师爷，一个是打手。以复兴社为骨干，康泽重点推行他的“政训战略”，即在各专区设立政训室，各县

设置政训员，同时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对各县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进行调训。

杨永泰和康泽展示给刘湘看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几个督察专员的职位倒还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一世的专员，到了一定时候就可以撤换或调任，但你想想，如果未来的县长、区长，一直到现在的保长、甲长，全都是蒋方训练出来的，那就撤无可撤、换无可换了，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今后四川地方究竟听谁的。

邓汉祥奉命拍马上前。谋士对阵，与武将不同，表面上闻不到一丝一毫的硝烟味道，甚至于邓杨之间还会惺惺相惜，互致殷勤。

邓汉祥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而且对美食很在行，便在四川有名的酒家定制粤菜，派人按日送到杨永泰公馆，极尽周到之能事。杨永泰也向邓汉祥频抛绣球。此前张群在接任湖北省主席时，曾有意邀请邓汉祥去做行政督察专员，被邓汉祥一口婉拒，但杨永泰不死心，仍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邓汉祥进行劝诱。他经常说的是："我看准了，你那个伙计（指刘湘）就是刘璋，与之共事，能有啥前途！你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后当上部长。"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叫作攻心战，尽管大家都知根知底，出手之前就预料到要打动对方难如登天，但该出的招还是得出。

化骨绵掌之后，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动作。杨永泰派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邓汉祥就亲自主抓县政训练。县训期间，他每天过问训练班的授课和办学情况，每周一定要给学员做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针对学员全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一特点，他在讲话时极力灌输

“川人治川”的理念，告诉学员绝对不要走南京政府的路子，否则四川就难以搞好云云。

学员中或许不乏慷慨请命、指点江山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还是希望能借此谋个好的饭碗。邓汉祥明白地告诉众人：“县长、区长都是由省府委派的，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任县长、区长！”

刘湘不是一个紧握所有权柄、死也不肯放手的人，早在重庆崛起时代，他就曾把财权交给刘航琛，让对方便宜行事。自从判定刘航琛“心术不正”后，这部分权力包括大部分用人权，又移交给了邓汉祥：除省政府的厅处长以及专员，须刘湘本人亲自裁决外，其他诸如县长、区长，皆由邓汉祥一人定夺，甚至于刘湘下手令委任的县长，如果邓汉祥以为不妥，刘湘亦会马上收回成命。

县训班一结束，邓汉祥便运用手中权力，对毕业学员予以重用。当然这是有附加条件的，就是要对刘湘忠贞不贰。

在邓汉祥的大力拔擢下，全川一百多个县，过半的县长为县训学员，五百多个区的区长，全部由县训学员充任，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也几为县训学员所包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重用，比空口许诺“你们就是明天的希望之星”之类要实际得多，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指责，认为学员毕竟都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怎么能一下子提拔到如此高位？邓汉祥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四川人，又属考试录取，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为什么不可以量才使用呢？”

以毒攻毒

见邓汉祥冲到了第一线，杨永泰又岂是省油的灯。正当两人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忽传命令，调杨永泰前去湖北。

湖北原由张群主政，但这时中日两国频频发生摩擦，张群在对日外交方面较为熟悉，蒋介石便决定让他回京主持外交部，所留下的职务由杨永泰接替。1935年12月，杨永泰离开四川，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乘势而进，完全占领了县训这块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阵地。

刘湘主政期间，邓汉祥共主持三期县训，培训学员一千多人，这些学员皆称邓汉祥为师，一时间，邓汉祥的门生布满全川。为了继续团结和约束这些门生故吏，邓汉祥组织了县训同学会，专门用以考察毕业学员的思想言行，一旦发现有投向南京政府或偏于其他派系的言行，立刻予以罢免或踢出局外。

随着杨永泰的暂时离川，邓汉祥原先所面对的两个强硬对手变成了一个，只需向康泽一人开战了。他以县训学员为骨干，在各县设立保甲人员指导室，以县长、区长来对甲长、保长实施“消毒训练”，同时实行省政统一，使专、县、区都被掌握在省府之下，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复兴社的政训活动。

要论政治才能和谋略，康泽还远不如杨永泰，邓汉祥这一着棋走下去，差一点把他给将死，以至于手忙脚乱，全无应对之策。

刘湘君臣初战告捷，但并没有因此高枕无忧。自从发生“二刘对调”流言事件后，刘湘就唯恐漏掉关于蒋介石对他伺机下手的任何一点

动静，他在省府建立了情报机构，大量收集关于蒋介石的情报，除此之外，还从侦察电台抽调了两名破译密电的高手，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重庆行营、康泽同蒋介石来往的密电。

每天晚上，刘湘都会认真研究这些情报、密电。仔细看过去，发现里面几乎全是针对他的攻略，内容从挖墙脚到政治战，无所不有。最让刘湘感到寒心和后怕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四川有一个“五运”计划，即用“军运、匪运、团运、学运、民运”，来对其阵营进行全面瓦解。

显然，如果不彻底整倒刘湘，老蒋决不会善罢甘休。在刘湘过往的军政生涯中，强敌众多，但就分量而言，谁都比不了蒋介石。蒋介石在他面前就是一个超级大鳄，只要他下了狠心，什么“川人治川”、县训同学会，不过是浮云，人家立马可以将其全部摧毁。

一想到前期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春梦，刘湘便感到不寒而栗，他必须寻找到新的对策。

这一次，他把蒋介石当成了师傅。蒋介石曾告诉他，与红军作战，最好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对军事，而是要“三分政治，七分军事”。刘湘来了个以毒攻毒，把这套方略套用到了蒋介石自己身上，名称也变了，叫作“表面敷衍，暗中防范”。

“表面敷衍”暗合“三分政治”，就是给蒋介石打马虎眼，用笑脸将他哄住。“暗中防范”与“七分军事”接近，是要联络全国各地的反蒋派别，像春秋战国时一样，以“天下之士合纵而攻秦”。

一人饰不了两角，刘湘把扮笑脸的活交给邓汉祥，指示今后与蒋介石的所有接洽和函电，也全部由邓汉祥负责办理。考虑到“暗中防

范”的风声传出后，可能会影响邓汉祥取信于南京政府，在公开场合，刘湘都有意让邓汉祥采取回避态度，只由钟体乾、张斯可等其他谋士参与其中。

恶人甚至是敌人的角色，只能由刘湘亲自扮演和统筹。他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南方诸侯对抗蒋介石，所谓南方诸侯，主要指的是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云南的龙云。原先出于统一四川和抵抗红军的需要，刘湘曾将派往南方各省接洽的代表一律撤回，以示向蒋介石一边倒，这时他又派张斯可等人作为代表，偷偷地前往两广和云南进行联络。

滇黔桂方面所面临的威胁，其实和刘湘没有什么两样，大家很快就情投意合，走到了一起。

风云突变

有这么多反蒋力量给自己撑腰，刘湘一下子气壮起来。

1936年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通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也摩拳擦掌，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蒋介石给四川省府发来电报，要刘湘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统一”。

邓汉祥接到电文，深感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赶去大邑，面见正在养病的刘湘，与之会商办法。刘湘的两只眼睛光芒四射，对邓汉祥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老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无论谁打胜，都非拉拢四川不可。”

话虽是这么说，可刘湘毕竟不同于水晶猴，他内心是有情感倾向的。当邓汉祥主张响应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发一个通电，以坐观成败时，刘湘极不赞同地表示：“我们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老蒋了。”

依照刘湘的吩咐，邓汉祥回成都后便以一百字为限，复电陈、李、白，同时将原文通电全国。这份电文明显是帮着两广说话的，其中没有提到一句“据地称兵，破坏统一”，但在起草电文时，邓汉祥考虑不能完全得罪蒋介石，所以也加进了一些敷衍之辞，比如劝两广应服从南京政府之大计，切勿操之过急，等等。

通电发出后，刘湘紧跟着也来到成都，并秘密召集高层幕僚及部将商讨此事。在邓汉祥加入刘湘幕府前，刘湘的幕僚主要以张斯可、傅常、乔毅夫、钟体乾为核心，参谋长傅常是同盟会员出身，还曾追随过熊克武，他的很多观点都相对较为激进，是一个有着武将气质的谋臣。会上，傅常主张，不仅在电文上响应两广，行动上也要发动起来。

当时成都设立了中央军分校（即黄埔军校），它和重庆行营一起构成了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某种象征。傅常提议，应首先对成都分校及行营予以包围乃至占领和接收。

傅常话音刚落，潘文华等大多数人便都表示赞同。会议本来已初步达成一致，但刘湘发现邓汉祥从头至尾都保持沉默，便问他意下如何。邓汉祥说：“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但采取的具体步骤应该慎重。”

邓汉祥那段时间虽未像张斯可等人一样出使外省，但他对外界形势始终能做到洞若观火。在他看来，两广一致反蒋，并不表明其内部已铁板一块，事实上广东和广西在很多方面尚有分歧，这就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的可能。

蒋介石就像当年的刘文辉，最擅长用挖墙脚的办法来对付各省诸侯，邓汉祥怀疑，陈济棠的手下是否已有人被挖了墙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极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先是广东阵营大乱，然后广西望而生畏，最后树倒猢狲散。

邓汉祥据此认为，四川方面发一个倾向两广的通电，可能已惹得蒋介石不高兴了，不过这毕竟还不会带来危险，但要是马上出兵，万一两广支持不住，蒋介石的矛头必然会转向四川，由此将给四川带来严重后果。

邓汉祥主张，不如先暗中进行准备，等两广战事到达重要关头，四川这边再采取行动不迟。刘湘听完他的分析后，觉得这样做确实比较稳妥，当即表示同意。

散会之后，刘湘想来想去，到底还是不甘心。蒋刘如今的关系，若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一想到蒋介石、陈诚挖苦他的那些言语，一看到蒋介石暗中捣鬼的情报和密电，刘湘都会忍不住生出一种把蒋介石揪出来一把掐死的冲动。

这是与蒋介石的共同斗争，也是往老蒋的光脑袋上扣屎盆子的绝佳机会，倘若其间因为缺了川军，结果导致功亏一篑，岂不是会留下终生之憾?

在傅常、潘文华等人的撺掇下，刘湘瞒着邓汉祥，密令所部乘夜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刘湘调兵遣将，静候两广传来佳音，他完全没想到会风云突变。1936年7月14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空军也跟着哗变，蒋介石一枪未放便将陈济棠放倒在地。

邓汉祥的顾虑转眼成为事实。正要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刘湘，一不小心就扭到了腰，他赶紧偃旗息鼓，悄悄收兵，但仍不免紧张万分：这么长时间过去，会不走漏一点风声吗？如果蒋介石知晓内情，会不会马上引兵西向？

所有这些都不是嘻嘻哈哈几句话就能糊弄过去的，刘湘急到几乎一夜白头，他亲自赶到邓汉祥家，要邓汉祥代表他到江西庐山去谒见蒋介石，以便“摸底”。

邓汉祥已经知道了他偷偷调兵的事，不由得顿足长叹：“我早就说过，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再去，还有什么用呢？”

刘湘一听脸都白了，双手拉住邓汉祥不放：“现在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是非去不可。我们必须弄清楚，蒋介石究竟是否知道动兵这件事，知道了又是什么态度，这样才好定下应付之方。”

明知棘手，可眼看着刘湘已经山穷水尽，邓汉祥也只能硬着头皮起程出发。

揣着明白装糊涂

直接找蒋介石，多半要吃闭门羹，邓汉祥决定先飞汉口拜访杨永泰。

一见面，邓汉祥还未开口，杨永泰就说："你这位大军师，认为陈济棠造反，就是倒蒋的机会到了，怂恿刘甫澄（刘湘）连夜调动军队，准备围攻重庆行营及成都军校，以为我们都不知道？"邓汉祥听后心里咯噔一下，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到底还是露馅了。

施过下马威之后，杨永泰又道："我过去听信你的话，拼命帮助刘甫澄，康泽因此造了我不少谣言，甚至说我受过刘甫澄六十万元的贿赂。蒋先生（蒋介石）固然不会相信这些谣言，但他为何不把我调回身边，而要我远离他，在湖北任主席？不能不说，都是受了这些攻击的影响。"

杨永泰确实在蒋介石面前替刘湘说过好话，并且不止一次，当然其出发点绝不是如他所言，是听信了邓汉祥的一面之辞，而是出于策略需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罢了。

康泽造杨永泰的谣也是真的。杨永泰、张群等人被外界称为新政学系，长袖善舞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康泽的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包括康泽本人在内，擅长的都是打打杀杀或谍战暗杀，他们对政客伎俩完全是雾里看花。既然弄不懂杨永泰为何要替刘湘说话，复兴社便自然而然地编出另一种解释，比如"杨永泰受贿"，然后康泽再以"嫡亲儿子"的身份，三天两头地在蒋介石面前打杨永泰的小报告。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是不是受了康泽的"陷害"，邓汉祥并不完全清楚其中内幕，他只是从这番含着骨头还露着肉的说辞中，听出杨永泰是在以攻为守。

杨永泰上下嘴皮合不住，邓汉祥来了之后，就听见他一个人在说，接下来也该邓汉祥来两句了。

邓汉祥认为杨永泰说的不错：“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及复兴社的一些人，天天挑拨离间，就唯恐四川不乱，而且在收回防区之后，原有防区内的各军头对刘甫澄也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乃是意料中事。”

说到此处，他突然话锋一转：“你接受贿赂是谣言，其实川军调动也是谣言，刘甫澄何曾有过调兵遣将的事呢？”

事到如今，大家都得把脸皮撕下来放到裤兜里，不能认的打死也不能认。可杨永泰是何等精明角色，对于邓汉祥的话，他完全不信，认为这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如果连杨永泰这道门都迈不进去，谒见蒋介石岂不是成了镜花水月？邓汉祥又气又急，他很愤慨地对杨永泰说：“如果连你都相信刘甫澄会调兵，那还说什么呢？我明天就飞回成都，听候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了。”

说是要走，邓汉祥却根本就没挪步。这是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招，为的就是用激将法打开对方的心理防线，邓汉祥相信，杨永泰一定还有余地和底牌，他必须逼杨永泰把它们全都亮出来。

杨永泰听后果然神色缓和下来：“据我所知，刘甫澄调动军队确有其事，或者他瞒着，没有让你知道，所以你还蒙在鼓里。刘甫澄既然已派你到庐山，如果中途折回，岂不又加上了一层裂痕？”

杨永泰不会让邓汉祥回去，因为他的底牌是不主张对四川用兵，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不主张现阶段对四川用兵。

此前杨永泰曾力主以两广事变为由，彻底解决广西的新桂系，但恰在此时，传来了伪蒙军要进攻绥远的情报，这意味着绥远战役即将打响，加上张学良、杨虎城在陕北久而无功（实际已与红军秘密结盟），南京政府不能不将用力重点移往北方。

在邓汉祥还没来武汉的时候，杨永泰就已经意识到，让南方诸侯逐个缴械的时机尚未成熟，“剿”只能让位于“抚”。只不过一方面他需要通过敲打，来试探四川方面所拥有的底线，另一方面，因为复兴社屡进“谗言”，他也不便再出面为刘湘向蒋介石进言。

尽管利益和目的完全不同，邓汉祥、杨永泰却都已坐进了同一节车厢，他们探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如何劝住蒋介石。

杨永泰没法陪邓汉祥同去庐山，但他预计邓汉祥要是一个人直挺挺地去谒见的话，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肯定会碰大钉子，因为蒋介石对刘湘调兵的事非常生气。

怎么办呢？杨永泰沉吟片刻，想到了一个人：“你可以找熊式辉，他就在庐山。”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杨永泰、张群、熊式辉，向来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三个人在政见上比较接近，关系也很融洽。杨永泰对邓汉祥说：“我可以给熊

式辉发电报，要他帮助你。你如果有不便直接跟蒋先生说的话，可以托熊式辉转达。”

于是邓汉祥前往庐山，并首先造访熊式辉。在熊式辉面前，他把文章主要做到了复兴社头上：“他们无中生有地诬蔑刘甫澄，说他勾结陈济棠造反，弄得刘甫澄很无安全感。”

熊式辉早已接到杨永泰的电报，他笑了笑：“以我同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他们尚且挑拨离间，何况刘甫澄。不要紧，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委员长，委员长有什么回话，我再拿来告诉你。”

有熊式辉缓冲，邓汉祥感觉踏实多了，但他不知道蒋介石能否相信自己的话，所以心里依旧非常忐忑。

等到熊式辉回来时，仅带回老蒋的一句话：“四川的事不简单，告知邓汉祥马上会见我。”邓汉祥喜忧参半，喜的是下半句，蒋介石既已同意接见，说明事情有了初步转机，忧的是上半句，“不简单”便是复杂，看来蒋介石对他的话仍存有怀疑。

果然，当邓汉祥见到蒋介石时，蒋介石满面怒容，连必要的寒暄都没有，就狠狠地掷出一句：“刘甫澄要造反！”

邓汉祥连忙申辩，力言绝无此事，是“复兴社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二话不说，喊副官拿来地图，把川军的调动情况指点得清清楚楚，比如这里调集了多少部队，那里又调集了多少部队。他一边指给邓汉祥看，一边嘴里恨恨连声：“刘甫澄不仅出动了军队，还是深夜行动，这些都瞒不了我，我已经很清楚。请问，你们这不是在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又是在干什么？”

邓汉祥猛然发现，蒋介石所收集情报之周详，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计。室内的气氛一时紧张到了骇人，邓汉祥急中生智，忙说：“委员长一定弄错了，不可能有调兵的事，即便有部队移动，也不是为了附和陈济棠，而是为了‘剿匪’！”

蒋介石瞪大眼睛看着邓汉祥。邓汉祥解释说，四川的土匪跟别处不同，他们同社会上的袍哥向来互通声气，剿匪部队倘若白天行动的活，很可能泄密，因此一定要在夜晚出没，才能打土匪一个冷不防。

“这是在绥靖地方，委员长千万不可听信谣言啊！”邓汉祥七拐八拐，又回到了“谣言”这个起点。

蒋介石见邓汉祥说得有鼻子有眼，倒也有些信了。邓汉祥趁热打铁，当着蒋介石的面论证起刘湘为什么不可能造他的反：“刘主席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负难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已定，谁都能看清楚局势，刘主席再无知识，又何至于此！”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邓汉祥洋洋洒洒一通发挥，把蒋介石讲到无话可驳。联想到刘湘过去维护自己的一些往事，他火气顿消：“是啊，所以我还是相信甫澄的，四川的事，仍望他多负责任。”

在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后，邓汉祥又在会谈结束前，请蒋介石写封回信，以便复命。蒋介石慨然应允，第二天请邓汉祥吃饭时，便将亲笔信交给了他。邓汉祥展开一看，满纸都是如何信赖和倚重刘湘，甭管他说得有多么言不由衷吧，至少表明短期内不会与刘湘摊牌了。

当夜回到旅室，邓汉祥立即将蒋介石的信件用密电方式告知刘湘。刘湘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邓汉祥要是再不来信息，

他差不多就要抹脖子上吊了，接到电文，这才稍稍心安。

邓汉祥乘机返回成都，刘湘派员从机场将其接来，详详细细地询问了一遍经过，确认无误后才送他回府。从此以后，刘湘不仅对邓汉祥言听计从，而且幕前幕后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由他全权处理和运作，邓汉祥俨然已是事实上的“川中宰相”。

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邓汉祥地位跃升如此之快，引起了一些武将的嫉妒，他们在背后嘀嘀咕咕，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

流言传到邓汉祥耳朵里，让他深感痛心，说：“他们会打，当蒋介石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叫我一个人出面去抵挡吗？他们怎么又不敢去打呢？”

好在刘湘非常清楚邓汉祥的价值，不管周围的人如何叽叽喳喳，都不为所动。他也确实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处于云谲波诡的多事之秋，川幕中真正能胜任折冲重任者，唯邓汉祥一人，你不用他，还能用谁？

成都事件

因为邓汉祥的巧妙运作和周旋，刘湘才侥幸未被多变的政局所吞噬，但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琢磨和思考，如何才能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

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固然都害怕蒋介石，但蒋介石也还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比方说日本人。

如果把南方诸侯们叫作“内”，日本处于国门之外，就是“外”，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摆平了再跟日本人斗法。诸侯们则针锋相对，提出“攘外才能安内”，或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内自然安”，除了御外抗侮的民族情感之外，不得不说，牵制蒋介石，以保全自己，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在两广事变中，无论广东还是广西，都以抗日为名，以反蒋为实。广西的新桂系更好，竟然可以前脚接受日本武器和教官，后脚就“北上抗日”，敢情一样都不耽误。刘湘并不例外，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又比两广要磊落得多，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万县惨案时杨森与英军对阵开始，四川人在对付洋鬼子方面还真没怎么含糊过。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放弃东三省退入关内。有一次杨森召集所部军官开会，在会上大骂张学良，说：“什么叫军人？作为军人就要保卫国土！蒋介石不让你打，你就不打吗？真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说着说着竟然号啕大哭，连话也说不下去了。

杨森的激愤实际代表了四川军民的一种集体情绪。日本在成都原来设有领事馆，九一八事变之后就被迫关门大吉，日本侨民也撤回了国，此后日本外务省不断向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恢复领事馆。

新任外交部长张群就此征询刘湘的意见。邓汉祥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表示，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要设立领事馆的话，也没有条约上的根据，当然最重要的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川人仇恨日本的情绪甚为激烈，因此请外交部予以慎重考虑。

收到邓汉祥的电报，张群即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拒绝恢复成都领事馆的照会，但日方不管不顾，仍然计划派人潜入成都，做设立领事馆的准备。刘湘获悉后与邓汉祥计议，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一律不许接待日本人，同时派出密探队，跟踪监视所有入川来蓉的日本人。

1936年8月，日本政府所派出的四人先遣队利用各种关系住进了四川的一家大饭店。刘湘在派人规劝未果的情况下，策动了成都各界示威游行，以压迫先遣队出境。

按照刘湘的要求，举行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负责维持秩序，不对游行队伍进行干涉。由于群情愤慨，游行人群很快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四个日本人遭到痛殴，造成两死两伤，这就是“成都事件”（也称“蓉案”）。

蒋介石对“成都事件”很是恼火，专门来电相责，说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蓉案”应负完全责任。不料这次刘湘有高人相助，游行前邓汉祥特地通过民间抗日团体，出面邀请了成都的复兴社对游行进行指导。

复兴社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在蒋介石阵营内部，他们属于抗日主战的激进派系，与新政学系的相对低调保守完全不同。接到邀请，复兴社欣然同意参与其中，甚至都没有向蒋介石进行报告。游行过程

中，邓汉祥安排专人，用手提照相机将复兴社成员沿途活动的情形全都拍了下来。现在蒋介石要追究责任，刘湘就按照邓汉祥的建议，把当天拍得的照片函送南京，并复电说，“蓉案”系由成都中央人员（复兴社）领导和发动，又是爱国行为，因此，“事前未便阻止，事后无法缉凶”。

本来要打别人板子，没想到闯祸的却是自己的嫡亲儿子，蒋介石只得放弃对刘湘追责，改由南京外交部直接与日交涉。

这是关乎生存的斗争

“成都事件”是刘湘暗中支持的爱国行动，但从蒋介石进行追究时不依不饶的架势来看，将它纳入蒋刘斗争的范畴也未尝不可。

在赤裸裸的事实面前，蒋介石先前所有口头和文字上的“信任”“倚重”被证明都是谎言。经过“成都事件”，刘湘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对他的真实态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因而继续加深，且毫无调和的余地。

1936年秋，四川举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临时国大）代表的选举。蒋刘两大阵营对此都非常重视，康泽把复兴社和别动队都动员起来，深入四川各县，扶助反刘拥蒋的人员参加竞选。

刘湘也亲自拟订各县候选人名单，邓汉祥将名单秘密分发给各专员和县长，责成按名单选出候选人，同时还派出视察员，分赴各地监视选举。他暗示所有专员和县长：如果你们不照名单选人，不管专员还是县长，过后一律撤职！

民国时期的所谓选举，实在是个怪胎。从袁世凯时期的逼人投票，到曹锟的贿选买票，再到四川的监视投票，可称光怪陆离，但它又实在最快捷最有效，这么做的一方通常都会大获全胜。临时国大的选举结果，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当选者，皆来自刘湘拟订的名单。

康泽落败，无法向蒋介石作出交代，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以前有个杨永泰，现在杨永泰早已离开了四川，贺国光便倒了霉。康泽公然向他开火，说贺国光以刘湘的同学自居，平时倚仗川军自重，一味敷衍，乃是此次选举失败的罪魁祸首。

作为重庆行营的实际负责人，贺国光既要怀柔刘湘，又要忍受康泽和复兴社的攻击，其实是两头受气。思考一番后，他决定去拜访刘湘。

在见到刘湘时，贺国光非常恳切地说："我为甫公借箸一筹，你和蒋委员长如能彼此坦诚相见，则于国于川，两皆有利。如果相互对立，那大家都无好处。"

在座的邓汉祥未等刘湘回言，便抢先说道："刘主席原是拥护委员长的，委员长需衣，刘主席可以解衣，委员长需食，刘主席可以推食，但今天委员长要剥刘主席的皮，人而无皮，又如何可以生存呢？"贺国光哑口无言，只得怏怏而归。

四川就是刘湘的"皮"，刘湘绝不会容许蒋介石来剥他的皮，这是关乎生存的斗争。

蒋介石欲对刘湘"剥皮"，但北方麻烦不断，暂时又力不能及。这时刘湘也把视线移向北方，开始在北方寻找新的同盟者。

北方军人中，刘湘对冯玉祥最为推崇。倒不是因为冯玉祥与四川有过一段因缘，而是他在练兵和军纪上着实有一套，所训练出来的西北军堪称国内的超强军团，这让刘湘羡慕不已。

刘湘视冯玉祥为偶像，可冯玉祥起初并没有与四川方面合作的打算。在冯玉祥处于事业的鼎盛期时，常驻冯处的四川代表如果要拍发电报，都必须向他交出密电本，或是经他派人审阅签署后才能放行，有一段时间，冯玉祥甚至还检查乃至扣留代表们与四川的来往信件。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被蒋介石打到分崩离析，冯玉祥也不得不退隐泰山。虽然冯玉祥已经落寞，但刘湘对他始终还是敬畏有加。某次，他在重庆与冯玉祥的幕僚高兴亚偶遇，便请对方以第三人的身份，比较一下成都之兵与重庆之兵，双方孰优孰劣。

成都之兵是指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重庆之兵是指刘湘的军队。那个时候，刘湘正准备与刘文辉对决，他认为自己的军队起码在军纪上要比前面三位好得多，因此才有此一问。

同共产党交朋友

高兴亚是了解川军实情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家分掌成都，三军同驻一地，彼此都不能管辖对方，秩序很糟，往往还有白天发生凶杀案却不知道该属谁管的事发生，成都人称为“三不管”。高兴亚认为成都之兵军纪不严，难成大器，但他也据实告诉刘湘：“你的军队在纪律上比那三不管的地方要好些，可是我见到你的兵，还是害怕，没有安全感。”

刘湘闻言甚为尴尬，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谦虚地问高兴亚，可不可以将自己的军队训练到老西北军那种程度。

高兴亚断然答道：“不可能！”他随手列举了几条练兵的标准，认为川军根本就难以做到，刘湘被说得面红耳赤，沉默无言。

万源之战和“六路围攻”失败后，刘湘痛定思痛，在军中大力推行“新战法”，不过他还是觉得川军作风不够硬朗，若真的和蒋介石刀兵相见，必处下风，于是又想到了冯玉祥及其练兵之法：你说老西北军的练兵标准高不可攀，那我就汤下面，因陋就简一点行不行，就算练不出正宗的西北军，能端出个“准西北军”也可以啊！

这次刘湘联系到了冯玉祥本人，除请其派人入川帮刘湘训练军队外，他还希望能以冯玉祥为桥梁，与北方两大军事巨头宋哲元和韩复榘建立合作关系，以作唇齿相依。

冯玉祥不仅一一应允，还授刘湘以计：同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和谁联盟都可以，唯独对此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说：“我跟红军打过仗，现在要化敌为友，如何让我的部下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再说交朋友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双方都同意才行，共产党肯和我交朋友吗？”

冯玉祥知道刘湘抱有疑虑，便向高兴亚（时为冯玉祥的驻川代表）传达指示，让他以聊天的方式给刘湘说明白其中道理。高兴亚依言告诉刘湘：“冯先生说，你是军人，你的军队质量和数量，与他在极盛时期相比，何如？”

冯玉祥的极盛时期，拥有若干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而且全部训练有素，战力凶猛，乃名副其实的中原第一军团，岂是川军能够比得上的。刘湘连忙答道：“万万不如！”

高兴亚又道：“冯先生的将领都是多年由行伍训练提拔起来的。他本人当旅长有八九年没有升迁，长期扎根于一个旅，与部下有长时间的感情培养，因此这些部下都对冯先生非常尊敬。你与你的将领的关系，比冯先生如何？”

刘湘回答：“我的部属军官，多数是半途来归的，不如多矣！”确实，刘湘的不少嫡系将领，如王缵绪、范绍增，都是从敌方营垒转投过来的，养子就是养子，再养也隔着肚皮。

高兴亚引用冯玉祥的话对刘湘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以五百万元收买了韩复榘，三百万元收买了石友三，一下子拉走十来万部队。要是蒋介石来挖你的墙脚，恐怕还用不着五百万、三百万这样的代价吧？”

刘湘老实承认：“很对。”

高兴亚继续说：“冯先生与蒋介石是把兄弟，一块磕过头换过帖的，表面上他对冯先生非常推崇，即便决裂之后，还称冯先生为大哥。你同蒋介石有这种关系吗？”刘湘自然只能回答没有。

高兴亚随后又提到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恩”：“知道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来又是怎么上台的吗？”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其实是被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的。之后，冯玉祥认为白崇禧指挥无方，于是约阎锡山联名通电，请

蒋介石复出担任总司令，统一军权。这虽然是战事危机下的无奈之举，但事实上蒋介石就是赖此才得以重新上台的。

高兴亚问刘湘：“冯先生对蒋介石个人有着莫大的恩惠。你对蒋介石有这样的恩惠吗？”刘湘又只能回答：“当然没有。”

高兴亚说，冯玉祥对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称得上是恩重如山，可是蒋介石却恩将仇报，不择手段地收买冯玉祥的部下，把冯玉祥整得很惨。“蒋介石对有恩于他的把兄弟都是如此，对你，难道还会有所顾忌，不好意思下手吗？”

在高兴亚奉命入川之前，冯玉祥特意关照高兴亚，对着刘湘绝不要多谈革命的大道理，而是要针对他的个人处境，多谈存亡利弊，让他在既怕蒋又惧共之间做出决择。高兴亚讲了这么多有关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恩怨往事，为的就是进入了正题：“冯先生跟蒋介石打交道，吃够了亏，但是他跟共产党交朋友，就从来没有吃过亏。”接着他转述了冯玉祥的原话：“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石争天下，不是与你刘甫澄争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刀已插进你的心脏，为什么对与共产党交朋友还心存顾虑呢？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你看看我的情况，就知道不会吃亏！”

刘湘听完后茅塞顿开，兴奋异常，他用手在茶几上一拍：“冯先生真知我爱我者。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

以会治军

经过冯玉祥、高兴亚的耐心说服，刘湘一改出道以来对共产党的仇视态度，一面答应释放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一面与延安方面建立了直接联系。

大约从1935年或1936年起，刘湘就先后派代表前去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双方合作和联合抗日事宜。其间代表还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自延安返回后，代表向刘湘汇报了毛泽东的话："只有坚持抗日和民主，才能制蒋，譬如牵只老虎给他（蒋介石）骑在背上。骑上，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下来，就要被老虎吃掉。"刘湘大为叹服，从此将这句话引为圭臬。

1937年的某一天，高级顾问郭秉毅（来自冯玉祥系统，实际为共产党员）拿来一封毛泽东亲自写给刘湘的信，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

事后有人猜测毛泽东写这封亲笔信，真正的用意绝不只是为了请刘湘予以帮助，而更可能在试探刘湘对于双方合作的诚意。当着郭秉毅的面，刘湘的几个亲信经过商议，决定送一万元。

在没有通货膨胀之前，一万元不少了，也很管用，但意见上报刘湘后，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他立即在意见上批了"帮助五万元"。

延安方面也向四川派出了代表，四川地下党领导人罗世文即于此时入川，他与冯玉祥的驻川代表（部分也是地下党员）都受刘湘聘请，成为其高级幕僚。

在地下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刘湘办起了武德励进会。武德励进会的前身是武德学友会，后者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似，虽然人数众

多，但内部结构较为松散，有的人交过会费，但从来没有去过会址，更有甚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组织。即便是经常参加活动的会员，所能做的事也无非两件，一是联络感情，大家空下来打打扑克，推推麻将，或者吹吹牛聊聊天，一是办一本会刊，也无非是证明尚有这个组织存在而已。

刘湘新办的励进会与学友会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并存，学友会属于外围组织，完全公开，励进会属于核心组织，对外始终保密。

励进会的入会手续很严格，必须由两个老会员介绍，并经刘湘亲自批准，才能成为正式会员。入会之初，会员要宣誓，首要一条便是拥护会长，也就是刘湘。毒誓由每个会员自己填写，申明如有违反，须受的各种惩罚：有人填“枪毙”，有人填“杀头”，有人填“家破人亡，断子绝孙”……

念完毒誓，还要按手印，程序相当严格。刘湘最初发展的会员，都是营长以上的实职军官，后来逐渐推广到王陵基的保安队，最后连县政、财政训练班也被纳入其中。

凡是参加过蒋介石峨眉军训团的军官，都会被刘湘认定为有“中毒”嫌疑，这些人都不能马上介绍入会，必须先到他举办的军官教育团回炉再造。军官教育团名义上是上军事课，但主要仍是精神讲话，只是内容跟军训团反着来，而且由刘湘亲自主讲，这叫“消毒”。

只有消过“毒”，再经逐个考察，才能拥有加入励进会的资格和机会。在嫡系将领中，潘文华、王陵基首批被批准入会，成为刘湘暂时能信得过的自己人，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则受到励进会的严密侦

察和监视，因刘湘怀疑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每天被派去盯梢他的特务竟达到二十人之多。

依靠励进会，刘湘成功地从“以神治军”过渡过“以会治军”。最盛时，励进会员达到八百多人，逐渐形成了以刘湘为中心的所谓甫系。

在刘湘的护持下，地下党逐渐进入励进会的核心决策部门，并在蒋刘斗争中扮演起重要角色。康泽的复兴社无孔不入，到处收集情报，地下党就在励进会中设立情报训练组，专门训练反蒋特工人员。

别动队是康泽身边不可或缺的打手。别动队持有武器，且受过军事训练，一般人不敢惹，励进会便也相应成立了特务队，对别动队进行打击。由于别动队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四川地方又大，以至于吃了亏后，都不知道应该找谁算账。康泽气急败坏，找到刘湘大发雷霆，质问是怎么一回事。刘湘推说他会慢慢调查，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头目给打发掉了。

蒋方人员发现要打入刘湘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参谋团成员之一荀乃谦初到重庆，在一个星期天去看望老友蔡军识。蔡军识是刘湘部下的少壮派军官，同时也是励进会骨干成员，他直言不讳地对荀乃谦说：“中央入川帮助‘剿共’，我们竭诚欢迎，如要征服四川，那将受到抵制。”

在励进会的明争暗攻下，一贯叫得最凶的康泽率先支持不住，政训活动被迫停顿，并于年底自行撤销，他自己也被调去搞“禁烟缉私”了。至此，除少数隐藏得较深的复兴社骨干外，重庆行营、成都军校、宪兵团、别动队都纷纷偃旗息鼓，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遭到了极大削弱。

既高兴又忧虑

正是因为与共产党等政治力量进行合作，刘湘才得以根本性扭转自己在蒋刘斗争中的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他派张斯可赴广西南宁，与延安代表、广西代表共同签订了“红（军）、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要联合反蒋和共同抗日。

刘湘还希望将省外的这盘棋做得更大一些。1936年9月，他召集励进会骨干成员，在成都公馆举行秘密会议，他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如何交结更多的盟友，让众人支着。大家经过一番讨论，所提交的盟友名单中列举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以及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等。

陕西本是杨虎城的地盘，张学良在“九一八”后失去了东北，长城抗战后又失去了华北，已无固定防区，只能在陕西寄食以存。根据相关情报，蒋介石要调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去福建，调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去甘肃，另由胡宗南进驻西安，取代张杨。

刘湘分析认为，蒋介石的这一调动必然会激怒张杨，现在要联络张杨反蒋恰在其时。反倒是韩复榘和阎锡山，虽然也与蒋介石有矛盾，但他们本身的地盘不小，因此投鼠忌器，很难下决心造老蒋的反。

刘湘决定联络陕西的张杨。经过物色，他决定派川康绥署顾问黄慕颜（共产党员）完成这一使命。黄慕颜首先去广西，与李宗仁谈妥了川、桂、陕合作反蒋的事宜，接着便由成都乘机去西安，对外则宣称前往陕西洽谈川陕联防事宜，用以避人耳目。

黄慕颜的妻兄傅剑目在西安绥靖公署任交际处长，是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通过这一关系，黄慕颜顺利地就见到了杨虎城，并将一份川、桂、陕联合反蒋的电稿交给了杨虎城。杨虎城说他和刘湘在见解和想法上完全吻合，但他要黄慕颜稍等几天，待他和张学良研究之后再行答复。

1936年12月11日晚，黄慕颜正要入睡，忽然听到枪声响个不停，他忽忙用电话向绥署询问，得到的回答说是“无事”。第二天早晨，傅剑目前来告诉黄慕颜，因蒋介石执意不听张杨苦谏，张杨只得实施兵谏，已将蒋介石予以扣捕。黄慕颜闻之大喜，随即致电告刘湘，报告事变经过，并建议刘湘解决在川的蒋军部队，作为对西安的响应。

西安事变爆发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讯急忙赶回成都，召集将领和心腹大员开紧急会议，紧接着他们就收到了黄慕颜的电报。确证消息属实，众人既高兴又忧虑。高兴的是张杨胆识兼备，竟然扣留了蒋介石，忧虑的是时局变化无常，若抢先动手解决在川蒋军，四川便很可能因此成为与蒋军开火的第一个省份，而据各方消息，张杨并无杀蒋之意，万一老蒋大难不死，恐怕将来难以转圜。

会议商讨了几个小时也难以做出决定，最后刘湘听从傅常和邓汉祥的建议，决定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多看几天再说。

当天，四川发出两封通电，一封出自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封出自刘湘，前者自然是声讨张杨，后者看似态度模糊，实质却是寓支持于模糊之中。见刘湘举止暧昧，贺国光惶惶不安，一再找刘湘和邓汉祥探问，并竭力劝说刘湘拥护南京政府。

不久，南京来电，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声称要调集“百万大军”包围西安，讨伐张杨。早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孙震闻风而动，一面通电声讨张杨，一边命其驻于川陕边境的部队开拔入陕，以示对蒋的忠诚。刘湘得知后，立即以川康绥靖主任的名义给孙震下达电令，要求速将部队撤回川境，不准擅自行动。

除孙震外，川中其他将领如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等都在静观局势变化，没有匆匆表态，这也进一步凸现出了时局的复杂微妙。

嗣后新的消息传来，蒋军已攻入潼关并派飞机轰炸滑县。刘湘估计，在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恐怕不会再留着蒋介石做人质了，而且就算蒋军暂时未攻西安，光用飞机轰炸，也得把老蒋给炸死。

刘湘盘算着用武力解决在川蒋军的时候到了。征询幕僚们的意见，高兴亚（也已被刘湘聘为高级顾问）、郭秉毅都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因为过早解决在川蒋军，必然会把南京的注意力引到四川来，从而使得川民遭祸。他们建议，如果南京出动飞机炸西安，真把老蒋炸死了，到时再动手也不迟。

刘湘认为言之有理，他以潘文华为总指挥，傅常为副指挥，授令二人负责先将在川蒋军完全包围起来，之后再视情况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在成都的蒋系军分校、省市党部、宪兵团、特务机关等处全部遭到包围。发现自己被包围后，各单位人员当然不甘于坐以待毙，所有大小官员都昼夜和衣不睡，自动自发地出来抢筑工事，且不论文武，全部持枪在手，欲作困兽之斗。成都市区由此一片肃杀，街上连行人都看不到几个。

穿心剑

刘湘等着老蒋毙命，便好下达进攻令，但黄慕颜那边迟迟没有消息。1936年12月16日，刘湘召集高层会议，以便敲定最终立场。会上，傅常、潘文华主张立即响应张杨，对在川蒋军发起进攻。

听完傅潘之言，刘湘问邓汉祥以为如何。邓汉祥依旧审慎稳重，认为："策之上者，莫若静观其变。蒋败，不过是瓮中之鳖，万一事有反复，则我未轻举妄动，大可免遭嫉恨。"

他反对傅潘的意见，不同意对在川蒋军轻举妄动："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能搬得走吗？又假设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到时候我们怎么下台？"

有了两广事变时的教训，刘湘已不敢再随便头脑发热，他觉得邓汉祥分析得很对，便力排众议，采纳了他的建议。

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案，邓汉祥出面安慰贺国光及其他在蓉人员，宣称"对陕变异常愤慨，主张从速设法营救蒋委员长"。刘湘对外也换上了一副新面孔，领着邓锡侯等人，口口声声要"营救领袖（蒋介石）"。

这当然都是做给人的表面文章，如果是真心"营救领袖"，刘湘也犯不着把孙震给硬拉回来了——最好是张杨直接杀了老蒋，那得省多少事啊！

可是让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调解下，西安事变最终还是得到了和平解决，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

陪送其回到南京。刘湘对此既失落又诧异，但也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撤兵解围。

邓汉祥说的是对的。依靠他的远见卓识，蒋刘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继两广事变之后，刘湘又躲过了一次莫测风险。当然刘湘也没有办法将他兴兵包围在川蒋军的事都一概抹去，相关报告早就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双方原来就有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积越深。

1937年2月，社会上突然各种谣言纷传，有的说蒋介石要下手搞刘湘，有的说刘湘也将有所行动。驻川蒋军与川军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双方都忙于构筑工事，以备不测。直到已升任代行营主任的贺国光急忙下令将工事全部铲除，刘湘也通过讲话辟谣，事态方告平息。

所谓“谣言”从来都不是没来由的。蒋介石给刘湘发来电报，让他派全权代表到南京商议要事。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蒋介石又在动脑筋对付他了。

跟蒋介石打交道，环顾川幕，唯邓汉祥能胜此任。在送邓汉祥出川时，刘湘把自己想好的策略告诉了邓汉祥：“无论蒋介石出什么题目，我们都要抱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打仗为上策。”

3月18日，邓汉祥由贺国光陪同，乘专机飞至南京。一下飞机，他就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当地舆论都在议论四川企图“造反”。

在这种舆论包围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了。果然，蒋介石召见邓汉祥，一开口就说：“四川的军队太多了，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应该缩编！”

预想中的铁砂掌打来了，邓汉祥不慌不忙，以刘湘所传的拖字诀应之：“如果四川各军都按照一个标准同时进行，自属必要……”

蒋介石同样准备充分，铁砂掌刚出，飞剑又至：“甫澄（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一直深恐他力有不逮，所以这次我准备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担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这样也便于他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这不但是飞剑，还是穿心剑，眼瞅着直奔对方的胸口致命之处而去。邓汉祥既不能退，也不能闪，更不能拖，只能硬生生接招。

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省政府成立，防区制取消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方面，才稍稍有了眉目。邓汉祥由此出发，论证如果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人负责，不仅难收辅车相依之效，反而还会增加南京政府西顾之忧。

可是不管邓汉祥如何分析其间的利弊得失，蒋介石始终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眼见相持下去甚为不利，邓汉祥想了想说：“委员长日理万机，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机会。”蒋介石料想邓汉祥也要不出什么花招，便点头应允，并指定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其商榷。

舍卒保帅

邓汉祥反复权衡，在蒋介石势大，又不能刀兵相见的前提下，要想缩着脑袋一刀都不挨是不可能了，按照刘湘“拖一天是一天”的策略，只能选择舍卒保帅。他对何应钦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

事，如果同时进行，逼得过紧，恐难免滋生事端，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

邓汉祥提议，可以先缩编川军，过一些时候再搞军民分治，这样“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何应钦听后向蒋介石进行了转述，蒋介石一合计，左一刀右一刀，反正都是一刀，排着队砍也未尝不可，于是在第二次接见邓汉祥时，便不再提及军民分治，只决定于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渝主持。

邓汉祥返回成都，将前后情形跟刘湘一说，刘湘也意识到此番不同往日，蒋介石对四川是有备而来。

假如当初不听邓汉祥之言，贸然向在川蒋军发起进攻，不管进攻能不能奏效，有一点可以确定，蒋介石绝不会跟你这么啰里啰唆，他早已直接派兵打到四川了，现在还能分步骤来，其实已经算是留了余地。权衡一番之后，刘湘不得不致电蒋介石和何应钦，表示拥护整军会议。过了些日子，他又再做让步，声明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川军国军化，政治中央化”，川军随后也腾出部分防区，供蒋军正式进驻重庆。

这是刘湘备受煎熬的一段时间。西安事变后，曾一度起到作用和效果的合纵之术已经式微，面对蒋介石在军政两面的凌厉攻势，南北各省诸侯均噤若寒蝉，没一个敢上台过招。

1937年4月30日，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的第十七路军就已经瓦解，对于军人来说，一旦失去枪杆子，别人怎么摆布你都可以。

当天，刘湘离开成都市区，移居金花桥别墅。金花桥别墅是一座乡村别墅，坐落于成都至双流的公路附近，有专用汽车道与公路连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可以沿公路逃生。过去刘湘养病都是去大邑老家，这次破例住进金花桥别墅，实在是被杨虎城的遭遇给吓得不轻。

四天之后，见周围尚无异样，刘湘这才返回成都，而且一回来即将蓉、渝两市的警察局长予以撤换。

似乎暂时还是安全的，在整军会议之前。尽管刘湘内心很是害怕，但一天天过去，召开整军会议的日子还是在不断逼近。何应钦致电刘湘，告知他即将飞抵重庆，同时叮嘱他如期与会。

刘湘的嫡系部将闻讯，大多劝止他赴渝，刘兆藜等三个旅长更是跪在地上痛哭，说到重庆凶多吉少，万一被扣，就毫无办法了。刘湘尽管已答应与会，但其实心里也一点儿底都没有。

彼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在山上都驻有代表，代表们发回的电报，无一例外都说蒋介石欲借整军会议来收拾刘湘。这些电报当然不是给刘湘看的，但刘湘有办法偷看到，他的侦察电台可不是吃干饭的。

看完电报，刘湘顾虑更大了，就担心何应钦在会上当场拿他开刀。

谋士和武将数不胜数，到头来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却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邓汉祥。刘湘问邓汉祥，他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邓汉祥说："假使我替蒋介石策划，就绝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光扣你有什么用呢，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

那蒋介石会用什么办法进行整治呢，“不如用绳子勒！”乍听此言，刘湘被吓了一大跳，但邓汉祥所说的“勒”并非真的是用绳子勒，而是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蒋介石可以先缩编你的军队，再逼你实行军民分治，最后再调你到中央当个部长，岂不省事得多？”

邓汉祥分析认为，蒋介石没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整军会议上直接予以扣留，而是会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卸除刘湘的兵权，所以刘湘大可不必过于惊谎。

当然所有这些也都只是推测，为刘湘的安全起见，邓汉祥又想出了一个相对为稳妥的办法。

哑巴吃黄连

按照事先约定，刘湘、邓汉祥同时从成都出发，但二人所乘交通工具不同，刘湘乘的是汽车，邓汉祥乘的是飞机，这样邓汉祥便提前到达了重庆，而刘湘则一路慢行，最后停于璧山。

邓汉祥告诉刘湘，他到重庆后将先同何应钦进行密谈，摸到底细后再到璧山与其会合，而刘湘的行止完全依照试探的结果而定：发现整军方案危及川局，接受不了，便马上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折回重庆；如果对方开出的条件尚不难接受，就大大方方进重庆。

邓汉祥到达重庆后，马上到机场接得何应钦。二人寒暄已毕，邓汉祥首先对何应钦说：“你不知道，这里的谣言很多。”何应钦忙问是什么谣言。邓汉祥便告诉他：“不外整军就是在整刘甫澄（刘湘）。”

何应钦不听则可，一听赶紧辟谣，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邓汉祥保证：“我带来的是一张白纸，刘甫澄想要如何写就如何写。”

这正是邓汉祥想得到的答案，他和刘湘怕就怕蒋介石利用整军会议，或直接扣人，或卸其兵权。为了进一步加以确证，他故意说：“蒋先生的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特别是我不知道你给我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何应钦急了：“我是贵州人，川滇黔向称一家，而且我对甫澄素无恶感，如果委员长真要收拾他，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邓汉祥和何应钦是同乡兼同学，平时私交不错，彼此之间也很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气。邓汉祥注意到，何应钦在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自然，没有一丝一毫硬装出来的表情，因此判断何应钦没有欺骗他。于是他当晚就赶到璧山，将前后经过详详细细地对刘湘说了一遍，刘湘这才决定前往重庆。

1937年7月1日，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何应钦先代表蒋介石讲了一通会议的意义，刘湘、邓锡侯等人赶紧假惺惺地表示拥护。接着便进入了实质话题，何应钦为会议定调：“川康军队，从数量来上讲，报中央备案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个团，竟然比日本常备部队的两倍半还多。以四川一省来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无怪乎质量难以提高，所以四川军队急需整理。”

说一千道一万，不过还是要缩编，可握枪杆子的又有谁舍得朝自己身上砍一刀？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谁都不表态，刘湘也缄口不言。

会议形成僵局，只得暂时草草收场。何应钦着急万分，他虽然带来的是一张白纸，但总得往上面填点啥，否则不好交差啊。无奈之下，他通过顾祝同对范绍增进行说服，要他在会上带个头，主动裁减军队，条件是将来另外成立一个军，由他出任军长。范绍增早就跟刘湘离心离德，觉得这个买卖不错，于是一拍胸脯，应承下来。

再次开会，范绍增第一个开口发言："服从中央，裁减我师！"

范绍增的表态，一下子为缩编打开了缺口，会议随后完全被何应钦一人所掌控，由着他哗啦哗啦地把价码往上抬：川军缩减十分之二；川军团长以上军官以后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军饷每月由南京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

何应钦从南京带来的确实只是一张白纸，可是转瞬之间，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刘湘不仅要裁军，而且眼看着连军队的用人权和财权都保不住了。

刘湘和各军头领瞪目结舌，都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正在众人大伤脑筋之际，何应钦突然宣布中止会议，并马上紧急启程返回南京。

会议无疾而终，决议自然也就无法落实了，包括刘湘在内，川军将领们皆喜出望外，如蒙大赦。

何应钦中途离场的原因很简单，七七事变爆发了！

参考文献

［1］但懋辛．清末留日学生与新军［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02～203.

［2］熊克武．辛亥革命前四川历次起义亲历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248～258.

［3］向楚，朱必谦，石体元，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22～49.

［4］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94～100.

［5］熊克武．四川十年回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2874～2883.

［6］熊克武．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001～029.

［7］严啸虎．国民党改组前四川国民党派系争夺战［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15～019.

［8］李有明．护国战争在川始末［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001～023.

［9］熊克武，熊达成．虎门蒙难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040～048.

［10］黄爵高．蒋汪扣捕熊克武及其总部人员之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049～054.

［11］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专辑：第一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2］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专辑：第二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3］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专辑：第三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4］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专辑：第四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5]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专辑：第五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6] 杜凌云，彭惠中．四川自流井盐税的掠夺战［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187～203.

[17] 邓锡侯，田颂尧．1917年成都罗刘、戴刘之战［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027～036.

[18] 邓之城．丁巳蜀战亲见备忘［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035～046.

[19] 邓汉祥．刘戴混战有关见闻［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047～050.

[20] 杨思义．刘戴成都巷战亲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051～062.

[21] 余承基．刘戴成都巷战血迹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051～062.

[22] 金汉鼎．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0

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077～111.

［23］吴克雄．四川讨贼军的兴起和失败［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037～068.

［24］李筱亭．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四川情况片断［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119～130.

［2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大邑文史资料选辑：刘湘专辑［G］．大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3.

［26］杜岷英．刘湘的起家［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348～358.

［27］邓汉祥．我所知道的刘湘［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001～018.

［28］鲜英．刘湘早期二三事［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019～032.

［29］马宣伟，吴银铨，肖波．杨森的一生［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79.

[30] 冷寅东．回忆杨森［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05～608.

[31] 严啸虎．杨森简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09～612.

[32] 刘石渠．我所知道的杨森［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13～629.

[33] 杨小捷．我的家庭内幕［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30～640.

[34] 冉廷栋．杨森之成败史［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41～646.

[35] 熊中岳．1915至1928年的杨森［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53～657.

[36] 杨汉域．杨森部下的反叛［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79～680.

［37］郝奕隆．我与杨森相处的日子［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07～209.

［38］傅渊希．由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到川黔联军倒杨战争［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032～050.

［39］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刘湘、杨森联合驱袁祖铭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051～067.

［40］杨芳毓．四川军阀刘湘的整军练兵活动［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359～363.

［41］蒋逵．我为刘湘训练海空军的前前后后［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082～115.

［42］范崇实．为刘湘扩充反动武装的亲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039～047.

［43］刘华钧．刘湘的兵工厂［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048～051.

[44] 宁芷邨，马绍周，李时辅．刘航琛其人［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8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065～100.

[45] 王抡楦．刘航琛从政内幕［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061～073.

[46] 周之德．记刘湘的神仙军师刘从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186～202.

[47] 蒋尚朴．刘神仙与四川军阀［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160～167.

[48] 何翔炯，奉伯常，陈仕俊，付英道．我们所知道的邓锡侯［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023～042.

[49] 何煋荣．田颂尧、刘文辉成都巷战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075～084.

[50] 冷寅东．刘湘、刘文辉争霸四川的几次战争［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052～064.

［51］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095～105.

［52］马宣伟．二刘之战［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16～145.

［53］黄应乾．刘湘、刘文辉混战始末［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059～074.

［54］黄应乾，鲜宝濂，何煜荣，等．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

［55］陈光藻遗稿．四川军阀最后的一场混战［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085～094.

［5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57］范绍增，徐伯威，况鸿翔，等．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暨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专辑）［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5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59］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60］唐宏毅，杨重华．配合红军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三台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三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001～009.

［61］四川政协文史研委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109～123.

［62］邓汉祥．段执政时我所经历的一鳞半爪［M］//文斐．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22.

［63］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堵击红军长征之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043～077.

［64］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147～177.

［65］吴嘉陵．刘湘六路“围剿”红军始末［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46～174.

［66］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053～071.

［67］杨学端．“峨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回忆［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090～106.

［68］陈雁翚．邓汉祥在刘湘统治时期的活动［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136～146.

［69］高兴亚．冯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240～250.

［70］高兴亚．冯王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的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75～188.

［71］於笙陔．刘湘主川开办的“七训”［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73～193.

[72] 曾扩情．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内幕［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106～116.

[73] 邓汉祥．四川省政府及重庆行营成立的经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117～128.

[74] 黄慕颜．西安事变侧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203～204.

[75] 周少稷．西安事变前后刘湘的反蒋谋划［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205～214.

[76] 张正祥．西安事变前后刘蒋的明争暗斗［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215～226.

[77] 徐中行，昌荣威．西安事变时刘对蒋在蓉军校部队的接收准备［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227～228.

［78］田一平．武德励进会纪实［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89～206.

［79］田一平．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001～012.

［80］甘绩丕．川康整军会议的形形色色［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129～134.

［81］邓汉祥．一九三七年重庆整军会议［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147～154.